

社

会

学

(第十版)

〔美〕戴维·波普诺 著

李 强 等译



社会学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RENTICE HALL 出版公司

000
G1
543

社会学

(第十版)

[美] 戴维·波普诺 著 李强 等译



社会学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RENTICE HALL 出版公司

20004 6月 27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学 (第十版) / (美) 波普诺著; 李强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社会学译丛)

ISBN 7-300-03194-3/C·177

I. 社…
II. ①波… ②李…
III. 社会学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2498 号

社会学译丛

社会学 (第十版)


[美] 戴维·波普诺 著
李 强 等 译

出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Prentice Hall 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62514146 门市部: 62511369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46.75 插页 3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 979 000

定价: 6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序言

社会学学科在祖国大陆的恢复，从1979年算起，至今已有整整20年了。然而，提起社会学，不少人还是会反问道：“什么是社会学？”可见，迄今为止，社会学的知识在祖国大陆还不很普及。

尽管我们可以给社会学下一些精确的定义，但是，要真正理解社会学的精髓，最好还是和经济学作个对比。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的。所谓经济行为是以追求经济利益或利润为目标的行为。经济学的目标是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或简称“效率”。与此相对应，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行为，所谓社会行为是影响社会利益的行为。社会学的目标是追求“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的核心问题，讲的是社会公平或社会公正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学追求的核心目标。追求效率和实现公平，两者缺一不可。这里所说的社会公平是广义的社会公平，例如，它包括调整贫富差距、建立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口、治理贫困、消除犯罪、保护环境等等。因此，社会学在实现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追求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如果说，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前20年（1979—1999年）遇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的问题，那么，它的后20年遇到的将主要是社会发展的问題，因此，社会学在中国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为向社会各界提供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笔者特组织和翻译了美国戴维·波普诺教授所撰写的社会学教材。波普诺教授的这本

《社会学》自1971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美国各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青睐，该书成为美国社会学课堂上最为流行的教材。波普诺教授本人也不断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对该书加以改进，迄今为止，该书已经出版了十版。在得知我们翻译该书第十版时，波普诺教授还很高兴地为我们写来“中文版序言”。

本书的翻译出版是群体力量合作之结果。笔者所组织的译者，除陈运辉为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讲师外，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和博士、硕士毕业生，其中很多毕业生都在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工作。他们能放下自己手头繁忙的研究工作而全心致力于本书的翻译，此种敬业精神正是本书可靠的翻译质量之保证。刘精明和郑路两位同志协助笔者对全书作了大量的校对和整理工作，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两人的尽心尽职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还得益于诸多同志的关心和支持。郑也夫教授、沈原研究员、何光沪研究员为本书的翻译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王爱玲编辑和洪大用同志在笔者外出讲学期间，曾帮助我作过许多翻译进程中的协调工作；冯仕政同志协助查对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原文，并做过不少联系工作；赵斌同志对某些章节的译文提出过修改意见；特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潘宇同志为本书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在此，我代表所有的译者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各章的具体分工情况是：

译者序言：李强；	第十一章 龚维斌；
中译本序言：陈翔；	第十二章 吕新萍；
第十版序言：刘精明；	第十三章 吕新萍；
第一章 李强；	第十四章 史威琳；
第二章 邓建伟；	第十五章 史威琳；
第三章 章谦；	第十六章 郑路；
第四章 郑路；	第十七章 周红云；
第五章 洪大用；	第十八章 周红云；
第六章 刘精明；	第十九章 周红云；
第七章 刘精明、邓建伟；	第二十章 周秋良；
第八章 陈运辉；	第二十一章 郑路；
第九章 龚维斌；	第二十二章 陈翔。
第十章 龚维斌；	

此外，王洪伟同志曾经参加过本书第十六章的翻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96级本科生唐品林同学负责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法语姓名译名手册》等译名工具书翻译和统一了书中所出现的外语人名。

虽然本书译者确有精益求精之态度，但囿于水平，译文中仍恐有不妥之处，敬希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李 强

1999年5月20日于人民大学林园



中译本序言

我很高兴我的《社会学》这本教科书有了新的中译本。但更让我高兴的是，这本新书的出版，显示了社会学这门学科在当今中国是非常活跃的。

这里有一点我要着重指出，即本书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社会。读者将同时看到当代美国人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也能看到美的一面和丑的一面。细心的读者一定能够通过本书对我们美国人是如何生活和思想的有一个开明的认识。

除此之外，由于本书强调比较的方法，中国学生还应该改变许多社会学的概念，以适应你们的文化环境。这里所说的改变，指的是概念的应用可能需要改变，但最好不要改变概念本身。这是因为，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整套精练的理论和研究技术，不管一个社会的政治特征、文化的独特性或是经济发展的层次如何，社会学都可以卓有成效地应用于任何社会环境中去。

实际上，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观察我们的社会世界提供一种客观和不偏不倚的方法。这一目标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科学性的。它是认识的导向，而非政治和社会变迁导向。就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而言，社会学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学科。正由于社会学这种通过科学研究而获取更好认识的能力，我们应该把它视为科学革命的一个分支，社会学无疑是现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

戴维·波普诺



第十版序言^①

在为大学生写作概论性的教材时，作者总会面临一些挑战。这种挑战也表明介绍社会学学科的教材存在极大的需求。社会学学科内容广泛，理论观点常常相互冲突，而学生的背景又各不相同，这就使作者在取材、确定写作目的、写作风格等方面遇到一系列困难。

在准备这本教材第十版的时候，我脑海中最初的目的是：用系统、学术化的方式来表达基本的社会学内容，同时为用社会学知识解释日常生活而提供最大可能的社会学洞察。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力求使该书能够做到既深刻又完整、既有可读性又保持社会学的准确性、资料既有更新又能顾及原来的传统。在处理意识形态的争论的时候，我力求做到公正、无偏向，为学生提供各方面的观点材料，让学生自己作出判断。

在第十版中，为更能体现社会学的新发展，对学生更有吸引力，我对本书作了许多调整。几乎在所有的章节中，我补充了大量额外的新材料来进行深度的改写。我尽力去提高该书的可读性、简明地阐释艰深的概念，并使用书本中提供的例子来将概念运用到对生活的分析之中。此版的一个新的特征就是“大众文化”的栏目，它提供了对文化问题、人格、事件的社会学分析。

我也尽可能对该书的内容进行更新。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学

^① 针对我国读者的需要，本序言的翻译有所取舍。

已经完成了大量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在种族与民族、性别、年龄和健康以及教育领域。我试图对最为重要的社会学研究加以总结，并用学生可以接受的方式加以介绍。统计数据作了更新，图表作了修订，并加入了大量的图解说明，其中许多还用彩色颜色来示明。大多数章节还将美国置于跨文化的视野中加以详细讨论。同时重新改写了教材的补充部分。



第十版内容安排

第十版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对社会学学科、历史及其研究方法作了一个轮廓性的介绍。第一章一般性地介绍了社会学学科的基本假设、发展历史、理论视野以及社会学的用途。第二章用应用研究的例子完整地讨论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过程。

第二部分“社会组织 and 个体”的讨论是以第三章“文化”作为总述开始的。在第四章中，我们讨论了社会学中一个共性的核心问题“社会和社会结构”。该章将功能主义理论视角和冲突论的视角进行了广泛的比较讨论。第五章从宏观进入微观，我们讨论了社会互动、包括符号互动论、拟剧理论、本土方法论、非语言沟通以及社会网络。第六章对社会化的讨论包含了人格发展和生命历程的一些理论。第七章讨论的是群体、组织。作为第二部分的结束，第八章对越轨、犯罪与社会控制进行了深入讨论。

第三部分涉及的是社会不平等。第九章汇集了关于社会阶级、社会地位、社会分层的主要理论材料。第十章内容覆盖了美国社会中的阶级与贫困问题，并介绍了美国的社会福利计划与现代福利改革。民族和种族（第十一章）、年龄与健康（第十二章）是其他重要的社会不平等的基础。第三部分的结尾章是对性别（gender）不平等的讨论。

第四部分我们转向了对主要社会设置的讨论。家庭也许是最重要的社会设置，它是第十四章的主题。第十五章关于教育、第十六章关于宗教的研究材料都作了扩展和更新。第十七章讨论世界范围内的权力、政治和政府，同时也包含了对美国政治和政府体制的详细讨论。第十八章对经济和工作讨论不仅分析了美国的劳动异化和满意问题，同时也广泛讨论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制的差异。

第五部分“社会环境和社会变迁”，主要是针对社会各主要维度的社会变迁。第十九章讨论的是人口和生态，第二十章处理的是城市、城市发展和社区变迁，第二十一章是关于集合行为和社会运动，其间认真讨论了80年代以来的重大社会运动。作为本书的总结，第二十二章讨论了社会变迁及未来的社会发展。



本书特征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各章恰当的地方插入了五种不同类型的经验材料栏目，以帮助学生透过社会生活的事实来理解书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内容。

“社会学之窗”（Window on Sociology）：该栏目扩展或深化了正文所触及的讨论主题。一些栏目是对以前发表的论文和书籍的某些部分的缩写。

“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扩展了对世界范围内的各不同社会的某些特定方面的社会学讨论。

“应用社会学”(Applying Sociology):此栏目为学生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而设计。

“新闻报道”(In the News):此栏目取材于当今社会中的一些重要新闻事实,每个“新闻报道”中都提供了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讨论。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此栏目将一些社会学概念与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大众文化联系起来,尤其是与电影、电视及流行音乐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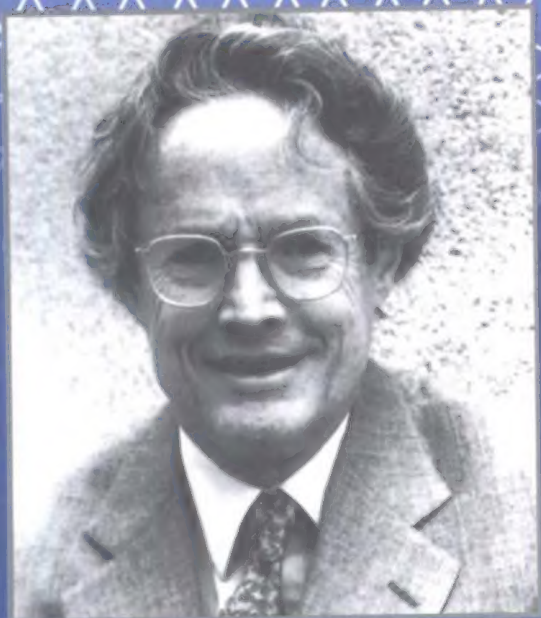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可读性。一本好的教材应该让学生可读、想读。一本书的可读性主要依赖于三个因素:内容的组织、语言、趣味性程度。为达到较高的可读性,教材的材料必须很好地加以组织,并一步一步地清晰地呈现给读者。本书的每一章就是这样分为三个或更多的主要主题部分的。

简练通俗的语言也可使一本书具有可读价值。为理解新的主题内容而不得不学习所有的术语词汇,学生总是为此而犯难。有鉴于此,本书只是使用一些为理解基本社会学内容、为进一步的课程作准备所必须的专业术语。每当使用一个新的术语时,书中都用黑体字标出来,并给出明确的定义。

相关材料可以促使人们去阅读因而增加一本书的可读性。本书在阐明社会学理论和概念时,不仅仅是表述已发表的研究之结果以及对相关社会问题的讨论,而且还利用了学生自己社会环境当中的例子——朋友、父母、同学、邻居的日常行为。

每章都以“总结与关键概念”来结束该章的内容,它回顾了该章中最重要的观点、概念和发现,并重复表述了该章中每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术语及其定义。

在每章的后面还包括了一个推荐阅读书目,以便学生获得进一步的信息。这些读物的范围包括经典的研究和近期学术界最著名的研究范例。



作者简介

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是位于新布伦瑞克的新泽西州立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和副院长、拉特杰尔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社会学教授、拉特杰尔社会学系前系主任、学生指导委员会主席。他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家庭、社区变迁等方面有高深的造诣。发表过大量的论著,其中最近的一本是:《家巢的扰动: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变迁及其衰落》。其他主要著作涉及个人幸福、公众境况、城市郊区环境等。

波普诺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大学毕业于俄亥俄州安提阿学院,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学术生涯是从城市规划领域开始的。此后,波普诺教授曾在拉特杰尔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担任研究指导,在该大学除了开设社会学导论性课程外,还讲授城市社会学、婚姻与家庭社会学、城市规划、环境社会学、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比较社会制度、社会变迁和社会理论。

波普诺教授夫妇及其两个女儿现居住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他目前还是美国家庭委员会的主席之一。



目 录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一章 社会学导言	2
一 什么是社会学	3
1. 社会学的研究方式	3
2. 社会学:显而易见的科学吗	4
3. 社会学的基本假设	7
4. 社会学的“为什么”	8
5. 社会学的解释	9
6. 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	11
二 社会学的历史及其发展	12
1. 经典人物	12
2. 美国社会学的发展	14
三 社会学理论	17
1. 功能主义的视角	18
2. 冲突论的视角	18
3. 互动论的视角	19
4. 对三种视角的简要评价	20

四 应用社会学	21
1. 社会学与社会	23
2. 为什么学习社会学	28
总结与关键概念	29
推荐阅读书目	31
第二章 社会学研究的过程	33
一 研究过程	34
1. 社会学解释	35
2. 变量分析	37
3. 统计控制和多变量分析	39
4. 社会研究的阶段	41
二 研究方法	43
1. 调查研究	44
2. 试验	47
3. 观察	48
4. 第二手分析	51
5. 研究策略	52
三 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和伦理学	55
1. 客观性和偏见	55
2. 社会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56
3. 道德中立	57
总结与关键概念	58
推荐阅读书目	60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与个体

第三章 文化	62
一 什么是文化	63
1. 文化的定义	63
2. 文化的演进	64
二 文化的构成	66
1. 符号	66
2. 价值观	69
3. 规范	70
4. 物质文化	72
三 文化的分析	73
1. 文化分析的视角	73
2. 文化的差异和统一	76
3. 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性	77
4. 亚文化	78

5. 文化整合	80
6. 文化变迁	81
四 美国人的价值观	81
1. 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	82
2. 对美国人价值观的其他分析	85
总结与关键概念	89
推荐阅读书目	91
第四章 社会与社会结构	93
一 社会结构	94
二 社会结构的单位	95
1. 地位	96
2. 角色	97
3. 社会群体和组织	99
4. 宏观社会结构	102
三 社会的类型	103
1. 社会的生存方式	104
2. 公社社会和社团社会	105
四 关于社会的几种理论视角	108
1. 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	108
2. 冲突论的理论视角	110
总结与关键概念	112
推荐阅读书目	114
第五章 社会互动与社会网络	115
一 什么是社会互动	116
二 符号互动论	117
1. 乔治·赫伯特·米德	117
2. 符号互动论的原理	118
3. 共享定义	119
4. 批评	120
三 关于社会互动的其他理论	122
1. 拟剧论	122
2. 本土方法论	127
四 非语言沟通	128
1. 体态语言	129
2. 个人空间	129
五 社会互动的形式	130
1. 交换	131
2. 合作	132
3. 冲突	133

4. 竞争	133
5. 强制	133
六 社会网络	134
1. 网络特性	134
2. 小世界研究	137
3. 网络分析的重要性	137
总结与关键概念	138
推荐阅读书目	139
第六章 社会化	141
一 人类生物学与社会化	142
二 婴幼儿的社会化	145
1. 与人类的接触	145
2. 情感发展	146
三 人格发展理论	147
1. 查尔斯·库利:镜中我	148
2. 乔治·赫伯特·米德:角色借用	148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无意识	149
4. 艾里克·艾里克逊:认同危机	151
5. 让·皮亚杰:认知发展	152
四 养育孩子的方式	156
五 社会化的主体	157
1. 家庭	157
2. 学校与日托中心	157
3. 同辈群体	158
4. 大众传媒	159
六 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化	163
1. 青春期与青年期	163
2. 成年期	164
3. 晚年生活	165
4. 死亡与濒临死亡	165
七 再社会化	166
八 社会化与人的自由	168
总结与关键概念	169
推荐阅读书目	171
第七章 群体与组织	172
一 社会群体的性质	173
1. 什么是社会群体	173
2. 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	174
3. 我们为什么形成群体	178

二	群体结构	179
1.	群体规模	179
2.	群体规范	181
3.	群体角色	182
三	群体是怎样运作的	184
1.	决策	184
2.	遵从	185
3.	群体界线:内群体和外群体	188
4.	参照群体	189
四	组织的特性	189
1.	组织目标和特征	189
2.	组织结构	190
3.	科层制	192
五	组织过程和变迁	194
1.	制度化	194
2.	组织变迁	195
六	组织选择	196
1.	美国社会中的志愿者协会	197
2.	弹性组织	197
3.	日本人的选择	198
七	组织与现代社会:一个人文主义的观点	199
	总结与关键概念	200
	推荐阅读书目	202
第八章	越轨、犯罪和社会控制	204
一	越轨的本质	205
1.	越轨的定义	206
2.	社会控制和越轨	208
3.	越轨的社会功能和功能障碍	210
二	关于越轨的理论视角	212
1.	生物学视角中的越轨	212
2.	心理学视角中的越轨	213
3.	社会学视角中的越轨	214
三	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统	222
1.	犯罪的种类	222
2.	犯罪统计	225
3.	美国社会的高犯罪率	229
4.	犯罪控制:刑事司法系统	231
	总结与关键概念	233
	推荐阅读书目	235

第三部分 社会不平等

第九章 社会分层	238
一 有价值物的分配	239
1. 收入与财富	240
2. 权力	241
3. 声望	242
二 社会地位与地位等级	242
1. 辨认社会地位	243
2. 社会地位的等级评定	244
3. 地位不一致	247
三 历史上的分层制度	247
1. 奴隶制	247
2. 种姓制	248
3. 等级制	249
四 社会阶级	249
1. 阶级分化	250
2. 阶级意识与虚假意识	251
五 社会流动	252
1. 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	253
2. 社会流动的条件	254
3. 妇女的社会流动	255
六 分层理论	256
1. 功能主义理论	256
2. 冲突理论	257
3. 伦斯基的理论	258
七 其他社会的分层与流动	258
1. 英国:阶级社会与福利国家	259
2. 巴西:传统与发展	260
总结与关键概念	261
推荐阅读书目	263
第十章 美国的社会阶级与贫困问题	265
一 美国的社会阶级	266
1. 下层阶级	269
2. 工人阶级	270
3. 下层中产阶级	270
4. 上层中产阶级	271
5. 上层阶级	271
二 美国的社会流动	272

三	生活机会中的阶级差异	273
1.	社会阶级、健康与寿命	273
2.	社会阶级与法律	274
3.	社会阶级与教育	275
4.	社会阶级与社会参与	275
四	贫困	275
1.	贫困的定义	275
2.	贫困发生率	276
3.	穷人与就业	277
4.	贫困的原因	278
五	社会福利	279
1.	社会福利简史	280
2.	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	282
3.	社会福利中的问题	284
4.	社会福利制度评论	286
	总结与关键概念	286
	推荐阅读书目	288
第十一章	民族、种族与少数民族	289
一	民族与种族群体	290
1.	民族群体	291
2.	种族群体	291
3.	美国的少数民族群体	295
二	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与歧视	305
1.	偏见	305
2.	歧视	306
3.	偏见与歧视的变化形式	307
三	少数民族的关系模式	308
1.	接受模式	308
2.	排斥模式	310
3.	美国的结构性的不平等	312
四	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反应与心理反应	318
1.	被动接受	318
2.	个人攻击行为与暴力行动	319
3.	集体抗议	319
4.	自我隔离	320
5.	自愿同化	320
五	民族、种族关系的未来	321
	总结与关键概念	321
	推荐阅读书目	323

第十二章 社会中的年龄和健康问题	325
一 年龄与社会	326
1. 人口的变化	326
2. 生命阶段的历史发展	326
3. 年龄与社会结构	329
4. 年龄歧视	330
二 变老	331
1. 生理变化	331
2. 社会老年学的观点	333
三 美国老年人的社会状况	336
1. 退休	336
2. 居住	337
3. 健康与个人照顾	338
四 其他社会的老年人	339
1. 中国:尊敬老人	339
2. 以色列吉布兹:老年人的整合	340
3. 艾克:弃老	340
五 美国的健康与医疗保健	341
1. 健康的社会分布	341
2. 医疗保健系统	343
六 医疗保健存在的问题	347
1. 生活的医学化	347
2. 用医学技术保存生命	348
3. 医疗费用上升的危机	349
4. 艾滋病:社会、经济和道德问题	351
总结与关键概念	353
推荐阅读书目	355
第十三章 性别	357
一 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	358
1. 生理差异	358
2. 心理差异	360
二 性别角色	362
1. 性别角色的社会简史	364
2. 性别角色的社会化	365
3. 成人的性别角色	369
三 性别与不平等	372
1. 性别分层的社会学理论	373
2. 性别歧视	375
3. 性别与婚姻	375
4. 性别与工作	376

5. 性别与政治	380
6. 女权运动	381
总结与关键概念	383
推荐阅读书目	384

第四部分 社会设置

第十四章 家庭	388
一 社会中的家庭	389
1. 功能主义的观点	389
2. 冲突论的观点	392
二 家庭结构	393
1. 亲属与家庭	393
2. 核心家庭与扩展家庭	394
3. 家庭中的权威	396
4. 婚姻居所	397
5. 世系与继承	397
三 婚姻、离婚和寡居	397
1. 选择一位婚姻伴侣	398
2. 求爱和罗曼蒂克式的爱情	400
3. 婚姻	401
4. 离婚和再婚	402
5. 寡居	406
四 变迁中的美国家庭	406
1. 人口趋势	406
2. 单亲家庭和继父母家庭	406
3. 工作与家庭	407
4. 家庭暴力	409
5. 婚姻与核心家庭的选择	412
6. 家庭的未来	413
总结与关键概念	414
推荐阅读书目	416
第十五章 教育	417
一 社会学视野中的教育	418
1. 功能主义的观点	418
2. 冲突论的观点	422
二 教育组织	424
1. 教育的普及	424
2. 美国的教育组织	425
3. 教育组织模式	426

4. 政府的支持和父母的选择	426
5. 教师和学生的角色	427
6. 对学生的评价	429
三 美国教育的趋势和问题	431
1. 对美国教育的批评	431
2. 教育革新	432
3. 私立教育	437
4. 教育和少数民族	438
5. 教育和平等	443
四 教育的影响	444
1. 教育和收入	444
2. 教育和价值观	445
总结与关键概念	445
推荐阅读书目	447

第十六章 宗教

一 宗教与社会	451
1. 宗教的类别	451
2. 宗教与人类境况	453
3. 功能主义视角:宗教与社会稳定	454
4. 冲突论视角:宗教与社会变迁	458
二 宗教组织	460
1. 宗教的要素	460
2. 宗教组织的类型	461
三 美国生活中的宗教	464
1. 宗教与美国文化	464
2. 宗教成员资格及宗教倾向	466
3. 宗教参与	469
4. 新宗教意识	471
四 社会中的宗教:一种长远的观点	475
1. 起源与发展	476
2. 世俗化讨论	477
总结与关键概念	478
推荐阅读书目	480

第十七章 权力、政治和政府

一 权力、权威和国家	482
1. 权力	482
2. 权威与权力的合法化	483
3. 国家	484
4. 关于政治权力分配的几种观点	485

二 政府形式	487
1. 民主政体	488
2. 集权主义	489
3. 独裁主义	490
三 美国政治与政府	490
1. 历史和文化背景	491
2. 政治参与	491
3. 政党	494
4. 利益群体与院外活动	497
5. 军事—产业联合体	499
6. 谁统治美国	500
四 社会学与国家:一种人文观点	501
总结与关键概念	502
推荐阅读书目	505
第十八章 经济与劳动	506
一 经济	507
1. 经济的历史演变	507
2. 现代经济的构成	508
二 经济制度	509
1. 资本主义制度	509
2. 社会主义制度	513
3. 混合经济	514
三 美国的经济制度	515
1. 历史与文化背景	515
2. 合作资本主义	516
3. 经济集中与双重经济	517
4. 政府与劳工组织的作用	518
5. 经济全球化	520
四 劳动社会学	521
1. 工人的异化与满意度	522
2. 美国的劳动倾向	524
3. 跨文化观点:日本的经济与劳动	529
五 社会与市场:一种人文观点	530
总结与关键概念	531
推荐阅读书目	533

第五部分 社会环境和社会变迁

第十九章 人口与生态	536
一 人口研究	537

1. 人口研究的数据来源	537
2. 人口结构:性别与年龄	538
二 人口变化的要素	542
1. 出生率	542
2. 死亡率	543
3. 移民	546
三 人口增长与社会	549
1. 世界人口增长	549
2. 生育控制	552
3. 美国的人口增长与变化	554
四 生态学与环境社会学	557
1. 人口密度与人类行为	558
2. 生态系统	558
3. 地球生态系统	559
总结与关键概念	560
推荐阅读书目	562

第二十章 城市、城市化和社区变迁

一 城市的起源和成长	565
1. 最初的人类社区	565
2. 城市的诞生	566
3. 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城市发展	567
二 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化	568
1. 美国的城市化	568
2.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569
三 美国大都会的结构和发展	570
1. 大都会社区	570
2. 大都会的兴衰	573
3. 城市生态学	576
四 城市生活和文化	578
1. 社区生活的变迁	578
2. 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的研究视角	580
3. 城市生活方式的经验研究	582
4. 郊区生活	583
五 美国大都市问题和城市危机	584
1. 老中心城市的问题	584
2. 大都会的离析和蔓延	586
3. 城市规划与城市重建	587
4. 冲突理论与城市危机	588
5. 美国城市的未来	589
总结与关键概念	589

推荐阅读书目	591
第二十一章 集合行为和社会运动	593
集合行为的性质和发生的条件	594
1. 集合行为的性质	594
2. 集合行为发生的条件	595
二 集群与大众行为	598
1. 集群的类型	598
2. 集群行为理论	600
3. 大众行为	602
三 传播与集合行为	604
1. 谣言与闲话	604
2. 公众舆论	607
四 社会运动	610
1. 社会运动的类型	611
2. 社会运动的过程	615
3. 社会运动发展的一个现代理论:资源动员	616
总结与关键概念	617
推荐阅读书目	618
第二十二章 社会和文化变迁	620
一 社会变迁的原因	621
1. 物质环境	621
2. 人口	621
3. 技术	622
4. 非物质文化	623
5. 文化进程	623
6. 经济发展	623
7. 有目的地促进变迁	624
二 社会变迁的理论	624
1. 社会文化进化论	624
2. 循环论	625
3. 功能主义者的观点	627
4. 冲突论的观点	627
三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	628
1.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	628
2. 第三世界的经济困境:冲突论的观点	629
3. 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	631
四 现代化的构成要素	634
五 发达社会的未来	636
1. 后工业社会	637

2. 悲观主义情结:增长的极限	638
3. 乐观主义情结:未来主义	638
总结与关键概念	640
推荐阅读书目	642
参考文献	643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702



第一部分

导论

与多数大学生一样，你可能将高等教育视为获取美好前程的一种手段。然而，不同的人对于究竟从学历中获得什么，看法会是不一样的。

在一些人看来，所谓美好前程主要是指经济方面。就以思丽为例吧。思丽的专业是经营管理，她计划继续读研究生，获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希望最终成为大公司的经理，手下拥有众多雇员，达到六位数字的收入，在市郊有高级住宅，车房里停着三辆轿车。这样，思丽希望教育能够帮助她实现传统美国人的发财梦。

与之不同，乔治并不将财富视为美好前程的标志，他更看重于职业给人带来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是法律预科生，他毕业后准备与一个环境行动小组一起为制定极其严厉的环境法规、以限制诸如随便堆放有害物质一类的行为而奋斗，文凭给他带来的仅是相对较低的收入。

乔治的朋友苏珊对于自己的前程又有另外一种看法。在她看来，高于一切的是能够开拓其知识视野的机会。她的专业是英语文学，她选修了广泛的文艺类课程。虽然苏珊还没有决定毕业后做什么，但是她选择的生活道路是要使她能继续发展自己的心智。

和上面这些学生一样，我们大多将自己的前程视为个人的一种选择。倘若我们决定选择一种我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我们只需选择它就是了，于是它就是我们的了。我们感到，我们是平等而又自由地选择结婚或不结婚，要孩子或不要孩子，住独立的一幢房子或只是租一套房间。选择性似乎是无限

制的。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作为美国人，我们有一些关于应该怎样待人行事的共同观点。如果有人不按这些被“设定的”行为去做，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

这些社会现实环境不仅影响着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且，最终真的会影响我们走向了目标。例如，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结婚，而当我们真的结婚了以后，我们会认为这是自己自由的选择。但实际上，不仅我们决定结婚，而且连我们选择谁作为终身伴侣，都深深地受到了周围人的期望之影响。我们的选择也受到了社会地位的制约。例如，出身于富有家庭的人，理论上，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人结婚，无论贫富。然而，他们选择的配偶却往往同他们有相似的经济背景。我们大多选择的结婚伴侣也是与我们种族、宗教相同，年龄相仿的，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引我们走。同样，思丽、乔治和苏珊会感到关于他们前程的决定是他们个人做出的，但是，社会学家会指出，有一大堆压力，或多或少地，推着他们走向了他们的决定。

社会学是值得学的，因为它可以向我们提供塑造我们生活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信息。如果你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你将会吃惊地看到，你自己的生活也是多多少少可以预见的。你也将发现，在你寻找和实现个人目标时，社会学知识给你提供了更多的自由。

什么是社会学

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社会学学科可以使我们超越仅局限于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即那种认为社会成员、构成该社会的群体和机构，以及改变社会的力量均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念。

有很多方式可以研究社会与社会互动。或许，介绍社会学学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看看它的研究方式——它处理问题的特殊手段。

1

社会学的研究方式

在研究社会与社会互动时，社会学尽量保持科学性。这就是说，社会学并不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依靠洞察力、无确凿根据的信念或道听途说的基础之上。纵观历史，众多智者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有所评论。莎士比亚的戏剧、伏尔泰的文章、狄更斯的小说——都有对于人类关系及社会系统的精辟见解。民谣谚语诸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酒店老板爱酒鬼，可自己的女婿要除外”等等，都确实包含了许多智慧。但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无论他们多么愿意相信这些观点，他们却不能将这些观点作为理解与解释社会的坚实基础。他们只能依赖于科学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是通过对人类生活的系统研究获得的。

社会学家总是尽可能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技术，比如生物学、物理

学的技术。他们常常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像其他科学家一样，社会学家在提出问题、得出结论时努力做到客观性——不受感情、偏好之影响。正是在这样一种科学方法的意义下，使社会学区别于诸如文学、宗教、哲学等非科学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的最终目标是发展出一种完善的科学知识体系，以解释、并在某些情况下预测社会事件。

当然，在研究活生生的人时，要想做到不受影响、无偏差，是不容易的。在社会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也存在很多问题。人类区别于石头、星星、或分子，他们有思想、感情，有个人兴趣。事实上，社会学家在其主观方面，是有感情、有道德的，这限制了他们研究什么和怎样进行研究。比如，社会学家不能为了检验其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而限制儿童的爱，或限制儿童与他人接触。他们不能为了观察人们的反应或人们的宽容度而去发动战争。他们也不能撤掉现存的社会机构，以观察失去了这些机构，社会将如何运作（关于作为科学的社会学是第二章讨论的主题）。

由于人类与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对象是如此之不同，很多社会学家便对自然科学的方法予以修正。这些社会学家相信，社会学事实的发现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对于调查方法的认识。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已趋于达成这样一种认识，即仅仅靠“硬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不足以认识人类社会的经验的。有很多社会学的工作反映了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的视角。这样一种交叉的视角，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使得社会学成为今天的一个令人兴奋和憧憬的研究领域。

2

社会学： 显而易见的 科学吗

一些社会学门外汉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显而易见的科学。按照他们的看法，社会学家花很多钱去发现一些尽人皆知的东西。这样一种错误看法的存在是因为，社会学家所研究的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确实，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一位业余的社会学家，用他所喜欢的理论去解释什么使得世界运转、使得人们行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常常是我们的常识以外的领域。要回答自然科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常要使用为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语言或符号。

由于社会学的主题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人就要十分小心地处理社会学的材料。听起来像是人们所公认的那些论断及其理由，很可能是——并且常常就是——不真实的。

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与没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研究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社会学的视角帮助我们去理解影响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社会因素，帮助我们去理解整个体系是如何运转的、是如何联为一体的。比如，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离婚，要求人们认识到，问题并不仅仅是离婚，而且也与妇女的角色、经济状况、婚姻与家庭在社会中的位置有关。同样，犯罪的问题，牵扯到法律、社会的价值体系以及大城市的生活状况。

这样一种考察问题的方法——注意问题的整体关系——常可发现，生活并不总是像它看起来的那样。社会学告诉我们，事物总是与我们的第一眼印

象不同，要更为复杂。要想真正认识事物，就要透过表面现象寻找作为原因的社会因素。这种穿透“凭经验”、“想当然”的社会表面现象的过程，被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1963）称为“揭穿真相”。

能够穿透凭经验、想当然，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的一个主要发现就是，有关如何进行组织经营管理的多数常规认识，并不一定是正确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从上面严格控制的组织，工作起来是最有效的：“紧防松懈，铲除冗员，让每一个人都跟上步伐，明确目标，其结果必然是成功、有效、利润”。然而，社会学的研究发现：“非集中型的、松散控制的组织，常常具有更好的适应性，换言之，松散、不服从管理常可有助于提出新的思想和发明”（《时代》，1982年6月22日）。可见，“揭穿真相”可以揭示意想不到的社会学的见解。

再以自杀问题为例，这已经是美国青年致死的第二号主要因素（仅次于交通事故）。请你根据一般常识判断一下，在下列关于自杀及其原因的判断中，哪一条是正确的？

1. 因为妇女具有依赖性，受压抑、受性因素影响，所以他们比男人自杀率高。
2. 年轻人比老年人自杀率高。一个人年轻时，生活的压力和不确定性最强。
3. 由于历史上的不平等、种族歧视，美国黑人比白人自杀率高。
4. 很多人在节日自杀，因为这时候一些人最感寂寞、最感沮丧。
5. 当传媒中不断地谈到其他人自杀时，受其影响，人们更易于自杀。

表 1—1 按性别、种族和年龄分组的每十万人口中发生的自杀之比率（1989）

年 龄	男女总计 ^①	男性		女性	
		白人	黑人	白人	黑人
各年龄段总计 ^②	12. 2	21. 4	12. 2	5. 2	2. 4
10~14 岁	1. 4	2. 2	1. 7	0. 7	—
15~19 岁	11. 3	19. 4	10. 3	4. 5	2. 3
20~24 岁	15. 3	26. 8	23. 7	4. 3	3. 4
25~34 岁	15. 0	24. 9	22. 0	5. 9	3. 7
35~44 岁	14. 6	23. 8	18. 1	7. 1	3. 9
45~54 岁	14. 6	24. 2	10. 9	8. 0	3. 0
55~64 岁	15. 5	26. 6	10. 4	7. 9	2. 5
65 岁及以上	20. 1	43. 5	15. 7	6. 3	1. 8
65~74 岁	18. 0	35. 1	15. 4	6. 4	—
75~84 岁	23. 1	55. 3	14. 7	6. 3	—
85 岁及以上	22. 8	71. 9	—	6. 2	—

①包括不同种族
②包括各年龄组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2》（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社会学研究有效地揭示了这些论断的真伪。如上页表 1—1 所示,男性自杀率始终是高于女性的(尽管女性中企图自杀者比男性多)。老年人自杀率明显高于青年人,部分是由于健康原因。美国黑人自杀率相对低于白种人。新近的研究并不支持那种认为节假日是引发自杀风险之因素的流行观点(菲利普斯和威廉斯,1987)。其他一些研究也证明,虽然,那些已有自杀风险的人有可能受到大众传媒中大量的关于自杀报道的影响,但是,那些没有自杀风险的人并不会因传媒的影响而发生自杀(魏斯,1989)。

当社会高速发展时,会引发自杀率剧增。首先系统收集证据证明这一现象的,是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他的《自杀论》一书是社会学的先驱科学研究成果之一。自此以后,自杀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像迪尔凯姆一样,常有惊人的发现(马里斯,1981)。



常识还是科学的判断?

你们中有多少人认为社会学的入门课程只不过是重申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观点?然而,请试着按照社会学家的方式去思考,你有可能将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研究看起来像是简单常识的那些概念。就拿那些揭示了生活中智慧的谚语来说吧。近年来,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调查发现,这些广为人们所接受的格言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真理。下面就是他们的一些发现。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显然,我们并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但是,很多人之所以多得,正是因为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以薪金为例。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布任达·梅杰(Brenda Major)和他的同事让学管理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大都具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在一家百货公司扮演人事处管理人员。那些申请人扮演者手中的纸夹告诉他们所期望的薪金水平是什么——一些是较低的,一些正合适,一些较高。

结果如何呢?对于薪金的期望并不影响职位的获得。但是,在受聘的申请人中,那些“大声叫的”确实得到了更多的“奶”吃。研究人员认为:“虽然,申请人并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但是,申请人中要求较高薪金的,确实得到了更多的薪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异类相吸”

人更像鸟,而不像磁铁。根据德尔马精神病诊所的理查德·列维克(Richard W. Lewak)及其加州同事的很多研究,关于异类相吸的观点仍得不到实验的有力支持。很多研究证明,那些种族、宗教、经济背景相同的人通常聚在一起,政治观点相同的人也是这样。至于强大的吸引力使人们结为夫妻,研究人员认为:“结婚的双方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列维克自己的研究证明,我们更倾向于与那些智商与我们多多少少相似的人结婚。而康奈克迪卡特学院的伯纳德·默斯坦(Bernard Murstein)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尽管我们梦想着尽可能与那些美貌的人结婚,但结果还是找到了吸引力与我们相似的人。根据密执安大学研究人员大卫·布斯(David M. Buss)的研究,人们被相似的人所吸引这一原则:“是人类婚姻结合的心理学、生理学最完善的、可重复的发现之一。”

“美丽只是表面的”?

卡任·迪昂 (Karen Dion)、艾伦·伯斯迭得 (Ellen Berscheid) 和艾兰·哈特弗尔德 (Elaine Hatfield) 于 1972 年发现, 对于外表漂亮的人, 我们会认为其他方面也同样好。研究人员询问了 60 位学生, 让他们仅仅根据照片来描述人们的品质特征。结果, 与较低吸引力的人比较, 外表具有较高吸引力的人被描述为更具社会品质, 从事更高声望的工作, 婚姻也更为幸福。

这项名为“美的是好的”的研究 (迪昂, 1972), 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吸引力的发现。自那以来, 众多的研究者揭示了这样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 由于外表漂亮的人被认为是应该有更多的贡献, 他们就真的朝着人们的这种预期去做了。可悲的是, 那些不漂亮的人也朝着相反的预期去发展了。

研究中考察了外表吸引力与人格的关系。发现, 外表漂亮的人比不漂亮的人具有更高的自我评价, 更幸福, 更少神经过敏, 更能承受压力。不仅如此, 漂亮的人对于他人更具影响力, 薪金更高, 在法庭上更易得到宽容, 更易被学生视为高水平的老师, 更易被看作朋友、同事、情人。无论男性女性均是如此。

哈特弗尔德认为: “我们对待有吸引力者和无吸引力者的态度, 塑造了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 其结果是他们就真的形成这样的人了。”在我们的文化中, 显然, 美丽远不是表面的。

资料来源: Alfie Kohn: “You Know What They Say...”, 《Psychology Today》22 (April 1988): 36~41; 引用已得作者许可, 1988 年版权为: Alfie Kohn, K. Dion 等: “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4 (1972): 285~290.

3

社会学的 基本假设

除了我们的常识会误导我们这点以外, 还可以从社会学对于自杀的研究中学到其他一些重要的东西。自杀并不简单地就是一种“被推向悬崖”的失控、非理性、无规则行为。自杀率的各种差异显示, 自杀与一些特殊的群体、地区、时间有密切联系——几乎可以说, 每一类型都被在自杀中“安排了”一定的配额。虽然没有人可以预言在每一类型中哪些人会去自杀, 但是, 可以确信哪种类型会具有更高的自杀率。例如, 多年以来的数据显示, 美国白人比美国黑人、男人比女人、未婚者比已婚者、富裕社会的人比贫穷社会的人自杀率更高。

从自杀的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中, 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当然, 自杀肯定是个人决定之结果, 即一个人得出了生命继续下去已无价值的判断。在此意义上, 自杀是纯粹个人的行为。但是, 在某些社会环境下的人群中, 这种个人决定却表现出了更多的共同点。这一事实显示出, 自杀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事实, 即该行为受到了一个人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从自杀这一社会模式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人类行为部分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家庭、组织、社区、种族、社团和历史时代——而他们自己正是身列其中。这个结论就是社会学家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 人类行为由社会和社会环境所塑造。

社会学的 “为什么”

任何科学所提出的核心问题都是“为什么？”一种特定的状况是怎样形成的呢？是处于哪一种特定的环境之中呢？通过什么过程？涉及到什么样的机制？换言之，如何解释一种既存的现象呢？这些问题都有助于回答“为什么”这一总问题。

迪尔凯姆想要知道，在关于“为什么”一个人自杀的问题上，社会学能告诉我们什么。全面地理解迪尔凯姆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就把握了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和在知识发展中的学科潜力。在讨论社会学的“为什么”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三种非社会学的关于为什么自杀的答案。

1. 生物学的答案。有可能是生理的或机体的因素起作用——例如，生化的不平衡会导致一个人结束了他或她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回答，当然是与社会学无关的，是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社会学家不否认生物学原因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并不研究该原因。

2. 传记学的答案。某一人自杀的原因可以表述为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了这一行为。这一天，某人在学校受到处罚，接着他与一位朋友绝交，与父母吵架，以及受到最近离婚的影响，等等。这种分析在解释某一特定的自杀中是有助的和有效的，记者们常运用此方式。然而，试图从特殊中寻求一般的社会学家却不常用此法。在每一个自杀案中，连续发生的事件总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们不能适用于一般的情况。

3. 心理学的答案。或许对于自杀的最通常的解释就是心理学的，它研究个人的心理过程。比如，自杀者有可能留了一张绝命前所写的字条，描述了他或她自杀的原因——或许他或她想“报复”父母，或者无法调整深深的负罪感。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人们还想知道这个人的气质如何，——该人有过精神病、极度悲哀、奇耻大辱吗？这些信息并不是仅从那张字条中就能获得的，这就需要调查此人以前的精神状况。

有关一个人的生物学、传记学和人格的知识可以提供某一自杀发生的合理解释，生物学家、私人侦探和心理学家发展了这一类的知识。那么，社会学家能做些什么呢？社会学家并不研究自杀的生物学、传记学、人格学的功能，而是研究其社会的功能。社会学家用其社会背景与环境来解释自杀个案。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学学科作为一个整体，主要并不研究诸如为什么某一个人会自杀（或犯罪、婚姻失败、被开除学籍或失业）的事件。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该行为所赖以发生的社会环境与氛围。

在社会学家眼里，自杀更多地是被看成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事实”，而较少是个人行为。社会学家并不想知道某一人为什么自杀，而是想知道为什么在某一社会环境中，自杀率比其他地方更高或更低。试图找出诸如下列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农村自杀率比城市自杀率低（至少在西方国家是这样），或为什么意大利人比奥地利人更少自杀？比如，农村和意大利有什么共同特

点，这些共同特点是如何与自杀相联系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能全面解释自杀，也不能预测个案中的自杀。但是，它却能提供丰富的信息，不仅是关于自杀的，而且是有关人类组织的根本性质的。

当然，如果说社会学仅仅关注社会而非个人，这并不准确。虽然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要对于人类行为做出充分解释，但是，社会学家认识到被概括为“社会”的，正是人类的创造物，它是个人相互互动的结果。多数社会学家的主要兴趣是关注于如此被创造出来的社会的本质、它对于个人的影响（就像在自杀研究中这样）。自然，很多社会学家也关心社会互动过程本身。社会是怎样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互动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呢？本章后面将会探讨，在关注于社会还是关注于社会互动问题上社会学的分化。

5

社会学的解释

使用如此抽象的概念诸如“社会”或“人类社会组织”，社会学家是如何解释、说明自杀的社会类型的呢？为什么在密西西比农村的自杀率大大低于纽约市呢？为什么意大利的自杀率大大低于奥地利的自杀率呢？要想给这些问题以全面的社会学的解答，将会使我们把话题扯远，但是，用不长的篇幅来讨论社会学的各种解释，可以使我们深入到社会学的本质。

在这些低自杀率的群体、社区、社会中，究竟是什么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更不易于走上绝路呢？迪尔凯姆认为，这些社会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具凝聚力、整合性，或有更紧密的结合性（迪尔凯姆，1897/1950；波普，1976）。在这些群体中，个人具有更为明确的生活目的与意义；他们具有更为特殊的社会地位；社会对于其行为取向的预期更为明确；他们感到自己已经被置入了或联结到了一种超出或高于他们自己本身的关系之中。同样的，这些社会群体对于其成员具有更强的控制，它们对于个人的行为有着很强大的外部限制。

这些社会特征最为盛行于那些稳定的、传统的和有着很深宗教影响的群体、社区与社会中。正是在这些群体中，自杀率是最低的。个人与群体的联系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群体要防止个人采取、甚至防止个人考虑用自杀来结束他或她的生命。实际上，在这里，人类生活被看成是，群体的联系和目的要大大地高于个人。

与此相反，自杀率最高的是那些“个体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在这里，群体联系较弱，群体期望受到质疑；而个人可以相对自由地过他们认为适当的生活，可以变成一种社会孤立（斯塔克，1990）。在此，社会孤立的人们的生活受制于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很强的群体目标。事实是，这种缺少很强群体目标的个人兴趣，常常使个人不足以有活下去的意志。因此，甚至可以说，自杀是享有大量自由的人们付出的一种代价。

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家并没有做出任何道德的判断。基于一个社会自杀率较低或个人自由较高而判断一个社会优于另一个社会，这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使命。那样一种道德的或政治的判断超出了社会科学的领域。然而，社会学却可以提供此种判断所赖以为基础的有价值的重要信息。

为了更深入地进行探讨，有必要提到一种特殊类型的自杀，因为它与美国人通常所接受的关于自杀的观念有明显的差异——此种类型的自杀甚至受到强群体的鼓励。为人们所熟悉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自杀，自杀者希望献出他们的生命以拯救日本民族。再有的例子就是老年的爱斯基摩人，他们感到自己已变成了家庭的负担；以及信仰印度教的寡妇，她们希望与丈夫同赴火葬。这些个案是一种强大的而非弱小的群体认同，形成了自杀的原因。此种个人将群体的利益置于他或她的生命之上的自杀被称为“利他式自杀”。当然，从道德角度看利他式自杀，会与那些想要实现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自杀者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利他式自杀只是迪尔凯姆所定义的四种自杀之一。自杀的其他三种主要类型是：利己式、越轨式、宿命式自杀，参见表1—2）。

表 1—2 迪尔凯姆的自杀的四种类型

	利己式	利他式	宿命式	越轨式
描述	个人并不感到与广大的社会有关	个人将群体利益置于他或她个人生命之上	个人自杀的原因是感到无法控制他或她自己的生命	当社会缺乏秩序时，个人自杀
例证	贫民窟无业游民的自杀	老年的爱斯基摩人、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自杀	囚犯自杀	股票破产者的自杀
心理指标	沮丧与忧郁	责任感，羞耻感和负疚感	恐惧，听天由命	不安全，失望

资料来源：摘自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0；初版 1897）；M. 伊加：《菊中刺：现代日本的自杀与经济成功》（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让我们再来看看社会学解释的最后一个方面。如果自杀与群体联系的强弱有关，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有些群体凝聚力强、具有很强的联系，而另一些群体缺少凝聚力、联系松散呢？与农村相比较，城市的整合性较弱，这一点反过来又与城市的较高自杀率相关联。但是，为什么城里人比农村人联系更为松散呢？当然，答案也可以使用生物学或心理学术语。但是，看起来并不是城里人在生理上不同于农村人，城里人与农村人心理上的不同并不像是来自什么天生的差异，差异是在社会环境方面。

那么，群体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解释个人的自杀行为方面，社会学家倾向于从其他社会现象中寻找影响，诸如社会整合性水平这类社会现象的原因。例如，社区与社会的形成，就主要是通过社会设置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的。家庭受经济影响，经济受政府影响，政府受法律影响，法律受道德影响，等等。这样，每一种社会环境都是相互作用的社会力量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网。

因此，我们在对从文化到文化、甚至从群体到群体作总结时需十分小心。虽然我们可以说，在很多文化中老年人的自杀率较高，但是，我们不能

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自杀率总是很高。例如,与城市自杀率较高的美国相比,在日本自杀率更高是在农村地区。有几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一点,在日本,老年人多住在农村,他们的收入较低,在不适当的福利制度下生活拮据(伊加,1986)。探索其他文化的以及探索我们自己文化的社会现实的网络,这就是这门称做社会学学科的任务,以及对它的挑战。

6

社会学与 其他社会科学

与系统研究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不一样,社会科学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与人类行为。在使用方法上,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社会学也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关,因为其研究主题有相互重叠之处。社会学与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分野常常并不清晰。例如,对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城市居民问题的研究可以被称做是城市社会学、家庭经济学或城市政治学。但是,界限确实存在,对于社会学的精确的描述,需要了解其他各门社会科学。

经济学研究的是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分配、消费的方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共同领域就是研究经济行为的社会基础。金钱并不会自动地流入和流出银行,也不会听从于非人格力量的指挥。是人们在存钱,是他们做出就业、为子女教育存钱,或购买房屋的社会决定。也正是人们在取钱,他们或是想要自立门户做买卖而不是听从于老板的指挥;或者他们想要买一件皮大衣,因为上周他们的邻居就买了一件;或者因为他们失业了。另一个联系是许多社会行为的经济基础。社会学家认识到,经济和物质利益对于社会运转有很大的影响(关于经济生活的社会学参见第十八章)。

政治科学研究政府与政治权力的使用。政治学的学生考察在政府体制背后的观念、政治的操作过程。在另一方面,社会学对于政治行为(人们参与政治运动或支持政党的原因)以及政治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更感兴趣(关于政治社会学参见第十七章)。近年来,政治学与社会学在方法、研究主题、概念上越来越密切,甚至越来越难以找出两者的确切分野。

历史学考察过去,试图找出历史事件的原因、过程和含义。历史分析已从过去的研究人与地点变成了探索更为广泛的一定时期的社会趋势。反过来,社会学家从历史的考察中获得了很多东西。例如,社会学家用19世纪西方国家工业化的社会后果与今日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趋势相比较,就是得自历史的研究。本书常用一些历史资料来对比很多今天的社会事件。

心理学主要是考察人类的精神过程。心理学家研究这样一些心理活动,如推理、动机、理解、做梦和创造力,也研究精神病、精神冲突和各种情感状态。心理学与社会学有很大区别,因为它关注的是个人的经历而不是社会群体。但是,社会心理学——它研究的是人格、行为如何受到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却与社会学联系密切,两个学科在知识和方法上也是互通的。近来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一些工作就是一个例证,参见社会学之窗:“常识还是科学的判断?”(第六章关于社会化的讨论也主要是以社会心理学的工作为基础的)

人类学是研究世界各地、各个时期的人类进化与人类文化的。体质人类学集中于研究人类的生理进化和今日世界各民族的体质差异。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现代化以前的社会（有时称“前工业社会”）的文化与发展。而社会学则主要关注于现代文明。社会学家借用了很多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与方法，然而，在一些学院和大学，这两个领域是合为一个系的。

人类学面临着其固有的局限性，可供研究的现代化以前的社会已经不多了，而且几乎已找不到未与现代文明接触过的社会了。这就是20世纪的人类学家已将其研究领域扩大，包括了现代社区与社会的原因之一。于是，他们使其研究领域在主题上更接近于社会学了。人类学的报告“民族志”，深化了人类行为或生活方式的一些研究领域，这有助于社会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理解与比较不同社会（本书第三章探讨了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视角）。

社会学的历史及其发展

社会学取其现有的形式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当然若溯其学科根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这段历史被称为启蒙时期，其思想家相信理性和人类完善自己的能力。社会学的一些早期假说就来自这些思想家。一个主要的假说是，正如研究自然界的科学家可以使用推理去发现物理的规律、行星运转的规律一样，研究社会世界的科学家也可以运用推理去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另一个假说是，一旦知晓了人类行为的规律，就可以用它来完善社会本身。但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系列迅速、广泛的社会变迁，这对启蒙学者的乐观思想提出了挑战。

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在那里，发明者完善了珍妮纺织机，机器动力的纺织机使得大量的纺织品既快又便宜地被生产出来。随着纺织工业以及冶铁和其他工业的发展，大量人口涌入迅速扩张的城镇，去工厂劳动。他们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产业工人；他们的雇主也形成了强有力的新的社会阶级。家庭结构、社会政治、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工人的工资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丈夫、妻子、孩子都要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有些人一天劳动19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或7天。这并不意味着工作是稳定的，解雇是很平常的事。除了长时间劳动和缺乏保障以外，工人的住房和卫生条件也很差。恶劣的条件降低了城市新贫民的预期寿命，与此同时，犯罪率却在升高。对于这一系列可怕的问题，19世纪早期的思想家们试图加以解释并希望予以解决。

1

经典人物

虽然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但最著名的早期社会学家却是法国人、德国人，而非英国人。原因之一是，遍布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求知欲遵循着法国革命的传统，这种求知欲产生了很多新的思想方法。

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 Comte)

奥古斯特·孔德 (1798—1857) 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曾经是另一位早期社会思想家亨利·圣西门 (Henri de Saint-Simon) 的私人秘书。孔德创造了社会学这个词。早先,他曾称这门新学科为“实证哲学”,既强调它的科学性,又与传统的哲学相区别。他认为,社会学的目标是去发现社会的“不可更改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新的秩序。孔德并没有以纯科学的兴趣去分析社会;他更想建立一个“精神的精英”——由他自己领导——去管理新的社会秩序。

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赫伯特·斯宾塞 (1820—1903) 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他通常被认为是该时代英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他提出了社会像一个有机体——一个自我管理的体系的思想。通过吸收一种类似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斯宾塞提出社会就像物种那样,由简单向复杂进化。达尔文在其自然选择的理论中指出,那些能更好地适应其环境的动物更易于存活和繁衍,与达尔文的思想类似,斯宾塞认为那些能更好地适应其环境的社会比不能适应环境的社会更易于生存与发展。

斯宾塞是后来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早期拥护者——即认为适者生存的原理适用于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换言之,社会的特征,包括它的不平等,都是“自然”进化原理(或规律)的结果。与该时代的改革思想家不同,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社会事务,因为他认为这种干预会阻碍这些自然发展规律。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经常受到人们的怀疑。然而,他将社会类比为生物有机体的思想却在现代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学派中得到了响应(关于功能主义参见本章后面)。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出生于一个德国人的家庭,但是他成年后大部分生活是在伦敦度过的,他多数的著作也在那里完成。马克思不相信社会是一个自行管理的有秩序的体系。反之,他把社会看成是不断冲突与变迁的。他指出,每一个社会都包含有“毁灭自己的种子”。与斯宾塞的社会服从于“自然”规律的观点相对立,马克思相信社会主要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他将人类历史看成是经济上的各阶级不可避免的相互冲突的过程。

与孔德的传统一样,马克思感到社会科学家不仅应该认识社会而且应该改变社会。然而,马克思的观点颇为激进,他相信正如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一样,资本主义也将通过阶级斗争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他将自己大部分的生命都投身于引发这场变迁。事实上,马克思的观点和理想所激发的社会变迁,多于历史上其他所有的人,当然,并不一定是完全按他所预料的那样。

马克思的社会阶级观和关于经济因素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被视为对于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他关于阶级冲突的观点反映在现代社会学的冲突学派之中(关于冲突学派本章后面将有探讨)。他对社会学关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分析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见本书第十七、十八章)。

埃米尔·迪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法国学者埃米尔·迪尔凯姆(1858—1917)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确定了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指出了它与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改革的区别。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4, 1950)和《自杀论》(1897, 1950)中,迪尔凯姆提出,社会学主要应关注于他所谓的“社会事实”。这些事实在人们以外,但是却对人们施以控制。例如,法律也可以说仅仅是一些词句,但是人们的行为体现出法律是可以感知的、是真实的。

迪尔凯姆相信,社会事实应在其自己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他坚持认为,要用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而不是用生理的、心理的特征来解释。这样,根据他的观点,如果要理解社会法律的含义及其发展,就必须考察社会的宗教。如果要理解社会组织,就必须考察诸如政府、经济组织这些作为社会组织构成部分的机构。

与孔德、斯宾塞相同,迪尔凯姆将社会视为它自己的一个整体,该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他的核心兴趣之一就是:社会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由于对前工业社会的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之崩溃深感沮丧,迪尔凯姆便寻找社会团结的源泉。最终,他相信社会是因其成员享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而联为一体的。迪尔凯姆强调社会团结的思想常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社会学家的批评,他们则对于社会中的冲突之源泉更感兴趣。迪尔凯姆对于宗教促进社会团结之能力的分析,阐述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5)一书中,这本书也被视为社会学对于宗教分析的重要贡献(参见本书第十六章)。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或许对于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他特别对于社会的大的方面感兴趣,比如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他从广泛的历史的世界性的角度进行研究。或许他最为著名的是对于科层制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对于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他也有重要贡献。韦伯的多数思想都与马克思的形成鲜明对照。

韦伯既是一名有贡献的学者,也是一名热心于研究当时德国问题的人。作为学者,他认为,社会科学家在研究问题和得出结论时,只有将他们自己的观点暂时放在一边,他们才能发现解决问题的客观方法。这样一种“价值无涉”社会学,直接与孔德和马克思的传统相对立。然而,韦伯相信,作为公民,社会学家应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管理一家军事医院,后来,他又帮助起草魏玛共和国的宪法。

像迪尔凯姆一样,韦伯塑造了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理论的模型。韦伯感到社会学必须包括“社会行动”研究,即研究人们相互之间行为取向的方式。在他看来,研究人际互动不应该只依赖于客观的定量方法。它也必须包括韦伯所谓的“解悟心声”(Verstehen),即对于他人心灵的“同情理解”。

2

美国社会学的发展

虽然社会学的奠基者是欧洲人,但是它却逐渐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社会。美国的知识氛围有助于激励新思想的产生,而它的社会氛围——异质性十分

强,社会变迁迅速——亟需社会学的系统研究。像许多欧洲先驱者一样,早期美国社会学家对于社会改革颇有兴趣。

从一开始,美国社会学及其实践者如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弗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威廉·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威廉·孙末楠(William G. Sumner),就承担起这样一项使命:认识、评价与解决城市问题(仅举几例,如贫困、恶劣居住条件、行为放纵等)。虽然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大都来自农村背景,但是强烈的宗教倾向和道德原则导致他们去推进城市改革(赖斯,1968;欣克尔,1954)。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注重解决城市社会问题,这一点使他们明显地区别于更多意识形态、而更少实践倾向的欧洲的早期社会学家。

芝加哥学派

美国社会学学科首先建立于中西部地区。1892年,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能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到了1905年,社会学的研究生学习已发展到东部地区,布朗、哥伦比亚、达特摩斯、耶鲁等大学都有了正式的社会学学科教学。到20年代,在全美国范围内,社会学已被广泛地接受为学术性与实践性学科。

芝加哥大学居于社会学研究与训练之中心地位持续了多年。这一时期,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们被统称为闻名遐迩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热衷于典型的美国社会问题,如贫民窟、移民、种族关系、城市化。他们收集了大量有用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迄今仍为人们所使用。

芝加哥大学的领导人物是从1914年起到此任教的罗伯特·帕克(1864—1944)。帕克是独一无二的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他曾有一段时间作过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宣传主管和代笔人)、研究学者和理论家的结合。他合作撰写了社会学的第一本主要入门教材(帕克和伯吉斯,1921)。他的很多学生后来成为美国其他大学的有影响的社会学家。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是诞生于芝加哥的社会学理论分支“符号互动论”的主要理论家(该理论参见本书第五章)。米德强调,人类既对于抽象的含义也对于具体的经验做出反应。与同时代的多数理论家不同,米德认为人类的心灵和自我意识主要是社会的产物。他确定了视个人行为为社会产物的这一领域的社会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学

在大萧条的动荡岁月里,联邦政府开始雇用社会学家作研究,并让他们为诸如“职业促进管理会”、“农业部”、“自然资源委员会”这样一些政府部门作咨询。随着二次大战的到来,很多社会学家应招到华盛顿工作。社会学家运用他们的技术来设计服务人员的训练项目,发展向平民的宣传运动,给作战部、价格管理办公室、国务部作咨询。他们也帮助建立二战期间发展起来的食品配给制(布尔默,1984)。

然而,在大萧条以及二次大战以后,芝加哥学派参与社会改革、收集数据的强烈热情逐渐衰退。美国社会学家变得对于建立社会理论更感兴趣。到

了40年代后期,社会学已经如此大大发展、迅速成长,以至于应该回头看看,总结一下已经收集的关于社会的知识了。这样一种变化还伴随着学术主流地区的东移,从芝加哥大学移到了哈佛和哥伦比亚。

美国最重要的纯理论社会学家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他是30年代哈佛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帕森斯综合了一些经典社会学家的不同学说,主要是韦伯和迪尔凯姆的,合并成他所谓的“行动的一般理论”这样一个总的思想体系(帕森斯,1951;帕森斯和希尔斯,1951)。在这个总体理论中,他寻求发展一个可以用来分析所有类型社会现象的理论框架,从分析社会的主要制度到分析个人的行动。后来,他将该理论应用于广泛的主题,包括宗教、教育、种族关系。帕森斯对于几代社会学家都有重要影响。然而,由于他偏爱抽象理论,他的关于社会的观点比较呆板乏味,因此也一直受到强烈抨击。

另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是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 1910—)。作为帕森斯的学生,默顿仍遵循着帕森斯的传统,但是,他尤其感兴趣于发展社会学的中间距离的理论。“中距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居于狭隘的“专门理论”与广泛的“总体理论”之间,前者关注于社会生活的单一方面,后者则试图无所不包地解释广泛的社会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默顿的理论没有帕森斯的理论那样抽象,比较容易用实证检验。默顿的持久的贡献之一,是他关于越轨行为的理论,本书第八章将予以讨论。

在战后早期,就像帕森斯和默顿一样,很多社会学家都属于功能主义传统。但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1916—1962)则是一个例外,他是目前所称的“冲突论”发展中的重要人物(本章后面将会详细讨论功能主义与冲突论)。米尔斯既批评芝加哥学派的“铁杆经验论”,又批评帕森斯的“总体理论”,认为他们缺少社会关注。他曾将自己描述为“朴素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既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也受到韦伯的影响。米尔斯全身心地介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与政治活动;他尤其希望看到,美国的财富和权力能够更平等的分布。

今日社会学

今天,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学都已是一门完善的学科。最为发达的还是在美国;所有的主要大学都讲授社会学(如1993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学科专业人员组织有13 500人)。社会学在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有坚实的发展。

在东欧国家,社会学的地位尚不很确立。社会学在前苏联范围内所遇到的障碍,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也遇到了。在前苏联,社会研究受到限制,那些与官方关于现存社会安排设想相矛盾的发现变得默默无闻。不仅如此,前苏联社会学家难以接触到西方同行们关于该社会的研究成果(诺夫,1989)。所有这些都随着80年代中期前苏联发生的影响深远的改革而发生了变化。由于不再受到党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并且对于西方社会学家的理论与方法也更为熟悉,前苏联社会学家看到他们的工作影响了关于妇女就业、工作条件、健康与抚养儿童、学校教育等方面的决策(诺夫,1989)。在前苏

联以及如匈牙利等邻国,社会学的崛起是因为需要解决众多的社会秩序问题——不法行为、犯罪、家庭破裂、自杀等比率都在上升——这些都使社会学的发展变得更为紧迫(桑坚,1991;莎赖,1991)。

看来,每逢遇到社会动荡和无序时期,社会学的影响力、吸引力便上升,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当东欧、前苏联这些国家发生了迅速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紧张与两难困境时,其社会学学科会变得更为重要。同样原因,社会学也可能在美国复兴。如上所述,社会学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困惑与动乱之中。旧的社会秩序已被打碎,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学受到青睐是因为它可以提供新的认识与新的观念。在美国,社会学发源于20世纪的前20年,这也是一个因迅速与广泛的城市与工业发展而引发社会巨变的时期。半个世纪以后,到了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社会学又大显身手,因为发生了以城市骚动、民权运动、反战示威为标志的深刻的社会冲突,使人们又来求助于它(莱曼,1991;古尔德纳,1970)。今天已有征兆显示,美国社会可能处在另一次社会动荡之前夜,其依据是经济下滑,收入与财富分布不平等程度上升,国民凝聚力下降(沃尔夫,1991)。会引发社会学复兴的,也是人们越来越频繁问起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为了建立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之基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赫恩,1985)

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是一门完善的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门用统一的方式看待世界的学科。虽然社会学家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学中并没有一种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观点。确实,很少有学科,特别是像社会学这样的新学科,能够有高度的统一性。社会学仍然在确立其研究范围的过程之中——这包括它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之应用。

从本章的前面部分,读者应该已经看到了社会学理论范围的一些线索。在我们讨论社会学的特点时,我们曾指出,很多社会学家希望这门学科越具科学性越好,而另一些则喜欢人文取向。在讨论社会学的“为什么”时,我们曾指出,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关注于社会,但一些人则主要关心社会互动。社会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与他们关于社会学在社会上的作用、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所提出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试图理解社会如何运转的问题上,不同的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基本特征,有着不同的假设。一些人认为秩序与稳定比冲突与变迁更重要,另一些人则持相反观点。一些人主要考察社会的大的制度结构,另一些人则更关心小群体的人际互动。这些选择决定了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有时候也称做“理论范式”)。理论视角帮助社会学家去选择他们所要提出的生活中的问题,选择他们用来寻求答案的方法。换言之,它们限定了社会学家寻求解释社会与社会行为的方式。

功能主义的视角

功能主义的视角强调这样一种模式，即社会的每一个部分都对总体发生作用，由此维持了社会稳定。根据这种观点，社会非常像人类的机体或任何活的有机体。像身体的各个部分（比如四肢、心脏、大脑）一样，社会的构成部分（比如家庭、商业机构、政府）以系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对整体发挥着好的作用。每一部分也帮助维持着平衡状态，这也是系统平稳运转所必需的。功能主义（有时也称“结构功能主义”）可以溯源到早期社会学理论家如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埃米尔·迪尔凯姆的著作。

后来，默顿指出，社会结构构成单位的功能可以是“显在的”（可以意识到和看到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未意识到和未看到的）。例如，小学的显功能之一是使学生打下阅读、计算这样一些学科技术的坚实基础。然而，小学的一个潜功能却是教给学生诸如合作与组织这样一些重要的社会技术。如果社会结构的某一部分阻碍社会满足其需求，则被视为具有反功能。如果在学校里学生们从其小伙伴群体那里学到了社会所不希望有的行为，那么，学校也就具有了反功能。

既作为文化人类学也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视角，功能主义特别适合于研究稳定的、小规模的社会，例如，太平洋群岛上的孤立的社区，或美国中西部的小城镇。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在这样的社区中，人们怎样形成了有秩序的生活，表现出了强大的合作精神和高度的团结性。在这些种类的背景下，并不难设想，事情还会像以往一样继续下去。除非来自外部的因素破坏了平衡。确实，功能主义者通常将社会变迁解释为来自外面的力量干扰了系统的平稳运行。

然而，社会生活并不总是平静的。世界上很多地方被卷入战争、叛乱和革命之中。功能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功能主义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些事件。社会学的第二种理论视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这就是冲突论。

冲突论的视角

冲突论强调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该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构成社会的各部分远不是作为整体一部分而平稳运行的，实际上，他们是互相冲突的。这并不是说社会就永无秩序——冲突论者并不否认很多社会秩序的存在——但是，秩序只是社会各部分之间不断进行的冲突的一种结果，而且，它也并不一定是事物的自然状态。

冲突论者源于马克思。他们强调社会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性质。在他们看来，社会经常处在极易被破坏的平衡之中。事情常常是这样的，社会秩序（常常是十分短暂的）源于社会的一部分统治于另一部分之上，而不是源于各部分之间的自然合作。社会秩序是力量与强制的产物，是统治——强的压迫弱的，富的压迫穷的。

功能主义与冲突论视角之比较

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学家如何应用上述理论分析校园中的社会组织，来展示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视角（注意，虽然这两种视角非常之不同，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是不相容的。每一种视角考察了社会的不同方面）。功能主义者可能会将校园看成是各种有机的部分构成的统一体，包括学生、教师、管理者，以及维持校园生活正常运转的成员、研究助手、食堂工作人员等等。所有这些部分都相互联系，并且都对校园的正常运行做出贡献。任何一个部分的动荡都会带来暂时的失衡。学生因教学质量、吃饭问题，或大的政治事件而罢课，都确定无疑地会使校园陷入混乱。但由于社会是建立在认同与合作基础上的，这种暂时的不平衡会迅速地转化为有利于整体向好的方面发展。

冲突论者将会透过校园表面的平静考察不同群体自身的利益以及他们之间的对抗。例如，教师会为减少课时压力而斗争。二年级的大学生会因选修课的减少而不安。医学实验室的助手会组成工会，以提高他们的工资，使之达到校外同样工作的水平。而学校管理人员会认为，所有其他人员都没有看到，在面临政府削减经费的压力下，他们为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做了极大的努力。冲突论者认为校园的“秩序”只不过是各群体之间相互竞争的难以持久的、暂时的结果（关于功能主义和冲突论在本书第四章将会有详细论述）。

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首先关注宏观社会，或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研究它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有时候被称为宏观社会学家的研究人员，运用上述理论视角研究社会的主要结构单位，如组织、制度、社区、民族国家；研究诸如城市化、社会流动等社会过程；以及研究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社会信仰体系。

这两种理论视角，在关于人类社会、人类行为的结构主义观上也是相同的。结构主义观的前提是：第一，社会结构应被视为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即它在个人之外却又控制着个人的行为；第二，个人行为主要是非个人所能造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产物。这些理论视角强调社会对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强制力量，缩小了自由意志和个人自治的重要性。

3

互动论的视角

社会学中，另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理论视角，因其更关注于社会的微观方面——社会互动和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而区别于上述理论。这种理论被称为互动论视角，它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交往的，他们又是如何使这种交往产生实质性意义的。倾向于互动论视角的人，有时被称为微观社会学家，因为它们研究个人和小的群体而不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乔治·米德通常被认为是互动理论视角的奠基人（关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参见本书第五章）。

或许由于在如此之近距离观察人类行为，互动论者倾向于认为人们具有的行动自由——在社会约束中的更多的自由——比功能主义学派、冲突论学派宏观社会学家所说的要多。换句话说，互动论者并不将社会看成是一种控制力量，至少没有达到宏观主义者所说的那种程度。互动论者强调，人们总

是处在创造、改变它们的生活世界的过程之中。再者，他们不仅对于人们如何行为感兴趣，而且对于人们的思想和感觉感兴趣。互动论者探索人们的动机、目的、目标和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我们可以回到前述的那个关于校园的例子，来说明互动论视角。互动论者既不用合作也不用冲突来解释校园生活，他们关注于这样一些问题：学生们刚入学的时候如何看待校园生活，高校的经历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宿舍里的社会互动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互动论者并不很关心大学校园的组织、运转，而是关心校园中日常互动的性质，学生、教师和管理者是如何看待这种互动的。互动论者并不把校园看成是其成员必须与之相适应的一成不变的组织。相反，他们认为，校园的组织通过参与者的互动而发展和变化。

除了在研究上侧重于个人外，互动论者与宏观社会学家在研究的方法上也明显不同。由于互动论者研究的是人们所想、所感觉的，他们常使用定性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设计上是要研究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们。相反，宏观社会学家更多地是使用定量的方法，比如认真加以控制的统计研究（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详见本书第二章）。

4

对三种视角的简要评价

社会学理论视角的多样性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学并不是一门有着严格定义和统一的世界观的学科。但是这种多样性也说明了，社会学也不是一门追求狭隘性、封闭性的学科。确实，今天，很多社会学家将这种多样性看成是可以使其学科更重要、更具活力、更具冒险性，这样一种多样性总是试图探索人类经验之深层意义。

还需强调的是，这三种视角所显示的差异性并不是起源于矛盾或对抗，而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决不是说一种视角是对的，另一种是错的；每一种视角都考察了同一社会现实的相关方面，而给对方以补充。在所有的社会群体中都可以发现秩序与冲突，如果只研究一个方面而无视另一个方面，那就会丢失了真实和重要的东西。同样，社会的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也确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柯林斯，1981）。宏观社会组织是从微观情境里人们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这样，高校校园的组织就是参与者日常互动的产物。然而，同样的，每一种社会处境也是由已经事先就互动于该处境中的人们组织起来的。这样，新入校的学生发现有一种在他们以外的、先于他们存在的社会结构，他们必须使自己的生活适应于该结构。

先不管哪一种视角最有说服力，读到这里时，恐怕很多读者急于要知道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所有这些理论观点的用途是什么？怎样将社会学应用于我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应用于我自己的生活的。我怎样应用所有这些信息，应用关于人类状况的观点？本章以下部分将要回答这些问题。

社会学的主要目标是推进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它本身已表明了社会学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常常并不是学习社会学的学生们最感兴趣的目标。他们想知道社会学是怎样应用于“真实生活”的。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社会学对于社会整体的实践意义在哪里？社会能从社会学家那里获得哪些收益。第二，你们，学生们，为什么要耗费精力学习社会学？它能给你们带来什么？本章以下部分以及本书中多处称做“应用社会学”的特写部分，都对上述问题做了探索性回答。

体育与社会：理论视角之应用

一百年前，当体育只局限于在有草皮的后院或农场做的一些游戏时，人们尚难以想象它在20世纪所受到的重视。今天，甚至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也会被网球决赛或橄榄球大赛所取代，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体育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丹尼斯，1989）。80年代末的一次调查揭示，成年人中，足足有81%的人，主要是通过电视，热衷于观看体育比赛。而周末的“体育寡妇”现象——即妇女被观看周末体育比赛的丈夫所“遗弃”——已进入了它的第三代（吟里斯，1987）。

体育的功能

用社会学的术语可将体育定义为：依据一定规则进行的身体的比赛活动。像所有的社会设置一样，体育也有多种功能。第一，体育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群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闲暇活动。虽然，倘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闲暇社会有夸大之嫌，但是，多数人的非工作时间确有很大增长。不仅如此，由于现代社会中大量的职业只有很少的或根本没有身体活动，娱乐活动也就变得很有必要了。

第二，体育为释放社会能量提供了渠道，这种能量如不予以分散，会严重威胁社会秩序。无论对于球迷还是参与者，体育可以让他们宣泄情绪（例如愤怒、失望），其方式是社会可以接受的，甚至为社会所鼓励。

最后，体育为社会提供了模范角色。各级运动员，特别是著名运动员，提供了其他人可以效仿的行为与技术运用的样板。例如，今天，被很多儿童视为英雄的是职业橄榄球和棒球队的运动员。

冲突论视角

虽然体育推进了社会的许多方面向正向发展，但是，冲突论者立即指出，体育也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像大多数其他社会设置一样，体育也具有阶级、种族、性别不平等的特点。

例如，像马球、网球、滑雪传统上就是有钱人的运动。低收入的人一般买不起也养不起马匹，买不起贵重的网球、滑雪设备。其他一些运动是典型地起源于穷人和穷人参与的，如拳击，常与城市贫困相联系（萨格登，1987）。一般来说，下层阶级、工人阶级倾向于参加诸如垒球、篮球这样的运动：只要有一块场地、一个球和



球员就可以玩了。冲突论认为,这样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倾向于(或远离)某一运动的现象,是代代相传的。

虽然有时人们认为体育中并无种族不平等,但社会学的研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美国社会中的非白种人在职业体育中所享有高收入的机会大大高于在其他职业中,这一点确为事实,但是几乎所有运动队的经理、老板都是白种人,这也是事实。非白人的体育节目播音员、管理者、各种裁判员人数甚微。再者,在除了垒球、篮球、拳击和橄榄球以外的职业体育中,非白人几乎无人问津(甚至连球员都没有)(科克利,1986)。

纵观妇女在男人取向的体育中的历史,也可看到歧视和不平等。当1896年举办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妇女几乎被排斥于所有竞技项目之外(曼甘和帕克,1987)。直到前不久,女孩子还不许打“小联盟”垒球。但是,近年来,作为妇女运动、法庭裁决和政府政策的成果,妇女在体育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今天,很多妇女不仅擅长于诸如体操、花样滑冰这样的传统“妇女”项目,而且擅长于像赛车、篮球这类更具进攻性的“男子”体育项目。然而,至于妇女是否将全面进入像橄榄球、拳击这样的强冲撞性体育项目,我们将拭目以待(梅思尼,1977)。

互动中的体育

互动论的视角是从微观层次上解释体育,而不是像功能主义和冲突论运用结构假设。这样,互动论者通常注重于研究运动员准备与参加比赛时,面对面的动态的互动过程。

尤其适合于互动论者研究的体育的一个方面是,在活动中,单个的参加者通过象征性符号试图显示他们遵循着他们社会的重要的规范与价值观。在美国,运动员的行为应该是反映了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这一价值观。正如“绿湾打包工”队前教练万斯·朗巴迪的一句名言:“取胜并不代表一切,但它是惟一的事情。”或如华盛顿印第安队前教练乔治·阿兰所说:“你每一次取胜都是一次再生。输了就是向死亡靠近了一些。”很多运动员的行为显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来实践这样的观念。因此,垒球运动员即使在击出了很差的球时也会全力冲向一垒;游泳运动员频繁地剃光头,不仅仅是希望减少游水时的阻力、增加速度,而且也是他们全力以赴争取胜利的决心之象征。

在其他文化中,体育可能会反映不同的价值观。例如,在新几内亚的平均主义的、非竞争的坦古部落中,有一种称做“踏科踏克”(taketak)的颇为流行的游戏,玩的时候并不争输赢,而是追求平局(伯里奇,1957)。美洲西南部很多土著社会,对于与竞争对手竞胜负持相似的态度。一位互动论者分析了纳瓦尤(Navajo)的青少年在参加英国中学体育比赛时所遇到的困难。该研究发现,这些青年人刻苦训练以改进其体育技巧,但是却并不想战胜对手,在通过竞争获得荣誉和奖励后却感到不舒服(阿利森,1979)。

或许,西班牙社会的斗牛传统最好地展示了体育象征意义的重要性。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斗牛具有了象征的和文化的意义。牛被视为象征敌人或刺客,斗牛士被视为战胜敌人者。野兽代表世界动乱之力量,斗牛士代表英雄,他战胜了牛,制止了由野兽所造成的混乱。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斗牛象征着传统西班牙崇尚英勇、崇尚运用臂力技巧的价值观(格拉纳,1987)。

从互动论的视角看,社会中的人们参与体育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他们如何看待生活世界的重要启示。近来,记者描述了中学橄榄球在经济萧条的西德克萨斯的奥德萨城所发挥的作用,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比辛格尔,1990)。这个荒

凉的社区连续被评为国内人们最不愿意居住的地方之一。真的，其居民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然而，伯密安中学橄榄球项目的巨大成功却是个例外。伯密安黑豹队的成功帮助市民们克服了心理上的群体自卑感。

黑豹队在巨大的现代体育馆打球，该球场比一些中等规模大学的场地要大多了。在橄榄球比赛季节，全城到处都是校旗。球员们被视为至宝被光环笼罩着，他们从那些日常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不用上课、不用做一般的家庭作业。只要球队赢了球，球队教练的薪金就是最高的，大大超出学校系统的其他雇员，他本人也受到极大尊重。然而，只要是输了球，甚至只要赢得不痛快，第二天早上，他就会在自家前门草坪上发现插着“待售”的牌子，这表明社区居民对他的不满。

可以从互动论视角考察体育活动的最后一方面，是关于大学、职业球队所使用的美洲本土吉祥物和球队象征问题上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诸如亚特兰大印第安年轻战士、堪萨斯城首领，或华盛顿印第安这些名字是自贬身价，坚持认为应更改名字，认为像“印第安年轻战士”、“印第安砍斧”等名字应停止使用。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这些名字并没有什么不敬的含义，并为保留这些名字而战斗。

1

社会学与社会

多数社会学家在学院和大学里当教师。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通过教学——是间接的。学生们学习了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他们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能比较好地解决他们所在社会中的问题。但是，在大学以外，社会学的直接应用是什么呢？社会学的这个方面称做“应用社会学”——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蒙尼特、叙利旺和德容，1986；奥尔森和米克林，1981）。在应用部门工作的社会学家人数大为增长，这些部门有：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私立研究机构，以及诸如传播、广告、技术等领域（休伯，1984）。

通过考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理解纯学术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的区别。基础研究关注的是知识本身，它不考察知识的使用与应用。应用研究目的在于，为解决直接实际问题提供答案。它直接涉及真实世界问题的解决，它是决策取向的。通常，那些需要信息的帮助以做出特殊决策的人，或需要解决诸如：“如何降低街头犯罪率、降低学校退学率”这类问题的人，他们最需要应用社会学研究。

应用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芝加哥人口稠密区海洛因吸毒者研究。由伊利诺斯州控制滥用毒品项目组和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社会学家完成的这项研究，确认了吸毒过程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因素。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项决策，该决策通过三年的实施，结果使得吸毒者的人数大大下降（休斯，1977）。

实际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楚的。那些旨在解决特殊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研究的成果。很多研究既是基础研究，同时也是应用研究。

应用研究的类型

应用研究的五个主要类型是：评估研究、社会实验、政策取向的社会调查、社会预测和社会监测与描述。

评估研究。这是一种常见的应用研究，它是对已经实施的项目、方案之效果作评价。评估研究用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项目成功吗？它达到预期目标了吗？

评估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涉及到著名的电视连续剧《芝麻街》。这个连续剧是由儿童电视制作中心设计的，其目的是为促进学龄前儿童（特别是劣势的学龄前儿童）智力与文化的发展（库尼，1968）。其目的达到了吗？研究人员发现，每周观看该电视节目四次以上的儿童，确实表现出学习上有所进步。但是他们也发现，优势儿童比劣势儿童看该节目更频繁。结果，该节目看来扩大了优势儿童与劣势儿童的学习差距。因此，《芝麻街》虽然对学龄前儿童起到了某些帮助作用，但是它并没有实现设计者所期望的目标（库克，1975）。

一项对于佛罗里达强迫判决法影响的研究，提供了评估研究的新的例证（贝尔斯和迪斯，1992）。作为对于犯罪采取“强硬对策”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佛罗里达最近颁布了十项强迫监禁条例，其中仅1988、1989年通过的就有六项。研究人员想了解，这些条款的效果如何。他们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新的法律确实得以实施。非法买卖毒品最起码的判决是强迫监禁，该项被判决的人数从1979—1980年的4人增加到1989—1990年的1 022人。在同一时期，被判为佛罗里达重大罪行惯犯的人数从21人猛增到1 084人。第二，这些法律导致州监狱人数翻了两番，从10 000人增至40 000人。第三，由于监狱过度拥挤，官方只好更多地提前释放那些在实施强迫监禁法以前判刑的罪犯；其结果是，佛罗里达判决监禁的百分比，从1987年的53%跌到1989年的34%。不仅如此，那些被提前释放的罪犯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已经被判犯有严重暴力伤害罪。该研究认为，强迫判决法会造成事先未预料到的后果，而该后果大大削弱了降低犯罪率的效力。

60年代以来，评估研究的声势巨大，这是因为，政府要求对其社会项目做出评价（如职业培训、劣势者教育和穷人的法律服务）。然而颇使大家沮丧的是，正如一位重要的研究人员总结的，政府的这些项目很少有实现原来所设定的目标的。但这位研究人员同时也指出，她的上述结论或许受到这样的影响，即由于资金有限，评估必须迅速完成，这样就难以准确评价项目的长期效应。

社会实验。另一类应用社会研究——社会实验——是在项目开始前进行的。虽有时间序列之不同，社会实验常常使用与评估一样的研究方法。在一项重大的社会实验中，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向25 000个低收入家庭直接付费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而不是为他们建筑那种有补贴的低价房屋。实验从1973年持续到1980年，其目的是想要看看，直接付费是否会更好地满足穷人对房屋的需求。

研究人员发现，房费确实交给了那些最急需的家庭，也确实减少了他们

家庭收入中需要付房租的这一部分。然而，该项目的一项规定是，要接受房费，这些家庭就必须将他们的住房标准提高一个档次。结果，大多数家庭选择的是，仅对他们的现有房屋稍做维修或仅搬到稍好一点的住房。换言之，他们并没有大大改善住房条件，而是把大部分房费用于贴补他们拮据的经济开支了。因为实验表明，直接付费的办法并没有给低收入家庭住房以很大改善，所以，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转而采用其他措施去处理住房问题了（弗里登，1980）。

政策取向的社会调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种受到人们重视的应用社会学的形式就是大规模的、政策取向的社会调查。这些研究通常是或者受到政府资助，或者受到私人基金会资助。调查的目的是向官方和大众提供有关国家面临的主要政策问题的信息和对策性建议。

例证之一，是由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领导的小组所做的一项重要研究，它比较了美国公立的、天主教的和私立的三种学校的学术成就水平（科尔曼、霍弗和基尔戈，1982）。这项研究是应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之邀，对于建议中的教育政策的改变做出评估。教育政策的改变包括给私立学校参加者的学费优惠或“教育优惠券”，其目的是要减少教育中的隔离现象。研究发现，私立学校的学生教育成就更高、学习热情更高。这是由于私立学校具有更严格的学术要求和更有效的管理纪律。然而，私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比公立学校要少（但经济隔离现象更多）。

研究人员的报告招致了众多的批评，无论是它的研究方法还是它的结论都受到批评。一些批评者认为，改善公立学校的学习环境要比让更多的学生去私立学校上学有效得多（芬恩，1981）。一些学者所给予的总的批评意见是，这类政策研究有时候只不过是支持政府已经做出的决定（马萨奇里和麦卡洛，1979）。

社会预测。在自然科学中，预测某一现象的发生是研究的主要目标。然而，由于社会世界是如此之复杂，所使用的方法相对地不精确，很少能预测社会事件的发生。例如，要想提前知道战争、革命、经济萧条发生的精确时间，甚至要想知道小的内部骚乱是否会发生，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做出预测，并有实际效果。广为人知的一个例证就是预测选举结果。50年前，预测选举结果还主要靠猜测。今天，它已成为一门精致的艺术，民意测验家可以预测几乎所有选举的结果，当然，那些选票极为接近、差距极为微小的选举除外。

社会监测与描述。不是所有的应用社会研究都能得出明确清晰的结论，可以预测的是很少的。一些研究仅能准确地描述世界运作的方式。例如，密执安大学已故的安吉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曾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样本，做历年的关于人们的感受、态度、幸福感的调查。他发展出一种了解美国人口中哪一种人具有最高幸福感，哪一种人具有最低幸福感的方法。一些样本中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坎贝尔发现，一般来说，结婚的人比没结婚的、分居的、离婚的和鳏居、寡居的人更满意。但是，在坎贝尔的样本中，家庭有孩子并不能使幸福感增加。社区感会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总

的来说,这种社区感在农村、小城市,比在大城市更为常见。但是,坎贝尔发现人们的幸福感与人们的收入水平之间仅有很小的联系(坎贝尔,1981)。

将早期的这类研究和新近的研究互相对比以后,这些快相式描述就可以变成社会指标、数据,并告诉我们,民族的脉搏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例如,政府近来的统计数字显示,家庭单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其指标是,从1960年到1990年,离婚率上升了122%。这意味着,仅与单亲住在一起的儿童比以前增多了(1960年是9%,1990年是25%)。从1960年到1990年,美国家庭住户的平均规模从3.33人下降到2.63人,这清楚地显示了家庭变小的趋势。

虽然可以用不同方式解释这些数据,但是,这些指标确实告诉我们,国家在朝哪一个方向走。通过不同时期监测所获得的数据,也可以用作形成和指导公共政策的基础。

社会学的其他应用研究

以上我们介绍了直接运用社会研究的应用社会学。其他的应用研究包括政策咨询、社会批评和诊所社会学。

政策咨询。社会学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不只限于大规模政策取向的社会研究。政府决策者也会直接找社会学家咨询,请他们提供有关社会事务的专业知识。

这种向社会科学专家咨询的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最高法院1954年关于禁止种族隔离学校的决定。在布朗对教育委员会的讼案中,法庭的裁决主要是依赖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证据和证言,即认为在有种族隔离的所谓“分开但平等”的学校上学有害于黑人(霍维茨和卡茨,1975)。这是社会科学的观点与研究第一次在重大讼案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批评。社会学家不必等待别人来咨询他们关于社会政策的观点。很多社会学家在社会上发表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意义的社会生活理论分析著述。这些分析通常被称做“社会批评”。

例证之一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该书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颇具社会影响。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被两套互相冲突的价值观所拖累:一套是传统的价值观,强调独立、节制、工作和节俭;另一套是现代价值观,强调不间断的个人需求之满足。需要第一套价值观来使人们生产商品和资本,另一套让人们购买这些商品。对于我们的经济,两套价值观都是必须的,但是它们却互相矛盾。当人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不间断的需求满足价值观时,他们的生产和储蓄就会减少,于是就会造成国家的经济问题(对于此著作,本书第三章还将予以详述。)

诊所社会学。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不满意于其学科孤立与抽象的特点,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称做“诊所社会学”。像在诊所诊断人们精神和感情问题的心理学家,也像临床诊视病人身体的医生一样,这种新发展出来的社会学家,正在设计一种直接帮助人们解决其社会问题的方法。诊所

社会学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改善社会状况。像其他的诊所实践一样，社会学家在实施参与之前，也要对问题做出专业诊断。

客户的范围从个人、家庭直到大型的社会组织（罗西和怀特，1981）。诊所社会学家帮助客户实现他们自己所陈述的目标，而不是通过介入带来制度的或社会的变迁。诊所社会学的一个例证是凯·埃里克森（Kai Erikson）在西弗吉尼亚布法罗溪对社区生活所做的工作，这是在1972年的那次山洪暴发，冲垮了水坝，席卷了山谷以后的事情（1977）。埃里克森是要评估洪水对于居住在山谷里的5 000户家庭的个人的与社会的影响。由于失去了那种曾经能将居民们联络在一起的社区支持，很多人失去了精神上的力量，失去了精神健康，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通过对社区生活被损害原因的一针见血的分析，埃里克森成功地帮助受害者从灾害中犯有疏忽罪的煤矿公司那里赢得了1 350万美金受损害补偿费。

在我的职业与事业中如何运用社会学？

绝大多数选择社会学专业或选修社会学课程的学生，并不想成为专业社会学家。你可以看到，前社会学本科学生，后来所走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下面是一些例证，展示了你可以运用社会学训练的多种方式。

人事部门经理

一家比较小的制造业公司雇用了一位具有社会学学士学位的毕业生，他主要学习的是工业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公司人事部门任初级职员。几年之内，他升为部门经理，在公司的雇用人员、培训和提升政策上有较大影响。将来，此人可以选择，或者寻求在同一家公司人事部门以外获得更高的管理人员位置，或者到另一家公司就职。他并不认为自己能跟得上最新的社会学研究，但是，他也确实阅读一些社会学专业出版物，继续把他在大学学到的社会学知识运用于工作之中。

城市规划员

传统上，城市规划员的来源背景比较广泛，包括工程、建筑、地理以及社会学。一位新近为一家城市规划公司工作的社会学毕业生发现，她的每一位同事都为公司带来了不同的视角，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她自己则关注于物质环境对于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她准备在获得了城市规划硕士学位以后，寻求做城市更新的工作。她的主要目标是在城市内部保持一种开放空间的感觉，这种思想起源于她在小城镇长大的背景。

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机构为个人或家庭提供服务，目前，很多都是私营的。由于看到近年来社会工作者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收入），一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也加入到专业主义的浪潮中来，获得了社会工作硕士学位。通过在公共机构的五年的训练，她变成了“获有证书的社会工作者学会”的一名成员，最后，她开办了一家私营机构。虽然她的业务主要依赖于递交的申请资料，但是，她很欣赏自己专业工作的独立性、灵活性，以及能够运用她的教育训练去帮助他人。

公共援助管理者

虽然大多数专业社会学家是教师和研究人員，但是，这一位女士自从她第一次接触社会学以来，却一直对于应用该学科直接帮助他人感兴趣。她在市政府的社会



服务部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一名项目协调员。虽然她的工作包括处理大量的文件，但是，也还是使她能广泛接触穷人、少数民族、残疾人、老人——使她有机会帮助这些人。她的很多合作者受过社会工作训练，但是，这位女士运用她的关于社会分层、家庭、城市社区等领域的系统知识，为她的工作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社会科学作家

一位社会学本科毕业生继续攻读文学创作的硕士学位，此后便开始写小说。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他的社会学背景对于他创作可信的人物、令人相信的情节有极大的帮助。过了一段时间，他认识到了以写小说为生的困难，于是他开始寻找承接社会科学写作任务的自由撰稿人的工作。由于他有双重背景，找到这样的工作并不困难。自那以来，他一直给一家主要的出版公司写教科书的一些章节，合作写社会批评方面的著作，写了很多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辞条——同时也继续创作小说。

资料来源：改写自《社会学中的职业》（Washington, D. C.: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91）；经允许使用。另参考：雷克斯·A·斯基德莫尔、米尔顿·G·撒克里和O·威廉·法利：《社会工作导论》（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88）；哈里·戈德：《城市社会学》（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82）；斯蒂芬·布夫：《社会学专业做什么》（Washington, D. C.: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91）。

2

为什么学习社会学

以上我们谈的是社会学家所应用的社会学。但你们中那些不准备成为社会学家的人，有权利问，社会学对你们的用途是什么。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方式可以应用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的知识对很多职业都是有价值的。研究社会学可以学到探讨问题——不管是个人的、与工作相关的还是政治的问题——的特殊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日常生活中的决策。

为就业做准备

一位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在他所获得的有用的技能中，能在任何一种工作中用得上的他客观地观察社会情势的能力。这样一个人，通过社会学训练学会了组织复杂的观点，运用数据检验各种直觉判断和各种理论，清晰和符合逻辑地推理。这些对很多职业都是十分有用的能力，尽管这些职业从来不使用社会学这个词。

社会学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上述技术。且不论职业选择，我们需要社会技巧，在与他人相处时需要这些技巧。因为社会学可以改善你对于他人互动方式的认知，学习了社会学，在这个方面真的会有所帮助。再者，组织技巧在很多职业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正式组织内生存与发展需要这些技巧。社会学可以提供这些技巧所赖以为基础的知识。

最近，美国社会学会所发的一份小册子，谈到了社会学作为经营管理职业的前期准备的价值，该材料建议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应该注重于某一特殊的具体领域或具体问题（例如，经营组织或社会问题）而且越早越好。很多社会学专业的人，很早就对于经营组织有兴趣，后来转到了人事管理、工业关系、公共关系、组织规划和国际市场销售这些职业上去了。那些对于社会问

题、社会心理感兴趣的人常常被吸引到了诸如社会工作、咨询、教师这类“帮助”型职业上去了。

日常生活中的决策

社会世界的客观知识、社会学方法和社会学的视角，也可以帮助我们更理性地探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决策。运用社会学的发现以及社会学的技术，我们更有可能做出对我们个人幸福生活有利的决策。本书中的很多名为“应用社会学”的专题，就列举了社会学如何帮助个人做出日常生活中决策的例证。

理解你自己

C·赖特·米尔斯强调，社会学视角可以作为—种主要工具，帮助解释与理解我们的生活。他主张，只要把我们自己放进我们的社会、放进—定历史时期，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的经历，就能决定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米尔斯将这个过程视为社会学想象力的发展。

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能够抓住历史与我们的经历，以及在社会中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它的任务，是它所承诺的……。这种想象力的第一个果实——体现这种想象力的社会科学的第一课——就是这样的观点：即仅仅通过将他自己置于他所在的历史时期之中，—个人就可以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就可以估计他自己的命运；仅仅通过了解他身边的所有的人，—个人就可以知道他自己的生活会（1967）。

请记住，米尔斯心中有明确的使命感：鼓励社会学家成为社会批评家。对于米尔斯来说，“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意识到个人问题演变为公共问题的能力，就是不断地穿梭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就是将个人既视为独一无二的人物，又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个部分及其产物。

在我们为寻求个人的定位和自我理解时，社会学视角是—个强有力的工具。如果我们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种视角是极其重要的。当知道，我们的前程、我们的机会、甚至我们的幸福感、挫折感都主要是由—种外在于我们的力量决定之时，这是我们很难接受的。然而，正如米尔斯所说：“在很多方面它是可怕的一课，在很多方面，它是光辉灿烂的一课”（1967）。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社会学是—种关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的系统的、客观的研究。
2. 与文学、哲学这类学科不同，社会学在其探索中努力要成为—门科学。与自然科学家—样，社会学家常常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然而，仅仅靠自然科学方法，并不能实现对于人类社会的充分理解。很多社会学的著作显示了人文学科的痕迹。
3. 社会学被责难为得出的是关于人类行为方式的显而易见的结论。但是，社会学研究已经证明，关于人类行为的许多看起来似乎正确的观点，却

是错误的。社会学视角的这种特性被称为“揭穿真相”。

4. 社会学家关于一切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是：人类行为由社会和社会环境所塑造。

5. 大多数社会学家的主要兴趣是理解社会的本质及其对个人的影响。很多社会学家也关心社会互动过程本身。

6. 社会学家试图从社会现象中而不是从心理的或生理的现象中了解社会现象的原因。每一种社会背景都被视为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一个复杂的网络。

7. 一门社会科学就是要使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与人类行为。社会学与诸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确，这些学科的分界常常是人为的。虽然在研究角度上略有差别，但各种社会科学学科常常研究的是相似的问题。

8. 社会学取其现有的形式只不过大约一百年的历史，它根源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心怀革新思想。他发展了“实证哲学”的思想，也就是他后来所称的“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社会的“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赫伯特·斯宾塞是一位英国思想家，他将社会比做生物有机体，认为两者都是由简单向复杂形式进化，都受到“适者生存”规律的制约。卡尔·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一个有秩序的体系，而是阶级冲突之结果。作为一位革命家，马克思通过分析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对于社会学的主要贡献是他强调经济因素和阶级冲突的重要性。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主要关注于“社会事实”。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是由诸如法律、习俗、制度等社会事实构成的。这些社会事实在人们以外，但是却对人们施以控制。马克斯·韦伯特别对于社会的大的方面感兴趣，比如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他以研究科层制和资本主义而著称。他还感到，社会学必须包括对“社会行动”的研究，即研究人们相互之间行为取向的方式。

9. 美国的早期社会学研究人员与其欧洲先行者一样都有改革主义倾向，他们常常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工作目标。2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罗伯特·帕克、乔治·赫伯特·米德等社会学家研究了诸如城市化、种族关系等社会问题。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学家开始帮助发展政府机构和开拓研究项目。二次大战以后，社会学家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发展一般的理论以解释社会运行。塔尔科特·帕森斯寻求运用韦伯和迪尔凯姆的理论去建筑一种“行动的一般理论”。帕森斯的学生罗伯特·默顿以他的越轨行为的理论对社会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帕森斯的主要批评者，C·赖特·米尔斯在发展冲突论视角上具有重要影响。米尔斯既批评芝加哥学派的经验论，又批评帕森斯这一类的“总体理论”，认为他们缺少社会关注。

10.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社会学仍然在确立其研究范围的过程之中。社会学家们观察社会的理论视角是不一样的。功能主义视角强调这样一种模式，即社会的每一个部分都对总体发生作用，由此维持了社会稳定。根据这种观点，社会的构成部分（比如家庭、商业机构、政府）以系统的方式结合

在一起,对整体发挥着好的作用。社会结构构成单位的功能可以是“显在的”(可以意识到和看到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未意识到和未看到的)。如果社会结构的某一部分阻碍社会满足其需求,则被视为具有反功能。社会变迁通常被认为是来自系统以外。

11. 与功能主义视角形成鲜明对照,冲突论视角强调人们因有限的资源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冲突主义者强调社会的流动性,认为社会的各部分处于相互的冲突之中。所谓秩序是强群体对于弱群体实施统治之结果。

12. 无论功能主义者还是冲突论者,他们都首先关注宏观层次的社会: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它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两种理论视角,在关于人类社会、人类行为的结构主义观上也是相同的。结构主义者认为,个人的行为是非个人所能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之产物,他们缩小了自由意志的概念。

13. 互动论视角主要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交往的,他们如何使这种交往产生实质性的意义。它关心的是微观层次的社会——社会互动和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互动论者强调,人们总是处在创造和改变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过程之中,互动论者倾向于依靠定性研究。

14. 虽然很多社会学家在学院和大学工作,但社会学仍大量地应用于实践之中。社会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关注的是知识本身,它不考察与该知识相关联的使用与应用。应用研究的目的在于,为解决直接问题提供答案。应用研究的类型包括评估研究、社会实验、政策取向的社会调查、社会预测和社会监测与描述。那些非直接应用研究的应用社会学包括政策咨询、社会批评和诊所社会学。

15. 学习社会学可以使我們得到考察世界的技术与方法,这可以有助于与社会无关的职业,有助于做出日常生活中的决策。社会学使我们能够理解那些影响我们的社会力量,有了这种理解,我们就可以对生活有一些控制。C·赖特·米尔斯将这种通过摆正我们自己在社会、社会力量中的位置,来理解我们自己的方式,称做社会学的想象力。

推荐阅读书目

1. 巴特(Bart), 保罗林(Pauline)与林达弗兰克尔(Linda Frankel), 1986.《学生用社会学手册》(*The Student Sociologist's Handbook*, 4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社会学实用参考书, 内有学生所需要的实际信息。

2. 鲍曼(Bauman, Zygmunt), 1990.《用社会学思考》(*Thinking Sociologically*.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对于社会学思想有精彩的解说。作者展示了如何将日常生活经验翻译为社会学的语言, 而这种翻译又如何能提供了对我们所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与活动的新的认识。

3. 伯杰贝内特 (Berger, Bennett) 主编, 1990. 《作者们自己的生活: 二十位美国社会学家的生活道路》(*Authors of Their Own Lives: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ies by Twenty American Sociolog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关于如何走上社会学道路的介绍, 著名社会学家描述他们的个人生活与学术兴趣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4. 彼得·博格 (Berger, Peter), 1963. 《社会学的邀请: 一个人文主义的观点》(*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关于社会学视角的精美阐释。

5. 克利斯托弗 (Bryant, Christopher G. A.) 与贝克尔 (Henk A. Becker) 编辑, 1990. 《社会学取得了什么成就?》(*What Has Sociology Achiev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十二位学者谈社会学学科已取得之成就, 以及社会学观点是如何被应用的。

6. 柯林斯 (Collins, Randall), 1992. 《社会学的洞察力》(*Sociological Insight*,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介绍了古典与当代社会学研究人员与理论家的一些易被人忽略的发现, 既简明扼要, 又有趣易读。

7. 米尔斯 (Mills, C. Wright), 1967. 《社会学想象》(*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位著名的、有争议的社会学家用批评的眼光评价了社会学及其发展过程, 确认了学科的一些应用与收获。

8. 社会学写作小组 (Sociology Writing Group), 1992. 《社会学论文写作指导》(*A Guide to Writing Sociology Papers*,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是初级班和高级班社会学学生写作论文时十分有用的参考手册。

9. 洛恩 (Tepperman, Lorne) 与安哥尔拉 (Angela Djao), 1990. 《选择与机会》(*Choices and Chanc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解释了社会学知识怎样帮助人们做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决策。

社会学研究的过程

如果你稍微花几分钟时间观看电视新闻节目，或者浏览几份主要报纸，你就会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学家感兴趣的问题，许多新闻记者也对它们有兴趣。每天当你打开报纸时，许多大字标题涉及到了家庭破裂、犯罪、吸毒、失业、种族冲突和性骚扰等社会问题，而且其报道内容还明显地提及了由社会学家或者社会科学组织和机构所作的研究。

对职业社会学家来说，大众传媒经常性地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他们既有好处又有害处。从好的一方面讲，社会学研究的通俗性报道有助于人们对该学科的了解。普通老百姓虽然对社会学不可能有完整而又准确的理解，但是在大众传媒中他们至少知道了社会学研究的某些内容。而公众的这种一般性的了解，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该学科研究领域的合法化。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新闻记者 in 谈及社会学研究时，职业社会学家认为极具重要性的问题似乎又很少能在记者们所采写的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更进一步说，新闻报道总是歪曲了职业社会学家的研究。

针对这种情况，有两位社会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以此来发现记者是如何根据读者的兴趣来取舍社会科学研究内容，并加以重新包装来吸引大众的。

魏斯(Carol Weiss)和辛格(Fleanor Singer)不仅关注社会学在普通公众中的形象，而且他们还研究了媒体报道中的社会科学研究对政府和商业部门的决策者所产生的影响(1987)。他们两位都积极地进行了应用研究。他们从以前的研究资料中了解到，在通常情况下，决策者很少会花大量时间去阅读专门

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报告或者社会科学杂志。相反,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他们决策时主要依赖于媒体中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报道。这说明国家的决策者们很有可能是在根据不完全的、带有偏见的甚至是极不精确的新闻报道来进行决策,而这种决策又给数百万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所以仔细研究新闻记者在报道时是如何对社会学研究进行删改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

研究开始时,魏斯和辛格系统地检索了社会科学文献,查看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他们也邀请了一些经过挑选的社会学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经过大量准备,他们着手进行一个三阶段的研究计划,力图弄清新闻记者的镜头是怎样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过滤和筛选的。在第一阶段,辛格详细列出了在最近五个月中各主要媒体中出现的对社会科学研究情况的报道一览表(大约有2 000余条类似的报道)。第二阶段,魏斯从上面这些报道中抽取了调查样本。他与样本中撰写各社会科学报道的记者及报道中其研究成果被引用的社会科学家进行了标准化的电话访谈。最后,辛格分析了每一篇文章的内容以便发现新闻记者是如何对它们进行修改的。

研究结果表明,新闻记者不是因为科学价值而选择某一论题,相反,他们报道某一社会研究是因为他们相信该研究会以其重要性、趣味性和新颖性的特征而吸引观众。研究指出,总的说来,新闻记者不曾受过社会科学的教育,他们甚至也没有意愿去辨别他们所采写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优劣,或将自己所采写的研究与类似的其他研究进行比较。然而这些却正好都是职业社会学家所必然要做的。社会科学家自然十分明了所做的研究被报道后所面临的现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总是不断地埋怨自己的科学研究被过分地简单化了,被大量地篡改了,断章取义,科学研究简直就成了一条新闻报道。

魏斯和辛格还发现,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正是那些资助调查的政府和私人代理机构,而不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提醒了记者去报道那些他们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这是媒体报道歪曲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层原因。

研究过程

像上面所说的一样,许多社会学家都是通过调查研究来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关于调查其实一点也不神秘。它要求研究者慎重地提出问题,然后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在前面的例子中,魏斯和辛格为了探索社会科学和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他们围绕着三个问题来组织研究:第一,新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科学?第二,社会科学中的特定研究和人是怎样变成新闻报道的?第三,社会科学中的这些研究和人在新闻报道中的准确性如何?

什么是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社会科学家又怎样设计方案来回答这一问题?社会学家使用何种方法来收集资料?他们又怎样对数据进行解释?他们怎样陈述他们的调查结果并把它们介绍给别的社会科学家及一般公众呢?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学方法论关注的焦点。方法论就是有助于社会学家开拓知

识面的系统程序。没有方法论的指导,社会学甚至比无根据的胡乱猜想强不了多少。

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十分强烈地依赖于经验性方法。这种方法使用人的感官如视觉和听觉来观察外部世界,其观察结果又可以由别人用同样的过程来检验其正确性。因此经验方法是一种极为普遍和开放的获得知识的途径。因为它依赖于感官观察,而这又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所以它减少了个人偏见、情绪化成分以及歪曲性论断。

设计经验研究并且从中引出结论的过程当然必须遵循逻辑法则。单凭推理或者单凭直觉均无法获得科学“真理”。科学研究总是要受到经验调查的影响。例如,推理和直觉认为贫困是革命的主要原因,或者家庭破裂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但直到我们在较长时期内对革命和青少年犯罪进行仔细观察之后,我们才能满有把握地相信这些结论。

通常,社会学家进行两种类型的经验研究。描述性研究是知识探索的第一步。它主要是为了弄明在何时、何地、对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描述性研究中人们认真地收集资料来描述群体、社会活动和事件。犯罪统计、舆论调查、电视收视率调查和有关人类性行为的报告,它们都是描述性研究的实例。

虽然描述性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起点,但是社会学家常盛不衰的理论兴趣却使他们对事物为什么会发生。解释性研究就是为了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的。为什么离婚率在不断上升?为什么人们搬离城市而去郊区居住?为什么青少年犯罪率在最近几十年有如此明显的上升?孩子们是怎样变成少年犯的?

1

社会学解释

解释社会现象是社会学理论的全部内容。社会学理论远不止是推测。好的理论既是其后继研究的推动力量,又是该社会研究的最终成果。社会学实践包括大部分的理论和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正如我们在这一节将要看到的,理论指导研究,又从研究中提炼出理论。

概念和变量

调查研究和理论的基石就是概念和变量。社会学概念是对研究范围内同一类现象和过程的概括性表达。概念可以是实体性事物,例如,人或建筑物,也可以是非实体性现象,例如,和平、福利或爱情。

小孩甚至在上幼儿园之前,他的头脑中就有了许多概念。例如,一个四岁的小孩,他就有了“汽车”的一般概念(它能与某一特定的汽车区别开来),知道汽车包括了他父母的红色丰田车,比尔叔叔那辆古典的1967年的“野马牌”汽车和邻居家的旧面包车。概念引导孩子关注某一类事物。通过归纳方法,孩子们懂得了要得出“汽车”这一概念,必须忽略其在颜色大小和水箱设计方面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对于“汽车”这一概念来讲都是不重要的。

概念的一般用法通常比较模糊。“家庭”这一概念既可以指父母亲双方及其小孩,也可以指涉193个远房的堂表兄弟姊妹。当人们使用一个概念来

表示许多不同的事物时,我们总是能够根据其使用情景来了解概念的含义。假如你妈妈告诉你,她将购买 25 磅火鸡,因为全家都会来参加感恩节聚餐。这时,你肯定明白她所说的“全家人”一定包括了叔父母、伯父母、堂表兄弟姊妹和爷爷奶奶。

然而在社会学研究中,类似“家庭”这样的概念必须有更精确的定义。学生在阅读有关中国家庭群体交流方式方面的论文时,他们不应去猜测作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家庭”概念的。因此,像所有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一样,社会学家也有一套公认的概念来描述他们所要说明的模型和事件。

很多普通概念,例如“汽车”,相对而言指的是较为固定不变的事物。汽车有多种大小和形状,但人们不会在意这些区别。这就是说,在某种时空维度中汽车的特征是不变的。可是在社会学所使用的大部分概念中,其所界定的事物是变化多端的,它们或者在时空维度上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或者代表了不同人或群体,这就是变量。年龄就是一个变量,因为人的年龄可以从不到 1 岁一直到 100 多岁不等。社会阶级是另一个变量,人们有可能属于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和下层阶级。较为常用的其他社会学变量还有收入、教育水平和性别。有些变量例如收入和年龄,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另外一些变量不是根据程度而是按类别来变动,例如性别不是指男性就是指女性。

为了进行研究,社会科学家必须将一般性概念转换成具体的、可以测量的变量,这一过程叫做“变量的操作化”。例如,一般性概念“大学质量”就可以通过诸如教职工中拥有博士学位者的百分比,大学图书馆中藏书量大小,申请入学的人数等等“操作性变量”进行测量。社会阶级是一个极为常用的概念,它可以通过诸如教育、收入和职业等变量进行操作。有效地选取和定义变量需要较高的手段和技巧。

假设和经验概括

社会学解释大多数都是陈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是关于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之间联系方式的尝试性陈述。例如,有人可能会假设,在美国社会中,结婚的年龄越小,离婚率就越高。这一假设就提出了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结婚年龄和离婚率。由于假设通常是人为假定的,因而如有证据表明它是不对的,它就可以被摒弃。然而,假设永远也不会在绝对的意义上被证实,因为总存在进一步的证据来拒绝这一假设的机会。

一旦研究表明某一假设是合理的,这一假设就成了一种经验概括——即关于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为经验证据所支持的陈述(如以观察为基础的证据)。现在我们来考察结婚年龄下降时离婚率上升这一假设。我们能提炼这一假设吗?除了结婚年龄以外肯定还有别的社会因素影响离婚率。在何种条件下两个变量之间的初始关系会发生改变呢?假设我们来测量配偶家庭的宗教信仰是如何影响离婚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表明,有宗教信仰的夫妇其离婚率要比无宗教信仰的夫妇低。这时,结婚年龄还是影响离婚的一个重要因素吗?如果是的话,结婚年龄又在多大程度上与宗教信仰相互联系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又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只有在通过无数次研究尽其可能地对多个变量进行阐释之后——例如结婚年龄、宗教信仰程度、居住区域

和子女数量——社会学家才有可能较满意地得出正确的经验归纳。

理论

理论刚好与假设相反，它是对被观测到的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解性解释。在构建理论时，社会学家试图透过生动的经验概括来力求对它们加以解释。理论产生于经验性归纳，反过来，理论又可以预测其他变量相互联系的方式。这些预测又可能被新的经验性观察所检验。

罗森伯格（Rosenberg）和西蒙斯（Simmors）（1971）所作的关于城市学龄儿童自尊的研究说明了理论和经验归纳之间的相互取予的关系。他们要研究孩子的自我形象是怎样通过其社会经验而形成的。当他们调查种族隔离学校中非洲裔学龄儿童的自尊水平，并将它与美国白人孩子进行比较时，他们感到十分惊奇的是，美国黑人孩子在自尊测量中的得分与相同年龄和社会背景中的白人孩子的得分一样高，这是研究开始之时所没有想到的。因为以前的研究发现非洲裔美国儿童来自于极为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中，并认为这样的环境会导致自卑感。那么怎样来解释这一新发现呢？

研究者一旦确信自己的研究方法没有引起对事实的歪曲后，他们就用“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s）来解释上述现象。作为社会中的人，总是要不断地拿自己与别人进行比较。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所有黑人学校上学的学生比在混合学校的黑人学生更具有优越感。根据罗森伯格和西蒙斯的理解，在被隔离的黑人学校的孩子看来，贫困和种族歧视只是日常生活中默认的事实，没有一个穷孩子觉得自己受到与众不同的歧视，也没有人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优越。但是在种族混合的学校中，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的区别对待是显而易见的：与享有特权的白人孩子相比，美国的黑孩子时刻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别人优越。

这种解释看起来颇有道理。它呈现了研究者们所设法证实或证伪的社会理论的基础。罗森伯格—西蒙斯的自尊理论说明与社会情景越协调——与儿童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的相似处越多——儿童的自尊感就越强。但这一解释能运用于大学生和年幼的学龄儿童、优秀学生和较差学生，在家里与在学校的儿童之间的自尊水平的对比吗？这一理论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供我们去探索和解答，而且我们也总有机会得到更有说服力的新理论解答它们。

2

变量分析

我们曾经指出，假设是关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陈述。但是社会学研究探索的是哪一种变量关系呢？与别的科学家一样，社会学家试图找出原因和结果来。例如，他们想知道青少年犯罪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会研究多种可疑因素如辍学、青少年的待业、失业、吸毒和酗酒。这些可能性原因或解释性变量，我们就称之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其结果（犯罪总数）是因变量。也就是说，因变量是研究者想要解释的变量，自变量是其可能的解释。

在一些研究中，因变量（结果）是已知的，因此研究重点在自变量（原因）方面。为什么人们购买这一品牌而不是其他品牌的咖啡？为什么人们要

从一地搬迁至另一地？

在另一些研究中，自变量（原因）是已知的，但是因变量（结果）是未知的。政治运动的后果是什么呢？医生为什么要反对吸烟呢？反毒品法的社会作用是什么呢？

有时要区分原因和结果十分困难。广告能刺激人们的购买欲吗？有些研究表明人们是在买到汽车之后才去看汽车广告的。在做出某一抉择之后，人们往往还对所放弃的选择感到不安，这样，他们力图再度确认自己已经作出了最佳的选择（威克伦德和布雷姆，1976），因此观看广告不是购买的原因而是购买后的结果（威金斯，1955）。

原因和结果还可以互换位置。儿子犯罪有可能导致父亲抛弃家庭，就像家庭破裂有可能导致青少年犯罪一样。在一个时点上自变量，到了另一个时点却又可能变成因变量。为什么低级科层职员彼此常常如此僵化，斤斤计较？有人认为原因不仅在于这些性格僵化的人往往喜欢干科层职员这种职业（这里，人格是自变量，而工作选择是因变量），而且还在于工作中的繁文缛节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僵化倾向（默顿，1956）。另一研究也表明参军的高年级高中生接受“军队价值观”，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倾向导致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参军，而不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军队训练（巴赫曼、西格尔曼和戴蒙德，1987）。

社会学家怎么知道他们所研究的变量是否是因果关系呢？第一步，研究者们寻求统计中的相关关系，一个变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与另一变量的变化相联系。假设我们想了解谋杀率和国家的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统计资料就会发现，当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少时，一般说来谋杀率就高。这两个变量在统计上的相关程度的精确值可以计算出来（参见“社会学之窗”栏：“社会学中的统计学”）。然而即使找出了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也无法得出缺少教育就会引起谋杀这一结论，很有可能二者都来源于另一个变量——例如贫困，因为贫困既造成了在教育中的低收入，又发出高谋杀率。

总之，简单相关并不能证明某两个变量是以因果关系相联结的。事实上，有时两个变量之间即使不存在因果关系它们也有可能高度相关。例如，在医院比在家中有较高的死亡率，这是否意味着医院会导致死亡呢？当然不是。虽然这种相关是有效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不以因果联系为基础的相关被认为是虚假相关（spurious correlations）。



理解图表、表格和图形

1. 从标题开始阅读。标题将精确地告诉你，从这些图表、表格或者图形，你可以期望获得些什么。
2. 查看其他说明性注释。有时你将发现眉批中解释了资料是怎样收集的。资料是在何种条件下收集的，或者作某种分类的原因。脚注解释了资料的来源，或者指出了在有些条件下，资料是不完全的和不精确的。

3. 看图表或表格时,从每一列的顶端标题看起,对照每个单元格所代表的意义,从该列逐一往下看。阅读图形中横轴(位于图的底部)和纵轴(位于左端)的标题。它们将告诉你图表和图形中包含的是什么数据。

4. 找出所使用的是何种测量单位。当数字达到数千或数百万时,测量单位容易混淆。比率甚至更麻烦,因为它们可以用多种方法表示——例如可以是每100或每1 000或每1 000 000人的倍数。

5. 估计资料的变化范围。找出最大数、最小数和平均数,然后你才会有对数据进行比较的基础。

6. 比较表格和图形:它们可能是以不同方式来说明同样的信息,这里介绍的表格和图形都表明了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户主所获得收入多少的比率。假如我们希望了解精确的百分数,表格将会更有效地帮助你获得这些信息。但是图形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系。

7. 总结图表、表格和图形的意义。资料来源可靠吗?资料是怎么获得的?资料的变异有足够的意义吗?运用资料进行报告的方式含有偏见吗?回答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将会帮助你判断表格和图形的意义(参见表2—1)。

表 2—1 家庭户主的教育程度与家庭现金收入:百分比分布, 1991

户主的教育水平	家庭收入水平						
	\$ 5 000 以下	\$ 5 000~9 999	\$ 10 000~14 999	\$ 15 000~24 999	\$ 25 000~34 999	\$ 35 000~49 999	\$ 50 000 及以上
九年级以下	10.9	26.6	18.2	21.7	10.5	7.4	4.5
高中	4.0	9.5	9.9	19.7	17.8	19.5	19.6
大学	1.3	2.0	3.2	9.1	12.4	19.0	53.0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 1993》(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3

统计控制和多变量分析

当研究者发现两个变量相互关联时,他们怎么知道这种相关是否包含了某种因果关系呢?他们就会通过应用统计控制来表明别因素并不是这一相关关系的来源。有两位学者想知道,不同类型的大学教育对人们后来生活的影响(所罗门和瓦克特尔, 1975)。有一种看法认为,毕业于规模较小的、不太重要的大学的人在经济上总没有名牌大学毕业生成功。研究者确实发现了人们所上的大学和所得收入之间存在高度的统计相关性:就读的大学排名越高,他所赚的钱也更多。但是这确实是所上大学类型产生的结果呢,还是说好学生总是上好大学呢?研究者运用统计控制,对具有同等社会经济背景和同等学习能力的学生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学校类型仍然举足轻重:学校的质量越高,其学生赚的钱越多。换句话说,学校的质量对以后收入获得具有独立的影响。

现实社会中很少有简单的因果关系。相反,单一的社会事件通常同时受到许多变量的影响。因此许多统计研究都要进行至少两个以上的多变量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因果关系的探索主要就是去发现几个相对重要的变量所产生的总体效应。多变量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所入大学和未来收入之间存在的高度相关关系。很可能较好的学校吸引了较优秀的教职员工，他们更积极鼓励学生们继续完成学业和上职业专门学校，或者是高薪单位更喜欢录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多变量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分析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社会学中的统计学

社会学调查经常要以定量的形式收集大量资料。社会学家使用统计方法来解释资料并从中得出有效结论。在社会学中使用的最关键性的统计方法是测量集中趋势(平均数)和测量相关性。

集中趋势的测量

集中趋势的测量值是对某组成员所进行的一系列测量的概括，换句话说，就是平均数。测量集中趋势最常用的方法是算术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mode)。

算术平均数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平均数”，它是整组中个体测量值的总和除以组中成员的个数而得到的。例如，考虑一个3人组，每人手中都有一定数量的金钱，一个人有3美元，另一个人有5美元，第三个人有7美元，假如我们将它们相加($3+5+7=15$)，除以组中成员的个数($15\div3=5$)，我们就得到了5美元这一算术平均数。

中位数是另一种测量集中趋势的方法，它是一组中代表中间数字的那个数目。例如，假如一个8人群体中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分别是5, 5, 6, 7, 7, 10, 11和12年，那么这一组中接受学校教育的中位数就是7年，中位数是通过找出某个数字而得到的，在这一数字之前和之后都有三个测量值。

众数是第三种“平均数”。它是在一组测量值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数目。例如，假如有一群体包含有8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个数为1, 2, 2, 2, 3, 3, 4和9个，那么众数就是2，这是出现频率最多的数目。与众数相比社会学家更常使用的是算术平均数和中位数。

相关关系

社会学家常想了解两个变量是否相关——换句话说，两个变量的变异是否一致和显著。变量相关可能是正相关或者负相关。

在正相关中，当第一个变量增加时，第二个变量也增加；当第一个变量减少时，第二个变量也减少。例如，教育与文化自由主义是正相关的。这意味着一个人所受教育越多，他或者她就越有可能接受流产和同性恋；一个人所受教育越少，他或她接受它们的可能性就越小。在负相关中，当第一个变量减少时，第二个变量就增加；当第一个变量增加时，第二个变量就减少。例如，教育与文化保守主义是负相关的。一个人所受教育越多，他或她就越不可能反对流产和同性恋；一个人所受教育越少，他或她就越可能会反对它们。

社会学中最常用于测量相关关系的方法是“皮尔逊相关”(Pearson's r)，有时它被称为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这是在-1到+1之间变化的一个数字，相关系数 r 为+1时表示完全正相关，相反， r 为-1时表示完全负相关。 r 为0时表示两个变量之间没有相关关系。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 r 为-1, 0, +1的情况是极

少见的。

最后，调查者在构建相关关系时，必须寻找中间变量。例如，受教育的年限可能会间接地对减少谋杀率起作用，但不是直接地减少谋杀率，所受教育少可能会妨碍获取知识，这又会妨碍年轻人获得高报酬的二作，因此这又会导致贫困，最后增加了谋杀率。

4

社会研究的阶段

怎样设计研究方案呢？在这一部分，我们概括出了社会研究的六个阶段，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研究的科学程序——设计出的这一套程序确保社会研究得出有效的归纳和理论。对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方案来说，这些阶段并不一定需要严格遵循。但是它们确实为社会学家和别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指导。

我们通过一个实际的社会学研究计划来具体解释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是如何实行的。这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研究项目：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的“青少年社会”（1961）。虽然它是在好些年以前进行的，但其成果在今天看来似乎还与它第一次出版时一样重要。

长期以来，科尔曼一直注意到美国高级中学的社会气候中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教师和父母所教导的“价值体系”看来与学生所认同的价值观正好相反，教师强调学习成绩，但是男生看重体育才能，女生看重是否引人注意。于是科尔曼想了解学校和社区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风气（或者价值体系），中学的社会风气对学生又可能会产生何种影响。

第一阶段仔细地陈述所要研究的问题并且提出假设以供调查研究。科尔曼在拟出正式的调查计划之前，他查阅了以前的研究，以了解他的调查将怎样扩充已有的知识。这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接着，提出了将要加以验证的具体假设。这包括详细地定义所要研究的问题，并对研究变量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方式作出陈述。例如，有一个假设是，社区中的某些社会特征将会体现在社区中学的价值观中。因此，体育运动对小镇上的高中最为重要，而学习成绩对社区学校的学生更为重要。另一个假设认为，学校风气中青少年具有反对学习成绩的倾向，是因为成绩好的学生可能资质平庸，而那些智力最好的学生在非学习方面的活动中表现突出，这为学生们所喜爱，但不为老师所重视。

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必须根据可以测量的具体变量来得到操作性定义，也即对诸如“学生价值观”一类的一般概念加以定义。科尔曼将学生价值观化解为两个可以操作和测量的变量，这就是声望（哪类学生的声望最高）和学生态度（一个学生怎样才会最容易地被同学所记住）。

第二阶段：进行研究设计。研究设计指对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评价的计划，这可以使我们证实或证伪最初的假设。研究设计必须明确说明，对于建立一种解释而不是建立另一种解释来说，哪一种是有用的。

社会学家通常使用四种基本的研究设计：调查研究是运用问卷和访谈来从相对较大的人群中收集信息。“试验”是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精确的评估，它通常是在具备严格控制条件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中进行。比较而言，“观察”却是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研究对象处在日常生活的情景中。最后，“第二手分析”是利用别的研究者以前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这四种研究设计在下一部分还要更加详细地讨论。

科尔曼选用了调查研究——这是社会学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方法。问卷调查在伊利诺伊州北部彼此邻近的十所中学中进行，他把调查表发给这些学校的学生、教师和家长来收集资料。针对不同的社区特征，他选取了位于大城市中心、郊区和小型农村社区中的不同学校。

第三阶段：按照研究设计收集资料。科尔曼和他的同事将问卷分发给十所中学中总计8 900名学生。要求学生们回答有关他们自己和学校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还与新生和高年级学生进行了非正式访谈，这为问卷数据提供了一些生动的例子。调查问卷也分发给小样本量的教师和家长。

第四阶段：依据假设分析资料。在这一阶段研究者根据所要检验的假设来整理分类和组织资料。在小规模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可以手工处理这些资料。但是在像科尔曼所做的这种大规模研究中，手工处理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变量要同时进行检测（多变量分析）。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们必须在计算机上处理资料。

科尔曼检验在第一阶段社区特征和学校风气的假设时发现，他不得不拒绝这一假设。学校中对成功的定义在不同社区类型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没有一所高级中学的学生认为学习成绩是最重要的成功标志。事实上，他发现所有学校都存在一种与学习成绩相反的社会风气，学生价值观看来与老师的价值观针锋相对，并且学生价值观占了上风。这种情况的表现之一就是“在这些青少年社会中，那些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和那些开始用这种方式看待自己的人，其实并不是智商最高的人，而只是那些愿意以一种为学生所相对瞧不起的方式刻苦努力的人”（科尔曼，1961）。

第五阶段：解释调查结果并且得出结论。最后，研究者必须从特定的调查结果中进行归纳，必须从零散的事实材料中找出总结性规律。科尔曼的一般性结论是“在我们的社会之中有许多青少年群体，他们以自己的兴趣和态度对待事物，而与成人的责任感相去甚远”。“我们今天的青少年与成年人社会的隔膜，很可能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深。”

科学研究的精确性和意义总是用效度和信度来进行评估的。效度（validity）指的是研究工具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测量到了所要测量的对象。例如，“声望”和“学生态度”——这些是科尔曼用于测量“学生价值观”的两个变量——事实上它们能真正准确地测量价值观吗？它们所测量的是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呢？信度（Reliability）指的是研究工具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前后一致的精确结果。如果对学生价值观的测量是可靠的，那么，当别的研究者重复进行这一研究，其结论应该是相同的。

以另一个例子智商测验（IQ）来说，它们似乎是可靠的，但是它们有

效地测出了人天生具有的智力吗？这仍然是一个可以继续探索的问题。另一个例子是浴室体重刻度表，它会始终如一地读出你减轻了5磅的读数，虽然该读数是无效的，但它仍然提供了一个有关你的体重一天天改变的信度指标。

第六阶段：发表你的调查结果。公开出版之所以重要，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它允许别的社会学家对你所作研究的质量进行检测和评估。计划和完成一个广泛的研究项目，如科尔曼的“青少年社会”，花费了社会科学家好些年的时间，而纷繁大量的研究容易产生盲点，它使你在对关键变量操作化时、在建构研究设计时、在收集和分析数据时或在解释发现产生理论时，难以发现其中的错误。通过发表详细的研究叙述，学者们总是允许甚至鼓励社会学界同仁指出研究工作中自己未能发现的问题和疑点。

第二，假如某一研究公开出版之后，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理论上被同行接受，它就成了未来研究计划的基础。科尔曼强调指出他的研究至多只应视为一种探索性研究，在得到肯定、有效而可信的结论之前，还需要做深入的调查。从该研究所得到的归纳性结论能运用于其他州、其他国家的其他类型的学校吗？科尔曼的调查结论是在60年代得到的，它们也适用于90年代的学生吗？这些都是在科尔曼的原始研究报告出版之后，别的研究者在它的鼓舞下对同一问题进一步调查研究所提出的质疑。

最后，社会学家公开出版他们所作的研究还有第三个非常不同的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人的原因，那就是：某社会学家所公开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质量是确立他或她的学术荣誉的最重要标准。社会学与在别的所有学科一样，“要么发表东西，要么就销声匿迹”这决不只是一句口号，它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

研究方法

在最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学家使用两种研究方法：定量和定性。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用于研究可以用数量来测量的变量——例如收入、年龄和教育水平。因为定量测量在所有科学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只要有可能，大多数社会学家也设法使用这些方法。但是在人类事务中有许多情况不能用数量来测量，至少用数量表示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有些社会学家觉得定量方法可能还会损害和歪曲所研究的社会现实。

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运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社会现实，而不是进行数量的测量（邓金，1978；沙茨曼和斯特劳斯，1973；洛夫兰，1971）。研究者使用这种方法研究社会互动，它是定性法研究中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它从所研究的人本身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世界，而不是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研究。也许最普遍的定性观察技术是参与观察，我们将把它放在后面的部分讨论。

总之，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学使用了更广泛的研究方法。许多社会学研究既有定性成分又有定量成分。一般说来，对某一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时使用定性方法，紧接而来的是就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运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

1

调查研究

在社会学中使用最普遍的定量研究方法是调查（survey），它是对大量人群系统地询问他们的意见、态度和行为，以图发现人们是怎样思考、感觉和行动的。

也许，解释调查研究的最佳办法是对一个典型调查所要遵循的各阶段加以讨论。同所有的社会研究一样，调查研究开始于对所研究问题的严格陈述，然后研究者必须识别所要调查的人口，选择样本，设计研究工具，运用研究工具，最后分析资料。

识别调查总体

一旦研究问题确定之后，调查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识别调查总体，即所要研究的全体（调查总体有时也称做“全体”。调查总体可能是居住在利比亚的所有男性公民，在密尔沃基的所有上班的女性，或者是大学社区中所有低年级学生。调查总体总是由具有研究者所要考察的特征的全体人组成）。第一步是极为关键性的，因为假如调查总体没能准确地指明，调查结果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调查目的是为了预测选举结果，那么尽可能地选择在竞选中将会实际投票的人所组成的调查总体是极为重要的。

选取样本

因为访谈全部的调查总体总会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经费，所以调查研究的第二步是选取合适的样本。样本（sample）是经过选择以代表所要研究的调查总体的有限数量的个案。

选择样本有一套严格的程序。选取样本的程度越完善，样本就越接近调查总体，运用样本所进行的归纳和预测就会更准确。我们来看以下例子：希尔·海特（Hite）的著作《妇女与爱情：前进中的文化革命》（1987）认为较高比例的美国妇女不满意她们自己的婚姻。为了给这本书收集数据，希尔·海特分发了100 000份问卷。大多数问卷都分发给妇女组织的成员，而且仅仅回收了4 500份答卷，回收率为4.5%。

没有人会认为海特抽取的样本代表了她们有兴趣研究的调查总体——80年代的美国妇女——一部分是因为问卷的回收率低，因为妇女组织中的妇女对婚姻的态度很可能与一般意义上的典型的美国妇女有很大不同。抽取的样本无法代表所要研究的调查总体，这种误差就是抽样误差。

在抽取样本的多种方法中，最简单的是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运用这种方法，被抽取的样本保证了调查总体中的每一个体都有同等被选中的机会。人们可以用从帽中抽取名字的办法挑出随机样本，但在大规模调查中，这是行不通的。于是研究者们就经常使用随机数——由计算机或随机表所产生的随机数字——来决定调查总体中的哪些个体纳入样本之中。

其他抽样程序在调查研究中更为普遍：一种是系统抽样（systematic sampling），运用这种方法必须遵循某一特定方案，例如，在电话号码簿中或者在出勤表中每隔 10 个号码抽取 1 个人。另一种方法是分层随机抽样（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它首先将调查总体细分为群体或阶层——例如将大学分成系，将国家分成州，将工人分为车间——然后在每一层中随机抽样。

具有代表性的小样本会比不具代表性的大样本更优越。换句话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样本的大小，而是样本能较好地反映出所要研究的调查总体的特征。例如，劳动统计局通过考察美国 56 个城市中商品和服务的“菜篮子”来监控日用品价格。“菜篮子”这一精心选择的样本代表了整个美国的消费情况，由此得到的消费价格指数证明是对不断变化中的食品住房、服装、运输、健康和娱乐费用的精确测量。

设计研究工具

样本一旦选定，调查研究的第三个步骤就是设计研究工具——问卷调查表、访谈或者测试。某一调查可以运用多种工具，但是无论运用何种工具，所问问题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它们是否措词得当使得每一个回答问题的人都能准确地理解呢？例如，假如一定数量的美国人说他们更赞同环境规程，能保证他们每个人想的环境规程是相同的吗？很可能不会。所以为了避免混淆，所设计的问题必须对环境规程的确切含义清楚地表达出来。

一般说来，调查的问题越具体，被访者对某问题作相同理解的可能性就更大，所得到的回答就会更准确。封闭式问题（closed response question），它为被访者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答案（例如多项选择题），它在社会学研究中很可能是最具体、使用最广泛的问题；开放式问题（open response question），它不包含回答选项，允许回答者自由回答，这种方式不常使用。

在调查中决定使用哪种类型的问题，社会学家必须考虑到调查目的、样本的抽取方法、调查样本的大小和所探求的信息特征。例如，在当地大学校园中随机抽取 500 个学生，调查他们对个人前途和国家的未来所持的乐观主义态度，设计调查问卷时最好将问题设计成多项选择的封闭式问题，这种格式有助于研究者控制回答者对问题的理解并且易于将他们的回答分门别类。在另一种情况下，要研究人们对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在本地学校上学的反应时，问卷就最好设计成开放式问题，它允许人们自由地表达意见。这种研究设计既利于研究者获得调查对象的思维方法，也将他们的反应进行了记录（康弗利和普雷斯特，1986）。

探索封闭式问题答案的方法是用开放式问题来提问。例如，1983 年在底特律地区所作的有关福利的态度研究时，相当多数的回答者都同意“政府管了太多应该由个人或者私人机构去做的事情”。可是当用以下问题对同一回答者提问时，“你认为哪些事情应由个人或私人机构去完成？”超过 25% 的人无法回答，甚至举不出一个例子（康弗利和普雷斯特，1986）。

设计问题时还应考虑到揭示研究主题本身的复杂性。有一项调查问被访者是否赞成禁止私人拥有枪支，大多数人答“不”。但是，当问到他们是否

赞成规定人们在购买枪支前，必须获得警察局许可的法律时，又有同样多数人表示了支持。这种提问揭露了同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既让被访者答所欲言，也使调查者更不可能把易引起歧义的片面回答当作公众意见。

而且，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偏见，问题应该尽可能中性地叙述，在一项调查中问人们是否应该修改宪法来“反对流产”，大多数人回答“不”。可是当这一问题重新表达成“是否应该修改宪法来‘保护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时”（语言变得更加支持婴儿的前生命阶段），大约有 20% 的回答者改变了主意做出了“是”的回答（布劳沃，1988）。

访谈员也偶尔将个人偏见带入调查之中。例如，他们的言词评论可能暗示了被访者用某一种方式去回答问题。因此访谈应该是适合于访谈工作的人，他们应在采访技巧方面接受严格训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态度调查和公众舆论方面的民意调查是通过面对面的访谈进行的。进行这些访谈既有结构性的又有非结构性的。结构性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主要由一附有答案表的一系列封闭式问题组成。所问问题和所得答案是用同样的方式、用同样的先后次序叙述出来的，因此所得结果较容易整理和归纳。

在其他类型的研究中，当需要更多有关态度和行为的信息时，用非结构性访谈（unstructured interview）有许多优点。在非结构性访谈中，顺着访谈员的引导，能得到被访者个人的观点。这样访问者可以了解回答者是否真正理解了所问的问题。这种访谈的缺点是所得到的答案很难进行分析和比较。所以很多访问都是半结构性的——这就是说，它们结合了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的某些成分。

研究实施

调查研究的第四步是研究实施，为了得到最精确的结果，全部样本都必须调查到，尤其是样本很小时。假如人们拒绝填答或者因为别的原因问卷无效时，样本不再与计划样本具有同样的代表性，所得资料将很可能不太精确。通常，当问卷表通过邮局投放时，很难回收，而且回答者可能仅仅填答了那些他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通常都会使调查结果产生偏见。

分析资料

调查研究的最后一步是列表分析资料和解释资料。除了小规模的投资以外，这一步几乎都要使用计算机来处理数据。

调查法的局限性

在获得有关大量人口的准确信息方面，没有任何一种技术会比调查法更管用。当然，调查法也有它的局限性。被访者在填答有关他们自己的个人信息方面，一般都比较准确——诸如年龄、职业和教育——尽管他们有时也会出错。可是有关他们态度的回答真实性成分就可能会更少，或者说在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差异。例如，有种族偏见的人可能积极地推行种族歧视。但是，因为知道别人不赞成他们这么做，他们通常会不承认自己有种族歧视。或者有人可能会诚实地向访谈员说出他们赞成某些事物——例如，改善学校条件，但是在投票那天他们很可能又会对改善学校条件投反对

票，因为投票时他们认为减税似乎更加重要。一项成功的调查有可能揭示出这些隐秘的态度，展露其自相矛盾的地方。社会学家必须清楚在访问中所表达的态度并不是反映潜在的价值观，行为并不总是与态度相一致。

2

试验

试验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用于研究因果关系的经典的科学方法。典型地说，试验是为了检测有关两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假设。其一是自变量，在实验中引入它是为了说明它对另一个变量（因变量）的影响。

理想中的控制试验是通过控制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自变量的效应，将某一自变量对因变量所产生的特定影响分离出来。在多数形式的控制试验中，被试者被随机地分成相同两组，各个方面都相同，除了其中一组中引入了自变量以外。引入了自变量的一组叫做试验组，另一组叫做控制组。然后将这两组进行比较，看它们与因变量的关系有何不同。通过比较，基于两个变量关系之上的假设就可以得到证实或者被拒绝。

例如，有一项研究，试验组是学校儿童，他们用计算机学习阅读；控制组由类似的学生组成，他们用标准的课本阅读。在试验开始时两个组都进行了阅读测试。这种试验持续了一个学年的时间。在试验快要结束时，重新测试两组学生，看试验组是否比控制组成绩更好。假如的确如此的话，在阅读分数（因变量）方面的差别将归功于实验课程（自变量）的影响，当然，用计算机阅读的试验组之所以得分更多也许还有别的原因，由于选入试验组也许他们学习更有动力，也许试验组中所设计的新方式鼓励了他们的父母在家里更多地辅导自己的孩子。

并非所有的试验都运用传统的试验组和控制组。例如，为了研究媒体宣传暴力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者们挑选了两组人，他们在社会阶级和个性方面完全不同（这已通过特别的人格问卷进行了测量）。一组主要由来自于较富裕的白人家庭组成，他们是自愿参加的大学生，另一组被支付劳务费，由居住在城市中心种族混居区域中的人组成，其年龄与前组被试相仿。在这一试验中自变量是观察者从24部商业片中挑选的有关暴力描写的片断：事故伤亡、袭击、财产破坏、谋杀和强奸。因变量是被试者对这些暴力描写的心理反应（通过皮肤电导测量）。

研究表明暴力描写对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带的被试比对大学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关于强奸的描述，它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就更小。为什么出现这种结果呢？研究者认为，在城市中心区域居住的人之所以对电影中的暴力描写有更强烈的反应，是因为这反映了他们的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弗罗斯特和斯托弗，1987）。

许多社会科学试验都是在试验室中进行的，在那里几乎所有环境都能得到控制。例如，在一个有趣的试验室中，两组成员，每组均由15个男性和15个女性组成，都听录音带上播放的笑话。在控制组所听的录音带中，不播放笑话之后的笑声。在听完每一个笑话之后，研究人员再对被试者“欢乐的表情”，例如微笑和大笑进行测量，他们发现试验组中的被试与控制组相

比,其“欢乐表情”更多些——这也就是说,录音带中播放的笑声似乎能引发被试者的笑声。而且在以后的测试中,试验组成员比控制组成员更能记住他们听过的笑话(查普曼,1973)。

类似的实验室试验在心理学中使用得尤为经常。而在社会学中,试验地点一般从实验室中移到了实地——学校、医院和街道。因为社会学家要控制试验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利用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s)——这就是说,试验在真实的环境中进行,研究人员不设定控制组。

在加拿大的三个集镇中所进行的为期两年多的儿童攻击性研究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一个极好例子(杰伊、金博尔和扎布雷克,1986)。这三个社区中,有一个社区被研究者称之为“多视之城”,这里的居民既能收到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节目又能收到三个美国视听网络的节目。第二个城镇叫“单视之城”,这里的居民仅仅能收到加拿大广播电台的节目,第三个城镇叫做“无电视之城”,他们在研究开始时不能看到任何电视节目(但是一年以后就能收到电视节目了)。两年后研究者观察到,“多视之城”的儿童(试验组)的攻击性行为比其他两个镇(控制组)大大增加。这一研究强烈表明观看电视能刺激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别的自然试验还调查研究了这样一些主题,例如在规模较大的大学和规模较小的大学中学生的学业成功率,在双亲家庭和单亲家庭中小孩的抚育等。

试验法的局限

实验室试验与自然试验或实地实验相比,它可以更好地控制变量。不过实验室是一个人工环境,这又有可能使试验结果被扭曲。虽然在自然试验中调查者更难控制自变量和试验组被试的构成,但它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社会行为的动态过程。

3

观察

为了进行系统观察(systematic observation),社会学家要寻找能研究社会互动的有保证的观察场所。观察者在观察时虽然不对任何变量进行控制(除非观察与有严格控制的试验一起进行),但是制订严格的观察程序并将观察结果记录下来,这样任何资源研究者都可以重复这些程序。系统观察既可以在实验室进行,也可以在实地进行。

实验室观察

许多研究计划都是在实验室中对小群体进行观察的。例如,研究者通过单向窗口来研究儿童群体,或者召集一小群人来讨论某一具体问题。讨论时,某一不露面的社会学家录下了某种行为是如何发生的——提出意见和接受意见,同意和反对,开玩笑,批评等行为的发生率(贝尔斯,1951),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试验是在人工环境中进行的,但是此类研究却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

实地观察

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在家庭中、操场上、街道上或者办公室中进行观察。有时他们观察一些正式群体——委员会、医疗组或者职业协会中的行为。有

时他们也观察某一特定的场所的使用——沙箱、街角，甚至是一个配有电视机的起居室。例如，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社会学家观察了街头老流浪汉后发现，人们一般视贫民区的流浪汉为完全的孤独者，而这是不准确的。虽然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家庭，但是与其他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有很多的互动。虽然这种互动关系不能视作是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但是在这种变动不居的流浪生活中他们偶然相遇，一个人帮助了另一个人，并期待很快就能获得回报（科恩和索科洛夫斯基，1989）。

在另一个实地研究中，两位英国作者（布罗德斯特和塞奇里特，1975）特意选择了几个极爱看电视的劳工阶层家庭，观察他们怎样看电视。他们发现电视机被打开的时间和人们实际观看电视的时间之间只存在一种弱关系，家庭成员在家中总是走进电视机房，在电视机前坐下看一小会电视，然后又走出去吃饭，或者做家务。有时电视机可以连续打开几个小时，好像它只是房间中的一个摆设。

非参与观察和参与观察

在非参与观察（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中研究者不参与到他所研究的社会活动和社会情景之中所进行的观察。相反，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却要求研究者融入他所研究的社会情景之中，研究者实际上变成了他所设法研究的群体中的一员，并试图用群体成员的眼光来理解世界。这一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之中，而且因其不断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完善了。有时参与观察者也使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虽然在参与观察中这些研究工具的运用并不要求像在调查研究中那样正式。

在公开性的参与观察中，研究者参与了被试的社会生活，被试者明确地意识到了研究者的社会科学家的身份。在隐蔽性的参与观察之中，研究者在不暴露自己的研究身份和研究意图的情况下，设法参与到他所研究的群体之中，并成为群体生活的一员。隐蔽性参与观察向研究者提出了严肃的道德问题，为了研究他们，研究者是否有权欺骗被研究者，并且侵犯别人的隐私呢？

大多数参与观察都采用案例研究的形式。个案研究（case study）是对单个事件、人物或社会群体的详细记载。个案研究对社会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大规模调查所运用的假设及分析问题的洞察力，大都主要来自于先前所做的个案研究。

一项经典的个案研究就是艾略特·黎埃波（Elliot Liebow）（1967）的《泰莱的街角》（Tally's Corner）。黎埃波所研究的美国黑人知道他是一名观察家，他们允许他分享其在华盛顿 DC 街角的逗留生活。黎埃波和他们聊天、喝酒、赌博、参观他们的卧室，在外卖商店附近逗留。黎埃波决定集中研究他们的人际关系。他证明了在破碎的世界里，这儿的人际关系是怎样反映他们的社会生活的。他们很快就会成为朋友，并且关系十分密切，然而朋友之间常常不知道对方姓什么。朋友之间十分忠诚，但是忠诚消失得也快。这些人也想生儿育女，但是在他们中间，那些离开了家庭的父亲比那些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人对待孩子似乎更温柔。黎埃波发现这些人不能在“合法”

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他们在世界之外过着阴暗的生活。

另一项有关参与观察的著名例子是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son）所作的所谓“晾牛舌头”的研究。汤普森，是一名社会学家，他在食品包装厂的屠宰部申请了暑期工作，这里活牛和死牛散发出臭气熏天的味道。在汤普森的车间里，人们的任务就是对牛舌头进行加工处理并将它们晾起来晒干。这种工作单调枯燥，无人情味，而且总是面临着身体受伤害的危险。尽管工人在每个班都要晾干、烤熟和袋装好大约1 500个牛舌头，但是却得不到多少报酬，惟一的好处就是一个月发下的那点死工资。

汤普森对工友们是怎样适应这种枯燥环境进行了仔细观察，并且他获得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他发现工友们有好几种方式来从心理上摆脱工作中的枯燥，他们漫无边际地遐想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业余爱好。大多数工友谈起他们设法想买的奢侈品来总是没完没了：小汽车、大篷车和摩托车。这是他们工作中的惟一乐趣（汤普森，1983）。

观察的局限

参与观察法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参与观察通过参与到某一环境之中直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这有助于社会学家身临其境地理解被试的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互动方式。但是正因为如此参与观察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可能最大的困难就在于社会学家融入被试的群体活动之中后，他就很难保持研究的客观性。



在商业和工业中运用社会调查技术

十分明显，调查技术在社会科学中是极其重要而且又必不可少的。这些技术对于政府机构评估公共项目也是有用的。可是人们还不太明白的是，同样是这些技术在商业和工业部门中却也是极其重要的，熟悉了这些技术的人们会发现，他们极需要这些技术。

怎样在商业和工业之中使用社会科学调查技术呢？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市场调查。例如，设想某电气公司要将一种电话留言机投入市场。企业从以前的调查中获得，最有可能购买这种电话留言装置的是那些由单身男人或单身女人组成的家庭，或者是那些夫妻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基于人口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类型的家庭在农村地区可能最集中。

为了提炼这一市场信息，公司可能还要使用别的社会科学技术。用于决定选举模式和有关种族定额^①舆论的调查程序，同样有助于决定哪种家庭有可能购买这种留言机。这些技术包括了电话访谈，在购物中心或商店中采访，以及邮寄调查问卷。

社会科学调查技术也可以用于检验广告的社会效果。例如，假如你正在生产一种新型饮料，并且开始运用广告来投入市场，你就可以使用“重点群体研究”（focus

^① 种族定额（racial quotas），指为了弥补从前种族歧视所带来的后果，政府制定法律或政策，为少数民族成员，尤其是黑人群体，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指定某些企业或机构给他们预留一定比例的机会或位置。这一做法引起了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白人的反对。因而政府或新闻媒体常常进行民意调查，了解人们对这种做法的态度，这就是种族定额舆论。参见本书第十一章。——译者注

group study)来看你的广告效应怎么样(史密斯,1981),这种技术将访谈与实验室观察结合起来。一个训练有素的调查分析家与一组消费者进行广泛而又深刻的讨论,而委托人——广告商或者饮料企业的代表——却通过单向镜在另一房间里聆听和观察他们的讨论,讨论被录制下来,消费者被告知他们正处于观察之中。重点群体由一个中间人引导着,将他们的讨论集中在预先安排的话题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讨论话题可能是软饮料在消费者食物中的重要性,消费者最喜欢的饮料是什么,消费者对饮料新产品的印象如何等。

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技术也可用于帮助商业部门作出重要的管理决策,包括提高工人工效和劳动生产率。例如,公司可能想知道是否办公室空间设计的变化会使他的员工们更具满意感,更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按常规设计的老办公室(每一办公室都用墙与另一办公室隔开)搬到一种开放性设计的新办公室(没有墙壁将各办公室分开),一家公司请一组社会学家来研究这种变化的效果。研究是“准试验”性的,因为它只有一个试验组,没有控制组。试验组成员是从老办公室搬到新办公室的人,每人分发给一份问卷,它是用于测量在办公室改变之前和改变之后员工的满意度和劳动效率。结果显示,他们在新开放性办公室中办公比在老办公室中办公满意度更小(奥尔德姆和布拉斯,1979)。

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每天都进行着类似的调查。今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调查将变为常规性的活动,正如我们习惯于在选举年进行民意调查一样。社会学家的这些技术正在成为我们测量生活中的各方面的工具。

4

二手分析

社会学家不必总是出去收集新资料。以前别人所作的研究在经过重新提炼、整理和分析之后,又变成了回答新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这种对以前所收集资料的重新使用,我们称之为二手分析。

在日记、信件、自传和其他私人文献中,在单位案卷、历史文献、新闻报道、政府档案和以前社科研究的数据银行(data bank)中,都能找到大量的研究资料。在美国,人口普查是研究资料的最主要来源。定期进行的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调查后都有专门研究)中包含了年龄、性别、种族、婚姻状态、收入、家庭构成和其他别的变量。此外,还有一些生命统计资料的公共记录,例如每个人的出生日期、结婚日期、子女数量和死亡日期等,这些都可用于研究的目的。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数据还可以保证不侵犯别人的隐私。在德国,虽然官方声称,人口普查保全了个人的隐私,但是一些研究表明,人们还是能从人口普查数据中找出某些个人的隐私特征(格卢克曼,1988)。

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是在二手分析中经常运用的研究程式,它要求检阅所载文件或其他信息(如信函、连环漫画或电视节目插曲)的内容,以及对它进行系统的数码编排。例如,林达·穆妮(Linda Mooney)和莎娜·布拉本特(Sarah Brabant)饶有兴趣地研究了贺卡上表达爱情的频率和方式。他们在路易斯

安那州的某一城市的贺卡商店中选取了一些生日卡作为样本，并根据每张卡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编码。这种编码方式分为一般特征，例如价格、大小和总字数；封面特征，如艺术品的种类；语言风格，如严肃的、有趣的和中性的；贺卡所表达的感情，如爱、快乐或欣赏；发卡者和收卡者的身份，如父母、姐妹或者情人。

研究中最有趣的发现是：提到爱的贺卡（仅占全部贺卡的四分之一）一般都适用于亲属（特别是女性亲属），寄卡者和收卡者都是亲属关系。这类贺卡较别的贺卡价格更昂贵，装饰更好，语言更严肃。研究者认为，这些贺卡特征支持了男人缺乏情感的刻板印象（穆妮和布拉本特，1988）。

内容分析的另一个例子是研究宗教电视节目所讨论的主题（埃布尔曼和诺伊恩多夫，1985）。在27个著名的宗教节目中每个节目都抽出三个片断，然后将他们分类为社会性论题、政治性论题和宗教性论题，并记下这些论题在节目中出现的频率和叙述方式。研究结果发现，社会话题中讨论最多的是死亡；政治话题中讨论最多的是共产主义；宗教话题中讨论最多的是上帝。

5

研究策略

上面我们已经探讨了四种基本的研究方法——调查研究、试验、观察和二手分析，社会学家在研究某一课题时可能会在几种研究策略中选择一种或几种。这些研究策略主要有比较分析、重复、物质痕迹测量和复合研究法。

比较分析

当要分析大量资料时经常要使用比较分析。虽然大多数社会学研究都多少包含了一些比较，但是比较分析一般指的是包括了几个社会体系的对比——例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比或者国家内部几个主要部分之间的对比——或者同一社会体系在不同时点的对比（沃里克和奥谢尔森，1973）。

跨国研究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比较性研究。这方面一个较好的例子是社会学家对于民族性和心理现代性的相关关系所作的研究（英格尔斯，1978）。英格尔斯（Inkeles）认为构成心理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有：对新生事物的开放性态度，抵制传统权威，对新闻和社区事务感兴趣，雄心勃勃和信仰科学。他在六个国家中获得了在教育和职业方面大致相当的年轻人样本。接着，他测量了心理现代性在这些样本中所表现出来的程度。引入这些特征之后他发现，心理现代性的表现具有广泛的国籍差异：阿根廷和以色列排在第一位，尼日利亚、智利和印度排第二，孟加拉国排最后。

实际上，将同一社会在不同时点进行比较就是研究社会变化。社会学家通过纵向研究和横剖研究来研究社会变迁。纵向研究在一段时期内追踪同一群人进行研究。例如，某研究者考察了在1916年和1925年之间出生的男人的社会生活（埃尔德，1974）。在大萧条时期这些人都只有十几岁，埃尔德（Elder）特别感兴趣的研究是，数年经济困难对他们的成年后的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他发现穷人在长大成年以后，更以孩子为中心，他们辛勤劳动是为了给小孩创造一个舒适安全和富裕的环境——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在年轻时

错过了的东西。

因为进行纵向研究的花费很大，所以社会学家经常通过横剖研究来研究社会变迁，它是将某一时点上的年龄、教育、经济情况、种族背景不同的人的回答进行比较。有这样一项研究，它比较了在广告中谈及性时两代人对不同的反应方式（维斯和麦伦斯基，1974）。父母亲似乎比他们上大学的儿子更同意以下观点：“广告商过多地使用了性诱惑”。虽然我们无法假设他们的儿子老了以后也会持同样的看法，但是研究告诉我们人们的态度确实随时间而改变。

重复策略

物理学家普遍强调重复试验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为了验证其正确性就有必要对某一研究或试验重复进行试验。在物理学中进行重复试验往上是较容易完成的。只要在实验室中创造了同等的条件，引入变量，得出结果，这就可以进行比较了。但是因为在实验室中所完成的社会学研究相对较少，所以社会学家常采用新的方式来重复以前的研究，这总是较为困难而且要花相当的时间。

假设我们对最近所做的研究进行资料分析后，我们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与那些完整的家庭相比，青少年犯罪总是更频繁地出现在破裂的家庭中。在我们开始研究之前，我们做出了关于这一过程的假设，一旦我们收集到了实际资料，我们就使用某种统计方法来核实影响调查结果的各种因素，孩子们在破裂家庭中生活的时间长度、家庭的地理位置、社会经济状况和是否有前科等诸如此类的因素。但是运用不同样本重复研究时，我们的调查结果能成立吗？我们必须意识到，很有可能我们的研究是建立在非正态的样本上。因此我们必须用新样本重复这一研究之后才能发现第二次的研究结果是否支持有关家庭破裂与青少年犯罪之关系的初始假设（表面上已被论证）。重复能让我们找出原来研究中所出现的错误，也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理解我们以前结果能站得住脚或站不住脚的条件。

虽然有些研究者自己重复了自己的研究，但是由别的研究者去重复某一研究的情况往往更普遍，它往往有助于消除研究者的偏见，在研究中引入更强的客观性成分。从新知识、新技术、新数据分析方法的观点来看，所有研究者都必须承认，他们的研究结果将来很有可能会被别人修正。事实上，重复研究结果与初始研究完全矛盾的情形是常常会有有的。

例如，80年代中期的一项研究指出：电视上播放有关自杀的新故事片越多，关于自杀率的增长曲线就会越陡（菲利普斯和卡斯滕森，1987；斯托克，1987）。但是虚构的自杀故事在电视中播出之后，现实中的自杀率会增长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验证原来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对纽约市的青少年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在电视播完虚构的自杀故事之后这一地区的自杀率的确增加了，因而这支持了原来的研究（古尔德和谢弗，1986）。

但是原来的研究者对于纽约样本并不满足。因此他们在电视中播放虚构的自杀故事之前和之后，又考察了加利福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中有关青少年自杀率情况的资料。他们的疑问解除了：在电视中播出虚构的自杀故事之

后,并没有引起自杀者的增多(非利普斯和派特,1987)。

在两个地区之间出现上述研究结果之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者可能会认为,模仿性自杀一般出现在城镇,或者说它局限于东北部地区。为了检验这一假设(将纽约城的样本和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州的样本结合起来),他们又对资料进行了重新分析,没有一个样本能证实原来研究所得出的戏剧性结果。因此通过连续不断的重复研究,对各种相当特殊的可能情况的琢磨,研究者认定“虚构的自杀故事对于自杀率有影响”这一结论的确是不成熟的。

物质痕迹测量

一些社会学家,因为不想参与到自己正在观察的研究对象之中,他们就着重使用物质痕迹测量法(Unobtrusive Measures)。例如,观察社会行为所留下的物理痕迹(韦伯等,1960)。与侦探一样,社会学家研究了博物馆地板的磨损(为了说明观众的偏好),图书馆中哪些书刊磨损得比较严重(为了研究读者的阅读倾向)和弃置的酒瓶(为了研究某一“禁酒”城镇的饮酒情况)。这些测量虽然很少单独使用,但是它们增加了研究资料,并且确保了研究者没有对正在研究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复合研究法

考虑到前面所提到的四种主要研究方法都有局限性,很多社会学家决定将两种或多种方法结合起来,这一策略有时称为三角分析法。由于同时使用不同方法,这就增加了研究者对所作调查研究的正确性的信心。

在社区研究中使用复合方法显得特别重要。运用复合法,社会学家小组在小城镇或者中等城镇收集到广泛的信息,有助于对整个社区的生活方式提供启发性的、深入的理解。参与观察法在社区研究中作用突出,但是调查研究和第二手分析也能增加社区研究所需的信息。

社区研究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Robert and Helen Lynd 1929, 1937)对印第安那州曼西所作的调查,在大萧条的前后几年时间里他们居住在这座中西部地区的城镇。林德夫妇采访了许多曼西市民,系统地查阅了报刊资料,得到了有关这一城市过去的资料,他们俩人也设法融入到了小城镇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发现曼西市民重视工作、自立、信仰基督,并为自己是曼西市民而自豪。

一个社会学家小组在70年代后期重新回到曼西城来了解该城的社会生活。此时它又发生了变化吗?令人惊奇的是虽然该城也有一些外表变化,如新建的购物中心、快餐店和迪斯科等,但是,社会学家发现,过去相同的价值观影响很深,例如,大多数高中生都认为圣经是“现代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指南”,然而曼西城居民在今天对不同意见更具有宽容性,这很可能是因为电视的影响。现在只有少数人认为基督教才是“一种真正的宗教”(卡普洛、巴尔、查德威克和威廉姆森,1982)。

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和伦理学

在社会学研究中使用任何研究方法都会涉及到客观性、偏见和道德性问题。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些话题。

1

客观性和 偏见

当然，社会科学家在研究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客观性问题。社会学家总是被人问：“你也与别人一样，是有感情、有道德、有偏见的高等动物，为了保证你的调查的客观性，你能在调查中超脱出来，不动感情吗？我们怎么能知道你报道的是事实本身，而不是你自己的愿望呢？”虽然社会学中的主观性的东西似乎面临着不同寻常的客观性问题，但这也是每一门科学都面临的问题。

社会学家在解决客观性问题时，一方面是通过学科内容的组织方式，另一方面是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与别的学科一样，社会学的知识来源于很多社会学家的研究，通过别的学者对相似问题的检查和权衡之后，某个社会学家的特殊观点和偏见得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弱化。社会学的调查几乎总是公开报告，包括它所使用的方法和资料来源。其他人还可以试用同样的事实和方法来检验他们所得到的结论。

有争议的研究会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例如，在60年代中期詹姆斯·科尔曼领导研究了美国教育制度和它们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科尔曼等，1966）。这项研究是美国教育办公室（现在是教育部）委托进行的，它希望检验关于美国学校中教学设备的质量差异能大量解释学校学生在学习能力方面的差异这一共识。用另一句话说，好学生总认为是来自好学校。

科尔曼发现在学校设备优劣上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差异并没有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大。他也发现看来这些差异的确影响到了学生的成绩，但是这种影响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总之，科尔曼认为，过去认为联系紧密的东西，现在证明这种联系实际上很弱。

这些结论让大多数的教育家都感到惊奇并争论得十分激烈，因为这些结论意味着改善教育条件（例如图书馆和实验室）相对来说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没有多大影响。正好与教育部所期待的答案相反。因此人们对科尔曼的报告进行了严格检查。尤其是在哈佛大学，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专门研讨班。在这个班上，报告的假设、资料和结论都被人们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直到今天这一报告仍然是争论的焦点，许多人认为调查结果是无说服力的。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关于美国黑人家庭的所谓穆瓦尼昂报告，它是由丹尼尔·帕特里克·穆瓦尼昂（Daniel Patrick Moynihan）完成的，现在他是来自纽约州的美国参议员（穆瓦尼昂，1965），穆瓦尼昂那时是约翰逊总统的助手，这一报告详细研究了当时极为普遍的由妇女当家的美国黑

人家庭。实际上，他认为女权家庭（例如由母亲当家的家庭）在数量上的增长表明了美国黑人家庭结构的瓦解，这是美国黑人贫困的最重要原因。

许多社会学家和美国黑人不相信所谓妇女当家就一定导致贫困。而且，许多人认为他的报告是为约翰逊政府伟大社会计划辩护的政治文件，而不是关于黑人家庭的客观研究。因为这两个原因，这项研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检讨。

在社会研究中与偏见有关的另一问题是研究过程本身对被研究者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社会学家应该记住，社会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人们会对研究过程作出反应——有时我们无法预见这些反应。研究者简单的呈现可能歪曲正在研究的社会情境，这一现象常常称为反应作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早期所进行的著名的霍桑试验（Hawthorne experiment）（罗特列斯伯格，1949）。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位于芝加哥城郊，其管理人员想知道环境因素例如照明是否会影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士气。社会科学家小组开始对一个工人小群体进行试验，把他们与其合作的工人分开。试验人员的工作环境得到控制，被试者被加以细致的观察。令研究者吃惊的是不管工作条件如何改变，这群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总会增加，甚至当环境条件变化（例如在车间突然减弱光线）并不可能产生这种效果时，也是如此。

结论认为，研究者的在场，让试验组的工人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工人们开始相互了解和信任，并产生了强烈信念，认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研究者认为这就是他们增加劳动生产率的原因，而不是工作条件的改变。初始资料的重新分析又对霍桑实验的研究者在理论上提出了挑战，认为人际关系模式的改变应该是研究者所最应该看重的，但这一点在原来研究中却从来也没有测量过（弗兰克和考尔，1978）。然而即使霍桑研究的原始结论必须修改，它还是提出了所有社会科学家都共同面对的问题，即当被试者知道了别人正在研究他们时，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在社会科学中，这一现象被称为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

2

社会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因为社会学家研究的是人类主体，所以他们必定面临着几个重要的伦理问题。问题之一是对研究对象的选择。这个问题在社会实验中最为明显，例如为服刑后的人提供工作，为未就业的青少年提供特殊培训，为少数民族儿童增加教育的项目。社会学家怎么依据社会道德标准来决定谁将进入试验组（他们将得到特殊帮助），谁将选入控制组——这些人根本就不能获得任何帮助呢？是挑选那些会获益最多的人，还是最需要的人？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被试退出试验。一旦你选取了某人参与到特殊的研究项目之中，假如他们看来要打断研究，这时强迫他们退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呢？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们的选择自由的问题。例如，大学生可能会问，假如他们成绩的等级是老师评定的，那么他们是否真的可以自由地拒绝参加某一试验呢？

第三个伦理二难问题是社会学家想要知道隐私但被试者却有权保护隐私权的矛盾。社会学家总是想把行为从“社会壁橱”(social closet)中曝光。可是什么东西赋予了社会学家们去调查别人的过错、冲突、反社会行为和不便告人的社会经历的权利的呢?被试有权对诸如此类的事情保守秘密吗?

面临这样的二难困境的一个代表性事例便是劳德·汉弗莱斯(Laud Humphreys)(1970)对于公共场合同性恋行为的研究,当别的男同性恋者正在发生同性恋行为时,汉弗莱斯在公共休息室中充当着望风者的角色,假如警察来了,他向参与同性恋行为者发出警报。由于记录了同性恋者的汽车牌照,他得到了他们的家庭住址。大约一年以后,他登门拜访,作为一个研究者,他提出了许多被试都感兴趣的问题。结果他发现大多数的人都呼吁强烈反对同性恋,而且似乎都想过上正常人的婚姻生活。虽然汉弗莱斯的调查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是很多人批评他在研究中使用了不道德的方法。他们认为他不应该用欺骗性手段来研究同性恋者的隐私。

社会科学职业协会及资助研究的政府机构就有关隐私问题的研究有着鲜明的立场,那就是,研究者必须保守研究对象的隐私,应该将自己的研究目的告知被研究者,应该立法来保护他们的人格,许多研究的负责人认为,在研究开始之前,应该征得被研究对象的书面同意(假如被研究对象是被监护人,应该征得他们父母的同意)。

关于调查研究之伦理的一些官方声明认为,社会研究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可能的研究对象应该知道调查是干什么的,他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能够从调查中获得哪些利益。

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权衡利弊。如果知识的增长来源于一个可能会产生更大损害的研究,那么这一获得知识的过程还需要进行吗?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仅是进行调查的社会科学家的责任,而且作为支持社会科学的社会成员,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里夫林和廷潘,1975)。

3

道德中立

道德中立是社会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都会遇到的问题。在科学中,道德中立指的是不管它伤害了谁,有益于谁,或者说研究者持何种价值观,都应该探索科学真理。核武器和别的具有广泛杀伤力武器的出现,人们又开始怀疑起道德中立来。

作为一名市民,社会学家可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有较强的政治观点,可以谈论各种公共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在他们的社会科学著作中他们必须坚持科学的精神,避免政治倾向,他们应该是学者,而不是社会活动家(西布利,1971)。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坚持道德中立至少是社会中立和政治中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就会危及本应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的地位。这一观点,有时也称为价值无涉的社会学,它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并且直到60年代还大体上未受到挑战。

可是在最近,许多社会学家开始认识到价值中立的潜在危险(贝克尔,1967)。他们告诉人们,“中立性”研究有助于保护业已存在的社会秩序,这

些研究中的大部分得到既成体制的支持。他们认为假如社会学不能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它实际上等于是在维护现状(古尔德纳,1962)。这些批评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是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社会学家甚至还要倡导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他们还认为社会学家应该使用调查研究来推动社会变迁。

这场争论正在进行之中,许多社会学家拒绝道德中立,赞成更多地卷入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中。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方法论。它是帮助我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体系,在进行调查研究时,社会学家主要使用以感觉器官进行观察的经验方法。这一过程可被别的研究者重复和验证。因此它为获得知识提供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客观手段。

2. 社会科学家用于经验性研究的两个类型是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描述性研究概括性地描述了某一群体、活动或事件的主要特征,它是解释性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解释性研究是为了阐述事物发生的原因。

3. 调查和解释的基石是概念和变量。概念是对许多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和过程的归纳。社会学研究需要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表示事物在时间上的变化或从一个人、群体向另一个人、另一个群体的转变的概念就是变量。主要的社会学变量有年龄、性别、收入和社会阶级。为了进行调查,社会科学家必须将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可以进行测量的变量。这一过程就是“变量操作化”。

假设是关于两个或多个变量相互联系的尝试性陈述。当经验事实表明一个假设是合理的时候,这个假设就可以称做是经验概括。可是,假设永远也不会被完全证实,因为总能找到可以推翻假设的新证据。理论是对可观测到的变量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解性解释。

4. 社会调查一般说来是为了寻求在一个结果与一个或多个原因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我们称原因为自变量,结果就是因变量。为了找到存在于变量之间的联系,研究者运用统计相关进行分析。在统计相关中,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是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相联系的。然而,统计相关无法保证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能反映因果关系的相关就是虚假相关,应用统计控制可以确定是否存在虚假相关。许多统计调查都含有两个或多个变量的多变量分析。

5. 社会研究中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仔细陈述研究问题并形成假设。第二阶段产生研究计划——用于收集、分析和整理资料的计划。第三阶段,就是收集资料,随后是分析资料,检验假设。资料分析和假设验证完成之后,研究者可以得出研究结论,最后一个阶段是公开出版调查结果。调查结果的准确和意义总是用效度和信度来评估。效度即测量工具或研究对要测量的事物所实际测量的程度,信度就是测量工具能否提供一致的准确结果的程度。

6. 用于社会调查的方法有定量法和定性法。定量方法用于能够用数量来测量的变量。例如,收入和年龄;定性方法是设法用准确的言词来描述社会现实,它经常是从参与者而不是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世界。

7. 调查研究是社会学中最经常使用的定量方法,它是系统地询问人们的意见、态度和行为的方法。第一步是识别调查总体,即要研究的全体样本,第二步是抽取样本,样本是能代表总体的有限个案。样本离总体特征越近,调查结果就会更精确。抽取样本有几种常用方法。在随机抽样中,样本抽取时可以保证总体中每一个体均有同等被选机会。在系统抽样中,选取样本有一特定的具体方案。在分层随机抽样中,首先对调查总体分组或分层,然后从各层中抽取随机样本。在第三阶段,设计调查工具——问卷、测试、访谈。在第四阶段对被调查者进行问卷式提问、测试或访谈,最后,列表、分析数据。

8. 找出因果关系的经典作法是控制实验。实验通常用来检验存在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理想的控制试验是通过控制其他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而将某一自变量的特殊影响分离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自变量引入试验组中,而不引入控制组,然后将两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看它们是否对因变量的影响有所不同。社会学家总是在家庭、操场和办公室等实地场合合作自然实验,自然实验虽然缺少实验室控制,但是它更接近于真实生活的社会情境。

9. 观察是社会研究中收集资料的重要方法。在实验室中,不露面的观察者能对小群体的行为进行观察。在实地研究中,他们可能研究人们在某一特定地点如街角的活动。许多研究都使用参与观察,即研究者为了用群体成员的眼光来理解他们的世界,他成了正在研究的群体中的一员。参与观察既可以公开也可以隐蔽进行。参与观察的最常用形式是个案研究,它对事件、人或社会群体进行详细记录。在非参与观察中,研究者观察被研究对象的社会活动情况,但不参与到他所研究的群体之中。

10. 第二手分析是社会研究的另一重要方法,它是对以前所收集资料的重新解释。这类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人口普查。内容分析在第二手分析中使用极频繁,为了找出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它对各种信息交流形式进行考察,并且使用了系统的编码方案。

11. 社会学家经常进行比较分析,这种研究指的是多种社会体系的比较,或者同种社会体系在两个或多个时点的比较。主要的比较分析有跨国研究(两个或多个国家的比较性研究)、纵贯研究(在一段时间内追踪同一被试进行研究)和横剖研究(在某一时点上对不同年龄、教育、经济状况和种族背景的人进行比较)。为了检查研究的精确性,社会科学家认为重复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学家有时为了保证自己不对所研究的行为造成影响,他们运用物质痕迹测量法进行研究。最后,为了增加研究的效度他们经常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这在社区研究中尤为常见。社区研究是为了对整个社区的社会生活提出整体看法的研究方式。

12. 社会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保持客观性。为了最大限度地减

少偏见，社会学调查几乎总是公开报道，以便别的学者对它进行检验。另一基本的问题是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可能会与研究过程本身发生互动。就这一问题而言，著名的就是霍桑效应，被试了解到他们正在被研究，因而改变他们的行为。

13. 在和被研究对象交往时社会学家总是面临道德的困境。现在社会科学协会和政府研究机构一致认为，研究者必须征得研究对象的同意，尊重他们的隐私。最后，社会研究中的道德中立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有人持韦伯的观点，认为研究者应保持道德中立。然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社会科学家应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持有自己的立场。

推荐阅读书目

1. 巴比 (Babbie, Earl), 1989. 《社会学研究实践》(*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5th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一本涵盖理论与实践的极好教科书。
2. 伯格 (Berg, Bruce L.), 1989. 《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用一些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如何收集、分析定性研究数据，最后一章还附有如何撰写学生的研究论文的指导。
3. 胡佛 (Hoover, Kenneth R.), 1992. 《社会科学思维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 5th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对社会科学的力量与局限的一种导论性著作，可读性较强。
4. 嘉夫 (Jaffe, A. J.), 1987. 《被误用的统计学：直说扭曲了的数字》(*Misused Statistics: Straight Talk for Twisted Numbers*. New York: Marcel Dekker.) 该书指出了统计学的误用是如何导致错误的决策的。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 与 个体

今天，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在美国，大部分数学与自然科学类的大学奖学金与学术荣誉都被亚洲来的学生获得。从加州的硅谷到马萨诸塞的伍兹侯（Woods Hole），很多美国一流的研究院、实验室都雇佣了大批亚洲籍科学家和工程师。

为什么？是亚洲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是他们拥有西方人所不知的成功秘诀？还是因为亚洲人更勤奋？

尽管有些流行刊物对以上问题都回答“是”，但作为社会学学生，我们需要解释的是其表象下的真实原因。最近美国做了一项研究，对 500 名成绩优异的东南亚难民的孩子进行了追踪调查（卡普兰、乔伊和惠特莫尔，1992）。这些难民孩子从越南和老挝辗转迁徙至此，其间受尽了痛苦和折磨，也失去了许多上学的好时光，抵达这里时，他们只懂极少的英语。然而，尽管有这么些阻碍，但他们很快就在美国的学校中取得了数学和自然科学类的好成绩，例如，在一所学校，仅占 27% 的亚洲来的学生却包揽了所有数学科目的前十名。从学分等级来看，这些孩子的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中，得“A”和“B”的占大多数，而得“C”的很少（仅有 17%），仅有 4% 的学生得分在“C”以下。

对亚洲学生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功，社会学的解释将其归功于亚洲人的价值观。研究人员发现，亚洲人所取得的成就与其成就取向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内在联系。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各不相同。各时代、各地区都有自己的特

色，这是理所当然的吗？在社会学中，“文化”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而价值观正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文化”，这个我们即将要谈论的概念的一种测试。

什么是文化

一个大学生群体与一群猩猩的区别是什么？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问题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把人类和其自然界的近亲——猩猩区分开的、质的东西是文化。在日常谈话中，文化常用来形容艺术的深奥与精致。例如，认为古典音乐爱好者是“有文化的”，而流行音乐的追随者则是“无文化者”。显然，文化在此处的定义是无法帮助我们吧人类与猩猩区分开的，无论是否爱好艺术，人类都不同于猩猩。

1

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所有群体和社会的人们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抽象和无形的人类创造，如“是”与“非”的定义，沟通的媒介，有关环境的知识和处事的方式。人们也共享物质文化——物质对象的主体，它折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物质文化包括工具、钱、衣服以及艺术品等。

尽管文化共享，但它仍需每一新生代通过社会交往的方式来学习，文化因此而代代相传，不断累积。

从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文化是代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虽然“文化”的概念时常可与“社会”互换，但这两者不应混淆。严格地说，社会指共享文化的人的相互交流，而文化指这种交流的产物。事实上，人类社会与文化不能相互独立存在。文化是人们在交流中创造的，但人类互动的形式又来自于对文化的共享。

尽管人类是惟一的具有文化的动物，但我们并非是惟一的社会性动物。猩猩以稳定的社会群体形式共同生活，并表现出了某种交流往来的现象。比如，它们常对外来者有着充满敌意的反应，在搜寻水果和猎物时会产生一种协作关系。蚂蚁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他们有着极其复杂的劳动分工。每一只蚂蚁从事着一种工作：小蚂蚁在洞穴内劳作，中等个的蚂蚁在洞外觅食，而长触须的蚂蚁则充当卫士。

但是，与所有动物和昆虫的社会相仿，无论是猩猩还是蚂蚁，其行为都不是由共同的价值观、知识或其他鲜明的文化特征塑造的。动物们所依赖的不是文化而是本能——他们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一种复杂的行为模式。动物行为是受遗传因素所控制的，各种单一物种的社会组织形式似乎是由同一地方的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仅仅仰赖于他们的本能，世界上所有的海狸都

能修筑水坝，以极为类似的方式抚育后代；所有的鸟类都筑着同样的巢穴。这些动物都不是被迫教导着做这些事。

对比可知，人类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的行为模式不仅仅依赖于遗传，而且还依赖于人类文化（人类社会是第四章讨论的主题）。与猩猩不同，我们的行为深受我们生长在其中的文化的影响。

再来讨论大学生和猩猩的区别，不太准确地说，猩猩是靠生理来约束，而大学生则靠文化来约束，人类已无任何强烈的本能，但我们也有着与猩猩及其他高等生物一样的生理冲动，如食物、水、睡眠的需求满足的冲动。事实上，许多人类文化是围绕着这些冲动而形成的。

反过来，猩猩也具有某些类似于文化的特点。这些人类的近亲会使用原始的工具，并把制造与使用工具的技能传给他们的后继者，猩猩已懂得用树枝当作棍子在战争中使用，用石头砸开坚果，用麦秆把白蚁从其洞穴中钓出来。也许，猩猩已具有使用语言所需的一些基本技能，但只是缺乏具体说单词的能力（普雷马克，1985）。一些研究人员已成功地教会猩猩看懂和使用美国手语——一种美国聋哑人使用的手语（桑德斯，1985）。一些观察者甚至宣称猩猩们使用的是它们用符号组成的语言（加德纳与加德纳，1975）。但是，也有人批评这种说法，猩猩很少能将两个以上的字串在一起，因此不可能组成完整的句子（特雷斯，1979）。

无论如何，猩猩以某种形态过着群居生活，具有一些符号能力，有一个能模仿、学习行为的身体，会使用工具，这是否就可以认为它们拥有文化呢？多数研究者认为猩猩已具有文化的基础，至少已具有某些与文化相似的地方，但所有这些都与人类的文化相比，其复杂程度还相差很远。为了理解这些差别，我们只需要简单地如此对比一下，我们通过语言所表达的是非常精微妙的、复杂多样的意思，而猩猩只能借助三两个符号表示有限的意义。此外，我们的物质文化和约束我们的行为、组织我们社会的社会规则十分复杂，这些都是猩猩所无法比拟的。举例来说，普通美国学生都在用着非常先进的工具：像计算机、计算器及录放机等，而动物中人类的近邻仍在使用着钓白蚁的麦秆。

2

文化的演进

人类文化的最早标志是在大约三百万年前形成的。尽管因为价值和意义（文化中非物质方面）无法成为化石，但是所有早期社会的物质文化的片断都保存了下来。最早的工具是由卵石打磨成的刀片。

也许早期人类史上最重要的文化适应是向大动物狩猎的转变。许多证据表明，早期人类最直接的祖先，类人猿主要靠植物果实和死去动物身上的肉而生存。在早期人类的居住地附近也发现了许多大型动物的骨头，这暗示着真正的人类已开始猎食大动物，并将其带回居住地。基本上，新的社会模式，包括食物的共享、根据性别的劳动分工、协作和制造工具，都是伴随着狩猎的变化而发展的，狩猎同样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

向狩猎生活方式的转变大约发生在一百万年到三百万年前。今天我们所

熟知的家庭——由一个男人和一个或多个女人所组成的家庭——在那个时代，也许已经形成。人类出现以前的原始人只有当女性有了需求，而男性通过较力竞争赢得了繁殖的机会时，男性和女性才会交媾结合。人类女性在各个年代都或多或少地处于性的被动方，这点与动物界的其他雌性不同，许多人类学家认为这种男女间的较固定关系是与大动物狩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一旦形成男人狩猎而女人采集果实的分工时，狩猎和采集技术对只和少数几个配偶交配、选择配偶来说，就是一种优势。

通过对今天卡拉哈里沙漠桑部落和澳洲土著人狩猎——采集的观察，我们可以了解到早期人类社会组织的大致形态。早期的人类，大概生活在由大约25个有血缘关系的男人及其妻儿老小组成的群体中。领导者是不固定的，由成员轮流担任，引导人们大部分行为的是非正式的规矩，男人们出去狩猎，女人们则在家饲养小动物，采集果实，抚养小孩。

在文化发展之前，人类只能通过上百代才能形成的生理变化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达尔文，1859）中阐述了进化理论和自然选择学说，指出那些最能调整自身以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才有可能得以生存繁衍。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后来称之为适者生存。文化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第一次改造环境以利于自己的生存。同时他们也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变化着的自然条件。实用知识，例如如何制造窝棚，如何找到某种食物等知识，能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当一种猎物灭绝时，捕猎另一种动物的策略又会被思考出来。当气温下降时，衣服就发明了。其他物种灭绝了，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像人类一样适应环境的变化。

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也影响了人类生理的变化。例如，早期人类有一部分人具有相对较大的大脑和灵活的双手，能够制造出更有效的工具，并完成一些较专业的工作，这些人就更容易得到生存和繁殖的机会。一段时间后，拥有较大的大脑和较灵活双手的人在人类人口中越来越普遍。因此，正如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一样，文化的演进也促进了人类生理特征的演化（坎贝尔，1985）。

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里，文化出现了一步步巨大的变化（伦斯基和伦斯基，1987）。大约四万年前，人类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他们开始穿起衣服，建造房屋。人类在从热带到北极的各种气候下生存，他们埋葬死者，用火做饭，参加各种宗教仪式。

大约在公元前一万年前，人类开始生产自己的食物；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种植庄稼逐渐流传开来。农业生产可能引起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人类再也不用过着迁移狩猎的生活了。随着种植庄稼和饲养家禽而出现的是更大的定居社区的建立。随着农产品的增加，经济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一些人生产或交换货物，或成为管理者，而他们的食物则由另外的一些人供给。一些早期的人类定居地成为集镇，尔后形成城市。大约在五千年前，国家这种由几个社区组成的、具有共同的政府的独立政治实体在中东和希腊开始形成（斯塔连诺斯，1983）。国家很快就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主要政治形式。

直到18世纪后期,才出现了另一个巨大变化,其重要性可与农业的产生相提并论,这就是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从那时起,机器技术完全改变了整个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它使世界范围的交流与通讯成为可能,也使我们能生产出大量的工具、节省人力的装置、奢侈品和娱乐设施。它同样也能使我们生产出能摧毁人类自身的武器。尽管这种危险随时存在,但文化已使人类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

文化的构成

1

符 号

文化的存在取决于人类创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符号是指一群人所认可的任何能有意义地表达其自身之外的事物的东西。所有的文字和数字都是符号,此外,紧握的拳头、美国国旗、十字架也都是一符号。和原始祖先不同,现代人类可以和其他人交流十分复杂的信息——从“我爱你”到关于浩瀚宇宙的技术数据——而且,他们能从他人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人类拥有这种能力的关键就是符号的使用。通过符号,我们能够理解现实,能够交换和保存复杂信息。简而言之,我们既能创造文化,又能从文化中学到很多(盖斯菲尔德和米恰诺维茨,1984)。

符号在帮助我们理解诸如“上帝”、“正义”、“爱国主义”等抽象概念时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这类概念往往难以理解,我们总是把它们和我们已理解的事物加以比较。这样,隐藏在我们法律体系之后的理想和情感常常是由一个掌握正义尺度的蒙眼女性来代表的。这种符号履行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功能,即通过把复杂概念与简单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帮助我们最终达到对前者的理解。通过这种方式,符号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并使沟通变得简单。

符号有时和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很相像。例如,鸟可能代表“自由”,因为在受地球引力束缚的人类看来,鸟儿似乎可以到达它们想要去的任何地方。然而,这样使用符号,可能会影响我们对符号意义的理解。当符号未被理解为自身之外的其所象征的事物时,就会产生许多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混淆。符号不仅代表了某种其他事物,而且同时也暗示了对象征事物的态度(戈夫曼,1976)。一些符号承载了如此确定的意义,以至于它们预先就定义好了其所代表事物的社会含义。

举例来说,用白色代表“好”,黑色代表“坏”,这显然会对白人和黑人看待自己和观察对方的方式造成影响。研究人员在一项研究中,用绘图—故事的方法以判断学前儿童的种族歧视倾向。孩子们首先被出示两幅图画,一幅是黑肤色的人,一幅是浅肤色的人。然后,研究者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孩子们被要求作出判断,这个故事是关于哪一个人——黑肤色还是浅肤色的人?孩子们倾向于把浅肤色的人和正面故事联系在一起,而把黑肤色的人

和反面故事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与黑颜色相关的反面含义似乎本身已属于黑人,因此试验的结果已被预先认定了。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某种文化中的符号能通过预料不到的、不为人们所希望的方式来建构这个文化本身。

语言。语言,简而言之,是指人们所使用的口头和书面的言说方式,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符号系统。通过语言,观点、价值观和文化的标准都能找到它们最完整的表达方式。虽然我们也使用许多其他的媒介——如绘画、音乐、雕塑及舞蹈——来表达文化,但只有语言才能最灵活、最准确地传递所有人类所能理解的复杂而精微的含义。

实际上,如果没有语言,大部分人类思想将不复存在(克里斯特尔,1988)。通过语言,孩子们学会了他们的社会是如何理解世界、过去和将来的方式。也主要是通过语言,孩子们知晓了父母、老师和朋友们对他们的期待。因此,语言对社会的建构而言是最重要的。它比任何其他符号体系都更为全面地使我们能建设和传递文化。

虽然语言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起源的。一种理论认为语言始于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如“溅水”声和“吼叫”声。另一种理论认为语言产生于人类由于疼痛或其他剧烈的情感而本能发出的声音。还有一种理论则断言语言最初是伴随着反复的肌肉运动而产生的,如“叹息”声和“号子”声。

然而,一种更为可信的解释认为,语言源于早期类人动物把它们原始的用以联络的叫喊声糅合起来,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意义系统(霍基特和阿舍,1964)。例如,咳嗽声和尖叫声就是一套具有固定含义的符号。从这种叫喊系统到语言的演化使狩猎和其他集体活动更有效率。那些拥有高级语言技巧的部落比那些语言技巧相对低级的部落更有可能生存下来。

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研究表明,人类有可能在前脑发生了生理结构的进化,这使学习语言变得相对更容易一些(乔姆斯基,1975)。这种“语言接收装置”为所有人类语言的共同逻辑的存在奠定了基础。乔姆斯基把这种逻辑基础称为“一般语法”。当然,一般语法不包括某种特定语言的特殊词汇和语法规则。对每一种文化而言,这些特征是各不相同的,但它们隐藏在一般语法中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下面是一个关于这种内在的语言接收装置的例子。研究发现,不同文化中的儿童在掌握各自语言的语法特征之前,基本上都在相同的年龄开始学习语言,在同等程度上掌握各自语言中相同的方面,并往往犯相同的错误(这反映了一般语法的原则)。

现代社会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文化中语言的某些发音在其他文化中是找不到的。例如,法国人在发“thin”这个音时常有困难而经常代之以“sin”这个音(法语中没有“th”这个音)。美式英语的发音和英式英语的发音也常常不同。不同语言在由音节构成词汇,由词汇构成句子的方式上也有区别。举例而言,英语中词序对句子的意义十分重要,但在别的语言,比如德语中,句子中每个词都有一个词尾以表明它和句中其他词汇间的关系,因此词序相对而言就不重要了。

语言的词汇同样反映了言语者的文化和环境。例如，萨摩亚群岛居民以捕鱼为生，因此语言中有着关于捕鱼和航海方面的丰富词汇。同样，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边缘的阿拉伯人则拥有许多沙子方面的词汇。

一些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语言间的区别不仅仅反映了言语者的需要和环境的影响，而且它们还会对言语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影响。这一由萨皮（Edward Sapir）和沃夫（Lee Whorf）所发展的观点被称为萨皮—沃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萨皮和沃夫认为，既然语言和思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持同一种语言的人对世界的看法要比持不同语言的人要一致得多。沃夫指出，英国人把时间分为三种时态：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使用霍皮印第安语的人则没有这些概念（虽然他们也能表达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沃夫认为，这样的结果使讲英语者比讲霍皮语者能更具体地去理解时间。对持英语者而言，时间是可以计量的，而持霍皮语的人却不这么认为。沃夫认为这种区别也许可以解释持英语者在诸如档案保存、年历和历史方面的兴趣。

萨皮—沃夫假设在最极端的含义上可推断出如下结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群体语言习惯基础上无意识地构建而成的。由于我们群体的语言习惯已预设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将会很自然地用这一方式去观察、去听、去体验事物（沃夫，1941）。这样，语言决定了我们对现实世界进行思索的特定方式，因为通过其他途径我们很难把它表达出来。

在构筑文化结构时抽象词汇可能是最重要的。抽象词汇在现代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中数量最多，而在古代文化或前工业社会文化中则相对较少。然而，萨皮—沃夫假设的极端推论可能夸大了语言在决定人类思想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他们近期的论文中，萨皮和沃夫提出了一个比原来的假设较为和缓的推论。依照这个推论，语言预先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但其影响的程度并不如极端推论所设想的那样强。

语言不仅在不同文化间有区别，在同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群体间其语言也有差异。语言中地区和种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美国南部和北部人、意大利移民和犹太移民间语言就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同样，英、美两国基本语言是一致的，但细微差别也很多。某些群体甚至还创造了只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一种严格限定的语言系统——用于特别的目的。如美国卡车司机经常收听的市民波段电台（CB）语言就是这样一种特殊语言。这种CB语言充满了华丽的辞藻和短语，圈外人很难听懂。以下是一些CB语言的例子，狗熊（bears）代表警察，眼球（eyeballs）代表头顶灯，五指折扣（five-finger discount）代表赃物，移动洗面剂（motion lotion）代表汽油，超级可乐（super cola）代表啤酒等（克里斯特尔，1988）。

最后，语言能反映价值观。一项对澳洲英语的研究表明，澳洲英语反映了澳大利亚人幽默、随和和理性的价值观。澳大利亚人喜欢把词汇简化并在词尾加上“ie”或“y”（如用prezzie来代表present，用matey来代表mate），这可以看成是一种表达他们诙谐、爱交朋友和易于相处的性格的方式（威尔兹比卡，1986）。

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关于如何区分对与错、好与坏、违背意愿或符合意愿的观念。价值观是决定社会的目标和理想的普遍和抽象的观念。价值观通常是充满感情的，它为一个人的行为提供正当的理由（克拉克洪，1961；威廉斯，1986）。

我们在本章开始部分提到了亚洲移民的孩子具有一种价值观，这使他们在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具有优势。另一种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也仍由上一辈传递到下一辈，它强调家庭的中心地位。例如，课后作业被认为是一项家庭共同承担的任务，年长的孩子要帮助年幼的孩子；父母不让孩子们做家务，以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做作业。典型的场景是饭后桌子就被清理干净，然后家里所有孩子都趴在桌上写作业。印度高中生花在课后作业上的时间平均为每天3小时10分钟，而美国学生则仅为一个半小时。自然，这种投入带来了显著的效果。

对其他移民群体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工作价值观。实际上，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和亚洲人一样强调学历和努力工作，但美国人更多是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家庭出发的。

文化的主要价值观是通过其符号系统而传递下来的。价值观可从民间传说、神话、艺术、娱乐及其他媒介得到体现。例如，在英国亚瑟王传奇中有着许多丰富多彩的形象：亚瑟王、圭尼威尔王后、兰斯洛特爵士、莫林、龙和其他四角兽等。今天当我们阅读这些故事时，我们会崇拜亚瑟王对他的臣民慈父般的关怀，会赞许兰斯洛特的勇敢和忠诚，也会为莫林的神奇力量和智慧所惊叹。这些品质体现了中世纪文化的价值观。

像符号一样，价值观不能孤立地存在。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集合模式。在中世纪，人们对慈父国王的理想往往是对臣民忠诚的要求是分不开的，部属被鼓励把自己视为“家庭”的一员而不是看作一个个体。因此，我们现在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和中世纪英国的价值观显然是不一致的。同样，对通过家庭纽带而连接在一起的中世纪人而言，我们经济生活中利益趋向的价值观显然也是难以理解的。

典型的价值观往往成对出现，有正面的价值观必有反面的情形。有被崇拜的价值，就必然有被唾弃的价值。例如，中世纪的人们崇拜勇敢，就必然厌恶懦弱。有时，在兰斯洛特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到同一人物身上体现了正反两种品质。他既是一个恶棍（因为他对亚瑟王的妻子——圭尼威尔王后有一种婚外恋情），又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把圭尼威尔王后从不忠中解救了出来）。

价值观如何与行为联系起来呢？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相反的观点（斯帕特斯，1983）。一种理论宣称价值观决定行动。按照这种理论，基本价值观在个人生活的早期就已被接受。一旦价值观形成，它们就成为个人行为选择和态度形成的指南。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51）认为：

有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从某些方面看，人类后天习得的个性因素

中最稳定和持久的即是主要的价值倾向模式。有理由相信这些模式在儿童时代就是“定型”的，而且到了成年时代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这种理论还认为，行为方式的变革是社会价值观的外在逻辑结果。例如，在美国，商品的定价取决于商人对顾客支付能力的估计，政府一般不予干预。这种行为反映了个体自由经济的基本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逻辑结果是，使人们认为政府对自由交易的限制是错误的。

反对意见则更关注行为在创造价值观方面的重要性，就像早期著名社会学家威廉·G·萨姆纳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习俗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自然形成的（萨姆纳，1906，1960）。为了证明继续沿用这些习俗的合理性，或者说是为了掩盖这些习俗可能是非理性的事实，人们就试图对它们进行抽象的解释。换句话说，价值观是一种事后的解释，通过它们，社会已存在的习俗就变成一种需要的产物。

这种理论可以应用到前文所述的自由市场商品定价的例子中。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价格体系是在移民涌向一个富有同时又缺乏控制的国家时出现的，在那里政府的权力十分软弱，对个人而言，致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定出了市场所能承担的最高价格。这逐渐成为一种商业习惯，后来又通过建构自由经济这一价值观而获得了合法性。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正确之处，很难说谁对谁错。因此许多相关理论中都是两种观点并存的。一方面，确实存在一系列基本价值观，它们成为每一个既定社会的基础（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将在本章后边详述）。另一方面，价值观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它们通过日常生活而形成、强化和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认为价值观取决于行为，行为又决定于价值观。换句话说，价值观与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3

规范

社会学家把人们在特定环境下被要求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体验的期望称为规范。规范既有正式的，又有非正式的。正式规范通常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违反者有特定的惩罚。非正式规范是不成文的，但往往能被社会成员普遍理解。最重要的规范往往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公认的规范，如一般美国人都能遵守严禁谋杀、抢劫、裸体出行的规范。

也有一些规范只对特定群体生效。我们常把音乐人视为反传统的人，对规范毫不关心。但事实上，音乐人和所有人一样，也有决定其行为的特定规范。只不过显得荒谬的是，对音乐人而言，一个重要的规范就是要求他们与众不同，要游离于传统社会规范之外。许多音乐人喜欢讲述他们曾做过的反习俗的事，如以下的这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为舞会伴奏。工作结束后，我们收拾好行装，挤上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回底特律。刚出城不一会，车子就不走了。油箱里汽油还很多，但车子就是不走。人们都从车子里出来，站在一边抱怨着。突然，一个家伙说：“我们把车子烧了吧。”于是一些人从油箱里弄了一些油出来，撒在车子四周，并点着了它。很快烟雾升了起来。这真是一

个奇特的体验。车子在燃烧，这些家伙就站在旁边，一边怪叫，一边拍着手（贝克尔，1963）。

然而，大部分社会规范都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及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如母亲、男人、雇员等密切相关，或者与特定的时期有关。举例来说，医生处理病人时就应包含着一整套规范。他们始终应表现出镇定、稳重、富有同情心和责任心。许多与医生相关的规范就不见得同样适用于别的身份或位置。不过从事医疗工作的其他人员也可以模仿医生的行为，以使自己显得和医生一样，从而像真正的医生一样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实际利益（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将在第四章讨论）。

“规范”这个名词及其形容词“规范的”不能和另一个相关词“正常的”混为一谈。所谓“正常”的行为是指统计意义上最普遍的行为。左撇子或一头红发可以说是不“正常”的，然而从规范的角度看它们都是可接受的——或者可被认为是对的和正当的。

虽然价值观和规范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但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规范是特殊、具体的，它受到具体情况限制。它们通常被视为是行动的指针，决定一个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价值观是一般的，而且经常被视为判断规范的标准（威廉斯，1970）。举例而言，我们社会注重金钱上的成功。某些规范就指导我们如何合法地实现这一价值——我们可以接受教育，开始自己的生意并获得利润，也可以谋求一份职业并努力获得提升。

社会习俗。不同的规范其社会重要性同样也极不同。许多规范被违反后并不会产生严重后果。比如，虽然男性通常被要求留短发，但还是有许多男性留长发甚至还有人留辫子。虽然存在反对这种行为的规范，但它们没有太强的约束力，因此在很大的范围内很轻易地就被突破了。类似于这样的规范，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习俗（folkways），或称之为社会习惯（萨姆纳，1906，1960）。餐桌上的礼仪规则和其他礼仪规则都属于社会习俗的范畴。

民德。其他规范几乎都被视为是神圣的，对它们的违反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当一个人违反了严禁杀人的规范时，就不能仅仅因为他是初犯就可以原谅他或原谅他的行为。杀人者将得到惩罚。这种得到严格执行、被认为是关键的和必须严格实施的规范，我们称之为民德（mores）。

民德可以是提倡性的，也可以是禁止性的。提倡性的民德表明人们应该怎么做，如关心不能照顾自己的婴儿和儿童。禁止性的民德表明人们不应该做什么，如不能闯入他人家中。特别严格的民德被称为禁忌。乱伦禁忌就是一种普遍接受的禁止性民德——它严禁任何一种近亲间的性关系。

法律。法律是一种正式的规范，通常也是民德的一种，它是由国家颁布的用以控制人类行为的规范。同一种行为很可能既是非法的（违背了法律），但如用某种非正式的规范来判断又是可以接受的。比如，美国大部分21岁以下的人都喝含酒精的饮料。虽然这种行为严格地说是违法的，但社会的非正式规范有时却允许这一法律被忽视。大部分警官都不会拘捕一个让他14岁的儿子喝一小口啤酒的父亲，而大学校园里未到喝酒年龄者喝酒也往往被

视而不见，只要这一行为不是公开的。

约制。一个社会要运作，就必须强化它的规范。人们被迫遵从，或者说以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行动，即使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是困难和不愉快的。对社会规范的违反被称为越轨。对规范的遵从通过约制的压力而得到强化，即一种社会控制的过程（吉布斯，1966，1981）（越轨行为和社会控制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约制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正面约制是对那些行为正当的人的奖励。负面约制是对违反重要规范者的惩罚。

约制有正式的（这种约制由具有权威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实施），也有非正式的（这种约制由朋友或同辈人实施）。对一个抢劫杂货店的人判处三年徒刑就是一个正式的负面约制的例子。对一个忠实服务于公司的员工予以提升，或者是给一个在现场看见抢劫银行匪徒的汽车号码，并报告给联邦调查局的姑娘以现金奖励，都属于正式的正面约制。

正式约制往往是最后的办法，一般只在非正式约制不能产生作用的时候才实施。非正式约制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例如，一个违反西点军校荣誉准则的士官生会被他或她的同学们所排斥。一个人如果穿着牛仔裤和破T恤衫去参加一个音乐会，那么就很可能受到其他音乐爱好者非正式的约制，如对他冷眼相对。一些研究表明，非正式约制往往比正式约制更为有效（霍林格和克拉克，1982）。

社会学研究已开始关注许多发生在群体内的富有想象力的非正式约制。一个研究小组在对一群工厂的工人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些很常见的负面约制的例子（布劳和斯科特，1962）。工人们和受约制的人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距离，即使多绕一些路也不愿在这个工人的桌前经过。他讲笑话时，没人发笑；他有困难时，也没人表示同情，甚至人们还侵犯他的个人权利。而当人们要赞许一个人的行为时——无疑这是一种正面约制——工人们会经常提他的名字，发表意见时会先称呼他的姓名。他们会拍他的背，或采纳他关于生产的建议。

并不是所有的日常生活都需要约制，因为社会成员在其成长过程中已接受了各种规范。实际上，规范是否真正发挥功能取决于人们自觉遵守规范的程度。

最后，必须加以说明的重要一点是，我们并不要求人们永远严格地遵守规范。文化和社会必须能适应改变的环境。允许对现行规范的一定偏离有助于社会保持灵活性（默顿，1968）。

4

物质文化

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物质形态——机器、工具、书籍、衣服等——称为物质文化。一直以来，人类利用周围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生活服务，以提高人类生存的机会并丰富人类的生活。他们把土地、树木、岩石、金属、动物及其他自然资源转化为房屋、工具、服装和交往的手段。

一个特定社会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其实质是技术水平、可开发资源和人类需求的集合体。现代社会拥有丰富的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和高度发达的技

术。当我们把这些物质及非物质的资源用于解决交通问题时，就产生出了汽车、卡车、火车、飞机及其他交通工具。20 世纪前的印第安人只有非常有限的资源和简单的工具，但由于他们的需求也更加朴素，因此他们解决交通问题就更加简单。在需要运东西时，他们要么肩扛，要么利用拖橇——一种用两根拖杠支撑着木板或绳网的马车。

当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座古城的遗址时，他们发现了如下物质文化：一个破裂的罐子、一条被精心保存在小木盒里的项链、房屋的基石。从这些人造制品中——人造的或人使用的——考古学家们就能重构当时社会中非物质的价值观和文化中的规范。

同样一个人工制品在不同文化中意义是各不相同的，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意义甚至会完全相反。许多印第安部落在宗教仪式中所发出的声音，在我们听来就像是小孩的尖叫声。一种文化中用来吃饭的碗钵，在别的文化中可能会被用于乞讨。我们对国旗会感到骄傲和崇敬，但对其他文化而言，它只是一块布料而已。

人类创造了物质文化，人类也能改变物质文化。我们可以把物质文化视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非物质文化的所有因素——规范、价值、语言、传统及其他——都必须去适应物质文化。举例来说，汽车被 20 世纪早期的社会批评家称之为“轮子上的卧室”，避孕药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关于性的规范和价值观。同样，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也迫使我们围绕着什么是真正死亡，而重新思考许多重要的伦理问题。

文化的分析

尽管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都在研究文化的某些方面，但他们的工作并非所谓的文化分析。文化分析是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考虑。要分析一个整体的文化，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确定其主流价值观和标准，观察这些文化是如何在社会行为中得到体现的，研究价值观和观念是如何塑造物质文化，同时又为物质文化所决定的。

描述和分析原始文化已成为文化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分析现代文化则是社会学家的主要任务。虽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是从不同的传统出发、根据不同的学术著作来进行研究的，但他们无论是在兴趣和研究方法上都十分相近。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同时研究原始文化和现代文化，而社会学家在文化分析中也引用了大量的人类学概念和有用的技术方法。

1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考察信仰体系、礼仪、制度或文化的其他方面特征时，总是首先要提出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文化的这个方面能够存在？”社会科学家从多种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考

文化分析的视角

察三种最重要的研究视角：功能主义的、冲突论的和文化生态学的探讨方法。

功能主义的视角

从功能主义（功能主义在第一章已有介绍）的视角来看，一个特定的文化特征的存在是由于其履行了某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功能主义是文化分析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在二战后的美国大行其道之前，它曾是英国人类学家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回答为什么某个文化特征能够存在的问题时，功能主义论者会进一步提问：“它承担了什么功能？”这一视角强调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对文化整体所做的贡献，既包括正向的贡献，也包括反向的贡献。

英国人类学家 A.R. 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 1952）对印度洋边的安达曼岛居民孩子出生时一些社会习俗的解释，就是一个杰出的功能主义方法的例子。布朗需要解释以下文化事实：当一个安达曼岛的妇女希望能有一个孩子时，婴儿还在胎中的时候姓名就已经取好了。从那时起到孩子出生时为止，大家都不许直呼孩子父母的名字。相反，在称呼他们的时候必须指明他们和孩子的关系。同时，在孩子未出生期间，父母将忌食一些原来是正常饮食的食物。

岛民们坚信这些习俗具有某种魔力，能保证孩子的安全出生。但布朗认为这些习俗同时还履行了岛民们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的重要社会功能。在布朗看来，通过强调和孩子的关系来称呼父母的习俗可以强化他们即将成为父母的意识，提高他们完成其父母角色的可能性。同样，忌食某些食物是为了表明他们为其新的父母角色而作出的自我牺牲态度。这样，看上去毫无实际作用的文化行为实际上满足了重要的社会需求。

关于美国文化的讨论中最富争议的功能主义分析是由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提出的关于美国贫困正向功能的分析。与其他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相比，美国具有相对更高的贫困人口比例，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也较少。对这一政府决策，通常的解释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机会之邦”，因此人们一般认为贫困是由穷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在大家看来，只要一个人想成功，他就一定能成功。但是，甘斯认为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贫困如此漠不关心有其潜在的原因，即贫困履行了重要的社会功能。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贫困，那么，社会的“脏活”——不需要任何特殊训练或知识的体力劳动——就会没人去干。这样，虽然平等这一价值观被赋予很高的评价，但美国社会还是有一个杠杆以保持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

冲突论的视角

从冲突论的视角看（冲突论在第一章已有介绍），文化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保护或促进了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这一视角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社会存在着，或者说也许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文化要素，不同的文化要素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或社会阶级的利益。通过这一视角，社会学家试图发现哪个集团支持哪种观念和价值观，并试图弄清原因。

这种冲突论视角的核心概念是意识形态——指某一阶段、群体或其他社会部分在与其他群体为争夺特权与统治的斗争中，为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或

正当化的一套文化信念。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和目的就是维护（或挑战）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的权利。从这种角度出发，美国人所普遍接受的只要努力就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的观念，其真正作用在于反对根本的经济变革，从而维护经济精英们的权利和特权。

反主流意识形态往往能获得社会下层阶级的支持。在美国，这类反主流意识形态既包括民主党左翼宣扬的温和变革，也包括在 20 世纪早期得到诸如世界国际劳工组织等前共产主义工会组织支持的激进主张。这些运动否认资本主义精英的权利，要求彻底改变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

其他一些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关注相对要弱一些。例如，最近几年，美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一系列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有时被称为“传统美国家庭观”，他们的反对者则强调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在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上我们都能发现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如工业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之间、石油开采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民族融合论者和隔离论者之间的冲突。

盖伊·斯旺森（Guy Swanson）的著作《宗教和政体》（1967）提供了一个用冲突论的视角去进行文化分析的例子。斯旺森试图说明 16 世纪欧洲的君主们分别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原因，在于哪种宗教能更好地成为维护他们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君主们发动了一系列的宗教战争，其真正原因可理解为小君主和中央王室之间的权力斗争。根据天主教的教义，教皇，或从更小一点范围而言，由教会所控制的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斯旺森分析道，拥有强大集权势力的国王会倾向于这一信条，从而选择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将起到其政治权力的文化屏障的作用。相反，基督教更强调对上帝的一种更私人和个人化的感受，因而有可能瓦解中央王室的权威。斯旺森坚信，小君主们会很自然地倾向于这一信念。

斯旺森发现，中央王室和诸侯们都支持能促进和维护其利益的宗教意识形态。国王们信奉天主教，因为它能维护中央政权的权威；诸侯们则信奉基督教，因为它的作用恰恰相反：强调个人主义，削弱了对中央权威的遵从。

生态学的视角

文化分析的第三种视角援用的是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间关系的生态学的观点。文化生态学断言，文化特性由资源及周围环境的限制所决定，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1955）奠定了这种生态探讨法的主要基础，他对不同社会的文化与相同水平的生存技术作了比较，发现每个社会都使用了弓箭、长矛和陷阱以狩猎。斯图尔特提出，社会文化将随着狩猎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他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认为如果主要的狩猎对象是较大的迁徙动物群，如驯鹿，则这个社会往往规模较大，组成多个家庭的群体。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发展较大规模的协作狩猎。如果正好相反，狩猎对象是分散而不是迁徙的小兽群，该社会的规模往往较小，有可能组成一种单一家庭的群体。为证明他的假设，斯图尔特提出了三个环境完全不同，但都以小动物为狩猎对象的社会为例子。森部落（生活在沙漠中）、尼格利特

斯人（生活在雨林中）和福吉安斯人（生活在寒冷、多雨的沿海平原）都表现出了一种小动物狩猎者的社会文化。

虽然我们已经发现社会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但实际上，在别的领域中——宗教、科学和艺术——文化要素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更加明显。在另一项可能引发争论的研究中，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 1989）试图用当时人们的营养需求去解释阿兹台克人的牺牲习俗和食人肉的习惯。哈里斯认为，只有能够帮助人们适应环境，一种习惯才能得到生存和延续的机会。由于阿兹台克人不饲养大牲畜，所以他们的食物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食人肉的习俗之所以出现并得以延续，就是因为它满足了这种营养需要。

尽管生态学探讨对解释某些文化的特征是有用的，但它不能解释一切问题。例如，我们很难纯粹用环境的差异来解释现代世界中各种政府的差异。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处于基本上是一样的生态环境中，但哥斯达黎加是民主政府，而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两国则在大部分历史中都处于独裁体制之下。

2

文化的差异 和统一

文化的差异

每一种文化都是不同的，因为它们要适应特定的环境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文化生态学家已经为我们揭示了有助于文化形成的关键要素，包括气候、地理、人口和动植物。生活在南海的人们不会去捕捉海豹和北极熊作为食物，自然条件要求他们以当地野生的果实为食物，并且要学会在咸水湖和公海中捕鱼。这类环境往往与定居市区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为保证渔民的安全而举行的各种巫术和宗教形式也很容易得到发展。生活在一个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环境中则因为花费较少的时间就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包括食物和住所，从而人们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以发展艺术和仪式典礼。

但是，虽然自然条件非常重要，但与社会条件相比，前者的影响显然不如后者，特别是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所说的社会因素包括技术水平、语言、普遍的信仰以及与别文化相联系的程度。就是这些社会因素决定了南海地区的社会管理方式，决定了是由祭师还是由巫师来为出海的船队做符咒，也决定了该社会中的艺术主要是描述爱还是侵略。

文化的普遍性

不过，人们可能会很容易过分强调文化上的差异。人类学的比较研究已证明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的基础，通常我们称之为文化普遍性。一位人类学家曾列举了近六十种文化普遍性，包括烹饪、劳动、民俗、葬礼、音乐和法律等（默多克，1956）。

所有的人种在生理上都是类似的，这就可以解释许多已知的文化普遍性。我们都需要吃饭，需要住所；我们都必须照顾儿童，处理年老、疾病等问题，我们都要面对死亡。

其他一些文化普遍性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需要。社会为了正常运行,就必须替换掉那些死去的、离开的或者生病的和残废的成员。它必须教育新成员承担有用的社会角色。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想生存,它就必须生产和分配商品,提供服务,维护秩序,保持目的感,不可能脱离于这些需求之外。

文化普遍性也与一定的自然环境所允许或所限制的范围有关。几乎每一种文化都用火来取暖和照明。几乎每一种文化都要创造出一种面包。没有任何一种人会使用方的轮子,因为它根本不会转。

婚姻和家庭是两个重要的文化普遍性。每个社会都有性别不同而造成的社会分工,每个社会都必须抚育儿童。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缺乏婚姻和家庭系统的社会。但是,和其他文化普遍性一样,婚姻和家庭的具体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中很可能大相径庭。

3

种族中心主义 和文化相对性

旅行者和传教士们对其他文化的最初描述往往带有高度的偏见。他们总是倾向于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他们所观察到的文化。他们常常把那些与他们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相矛盾的习惯和信仰视为落后和野蛮的,对那些与其所持价值观相一致的习惯大加赞扬。这样一种用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文化,并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对的、而其他文化是错的这样一种倾向,我们称之为种族中心主义。

现在,研究其他文化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都自觉地试图避免种族中心主义。但由于每个人都已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一套价值观,因此在分析其他文化时要保持完全的中立是不可能的。虽然这样,文化分析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必须根据文化的自身标准来评判它。这一原则就是文化相对性。文化相对性原则认为,要真正理解和正确评价一种文化特性,就必须把它视为一个更大的文化或社会的一部分。

一方面要对其他文化作出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对自己文化感情上的赞同,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痛苦的斗争,这种斗争甚至明显地体现在弗兰斯·博厄斯(Frans Boas)——美国最早的人类学家之一——这样细心的科学家的生活中。读他的著作、论文,甚至野外观察记录,你会感到他显得是那样的公正、客观。但他的私人日记及写给家人的信件却揭示了其客观观察的信条与其个人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描述他在加拿大西北部印第安部落,特别是在爱斯基摩人和贝拉库拉人中的工作时,弗兰斯·博厄兹这样写道:

随后,我到了贝拉库拉人那里,他们给我讲了另一个愚蠢的故事……听他们给我讲故事这件事是相当有趣的,但这些故事本身却比那些爱斯基摩人讲的故事还要令人恶心(《日记》,1886年10月3日)。

与此同时,那些肮脏、尖叫的孩子们正在四处乱跑,而有时人们正在吃饭。狗和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火和烟几乎熏得你睁不开眼睛……总之,整个过程简直是对承受能力的一种考验(1886年11月8日)(雅波尔

斯基, 1958)。

种族中心主义可以在社会中履行正向的功能。如社会成员相信他们文化中的价值观和规范是正确的和好的, 他们就有可能更严格地遵守它们。这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极端的种族中心主义却会妨碍有利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文化交流, 从而导致社会孤立。种族中心主义还有可能被滥用于政治目的。希特勒就利用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极端形式——极度宣扬德意志文化——从而抬高他自己的声望。

当今世界, 由于国家间日趋相互依赖, 因此种族中心主义已逐步失去市场。世界经济的发展, 甚至它的生存, 都部分依赖于我们理解其他文化的能力(表 3—1 列举一些源于其他文化, 但已被美国人所广泛接受的文化特征)。反过来, 那种认为其他文化强于本土文化的他国中心主义观念必须避免。他国中心主义有时被认为是一种“倒过来的种族中心主义”。

表 3—1 部分常见文化物品及其起源

项目	雪茄	咖啡	餐叉	玻璃	睡衣	塑料	丝绸	肥皂	毛巾	火车	雨伞	华夫饼干
起源国	巴西	埃塞俄比亚	中世纪的意大利	古埃及	东印度	古墨西哥	中国	古高卢	土耳其	英国	印度	斯塔第纳维亚

4

亚文化

并不是每个社会都是以一种由其所有成员平等共享和接受的单一文化为特征的。所谓一个社会的文化通常仅仅是存在于构成这一文化的不同要素之间的一个共同的名称。

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 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 这种群体文化被称为亚文化。亚文化可以围绕着职业种类发展而成, 如医学或军事部门的亚文化。亚文化还可能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的差异, 如美国黑人亚文化。亚文化还可能是源于地区的差异, 如美国南部各州的亚文化; 也可能基于原来的国籍, 如美籍墨西哥人和美籍意大利人亚文化。由于成员已定居美国, 这些亚文化大多数已部分适应了美国主流文化的要求, 但同时也保留了一些明显是非美国的规范、价值观和语言模式。

每一个复杂社会都包含着许多亚文化, 社会成员常常是在一个以上的亚文化中发挥作用, 反过来说, 他们在一生中也会经历许多种亚文化。许多青年群体亚文化都与一些特定的流行音乐密切相关, 这些音乐往往一度非常时兴, 若干年后又很快悄无声息, 它们都属于一种暂时性的亚文化。这类亚文化大部分在代际之间发生变化, 但几乎所有亚文化都体现出了青年对父母、教师和其他权威角色的反叛。50 年代, 最流行的亚文化是围绕着摇滚乐而形成的, 它以黑色的皮夹克、鸭尾状和蜂窝状的发型为特征; 60 年代, 围绕着疯克音乐产生了一种重要的亚文化; 70 年代是迪斯科音乐; 80 年代是朋克音乐; 现在则又是摇滚乐以及说唱乐亚文化。

那种直接对主流文化的中心因素如价值观、信仰、观念、风俗习惯等构成挑战的亚文化，我们称之为反文化。反文化往往产生于青年群体中。例如，产生于60年代后期的嬉皮士反文化就强烈反对已确立的生活方式，并直接对抗关于工作、爱国主义和物质财富的主流文化（古特林，1987）（参见“大众文化之窗”栏：“嬉皮士反文化”有关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其他反文化的例子有戴维德·克罗什（David Koresh）领导的戴维德运动，1993年因其堪萨斯州沃科总部受到冲击而消亡。

嬉皮士反文化

在嬉皮士反文化出现近三十年后，其仍然继续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这不仅仅包括已成年的前嬉皮士们，也包括那些在1967年“爱之夏”时还未出生的那部分人。

但是，嬉皮士亚文化绝对不是20世纪最早的豪放派艺术亚文化。它最著名的前身是所谓垮掉的一代运动，他们为平静的50年代增加了一些刺激。垮掉的一代运动的中心是纽约州的格林威治村，以爵士乐和疯克音乐为特征，以诗人阿兰·金斯伯格、小说家杰克·科罗克为代表。它对主流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反对是有力但又是低调的。垮掉的一代运动对主流文化的影响日益明显，偶像影星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邓恩的大受欢迎，咖啡屋和黑色紧身衣在郊区和大学校园的日益流行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50年代它仍然只是生活中一个较小的方面。

嬉皮士却不一样。当垮掉的一代运动衰败时，嬉皮士运动正方兴未艾。垮掉的一代运动主要是局限于其自身亚文化之内，而嬉皮士运动则受到了大众媒介的推崇或辱骂，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

1965和1966年，嬉皮士运动最早出现于旧金山附近，在1967年夏天进入了整个国家的视野内，这以后就开始进入自我模仿阶段。它的发展可以用三个关键的背景因素来解释：（1）50年代生育高峰所造成的60年代青少年所共有的认同感；（2）当时的社会繁荣使许多青年人不关心如何谋生；（3）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对新奇事物的追逐。

反文化中的许多核心分子都是非常认真地投入这场运动的，他们坚信他们是在开创一种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最终会成为整个社会再生的模式。在嬉皮士最重要的价值观中，以下是一些关键点：

1. 世俗社会中的物质主义和竞争是一个陷阱或骗局，必须予以避免。
2. 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你应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
3. 消灭所有形式的暴力。
4. 毒品，特别是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和大麻，提供了进入自觉的新世界和更高层次现实的途径。它们应被用于启蒙中，而不应用于过瘾或逃避。
5. 性应是自由的、公开的和自发的。

坚守着这些信条，60年代后期，在旧金山的哈特·阿斯伯利地区聚集着数以万计的嬉皮士，在美国所有的大城市或小城镇中也都聚集着一群群的嬉皮士，他们一般都群居，在音乐、艺术、服装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此外还有数以百万的其他青年人，他们不愿意脱离世俗社会，但又为嬉皮士的自由所吸引，从而接受了这种反文化生活方式的部分内容。



最后,像所有在此之前的其他青年亚文化一样,嬉皮士运动衰败了。受大众媒介的影响,嬉皮士的先锋们开始使用更烈的毒品(特别是安非他明),实施暴力,而这些都是嬉皮士族所坚决反对的,这就挡住了嬉皮士发展的道路。由于震惊,反文化中大部分真正的信徒在60年代末都遁入了嬉皮士在农村的群居村。他们有些人到现在还存在,但大部分人都已回到了主流文化中,剪掉了作为他们标志的长发,完成了学业,结了婚,找了一份工作。

嬉皮士是不是真的已过去了呢?也许是的。但弗莱德·戴维斯在嬉皮士时代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这一运动是对后工业社会的三个正在产生的问题的一种回应,这些问题是:

1. 强迫消费。我们的经济是持续扩张型的,它要求人们每年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这能够持续下去吗,特别是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嬉皮士有目的地养成了一种在较少供给基础上的能力。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不得不这样做。

2. 被动观察。现代美国人似乎更倾向于观看专业人士进行体育比赛、唱歌或表演,而不是积极投身于各类活动中。嬉皮士则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还有比这更有价值的一课吗?

3. 极端的将来取向。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把一生的大部分用于为将来做准备,而不是享受现在。有些事是必须要做的,但也许我们可以放慢脚步,闻一闻玫瑰的芳香,就像孩子们所做的那样,如此肯定会受益非浅的。

资料来源:弗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为什么有时我们都是嬉皮士》,《跨越行动》第5期,10~18页,1976;威廉·帕特里奇(William L. Partridge):《嬉皮士:一种亚文化的历史》(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3)。

5

文化整合

许多现代美国的文化要素之间看上去具有某种相互的一致性。我们对于科学的信念、对物质进步的重视、对效率的强调以及现代技术的物质产品——所有这些都似乎构成了一个一致性的整体。当各个文化特征相互之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时,我们说这个文化体现了很高程度的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可以存在于相对局限的某些文化部分,也可以存在于文化的整体水平上。如基督教关于人生来就有罪的观念、救赎观、耶稣关于“人打你左脸,你就应送上右脸”的教义,这三者在逻辑上是统一的,它们都体现了基督教关于宽恕的核心价值观。

但是,各文化要素之间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它们在逻辑上可能不一致。例如,一个社会的规范可能和它的价值观不一致,结果,人们的行为和他们的观念之间产生了背离。举例来说,当人们发现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诸如诚实、正直和公平交易等价值观时,当一个社会宣称为了和平而发动战争时,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就发生了。社会学家有时把这种人们所信奉的观念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冲突,称为理想文化和现实文化之间的冲突。

文化矛盾也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发生,如外来文化的某些要素与本土文化部分要素之间的冲突。当这种冲突发生时,作为接受一方社会的成员往往

会对改变中的价值观和规范持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例如，许多刚到美国的亚洲移民都很难接受美国人开放的性观念。同样，对大部分亚裔家庭而言，他们在传统上家庭是非常团结的，因此，面对美国的高离婚率和分居率，他们往往会大为震惊。

最后，文化要素间也可以是既不一致，也不矛盾，而是一种中立的关系。例如，一位服装设计师设计出一种新时装，与此同时，一位发明家设计了一种新型计算机，这两者之间显然不可能会有什么关系。由于人类社会如此复杂多样，其中可能同时存在着许多没有多少相互关联的信仰、习俗和发明创造。

6

文化变迁

虽然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专门讨论文化和社会变迁问题，但如果在此我们不对该问题作一简要论述，那么我们对文化分析的讨论将是不完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人类社会与这些环境间的关系也处于相应变化之中。文化变迁主要有两种方式来推动，一是在文化内部发生的，一是对外来文化影响的回应。文化变迁可能是社会内的多种紧张关系、冲突及新发展的结果。文化变迁的一个常见的内部根源是革新，即新的文化特征——包括新的观念、规范或新的人工制品——的发展。有时革新会产生新的文化特征，如原子能。也存在另一种情况，现有的文化特征去逐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例如核技术在外科医学中的使用。文化变迁也可能是文化传播的结果，通过文化传播，一种文化的特征和模式被扩散到另一个群体或社会中。

因多种原因的存在，各种文化必然会发生联系，如贸易、旅行和战争。当代社会由于大众传播和国际贸易的原因，大部分文化的相互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在过去两百年间，通讯和交通的迅速发展使远距离的交往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方便。当然，并非所有这些交往都是逐步实现的，也不都是通过友好的方式而实现的。有时候，一个社会的成员会出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而占领、统治和剥削其他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交流往往是对弱小社会的信仰及习惯的一种践踏。

美国人的价值观

因为在本书中我们经常需要对美国社会进行分析和讨论，因此，简要叙述一下美国文化的一些主要方面——赋予美国人生活以意义的共同价值观和信仰，是很有帮助的。这样一个简述也为我们提供了对一个社会展开详尽观察的机会。

对我们而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是那样的熟悉，因此很难注意到它们。它已成为了我们的生活背景，我们离不开它们，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它们是一种想当然的东西，从我们的出生到最后死亡，文化一直决定着我们的

生活。如果文化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成为现在的自己了。

美国人的种族、职业、信仰多种多样，因此，美国文化是最多元化的文化之一。煤矿工人和公司经理、爱尔兰血统的波士顿天主教徒和新奥尔良的科利奥尔人——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为美国文化增添了光彩。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某些共同的价值观模式还是能够清楚地被区分出来的。

1

美国人的 传统价值观

罗宾·威廉斯在他的《美国社会：一个社会学的解释》（罗宾·M·威廉斯，Jr.，1970）一书中给出了一套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为我们这一部分的讨论提供了基础。此外，许多其他社会学家也区分出了一系列美国人共有的价值观。这些论断已得到了外国游客的赞同，他们观察到了同样的典型美国人的特征。在美国人中进行民意测验也证实了这些价值观，测验结果表明美国人仍然信守冈纳·莫德尔（Gunnar Myrdal，1962）所说的“美国人的信条”。威廉斯列出了如下传统的美国人价值观。

个人成就。个人成就是所有美国人评价最高的价值观之一。美国人赞扬和奖励那些才艺出众和成就辉煌者，尤其是那些通过艰苦工作而取得成就的人。一个人的价值常常被等同于其在商业、艺术或其他重要领域中的成就。但是，对成就的这种强调，特别是往往用经济方面的状况来衡量成就，就与尊重一个人仅因为是其自身的原因的观念相冲突。

工作。美国社会是建立在艰苦工作的基础上的。来到这片荒原的早期移民必需努力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争取较好的社会条件，更是为了能生存下去。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们的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这些殖民者也意识到，一个农民、猎人或矿工的劳动不仅仅给他自己，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财富。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工作被视为是取得较好的社会条件的手段。这个新国家开放流动的社会结构也为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们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到现在为止，工作仍然是美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

道德关怀和人道主义。作为美国人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早期美洲殖民者对那些比他们不幸的人们的福利有着深切的关注。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美国人并不经常把这种价值观付诸实践。同时，人道主义价值观与美国人其他的一些主要价值观存在逻辑矛盾。比如，个人成就的价值观就使很多美国人难以接受国家福利计划。在他们看来，让社会的一部分人来养活那些根本不工作的人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其他人显然是由于其自身难以抗拒的原因而陷入贫困的（例如水灾受害者），则大部分美国人的态度是十分慷慨的。要解决诸如上述个人成就与道德关怀之类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很困难的，而且很容易导致个人层次的混乱和不稳定。

效率和实用主义。美国人倾向于用实用主义来评价事物：这是否可行呢？是否值得这么做？这种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边缘地区传统

的影响。边缘地区的危险环境使当时的殖民者对那些缺乏效率和不够实用的工具、武器甚至人都十分轻视。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美国人喜欢尽快解决手头上的问题。结果，美国人往往比较注重技术，并有一种想控制物质世界的强烈欲望。美国人一般不愿意追求长远的、不切合实际的目标。

进步和物质增长。作为一个建立在希望之上的国家，美国一直对进步的思想感兴趣。这种思想的源泉之一就是工作的重视，它直接导致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艰苦的工作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早期的美国人努力提高他们的物质繁荣和享受的水平，这种努力使进步的思想和技术革新相联系起来：如果一种事物是新的，那它肯定就是好的。由于进步思想和物质增长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它们都意味着“美好生活”。由此，在美国的公司和企业中出现诸如“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这样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广告也竭力使我们购买它所宣传的产品，因为它是“新的”和“进步的”。

平等。由于早期的美国殖民者大多来自殖民国的中下层阶级，所以他们大多反对严格划分阶级的观念。因此，“旧世界”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在美国则不是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国家具有大量的自然资源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供应，从而更增强了平等的观念。

和许多其他主要价值观一样，平等观念也和其他一些价值观存在冲突，而且也往往在实践中难以得到体现。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理想价值观和现实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一种认为美国人生活中明显缺乏平等的观点指出，要体现平等价值观就要求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去争取成功，但实际上即使以这个最普通的标准去衡量，大多数美国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许多中上层阶级的成员把他们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解释为对他们更高个人成就的一种奖励，而这种个人成就观点也是美国人的主要价值观之一。

自由。在所有美国人价值观中，自由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对美国人而言，自由意味着行为不受约束，又代表着一个明确的、完全的自由体制，包括：新闻自由、和平集会的自由、维持多党政府的自由以及私人经营企业的自由等。

虽然美国人也接受一些对其自由的限制，但他们对任何过分强权的、直接要求他们如何生活的政府则表示出完全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建立这样一种信仰之上，即人们应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

美国人的这种对政府控制的怀疑态度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冲突，即文化中自由价值观和平等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利普斯特，1963）。如果没有政府管理，一部分人会变得极端富有甚至专权。极端的财富紧接着就会带来对穷人、下层阶级的压迫。这就违背了我们所接受的平等价值观或至少是违背了平等机会的观念。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大部分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而且应被其他国家沿用。即使到今天，那些对美国社会提出建设性

批评的美国公民有时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的。

最近的一些社会学研究已发现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个人价值观之间存在许多相同点。正如表 3—2 显示的那样,在 12 种价值观中,两国的城市居民都把“身体健康”和“婚姻幸福”列在最重要的选择,而把“道德目的”、“团队工作的意义”、“赚大钱”列在最后。然而,两国公民对具体各项价值观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婚姻和朋友对英国人而言更为重要;美国人则更注重“有意义的生活”。可以推断,这些区别反映了两种文化间深层次的差异:英国文化更偏向于集体主义,而美国文化更偏向于个人主义。

表 3—2 英、美两国成人个人价值选择表

个人价值	美国	英国
1. 身体健康	7.86	8.25
2. 婚姻幸福	6.38	7.37
3. 有意义的生活	6.29	5.43
4. 和平的意义	5.85	5.28
5. 亲密的朋友	4.76	5.64
6. 对生活的控制	4.71	4.06
7. 得到其他人的尊重	4.43	4.48
8. 拥有孩子	4.01	4.40
9. 工作较好	3.76	3.69
10. 道德目的	2.33	2.67
11. 团队工作的意义	2.15	2.38
12. 赚大钱	1.60	1.61

资料来源:帕金斯与斯帕特斯(H. Wesley Perkins and James L. Spates):《镜像:英美国家价值观的三种分析》,《国际社会学比较》,注第 27 期,31—50 页,1986。

注:上表中的分值从 0 到 10。0 表示不重要,10 表示最重要。



混合的记号

虽然世界看上去已变得越来越小,通过文化间的融合和相互交流,人们也越来越相似,但是社会学家们认为应注意到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差别以及由这些差别所造成的误解。

发现这种群体差异的途径之一是研究不同文化中的姿势,特别是用来向他人发出沟通信息形体语言的不同含义。对不同国家之间姿势的不同含义,甚至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间同一身体语言不同理解的研究,充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的姿势是如何传递出丰富多样的信息的。

举例而言,在英国,摸一摸鼻子意味着需要保密或秘密协商:“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千万别告诉别人。”在意大利,摸一摸鼻子则意味着善意的警告:“小心,他们是骗子。”两种含义都提示要警惕,但重点由“我们”转到了敌方的“他们”。

另一个在不同文化间含义区别较大的姿势是“轻抚下颚”。在法国和意大利北部,这是一种侮辱:“滚开。你妨碍我们了。”但在意大利南部,这个动作就失去了侮辱性的含义而仅仅代表着一种否定信息:“不”或“我不知道原因”,或者是“这儿什么都没有”。在国内西亚,这一姿势又回到了侮辱性的意义上了,这也许正反

映了法国殖民者的影响。

在世界范围内，复合意义的姿势（经常是具有相反意义的姿势）很有可能成为许多误解的根源。把食指和大拇指搭在一起形成一个圈，这在美国意味着“好”；在日本代表金钱；在法国代表零或毫无意义的东西；在马耳他意味着男性同性恋；在希腊则是一种猥亵的评论。

甚至那种简单的表示“是”或“否”的姿势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不一定能够被理解。点头表示同意在大部分地方都能够得到认同，包括澳洲的土著人、欧洲人、非洲部落、中国人和日本人。但是不同地方表示肯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一姿势可以表示完全同意（“是的，我会”）、承认（“是的，我在听”）、鼓励（“是的，继续”）、理解（“是的，我明白你意思”）或正确（“是的，那很对”）。摇头表示否定，其程度也是大不相同的，从“我不能够”或“我不愿意”到“我不知道”或“我不同意”。也许是为了使事情更复杂，摇摆脑袋对大部分欧洲人而言意味着“也许是，也许不是”，但对土耳其和部分伊朗人而言则意味着“是”（莫里斯，1977）。

这种文化差异在商业交往中经常体现出来。例如，西方人在与中国的商业伙伴洽谈时经常发现对方所做的在他们看来意味着一笔交易已经完成的姿势，其真实含义常常是谈判可以开始了。中国人点头称是也许仅仅是为了取悦他或她的伙伴，实际上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听懂对方的意思（马洛伊，1989）。

如何避免这种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尽量熟悉外国文化，因为许多潜在的、易引起误解的习惯和价值观已深深地植入了一种文化内，并已被其成员很自然地加以接受了。

2

对美国人价值观的其他分析

尽管罗宾·威廉斯曾经指出，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某些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冲突，但他并没有过多地强调这些冲突，从而把它看作是美国文化的主要要素。他也没有对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足够的讨论。但近年来，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联系已成为其他社会学家们分析的焦点。同时，研究者们还指出，美国人的主要价值观正处在巨变过程中。

帕森斯的观点

塔尔科特·帕森斯（1964，1967）（他的社会理论很强调文化价值的意义）认为美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可称为“工具性能动主义”（instrumental activism）。所谓“能动主义”，帕森斯是指美国人倾向于对周围环境进行控制，而不是佛教徒那样的被动的生活方式。所谓“工具性”，帕森斯是指这样一种事实，即美国社会并不追求一种高层次的或者说是“最终的”目标或价值观，相反，它追求一种非常普通的“改善”或“进步”。美国社会所主张的主要价值观——如效率、经济发展、科学进步及追求知识等——都是为了获得个体或集体的人类幸福的工具。

帕森斯强调指出，美国社会一直受到新教教义的道德和精神传统的强烈影响。新教徒认为人是神的意志的工具，因此，人类应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工作，他们的目的是在现世建立一个上帝的王国，而不是期待来

世。新教徒相信，个人能够而且也有责任把自己的行为引导到这种基本的宗教义务上来。因此，所谓工具性能动主义就阐发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每个成员都能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社会。

批评的观点

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出了对美国文化冲突的尖锐批评（丹尼尔·贝尔，1978）。他指出，主导美国经济的资本主义体制在其发展的不同过程中强调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观。在其早期阶段，资本主义强调独立、工作、成就、节俭和节制，这促成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并使资本家把获得的利润不断地进行再投资，从而积累资本。但是当美国社会由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大规模的资本联合时期时，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持企业的运转，需要支出大量的广告费用以鼓励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这就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享乐、自我表现和自我冲动。

人们不断被劝告要增加消费，要好好消遣，要旅行，喝酒，享受生活，这一切都使美国人发现自己已陷于与原有价值观——艰苦工作、勤俭和谦虚——的剧烈冲突之中。为了获得享受新价值观的手段，人们反而又必须继续遵循旧的价值观。但是，这两种价值观在许多方面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很难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此外，这种明显向贝尔所说的享乐主义——认为个人享乐是最高利益的观点——发展的长期趋势，最终将会威胁到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即时享乐的愿望将会使人们丧失努力工作、节俭的动力。如果贝尔的上述论断是正确的，那么美国文化就已远远背离了新教徒的信仰和实践。

贝尔并不是惟一的一位认为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正在潜移默化地向享乐主义转变的当代社会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其最畅销的著作《自恋主义文化》中指出：长期主导着美国人生活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正在让位于“纯粹的个人专注”，或者说让位于所谓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克里斯托弗·拉什，1979）。甚至我们关于成功的定义也正在从通过艰苦工作和推迟享受以求得自我实现，变成直接追求报酬和满足的自我实现。

作为这种不断增长的自我专注的结果，自我实现的流行观念，如健康食品、强调个人舒适和学会沟通等正成为一种时尚。拉什把这种价值观的变化视为一种个性失调，称之为“自恋主义心态”，或者说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反过来，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增长是和我们社会的更大变化直接相关的，特别是与我们大多数人在其中工作的大型官僚体制的兴起密切相关。现代社会中官僚体制的巨大规模，使人们对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这么一个已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是否依然能发挥作用而产生怀疑。同时，具有自恋主义心态的人们则发现他们操纵他人的能力可使他们在这个共同世界中走向成功。

最近，由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领导的研究小组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对美国人价值观的广泛批评。在一本名为《心灵的习性》（1986）的书中，贝拉和他的同事们同意贝尔和拉什关于自我实现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价值观的观点。贝拉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自我实现是个人主义的现代发展形式，而后者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中心观念。在他们看来，这种当代形式的

个人主义的问题是，人们已越来越对社会的集体目标缺乏关心，并退回到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去了。他们认为，在美国早期历史中，这种与个人主义与生俱存的自我中心主义受到了人们与家庭、教会及当地社会较强联系的制约。然而，随着这些社会机体的日益衰弱，人们越来越把公共关怀（如照顾穷人）放在一边，而这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生存而言是必需的。

在上述对美国文化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贝拉和他的同事们在《美好社会》一书中强调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该书认为强有力的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们能压制人们自私的冲动，并促进公共利益。作者还详尽描述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制度弱化的结果：家庭、商业组织和国家都陷入了债务的泥潭中；贫困、无家可归和污染持续恶化；美国的儿童也处于困境中；自然资源难以更新。他们强调认为，只有为我们的社会负更大的责任，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

美国人是什么样的呢？

对外国留学生而言美国人是什么样的呢？为了使他们能对在美国的生活作好准备，美国信息机构出版了一本指南性手册，意在为外国留学生及准备在美国进行研究的学者们提供帮助。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美国公民经常称自己为“美洲人”，但其他的“美洲人”，如墨西哥人、中美洲和南美洲人则认为把“美洲人”这个词与“美国人”等同起来是不合适的。然而，在美国仅 200 年的简短历史中，美国人一直用“美洲人”这个词来称呼自己，而且你现在还会经常听到这种用法。

美国人非常随便。他们穿得很随便，玩得很随便，对待其他人也用一种很随便的方式，即使他们之间在年龄或社会地位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外国留学生可能会认为这种随便是对他人的一种不尊重，甚至会认为这是一种粗鲁的行为，但这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美国人通常是很富有竞争性的。美国人和朋友开玩笑的方式、玩填字游戏和机智问答，这些都反映了美国人崇尚竞争的一面。虽然这类行为对美国人而言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但也许你会发现这有点让人觉得不舒服。

美国人是典型的成就主义者。他们热衷于体育竞赛记录，他们在办公室里挂满商业成绩图表，他们在家摆满了体育比赛的奖杯。

美国人爱问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在你看来可能是毫无意义的、过于随便的或者是琐碎的。也许一个你刚认识的人会向你提出一个十分私人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无礼的问题或行为是故意的；他们确实是出于兴趣。

美国人十分注重守时。他们根据日程安排而生活。对外国留学生而言，美国人通常是忙忙碌碌的，这使他们有时会显得很粗鲁。美国人一般都效率很高，这是通过四处奔忙而做到的。

美国人往往会对沉默觉得很紧张。在会谈中，他们更愿意谈论天气而不是默默地坐着。



民意测验的观点

贝尔所发现的美国文化中日益增长的享乐主义与拉什所看到的正在出现

的自恋主义倾向显然是相互联系的，两者都和贝拉所说的新个人主义有关。但是，这些分析都只能说是针对特殊情况的，是建立在个人观察和推理的基础上的。即使是对贝拉小组而言，他们的结论也仅仅是建立在对几百个美国人观察的基础上的。作为这些论断赖以存在基础的数据本身的脆弱性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民意测验所反映出来的美国人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他们的观点？

在对从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后期美国人价值观变化进行的测量中，民意测验专家丹尼尔·扬克罗维奇发现了他所提出的美国价值观正在进行“文化革命”的依据（丹尼尔·扬克罗维奇，1981）。他把这场革命视为一种由我们的新教徒先辈的“自我克制”观念向自我实现伦理的转变。他所引用的部分论据是，他在研究中发现相信“勤劳致富”的美国人的数目从 58% 下降到 42%，或者说还不到美国人口的半数，而 80% 以上的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已认同了自我实现的观念。但是，他保持了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这种变化已得到了扭转，并相信美国人正在变得更少一些自我中心主义，而且正在向责任伦理转变。

不论美国人是否真的愿意向责任伦理转变，他们显然正在变得更为愤世嫉俗，也日益从对公众社会的幻想中醒悟过来。通过对美国人观念在 6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期间变化的研究，研究者发现了日益增长的超然态度和对美国社会信任程度的减弱（哈里斯，1987；黑斯廷斯等，1991）。例如，对医生的信任程度由 73% 下降到 30%；对商业领袖的信任程度由 55% 下降到 16%；对联邦政府技术部门的信任程度由 41% 下降到 17%；对工会领袖的信任程度（从来都没有达到过较高水平）由 22% 下降到 10%（参见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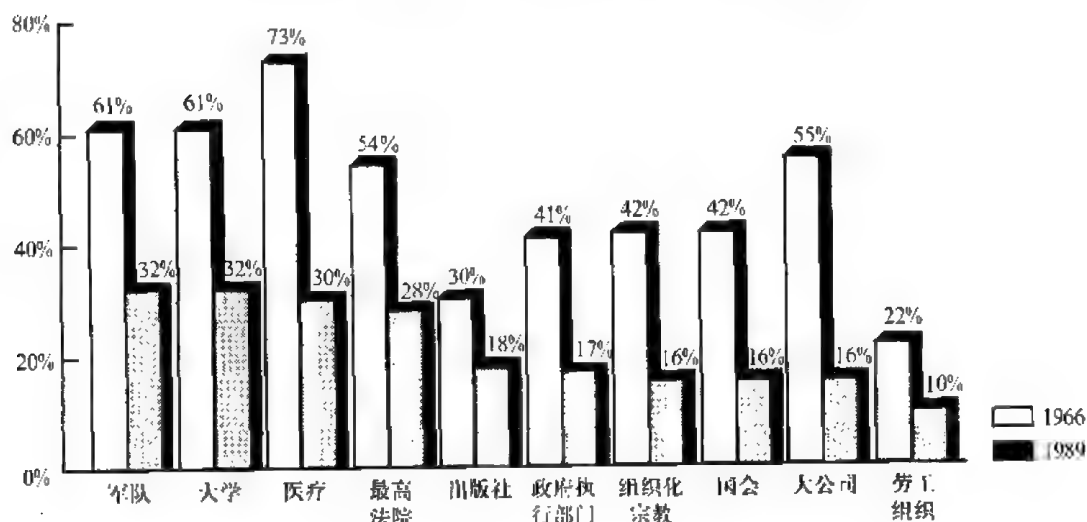


图 3—1 对美国机构的信任程度（1966—1989）

资料来源：路易斯·哈里斯：《美国内部》（Inside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

一种新的文化转变？

在最近的一篇向布鲁科林斯研究所提交的报告中，丹尼尔·扬克罗维奇

(1994) 为他的乐观观点提出了一个新的依据,认为我们正处在向一种新文化转变的边缘——如果说不是要回到传统价值观,至少也可以说是背离了最近几十年的激进个人主义倾向。这一新趋势得到了大众媒介的鼓吹,他们持续报道美国人正变得日益“家庭中心主义”,且不热衷于“物质主义”。如果这一变化确实已在发生,则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在相对表面的层次上,这一变化可能和二战后及 60 年代期间美国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那一代人已逐渐成人有关,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因此正在严重影响美国人的文化模式。过去几十年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发展可能和这一代人还是青少年、大学生或未婚人员这一事实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还未受到工作、家庭这一现实的束缚。进入 90 年代以来,这一代人中的大部分已开始安定下来,参加了工作,组织了家庭,并已生儿育女,这就促使他们转向一种更偏向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扬克罗维奇提出了另一种较为可信的解释,认为这一变化更多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是人口代际变化。在他看来,推动文化变迁的动力是经济发展的程度,这一变化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在美国,这一阶段发生于高度繁荣的 50 年代),富裕经济是一个新事物,人们并不指望它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他们倾向于坚持诸如家庭稳定、努力工作和自我牺牲的价值观。在第二阶段(在美国,这一阶段发生于 6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人们已开始习惯了繁荣,而且认为这种繁荣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根据这一看法,在这一阶段人们更倾向于个人选择而不是社会契约。“他们和他们的国家现在可以随意消费,根本不用顾虑明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任意挥霍,以弥补逝去的时光”。在第三阶段,一种对繁荣可能已失去的恐惧产生了。人们认为他们可能由于个人原因而丧失许多机会,从而又必需依赖别人。由此,他们开始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背离个人主义,转而强调社会联系。

由于日益增长的经济问题,美国显然已开始进入第三阶段。扬克罗维奇这样写道:“美国人正在降低他们的期望值,以使自己逐步适应在他们看来是困难变大、开放程度降低、公平度下降、压力更大的经济环境”。然而,到底这一变化能走多远,是否会导致美国社会制度的全面革新,这还将拭目以待。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所共有的产品,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和物质对象等。文化中无形的这一部分——信仰系统、互动模式、政治程序等——构成了非物质文化。文化中物质部分——机器、工具、书籍及其他——构成了物质文化。人们通过社会互动学习社会文化。社会取决于同一文化中互动的人们;文化是互动的结果。人类社会和文化不能独立存在;文化是通

过人类互动而产生的；但是人类互动只能在文化的范畴内确定其具体形式。

2. 动物主要依赖于本能而不是文化，本能是动物所固有的复杂的遗传性行为模式。人类受本能的影响相对较弱，但和其他高等动物一样，人类也具有生理冲动。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如大猩猩）都有某种形式的社会。

3. 人类文化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大约三百万年前，它包括简单的工具。关键的社会适应性变化大约发生在其后的两百万年间，这其中包括家庭和集体狩猎的发展。文化使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程度比仅依靠生物进化加快了许多。

大约在四万年前，人类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他们开始穿起衣服，建造房屋。大约一万年前，农业的出现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约5000年前出现了国家。18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为我们的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开启了一轮新的巨变。

4. 人类依靠符号，特别是语言——最复杂的符号系统——来创造、学习和交换其文化。符号是某一群体所认可的具有其自身以外的象征意义的任何东西。人们使用符号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理解。语言指人类所使用的口头和书面的言说方式，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并反映了言说者的文化。根据萨皮尔-沃夫假设，一种语言决定且限制着言说者认识现实的方式。价值观是一种由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关于好与坏、对与错、值得追求和不值得追求的观念。价值观既决定着人类行为，也为人类行为所形塑。

5. 规范是一种确定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应如何行动、思想和感受的准则和标准。规范比价值观更具体，更受条件限制。约束力相对较弱的规范叫民俗。民俗是指不被认为具有道德重要性且不具有严格约束力的社会习惯。约束力较强、要求严格遵守的，反映了一个社会系统核心道德观的规范叫民德。法律也是一种规范，通常属于民德的范畴，是由国家颁布的用来管理人们行为的规范。一个社会要想正常运转，就必须有实施其规范的手段。这就需要通过使用约制——包括奖励（正向约制）和惩罚（负向约制）——来鼓励和强化对社会规范的遵守。

6. 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反映了其技术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的可得性及其社会需求。同一种物质的意义在不同文化间是不一样的。

7.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运用了多种方法来分析文化，包括功能主义方法、冲突论方法和生态分析法。

功能主义者把文化视为一个大系统，其中的不同要素因履行不同的重要功能而存在。这一理论试图探讨一个特定的文化特征在整个系统中的功能。从冲突理论的视角来看，不同文化特征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或促进某一群体的利益。这一理论视角最重要的概念是意识形态，即一系列与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利益相关的、且有助于维护此类利益的文化信念。文化生态论者认为文化特性是资源或社会环境局限性的产物。

8. 因为每种独立的文化都要适应一种特定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因此世界上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所有的文化都具有相同的基本信仰和习惯，即所谓文化共性，这是由于每个社会都面临着一些同样的问题，在解决

这些问题时也面临着同样的物质限制性。

9. 社会科学家们试图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即认为本土文化高于其他文化,并试图用自己的规范去评价其他社会的倾向。文化分析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每个文化都应用其自身的观念体系加以评判,这一原则被称为文化相对性。

10. 当一个社会中某一群体的生活方式既包括主流文化的特征,又包括某些独有的不为其他群体所共有的文化特性时,这种群体文化就叫做亚文化。直接挑战主文化的价值观、信仰、理想、制度和其他方面的亚文化,我们称之为反文化。

11. 文化要素间在不同程度上是一致的。当文化要素间在逻辑上相互一致时,我们就说存在一个较高层次的文化整合。文化变迁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革新和文化传播是文化变迁的两个重要手段。

12. 虽然美国社会具有多种多样的文化,某些基本的价值观模式还是存在的。这些价值观包括个人成就、勤奋工作、道德关怀、人道主义、注重效率、实用主义、强调进步和物质增长、平等、自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

13. 塔尔科特·帕森斯把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称为工具性能动主义,意思是美国社会更倾向于一般意义上的改善和进步,而不关心任何高层次的目标或终极目标。丹尼尔·贝尔在 70 年代对美国社会的批评中看到了传统价值观和享乐主义的根本冲突。社会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则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在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纯粹的个人专注”正在占据统治地位。自恋主义个性正日益变得更为普遍。罗伯特·贝拉和他的同事们则把个人实现视为个人主义的现代发展形式,并认为人们正在把必要的社会关怀放在一边,而专注于自我实现。民意测验的结果证明了美国价值观中正在发生一种“文化革命”。最近,丹尼尔·杨克罗维奇认为由于经济的衰退,美国人的价值观正在背离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

推荐阅读书目

1. 贝尔 (Bell, Daniel), 1978.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在一系列论文中,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正在播种自我灭亡的种子。通过对追求个人满足的鼓励,它正在摧毁合理性和工作伦理。

2. 贝拉 (Bellah, Robert N.), 理查德 (Richard Madsen), 威廉 (William M. Sullivan), 斯威德勒 (Ann Swidler) 和蒂普顿 (Steven M. Tipton), 1986. 《心灵的心性: 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承诺》(*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1st Perennial Library ed.) 一些社会学家发现个人主义正在美国滋

长，其代价是对社会和公共生活关心的丧失。

3. 哈里斯 (Harris, Marvin), 1985. 《美食：食物之迷与文化》 (*Good to Eat: Riddles of Food and Cul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严肃话题的有趣的书：世界各地饮食习惯的区别和各地生态环境及资源的限制是密切相关的。

4. 亨特 (Hunter, James Davison), 1991. 《文化战争：为神圣美利坚而斗争》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iv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该书论述了在文化保守主义者或道德传统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或文化进步主义者之间正在滋长的决定美国文化的一场冲突。

5. 克菲阿特 (Kephart, William M.), 1993. 《异常群体：对非常规生活方式的一种考察》 (*Extraordinary Groups: An Examination of Unconventional Life - Styles*, 5th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该书对美国影响广泛的多种亚文化进行了认真的调查。

6. 拉什 (Lasch, Christopher), 1979. 《自恋主义文化》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 Warner Books.) 拉什认为美国人在变得日益自我中心主义，自恋主义个性正占据主导地位。

社会与社会结构

在威廉·戈（William Golding）的著名小说《飞行之神》里，二战中一架载着一群6至16岁男孩的飞机被击落了。飞机坠落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岛屿上，幸存下来的是这群既无领袖又没有什么组织的孩子们。但不久，在这群男孩中便出现了一些为我们所熟知的社会特征。

坠机后不久，一个个头高大、相貌英俊、年龄较大、名叫拉尔夫的男孩对众人说：“看来我们得有一个‘头儿’来决定一些事情。”“这应让我来承担”，拉尔夫的话音刚落，杰克，一名竞争者便宣称道：“但我是唱诗班的领唱。”最终每个人都同意应由大家投票决定谁来当大家的“头儿”，拉尔夫得以胜出。他随即对杰克委以重任：“杰克，你是唱诗班的负责人，那么你认为你们能为大家做点什么呢？”杰克回答道：“狩猎。我们能够猎杀野猪来充当食物。”而另外的一些六岁左右的小男孩则被组建成一个小组。他们过着“与大孩子们截然不同的生活，也很少去干扰大孩子们，充满激情的团队生活与他们身心交融”。

当火种有熄灭的危险时，进一步的秩序就成为了必要。拉尔夫提出：“我们应该制定出更多的规则。”杰克对此表示赞同：“我们的确需要制定出规则并贯彻它们，我们毕竟不是野蛮人，我们是英国人……”，他宣布：“我将把猎人们，也就是唱诗班分为几个小组，我们有责任使火种延续下去。”后来，孩子们的脑海中滋生出了对怪物的想象，于是，害怕、妄想和恐慌便进入了他们的世界。当拉尔夫再次提及秩序的重要性时，杰克则大叫着回敬

道：“去你的规则！我们才是强大的，是我们在为大家捕猎！”于是孩子们分裂成了交战的双方。幸运的是，在完全消灭对方之前，大人们找到了这群孩子。

威廉·戈的小说富有想象力地描绘了一个小规模社会的形成。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劳动分工和社会结构（形塑人们交往方式的规则和群体模式）分化的兴起。最后，我们目睹了这一社会结构瓦解后产生的混乱与战争状态。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对社会的性质和人类社会做一个介绍。我们将讨论社会结构的概念，阐释“身份”和“角色”之间的差别。我们还将论及构成社会内部结构的主要单位、社会的类型，以及功能主义和冲突论对社会性质的不同理论视角。



社会结构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承认：除了组成社会的人以外，社会还有其自身的存在。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身份与角色、群体与组织、社会设置与社区得以产生。这些概念被看成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社会的局部，而不是属于个别人的。它们在个人的眼中是作为外在之物而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有时还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在许多方面迫使我们去修正我们的行为。

在社会学中这些自发产生的概念合起来指的就是“社会结构”。结构这一术语是指某一整体中的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方式。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就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

我们趋向于把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当我们将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于对日常惯例的思考时，就会轻易地发现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我们的学校或雇主限定了我们应该怎样来安排日常到达和离开的钟点，起床和睡觉的时间。我们的父母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使我们树立了获取好的学习成绩和学术成就的目标。此外，学校和雇主还为我们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制定了许许多多的行为准则。

在时光的流逝中，社会结构尽管会有一些微小的改动，而且促使它发生转变的一些压力也的确存在，但社会结构仍能够保持其相对的稳定性。让我们以一所中学为例，每到秋季开学时，学生的构成就会经历一次变化；一些人学成毕业离开母校，但学校又迎来了一批新生。在这个校园内的每一天，我们或许观察到的是一个或多或少有所不同的学生群体：一位新生从外校转学到了这里；某位学生中途放弃了学业找了一份工作；而有的学生则可能因为生病而只好呆在家里。在每个礼拜，校长办公室都会将一些新的规定传达下来。每一学年，课程表都在更新。但任何人都不会否定像乔治华盛顿中学这类的学校拥有一些悠久而稳定、本质上未曾变更的结构性的特征。每个人都可以自信地判断说“这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一间杂货店”，或者说“校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历年如此”。换句话说：虽然校园中的人员、规

章制度与课程在不断经历着变化，学校本身所具有的一般性社会特征仍是十分固定的。

一所学校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性质便是它的社会结构。学生和老师大致都明白应当如何与群体中的其他人打交道。因为他们各自知道学生、教师、管理人员及其他职员的责任所在。今日的学校与往昔相似之处就是因为这一群体内的成员总是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被组织起来。

尽管有这些稳定特征，但也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是人人循规蹈矩，事事平稳运行之所。校园中有的规章制度可能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即使并非如此，对组织规则的偶尔逾越也是每个组织所内在的、让人不感意外的事情。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一个学校的社会结构是不牢固的。事实上，行为上的一些变化，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在模式化和可预见性方面与遵守规则的行为并无二致。例如，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之下，学生是可以被允许缺课的。如果他们的理由充足或者是他们的老师正好心情不错的话，有时他们还可以晚交家庭作业。

学校的例子还能被用来说明社会结构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试想一下，如若当学生、老师和管理人员们每日清晨来到校园后，不存在一种有秩序的、模式化的相互联系的方式在发生作用，那么将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人们需要经过冗长乏味的尝试来发现哪位教师适合教授哪门课程，哪些学生希望学习哪些科目，各门课程又应如何来讲授。一旦有某个学生生病或某位教师辞职或有新的成员加入这个群体时，上述的整个过程又必须重新再经历一次。很显然，除了需要社会结构外，学生什么也学不到！

社会结构还使我们能够以适度的效率来完成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事务。它使我们避免了在行动前对成百上千种琐碎的可选项进行选择的麻烦，从而保持了群体和社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当然，同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一样，社会结构也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它一方面促使有效率的人类活动成为可能，同时也能限制个人的自由。居住在封闭小镇上的人们也许会有特别强烈的受限制感。在以强制性的社会气候为特征的极权主义社会里，这种桎梏感更加强烈。然而我们所有人不管身在何处，曾经都体验到了社会结构的这种强制力。我们的父母、上司，或是警察们的一些做法，时常让我们感到了一种限制性的压力。如果这些限制过于严厉，就会产生某种要求改变社会结构的压力。种种企图改变社会结构的尝试可以小到规则上的细枝末节的修改，大到可能发动一场激烈的社会革命。

社会结构的单位

俱乐部、家庭、教堂、学校、政府这些普通的团体都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学研究主题中的核心要素。但当社会学家分析社会

结构时，他们不能只运用日常语言。他们必须借助一套定义清晰的术语才能精细地勾勒出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图示”。社会是如此的复杂，因而这件工作就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了。事实上，社会科学家从未在用来描述社会结构的概念和术语方面完全达成一致。

在这一节里，我们所借用的已经简化的概念框架来自于一些社会学家的著述。我们将要展示的社会结构的单位是以序列的方式出现的，首先从与个人最接近的概念开始，直到论及社会和社会的世界体系这一最抽象、离个人最远的单位为止。在此处简要叙述的一些社会结构单位，我们将在本书的稍后用整章的篇幅加以论述。

1 地 位

身份和角色的概念在社会结构分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地位(status)指的是在某一群体或社会中某一确定的社会位置。例如，女性、黑人、律师或父亲，都可以用来当作地位的例子。列举所有可能的地位似乎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情，而我们熟知的大多都与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教育、种族、宗教信仰和职业等相关。

有两种主要的地位类型。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作为个人努力与否的结果而获得的地位被称为自致地位(achieved status)。现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职业，从企业管理人员、医生到擦鞋匠、垃圾工，都是自致地位。其他的一些例子还包括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大学毕业或是小学辍学)，所属教派以及社会阶级地位。一些家庭内的地位，包括为人父母和配偶，也是自致性的。如果某人愿意的话，他(她)的自致地位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被改变的。

某人所拥有的被指定的、并且通常不能被改变的社会地位被定义为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包括种族、民族、年龄、性别和某些家庭内的地位，例如，作为长子或者是作为一个孙女的地位。先赋地位一般以出生为基础，孩子们继承了父亲或母亲的社会地位。先赋地位还能以一个人出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为基础。我们可以设想出四胞胎的出生这一例子来考察一下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一事件给这些四胞胎婴儿带来了名声和一定的声望，仅仅因为他们作为四胞胎而出生，他们还获得了一些现金方式的赠礼。

绝大多数的地位可以在责任、权力和声望等方面与其他地位相比较，而被划分到某一等级。例如，一些职业相对于其他职业能给人带来更高的声望(和报酬)(第九章表9—2列出了当代美国社会一些重要的职业地位的相对声望等级)。同样，军队中从最高层的将军到最低的士兵按照地位被划分等级，中学里也从新生到像神一般被崇拜的高年级学生依次划分了等级。实际上，用日常话语来表达“地位”的含义，就像我们用“真有派!”来感叹那些驾驶着“宝马”车的人一样。然而，社会学家把地位的等级仅仅看作是次要重要的问题，在许多场合中，他们用地位一词来指涉社会中在与其他位置相比较时并不必分出等级差别的某个位置。

很显然，每个人会拥有多重地位，而一个人同时拥有的不同地位则常常能够揭示出关于某一社会结构的大量信息。例如在美国，男性律师的比例要

高于女性律师，黑人青年的失业率要高于白人青年的失业率。此外，拥有某种地位还会有利于获得其他的一些身份。例如，一家银行的总裁能够应邀担任“联合道路”（United Way）的主席、博物馆的董事以及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这些都是因为他（她）的职业地位处于很高等级的缘故。

由于大多数人都拥有许多或高或低的地位，因此当涉及到一个人总的社会地位时，尤其是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时，就遇到了难题。休斯（Everett Hughes）曾指出，社会用来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承认某种地位比其他地位更为重要。休斯把用来决定某人总的社会地位的那个关键性的地位叫做首要地位（休斯，1945）。对我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年人而言，职业通常是人们的首要身份。但是某一先赋地位，例如残疾、惊人的美貌或是继承的万贯家产，仍然可以成为首要身份。我们可以设想出一位职业“低下”、但又腰缠万贯的富翁。再如，当一名来自于肯尼迪家族的年轻女子成为社会工作者时，她仍旧载负着作为一名富人的较高的首要地位。对于欧洲的贵族，家庭背景就是一种首要地位。一位穷困潦倒的王子获得的仍是王子的声望，而非贫民。

2

角 色

角色（role）是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按照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 1936）的说法，一个人占有的是地位，而扮演的是角色。在每一次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互动中，社会都为其提供了一个“剧本”，用以指导分配给不同社会成员的不同角色的扮演。角色的学习就是要领会某一特定身份被期待的或是必需的行为，换言之，即把握好对具有某种身份的人的“规范”。在《漂亮女人》（My Fair Lady）中，艾丽莎（Eliza Doolittle）直到在亨利（Henry Higgins）对她进行了一番作为一位女公爵的行为训练之后，才开始能够扮演女公爵的角色。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学会扮演与我们的身份相适应的角色。

某个身份可能伴随着一些相关的角色。例如，英语教师们被期待着给他们的学生讲授莎士比亚。而他们可能还需要与望子成龙的家长们面谈，为学生们的戏剧协会提出某些建议，为图书馆订购图书，在教师会议上汇报情况，以及参加专题讨论会等等。这些角色与师生关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们都是对任何拥有英语教师这一身份的个人的角色期待。这些与某一种身份相联系的角色集合就叫做一个角色集（默顿，1968）。

对于某个新出现的身份来说，一些与之相匹配的角色就需要设计出来。在美国社会中，单亲父母和妇女实业家的身份是相对较新的。与这些身份相关的角色正通过目前拥有这些身份的人们的行动在逐渐地被加以定义。那些被证明为最成功的、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规范迟早会成为一种标准。因此，对于刚刚拥有某种身份的新人而言，最好从一开始就去领会对自己的种种期待。

此外，角色也有被重新定义的时候（特纳，1990）。例如，长期以来寡妇都被认为应该离群索居。而现在她们更愿意尽可能多地保持丈夫去世前的

各种活动方式。再如一些退了休的工人现在也有机会放弃清闲的生活，开始新的职业生涯。这些变化得以产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今天的人们越来越长寿，我们社会中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也在推动着社会的变迁。他们不愿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而希望仍能充当活跃的角色（关于这一话题我们在第十二章里将有更详细的说明）。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赋予某种角色的规范与角色扮演者的实际表现常常存在着差距。换言之，即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与角色表现（role performance）之间不相匹配。前者是指社会对角色扮演方式的定义，而后者是指某人实际扮演某一角色的方式。这两者之间差距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尚未完全领会他们的角色，也可能因为个人的原因而拒绝按照他人对角色的期待去扮演。一项针对急救医务人员的研究表明：医务护理人员们常常出于“应该为生命垂危者做点什么”的愿望，做一些超越了他们职能范围的事情（帕尔默和冈苏林，1990）。他们偶尔会在对药物的处理上或者是在为危在旦夕的病人选择医院时不顾正式的规定而作出自己的决策。角色期待与角色表现存在差距的原因之二则有可能是对角色的期待不清晰，尤其是在对待那些新近出现的角色时。然而即使人们并未严格按照所期待的那样去扮演角色，他们仍还会被认为是扮演着那些角色。

身份和角色这两个术语是用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十分有用的概念工具。试想如果我们希望分析一下在本章开头提及的那所中学的结构的话，我们首先将确定那所学校中所包括的所有角色：学生、教师、秘书、护士、校长、自助餐馆的工人等等。接下来我们就应该找出拥有某种身份的个人被期待着应怎样与其他人建立关系。由此我们所揭示出的这一组织化了的身份和角色网络便是这所学校的社会结构。

角色冲突与角色紧张

在每一天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都扮演着许多不同的角色。每个人都可能具有两个或更多的角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两种或更多的身份。当来自于这些角色与身份的要求出现对立时，置身于其中的个人就处于了一种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的状态。比如，许多妇女既希望能有自己的事业，又想能照顾自己的孩子。与女实业家和母亲这两种身份相联系的角色要求常常就会发生冲突，因此妇女们就需要在二者之间作出一个妥协。当孩子尚幼时她们会暂且放弃自己的事业，或借助于日托中心，或者与丈夫一道分担养育的责任。角色冲突常常带给人一种被来自于不同方向的力量同时牵引的感觉。另一个例子也能使人处于角色冲突的困境之中，那就是当自己的孩子就在自己执教的运动队当一名队员时，以父亲为身份的角色期待与以教练为身份的角色期待常常也会发生冲突。

有时，相互对立的要求被置于同一角色之中，由这种情形而导致的个人压力就称之为角色紧张（role strain）（占德，1960）。例如，要想作为一位成功的军官，他必须对下属们关爱有加且充分信任，因为有时他可能需要下属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战斗。而与此同时，军官的权威也需要迅速而不容置疑地被服从。前一个军官角色要求军官的言行要和蔼、有人情味，而后者又要

求其行为要显得严厉而强硬。与此类似,医生既要有一名癌症患者表示同情,同时又要保持其客观性。作为牧师,即使聆听了一名刚犯下罪行的人的忏悔,也被期望着应该保护他人的隐私。在这些例子中,角色的扮演往往导致了个人的紧张和忧虑。

角色与自我认同

人们怎样来处理那些与他们的价值观或自我形象相冲突的角色期待呢?他们可能会试图通过调整角色来解决这一难题,使他们的日常行为能够符合角色的要求。他们也可能尝试着放弃这一角色。或许确立起如戈夫曼(1986)所称做的“角色距离”(role distance),使自己远离角色的要求,做做表面文章。用这种方式行事就像是在向众人宣告:“我做这事儿仅仅是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其实我才不信这一套呢!”如果上述解决冲突的方案都不可行,一个更具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自己一分为二,并告诉自己“我在此处是这种人,在别处又可以是那一种人”。然而这种行动方针可能会引发心理上的问题。

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认同。我们很容易回想起某人在承担了新的角色后判若两人的例子。例如,一位学医的学生在成为医生之后通常表现出让人信任的态度和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些特点并非是医科文凭所附加带来的魔力所致,而是因为要扮演医生的角色促使了这些特点滋长。事实上,一位医生要想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具备这些性质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偶尔也会为了使自己与主要的生活角色更加相配,而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自我形象。有时因为改变的程度如此剧烈,使得他们在角色行为的表现中几乎丧失了自我。这种情形被拉尔夫·特纳(1978)称为“个人与角色的混同”(person-role merger)。特纳认为,当一个人在扮演许多角色时,如果他很难将这些角色区别开来,这种情况就尤其容易发生。我们都知道,即使是那些我们认为有能力将个人本身与他们的职业角色区分开来的警官、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们,在远离工作时也需要不时提醒自己。同样,一些人则常常与他们的性别或年龄角色混同起来,使得他们总是以妻子或老年人的方式出现,而不管这些角色与他们身处其中的互动情景是否贴切。

3

社会群体和组织

角色和身份是社会群体和组织最典型的组成要素。社会学家和非社会学家对社会群体这一术语的用法很相似,都是指各类人群联合体。以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用法来讲,一个群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共同认同和团结感的人所组成的人的集合,群体内的成员相互作用和影响,共享着特定的目标和期望。当然,所有的群体都有一个社会结构。但是它们既可以像排队等候的购物者那样松散,也可以像每一成员都有特定任务的野战排那样结构严密。

每个群体也可以被叫做一个社会系统。把群体称做功能主义者尤其爱用的社会系统,是为了强调它们同样具有所有系统所具备的一些基本结构特

征。汽车发动机、工厂、人体和太阳系之所以都被称做系统，是因为它们各自都是由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为整体做出贡献，而整体又大于部分之和。当系统中的某一要素发生变化时，系统中的所有其他要素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

在我们的定义中，群体是一个非常宽泛、一般性的术语。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不同群体的不同演变方式。例如，群体之间在规模和延续时间上有着较大差异：罗马天主教会已经存在了十几个世纪，而一个偶遇群体也许仅能持续一个周末。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考察对社会学家而言尤其重要的有关群体的三个不太明显的特征：群体的结构水平、群体的亲密程度以及群体与社会不平等和人类差异的关系。

群体中的结构水平

某些人类集体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并非是群体，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具有社会结构。例如，那些仅仅是共同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人们：比如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男人或女人，高中毕业生或大学毕业生等等。社会学家把这些集体叫做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ies）。社会类属中的成员并不一定要相互交往、彼此认识、共享某种社会结构，或者说有某种共同之处，但不具有共享特征。

尽管社会类属是非结构化的，但是同属于某一类别则有可能在成员中激发起共同的兴趣和目标，从而导致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群体的形成。例如，一些女权主义者群体就是由“女性”这一类属而引发的共享共同经历和观点的群体。

另一类也不被社会学家当作真正的群体的集体就是集合（aggregate），它是指在某个特定场合中面对面相处的人群，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互动，也缺乏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例如，那些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的乘客和在牙医门诊休息室等候的患者。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集合人群中仍然有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存在。例如，在公共汽车上就存在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分配座位的方式——先来先上，此外残疾人、老年人和孕妇也可以得到特殊的关照。尽管如此，集合中的人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互动，也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团结和普遍认同，更没有任何共同的目标和期望。

值得一提的是，与社会类属一样，如果集合中的成员因某种原因而开始发生互动，社会结构就可能由此而发展起来，一个真正的社会群体就可能得以产生。不论是电梯上的某人心脏病突发还是公共汽车上的人们合力去帮助一位发病者，这样的集合都可能转变为一个群体。

除了集合以外，还有一些结构松散、比社会学家通常所指的社会群体等集合性实体更具自发性和临时性的集群。例如，在火灾中聚到一块的人群，大学校园中的抗议集会，城市中发生在少数民族聚集区的骚动。此类集群中所发生的行动被称为“集合行为”（这是第二十一章中的主题）。

每一个现代社会中都有成千上万个比集合行为中的集群更稳定的小型且组织松散的群体。例如家庭、朋友圈、讨论组和各种委员会。一些社会学家倾向于只有在提及这种小而稳定、面对面的集群时才使用“群体”这一概念

(关于小社会群体的论述参见第七章)。

一些规模较大且更具结构化的群体被称组织,即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标而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群体。组织的实例包括商业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组织中通常有对工作和权力的精细划分,还有对每一个成员的角色和身份的精确定义。因此,组织中的行为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具有高度的模式化特征(关于组织的讨论参见第七章)。

群体内的亲密程度

另一种给群体分类的常用的方法就是按照其内部的亲密程度来划分。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是一种规模较小又非专业化的群体。他们中的成员在交往时既直率又亲密。我们最熟悉的初级群体就是家庭。其他的例子有一起玩耍的伙伴、少年团伙和长期相处的同事等。

相比之下,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指的是成员之间以一种有限的、非个人方式交往的规模更大、更具专业化的群体。最常见的次级群体就是我们刚才提及的组织。初级群体存在于作为次级群体的组织之中(公司中相邀一起共进午餐的同事、学校中的少年团伙等等)。然而为了达到其组织目标,一个组织往往要求其成员要将个人的风格和偏好先放在一边(在第七章中有对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更详细的介绍)。

群体中的不平等与差异

在每一个已知的人类社会中,人们都倾向于根据财富、权力和声望将人们及其社会地位排出等级。这种排序被社会学家们称之为“社会分层”(这是第九章的主题内容)。社会的等级化能够产生出非常牢固的社会群体。例如印度的种姓群体(caste groups)就是已知人类社会最严格、高度结构化的社会群体。一些社会学家也将美国的种族关系看成是种姓制的一种形式。各个种姓的成员资格由父母传至他们的子女,并且终身不变。

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地位是建立在社会等级制(social estates)这种群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之上的。三种主要的社会等级分别是贵族、教士和农民。在有些场合,社会等级被称为“被冲淡了的种姓制”(diluted castes),因为等级制里的成员资格较之种姓制要松散一些。

随着中世纪等级制度的衰落和市镇的兴起,社会等级被社会阶级(social classes)的概念所取代。阶级又可以被看成是被冲淡了的社会等级制。社会阶级(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围绕着对工业产品的所有权关系被组织在一起。

另一种较为我们所熟悉的社会集群就是民族群体(ethnic group)。一个民族群体由具有共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相互认同感的人所构成。民族群体这个术语通常指在一个社会中,由另一种文化群体所统治的处于少数地位的民族。这种少数民族(minority group)群体在社会中因具有某种生物的特征而成为歧视和偏见所攻击的对象(关于民族和少数民族群体的论述参见第十一章)。

我们能够真切地观察到行动中的人群、家庭或工作群体，但在社会结构中还存在一些不容易觉察到的重要单位。用于分析这些宏观社会结构的概念可以归入社会学中最抽象的范畴之中。

社会设置

概念之一就是社会设置。社会设置 (social institution) 是指用来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社会结构中相对稳定的一簇要素。例如，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它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就是以社会所赞同的方式来生养后代、教育年轻人。这个任务是由家庭这种社会设置来完成的 (参见第十四章)。家庭这种社会设置包含了家庭群体和家庭角色及身份等特定的社会结构。性行为应发生在夫妻之间，在绝大多数的社会中，这对配偶还应承担起抚养后代的责任。他们被期待着教育他们的孩子以一种为社会接受的方式去行事。

其他一些社会设置则满足了社会其他的基本需求。社会通过教育这种社会设置将文化传递给青年一代，并希望他们能像社会中的其他所有成员一样行为和处事。宗教增强了人们对共享价值观的使命感，促进了社会整合。社会通过经济设置来生产和分配产品和服务，用政治设置来分配权力 (这四种社会设置在第十五章到十八章中从功能主义和冲突论这两种不同理论视角进行了考察)。此外，像体育一类的社会设置则在娱乐和休闲中传递和增强了社会价值观念。

社区、社会和世界体系

社区 (community) 和社会 (society) 是经常被混用的一对术语。当简单地指一群居住在一起并具有共同文化的人的时候，它们是可以互换的。然而社会学家通常依据规模的大小、独立和自足的程度来将二者区分开来。

当一群人集中于个人家庭和工作地点，并且以社会互动的日常模式 (例如与工作、购物和上学等相关的生活模式) 为基础时，我们通常将这种集合叫做社区。村庄、小镇、城市、郊区和现代大都市都可以被看作社区的实例 (第二十章有关于社区的更完整的论述)。

在往昔的一些社会中，例如希腊的城邦，社区与社会是融为一体的 (在今天的一些原始社会中也是如此)。在此类社会中，不存在比当地的人口群更大的社会单位。然而今天，通讯和运输的进步极大地拓宽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本地社区已成为相对狭小的区域，并且它们不可能脱离由更大范围的人所组成的社会而自给自足地存在。

像所有的社会群体一样，社会是有着相互认同、团结感和集体目标的人的集合。不仅如此，社会更是一个包含了广泛的、以地域为基础的、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所有社会设置的社会性集合。这种广泛性正是一个家庭、单一组织或单一本地社区所缺乏的。

在下一节中我们会看到社会可以以多种方式构成。但所有的社会类型都会展现出以下一些特征 (奥尔森, 1968)。

1. 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关系都发生在社会的边界以内。超出社会边界

的行为将受到严格的正规控制。例如与外国的关系就要受到严格管理。一位公民需要有签证或护照才能去国外旅行。

2. 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一个社会要建立起一些社会程序和机制来获取和分配经济的或其他种类的资源。

3. 作出决策和解决争端的最终权威属于整个社会。

4. 社会是其成员效忠和捍卫的最高一级的组织形式。例如,绝大多数愿意服兵役的美国人只愿意加入美军为美国社会服务,而不会愿意加入别的国家的什么军队。

5. 所有社会成员分享着共同的、独特的文化,通常也拥有共同的语言。在美国社会中,人们以“国家独立日”、“好莱坞”、“麦当劳”等作为美国文化的象征,并且都具有个人主义和成就主义等文化价值观念。

由于各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大,社会学家们最近将注意力放在了所谓的世界体系上(沃勒斯坦,1974)。这一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体系将世界上的所有社会联在了一起。我们如果对一个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历史不甚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了解这个社会。与其他的社会系统一样,世界体系也有自己的结构。例如在各社会间就存在着劳动分工和权力等级的分化。一些社会只能供应自然资源,一些社会则主要生产出品。再如一些社会因弱小而依附于他人的羽翼之下,另一些社会则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单位的范围从身份、角色、地位,一直到世界体系。这些单位是社会学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对象。虽然有时候社会结构听起来像处于静止状态,然而并非如此。社会结构的单位(如家庭、学校和社区等)经常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本书的最后一章将涉及到社会学中这一最抽象、最全面的主题: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变迁过程。

社会的类型

所有人类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基本需要:吃饭、睡觉、繁衍后代、生产、学习以及维持一种秩序。然而可以满足这些需要的各种社会形式可谓让人眼花缭乱,只要让我们回想一下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哪些社会类型,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

社会学家们从未在划分社会类型的方式上达成过共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做过尝试,事实上许多经典社会学家都以对社会的划分来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石。这些理论通常与社会的更替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学被确立为一门学科以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早就在创造各种各样的分类框架。

经典社会学家们所提出的一些分类框架常常由于对划分出的社会类型所持有的强烈的价值判断而有所缺陷。例如,在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77)的理论中将所有的社会分成三组:原始社会、

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从根本上是指具有现代西方社会特征的社会，而非西方社会就被理所当然地看作了原始的或野蛮的社会！

类似地，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877）认为所有社会都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的。从文明初始到公元 1300 年为神学阶段，它以明确的、广泛存在的宗教观念为特征。从 1300 年到 1800 年为形而上学阶段，它以较为理性化的生活方式为特征。从 1800 年起人类进入实证主义（科学）阶段，遵循的是科学知识。

即便孔德的理论在当时不啻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进步，然而到今天像这样笼统的分类框架已不再受社会学家们的青睐。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考察以下两种在今天普遍采用的划分社会的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成员如何生存（即他们的生存方式）为基础的分类，另一种是与一个社会的整体社会结构相关的分类方法，即公社的还是社团的社会。

1

社会的生存方式

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衣、食、住等根本需要。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生存需要是因为它们使人类得以生存。许多分类框架就是建立在社会如何被组织起来以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的基础之上的。

最佳的分析框架之一就是下面所介绍的由格尔哈特·伦斯基（Gerhard Lenski）发展出的这种分类。如其所述，最古老也是最简单的社会类型是狩猎和采集社会。这种社会以规模小而分散的人口、游牧的生活方式和原始的技术为特征。家庭在这种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社会几乎没有什么专业化的分工，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足以胜任绝大多数重要的社会和经济角色。人类历史中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曾以狩猎和采集的手段为生。即使是在当今 20 世纪仍有这样的社会存在，例如非洲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中的桑（San）部落以及新几内亚的一些群体。然而随着拥有先进技术手段的人们对他们的领土进行蚕食，这些社会正迅速地被毁灭掉。

当人类社会越发依赖于植物，例如小麦、稻米和其他谷物时，园艺社会（horticultural society）就由此而生了。最早的园艺社会可能出现在 9000 多年前中东地区土地肥沃的两河流域。这些社会中的成员以种植谷物为主，同时也以一些野生植物和动物为辅助性的食物。这些社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永久性社区，其中的一些社区达到了千人左右的规模。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安定，这些社区中的成员制造了许多工具和家庭用品，例如罐子、碟子等。随着园艺种植效率的提高，最终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来生产食物。由于需要一些人来负责分配食物给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便产生了。

而一些社会依赖于捕获、驯服和饲养动物，并以此作为他们最重要的食物来源。这些被称之为游牧社会（pastoral society）的社会类型几乎与园艺社会发端于同一时期。园艺社会的成员倾向于固定居处，仅当土地枯竭时才进行迁徙；而游牧社会为了寻找喂养畜群的草地总是居无定所，过着游牧生活。在今天的非洲和中东地区仍有许多游牧社会存在。

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犁的发明将一些社会带入了农业社会 (agrarian society)。犁可用来控制杂草和保持土地肥沃。这使得农产品的盈余成为可能,并且结束了定期移往新的土地的必要。这些因素反过来也导致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包括人们进一步分化为不平等的社会群体 (一些人耕种,另一些人获取剩余价值),建立起官僚机构以控制日益膨胀的经济,以及第一批城市的兴起。此后,货币经济得以发展,技术上的重大革新得到了推动,那个时期的发明有火药、钟表、风车,尤其重要的是炼铁术的发明。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期间,工业革命引发了另一场重大的社会变迁,从而导致了工业社会 (industry society) 的来临。工业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组织是产品制造业。许多工种开始由机器来承担,城市中的人口愈加稠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大型的政府机构、大型的官僚组织以及更加专业化的社会设置和社会角色。

最后,今天的一些社会科学家提到了后工业社会 (postindustrial society) (贝尔, 1973)。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办公室代替了工厂,计算机取代了机器,同时大都市也将市镇取而代之。与工业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中主要的经济企业是广泛的服务项目的供应者,包括医疗、教育、交通和通讯,以及商业和政府。当今世界大多数经济发达的社会,包括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社会状况,都与这些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描述相吻合。

2

公社社会和 社团社会

也许社会学家用得最多的社会分类框架是按照社会的整体结构将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对这两种社会类型的名称还没有普遍接受的叫法,但在美国社会学界里通常把它们称为公社社会 (communal society) 和社团社会 (associational society) (奇诺伊, 1968)。

与此相关的经典社会学家是德国的费迪南德·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1963)。滕尼斯区分了公社 (德文, Gemeinschaft, 相当于英文中的 community) 和社会 (德文, Gesellschaft, 相当于英文中的 association) 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绝大多数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个人的亲友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后者指的绝大多数社会关系都是正式的、契约化的、非人格化的、专门化的这样一种社会类型。一般而言,在乡村和农场中,人们彼此熟识且交往频繁,这种类型的社区就是公社的典型。现代社会中强调个性和个人隐私的都市生活,则是社会的代表。

在相似的分类框架中,埃米尔·迪尔凯姆 (1893) 区分了建立在机械团结基础上的社会和建立在有机团结基础上的社会。以机械团结 (mechanical solidarity) 为基础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整合是因为社会成员们扮演着非常相似的经济角色,从而共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念。以有机团结 (organic solidarity) 为基础的社会的整合来自于社会中的成员承担着非常专业化的经济角色,从而相互高度依赖。

综合这些观点,我们认为一个公社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1. 劳动分工程度与角色的专门化程度不高。即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几

乎可以胜任所有工作，承担社会中现存的所有角色。虽然在男女老少所承担的角色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以所有的男性青年为例，他们几乎扮演着同样的社会角色。

2. 家庭是社会中最重要社会设置。亲属关系是几乎所有社会组织的基础。社会中有时还存在着比家庭更大的亲属群体，例如氏族、部落等。非亲属集团则相对不重要。

3. 绝大多数的社会关系都是人格化的和持久的。社会交往对参与其中的人具有强烈的情感意义。

4. 社会行为主要由习俗和传统来加以规范。就像某部小说中的一个生活在俄国小村庄的人物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知道他向他的邻居期待些什么，以及上帝向他期待些什么。”（萨缪尔，1943）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77）在一封信中提及了她在田野工作中所捕捉到的公社社会的精神。她这样描述了阿德米那尔提（Admiralty）群岛上的一个村庄：

深夜里你静坐在此处，三四百人在你的周围安睡着，整个村庄一片寂静。真不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即将出生的婴儿是否会夭折或残废？母亲会不会不明不白地死去？母亲的去世会引发一场指责和保护吗？大人物是否将会死去？一场争吵能否将整个村落的分裂？一个小孩将会溺水而死，或是一艘独木船将在海上破裂？这里的人们如此的近密无隙，仿佛任何事情都能一触而动全局。一个人突然离开村庄或者生病，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都会打破整体的均衡。

对一个社团社会的把握只需要将公社社会的上述性质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到：

1. 社团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劳动分工和高度专门化的角色分类。例如在美国，许多职业角色（脑外科医生、宇航员等）所具有的专业化程度要求从业者必需接受数年的培养。作为劳动分工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比年龄和性别更加重要。

2. 家庭的影响力有所丧失，家庭的一些活动分别被经济、宗教、政治等其他一些社会设置所取代。在当代的社团社会中，经济活动由大公司在支配，对神灵的崇拜蒙荫于各种形式的宗教组织之下，统治权由政客和公务员们所掌握。

3. 许多社会关系都是非个人化的、短暂的。我们不会知道也不会去关心公共汽车司机的姓名、我们的图书馆员对书的品味，以及教授的嗜好。我们所关心的是他们能否平稳而高效地工作。

4. 社会行为由法律而非习俗来管束。一些传统已不再适应飞速变化着的环境，从而需要对其进行调整。

中世纪以来，从公社社会向社团社会的转变已是显著的趋势所在。这一被称之为“大转型”的趋势对经典社会学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并且在许多社会学思想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洞察就是：社团社会中用以联系人们的纽带比公社社会要弱。我们只要考察一下诸如位于宾夕法

尼亚州的基督教门诺派所结成的严密的公社社会，就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公社社会具有超乎寻常的凝聚力，从而使它能够在美国这样的大型社团社会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社会学本身就是在对这一转型潮流的回应中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社会问题促使研究者们必须以一种更为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人类的社会环境（尼斯比特，1966）。

公社社会和社团社会的区别与以生存方式为基础而划分的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分密切相关。狩猎与采集社会、园艺社会、农牧社会和农业社会通常可被看作公社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也可被称为广义的社团社会。工业化和技术的进步毫无疑问是社团社会出现的主要原因，但它们并不是惟一的原因。为了避免上述误解的发生，一些学者用“传统”和“现代”来代替“前工业”与“工业”。无论采用那种表述，许多社会学理论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即人类的社会史反映了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转变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巨大的历史性变化。

社会学与法律体系：对陪审员的挑选工作

你接到了请求担任陪审员的电话吗？你也许尚未意识到，在幕后有一位社会学家参与了这个过程。作为对法律和社会科学的交叉部分感兴趣的应用社会学家来说，“挑选陪审员的工作”（jurywork）是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无论是对于诸如谋杀或伤害一类的刑事案件，还是处理从性骚扰到内部交易一类的民事案件，社会学家们都已经发展出了一套专业性的方法来指导陪审员的选择及法庭审判的准备工作。这些被称为“陪审员挑选者”（juryworker）的社会学家能够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指出预期的陪审员的观点是如何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例如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他们的群体交往、以及居住的社区的类型）相联系的。从而就可能预测出每一个预期的陪审员会对法庭进程产生何种可能的反应。

一位社会学家能够设计出特定的研究计划，以帮助审判小组挑选出更能理解他们的陪审团，以及指导他们如何对案件陈述进行润色。例如，对于公众高度关注的谋杀案件，一位陪审员挑选者首先可以从对当地传媒内容（在审判所在地可以接触到的报纸和电视新闻节目）进行分析入手。由于陪审员是从当地社区挑选出来的，因此发现他们在审判前对案件有何了解是一件必需的工作。他们对案件的了解程度如何？媒介对相关事件是怎样报道的？预期的陪审员有无可能对案件的某一方有偏见？

如果某个社区里的种族界限很深而局势又是一触即发，陪审员挑选者会建议将一件有关种族歧视的案件移至该社区外进行审理。他（她）会收集强有力的信息来使法官确信审理地点的改变是明智的。系统的传媒分析已被证明为一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有效办法。

当公众舆论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两极分化时，陪审员挑选者将建议开展更加细致的社区调查，以收集有关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社会关注点、相关的主要机构以及分歧的大小等人口统计学方面的资料。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通常需要收集已出版的人口普查资料，对当地的官员们以及规划委员会进行访谈，以及参加社区论坛或讨论组。尤其重要的是要识别社区中的一些变化，例如新的民族团体的建立，新行业的到来，或者是社区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冲突的征兆。

除了传媒和社区研究以外，社会学家可能会建议对本地居民进行严格抽样的电



话调查。这种电话访谈的目的在于发现哪类人对特定案件是持肯定态度，而哪类人持否定态度。陪审员挑选者会试图从中识别出有偏差看法的一些指示性变量，这些变量通常为年龄、教育、民族背景、职业、工作机构的类型，以及传媒偏好等。一项统计预测就可以由此而得出：社区中不同类型的居民对案件的有关问题最可能持有的态度。

在选择潜在的陪审员时，审判小组应该明确询问每位候选者一些问题。浪费有限的提问机会是不可取的，每一个问题都应尽可能有效力。绝大多数的候选者会认为他们是可以做到公正无偏的。这就需要设计出恰当的问题来鼓励他们说出可能揭示出内心偏见的一些经历。

甚至在陪审团名单最终确定之后，社会学家仍会提出一些关于陈述案情的关键性建议。有时社会学家们会在真正的审判之前进行一次模拟审判，使审判小组能够看到陪审团成员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以及陪审员们是如何确定自己评价案件的准则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陪审团会发现法官和律师们所给出的一些说明有时会很复杂而且难以把握。因此一些陪审员就依赖于他们的同伴的讲解。此时，陪审员挑选者就会提议将那些说明改得简明易懂，同时还可能向法官提议允许陪审员在法庭上作笔记并可以提出问题。为了获取对今后审理案件更有用的信息，一些陪审员挑选者还在案件审理之后进行一些访谈，从而得到可以用来评估工作成功与否的反馈意见。

资料来源：克劳斯（Elissa Krauss）和博诺拉（Beth Bonora）编著：《陪审员的挑选：系统性的技术》（Jurywork: Systematic Techniques, 2nd ed）美国陪审员选择方案有限公司（New York: Clark Boardman, 1987）。

关于社会的几种理论视角

我们在此处将介绍社会学三大理论流派中的两个流派：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和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我们在第一章里已对它们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两种理论视角都属于主要研究大型社会系统和整个社会的动力机制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在这里我们将进一步较为详细地对这两种理论视角进行探讨，看看它们是怎样被用来分析社会运行的。第三种主要的社会学理论流派是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它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人类社会行为，通常不被用来分析大的系统和整个社会，我们在第五章将对这一流派进行详尽的介绍。

1

功能主义的 理论视角

功能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生物学占据统治地位的19世纪发展起来的。那时有关人体、微生物以及遍布全球的动植物的知识不断增长。19世纪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吸收了这些新知识并以自然选择来解释物

种进化,从而使生物学获得了空前的声望。被这些前进的步伐所激发的早期的社会思想家自然地将生物学的一些概念运用到了社会中。

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提出了功能主义的最基本原则: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这一观念中包含了三个要点:第一,社会与生物有机体一样都具有结构。一个动物由细胞、组织和器官构成;与其类似,一个社会由群体、阶级和社会设置构成。第二,与生物有机体一样,一个社会要想得以延续就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例如,一个社会必须要有能力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得食物和自然资源,并且将它们分配给社会成员。第三,与构成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相似,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也需要协调地发挥作用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受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影响,斯宾塞和他的追随者们都坚持任何系统都会自然地趋向均衡或稳定的观点,同时,社会中的各部分对社会的稳定都发挥了一定的功能。因此,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是由在功能上满足整体需要从而维持社会稳定的各部分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

后来的一些学者吸收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相似”这一功能主义的基本思想,并且对其进行了提炼和补充。迪尔凯姆常常被视为当代功能主义的奠基人。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道德价值观上的共识来规范的一种特殊的有机体。功能主义还是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创建者们所持的主要理论视角。

在美国,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将功能主义发展为社会学分析中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理论的领袖人物。他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满足了四个基本需求,才能发挥其功能,也就是说才能维持其秩序和稳定(帕森斯,1951;帕森斯和斯梅尔塞,1956)。这些有时也被称为功能性必需(functional requisites)的四个基本需求是:目标的获得,对环境的适应,将社会不同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以及对越轨行为的控制。帕森斯尤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的满足,认为这需要社会成员接受和遵守社会的共享价值观。他认为正是这些共享价值观将社会“粘”在了一起。如果过多的人拒绝接受这些价值观,社会稳定将会崩溃。

罗伯特·默顿(1968)将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了改进,使其更有利于经验研究。他的理论是从分析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特定单位入手的。而早期的理论家通常用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对维持整体的作用来解释其存在,这样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社会中还会有一些对社会造成损害的单位,而他们认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单位只要存在,就一定对维护整体发挥功能。然而默顿指出社会系统中并非所有组成部分都发挥着正功能,当社会结构中的某一单位阻止了整个社会或其组成部分的需求满足时,它则是反功能(dysfunctional)的。

当宗教把社会成员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在发挥着正功能;当军队在保护一个社会免受伤害时,它也是正功能的;当一部政治机器通过提供关于政府和社会服务的信息而将外来移民整合入社会之中的时候,它同样发挥着正功能。然而当宗教在北爱尔兰等地区激起政治纷争时(达比、道奇和赫伯恩,1990),当军队耗尽了医疗和教育机构等更紧迫的社会需求所需的资源

时，当一部政治机器靠贪污和腐败为生时，他们发挥的却又是反功能。

同样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结构单位发挥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或预期的功能，除了已意识到的或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之外，一个社会结构单位还具有尚未意识到的，或者是未预料到的潜功能（latent function）。

例如，大学的一个显功能是使年轻人接受教育，为将来承担专业化的工作打下基础。而大学的一个潜功能则是把一部分人口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从而减缓经济生活中的压力。

功能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受到了批评，主要是因为它所反映的社会观从本质上是保守的。由于它强调共享价值观并且将社会看成是由为整体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各部分所组成的，功能主义似乎给不赞同这些社会价值观并企图改变它们的人们只留了极少的空间。批评家指责功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社会的不满和社会冲突。由于功能主义是如此依赖秩序、稳定和共识，它甚至可能曲解了社会的真正本质。批评家们指出，与生物体不同，社会的各个部分并不总是为整体利益而通力合作的。社会中的某些组成部分处于冲突之中；某些部分的获利则是以其他部分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

对功能主义最严厉的批评来自于被称为冲突主义论者（conflict theorists）的学派。他们认为功能主义视角在研究稳定的社会时也许是十分有用的。但放眼今天之世界，社会在飞速变迁，冲突不是例外而是规律。

2

冲突论的 理论视角

冲突论的视角作为一种观点不如功能主义那样统一。它是由在近年来才被贴上冲突论标签的多种理论流派所组成的。这些冲突论者共同持有的一个信条就是：社会总是处在对稀有资源的争夺状态之中。其中最重要的稀有资源之一即是权力。冲突论者由此认为社会最好是被看作一个持续展开着权力之争的竞技场。

许多冲突论者的主要假设是：社会、社会设置和社会秩序主要是通过强力来维持的，而并非是通过共享价值观将它们“粘”在了一起。社会中的权势者在迫使社会中的弱势成员至少要在表面上服从他们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强力。因此，冲突论者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确定出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探求它们是如何维持其统治的，以及它们在最初实际上是怎样获得这些权力的。

冲突理论有时被仅仅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强调的是社会中经济力量的重要性，而不是功能主义者所强调的共享的文化价值观。他们所关注的是阶级之间的持续斗争。马克思划分出了两大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即资产阶级。他预言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性的颠覆，从而进入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

马克思的预言尚未实现并不意味着冲突理论的失效，更不能据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已经终结。新马克思主义冲突论者通过强调绝大多数

社会被阶级冲突和斗争所分裂的事实来继续支持马克思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只有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权力消亡以后,社会进步才能实现(布雷尔曼,1975)。

冲突论者这一术语同样包括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也许当今最著名的非马克思主义冲突论者是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 1958, 1959),他还曾经是经济学的伦敦学派的领袖。达伦多夫抨击了“社会基本是有序”的这一功能主义的基本前提。他把此前提看成是乌托邦(1958),从而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社会的丑陋面——冲突上来。达伦多夫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愿意把冲突看成权力的争斗,而非阶级间对经济资源的争夺。然而与马克思一样,他也认为社会总是倾向于不稳定和变动的。他实际上在坚持应将社会变迁、而不是把社会秩序,作为社会分析的主要关注点(1959)。

美国的冲突理论的奠基人是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米尔斯认为他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他的许多思想也来自于马克斯·韦伯。米尔斯的思想反映了美国中西部的民粹主义。这种19世纪晚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将“人民”看成是美国生活中腐败的“大利益集团”的对立面。在他的名著《权力精英》(1956)一书中,他试图揭示谁在真正统治美国。他认为这个国家被来自三个日益相互关联领域的领导人所主宰,他们是大企业的高级主管,政府行政机构的主要官员,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仅如此,企业主管常常进入政府就职,退休的将军频繁地被选入企业的董事会。米尔斯认为,这个小且非常集中的群体为美国社会做出了绝大多数的重要决策,包括战争与和平、货币和税收、人权和职责等。

米尔斯由此发展出了当代冲突理论的中心思想(多姆霍夫,1978, 1983, 1990)。冲突论者认为那些权力精英们尽管具有显而易见的成功标志,然而他们并不如其反对者那样意识到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为了处理反抗和把公众反感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大权在握者总是试图模糊他们与大众的界限。尽管如此,大众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权,并对此表示愤恨。这种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紧张状态孕育着社会冲突的火种。从现存社会秩序中受益最多的人会试图将这些制度维持下去,而那些被剥夺者则在奋力改变这一切。来自于这些对立群体间的冲突将导致重大的社会变迁。

不管其个人偏好如何,当今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都承认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的价值所在,认为他们都探索了社会的不同方面。功能主义考察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分工合作的。它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用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有着特殊个人需求和利益的人们会相互合作?冲突理论在另一个方面关注了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关系、社会平等的缺乏以及社会秩序的崩溃。正像功能主义由于过分看重合作与秩序从而可能出错一样,冲突理论因为相信社会冲突是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而同样可能误入歧途。然而这两种理论视角都洞悉了社会存在中基本而普遍的方面。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认为人类行为是由社会结构所形塑的。社会结构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组成一个群体的成员可能会在不断改变,但是群体的结构却通常能够保持稳定。社会结构会限制个人的自由,然而通过有效地组织日常事务,社会结构给群体和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 地位和角色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要素。一个人的地位指的是他(她)在群体或社会中被社会性地定义的位置。通过某人直接的努力(或不努力)而获得的社会地位被称为自致地位。按照超出某人控制能力之外的一些标准而分派给某人的社会地位被称为先赋地位。一个人可以拥有许多不同的地位。用来决定一个人的综合社会地位的一个主要地位被称为首要地位。

3. 角色是指对群体或社会中拥有某一特定地位的人的行为期待。一个人可能拥有许多身份,而每一个身份都可能要涉及到扮演几种角色。与某一身份地位相联系的所有角色的集合被称为角色集。当某一新的身份诞生时,常常需要一段时间来产生出与其相配的角色。

4. 角色扮演指的是一个人在某一角色中的实际表现,它常常与角色期待不相匹配,而后者指的是社会对某个角色扮演方式的定义。一个人有时候不得不去扮演各种不同角色。当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身份相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角色对某个人提出了相互对立的要求时,这种情形就被称为角色冲突。而由某一单个的角色的对立要求而引发的个人的压力被称为角色紧张。角色期待通常影响着个人认同,从而使人们按照需要他们扮演的角色去塑造自己。

5. 一个群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有着共同的认同和团结感、一定共同目标和期望的人组成的。群体具有一定的结构,由一组相互关联的地位和角色所构成。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可以被当成一个社会系统来分析。按照结构的水平、亲密程度、社会不平等和人的差异之起源这三种性质可对群体进行分类。

6. 一个社会类属不具有结构。它是一个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所组成的集合。类别不是社会群体。共同使用公交工具的人们或者是在商店排队买东西的人们被定义为一个集合(aggregate),它同样不是真正的社会群体。像人群和集会等自发性的聚集是另一类社会集合。这种结构松散的互动类型被称为集合行为。像家庭和朋友圈等面对面交往的群体比集合行为更具有结构性。而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创建的组织(例如学校、医院、企业等)则有复杂程度很高的结构。

7. 群体可以依据其亲密程度进行分类。例如,家庭这样的初级群体规模较小,在心理上亲近,并且没有正式的目标。一个企业则是次级群体的例

子：规模较大，具有特定目标的非人格化的群体。

8. 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根据社会等级对人进行严格分类的一个例子。基于社会等级的较为松散的分类方式包括中世纪的社会等级制以及后来的社会阶级。少数民族群体是由具有共同文化背景和相互认同的人组成的群体。

9. 为了分析较大规模的社会单位，社会学家运用了社会设置、社区、社会和世界体系等术语。社会设置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而被设计出来的社会结构中相对稳定的一簇要素。家庭、宗教团体、教育体制、政治和经济系统都属于社会设置。

10. 集中在某一居住地和工作场所并以社会互动的日常形式为特征的人的集合叫做社区。一个包含了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所有社会设置的综合性的、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集合被称为社会。

11. 由于社会之间日益相互依赖，社会学家最近使用了世界体系这一术语。它指的是将世界上的所有社会联系起来的关系体系。

12. 用来给社会分类的两种常用方式是依据社会生存方式和依据社会结构的总体类型来分类。生存方式的分类方法是考察一个社会是如何为其成员提供衣、食、住所的。狩猎和采集社会、园艺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等是以这种方法确定的主要社会类型。

13. 费迪南德·滕尼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公社和社会。公社或社区，是社会关系主要建立在朋友和亲属等个人纽带基础上的社会。社会或社团，其绝大多数社会关系是正式的、契约化的、非人格化的、专门化的社会。迪尔凯姆区分了建立在机械团结基础上的社会和建立在有机团结基础上的社会。建立在机械团结基础上的社会因为其社会成员承担着非常相似的经济角色，并由此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念而被整合在了一起。以有机团结为基础的社会由于其社会成员承担着非常专门化的经济角色，并由此高度相互依赖而被整合在一起。

14. 社会学中最频繁使用的社会分类方法也许是公社社会和社团社会的划分。公社社会的专门化程度较低，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社会关系通常是高度人格化的，习俗规范着绝大多数的行为。在社团社会中，人们承担着非常专业化的任务，家庭的重要性相对降低，社会关系是非个人的。是法律而非习俗，规范着绝大多数的行为。

15. 关于社会的最主要的两大理论视角是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功能主义建立在将社会与有机体进行类比的基础之上。一个复杂社会的组成部分发挥着保持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功能。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满足其成员的需要，并且使他们继续共享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秩序就能得以维持。有时，社会中的某一组成部分会发挥反功能，它起着颠覆而非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样，某一社会结构单位的显功能（被认识到的和预期的结果）也许会与它的潜功能（未意识到的和未预料到的后果）有所不同。

16. 冲突论者眼中的社会处于对稀有资源的争夺状态之中。按照许多冲突论者的看法，社会中的统治集团是靠强力来维持统治的。冲突理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对这些统治群体（或精英）的认同问题。冲突理论深受马克

思主义的影响，然而他们并不总是像马克思那样强调经济斗争。

推荐阅读书目

1. 贝拉 (Bellah, Robert), 马德森 (Richard Madsen), 沙利文 (William M. Sullivan), 斯威德勒 (Ann Swidler) 和梯普森 (Steven M. Tipson), 1991. 《美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 New York: Knopf.) 本书分析了当今美国的一些社会设置的理想、挫折和希望, 提供了关于什么是社会设置、它们如何运转、如何对它们加以改造以增强民主社会之活力等问题的最新讨论。

2. 厄苞美 (Ebaugh, Helen Rose Fuchs.), 1988. 《告别过去: 角色退出的过程》(Becoming an Ex: The Process of Role Ex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退出一个角色意味着什么? 本书的作者曾经是一个修女, 她对前囚犯、前酗酒者、离婚者、前医生、前政府官员进行了访谈, 以解释人们是如何退出一个角色并产生新的自我认同的。

3. 菲斯克 (Fiske, Alan), 1991. 《社会生活的结构》(Structure of Social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本书考察了社区共享、权威等级、平等匹配和市场定价这四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在社会中的运作。

4. 汉德尔 (Handel, Warren H.), 1993. 《当代社会学理论》(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本书以生动的笔调对社会学的当代理论进行了最新比较。

5. 伦斯基 (Lenski, Gerhard), 让·伦斯基 (Jean Lenski), 诺兰 (Patrick Nolan), 1991. 《人类社会: 宏观社会学导论》, 第六版, (Human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本书作者从生态进化论的视角对狩猎-采集性社会到工业社会等主要社会类型进行了考察。

社会互动与社会网络

当乔吃过早饭之后，不断地问自己“今天怎么办”？一个小时后，他将在当地有声望的商业学校接受招聘主任的面试，他觉得这将决定自己的未来。乔不断地在大脑中排练着面试的场面，一时扮演自己的角色，一时扮演那位考官的角色。

开着车直奔校园。他很紧张，但在一个外人看来，他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经理的形象：头面整饰一新，穿着擦得光亮的皮鞋，夹克和领带也是老式的，并且还夹着一个崭新的公文包。

在面试时，尽管乔有些紧张，他还是尽力表白他的优点。他想向校长表明自己很聪明，精于算计，更重要的是能办事。他还巧妙地询问了有关专业选择和毕业实习计划方面的问题，尽量把话说得恰当、自然。

面试结束后，乔浑身轻松，并且得意洋洋。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给考官留下了有修养、会说话的深刻印象。他的确尽了最大努力。他希望自己正是考官所需要的人。然后他回家了，又换上了牛仔裤和他最喜欢的法兰绒衬衣。

乔做了些什么呢？关键是为了以某种方式表现自己，他修饰了他的行为和外表。他的衣着、言辞、举止以及表情，都可以看做是精心设计以满足观众期待的。他尝试塑造一种突出其个性特征的形象，并觉得这种形象对于面试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自己的不同方面，这一切取决于特定的情境。我们这

样做，是根据社会成员共同建构和分享的一些规则。乔和招聘主任之间的互动遵循着相互期待的法则，主任希望见到那种机灵、礼貌、目标非常明确、穿着非常得体，并对有关任命的谈话和问题准备得很好的人。乔则期待着见到那种有权威的、对于学校非常了解的，并且在提探索性问题时非常内行的人。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社会学家们怎样分析人们之间的日常互动，我们也将检视社会互动的几种主要形式，包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网络。

什么是社会互动

由于我们总是意识到自身行动对于他人的后果，所以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以他人为导向的。在我们日常与别人面对面的接触中，我们常常意识到别人对我们行为的期待以及我们对他人思想、感情和行动的期待。我们不断地根据自己身处何地以及有谁交往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当我们在高中的快餐厅或大学食堂就餐时，我们的行为表现与在高档饭店或家中吃饭时的表现不一样。我们在课堂上的行为与在课堂外的行为也不一样。同事们上班时在办公室的交往与下班后进入社会的交往也明显不同。并且，当我们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恰当”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不舒服，例如，当我们在酒吧里碰到老板时。

甚至我们还没有有意识地想到过别人，但我们的行为已经被我们过去习得的期望模式化了，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的日常行为，看上去纯属私人的行为，例如在街上溜达，在房间里四处看看，甚至睡在自己的床上，都无一不受别人关于这类行为应当如何之期望的影响。例如，大街上两个陌生人相遇时，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一眼，这一看一般就遵循着某种共同的模式。在一种被称为礼貌的疏忽（civil inattention）的过程中，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一看，仅仅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为止，而不是看得太长，不会表现出任何好奇。所谓礼貌的疏忽，通常采取这种形式，即“往对方头顶看，……当对方走过时收回眼神——这就是对别人的一种模糊的印象”（戈曼夫，1963，1980）。

关于别人期望我们如何行事的这种意识，即使当我们没有与别人在一起时也会出现。我们可能在独自一人时想到某个别人，或者想象某个别人在想我们。我们可能要想一想某个朋友关系的质量，或者评估最近之社会交往的重要性。或者，我们很想知道如何给我们的教授或导师留下深刻的印象。简言之，我们几乎总是卷入到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中去，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人们以相互的或交换的方式对别人采取行动，或者对别人的行动作出回应。社会互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主要部分。

互动和意义

并非只有人类才进行社会互动。但是，非人类的生物体总是用一系列非

常固定的行为彼此沟通。想一想吧,例如,两只狗相互围着转,只是要打架。在某种意义上,两只狗通过咆哮、露出它们的牙齿和不停地叫唤来彼此“交流”。一方的行动引起另一方本能的反应。

但是,这种“交流”与人际之间的互动有着本质的不同。比方说,一对夫妇商量如何去度一个夏天的周末,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类互动是有意义的:丈夫和妻子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对方说话的动机或意图。每个人都能根据他们多年在一起的经验理解对方的行为,这还不用提他们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与此相对,动物只是通过对一系列刺激反应来进行互动。它们可能并没有有意识地虑及彼此的行为意义。

马克斯·韦伯是最早强调研究互动及其意义之重要性的社会学家之一。实际上,他认为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他所讲的“社会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韦伯觉得社会学家们必须把他们自己放到他们所研究的人的位置,然后去阐释他们的思想和动机。他把这种方法叫作移情式理解(Verstehen)。

然而韦伯从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他所做的大多数工作是在宏观社会学层次。倒是,一个美国人——乔治·H·米德,成了最早对人类互动中的意义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理论视角后来被称为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符号互动论

1

乔治·赫伯特·米德

米德在1894年到1931年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教员(参见第一章)。他的研究集中在他所认为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单位,即行动。按照米德的观点,行动(act)是指某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全部反应。它不仅包括人们的实际行为,而且包括他们对环境中特定事物和人的注意,以及他们对那些事物或人的感觉和想法(斯特劳斯,1956)。

人类并不像动物那样,只是毫无思考地对别人的行为作出简单反应。他们非常仔细地考虑他们正要作出的回应。他们在行动之前计划他们的回应,甚至在他们的脑中进行预演。

米德还说,人类与动物的不同,还在于人类拥有自我。米德用自我这个词强调这样一种事实:我们针对自己采取“行动”,就像我们针对另外一个人一样。我们赞美我们自己,也与自己辩论,在内心感到自豪,或陷于自责。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我们在与我们的自我交流,与一个内在的“人”交流,就像我们与另外一个人交流一样。按照米德的观点,这种与自己“交谈”的过程,是人类意识的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

此外,米德强调人类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意义的影响,并且多数文化意义是象征性的(参见第三章)。旗杆上一块彩色的布,象征着我们的国

家。一个微笑可能意味着某个人很高兴。

正是米德洞察到，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学习由社会建构并由大家共享的象征意义，同时，人类还与他们自己交流这些意义，这就是米德的主要洞察力所在。按照米德的观点，人类互动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布鲁默，1962）。

2

符号互动论 的原理

在第一章中，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三种主要的社会学理论视角：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符号互动论。由于前两种理论关注的是较高层次的或宏观社会学的现象，我们在第四章对它们进行了详细介绍。现在，我们来深入讨论符号互动论，这种社会学视角强调符号和意义在微观社会学层次的重要性。作为米德的学生，H. 布鲁默（Herbert Blumer）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他老师的思想进行提炼和发展，可以说，布鲁默对符号互动论的本质作了最好的概括。

布鲁默（1986）总结了互动论的三个基本原理：第一，我们依据我们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而对其采取行动；第二，我们所赋予的事物的意义源于社会互动；第三，在任何情况下，为了赋予某种情境以意义，并决定怎样采取行动，我们都要经历一个内在的阐释过程——我们“与我们自己交流”。

例如，试想一个顾客在饭店收银台买单的情景。顾客把账单交给收银员，并且掏出她的钱包。收银员准备收钱并找零。他们对于账单的行动都是基于他们所赋予账单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他们所共享的（互动论的第一原理）。他们之所以知道账单的意义，是由于他们通过以前许多类似的互动学习的结果（互动论的第二原理）。现在，假定顾客没有足够的钱买单。那么，她会表现得很尴尬，并且会说她到隔壁的银行取一些钱，马上就回来。收银员得对这种新的情境进行阐释，赋予它某种意义，并且决定怎样行动（互动论的第三原理）。他自问是否应当信任这位顾客或是去叫经理。这个顾客看上去诚实吗？她是常客吗？收银员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类似的情况遭遇如何？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收银员作出某种阐释，并且，按照布鲁默的观点，理解这一阐释的过程正是互动论分析的重要目标（华莱士和沃尔夫，1986）。

按照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在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考虑与其他人在同一社会情境下的行动和思想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阐释他人行为的象征意义。当一个年轻的推销员与老板和一个潜在的客户共进午餐时，由于他（她）没有正确理解这种情境，而冒失地提到了最近办公室发生的恶作剧。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推销员还不能明白老板对他（她）瞪眼的意思，那么，他（她）在未来的这种互动中就会被排斥在外。

人们如何理解他人对于某些符号所赋予的意义？米德认为，这种重要的理解是经由他所说的角色借用（role taking）过程而获得的。人们往往站在他们互动对象的角度来想象自己。通过密切注意互动对象使用语言或其他符号的方式，我们可以领悟到对方通过语言和行为所要传达的意思。因此，上

面讲到的那个推销员，可以在脑海中扮演其老板的角色，以领会老板试图向客户传达的信息，即他们公司的员工是严肃的、有能力的。这样，推销员就与老板有了关于上述情境的共识。通过扮演老板的角色，推销员明白了老板行为的意义，并且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许多社会情境需要某种创造性的定义和再定义过程。每个人必须不断地理解互动之另一方的行动，并调整他（她）对这些行动的反应。例如，某个妇女在作严肃的演讲时，有可能稍稍放慢音调，以表明她将讲一个笑话。听众们意识到这种变化，所以调整他们对于演讲者的注意力，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候笑出来。采用同样的方式，演讲者也反思自己的讲话，根据她所认为的能够感染听众的方式调整其措辞。如果看上去听众对她的幽默没有反应，演讲者就可能采取更为直截了当的讲笑话的方式。很多社会互动的“剧本”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在现场创作出来的，而不是一经写出就可以反复使用的。

3

共享定义

在进行多数日常活动时，我们一般假定：不仅是对语言及其他具体符号，而且还包括日常社会情境，别人与我们都使用同样的定义。多数共享定义，或者说“情境定义”，是在无意识当中领会的。无论是顾客还是店员，当对方一起挨个翻动衣架上的新夹克时，都不必停下来特意考虑他们所卷入的社会互动。每个人都明白他（她）自己的角色和对方的角色。想一想吧，如果人们在买牙刷时，在回答老师的提问时，或者在为雇主打印信件时，他们都不知道怎样互动，那么，生活该是多么困难和多么不确定。关于日常情境的共享定义使得人们可以将世界看作一个稳定的地方，在这里，或多或少可以“想当然”地处事（舒尔茨，1962）。

这种关于定义的共识是人类互动得以进行的关键。由于某个社会的成员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和定义多数同样的情境，所以他们可以以某种组织化的方式共同采取行动。

作为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W.I. 托马斯（W. I. Thomas, 1928）指出了共享定义（Shared definitions）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就是人们有时所说的“托马斯定理”（the Thomas Theorem）。尽管这些定义在客观上有时并不准确，但是，我们所共享的这些定义仍然指导着人类活动。如果人们相信巫婆确实存在，或者打喷嚏可以传播艾滋病（AIDS），那么他们在危急时刻就有可能烧死他们认为是巫婆的人，同时，在艾滋病人患流感时，也会竭力回避他们，尽管事实上这类行为都是基于一些错误的假定（对于作为受害人的“巫婆”或艾滋病患者而言，“事实”如何并不能造成什么区别）。

有些时候，人们关于某些社会情境的定义并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过社会互动发展他们所需要的定义。根据他人所提供的关于他们自身的信息，特别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模式，一个人可以领会期待什么和被期待什么。比方说，两个人同时出席某个新的商业同行所举办的晚宴的人，就必须定义这种情境：宴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邀请他们？他们怎样应付在场的

其他人?每个客人都有可能发现别人有不同于他(她)的定义。某个人可能利用这种场合谈成一笔生意,而另一个人则有可能把它当作与他人的配偶调情的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对于男女主人而言,他们可能主要是借此炫耀他们新装修的居室。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由于某种熟悉的习惯发生变动,人们关于某种情境的定义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在70年代,男士主动为女士开门的习惯遭到广泛挑战。一些人觉得这种礼仪是男性控制的象征,在这种控制下,女性处于被动地位。一位社会学家曾经让她的学生观察并记录在男女两性相遇时,谁给谁开门,以及他们的感觉如何。结果,她发现,这种相遇的过程日益变得复杂、成问题,并且也不再是常规性的了。换句话说,关于男人和女人彼此应当如何互动的一系列新的定义,已经导致了这样一种新的情形:即使熟悉的习惯也需要重新定义。许多社会学家相信:这种习惯性行为方面的变化,常常在实质性问题为社会价值观的未来重大转换奠定了基础(瓦莱姆,1974)。

4

批评

符号互动论的批评者们认为,符号互动论仅仅关注的是个体的互动方式,这种理论方法不能够解释个体无法控制的力量对其行为的形塑。换句话说,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于我们生活的很多影响。符号互动论似乎否认历史、社会和经济对我们的约束,并且它造成了一种个人拥有无限自由的错误印象。

在回应这些批评时,布鲁默和其他符号互动论者指出,无论那些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具有何种影响,人们总是在相互的互动过程中体验到它们。他们强调,如果不能首先理解人们的互动方式,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社会(阿德勒等,1980)。



贫民窟:运用符号互动论

多数美国人认为无家可归者是我们当今所面对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估计,全国可能有几百万无家可归者(各种估计是不确定的,并且非常矛盾),无家可归者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已婚的和单身的;健全人和不健全人;清醒者和毒品依赖者;黑人和白人;老年人和年轻人,以及由于失业或个人悲剧而陷入贫困的家庭。

这种人口的多样性,与贫民窟的早期居民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多数大城市里,都可以发现这种肮脏、破败的贫民窟。但是,其早期的居留者主要是老年人,没有专长者,单身的酗酒男人。最近一些年,实施了城市复兴计划。这个计划拆毁了作为贫民窟最重要标志的,虽然破败但是却很便宜的“单间住所”旅馆(通常是“低级旅馆”)。随着这一计划的实施,城市中的贫民窟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举措却导致了无家可归者人数的增长。由于被剥夺了他们仅有的、可以付得起房租的住房,许多贫民窟的居民别无选择,只好住在大街上(鲍姆和伯恩斯,1993)。

尽管改革者付出了最大努力,贫民窟仍然在许多城市继续存在。多数了解这

些地区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对这类地区的反应要么是恐惧，要么是厌恶。那些充满恶臭、污秽、而又极其便宜的住房，以及那些充满绝望、无所事事而又蓬头垢面的居民，似乎远离我们的生活，我们相当幸运，能够不住在这种贫民窟。

但是，那些居住或工作在贫民窟的人们，其感觉又如何呢？这是社会学家J.P. 威斯曼（Jacqueline P. Wiseman）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她在《落魄者的港湾》（1979）这本书中报告了在“太平城”贫民窟所做的研究。威斯曼发现，住在贫民窟的酗酒者，与在那儿工作的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感觉极其不同。她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符号互动论的原则：某个人的态度取决于他（她）在首次遭遇时如何看待事物，他（她）所见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他们的意义，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反应。按照威斯曼的观点，贫民窟居留者与社会工作者，就贫民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认识不一，这是因为“每一方所遭遇的现象都经过了极为不同的选择和排列”。

对于在这一地区工作的社会工作者而言，贫民窟是某种被剥夺的环境。充斥于反映该地区的专业文献中的词，诸如，“挫折的”、“沉闷的”、“忧郁的”和“肮脏的”等，加上该地区的物质环境，都被看成是该地区居民之道德和心理缺陷的反映。因此，这里男人们的形象被描绘成穷困潦倒、表情冷漠、身心俱损、不能自立、心灰意冷、毫无信心，他们的外表即是这些症状的证据。男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看作是表面化的——如果人们多少还注意到这种社会关系的话，并且，他们的境遇通常被解释为是由于社会化不足：缺乏长期的朋友关系、家庭义务或工作。这些缺点又被认为是教养或个性之不完善的结果，教养与个性的不完善妨碍了贫民窟的男人对他人承担责任和义务。

贫民窟的居留者对其境遇的看法与此有很大不同，这一点并不奇怪。对其态度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是酒精的效果，它至少在开始时使得人们产生某种乐观和处境不错的感觉，而与此同时，它也使人们对于周围糟糕的环境和人感觉迟钝。威斯曼注意到，直接环境变得不仅与贫民窟的人无关，而且很多人还为成为其中的一员感到满足。

与在他们当中工作的社会改革者相比，贫民窟的居民对于时间有着不同的态度。与其他穷人一样，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活一天算一天，并没有很强的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识。他们也同样感到自己软弱无力，为了对付一个充满敌意和不公平的世界，他们不得不变得狡猾。威斯曼说，酗酒者预感到了在一天接一天的生存斗争中的失败。他也预感并看到了其所有社会关系的不牢固性。最后，他们接受了一种偶尔的极端独立与在制度性场景中不愿的全面依赖的生活方式。

然而，在这种对生活的预期模式中，贫民窟的人的“生存策略却显示出令人吃惊的不屈不挠和富于创造性的精神，这与文献当中所描绘的病态形象有些不一致”（威斯曼，1979）。换句话说，这里的居民很善于对现实进行再定义，他们自由地赋予某个客体以意义，并将其转换为能够服务于另外的目的或社会场景的原材料。例如，一件放在当铺的珠宝可以当作银行账目；由于银行要求签名的一致，而这对于酒鬼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不去选择银行。

尽管贫民窟的男人们通常被描绘成孤独的高群索居者，但是威斯曼说，任何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吃惊地发现：这里充满着开朗乐观的气氛”（1979）。她注意到，在很多方面，这儿的环境很像大学校园环境，在人行道上漫步的人们，向人们展示出大学生活的悠闲自在。贫民窟的居民就像大学生一样，他们的许多共同点使得他们不用瞻前顾后就可以直接友好相处。事实上，在大学校园和贫民窟，人们

之间友谊的发展仅仅是基于以下事实：他们都住在那儿，并且都有足够的时间交流。而且，在这两种场合，总是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任何人均可旁观或加入一个活动群体。就像大学成为人们变为成年人之前的一个四年缓冲期一样，城市中的贫民窟也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成年人的责任可以被暂时搁置”（威斯曼，1979）。

那么，究竟谁的观点是对的？贫民窟是意味着悲惨的、充满臭味的、破败不堪的建筑呢，还是意味着一个尽管有些破旧但却充满温暖和友谊的校园？威斯曼用另外一个问题作了回答：既然人们对于事物的评估是由其参照系所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不能说两种观点都是对的呢？

关于社会互动的其他理论

社会学家们已经发展出许多另外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进一步阐释和拓展了符号互动论的中心思想（阿德勒和丰塔纳，1987）。其中，拟剧论和本土方法论是最为著名的。

1

拟剧论

当我们与一个并不太熟的人谈话时，通常立即会自问有关对方的一些问题：他（她）是干什么的？住在哪儿？为什么要与我们谈话？所有这些问题帮助我们作出某种情境定义。我们还可以根据对方的穿着打扮以及过去在类似情境下的遭遇等等作出推断。但是，我们就要结识的这个人，有可能完全意识到我们的思想活动，并且，他（她）还会积极地作出努力，以影响我们正在进行的解释和定义过程。

艾文·戈夫曼在晚年（1982）详细研究了人们在别人眼里制造形象的过程。戈夫曼关于社会互动研究的理论观点被称为“拟剧论”（dramaturgical perspective），这种观点把人们看成是戏剧中的演员。按照戈夫曼的观点，当人们扮演角色时，他们的表演是由观众来判断的，这些观众对表演的失误非常警觉，而这些失误则有可能反映演员真实性格的某些方面（戈夫曼，1959，1963，1971）。

因此，按照戈夫曼的观点，人类互动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或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为了使他人按照我们的愿望看待自己而在他人面前展示自我的努力。例如，许多人都制造某些使他们看上去很善交际的形象。在舞会上，由于被人介绍与一群证券经纪人相识，某个客人可能会对证券市场表现出浓厚兴趣。与此类似，推销员也总是试图制造出与他们所售物品相符的形象。比方说，某个出售维他命的人，可能会在家中的日光灯下消磨时间，以便使他们看上去比较健康。再如，雄心勃勃的摇滚明星可能采用某种他们确信能引起注意的穿着和行为举止。



摇滚象征：外表形象

摇滚不只是音乐，它包含了使其与众不同的一整套价值和规范。而且，在摇滚里面有许多不断变化的亚文化。每种亚文化不只是作为有特色的音乐和抒情手段，而且还有其独特的视觉风格。

摇滚亚文化的这种符号区别并不新鲜。50年代，“猫王”普莱斯利摇动着从额部向上梳起并扎成一络的高耸的头发，身穿黑色皮夹克。在充满幻觉的60年代，像柏滋以及后来的甲壳虫乐队，理着“拖把头”的发型，带着老太太眼镜，身穿喇叭裤和花衬衫。10年后，迪斯科占据了主导地位，演奏者们以蜂窝式发型和涤纶休闲服为标志。每种潮流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并为不太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家和歌迷所效仿。

实际上存在许许多多的摇滚“外表形象”，其中有些形象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尽管年复一年，它们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是某种稳定的模式的确不断出现。理解了这些形象的象征意义，你就可以理解音乐的意义。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在你还没有听到旋律之前，你就已经明白了音乐的意思。

有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风格是以工人阶级的形象为基础的。这种风格据说是小爱维斯（Elvis）所创，并在最近为诸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约翰·美伦肯普（John Mellencamp）和B.塞杰（Rob Seger）之类的艺术家所定型。它的外形特征是蓝色牛仔褲、袖口向上翻卷的T恤和旅行鞋或长统靴。这类歌星所唱的歌一般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并且突出普通人的情感。

另一种长期存在的外表形象是使用重金属。披肩或长头发，有时烫起来并染色；按照美洲豹或斑马皮图案剪成的衬衫和紧身皮裤，以及眉毛和其他地方所化的浓妆，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重金属意象的特色。像小丑克鲁、金属和枪炮与玫瑰之类的乐队，都是因重金属意象而发迹的。这种重金属意象是如此标准，以至于产生在Spinal Tap中一次破坏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模仿。正像其外表形象一样，这种音乐极其洪亮和放肆。这些是摇滚的坏孩子，它们的外表形象准确无误地表达了这一点。

最近变得流行起来的一种形象是：法兰绒衬衫和穿破了的旧衣服。这种形象为好些乐队所欣赏，特别是80年代末在西雅图出现的一些乐队，如涅槃和珍珠酱。这种外表形象所表达的情绪正与走向成人的“垮掉的一代”的愤世嫉俗相吻合。

说唱乐也正在流行。从弗雷希·普林斯和哈默等相对温和的形式，到公众敌人、猎犬和雷博士等更为吓人的面孔，说唱乐明星喜欢戴棒球帽、太阳镜，穿黑裤子、T恤和高级名贵的运动鞋，并佩带许多金饰。就像他们的旋律一样，他们的形象通常被认为是少数民族居住区的生活现实的反映。

女性摇滚歌手则在其形象中加进了强烈的性吸引，有时与重金属风格形成一种性别意义上的对比。麦当娜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詹·杰克逊，都强调女性内衣、紧身皮衣和高跟鞋的魅力。

有些摇滚歌星采用像弗勒尔·蒂米也尔——这个人曾经创造了奥滋·奥斯本和引路天使等意象——之类的服装顾问和设计师的意见（霍华德，1988）。但是，多数人选择了更具权威性的路线，他们创造一种外表形象，象征性地反映他们想要表达的态度。在决定哪个人和乐队取得明星地位方面，音乐是重要的。但是，在市场化 and 音乐电视流行的现代社会，视觉风格在影响成功或失败方面，通常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第一印象非常重要的情景中，人们通常小心策划他们的表演，以便使其行动与他们所想制造的印象一致。例如，一位为开学第一天做准备的老师，就其所要建立的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以下意见。

你决不能让他们占上风，否则你就完了。所以，我一开始总是表现严厉。上新课的第一天，我就让他们知道谁是老板，……。只有一开始严厉，你才有可能逐步放松。如果你一开始就放任自流，当你想严厉时，他们就会只看作你发笑（贝克尔，1952）。

印象管理可能有目的。行动者可能想欺诈、侮辱、迷惑、误导或打发别人。但是，不管目的是什么，正如戈夫曼所指出的，它总是为了使行动者能够更好地控制别人的行为。这样的目的是通过印象管理的过程达到的，这种印象管理能够诱导对方作出行动者所期望的行为。

戈夫曼把针对陌生人或偶然结识的朋友的行动叫做“前台”行为。只有关系更为密切的人才被允许看到“后台”正在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说，了解行动者的真实情感。例如，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境：一位顾客向百货商店的一个职员抱怨衣服的质量欠佳。这个职员表示道歉，并微笑着说，有时由于质检员的疏忽，的确会出现不合格的商品。当这位顾客换了件新衣服离开后，那位职员就与其同事说开了属于“后台”的话：“有些人闲着没事干，只会抱怨！”

前台和后台也可以指实际的物质场所，在这些场所中，只能有某种特定的表演。在典型的中产阶级郊外住所中，客厅最有可能被当作前台，因而进行了仔细的、有品味的装修，以尽可能积极地反映表演者的要求。而没有条理卧室或家里人的房间，则表现出了其后台的特征。在高级中学，老师们的起居室是后台，而教室则充当前台。

有时，两个或更多的人一起协作，组成剧班（team），以制造某种预期的形象。例如，两位职员可能一起演双簧，赞赏某位顾客对于服装的选择，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想尽快成交，以便关门打烊。

偶尔，在制造某种印象时，行动者几乎是无意识地“露出”了马脚，使观众感到，原来他们一直是在看表演。例如，演讲者的声音可能发颤；一个接受访问的人可能会因为过分夸张其放松的样子，而暴露出其内心的紧张。或者，当父母正准备管教孩子时，一个微笑可能就泄露出他们并未生气。当“观众”中的某个人提起某件事实或问起某个问题，而这个事实或问题可以弱化行动者所想制造的形象时，也有可能出现表演失败的情况。

按照拟剧论的观点，当行动者意识到他（她）的表演已经失败，没有能够在观众中制造出所预期的印象时，就会出现尴尬情形。例如，一个被认为是经济学权威的教授，却不知道一份有关经济的重要政府文件，这种无知如果暴露在课堂上，这个教授就有可能陷入尴尬。同样，如果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歌手不能唱出她所赖以成名的高C组E音，她也可能陷入尴尬。面对尴尬时，表演者可能做些挽回面子工作的事，以避免丢脸。比方说，经济学家可能一般性地嘲弄一下政府文件，认为那是有偏见的，不可信的；歌剧明星也可以说，正当她要达到令人震颤的音高时，她吸进了一点灰尘。

但是,戈夫曼指出,表演者的尴尬通常也伴随着观众的尴尬。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观众通常忽视表演中的过失,因此也就帮助表演者保全了脸面。戈夫曼用“有意忽视”(studied nonobservance)一词描述这样一个过程。例如,班上的同学可能降低政府经济报告的重要性,以帮助经济学家保全脸面;针对歌剧的评论也可能故意不提演员唱不上调这一缺陷。“有意忽视”是得体的一种形式。所谓得体,是一个含义更为宽泛的词,指观众帮助表演者保全脸面的各种方式。

就业面试中的印象管理

申请工作可能是一次挫折的经历,也可能是一次成功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你对就业面试的把握。下面是一些成功指南,摘自美国社会学会准备的一本小册子。

一般而言,雇主不会轻易放弃某个合适的人选。相反,他们愿意让面试中表现突出的人填补空缺。因此,对于申请者而言,面试是就业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人们不得不在面试中表现出最好的自我。为了在这一重要关头获得成功,你不必是天生爱交际的人或者优雅的健谈者。但是你的确需要做好充分准备。这意味着在跨进面试办公室之前,你就应当对所陈述的要点胸有成竹。特别是,你应当清楚自己的专长和技能对于你所申请的工作是如何有用。同时,你还应当准备具体说明一系列职业目标以及正在谈论的职位是如何与它们相关的。再者,你应当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特别是一般的就业前景和薪金水平。最后,还应当对你要访问的公司或机构有所了解。

除了汇集种种在面试中可能有用的信息之外,你还应当预想一些可能的问题并设计答案。常见的问题一般与下列话题相关:你的技能以及它们怎样与你所申请的工作相关;你的专业知识;一般的性格特征;有可能不适合于所谈职位的某些偏好或特征,以及你对公司或工作的有关疑问。后者应当联系到下列问题:如所申请职位的职业前途、主要义务和责任等等。在考察工作性质时,可以设计一些问题,以表明你的技能使你非常适合所申请的工作。同时,你所提的问题也应当反映你对正在谈论的公司或机构的了解……。

在面试的当天,应当给自己留出充分的时间做准备。一定要带好几份干净的简历和你的详细材料目录。同时,如果有必要的话,带上一个公文包(也许要装上学期论文、出版物、推荐信和荣誉证明,等等)。在备齐了所有你想随身带去的東西之后,应当确认一下你还像个样子。一定要注意:头发是刚刚洗过的,衣服也是干净的。你通常穿到课堂上去的牛仔服,对于就业面试的场合是不合适的。当然,穿上你最好的宴会服也不合适。应当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某种选择”。应当尽量提前十分钟到达面试地点,以便你能歇口气,并收拾一下自己。当你在等待面试时,看点什么东西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最好不要看报纸或印刷质量糟糕的杂志,以免弄脏了你的手。如果你事先知道,应当记住面试者的姓名,并根据对方是男是女而决定怎样称呼。当你与对方相见时,应当紧紧握手。

一旦你被引进面试办公室接受面试,切记以下要点:

- 千万别紧张。极度紧张会产生负作用。尽力做得最好,消除急躁和不安。同样重要的是,在面试过程中,要把握住自己。否则,你会觉得不熟练,并给面试



者留下拘谨的印象(艾里什, 1978)。

- 你需要就你的职业计划给人以自信且明确的印象, 同时你还应当令人信服地描述你的技能。不要表现出急于得到正在谈论的工作。即使你确实渴望这份工作, 也应淡然处之。

- 在你与面试者交谈时, 应当看着对方的眼睛。在评价一个申请者的表现时, 目光接触是一个重要标准。因此, 面试一开始就应该有这种接触, 并在面试过程中保持这种接触。与此同时, 别把好事做得太过, 也就是说, 不必紧盯着面试者。

- 应当做一个好听众。如果面试者想说话的话, 就让他(她)去说。听话总比说话省事。并且, 面试者所说的话有可能提供某种线索, 这样有助于你推测他(她)所想要的人。

- 你应当简洁明了地回答所有合适的问题, 但是这样做时应当从容不迫。回答问题时应尽量具体, 在谈到以前的工作时应当举例。此外, 应当表现诚实, 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无知(艾里什, 1978)。你可以中肯地评价以前的雇主和同事, 但是, 批评以前与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并非明智之举。

- 你可以不回答那些不合适的问题(例如年龄、种族、性别、民族、犯罪记录等), 或者涉及你个人生活隐私的问题(例如婚姻和家庭计划, 等等)。如果你不想回答, 应当礼貌地加以拒绝。一种方式是反问: “您能告诉我那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吗?” 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最简洁的方式, 即紧接着对方的提问回答: “但是, 我不认为这一点妨碍我做这项工作。”

- 就你所申请的工作而言, 表明你对它的兴趣的最好方式就是问一些相关的问题。先问一些涉及组织的一般性问题, 然后再问那些与你直接相关的问题(柯伦和泰勒斯基, 1980)。

- 你应该在面试结束之前安排一下了解面试结果的方式。如果面试者表示他(她)将很快给你打电话, 但是后来并没有打, 那么, 你就应该往公司或机构打电话。这种恒心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

- 你千万不要在面试当时就接受一项工作。你应当要求给几天或一周时间去考虑, 以便能够仔细权衡某项工作的利弊。有时, 当找到工作那一刻的高兴劲过去之后, 人们的观点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此外, 一定要在得到有关工作的所有条件的书面承诺之后, 再表示接受这项工作, 特别是涉及到有关未来提升的承诺时, 更应如此。

* 男士应当穿西服或休闲夹克, 并配上一条好便裤。无论是穿西服还是穿夹克, 都应当系领带。女士应当穿西服或一套适合日常穿着的衣服。无论怎样, 都不能太暴露。

资料来源: 休伯(Bettina J. Huber): 《用社会学专业知识求职》(Washington, D. 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82, PP. 22~25.)。

关于拟剧论的批评

一些批评者认为拟剧论太过于静态地考察自我了(邓金和凯勒, 1981)。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 我们的自我观念在各种互动中实际上是略有不同的。正如库利(Cooley)的“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概念所表明的那样, 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以了解我们自己, 由于每个人对我们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 当我们与不

同的人在一起时，自我的确是有些区别的。所以，当我们与我们的父亲、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最好的朋友或者一个公共汽车司机互动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表现为不同的人。但是，戈夫曼似乎在想象某种稳定的、永不变化的自我，这个自我在所有的互动中都只是在尽可能地制造最好印象。

另外一些批评者指出，戈夫曼过于把人们描绘成一种玩世不恭的和非道德的形象。我们并不总是在操纵社会情境。有时，我们努力诚实、真实地表白自己（道格拉斯等，1980）。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戈夫曼的玩世不恭用于描述某些当代美国人的行为可能是合适的，但是对于美国社会中的另外一些人或者其他社会中的人来说，这种描述就是很不适用的。

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戈夫曼间接地回应了这些批评，他不再只是关注印象管理。他乐意承认印象管理只是社会现实的一个方面。

2

本土方法论

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1967）在研究陪审团评议时杜撰了“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这个词。加芬克尔对于陪审员们在以前彼此并不认识，并且对于法律的技术规则并不了解的情况下，能够一起工作并作出决定感到奇怪。他断定必然有一套我们大家都不言自明的规则，并且可以运用这套规则去指导我们在新的情境（例如，在陪审团）中的行动，这套规则就是本土方法（ethnomethods）。换句话说，这些本土方法是某种简化程序，他使人们即便是在彼此并不认识的情况下，也能有效地沟通和互动。

本土方法论者与戈夫曼及其拟剧论有着某种共同的兴趣，这就是关注人们在社会情境下为了制造印象而使用的一些技巧。但是，本土方法论者就这些技巧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这类技巧或规则是如何帮助人们形成关于现实的共同意识的，即人们之间为什么有相同的理解？”

主流的符号互动论者认为，我们互动时所遵循的规则是互动过程的产物。与此相对，本土方法论者对这些规则的起源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在特定情境下，人们为了知道怎样互动而运用这些规则的方式（惠伦和齐默尔曼，1987；华莱士和沃尔夫，1986；德诺娜，1986）。

这些指导社会互动的民俗规则涉及许多人们彼此拥有的隐含的理解和预期，或者某些背景假设。人们对于这些背景假设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很少去注意它们。但是，当这些背景假设遭到破坏或挑战时，它们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就很明显。一个男人穿着牛仔裤和T恤去参加一个正式的婚礼，就没有遵循“在这种场合应当注意穿着”这样一般公认的规则。一些客人可能只是对他没有遵守规则感到迷惑不解，而另一些客人则有可能完全回避他。

本土方法论者指出，即便是偶然相遇，也遵循着某些共同的假定。为了证明确实如此，加芬克尔（1967）设计了一种实验，他把这种实验叫作“违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实验者故意表现出对会话背后没有明说的基本假定并不明白的样子。下面就是发生在受试者（S）与实验者（E）之间的一次会话：

（S）：嗨，雷，你的女朋友感觉怎样？

(E): “她感觉怎样?”你是什么意思?指身体还是指精神?
(S): 我是问她感觉怎样。你怎么了?(他看上去被激怒了)
(E): 没什么。只是请你解释清楚一点。
(S): 算了吧,别谈这个了。你向医学院的申请怎么样?
(E): “它们怎么样?”你是什么意思?
(S):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E): 我真的不知道。
(S): 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加芬克尔, 1967)

这样,不仅两个人之间出现了沟通障碍,而且那个作出背景假定的人被另一个并不接受这些假定的人弄得心烦意乱。

在另外一次违规实验中,加芬克尔要求学生与他们家里人进行大约一个小时的交流,并在交流中假装对家中的共享假定并不熟悉,即不再想当然地采用任何作为家庭互动之基础的背景假定。比方说,在互动中,严格遵守礼节,把爸爸称做“先生”,把妈妈称做“夫人”。结果是沟通中断,家里人感到气愤并且心烦意乱。在努力恢复正常情景时,学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家里人的共享假定。

关于本土方法论的批评

许多主流社会学家,特别是一些宏观社会学家,对本土方法论并不熟悉,而且也不相信。他们认为,对于社会学的一些主要问题——如社会设置的特性以及社会中的权力运用等——而言,本土方法论走得太远。而且,这种理论看上去极其模糊和抽象。但是,很明显,揭示社会交往的各种规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本土方法论正是把这一点作为其中心目标。

有些社会学家试图将这些微观层次的规则与那些管理社区与国家的宏观层次的规则联系起来(亚历山大等,1987;柯林斯,1981),这种连接有可能为人们观察社会生活提供令人兴奋的、强有力的新方法。

非语言沟通

在我们与别人交流时,我们不只是对他们所说的话作出反应,实际上我们也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反应。例如,假如某个教授说他(她)对你关于某个问题的想法非常感兴趣。但是,你讲话时,却看到了他(她)那止不住要打哈欠的神态。从那时起,教授表现的非语言部分肯定会影响你的行为表现。

在人们的日常互动中,非语言交流之多令人吃惊。据估计(伯德威斯特尔,1970),多数人一天只讲10~11分钟的话。通常情况下,在两个人交谈时,语言对情境的社会意义的表达平均不到35%,剩下的65%的意义都是由非语言的方式表达的。

借助符号而不是语言所进行的沟通被叫做非语言沟通(nonverbal com-

munication)。身体外貌、衣着和个人财物，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非语言沟通形式。其中，两种最重要的非语言沟通形式是身体语言（包括动态或静态的体语和面部表情）和个人空间。

1

体态语言

面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s）它是如此直接地展示着情绪的变化，因而可能是非语言信息的最丰富的源泉。在与人交谈时，我们通过不断地观察对方的脸色，以了解他们对我们说话内容的反应。我们也试图恰当地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是，由于面部表情很难读懂，因此，要解释它们的意义通常也是很难的。

但也有证据表明，诸如恐惧、快乐、惊讶和气愤等情绪的表达方式是共同的。当研究者将这些表情的照片给现代文化中的人和与世隔绝的传统文化中的人看时，他们都能将每种表情的意义正确区分（埃克曼和弗里森，1971）。大家普遍认为，这类表情反映了一种天生的生物安排，也就是说，是自然具有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人们不必去学习；并且，事实上，这些表情在所有文化中都传达着同样的意义。

相比之下，在不同的文化中，动态体语（gestures）——也就是通过身体或四肢的运动以表达某个意图、某种情绪或态度——所表达的意义是非常不同的。例如，在美国，上下点头意味着“是的”，而左右摇头则意味着“不”。但是，马来半岛的萨芒人把头向前伸表示“是的”，而马来西亚的矮小黑人则通过往下看以表明“不”。对于埃塞俄比亚人而言，交手的姿势（把一个手腕交叉放在另一个手腕上，并同时按照相反的方向移动双手）意味着向一位妇女示爱；在以色列，这个动作曾经具有军事意义，而现在则意味着双手被“禁锢”或受了伤。在埃塞俄比亚，手袋式的动作（伸出手，摊开手掌，然后将五个手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点）意味着乞讨食物；而在以色列，这是“慢一些，保持耐心”的标志（舍勒，1985）。

静态体语（posture）——即人们身体或四肢保持某种状态的姿势——也是体态语言的一种形式。与有意控制的面部表情和动态体语不同，人们通常没有考虑自己的静态体语。因此，人们常常通过静态体语“暴露”出他们本来不打算泄露的信息。

2

个人空间

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利用个人空间（personal space）——环绕一个人四周的直接区域——以传达某种意义。但是，在更多的时候，这样做通常是无意识的。个人空间的一个方面，即谈话人之间的人际距离，尤其有意义。人际距离通常用身体之间的空间距离来测量。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 1966）曾经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空间距离是怎样表明人们彼此间的情感的。

正在生气或者强调各自观点的人们，总是越凑越近。他们抬高嗓门喊叫，好像这才是正常的。与此类似，正如所有女人都知道的那样，一

个男人示爱的最初迹象之一就是向女方靠近一些。如果女方不是同样感到有意的话，她对此的反应就是向后退。

霍尔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个人距离有四种基本类型，每种类型的距离又都有其自己的活动和关系特征。人们选择特定的距离进行互动，不仅反映着，而且有时还形塑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理论可能只对霍尔所研究的人适用，即美国东北部的健康的中产阶级成年人。

在亲密距离（intimate distance，从实际接触到彼此相距 18 英寸，大约 45 厘米）内，另外一个人的出现会让人不知所措。在这个距离内，一方可以感觉到对方的气息，并能详细地看到对方的身体。这是求爱、安慰和保护的距离。尽管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孩子们在各种公共场合保持这种距离，但是对于许多成年人而言，在公众场合保持这种距离是不合适的。

在个人距离（personal distance，从 18 英寸到 4 英尺的距离，大约 122 厘米）内，一般是与密友和相爱者进行互动。在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从 4 英尺到 12 英尺的距离，大约 365 厘米）内，可以处理一些非个人事务。除非受到空间限制，人们在偶然的交际场合也保持这种距离。12 英尺以上的距离叫做公众距离（public distance），知名人士在给别人做演讲时，一般保持这个距离。

霍尔指出，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类似的个人空间，尽管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中的具体距离有些差别。欧洲大陆人通常采用的彼此说话的距离，在美国被认为适合于更为密切的私人关系。霍尔（1966）所访问的一个美国人说：“这些人离得太近了，眼睛都对上了。这样确实让我很紧张。他们把脸贴得太近，让人觉得他们就像‘在你身体里’似的”。

关于个人空间的文化定义也体现在人们对于居室、房门和办公室的看法上。德国人觉得房门保持了房间的完整，并且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一条必要界线。例如，在德国人的办公室里，门一般是坚固的，并且总是关着。但是，在美国，关着门可能意味着屋里人不愿交际，甚至是一种搞阴谋的迹象（施瓦茨，1967；霍尔，1966）。与此同时，美国人和德国人都倾向于把总经理的办公室安排在大楼的某个角落，而法国人则把正中央的办公室看作是最受尊敬的。在法国，办公室和城镇通常都是围绕某一中心向四周辐射，那些最重要的人以及最重要的地点和机构，都处在中心位置（霍尔，1988）。

还有证据表明，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对于不同性别的人是不同的。有位研究者指出，男人一般比女人需要更多的个人空间（爱泼斯坦，1986）。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在一间拥挤的屋子里，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弗里德曼，1975）。

社会互动的形式

在社会学的先驱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19 世纪末的德国社会学

家)之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已经区分出并且分析了许多种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那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突出的互动形式有交换、合作、冲突、竞争和强制。尽管我们分别地讨论这些互动形式,但是,实际上它们常常是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

1

交 换

个人或群体采取某种方式彼此交往,这种交往旨在获得报酬或回报,这样形成的关系就是交换关系。许多关系都是属于这种类型,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受雇者按照雇主的意图去做事,那么他(她)就会获得一份薪水的回报。

回报并不一定是有形的。许多社会交换关系提供的是情感回报,就像人们只是为了接受感谢而对别人作出某种行为一样。与目的明确的行动相比,人们更多的是无意识地期待别人感激(布劳,1964,1987)。为一个想从自动售货机上买烟的陌生人换点零钱,帮助一个老人过马路,给生病的同事送件小礼物,所有这些行为都隐含着期待别人感激你。

在亲密的交往中,交换关系也是重要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爱并不完全是基于某种预期的回报。然而,期待回报却是这种关系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完全不能从他(她)所付出的爱中获得任何感情或感激的回报,那么其爱的感觉将有可能消失。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社会交换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互惠。按照这一原则,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每一次让渡都包含着关于某种回报的期待。这种回报可能是当场兑现的,也可能是日后再说的。但是,关于最终可以获得相应回报的某种预期的确指导着整个关系。互惠原则假定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基本的平等关系,它有助于通过创造持续的相互间的义务来维持交换的平等。

交换关系是交换理论的研究主题。基于一些与符号互动论完全不同的假设,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对微观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作了最好的阐述。霍曼斯的理论将行为心理学或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只关注那些可以观察和测度的行为)的一些原则应用到社会学中。

在汲取其哈佛大学同事、行为心理学家 B. F. 斯金纳(B. F. Skinner)思想的同时,霍曼斯(1961,1974)指出:在人们彼此交往的背后,自我利益是一种普遍具有的动机。就像斯金纳的心理学实验中的动物一样,人们做事情是为了获得酬赏。并且,如果某种行为得到正面强化或奖赏,那么,这类行为将来更有可能重复出现。

这种观点假设人们所考虑的是净收益,也就是说所获得的收益必须减去成本。例如,某种关系即便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心理痛苦,但是只要从这种关系中所获得的酬赏继续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人们就不会终止这种关系。而且,由于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机会建立可以提供更多酬赏或付出更小成本(或者兼而有之)的关系,当事人也有可能继续保持原先那种没有酬赏的关系。

因此,按照交换论者的观点,许多人类社会生活可以还原为某种关于酬赏与成本的计算。这一逻辑被用于考虑婚姻、友谊,甚至包括仅仅为某人做好事的行为。由于人们发现互动的好处,人际互动的稳定模式才得以形成并维持。

交换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在夫妇关系的研究中(勒文热,1979)。大多数夫妇并没有有意识地用成本和酬赏、借方和贷方的观点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他们从事很多种交换。交换的项目可以包括诸如家务劳动和经济支持之类有形的东西,也可以包括诸如情感支持和身心愉悦等无形的东西。按照勒文热(Levinger)的观点,某种关系的稳定性取决于这类交换对于当事人双方的满足程度。在一种稳定的、持续的关系中,各种交换是想当然的。当某种关系开始变味时,当事人就开始特别注意自己为对方做了些什么。当他们觉得其成本大于收益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结束。

一般而言,在社会学内部,对于交换理论和行为主义的批评是非常激烈的,而来自符号互动论的批评尤其如此。符号互动论者认为,交换理论在概念上就很狭隘,它根本不考虑意义、价值、动机、意图以及自我等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而这些在符号互动论者看来是极其重要的(邓金,1986a)。例如,符号互动论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不了解既定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奖赏,什么是代价?”然而,各种社会中交换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并且,目前交换理论在社会学中越来越重要。

2

合 作

合作是指这样一种互动形式,即由于有些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对于单独的个人或群体来说很难或不可能达到,于是人们或群体就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正如功能主义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在广义上讲,所有社会生活都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合作,社会不可能存在。人们结合成群体和社会,是为了对付诸如洪水、饥荒和疾病之类的环境威胁。他们一起工作以更好地满足个人需要,并彼此保证安全,以防来自其他群体的威胁。

有人区分出了四种主要的合作类型(尼斯比特,1970)。最古老和最具普遍意义的合作形式是自发合作或互相援助。这种合作直接产生于某种情境下的实际需要和可能,例如两个人一起做家庭作业以便都能获得好成绩;或者,当目击一次事故时,人们一起工作以救助伤员。

有时,原来自发的合作,逐步变为稳定的社会习惯,因此合作被制度化了,这种合作叫做传统合作。例如,在美国早期的边疆地区,居民们有一种传统,即大家一起互相帮助搭建谷仓和收获庄稼。

现代社会更多地依赖指导合作而不是传统合作。所谓指导合作是指双方在具有权威地位的第三方的管理和协调下进行合作。这个第三方可以是雇主,他告诉两个一起工作的人协力完成某项工作;或者,第三方也可以是游泳指导,他让学生们下水时要结队而行。

现代社会也同样依赖契约合作。所谓契约合作,是指个人或群体之间正式同意以某种方式进行合作,并对彼此的职责进行清楚的界定。例如,当年

轻的父母们决定轮流照顾彼此的孩子以便各自都能抽出时间做别的事情时，他们就是在进行契约合作。

3

冲突

作为合作的对立面，冲突是针对珍稀物品或价值的斗争（尼斯比特，1970）。为了达到所向往的目标，打败对手是必要的。正如社会学中的冲突论所强调的那样，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和有价值物是有限的。个人在追求这些稀缺资源时必须竞争。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每个人都尽力去征服别人。

乔治·齐美尔（1955）概括了冲突的四种主要类型：群体之间的战争，群体内的冲突，打官司（指合法处理并且通常是在法院加以解决的冲突）和理念之间的对立。与对于具体财产的各种冲突相比，理念之间冲突通常是最残忍和最具破坏性的。例如，在今天世界上许多最严重的冲突背后，都可以看到宗教观念的差异。中东和北爱尔兰地区的冲突就是如此。

由于冲突通常导致苦难，人们一般都对它持否定态度。但是，继齐美尔之后的一些当代社会学家已经指出，冲突也有一些正面效果（科塞，1956）。例如，冲突可以成为一种促进对方紧密团结的力量；通过强迫冲突双方坐下来谈判并直面他们的问题，冲突也可能导致必要的社会变迁。这些社会学家还指出，即便社会能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消除冲突，但这也许并非理想境界。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将是毫无生机、沉闷乏味的社会。

4

竞争

竞争是遵循某些规则的一种合作性冲突，在这种形式的互动中，达到所追求的目标要比打败对手更重要。就像冲突一样，竞争的一方获取目标，而另一方面面临失败。但是，这里打败竞争者不是主要目的。与卷入合作性互动中的人不同，竞争者通过各自的努力去获取目标，并且彼此之间处于竞赛状态。

为了防止竞争转变为冲突，竞争双方必须预先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在遵守这些规则上必须协作。这一点适用于市场竞争、教室里学生之间的竞争以及足球队之间的竞争。竞争在西方社会中尤其普遍。例如，它就是美国式个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

5

强制

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另外一方时，强制这种互动形式就出现了。在本质上讲，所有形式的强制都是以使用物质力量或暴力的威胁为最终基础。但是，一般而言，强制的表现要微妙得多。对于父母的爱，对于国旗的敬重，对于上帝的信仰，以及对于孤独的恐惧，都可以作为强制的手段。

像冲突一样，强制通常也被看作是一种负面的社会互动形式。但是，强制也有正面的社会功能。尽管父母们和教育工作者们在培养孩子时使用很多策略，但是在社会规则教育的背后，通常隐含着惩罚的威胁：做错事的男孩

被送进他自己的房间；把三轮车骑到高速公路上去的女孩要挨板子。

社会网络

研究社会互动的另一种方法侧重研究人们所属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由个人之间复杂的联系网所组成。网络与群体有着某种相似性：其成员之间偶尔有互动，并通常共享某种认同感和团结感。他们可能还有某些共同目标和期望。但是，与将群体（即便是次级群体）成员凝结在一起的各种关系相比，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一般更具有局限性和弥散特征。

许多网络是我们一生中自然地结成的。在我们步入成年时，我们成为各种网络的成员，如亲戚网络、邻居网络、校友网络，以及我们父母的朋友和同事网络。尽管我们加入这类网络时毫不费力并且通常也不假思索，但是，在我们后来的生活中，这些网络所提供的资源会对我们作为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就职业流动而言，网络分析进一步证明了一个长期被怀疑的事实：尽管机会平等在口头上说得好听，但在事实上算数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

社会网络发挥着若干重要功能。首先一个是，一个人的许多决定和选择，都受朋友网络、家庭网络或同事网络的影响。同时，网络也是信息和建议的一个基本来源，不管是对找个地方住的移民而言，还是对一个想在暑假找份工作做的学生而言，或者是对想找个好的日托中心的父母而言，都是如此。此外，网络还可以为个人提供同伴。

最近，在职业领域，建立网络这个词已成为一个关键词汇。它通常是指为了结识“合适”的人而进行的社会交往。例如，某家大公司的一位员工可能会尝试与公司管理层的某些人士结识，比方说在公司的聚会上或在高尔夫球场，这样结识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喜欢他并有助于他的发展。

1

网络特性

各种网络之间在其特性上有着巨大差异（霍林格和哈勒，1990）。人们已经仔细研究了多伦多地区英裔加拿大东约克人这一群体的各种网络（韦尔曼，1979）。研究者向东约克人询问了一些详细问题，例如：他们觉得最亲近的人是谁？这些人住在哪里？他们之间的亲近是因为彼此是亲属、是朋友呢，还是因为彼此是同事？他们之间怎样保持联系？研究者们还测定了所列举的亲密关系是否是通过各种社会网络而联系起来的。即使东约克人住在大都会多伦多的其他部分甚至更远，但是他们都报告说每周见面或打电话是常有的事。

研究发现：这些网络大多数“松散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大多数被访者属于多重网络而不是属于某个单一的、紧密联系的群体。但是，生活在这种松散地连接起来的网络中，并不意味着有孤立的感觉。只有2%的被

访者报告说，他们在家庭之外没有觉得亲近的人，而 61% 的被访者报告说他们至少有五种亲密关系。

正如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各种社会网络之间相互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们的密度。这种密度的范围包括从非常松散的连接到非常紧密的连接都有。所谓密度，指的是网络中个人关联的程度。如果你的大多数朋友都彼此相识而不只是认识你，那么，你的朋友网络是紧密的连接，或者说是稠密。如果你的朋友们彼此一般都不认识，那么你的朋友网络是松散的连接。有很多证据表明，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通常拥有的是较为松散地连接起来的社会网络。

网络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多重关系卷人的程度。所谓多重关系，指的是两个人卷入交往的多种方式。这种交往可能是简单的单向交往——例如，售货员与其顾客之间的交往；也可能是多重关系的交往；例如，那些卷入家庭生活的人们之间的交往（肖尔丁，1984）。一项关于加利福尼亚居民的研究已经揭示，年轻人、参加工作的人以及拥有高学历的人，最有可能拥有多重交往关系（弗希尔，1982）。而且，这项研究还与较早的一些理论形成对照。较早的一些理论认为，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之间有着大量交往，但是，这种交往比农村居民之间的交往更具表面性。而关于加利福尼亚的研究则表明，拥有较大网络的人，同时也有更多的多重关系。这项研究总结到：当我们与更多的人交往时，我们“实际上可以享受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

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可以根据其强弱程度进行分析。所谓强关系（strong tie），是指人们在其中投入更多时间、更多情感，并且彼此更为亲密也更为频繁地提供互惠性服务的关系。当我们遇到个人麻烦时，我们向谁求助？我们一般是向那些与我们有着强关系的人求助，并且，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最亲近的朋友或同性邻居。我们还倾向于将我们的亲密关系进行区分：一些人可以充当具有同情心的听众，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理解；另一些人则可以帮助我们做些实事。同时，在对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时，我们也会进行报答（韦尔曼和沃特利，1990）（若想了解一个依赖于维持强的、具有多重交往的、稠密的社会网络而生存下来的群体，请看“全球社会”栏：“具有古老秩序的基督教门诺派中的严紧派：社会网络作为社会控制手段”）。

所谓弱关系（weak tie），是指那种自我卷入不多甚至没有卷入的关系（格兰诺维特，1973）。大多数人们有着比强关系多得多的弱关系。但是，不应低估弱关系的重要性。一项关于人们改变工作的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被访者而言，一次社会接触可以提供关于新工作的信息，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所接触的人只是处于目前社会网络之边缘的某个人……”（格兰诺维特，1973）。在众多拥有技术和专业特长的人们之间，弱关系在培养某种忠诚感方面也是重要的，同时，它还有助于会议和聚会上的信息与思想交流。



具有古老秩序的基督教门诺派中的严紧派：社会网络作为社会控制手段

对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社会网络是扩展我们视野的一种渠道。通过每个新结识的朋友或熟人，我们得以拓展思想和经验的范围。但是，有些群体则运用这种社会网络严格限制其成员与外部世界的互动。

具有古老秩序的严紧派共同体，坚定不移地拒绝按照他们周围现代世界的人们的期望行事。尽管目前美国社会的其他部分都已想当然地把诸如电、室内抽水马桶、汽车等当作“必需品”，但是，严紧派人还生活在与其200年前的祖先几乎一样的不境里。这就意味着没有电，没有室内抽水马桶以及其他现代生活设施。几乎所有的严紧派男人都是农民，他们使用同样的工具耕种土地，而这些工具早在18世纪就开始使用了。一般的严紧派妇女在20岁出头就结婚，然后终其一生生儿育女，并操持家务。

尽管现代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诱惑，严紧派人还是能够保持其共同体的繁荣昌盛。在1900年，他们大约有5000人；到1990年，在美国20个州和加拿大，严紧派成员已有超过10万人。由于严紧派共同体并不吸收外来者，所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严紧派成员的急剧增长意味着：在严紧派传统中养育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当他们进入成年时，都会决定维持严紧派的生活方式。

什么东西使严紧派团结在一起？早在300年前，雅各布·阿曼（Jacob Amman）就发现，严紧派宗教维持着对其信徒的严格控制。一个重要的控制就是禁止与非严紧派社会的接触。一般说来，严紧派的男人或女人只与那些和他们同属一个共同体的人交往。即便是与其他严紧派共同体的交往也只是偶尔发生，而与门诺派教徒——严紧派所叛离的一个宗教群体——的交往则是不存在的。

严紧派成员几乎完全凭良心判断是非。当然，良心浸润于他们的传统之中。由于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严紧派成员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从孩提时代起，严紧派人就被告知：要拒绝所有形式的外部诱惑。当严紧派人到了接受洗礼的年纪（一般是16岁）时，他（她）都能很好地意识到信仰的需要以及违背信仰的后果。

尽管每个严紧派的居住点都有牧师领导，但是控制的力量并不仅仅来源于牧师。严紧派人采用许多有效的约制手段（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以保持成员们的一致。其中，负面的约制手段包括了从相对温和到非常严厉的一系列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涉及到严紧派成员的社会网络。

例如，假如人们知道某个严紧派的男人与某个非严紧派的人（或者，按照严紧派成员的说法，叫做“讲英语的”）女人交往。那么，最初的否定性约制可能是非正式的：那个严紧派男人的过错在社区内到处传播，他还遭到嘲笑、耍弄以及其他形式的群体非难。如果这个违规者还不修正自己的行为，那么接下来的惩罚可能变得更加正式：某个牧师将去看他。这个牧师可能要求那个违规的男人在社区成员面前详细供述他的罪恶并请求原谅。

如果这些约制并不足以使那个违规男人走出迷途，牧师就有可能被迫采取最终的惩罚——美当（the Meidung，或叫“隔离”）。所谓美当，是指全面禁止该成员与严紧派其他成员的交往。这种惩罚是由牧师执行的，但是须经全体教徒的同意。一个遭受美当惩罚的严紧派男人或女人，与整个社区就失去了联系，包括失去与他（她）自己家庭的联系。并且，任何破坏这一规矩并与隔离者交流的人也将遭到惩

罚。只有当受罚者承认其过错并请求共同体原谅时，才可以解除美当。不过，美当的执行通常是少见的。一般情况下，闲话和群体非难等非正式的约制就足以使一个违规者循规蹈矩。

但是，与负面约制相比，严紧派用以维系其共同体的正面约制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那些遵循严紧派传统的人会得到其他共同体成员的深爱 and 友谊。

一些现代观察者们认为，对于现代世界的某种适应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已经要求严紧派教徒给他们的马车安装前灯），因此他们怀疑严紧派的生活方式在今天能否继续下去。但是，作为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严紧派共同体已经存在了 300 多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能继续繁荣下去。

资料来源：选自克菲阿特和泽尔内（William M. Kephart and William W. Zellner）：《极端群体》（Extraordinary Groups, 4th ed, 1991）。

2

小世界研究

一项旨在探讨横跨美国的网络联系的有趣研究就是“小世界研究项目”，取意于“世界毕竟很小”（特拉韦尔和米尔格朗，1969）。研究者想弄清的是：一份文件由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某个人手里，仅仅使用关系传递的办法，传到马萨诸塞州沙伦的某个人手上，到底需要花费多长时间？这份文件被寄到一组随机的奥马哈居民手中，同时将在沙伦的最终收件人的姓名告诉这些居民，并提供相关的传递指导和用于与研究保持联系的明信片。研究者告诉被选中的居民：如果他们自己不认识最终收件人（一位证券经纪人），他们应当将文件传给更有可能认识他的人。

结果怎么样？在奥马哈的居民与最终收件人之间，平均只需要五个左右的中介人，就可以将文件传递到。考虑到美国如此之大，但是却只要大约五个中介人就可以把任何两个人联系起来，这一点是令人吃惊的。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看待城市特别具有重要意义。那些巨大无比并且看上去毫无组织的人口中心，实际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网络。后来的研究甚至表明，只要经过两三个朋友的朋友，通常就足以将这个世界的任何两个人联系起来（科克恩，1989）。

3

网络分析的重要性

传统上，社会学关注的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由于网络分析关注个人之间的联系，它已经对社会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更具动态的视角，为分析社会系统的内在运转过程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像本章所讨论的每种视角一样，网络分析强调个人在社会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作用，而不是被动地适应超越个人层次的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弗希尔等，1977；弗希尔，1982）。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社会互动,指人们以相互的或交换的方式对别人采取行动,或对别人的行动作出回应,它是人类存在的重要方式。我们不断地意识到我们的行动对于别人的效果。反过来,别人的期望影响着我们自己的大多数行为。与其他动物间的互动相反,人类互动是有意义的。

2. 作为早期人类互动的研究者,乔治·H·米德的研究重点是行动——某个人在某种情境下的全部反应。按照米德的观点,人类反应与动物反应不同,我们在作出反应之前要进行有意识的思考。而且,人类拥有自我——一个我们与之“交流”的内在的“人”,就像我们与别人说话一样。米德把与我们自己“交流”的行动看作人类意识的最重要的特征。他强调人类互动是以为文化所定义的符号为中介的。我们在理解那些符号的基础上彼此互动。

3. 符号互动论是指强调符号和意义在人类互动中之重要性的一种社会学理论。H. 布鲁默(米德的学生)总结了互动论的三个原则:(1) 根据我们对于事物所赋予的意义,我们对之采取行动;(2) 我们对于事物所赋予的意义是社会互动的结果;(3) 在任何情境下,为了赋予情境某种意义并决定怎样行动,我们都要经历一个内在的阐释过程。在特定社会情境下,这一阐释过程通常包括米德所说的角色借用,即假定承担别人的角色并试图理解别人的思想和情感。

4. 许多活动是常规性的,并涉及我们无意识中获得的且想当然的许多定义。我们的共享定义指导着人类活动,甚至当这些定义与客观现实不一致时也是如此。

5. 拟剧论和本土方法论是理解社会互动的两种特殊的理论视角。艾文·戈夫曼关于人类互动的研究被称为拟剧论,这种理论把人们看成是戏剧中的演员,它宣称人们是在按照社会剧本的要求扮演各种角色,并且人们的表演要接受观众的评判,观众对于可能揭示演员真实性格的某些过失非常警惕。这种角色表演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印象管理或自我呈现,即向别人表现我们自己,以便他们能够按照我们的愿望看待我们。人们的行为既包括“前台”行为,又包括“后台”行为。“前台”行为针对的是他们并不熟悉的一般观众,“后台”行为则是针对亲密朋友的。在有些情况下,人们组成剧班以表现某种印象。当印象或形象遭遇别人挑战时,通常会导致尴尬。

本土方法论是分析人们在日常社会互动中所遵循的一系列规则的一种社会学方法。按照本土方法论者的观点,所有日常社会互动都遵循着某些背景假定或“规则”,这些假定或“规则”形成了有序沟通的基础。违规实验已经表明了各种背景假定在人类互动中的重要性。在这种实验中,实验者假装并不明白谈话背后没有明说的一些假定。

6. 非语言沟通,即通过符号而不是语言所进行的沟通,是人类互动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种最重要的非语言沟通是体态语言和个人空间。体态语言包括面部表情、动态体语和静态体语。人际距离是个人空间的一个方面。按照爱德华·T·霍尔的观点,美国人之间的交往有四种距离: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会距离和公众距离。

7. 社会互动有几种主要形式。交换关系是指某个人或群体采取某种方式,与别的人或群体交往,这种交往的目的在于获得酬赏或回报。互惠是交换关系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每次让渡都包含着获得相应回报的预期。作为社会学解释互动的一种理论视角,交换理论部分地基于行为心理学的一些原理。

合作是指人们或群体为了满足共同利益或达到共同目标而一起行动,这些利益或目标单靠一方是难以实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合作可以是自发的、传统的、被指导的,也可以是契约的。

冲突是合作的对立面,指的是针对有价值物或价值观的斗争;这里,为了达到预期目标,打败对手被认为是重要的。

竞争是一种合作性冲突,它受一些规则约束,达到目标比打败任何对手更重要。竞争规则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

强制是指某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给别人的一种倾向。尽管它最终依赖于使用暴力或体罚的威胁,但是,它通常所采取的是一些更为微妙的约制手段,如爱国主义、爱情、信仰或恐惧等。

8. 社会网络是指个人之间的复杂的联系网。网络在帮助个人形成意见和作出决定、获得信息和建议以及找到同伴等方面是很重要的。这些网络或密或疏,或者卷入多重关系或者只是单向交往,并且表现出或强或弱的联系。小世界研究表明,那些大规模的、看上去毫无组织的人口中心,实际上充满着社会网络,人们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网络分析为社会学研究增加了一个重要维度,它侧重探讨个人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关注个人或群体的特性。

推荐阅读书目

1. 贝克尔(Becker, Howard S.)和麦可(Michael M. McCall)主编,1990.《符号互动论与文化研究》(*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这是一本有关符号互动的、资料非常丰富的书。社会科学家们在此讨论了他们的研究主题,如说话和讲故事的方式、城市和农村的巫术实践、油画所传递的信息以及健身潮等。

2. 彼得·博格(Berger, Peter L.)和托马斯·卢肯曼(Thomas Luckmann.),1980. Reprint of 1966 ed.《现实的社会建构:社会学知识论文集》(*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这本书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我们关于日常现实的知识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而得以发展和维持的。

3. 布卢默 (Blumer, Herbert.), 1986. 《符号互动论: 理论与方法》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这本书总结了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原理。

4. 伯恩斯 (Burns, Tom.), 1991. 《艾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New York: Routledge.) 这本书对戈夫曼进行了详细研究, 探讨了迪尔凯姆、齐美尔和芝加哥学派对戈夫曼的影响。

5. 查伦 (Charon, Joel M.), 1989. 《符号互动论: 介绍、阐释与综合》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 Introduction, an Interpretation, an Integration*,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这是一本介绍符号互动论原理及其应用的通俗易懂的著作。

6. 戈夫曼 (Goffman, Erving.), 1959.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 书中常常用生动的例子说明戈夫曼的拟剧论。对拟剧论感兴趣的同学还可以看《避难所》 (*Asylums* 1961, New York, Doubleday) 和《诬蔑》 (*Stigma* 1964,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两本书。

假设你的婴儿期和童年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房间里度过，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人类接触。你能用一种人类语言说话吗？你会有自己的人格吗？或者，你能体验到人类的情感吗？

三个在极度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孩童个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部分答案。这三个孩子是安娜、伊沙贝尔、珍妮（戴维斯，1940，1947；格罗金等，1974）。安娜是个私生子，母亲由于害羞，生下安娜后，便把她藏在一间房子里，不与人接触。发现安娜时，她已经六岁半了，当时还不会走路、说话、自己吃饭，也不会保持自己的个人卫生。她没有任何情感表达，对人十分冷漠。安娜被发现后，首先被送到一个智残儿童之家，尔后又送到一所育婴所。她的社会技能逐渐提高，到11岁她去世的时候，她已开始学会说话。

伊沙贝尔也是一个私生子，被她的聋哑母亲藏了起来。尽管伊沙贝尔没有学会说话，但她与她的母亲可以通过手势进行交流。像安娜一样，她也是6岁半的时候发现的。当她首次被发现时，她对别人的行为就像“野兽那样”。然而，与安娜不同的是，照料伊沙贝尔的人使她接受了强化训练。只有几年的时间，伊沙贝尔获得了与同龄儿童相似的正常发展水平。

珍妮在18个月左右的时候，被锁在一间小屋子里，发现她时，她已有13岁。她童年的许多时光是在一个小便桶椅上度过的，她父亲把她捆在小椅子上，一呆就是许多昼夜。没有被捆在椅子上时，她就被放在婴儿床上，

置于一个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她的瞎子母亲被允许给她喂食，但其父不允许她们在房子里发出任何嘈杂声。她的父亲、哥哥甚至不与她说话，确切点说，他们对她像使唤狗一样。

到发现她时，珍妮已是一个消瘦憔悴、情感受滞的少女，她既不会站、也不会说话。医生没有发现珍妮有任何生理上的缺陷，于是心理学家认为，由于长期的社会隔离，剥夺了她说话的能力。珍妮后来被带到医院接受治疗，在那里，她似乎懂得了一些单词，但呆了一年后，她还不能产生自我。尽管在许多方面，她都取得了进步，例如，学会使用厕所，但是她从未掌握说出一个完整句子的技能（派尼斯，1981）。

当然，儿童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成长的例子是极个别的情形，但他们表明，一个人的出生是情感性和社会性的，也是生物性的、无助的。要成活下来并完全成长为人类中的一员，就必须与他人有正常的互动。他们必须向他人学习如何思考和行为。这种互动和学习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社会化的正式定义就是：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

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生，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大致是相似的——不管是生在洛杉矶、孟买，还是特洛布里安岛（Trobriand），尽管各地的文化内涵千差万别。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婴儿从一个人类的动物转化为了社会的存在。当人们度过他们的童年的时候，他们已被教会了社会所期待的行为模式、语言、技能，以及如何去扮演一系列角色。即使成年后，社会化过程仍在继续，新的角色和技能仍需学习。这样，社会化在人的整个一生中都在继续——在人的发展的每个阶段，包括出生、童年、少年、青年、成年、老年直到死亡，社会化都是存在的。

社会化不仅对个人的生存、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社会的生存与有效运作也是如此。事实上，没有社会化就没有社会（埃尔金和汉德尔，1978）。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成员一起行动共同支持、维护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才会生存下去，所以每个社会都会塑造成员的行为来达到此目的。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当人们感觉到自己想做的正是社会所期待的，并且社会之期待也最好地满足了社会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化过程才能有效地运作。

人类生物学与社会化

社会化过程与人类生物学密切相关。人有六年左右的时间处于幼年期，也就是说，这是完全依赖于他人的时间，此后的14年是少年期。这样，整个生命的15%~25%的时间是依赖他们父母的。与其他动物相比，甚至与其他灵长目动物相比，这都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然而，就是这个延展了的依赖时期，为学习文化意义与社会技能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也与他人和社会总体建立了终生的社会和情感联系。

如果人类有很强的社会本能,或者有遗传的生物性的固定行为模式,社会化过程就没有必要了。然而,正如第三章所指出的,人类缺少这些本能,替代它的是文化。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学习文化模式。这就是社会化过程的目的。

在低级动物那里,它们是靠本能而不是文化指导群体生活,幼仔可以在非常小的时候就独立生活。动物幼仔把它生下来最早见到的移动客体当作“母亲”——一个叫做印模(imprinting)的过程,但是一个幼鸭仔即使它所见到的第一个移动客体是母鸡,它也会根据本能去找水、游泳。缺乏本能,一个未受到保护的人类婴儿的生存机会比大多数新生动物就要小得多,但同时,动物对本能的依赖将它们局限在了一套固定的行为模式上。

尽管很少有科学家认为存在真正的人类本能,但是,许多人坚持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受到生物遗传的影响很大。这种观点在19世纪尤为流行。今天,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强调文化影响社会行为的重要性,然而,生物与文化,或者“自然与教养”之间的对立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甚至人类身体还受文化和环境的影响。社会阶层是一个广为研究的环境因素。社会学研究表明,父亲属于高收入阶层,其子女就会比低收入阶层群体的子女个子要高些(雷诺兹,1976)。理由之一就是,高收入的家庭,能够提供较好的营养。另举一例来说,少女青春期的开始是基因所控制的发育过程的一部分。但是,20世纪以来,这一开始年龄平均每十年下降4个月,这是像甜食、健康照料及医疗等环境因素的结果。

很少有科学家认为,人类行为完全是由遗传基因或者环境所单独决定的。大多数科学家都确信,人类行为是由两者共同形塑的。然而,他们并不认为遗传基因的影响程度会有多高。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由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廉逊(Edward O. Wilson, 1975, 1978)所领导的社会生物学家(sociobiologists)群体的工作。

尽管有人指出,人不是仅仅由百分之一的基因材料所复制的,社会生物学家却看到,像动物一样,大量的人类社会行为是有机体的后果,而不是文化演变的结果(格里本等,1988)。他们断言,人类基因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一种程式,规定了我们的社会行为,就像它形塑了我们机体的物质特征那样。在今天人类身上所发现的具体的基因信息就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认为,那些最能适应其环境的个体将最适合于生存与繁衍。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适者生存”的理论。我们最经常想到的适应特征,主要是一些物理性状——身高、强壮、快速。但是,适应这个概念,社会生物学家也用之于社会特征的分析,比如爱的能力,与他人相处的能力。不管这些特性是物理的还是社会的,那些较能适应者生存下来,并把他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经过许多代的传衍,优势基因在群体中传播开来,最终,整个种群都将拥有与这些基因有关的特性。

在生物学的术语中,适应与生存有三个含义:个体的(personal)适应与生存(存活时间长),繁衍的(reproductive)适应与生存(生育为数众多

的、健康的下一代),基因的(genetic)适应与生存(所有拥有相同基因者的继续存在,它包括所有的近亲,而不仅仅是其直接后代)。社会生物学家主要是针对第三层含义来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些重要特征的。

举例来说吧,利他主义行为,是一种反映顾及他人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形式,经常被认为是完全的文化行为,它与“丛林规律”(the law of jungle)直接对立。许多人相信,它源自于宗教,或者来自于其他更高水平的价值系统。但社会生物学家们指出,大量的利他主义行为主要有益于家庭成员及其近亲,因而这是一种强烈的生物行为。如果一个妇女牺牲她的生命(极端的利他主义)去从大火中抢救她兄弟的孩子,就基因而言,她实在是一种“自私”(道金斯,1976)。她是在强化她的近亲基因的生存。同样,夫妻之间“为了孩子”而维持婚姻,也许也是为了通过孩子来促进他们自己基因的生存,因而也就营造更为安全的环境来养育子女(巴拉什,1977)。社会生物学家能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解释其他共同的人类行为及社会组织方面的特性,诸如攻击性、同性恋、社会不平等、性别角色差异。

大多数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基因只是为社会行为确定一般极限,并承认社会与文化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互动。然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觉得,社会生物学家太过于用生物学原来解释社会行为了。例如,社会生物学的批评者们注意到,在许多社会中,对亲属认定既是社会性的,又是生物性的,两者同样重要。一个扩大的父系家庭(参见第十四章)可能包括那些在基因上没有任何联系的人。如果人们为这样的家庭作出利他主义行为,显然也是出于社会的原因,而不是生物性原因(沙尔林斯,1978)。

在一些社会生物学家宣称人类有攻击性的本能时,批评者们论辩到,攻击性行为与和平行为一样,在其生物性基础方面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的行为既可以是攻击性的,也能够是和平的。是文化性规则,而不是生物性本能,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是攻击性的还是和平共处的。有人注意到,一个人类学家已指出,社会生物学家有时把人类描绘成乐于去寻找发泄好斗本能的机会(如战争),而实际上,人类总是恐惧于战斗的场面(沙尔林斯,1978)。

对社会生物学的一个基本的批评就是,那些关于人类行为的断言,并无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克切尔,1987)。没有人具体指出过何种行为是由何种基因引起的(雷温亭、罗斯和卡明斯,1984)。而且由于对人类生育进行实验可能是不道德的,因此社会生物学家对决定行为的基因研究只能依赖非直接的证据(古德,1971)。就此而言,社会生物学家所提出的一个基本的争论之点就是,某些社会行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能找得到,因此,这是由基因,而不是由文化决定的。然而批评者们却认为,这些学者们太没有注意到更广泛的历史、经济与政治维度了,他们仅仅注意的是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细枝末节。

社会生物学所提出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是,即使是最坚定的文化论者(从文化解释人类行为的人)也会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生物有机体。并且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识到,一个人的生物需要的满足,特别是早年的生物需要的满足,是其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部分。

与人类的接触

社会化始于父母最初怀抱宝贝的那一刻。婴儿学会把自己看成独特的个体、建构社会联系、发展道德观念、学习语言，等等，这是一个漫长过程，而被人拥抱这种人类的接触是这一过程的第一步。在婴儿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父母努力满足他们子女的最基本的生物需要。然而，正是这些满足生物需要的行为，也同时响应了婴儿的情感需要。

当婴儿在吮吸母乳或者被父母拥在怀里用奶瓶喂奶的时候，他们接受了三种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温暖、食物以及与人类的接触。尽管与人类的接触的重要性不如温暖与食物那样来得实在、重要，但它对婴幼儿发展甚至生存来说，都不再是无关痛痒的事了。

心理学家哈里·F·哈洛（Harry F. Harlow）对罗猴的实验表明，接触（既包括身体的接触也指与同类的互动）是猴子的一种基本的生物需要。如果这种接触的需要猴子早年生活中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严重的身体机理或情感方面的问题。身体的接触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当猴子们被置于一个有两位假“母亲”（一个由线绳做成，另一个用柔软松软的布裹了起来）的笼子中的时候，这些猴子的大多数时间是依附在裹有松软棉布的“母亲”周围的。即使他们只能从线绳做的“母亲”那儿得到食物，他们也还是喜欢布团“母亲”。当布“母亲”被拿走后，猴子们产生了严重的行为问题。布团“母亲”提供了一些真实母亲所能提供的舒适。然而，许多由布团“母亲”带大的孩子，尽管开始时似乎很正常，但后来的情况表明，他们完全难以胜任为父母的角色，并且许多雌猴根本不能生育（哈洛，1959）。

尽管从动物研究来总结概括并应用于人类行为的分析，对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来说，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大多数专家相信，幼婴，例如猴婴，对接触和互动有着基本的生物与情感需要。施皮茨（Pené Spitz, 1945）的先驱性工作为这样的需要的存在提供了最初的证据。施皮茨比较了两组儿童的成长，一组是有母亲的照料并允许自由走动，另一组是孤儿院的弃婴。后者只能得到护士的最低限度的照料，并且不允许他们离开那带栏杆的小童床。到第一年结束的时候，被限制自由的儿童发育迟缓、生病也多——并且许多孩子还异常忧郁。

各种机构所做的对儿童的研究，为人类接触对婴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一个最近的研究是，对一些早产婴儿进行每天三次、每次15分钟的按摩（戈勒曼，1988）。结果发现，在体重增加方面，这些婴儿比那些独自留在婴儿床上的婴儿要快47%。另一个研究是，让护士每天额外多花20分钟与一些婴儿呆在一起。这些得到了额外的人类接触的婴儿，

对外界事物的兴趣增加，他们比那些没有得到额外的人类接触的婴儿，平均早 45 天学会抓东西。

2

情感发展

大约三个月左右，婴儿就能辨认出人的面貌，如其父母的面貌。为了使其成长为情感健康的成人，在这个阶段，婴儿必须开始发出和接受强烈的情感信息。开始时这些信息是非语言的，例如身体的或面部表情的变化。在一个观察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婴幼儿能够区分出母亲对他（她）所做的微笑和恐吓面孔，并能恰当地作出反应；然而，他们却不能对陌生人做的不同的面部表情作出反应（扎巴坦尼拉姆，1985）。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人类情感的发展，有一个固定的顺序（戈勒曼，1984）（参见表 6—1）。新生婴儿似乎只会四种情感：满足感、惊讶、厌恶和沮丧。6~8 周以后，婴儿才会有快乐感，3~4 个月后，才会生气，悲哀与害怕到 8~9 个月后才出现。

表 6—1 情感发展的连续过程

情感产生时的平均年龄	情 感	情感产生时的平均年龄	情 感
出生	满足感	2 岁	骄傲感
	惊讶	3~4 岁	内疚感
	厌恶	5~6 岁	社会性情感： 无安全感
6~8 周	沮丧		谦虚
3~4 个月	快乐		信任
8~9 个月	生气		嫉妒他人
	悲哀	青少年	罗曼蒂克激情
12~18 个月	害怕		哲学沉思
	亲切感		
18 个月	害羞		

资料来源：丹尼尔·戈勒曼（Daniel Goleman）：《情感发展的秩序》，《时代》，1984 年 6 月 19 日，授权重印。

在 12~18 个月时，儿童就足可以为获得来自母亲或扮演母亲角色的人的喜爱而对外部世界加以注意了。害羞、骄傲与内疚，分别在孩子 18 个月、2 岁、3 岁与 4 岁的时候，进入孩子的行为系统之中。

直到孩子五六岁时，他们才开始表现出所谓的社会情感，如无安全感、谦逊、信任他人和嫉妒。一些更复杂的情感，像罗曼蒂克激情、对生命意义和善恶本性的哲学沉思，到青少年时代到来之前是不会出现的。

尽管探索这个发展顺序的研究者们认为，这种顺序有其生物本质的根源，但他们也发现，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可能将这个“时间表”加以颠倒。例如，受虐待的儿童三个月时就可能表现出害怕，而不必像通常那样等到有 8~9 个月大（根斯鲍尔和希亚特，1984）。

在婴儿与其父母的互动过程中，婴儿不仅仅在机体和情感方面有所发展，而且他们也正在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他们同时还在形成自己的人格。

什么是人格？在日常生活用语中，人格常指的是社会技能。这就是当我们说某人有“很好的人格”或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较好的人格”时所指的那种意义。然而，对社会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来说，人格（personality）指的是特殊的思想、感觉和自我观照的模式，它们构成了特殊个体的一系列鲜明的品质特征。人格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部分：认知（思想、知识水平、知觉和记忆）、行为（技能、天赋和能力水平）及情感（感觉与感情）。

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人格是独一无二的。然而，社会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则更多地认为，人格是人们所处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的产物（帕森斯，1964；华莱士，1970）。甚至那些表面是个人特征的东西，像竞争意识、易怒等，都是由社会和文化所塑造的。在某些文化和特定亚文化中，这些特征会比在另外一些文化中要来得更为普遍。

社会学家对人格所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自我（self）。自我就是指个体对他们的个人特征和社会认同的意识与感觉——就是我是谁，我怎样与他人区分开来？自我（自我认同）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社会化的过程。

婴儿出生时，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自己与其父母之间存在的差异。他们还没有形成任何意义上的自我。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逐渐地开始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一个人，而把父母看作另外一些其他的人。他们也许获得了关于父母是保护者、自己是依赖者的一种粗略概念。渐渐地，互动变得更为复杂了。婴孩知道了他们自己小而他们的父母大；他们是学生而他们的父母是老师；他们是儿子或女儿，他们的父母是父亲和母亲。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下成长的儿童（他们没有得到社会化）在情感和社会交往方面都有严重的障碍（戴维斯，1940，1947）。他们被剥夺了从他人的眼里反映他们自己的机会，也即不能通过社会互动来发展其对自我认同的理解。事实上，在我们的整个一生中，为发展和维持我们对自我的意识，都依赖于社会互动。通过接受来自他人的反应，我们经常地改变我们的自我形象。

从孩提时代到成年，我们的人格和自我意识是怎样发展的呢？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这个基本的问题是许多理论的研究主题。然而，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答案。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回顾了在这个领域中的一些重要理论。许多理论把人格和自我的发展看作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系列阶段。

查尔斯·库利： 镜中我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929）是最早提出自我发展理论的社会学家之一。按照库利（1902）的说法，自我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它的出现有三个阶段。首先，我们察觉到我们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其次，我们领悟了别人对我们行为的判断；第三，基于对他人反应的理解，我们评价我们的行为。简单地说，我们根据想象别人对我们自己行为及外表的感觉来理解自我。例如，如果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人赞成我们的行为，我们也许也会赞成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个行为。这样，由于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可以说是对他人是如何想象我们自己的反映，因此库利就称这种自我为“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

库利相信，自我在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s）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参见第七章）。库利认为，家庭就是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群体。在家庭中，孩子对他们父母的意见抱有“同感”，由此而形成自我意识。通过注意父母的手势与话语，孩子们开始认识到父母对他们期望什么、父母如何评价他们的行为，父母对他们的意见是什么。有了这些知识和认知后，孩子就试图形成一种父母所期望的自我。

乔治·赫伯特·米德： 角色借用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一个符号互动论发展中最重要的人物（参见第五章），他认为他自己主要是一个哲学家。他的著作作为社会学家们所接受，主要是由于在他死后，他的学生发表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学笔记（米德，1934）。

米德认为，在孩子出生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有所区分的。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对符号的理解，自我概念开始发展。当在思维中把自己当作客体并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加以想象和思考的时候，自我就形成了。他们可以与自己的自我“交谈”，可以对自我作出反应。他们本身成了自我的客体。

米德将自我分为两个部分：“主我（I）”与“客我（me）”。“主我”包括每个人自发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特征，如在每个正常婴儿和儿童那里都有的无约束的冲动和动力。“客我”是自我的社会部分——对社会要求的内化和对那些要求的个人意识。“主我”首先发展起来。由于婴儿必须首先领会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因此“客我”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出现。米德认为自我的发展包含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系列连续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主我不断地对变化着的客我作出反应。

从米德的观点看，客我在社会化过程中经历了三个极不相同的阶段，有三种形式：模仿、嬉戏与群体游戏。

1. 模仿阶段（imitation stage）包括人的一生中最初的两年的时间。在这个阶段，儿童仅仅从事米德所说的与父母“手势交流”（conversation of gestures）活动，模仿父母的动作。在这个时期，真正的“客我”尚

未发展起来。

2. 第二个阶段或嬉戏阶段 (play stage) 从两岁时开始, 大约持续几年的时间, 这时孩子开始从事角色借用 (role taking): 他们把自己想象为处于他人的角色或地位, 从而发展起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我与世界的的能力。这一实践最先使他们发现自己的思想和目标与父母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大多数情况下, 这又多产生于父母未能满足他们某种或多种需求从而遭受挫折的时候。

起初, 儿童开始借用的角色是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 的角色。重要他人即指与儿童相处十分密切、同时对他们自我发展影响最大的那些人。一般来说, 第一个重要他人是父母或代理父母之职者; 到后来, 兄弟姐妹、家里的朋友以及其他一些非亲非故者陆续加入到儿童的借用角色之列中。在这个阶段, 当儿童模仿他人角色的时候, 他们实践着重要他人所期待的态度和行为。儿童也许首先扮演偷饼干的“坏孩子”, 然后假扮呵斥坏孩子的“父母”, 最后扮演解决问题的“警官”。就是在这个阶段, 儿童才开始第一次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客体: “我在做此事”, “玛丽要糖果”。虽然“客我”在这个阶段开始得到发展, 儿童还是不能理解角色借用的意义; 他们只是在玩耍生活中的社会角色。

三四岁以后, 一个人的群体游戏阶段 (game stage) 就立即开始了。在这个阶段, 儿童开始走出家庭, 与更多的人和群体发生联系, 同时他们也把家庭看作是他们所隶属于的群体。儿童开始关心在非家庭群体、包括作为整体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发展起了一般意义上人们对他们的要求和期望的观念, 即米德所说的一般他人 (generalized others)。在游戏中, 如玩垒球, 儿童必须考虑许多人在同一时间扮演许多不同角色时的相似行为。他们必须预知所有其他玩伴的行为并决定对这些行为作出何种反应。他们必须知道周围的整个情势。这样做时, 他们借用的是一般他人的角色。当能够这样做时, 他们已将“社会”内化了, “客我”的形成过程已经完成。

米德和库利的理论在现代社会学中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但两个理论中对社会现实的想象比我们今天所真正面对的现实要简单得多。例如, 库利就没有对初级群体之外的那些迅速出现的社会力量对自我的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 如大众传媒。米德关于一般他人的概念, 同样没有注意到今天的多元社会现状。在当代美国, 随着大量的亚群体和亚文化的出现, 若认为一个“较大的社会”服从于单一、统一的要求和期望, 那是十分困难的。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出生于维也纳, 心理分析奠基人; 是在人类行为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如果不提到他的著作, 那么任何关于社会化的讨论就是不全面的。与库利和米德不一样, 他们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协调, 而弗洛伊德则看到在这两者之间更为基本的是冲突。他甚至走得更远, 说我们越是文明, 我们就必定越不幸 (弗洛

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
无意识

伊德, 1930, 1962)。这是因为, 文明的生活要求我们去压抑许多深层的生理欲望。库利和米德把自我解释为一种社会的产物, 并强调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重要性, 可弗洛伊德则强调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生理基础和情感的力量。最后, 弗洛伊德认为, 我们大量的心理活动产生于无意识领域, 这是我们的意识和“理性”难以进入的区域。事实上, 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 被认为是 20 世纪的重大成就之一。

弗洛伊德认为, 人的人格分为三个部分: 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超我大致相当于米德的“客我”, 即对从社会中习得的“应该如何”和“必须如何”的内化。这就是对人格的审查、意识和社会监控。本我包含无意识记忆和生理的、心理的冲动, 尤其是性冲动。对本我的强调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我在超我和本我之间扮演着一个中介角色, 大多数情况下处于无意识之中。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 如果一个人要达到心理健康, 人格的这三个部分, 必须终其一生都是和谐的。

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助于说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功能。想象一下, 你正驾车走在一个开得非常慢的人后面。你要急于在八点钟去赴约, 但如果你只能以每小时 25 公里的速度驾车的话, 你是不可能八点钟赶到的。你按响喇叭、打亮前灯, 但走在你前面的那个司机仍然拒绝开得再快点。这个时候, 你的本我也许就会要你猛踩油门向前面那辆车冲过去以教训一下那个司机。而自我则可能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 车损坏了, 保险费将会提高, 甚至还会丢了性命。超我或意识可能会提出关于你的行为的道义与“正当性”的问题, 我有权把自己的汽车撞向另一辆汽车吗? 难道其他司机没有权利走得慢些吗? 最后的结果是: 你可能会沮丧地嘟嘟囔囔(或者也许是尖叫), 但你不愿把汽车向前面那辆撞过去。

弗洛伊德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者的攻击。他们认为, 弗洛伊德的理论根植于他所成长于斯的严格的维也纳中产阶级社会, 而那种文化几乎不能算作是普遍的文化。实际上, 跨文化的研究挑战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一些性心理冲突的普遍性。对他的著作的最尖锐的批评来自女权主义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他们感到他的理论深深地浸透了性别主义, 甚至露骨的厌恶女人的假设。例如, 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 当小女孩意识到她们没有阴茎的时候, 她们就假设已被“肢解”, 她们未来的发展也就由这种“阴茎”情结所支配。他们还认为, 一个心理正常的女性, 总是降服于人甚至是受虐狂, 而不是显示自己权威的、自信的人。

另一种对弗洛伊德的共同批评是认为, 他的理论声称儿童在早年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终其一生而不变, 而这也过于教条化了。大量证据表明, 在人的一生中, 人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人格。并且, 弗洛伊德还暗示, 如果性爱更开放些的话, 人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成为受挫者或不幸者。可是, 从弗洛伊德那个时候起, 西方的性道德观就已变得较为松弛了, 但这似乎并没有减少多少不幸。这表明, 在性爱冲突之外, 还有许多因素是人格问题的根本(马森、康格和卡根, 1974)。最后, 弗洛伊德的理论因缺少经验证据而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今天,许多社会学家感到,弗洛伊德太过于强调生物因素对人格塑造的影响,而对社会因素强调不足。但弗洛伊德在很大程度上也强调了儿童在家庭中的社会经历。除了他关于无意识的理论之外,弗洛伊德广为人接受、流传最久的理论贡献也许就是他关于儿童期的事件对后来生活的影响。

4

艾里克·
艾里克逊:
认同危机

艾里克·艾里克逊(Erik Erikson, 1902—1994)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修正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大家都称他为“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弗洛伊德强调本我的冲动;艾里克逊主要关心的则是更为“理性”的自我(ego)的世界。艾里克逊把自我的发展分为八个心理阶段,它随着我们一生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而变化。弗洛伊德重点研究的是儿童期;艾里克逊的发展阶段一直延续到老年期。这样,艾里克逊相信,人格发展是终其一生的事情,而不仅仅在儿童期。

根据艾里克逊的观点(1963),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是由“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来定义的。一个稳定的自我认同源自于对这些认同危机的积极解决,在现代社会中,这也囊括了人们对生活的许多基本关怀。下面是对艾里克逊八个认同危机的概括(埃尔金德,1970)。

1. 信任与不信任(婴儿期):婴儿的需要如果得到充分的满足,就会产生信任,即产生世界是安全的感觉。但是,如果对婴儿的照料不是稳定的或不是充分的,或者如果婴儿感到被拒绝,就孕育了一种基本的不信任,而这将在往后的发展阶段起作用。这个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像后面的问题一样)在人的一生的头一年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在人的一生中,信任可变为不信任,反之亦然。

2. 自主与怀疑(儿童早期):自主(独立的感觉意识)在第二个阶段开始出现,它是儿童运动机能和大脑智能发展的结果。如果父母认识到他们的小孩需要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就让他们去做,这样儿童就会感到,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肌肉、他们的冲动、他们的自我以及周围的环境。另一方面,儿童有时候会感到怀疑,或者,甚至害羞——例如,如果他们受过上厕所的训练,但却失禁于照看者的膝上。当父母没有耐心而代儿童去做他们自己能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儿童就强化了这种怀疑意识。儿童进入其他发展阶段后,就会更加感到害羞和怀疑而不是自主,这就影响到了他们在青春期与成人期的自主意识的获得。

3. 主动与内疚(学龄前):儿童进入这个时期时,他们已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现在他们开始了新的机体运动活动,同时还包括语言与一些好玩的事。在这个阶段,无论孩子是获得了主动首创性还是内疚感,都依赖于父母对儿童的自发活动的反应。如果父母让儿童感到他们的行为是坏孩子行为,他们的问题是幼稚的,他们所玩的东西愚蠢可笑,他们就可能产生一种强烈而持续的内疚感。

4. 勤奋与自卑感(学龄期):这个阶段包括整个小学阶段。在这个时期,儿童要知道东西是由什么做成的,它们是怎样运作的,它们在做

什么。如果成年人鼓励儿童努力去制作、构筑某些实际的东西，允许他们完成他们的计划，对他们所做的结果提出表扬，这就会加强儿童的勤奋感。但父母如果把孩子努力制作或做的事情看作是“捣乱”或“搞得乌七八糟”，或者教师要求孩子遵守像成人那样严格的规则，就会使儿童产生自卑感。

5. 认同与角色混淆（青春期）：儿童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们的身体起了变化。青少年看待世界和思考问题有了新的方法。他们的角色除了儿童时期的女儿、儿子、朋友、学生等外，又加进男友、女友、运动员、学者及许多其他的角色。这些新角色必须平缓地与原来的角色结合成新的角色集，以促进强烈的自我认同。在这之前的早些阶段，如果他们已形成了较强的信任感、自主感、主动性和勤奋感，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就好比那些没有形成这些感觉意识的人有更好的机会获得强烈的自我认同感，避免角色混淆。

6. 亲密与孤独（青年时期）：这个阶段包括求爱与建立家庭。艾里克逊所说的亲密，即指一个人在无须虑及自我认同丧失的情况下去爱另一个人和关心另一个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不能与他人亲近，他或她就会生活在一种孤独感之中。亲近他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强度的大小。

7. 代际关怀与自我沉浸（中年期）：中年期的人已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的关怀开始超出自己的家庭，更加关心未来一代的成长，关心下一代将要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状况。艾里克逊把这种关怀称为“代际关怀”（generativity）。那些没有形成代际关怀的人，则会沉溺于自我，个人的需要和舒适成为他们的主要关怀。

8. 完美与绝望（老年期）：在这个最后阶段，个人的主要活动接近尾声，他们已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完美的感觉来自一个人对他或她的一生的满足。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过去失去了一系列机会，或者走错了路，那么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艾里克逊的批评者认为，他的发展模型是以中产阶级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因而有失偏颇。大多数情况下，艾里克逊把他的模型建立在对中产阶级的研究的基础上，这是不争的事实。他还研究了人格的一般发展（像其他理论家所做的那样），而没有去考虑社会阶级、种族群体或可得性机会的影响。另一个对艾里克逊的批评是认为，他的模型很难进行经验研究。比如，我们怎样来衡量一个人在他发展的每个阶段是成功的呢？最后，艾里克逊的模型暗含了一种关于人格发展的抽象理想，但这个理想是什么呢？幸福？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遵从？心理健康？艾里克逊并未给出答案。

5

让·皮亚杰： 认知发展

前面我们讨论的理论都是把人格发展当作一个整体。最后要讨论的理论，是瑞士学者让·皮亚杰（Jean Piaget）发展起来的，他所关心的只是人格发展的某个局部，也即认知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学会思考的途径。

许多人认为,皮亚杰是儿童如何学会思考和推理研究方面的先驱者。他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知道些什么?他们用什么工具来获得新知识?在每个具体的年龄,哪些知识是他们所必需的?皮亚杰对我们认识社会化过程的主要贡献是,他描述了儿童在不同发展阶段是如何思考的。

皮亚杰断言,在每个发展阶段,从婴儿期到青少年期,儿童所有的活动都标记着确定的智力操作类型,这些智力操作类型为儿童获得知识给定了某种结构。他相信,尽管有些儿童比另外一些走过这些阶段要快些,但所有的儿童都必经按同样的顺序走过所有的阶段。由此,皮亚杰感到,像“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孩子教以任何东西”的说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荒谬的。

皮亚杰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为了学习,儿童必须吸收知识并加以消化。皮亚杰相信,儿童智力发展要经过下列几个阶段(埃尔金德,1968)。

1. 感觉运动阶段:在孩子1岁半到2岁时,他对世界的了解,是完全通过他们的感觉器官的。儿童伸手够、触摸、坐、走路、探索。起初,他们的行为很偶然,但随着一天天长大,就变得越来越有目的了。在这个最初阶段,儿童学会在大脑中建构和再构(construct and reconstruct)客体。例如,如果把一个新生儿注视的物体从其视线中移走,婴儿的眼睛是不会跟着物体走。对婴儿来说,“视线之外”的东西,就意味着“存在之外”。如果物体不在视线之中,它就不存在。然而,在感觉运动阶段的末期,儿童就能在大脑中获得对客体的影像。

2. 前操作阶段:这个时期从2岁左右持续到7岁。在这个阶段,孩子学会使用和理解符号,学会说话,并且第一次有了描摹客体的企图。前操作阶段的儿童在同一个时刻只把精力集中在情境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他们可能不正确地坚持认为,一个高而窄的玻璃杯比矮而广的玻璃杯要盛水更多,即使他们看到第一个杯里的水倒进了第二个杯子而未溢出。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儿童还未能理解宽、深、厚度、数量和因果之类的抽象概念。在这个阶段,儿童是高度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完全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因而也就不能领悟他人的角色并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3. 具体操作阶段:在7~11岁之间,儿童懂得如何去构想一个具体的客体,或者以不止一种方式来认识客体的类属,他们能够形成关于事物之间联系的概念。例如,在这个阶段,儿童知道一个客体可以同时是一个球、一个玩具、一个圆的东西,并且他们能根据事物的因果关系来加以联想。他们也开始发展起了从他人的位置来想象自我的能力。

4. 形式操作阶段:这个最后阶段大约从12岁开始,到15岁结束。这时的青少年发展起了高度抽象思考的能力。他们可以对现实的可能性进行思考,建构理想,以及对未来进行实际的推理。这种能力也使青少年能够逻辑地推敲与事实相反的陈述。

尽管皮亚杰的工作在发展心理学家之间形成了一个主要的思想流

派,也影响了许多其他理论家和研究者,但并不是说就没有批评者。一个主要的批评是认为他的工作并不系统或科学。人们很难重复他的研究过程并达到相同的结论。



日本儿童的社会化

在日本,父母对他们的孩子的社会化尤为投入。据说“三岁儿童的心灵可以延续百年之久”(亨德里,1987)。

日本儿童从很小就开始接受日本社会的一种重要教化:对年长者的尊敬。人们不停地教导儿童,年长者具有优先权,年龄在家庭、在学校、在玩耍场所,都是很重要的。不仅要尊敬老年人,而且对任何年龄比自己大的人都要依从。

在日本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对群体的强调。尽管也强调个人可以自己着想,但儿童必须学会把他们生活的这个方面与群体的需要协调起来,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理解、行动,都必须与对家庭、学校、玩伴群体或同事群体的责任一致。到这些儿童成年时,他们将了解到,集团企业的成功要归功于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某个个体成员的天赋。

在儿童开始正式上学之前,他们就参加日托或幼儿园以接受群体生活的尝试。幼儿园的老师通过给他们着以统一的制服、相同的用具、规定共同承担的责任来强调儿童之间的平等。如果儿童之间发生争议或争吵,老师就与儿童一起来讨论遇到的麻烦,搞清楚争吵是怎样开始的,并为谁对谁错、谁应对谁道歉作出群体裁决。一个班就是一个集体单位,无论是整队行进、演奏管弦乐还是参加体育运动。童话故事“三个小猪”的日本版也许最能说明这种哲学:不像这个故事的美国版那样,先是有两个猪给大灰狼吃掉了,日本版的故事则是起初的两个小猪联合起来从敌人手中去解救他们的朋友。

日本人教育儿童说,理想的孩子应该是聪明、快乐、不能哭叫。哭叫的孩子被拉出群体,直到他们重新镇静下来。他们教育儿童,在不同的情景下,应该有当情当景的适当行为表现,以保全面子。例如,如果孩子碰碰一下摔了一跤,就会强忍住不哭,否则就被认为在班集体面前“丢了面子”(不过,在家里,儿童哭叫是完全正常的)。儿童在孩提时代学会的“面子”,将通过社会情景带到他生活中遇到的每个事件当中(亨德里,1987)。



我应该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吗?

在90年代,许多家庭发现,仅就满足开销而言,两个成人全天工作是必要的。然而同时,大多数夫妻想要孩子。而休完产假后就带来了问题,新生儿母亲要重返工作岗位,谁来照料孩子?

现在,30%有工作的母亲都请一个亲戚或朋友来家照看他们的孩子。大约35%到40%的人将孩子留在别人家里照看(《纽约时报》,1988年6月5日)。剩下的其他正在工作的母亲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day-care centre),现在,拉扯5岁以下孩子的工作母亲,有约25%是这样做的。

近年来,日托中心在欧洲国家相当普遍。然而,即使许多利用了日托服务的美国父母对日托及其给儿童带来的影响总是热情满怀(罗普那恩和亨普尔,1988),但

是那些面临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的机构的人,至今仍然常为自己的决定感到焦虑。这样的问题值得关心吗?孩子在日托中心真的受苦吗?在日托中心有什么益处吗?社会科学研究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多种回答。

许多父母担心日托中心是否会有助于孩子将来在学校里做得更好些,是否将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从智力发展来看,一个运作很好的日托中心似乎对儿童既没有正面的影响,也没有负面的影响(安迪生,1989)。但父母可能发现一些入日托的孩子,更加带有攻击性。一项加拿大研究表明,在学龄前日托中心呆了4年或以上的6岁儿童,比控制组显示出更多的攻击性,但较少焦虑感(巴格利,1989)。然而,应该注意到,“更加带有攻击性或和更少与大人合作”,有时候可能意味着“更为自信、雄心勃勃,更为独立”。这些特征对孩子进一步发展来说未必是坏事(布劳姆,1983)。

也许父母最关心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日托中心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弱化或打破所有父母与孩子之间重要的联系纽带。可一些研究清楚地表明,情况并不是这样,日托并未丝毫损害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联系,即使孩子还非常小的时候就送了日托(布劳姆,1983)。另一些研究则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找到证据说,1岁以下婴儿每周在日托中心呆上20个小时以上,在婴儿期就会出现与母亲在一起感到不安全,在学龄前时期及最开始的几年学校生活中就会出现一些行为问题(贝尔斯基,1987,1988a,1988b,1988c)。有个研究者则相信,哺乳期母亲上班反映的是母亲独立自主的愿望,因此,解释这些研究结果的因素,就是母亲的这种态度,而不是日托中心本身(克拉克斯图尔特,1988)。

那么对健康又如何呢?是否就是说,当孩子离开家庭被迫与其他小孩呆上几个小时,更容易生病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也仅此而已。日托与正规学校教育很相像,它似乎增加了某些小疾病的可能性,如感冒(布卢姆,1983)。

父母选择一个日托中心的时候,应该对日托中心的各方面加以仔细考虑,近些年来,日托中心在人事安排上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一项国家研究报告说,日托中心的工作人员通常由于工资低、福利少,每年都会有40%的人离开照看孩子的工作(温格特和坎特罗威茨,1990)。所以,父母应该搞清楚:(1)该日托中心是否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来照料孩子;(2)这些员工是否热情,有爱心。日托中心应该提供多样化的玩耍活动,同时也要有一些可以让孩子独处的角落或地方。此外,日托中心应该安全、卫生。对儿童来说,他们在那里应感到受欢迎、舒适,他们能有一些柔软的东西玩,如枕头、沙土、玩具动物(布卢姆,1983)。

在父母把孩子交给日托中心之前,为保险起见,他们预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父母应该确信,在任何时候,孩子都可以自由出入中心的任何设施场所。第二,父母应该对孩子强调,在中心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被保密的,即使老师说会这样。父母应该一而三再而四地对孩子说,“如果某人对你做了些什么,或说了些什么,一定要告诉我”(芬克尔约尔威廉斯和伯恩斯,1988)。在父母确信孩子在某个日托中心没有得到恰当照料之后,应该毫不迟疑地找一个新日托中心。

无疑,在将来几十年内,日托中心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都会继续增加,质量也会提高。现在的日托与早些年就有了明显的不同。近些年来,许多日托中心日益重视年老公民与儿童的关系,他们雇佣老人来当老师(加林斯基,1989)。并且应工作母亲的要求,日托中心也为生病的儿童提供照料和治疗,因为母亲不能因为孩子生病就呆在家里(兰迪斯,1987)。

养育孩子的方式

儿童的人格和社会发展受父母教养孩子方式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复杂社会中，教养孩子的方式在不同群体之间差异非常大（在其他文化中，教养孩子的方式可能同质性较强，参见全球社会栏：“日本儿童的社会化”）。

教养孩子的方式可以说有专制型和放任型（authoritarian to permissive）两个极端。专制型的父母要求孩子无条件地服从。他们强调秩序和稳定之类的价值观，并倾向于使用体罚。放任型父母则相反，对待他们的孩子的办法更为开放和更富弹性，更喜欢对他们讲道理，在规则或原则问题上容易折衷处理。此外，他们更多的是用情感感染或以不赞成来威胁的办法强化规则，很少用肉体惩罚的方式。

在回顾四五十年代所进行的研究时，心理学家布龙方布雷内（Urie Bronfenbrenner, 1958）总结说，在教养孩子的方法上，中产阶级的父母更倾向于放任型，而工人阶级的父母更倾向于专制型。这种在教养孩子方面的阶级差异，可以部分地从父母在工作中的角色来得到解释。中产阶级所强调的特征：灵活性、主动性、自我控制和个人成就，是中产阶级的工作所必需的。同样，工人阶级所强调的纪律和服从，反映了他们的工作经历。工厂和建筑业更多地要求的是遵守和服从，而不是独立和主动（海曼，1953；科恩，1963）。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教养儿童方面的阶级差异可能正在减弱，这也许是事实。例如，一位研究者发现在社会阶级等级和使用身体惩罚之间只有一种弱相关关系（厄兰格，1974）。此外，另一些研究表明，今天大多数父母（而不仅是中产阶级父母）比20世纪早期的父母要更强调个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这种变化与人们对社会制度的遵从感减弱及个人主义的持续增长相关（爱尔兰，1988）。

一项长期研究得出结论说，最为有效地培养出独立的、社会责任感强的孩子的父母，既不是专制型，也不是放任型，而是权威型的（authoritative）（鲍姆兰德，1980）。专制型的父母认为孩子不应有多少权利，但需负担许多成人的责任；而放任型的父母则认为孩子没有多少成人的责任但有许多成人的权利。比较而言，权威型的父母试图强调与特定的儿童发展阶段相应的权利与责任的平衡。这样的父母期望他们与其子女的关系是互补性的。这就是说，他们感到，他们对孩子的责任和孩子对父母的责任应该是一种相互平衡的关系，并且平衡关系也随孩子的成熟而变化。

社会化过程涉及一系列广泛的个人、群体和机构。这些群体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者被称为社会化的主体。主要的社会化主体有家庭、学校和日托中心、同辈群体 (peer groups), 以及大众传播媒介。

1

家庭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 最重要的社会化群体一直就是家庭 (在第十四章中将有详细讨论)。这种连续不变的重要性源于它在一个人一生中关键的头几年中所处的最初社会化主体的地位。社会化从家庭开始, 在这里, 孩子学会了认识他们是谁, 他们能够和应该从他们的社会期望些什么, 这个社会对他们期望什么。

在完成社会化任务的许多方面, 家庭都是理想的场所。因为它是一个小的初级群体, 其成员之间有大量的面对面的接触, 儿童行动得到密切的注视。错误的和不宜的行为可以在早期就被发现并得到纠正。

然而, 即使在孩子生下来后最初的几年中, 家庭作为社会化过程的主导地位也受到了其他社会化主体的挑战。现在由于半数以上的家庭父母双方都在外工作, 许多家庭还是单亲家庭, 因此儿童花在看电视方面的时间可能比与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进一步说, 儿童的生活越来越以学校、日托中心和同辈群体为中心。最近一二十年来, 所有这些家庭以外的社会化主体已变得非常有影响了。

2

学校与 日托中心

有史以来, 家庭以外的最主要的儿童社会化主体是学校。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 儿童被教之以在这个社会和文化传统中他们所需要的技能和态度。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复杂的、技术先进的社会中, 正规教育是一个重要而长期的过程, 有的情况下要延续 20 年的时间。在相对简单的社会, 其成员只需接受相对较少的专业知识, 正规教育只占了儿童一生中相当少的时期 (在十五章中对教育有更为详细的讨论)。

儿童在学校中学习的社会角色比在家中所学而言要更多地面向广大社会。老师告诉他们, 作为学生, 人们对他们有什么期望, 作为社区成员、作为国家公民, 人们对他们又有什么期望。此外, 儿童在这里首先接受了与他人相比较的系统评价。老师也许非正式地评论学生的行为, 表扬或批评他们。在大多数学校中, 定期的测评成绩报告单就不只是学生学习成绩的进展报告, 而且也是其社会中的进展情况。它反映了这样一些标准, 如“遵守规章制度”, “表现出自我控制”, “与他人友好相处”, 以及“服从指导”。这种教育的非学业维度被称为“隐课程” (hidden curriculum, 斯奈德, 1971)。

对非个人的规则和权威的遵从，是现代社会顺利运作的调节基础，对此，学校社会化尤为强调。在家中，儿童学会服从父母，并认识到他们是一个权威形象。但这种父母与儿童之间关系的性质是个人的、带有感情色彩的。爱和认识到要依赖父母使儿童服从他们。然而，在学校，儿童学会服从“规则”，而不仅仅是个人。

最近，日托中心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照料儿童的模式，大部分是因为今天有许多母亲想要、也需要在外工作（卡恩和卡梅尔曼，1987；麦金农和金，1988）。日托中心员工的素质与计划，还有父母与孩子对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日托中心的成效。在美国，对日托中心仍有争议（参见关于日托中心的“应用社会学”栏），但在许多欧洲国家几年来一直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卡梅尔曼和卡恩，1981；卡梅尔曼，1991）。

3

同辈群体

当儿童加入日托中心，或者在后来开始上学后，他们就全面地暴露在另一个社会化主体——同辈群体面前了。同辈群体（peer group）这个词，指的是有大致相当的社会地位、并且通常年龄相仿的一群人。同辈群体的成员并不一定是朋友。例如，编班为二年级的儿童尽管他们在情感上彼此并不亲密，但这就是一个同辈群体。

在儿童时代，同辈群体的形成大部分都出于偶然。在往后的生活中，更多的选择卷入了进来。在7岁的时候，一个人的同辈群体，一般就是他在学校里的同班同学（或者班上的亚群体）及他邻居中的同龄群体。成年人选择同辈群体，一般以共同的兴趣、活动、相似的收入、职业或社会地位为基础。在成年期，年龄的局限更有伸缩性，例如，在30~45岁之间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37岁的同辈群体的成员。

随着儿童期年复一年地过去，同辈群体越来越多地影响其社会化（鲍尔曼和金奇，1959）。由于同辈群体帮助青少年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平等位置，因此它对青少年有特别的影响。与此相对照，在家庭中，年轻人的地位总是从属的。同时，青少年同辈群体在帮助年轻人减少对成年人的依赖方面也十分重要。

青少年同辈群体可以成为一种历史的力量。在任何社会，同代人都有共同的经历，并用共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是更大的形式上的同辈群体。六七十年代的少年和青年人，即从1945年到1963年之间出生的那些同辈群体，在近来的美国社会和文化历史中尤为重要。这个群体，出生在战后经济繁荣的年代，实际上比任何在此之前或以后的其他世代的美国人都要多。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通常被称为“生育高峰的一代”。

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这代人早年成长于电视机前面，这一事实深刻形塑了他们的意识和观念，并把他们与父母那一代区分开来。在六七十年代，受媒体影响所带来的与父母那一代的差异，引发了一场关于“代差”（generation gap）的讨论。影响这代人感觉独一无二和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青年文化的商业化发展，它的迅速发展，既反映了生育高峰这一代人的规模，也反

映了与电信媒体的关系（吉特林，1987）。

许多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他们青春期和成人早期，尤其是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者，强烈地（不过是暂时的）热衷于广泛而尖锐的反文化模式。这样的反文化模式，不仅在表面看来与当时成人世界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有差异，而且实际上也存在着对立。这种反文化的形成共同经历了人权运动、对约翰·罗伯特·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的暗杀、反越战、嬉皮士运动及水门丑闻等事件。这一代人激情亢奋地相信，激进的政治、吸毒自娱、性自由、留长发以及摇滚乐不久将引导一个真实的历史新时代——这就是一个热衷于此的人所称的“第三意识”（Consciousness III）（赖克，1970）。不过尽管这一代人中有许多继续保留一种强烈的代际意义，但这些毫无节制的希望大多数都破灭了。

到80年代中期，中产阶级的大学同辈群体，相对于为改造社会而工作、寻求社会发展而言，他们对适应环境和挣钱更感兴趣。在他们所处的经济机会减少的年代里，这种变化是合乎逻辑的（阿斯坦等，1984）。然而60年代的这代人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仍然十分强烈，他们继续深深地影响着从电视节目制作到关键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中的每件事情。

一些记者和观察者已经指出，在美国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新一代人在发展。这个新后代的意识有其专有词为“X代”或“第十三代”，它形成于60年代那代人的文化控制之中，同时面临9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他们比60年代那代人更为实际，但却不如里根时代的那一代，他们看到对社会改革的真实需要，但担心由于国债的日趋严重而会使完成必要的变革成为不可能。随着60年代那代人的孩子进入大学，X代的人数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几年内将会膨胀；他们所定义的代际意识将继续进入随后的一些年里。

4

大众传媒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mass media，指的是传到广大人群之中并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传播方式，尤其是指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在社会化中已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很少有人能读东西，信息传递很缓慢，主要靠口头传达。现在的信息，几秒钟之内就呼地一下传遍了全世界。人们只要轻轻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听音乐或看新闻、喜剧、戏剧。实际上，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说，现在电视是他们的主要新闻来源（鲁宾逊和莱维，1987）。

近年来，许多人，包括社会科学家，特别关心的是看电视对儿童的影响。98%以上的美国家庭至少有一台电视机（美国人口普查局，1989），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不止有一台电视机（《世界年鉴》，1990）。美国家庭中平均每天要开6~7个小时的电视，尽管这并不意味人们通常对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在认真收看。根据一种估计，一个美国高中生毕业的时候，他或她已经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平均是20 000个小时。这个数字超过了所有花在教室里的时间（巴维什和埃伦伯格，1988）。

更深刻点说，电视节目带来了大量的矛盾（埃伦豪斯，1989）。电视为

儿童既提供了现实的世界与行为的信息,又提供了想象的世界和行为的信息。但儿童不是成年人,他们容易误解他们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东西。例如,人就不像卡通人物那样,被人敲击头部、推下悬崖后,回来还面带微笑。

在某些方面,儿童节目强化了由其他社会化主体所教导的价值。同辈群体也许观看某个节目,一起讨论,一起外出活动,这样强化了群体的团结和价值。但从电视学到的观念也许同时也与在家里和学校中所教导的价值相冲突(科姆斯托克,1990)。例如,儿童也许从他们的父母和老师那里学到,要出人头地,就应该努力、接受良好教育。相比来说,电视也许教导他们,趁着年轻,一个人要尽情享受。



使人堕落的大众文化

这在几代人都发生了。父母只要一看孩子所读、所听或所看的东西,就会感到一个极为厌恶的问题,从而开始谈论道德滑坡和新闻检查的必要性。

大众艺术能使年轻人思想堕落观念并不新,二千多年以前,柏拉图就写到:“如果最重要的政治形式和方式不发生变化的话,音乐的形式和节奏从来都不会变……新的风格暗暗地巧施诡计使自己跻身于态度和习惯之中,从那里,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去攻击法律和宪法,表现最大程度的不敬,直到它推翻了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事务,它才肯罢休”。但现代传播工具的紧逼和渗入,增强了大众文化施与者作为社会化的重要性,并强化了关于它的影响的讨论。

现时代第一场论战是关于连环画。根据50年代的一些批评者的观点,连环画引诱和败坏了新生读者的思想。摇滚乐(Rock “n” roll)是另一个早期攻击的目标;在1955年,一个国会议员小组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以确认青少年犯罪与听“猫王”的歌曲这两个事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在六七十年代那个反抗的时代,矛盾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许多通俗歌曲以抒情的笔调颂扬性与吸毒之乐的年代。这时,约翰·列农(John Lennon)点燃了一把批判的火把,他宣称其理由是甲壳虫乐队的歌声“比上帝的声音还大”。保守派的部长们及其随从为表示他们的愤慨,焚烧起了甲壳虫乐队的唱片和磁带,烟雾在教堂的停车坪上飘浮弥漫。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多的有关“性”的细节描写使电影工业引进了分级度,从而有效地缓解了普遍高涨的要求建立电影审查制度的呼声。

更近些来说,由于确信歌曲的歌词导致了年轻人的堕落,1985年5月成立了一个“父母音乐资源中心”(Parent's Music Resource Centre,缩写为:PMRC),这是一个由几位重要的华盛顿政界要员(包括蒂珀·戈尔)的妻子成立的组织,它要求歌词应该写在音乐带的包装封面上,那些有潜在越轨导向的唱片与磁带应该贴有建议性的警示标签。在1985年9月,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听取了PMRC的要求: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恩斯特·霍林斯宣言:“我们必须从摇滚色情中拯救这个民族的少年儿童,使他们的耳朵免受污染。”可是音乐家弗兰克·扎培尔却回应道:PMRC所寻求的是在去掉头皮屑与砍头之间的平衡。最后,大多数经销录音带的人都同意在有淫秽内容的磁带上贴上标签,这样,PMRC就消失在记忆中了。

但斗争在继续。受到指责最多的是说唱乐。在1990年,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一个法官认为二生乐组(2 Live Crew)的歌曲中的一些歌词有淫秽内容,因此就

逮捕了出售这种音乐的一个店主。但电影和电视也同样纷争叠起。1993年,在宾夕法尼亚,一个年轻人在模仿迪斯尼电影《节目》中的一个特技表演时丧生,制片人花了65万美元收回发出去的拷贝,并删截了有违众怒的部分。同年,音乐电视也受到了严厉批评,那是俄亥俄州一个5岁的小男孩,据称受有线电视网上广受喜爱的比夫斯与巴特-赫德(Beavis and Butt-Head)的影响,玩起了火柴,结果引发了一场失火事故,将他2岁的妹妹烧死了。MTV对此作出的反映是删去了所有与火柴有关的节目,并把MTV节目移到后面节目时间的间隙播出。

社会学研究已经证明,在电视暴力与儿童显著的攻击行为之间有强相关关系。但关于媒体中有争议的人物形象如何影响我们的文化这个更大的问题,研究起来极为困难。一些研究认为,少年儿童大都没有意识到通俗歌曲中的歌词意蕴,但批评者回击说,不能前后关联地解释抒情歌词的意义,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从一个更深的层面去理解它。

大众传媒之所以去渲染,当今社会中为人所接受的东西,是因为它们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吸引着广大观众或读者。对青少年来说,由于他们反抗道德上的保守,其逆反心理特征促使他们追求类似的媒体表现。这也是给音乐、电影或电视节目贴标签分级策略的主要问题,它实际上增加了“禁果”的诱惑力。

最后,如果从根本上讲,还没有一种方法能说明艾丝堤(Ice-T)的打击抒情乐、广为人知的麦当娜的肚脐,或者像通常在背上写着“M. N. Y. P. D. Blue”一样的大卫·卡鲁索(David Caruso)那裸露的后背等,已经使我们堕落了多少。对打“擦边球”的媒体表现内容的反应,反映的仅仅只是观察者个人的价值体系。社会学家并不拒绝承认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但他们强调,即使在现时代家庭和同辈群体仍然是比媒体更重要的社会化主体。比夫斯与巴特-赫德无疑远非是一种理想的示范,但前几代人在“三个小丑”(Three Stooges)和“狂飙兄弟”(the Fabulous Furry)的浪潮中并未堕落掉;今天的青年也许会有同样结果。

社会科学家很长时间以来就知道,儿童是以他们周围的人的行为为自己行为的模本的。因此,研究者们就试图去揭示儿童是否模仿他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人的行为,特别是,电视中宣扬暴力的节目是否导致了儿童的暴力行为的产生。这是很复杂的事情,因为情况可能是,那些已有攻击行为倾向的儿童,更喜欢去看那些有暴力内容的电视。

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资助的一项对电视与社会行为关系的文献研究,考察了大约900个关于电视暴力的研究,并总结到:

大多数研究者之间有一种共识,电视暴力确实导致了观看此类电视节目的少年儿童的攻击性行为……从相关程度的大小来说,电视暴力与攻击性行为之间关系,同它与其他任何所测量的行为变量之关系一样,相关性都很强。

另一项研究认为,这些发现对成年人也是适用的。这并不是说成年人在看了电视的暴力情节后,就会跑出去犯罪,但是他们在看完暴力电视后,更容易隐藏起攻击性的想法,更容易与家庭成员交流一些敌意的词汇和犯罪意

识(林茨和唐纳斯坦,1989)。应该注意到,没有一项研究认真研究过家庭娱乐的新方式(有线电视与录像机)对其观众的影响(斯蒂普和米拉维斯基,1988)。

对电视暴力的潜在危害性影响的意识不断增强,使得热心的市民和支持群体对媒体网络施加压力,让他们在节目中减少暴力场面。最近以来的一场这样的运动,起于1993年公众对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一个颇有争议的新剧“N. Y. P. O. Blue”的关注,这使得许多节目在一开始就向观众通告:“这是有暴力内容的。”然而如果公众兴趣转到了别的方面,广播公司是否还会继续这样做,这须拭目以待。

到20岁时,美国人平均看了100万则广告(波斯特曼,1981)。大多数广告告诉人们,如果购买了某种产品后,问题就会很容易、很快地得到解决。一项研究表明,经常观看大量电视的儿童倾向于相信,机器会魔幻般地工作,而且不会出错(希拉,1983)。

更进一步说,电视经常把人们或机构演绎为简单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在年轻观众的脑子中会得到强化。例如,在80年代中期,人们批评电视说,它们回到了“妇女是受害者”的主题。可在同一时期,尽管在媒体历史中是首次,电视中男女角色的比例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比例:大约是50比50(派那奇尼,1987)。

近些年来,传媒研究的学者就电视是否对现代社会的生活有更深或更微妙的影响,有了实质性的关注。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站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前列,他认为电视基本上重新定义了“能识字”的含义,并且正在逐渐地把世界联结为一种“全球村”(麦克卢汉,1964)。较近一些的分析不如这样乐观。波斯特曼(Neil Postman)认为,由于电子传媒总是暗示观众说,文化的每个方面都必须是娱乐性的,因而使公众的生活庸俗化和琐碎化了(波斯特曼,1985)。

在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讨论中,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提出了一种戏剧分析的方法,并认为,电视把社会生活的前台和后台的界限搞得模糊不清了。当儿童能够观看父母在电视上讨论如何抚育孩子的时候,父母的权威弱化了,成人与儿童的区分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可这种界限在印刷媒体时代曾经是十分清楚的。相似地,当媒体实际上对我们所有的政治领导人物的瑕疵进行残酷追猎和公开发表的时候,事无巨细(大的如理查德·尼克松的水门录音磁带,小的如比尔·克林顿的性丑闻),都使得公众对领导人的信任关系动摇了。事实上,梅罗维茨所担心的,在现时代,对任何人来说是否都能继续相信他们的英雄,正是我们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的潜在分支(梅罗维茨,1985)。

但是,电视的影响当然不会全都是负面的。电视节目,包括广告,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儿童可以从电视中得到许多关于人物、地方和事件的广泛知识,认识医生与律师、警官与消防员等多种社会角色。电视节目可能会是一堂地理课,或者激发对科学的兴趣(参见第十五章关于电视在教育中的用途)。并且电视广告确实有助于把儿童引介为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并使他

们认识到他们的社会是一个消费取向的社会。

总结来说,电视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化主体,它有一些有害的影响,尤其是对儿童,但也有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潜力。

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化

发生在儿童期的社会化,我们在上文已讨论了许多,但社会化并不会在某个特定年龄结束;它在人的整个一生中都在进行。当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获得了新的地位和角色。例如,我们许多人将要结婚,也许后来又会离婚或丧偶;我们将成为父母、受雇者或雇主以及年长的公民。即使在老年期这样一个接近人的一生的终点的年龄段,人们也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新情境,并创造新的自我形象。在我们这样的复杂社会中,生命展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序列,在这一序列中,有许多新的角色需要我们来扮演。

1

青春期与青年期

青春期是一个敏感期。由于青少年的身体和思想都戏剧般地在变化,也由于他们必须提高获得新的社会地位、扮演新的角色的能力,因此,他们有许多东西要去学习,要去适应(克拉克斯图尔特和弗里德曼,1987)。

成年人与青少年的关系每个社会都不一样。在美国及其他现代社会,人们倾向于把青少年当作孩子,而在前现代社会中,青少年则要从事劳动,因而被当作成年人。事实上,把青春期当作一个单独的或延续的人生阶段,在前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斯通和切克,1975)。

在现代工业社会,大多数青少年与他们在更年幼时相比,较少受到来自其直系家庭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受到了同辈群体与学校的影响。对那些不能将新旧两种情况加以整合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就面临一个疑惑和混乱的时期(阿德尔森,1980;霍根和阿斯顿,1986)。

与儿童期相比,青少年能在更大程度上采纳别人的观点,仔细审查他们自己的人格。然而,他们的世界观仍然是高度可变的,也就是说,会根据他们的切身经历和感觉发生变化。他们经常过分地意识到其他人在评价他们的行为,并且他们容易在唯我主义(经常地,在说或写的时候过多地提到自己)与自卑之间来回变动。

青春期是一个人发展抽象思维能力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大多数人发展幽默感的时期。显然,随着理解能力的增强,欣赏幽默的能力也会提高。

大量青少年期的社会化是以预期社会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的形式出现的:即指向未来角色的社会学习过程。尽管预期社会化跨越了整个生命周期,但“预演”未来的成人角色在青春期少年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如配偶(通过求爱)、父母(通过做保姆)及工作(通过兼职)。许多观察者声称,近几十年来,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联系纽带已经弱化了,尤其是在中产

阶级家庭，产生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代差。当青少年逐渐成长并在某些方面更为独立的时候，他们大多数在财政方面还是依赖于家庭的。这就产生了颇为棘手的情感冲突。其中三个重要的、也是被广泛讨论的冲突就是在衣着、发型及宵禁方面。青少年另一个共同抱怨的问题是，父母有时候把他们的目标强加到青少年身上，而没有去费神了解一下孩子到底是否愿意。然而，近来一些美国与英国的研究已经表明，尽管有这样的冲突，大多数青少年与他们父母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肯定性的（科尔曼和亨德里，1990）。

在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在青春期末与成年期之间，也即在生理上的成熟与完全进入成人世界之间，有一个不明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年人的年龄可以参加选举、结婚、生孩子了，但经常依赖于父母或家庭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由于大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许多年轻人直到25岁左右还留在前成人阶段。这个时期的生活被称做青年期（凯尼斯顿，1970）。近来的普查数据表明，部分地由于9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青年期的成人一直留在家里的人数在增加。事实上，在1991年，大约有30%的25~29岁之间的未婚的成人，都没有与他们的父母分开另立新居。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它似乎会延迟成千上百万的年轻美国人进入真正的成年状态。

2

成年期

进入成人期后，所谓的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指在一个人的早期阶段为各种成人生活角色所做的基本准备）已经完成。进入成人期后，正常来讲，人们已经发展起了关于自我的形象，既包括真实的，也包括理想的；遵从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达到一定的自我控制的程度；使个人的欲望服从社会的规则。但成人的人格还没有完全定型。事实上，不断出现的证据表明，他们的人格在继续成长并在整个成人期都在变化（布里和卡根，1980；勒力松等，1978）。此外，许多新的社会角色（如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必须在成人期去学习。就是这些原因，使得社会化终其一生都在继续。

成人社会化与儿童期社会化在几个主要的方面有所不同（布里，1968）。成人社会化的动机比儿童更明确，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去选择角色。如果他们想的话，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宗教、婚姻或工作状态，或者他们可以回到学校。儿童一般没有这样的自由去作这些选择。

成人社会化还包括，当角色内容发生变迁的时候，他们可以重新定义或再创造现行的角色。与儿童社会化的“角色借用”不一样，成人是在“制造角色”（role making）。关于角色内容变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对妻子角色的新定义。在过去，妻子的角色是期望去照料她们的家庭，去帮助她们的丈夫感到宁静和充实，而对家以外的责任，如果有，那也很少。这种角色定义现在受到了严厉批评，对妻子角色的重构工作正在顺利的进行。

在40岁左右，许多人发现他们对自己成就的价值感到怀疑，害怕他们无法完成他们开始想做的一切。有时，这种“更年期”（midlife transition）展示着一个再评价和变更的时期（帕克，1985；科克等，1986）。一项研究发现，经历更年期的人，似乎尤其全神贯注于他们的工作：他们选择的工作

类型，源于工作的自我认同，以及在成年初期是否对职业生涯作出了合适的选择（法林，1987）。有些人不能设法对此作出再评价，他们就进入了一个称为“中年危险期”的时期。这种危机可能以巨大的悲哀与不幸为特征，但那些安然渡过这些灾难风暴的人，经常会发现他们往后的成人生活是一生中最为快慰的时期。

3

晚年生活

像艾里克·艾里克逊那样的学者相信，一些最困难的态度和行为变迁发生在一生中最后岁月里。在这一时期，一个人必须调整自己，以求与社会声望的降低、身体机能的下降、面临死亡，以及一个人的生活失败等相适应（艾里克逊，1982）。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期有时被当作是无助的、无用的、依赖别人的时期。也许也是一个自我认同弱化的时期。大多数美国人的自我认同有赖于他们的工作角色及他们独立性和自我支持的程度。退休导致了工作时的自我认同的突然中断，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痛苦的。妇女的自我认同基于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如果她们丧偶或离婚，或者当她们的孩子离开家的时候，她们有时就感到失落或者说感到没用（这个老年化过程和问题将在第十二章讨论）。

4

死亡与 濒临死亡

戈勒尔（Geoffrey Gorer）令人信服地证明，现代美国人把死亡看作是和无性色情一样的令人倒胃的东西（戈勒尔，1965）。我们拒绝死亡，对濒临死亡的人掩盖他们的处境，并把死亡的所有蛛丝马迹都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赶走。我们把濒死的人送到医院，不仅仅是减轻垂死者的痛苦，也是将其从我们的视线中移开。我们压抑自己的哀思并把死亡带来的影响尽可能快地从我们的生活中去除（阿里斯，1981）。结果是，死亡的社会化通常被限制了或不再存在。

濒临死亡的体验

尽管有些人似乎镇定自若地面对死亡，但这样的镇静通常是长期的情感斗争的结果。面对死亡从来不是容易的，即使对那些似乎很勇敢地面对它的人也是这样。一位名叫库布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的内科医生（1969），花了一些年研究那些不治之症患者对死亡前景的反应，他认为，大多数人接受死亡经过了五个阶段。首先是拒绝并与他人隔绝；其次是愤怒；第三是讨价还价（临死的人与死神作交易，上帝或命运是否让他或她活得稍长些）；第四阶段是沮丧；第五个阶段是接受。大多数人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个顺序经历了这些阶段，他们有时仅在闪念之间就接受了死亡，有时是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摆。

库布勒罗斯勾勒临死的过程，起初是想帮助医生、护士理解他们的病人正在经历什么。然而，有时候这些“临死的阶段”解释得太字面化了。医生和护士试图引导病人机械地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一些病人由于没有

处在“适当”的阶段就对此感到焦虑。

悲伤、哀痛与失去亲人

当我们面临失去亲人(bereavement,即失去所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在经历悲痛的过程。如果病人在苟延残日,悲痛就通常开始于死亡之前,对临死者及活着的人都是这样。某个人要死的消息会产生一阵预期的悲哀(anticipatory grief),它几乎与死亡消息本身一样深撼人心。为了从因所爱的人面临死亡而悲哀的境遇中解脱出来,许多人试图把临死者健康时的形象在心理上固化下来。未预料到的丧亲之痛为什么使活着的人尤为难过,一个原因是突然死亡没有机会让人经历“预期的悲哀”(伦丁,1984)。然而,不清楚的是,预料到死亡,是否总是有助于活着的人调整自己去面对失亲之痛(兰德,1989)。

当死亡确实发生,对死亡的反应也会经历几个阶段。典型地,有四个连续的情感阶段伴随着失亲之痛:首先是震惊,麻木地拒绝所发生的一切;其次是拒斥死亡事实,经常盼望死者重新出现;第三是绝望,常常是极度的消沉;最后是适应,活着的人试图建立新的生活(魏斯,1988)。然而,这些阶段也许不会按照一定的顺序发生(伦德、卡塞尔塔和戴蒙德,1986)。

尽管悲哀是普遍的,但每个人经历悲痛时则表现不同。失去亲人的人,有的也许流泪悲伤,然后又突然愤怒地诉说死者“抛弃”了他们。或者生者重温死者20年前所说的话,与死者默默的交流,或者实现死者的愿望。这种内疚和愤怒的感情就是生离死别过程的一部分,它最终使失去亲人的人认识到,人死不能复生(伦德,1989)。

再社会化

尽管社会化在整个生命周期都在进行,但我们所形成的(人格)大部分是建立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的未发生变化的价值观之基础上,建立在那时确立的自我认同之上。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青少年和成人经历着一种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过程,即有意忘掉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接受新的价值观与行为。这一过程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有时对战犯的强迫“洗脑”(沙因,1961)。

再社会化经常发生在艾文·戈夫曼所说的全面控制机构(total institutions)中:即为了基本改造一个人的人格、价值观与自我认同,把一个人一天24小时都置于管理人员的完全控制之下的地方(戈夫曼,1961)。军队的基本训练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相对平和的全面控制机构的例子。基本训练的目的在于改变入伍者的市民自我形象以建立一种军人的自我形象。

这种变化由两个明确的阶段完成。首先,一旦入伍者从市民环境中走出来,集中在一个封闭的军事基地,他们就开始经历剥夺或禁欲的过程,这使他们旧的自我被系统地刷去。入伍者被要求放弃过去生活中所穿的服装,留

起统一的发型。个性化的名字尽量少用，代之而用的是“战士”或“水手”或叫他们的军衔。他们很少允许与以前的朋友和亲戚接触，并让他们干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同时还剥夺了相当多的睡眠时间。这种剥夺的结果是，他们过去所认同的东西开始弱化，开始越来越依赖于全面控制机构，很像小孩子依赖于他们的父母那样。

在第二个阶段，一个新的、军人的自我重构起来。入伍者被灌输以一套行为模式，通过向长官敬礼、注意整洁有序的外表、无条件地执行命令等，被期望的肯定的角色模式得到强化。12个礼拜以前，入伍者还是一个市民，现在他或她就是一个士兵，一个水兵或潜水兵了。

研究表明，军队训练成功地弱化了诸如个人的行动自己做主之类的市民价值观，并代之以服从权威之类的价值观。而他或她若要恰当地扮演新的角色，后一类价值观至关重要（斯道夫等，1949）。

另一个在全面控制机构中再社会化的例子是向非常规宗教转变的过程，许多人称之为“邪教”。然而，研究表明，大多数邪教成员最终回复到了原来的自我形象与价值观。有个报告估计说，最初加入邪教的人只有5%在那个群体中呆了五年以上的时间（彼特兰克，1988）。另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自愿离开的人从属于那个群体不到一年的时间（盖兰特，1982）。这些研究说明，只有对那些获得正规接触从而不断强化新的自我形象的转变者来说，再社会化才是通常有效的，这在社会所赞成的新士兵或水手的认同中更容易发生，而遭到普遍贬斥的邪教成员角色则不然。

为什么监狱，以及全国控制程度稍轻点的精神病院，常常不能有效地使其成员再社会化呢？戈夫曼关于全面控制机构的理论为此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洞察视角。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失败，也许是由于囚犯及一些精神病患者是非自愿地接受再社会化的，在这一点上与军队入伍者及大多数邪教成员不同（与这一事实相反，大众舆论通常认为大多数邪教教徒是非自愿地加入邪教组织的）。但是，对战犯成功“洗脑”的例子则表明，再社会化甚至无需主体同意也能达到一个有效的程度。监狱的失败及其他全面控制机构的不成功，是因为尽管有效地剥掉和抑制了成员原来的自我认同与价值观，但是很少能提供正面的角色模式，也很少强化它们想象中所推行的新价值观和新的自我认同。

并非所有的再社会化形式都像上面所讨论的那样具有戏剧性，所有的再社会化也并非全都发生在全面控制机构中。在有声望的职业领域如医学与法律中的再社会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过程可能尤为困难，充满压力。一位医生回顾她在医学院的经历时提到，像大多数一年级的学生那样，她首先相信治愈病人将是她的职业。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她认识到这种想法太过于简单：一些病人简直不能得到帮助，因为医学专业缺少这样的知识。医学专业的学生被逐渐地再社会化了，而她们的理想也就被严酷的医疗现实所驯服（克拉斯，1988）。

社会化与人的自由

我们所讨论的人们如何学会接受社会所期望的思想、感觉与行为模式，似乎暗含着这样一个结论，即人们仅仅是被动的墨守成规者。人们似乎经常屈服于学校、工作机构及其他社会力量的要求。然而，人远非是由社会通过社会化来操纵的木偶。社会是由人来创造的，尽管不是某个人所为。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就像社会是人们的一部分一样（朗，1961）。人们通过他们的互动创造了社会规则。

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对此进行过思考。尽管社会科学家们的哲学前提不同，但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把人看成是积极的存在物，他们能够，也确实创造和改变了文化与社会结构，即使经常是按照某种为社会所期待的方式在行动。

尽管社会化过程似乎限制了个人的创造性和人的自由，但注意到社会化也为人的创造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人必须具有高度的自信以开展新的、有时是冒险的工作计划，也必须能够忍受与此类工作相伴随的孤独与寂寞。这种自信最终来自于父母及同辈群体所提供的社会化。

进一步说，所有的社会化形式，甚至包括婴幼儿期的社会化，都需要个体的合作。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如在某些全面控制机构中），一个非自愿的主体是不能得到社会化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拒绝社会的某些教导。当人们感到某种行为不可能受到嘉奖的时候，他们就会拒绝所学到的或曾经履行过的行为期望。

随着人的长大，他们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通常会增强。我们都知道，有些个体在成年生活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剧本”，这与大多数人的社会模式是相反的。放弃回报丰厚的商业生涯而去做一位牧师，家庭主妇在中年时开始新的职业生涯都是其例。学院院长放弃在名望很高的大学中的职位而到小的南部黑人学院去从教也是这样。所有这些都拒绝“社会剧本”，寻求他们相信能更为满足其人格要求的角色。当人们为满足他们变化的需要而调整其角色的时候，每天都有少量的“剧本”变化的例子发生。

总而言之，不管一个社会看起来多复杂，也不管它怎样要求人们去遵从它，它仍然是可以改变的人类创造物。有时一个特殊个体的行动改变了社会，如拿破仑或亚历山大大帝。更多的情况下，变迁来自诸多无名个体的恒定压力。一个不遵从的行为也许就是一种偏离行为，但当这种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的时候，它就可能成为一种社会革命。

1. 社会化：是人们获得人格、学习社会 and 群体方式的社会互动过程，它从出生就开始了，并持续一个人的整整一生。人类相对较长的生活依赖期使得社会化成为可能，而我们在本能方面的缺陷使得延长社会学习的时间至关重要。

2. 基因与社会影响共同形塑人类行为，但哪一因素相对更为重要，争议颇多。社会学家认为，像利他主义、攻击性及性别角色差异等社会行为，都有一种生物基础。

3. 与他人的早期接触是婴儿的基本生理需要，对婴儿的智力和情感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有证据表明，人类情感的发展有一固定顺序。父母与婴儿之间的互动，为儿童的人格与自我意识的发展做准备。人格是构成特殊个体鲜明特征的思想、感觉与自我观照的特殊模式。自我即指一个人对他或她的个人认同或社会认同的意识与感觉。自我是人格的一方面，社会学家对此有浓厚的兴趣。

4. 查尔斯·库利的理论认为，人们对自己的意识（他们的意义，他们的自我），反映了他们所考虑到的别人对他们的思考。库利称此概念为“镜中我”。

5. 按照乔治·赫伯特·米德的观点，自我包括两个部分：自发的、冲动的、独一无二的“主我”，以及“客我”，即对社会要求的内化与个体对这些要求的意识。自我的发展依赖于参与角色借用的能力。角色借用指人们把自己想象为处于他人的角色或位置的角色活动。米德社会化三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即模仿阶段，其行为是基于重要他人的要求的。重要他人，指对一个人自我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尤其指在儿童时期。在嬉戏阶段，儿童装扮角色，但并不理解所借用的角色意义。就是在这个阶段，“客我”才真正地开始发展。在后来群体游戏阶段，“客我”才基于一般他人中的非个人期望而形成。一般他人指儿童所想象的较大社会的整体形象。这样自我的发展就包括“客我”与“主我”之间的连续对话。

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强调社会化过程的生理基础和情感维度，而不是社会化过程。他认为人格包括三个部分：（1）本我，一个无意识的生理冲动王国；（2）自我，在本我与内化了的社会要求之间的调节者；（3）超我指在社会中学到的“应该如何”与“应当如何”的内化，它是人格的审查者和社会监控者。要使一个人保持正常和健康，这三个部分必须在人的发展的各阶段都是协调均衡的。

7. 艾里克·艾里克逊，一个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他把分析焦点从本能冲动转向了自我的理性世界。在他所划分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种认同危机产生。对每个认同危机的积极处理，就会产生稳定的认同。

8. 让·皮亚杰研究了儿童的认知发展,即儿童认识和感知事物的能力的增长。这种发展有四个阶段:感觉运动阶段、前操作阶段、具体操作阶段及正式操作阶段。

9. 在复杂社会之间,培育孩子的实践很不一样。极权型的父母要求孩子无条件地服从。放纵型的父母对孩子更为开放和灵活。最有效的也许是权威型的父母,也即根据孩子的成熟程度来调整和扩大孩子应负的责任。

10. 一种社会化主体是对社会化作出贡献的一个群体或机构。主要的社会化主体一直都是家庭。家庭以外的社会化主体如学校和日托中心,同辈群体以及大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在传播文化技能与知识遗产、灌输以广大社会为取向的新的角色行为、教育个体以非个人的规则和权威来调整自己等方面,学校是重要的。儿童同时也受到了同辈群体的重要影响。同辈群体由拥有相同社会地位、年龄相仿的人构成。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近来已成为社会化的主要主体。电视既可能强化、也可能抵触其他社会化主体所教导的观念与价值。儿童在花费大量的时间观看电视。有些研究表明,这可能助长了暴力行为的产生,并使他们以此刻板印象来思考人和社会设置。

11. 在青春期,年轻人不断地摆脱家庭的影响并更多地接受同辈群体的影响。由于孩子与父母在情感上不断取得独立,同时又继续接受父母的经济支持,这种冲突就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很是烦恼的感觉。许多青春期的社会化是以预期社会化的形式出现的。预期社会化就是为扮演未来角色做准备的社会学习过程。

12. 在成年期,初级社会化已经完成,但仍然有许多新的角色需要学习。以后生活中的角色变化可能会出现自我认同的问题。初级社会化指早年为各种成人生活角色所做的基本准备。

13. 成人在态度与行为方面最为困难的一些变化发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许多老人当他们退休、丧偶或者孩子离开家庭的时候,就遇到了自我认同的问题。

14. 传统上,在美国对死亡的社会化很不充分。根据库布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的研究,就身患绝症的病人而言,濒临死亡的体验通常包括五个反应阶段:拒绝和与世隔绝、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这些阶段并不一定是必须连续有序的,但可能当病人走向死亡并试图接受它的时候再现出来。因死亡的悲痛通常在死亡事件发生之前就开始了。(亲人)死后,活着的人的悲痛可能经历几个阶段,包括震惊、拒斥死亡事实、绝望与适应。

15. 再社会化指产生与以前的价值和行为不同的新价值观与行为的社会化形式。它常发生在全面控制机构中。全面控制机构是为了从根本上改造一个人的人格、价值观与自我认同,而将其一天24小时都完全置于管理人员之控制下的地方。

16. 尽管我们的人格主要由社会来塑造,但社会化并未排除个人自由。所有的社会化形式都要求个体的合作,而成人可自由地拒绝社会化的某些方

面，或者力图改变社会。

推荐阅读书目

1. 伯杰 (Berger, Kathleen), 1986. 《儿童期与青春期的个人发展》(*The Developing Person through childhood and A dolescence* 2nd ed. New York: Worth.) 对人的发展, 尤其是婴儿期与儿童早期发展的研究导论。

2. 卡特 (Degler, Cart), N. 1991. 《人类本质探索: 美国社会思想中达尔文主义的衰落与复兴》(*In search of Human Nature: The Decline and Revival of Darwinism in Amerrca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该书是对人类本质的生物基础及生物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日益增长的公正解释。

3. 艾里克逊 (Erikson, Erik), 1964. 《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修订版。讨论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面临的认同危机的经典著作。

4. 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1962. 《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的绝世之笔, 该书表明了他关于一个人的本能冲动与社会化过程中的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的观点。

5. 汉德尔 (Handel, Gerald) 主编, 1988. 《儿童社会化》(*Childhood Socialization*. New York: Adline.) 一部对儿童社会化进程的优秀著作。

6. 皮亚杰 (Piaget, Jean) 和巴伯 (Barbel Inhelder), 1969. 《儿童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Child*. New York: Basic Books.) 该书介绍了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 并附有对皮亚杰许多实验的讨论。

7. 罗宾斯和瑞特尔 (Robins, Lee N. and Mchael Rutter) 主编, 1990. 《从童年到成人的捷径与歧途》(*Straight and Devious Pathways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个重要的关于童年经历预示成年后果的长期研究论文集。

群体与组织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笔下的鲁宾逊·克鲁索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人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因想象自己处在一个充满陷阱、完全孤独、荒无人烟的岛上而神情激动或恐惧。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一个现代的克鲁索，长时期地与人类断绝了所有的交往接触，想象一下你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一方面，你会觉得很好，没有其他人来告诉你去做什么。你想睡多长时间就可睡多长时间，爱怎么穿衣就怎么穿，尽你最高的音量放声高歌，你可以打嗝、搔痒而无需担心别人是否会喜欢。一时间，这样的自由也许是天堂般的。

但是你可坚持多久？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答案是：根本不会坚持很久。即使是最反社会的个体，不久也便会开始想要有人来陪伴。如果我们孤独地生活，谁会来祝贺我们的成功，在我们忧伤时谁会来安慰我们呢？除了自己的声音外不能再听到别人的声音，我们的一些想法只能在自己的脑子里萦回而不能向他人表达，这种情况我们能满足多久呢？事实上，长期被迫忍受与世隔绝的人，经常体验到深刻的迷惘，甚至可能因没有人的陪伴而发疯。毫不奇怪，传统监狱中大多数最严厉的惩罚可能就是关禁闭。类似地，对许多社区宗教群体来说，可以实行的最强烈的惩罚性制裁就是“隔离”，或者说强迫离开群体。就像鲁宾逊·克鲁索最终在他的孤岛炼狱中遇到另一个人时欣喜若狂那样，任何曾经被迫经受、即使是相对短暂的与世隔绝的人，都会知道与他人的接触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需要，就像人需要食物、水和

住所一样。

第六章引用大量文献说明了,为获得恰当的社会化,人就需要与他人接触。我们大多数的基本生理需要与心理健康,也要依赖于他人。我们与他人一起工作、嬉戏、学习和祷告;事实上,大量的人类生活是以群体的形式进行的,以至于那些喜欢独处者被贴上“孤独者”的标签,并认定为有偏离行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认为人类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人类就是生活在所有不同规模和类型的群体中。

由于社会群体在我们生活中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我们生活的主要部分,因而也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本章就从对小群体的性质和结构的讨论开始。小群体就是小到能允许其成员以个体为基础进行相互的交往联系的群体。在研究了小群体的运作方式后,我们转而分析组织这样较大的社会群体,并以讨论取代传统组织结构的种种形式来总结本章。

社会群体的性质

30至5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就是对小群体的研究。虽然在适当的地方我们也引用了更晚近些的研究著作,但我们对小群体的讨论,大量引用的是这个时期的经典研究。我们以回答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为开始:精确地说,什么是社会群体?

1

什么是社会群体

像在第四章指出的那样,群体成员不仅仅是人群的集合、或社会的类属,它展示的是人们相互联系的独特模式。换句话说,他们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并对其成员有某种确定的期望。群体还通过一些特殊的意义与规范产生了群体文化。所有群体都有自己的特征,并且从属于群体的个体成员,在人格、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各不相同。通过共享群体的意义与规范,群体中的人就产生了一种作为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这样,群体中的人就与群体外的人有了十分明确的区分。因此,社会群体就可定义为两个或更多的人,他们有共同的认同及某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对群体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相同而确定的目标和期望。

虽然社会群体一词可以应用到大到整个社会的各种单位,但它还是有更为具体的含义。这个词经常为社会学家与非社会学家用来表示小的、面对面的、成员彼此认识的群体。举例来说吧。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下午,你如果环顾一下公园四周,就会发现许多类人群的聚集。有些人聚集在热狗站,等待购买食物;一群五六个十来岁的少年,身穿牛仔、T恤,骑在自行车上一路争吵而来;还有一些零星的散步者、漫游者、儿童。转到左边来看看,也许有些大人与小孩在围着一个公园桌子野餐。这里,哪些是社会群体呢?

围在一起等着买热狗的人不是社会群体,因为他们没有独特的群体结构

和共同的文化。他们彼此并不认识，除了都想尽可能快地买到食物外，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他们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仅仅因为都想买到热狗。社会学家有时称这种人群聚集为聚合（aggregates）（当然如果所有排队买热狗的都是家庭成员或朋友，他们就组成一个社会群体——但不是因为他们有买热狗这个共同目标）。

然而，小公园这些的场景中确实包括两个社会群体。骑自行车的男孩可能是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有共同的行为方式和一套价值观与角色期望。一个男孩可能是小丑，另一个是头，其他人是“随从”。他们的服装、说话的风格、行为代码以及群体团结感，把他们与那些仅仅是聚合在一起的人区分开来。在野餐桌旁聚集的人也可能是一个社会群体——也许是一个家庭或亲密朋友的星期日郊游活动。

一个众所周知的小群体是匿名酒友群体（Alcoholics Anonymous，缩写为AA）（邓金，1986b）。匿名酒友群体，大小从5个到30或更多个人不等，每周至少见一次面，有一个主要人物领导。仪式是群体集会的重要部分——祈祷，他们的读物引自AA文本，那些提供此类引文的人被赋予特殊地位。成员通过宣誓“不喝醉”而团结在一起，这再次确认了群体的目标。他们也有作为饮酒者的共同认同，即在讨论开始，总是说“我的名字是……，我是一个酒友”。交往是集会的核心活动。AA成员在过去有共同的（在一起饮酒的）经历，并发誓将会继续来参加集会，这样群体就延续下来。

2

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

正如第四章所简单讨论的，社会学家很早就区分了群体的两个基本类型：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整个历史中，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也许是最重要的社会群体）是初级群体，即一个相对较小，有多重目的的群体，在那里互动是亲密无间的，并存在一种强烈的群体认同感。最重要的初级群体是家庭，其他初级群体包括年纪小的同辈群体，如儿童的嬉戏群体和青少年帮伙；一些邻居朋友圈和成人社会俱乐部；在复杂组织中的非正式群体，例如工厂工人的派系，以及学生的朋友群体。

自从查尔斯·霍顿·库利（1909）首次使用这个词以来，初级的含义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扩展。库利使用“primary”这个词主要是表示“最初”（first）。家庭和儿童的嬉戏群体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社会化主体，因而他将之称为初级群体。库利把这类群体看作是“人类本性的培养所”，他相信此类群体对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自库利以来，这个词一般被扩大到用于有类似家庭纽带关系的所有群体。成员之间有共同认同感的兄弟会与姐妹会、运动队乃至小的政治团体，都可以当作初级群体来分析。

初级关系

也许理解上面这些群体性质的最好办法是去看一下联结群体成员的关系类型：初级关系（Primary Relationships）。这种类型的关系不仅可以在所有的初级群体中找到，而且几乎在每一种组织、所有的社会场景中也都存在。初级关系是一种个人的、情感的、不容易置换的关系，它包括每个个体

的多种角色与利益。它以大量的自由交往和全部人格的互动为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有更为详细的解释。

第一，这种关系中的人扮演多种角色，并把许多个人利益带了进来。例如，教授与大学生的关系是典型地根据这两个特定角色而定的，他们没有初级关系。然而，假设这个学生要开始学习研究生课程了，并与同一个教授一起密切工作，这两个人也许就会建立起一种初级关系——成为朋友、并在工作之余因社交而见面，甚至他们还会成为竞争对手。

第二，因为初级关系包括广泛的角色和利益，它也就包括了全部的人格。例如，办公室中的初级群体成员也多半会相互了解彼此间在办公室以外的事情。通过下班后的社交与工作时间的聊天，他们知道了他人是怎样管理家庭财政、闲暇怎样度过、以及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因为他们从多种角色来相互观察，因此在相互评价时，可能最终也会根据非工作角色，这正如根据共同的工作角色作评价一样。

第三，初级关系以大量的自由交往为特征。处于初级关系中的人通常感到他们能够、也应当亲密地往来。我们既不期望也不希望屠夫在某个早上告诉我他为什么沮丧。但我们期望自己的配偶要这样做。通过开诚布公的交流、通过对相互之间行为的观察，初级关系中的人展示着他们的内在自我，这样就变得更加亲密。

第四，因为在初级关系中人们投入了人格的许多方面，因此尽管他们不必总是情深意重，但他们的交往是充满情感的交流。一些初级群体成员甚至可能对另一些人非常憎恶。群体的成员关系中，除了情感的联系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许是尊敬或支持，而这正维持着彼此厌恶的成员之间的初级关系。

第五，由于初级关系卷入了个人的独特性格，因而，这种关系就不会容易地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如果你认为你的医生粗鲁、缺乏耐心，你可以去找另一位。但假设在男朋友或女朋友这种情况下，亲密的感觉是不会很快、或很容易地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的。

初级群体、次级群体与“墨菲·布朗”

某种程度上讲，说电视是社会的镜子，并没有抓住关键。美国电视是一个商业媒体，因此它所设计制作的节目是在最大可能地吸引观众。这是电视制片商所追求的目标。但他们不是通过描绘真实的社会来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而只是对观众投其所好。

在这种情况下，初级群体，尤其是家庭，其重要性出现了历史性的下降，而相应地次级群体的重要性在上升。随着许多美国人对家庭的日益弱化感到深深的悲哀与忧虑，这种趋势（也是现时代的一个最关键的社会转变）已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面对人们的这种关注，电视制片商以媒体学者埃拉·泰勒（Ella Taylor）的话来回应说：“20世纪晚期，现代生活发生了摧枯拉朽的变迁，人们基于这一变迁所表现出的关注，正是对初级附属关系的沉思默想，对社区与集体团结的一种想象性注释”。



一方面,“考斯比电视剧”(The Cosby Show)的巨大成功激发了以家庭为中心的情景喜剧的复活。这个节目及其仿制品,展现了传统主义者尤为强烈喜好的初级互动的理想形象。考斯比电视剧是对渴望完美、协调的家庭或社区关系的一种回应。这样的家庭或社区为其所有成员提供了需要的满足,并通过感情、献身来调节其本身(由于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似乎并未实现,因此这种渴望就愈加强烈)。”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明显的一方面,为回应我们对初级互动的渴求,也是为回应因初级互动如此亲近而产生的某种恐惧,电视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理想工作场所的剧目。这些剧目对那些过于个体化、过于珍视自己的特权的人来说,尤其具有感染力。它们充分地回应了初级群体对个人自由的巨大压抑,就像考斯比剧所反映的那样。这种趋势开始于7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的节目有“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M*A*S*H”,“Lou Grant”及“Barnery Miller”,而现在最著名的则是“墨菲·布朗”(Murphy Brown)。

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工作群体是次级群体,而非初级群体。尽管我们也许与合作者产生了偶然的密切关系,但我们与他的工作关系多倾向于算计的、工具性的,是一种冷淡的关系。由于我们渴求一种温暖的、密切的联系,因而就被吸引到剧本所展现的一种虚拟的工作空间中——那儿温暖、具有初级特征。

我们来看一下在“墨菲·布朗”剧中的工作群体吧。他们中除了主持人吉姆·迪尔结婚多年外,其他人都没有常规的家庭联系。迈尔斯·西尔贝格(Miles Silverberg)与弗兰克·丰塔纳(Frank Fontana)几乎患了约会强迫症但未能有婚约。科基·舍伍德(Corky Sherwood)结婚了,但关系破裂,现已离婚。墨菲(Murphy)她自己则是一个未婚母亲。

尽管这些人缺少正常的家庭纽带,但很明显,他们相互之间有很强烈的感情联系。墨菲(Murphy)与弗兰克(Frank)之间有柏拉图式亲密恋情;可实质上,他们是兄妹。吉姆(Jim)木讷,却是受人爱戴的兄长;科基(Corky)是个好冲动的小妹;菲尔是大伙经常去的那个酒吧的老板,扮演着一个睿智大叔的角色。正如泰勒(Taylor)所讲的,“这个电视场景……假定温馨和团结,情感深沉与滋润,家庭与社区的保护功能等,都是我们相信曾经有过,但已经失去了的东西”,但是,迈尔斯(Miles),整个新闻室中拥有正式权威职位的人,是一个年轻、弱不禁风、无主见的人,远非“考斯比剧”中的主要领导形象。他的懦弱反映了初级互动中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矛盾。

关于墨菲的家庭生活也可列出一些相似点来。她有一个婴儿要去爱、也为其所爱,但没有过分严格地限制她的丈夫。代替这种角色的是一个古怪的家庭画师并代为主姆的爱尔丁。他与墨菲的关系,密切时,不仅限于非性的方面,而且还整个处于墨菲的控制之下:他不是她的丈夫,他是她的雇员。

这样,“墨菲·布朗”剧中的人对其他人都只有利而无害。他们与同事享受虚拟的家庭温暖,彼此提供陪伴与情感支持,但与此同时,又没有对个人的难以忍受的限制,每个人最终都是自由的。由于“考斯比”感染了我们中的传统主义者,“墨菲·布朗”反映了对自由与亲密的矛盾渴求,这就在我们这样一个初级群体下降、次级群体日益普遍的社会中流行开来。

资料来源:埃拉·泰勒:《黄金时间的家庭:战后美国的电视文化》(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Copyright ©1989. 获该出版社及作者允许重印。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初级关系,因而也就是初级群体,为人们

提供了人格发展的机会。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把对自我的形象扩展为一种复杂的、多层面的个体。更进一步说,在人们与其他人或群体发生冲突的时候,初级群体是主要的认同来源和安全来源。因为初级群体接纳的是整个人,它给人以“某人站在我这边”的感觉——这是一种必要的情感支持。成人失去配偶、老人的所有朋友都离开人世、或者因死亡或离婚而使儿童失去父母,在这些情况下,很明显,初级群体和初级关系是多么的重要。这里的每种情况都表明,因初级关系的破损,个体都遭受着重大的痛苦。

不过初级群体也对人们产生负面的影响。由于一些初级群体压抑个性、有时还压制个人的成就,从而也就会限制个人的社会发展。为了寻求个体自己的独立发展,一些人不得不从他们的家庭联系中挣脱出来。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了解。

次级群体与次级关系

尽管库利没有使用过次级群体与次级关系这样的词,但今天的社会学家则在广泛地使用着它们。次级群体是为达到特殊目标而特别设计的群体,其成员主要以次级关系来相互联系。与初级关系相比,次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缺乏情感深度的关系,它所包含的只是一个人人格的某些有限方面。

次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普遍。办公室工作人员、大学院系的同事、政府机构的官员,所有这些大都是次级群体的普通成员,这些人通常是通过便笺或电话进行非直接的交往。这种非人格特征反映了次级群体的目的:达到务实的目标,而不是提供情感支持或作为自我表达的工具。我们最熟悉的次级群体是正式组织,将在本章稍后一点讨论。

表 7—1 总结了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的差异。

表 7—1 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特征比较

初级关系	次级关系
1. 包含了每个参与者的多种角色与利益。一般是弥散的特征。	1. 一般只包括每个参与者的一种角色与利益。特殊性的特征。
2. 每个参与者的全部人格投入。	2. 参与者只投入了与情景具体相关的那些方面的人格。
3. 包含大量自由的交往。	3. 与特殊关系主体的局部交往。
4. 充满个性特征与情感。	4. 相对无个性、无情感交流。
5. 别人不容易替代。	5. 可能移到他人身上,也即参与者可以互相替换。

注:初级关系通常是情感表达与使人满足的重要来源。次级关系在商业往来方面更为有效,它是现代城市与工业社会的独特特征。

群体行为: 偷懒 (Social Loafing)

在群体中做事与单独一人做事,效果常常很不一样。在群体中工作可以促进团队精神,并易使人们更为努力。这在社会学术语中被称做社会促进 (social facilitation)——它使一个人在他人面前表现得更为努力 (亨德里克, 1977)。然而,群体中却并不总是存在社会促进。



在许多群体中，有人怀疑许多成员装出努力的样子，但实际比他们为自己干要做得少。这是多么常见的事啊。我们常用许多词来描述这样一些行为：偷懒、马虎、工作打瞌睡、上班睡觉、懒人、不做份内之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学家，试图避免使用此类充满价值意味的词，他把这称做“社会性表演阻滞”（social inhibition of performance）；有人则喜欢用直率的贬义词：“偷懒”。

偷懒不是一种开玩笑的事，它使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至少，据说许多美国二厂相对低产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工人缺少激励。然而有些类似于美国工厂的机构，如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公社（kibbutz，集体农场）及日本的资本主义工厂，其成员或雇员远非是“偷懒者”，他们似乎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在工作。

既然集体努力对社会生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那么许多群体成员所做的远比他们所能做的事情要少得多的这种趋势，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十分可能的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会因偷懒行为而下降，就像因缺少资本投资、人口过量增长、熟练研究人员与技术人员短缺……等等而下降一样。

20年代早期一个名叫林格尔曼（Ringelmann）的德国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这是“偷懒”的一个证据）。林格尔曼让志愿参加实验的人尽他们所能去拉一根绳子，并分别让单人、二人一组、三人一组、八人一组去拉这根绳子。他的那些受试，都是身强力壮的工人，当他们每个人单独拉这根绳子的时候，平均能达到63公斤（139磅）的力，然而，当他们组队去拉时，却并未因团队精神的鼓舞而使每个人的拉力加强，反而下降了——两人一组时下降小些，三人一组时下降更多，八人一组时下降最大。八人组每组的平均总拉力只有248公斤，或者说少于个人单独表演时之总和的一半（拉塔内、比布、威廉斯和哈金斯，1979）。显然，当他们一起拉绳时，有某种原因使他们未能做得最好。

后来研究表明，在偷懒数量与偷懒是否显眼之间有某种关系。一项研究宣称，大学生群体与其他群体竞争时，偷懒者要少些（哈金斯和席曼斯基，1989）。更进一步说，当个体知道他们的工作结果要向大家公开时，偷懒就更少些（威廉斯、尼萨和拉塔内，1989）。最后，群体工作的感染力越大，发生偷懒的情况就越少（扎卡罗，1984）。

资料来源：摩顿·亨特（Morton Hunt）：《社会研究纲要：人类互动的科学研究》（New York Russell Sage P Foundation, 1985, PP156~159）。

3

我们为什么形成群体

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有两类，即工具性需要和表意性需要。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的界限也十分明显。社会学家相信，这两个方面的差异，就是人们为什么形成社会群体的两个基本原因。

一些群体满足工具性需要（instrumental needs）——也就是说，群体帮助其成员去做那些不容易单独完成的工作。许多工具性群体是绝对必要的，例如，单个的足球运动员是不可能赢得一场比赛的。另一些工具性群体则不那么重要。没有诸如“体重观察者”群体，人们也可以减肥；没有在考试时形成的非正式学习小组，学生当然也可以通过考试。但这些群体通常比个人更为有效地达到目标。不过，有时群体的努力与单独个人的努力相比，其效

率更低（原因请见“社会学之窗”栏：“群体行为：偷懒”）。

另一些群体的形成主要是为了满足表意性需要（expressive needs）——这就是说，群体帮助其成员实现情感欲望，通常是提供情感支持和自我表达的机会。大多数朋友群体就是出于这种目的；兄弟会和姐妹会也同样如此，尽管其结构性特征更为明显。

实践中，许多社会群体（也许是大多数）都能满足这两种需要。例如，工具性群体也经常满足表意的需要。运动队的成员会产生密切的关系，这是他们在场外的友谊基础。音乐师在一起长时期地排练和表演，就是一种密切的相互接触，这就会导致友谊的产生。

群体结构

人们在一起呆的时间足够长，几乎总会有社会结构的产生。陪审团、工作人员，甚至困在电梯里的人，起初可能只是一些陌生者的集合，但当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他们就会形成统一的规范、地位、角色系统。为什么人类群体有这种倾向？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在第四章已经讨论过。这里我们把讨论只集中在小群体方面。

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 1951），一个小群体研究的先驱者，根据他的观点，社会结构的产生在于人们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的需要。当两个或更多的人第一次相遇，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紧张。每个个体都试图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群体互动模式来减少这种紧张。一旦这样的模式建立起来，其成员就开始知道哪些行为是相互期待的；反过来，成员也可在群体中形塑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结构就解决了每个群体成员都面临的问题：我应当在他人面前如何表现行为？

群体成员不同的天赋和个人特征也有助于社会结构的产生。有些人发现当领导很容易，而另一些人则发现服从很容易。有些人对群体的价值可能有特殊的洞察力，因而扮演起了领导新潮流者的角色。渐渐地，群体角色逐步发展起来。例如，在高中学生的同辈群体中，社交能力最强的成员可以主持聚会，而智力最好的人可能会最大程度地影响群体其他成员的意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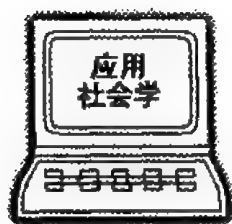
群体的规模怎样影响其成员的行为呢？许多古典社会学家对此主题都很感兴趣，尤其是乔治·齐美尔（沃尔夫，1950）。

群体规模

可能最小的群体是二人群体（dyad），只有两个成员。二人群体的关系纽带可能是最强的，这样的群体能够产生较大群体中所没有的团结感和亲密感。但是，由于二人群体依赖的是一种单一的联系，成员必须总是相互考虑到对方。并且在二人群体中，没有任何让别人参加互动的机会。如果一个成员退出，这个群体就终止了。

根据齐美尔的观点,有三个成员的三人群体(triad),某种程度上说,是所有小群体中最不稳定的群体。在三人群体中,有一位可能总是局外人,或者说是个“入侵者”(卡普洛,1969)。另一方面,第三个人有时可能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对群体规模的分析有实践意义,参见“应用社会学”栏:“我应该与几个人住一屋?”)。

群体越大,它就越复杂、越正式。每增加一个新的成员,群体中可能的社会关系数成几何级数增长。例如,在一个有A、B和C的三人群体中,只有三对可能的友谊关系:A与B、A与C和B与C。一旦另外一个人(D)加入群体,可能的成对友谊关系就有六对:AB、AC、AD、BC、BD和CD。如果再有一个人(E)进入群体,十对二人关系就形成了:AB、AC、AD、AE、BC、BD、BE、CD、CE、DE。这样,群体规模只是增加了两人,而群体中可能的关系对则已由三个上升到十个。



我应该与几个人住一屋?

当学生开始上大学时,通常他们所作的第一个独立决定是住哪里。如果不是住家里,那么他们就有广泛的选择——他们可以独居,可以与一个室友住在一起,可以与两三个人共住套公寓,或者甚至与四个或更多的学生共租一座房子。显然,每一种选择既有长处又有局限。即使学生相互之间非常了解,也会发生些问题,所以选择住的方式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了一些有趣的知识信息,它们可以帮助学生在居住安排方面作出合理的选择。这种知识可帮助学生了解,在选择居住方式时,哪些行为模式是可期望的。

像在正文中提到的,最小的群体,二人群体,最大程度地提供了潜在可能的亲密关系,这可能为群体成员提供很大的满足之源。但因为二人群体依赖于一种单一的关系,当他们在一起时,为保持与另一个人连续的交流,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责任。

这对大学室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二人群体可以保证两个参与者的情感支持。然而,群体规模也可能是一种紧张之源,它可能使这样一种关系很难维持。两个群体成员间的亲密无间可能妨碍他们的隐私。他们也许因要常常检点自己的行为 and 感觉而感到有压力。那些想要扩大社会生活、去体验许多新事物的学生,也许会感到不得不经常与某个人在一起是一种紧张。但对那些想要开始努力学习并要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来说,只有一个室友也许会是一件很有益的事,尤其是那些志同道合的室友。

当第三个人加入这个二人群体时(形成了一个三人群体),他们的关系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第三个人起调解者的作用,就会加强群体的稳定性。若第三个人受人尊重、两人都对他或她很信任,当群体中两个成员间发生了触忤,他或她就可以帮助缓和气氛并弥合他们之间的差异。但社会学家注意到,第三个人如果试图成为主导者,他或她也可能就是关系紧张的来源。三人群体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其中的两个成员经常是意见一致的,则有可能将第三者晾在一边,使这个人感到受欺侮、被拒绝。

很明显,不会有对每个人都会是最好的群体规模,因为没有哪两个人会有同样的需要。但研究表明,一个小群体的最合适规模是五个人。大多数人发现,在一

个很小的群体中，经常面对面的互动但又缺少平等，会显得太紧张。并且他们感到，如果群体超过五个人就太大，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相信，在这样的群体中，每个人只能扮演一个很有限的角色。

五人群体似乎具有了三个稳定的、令人满意的特征：(1) 奇数的成员数目使角平衡成为可能；(2) 这样的群体倾向于分裂成一个三人的多数派和一个两人的少数派，因此没有人会完全感到被抛弃。(3) 这样的群体大小足可以使其成员轻易地从一种角色转到另一种角色，例如从领导者转变为协调者，而不会使某个人总处在一种位置 (Hare, 1962)。所以那些将选择在校外合租一座房子或较大公寓的学生，可以考虑这样一种居住安排，因为它似乎提供了最好的机会，限制也最少。

资料来源：霍华德·L·尼克松 (Howard L. Nixon)：《小群体》(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79)。

大群体与小群体相比，既可能成效更大也可能更小，这要看群体的任务 (Nixon, 1979)。当群体任务的完成受到群体中最弱的或效率最低的成员的局限时，在解决问题方面，它就通常比一两个有创造性的个体的效率还要低。但当群体任务依赖于一致的群体努力、每个人的投入都对该任务有价值的时候 (如为某种政治请愿而获得签名)，通常一个大的志愿群体更容易完成——成员彼此的工作对任务的完成都是一种补充 (伍德、波莱克和艾肯, 1985)。

这样，“恰当”的群体规模强烈地依赖于它的目标，当许多群体相对小时，它们都运作得最好。对像顾问群体或情感受挫儿童的日间夏令营 (day camps)，理想的群体规模应不多于 10 个。学校中的群体规模，其成员在 12~30 个之间为宜 (斯基德莫尔、霍恩、撒克里和法利, 1988)。

2

群体规范

我们已经提到过，社会群体与仅仅是人群的集合区分开来的一个特征是一套共享的规范。群体规范规定了成员应该如何行动以及违规意味着什么。

对群体规范及其起源的研究中，最好的一个是威廉·福特·怀特 (William Foote Whyte) 的经典研究《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在 30 年代后期及 40 年代，怀特投入到在“科纳维尔”的一个街道团伙的活动中。“科纳维尔”毗邻“东部城市” (实际上在波士顿北端)，是意大利人居住的城区。大多数“受人尊敬的”波士顿人对这个地区很少了解，只是相信“在科纳维尔很少有课堂，孩子们在狭窄、无人注意的街上到处乱跑，青少年犯罪率高，成年人犯罪很普遍，并且在大萧条时期，大多数人靠救济过日子”。除此之外，对这个城市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科纳维尔除了“可怕的人群混杂、社会混乱”外，一无他物 (怀特, 1943, 1981)。

怀特的研究对象是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纠集在一起外出。这些“街角小伙子们”有一套至少和比康·希尔精英群体 (Beacon Hill) 的规范一样严格的规范。例如，他们关于等级的观念就高度发

达。在帮派等级的顶部是该帮伙的头，称做“多克”(Doc)。多克下面有三个直接助手，在这三个助手下面则是九个左右的成员。这三个等级之间的关系，出于一种首领对其成员有优先权的坚定信念的支配。

传统惯例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群体行为。成员每晚要在同一个酒吧聚会就是这样的惯例。并且这样聚会无论在哪天，他们都要坐在同一张桌子的同一个位置。“坐这些位置的权利为其他科纳维尔群体所认可，当在惯常的位置上发现了陌生人，那么必须另外找一些椅子，这就是件很麻烦的事”。

群体成员严格恪守相互帮助的复杂规则。“科纳维尔小伙子这个代码就要求力所能及地帮助他的朋友们，并不允许他做任何对朋友有害的事情。”这些责任在成员之间有所不同。一个帮伙的头必须出手大方，他的手下也期望他给出大量的礼物、带来大量好处。这样的人如果反过来接受礼物，特别是接受来自地位低的成员的礼物，被认为是损尊严的。然而对地位低的成员来说，帮助头做事就是加强自己地位的途径。

这样，怀特的街角社会远非是一种无组织的社会群体。它们具有调节所有成员行为的复杂群体规范。这些规范简直就是与任何其他社会的规范一样充满意义：它们精确地告诉这些帮伙成员在大多数情景下如何行动，即使这些行动看起来对其他波士顿人来说非常特殊。

3

群体角色

在《街角社会》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许多群体规范以角色期待的形式出现。群体角色可以很自然地出现。例如，如果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紧急事情之中，如车祸事故，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自动地假定一种不同角色。有人可能会作为医生的助手，有人可能会成为维持秩序者，另一个人则可能成为送信者。这就是像事故这样的偶然事件如何把一群人转化为一个群体的例子。

许多人试图搞清小群体中产生的一般角色。最著名的是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及他的同事对各种任务取向的小群体(task-oriented groups)研究。他们发现在每个小群体中都会产生一些相同的基本角色。每种角色都以不同的方式对群体的任务或活动作出贡献。一些人扮演着说话者的角色以保持交谈的继续。另一些人则为群体出主意。还有另外些人也维持着交谈的继续进行。最后，最受人喜欢的人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他们帮助着解除紧张，增进团结(帕森斯和贝尔斯，1955)。

另一个关于群体角色的著名研究是由菲利普·齐默巴多(Philip Zimbardo)主持的。齐默巴多(Zimbardo)与他的同事想要研究的是狱警滥用权力的问题，如扣留送给犯人的东西，打犯人及把犯人关禁闭。齐默巴多想知道，是哪些粗鲁的、冷酷无情的人被拉来干狱警了呢，还是监狱社会环境中某些东西可以产生暴力行为。

为给这些问题找到答案，齐默巴多在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仿建了一座监狱，并向年轻人发广告征集实验的参与者。70多人申请了这项每天报酬15美元的工作(齐默巴多，1972)。齐默巴多用心理测验和体能测验挑选了24

个看起来心理稳定和正常的学生参加实验。他们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中产阶级家庭。然后，学生被随机分配“犯人”或“狱警”这两个角色中的一个。那些被“选”作犯人的学生真的由当地警察逮捕并带到这个地下室监狱，关在一个三人一间的囚室里，并被告知要关两个星期之久。到第六天结束时这个假监狱被关闭了，因为研究者对他们的实验所引起的行为感到很担心（齐默巴多，1971）。被选为“狱警”的学生真的扮演起了典型的狱警角色，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囚犯”，以非人的手段从中取乐。同时，“囚犯们”也很快地适应了囚犯的角色，想到的只是如何逃生和避免惩罚。

批评者们指出，齐默巴多的研究对真实的囚犯来说可能不是完全适用的。在真实场景中，同室囚犯一般能够产生一种非正式的结构，这可以有助于他们减缓所面临的压力。进一步说，在真实的监狱中，狱警知道，他们要与囚犯相处数月、数年的时间，而不只是一两个礼拜，他们大多数都开始懂得，他们必须与囚犯建立起一种合理的、积极的关系，因为一种极端敌对的工作环境将会使他们的工作做起来更难、更冒险。然而，尽管有这些要注意的问题，齐默巴多的实验结果广泛地解释了监狱暴力的原因，它表明监狱暴力不在于狱警和囚犯的人格，更多的是监狱本身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研究中，两组学生（“狱警”和“囚犯”）扮演的群体角色的方式，强烈地支持了结构性要求可以容易地克服个人偏好的观点。

领导

每个群体都有些位置能使某些人对他人行使权力。贝尔斯（1951）发现，小群体中有两个主要领导类型。工具型领导（instrumental leadership，也称任务型领导）力图指导群体朝它的目标走。表意型领导（expressive leadership，也称社会情感型领导）寻求创造群体的团结和维持群体的协调。两种形式的领导对群体的成功来说都是需要的。

两种形式的领导角色通常由不同的人扮演。根据帕森斯与贝尔斯的观点（1955），传统的美国核心家庭就存在这种领导者的划分：养家糊口的丈夫扮演的是工具型的领导角色；管理家政的妻子则通过为家庭提供温暖、舒适及情感、安全，扮演着一种表意型领导的角色（有关家庭中性别角色的其他观点，参见第十三章）。除了促进不同的目的外，领导可以有不同的风格。在3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勒万（Lewin）、利皮特（Lippit）及怀特（White）对小群体领导风格做过些经典的研究工作。他们把11岁的男孩组成的群体置于三种风格的领导之下——极权的、民主的和放纵的，并观察不同领导风格对行为的影响（利皮特和怀特，1952）。

这些领导风格在几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极权型领导的情况下，领导是唯一可以决定群体政策和任务分配的人。民主型领导的情况下，政策的决定和任务的分配通过了群体的讨论，领导在其中得到辅助。放纵型领导的情况下，孩子们有完全的自由，领导者极少干预。此外，领导表扬和批评孩子在不同类型场景中也不相同。极权型领导批评时常有个人的色彩，民主型领导力图客观和公正；放任型领导对孩子们的行为很少发表意见，而且也不试图规范群体行为。

孩子们是怎样对这些领导风格作出反应的呢？与民主型群体相比，在极权群体中表现了大得多的敌视和多得多的攻击性。还有，在极权型领导的领导下，与其他群体相比，有更多的群体成员在找出气筒——这就是说，找其他人来责骂。民主型领导比极权型领导较受欢迎，20个中有19个孩子喜欢他们。十分之七的孩子喜欢放任型领导甚于极权型领导。虽然在群体成效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差异，观察者判断，民主型群体产生的结果要优于其他群体（肖，1976）。

勒万（Lewin）、利皮特（Lippit）与怀特（White）的研究有些重大的局限性（尼克松，1979）。其一是，他们集中研究的领导关系是从外部强加的，而不是从内部非正式产生的（戈比斯基，1962）。另一个局限是这个研究对民主型领导有明显的偏好。后来的研究者通过使用诸如指导型和参与型这样的词，以代替极权的和民主的这样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试图以此来纠正这种偏差。

后来的研究者还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念：在某些情景下，民主型比极权型还更为不利。例如，在课堂上，成员需要获得基本的技能，这时，在学生达到某种水平之前，极权的指导方式经常是最有效的（麦克基尔，1954）。进一步说，在某些情况下，如军队与某些工厂中，人们期望领导是极权的，并且在这样的地方，如果民主型的领导介入，产量就会下降，成员就会感到不满（黑尔，1976）。相似地，在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第三世界国家，极权型领导在各种小群体中可能受到欢迎。简言之，领导风格的影响效果有赖于领导的性质以及实践的时间地点。

强调领导能力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资格是重要的。尽管一些个体特征对成功的领导来说至关重要，如说服能力、开拓性、果断决策的能力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具有一套十分明确的个人性格特征（霍尔，1991）。一个群体的领导不会自动地成为另一个群体的领导。领导能力依赖于每个特殊群体的价值、需要与目标。

群体是怎样运作的

1

决策

群体是怎样决策的呢？在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中，罗伯特·贝尔斯与弗雷德·斯多特贝克（Fred Strodbeck）（1951）研究任务取向群体（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群体）时发现，群体决策有四个明确的阶段。在定向阶段，群体被引到问题上来，并对一些事实进行分析。在评价阶段，成员对问题作出估计，并对其他人的观点作出反映。在第三个阶段，群体开始谈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达成共识的斗争中，产生了派系也建立了情感。当决定最后出现，第四个阶段就开始了。在这个阶段，群体试图重新回复到开始时的和谐关

系。例如，成员之间可能相互开些玩笑或耍些噱头，以缓和紧张气氛并重建群体的统一。

2

遵 从

什么东西决定了群体要作的选择呢？什么东西导致群体作出某种决策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探讨一下群体遵从的性质。遵从（conformity）指与习惯、规则或普遍意见一致的行动。许多实验都表明了群体内部的遵从压力是如何强大的。

为测量群体对其成员的影响，默扎弗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 1963）让试验中的受试者独坐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盯着一个固定的亮点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亮点实际上一一直固定未动，但看起来好像在轻轻地移动。然后，受试者被要求报告他们所估计的亮点移动的距离。几个回合后，受试者的估计开始相对固定——一个受试者说是两英寸，另一个说是三英寸，等等。然后，这些受试者被放到一个小群体中，实验重复进行。受试者被要求重新估计亮点移动的距离，但这一次，允许每个受试者听到群体其他成员的估计。谢里夫发现，成员的个人估计开始向一个崭露的群体规范集中。最后，每个受试者又一次被单独测试。这时受试者是遵从群体规范，而不是回到他们原来的估计。

谢里夫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小群体成员倾向于通过确定对现实的共同观点来减少情景的模糊性。成员内化了群体的共同观点，甚至在离开群体后还继续持有这种观点。

谢里夫实验所研究的情景，就其亮点看起来在移动但实际未动这一点而言，实际上具有内在的模糊性。在后来的研究中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 1955）表明，即使目标不是这样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受试者也有明显地遵从群体期望的倾向，而不是表达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阿施进行了一系列“知觉”试验。每八个男子组成的一个群体。阿施在群体面前举着两张大卡片，第一张上面只有一条线段，而另一张上面则画有三条长度不一的直线，其中有一条的长度与第一张上面的线段完全相等。每个群体中有七位当面看着阿施画线条（与阿施合谋），而另一位则没有看到（受骗者）。在所有其他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包括那个受骗的受试，每个群体成员被要求大声说出第二张卡片上的三条线中，哪条线段与第一张卡片上的那条线是相等的。在实验中，阿施总是让七个合谋者全都说出了他们的判断后，才最后让那个受骗的受试回答。

试验对每组群体都进行 18 次，在每一次试验中，正确答案都是明显的。为了让受骗的受试者在他认识到的证据与他渴望遵从的貌似群体共识的东西之间，产生一种明显的冲突，阿施的七个合谋者总是给出一致的回答，并且错误的回答有 12 次。阿施发现，他的受试者只有四分之一从来没有屈服于群体；50 位受试者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在半数以上的实验中同意了群体的意见。其余的受试偶尔服从，但大多数坚持自己的意见，尽管这种姿态实质上经常伴随着受试者的情感强调。

是什么把屈从者和非屈从者区分开来的呢？对受试的访谈揭示了这个问题。那些从未屈从过的人，要么十分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很少去管群体的意见，要么对反对群体意见有所担心、但又想以其他方式展示自己的能力。那些屈从者大多数都能正确地感知线条的长度，但却作了屈从于群体压力的结论（群体的答案使他感到他们的感知是错误的）。一些人知道他们的观察是正确的，但被遵从的需要所压倒。

谢里夫和阿施给我们提供了信息遵从（informational conformity）的例子。这些研究中的受试并未明确感到对群体成员的意见和判断的遵从压力，而仅仅由于感到群体成员所表达的选择一定有很好的理由，他们才决定接受群体的观点。与此相对照，规范遵从（normative conformity）包括来自他人的真实的或想象的压力。例如，许多学生可能饮酒或表现一些与他人相似的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不这样做就可能遭到朋友们的拒斥（英斯科等，1985）。

服从（obedience，即认同于现实的或者想象中的领导期望）（克罗斯比，1975）是遵从行为的第三种表现。60年代早期，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雷·米尔格朗（Stanley Milgram）做了一项著名的、也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有关权威服从的调查。当人们在米尔格朗打出广告后来应聘时，米尔格朗对他们说，他想试图验证某一教学方法。每一名“助手”都被带入一间房子中，那里有一名“学生”被捆绑在椅子上进行口试。当“学生”回答问题出现错误时，米尔格朗要求“助手”“电击”学生。

当然，整个事件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助手”是真正的被试。“学生”是真正的演员，当“助手”“电击”他时，他要假装痛苦地嚎叫。试验的目的是为了知道，当给别人施加痛苦时，人们还会在多大程度上服从米尔格朗的命令。

试验结果是令人恐怖的。即使“学生”痛苦地尖叫甚至假装昏迷，但仍有不少于65%的“助手”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米尔格朗的命令（米尔格朗，1963）。许多被试认为服从命令是因为他们尊重正在进行试验的科学家的权威。

虽然米尔格朗的试验引起了有关社会科学中伦理道德的严肃争论，但是对于人们将在多大程度上服从权威指令，它依然是一个经典性的解释。

风险转移

遵从压力明显地影响了群体决策。在一系列试验中，好几位学者（沃利奇、科根和贝姆，1962；斯托那，1961）发现，群体决策比单人决策要冒更大的风险。一个典型的试验是，一份工作安全但是报酬不太优厚，而另一份工作可以提供更多的报酬，但不够安全。实验要求被试决定是否应该辞去前一份工作而去做后一工作。首先要求被试单独决策，然后加入某一群体再进行决策。群体决策时，风险承担者不再是个人，而是作出一致的群体决策的群体，这一现象叫做“风险转移”（the risky shift）。

风险转移的一种解释是人们在群体中进行集体决策比个人单独决策承担了更少的个人责任，群体可以作出更大风险的决策。另一解释与前面所讨论的谢里夫试验有关——风险转移来源于对群体压力的遵从（斯蒂芬·威尔逊，

1978)。在群体讨论过程中,个体将自己的观点与别人的观点进行比较,然后修改自己的观点,从而达到一致的群体决策,但是为什么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相比总要冒更大的风险呢?这可能是因为在群体中最初持极端观点的人在群体讨论过程中似乎改变得最少。结果,为了得出一致性的共同决策,别的群体成员自然朝极端观点方向转移。但是也并非所有的群体决策都包含了风险转移。在一些情况下,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更慎重(诺迪,1962)。

群体意见

在埃文·雅尼(Irving Janis, 1972, 1983)研究外交大失败时,提供了另一类型的群体遵从压力的极好例子。雅尼描述了他称之为“群体意见”(groupthink)的过程,即凝聚力很强的群体之中,群体的一致性需要压倒任何批评性意见的一种普遍方式。雅尼认为1961年肯尼迪总统入侵古巴的决策就是一种群体意见的结果。1961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决定派一队古巴流放人员去侵犯古巴的猪湾地区。这个计划是由一些雄心勃勃却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军官提出来的。实际上,当时政府中有许多阅历丰富、出类拔萃的人参与了这一决策。然而他们都没有看到,卡斯特罗在古巴深受人们爱戴,这一计划也整个地低估了古巴的军事力量。结果,卡斯特的军队在一天的时间内就包围并且俘虏了这支入侵队伍。

那么这样的计划怎么能得到人们的赞同呢?按照雅尼的说法,肯尼迪的顾问团产生了好几种错觉,妨碍了批评性意见的提出(错觉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意见)。一个错觉是顾问团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会有失败。这使顾问团没有考虑在军事力量140:1的悬殊情况下成功的可能性。另一错觉是在决策会议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意见一致,这使得某些人隐瞒了他们的批评性意见。而且,后来许多顾问团成员谈及此事时说,之所以隐瞒自己的异议是因为害怕被别人贴上懦夫的标签。

群体意见的另一个特征是突发性的“心理防卫”,或者说,顾问团成员消除潜在性的异议,保全了意见的一致性,皆大欢喜。在猪湾惨败中,首席检察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可是后来,肯尼迪总统让一些非专家型的军官支配了会议,这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不同的意见。所以,由于寻求共同一致性意见而取代了批评性的争论,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创造了一种一致同意的氛围,这一氛围使他们忽视了行动中所存在的明显的冒险。

肯特州立大学1977年的体育场争端是群体意见的又一例子。肯特州立大学理事会决定,就在1970年5月4日悲剧性枪杀事件的发生地兴建学校体育馆,那里曾是俄亥俄国民警卫队与肯特州立大学学生在反越战游行中彼此对峙、枪杀四名学生的地点。尽管全体学生、教职工和政府官方一再恳求,但是理事会拒绝改变兴建体育馆的位置。在工程耗费了许多资金、经历了许多年之后,他们仍然拒绝改变原决定。建筑工程按原计划进行。

社会科学家分析争端之后认为,理事会对工程建设的决议是群体意见的结果。理事会是同质性极强的一个群体,他们均来自俄亥俄州东北部的中年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他们十分在乎获得双方的理解。而且,因为媒体广泛

地宣传了体育馆争端，所以理事会力图摆脱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批评。为此，他们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阵线来拒绝修改他们所定下的计划（吉恩斯利和格里芬，1986）。

3

群体界线： 内群体和 外群体

从我们的讨论中我们应说明了我们所属的群体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然而外在于我们的群体也可能影响我们。一个最早的群体互动原则就是由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 1906, 1960）总结出来的。他创造了内群体和外群体这两个词语来分别描述成员对自己群体以及对别的群体的感受。群体成员一般说来对于他们的内群体（ingroups，即他们所属的群体）都有特别的感觉。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别的群体，或者说是外群体（outgroups，即他们所不属于的群体），认为外群体不如内群体重要。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内群体中找到优点，这反映了我们对肯定性自我形象的需要（泰杰菲尔和蒂尔内，1979）。获得类似的自我形象对群体成员来说极为重要（罗特斯坦，1990）。

定义群体成员依赖于明显的群体界线的存在。没有群体界线，我们就无法区分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界线经常以某种特殊的语言表现出来，它有助于群体成员形成团结感，并且与其他群体成员区分开来（邓金，1984a）。

一些群体界线由一些符号和代码来正式规定和强化。例如，僧侣的衣服就指明他们属于何种群体。像律师这样的专业群体，其群体界线的符号就是高学历和行业协会的成员资格。

在我们通常称之为“强盗海湾”（Robbers' Cove）的研究中（这一研究作于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初期），默扎菲尔（Muzafer）和卡洛琳·谢里夫（Carolyn Sherif）（1953）表明了冲突是怎样影响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的被试均是11岁的男孩，这些孩子认为将要参加的是一个普通的夏令营，从未知道他们正在做一场试验。在夏令营刚开始的几天中，研究者让小男孩自发地形成伙伴群体。然后又任意地将夏令营成员分成两半，将业已自发形成的伙伴群体人为地分离。这两个新群体很快就形成了彼此独特的社会结构，有领导者、有追随者，而且形成了群体界线符号，例如名字和特殊颜色。

当研究者将新群体分成两半，让他们参加体育比赛，他们之间的界线变得更加清楚。由于处于两个不同群体中，男孩子之间原来产生的友谊破裂了。当两个群体被强迫地组合在一起时，他们打架斗殴并且直呼其名。事实证明要回到原来和睦相处状态已十分困难。只有在研究时设计了一系列“紧急状态”时，两个群体面临着共同目标，他们不得不同心协力并肩战斗，这时敌对感才开始慢慢消失。

像斯坦雷·米尔格拉姆所做的权威服从（obedience-to-authority）研究一样，上述研究，也是对被试进行控制并且强迫他们忍受不愉快的甚至是令人恐怖的经历。这种研究今天再也不会重复了。难道为了发表学术文章，孩子们就应该向他们的友谊开战吗？今天的共识认为，被试应该预先尽可能多地告诉

他们所要参与的试验，以及试验所要产生的可能性后果。不过，过去的研究尽管有时对被试的感情漠不关心，但它的确详细地揭示了社会群体塑造我们行为的方式。

4

参照群体

要总结一下对群体的讨论，还应该注意有些称为“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s）的群体，它比别的群体更大地影响了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怎样的意识。参照群体是指对个人信念、态度和价值观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群体。参照群体并非一定是本章中所讨论的小群体，也并不一定总是我们所属的群体，它可能是某人想要加入的群体。例如，医学预科学生可能将医科大学的学生视为他们的参照群体。换句话说，某个群体已经达到的目标是人们所要追求的，人们便按照这个群体的行为模式行动。参照群体可能是正面的，像上面所举的医学大学学生的例子；也可能是反面的，希望禁止喝酒和吸毒的高中学生可能会将他们学校中的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看作反面的参照群体，即正好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行为模式。

社会学家认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参照群体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扮演多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参照群体作为一个心理参照点，反衬出其他群体在变迁中所产生的要求和期望。正面参照群体的价值和标准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社会基础。

组织的特性

正如我们看待这个社会许多别的方面一样，我们也许会对组织熟视无睹。你可能属于基督教或犹太教的教堂，属于某个联合会或者兄弟会。你可能会到一家大银行的分支机构去存钱，到超市连锁店买东西，或者在某一所大学上课。然而面对你成天接触的社会组织，你是否经常思考它的结构和特性呢？

即使是那些生活在组织之中的人也很少意识到这些社会单位是怎样影响他们的生活的，诸如科层制和领导职位等组织结构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熟视无睹的那些复杂科层管理体系并非就是简单地由其自身发展起来的。组织是怎样产生的？人类为什么要创造他们？人类又怎样对它们进行管理？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私人生活、对我们彼此联系的方式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一部分所要考虑的问题。

1

组织目标和特征

在人类社会，人们长期以来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标而结成群体。这些具有特定目标的群体就是组织。组织就是精心设计的以达到某种特定目标的社会群体（埃斯欧尼和莱曼，1980；霍尔，1991）。俱乐部、学校、教堂、

医院、监狱、公司和政府机构都是组织的例子。现代城市工业化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大量规模巨大的、极其复杂的组织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主要归因于现时代人们对理性和效率的高度重视，而这些目标正是组织运作之能事。

从只有六个成员的童子军到拥有数百万职员联合政府的组织，组织的类型五花八门、形式多样。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描述存在于各式各样的组织中的基本特征。所有的群体都要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经常是一般性的，抑或没有明确表达出来。有时群体中每个人又都有各自独立的目标。然而在组织中，目标却是明确地、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并且总能得到组织成员的充分理解。

除了清晰陈述的特定目标以外，一般说来组织还具有下列基本特征（埃斯欧尼和莱曼，1980）。

第一，为了更高效地达成群体目标而进行的劳动分工和权威的分配。

第二，权力相对集中在领导或者执行主管手中，他们使用权力控制组织成员活动并将它们导向组织目标。

第三，组织中成员不是固定的，这使得组织可以超越某一特定成员而生存；组织成员死亡、辞职、退休或者解雇时，可以用常规性的方式来加以替补。

许多群体并不都会具有所有这些特征。家庭通常就不被看作是一个组织，因为它的成员不可能按照惯例替补，而且它也没有特定的目标。民族群体也不是组织，例如意大利裔美国人。但是像由意大利后裔所组织的“意大利之子”这样的群体，其目标是为了提高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公众形象，这就肯定是一个组织。一个朋友群体，即使他们之间具有极强的模式化联系，也并不是一个组织，因为它缺少明确的目标。

2

组织结构

我们通常根据两个方面的组织社会结构来分析组织：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

正式结构

组织的正式结构（formal structure）是指导组织成员活动的一套明确陈述的规定、纪律和程序。正式结构包括规章、法规、内部细则、命令和达成目标的时间表。通常规则和程序都写在纸上，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一个小群体，例如某一俱乐部，可能会通过群体中的工作人员、目标和大家同意的召集会议的方式而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但是可能没有保留任何文字记录。因为俱乐部规模较小而且比较简单，成员对组织的结构都了如指掌。

正式结构的显功能是富有效率地达成组织目标。每个成员都分担了特定的组织任务。同时，每个人都必须清楚与别的任务承担者的成员关系。所以，每一成员对别人的权力、成员之间交流和协作的期望模式，都有严格而清晰的说明。每一成员都知道何时、何地、由谁通过何种方法来进行决策，他或她处于组织等级中的哪一位置。

组织也必须提供正式的约束手段，即运用于群体成员的详细奖惩规则，以此确保组织成员对规则的服从。在商业组织中，奖励性约束可能包括晋升、提高工资、授予称号、提供舒适的办公室，以及一些附加福利如提供花销账号、小汽车、邀请参加某些社会活动等，这些都会用于激励或酬劳那些完成了组织任务的成员。对那些没有遵守规则的组织成员则施以惩罚性约束，如降级、解雇或者该提升时不予提升等。在一个规模大而复杂的组织中，通常确立一些正式手段来衡量群体成员的绩效，例如工资审核，或者由上级所作的年终评估等。

以正式结构为主的组织就是正式组织。大多数组织，包括基督教或犹太教教堂、公司、学校和政府等，都属于这类组织（克莱格和邓克利，1980）。

非正式组织

组织的正式结构总是以非正式结构为补充的。非正式结构（informal structure）是由群体成员的互动所形成的人际关系。虽然非正式关系并不在组织的规划之中，但是对组织的功能发挥却必不可少。正式规则和程序并不能解决组织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还不如非正式规则有效率。例如，当空中交通调度员正在协商增加工资时，他们使用的策略是服从且仅仅服从所有的正式规章，而不采用那些通常使用的、可以节省时间的非正式规则，结果工作效率严重降低。调度员的所作所为表明，单凭“照章办事”并不是完成工作的有效方式。

非正式结构有助于组织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否则组织效率可能降低、目标难于达成。《华盛顿邮报》驻外记者描述了在前苏联巨大的运作体系中所产生的一个非正式结构要素（凯泽，1976）。工厂必须完成中央政府计划委员会所正式规定的经济生产任务。为此，原材料和经济领域的各部门不得不集中起来，以便能够及时供应成品。遗憾的是，并非每个工厂的定额总是能够如期完成，部门之间衔接的中断，结果就孕育了非法的、非正式的结构，其中之一就是采购员。

一个好工厂总有一名优秀的采购员。一名成功的采购员看来必须具备挨户兜售的推销员品质，外加酒量大、与本地那家最好餐馆的老板和经理建立友好关系。他利用自己的这些本事，去拉拢各种物质供应机构的官员。如果采购员告诉厂长说，他需要钱来请客、送礼，甚至是给回扣，厂长多半都会答应他的要求。作为回报，采购员找到了实现工厂目标所需要的原材料（凯泽，1979）。

这样，采购员有助于减缓正式结构中无法解决的前苏联经济的瓶颈问题。

非正式结构总是有助于组织获得更高的效率。研究芝加哥机器公司的社会学家发现了一种非正式结构，他将此描述为“应付游戏”（game of making out）。应付游戏是这个工厂第一线操作工的活动核心（贝雷威，1984）。工人们超额完成了正式的生产定额的100%时，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激励工资。但操作工人的非正式定额是140%，他们认为如果产量总是多于140%时，老板将会增加他们的正式的生产定额标准。操作工人经常能生产出多于

140%的零件，但是在报工作量时总是报140%。多生产的部分留了起来，当工作任务的难度较大、时间耗费多而不能完成非正式的生产水平时再拿出来。

实际上，操作工人在工作轻松时，为了能够为以后积累效率，他们在整个轮班时间内都会“拼命干”。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可能会轻而易举地为一周中的工作量积累好盈余产品。但是，在工作簿上所登记完成的工作量和他们在车间所实际上完成的工作量之间，总有一些差异。不过，即使没有得到高层管理者的认可，140%的下限和积累剩余产品的做法却被车间中的每一名工人所认可和接受（贝雷威，1984）。

尽管它与正式规则、规范和程序不相一致，但是“应付游戏”最终促进了公司的利益。它使车间不再枯燥，让操作工人对自己的工作更加感到满意。它将管理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转换成了操作工人间群体内部的竞争。最后，它增加了公司的边际利润。总之，这类非正式结构使公司能更有效率地达成目标。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非正式结构也产生消极性后果。例如，“打小报告”者所遇到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可能使许多工人不敢报告车间所发生的非法或危险的活动。这类非正式控制包括来自于工友和监督者的敌意和报复（尼尔和米塞利，1989）。

3

科层制

社会学家把一类特殊的正式结构称做科层制（bureaucracy），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组织都是这一方面的实例。实际上，科层制的趋势在历史过程中日益重要，科层制组织已开始主宰我们的经济和政治机构。今天很多人都把科层制和正式结构当作同义词来使用。

人们常常将科层制与繁文缛节、浪费、拖延、形式主义甚至更多的方面联系起来。在人们心目中，科层制一词与繁文缛节如此狭隘地紧密联结在一起，乃至使人们看不到它原来意义上的功能。不过，社会学家则将科层制定义为一种运作于明确的规章和程序之基础上的等级权威结构。

在20世纪早期，马克斯·韦伯对科层制进行了经典性分析。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世界的主要社会潮流——经由这一过程，陈旧的、传统的社会组织方法被大量明确、抽象、正式的规则和程序所逐渐替代。在我们的社会中理性化过程处处可见，从教育设置（在一些大学，一个500多个学生的课堂中，除了没有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直接接触外，什么都有了）到工厂（拥有成千上万雇员的巨型跨国公司代替了原来简单的“夫妻店”）。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家乔治·利茨尔（George Ritzer）最近对理性化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不无挖苦地称之为后工业化社会中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1993）。利茨尔认为以麦当劳快餐店为特征的组织模式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麦当劳化”含有四个基本原则：（1）极强调效率；（2）讲求速度（快餐）的定量配餐（巨无霸）；（3）可预见性（所有麦当劳都有同样的菜单）；（4）非人格化（麦当劳机械化程度极高，它

的员工在行为上实际上没有自由支配权)。根据利茨尔的说法,这些原则扩散到了社会的每一方面,从教育、宗教到性爱,甚至西红柿的生产。需要提出的是,像他的前辈韦伯(1922)一样,利茨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科层主义理性化过程如果说不是不可能拒绝的话,也是一种难以抗拒的不祥趋势。

韦伯在研究科层制时使用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研究方法。像科层制等社会现象的理想类型模型,就是描述它最为重要的特征。理想类型不包含那些现实社会中随处可见的描述性特征,它着重指出了理论家认为最能反映现象的本质、核心的那些特征,有时甚至用夸张的手法。因此关于德国牧羊人的理想类型就只包含了那些最为明确地定义的饲养特征。如果说有些真实的德国牧羊人表现了全部甚或大部分理想类型的特征,但是这样的例子极少。而且,理想类型并不是说在“好”这一价值判断上是“理想的”——你既可以构建一个儿童捣蛋或集中营的理想类型,也可以同样容易地构建一个天使或者济贫院的理想类型。

因此,任何一个组织要完全表现科层制这一理想类型的全部特征是不可能的,然而理想类型的描述在组织分析中却又是极为有用的。

1. 全体员工分化成较小的部门,这就是办公室和局。每一个局的责任都有详细描述,在办公室人员的工作预先都有严格的规划。

2. 权责分明。雇员都处于一定的等级制度中,每人都对上一级的监督者负责。这种结构有利于分工协作,共同努力实现组织目标。

3. 基于专业技术资格之上的人员用工制度。在科层制中,常常是聘用具备某一特定资格的人员来工作,诸如一定的文化程度、多年的工作经验等等。聘用某人 是基于其个人资格最适合于某一工作需要。

4. 详细的规章制度严格规定了工作人员的操作规程。规章严格限制了雇员发号施令的工作权威,它不能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偏好来随意改变。

5. 在科层制中确立了一套科层制职业发展的方式,根据职位、资历和业绩,以可以享有的工作年限、有价值的服务等形式来对员工进行晋级、提拔和酬赏。

科层结构:赞成与反对

建立科层结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然而科层制还有另外几个正面的特征。由于设计科层制的原则在理论上不依赖于某个人及其人格特征,因此它极大地减少了有关个人的情况对工作的干扰等许多潜在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弱化个人的民族、种族及性别等方面的偏见对组织运作效率的干扰:与在其他任何经济部门相比,有史以来,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等严格的官僚职位上,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并非是一种巧合。

科层结构也增加了工作的连续性。虽然从事某一工作的个人经常会有变动,但是雇员是忠诚于整个组织而不是忠诚于某一个人。定期对工作 人员的工作进行检查也有助于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以及维持工作的连续性。

但是,科层制也有很多缺点。正是那些提高效率的工作程序可能会产生问题。科层制可能会使工作僵化,高度正式的结构可能会窒息主动性和创造

性。而且,科层制还会导致寡头统治——由极少数人统辖整个组织。这样的危险总是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将高度集中于那些最重要组织中处于最高位置的少数人手中。最后,科层制还可能会使雇员产生过分谨慎的态度,极力希望维持现状。

同样使组织富于效率的非人格特征也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从事公共服务行业的科层组织,也会用同样的非人格化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服务对象,而这种服务态度通常影响了组织服务目标的实现。而且非人格化态度也不利于雇员从事本职工作。雇员更喜欢做那些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工作。实际上,非人格化后果已是现代化社会中极其重大的问题。

对大规模的科层组织的社会影响的理论争鸣,似乎分成了两个阵营。功能主义者一般说来接受了韦伯的假定,认为常规化、中央集权的等级结构、非人格化的正式规章制度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是科层制的重要特征,它们是组织效率的重要保障。冲突学派理论家认为组织的这些特征,与其说是提供了组织效率,倒不如说既对工作过程又对这一过程中的员工加强了控制管理。

组织过程和变迁

1

制度化

当一个组织成功地吸纳到了成员,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信赖,能富有效率地实现其目标,能被更大的社区所接受,它就通常能在相对稳定的结构中、在一整套目标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有序的运作模式。简言之,它就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了。一些组织,例如天主教会,延续了数百年甚至一千多年;大多数组织发展相当快。那些寿命最长的组织一般都是那些能够有效接纳和培训新成员的组织(汉南和弗里德曼,1989)。

组织刚开始形成时,它能相对自由地进行尝试。它的目标变动性较大,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也可以有多种选择,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非正式性的、可以相互调整适应的。但随着组织的成长,其结构就逐渐地为典型的制度化形式所主宰。

首先,进行群体活动的方式开始建立起来,有时候,这指的就是标准化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标准化操作程序最终会限制组织在多种行为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其次,程序越固定,员工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正式。结果,组织行为就越稳定,越可以预见。但是当非正式关系变得越不重要时,要创造新的交流方式和新的结构就越难。第三,组织目标开始越来越没有弹性。

虽然制度化可能会导致僵化死板,但它也有许多好处。当组织关系越有序、越可以预见时,成员之间就可以更好地协作,组织的连续性增强。随着

知识和经验的增长，也就不必再经过那种无效尝试和错误，就能找到最好的功能发挥方法。

目标置换

制度化的另一种负面效应就是目标置换（goal displacement）。当组织员工更加关注组织本身的存续和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而不去关心是否与组织的实际目标相符合时，这一现象就会发生。目标置换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说，组织成员热衷于保持他们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因而就把这个目的当成了组织的目标。例如，大多数协会都以民主形式的结构为特征——它的领导都是由普通群众选举出来的。但是，协会领导一旦就职，他就会设法破坏民主程序来保护自己的领导职务。因为这时还让组织处于高度民主之中很可能意味着领导地位和权威的丧失（利普赛特、特罗和科尔曼，1956）。

当组织规章制度本身成为目的时目标置换也会发生。当初制定规章制度是为了帮助组织有效地实现目标。可是规章制度可能会具有神圣性，这就会影响组织应付新情势、处理非常规问题的能力。雇员可能会认为自己在扮演角色时仅仅是为了遵从规则，而不论这些规则是否在实际上有组织目标的实现。这就是人们经常埋怨的所谓“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的行为（西尔斯，1970；默顿，1968）。罗伯特·默顿创造了科层制仪式主义（bureaucratic ritualism）一词来描述这样的科层制，它把规章制度优先置于目标的位置，而不是当作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

目标置换的第三种形式是雇员之间非正式结构的发展，导致他们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组织的需要（西尔斯，1970）。例如，工厂工人有时就他们一天中的劳动量非正式地达成一致，然后去抵制经营管理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尝试。

目标置换已经成了人们对组织特征进行幽默讽刺的主要话题。例如，根据帕金森定律（帕金森，1964），“为了工作的完成，所有可能的时间都被不断扩张的工作所填满”（波特，1980）。类似地，彼得原则描述了科层制中与提升有关的同一问题。在目前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雇员一般说来都会在科层等级中得到提升，例如优秀教师提升为校长助理，优秀护士提升到管理职位上。提升继续下去，总有一天，雇员最终会处在他或她不能更好地胜任其工作的职位上。这时，组织将会考虑解雇或者给该雇员降级，以避免挫伤正沿着科层制阶梯往上爬的其他员工的士气。因此在向上晋级的过程中，总会积累许多“无用的员工”。或者，正如劳伦斯·彼得（Laurence Peter）所说的，“在等级制度中，每一雇员总会提升到他所无法胜任的位置”（彼得和赫尔，1969；彼得，1985）。

2

组织变迁

正如制度化过程所表明的那样，每个组织本身就蕴含着变迁的种子。广泛的组织变迁可能源于组织内部事件的变化，诸如组织构成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领导的瓦解、或者是员工的反对。然而也有许多组织变迁是由组织外部因素所诱发的，这里组织外部因素被称之为组织环境。实际上，内部变迁

与外部变迁相对说来谁更重要是目前组织理论学家讨论的主要论题（赫尔，1991）。某些情况下，组织能够控制环境（麦克尼尔，1978；佩罗，1979）。另一些情况下，组织却又被环境所控制（普法伊费尔和沙兰克，1978）。

大多数组织都与别的组织竞争，以获得他们所服务的公众的注意。竞争性组织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互影响。当一组织不如另一组织成功时（例如，假如某一商业组织获取了较少的利润），不太成功的组织为了改进，就有必要进行基本的变迁，美国汽车业就是一个实例。当日本进口汽车开始大量占领美市场时，美国汽车业就必须进行痛苦的变迁。通用汽车公司发现，为了在剧烈竞争的市场中站稳脚跟，它必须对大多数基本的经营假设进行修改。福特公司开始在它的一些美国工厂中运用日本同行马自达公司所开创的经营技巧（《纽约时报》，1990年2月27日）。

某一新成员要改变组织进程也是可能的，尤其是这一新成员处于领导地位时。职业体育运动队的老板根据队员在赛季的不良表现来解雇教练。通常说来，新教练要变换运动员的位置，设法提高士气，改变队员的作战策略。所有这些改变都是为了将运动队扭输为赢。

其他导致组织变迁的外在因素还有新技术的出现，新市场或者新资源的获得，利益变动、态度和价值观的改变等。假如组织所服务的对象的需求改变了，考虑到这些新需求，组织也须作相应的改变。然而某一组织，特别是当它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时，其未来往往是难以预料的。

组织选择

阿米泰·埃斯欧尼（Amitai Etzioni）注意到，可以运用三种基本方法来使组织成员履行组织对他们的期待：强迫服从、给付工资、使其心悦诚服（1975）。从这一基本观察出发，埃斯欧尼（Etzioni）发展了组织的三种理想类型：强制型（coercive）、功利型（utilitarian）和规范型（normative）。

强制型组织主要依赖于实际的或潜在的物质性力量来确保组织控制之下的成员的服从。因为这种类型的组织必须动用大量资源进行社会控制，除了服从外，相对来说在达成组织目标方面没有效率。因此一般说来它只有在没有别的方式换取秩序和服从、万不得已时才使用——特别是当组织成员是非自愿性吸纳时。强制型组织的例子有监狱、集中营和一些公立学校。

功利型组织主要依靠金钱刺激来获取服从。大多数商业组织都属于这种类型。功利型组织虽然使用较少资源来进行社会控制，但是在另一方面成员融入组织时总是在精打细算，所以这也限制了成员对组织的忠诚。

假如成员参加组织主要是因为将组织目标当作了个人自己的目标，这时，组织可以获得成员的最大承诺，组织资源可以得到最少的耗费。此时成员感到自己融入了某一组织之中；假如组织成功了，他们会真正地感到是他们自己成功了。这样的群体被称之为规范性组织，或者说得更通常一些是志

愿者协会 (Voluntary associations)，经由这一组织，个体自由地寻求共同利益。通常说来，就大多数别的大型组织而言，志愿者协会较少科层制成分 (西尔斯，1968)。我们较为熟悉的例子有，男童子军、女童子军、家长教师协会 (PTAS)、妇女选民联盟、某些职业协会、业余体育运动队、许多的教堂、政治利益集团和像扶轮国际一类的服务性组织。

1

美国社会中的 志愿者协会

长期以来，社会观察家们注意到，在美国志愿者协会异常之多；美国人喜欢加入这类组织，这是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queville) 的经典性研究《美国民主》一书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它是基于 1831 年到 1832 年间 9 个月的仔细观察所作出的。

当代社会学家仍然对志愿者协会的社会功能极感兴趣 (托梅，1974)。其中的一项功能是它为组织成员提供了某种追求社会目标的机制，而这是单个群体成员所无法获得的。此类功能在政治领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大规模的、组织很好的志愿者协会可以对政府施加实质性影响，例如，最近几年中，生存权利运动成功地动员了选民去支持反对流产的政治候选人。

志愿者协会的另一重要功能是在大规模的科层组织 (如政府、学校、公司) 和个人之间构建桥梁。像妇女选民联盟一类的志愿者协会有助于将个人整合到一定的政治过程之中；又如家长教师协会可以协调学生家长和正式的科层组织学校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正式组织，例如教会、医院，甚至武装部队，都在努力创建志愿者协会来赢得人们的支持 (利特沃克和迈耶，1966)。

虽然志愿者协会为社会发挥了许多有益作用，但是也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来自政治左翼人士的批评是许多志愿者协会减少了政府在诸如健康、福利和娱乐领域中正确履行职责的压力。类似地，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志愿者协会实际上是在剥削妇女，因此妇女们应该在许多“自愿性”活动中获得报酬，而不应是不领取报酬的志愿者 (哈特曼，1976)。还有，人们已经注意到，从志愿者协会所提供的机会中获利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最不积极参与协会的人 (例如，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人)。

2

弹性组织

许多大型组织都是高度科层化的，如武装部队、政府机构、商业组织等等。科层制曾经支配了工业部门将近半个世纪，但现在严密的科层制结构在工业部门中越来越少见了。为什么呢？在稳定的环境中，严密的科层制能极好地发挥作用，但是 90 年代富于变化的、波动起伏的、不可预见的市场与稳定性的社会环境极其不同。因此，今天的工业化社会中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弹性的社会组织。

弹性组织 (flexible organization) 提倡新的产品设计和系列产品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由科层组织所提供的标准化产品。而且，弹性组织通过更广泛的职责分解来鼓励更多的民主参与，减少敌对的劳资关系。“弹性”意味着促进管理者、员工、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所有这些都一起参

与创意和实施新思想的过程。

弹性组织中的生产费用通常会比科层组织中的生产费用要高。但是因为新型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导致了生产力的高效增长,甚至在短期产品生产中,工业部门仍有可能迅速而经济地满足新产品的需求(赫恩,1988)。所以从长远来看,科层组织虽然通过工作制度和产品标准化过程而降低生产费用,但是弹性组织却具备迅速变换产品样式的能力,这往往能使其生产出比科层组织更多的赢利。

引入弹性组织中的两个广泛的构成要素就是弹性时间和工作分享(job sharing)。由于有了弹性时间,雇员可以自由安排他(或她)的工作时间(例如从上午11点工作而不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工作)。在工作分享中,两名或多名雇员分担一个工作。弹性时间有效地留住了有资格的人在他们所选择的行业中工作,工作分担保证了兼职工人在变换工作或者抚养小孩时还能继续工作。同时公司还能从更有资格、积极性更高的劳动力中获益。可是,在传统的科层环境中,规章制度因无视个体的需求而被强化,因而完全不能接受弹性组织一类的设计。

3

日本人的选择

近年来为什么日本经济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美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社会科学家广泛地调查研究了日本社会中日本模式的劳动组织特征。他们的调查结果,引起了学习组织理论的学生的兴趣,也引起了美国和西方传统经营方法与实务的不安。

日本劳动组织的差异到底有哪些呢?其中一个不同是日本依赖于通才管理,这与专家管理相反。与美国型管理者通常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不同,日本管理者通常在每个不同的组织部门中都工作过。结果是,日本管理者获得了整个公司运作的整体知识,而并非仅仅掌握了公司内某个特殊部门的知识(例如加工过程或营销知识)。这就增加了管理者对组织的重要性。

在西方,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个体和组织所签订的协议合同之基础上,这种关系总会产生冲突。相反,日本组织以保证雇员的安康幸福而闻名于世。对于较大的公司来讲,这意味着公司为雇员提供住房补贴、社会培训、医疗福利、退休保障和度假旅游,反过来,雇员甚至把许多美国人认为纯系是私人事务的东西都融入公司之中:结婚、儿童教育等诸如此类。

日本组织也鼓励全员决策,通常某一提案沿着组织的等级阶梯自下而上,在每一级中,人们对它进行修改和补充然后提交给较高等级,直到它达到金字塔的顶端。这一制度与典型的西方的做法大不相同,在西方常见模式是由高层领导做出决定,在实施过程中的细则则留给基层去完成。从理论上来说,日本组织的低层雇员易于作出最终决策,这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就参与了组织的决策过程。

大多数美国雇员的工作态度是“要么提升,要么放弃”——这就是说,他们期望正常的提升和晋级以作为其工作的奖赏。假如他没有得到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他们就着手寻求另一工作。在日本组织中的情况就不

一样，常见的晋升模式是缓慢而高度结构化的。与晋升制度相关的是，日本组织是根据雇员（除非是最高层经理）年功（seniority）而不是个人的表现或绩效来支付报酬（克利斯托弗，1983）。这一制度反映了日本文化对团体精神的强调（与强调个人精神相反）。

所有上面这些因素都利于建立有长远规划的稳定组织（这正好与急功近利、利益最大化相反）。因为日本人强调组织的长远发展，所以与美国经营者相比，日本经营者们很少会以公司的长久性健康发展为代价而去追寻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在日本之所以有这种态度，是因为与美国相比，日本很少有企业合并和兼并，很少发生有财政风险的交易（克利斯托弗，1983）。

尽管观察到了上面这些事实，但是有些研究者还是感到，学习日本组织理论的西方学生，可能会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过分美丽的玫瑰般图景（阿佐米，1977）。与西方的雇员一样，日本雇员在其组织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满意感，它依赖于他们在哪个公司工作、工作的性质是什么。例如，流水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他们的满意度比经理要低。总体来说，日本工人工作越卖力气，对工作的满意度就比美国和西欧工人更低！

此外，日本工人可享受到的许多传统好处看来也正在消失。长期以来作为日本商业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永久性雇工制度，现在已开始搁到一边去了。而且，日本的管理理论并非总能指导日本管理实践。有一位研究者在考察了日本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之后发现，“日本医院的规划性决策都是由上层官员决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日本医院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似乎与美国的情况差不多”（戈德史密斯，1984）。

看来，日本管理制度对西方管理的最大启迪就是它关注员工的福利、关注员工的个体需要、利用员工的评议来提高竞争力、产品质量及劳动生产率（林肯和卡勒贝格，1990）。但是，因为在美国十分强调个人，所以美国雇员将能在多大程度上像日本雇员一样遵从组织规范，这仍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

组织与现代社会： 一个人文主义的观点

大规模组织的出现给社会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损失。其中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社会效率——组织的人力和资源配置方式看来最适合于“去完成任务”。没有任何一个现代社会能够抵挡住社会效率的拉力，没有任何先进社会愿意为了更大的个人自由而放弃效率，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

当然在今天的世界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变化的迹象。尤其是在美国，强有力的事实证明，随着组织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人们越来越桀骜不驯了。最近几年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反政府倾向，并不表示对政府本身的抵制。相反，它是对大政府的消极反应，是对功能失常的科层制的消极反应，也是科层结构主宰日常生活的消极反应。尽管没有进行过广泛的宣传，但是，公众

对大公司、巨型大学，甚至大型宗教科层组织的对抗态度也相似地表现了出来（佩罗，1984）。

这些对抗性态度，就是几年前人们所相信的无法阻挡的反社会潮流的继续吗？现在还没有人能说清楚。组织可能已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来自一个组织化程度更高的社会的损失已开始超过了它所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许多社会领域中强化的组织效率似乎正是人们所需要的。任何对效率的提高，无论是针对福利计划、老年与退休保障、退伍军人安置还是针对环境保护，也无论它是否让我们直接获益，我们都支持。而如果这些计划无法富有效率地实施，那是我们咎由自取。

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果先进社会要保持民主，如何能保持大众对大型组织的控制。在此情景中常用术语就是责任（accountability）。与人的本性一样，组织的本质也是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来运作。正如人在科层组织上要负严格责任一样，科层组织也必须对民主社会负有责任。由于这一任务的严肃性，未来几年中将会看到，大型组织的管理集团在公众面前的公开表演及“共同行动”（classaction）之类的活动将会大大增加。诸如此类的活动，将使政府或私营领域的大型组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社会群体可定义为两个或更多的人，他们有共同的认同及某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对群体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相同而确定的目标和期望。小群体就是小到能允许其成员以个体为基础进行相互的交往联系的群体。

2. 社会学家明确区分了社会群体两个一般类型。初级群体是一个相对较小，有多重目的的群体，在那里互动是亲密无间的，并存在一种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它是社会群体的最基本形式。初级关系是一种个人的、情感的、不容易置换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多重角色，具有多种利益。每个人都可在其中进行自由而广泛的交流，全部人格都会参与到其中的互动。次级群体是为达到特殊目标而特别设计的群体，其成员主要以次级关系来相互联系。与初级关系相比，次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缺乏情感深度的关系，它所包含的只是一个人人格的某些有限方面。次级关系常见于现代社会之中。

3. 社会学家认为我们结成社会群体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要。有些群体的形成主要是满足工具性（任务）需要，它们有助于成员完成单个人所不易完成的工作。有些群体的形成主要是为了满足表意性（情感性）需要。事实上，大多数社会群体可能同时满足两个方面的需要。

4. 所有群体都有社会结构。群体规模是决定其结构特征的主要因素。两人群体，或者说是由两个成员所构成的群体，它可以发展出强烈的团结感，但是对群体成员有很高的要求。三人群体，有三个成员的群体，它常常

不如两人群体稳定，因为它很有可能会产生二人对一人的一种结合，当群体越大，群体结构就会越复杂。

5. 社会群体与聚集的人群（有时称为聚合体）的一个区别是前者具有一整套规定成员怎样行为的共享规范。

6. 许多群体规范都以角色期望的形式表现出来。处于领导地位的角色尤其重要。工具型领导设法指导群体朝向群体目标。表意型领导是为了寻求群体团结或者维持群体和谐。有些研究认为民主型领导比权威型领导和个人魅力型领导更有效率。领导虽然没有固定不变的特征，但是它有赖于群体价值观、群体需求和群体目标。

7. 研究者们发现群体决策有四个阶段：定向、评估、实际决策和恢复平衡。遵从指与习惯、规则或普遍意见一致的行动。遵从群体期待的压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模仿群体成员的态度和感觉。遵从的三种类型是信息遵从、规范遵从和服从。群体集体决策常常比由个人单个决策要冒更大的风险，这一现象叫做“风险转移”。“群体意见”是遵从的一个类型，达成一致的群体意见的需要压倒了其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8. 群体界线定义了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关系。内群体是人们所属的群体，外群体是他们所不属于的群体。群体界线常常由符号和代码来强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常常强化了群体界限。

9. 参照群体是指对个人信念、态度和价值观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群体。参照群体为人们评判自己提供了一种模型，它可以是某人设法追求的群体，而不仅仅是他或她已经所属的群体。

10. 组织是人们构建出来实现某种特定目标的社会群体。组织除了具有明确规定的特定目标以外，一般说来组织还典型地具有劳动分工、权力的集中、成员关系经常变化的特征。

11. 组织结构有两个方面：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结构是明确规定了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和程序，正是它们指导着组织成员开展活动。组织中的制裁，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它保证了组织成员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正式结构居于支配地位的组织就是正式组织。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互相补充。非正式结构由成员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所组成。非正式结构对正式结构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作出回应，它有利于组织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常常有助于组织获得更高的效率。

12. 科层制是运作于明确的规章和程序之基础上的等级权威结构。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存在着科层制取代不太正式的组织的趋势，工业革命加速了这一趋势。科层制的经典性研究是由马克斯·韦伯进行的。他称理性化是现代世界的主要社会潮流——经由这一过程，陈旧的、传统的社会组织方法被大量明确、抽象、正式的规则和程序所逐渐替代。韦伯将科层制当作是理性化的最大威胁之一。他对科层制所做的著名研究集中表现在他提出了理想类型的思想——它描述了科层制现象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征。

科层制具有以下显著特征：它将全体员工分成较小的单元，称之为办公室或局；权威和责任的明显分离；人员聘用主要根据其技术和专业资格来确

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对员工的工作方式进行了严格规定；科层晋级制度的确立。科层制可能极有效率，但是它也会僵化死板，因而这又窒息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13. 当组织发展起来并趋于成熟时，它就具备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目标和价值观，也就是说制度化了。虽然制度化可能会产生良好效应，但是它也会导致非弹性化，不能适应变迁中的环境。另一个制度化效应是目标置换，当组织员工更关注于组织本身的存续和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而不去关心是否与组织的实际目标相符合时，目标置换就会发生。

14. 每个组织内部本身就蕴含着组织变迁的种子。但是许多组织变迁源于组织环境，包括了来自于与之竞争的组织的压力、顾客的要求、技术革新的突破、新市场的开发、组织服务对象的利益、态度和价值观的变迁。

15. 埃斯欧尼 (Etzioni) 认为有三种基本类型的组织：强制型组织主要依赖于实际的或潜在的物质性力量来确保其成员的服从；功利型组织，它主要依赖于金钱刺激；规范型组织，也称之为志愿者协会，它允许员工自由地追寻某些共同利益。志愿者协会几乎没有正式控制机制，志愿者协会利于在个人和大型科层组织之间构建桥梁。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工业部门中的发展趋势是远离严密的科层制结构，趋向于更具弹性的组织形式。

16. 日本组织中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跟西方国家很不同。日本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发展公司取向的通才管理者而不是专业取向的专家，同时，公司关心雇员的康乐幸福的共同责任，在日本公司中强调全员决策、缓慢而又稳步晋升以及组织的长远规划。

17.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大型而复杂的组织已成为每个现代城市——工业社会占支配性地位的特征。最近，人们开始对科层制作出了多种形式的消极反应，他们反对巨型政府、组织化的宗教和大型公司。尽管类似的抵制性态度不断增加，但是人们仍然称赞科层制所带来的社会效率。

推荐阅读书目

1. 霍尔·理查德 (Hall, Richard) 主编, 1991. 《组织：结构与过程》第 5 版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Proces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组织社会学的标准教材，讨论了组织的内部结构与过程，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尤为强调了它们对组织的影响。

2. 霍曼斯 (Homans, George), 1950. 《人类群体》 (*The Human Group*.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这是一本对人类群体本质的经典研究。

3. 詹姆斯·林肯 (Lincoln, James R. & Arne L. Kalleberg), 1990. 《文化、控制与义务》 (*Culture, Control,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本书详细比较了日本与美国的工作组织和工作态度。

4. 查尔斯·佩多 (Perrow, Charles) 主编, 1986. 《复杂的组织: 批判文集》 (*Complex Organizations: A Critical Essay*. 3r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这是一个将社会学与企业管理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对组织理论的描述和批评。

5. 利茨尔 (Ritzer, George), 1993. 《社会麦当劳化》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可读性极强的书。书中论述了美国生活的所有领域实际上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理性化的。

6. 斯蒂芬·罗宾斯 (Robbins, Stephen), 1991. 《组织行为: 概念、争议与应用》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Concept, Controversies, and Applications*.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对社会组织中的冲突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

7. 戴维德·罗杰斯 (Rogers, David), 1992. 《美国银行业的未来》 (*The Future of American Banking*. New York: McGraw Hill.) 通过四家纽约城市银行的个案研究, 叙述了美国银行业适应变迁的失败。

8. 佐伯夫 (Zuboff, Shoshana), 1991. 《在灵巧的机器时代: 工作与权力的未来》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这是一本对八家技术复杂的组织的研究, 并探讨了雇工与管理者是怎样用新的思考方式对待他们的工作的。

越轨、犯罪和社会控制

将哪种行为适当地界定为越轨呢？我们可以相当可靠地假定任何特定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此都有很好的理解。越轨者是坏人，即那些破坏法律的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我们大多数朋友和家庭看来，基本上是错误的。我们可能模糊地意识到，别的社会里的人们对越轨和犯罪的定义有时与我们不同，或者，即使在同一国家，如美国，有些行为（如女人穿着松散慵懒）曾一度为人所不耻，而今却被广泛地接受了。当然，我们关于正确与否和道德与否的基本观念不大可能受到这类知识的严重挑战。

如果关于越轨的定义还是悬而未决的话，那么社会学的下述见解是重要的，即在现实中将什么定义为越轨行为几乎完全是相对的。尽管人们的确普遍地认为某些行为（最典型的是谋杀）是错误的（虽然哪种凶杀算是谋杀，在不同的社会里存在着理解上的很大差异），但是对于哪种类型的行为该处刑却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不同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将被认为是越轨行为，取决于何时何地以及是谁所为。

例如，考虑一下一个似乎很简单的问题吧，十几岁的孩子中哪些是青少年犯呢？如果说只有那些违犯了刑法的青少年才算是少年犯罪者，这种确认方式似乎过于简单。但是，W. J. 钱布利斯（Chambliss, 1973）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钱布利斯对比研究了两个不同的中学生群体，他将其中之一称为“天使”，将另外一个称为“无赖”。“天使”经常逃学，每到周末他们就去喝酒、盗窃或蛮干胡来。他们要么坐在自己的汽车里大声猥

裹路过的妇女，要么，在高速公路上大闹红灯。他们随意破坏建筑物的工地或被废弃的房屋。

这些男孩是违法者吗？我们大多数人很可能认为是。但是，他们同一社区中的多数成员并不这么看。他们是一些深受人们尊敬的公民的儿子，通常被看作是懂规矩的学生，是些偶尔来些恶作剧的好孩子。社区将他们当作未来的领导人看待，期望他们做得更好。对他们，警察睁只眼闭只眼，任其自由。

然而，“无赖”来自下层阶级，他们的过失行为与“天使”别无二致，但他们却被社区视为惹事生非者。在钱布利斯观察期间，每个“无赖”至少被拘捕过一次，这帮人一次次受到警方的收拾和折磨。而且，由于他们很少有机会搞到汽车，“无赖”们的偷窃、酗酒和野蛮行为常发生在他们自己的社区里，在那里，他们干什么都很容易被发现。相反，“天使”们小心翼翼地在人们不认识他们的较远的社区干坏事。因此，他们的“恶作剧”瞒过了他们所在社区的居民。

正如这项研究所发现的，在青少年“撒野”和青少年犯罪之间存在一条细微的界限。在该案例中，与其说这两个群体在行为如何不端上有明显差别，不如说公众对其行为的认知存在差别。下层阶级的“无赖”们被视为罪犯，这是在鼓励他们继续将自己看作歹徒；他们中的大多数将越轨行为持续到成年。然而，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的“天使”们则继续上大学，并走上成功之路。

青少年犯罪的本质，连同其他类型越轨的本质，比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在这一章，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种复杂性。我们从讨论越轨行为的一般本质和探讨它同社会控制概念的联系开始。这里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是指意图促使人们遵从重要社会准则的社会机制。然后，我们主要描述一下已被提出来的，关于越轨行为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解释。最后，我们以讨论犯罪——为法律所惩罚的越轨行为——和刑事司法系统结束本章。

越轨的本质

违反某个群体或社会的重要规范的行为，就是社会越轨（Social deviance）。然而，这个简单定义留下许多问题没有回答——比如，什么样的规范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某些社区，周日禁止特定商业行为的所谓蓝色法律仍白纸黑字地写在书里，却被广泛地忽视了；人们并没有将周末开店的商人当作越轨者。类似的问题另外还有：违规时周围的环境怎样？是谁、什么时候和为什么要违犯社会规范？社会规范要求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来，但是，当一位驾驶者高速行驶是为了赶紧将病人送到医院时，他闯红灯的行为是越轨行为吗？

正如本章开头提到的，越轨的定义因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变换而有所不同。比如，1984年的联邦法律要求各州在1987年以前将21岁定为可以饮酒的法定年龄；否则，这些州将失去联邦对高速公路的部分投资。虽然所有50个州最终都同意了，但是该法律还同个别州关于驾驶者在驾驶时血液中酒精的最高含量的法规有冲突。越轨定义不仅对社会学家而言是个主要问题，而且，一般来说，它对社会而言也是个问题。

1

越轨的定义

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强调，社会越轨是与统计异常大不相同的概念，统计异常学的偏离（Statistical deviance）简单地说是指一种行为的发生频度或多或少地偏离正常水平。收集纸板火柴盒盖并非很流行的嗜好，因此，是一种统计异常，而不是对社会规范的违犯，因此，社会学家并不将其看作社会越轨。另一方面，某种行为在社会上传播较广，如偶尔闯红灯和欺瞒所得税等这些在统计学上比较普遍的现象，却至少是一种温和的社会越轨行为。

给越轨行为下定义的另一方法是运用医学上的类推（默顿，1968；帕森斯，1967）。作为越轨的对立面，遵从可以视为健康的和有正功能的，因为它能起到稳定社会系统的作用。我们再来看越轨，越轨是一种病态，是一种机能障碍，因为它对社会稳定起瓦解作用。当然，这一定义仍有瑕疵。客观了解什么是健康的社会就够难了，更不用说是什么促进了这种健康。另外，社会学家还观察到某类社会越轨行为实际上促进了社会功能（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将讨论越轨的正功能）。

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越轨行为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例如，有时妓女在大街上公开兜售色相，而警察却并未去“打扰”她们。相反，若在报纸对警察局的腐败和堕落进行报道之后，她们再这么做，就很可能遭到拘捕。

正如前面有关“天使”和“无赖”的研究所表明的，地位卑微的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穷人，与那些富人和有权力的人相比，更容易被蒙上社会越轨的污名。来继续研究一下卖淫者和街头应招女郎的例子吧，她们是与肤色不相称的女人，她们接待的顾客一般都地位卑微，因而很可能比那些为更加尊贵的社会精英提供服务的“女孩”更容易被捕。

越轨的定义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不久以前，离婚还会使配偶双方的家庭蒙羞，其子女也会被打上新标记，成为“残破家庭”的产物。离婚被视为缺乏美德的象征。而今，当美国近半数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告终时，大多数人开始意识到，白头偕老的美满婚姻是不同寻常的。

伴随地点的变化和文化的不同，越轨的定义也有差异。在纽约的某些地区视为正常的行为在依阿华州的杜布切可能招致被捕。在所谓婚姻开放的美国受到鼓励的行为——特别是婚外性关系——在伊斯兰社会里，可能招致当事人被石头砸死。

最后，当被视为越轨行为时，还意味着这种行为必须是作为违规的行为而被观察，被定义的，并被贴上越轨的标签。比如，一名青年偷了一块手表，被售货员发现，如果售货员不将此事告诉任何人，只是要求他归还物品

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被称为越轨者。然而，如果售货员坚持要控告，并且这名青年进了劳教所，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尽人皆知。结果，这名青年就成为人所共知的越轨者了。霍华德·贝克（Howard Becker, 1963）建议不要将越轨定义为与特定行为相关联的品德，而是有某种行为的人与把该行为称为越轨的人之间社会互动的结果（我们在本章的后面讨论这个被称做“标签”的观点的意义）。

对越轨的误解

通常，越轨（deviance）和越轨者（deviant）这两个词汇往往让人想起那些堕落者、变态者和疯子。因此，在你研究越轨之前，记住以下五点十分重要。

第一，越轨行为未必就是坏的和不可接受的行为。越轨这个术语意味着“不遵从”。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富有创造性天才的小说家、艺术家和作曲家等诸如此类的人称为“不遵从”者（萨格林，1975）。

有时，行为是越轨了，但由于所违犯的规则并未被广泛接受，人们就不会认为这种越轨是不道德的。例如，沃尔斯特（Volstead）法案规定在美国实施禁酒令期间禁止卖带酒精的饮料，大部分美国人都反对这条法案。于是，私酿私贩酒类的人和其他违犯这条法律的人通常为公民所接受。

在官僚机构的某些案例中，为打破刻板的常规，更便捷地完成组织的核心任务，实际上，对正式规则的违犯可能是非常需要的。对一家飞机制造厂的经典研究描述了打破科层制规则是怎样有助于工人去做好他们的工作的（本斯曼和杰弗，1963）。一个由工友及其管理人员组成的非正式网络鼓励工人利用一种特殊的工具。使用这种工具时，工人的工作容易做得多，但却使飞机的结构有所削弱。使用或拥有这种工具应马上被解雇，然而，机械师们使用这种工具却得到了他们的同事和主管官员的默认。虽然这种行为是职务上的越轨，但实际上是被社会承认了的。

罗伯特·默顿对反常（Aberrant）和不遵从（nonconforming）行为的区分，是积极地看待越轨行为的另一种情况（1976）。反常越轨者（Aberrant deviant）是些基本上接受社会规则的合法性但却因个人目的而违犯的人。大多数犯罪行为归入这一类。实际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赞同反常越轨，即使是越轨者在大多数场合也不赞同。然而，不遵从越轨（nonconforming deviance）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不遵从越轨者相信规则是坏的，以至于有必要通过蓄意地和集体地违犯它而向它进行道义上的挑战。同希望隐瞒其行为的反常越轨者不同，不遵从越轨者吸引人们对其行为的注意。他们的目标不是个人得失而是改变规则。这类越轨是一种良知未泯的行为，而这里的良知则基于一定的社会理想。不遵从的越轨者常常被他们的支持者当作英雄，而且，如果他们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就会最终得到全社会的支持。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早在几十年前的民权运动中在隔离的午餐桌旁静坐的美国南方学生；而市民实际的不遵从行为则有诸如反对核动力的抗议者；希望改变军队中的反同性恋政策，同性恋性士兵伙伴所举行的公开的宣传活动等。因此，默顿的不遵从（nonconformity），如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的标新立异行为，是对广泛

存在的不受欢迎的法律的冒犯和反叛，或者意欲突破刻板的官样程式约束的违规行为，它们未必就是坏的或没有价值的越轨行为。

第二，越轨行为并非总是自愿的。例如，有身体障碍的人常常被当作反常者。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有生理缺陷的人违犯了与社会所认同的最基本规范是由于他们不是“完整”的人（萨格林，1975）。然而，因为社会认识到这种生理缺陷非意志所能控制，此类越轨常得到相对的社会宽容。不过，对这些人也会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比如把他们送进一些专门的机构。但另一方面，对那些有能力遵从规则却最终未能遵从的人，通常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全部责任。这样，被断定为大脑正常的谋杀者，被判为有罪后就要面临长期的监禁，而那些杀了人的精神病患者则会被宽大处理。

在不能遵从和未能遵从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一些理论家相信，几乎所有反社会行为都是因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缺乏正确行动能力的结果。但是，毫无疑义，正是这种宽泛的定义使作为我们司法制度基础的个人责任概念变得毫无意义了。

第三，越轨行为未必是犯罪行为。虽然大多数犯罪行为是越轨行为，但不是所有的越轨行为都是犯罪。一般而言，一个行动可能（1）既是越轨又是犯罪，如谋杀；（2）是犯罪但不明显是越轨，如赌博；（3）是越轨但不是犯罪。例如，检举揭发（如报道坏事和非法活动，特别是在商业上或者政府里的）被广泛地视作越轨行为，但它当然不是罪行。检举揭发可能在社会中还有许多正功能（格默，1985，1986）。肥胖的人、文身的人和邪教组织的成员都是越轨者，但是，他们的越轨只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而不是犯罪行为。

第四，越轨行为，虽不被赞同，却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指出，越轨“是任何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58）。没有听说哪个社会没有大量的将其成员定义为越轨者的行为；新英格兰的早期清教殖民者，按现代标准来看都是高度遵从的人，但他们发现其成员的许多行为应该受到责难（埃里克森，1966）。

第五，越轨可以是个人干的，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所为。某些类型的犯罪和越轨，如侵吞公款（格雷塞，1953），是某个人行动的结果。其他的，诸如由“天使”和“无赖”所干的犯罪行为都是群体性的。有些严重的越轨是由公司或政府机构所为。例如，一个公司在非法倾倒有毒垃圾时，它就是越轨者；在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联邦调查局违犯宪章，总想诋毁马丁·路德·金的名誉时，他们就是越轨者。

2

社会控制 和越轨

我们已经定义了，社会越轨是对重要的社会规范的违犯。这种违犯常常导致社会努力去惩罚冒犯者并试图减少甚至消除进一步的不良行为。旨在防止越轨并鼓励遵从的努力就是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s）。社会控制主要有两种类型：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内在社会控制（Internal social controls）指那些引导人们自我激励并按遵从的方式行动的过程。外在社会控制（External social controls）则是运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来促使人们遵从的

各种外在压力。

对越轨的内在控制

内化 (Internalization) 是指某个人对群体或社会的规范的认同 (这是第六章讨论的社会化过程的一个方面)。一旦社会规范的内化成功, 一个人通常会继续遵守它, 即使无人监视他时也一样。当然, 有时候, 我们所有人会同群体和社会的期望有偏差; 内化决不是完美的 (赛克斯和马茨扎, 1957)。

源于内化的对规范的遵从与怕招致处罚的遵从大不相同。后者是对社会应用外在控制的反应。对社会规范的成功内化使人们自制, 如不偷别人的钱, 这不是因为他们惧怕被捕或入狱, 而是由于他们相信偷盗是错误的。他们的良心充当了社会控制的内部机制。

内化是对越轨行为进行社会控制的最有效途径。虽然每个人曾体验过一些越轨冲动, 但社会规范的内化趋向于将这些冲动控制在“不逾矩”的范围内。人们可能对他们的父母亲、老师或者朋友撒过谎; 他们可能从商店偷过一张 CD、一本书或者一条围巾; 他们可能欺骗雇主请了一天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内化的社会规范导致自责、负罪感并使自尊意识减弱。结果, 越轨行为很可能被放弃。

对越轨的外在控制

对越轨行为的外在控制包含了对社会制裁的运用 (参见第三章)。有些社会制裁是非正式的, 也就是说, 通过日常生活中与我们互动的那些人的行动实现的。其他制裁均为正式的, 也就是通过负有专门责任的社会机构实现的。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 (inform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非正式社会制裁是初级群体的主要功能。消极制裁的范围包括, 从群体的不赞成态度到群体的完全拒绝, 甚或到身体的惩罚。同伴反应是非常重要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 甚至当人们受到破坏规则的刺激时, 正如一位社会学家研究指出的, “为了保持亲友的尊重, 他们常常压制那些冲动” (蒂特尔, 1980)。虽然这种情况可能被过分夸大了, 但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制裁的重要性是不能否认的。

在初级群体之外, 非正式社会控制通常适用于工作场所, 并为那些发生越轨时恰巧在场的人们所使用。一位雇员可能斥责另一位雇员把事情搞糟了; 一位老师可能非正式地告诉家长, 发现其子女吸毒; 邻街的年长的妇女可能怒斥邻居的孩子合伙欺负另一个小男孩的行为。

非正式制裁可能非常有效, 但是, 其效果常常有限。原因之一是因为这样的制裁通常不确定。在个人的越轨行为被发现后, 如果有惩罚的话, 他们真的不清楚紧跟而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惩罚。另外一个原因是, 个人感情、相关社会地位以及群体团结的情谊, 可能消减了人们运用社会制裁的愿望和能力。一名学生看到他的朋友在期末考试时作弊, 他可能谴责朋友的行为, 但是, 由于害怕毁掉友谊, 他不会报告朋友作弊的事。实际上, 那些真的报告了作弊的人可能被称为“告密者”, 反倒使自己变成了社会异己。

亲密的朋友群体的团结感能从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影响社会控制。越轨

是对团结的威胁，因此，群体希望限制它。但是，正是同样的意识抑制了群体成员对其越轨的同伴使用过强的制裁。已经有研究指出，亲密群体中的成员将保护越轨者，除了以下三种情况外：（1）当越轨能轻易被外部察觉；（2）当越轨者可能被迅速地认出属于本群体时；（3）当群体因为该越轨者的行为有受到严惩的可能性时（科恩，1966）。

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form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由于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的局限性，便产生了专司社会控制之责的组织和职位，如警官、法官、监狱看守和律师等。立法官、社会工作者、教师、神职人员、精神病医师和医生也将社会控制作为其职责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正式社会职位网络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一般来说，社会控制变得更加客观。

然而，有时社会控制的正式途径可能很不正规，甚至会很个人化。一位社会学家研究监狱看守同囚犯如何相处时报告说，看守同囚犯讨价还价（克劳沃德，1960）。看守通过“忘记”执行某些规定刺激囚犯在遵守其他规定时合作。

人们对警察在执行其职责时所使用的非正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警官并不常用他们的拘捕权力，即使他们知道犯罪已发生（赛克斯，1978）。他们可能希望犯法者成为情报来源。或者，为了其他一些理由，他们可能简单警告一下就将罪犯放了或者不理睬他们的越轨行为。事实上，警察的工作很少是他们自己去找的，大多数是对公民抱怨的反应。如果抱怨显示出宽大的意向，警察很可能就不实施拘捕了（布莱克，1971）。

其他正式社会控制机构也有大量的个人决定权。为了确保定罪，原告常参与诉讼交易——这意味着，允许某人服较轻的罪。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员处理案件或感到证据不足难以定罪，原告只能取消诉讼。

正式社会控制机构中如果没有一点灵活处理权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没有这种权力，司法就会过于刻板。进而，如果把所有的奸夫、所有开快车将怀孕的妻子送往医院的丈夫、所有的大麻吸食者、闯红灯者、乱扔垃圾者和大伙儿讨厌的人都突然逮捕并投入监狱，那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将比现在更难堪其重荷。

3

越轨的社会 功能和功能 障碍

至此，我们还主要是在考察越轨行为的个人方面。越轨行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公民们存车不付费或者骚扰和抢劫他人，这会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公司行贿或政治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又怎样呢？大多数人很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越轨的病态功能——其效应是负面的和破坏性的——但是，社会学家也已认识到了越轨行为的几个潜在的正功能。下面的讨论摘自科恩（Cohen，1966）的研究报告。

越轨的社会功能

虽然很难说越轨是人们想要的，但是，社会学家相信它有时确实有助于社会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并朝理想的方向变化。下面是越轨的一些社会功能。

1. 越轨有助于澄清并定义社会规范。许多社会规范在被破坏之前还模糊不清。这时，群体对越轨的反应进而澄清了规范。例如，共用同一厨房的学生可能建立起一条规矩，规定污水槽、炉灶和电冰箱必须保持清洁。但是由于“清洁”是一个不精确的词，每个学生并不完全清楚到底期望他们怎样做才算清洁。如果有学生在炉灶上留下了几个污点，是没有人会去注意的，但是，如果另有名学生将脏污的碟子扔得满厨房都是，就会遭到大家的抱怨。这样，使用厨房的人就能更好地理解什么叫清洁了。

2. 越轨能增进群体的团结。根据乔治·赫伯特·米德（1964）的研究，“对违法者的敌意态度有一个独特的优点，即促进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在感情上团结起来以对付破坏行为。”群体成员发现，他们面对越轨有同样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必须采取一些共同行动去控制和阻止越轨。

有时，群体为了一个越轨成员而团结起来，而这样做，也能增进整个群体的团结。这个群体可能要保护他们中的一个成员免受其越轨行为后果的影响，或者去帮助这名成员学会遵从社会规范。因为大家感到，为保持群体的完整，遇到的麻烦和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所以这两种行为都能促进群体团结。

3. 越轨能带来社会系统所需要的变迁。像前面所讨论的那样，通过越轨导致的社会变迁是非遵从性越轨者的目标。有时，某些越轨者的行为结果是，其他群体成员意识到了某条规则不好或与其他更重要的规则相冲突。然后，这条规则就被改变了。举一例说明，在由马丁·路德·金发动的公民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对种族隔离法的破坏将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上。这一民权运动最后导致这些法律得以改变。在另外情况下，如果不赞成行为一开始就广泛传播开来，那么，即使没有蓄意改变社会的运动，该行为也会被普遍接受。例如，妇女在公共场所吸烟和青年男子带耳环等被渐渐地接受了。

4. 越轨促使人们更愿意遵从。这只发生在越轨是不成功的和遭到惩罚的时候。当人人都遵从时，遵从就不被视为特别的美德。但是一旦某越轨者得到惩罚，那些没有犯规的人就得到了“报酬”：没有受罚而且感到做了“该做的事”。遵从者守规矩的愿望得以强化。

越轨与社会功能失调

由于社会具有吸纳大量的越轨而使之免遭严重后果的能力，因而某一越轨行动或某人的越轨影响社会功能的发挥情况是罕见的。但是长期或广泛的越轨能从几个途径导致社会功能失调。

其一就是，如果越轨广泛流传，就可能弱化人们遵从的动机。如果你在考试时知道了你的许多同学都在作弊，你可能开始在想为什么要开夜车学习自找苦吃呢？如果你所有的朋友都在纳税上欺骗，你为什么要诚实？如果越轨和遵从得到的是同样的回报，那为什么要遵从？

越轨可能有害，还因为它使生活不可预知并充满危险。所有复杂的社会互动都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人们通常会固守自己的角色定位。如果人们，特别是那些地位显赫的人，不能遵守人们期望他们遵守的社会规则，社会生

活正常进行就会产生问题并处于危险之中。正因为几乎人人遵守开车必须右行的规则，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才感到安全。在蹦床上跳跃的人期望他们的监护人保持警觉并在他们跌倒时扶住他们。正在战斗的战士将其生命押在他们的同伴对各自职责的自愿遵守上。在这种情况下，越轨可能削弱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相互信任的纽带。

对任何一个关于越轨导致社会功能失调的讨论来说，对似乎具有相同意义的两个概念“越轨”和“社会解组”加以区分是有帮助的。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是指社会设置的崩溃。一个高度组织的社会系统能承受大量的越轨而不会出现严重混乱。仅仅当大量的人长时间地越轨时，当越轨渐渐严重地破坏掉对基本社会机构的社会价值观的信任时，或者当越轨引发了社会不能容纳的冲突时，社会解组才会出现。与此同时，不仅过度的越轨可能会导致社会解组，而且战争、人口变化、技术革新以及诸如洪水、火灾和饥荒等灾难也可能导致社会解组。

关于越轨的理论视角

既然我们已经定义了什么是越轨并探究了它对社会的一些影响，我们就可以着眼考察一下它的原因。有些人为什么会破坏群体的或社会的规则？已经提出的许多理论视点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越轨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越轨行为的形式包括了从不向邻居打招呼到终生职业犯罪很宽的范围，所以，没有哪一个单一理论观点能解释所有形式的越轨。大多数的观点反映的不过是提出那些观点的学科的特殊看法。例如，心理学者强调心理因素对越轨的影响，反之，社会学家则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另外，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理论更多地涉及的是越轨的一般原因而不是特殊行为的原因。他们努力解释为什么越轨行为会发生，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人为什么会采取某一特殊的越轨行为。虽然社会科学工作者可能会有根有据地讲到，哪种社会情形很可能相关地产生大量的越轨行为，但是，他们可能很少预言，哪些人将会在这种情形下的确会采取越轨行动。

研究者已从三个主要层面寻找越轨行为的科学解释。有些学者相信某些生物学特性是越轨行为的主要原因。心理学家、多数公众以及大多数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工作的人，都将越轨主要归因于心理学的问题。尽管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因素无疑是越轨的重要原因，但是，社会学家以为，越轨行为得以在其中发生、承受以及有时得以改造的社会环境则是越轨的主要原因。

1

生物学视角 中的越轨

许多研究者想知道，是否生物学因素可以解释越轨，特别是犯罪型越轨。19世纪的意大利学者塞赛尔·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 1918)提出，罪犯在遗传和发育上不如守法公民。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埃恩尼斯特·胡滕

(Ernest Hooten, 1939) 得出结论说, 罪犯有多方面的遗传和生理缺陷。而且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谢尔登 (William Sheldon, 1949) 主张, 体型可能有与犯罪有关; 他将肌肉发达、筋骨健壮的身体结构称之为斗士体型, 在他研究的罪犯中有这类体型的人占很大的比重。

由于这些研究的质量太差, 人们广泛地认为这些早期研究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不管怎样, 对生物因素的研究还在持续进行。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有两位科学家报告指出, 人们发现许多男性暴力犯罪者多了一个雄性染色体, 其性染色体的构造为 XYY (史密尔和伯曼, 1970)。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这种情况导致了暴力行为, 而且多数暴力犯罪并没有这种反常基因 (沙宾和米勒, 1970)。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医药专家大会上, 几位研究者陈述了他们的观点, 近 90% 的极端暴力犯罪个人有大脑缺陷 (《纽约时报》, 1985 年 9 月 17 日)。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认为在暴力犯罪和甜点心 (特别是过量地使用糖的点心和) 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但证据不足。还有人认为攻击行为, 也许还有犯罪, 很可能受体内男性荷尔蒙激素水平的影响。

研究生物因素在引致越轨中的作用的最好方法是, 比较研究同卵双胞胎之间有关犯罪的发生和类型。然而, 这些研究的结果是有矛盾的。在挪威进行的一项关于双胞胎的仔细研究的结论是, 遗传特性不是犯罪的显著原因 (达尔加德和克林伦, 1976)。然而其他研究, 特别是有关严重犯罪行为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一项研究发现遗传性的犯罪行为更可能是偷盗而不是暴力 (加布里埃利、哈钦斯和梅德里克, 1984)。

尽管少数研究发现越轨与生物学因素有紧密的联系, 但是, 在解释越轨问题上, 一个趋势正在现代社会兴起, 即将越轨行为作为各种疾病, 包括器质性的和精神性的疾病的结果。这一趋势称为用医学方法处理越轨问题 (medicalization of deviance) 的倾向。结果, 像吸毒的副作用、机能亢进、酗酒等这样的越轨行为, 现在通常更多地视之为医学上的问题而非品德上的缺点 (康纳德和施奈德, 1980)。

这一重新阐释的过程与那些将小过失都看成犯罪的传统观点相比, 似乎更适应今天快速变化的文化 (莱特, 1989)。例如, 曾经被当作酗酒罪的行为现已被医学研究认定为酒精中毒。那些曾当作道德上有缺陷的行为, 现在被视作需要进行专门治疗的疾病。虽然药物能够帮助许多越轨者应付他们的问题, 但用医学办法对待越轨并不总是一个有益的方法。例如, 无家可归者常常表现出头昏眼花、丧失方向知觉等症状, 从而被称做患了“精神疾病”; 然而, 很可能这些症状不是由于疾病而产生, 而是由于无家可归者缺乏足够的食物和住房。因此, 从医学角度的考察可能鼓励我们去寻找严重社会问题的个人病理学依据, 而非基本的社会原因 (斯诺, 1988)。

2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提出某些类型的个性常常与越轨行为有关。持这种观点的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是英国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 (Hans Eysenck, 1977), 他的理论将生物学和心理学视角结合起来。根据艾森克的

心理学视角 中的越轨

观点,没有人生来就是越轨者,但是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越轨。一种特别可能产生越轨的个性类型就是“外向性格”(extrovert)——有这种个性的人善交际,但也好冲动,他们对丰富多彩和刺激有强烈的需要。与其相反的个性是“内向性格”(introvert),一种长于自我控制的安静型性格。艾森克指出,性格外向的人,其行为很可能逾越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因为这些人具有对刺激和冒险的生理需要。他们是否会成为越轨者,主要取决于他们是怎样被社会化的。

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学观点强调,暴力和越轨都是社会习得的(Socially learned)。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 1973)证明,即使并没有真正从事过攻击行为的人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攻击行为。例如,孩子们在电视上看到暴力场面就会可能在游戏中加以模仿。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学会了怎样行使暴力(例如,如何打枪),即使他们在实际中并未采取过他们所学到的行为。但如果他们后来发现暴力行为可以带来报酬却没有受到惩罚时,他们很可能会采取暴力行动。

关于越轨的第三种流行的心理学解释提出,攻击行为常常由挫折引起。当某一需要未能满足时,人们可能遭受挫折。正如“挫折—攻击”(frustration-aggression)假说所解释的,遭受挫折的总量取决于需要、冲动和欲望受到妨碍的强度(伯科威茨,1962)。反过来,攻击的程度与人们如何受挫有关。挫折可以是由于缺乏金钱、爱情和其他东西而产生的。实际上,这个理论能够推而广之,可以包括几乎任何一种情形。

3

社会学视角 中的越轨

心理学解释强调那些能促使人们以越轨的方式行动的个人特性,而社会学视角则集中于对社会环境的分析。这两种方法分别被称为关于人的理论和关于情景的理论(科恩,1966)。关于人的理论试图解释,不论是从生物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看,越轨者同其他人不同。而关于情景的理论试图断定,哪种情境使一个普通人违反规范。在追踪这种情境方法时,社会学家着眼于三个主要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环境比其他环境更可能产生越轨?为什么在某些社会环境下的越轨行为在另外情况下却有很高价值?为什么越轨者破坏某些规则而不是别的规则?

结构性紧张理论

早期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关于越轨的社会学理论是由罗伯特·默顿于1938年提出的。默顿的理论建立在迪尔凯姆的古典的失范概念(anomie)基础上。所谓失范,是指规范和价值相互冲突或者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阙如的一种社会状况。默顿指出,当社会的文化与结构之间存在紧张或冲突时,越轨就可能产生。

更具体点说,所有文化都提出了作为普遍欲求的某些目标(如个人在金钱上获得成功),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或社会认可的手段(如努力工作,读书求学)。但是,在社会快速变化和社会不平等广泛存在的环境里,属于某些群体的人可能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通过合法的途径

去实现文化上的成功目标。社会结构限制了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结果，这种群体中的人就会体验到社会失范，他们可能失去对这些目标的兴趣，或者失去通过合法的途径达到成功目标的兴趣，或者同时失去二者。因此，默顿的结构性紧张理论（structural strain theory）寻求解释在那些体验到机会被阻塞的人群中广泛流行的越轨行为，并把越轨当作是要实现目标却没有合法手段的文化压力的结果。

默顿指出，这些受阻群体中的成员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和穷人，他们可能以五种方式对其社会失范的困境产生反应。

1. 最通常的反应是遵从。运用文化认可的手段，通过努力工作去达到想要的且社会认同的目标，即使成功的机会比较罕见。幸运的是，这是对失范的最通常的反应。

其他四种可能的反应或多或少地都是越轨。

2. “革新”，接受目标（如获得财富）但拒绝社会认可的手段，而代之以“新”的非法的手段，比如当一个人通过卖毒品去赚钱买辆新汽车时。

3. “仪式主义”，相对来说，这一类型不常见，这里，机会受阻的个人接受手段但拒绝目标。例如，当某人上学只为获得学位，而几乎可以确定获得学位并非为了找份工作时。

4. “退却主义”，既拒绝目标也拒绝手段，例如隐士，这类人抛开尘世生活，退隐山林。

5. “反叛”，拒绝文化上赞同的目标和手段，代之以新的与他人协调的目标和手段。例如，一群大学生可能退学并抛弃世俗社会的成功希望，代之以组成激进的环境行动小组，运用非传统的方法为新的目标工作。

默顿的理论遭到几个方面的批评。首先，某些越轨行为，例如抢劫，并不能简单地由这套理论加以解释（吉本斯和琼斯，1975）。而且，这一理论解释的仅仅是那些成功机会非常有限的群体中的越轨成员；它无助于解释社会上有特权的成员中存在的越轨行为。最后，它无助于我们预测当某一特定个人面临失范时将作何反应。

文化传递理论

就其本身而言，失范并不一定导致越轨。例如，许多贫民区的孩子，受教育和挣钱的机会经常被抑制，但他们并未成为瘾君子、盗贼。正如心理学的学习理论所指出的，要想变成越轨者，人们必须有机会去学习越轨。那些习得了赞成越轨行动的观念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采取越轨的方式。

越轨，像遵从一样，是从一个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习得的。这一观点得到由克利福特·肖（Clifford Shaw）和亨利·麦凯（Henry McKay）的一项研究的支持，他们的研究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高犯罪率的地区进行。肖和麦凯（1929）指出，虽然，这一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但高犯罪率在这些邻近地区持续了20多年。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指出，新来者向已经居住在此的人，主要是通过孩子的游戏群体和青少年团伙学习越轨行为。

在更近的研究中，理查德·克劳沃德（Richard Cloward）和劳埃德·奥林

(Lloyd Onlin) (1964) 指出, 虽然社会环境试图劝导人们遵从社会规范, 但教导的内容并非总是一致。父母、教师、宗教领袖以及其他社会化主体有时传达出的不是遵从而是越轨的态度。比如, 一位母亲总是教导女儿守法, 藉此, 她教导女儿遵从。但是当她和女儿在逛商店出来时收到了一张停车罚单, 便说, “哦, 我就把它扔了; 他们将永远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同。”这时, 她是在教育女儿, 有些越轨是可以接受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社会学家指出, 在某些企图纠正越轨行为的地方实际上却在传授越轨行为。在监狱, 新来的犯人完全暴露在同一监狱内老惯犯的影响之下。老囚犯常常向年轻的同监犯人传授更多更有效的犯罪方法。在精神治疗机构, 通过机构的亚文化环境, 越轨行为趋向于相互强化。

没有一个人只是单一地受到越轨的影响。那些犯罪团伙的成员, 在听老成员教唆他们怎样偷车的同时, 其他人也教导他们说, 偷车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是错误的。许多邪教徒在传统的家庭中长大。然而, 为什么越轨模式对有些人有吸引力, 而其他人却倾向于遵从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埃德文·萨瑟兰 (Edwin Sutherland) 尝试提出了一套可能是最系统的理论。萨瑟兰的差异性联合理论 (theory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认为, 每个人都受到了遵从和越轨行为的双重影响。这些影响在个人的思想中展开斗争, 哪个方面在思想上占了上风, 哪个方面就会去引导人们的行为。如果走向越轨的社会化强度超过走向遵从的社会化强度, 一个人就会变为越轨者。萨瑟兰指出, 有几个不同因素打破平衡偏向越轨: 与教唆越轨的人联系越密切, 与之交往的次数就越多、越频繁和越持久, 且接触时的年龄越小, 当事人变为越轨者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控制理论

结构性紧张理论和文化传递理论的视角都有一个共同的假定, 遵从是事情的常态, 只有当违反规范时才需要解释。其他各种社会学理论则从相反的假设开始, 认为为了实现愿望,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想走捷径, 相应地, 有问题的假设是遵从而不是越轨。

一类控制理论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 认为某些人比他人更缺乏控制自己内在冲动的能力。根据沃尔特·雷克利斯 (Walter Reckless, 1967) 的“自利理论” (contain theory), 罪犯是缺乏正确的自我观念, 结果未能抵制住越轨诱惑的普通人。同样, 霍华德·贝克尔 (Howard Becker, 1963) 认为, “正常”人通过思考他们在越轨后会发生什么来控制他们的越轨冲动。他们不想污损他们的自我形象。而越轨者在抑制这些冲动时存在困难, 因为他们缺乏对自己的评价, 或者缺乏较强的认同意识。然而, 其他学者并没有看到在未能控制越轨冲动和成为越轨者的结果之间的联系。而且, 有些人可能简单地将自己看得无足轻重并感到对他们发生了什么都没关系。

特拉维斯·伊尔希 (Travis Hirschi, 1969) 提出的一个更详细的社会控制理论强调, 犯罪是由人们社会联系的纽带弱化所引起的。他指出, 在我们大多数人中起约束作用的四大关键社会纽带却在犯罪者那里典型地呈软弱状态。这些纽带包括, “附属”于其他遵从者, 特别是父母和同辈; “奋斗目

标”，他投入时间和汗水为实现诸如上大学等传统目标而工作，而越轨行为则会威胁到这些目标的获得；“参与”常规活动，以减少可能越轨的时间，以及“信仰”，接受常规道德观念。

冲突理论和越轨

我们在本章前面根据功能主义的视角介绍了越轨促进社会系统稳定的几种方式。默顿的结构性紧张理论也来源于功能主义。功能主义假定，所有社会成员共享一套希望达到确定的成功目标的价值观。

相反，冲突理论学家否认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相同的目标和价值。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同那些没有权力和地位的人的价值观大不相同。因为社会规则和法律是在社会权势参与下制定的，因此无权无势的人越轨频率更高，只不过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规则并未反映他们看待事物的特殊方式。基于这一视角，如果穷人、少数民族和女人制定法律，那么富有的白人男子将会比任何人更可能被判为罪犯。

文化冲突理论（culture conflict theory）和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Marxism conflict theory）可能是两种基本的冲突理论学派。第一个传统理论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复杂的社会包含许多的亚文化，每一亚文化都有其自己独特的目标和价值。这些亚文化可能集中于种族、性、生活方式、地理位置或者其他因素为中心而形成。被一个群体视为越轨的以另一群体中来说可能是可接受的行为。然而，较为强大的亚文化能有效地将许多弱小的亚文化的价值界定为越轨。

因此，文化冲突理论家经常问，为什么是某些群体而不是别的群体的规范被定为法律，为什么这些法律针对某些群体的成员而不是别的群体的成员执行得更严厉。比如，相对来说，大麻有害程度较小，而饮苏格兰威士忌酒与许多疾病的关系明显得多，但是为什么吸大麻被视为越轨，饮威士忌却是完全可接受的呢？文化冲突理论家可能指出，饮威士忌的人比大麻吸食者拥有大得多的社会权力。

流氓说唱乐的越轨世界

就许多大众文化而言，其部分吸引力无疑来自于对越轨主题的日常性的挑逗；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要对音乐、电影和电视努力进行如此经常的审查（请看第三章大众文化栏“使人堕落的大众文化”）。然而，某些说唱乐对传统规范 and 价值的挑战，使许多观察者感到震惊，简直是闻所未闻。“流氓说唱乐”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如渲染暴力、种族主义和深深的女性厌恶主义等等；在戴维德·盖茨（David Gates）为1990年《新闻周刊》所撰写的封面文章中，将这一流派描写为粗鲁下流的、丑恶的、阴沉的、令人震惊的、简陋的、令人讨厌的和可恶的。

一般公众可能是在1990年才第一次意识到“流氓说唱乐”的问题。这年，佛罗里达州检察官马丁尼茨·鲍伯（Bob Martinez）控告“二生乐组”（2Live Crew）的唱片“他们想怎么下流就怎么下流”违反了州反淫秽法。该唱片的歌词特点是极尽其能地详细描述了非常规的性行为，不停地将妇女称做“母狗”和“锄头”，而这在大多数的“说唱乐”那里是家常便饭。在争论平息前，“二生乐组”中的三名成员被



捕，因为他们在劳德代尔堡的一家“超越21世纪”俱乐部里表演了该唱片的内容；而且，有几家音像商店老板因为卖该乐队的唱片已被起诉。

也是在1990年，几个法律强制执行机构，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批评N.W.A.乐队所唱歌词，因为歌词内容充满愤恨地批判了警察对美国黑人的折磨。

两年后，争论又围绕关于“公众敌人”乐队的录像片“我到达亚利桑那州时”而展开。亚利桑那州官员们拒绝为纪念马丁·路德·金而确定一个州定假日，因而“公众敌人”乐队的成员组成暗杀组对他们行刺。该录像片描写的就是暗杀过程的前后经过。

一个相似但更强烈的反应是围绕快速重金属歌曲“杀死警官的人”而展开的，该歌曲是由埃斯提（Ice-T）所作，收于“身体相依”专辑。该歌曲的特点是歌词外露、亵渎、野蛮，像是在宽恕甚至鼓励刺杀警官的行为。这首歌及其作者受到当时的乔治·布什总统和60名国会议员的强烈抨击，他们联合签名写了一封信，称这首歌无耻卑鄙，并要求时代—华纳公司停止散卖包含这首歌的唱片。1400多家商店拒绝销售“身体相依”唱片。最终，“杀死警官的人”从该唱片的后来版本中删除了。

1993年底，自称为“狗”的22岁说唱歌手斯诺普（Snoop Doggy Dogg）（真名是：加尔文·布劳都斯 Calvin Broadus）作为谋杀的协从犯被拘捕。他的生活就像他的艺术，他曾因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Long Beach）贩卖可卡因而服过刑，还因武器交易入狱后获保释。这一次据他本人申述，他的保镖开枪打死了文斯梭林邦（Venice Shoreline Crips）的一名成员，他本人从那里开车逃出。斯诺普自己到了警察局，声称是自我防卫，尽管事实上死者是从背后被两次击中的。从那以后很短时间，他的首张专辑“狗式风格”（Doggy style），渲染随意的暴力、辱骂女性、吸食大麻，该唱片直达排行榜顶点，他也成了《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

尽管许多说唱乐都要处理种族隔离中的一些常见的问题题材。但是，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说唱乐艺术家的脑子里都充满着渗透在流氓说唱乐中的那种暴力和仇恨。像弗雷西·普林斯（Fresh Prince）或吟歌尔（Hammer）这样的更多的主流表演者，赢得了广泛的欢迎而没有违反传统的标准。然而，我们想了解的是，在90年代的早期，流氓说唱乐为什么在美国黑人和白人青年中赢得了如此广泛的欢迎。社会学解释可能采用冲突论的看法，说唱乐人试图重新定义越轨的概念，以反映他们所感知到的下层社会中都市黑人的生活现实。对“说唱乐”的批评者来说，音乐的粗俗语言、反警察态度和对暴力的歌颂都是越轨。而另一方面，对说唱乐人来说，真正的越轨是白人权力结构对他们社区的压迫。

从功能论的角度考察，人们可能认为“说唱乐”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对主流美国社会提出警告，比如，1992年在洛杉矶激发的罗德尼·金（Rodney King）暴动，就是一个警告：不久的将来，黑人聚居区可能再次激发暴动。正如《纽约人》杂志的撰稿人伊丽莎白·沃泽尔（Elizabeth Wurtzel）所指出的：“多年来，说唱乐用歌声所表达的许多社会意识，是在跟我们诉说警察的野蛮、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以及黑人聚居区的生活，他们以直率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一些闻所未闻的事实。”

资料来源：戴维德·盖茨（David Gates）：《说唱乐态度》，《新闻周刊》，1990年3月19日，56~63页；约翰·列兰（John Leland）：《刑事记录》，《新闻周刊》，1993年11月29日，60~64页；伊丽莎白·沃泽尔（Elizabeth Wurtzel）：《打击权力》，《纽约人》，1992年9月28日，110~113页。

关于法律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运用，两位研究者运用文化冲突方法观察

了针对在公共场合入店行窃事件的公众反应（斯蒂芬斯迈耶和特里，1973）。他们发现，无论有无证据，报告行窃事件取决于入店行窃人的外表。如果商店行窃人看起来像个嬉皮士，即被人瞧不起的无能之辈，公众就会更愿意去检举他。

一个文化冲突理论家蒂尔克曾努力精确地定义过文化差异转化为公开的法律冲突的条件（蒂尔克，1969）。他认为，这种冲突的结果取决于群体的权力、组织和他们的教养与世故。例如，一个高度组织化但没有权力、缺乏教养的群体，如一个街头团伙，极可能与法律产生冲突。一位只与很少几个人合作或独立行动的非常老于世故的人，其身份背景又很有权势，比如是一位贿赂了市稽查员的建筑承包商，就很少有可能与法律有纠缠。

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理论集中于社会阶级的不同权力，而非种种不同的亚文化。这种理论认为，最能够解释大多数越轨的，是阶级冲突，而不是一般的文化差异。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严重的犯罪是财产犯罪，这是穷人对富人的犯罪。而富人犯罪，诸如，纳税欺骗、存款丑闻等，尽管所造成的危害比穷人犯罪大得多，但法律只是将其当作相对次要的问题看待和处理。根据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的观点，我们社会大多数刑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现状，特别是在不惜损害穷人和无权者的情况下维护权贵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理论家认为法律体系只是有助于教育、大众传媒和宗教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下层阶级越轨，特别是像街头抢劫和小偷小摸之类的犯罪。结果，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社会损失更大的富人和权贵犯罪上转移开来，而忽视了最基本的越轨原因：美国社会生活的巨大不平等（格林伯格，1986）。

尽管有这样一些区别，但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冲突论者都同样拒绝我们的法律体系中的两个通常有效的观点。他们说，法律不是为了平等地保护社会中的所有成员而制定出来的；而且法律也没有必要反映全社会的道德思考。

标签理论

我们刚刚考察的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越轨行为的原因，但是它们不能解释越轨的所有方面。有些人花时间与越轨者呆在一起甚至扮演越轨者，但是并不被公认为越轨者。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判定一个人有越轨行为会导致这个人以越轨为职业。为了解释这些事实，一群以标签理论家（labeling theorists）而知名的社会学家，吸收利用符号互动论的思想，集中探究了越轨的过程而非越轨的原因。标签理论家们突出地强调越轨是相对的这一事实。一个行为及其违反者只有当被他人标签为越轨时才变成了越轨。

埃德文·雷梅特（Edwin Lemert，1951，1961）是最先研究标签理论的社会学家之一。雷梅特区分了两种越轨：初级越轨（primary deviance），即偶尔卷入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并未对个人的心理形象和社会角色扮演发生持续的影响；二级越轨（secondary deviance），卷入违犯社会规范的行为，并被其他人标签为越轨而且越轨者本人也这么接受了。在二级越轨中，越轨者必须围绕越轨者的角色来认知他们的行为和自我观念。他们可能以某种方式穿戴，使用一种特殊的、只有他们自己人才知道的俚语。他们越清楚地将自己

界定为越轨者，他们就越可能被其他人当作越轨者。经过一段时间后，即使那些对他们的名声一无所知的人，由于他们呈现出来的形象就可能一眼看出他们是越轨者。

标签理论家们曾将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的过程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是权威者或关系密切的人对越轨行为的察觉；第二步是对越轨者的标签；第三步是越轨群体或越轨亚文化为加入该群体或文化的人提供越轨行为的社会支持。一旦经历了这三个步骤，他或她就放弃不了越轨的方式，并回到遵从上来。这样个体就开始了他的越轨生涯（deviant career），也即接受了越轨亚文化中的越轨认同与生活方式。这个概念有助于理解越轨行为的阶段——不仅包括越轨的步骤，而且包括一个人成为越轨者的程度和认同越轨的程度。

观察越轨。在越轨者的眼里，一个破坏社会规则的行为可能对他而言没有什么社会后果，即使他经常表演此类行为。研究表明，这种行为极常见。一项全国性的研究，选取了847个男女青年的样本，访谈后发现，88%的年轻人承认，在此前的三年中，至少有过一次过失行为。然而，仅有20%的人与警察局打过交道，且仅有16%的人被送往过青少年法庭（威廉斯和戈德，1972）。我们可以可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多数过失行为并未被发觉，至少未被有关当局发觉。

对一个有社会后果的越轨行为而言，必须有重要的人看到它。知道这个行为的人的人数不必过大；更重要的是谁知道这一行为。如果一商店雇员从收银机里偷钱，并且仅被一个人发现——一位不会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的消费者——那么，这位雇员可能不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看到的人是雇员的老板，结果会大不相同。

标签越轨。在越轨生涯中，被公开标签为越轨者可能是最重要的步骤。越轨者被归入社会另册，给人留下反面印象。标签可能给越轨者一个公众形象，如“坚果”、“瘾君子”、“男同性恋者”、“懒鬼”或者其他似乎符合情境的名字。当越轨行为违反了法律，这个人也可能被称为罪犯。

标签可能是正式贴上的，像庭审或精神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有一种“堕落典礼”（degradation ceremony）的仪式，把一个正常人公开地宣称为越轨者。标签也可以是由朋友或家庭非正式地贴上的。一个孩子获得坏孩子或捣蛋鬼的名声的过程就是一个例子。标签也可以是自封的。许多同性恋者自愿抖出秘密，并公开宣称他们的性倾向，以便避免由于“误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标签越轨能产生持久的影响（林克和卡伦，1990）。那些获得这样标签的人，不再被简单地当作学生、水管工、父母亲或教堂职员，而多少被当作正常社会之外的人。即使个人实际上从未再犯标签所暗含的越轨行为，其社会后果是一样的。

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1963）指出，越轨者身份常常成了他的主要身份（master status），一种居支配地位且限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身份。

一个人如果没有其他身份，就将被确认为越轨者。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则。问题就产生了：“哪种人会破坏这样重要的规则呢？”答案是“一

个不同于我们大家的人，他不能或不愿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行动，因此还可能打破其他重要规则。”这样，越轨标签就支配了他的行为。

被标签为越轨者的人常被社会拒斥和疏远。这种拒斥可能是生理上的，比如，越轨者被送进监狱、医院或其他社会矫正机构。例如，朋友和家庭可能减少一些曾经给予的支持和感情，或者老板将其解雇。在许多情况下，越轨者获得了一个将越轨者们当作不为社会所接受的污名。社会拒斥和疏远趋向于将被标签的个人进一步推向越轨生活。在工作、交友以及他们的生活前途等方方面面，被打上越轨者烙印的人，慢慢地开始围绕越轨者角色构筑他们的全部生活。

加入越轨群体。对许多的越轨者来说，越轨生涯的最后步骤是加入和认同于一个其他越轨者组成的群体。加入这样的群体有两大功能。第一项功能是务实的。

当某人进入一个越轨群体……他学习怎样在采取越轨行动时最少惹麻烦。当他破坏某一规则后，他所面临的如何逃避惩罚的所有问题都是其他成员以前面临过的。因此，年轻的小偷同年长的小偷会面，后者比他经验丰富，向他解释怎样在偷物品时不冒被发现的危险（贝克尔，1963）。

加入越轨群体的第二大功能是成员从中获得情感的和社会的支持。在群体内，人们相互理解并相互同情。有时，群体也使越轨行为合理化。例如，群体成员可能宣称，正常的世界里充满了伪善的越轨者；但对越轨行为，越轨群体对自己的成员至少是诚实可靠的。这样的解释代替了外部社会对他们刺耳的指责，这部分地为群体成员减轻了内疚和自我悔恨的心理负担。

加入越轨群体使他们更有可能持续越轨的生活方式。恪守常规的压力减小了，越轨者的自我形象加强了。正如一个女孩所说的，当她的朋友中除了吸毒成瘾者之外，不再有别人时，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瘾君子（贝克尔，1963）。某些遵从压力存在于所有的群体中，无论是社会接受的群体还是越轨群体，这是一个讽刺。一个人违抗社会规则而进入越轨群体后，可能发现自己又被置于遵从越轨生活方式的实实在在的压力之下。

有时，在从事越轨职业的成员中间，特别是非法职业者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关系。比如，一名研究者在芝加哥访谈了28名男妓后发现，在男妓中存在三个主要的等级：挤街头的（这些男妓在公园或公共汽车站兜售他们的生意）、钻酒吧的和有机构护卫的。大多数的男妓从街头游娼晋为酒吧野娼，有些最终升到护送男妓之列。这些男妓获得头衔的方式存在明显的等级。这种等级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收入、隐私以及免遭被捕的安全性等。比方说，街头游娼每次接客获得大约10至15美元；酒吧野娼则为50至75美元；而最高等级的护送男妓则为100美元外加小费。

研究人员还发现，在这个阶梯上每升一级，都需要某些必要条件。街头游娼只需看上去比较漂亮。酒吧野娼至少21岁，要有吸引力而且在与顾客相处时如鱼得水，自由自在。而现在，护送男妓则需填写职业申请表，涉及他们个人背景、教育程度和经验等（卢肯比尔，1986）。

标签理论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将人们标签为越轨者就使他们成为越轨者的说法常常是一种夸张。许多罪犯从事他们的职业，主要是因为犯罪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回报，或者有与标签越轨无关的其他理由。即使标签可能是变成越轨者的部分原因，但它不能解释最初的越轨行为。标签理论的探讨不能代替其他试图从社会中探讨越轨原因的理论，但很明显，它的确对扑朔迷离的社会现实提供了重要洞察力。

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统

1

犯罪的种类

犯罪可以定义为由当局所禁止，并且运用正式制裁予以惩罚的行为。专家们传统上将犯罪行为分为几个主要类型，包括针对人的犯罪、针对财产的犯罪、无受害人犯罪或道德犯罪。最近几年，有组织的犯罪、白领犯罪和组织机构犯罪也引起了人们的实质性的注意。

最让人们普遍感到害怕的犯罪可能是谋杀、强奸和恶性袭击。所有这些都被权威机构归入针对人的“暴力犯罪”。即使暴力犯罪受到最大关注，但实际上，他们在官方机构记录在案的犯罪总数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参见表8—1警察局掌握的主要犯罪数据）。偷盗、入室行窃、抢劫、汽车盗窃和纵火等归入“针对财产的犯罪”。白领犯罪也包括在这一类之中（在本章的稍后部分再讨论）。

表 8—1 1991 年由警察掌握的刑事犯罪

所有的犯罪	数字	百分比
谋杀	25 000	0.17
强奸	107 000	0.72
抢劫	688 000	4.63
恶性袭击	1 093 000	7.35
入室行窃	3 157 000	21.23
偷盗	8 142 000	54.74
交通工具盗窃	1 662 000	11.17
总计	14 873 000	100.00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3》（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根据官方统计，在国际范围内，所有犯罪中的大约 20% 是针对人的犯罪；72% 是针对财产的犯罪；而 8% 是毒品犯罪。发达国家报告的犯罪数比发展中国家要多得多，略超过 2:1。所犯罪行的类型也有差别：在发展中国家，针对人的犯罪同针对财产的犯罪大体相同，但在发达国家（例如在美国），则针对财产的犯罪更多（穆勒，1983）。

有组织的犯罪

对非法赌博以及毒品和色情服务存在着巨大需要，因此，也意味着其中伴生有巨大利益。这些服务和产品都为法律所禁止，这事实上使经营它们的人能卖个高价，而提供它们的成本，常常相对要低。这对于解释为什么有组织的犯罪在美国很兴旺十分重要。不过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超出了传统的领域，发展到像工作诈骗、现金欺诈和洗钱等不同的领域。

直至最近，有组织犯罪的大众形象同意大利裔美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人对诸如众所周知的黑手党一类的犯罪财团很着迷。书籍、电影、报纸和期刊杂志，及解释这一群体的任何其他东西，总是畅销。近至80年代，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24个传统的有组织犯罪的家族仍在美国经营业务，松散地聚合在一个名作La Cosa Nostra（意大利语，意思是“我们的事情”或“我们的工作”）的组织里。警察局的情报称，与这些家族有牵连的各种特殊犯罪包括有非法赌博、抢劫、现金诈骗、工作欺诈以及买卖可卡因和海洛因。

然而，执法官员越来越担忧的是，新组织起来的有着不同种族背景的黑帮中，还有哥伦比亚的毒品卡特尔。非常典型的是，这些新群体严重卷入毒品买卖中，一般认为，他们没有黑手党组织得那么严密，但更加残暴。

有组织犯罪的成员决不能混同于职业罪犯。一个职业罪犯（professional criminal）是将某种特定的犯罪当作职业，比如，小偷小摸、行窃保险箱或武装抢劫。职业犯罪不像组织起来的犯罪集团那样有数百名成员，他们既不单独作案，也不同参加者或其他一些同伙合作过密。在多数情况下，职业罪犯表现出高度老练的技巧（常常是从狱中或街头其他职业罪犯那里学来的），他们得小心谨慎地从事他们的买卖，而免遭逮捕。那些技术特别高超的职业罪犯在罪犯亚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白领犯罪和组织犯罪

一提到犯罪，我们想象到的大多数就是抢劫、偷盗、强奸或者有组织的诈骗犯罪。发表的犯罪统计和报纸报道倾向于支持这样一个观点：那些由公司经理、政客和专业人才等白领从事的犯罪也很常见，但我们很少想到他们。部分地是因为，涉及到的这些人通常有权有势、老于世故，因而常常能避免暴露和被识破。如果被捕，他们通常在民事法庭而不是在刑事法庭接受审判，因此，他们就不会在犯罪统计中反映出来（克林纳尔，1979；萨瑟兰，1940）。

大多数白领犯罪是为了钱。这样的犯罪包括价格垄断、欺诈性广告和贿赂，阿卡朋（Al Capone）称之为“合法的无序”（萨瑟兰，1940）。这样的犯罪可以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也可能是公司官员为增进公司利益而采取的联合行动。

有些类型的白领犯罪可能是为了个人的金钱目标以外的原因。比如，现代债务法（liability law）要求，要起诉盗用机密信息而从事内部交易的人，必须是个人从中得到利益的。但是研究显示，通常内部交易首先是为了增进公司和客户利益，而非雇员个人利益（加藤，1987）。其他研究者指出，科

学研究中的“种族优先”有时导致篡改甚至伪造数据（默顿，1984；齐克尔曼，1988）。

白领罪犯所进行的“间接抢劫”不像街头抢劫那样是对个人的威胁。在枪口威胁下的抢劫当然看起来比某些大公司数百万的逃税更有威胁。但是白领犯罪比其他犯罪的损失更大。卷入的金钱数额，估计达到数千亿美元。80年代一项存贷款丑闻的损失就达5 000亿美元。

无受害人罪

今天在美国，一类最重要的犯罪是以道德犯罪、公共秩序犯罪或无受害人罪为特征的。无受害人罪（victimless crimes）指达到一致的成人之间就非常有价值的商品和劳务达成的交易因触犯刑法禁律而宣判有罪。据说，这些交易是无害的，因为涉及交易的当事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受害了。卖淫、色情作品、非法毒品的销售和使用就是例子。就美国历史来看，一般来说，试图执行无受害人罪的法律实践一直是不成功的，其突出表现是“禁酒”和当代的“反毒品战争”（马斯托，1987）。

目前关于禁毒的法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相信给吸毒贩毒定罪已经失败，应鼓励采用非罪刑化的政策，强调加强教育和治疗。这类似于走一条控制酒精和烟草的道路。主张毒品非法的人认为，非罪刑化将导致滥用毒品的人大幅度上升，其原因部分地是因为，它将向正在考虑使用毒品的年轻人传达出一个错误信号。

赞成合法化的人反击道，禁止毒品并不比禁止饮用酒精更成功。想用非法毒品的人可以毫不费劲地买到它们，这些东西的非法性反倒鼓励了一些人想去体验一下，这就是“禁果效应”。而且，我们的法庭和监狱塞满了贩毒和吸毒者，结果，起诉街头抢掠的罪犯就更为困难了（纳德尔曼，1929）。

尽管有这些争论，针对无受害人罪的法律仍在大多数的州有效。这部分是由于“道德家”倡导的结果，他们这些人或群体宣布某些行为不可接受并试图将其归入犯罪。

比如，有一个称为“反色情妇女”（Women Against Pornograph）的群体，她们发起了一场反对开发妇女在大众传媒、广告甚至医学书籍中的利用价值的运动。但事实上，现代美国人对色情东西的态度是矛盾。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色情作品是越轨的东西，却被广泛地容忍和漠视，除非儿童被卷入其中。大多数美国人相信，那些购买色情东西的人有权这么做（普雷斯等，1985）。反色情运动未能将色情的东西定为犯罪，只是因为许多美国人并不十分相信色情是道德上的恶（古德，1990）。



女性团伙

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因害怕成为犯罪，特别是街头抢劫、强奸、恶性袭击和杀人等犯罪活动的受害者而一直忧心忡忡。

街头大多数的暴力犯罪是谁干的呢？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作恶者的社会背景多种多样，一些最严重的暴力罪犯是年轻的、城市下层的少数民

族的男子，他们常常组成犯罪团伙。然而，最近的报告显示，至少这幅画面的局部开始发生变化：加入到全部由女性组成的暴力团伙的年轻女子的数目迅速上升，特别是在美国的大城市。

传统上看，女人在犯罪团伙中只是扮演边缘角色，且多数是由她的男朋友或亲戚拉进团伙活动的。只有很少的人取得了男性主宰的成员资格；通常，她们是作为从属群体的成员加入的（头目中的副职和副职的太太们），而且，她们的行动仅限于协从角色，诸如在其团伙对手中充当间谍和搬运隐藏的武器等（坎贝尔，1991）。

在最近十年里，这一切都变了。统一犯罪报告数据显示，在1979和1988年期间，尽管拘捕的男性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比率下降了9.2%，但拘捕的女性青少年犯罪的比率则上升了8.1%。男性犯此罪的可能性仍远远大于女性，大约8:1，但是发展趋势是不会弄错的。

女性犯罪团伙的暴力特点日益上升，这在ABC电台的“今晚世界新闻”广播节目中有大量的显著报道。该节目部分针对约7 000名来自洛杉矶内城区域的一些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团伙成员。这些团伙成员采用诸如“害羞的女孩”、“强盗”和“邪恶的人”等名字，用螺丝刀、匕首和枪武装她们自己；而且常规性地寻找时机去同其他女团伙成员战斗。她们强调力量、强硬和独立。虽然有些团伙在创办时是为了支持男性黑帮，但她们现在却全都独立了。

为什么这些女团伙在这个时候登场亮相？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因为她们的社会化不充分。ABC的报道指出，大多数的团伙成员来自缺乏爱和纪律的残破家庭。

另一个解释集中认为，那些甘愿冒险卖毒品的人可能有经济上的获利机会。有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妇女更加活跃地卷入了毒品的分发和使用。密执安州韦恩县的治安官办公室报告，因袭击底特律第一流的住宅而被捕的男子与妇女几乎一样多。ABC的介绍描绘了几个女团伙成员，她们通过毒品生意取得了金钱上的巨大成功。刚开始做毒品生意的十几岁少女一天赚200美元的利润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名经验更丰富的老手一周所赚超过10 000美元，她声称惯常雇佣男保镖，偶尔也雇杀手，向犯罪司法系统的代理人付费，而且为了避开税收上的问题而学习将其所获利润投资于合法的商业。

最后要注意的是，这些年轻女人中有许多人是孩子的母亲。据报道，她们中的有些人将毒品藏在她们孩子身上，因为她们知道警察很可能不会对儿童进行程序化的检查。这种行为表明，毒品文化通过这些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在至少一代以上的人中永远保留下来。

资料来源：鲍克、克罗斯和克莱因（L. H. Bowker, H. S. Gross, and M. W. Klein）：《犯罪团伙中的女性参与》（Female Participation in Delinquent Gang Activities.）*Adolescence*, 15（1980）：505~519；坎贝尔（Anne Campbell）：《团伙中的女孩》（The Girls in the Gang）（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4.）。

2

每年，当联邦调查局发表统一犯罪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年刊时，它都选出八种具体犯罪。这八种类型集中列入犯罪索引中，包括四种暴力犯罪——杀人、强奸、恶性袭击和抢劫，四种针对财产的犯罪——偷盗、

犯罪统计

入室行窃、自盗和纵火。

联邦调查局数据表明,列入索引中的犯罪大多是由24岁以下的人干的,虽然年龄范围随所犯罪行不同而不同。例如,在1991年,55%的谋杀犯、62%的抢劫犯、44%的强奸犯都在24岁以下这个年龄组。然而,大于24岁的人常常卷入非在册犯罪,诸如欺骗、赌博、酗酒和袭击家庭(美国司法部,1991)。

联邦调查局的这些数字还显示,犯罪通常是男子的行为,虽然有些犯罪,像娼妓活动,根据传统的定义几乎是女人的“专利”。但是,女人卷入了比她们过去更多的犯罪活动。在1991年,22%的在册犯罪被捕者是女人,相比之下,1967年只有12%。然而,那些常常导致女人被捕的犯罪是非暴力的。1991年,被捕的暴力犯罪中妇女只占12%,相比之下,她们因侵犯财产而被捕的占25%(美国司法部,1991)。

统一犯罪报告还显示出,黑人犯罪率要高于白人犯罪率,虽然在数据上随着所犯罪刑的不同而有不同。黑人在美国人口中约占12%;1991年在被捕者总数中黑人占到29%。为了解释黑人中存在的高犯罪率,人们提出了一些原因。包括有:第一,法律执行上的不同。黑人常因某些犯罪而被捕,若在白人,同样的情况可能被忽略不计或者非正式地解决了。第二,黑人的社会经验使他们更倾向于卷入犯罪。第三,官方数据的扭曲。白领犯罪大多为白人所为,但多数不报告出来;若在黑人,同样的犯罪就会被仔细记录下来(古德,1990;比宾斯,1977)。

最后,社区的大小和国内地区的不同,犯罪率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大城市的犯罪率高于小城市,而城市的犯罪率又比农村高。美国东北部拥有最低的强奸和盗窃犯罪率。西部在暴力袭击、入室行窃和盗窃方面的犯罪率最高。中西部抢劫和恶性袭击等暴力犯罪率最低。南方在杀人和强奸犯罪方面处于“领先”水平(参见表8—2)。从最近的十年看,全美国最高的犯罪率的重心从东北部和中西部转向南部和西部(美国司法部,1991)。

表 8—2 美国杀人犯罪率的综合素描

	频率最高	频率最低
地理区域	南方	中西部
社区大小	大城市	很小的社区
使用的武器	枪炮	毒药
凶手	受害人的家庭成员和朋友	与受害人关系陌生
凶手的种族	与受害者相同	与受害人不同
凶手的社会经济地位	低	高
凶手及受害人的性别	男凶手,男受害者	女凶手,女受害人

表 8—2 命案数据显示,杀人者及其受害人通常是熟人,而且,无论谋杀者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更可能杀害男性而不是女性。

资料来源:联邦调查局:《官方犯罪报告》(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避免受害与避免约会时遭强暴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受害者不应为其受害负责任，他们不过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然而，这种看法未必总是正确的。研究显示，某些态度和行为模式，增大了个人变成犯罪受害人的可能性。谁更可能成为受害人？在什么情况下？是不是有些人的态度、说话或动作“预示”着要遭强奸或抢劫？为避免受到罪犯的攻击可以做些什么呢？

根据一项研究，潜在的受害者可能以某些姿势、姿态和夸张的动作向那些潜在攻击者发出信号；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格雷森和斯坦，1981）。调查者在纽约市频繁发生袭击的地区随机摄下了60个步行者的录像；当事人并未意识到他们被录像机摄了下来。然后，将这些录像带拿到东北部的一个大监狱中放给囚犯们看。这里的“居民”犯过从简单的袭击直到谋杀等多种罪行，让他们评价录像中的潜在攻击对象。录像中的人分布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从最易攻击的潜在受害者到另外一个极端，即最不可能遭受攻击的对象。

可以根据诸如行走的方式、移动的稳重性、目视的方向以及行走的节拍等的不同，将录像中的主角的行为模式描述出来。受害者与非受害者之间主要区别同他们动作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相关。非受害者以一种稳当的方式移动他们的身体，而受害者在移动时则不连贯、不一致。调查者得出结论说，行为修正计划可能有助于潜在的受害者接受新的行动和动作，或者至少指出哪些行动在向可能的袭击者暴露了弱点。

另一项研究发现，个人态度可能影响已经受过伤害的人们的弱点。犯罪的受害者相信，他们本来可能做点什么以避免最初的攻击，同那些并不检讨自己行为的受害者相比，他们很少有再次受害的机会。感到自责的受害者似乎对犯罪也较少恐惧心理，他们相信可以做点什么阻止犯罪的发生。有了思想认识上的这些发现，现在采取了一些措施教育受害者，让他们知道怎样改变他们的态度和矫正日常行为来减少受害的危险（戴维斯，1987）。

强奸是一种受到特殊关注的暴力犯罪。一般来说，女人更可能是在她熟悉的环境里被认识的人所强暴，相对来说，受陌生人强暴的可能性反而要小（巴特，1981）。在约会时发生强暴的现象在大学校园内特别容易发生。约会时受强暴的例子说明的问题适用于许多强奸，因为女人常常不易区分友好的邀请和蓄意的袭击。因而，在减少约会强暴的威胁中，学会说“不”立刻变得非常重要（基德尔、贝尔和莫耶，1983）。而且，女人必须清楚与约会强暴相关的危险环境，诸如：滥用酒精和毒品时；与一男子独处时；与一名男子呆在他很可能感到同伴压力的环境中时；与表现出易冲动和反社会行为的男子呆在一起时；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而约会时，以及感到他们的个人空间被侵犯了的时候（帕罗特，1988）。

为了防止遭受犯罪攻击，通常建议的方法是，进行自我防卫和自信训练。同其他行为矫正训练不一样，这种训练假定人们有保护自己的责任，但无须为他们以前受害而自责。这些训练计划有什么价值呢？在一项有关为保护妇女免受袭击而开设的个人防卫和自信训练课程效果的研究中，发现那些感到强壮、勇敢和更能自控的学生，经过训练后比以前更能保护好自己。另外，他们获得了新技巧，因此比以前更细心更自信。

学生在经过自我防卫课程的训练后,对自己幼稚的神态和可能招致攻击的走路方式有了清醒的意识。处在自信训练中的学生,了解到了他们以前未曾考虑过的关于他们自己的空间和拒绝的权利。参加者发现,可以用愤怒代替害怕和绝望。虽然这对于男子来说并非什么壮举,但是,愤怒是女人表达不赞同的一种传统的社会反应方式(基德尔、贝尔和莫耶,1983)。

“真实”的犯罪率与报告的犯罪率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官方的犯罪统计。警察当局以官方形式获知的犯罪只是全部犯罪中的很少一部分。而且,虽然美国联邦调查局从全国收集数据,警察机构提供这些数据,但他们收集这些数据的方法的精确性存在着很大的出入。事实上,为了美化和粉饰警察,这些数据有时故意地用某种方式进行记录。

一个研究小组所进行的稽核显示,1980年、1981年和1982年警察部门关于四城市的报告,同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信息存在着实质性差别。例如,有一个部门将被捕的抢劫犯数据低估了12%;另一个报告中的抢劫犯罪数据比实际高估了40%。这些统计上的粗心大意甚至故意扭曲说明,对这些记录导致的联邦报告的准确性问题无人关心(《纽约时报》,1984年7月9日)。

1972年,执法援助局(The Law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开始测定美国城市的“真实犯罪率”。他们请美国人口普查局在13个大城市实施一项犯罪受害调查。调查随机抽取22 000个居民和2 000名商业人士,询问他们是否曾是犯罪的受害者。这项调查报告显示,同期内,调查出来的犯罪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官方统计的数目的两到三倍。在一座大城市,调查结果比官方统计的犯罪率要高五倍。根据最近的一个类似调查,只有44%的持械袭击,56%的强奸,32%的针对个人的偷窃和49%的人室偷盗报告给了警察(美国司法部,1987)。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犯罪没有报告?研究显示,他们不指望警察能做什么,或者,没完没了地要求他们费过多的劲,他们嫌麻烦,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犯罪。有些人,例如强奸受害人,害怕警察的麻木和骚扰。人们对亲戚朋友的犯罪,可能还是很少报,如果是陌生人犯罪,就不一样了。对犯罪,穷人比中产阶级报得要少。其他经常往返的人、旅游者和路过一个地方的人常常不报,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坚持调查到底。结果,当犯罪越严重——比方说,如果使用武器或伤害人身——受害者报告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斯科甘,1979;布思、约翰逊和肖尔丁,1977)。

性别问题

如果要找出一个与犯罪联系更密切的因素,那么很可能就是性别。在所有的文化里,女人犯罪比男人少得多,而且,一般来说,女人越轨也少。并且,正像上面所指出的,女人犯罪基本上是非暴力性的财产罪;这些人犯罪的动机大多是个人的经济目标(西蒙和兰迪斯,1991)。

最近几年,犯罪与性别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众多研究和讨论的主题。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女人的自然生理条件弱于男子,而且比男子更少攻击性(伦纳德,1982;戈夫,1985)。然而,有些社会科学家更多的是强调,男性与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同。一个类似的解释集中男女性别角色是怎样社会化的。通常,女人很少凭越轨冲动办事,这是因为她们性别角色的传统本质所决定(詹森和雷蒙,1976);这一解释还认为,男人表现出更多的越轨,其原因常常在于以侵略性和男子气为特征的男性角色(托恩东和詹姆斯,1979)。许多社会科学家指出,男性与女性在犯罪上存在非常不同的几率;同时,大多数文化对女性犯罪比男性犯罪更苛严,加以更多的污名(海德森,1987)。然而,迄今为止,支持这些不同理论的证据有限,犯罪和越轨中的性别角色问题仍是一个活跃的和激动人心的社会学研究主题。

3

美国社会的高犯罪率

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成为全美国关注的焦点。根据民意测验,40%的美国人晚上害怕呆在家里或在邻近地区转悠。此外,一份详尽的调查显示,46%的人回答说,他们都在家里备杆枪(尼米、穆勒和史密斯,1989;伍德,1990)。很清楚,人们害怕成为犯罪的受害人。

这种害怕有道理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87年的司法统计局的报告利用全国犯罪调查数据,估计了一生中成为犯罪受害的可能性(这项调查访问了所有的12岁及以上的家庭成员,要求他们根据他们的经验回答最近半年内成为犯罪对象的情况,该调查每年包括大约60 000个随机抽取的家庭)。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在所有现年15岁的美国人当中,大约有83%可能在将来的某一时间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且,事实上所有15岁的人在其一生的未来某一时刻将成为财产犯罪的受害者(科佩尔,1987)。尽管调查中有些方法上的缺陷(林奇,1989),这些数字还是惊人的和令人不安的。

在研究了犯罪的历史数据后,查尔斯·西尔伯曼(Charles Silberman, 1978)得出结论。

这些害怕建立在严酷的现实基础上: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美国处在大面积的犯罪浪潮的裹挟之下……成为诸如凶杀、强奸、抢劫和恶性袭击等主要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的机会,在1960—1976年期间翻了将近三倍;成为像入室行窃、偷钱包或偷汽车等严重财产犯罪的受害者的机会也翻了将近三倍……如果最近的增长率继续下来的话,今年,每百个美国人中至少三个人将成为一次暴力犯罪的受害人,每十个家庭中将有有一个家庭被盗。

不论我们是否同意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史诗般规模”的犯罪浪潮,但是,我们中的多数将会同意,犯罪已导致美国人生活质量的下降。在1991年,美国的犯罪数字总计达1 490万,与前一年相比,还伴随多种主要犯罪率的上升(参见图8—1)。然而,不只是美国拥有很高的犯罪率;在最近十年,每一个现代社会的犯罪率都有明显上升。但是,美国的犯

罪比其他国家不但更普遍，而且暴力程度更高。1991年，美国的凶杀率是每10万居民中有9.8个，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凶杀率要高得多。例如，它是爱尔兰共和国的16倍，爱尔兰这个国家的凶杀率最低。它还是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两倍以上。

1960年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引起这么高的犯罪率呢？社会学家强调的一个因素是二战后的高出生率（斯蒂芬斯迈耶和斯特菲尔，1991）。正如我们在最后一部分所指出的，犯罪行为主要集中于年轻群体。在1960年至1975年期间，年龄在14至25岁之间的人口增长了63%，超过其他年龄组的总和增长率的六倍。西尔伯曼（Silberman）估计，假定其他因素一样，总人口中单是年轻人口数字的增长，必定会使犯罪总量增加40%~50%。但实际上，同期的严重犯罪方面的增长更接近200%。

20世纪60年代在犯罪率方面，预期增长率是50%，而实际增长率是200%，这种差异到底应如何解释呢？社会学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些人强调毒品在最近十来年里被更广泛的使用导致了这一事实。另外有人则认为，电视描绘的“美好生活”激发了穷人的被剥夺感。然而，其他还有一些人则把原因归结为电视暴力的不断增加及种种越轨亚文化的生长。最后一种解释是认为这种差异只不过是这个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生的年轻人太多，以至于未能对他们进行恰当的社会化。

很清楚，同今天高犯罪率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毒品的广泛泛滥。在早几十年中，执法官员估计，只有约20%的严重犯罪者使用了毒品。然而，1992年夏季在大城市实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因重罪而被捕的人中检测出最近使用禁用药品呈阳性的百分比非常高，该数据的范围大致如下，费城高达80%，纽约和圣迭戈为77%，圣安东尼奥和奥马哈较低，但也有48%（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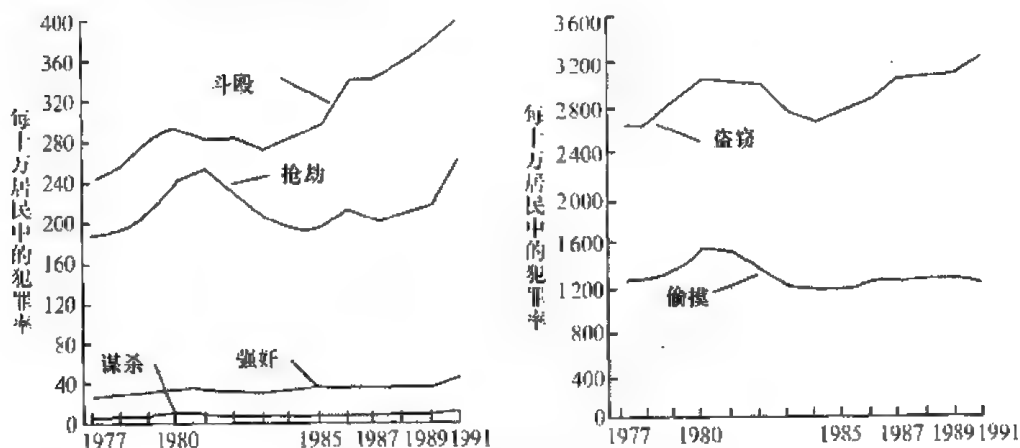


图 8—1 警察局掌握的几种有选择的犯罪的犯罪率（每 10 万人），
根据犯罪的类型，美国，1977—1991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3》（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此外，与毒品相关的暴力也急剧增加。与贩毒地盘冲突相关，大多数暴力犯罪采取了枪战形式；这些犯罪直接导源于贩卖毒品的高利润驱动，而不是由吸食毒品的化学反应本身所诱发的。然而，有些毒品，特别是 PCP，确实摧毁抑制并能够直接导致暴力犯罪。而且，使用像高纯度的可卡因这样极易成瘾的毒品，常推动吸毒者为维持吸毒获取毒资而卷入像抢劫一类的暴力犯罪。

根据家庭调查的数据（同向警察局报告的犯罪不同如图 8—1 所示），美国犯罪总量 1981 年达到了顶点，然后，进入了一个下降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显然可归于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人的年龄的增加。他们这一代那时正在走出 15~24 岁高犯罪倾向的年龄组。然而，一个转折可能即将到来。到 1990 年，这一代人的孩子们又开始进入 15~24 岁的年龄组，分析家们预测，犯罪水平将再一次上升。

4

在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是由三个不同的机构，即警察、法院和改造系统组成的连锁网络。

犯罪控制： 刑事司法系统

警察

在大多数公众的眼中，犯罪控制是警察的功能。可是直到 20 世纪，警察的主要功能还是维持秩序而不是执行法律。维持秩序，比如警察介入家庭的争吵，很少逮捕人（凯里，1978）。直到今天，警官执行刑事法律的时间不超过 20%。大多数当地警察力量的主要活动是指挥交通。

警察总是处于极大的公众压力之下，要他们“履行职责促使了一个特殊的警察亚文化的形成。社会学家注意到，这种亚文化的一个要素就是高度的怀疑感，认为人们都是不可信任的而且是危险的（曼宁，1974；韦斯特利，1970；威尔逊，1968；斯科尔尼克，1966）。这是因为警察总是面临危险的工作环境。这种怀疑感有时使他们把自己孤立于一般公民之外，并局限于自己的特殊世界中。

在警察学院受训时，新学员经历了正规的社会化过程。此外，他们必须学会控制使用武力的正式规则。使用武力是社会专门赋予他们的一项权力，然而他们在考虑什么时候使用武力，使用多少武力是合法的，社会很少帮助他们做出这一艰难的决定。他们必须适应下列三者之间的区别：合法武力（legal force），足以导致嫌疑人被逮捕；正常武力（normal force），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需要的（尽管并不总是合法的或得以高度认可的）；过度武力（excessive force）是残忍的，也是不必要的。实际上，警官们的社会化更多地是在街上完成的——一种与学院里的训练同样重要的非正式的学习过程或者说是“第二训练”（亨特，1985）。

法院

刑事司法系统的第二部分是法院。从理论上讲，法院的职责是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并决定对那些被证明有罪的人进行惩罚。检察官代表国家，辩护律师代表被告，法官调节全过程。能够支付得起钱的被告雇佣自己的辩护律

师，否则法庭就为其指定一个辩护律师。如果被告认罪，便无需再审判，法官只需决定量刑。如果被告申辩是无辜的，则还需由陪审团审判。

然而，大众把法院看作是对被告进行起诉和辩护的场所的看法是很不正确的。法院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科层制机构，大多数案件是通过协商过程得以解决的。为了处理越来越多的案件，法院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交易方式。这是个由法官同原告和被告协商，让他们认的罪比原判轻一些的过程，这样避免了陪审团审判，省了钱，也给原本紧张忙碌的司法系统松了绑。在很多法院，90%以上的重罪起诉是通过诉讼交易解决的。

诉讼交易的盛行很可能会引起公众对刑事司法系统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也表现在法院经过定罪后对罪犯进行的判决上。人们越来越觉得判决需要更强硬些。一项对11个州因重罪嫌疑被逮捕的人的研究表明，62%的人被定罪，但只有36%的人在狱中服完刑。那些被定为暴力罪的犯人中有三分之一被判决在狱中服刑一年多（《纽约时报》，1988年1月19日）。

由于技术革新或文化变迁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法律问题，法院系统并不总是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好充分准备。例如，在1981年到1985年之间46个州制定了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法律。尽管集中进行了立法活动，但是，一项有关计算机法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在县一级，起诉人的活动水平很低。为什么？在法院案例中这种新的罪没有先例。通常很难认识到如何将传统法律中的概念如偷窃罪和欺诈行为应用到计算机犯罪中（普夫尔，1987）。

近些年来法院系统也由于它们对待妇女的方式而受到责备。法院关于“一个明智的男人”在某种给定的情景下会做什么的传统观念，能完全适用于一个“明智的女人”吗？以为一个理性的女人在类似情况下也会那么做，这对吗？难道现行的法院诉讼程序对妇女没有偏见吗？例如，一些人在争论中指出，法院需要在一大群人面前提供证据，这使妇女处于劣势，因为长期封闭在家里，妇女比男人在能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更少（卡林和沃勒尔，1987）。

然而，很明显，妇女运动对法院对待妇女的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影响。作为对女权主义要求平等对待的回应，法院不再像过去那样相对宽大为怀地对待那些被指控有罪的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骑士假说”（chivalry hypothesis）看起来正在丧失其合法性。而且，强奸受到比过去更加严厉的惩罚（海尔布伦等，1986），许多审判权已采取了多种措施使妇女更易于起诉强奸犯，受到的伤害也更少。

改造系统

改造系统的建立是为了对法院已定罪的犯人施以刑罚和采取其他措施。美国改造系统的核心是监狱。美国有世界最高的人狱率，囚犯的数目从1970年的19.6万增加到1991年的78.9万（美国司法统计署）。然而，已被定罪的犯人中多数不是被判缓刑就是准许假释。在缓刑的这段时间中，罪犯不在狱中服刑，而是一直生活在社会中但受到密切监督。假释是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因而在其刑期未满足之前有条件地释放出狱。

理论上讲，改造系统应预定完成以下四项基本目标中的一项或更多：惩

罚 (retribution), 替受害者和整个社会寻求对犯罪的报复; 剥夺资格 (incapacitation), 限制罪犯的自由, 使她或他难以再犯更多的罪; 改过自新 (rehabilitation), 改造罪犯使她或他能回到守法的道路上来; 威慑 (deterrence), 通过灌输对刑罚的恐惧以努力减少犯罪活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 出现了从强调惩罚到强调改过自新的显著变化, 但是在过去的 15 年中, 公众坚持刑事司法系统应对罪犯更强硬一些, 这就从根本上减弱了监狱试图改造罪犯的愿望。

尽管人道主义者更愿意强调犯人的改过自新, 很多专家还是怀疑这一目标能否在监狱实现。对在监狱中进行改过自新计划的一项研究显示, 因为监狱环境中“冷漠”和“强硬”盛行, 让不情愿的个人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 所以没有什么改过自新能够获得成功。

甚至改变监狱的条件也不会有所帮助。当监狱被改变得更有人情味时, 研究发现, 与传统的刑罚机构相比, 并没有出现更多的改过自新者 (卡斯鲍姆、沃德和威尔纳, 1971)。如果说要让改过自新获得成功, 就似乎是在说必须更好地把改造机构整合到社区当中去。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 为了产生积极的效果, 惩罚与囚犯的社会环境同时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近年来关于改造系统的目的讨论得最广泛的一个话题是威慑力; 它也是多项研究的主题。威慑力基于这样 (并不完全现实) 的思想, 即人都是有理性的人, 且当人犯某种特定的罪时能够对收益和风险进行估算。如果威慑力发挥作用, 当惩罚的风险很高时, 犯罪率应该很低。

惩罚随确定性 (监禁的可能性)、严厉性 (刑期的长短) 和迅捷性的不同而变化。这三维变量中的每一项都在惩罚中发挥着作用。一些证据表明, 通过严惩, 特别是通过精确量刑, 可减少犯罪 (吉布斯, 1975; 齐默林和霍金斯, 1973)。然而, 其他研究则对此提出了异议 (米诺和哈利, 1982; 萨尔茨曼等, 1982) 公平地说, 在当前, 还得出关于威慑力的确切结论。

改过自新和威慑力的效果还不够清楚, 这一点实际上支持了防止犯罪的长远计划, 而大多数社会学家早就赞成这一计划。虽然做起来复杂、要花费代价并且在政治上困难重重, 然而, 在长期内解决犯罪问题的惟一方法, 只能是推行一项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 以缓解诱致犯罪的因素, 诸如贫困、歧视、失业、残破家庭以及缺乏住房等等。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社会越轨是违反群体或社会的重要社会规范的行为。越轨概念不同于统计异常, 而且, 该定义依越轨行为的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2. 越轨行为未必是坏的或不可接受的。反常的越轨者与不遵从者不同。前者接受社会规范的有效性但为个人目的去破坏它。后者则相信打破的是坏的并必须改变的规则。同样, 当被破坏的规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成员的

感觉和需要时,越轨可能得到社会的赞同。患精神病的、有障碍的或生理上有病的人,可能破坏了规则而不必为他们的行动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们不能够遵从。但是那些虽然能够遵从却未能遵从的人,通常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越轨行为未必是犯罪行为,反之亦然。越轨是一个文化的一般概念。一个越轨行为可能是由一个人单独所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所为,例如一个公司或政府机构。

3. 为使人们愿意遵从社会规范,每个社会必须限制他们的行为。这就是说要有社会控制机制。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是内在控制。内化是指将群体或社会规范作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加以接受。社会控制的另一种类型由通过应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裁迫使人们遵从的外在压力组成。初级群体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实施非正式的社会制裁。特定的组织和机构是正式社会制裁。

4. 越轨也有正功能,它有助于澄清和界定社会规范,增进群体团结,刺激所需的变化,并使人们更愿意遵从。

5. 持续的或广泛传播的越轨能产生功能失调,它可能弱化了人们遵从的动机,使生活不可预测并充满危险。大量的越轨者能导致社会解组,即社会设置的崩溃。

6. 关于越轨行为的解释有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虽然生物学因素已被研究过,但没有一个因素可以确定为越轨的主要原因。研究越轨的心理学方法集中于个体的人格。有些人试图想找出与越轨相关的人格类型。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强调行为模式的社会习得的重要性。一个流行的心理学解释是挫折—攻击假设,认为越轨暴力是由挫折产生的一种攻击行为。

7. 社会学解释强调文化和社会环境如何造成越轨。默顿的结构性紧张理论基于迪尔凯姆的失范概念。失范是指一种规范、价值相互冲突、脆弱或者阙如的社会状态。罗伯特·默顿的结构性紧张理论指出,越轨很可能是由于目标与手段之间的某种紧张引起的,即由于文化描述的目标和社会赞同的达到或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之间的紧张引起的。文化传递理论指出,如同遵从一样,越轨是习得的行为。越轨是以文化传递的和通过社会化学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机构本为矫正越轨而设计,但实际上在教授越轨行为。萨瑟兰的差异性联合理论坚持认为,尽管一个人的社会化是通过不同的群体来完成的,但是他们只接受那些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人和群体的规范。社会控制理论的解释是,越轨是对越轨者的冲动和诱惑未能加以充分的内在控制或外在控制的后果。

8. 冲突论者对默顿的功能主义的假设——社会的所有成员共享一套单一的价值观——提出了挑战。两种基本的冲突理论学派分别是,重视对抗的亚文化的文化冲突学说;强调社会阶级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这两个学派都同意,社会中最强大的群体能把弱势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定义为越轨,而且,多数越轨源于冲突和不平等。两派理论家也都相信,法律不是为保护社会的全体成员而制定的,而且也无须反映全社会的道德观。

9. 标签理论集中讨论变成越轨者的过程。在偶犯一两次越轨行为的人和开始越轨生涯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越轨生涯指的是接受越轨亚文化

中的越轨认同和生活方式。一个职业越轨者的形成典型地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某人犯规一次并被其他重要的人看到。第二，这个人被标签为越轨者。有时这一称号成为其主要身份。一个污名——社会耻辱的标志——也可能暂时贴在越轨者身上。第三，这种人加入和认同，由其他越轨者组成的群体，以获得感情的和社会的支持。典型的是，这些群体基于同大社会打交道的共同经验而拥有一整套非常发达的亚文化。

10. 犯罪是被当局禁止并能通过运用正式制裁加以惩罚的行为。犯罪的主要类型有针对人的犯罪、针对财产的犯罪和无受害人的犯罪。大多数注意力都集中于有组织的犯罪，这种犯罪严重卷入毒品交易。虽然相对地不受大众舆论的关注，但白领犯罪比其他犯罪更为常见且涉及的金钱数额更大。目前，关于无受害人犯罪是否应该非罪行化的（decriminalized），或合法化问题存在激烈的争论。在下列人群中犯罪率偏于更高：小于24岁、男性、黑人以及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性别和犯罪之间的联系成为一个研究和讨论的重要焦点。在总人口中进行的社会调查揭示的犯罪率比警方报告的犯罪率要高。在20世纪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美国在犯罪率方面经历了特别迅速的上升，至少，其部分原因是年轻人口规模的上升。但是，在80年代早期，犯罪率和青年人的人口两者都趋于下降。有些分析家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暴力犯罪率将再次上升。

11. 刑事司法系统由三部分组成：警察、法院和改造系统。警察在维护公共秩序如控制交通方面比忙于调查犯罪方面所花的精力要大得多。法院的功能是对被指控犯罪的人进行起诉，确定他们有罪或无罪，并确定恰当的惩罚。然而，因为该系统超负荷运转并且因为审判过程漫长，诉讼交易——即避免陪审审判过程——变得更加普遍。改造系统包括监禁、缓刑和假释，它服务于以下四个目的之一或全部：惩罚、剥夺资格、改过自新和威慑。作为威慑力，惩罚的效果受到它的准确性、严厉性和迅捷性的影响。

推荐阅读书目

1. 埃里克·古德（Goode, Erich.），1990.《越轨行为》（*Deviant havior*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关于当今美国社会发现的最常见的越轨形式的最新展望。

2. 米歇尔·R·戈特弗雷德森（Gottfredson, Michael R.）和特拉维斯·伊尔希（Travis Hirschi.），1990.《犯罪通论》（*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将犯罪主要归因于由穷人抚养孩子实践引起的自控缺乏的，一种有争议的理论。

3. 霍威茨（Horwitz, Allan V.），1990.《社会控制的逻辑》（*The Logic of Social Control*. New York: Plenum Press.）对社会控制的许多类型进行了杰出的广泛分析，强调现代社会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的衰微。

4. 詹姆斯·A·英卡德 (Inciarde, James A.), 1992. 《对第二代毒品的战争》(*The War on Drugs II*, Mountain View, Calif.: Mayfield.) 对美国为扑灭滥用毒品所作的努力进行了引人入胜的历史和现实的分析。

5. 詹考斯基 (Jankowski, Martin Sanchez.), 1991. 《街市岛屿: 帮派和美国城市社会》(*Islands in the Street: Gangs and American Urban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一项以民族志的研究探索帮派组织、他们的招募程序和群体暴力成因的研究。

6. 理查德·昆尼 (Quinney, Richard.), 1980. 《阶级、国家和犯罪》(*Class, State and Crime*, New York: Longman.) 关于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冲突论视角, 特别联系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7. 托马斯 (Scheff, Thomas.), 1984. 《精神病: 一种社会学理论》(*Being Mental Ill: A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Hawthorne.) 将精神病作为越轨类型的一种开创性研究。

8. 腾内尔 (Tunnell, Kenneth D.), 1992. 《选择犯罪》(*Choosing Crime*, Chicago: Nelson-Hall.) 反映了关于运用理性选择视角分析财产罪犯行为的刑事学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9. 萨缪尔·沃克 (Walker, Samuel.), 1994. 《有意义还是胡来: 针对毒品与犯罪的一个政策指导》(*Sense and Nonsense About Crime and Drugs: A Policy Guide*, 3rd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对哪一种减少犯罪的计划能否有影响, 所进行的头脑冷静的非意识形态的一般分析。

10. 詹姆斯·Q. 威尔逊 (Wilson, James Q.) 和理查德 J. 赫恩斯坦 (Richard J. Herrnstein.), 1986. 《犯罪与人性》(*Crime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对许多学科中的犯罪研究的重要评论。有一种不重视社会学理论的倾向。



第三部分

社会 不平等



第九章

社会分层

1912年4月15日清晨，世界上最大的客轮在其首航冰山林立的北大西洋途中沉没。这艘巨轮大约在三个小时内才完全沉没。不幸的是，救生船不够。人们后来非常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很多人遇难，但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注意遵守“优先救助妇女儿童”的社会规范。也许这一说法是必要的，英国公众和政府面对这一巨大灾难，也可以找到一些安慰。妇女和儿童确实更有可能幸免于泰坦尼克号沉没之灾，乘客中69%的妇女和儿童活了下来，而男乘客只有17%得以生还。

然而，就像在其他许多事件中一样，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在这个案例中事情并不完全如此。一个社会学分析表明，轮船的头等舱主要由有钱人住着，二等舱乘客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职员和商人，三等舱（以及更低等）主要是由去美国的贫穷移民乘坐。如果泰坦尼克号上乘客生还率按照性别和社会阶级计算比较的话，我们发现三等舱中的乘客只有26%生还，与此相应的是，二等舱中乘客生还率是44%，头等舱是60%。头等舱中的男乘客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要稍高一点。因此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也许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

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故事只是说明社会阶级之重要性的一个例子。在所有社会中，生活中所欲求的东西是不平等地分配的。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欲望之物的不平等分配、对这种不平等分配的解释以及这种不平等性是怎样既反映了社会结构同时又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缩小

范围更具体地集中讨论美国的贫富问题。

有价值物的分配

在所有社会中，人们一生下来就面对着不平等——即缺少平等的途径以得到社会所提供的满足欲望的物品。文化不同对有价值物的认识也不一样，它可能是物质的（牲畜、黄金、新鲜食物、世界锦标赛的门票），或者是非物质有价值之物（声望、尊重或名誉）。无论人们希望得到的物品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一物品是稀缺的，其需求大于供给。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大量的黄金或者声名远扬，但有些人一生中得到好东西的机会比另一些人多得多。

这些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是谁呢？在动物界，很明显是体格强壮的得到奖赏。在小鸡群中有禽鸟等级；捕猎的狼群和狮群是按照等级组织起来的；在许多灵长类动物中都存在层阶性统治秩序，特别是某些猴科动物。每一种情况中，头领都是使用自己的力量迫使其他成员服从并与之合作的。

相比之下，人类的不平等远不止是以纯粹的体力为基础。在最简单的人类社会中，个人的品质可能独立解释大部分社会不平等。比如，一群猎人中的头领的地位通常是通过他的勇敢、年龄和个人力量赢得的。但是在比较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个人特征和诸如种族、父母的财富等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着一个人的特权。

在比较复杂的社会中，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像城市中高层建筑公寓的等级一样，在这里有价值的物品包括阳光、远离喧哗嘈杂以及风景视线。最好的公寓位于上层，那里阳光充足，噪音和污染很少，视野开阔。往下，空气就没有那么干净，房间里直射阳光较少，视野受阻，房租也下降，为不太富有的人所居住。公寓的每一层可以看作是一个特权的独立层面或阶层。在我们去大楼维修工人居住的地下室之前，我们曾到过与之相对的大楼顶层公寓，那里有户外花园和游泳池，光线充足，视野未受到任何遮挡。

就像社会成员一样，在这样的建筑里，居民是按照社会分层体系安置排列的。所谓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在一项有影响的、至今仍然是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基础的研究中，马克斯·韦伯（1919，1946）确定了社会分层的三个关键维度。用作过某些修正的韦伯术语来说，我们通常称这些维度为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

这些方面有时叫社会“报酬”，不过“报酬”一词会引起误解，它暗含着得到报酬的人是因为他们有贡献。可是，皇家的子弟一生下来就有了财富和声望，一旦长大到足可以行使权力，他们也就得到了权力。这样，社会有价值物常常是给了那些由于偶然因素而处于较好社会位置的人，而不只是给

那些以自己优点而获得较好地位的人。

1

收入与财富

财富是由个人或群体的全部经济财产所构成，它不仅包括货币而且包括物品、土地、自然资源以及生产性劳动服务。说一些作为财富的物品有价值，可能是由于生产它们时消耗了熟练劳动的时间，或者因为它们是美的，或者因为它们会给今后的经济带来回报。例如，金刚石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既稀缺又美丽。一封由乔治·华盛顿签名的信有价值，是因为它既具有稀缺性又具有历史的、爱国主义的及情感上的感染力。土地有价值，因为它能够生产庄稼或矿物质等经济财产。

与财富密切相连的是收入，即使用人力或物质资源所得到的经济收益。财富与收入这一对概念不应该混淆。财富指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收入通常指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正常情况下的货币获得量。当我们说一个人有 300 万美元时，我们是在对他的财富进行评估，这些财富包括他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他的房屋、汽车、投资、银行账户以及口袋里的现金。当我们说这个人一年挣 35 万美元时，我们就是对他的收入进行描述。

收入通常用来表达一个单位时间内的货币流动量。可是并不是所有收入都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的。比如说，家庭成员在家里做修理、做家务，他们的行为不会产生货币收益。不过他们确实增加了家里的实际价值。他们获得了“非货币化的收入”：如果家庭成员不亲自做这些工作，他们就得花钱请别人做。

尽管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拥有财富和收入，但是总是有一些人比其他入获得的多。国家间经济收益的分布也不平衡。在土耳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生活在该国的人口数均分的该国经济总量——1990 年是 1 360 美元，同年美国是 21 100 美元，高出土耳其 15 倍。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180 美元（人口资料局，1991）。一个国家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是以其自然资源、经济力量以及用于从别国获取资源的能力类型（例如，军事能力）为基础的。

美国收入不平等分配的模式依居住地、教育、性别、职业以及其他一些变量而定。例如，1990 年康涅狄格州的居民人均收入 25 358 美元，这差不多相当于密西西比州 12 735 美元收入的两倍。从收入分配的民族和种族类型来看，1990 年美国白人家庭的中等收入是 36 915 美元，拉美入家庭为 23 431 美元，美国黑人家庭为 21 423 美元（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这些收入差别的意义甚至比它们表面看到的要大得多，因为非白人家庭的平均人口规模要比白人家庭大。因此，非白人家庭的较低收入必须设法维持更多人口的需要。

另一些重要数据则揭示了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20% 最富有的美国家庭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46.7%，而最穷的 20% 家庭只占 3.8%（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表 9—1 说明了 10 个国家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与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全部收入的百分比。

表 9—1 1989 年各国（地区）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所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危地马拉	香港	匈牙利	以色列	象牙海岸	菲律宾	波兰	斯里兰卡	美国 (1991 年)	乌拉圭
最低 1/5	6%	5%	11%	6%	5%	6%	10%	5%	3.8%	6%
最高 1/5	55%	47%	32%	40%	53%	48%	35%	56%	46.7%	4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美国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要比收入大得多。1990 年，1%的最高收入者大约获得全部收入的 13%，而 1%的最富者占有全部财富的 31%。实际上，最近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占人口总量 1%的上层人口的净财富超过占总人口 90%的下层人口的净财富（吉尔伯特和卡尔，1992）！

在美国经济中，最穷的人通常是那些最没有生产能力的人。他们可能是由于年龄太大或者太小而无法工作，可能是由于受教育不足而无法找到高薪工作，可能是在找工作或晋升时受到歧视，或者可能是由于不得不呆在家里照看孩子。无论何种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根据经济市场上的衡量标准，家庭收入的多少与整个家庭的产出量密切相关。

美国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模式可能看起来很自然，但这决不是很普遍的。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经济大多数时候都在扩张，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财富是一个人所挣来的东西。然而，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经济中，财富量是相对固定的，财富更可能是人们继承的，而不是人们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按劳分配。例如，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大家庭可能得到特殊的津贴，帮助它解决额外的支出。像老人和病人那样由于不是本身的错误而不能工作的人也得到国家的帮助。

2

社会学家用“权力”一词来指称个人或者群体控制或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而不管别人是否愿意合作。社会学家研究权力不但是为了揭示谁行使它，而且是为了弄清为什么要行使它以及谁从中受益。

权 力

在三个欲求之物（财富与收入、权力以及声望）中，权力是最难衡量的。大多数对权力的研究充其量不过是对权力事实的一种推测。很多种形式的权力潜藏得非常深，以致只有权力拥有者本人才深知其中奥妙。因为难以测量，又因为它与意识形态（一套联系并有助于维持各种政治、社会与阶级利益的文化信仰）联系如此紧密，因此权力的问题（谁掌握权力、权力又怎样运用）在社会学中争论很大。有些社会科学家坚持认为美国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具有共同背景、并且能一起行动的人手中（多姆霍夫，1983；戴伊，

1990)。例如，C·怀特·米尔斯（1956）说美国是由“权力精英”统治的，这一群体的总数不超过 300 人。另外一些社会学家表示强烈反对，认为美国的权力分散在许多群体和许多人手中（罗斯，1967；里斯曼，1961）。

社会学家倒是认为真实的权力并不总是存在于我们想当然的地方。举例说，有些城市的市长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决策实际是由许多幕后的工商业领袖作出来的。有一些决策是在权力较底层作出的，工作由这些基层来完成。警官忠于职守与教师课堂教学常常是这样的情况（对美国权力分配，第十七章将作进一步讨论）。

很明显，权力有可能不随财富而存在：并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有权力，同时也并不是所有的有权者都富有，不过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财富有时能够买到权力。例如，在国家政治中，当政的候选人通常很富有。肯尼迪兄弟、洛克菲勒的三任总裁以及罗斯福家族只是富人获取政治权力的几个代表。然而，权力通常又有助于获取财富。有多少法律制定者或将军在退休时还穷困潦倒呢？

3

声 望

社会分层的第三个方面是声望：一个人从别人那里所获得的良好评价与社会承认。声望以多种形式出现：公众的接受与名誉、尊重与钦佩、荣誉与敬意。声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特别善良、慷慨、勇敢、有创造性或者聪明的人通常得到声望的回报。金钱可以买到声望，权力可以控制它，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例如，当老约翰·D·洛克菲勒刚开始在石油上发大财的时候，公众对他嗤之以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运用巨额财富兴建博物馆、公园、基金会，投资慈善事业，不仅为自己也为他的继承人赢得了声望。

有时这一过程正好相反。一个人可能开始赢得了声望，然后把它转化为财富。小说家兼记者的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开始以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裸人与死人》而赢得小说家的声望。自从这部小说出版以来，梅勒出版了许多部畅销书。

然而，多数情况下声望来自于占有一个公认的好职位。例如，美国社会在医疗、科学以及法律等领域工作的人通常有较好的声望。在电视广播、体育以及电影等大众传媒的领域中取得成功，也能够获得较高的声望。

社会地位与地位等级

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地位是指在一个群体或社会中所界定的社会位置。这种社会地位的用法在第四章已经讨论过。然而就其与分层的关系而言，社会地位一词则具有更具体的含义：在一个社会等级体系或分层系统中的等级位置。社会学家通常用社会地位的这种用法来指称社会经济地

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或者简称 SES)。SES 是一种对社会地位的度量方法,它考虑到个人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职业声望等内容。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人有机会从社会中获得大体等量的需求物品。

1

辨认社会地位

因为个人的大部分生活是以社会等级为基础的,所以识别另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通常十分重要。然而,在现代城市中辨认地位可能很困难。我们通常并不认识多少我们所碰到的人,但必须很快对他们作出判断。如果我们要对一个人的地位作出正确的判断,必须依据两个东西:首先必须有公认的用于划分地位等级的等级序列,同时必须有一些可广泛理解的符号,以便让我们评估一个陌生人的地位水平。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以及别人对他的行为方式就能够准确地判定他的社会地位。人们对这个人表示非常尊重并且以礼待之?或者待他(她)不拘礼节?人们如何评价这个人,跟他说些什么?他或她是如何反应的?

我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寻找社会学家所说的地位符号。地位符号可能是随便什么东西:一件明显便宜或昂贵的物品、衣服的样式、说话的方式,它向别人表明其主人特定地位的水平。

当然,地位较低的人不会有意表现他们低等级的符号。不过,地位较高的人倒是努力展现他们的地位,保护他们的地位不被低估。事实上,人们的地位等级越往上,他们越喜欢有意表现更多的地位符号。

以男士服装为例。一件蓝色工作服和一件礼服衬衫加上领带、夹克衫的符号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这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子可能是从事某种体力劳动的,而打着领带穿着夹克衫的人可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而这一工作给他带来较高的声望和较为丰厚的薪水。许多人还有可能更细致地认出各种服装的区别。一件便宜的批量生产的化纤服装与一件从高档男士商店购买的昂贵的羊毛服装的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在上层地位层级内还存在着更为细微的差别不为外人所注意。这些差别,比如说在从高档男士商店购买的一件服装与一件定做的服装之间的差别,对于地位较高的群体成员来说通常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还有许多东西可用作地位符号。一栋房子、一个邻居、一块地毯、一个用词、一种狗、一辆汽车、墙上的一幅画,所有这些东西对于那些知道如何解读它们的人来说,都是社会地位的潜在的象征符号。而我们至少都善于解读我们自己地位等级的符号,尽管我们做这件事时可能是无意识的。

当人们炫耀性地表现地位符号来显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时,他们是在进行炫耀性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凡伯伦, 1899, 1967) 拥有昂贵的非生产性东西,比如精心修整的草坪和皮毛大衣,就是这样的例子。刚刚获得巨大财富的人有时试图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表明他们新的地位。这些新富者,被称做“暴发户”,购买昂贵的东西,例如马球运动的小马以及快艇,这些东西象征着非常富有者的生活方式。

然而，地位符号也可能产生误导。有些地位符号可能会被并不属于这个阶层的人欺骗性地利用。为了给人以较高经济地位的印象，家庭可能购买他们几乎买不起的家具或者汽车。大公司的行政主管们有时以比他们地位水平更高的人的方式去花钱做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让老板们认识到他们应该得到提拔了。如果他们真的被提拔了，他们就期望随新工作而来的高薪补偿这些成本。

C·怀特·米尔斯（1956）曾经说过，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中“地位恐慌”广为流行，部分原因是诸如小汽车与漂亮衣服之类的地位象征往下传到了劳动阶级那里。他认为，中产阶级非常重视选择居住地、追求享受，目的是获得更可以排斥他人的地位符号。

由于大多数地位符号可以由这一地位等级之外的人表现出来，所以最有用的是那些最难假冒的符号。因此，高层地位的符号通常是昂贵的，而且不断变换。例如，下层阶级不可能有钱跟得上高档服装样式的变化。许多地位符号都有流行一时的一面——今年高层地位的人养约克郡的狗，明年他们又玩起了舢板船。这样的符号尤其管用，因为对于外人来说注意到它的变化需要时间。

2

社会地位的 等级评定

许多给定地位的例子都与职业相关，这主要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职业是一个人占据的最重要社会位置（布劳和邓肯，1967年）。收入与声望水平都受到职业的严重影响，然而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像最初看起来那样紧密。表9—2显示了按声望排列的职业等级。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到收入最高的工作可能声望最高，而那些报酬最低的工作声望一般最低。不过并不总是这样。美国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地位很高，一年挣10万多美元。可是，在像纽约或洛杉矶等大城市中大公司的董事、或者有成就的医生或律师，比法官挣的还要多。法官具有很高声望，是因为这个位置的权力以及获得这一位置所要求的教育年限与经验。这个位置的筛选也非常严格：只有九名美国高等法院法官。

各种职业的声望等级相当稳定。一项研究发现自从1925年以来这些等级出现的变化很小（霍奇、西耶热格和罗西，1964；占皮和乔伊德，1984）。另一项分别于1947年和1963年进行的职业声望等级的比较研究，结果几乎是完全相关（相关系数为0.99）。不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声望稍有上升，而诸如教育之类具有“文化取向”的职业声望略有下降。

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的不同社会 and 不同地区，职业声望的等级也非常相似。在对两个不同地区的六个规模不等的社区的研究发现，声望等级以及分层体系的其他方面在各地几近相同。这一点似乎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模式（柯蒂斯和杰克逊，1977）。另一项比较研究也发现，对包括美国在内的60个国家的地位等级高度相关（ $r=0.83$ ）（特雷曼，1977）。在此之前仅仅针对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研究所得到的相关度更高（英格尔斯和罗西，1956年）。



你得等多长时间？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大多数人可能要花费大量时间来等待获取物品和服务。当社会学家研究等待的时候，得出的结果大致相近：你的等待时间或别人等你的时间取决于你的财富、权力和声望。

假如你不愿意等待，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有能力到别处去。然而，在供应商垄断所涉及的商品和服务而顾客不能随便到别处去的情况下，等待时间通常就会很长。申请医疗补助的人可能得在门诊所里等上一整天；而那些能支付起私人医疗服务费用的人可能得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等待，不过不需要等那么长时间，因为他们常常可以换医生。

对于不想等待而又比较有权力的人，另一个可用的办法是，通过代理机构或者个人合同方式获得像体育或戏剧门票之类的物品或服务。下层阶级可能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安慰：办理许可证、执照、护照之类的东西必须本人亲自等候，有时候人可能很多，富人和穷人都同样地感到不方便。

另一个可能有价值的等待是你的“开庭日”，这一天许多人在法庭走廊里空等。法院长时间等待是“日程过满”的结果，因为法官的时间被认为比我们其余人的时间更宝贵，他们接到的案子审不过来。律师、警察、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人在这种安排下无一例外地长时间等候，但是与此相反的是原告、被告以及证人，他们至少因等待时间而得到报酬。

假如让别人等你的想法对你有吸引力的话，那么你的目标就不是当雇员而是当老板。要让别人等你，而不是你等待别人，保证接近你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和“约会”。相形之下，你可以随时接近雇员。作为老板，你也甚至可以在和雇员约会的时候让他们等候，你可以中断你们的会面去处理其他事务，这是一个表明他们并不重要到足以“占用你时间”的肯定信号。如果你真想体验你与你的雇员之间的巨大社会差距的话，当下属进你房间的时候，你可以开始你自己中断的工作或者继续工作，漫不经心地说：“请稍等，我马上就完。”

资料来源：施瓦茨（Barry Schwartz）：《排队与等候：接近与延误的社会组织研究》（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表 9—2 声望等级分布

职业	声望	职业	声望	职业	声望
内科医生	82	葬礼主管	52	钟表修理工	37
大学教授	78	计算机专家	51	瓦匠	36
法官	76	证券经纪人	51	航空小姐	36
律师	76	记者	51	飞机副驾驶员	36
物理学家	74	办公室主管	50	技工	35
牙科医生	74	银行出纳	50	面包师	34
银行家	72	电工	49	修鞋匠	33
航空工程师	71	机工	48	推土机手	33
建筑师	71	警官	48	公共汽车驾驶员	32
心理学家	71	保险代理人	47	卡车驾驶员	32

续前表

职业	声望	职业	声望	职业	声望
飞行员	70	音乐师	46	出纳员	31
化学家	69	秘书	46	售货员	29
部长	69	工头	45	切肉工	28
民用工程师	68	房地产代理人	44	管家	25
生物学家	68	消防队员	44	码头工人	24
地质学家	67	邮局职员	43	加油站工人	22
社会学家	66	广告代理人	42	出租车司机	22
政治科学家	66	邮寄员	42	电梯工	21
数学家	65	列车员	41	酒吧间侍者	20
中学教师	63	打字员	41	侍者	20
护士	62	管道工	41	农场工人	18
药剂师	61	农场主	41	佣人/服务员	18
兽医	60	电话接线员	40	垃圾清运工	17
小学教师	60	木工	40	看门人	17
会计	57	焊工	40	擦鞋的	9
图书管理员	55	舞蹈演员	38		
统计员	55	理发师	38		
社会工作者	52	宝石匠	37		

注：这张表说明美国公众划分各种职业等级的方法。研究表明这些声望等级是相当固定的。

资料来源：詹姆斯·A·戴维斯和汤姆·W·史密斯（James A. Davis and Tom W. Smith）：《社会大众调查总汇，1972—1982》（General Social Survey Cumulative, Ann Arbor, Mich: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1983）。

在美国和其他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别。例如，在前苏联，工人的职业声望（和收入）一般比美国高。事实上，前苏联人一直对普通白领工作的职业评价很低，仅高于不熟练的体力劳动者，但比熟练的体力劳动者低（莱恩，1987）。这种对熟练的体力劳动职业的偏好在今俄罗斯继续广泛存在。然而，这种现象逐渐受到挑战，因为随着近来市场经济的启动，陈旧过时的产业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新兴企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得到鼓励（霍恩，1991）。

但是职业和收入并不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等级的惟一因素。在美国，许多人的地位等级部分取决于肤色（休斯和赫特尔，1990）。实际上，跨文化研究已经揭示浅色皮肤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例如，在日本，报纸上的征婚广告经常把皮肤亮丽看作是未来配偶的理想品质。日本妇女在找对象时经常搽美容粉、打阳伞、用面巾，目的是使她们显得更白净（弗罗斯特，1986）。宗教也是分等级的（在美国，新教教徒的地位比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要高；在新教徒中，美国新教圣公会教徒的地位最高），这和教育是一样的（获得研究生学位的人地位最高，从未上过学的人地位最低）。

在大多数文化中，传统上男子的等级地位比妇女高。另外，结婚的人一般比那些单身或者离异者的地位高。最后，仍然存在着基于种族的等级：原

央格鲁—萨克逊居民的后裔地位最高，而那些外国出生的非欧洲血统的人地位最低。

3

地位不一致

尽管每一个个体占据许多等级化的社会地位，但是这些地位之间一般明显存在着地位一致 (status consistency)。也就是说，在某一个领域地位高的人常常在其他等级序列中地位也高。比如说，一个职业地位高的人通常收入也高。另外，一个人在教育、种族以及肤色等方面地位较高往往有助于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各种地位水平不可能完全相等，不过在一个地位等级中处于特定位置的人，在其他主要地位等级中一般会处于相同的位置。研究表明，一般社会地位差不多处于中间等级的人，与处于上层与下层地位的人相比，地位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要差 (吉尔伯特和卡尔，1987)。

然而，地位不一致并非不正常，尤其在美国更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在一个领域地位较高，而在另一个方面却较低。例如，当一个人的教育和个人技能有助于他超越种族背景或者归属而获得较高地位的工作时，地位不一致就产生了。一个美国黑人物理学家就是一个地位不一致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高等法院的桑德拉·代·欧柯纳 (Sandra Day O'Connor) 法官。尽管她的性别地位一般来说比较低，但是从职业上来看她的地位是很高的。

有一些地位不一致表现在高声望低收入的工作中，比如部长工作。例如，尽管部长拥有很高的职业声望，但是他们挣的钱要少于层次较低的民用工程师和会计 (参见表 9—2)。普通部长没有钱能够像高级职业地位的人那样生活。

地位不一致的人一般都把最高地位的方面说成是他们的“全部”地位。例如，来自外国的皇室成员往往希望那些甚至不是其臣民的人以皇室成员对待他们，但是别人可能只会把他们仅当作“外国人”或者非公民看待。

历史上的分层制度

分层制度随着历史时期与经济结构的不同而变化。社会学家认为最重要的分层类型是奴隶制、种姓制度、等级制以及阶级制度。每一种类型都带有主要社会群体间不同经济关系的特点。

1

奴隶制

自由或解放是一种价值很高的非物质形态的理想物。奴隶制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分层体系，其中某一社会群体绝无自由。包括南北战争以前的南方在内的许多社会都发现，从别国强行进口奴隶有利可图。

奴隶制的本质特征是一种经济关系：一些人占有另一些人，因为奴隶被占有，所以他们为其主人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另外，奴隶本身就是一种可

以在市场上买卖获利的商品（柯林斯，1990）。

奴隶制最适合于生产方式相当原始并且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经济形态。战前的南方是一个较好例证，它的经济特点是围绕庄园或大农场的农业经济，主要作物是棉花，这种作物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种植、培育、收获、加工以及运输。

所有的分层制度都为意识形态所支持，捍卫上层地位利益的意识形态都证明着该种分层制度是正当的。而这些意识形态又多多少少使下层成员相信他们的不平等待遇是正当的、合适的。没有这种意识形态，要从为财富和收入、权力以及声望奋斗的失败者中得到服从并且保持有序，将会很困难或者不可能。以美国奴隶制为例，美国黑人与那些使他们做奴隶的人有很大不同，尤其在尊重对方的文化与体貌方面。这就方便了这样一种思想的传播：那些成为奴隶的人在生物上和文化上低人一等，甚至可能是低于人类的。

奴隶制度是美国最初的200年历史中最显著的分层特征。然而，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这种分层制度需要大量的镇压性社会控制机制。奴隶往往通过造反或者逃跑来反抗他们的处境。这说明，证明奴隶制度合理的意识形态在为奴隶主广泛接受的同时，也不断地遭到奴隶本身的抵制。尽管奴隶制度125年前就被废除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以种族主义和歧视美国黑人的形式在当今美国继续存在。

2

种姓制

种族制度作为一种不平等的分层体系，其地位由出生所决定，人们一般不能改变他们的社会位置。在种姓制度中，要想与另一个等级的人结婚通常也是非常困难的。

历史上最有名的种姓制度在传统的印度，那里虽然只有四个主要种姓（varnas），但是还有一千多个亚类（Jati）。每一个亚类都有自己的传统职业、居住地以及与其他种姓交往的规则。印度人早在儿童时期就学会辨认各个种姓成员的地位象征。最高种姓是牧师（婆罗门）和武士（刹帝利）种姓。然而，很多人并不属于任何种姓，这些人叫“不可接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地位最卑贱的，其他种姓成员禁止与他们进行某种接触。

印度种姓制度得到以印度教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印度教的一个重要信条是相信“轮回”。人死后，将重生为世上的另一个生命。生为不可接触者被认为是前世表现不好的结果。印度教鼓励那些不可接触者顺从地接受他们的下等社会地位（图明，1985）。

自从第二世界大战以后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以来，印度种姓制度有了很大变化。例如，印度宪法禁止歧视不可接触者。然而，印度种姓制度大约有4000年的历史，变化一直比较缓慢。

有些学者认为美国的非裔美国人的处境具有很多类似种姓的特征。一位研究印度的人类学专家（贝尔曼，1960）发现这样一些细节：“考虑到文化内容上的差别，印度的种姓和美国的种族关系……（是）惊人的相似。”

分层的等级制度与一种叫做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中世纪欧洲的农业社会就是以这样的分层体系为特征的。

支持欧洲等级制的意识形态授予第一等级成员（牧师）和第二等级成员（贵族）以特权，而包括农民在内的普通人属于第三等级，他们的权利与第一、二等级的特权相对照。这种意识形态得到了天主教会和国家法律的认可。

封建制度中的统治由贵族维持。在封建庄园中，农民和地主通过依附关系联系在一起：农民或农奴提供劳动和军事服务，作为回报得到贵族的保护和物质支持。

在封建主义晚期，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商人。商人，这个封建制度中第一个财富不依赖于继承土地所有权的群体，促进了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一重要社会经济变化将在第十八章讨论）。实际上，这些商人是第一批资本家。随着工业经济制度的发展，社会阶级成为了社会分层的主要形式。

社会阶级

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分层类型是阶级制度，这是一个主要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相对开放的分层形式。阶级制度的特点是其群体界线没有奴隶制度、种姓制度以及等级制那么严格。在阶级制度中，群体之间有大量的流动，个人成就（与先赋相对）在确定其等级位置中起较大作用。然而，即使一个阶级制度允许程度相当高的社会流动，但它也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层级次序。因此，阶级制度仍然包含广泛的群体不平等。

支持现代阶级制度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世俗的。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认为精英人物的特权是正当合理的，因为沿着阶级阶梯，大量向上或向下的社会流动是可能的，所以那些成功者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功绩而向上流动。这使人们确信不仅个人的决心和努力最终会得到财富和较高地位（罗西德斯，1990；法洛斯，1988），而且还意味着穷人的贫困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如果他们自己更勤奋一点，就不会受穷。所以，阶级制度被认为是非常公正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都无须感谢任何人或者责怪任何人，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些社会学家不同意关于社会阶级制度本质的看法。主要争论是围绕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而展开的。马克思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来界定阶级，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是财富的源泉。上层阶级（资产阶级）拥有并控制着生产资料，剥削下层阶级（无产阶级）的劳动。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这种阶级冲突，或者对抗阶级

之间的斗争,采取像罢工和革命之类事件的形式(马克思的阶级观将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更详细地讨论)。

与此相反,韦伯认为,分层体系中除了经济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分层维度:权力与声望。马克思认为权力和声望最终来源于财富,而韦伯认为它们与经济是相对独立的。韦伯还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冲突的,甚至有可能发展为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

社会阶级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是模糊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实。在美国社会学里,社会阶级的概念通常定义得非常宽泛,使之既能够包容许多不同的经济集团,也能包容以权力和声望为基础的集团。然而,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社会阶级”的意义和“社会身份”是一样的,并不指向具体的集团(科尔曼和霍恩沃特,1978)。

1

阶级分化

当各阶级成员得到的报酬水平差别很大时,当这些阶级的成员充分意识到这些差别时,当只有很少的机会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流动时,这个社会就存在着广泛的阶级分化——对不同阶级所感知到的和真实的差异。

在美国,阶级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阶级意识弱,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流动非常普遍。不过,美国确实存在阶级分化。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学家的一个杰出贡献是指出了阶级分化和不平等在国家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帕日,1969)。

世界上所有文化中都存在阶级分化,不单单是发达的、工业化的或者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韩国的阶级结构很不明朗,而现在则有了四个定义清晰的阶级:富有而强大的资本家阶级、白领和小业主阶级、工人阶级和社会最下层的边缘群体(罗西德斯,1990)。

阶级划分与阶级定位

是什么决定了主要的阶级划分?谁是哪一个阶级的成员?今天大多数社会学家把这些问题作为实证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因为阶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所以没有简单的答案。像人们判定谁属于集邮俱乐部或足球队那样,断定谁属于某一个阶级的普遍标准并不存在。

社会学家用来确定个体属于哪个特定社会阶级的方法有三种。

客观法。用这种方法时,研究者根据收入和财富的多少、工作类型以及受教育程度等的客观标准把人们归到一定的社会阶级。社会学家就这样通过为每一个社会阶级的成员确定“切割点”武断地建立了阶级界限。马克思的“资本家”和“工人”,以及现代关于中产阶级(或者白领)与工人阶级(或者蓝领)的区别,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确定社会阶级的例子。

很明显,用这种方法来确定社会阶级的位置序列并不是没有困难。批评者认为阶级之间的切割点有时没有意义。例如,按照客观法,如果年收入25 000美元是较高阶级成员资格的切割点的话,一个年收入24 999美元的人将被划分在比年收入25 000美元者低的阶级里。此外,

批评者还担心这些“客观的”阶级成员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阶级身份。

然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客观法特别有助于社会学家进行定量研究。另外，虽然人们公认一个年收入24 999美元的人的生活方式与年收入25 000美元的人没有差别，但是他们都很可能与年收入10万美元的人生活有很大不同。

声望法。这种方法要求社区成员指出他们镇子中或地域内的阶级数量与性质。还要求这些人说出社区成员所属阶级的名称，也就是要根据人们的“声望”确定其在阶级中的位置。使用这种方法的社会学家认为，只有“内部人”才能明白特定社区的社会阶级结构。

批评者说这种方法过于强调声望，而对比较客观的经济和政治因素重视不够。此外，这种方法在大家相互认识的小社区最有效，而在一个较大的社区或进行社区比较时就不那么有效了。

主观法。调查员用这种方法要求被访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阶级进行定位。因此，这种方法抓住了社会阶级的主观方面，即人们自己如何看待阶级制度以及他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使用主观法的一个问题是，在有些文化中有忽视阶级差别的重要性的倾向。例如，美国社会学中很重要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别往往模糊不清，因为媒体和政治家们常常认为并不富裕的人或是穷人具有“中产阶级”的特征。

另外，在美国许多工人阶级成员也认为他们自己具有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地位，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二战以来，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现在能够买得起曾经是白领中产阶级标志的物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享受曾是中产阶级标志的生活方式（赖特和马丁，1987）。

2

阶级意识与 虚假意识

社会阶级成员具有的、涉及他们共同处境和利益的共同意识，叫阶级意识。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相比较，美国人很少有阶级意识。如前所述，这种低水平的阶级意识尤其是美国工人阶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喜欢把美国这种低水平的阶级意识看作是虚假意识的例子。虚假意识是一个人对现实的主观理解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情况。机会平等实际上是美国阶级制度的基础，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却接受了这个核心的意识形态观念；政治家及与美国上层社会相认同的知名人士反复宣称阶级不是美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这些都明显促成了虚假意识。因此，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们国家的社会制度是私人财产分配不平等的反映，是保护少数精英阶级的利益的。

美国社会阶级意识水平低也是种族、宗教、民族以及地区差异的结果，这些差异往往超过甚至掩盖了阶级差异。美国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差异，社会阶级只是美国人区分他们自己的一种方式。美国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年龄、性别、教育、种族以及宗教方面的不平等，而不去考虑阶级问题。

美国生活中阶级意识水平最高的很可能是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成员，特

别是那些几代富有的人。这个群体强烈地意识到他们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有着共同而明晰的背景，有着共同的利益（科尔曼和雷恩沃特，1978）。

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指就一个人或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一般用语中，“社会流动”意指向上移动或社会地位的改善。但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向上流动只是社会流动的几种形式之一。人们也可能向一个较低地位移动（向下流动）。个人地位无论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都叫垂直流动。



如何获得地位与威慑别人？

下面这篇文章是通过精心选择地位象征来达到向上流动的方法，这些方法只是半开玩笑，不可当真。

你是不是赶不了时髦了？或者更糟，你是不是感到好像再也不值得努力了？不要灰心。信心是任何努力的成功关键，而在竞争愿望与冷静自信之间求得适度平衡就是成功的手段。造成一种使你的下属敬畏、对手迷惑的形象也是这样。但若你的个人预算只允许你粗茶淡饭过日子，那这样做就特别困难了。

不过，我们已经有一套小伎俩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些方法将以最小的个人开支把你的信心恢复到正常状态。请记住，这些技巧用得好，可能会和金钱一样重要。

1. 你的公文包里带上一张外文报纸。坐在酒吧的时候，拿出报纸，用严肃的表情浏览。为了这出戏，选择一种难度大的语言很重要，不能是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因为如果某个留学生向你动真格的，这些语言会让你遇到麻烦。

2. 在你汽车前座下面放上一部旧式电话。开车的时候，把听筒戴在耳朵上装着好像在与某人通电话。如果在一个人多的十字路口停下，把车窗打开好让行人能够听见谈话。然后，大声地以命令的口气说：“告诉哈瑞斯我们需要那栋楼！告诉他出5 000万，直接用现金，无论如何要拿下！”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

3. 用昂贵的容器处理家庭垃圾。当你光顾像雷曼·马柯斯（Neiman Marcus）之类的商店时（我们的所有铅笔都从那里买），多拿几个购物袋。一个月你往这样的袋里装几次垃圾，然后把它和其他垃圾袋一起放到路边。一定要让街上的人看得清楚袋子上的商店牌子。

4. 穿上纪念某个令人惊异的耐力赛事件的T恤衫。现在许多城镇都有可以在衬衫上印字的商店。只需要在T恤衫上印上：“雪地狂奔，1971年12月大孤山之秋”。当人们问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此类紧张激烈的比赛时，就说：“噢，我们只举行过一次，我们12个人聚在一起，就从事这项运动。根本未经任何明智团体的认可。”

5. 在你办公室的墙上多挂几个闹钟。每一个钟上贴一个首都的名字（利马、柏林、堪培拉）。和客户谈话时，你隔一段时间看一下这些钟。

6. 在你的汽车仪表板旁的小贮藏柜里放上一些神秘的东西。不要像平常那样放

卫生巾、零散钱以及太阳镜，你应该至少带上以下东西的中两件：一把计算尺和一张伦敦地铁系统图、一本英语—斯瓦希里语词典、一小瓶石蕊试纸或者一个棱镜。当一位乘客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耸耸肩说：“噢，是为我正在构思的一个工程准备的工具……”然后伶俐地把柜子上，表示不会往深里谈。

7. 在葡萄酒瓶上贴上你自己的标签。这种做法相当冒险，只是在你真想采取强硬手段时才使用的一种手法。假设你大学同宿舍的同学（他甚至在过去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乘坐一架私人喷气式飞机不期而至，包租了一家豪华宾馆的整个一层楼，邀请你去参加晚会，并不经意地提到几位不引人注目的皇室成员可能要来。（“你会非常喜欢西比尔和达明，他们到这里来避暑购物。”）同时拿出一张褶褶巴巴的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

这种场合你不用犹豫。拿出几瓶你喜欢的从当地经济市场上购买的普通葡萄酒，用水浸泡把原来标签撕掉，贴上你自己的标签。设计标签并不很难。关键是要知道某个和你一样拼搏的绘画艺术家。只要花很少钱或给一大堆面条，他（她）就会特地为你设计私人收藏标签，其风格从民间风味的酒窖到昂贵的外国葡萄园，应有尽有。

记住运用这些提示就好比是在磨合一辆新车。每次收益都会不同，这取决于你当前的地位。但是一旦运用这些方法，如果你夜里听到隔壁有哭泣的声音，不要大惊小怪，很可能是某个地位和你一样的家伙在乞求怜悯。

资料来源：吉佛瑞·沙夫（Jeffrey Shaffer）和苏兹·布莱克比（Suzy Blackaby）：《如何获得地位与威摄别人》，《华尔街杂志》，1984年11月26日。授权翻印。

1

开放社会与 封闭社会

分层体系因人们在其中从一个社会地位向另一个社会地位移动的难易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假如真有这样的社会，人们就可以取得他们的天资、能力和愿望允许其得到的任何地位。一个开放的社会不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位置将仍然存在，不过这些位置将主要按功绩大小来填补。所以，这样的—个体系可以称为理想的精英管理社会。

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里，每个人一生下来或者到一定年龄就会分配到某种身份或地位。这种地位将永远不会改变。尽管有些社会近乎极端封闭，但也从没有过完全封闭的社会。

相对开放与相对封闭社会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地位的混合程度。开放社会的特点是依赖自致性身份地位的程度大大超过封闭社会，而封闭社会更依赖于先赋性身份地位（自致的与先赋的身份地位在第四章已经讨论过）。许多研究表明，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化、技术先进的发达社会一般较为开放（赫兹尔里格和加尼尔，1976）。相反，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前工业化社会一般相对封闭（艾森斯塔特，1971年）。

甘地时代以前的印度就是一个较封闭社会的例子。在那个时代，种姓制度的规定通过法律得以强化。不过，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也允许一定

的社会流动。人们有时可以与较高种姓的人通婚，或者通过获得较高种姓成员的庇护而获得教育和较好的工作。这样的个人，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孩子，以后就能够进入更高一级的种姓。有时整个群体都在流动，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就改变了。

2

社会流动 的条件

社会学家通常分析两种社会流动：代际流动与代内流动。第一种类型，即代际社会流动，是将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其子女或孙子女所获得的社会地位相比较而言的；相反，代内社会流动是指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社会地位变动，例如，某个人从一个较低的社会阶级开始逐渐变得富有。不过，两种情况都会既包括有向上的流动也会有向下的流动。

向上流动

一项开拓性研究发现，在特定社会，有两个条件似乎特别容易产生向上的流动：这就是先进工业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学校教育（福克斯和米勒，1965）。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不需要多少技术的低工资、低地位的工作逐渐减少。这些工作最容易被机器替代。同时，更多的中、高水平的工作添加进来，由社会或经济体系（不是个人成就）的这种变迁，所产生的向上流动，叫做结构性流动。

然而，如果父母地位较低的子女得不到所需的知识和培训，高级工作岗位就占不满。发达社会试图用公立中学和高等教育制度来满足这种需要。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判断青年人将最终获得的地位高低或收入的多少；一个最容易观察的指标就是接受学校教育的年数”（詹克斯等，1979）。不过，这主要是因为学校教育提供了知识和技能，还是因为学校教育是一种分配工作的筛选制度？人们尚不清楚。

与高水平向上流动联系在一起的其他因素有大众传播、城市化和地理上的移动等（特雷曼，1970年）。此外，在向上流动与一个社会政府形式之间有着一定关系。独裁政府一般对向上流动和收入平等有消极影响，而民主政治一般具有积极影响（泰里、西蒙尼和霍奇，1979）。

有些社会条件可能不利于向上流动。传统社会提供的上层社会位置很少，因此人们就很少有机会向上流动。在相当封闭的社会里，比如像印度，从一个身份地位到另一个身份地位的流动，可能受到传统或法律的禁止。此外，工业化本身并不总是保证向上流动，因为在地位较高的工作岗位上就业的人数可能相当稳定。例如，在印度和埃及，尽管实现了工业化，但职业发展很少，结果许多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非常困难（马特斯，1984）。

在美国，有很多个人的向上流动是拉尔夫·特纳（1960年）所说的平等竞争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在英国更常见的流动是精英们从中产阶级中发现有前途的新人，然后有意识地把他们吸收进地位更高的阶级，这一过程特纳称之为提携式流动（sponsored mobility）。

向下流动

常识可能告诉人们导致个人向下流动的条件就是导致向上流动条件的反

面。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的。得不到教育、很小就结婚以及拉扯一个大家庭都与向下流动有关。如果一个非常大的家庭不能给所有的孩子提供学校教育以及其他条件,那么生在这样的家庭也可能会导致向下流动。

其他导致向下流动的环境可能没有那么直接。虽然生活在城市通常与向上流动相关(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1964),但是有些研究已经表明城市生活也可能促进向下流动(福克斯和米勒,1965)。例如,对许多刚到城市的新移民来说,都是典型的向下流动(马戈利斯,1990)。简而言之,城市生活促进了种种形式的流动。相反,小城镇和农村生活无疑与较低的流动率相关。

令人惊讶的是向下流动很少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部分原因是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向上流动的机会太多,以致向下流动可能就显得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过,下一章将要讨论的近来美国经济的变化,说明我们可能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在这个时代中向下流动会比以前变得更为普遍,这是一种既会对个人也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各种负面影响的趋势。

3

妇女的社会流动

直到最近为止,大多数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男子,尤其是对儿子与父亲进行比较。对妇女流动的研究已经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这一研究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日益普遍。这些研究也不得不考虑一些有意思的方法论问题。女儿的职业应当与其父亲还是母亲抑或与父母双方进行比较?难道妇女不是既可以通过婚姻也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流动吗?

一项研究表明,妇女的职业流动受到父母双方的职业地位的影响(罗森菲尔德,1978)。在女性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无论母亲是否外出工作,她所占据的职业地位都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当然,在男性流动的研究中也必须越来越多地考虑这些因素。根据一项此类研究,在职母亲与其儿子职业地位之间似乎存在正相关,但与其女儿的职业地位则没有这种关系(休厄尔、豪泽和沃尔夫,1980)。

另一研究者发现,妇女可以通过婚姻获得的社会流动,比男子通过职业获得的社会流动要大得多(蔡斯,1975)。这项研究揭示,男子的第一个工作一般“继承”其父亲的职业地位。然而,妇女往往和一个与其父亲职业地位相去甚远的男人结婚,因而与其丈夫的职业地位更为相关。婚姻未必总是与向上流动联系在一起,一项研究认为,通过婚姻的流动向下与向上概率相当(格伦、罗斯和塔利,1974)。

总的来说,研究表明接受教育与获得职业的过程对职业男性和职业女性来说已经非常相似(特雷曼和特雷尔,1975)。职业条件对于两性来说都是相同的,通往较高职业地位的道路主要是教育。然而,女性仍然主要集中在“粉红阶层”的职员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上,这些工作一般薪水和声望都较低(贝纳德,1981)。

为什么会出现社会分层？为什么在财富、权力和声望等方面人们的社会位置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些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进行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的焦点。其间出现了两个基本相对的答案。功能主义理论家认为，为了社会正常运行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平等是必要的。冲突论理论家认为这样的不平等既没有作用也不公正，它倒是上层人对下层人剥削的结果。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理论家都非常重视职业，把它看成是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标志。

1

功能主义 理论

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和威尔伯特·莫尔（Wilbert Moore）（1945年）的经典分析最为充分地表达了功能主义的观点。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不平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事实上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也是必要的。

他们的理论以这样的观察开始，即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一些工作比另外一些工作要重要。特别是，有些职位由最有资格的人承担，对保证该职位的正常运转来说，至关重要。很容易想到的例子是，医生、政治军事和法团领域的领导人、工程师以及律师。如果占据这些位置的人能力不足，其社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这并不是说其他许多职位，比如像卡车司机、垃圾清运工或者厨师不重要，而只是说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如果能力不足造成的社会危害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如果垃圾清运工工作不是很出色的话，结果我们可能得到的是桔子皮和咖啡渣成堆；如果我们允许笨拙的人当脑外科医生，那么结果可能就远远不是有问题了。

请注意，戴维斯和莫尔所挑选的重要职业都要求接受很多教育或培训。寻求这类职业的人，为了取得与之相匹配的资格要花很多年做准备。另外，这些工作绝大多数都对任职者的时间、精力和自我牺牲有很多要求。成功的医生、工程师以及政治领袖很少有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

那么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何使最有能力的人为从事这些具有挑战性的职业作出必要的牺牲。戴维斯和莫尔认为，可以通过给这些占据社会最关键职位的人提供更多的实质性的刺激（财富、权力和声望）来保证做到这点。他们认为，因为我们这样保证了此类必须熟练完成的工作将由我们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来完成，这样，在报酬上对这些人予以倾斜，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因此而获益。

这个看法尽管有点道理，但还是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朗，1959；图明，1953）。有一件事情是相当清楚的，有些职业报酬很高，尽管它们也可能需要一些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掌握的技术，但是对任何重要的社会目标都未作

出贡献。体育运动员和摇滚歌手就是明显的例子。与此同时，像中小学教师、日托护理人员、警察以及社会工作者之类职业无疑应当由能力较强的人来从事，可实际上他们的工资却很低。结果这些职业对最有能力胜任的人并不总是有吸引力，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损失。

针对戴维斯—莫尔命题，另一个问题是先赋性或继承性的优势可能会影响到不同资源配置的逻辑。比如说，一个能干而收入丰厚的企业主管的无能子女，可能利用其父亲的资源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一个能力强得多的工人阶级子女却得不到这样的好处。男性对女性以及白人对非白人的优势，同样可能影响到保证最有能力的人占据最重要的职位。

最后，一些批评者接受功能论的基本逻辑，但是担心现代社会中可资利用的报酬差别的程度。他们承认，医生得到的报酬比没有技术的工人高也倒是很好，但是一些人成为百万富翁，其他千百万人生活极度贫困，他们天生的技能得不到发展，而如果得到培养，在精英的位置上他们很可能对社会有贡献，这种情况对社会有好处吗？

采用功能主义观点所作的研究，其结果不尽相同。一位学者发现，棒球队不同位置队员的报酬分配方式支持了功能主义的观点（阿伯拉罕森，1979）。不过另一些研究者在分析商业主管的报酬分配中并没有发现支持功能主义观点的证据（布卢姆和库欣，1977）。

2

冲突理论

社会位置高的人获得巨大的财富、声望和权力是因为这些社会位置对社会有价值吗？是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对稀缺资源的垄断，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让这些资源广为扩散从而获得财富、声望和权力呢？冲突理论家倾向于持后一种观点。是什么因素决定谁得到什么呢？一句话，是权力（米尔斯，1956；达伦多夫，1959）。

对于冲突理论家来说，不平等并不是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它是强大群体对弱小群体剥削的结果。强大群体决定着哪些人将占据哪个职位以及谁将得到什么报酬。冲突理论家不承认职业报酬的极端不平等既对激励人们工作、又对有效地发挥社会功能是必不可少的。

大多数当代冲突理论是建立在卡尔·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之上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两大阶级的冲突。正如本章前面所介绍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他们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被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他们为了生存向资产阶级出卖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物品的分配主要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权力不平等的结果（罗斯德斯，1990）。

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能够保持其权力主要是因为社会设置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宗教、教育和政治秩序一般来说都适于维持现状，而不是鼓励变迁减少不平等。马克思还认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常常受到虚假意识的蒙蔽，看不到社会秩序是不公正的，只要资产阶级仍然统治着，他们就不可能取得应得的社会报酬。构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基础就是机会平等，但对机会平等这一虚假意识形态观念的接受，使工人阶级不能组织起来有效地追求他

们真正的阶级利益。马克思希望无产阶级最终将能够抛弃虚假意识，获得真正的阶级意识，起来对压迫他们的阶级进行暴力革命。

为了更好地反映 20 世纪后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现代冲突理论家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修正。尽管这些理论家们吸收了马克思关于分层制度的主要观点，即这一制度对有钱人和有权人有利，那些由精英们发明的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会蒙蔽中下层阶级，是使之上当的圈套，但马克思严肃的政治态度也被抛弃了许多。现代分层理论家还通过把分层体系中经济以外的因素（例如性别、种族和年龄）考虑进来以修正马克思的理论。他们有时也承认某种程度的社会不平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事实上人们在才能和技术方面确实有很大差别。不过，所有的冲突理论家都认为，最好把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理解为强者与弱者之间不平等斗争的结果。他们都同意，除了那些想证明自己所占有的非分巨额社会需求物品是正当的人之外，谁也不会为不平等辩护，这是现代社会的特点。

3

伦斯基的理论

格尔哈特·伦斯基（1966，1984）有力地说明了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的观点都有一定经验效度，两者应该结合起来对分层作一个更准确的分析。他还认为，有必要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分层，因为分层的特点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伦斯基指出，在小型的前现代社会里物品和服务主要是根据需求分配给其成员的。权力几乎与社会报酬没有关系。然而，社会越现代，权力确实形成分层体系方面就越重要。假定在他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之间选择，伦斯基指出，大多数人自然会选择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当社会第一次开始生产超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品时，强者就会为他们自己安排获得更多的一份。

但是，强者的权力总是以其经济地位为基础吗？与马克思不同，伦斯基认为权力还有其他来源，其中一个来源是强大的政治领导地位。不过，伦斯基同意马克思关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能够、而且往往确实按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向影响社会需求物品的分配。

与许多冲突理论家相反，伦斯基认为有些不平等实际上可能促进了社会的功能。但他对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并不抱有很大希望。这些观点又使他与功能主义思想的主要命题一致。

其他社会的分层与流动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考察两个国家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英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的分层体系与美国形成对比（这一点将在第十章详细研究）。英国是一个与美国很接近的国家。但是它的阶级体系更为严格。巴西的分层状况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一个比较典型的类型。

英国的上层阶级不再有优势

不久以前，说明英国是世界上阶级意识最强社会之一的标志还很清楚。上层阶级在伊顿和牛津受教育，在马斯蒂克（Mustique）度假，说话像亨利·希金斯。中等阶级上“微型”私立学校，在开恩蒂郡（Chiantishire）（又称图兹克尼（Tuscany）度假，学着BBC的样子说话。下层阶级接受国家公立学校教育，在布莱克波尔呆上一周，说话方式像伊丽莎白·杜利特尔。

不行了。现在很难给英国人分类了。现在是收入、品位和教育，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使大多数英国人相互区别开来……（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最经久的遗产可能是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国家：即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不管来自哪个阶层的人，他们的首创精神都隐匿了起来，地主绅士和其他人一样都必须证明其存在的价值……

仍然存在维多利亚意义上的专横不公平的特权。每年夏天初入社会的青年人出来社交，一群群郝瑞·亨利式的家伙（富有的年青人）把温莎的马球运动变成了一种专门的社交形式，世袭贵族仍然在上议院占统治地位……拿社交季节来说吧。50年代吸引了500余名年轻女贵族来暗中择偶。现在，肉食者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二，姑娘们不再觐见国王，奢侈的舞会被功利的鸡尾酒会取代。今天英国贵族后裔所致力寻找的是工作而不是配偶。

或者拿君主制度来说……这可能就是年轻的皇室成员好出风头者的滑稽表演。也许它会在电视上不断曝光，或者伦敦的小报给予地毯式报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皇室成员20世纪80年代消费水平降低，说明君主制度有对既像大歌剧也像肥皂剧。

甚至伦敦旧式的俱乐部似乎也受到了感染。实际上，很少有这样的俱乐部再把招牌挂在大门上或者接收妇女会员。而沃德豪斯（P.G. Wodehouse）的寄生虫世界，一个有叫鸡蛋，叫大豆，叫烤饼之类的浑浑噩噩成员的俱乐部，几乎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随着向上流动的雅皮士的进入，会员人数不断增加，桑娜屋和南瓜屋跟着时尚走，进去的通行证是支票簿而不是出身门第……

考虑到与上司的差异并且“知道你的地位”是过去的事情了。皮瑞格林·华斯森（Peregrine Worsthorne）这位《星期日电讯》的贵族编辑，以悲伤大于愤怒的笔调写到：“就是在不久前，操着正确口音的大人物还可能压住不守规矩的行为。”哀叹英国生活中礼仪衰落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罢工再次成为英国的弊病。今天，正是那些“小流氓们”、“乡巴佬们”和一伙伙反社会的青年，易于发起无知的暴力行动。

资料来源：重印自罗宾·奈特（Robin Knight）：《你赶快让位，亨利·希金斯》，选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第106期（1989年4月24日），40页，授权重印。



1

英国：阶级社会与福利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英国都是由工党执政。该党主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把英国变成了一个福利国家，内容包括像国家资助的卫生保健和教育之类的广泛的社会服务。即使这样，一直具有明显阶级结构的英国仍然还是一个带有实际社会不平等特点的国家。根植于有几百年历史的贵族家庭

的上层阶级仍然控制着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尽管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繁荣时期提高了全体英国人的收入水平,但是财富和收入在社会各阶级中的不平等分配并没有重大变化(戈德索普,1987;韦斯特加德和雷斯勒,1976)。

然而,这种收入不平等模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发达国家没有很大区别。比较明显的一点区别就是英国人看待他们阶级结构的方式。与把其社会看成是由许多模糊交叉的阶级组成的美国人不同,英国人认为他们的社会只有几个非常明显的阶级。另外,大多数美国人用收入和职业来定义阶级身份,而英国人则更喜欢用权力和对财富的控制来界定阶级身份(贝尔和罗宾逊,1980)。传统上英国社交界分为“我们”和“他们”,谈吐、教育和生活方式上的明显区别保持着这种分野。

英国上层阶级通过继承和共同的教育背景保持其财富和权力地位。许多占据有影响位置的人在专门的私立学校(在英国叫公学)上学。这些学校的昂贵费用使得入学者只可能是富家子弟。这些学校考上的大学生有一半要么上牛津要么上剑桥这样一些最受英国人景仰的大学,国立学校里考上的大学生只有 10% 上牛津或剑桥。这种排他性的、高质量的教育背景强化了上层阶级成员之间的共同价值观,有助于他们之间建立终生的联系,而这又能使他们比较容易地进入权力和领导位置(诺布尔,1981)。

不过,这种模式正在逐渐变化。尽管现代英国大家族的财富仍然主要建立在财产继承上(1% 的人口控制着全国大约 25% 的财富),但是国家的高税率可能慢慢削减这些财富。而且即使英国最富的 200 个人中大多数继承了财富,但其中也还有 86 个是靠自己发的财(奈特,1989)。实际上,有些观察家认为近年来保守党政府所强调的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会弱化阶级界限,产生以前英国闻所未闻的阶级融合(参见“全球社会”栏:“英国的上层阶级不再有优势”)。

战后英国向上的社会流动确实有明显的增多。例如,1951 年英国 73.6% 的职业男子从事体力工作,26.4% 的人从事非体力工作。到 1966 年为止,这些比例几乎倒了过来:34.2% 的人从事体力劳动,65.8% 的人从事非体力劳动(诺布尔,1981)。这一变化既归功于国家的福利措施,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构性流动。这种发展到 70 年代已经结束,后来的英国社会的流动率实际没有变化(戈德索普,1987)。

20 世纪 80 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时英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非常强盛的发展时期(赖德和西尔韦,1985)。撒切尔时代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仍然需要研究,但是一些评论家认为她的政策——减少国家福利并且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增加了收入、卫生和生活条件方面的阶级差别(赫德森和威廉斯,1989)。近年来,英国经济再次徘徊,有迹象表明不平等程度正在增加。

2

巴西:传统 与发展

巴西是一个重要的第三世界大国。第三世界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贫穷。巴西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 18% 和英国的 25%。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前，巴西穷人的儿子几乎肯定要受穷，而富人的儿子却一定富有。因此，阶级身份实际上一直是继承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巴西社会是由两大主要社会阶级构成：地主、专业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以及由体力（主要是农场）劳动者和工匠组成的广大下层阶级。上层阶级的权力主要依靠他们对大量土地的所有权，这个阶级的成员既控制着农村又控制着城市，统治着国家。下层阶级的巴西人贫穷，上不了学，过着悲惨的生活。

两大阶级之间是一种扈从和主人的关系。在这种家长式统治的关系中，下层阶级的劳动者依附于上层阶级的主人，这些主人可能是雇主、地主或债权人。劳动者向他们的主人表示忠诚，得到的回报是保护和物质支持（诺里斯，198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巴西经济发展很快，已经从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具有工业化基础的国家。巴西的农业部门仍然很重要——它种植的咖啡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是今天该国的经济不断以像钢铁、汽车、纺织、造船、机械和石油化工等工业为中心（《世界年鉴》，1994），工业化的发展使该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出现城市工人阶级，不隶属于扈从与主人关系的农村工人阶级成长起来，同时出现了新的城市精英（雷纳，1974；桑德斯，1971）。

然而，巴西阶级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平等已经减少了很多（罗尼格，1987）。1983年巴西最穷的40%人口的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8.1%，而最富的10%人口的收入却占46.2%（世界银行，1991）。农村和城市的大多数穷人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其中有些人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所有社会都存在一定的社会分层体系。所谓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社会需求物品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研究表明社会分层有三个主要方面：财富、权力和声望。

2. 财富是由个人或群体的全部经济财产所构成，不仅包括货币还包括物品、土地、自然资源以及生产性劳动服务。收入是使用人力或物质资源所得到的经济收益。在我们的社会里收入和财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后者比前者更为严重。像宗教、种族、教育、职业、性别之类的因素都影响着财富和收入的分配。

3. 权力是指称个人或者群体控制或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而不管别人是否愿意合作。社会学家在美国权力性质方面没有一致的意见。米尔斯认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即“权力精英”）手中，其他人认为权力为许多人和许多群体所分割。权力和财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财富有时能够买到权力，而权力往往可以用来获得财富。

4. 声望, 是一个人从别人那里所获得的良好评价与社会承认, 是社会分层比较主观的方面。声望来源于像名誉、尊重、荣誉与敬意之类的形式。尽管金钱可以买到声望, 权力可以控制它, 但是一个人的声望通常来自对一个高级职位的占据。

5. 社会经济地位 (SES) 是一种对社会地位的测量方法, 它考虑到个人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职业声望等内容。正确识别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靠的是两个东西: 一是公认的、用于划分地位等级的等级序列, 另一个是人们普遍理解的评价个人地位的符号, 以便我们据此来评估个体的地位水平。尽管人们的背景可能影响到他们评价别人的方式, 但是在美国, 人们对大多数社会地位的评价却惊人的一致。地位符号是任何可以向他人传达使用者的地位水平信息的东西。当人们通过炫耀性地展现地位符号来表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时, 他们就在进行炫耀性消费。

6. 尽管肤色、宗教、婚姻地位、年龄与性别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对人们的社会地位有很重要的影响,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 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是职业。职业的声望等级相对稳定。一般来说, 一个人在某个方面的地位较高, 在其他地位等级序列中他也会处于较高地位, 表现出地位一致。一个人在一个方面地位较高而在另一个方面地位较低, 这就出现了地位不一致。

7. 历史上有四个主要的分层类型: 奴隶制、种姓、等级和阶级制度。奴隶制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层体系, 在这种制度里社会中的一群人属于另一群人所有, 他们没有自由, 可能不被当人看待。种姓制度是一种复杂而严格的分层制度, 在这种制度里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出生决定的, 一般不能改变。等级制度是与封建主义农业社会类型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种分层制度中贵族因拥有土地而拥有权力, 农民以依附身份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

8. 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分层制度是阶级制度。这是一种主要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相对开放的分层形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 阶级是按照对生产资料或财富的占有方式来划分的, 资本主义社会两大主要社会阶级是工人 (无产阶级) 和资本家 (资产阶级)。马克思认为这两大阶级总是处于不断阶级冲突或阶级斗争的状态中。与马克思不同, 韦伯认为阶级制度除了经济以外还有两个其他的分层维度: 权力与声望。

9. 阶级分化是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的、感知上的以及真实的差别。社会学家用来划分阶级的方法有三种: 客观法、声望法和主观法。社会阶级成员对他们的共同处境和共同利益的共同意识, 叫阶级意识, 这种意识在美国相对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一部分原因是虚假意识, 即一个人对现实的主观理解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状况。

10. 社会流动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从一个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个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这种流动既可能是向上的, 也可能是向下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 地位直接通过个人的努力就可能获得。在一个封闭的社会, 地位是与生俱来的, 或到一定年龄就有的, 几乎不可能改变。尽管没有社会是完全开放或者完全封闭的, 但是工业化社会一般较为开放, 而农业社会一般较

为封闭。

11. 社会学家分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一是代际流动，即用子女或孙子女获得的社会地位与其（祖）父母的社会地位进行比较；二是代内流动，即指一个人一生中社会地位的变化。工业发展与教育普及促进了全国性的向上社会流动。由于社会或经济制度变迁（而不是个人成就）所导致向上流动，叫结构性流动。向上流动的人一般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向下流动的人往往是出身在大家庭的人，未受过教育的人，很早就结婚的人，要养活众多家庭人口的人。

12. 最新研究强调父母双方的职业地位都有可能与孩子的所能达到的地位水平有关。就一项工作而言，妇女和男子都可能具有同样的资格，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妇女仍然集中在低工资和低声望的职业上。

13. 关于职业在声望、财富和权力方面巨大差异的原因有几种理论。功能主义认为职业地位的差异对于社会的有效运转是必要的。没有这样的差异，人们就不会愿意为社会从事需要接受长期正规教育的重要工作。冲突理论认为，上层人士对下层人士的剥削产生了不平等，缺少平等对于社会来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格尔哈特·伦斯基试图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形成分层制度最重要因素是权力，而不是经济。同时认为有些不平等实际上可能有助于社会功能的发挥。

14. 各国的分层体制和流动率不同。英国的特点是比美国更具有明显的阶级结构，尽管有工党开创的福利国家，阶级差别仍然存在。在巴西，传统阶级结构包括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上层阶级和作为农场体力劳动者的下层阶级。这两个阶级按照家长式的扈从与主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战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城市工人阶级的成长以及农村劳动者阶级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向上流动不断增加。但是，巴西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并没有降低多少。

推荐阅读书目

1. 布劳恩 (Braun, Denny), 1991. 《富者更富：美国和世界收入不平等的增长》(*The Rich Get Richer: The Rise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 Chicago: Nelson Hall.) 该书研究了财富向高层地位者集中这一世界性趋势的原因和结果。

2. 吉尔伯特 (Gilbert, Dennis) 和约瑟夫·A·卡尔 (Joseph A. Kahl), 1993. 《美国的阶级结构：一个新的综合》(*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A New Synthesis* ,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该书对形成美国阶级结构的变量进行了分析。

3. 金克斯 (Jenks, Christopher) 等, 1979. 《谁获得了成功：美国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Who Gets Ahead: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Success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该书全面分析了家庭背景、学术能力、个性特征以及教育对美国人经济成功的重要影响。

4. 科伯 (Kerbo, Harold R.), 1991. 《社会分层和不平等: 美国的阶级冲突》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 Class Conflic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该书集中对阶级冲突的历史的和比较的观点进行了全面介绍。

5. 伦斯基 (Lenski, Gerhard E.), 1984. 《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理论》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该书基于对前工业化与工业化社会不平等的分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理论。

6. 罗西兹 (Rossides, Deniel M.), 1990. 《社会分层: 比较视野中的美国阶级制度》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American Class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该书描述了美国及其他当代社会的分层状态。

7. 特纳 (Turner, Jonathan H.), 1984. 《社会的分层: 一个理论分析》 (*Societal Stratifica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该书是描述社会基本特征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一本分层理论著作。

美国的社会阶级与贫困问题

这是六月一个和煦的星期六下午，四个 30 多岁的美国男子正在从事休闲活动。

詹姆斯这个星期刚开始就安排他的私人飞行员把他送往位于卡罗拉多州阿斯彭市郊几英里外的别墅去。如果是冬天，他肯定会去滑雪，可是现在他和妻子海伦正躺在游泳池里呷着香槟。此时，一大群佣人正在准备晚上的活动，为几十个客人筹备晚宴，大多数客人是事业有成的高级商人和律师。

查理斯正在令他愉快的城郊小镇的大街上漫步，他的妻子安正在商业大街为晚上在市里商业区一家美食店吃饭买一件新衣服。随后，他们将顺便去参加安在大学里的同事举办的鸡尾酒会，呆上几个小时。

大约在同一时间，彼特正在离他家几英里之外的一个公众场地参加一个激烈的垒球比赛，他家在一个古老的郊区，房子普通。他的妻子多尔瑞此时在搞第二职业，在一家超级市场当收款员。他们将叫人把比萨饼送到家里，晚上和亲戚们在一起看电视。

艾帝正和他的几个朋友在他城里寓所附近的球场上打篮球。他不时地拿出一瓶廉价啤酒，喝上一口。然后他可能玩落袋子弹戏，去他前妻巴巴拉家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呆上一段时间，或者在街角逛逛。

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多想社会阶级问题。事实上，我们常常听到政治家指责那些关注美国社会中阶级差别的人有一点“反美倾向”。我们不愿意公开讨论阶级，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广泛接受这样一种思想造成的，即人们在经

济上的成功几乎完全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因此，在人们的头脑中，承认某人不配当中产阶级无异于骂他无能或者懒惰。谈论阶级简直是不礼貌。

不过社会学家们没有礼貌的奢望，他们必须按其本来面貌来描述社会。另外，社会学研究有力地说明，美国意识形态过于强调个人应为自己阶级地位负责。能力和努力确实对个人的地位有影响，但是父母亲的阶级地位也有影响，特别是那些出生在贫穷家庭里的人向上流动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难得多。不管怎么样，正如詹姆斯、查理斯、彼特和艾帝不同的休闲活动所说明的那样，美国确实存在着阶级，我们的地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很大影响（然而，并非所有的兴趣和活动都是按阶级划分的，参见“社会学之窗”栏：“热狗跨越阶级界限”，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当然，阶级差别决不仅仅在于个人对休闲活动选择的不同。另外一些比较重要的区别包括得到医疗服务以及教育与就业机会之不同。我们将在本章研究美国不同社会阶级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标准的范围（range of living standards），研究社会阶级地位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关注贫困问题。最后，我们将对所谓的“社会福利”计划的范围作一简单的概述。

美国的社会阶级

在全美的中小社区里，社会阶级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大多数人一般倾向于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阶级内部选择朋友、配偶、雇员以及伙伴。另外，在阶级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联系障碍。工厂工人主要认识工厂工人以及从事相近工作的另一些人，他们通常很少与其他阶级的成员有接触，特别是那些离他们阶级较远的阶级成员。公司总裁可能过着更加封闭的生活，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屏蔽了他们与其他阶级成员的接触。

在大城市里，有时难以辨别像在小城市那样明确界定的阶级集团。要辨别全国的社会阶级仍然较难。然而，因为全国的职业地位大体相近，又因为收入和财富可以按客观标准判定，因此，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谈到了全美国的社会阶级。

美国有多少个阶级呢？有些社会学家认为只有三个：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劳埃德·沃纳（Lloyd Warner, 1949）是对美国社会分层进行经典研究的人，他把三个主要阶级中的每一个阶级按上层和下层再次分类，一共分出六个阶级。社会学家经常使用沃纳的分层体系，尽管有一些变化。例如，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只有五个阶级，省去了下上与上上阶级之间的差别。我们将用这种多少有点武断的五阶级划分法，讨论下面的美国社会阶级。表 10—1 概括了每一个阶级的特点。

表 10—1 美国五阶级在财富、声望、权力等方面的差异

阶级(及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数)	一般					
	收入	财产	职业	教育	个人与家庭生活	子女教育
上层阶级(1%~3%)	很高的收入,大部分来自资产所有者;控股投资者	巨额财富,旧富	经理,专业技术人员	自由艺术家	稳定的家庭生活	子女均受大学教育
上中层阶级(10%~15%)	高收入	通过积蓄积累财产	高级公民 军队军官 失业率最低	受过优良教育 专业训练	自主人格 较好的身心健康及保健	教育体制以他们趣味为基础
下中层阶级(30%~35%)	中等收入	很少固定资产 有些积蓄	小企业主 农场主 低级专业技术人员及雇员	一些人上大学 高中	预期寿命较长	比劳工阶级上大学机会高
工人阶级(40%~45%)	低收入	无固定资产	技术工人 无技术工人 失业率最高	一些人上过高中、初中、小学、文盲	家庭生活不稳定 单亲家庭	倾向接受职业培训计划
下层阶级(20%~25%)	贫困	无积蓄	失业率最高 剩余劳动力	尤其是功能文盲	顺从型人格 身心健康较差 预期寿命较短	对教育无兴趣 辍学率高
阶级(及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数)	声望				权力	
	职业声望	主观发展	消费	参加群体生活	政治参与	政治态度
上层阶级(1%~3%)	高职业声望	一贯的态度	有品味的消费			相信政治活动的效用
上中层阶级(10%~15%)		整合型自我感知	富有舒适	在家族、宗教、种族、民族及功能群体中有较高参与	在投票及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中参与率高,包括对高级政府阶段:垄断	支持民权与自由的对外政策
下中层阶级(30%~35%)			中等生活水平 享受物质,又拥有精神信仰			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反对福利计划
工人阶级(40%~45%)	低职业声望	不一贯态度 不现实的自我感知	消费水平低	较少参与群体生活		在政治活动中讨价还价,除了少数民族外,大都反对民权
下层阶级(20%~25%)	在劳动力市场上无价值	很易患精神疾病	物质贫困 强烈的经济上的焦虑	社会隔离者	倾向于不参与投票等政治行为	支持更为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及政府的经济援助及安全计划

资料来源:丹尼尔·W·罗西兹:《社会分层:比较视野中的美国阶级体系》,406~408页,1990。经 Prentice Hall 允许采用。



热狗跨越阶级界限

俗语“人如所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学哲理。饮食习惯和偏好可能是社会阶级非常有力的表征。例如，下层阶级成员吃鱼子酱没有上层阶级成员吃粗玉米粉多，这种假设可能比较保险。但是，正如一位作家指出的，当人们吃最“美国化”的食品——热狗时，阶级界限就不存在了。

作家琼和米切尔·斯顿（Jane and Michael Stern）俩人最近访问了北非岛屿特纳瑞福（Tenerife）。他们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岛民们得知斯顿两口子是美国人后，就向他们喊到“Perros caliente! Perros caliente!”他们是在叫卖东西还是在制造事端？远远地，仍有点发呆的琼·斯顿说。“Perros的意思是‘狗’，而 caliente 的意思是‘热’。我们发觉作为美国人我们走路代表着热狗这一标志。”

如果斯顿夫妇事先认识芝加哥罗斯福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布鲁斯·柯瑞格（Bruce Kraig）的话，他们就会有所准备。对于柯瑞格来说，大路货热狗是一种具有丰富魅力甚至是令人敬慕的东西，他深入探寻“热狗所表现出的美国社会史，而热狗是美国人所持的关于自身的思想和神话的一种象征。”

热狗于世纪之交在美国出现，柯瑞格解释说，“那是一个出现大规模迁移、严重的社会骚乱、城市迅速扩张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期。”选择这一时机纯属偶然。热狗（还有垒球也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盛行）提供了一种文化圣餐，即它为这些美国新人提供了一条成为美国人的方式。一个移民可以到球场去，寻找家乡的队伍，和大家一起吃热狗。正如柯瑞格所言，在球场上，他有可能心中暗想：“我正在成为美国人，我是美国人了。”

柯瑞格指出，热狗并不是高级美味菜肴。你可以把一根香肠包装得很漂亮，放在高级餐馆里未必有人要。柯瑞格说：“不过和我们一样，热狗能够不断变化，适应于新的社会环境需要。”这种变化的性质使热狗以多种方式成功地占领市场。过去一个世纪里，热狗是作为一种卫生的、儿童喜欢的、引起乡思的产品而销售，可今天是作为一种保健产品在销售。有新型的低脂肪“淡”热狗，更邪乎的有脂肪更低的鸡肉和火鸡热狗、被称为大海馈赠的金枪鱼热狗，甚至在圣·佛兰西斯科巨人之家的烛台公园还有豆腐热狗出售。这种19世纪的低等食品也非常适用于20世纪晚期的微波炉。

柯瑞格指出，热狗的多样性也迎合了我们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相互区别的需要。结果是，许多种热狗都有地方性特点，多多少少反映并保留了移民家乡的各种民族烹饪技法。例如，在纽约市由于受犹太人和东欧移民的影响，我们吃到是按犹太教规制作的带有大蒜味的热狗。与此相反，在芝加哥有用猪肉和羊肉做成的“南方村民”热狗出售，它是按照阿巴拉契亚移民的食谱做的，他们的祖先来自苏格兰低地和北爱尔兰。

热狗每年销售180多亿个，说明它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普及，它是民主美国的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象征符号。“每个人都吃热狗”，柯瑞格说。“它们神秘地象征着我们的社会平等，象征着机会平等。我们在参加像垒球比赛那样令人开心的公共活动时吃热狗，这样会使我们想起儿童时代的天真，想起单纯的岁月。”每年春天失意的政客们云集球场，扔出象征性的第一球，吃着抹有大量芥菜的热狗，他们是在告诉美国人他们代表着一贯性、传统价值、美德和民主。

资料来源：选自彼得·埃迪丁：《热狗》（Perros Caliente），载《今日心理学》，1989年12月，36页。经授权重印。

下层阶级由美国社会中离财富、权力和声望最远的人构成，目前大约包括20%的美国成年人，主要是少数民族成员。下层阶级中儿童也比较多。下层阶级成员的明显特征是，受教育水平低、缺乏谋生技术、失业率高、经济长期得不到保障。

从这些条件来看，难怪下层阶级的人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逆来顺受、疑心较重（罗森伯格，1956）。尽管下层阶级的人可能想加入社会的主流，但是他们参加的团体以及投票比任何其他阶级成员都要少。下层阶级成员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定型了，因为他们很少有可借以逃脱的资源。

布鲁斯·斯普林汀（Bruce Springsteen）的蓝领摇滚

人们常常发现摇滚乐与工人阶级有着特别强烈的渊源关系。从早期像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和杰瑞·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等革新者到后来的超级巨星像约翰·列农（John Lennon）和布鲁斯·斯普林汀（Bruce Springsteen），这种风格的主要人物主要来自蓝领阶级。然而，在所有的艺术家中只有斯普林汀的音乐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明确的阶级主题。

布鲁斯出生、成长在新泽西州离大西洋15英里远的一个叫弗里霍尔德的工厂小镇上。他的父亲道格拉斯当过公共汽车司机、工厂工人以及监狱警卫。斯普林汀一家的邻居主要是从南方迁移过来找工作的穷苦阿巴拉契亚家庭。只是凭着音乐的天赋，布鲁斯才能够获得社会流动。在他的许多抒情诗中，他反映了底层阶级的生活困境。



白天在街上我们用汗水冲刷

难抑的美国梦想

夜晚我们驶过光荣大厦

在自杀机器里

从笼中弹出在九号公路上，

铭做的轮子，装满了燃料

沿着马路向前行驶

孩子，这个城市累断你的腰

这是一个陷阱，一个自杀的鬼术

我们要逃走趁着年轻

像我们一样流浪

孩子，我们天生就要流浪

（选自《天生就要流浪》）

大清早

工厂的哨声吹起

男子从床上爬起

穿上衣服

吃完早饭

迎着晨曦出发

这是劳动、劳动

就是劳动的生活

穿过令人害怕的大厦

穿过令人痛苦的大厦

我看到爸爸步履匆匆

走进雨中的工厂大门

工厂夺去了他的听力

工厂给他生活

劳动、劳动

就是劳动的生活

一天结束

工厂哨声吹起

男人们穿过这些大门

眼中带着绝望

你就相信吧，孩子

有人今晚要受到伤害

这是劳动、劳动
就是劳动的生活。
(《工厂》)

我已尽力好好生活
我每天早晨起床去上班
可是你的眼睛看不见你的血已冷
有时我感到那么虚弱只想搞爆炸
爆炸把这座城市撕碎
拿一把刀从我的心头割去这块病痛
发现有人在等待开始的事情。
(选自《希望之乡》)

现在大街上粉刷过的窗户
空空的店铺
看似无人
再想来到这里

他们关闭了纺织厂
越过铁路
工头说,“这些工作没了,孩子们,
它们不会再回到
你们的家乡。”

昨夜我和凯特
躺在床上
谈着外出
打起背包
也许奔往南方
我三十五岁
我们已有一个儿子
昨夜我让他坐在车后
说,“儿子,好好看一看吧,
这是你的故乡。”
(选自《我的故乡》)

2

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由稳定地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构成,是几个主要社会阶级中最大的阶级,其中大约有 40%~45% 的劳动力。这个阶级成员的特点是感到工作并不是一种“主要生活兴趣”(迪宾和戈德曼,1972)。工人阶级的状况在稳步改善,尤其是从 30 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更是如此。然而,它的成员并没有摆脱经济拮据、工作不稳定或者工作没有报酬的困境。近来许多蓝领行业的大规模失业表明了这一阶级成员的工作一直不稳定。

尽管他们收入相对较低,缺少工作保障,但是这一阶级成员并不是完全没有政治和经济权力。通过工会或者其他集体行动的形式,像清洁工人和公共汽车司机之类的职业群体已经能够获得相当高的工资。事实上,他们往往比那些像职员或者教师之类学历较高的人挣的钱多。

工人阶级成员下班后与同事的交往没有中产阶级多,而且在家里他们一般不经常谈论工作(吕班,1976;科马洛维基,1964)。工人阶级成员业余时间可能观看球赛、去野营或者修理汽车。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美国人都从事这些活动。

3

下层中产阶级

这个“白领”阶级大约占劳动人口的 30%~35%,它既包括小业主也包括在政府、商业和工业部门等大型机构工作的人。这个阶级的成员从事知识型而不是体力型工作,典型的工作有职员、保险代理、中小学教师以及售货员。下层中产阶级的声望比工人阶级高。不过,由于这个阶级的成员一般

不联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集体力量还不如工人阶级。

下层中产阶级成员有时特别在意声望和地位,成为地位追求者(status seeker)(米尔斯,1951)。也就是说,他们用相当大一部分收入来购置能够作为地位标志的物品和服务,其中包括小汽车、住房以及休闲活动。

传统上,这个阶级的成员一直信奉“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创造的一个术语),这是一套强调勤勉、诚实、节欲、责任的道德与伦理原则(罗特曼,1978)(当然,这套伦理并不仅限于新教徒。)

4

上层中产阶级

上层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最新出现的阶级(本斯曼和维迪奇,1971),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技术社会中对专门知识的需求。这个阶级的成员大约占整个劳动人口的10%~15%,占国民收入分配的五分之一。他们除了收入较高以外还享有相当的权力和声望。他们的很多权力来自拥有诸如美国医疗协会等强大专业团体的成员资格,这些团体在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方面起很大作用。

与其他阶级成员相比,上层中产阶级成员比较喜欢寻找一些能够满足他们主要生活兴趣的工作,他们大部分社会生活可以围绕工作展开(迪宾和戈德曼,1972)。

上层中产阶级成员的社会背景相当复杂,至少与上层阶级成员相比是这样的,他们从事各种工作,范围从牙医、律师和医生等自由职业到拿薪水的公司主管这样的职位。这个阶级与下层社会阶级成员相比,阅读的报刊杂志较多,看电视较少(罗西德斯,1990)。

5

上层阶级

上层阶级是美国最有权最富有的群体,大约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3%。上层阶级成员占据着大型商业、娱乐业、工业、政府以及军事等部门的许多高层位置(罗西德斯,1990)。尽管这个阶级非常富有非常有权,但是其成员在许多人眼里名声并不是非常完美。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有能力远离不太幸运的美国人所遇到的日常问题。

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一般比较保守,往往比较优雅,由于受教于私立学校以及参加专门的俱乐部而显得高贵。上层阶级的许多成员试图通过,比如基金会和慈善事业,把他们的姓氏保存下来。正如第九章所指出的那样,上层阶级的成员比其他社会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要强。他们充分意识到其社会中的特权地位。

上层阶级成员一般把他们的阶级看作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类属。那些“新富”们(即暴发户)也许能够得到名义上的承认,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与那些几代有名的大家望族相比根本不会完全相同。

上层阶级的男子往往是一些专业人员或者金融家,而上层阶级的妇女一般习惯于在其社区中从事志愿工作。这些妇女不是在医院的走道里推小车或者接学校的电话,但是她们为博物馆、交响乐、儿童福利委员会以及其他类

似的文化与社会事业筹集资金（奥斯特兰德，1984）。

二

美国的社会流动

与其他高度工业化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人们从一个社会阶级向另一个社会阶级流动的难度有多大？美国一直被称为“机会的王国”，意思是有很多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 50 年代的一项经典的客观研究发现，美国的社会流动率大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同（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1959）。在每一个被研究的国家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体力劳动者（蓝领）子女找到了非体力劳动的工作。瑞士向上流动率最大，原西德最低，美国居中。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流动率相近，因为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经济形式。每一个国家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相对于蓝领工作而言，白领工作的数量增加了，因此而减少了蓝领工人，增加了白领工人的比重（戈德索普，1987）。

后来一项跨国研究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上述发现（福克斯和米勒，1965）。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总体上来说，从体力职业向非体力职业流动的机会，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当接近。然而该研究指出了一个例外，在美国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变成专业精英的流动现象多得多，这是一种从很低社会地位向很高社会地位的流动。

最近一些年美国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了吗？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向上流动稍稍有一点增加的趋势（布劳和邓肯，1967；弗瑟曼和豪泽，1978）。可是近来这种向上流动的趋势已经放慢，甚至逆转（布隆伯格，1981 年；列维和米歇尔，1991）。

近年来，社会学界就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正在消失”的美国中产阶级现象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帕姆派尔、兰德、菲尔森，1977 年；布莱克本和布卢姆，1985；纽曼，1988）。从二战后到 1973 年，中等家庭的收入因通货膨胀调整后迅速增加，但是后来却几乎没有变化，而此时像住房以及医疗保健之类的开支增长速度比通货膨胀增长速度大得多，结果是除了富人之外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有明显的经济压力。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这样的假设，即认为每一代人能够比其父辈生活得更好，而今天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子女正面临着这样的严峻现实，即他们要达到其父母的水平都可能是幸运的，而且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千百万中产阶级家庭担心他们可能跌入工人阶级的境地，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中的边缘成员正面临着贫困的危险。以前可望实现的目标，诸如再买一辆汽车、一年休假一次、孩子受到大学教育，甚至拥有自己的住房等等，似乎正在悄悄地消失。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向下流动这种令人不快的增长与个人工作能力或者工作绩效无关，主要是由于美国和世界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去工业化

(deindustrialization) 就是这样一个因素：美国制造业的一些部门在萎缩，因为管理人员发现在国外生产小汽车、从事数据开发、编写计算机程序、制造电子产品更有利可图，那里工资率比美国低得多。另一个因素是，80年代出现大量公司被兼并、收购现象。这两个因素减少了中层管理职位的数量（布卢姆斯通和哈里森，1982；哈里森和布卢姆斯通，1988）。许多大公司中层管理职位急剧减少的势头到90年代初仍在继续。向这些类型的职位升迁过去一直是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产阶级流动减少的另一个方面是，战后出生的那代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这一代人人数太多，所以根本没有那么多职位可以提供，他们晋升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这一代人很多青年人体验不到他们成长时所期望的向上流动。

生活机会中的阶级差异

社会阶级位置（社会经济地位）对我们有着巨大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与工作、我们的闲暇消遣、我们的政治态度都受到社会阶级地位的影响。社会阶级最重要的影响或许是对我们生活机会的影响。所谓生活机会（life chances）是指一生中獲得一些重要目标的可能性。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考察阶级地位与全部生活机会的关系。

1

社会阶级、健康与寿命

健康是生活机会的一个基本的决定因素，在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质量及寿命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社会中衡量健康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婴儿死亡率。一般来说，在美国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比白人低，所以对这两个群体的婴儿死亡率进行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阶级地位对健康的影响程度（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黑人在地位较低的群体中占的比例过大，但是大多数地位较低的人却是白人，而大多数黑人并不是下层阶级的成员）。1990年黑人婴儿的死亡率是17‰，白人是7.7‰（美国卫生与人力服务部，1991）。

下层社会阶级成员比其他人生活机会更差的另一个指标是由寿命统计得出的。今天白人平均寿命可望达到76.4岁，而美国黑人只能达到70.0岁。黑人的寿命只有65.6岁（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一项有争议的研究报告指出，纽约市哈莱姆（因其贫穷和住房条件差而闻名）的美国黑人的预期寿命很少能够达到发展中国家孟加拉国男子65岁的水平（《纽约时报》，1990年2月24日）。

产生上述预期寿命巨大差异的一个原因，是下层阶级中经常出现慢性病和流行病。另外下层阶级由于缺乏如何保健的知识而加重了这种不利状况。他们不仅难以有钱注意营养，而且也缺少如何选择平衡食谱的知识。食谱和健康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毫不奇怪，在穷人中营养不良和高血压病比在其他

人群中更为普遍(赛姆和伯克曼, 1986; 盖格, 1971)。穷人中心理疾病也更为普遍(凯斯勒和克利里, 1980)。

低收入的人不仅更常生病, 而且他们接受的医疗保健水平也比高收入群体低。在穷人聚居区医生很少。穷人因此常常被迫到公共医疗机构就诊, 这种机构一般很大, 人很多, 医务人员水平比私立医疗机构差。更为糟糕的是, 由于财政问题, 大城市中心许多穷人可资利用的医院设施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关闭了(法利, 1988)。

少数民族医生数量少、信誉低也影响了穷苦的少数民族群体成员获得医疗援助(科克拉姆, 1992)。另外, 穷人通常缺乏适当的健康保险。1991 年, 29.0% 的拉美籍美国人和 18.4% 的美国黑人没有得到健康保险, 相比之下只有 12.5% 的美国白人没有健康保险。

然而, 有必要指出的是, 很多权威人士认为得不到健康保障问题最严重的并不是那些非常穷的人(他们能够享受医疗补助), 而是那些有工作的穷人和下层工人阶级, 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医疗补助的福利, 这类人常常从事那些不提供健康保险的工作, 而他们自己又买不起私人保险。

更糟的是, 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员更有可能受各种工作和住房的伤害。有些职业病, 例如由石棉引发的矿工黑肺病和癌症, 主要发生在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不卫生的行业工作的体力劳动者中。工作事故的受害者几乎都是下层阶级的人。另外, 地位低的美国人家庭事故较多。在下层阶级家庭中经常发生煤气中毒(通常由冬天用于房间保暖的小型取暖器引起)和铅中毒(来自炉火和剥落的油漆)。低收入的人也更有可能居住和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以及堆放有毒废物的地区。因此,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家里, 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人都更有可能比中产阶级以及上层阶级的人因受到毒害而减少寿命。

最后, 下层阶级的人最有可能死于“非自然原因”。1990 年每 10 万人中死于事故和暴力的黑人男子是 142 人, 白人男子是 81.2 人, 黑人妇女是 38.6 人, 白人妇女是 32.1 人。黑人与白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凶杀率的不同: 黑人男子为 0.69%, 而白人男子为 0.09% (美国人口普查局, 1993 年)。

2

社会阶级 与法律

大量研究有力地表明, 人们的社会阶级地位影响其接受法律服务的方式(阿尔本蒂, 1991)。原则上, 所有的美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然而, 有时情况并非如此。下层阶级的罪犯比有钱的罪犯更容易被抓住, 一旦被捕, 一般不可能花钱请高水平的人为其辩护(布隆伯格, 1970)。当他们出庭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史, 往往包括逃学、失业、离婚以及按照中产阶级标准评判的明显缺乏责任感的一些东西, 会不利于他们。结果, 低收入的罪犯同样的罪行受到的惩罚可能比高收入的罪犯重。因为低收入罪犯往往付不起保释金, 所以他们通常只得呆在监狱的监号里等待审判, 而不是住在自己舒适的家里(详细内容可参见第八章关于社会阶级与犯罪之间的关系)。

受教育的机会是另一个受到社会阶级地位强烈影响的生活机会。为了获得一个享受美国社会许多好处的机会，教育是十分关键的。例如，大学毕业生年平均收入比受教育很少的人要高 50% 左右。一项对大约 9 000 名学生的经典研究发现，那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很高的人，中学毕业后获得继续教育的机会几乎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出身的人的 2.5 倍（休厄尔，1971）。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学习成绩与社会阶级地位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即使智商接近也如此（鲍尔斯和金提斯，1976）。阶级地位较高家庭的子女受到更强的鼓励去追求并重视更高的教育，这一点可以部分解释社会阶级地位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克尔克霍夫，1986），不过无力支付高等教育费用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参见第十五章）。

一项开拓性研究表明，下层阶级的人与阶级地位较高的人相比，社会参与的机会以及从中获得的好处较少（艾克斯洛德，1956）。他们朋友较少，认识的邻居和同事较少，参加的团体较少——一句话，他们很少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交往。后来一项对北卡罗莱纳州居民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霍夫兰、金和克里斯坦森，1979）。

贫 困

贫困（poverty）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对于那些体验过贫困的人来说，它纯粹是个人的感受——一种腹中空空的感觉，一种从自己的孩子眼中看到饥饿的感觉。美国今日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成为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学分析的社会条件。

贫困的定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它受政治与道德观以及经济的影响。贫困的定义既可以是相对的又可以是绝对的。

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的定义把任何社会成员中一定比例的人口看作是贫困的。如果一个人一特定社会中被认为远远低于正常水平，那么他就是相对贫困。例如，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贫困的收入水平是全国中等收入的一半，他们认为任何落入或者低于这一水平的人都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的定义确定一个低于个人或者家庭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线。使用绝对贫困定义，从理论上说，某个特定社会有可能不存在贫困现象。

尽管还没有令人完全满意的定义贫困的方法，但是为了实施社会福利计划，需要有一个定量定义。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要有数值性的贫困线 (poverty level) ——一种特定的收入，用于判定谁是官方认定的穷人——目的是决定谁有资格享受某些社会福利待遇。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一套计算贫困线的方法，这种贫困线反映的是绝对贫困，是根据足以买到维持基本生存所需食物的收入量计算的。国家与地方政府以及私人机构也经常依靠这个定义。考虑到通货膨胀以及家庭规模的变化，贫困线每年都要重新计算。1991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13 924美元。

联邦政府的贫困线最早是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它是由美国农业部根据最低食物预算计算出来的。这个预算仅够购买维持人们生活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营养品。然后这个基本食物预算乘以3就得出贫困线，换句话说，就是假定食物开支占到穷人家庭整个开支的三分之一。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一个四口人的贫困家庭的支出细账来加以说明（根据1990年数据）：

全部收入	13359 美元
食物	4453 = 3.05 美元 /人 /天
住房	4453 = 371.08 美元 /月
其他必需品	4453 = 92.77 美元 /月
(每人的衣服、交通、医疗、日用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贫困线只涉及到现金收入，没有考虑到许多穷人收到的诸如食物券之类的非现金（“以货代款”）补贴。然而，在这些补贴之外还可以得到补助，因为贫困线的食物预算太低。实际上，有些社会科学家已经提出，政府定的贫困线太低。一位研究者指出，“如果测量方法大大改进，调整各种因素，增加食物预算，考虑到以货代款、已纳税款以及少报的收入，那么贫困人口就很可能多出500万至2 000万人”（罗杰斯，1982）。

2

贫困发生率

贫困发生率因时而变。贫困不仅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表10—2说明了美国从1959年到1991年贫困人口的变化状况，这个数字是由美国政府测算的。

表 10—2 美国的贫困状况（1959—1991 年）

年份	贫困线（美元）	贫困人口数（百万）	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贫困率）
1959	2 973	39.5	22.4
1965	3 223	33.2	17.3
1973	4 540	23.0	11.1
1979	7 412	25.3	11.6
1987	11 611	32.5	13.5
1991	13 924	35.7	14.2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2》；《时代》，1984年8月3日。

是什么经济条件和政府政策引起了过去25年贫困率的变化呢？尽管对

这一问题有着激烈的争论，但是通常认为1959年至1965年贫困率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状况较好，1965年到1973年贫困率继续下降似乎更有可能是持续繁荣的结果，而不是60年代数十亿美元反贫困战的结果。贫困人口规模在整个70年代很少有变化，但是在80年代初贫困率再次上升，可以两个主要因素解释这一现象：经济状况和有争议的政府对社会福利计划的削减。

1991年总的14.2%的贫困率掩盖了特定群体特别高的贫困发生率——具体地说，美国黑人是32.7%，拉美籍美国人是28.7%，儿童是21.1%（参见图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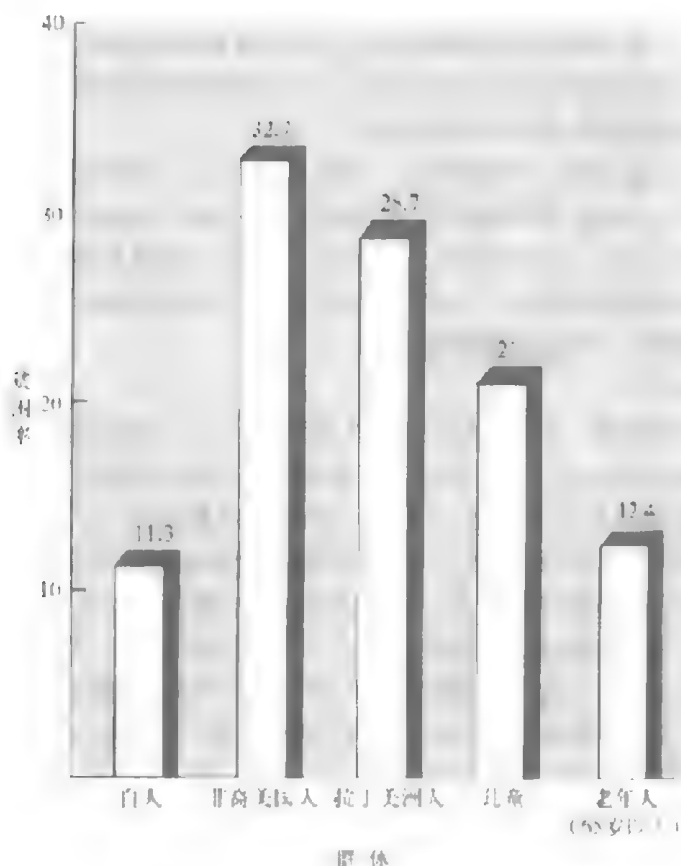


图10—1 1991年美国一些群体的贫困率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3》。

3

穷人与就业

尽管许多穷人不能工作，但是他们大多数人至少做一些零活。这些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长期就业不充分，也就是说他们从事工资很低的工作。1991年最低工资是每小时4.25美元。这个工资水平一年的全部收入（按每周不缺勤，40个工作小时计算）只有8840美元，这个收入比1991年四口之家13924美元的贫困线要低得多。

没有工作的最大穷人群体是那些呆在家里做家务看孩子的人，这些人主要是没有丈夫的女户主。不工作穷人中另一大群体是那些有病或者残疾的

人。很少有工作的穷人是身体好又没有孩子拖累的。

4

贫困的原因

责怪受害者

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在美国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穷人应该对他们自己的不幸负责。按照这个观点——社会科学家通常称之为“责怪受害者”的例子——任何人都有同样的通过努力工作得到发展的机会。如果一个人贫穷，他个人肯定在某方面不成功。这个思想是很多人对福利计划不满意的根本原因，人们认为享受福利计划的人太懒、不工作，或认为他们不道德的行为导致了家庭人口很多而且往往家庭破裂，所以依赖于福利。通过福利来支持穷人因此被认为是浪费纳税人的钱，鼓励人们继续他们的不正确行为，其中包括十分普遍的福利欺诈行为（克卢格尔，1987）。

社会科学家一般反对这种观点（菲尔森，1991）。他们认为，贫穷不是穷人的过错，而实在是受害者无法控制的环境的结果（瑞安，1976）。有一种观点认为，存在一种贫困文化（poverty culture），使穷人得不到他们向中产阶级流动所需要的条件。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中存在着结构性障碍，使穷人几乎难以摆脱他们的处境。

贫困文化

贫困文化是指一套穷人共有的规范和价值观，这一思想是由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对墨西哥和波多黎各贫民窟居民进行一系列研究之后提出的（1959，1961，1964，1966）。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全世界许多城市穷人的特点。当一群人几代都忍受经济剥夺之苦时，那么就会产生一种适应这种剥夺的文化——也就是说，它能使穷人克服这种极端环境。这种贫困文化的特点包括屈从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这些价值观适应于条件没有希望得到改善的环境。

然而，很不幸的是，像任何一个文化传统一样，贫困文化能使自身永久存在。刘易斯认为：

一旦（贫困文化）存在，它就会一代代存在下去，因为它对孩子有影响。在孩子六七岁以前他们通常已经接受了这种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从心理上不适于充分利用一生中可能出现的变化条件或者增长机会（1966）。

贫困文化的概念对60年代开展的反贫困社会计划有着重要影响（下面讨论）。这些计划中有许多是旨在改变穷人的个人素质——包括文化价值观，希望以此能使他们更有效地参与职业市场的竞争。职业培训、职业咨询和职业定位以及补偿教育就是这样的例子。

贫困文化观的批评者认为，这恰恰是责怪贫困受害者要为他们自己状况负责的一种更加老到的办法。他们的观点认为，不是文化价值观而是社会不公正引起了贫困。另外，批评者还认为，刘易斯并没有有效证明存在一个与社会上其他文化相区别的贫困文化。例如，这一点就可能引起争议，即穷人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并不比中产阶级更具有特点，惟一的区别在于中产阶级能

够自信地预期未来，那时他们能够实现这些理想。穷人没有那样肯定的奢望（哈里斯，1988；瓦伦丁，1968，1971）。

结构性解释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许多社会学家开始对那些集中关注贫困者个人以及文化素质的贫困解释感到不满。他们开始寻找文化的结构性解释（structural explanation of poverty），这些解释把贫困归因于社会持续的不平等，例如权力、财富以及其他资源分配等，这些不平等实际上迫使一些人处于贫困。

许多结构性因素减少了穷人获得工作的机会。例如，中心城市的（很多穷人生活在那里）制造业迅速迁向郊区（很少有穷人能在那里生活得起）后，留下的工作主要是低工资或者要求具有较高训练和技术水平的工作（威廉逊，1987）。因此，正如前面所说的，就是在城市能够找到工作，他们的工资也往往非常低，因此工作只能稍稍减轻他们的贫困。另外，制度化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 racism）——我们社会经济制度中持久的歧视——还可能是妨碍许多少数民族找工作的原因，使他们只能找到技术要求最低、最单调、报酬最少的工作（这个问题将在第十一章讨论）。

穷人还受到来自强大经济利益团体的各种剥削。例如，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考虑，为了压缩成本，工资报酬尽可能最低。在努力减少通货膨胀时，政府有时运用提高失业率，特别是在非技术工人中提高失业率的办法。最后，福利制度本身可能不利于鼓励工作：如果工作，领取者失去的好处将比通过工作得到的更多。这些因素一起影响了穷人去选择作为社会所重视的替代福利的工作。

结构因素无可争辩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也不需要考虑个人和文化的因素。事实上，有些研究表明，这两者是复杂地缠绕在一起使福利依赖永久化的。例如，“福利母亲”找到工作有困难，既有个人的原因又有结构性的原因。通常，她们不能把孩子扔下去工作，她们可能因为生活条件以及缺乏基本的医疗保健等会生病。这些都是结构性因素。不过福利母亲也可能缺少教育以及工作经验，使她们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获得经济独立。尽管有缺少教育与经验等结构性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也是个人与文化的因素，它们可以通过教育与职业培训计划得到改变。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是指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社会生活水平而提供的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广义上，社会福利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这里对社会福利的讨论限于收入补贴和福利服务，健康和教育是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的议题。

殖民地的福利

美国人受到早期清教徒价值观的严重影响，他们把贫困看作是道德缺陷的标志。殖民者看不起贫民、乞丐、流浪汉以及所有其他贫困阶级（除了老年人以外，他们大部分是该社区中的老成员）。对穷人的援助是一种由教区或者镇政府实施的地方责任。或者以货代款——食品、衣服、燃料——或者以向那些答应在自己家里援助贫民的家庭付费的形式，向穷人提供救济。通常，镇政府和那些收留搭伙者的家庭提供的援助仅能勉强保证穷人和体弱者活命。另外，这些穷人的房东有时还打骂惩罚他们，特别是打骂那些从镇外来的穷人。



更多的食不饱腹和无家可归者面对更冷的心

60年代在人们的记忆中是嬉皮士、学生造反和反越战的时代。70年代使我们想起的是迪斯科和“我”这一代。现在，在90年代我们经常把80年代和两个形象联系起来：华尔街从事多种商业活动的人和一无家可归的人站在街边，拿着一个纸盒，上面用大字写着“愿为食物而工作”。这两个对比鲜明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近年来富裕与贫困两者都明显增加的社会现实。

没有人知道今天美国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为穷人说话的人经常引用一个300万的数字。比较客观的评估说明任何一天都大约有50万人缺少住房，一年中大约有150万人曾有过无家可归的时候（赖特，1989）。

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成分十分复杂。大约有三分之一是整个家庭：父母和子女。剩下的三分之二是单身男子和单身妇女，其中一些人严重的毒品依赖或者精神健康问题。大约有一半的单身男子和六分之一的女子是醉汉或者是有问题的酒徒。

为什么自80年代中期以来穷人的数量增长这么快？与工业生产衰退及与资本全球化相连的美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可以解释其中的部分原因。里根和布什总统削减社会服务开支也是重要原因。但是在解释无家可归者数量增加时还有几个因素很关键。

首先，无家可归者是穷人中最穷的，大多数情况下其收入只有贫困线的40%（赖特，1989）。有一些人是早年本来应该在精神病院中得到照顾，但是在让精神病出院的运动中被“扔”到了大街上。美国廉价租赁房屋的存量长期持续下降也导致了无家可归者的增多。最后，大多数无家可归者个人和家庭都比较孤立，缺乏能够帮助他们以及愿意接收他们的亲戚和朋友。

当80年代中期无家可归现象是一个新认识到的社会问题时，公众的反应总体上是同情的。然而，随着问题持续存在并且不断恶化，许多观察者指出很多美国人“心肠变硬”了。有人称这种趋势为同情乏力，它对美国人有效对待这一问题的愿望产生消极影响。根据全国市长会议提供的一份1990年的最新报告，那一年对食物的紧急要求增长22%，而与此同时实际可利用的资源只增加了4%。类似地，对住所的需求上升24%，而与此同时床位数量只增加了3%。结果，有14%的食物要求和19%的住所要求得不到满足。

公共政策已经开始反映这种对穷人和无家可归者新的不满。例如，加利福尼亚

的圣塔·巴巴拉的警察现在逮捕睡在公共设施上的无家可归者。菲尼克斯已经减少220张床的住宿设施。而里士满和弗吉尼亚现在对每一张在大街上行乞的执照收取25美元！

资料来源：《ABC夜话：更多的食不饱腹和无家可归者面对更冷的心》，1990年12月19日。

19 世纪的改革

19 世纪，在改革家们批评殖民制度下穷人受到虐待之后，贫民院诞生了，它实际上想保护每一个穷人。贫民院主要是镇上或县上廉价购买的破破烂烂房子，通常由水平最低的政治人物来监管（弗里德兰德和阿普特，1980）。

19 世纪初，贫民院的政策一般是以同一个类型对待所有的穷人，给他们提供同样的服务。老人、病人和流浪汉、盲人、聋子、智力与身体残疾以及精神病人被扔在一起。体格健全的人整天闲坐着，墙壁、家具以及“卫生”设备污秽不堪（卡茨，1986）。

到 19 世纪中叶，私人慈善组织开始为儿童、病人和老人建立专门的机构，把他们从贫民院的恶劣环境中转移出来。与此同时，州政府设立了精神病院和监狱，因为照顾其他一些类型的穷人对于镇和县政府来说成本太高。

大萧条：联邦政府的介入

大萧条这样的经济大崩溃改变了人们对谁应该得到福利以及哪些组织应该发放福利的流行看法。不过，仍有一点人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即关于福利资金发放量应该尽可能少为好。

1929 年 10 月证券市场崩溃，之后的几年里美国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直到那时，人们还认为经济上的不幸只能降临到那些道德上有某种缺陷的人头上。但是大萧条时期严峻的失业形势说明是美国的经济制度而不是个人有问题（皮文和克劳沃德，1982）。地方政府与州政府和慈善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救济中心，但它们几乎破产，所以大批群众接受联邦政府发放的救济品。

当弗兰克林·迪尔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出任总统时，他实行了一系列计划，总起来说叫罗斯福新政，以 1935 年的《社会保障法案》为标志达到最高水平。这个法案是现代福利制度的里程碑，它为老人建立了一个以“社会保障”（参见第十二章）闻名的全国性养老金计划，以失业保险的形式为失业者提供救济。它还实施《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对老人、盲人和残疾人提供帮助。

新政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第一次为那些不能自理的人即老人、残疾人和穷人等负担起了责任。通过提供失业救济，政府也觉得有责任，减缓已经成为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一部分的繁荣与萧条循环的冲击。

大萧条和新政也标志着公众对福利态度开始转变。一些人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从公共机构接受帮助并不是道德缺陷的标志（威伦斯基和勒博，1965）。不过，不能过分夸大这种态度转变。公众对福利计划的接受程

度是因计划不同而有所不同。举例来说,老人福利就特别受欢迎,但是对于资助穷人的计划,例如 AFDC,就有争议。人们认为身体健全的穷人应该工作,自己照顾自己,这一看法十分盛行(在“新闻报道”栏:“更多的食不饱腹和无家可归者面对更冷的心”,讨论了人们对无家可归的穷人日益不满的情绪)。

大社会与反贫困战

60年代期间,林顿·约翰逊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扩大福利范围的措施。这些计划措施总称为著名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和反贫困战(the War on Poverty)。这项新法规很大程度上是对民权运动所提要求的反应。起初,北方城市黑人要求市政府提供更多的工作,对他们的要求有更多的回应。当他们的要求大部分得不到回答的时候,他们开始向联邦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管理部门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扩展了以前的福利并且创造了新的福利。

新的福利采取几种形式,包括一般的现金拨付、专款专用的补助以及为能够就业的穷人提供培训的计划。国会为老人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福利,扩大 AFDC 计划。尽管州和联邦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一些计划的资金和管理工作,但是自6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的责任急剧增加(皮文和克劳沃德,1982)。

2

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

从1950年到1988年,社会福利支出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增长到10.9%。1988年,联邦政府社会福利计划的支出超过8858亿美元。公共社会福利的主要管理中心是美国卫生与人力服务部。该部负责实施大部分收入补贴计划,该计划是公共社会福利的主体。最近一项调查显示,18.3%的美国公众曾经参加过一项主要援助计划(美国人口普查局,1989b)。

收入补贴计划

收入补贴计划给人们提供现金,主要是在他们不工作的时候提供,比如退休或者失业。这些计划对现金如何使用没有任何限制。有两种主要收入补贴计划: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和政府补助(public assistance)。社会保险计划建立在工人和雇主的缴费上,福利是与这些缴费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下,政府补助计划是从一般的税收收入中支付。人们的福利是通过经济情况调查确定的,只有那些收入低以及其他一些符合政府补助计划特点的人才能享受。社会保险福利并不要求经济情况调查。

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是两项最重要的社会保险计划。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老年人、遗属和残疾人保险》(Old 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通常叫做《社会保障》,给穷人分配的收入比任何其他政府现金支持计划要多。大约93%的全部工人接受或者准备接受 OASDI 福利。这一计划是通过向雇员和雇主征税筹措资金,退休时领取福利(或者残疾工人可以早一点)。

65岁至70岁之间仍继续工作有一定收入的人福利要减少——他们1990年每挣三美元就要损失一美元。70岁还工作的人无论他挣多少钱都领取全额社会保障福利。遗属领取退休前去世的工人的福利。

失业保险 (Unemployment Insurance)。失业保险 (UI) 目的是保证那些被解雇的工人有一定收入。这个计划是通过对雇主收税的方式筹措资金 (在有些州也对雇员收税), 税收的收益分配给属于联邦政府原则指导下的州立计划。符合享受失业保险金的条件是, 要求在支付福利之前有最低限度的工作时间以及有最低限度的工资水平。因为穷人是那些最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人, 所以他们最不可能成为享受的对象。1989 年, 美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失业人员领到了失业保险福利。

失业保险计划最初目的是帮助成年男性工人渡过偶尔的失业难关, 直到经济条件改善使他们能够重新工作为止 (福特基金会, 1989)。但是在今天迅速变化的经济条件下, 许多失业工人没有可以再回去做的工作。因此, 这些工人中有很多人需要重新培训寻找新的工作。

《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 与《补充保障收入》(SSI) 是两个最重要的政府补助计划。

《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是公众心目中认为是“福利”的最普通计划。联邦政府支付 AFDC 整个费用的一半以上, 但是计划由各州管理, 它们必须按照联邦政府的大原则确定享受规则以及福利标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保证符合条件的、有孩子的穷人家庭有足够的收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符合条件的是那些孩子在 18 岁以下的单亲家庭。50 个州中大约有一半 (1988 年) 也给父亲失业的双亲家庭提供援助。1991 年平均每个家庭每月从 AFDC 中领取 390 美元。

《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主要用于度过财政相对困难时期, 例如离婚或者孩子出世后这样的转折时期 (奥黑尔, 1987)。大多数 AFDC 领取者是 18 岁以下而且享受福利时间很短, 平均时间为四年 (邓肯、希尔和霍夫曼, 1990)。1991 年有 1 350 万人领取 209 亿美元的 AFDC。

《补充保障收入》。《补充保障收入》是一种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的计划, 它为大约 500 万穷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收入补贴。它的目的是使领取者的收入达到政府规定的贫困线的 75%。60% 多的领取者是妇女, 她们中 75% 是 65 岁以上的老人。54% 的领取者是白人, 25% 是黑人。最近一项调查发现大约只有一半应该得到 SSI 支持的人真正参加了这项计划, 其余的人主要是要么不知道这项计划, 要么为了避免担当福利享受者的污名而不愿参加 (《时代》, 1988 年 5 月 10 日)。

非现金计划

除了收入补贴计划之外, 联邦政府还实施了许多非现金计划 (noncash programs) 和社会服务计划。非现金计划通常是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定的, 往往包括其他一些强制性要求。从 60 年代以来, 非现金援助迅速增长, 1992 年大约 2 200 万人至少领取过一次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定的非现金福利, 这还不包括学校午餐 (美国人口普查局, 1993)。最有名的非现金计划是食品券计划 (food stamp program)。

食品券计划。食品券计划最初创立于 1964 年, 目的是维护食品价格, 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最有效的反贫困计划之一。领取政府补助或者纯收入在贫

因线 130% 以下的人可以领取食品券。可以买回食品以及其他一些必需品的代用券每月向有要求的符合条件的人发放。1992 年总共 2 100 万人领取了这些福利。

其他非现金计划 (Other noncash programs)。1991 年, 2 510 万儿童加入学校午餐计划, 这项计划保证生活困难的学童每天至少有机会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另外一种非现金计划是公共社会福利, 它为特定的困难群体提供特别的服务。1988 年, 这些社会服务花费了 155 亿美元, 其中包括职业恢复、儿童福利、日托、法律援助以及流动工人计划。医疗补助制度 (Medicaid) 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 (Medicare) 这样两个医疗计划是最大的非现金计划。将在第十二章对此加以讨论。

工作福利制

为了减少“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一个人逐渐依赖福利支付而不是靠就业来作为他的主要生活手段的一种状况)中的一些问题, 许多州设置了工作福利制(workfare)计划。这些计划试图通过要求享受福利的人在领取福利的时候参加培训或者教育计划来促进他们的经济自立。在享受福利者参加培训并找到工作之后, 他们仍然可以享受几种州立的服务(诸如儿童保育和医疗福利), 直到他们能够独立养活自己为止。工作福利制强调自给自足, 结果受到大众和立法者的欢迎, 即使有争议, 它也有可能是今后很多年内的一个重要福利计划(米德和林恩, 1990)。

3

社会福利中的问题

在提供社会福利计划方面美国已经比其他发达国家落后。例如, 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是 19 世纪 80 年代在德国首创的, 比美国 1935 年开始实行这一制度早了大约 50 年。考虑到美国比较富裕, 这一落后就令人吃惊了。根据威伦斯基(Harold L. Wilensky, 1975)的跨国研究, 他认为:“我们对全国福利计划的支持止步不前, 我们对享受不到特权的人的服务的管理水平很低。”

公共社会支出(public social expenditure)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美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低(社会支出包括养老金、保健、教育、失业保险以及家庭补贴(family allowance), 其中大部分项目并不仅限于穷人)。美国 1981 年社会支出占 GDP 的 21%, 而荷兰当年社会计划支出占 GDP 的 36.1%, 居世界第一。其他一些国家的比例是: 瑞典 33.5%, 意大利 29.1%, 英国 24.9%, 法国 23.8% (《经济合作组织与发展观察家》, 1984 年 1 月)。

现行福利制度效果如何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 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有很多弊端。这并不是说现行制度完全不成功, 它确实成功地向穷人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和服务。

一个问题是由于这一制度是分类实行的, 所以降低了它的效果。就是说, 这一制度只给那些符合条件的某几类人, 比如那些超过 65 岁的人、低收入父母、残疾人或者未成年儿童等, 提供援助。结果, 那些不符合其中任

何一类的人，无论他们多么需要，也没有资格得到援助。那些特别穷困的无家可归者没有可以接收福利的邮寄地址，也可能得不到福利援助。

许多计划授权各个州确定它们自己的领取条件和支付水平，所以这些计划的支付水平各州有很大差异。例如，1991年每月平均支付给AFDC家庭的福利是461美元，但是最低的是阿拉巴马的114美元，最高的是加利福尼亚的637美元（《世界年鉴》，1991）。批评者还指责各种福利制度之间缺乏协调，从而导致效率不高。有些家庭交叉领取福利。这种交叉加上有些人认为存在领取条件把关不严的现象，增加了福利制度的成本。

对现行福利制度最严厉的批评也许是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其他一些人的指责，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助长了对福利的长期依赖（默里，1984）。他们认为有一种相当高的依赖福利的代际传递水平，享受福利者的子女长大后还依赖福利。这种制度的许多方面是在鼓励这种依赖，包括许多州的享受福利者不愿意参加工作这样的情况，因为当他们有其他收入的时候就有失去福利（特别是医疗福利）的危险。然而方法比较复杂的一项研究已经对莫瑞的论点提出了挑战，说明整个福利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长期在福利榜上有名（桑德斯，1990）；平均每人接受援助的时间大约只有21个月（邓肯，1984）。

最后，最近的研究表明，许多享受福利的人由于各种原因对现行制度并不满意。在许多情况下，支付水平太低难以满足基本需要，不要说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另外，成人和儿童往往感到享受福利是一种耻辱。正如一位福利母亲所说，“当我使用食品券的时候，我感到像一个二等公民。假如我买巧克力奶，人们会看着我，好像我在买一辆凯迪拉克汽车”（波普金，1990）。

福利改革与1988年的《家庭援助法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会在1988年通过了自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来的最重要的福利立法。《家庭援助法案》（the Family Support Act of 1988）目的在于增加穷人的就业可能，以此结束穷困的恶性循环。

该法案的一个重要条款是开创一项叫做“工作机会与基本技能”（Job Opportunities and Basic Skills，缩写为JOBS）的新计划，目的在于为AFDC领取者提供就业、教育和培训机会。JOBS计划包括中学水平的教育、英语水平有限者的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像交通和孩子入托之类的援助服务。工作补助（work supplementation）（即州政府补助一些由私营老板支付的工资）与规定享受福利者有义务通过社区服务活动消费福利钱物的要求，是这项计划中另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所有AFDC享受者都必须参加JOBS计划，但是生病、怀孕以及上学等几种情况可以例外（《国会季度纪事》，1988）。

《家庭援助法案》还为青少年的咨询服务以及降低高辍学率的工程等其他计划制定了条款。它还要求各州更加努力迫使不在一起生活的父亲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不幸的是，法案中的一些条款已经出现新问题。以前当享受福利的人不

要福利去工作时，大多数州还会提供不超过三个月的儿童日托和医疗服务等资助。根据新法律，各州必须提供一整年这样的福利。然而，批评者认为，这些资助提供给照看儿童者的钱不够，法案对改变全国性缺少可供职业父母选择儿童托管方式的状况无所作为。另外，当父母 12 个月的福利期满后，他们很有可能被迫重新回到福利体系中去。

另一个大问题是与实施这项新计划的费用有关。有些州已经发现有必要把就业穷人的儿童日托资助去掉，以便为新福利提供资金。这些迫使一些父母离开工作，依靠福利，使公众承受巨大负担（海因兹，1990）。

今天在美国社会福利仍然是一个最有争议的公共问题。许多美国人关心不断升高的福利成本和福利依赖问题。许多人认为福利是一个无底洞，纳税人的钱花得没有什么效果。现在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定的计划中的福利支出，在联邦政府预算中占有相当大比重。单单 1991 年，AFDC 福利支付的费用就超过 209 亿美元。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福利计划又严重不足。1991 年只有 64% 的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享受到了非现金福利（只有 38% 的穷人家庭享受到了现金福利）。

社会和人口发展趋势说明，最需要福利计划的那些人口将会继续增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传统的福利享受者的比重，从 1930 年的 5.4% 上升到 1991 年的 12.6%。这一趋势有望继续下去，到 2020 年，老人将占到总人口的 15.5%。一份报告估计，到 2040 年美国老年人口大约有 6 560 万人（《家庭经济研究》，1989）。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单亲家庭和非家庭户（nonfamily household）（就是住在一起的人没有亲属关系）估计会增加，它们一般会比结婚夫妻组成的家庭户对福利津贴需要的程度高得多。最后，从拉丁美洲和亚洲到美国的新移民也可能对福利有着迫切的需求。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社会学家一般认为美国有五个主要社会阶级：下层阶级、工人阶级、下层中产阶级、上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这些阶级在其成员的财富、权力和声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他们在典型职业、价值观和休闲活动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别。

2. 历史上美国所提供的社会流动机会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多，但是有一个例外：从地位较低的体力职业向地位较高的专业化职业流动，美国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社会学家正在讨论最近出现的中产阶级向下流动现象增多的意义。

3. 社会阶级地位对人们的生活机会有着深刻影响。所谓生活机会是指

一生中獲得一些重要目標的可能性。與社會上其他人相比，地位較低的人可能壽命短健康差，享受不到平等的法律，接受教育的机会少，社會參與的机会有限。

4. 貧困是指在物質資源方面處於匱乏或遭受剝奪的一種狀況，其典型特徵是不能滿足基本生活之所需。按照相對貧困的定義，在一個特定社會中如果一個人物質上比正常水平少得多，那麼他就是窮人。與此相對，絕對貧困的定義確定一個收入線，低於這條線，個人或家庭就不能維持最低水平的生活。聯邦政府建立了一個計算貧困線的方法，該貧困線是指用於區分誰是官方認定的窮人的一種具體收入標準，它反映的是絕對定義的貧困，是根據足以買到維持基本生存所需食物的收入量計算的。

5. 美國的貧困發生率變化較大，主要隨著經濟條件和聯邦政府的政策而變。1991 年貧困率是 14.2%，這意味着那一年 14.2% 的美國人口收入處於或者低於貧困線。許多貧困家庭的戶主去工作，但是他們的工作通常斷斷續續，而且工資低。

6. “責怪受害者”是一個通常用來描述認為窮人的窮困主要是他們自己的責任這樣一種傾向的詞語。社會科學家提出瞭幾種解釋持續貧困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存在一種貧困文化，即一套窮人共有的規範和價值觀。根據這種觀點，窮人由於接受了包括無能意識和不願規劃未來在內的一套價值觀，從而適應瞭貧困。這些價值觀抑制瞭他們利用已有機會的能力。許多社會科學家不同意貧困文化的觀點，他們轉向貧困的結構性解釋，這種解釋是認為貧困是社會中持續的不平等造成的，例如權力、財富和其他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實際上迫使一些人處於貧困狀態。

7. 廣義上講，社會福利是指為了促進個人的功能發揮和使之獲得最低的社会生活水平而提供的一系列項目、好處和服務。

8. 在殖民地時期，公共福利是地方的責任，對窮人的援助通常不足。19 世紀的改革產生了貧民院，病人和老人往往和窮人、精神病人仍在一起。到 19 世紀中葉，州政府開始參與慈善活動，地方政府開始為窮人建立專門的機構。大蕭條和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 30 年代的新政標志著聯邦政府開始參與公共福利。新政的里程碑是 1935 年的《社會保障法案》，該法案為老人提供養老金、提供失業補償、為有孩子的窮人家庭提供援助。在 60 年代的大社會和反貧困戰計劃時期，政府擴大了它的參與範圍，擴大了以前的福利，創立瞭新的福利，其中包括一般現金補助、專門的津貼以及為有就業能力的窮人提供職業培訓計劃。

9. 今天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是由許多計劃組成的。收入補貼計劃的兩個主要類型是社會保險，包括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以及像 AFDC 和 SSI 這樣的公共援助。兩個類型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社會保險是一種僱主和僱員共同繳費享受福利的計劃，而公共援助則從一般稅收收入中支付，它的福利只有那些收入低於一定經濟水平的人才能享受。社會福利還包括許多非現金計劃，例如食物券計劃、特定貧困群體的各种社會服務以及工作福利制。

10. 美國社會福利計劃的發展比較落后。儘管福利制度確實為窮人提供

了大量的金钱和服务,但是大多数观察者认为这一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其中一个问题是享受福利的资格是分类的,因此该制度就把许多需要援助的人排除在外。另外还有各州福利不平等、福利交叉重叠、成本高以及它本身不利于刺激工作等一些问题。

11. 1988年的《家庭援助法案》是希望通过给那些需要找到工作的人提供技术和培训以减少他们对福利的依赖。这一法案还为不再享受福利的人制定了条款,为他们提供过渡时期的儿童看管、交通、医疗福利。

12. 今天在美国社会福利还是最有争议的公共问题之一,福利改革进展缓慢。人口老龄化与单亲家庭和非家庭户的增加,表明福利人口可能继续增加。

推荐阅读书目

1. 科尔曼 (Coleman, Richard P.) 和瑞因沃特 (Lee Rainwater), 1981. 《美国的社会声望: 阶级的新维度》 (*Social Standing in America: New Dimensions of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 该书根据在波士顿和堪萨斯市进行的调查, 分析了人们自己眼中的美国社会阶级。

2. 金克斯 (Jencks, Christopher), 1992. 《反思社会政策: 种族、贫困与下层社会》 (*Rethinking Social Policy: Race,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这是一本有影响的文集, 书中研究了下层社会的现象。

3. 卡茨 (Katz, Michael), 1988. 《在贫民院的影子下: 美国福利社会史》 (*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 A Social History of Welfare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该书从19世纪的贫民院讲起, 介绍了美国公共福利的历史。

4. 克罗吉尔 (Kluegel, James R.) 和艾略特 (Eliot R. Smith), 1986. 《不平等的信念: 美国人眼中的实然与应然》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mericans' View of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 Hawthorne, N. Y.: Aldine de Gruyter.) 该书对美国人评价各种社会不平等的方式进行了探讨。

5. 罗斯 (Rossi, Peter H.), 1991. 《穷困潦倒: 美国无家可归的根源》 (*Down and Out in America: The Origins of Homel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该书是一个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对美国的一个最紧迫问题进行的调查分析。

6. 鲁宾 (Rubin, Lillian B.), 1976. 《痛苦的世界》 (*Worlds of P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该书是一项关于阶级体系对蓝领工人生活影响的经典性研究。

7. 斯诺 (Snow, David) 和列恩·安德森 (Leon Anderson), 1993. 《他们穷困潦倒》 (*Down on Their Luc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该书对街头无家可归者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研究。

民族、种族与少数民族

大多数到美国参观的人会立刻被其鲜明的民族与种族多样性所吸引。单纽约市就有唐人街、小意大利、拉美人的哈莱姆和黑人哈莱姆；人口多的有希腊人、哥伦比亚人、犹太人和韩国人，人口较少的有数十种其他民族群体。国家民族与种族的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它的文化生活。爵士乐、萨尔萨舞曲、说唱乐、雷盖乐（reggae music）以及世界各地的烹饪技术，都还只是各个民族和种族群体对我们社会贡献的一小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是欢迎多样性的，但是它还有一部歧视那些构成多样性的成员的历史。美国的不平等部分是由于处于权力地位的人根据先赋特点限制其他人的机会。民族特性和种族都是先赋的特征。因此，在这个国家中，由于许多民族或种族群体的成员具有与众不同的生物性或社会性特征，因而受到偏见和歧视。社会学家把这样的群体称为少数民族。

在本章中，我们将定义民族的（ethnic）、种族的（racial）以及少数民族群体（minority groups）这样一些概念，并讨论偏见与歧视。然后我们描述对少数民族的接受和排斥的主要类型，最后讨论少数民族成员对其地位可能作出的各种反应方式。

民族与种族群体

最早的社会可能是同质性很强的社会，就像今天的一些前现代社会一样，它们可能对具有不同的文化或身体特征的少数民族没有什么了解。可是有文字记录的早期文明确实提到了少数民族，提出了如何对待它们的问题（卡斯提吾和库什纳，1981）。

诸如饥荒、失业与战争之类的环境、经济或政治条件，使得某个社会中处于文化多数派的一部分人离开这个社会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生活，这就是迁移。迁移的结果就是在另一个社会出现了少数民族群体。尽管迁移有时是自愿的，但更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历史上有很多非自愿迁移的例子。阿卡得和巴比伦古城的居民在环绕幼发拉底河周围的肥沃土地变成沙漠时，被迫移居到波斯湾。成百上千万的非洲人被捕捉，作为奴隶被带到美国。更近一点的有，大批阿富汗人为了躲避前苏联的迫害逃往巴基斯坦。

少数民族群体（minority group）指在一个社会中，那些可以通过某些生理的、社会的或文化的特征识别出来的、被这个社会当作偏见和歧视对象的人所组成的任何群体。“少数民族”和“大多数民族”群体的区别不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与每一个群体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密切相关。例如，在南非，黑人历史上一直被当作少数民族，即使它们的人数远远超过白人。这就说明，“主导的”（dominant）和“从属的”（subordinate）这两个词比“大多数”（majority）与“少数”（minority）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两个群体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权力。从属群体的利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中得不到充分表达（班通，1988）。在本章中，我们将使用少数民族群体和主导民族群体两个词。

对于一个可以作为少数民族看待的群体来说，它的成员必须具有共同的特征，既能够被少数民族成员又能够被主导民族成员所区别。能够产生“我们与他们”想法的因素有语言、服饰、肤色、头发颜色、发型以及宗教。这些特征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例如发型、服装和语言；二是由生物因素所引起的，例如肤色和头发颜色。

具有鲜明的社会和文化特点的群体叫民族群体（ethnic groups）。具有鲜明的身体特征的群体叫做种族群体（racial groups）。不过，民族、种族、文化和生物性往往紧密相连。另外，一个社会中各种群体的种种文化与生物上的差异的意义总是由主导群体决定的。并不是所有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都被挑出来作为民族群体看待。同样地，种族主要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生物的概念。对主导群体来说，只有一些确定的群体间生理差异具有足够的社会意义，可以当作种族认同的基础。

民族群体这个词的各种定义差异很大。一些社会学家用这个词是意指来自某一地区的所有人,例如,以色列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另外一些人用这个词来意指讲同样语言或具有同一宗教信仰的一群人。然而,许多当代社会学家把民族群体定义为任何与其他群体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区别、并且有自己的亚文化、有“共同意识的群体”(戈登,1964)。

外群体的人认定某个民族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识别民族群体成员与其他人的社会差异。例如,意大利裔美国人被称做一个民族群体,因为这些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使之与美国的多数人群体以及其他民族群体相区别。这些共同特征包括说意大利语,是天主教徒以及做一些传统食品等。不过,在欧洲,“意大利人”这个词具有一般性意义,并不是指某个单一的群体。该词的含义太宽泛不具有太多的社会意义。欧洲人注意到有北意大利人、南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认为每一个群体都有不同的特点。而在意大利国内,就是这样的分类也显得太宽泛,没有什么意义。在那里是根据地区方言、地方习俗以及像头发和眼睛颜色等体质特征来认定群体的。

在大多数具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群体中,社会与文化差异不仅是外人认定的,而且也是群体成员自己认定的。群体成员认为他们自己与外群体的人不同,外群体人是“非我族类”。把此类群体凝聚在一起的社会与文化纽带可能是宗教的,或者是语言的。但是更常见是一种与特定人口相连的强烈认同感,这是一种把自己群体与所有其他群体区别开来的特殊感情。强烈的民族群体内部产生了一个与较大社会群体相区别的社会系统,并且有着自己鲜明特点的社会化过程。

许多民族群体在种族和文化上各不相同。犹太人民族就是一个例子,别人以及他们自己都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群体。但是准确地说犹太人之间的共同之处是什么?是相同的种族吗?不是。他们的种族来源(叫闪米特人)和阿拉伯人相同。埃及犹太人和埃及阿拉伯人看起来相似。而欧洲犹太人长期与异教徒(非犹太人)通婚,因此闪米特人的特征往往不能使他们和其他欧洲人相区别。宗教也不是犹太人的共同纽带。犹太人的习俗和信仰差异很大,有些自认为是犹太人的人不再实践或者信仰任何形式的犹太教。犹太人也没有共享一种统一的文化。俄罗斯犹太人、波兰犹太人或德国犹太人的文化与叙利亚或摩洛哥犹太人完全不同。

尽管犹太人的社会特点不同,但是使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群体的纽带是他们共同的犹太民族意识。犹太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接受“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扼守《圣经》的逃亡群体。他们记住他们的先辈是一个遭受全世界强敌歧视、迫害和追赶达2000多年的群体。

如同民族一样,种族的观念也极难定义。从历史上看,试图对人种进行

识别和分类的主要是体质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工作，他们对肤色进行分类、对头型进行测量、对发束进行归类。多年来，根据体质特征人类被大致分成三个群类：高加索人、蒙古人和黑人。

然而，随着西方科学家对世界各民族的接触和研究增多，人们发现一些民族不易归入这些常见类型。例如，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就不宜归入上述三个基本类型。这就使人们在人种区分上引入了越来越多的新群类，那种认为人类可以区分为少数几个基本人种的观点逐渐被抛弃了。

所有想把人种确立为几个固定类群的努力，都是建立在种族可以按照该群体所有成员的某些体质特征来定义的假设之上的。随着对人类认识的提高，传统上作为种族分类基础的特征就日益显得有点武断。例如，高加索人与黑人的区别主要是根据头发质地和面部特征。但是有些高加索人种的亚洲印度人皮肤和大多数黑人民族一样黑；而有些黑人，例如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Kalahari Bushman）皮肤却是浅色的。因为用头发和面部特征与肤色相对作为人种分类的标准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因而这种特征选择就显得有点随意（乔利和普罗格，1979；库恩，1982）。

今天大多数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把种族看成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生物概念，认为种族类型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因素比体质差异大。事实上，大多数企图按照种族属性对一个人进行分类的美国机构，例如出于赞助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目的，已经放弃了传统的三大类型，取而代之的是八到十种类别，包括印第安人、美国黑人、亚裔美国人、美籍拉丁美洲人以及美国白人（班通，1988）。

虽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谈论种族概念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仍然是人们相互区分各自的社会类属的重要方式。本书中，种族这个词指的是别人所相信的、具有某些共同的体质特征但基因上有区别的一群人。换句话说，种族更多的是一个社会事实，而不仅是一个生物事实。

由于民族与种族群体经常交叉重叠，因而这一事实往往引起混淆。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是美国特点相对鲜明的美国种族群体，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民族群体。不过，也有些人是从种族上而非民族上属于某一群体。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三代而且对日本文化和传统不很熟悉或根本不熟悉的美籍日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而另外有些人，例如那些因为杂婚而肤色很浅的人，可能从民族上看他们是非裔美国人或亚裔美国人，但是从种族上看并不属于这些族群。最后，一种民族群体可能包括一个以上的种族。例如，印度就有很多种族混合现象，因此常常难以确定种族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用来对人们进行明确分类的是语言而不是种族。

不同社会的种族意识的程度差别很大。例如，在美国，体貌通常被用作社会分类的基础。但是拉丁美洲就很少有这种情况，在那里社会认同既取决于体貌也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鲍彻、兰迪斯和克拉克，1987；斯通，1985）。

种族、智力与性格

关于种族的一个主要问题已引起了许多争论，这就是基本种族类属中的

体质差异（如它们传统上被定义的那样）是否伴随着智力和行为品质的重大区别（例如智力和情感构成等）。这还有待于科学研究给出肯定答案。因为所谓的种族在基因构成上异质性很大，因此要研究纯粹的种族类型是不可能的。另外，由于要把文化上学习的行为与生物遗传的特征区别开来十分困难，而且要准确地不带偏见地测量情感与智力特点也存在问题，所以这样的研究就更加复杂了。

1905年法国阿尔弗雷德·比内（Alfred Binet）和泰奥菲·西蒙（Théophile Simon）发明了第一个有望对智力进行客观测量的现代测试法。社会科学家用这些方法和后来的一些测验方法，对不同种族的能力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早期的结果表明在智力方面，不同种族和民族群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那些对非裔美国儿童以及下层阶级儿童的测验总是得分很低，但这一点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希夫和雷温亭，1986）。

开拓少数民族市场

早期在做带有民族特色广告时，主管人员虽然犯了一些难忘的错误，但从那时起到现在为止向少数民族推销商品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90年代的商人们意识到要想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成功地推销产品，不能光靠在以白人为主的广告上画上几张墨脸，或者使用像“好哇”之类带有民族倾向的能吸引人的用语。博登公司在迈阿密（那里有很多古巴裔美国人）做冰淇淋广告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在墨西哥语中，冰淇淋是“Nieve”，可这个“Nieve”在古巴语中叫雪。有些美国公司成功的广告用语翻译成汉语产生了喜剧效果：“Finger-licking good!”（舔手指很好）变成了“吃掉你的手指”（Eat your fingers off!），“Come alive in the Pepsi generation”（在乐百氏时代活跃起来）变成了类似“乐百氏唤醒了你死去的祖先”（Pepsi. Come wake up your dead ancestors.）。

幸运的是，营销上的文化错误正在迅速成为过去。全球的企业家（除了美国比较特别之外）都已经意识到，在他们向种族或民族群体销售产品之前，他们必须真正懂得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理解他们的文化。工业领袖们利用社会学家、市场研究专家、人口学家以及公众舆论调查者提供的信息，他们比过去几十年敏感得多了，在文化上也成熟得多。今天有50多家专门研究亚裔、非裔以及美籍拉丁美洲人市场状况的广告机构。

很明显，近年来开拓美国少数民族市场的兴起，其背后有着人口原因。自1960年以来，美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差不多是其他人口增长的两倍。在这一期间，少数民族的消费能力有很大提高。

60年代商界意识到了非裔美国人购买力已经提高，于是他们就着手广泛地开拓少数民族市场。第一批进入“民族市场”的商家，向非裔美国人提供产品和服务，它们来自竞争激烈的产业：卫生和化妆品、啤酒和葡萄酒、香烟和食品。然而，今天像电话和通讯系统、快餐食品连锁店、小汽车租赁机构、保险公司以及软饮料制造商之类的品种更加繁多的商家，希望占领更大的少数民族市场份额。例如，在几乎每一个连锁比萨饼店的柜台后面，你现在都会发现一本标准长度的菜单，目的是为了帮助特许经营商赢得更多的西班牙语顾客。

非裔美国人继续成为整个消费市场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今天，非裔美国人



大约有3 000多万人，比加拿大人口还要多，最大的非裔美国人市场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费城、华盛顿区以及底特律。为了满足非裔美国人对特殊商品的需求，现在有很多杂志（《乌木树》和《黑色大理石》就是其中的两个）、电视节目（包括黑人娱乐电视有线频道）以及面向非裔美国人口的广播电台。

在许多情况下，主要直接面向非裔美国人的市场营销活动，也对其他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麦当劳“莫名其妙的”跳绳广告（突出非裔美国儿童的特征）在全国获得了成功：非裔美国人把它作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而白人对此也有很大兴趣，尽管它不是他们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有些地区，在音乐和时尚产业中，引人注目的非裔美国人的样式及其革新被其他群体所热忱接受。

今天美籍拉丁美洲人的市场也很重要。美籍拉丁美洲人现在的年收入总共超过3 000亿美元。全国2 240万美籍拉丁美洲人以比总人口快5倍的速度在增长。大约60%的美籍拉丁美洲人生活在10个城市：洛杉矶、纽约、迈阿密、圣安东尼奥、旧金山、芝加哥、休斯顿、阿尔伯克基、布朗斯威尔以及埃尔帕索，这就使得商家发动针对美籍拉丁美洲人市场的区域性市场营销运动特别容易。

研究表明，美籍拉丁美洲人比较喜欢从讲西班牙语的人那里购买商品。公司利用这一信息，发现它们可以通过统一电视网及其400家分支机构进入82%的美籍拉丁美洲人家庭。“字是写在墙上的”，一位营销专家说，“用的是西班牙语”（菲奇，1987）。

亚裔美国人数量尽管比非裔美国人和美籍拉丁美洲人少，但是他们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一个民族群体。他们的数量在20世纪末有望翻一番。一位专家说（范伯格，1987），“他们是商人的一个梦”，因为他们是美国最富有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的户均收入是28 906美元，比总人口的平均收入高），他们还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29%的亚裔美国成年人有大学学位，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9%）（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商人们开展大规模的吸引亚裔美国人消费者的运动，而金融服务、保险代理、旅馆、航空以及高技术公司只是其中许多产业中的一部分。

最近一些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重新检验这些证据，结果表明上述测验是一种误导（米勒琼斯，1989；欧文和贝里，1988；希夫和雷温亭，1986；古德，1981）。例如，1912年美国智力测验的开拓者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在艾丽斯岛（Ellis Island）对新来的移民进行“智力”测验。他发现83%的犹太人、9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87%的俄罗斯人都是“低能的”（卡明，1974）。然而，戈达德所测验的并不是“智力”，而是一种完成范围很窄的知识型工作的能力，其中一些工作对美国人来说比来自其他社会的移民要熟悉得多。另外，大多数移民不懂英语——有些人对本民族的文字也是文盲——这一事实很显然影响了他们的得分。当有些移民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接受测验，他们的得分就有了提高（希夫和雷温亭，1986）。

今天所用的所有智力测验的方法，尽管看起来可以准确预测一个人将来的学业成绩，但实质上反映的却是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社会、文化及学术标准。智力测验的高分要求像美国中产阶级说话那样掌握英语语言。即使在被

认为不需要语言的部分,比如形状或者颜色搭配,为了完全理解测验说明,仍然要求一些语言技能。另外,一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对于设计和控制测验的中产阶级成员来说是非常浅显的。

今天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相信,种族群体之间的智力可能没有天生的或遗传的重大差别。一个例外是教育心理学家詹森(Arthur Jensen, 1969, 1973a, 1973b),他的观点在科学界引起很多争议。詹森根据大多数常用的智商(IQ)测验中黑人平均得分比白人稍低这一事实,认为用环境因素对这一差异进行解释是不够的。他认为由于不同种族群体的体质特征存在差异,所以有可能他们天生的智力特征也是不同的。他争辩说,这些遗传差异是黑人与白人平均智商差异的主要原因。

詹森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遭到了攻击(威尔逊,1986;泰勒,1975, 1980)。人们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遗传学意义上白人和黑人不是相互区别的种族。估计80%的非裔美国人有部分白人血统,而划为白人的美国人中大约四分之一有部分非洲人血统。

对民族—种族智商的差异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勒林、林德泽伊和施普勒,1975)。

1. 美国社会中各种民族和种族群体成员的平均智商水平的差异可能反映出三个因素:测验本身的偏见、群体环境条件的差异以及群体之间的遗传差异。

2. 现有的证据都可能支持关于上述三个因素都相对重要的各种观点。

3. 如果不考虑上述因素影响,那么有一点似乎很清楚,那就是民族和种族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大大超过这些群体之间的平均差异。

对种族情感构成方面的差异下结论可能更难。有关种族品性和“性格”的许多刻板印象是根据很随便的观察得出的。尽管各种种族群体的情感构成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可能是从文化中后天习得的,而不具有生物性基础。

3

美国的少数 民族群体

每一个美国大城市都有主要是不同民族或种族群体居住的社区。大多数大城市都有一个主要是犹太人聚居的小意大利,还可能有唐人街。报纸和杂志用多种语言出版,在特产杂货店里出售多种民族风味的配料(有些少数民族大得很,可以形成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参见题为“开拓少数民族市场”的“应用社会学”专栏)。爱尔兰人庆祝圣巴特里克节,意大利人过哥伦布节。在俄亥俄的洛雷恩人跳匈牙利的恰尔达斯舞;在新墨西哥的盖洛普,人们跳祖尼雨舞,而在加利福尼亚的德拉诺人们跳墨西哥草帽舞。美国确实是一个拥有数百个公认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这里我们将讨论最常见的五个少数民族:非裔美国人、美籍拉丁美洲人、亚裔美国人、印第安人和白人少数民族。



电影中的非裔美国人

非裔美国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通过好莱坞电影的刻画方式间接地反映了出来，它有如下一些重要的里程碑。

1903年：美国电影中出现第一个黑人人物。这部电影是《汤姆大叔的小屋》的早期版本，该角色由一个带着黑色面具的白人扮演。

1915年：格里夫斯（D.W.Griffith）的内战史诗《一个国家的诞生》受到广泛的欢迎，认为是当时美国电影取得的最大成就。这部电影描述的是南北战争前的奴隶满意他们的地位，并且对战争结束后的三“K”党的角色加以美化。

1922年：受欢迎的系列喜剧《我们一伙》开始上演，喜剧重点刻画了几个黑人人物，其中包括法里纳、斯泰米和巴克威特。这些黑人是非裔守旧的，但是这伙人至少是团结的。

1929—1935年：斯特平·费奇特（Steppin fetchit）在26部非常成功的电影中出演智力低下、说话结巴、行为狡猾的人物。那个时候，如果黑人演员扮演当时流行的歌舞杂耍剧以外的角色，白人观众是不会愿意去看的。

1939年：哈蒂·麦克丹尼尔（Hattie McDaniel）因她在《飘》中扮演红色保姆而获得奥斯卡最佳配角奖，这是第一个非裔美国人获得这样的奖励。

40年代：作为对战时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努力的回应，用现实主义手法刻画种族歧视的一些电影在白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比较著名的有《这就是我们的生活》（1942）、《勇敢者的家园》（1949）、《粉红色》（1949）以及《入土的侵略者》（1949）。

1958年：鲍艾蒂尔（Sidney Poitier）与托尼·科蒂斯（Tony Curtis）联袂主演《叛逆者》，这是最早涉及种族问题的票房价值较高的电影之一。鲍艾蒂尔是当时战后最有市场价值的黑人明星，他一般扮演聪明、受过教育、文化上是白人的人物。鲍艾蒂尔主演的其他电影包括《黑板丛林》（1955）、《太阳下的葡萄干》（1961）、《猜猜谁来吃饭》（1967）以及《夜晚热浪》（1968）。

1968—1972年：在这个民权觉醒的时代，好莱坞生产了大量的黑人体裁的电影，其中大多数是由白人执导的，继续反映传统的形象，只是稍作改动，强调暴力和犯罪。《箭》和《贩毒者》形成了短暂的“吸引黑人观众”的电影流派。

1972年：塞西利·泰森（Cecily Tyson）主演《探测者》，这是一部表现南方农村一个比较优越的家庭的戏，是到1980年为止最后一部严肃处理黑人体裁的电影大片。

1982年：卢·戈塞特（Lou Gossett）因在《军官与绅士》中扮演训练军士而获得奥斯卡配角演员奖。

80年代中期：十多年来，很少有黑人演员找到过稳定的工作了，而此时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yor）和艾迪·墨菲（Eddie Murphy）成为喜剧和动作片的电影明星。胡皮·戈德伯格（Whoopi Goldberg）在斯迪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著名的《紫色》影片中以大牌演员的角色出现。

1989年：斯派克·李（Spike Lee）的第三部电影《做好事》（Do the Right Thing），是对城市中心的紧张的考验。这部电影使他一举成为美国顶尖的导演之一，并开创了黑人电影的新时代。李的电影对引起城市小规模骚乱的事件进行分解，故意对暴力事件采取暧昧态度，把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引言并列放在影片结尾处，李继续制作发行了《杀妻蓝胡子》（Mo Better Blues）（1990）、《丛林热》

(Jungle Fever) (1991) 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 (1993) 等这样一些广受评论界批评的影片。

1989年: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因其在影片《光荣》中扮演一个配角而获得奥斯卡奖,在90年代初成为自鲍艾蒂尔以来最受欢迎的非裔美国人戏剧演员。到1993年为止,华盛顿一直在像《鹈鹕辨讼状》(The Pelican Brief)这样的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而他的种族与人物没有关系。

1991年:23岁的约翰·辛格尔顿(John Singleton)因其大胆的现实主义影片而被奥斯卡提名为最佳导演。辛格尔顿的电影向其他年轻黑人导演执导的类似影片敞开了大门,这些影片包括《走出布鲁克林》(Straight Out of Brooklyn) (1991) 和《第二威胁的社会》(Menace II Society) (1993),它们在白人和非裔美国观众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资料来源:唐纳德·鲍格(Donald Bogle):《美国电影所表现的黑人历史》(New York: Viking, 1973); 托马斯·克里斯普斯(Thomas Cripps):《慢慢褪去的黑颜色:美国电影中的黑人》(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非裔美国人

奴隶制度使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与美国其他所有少数民族的历史明显不同。他们被迫进入美国(开始于17世纪初),漫长岁月里,长期被当作奴隶看待,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本土文化和传统家庭关系基本上被破坏了,个体身份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尽管1865年的《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解放了所有的奴隶,但是内战后通过的法律对非裔美国人的权利作了很多限制,直到1954年这些限制黑人权利的法律才被宣布是违宪的。

今天美国大约有3120万非裔美国人,占全国人口的12.3%。从建国初开始非裔美国人的比例一直是下降的。1776年,非裔美国人占13个州总人口的20%以上。从那时起,向美国的移民几乎都不是黑人。

内战前,大多数非裔美国人作为奴隶生活在南方。他们获得解放以后,逐渐开始向北方迁移。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一迁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1915到1918年间,估计有25万到35万非裔美国人离开南方到了北方工业城市(克鲁斯,1987)。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裔美国人向北方移民更加迅猛,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内移民运动。战争结束时,还有80%以上的非裔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南方,今天只有53%生活在那里了。然而,向北迁移看起来似乎结束了,部分原因是最近阳光地带^①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参见第十九章),也有可能是因为“北方明显地不再是黑人从前所以为的种族天堂”(法利,1988)。

非裔美国公民作为农场工人和农村居民的形象已经被新的现实所取代——城市非裔美国人。1991年,美国56.3%的黑人生活在中心城市里,而

^① 阳光地带(the Sun Belt)指美国南部沿海西自加利福尼亚州,东至北卡罗莱纳州和南卡罗莱纳州一带。——译者注

白人只有 30% 生活在那里。黑人单亲家庭的比例也比较高（黑人 57%，白人 21%），非婚生育率也较高（黑人 67%，白人 17%）（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黑人中等家庭的收入比白人家庭也要低得多：1991 年黑人中等家庭的收入是 21 423 美元，而白人中等家庭是 36 915 美元（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

我们将在本章后面更详细地讨论非裔美国人问题。

美籍拉丁美洲人

美籍拉丁美洲人是美国人口中增长较快的一个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有着共同的语言（西班牙语），一般都信仰宗教（罗马天主教），有着共同的西班牙殖民经历。然而，他们的差异也是很大的（波泰尔和特洛伍，1987）。例如，中产阶级的古巴难民生活与墨西哥工业劳动力，或者与西班牙语哈莱姆的波多黎各制衣工人生活区别很大。这是有些美籍拉丁美洲人反对被贴上“西班牙语”标签的一个原因。美籍拉丁美洲人是一群范围很广的毫无联系的人，他们的背景、国籍、态度以及价值观各不相同，“美籍拉丁美洲人”（Hispanic-Americans）这个词想把他们归成一类，否定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多样性（甘恩和杜伊格南，1986）。因此，用来自哪个国家来指称有西班牙传统的美国人往往更好一些，例如，可以称美籍墨西哥人、古巴美国人和美籍波多黎各人。

整体上看，美籍拉丁美洲人中大多数来自墨西哥、中美洲与南美洲，大约有 2 240 万人，占总人口的 9.01%（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另外，根据联邦政府的估计，美国还有大约 500 万非法移民，其中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西班牙语世界。这就使美国成为世界上讲西班牙语的第五个大国。有的人口学家预测，到 2000 年美国讲西班牙语的人口数量将增加到 2 500 万人（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d）。

美国目前大约有 90% 的西班牙语人口居住在三个州：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以及得克萨斯（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d），可在全美你到处都可以看到、感到讲西班牙语人的存在，大城市中西班牙语艺术家的壁画装饰着许许多多的建筑物，墨西哥餐馆大受欢迎，而在像宾夕法尼亚荷兰式乡村这样不起眼的地方，也有数量可观的讲西班牙语的人定居。美国两个最大的西班牙语群体是美籍墨西哥人和美籍波多黎各人。

美籍墨西哥人。美籍墨西哥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获取西南部美国领土的时期（其中大部分原来是墨西哥的领土）。随着边境几个州的出现，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墨西哥的长期贫困，刺激了墨西哥人越境移民（兰利，1988）。在最近几十年里，大部分墨西哥移民是非法的，形成了美籍墨西哥人社区中一大群“看不见的”无保障的人。估计目前美国的非法墨西哥移民数量在 150 万到 400 万人（法利，1989）。

目前大约有 1 350 万墨西哥血统的人合法地生活在美国。他们大多数人居住在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及新墨西哥州。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墨西哥人及美籍墨西哥人是农业劳动力移民的主要部分。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日益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减

少,更多的墨西哥移民向阿尔伯克基、洛杉矶、菲尼克斯、丹佛、芝加哥等城市流动。

尽管很少有隔离美籍墨西哥人的正式法律,但是这个少数民族群体仍然感到在西南的一些地区难以买到住房。例如,有些房地产经纪人根据购房者的收入、信用等级、“民族亲和度”以及社会地位等,暗地里确定了一套购房资格标准,这有效地阻止了墨西哥人在富裕地区买到房子(弗根,1989)。

工作机会也可能受到限制。大多数不从事农业生产的美籍墨西哥人作为不熟练或半熟练的劳动力受雇于工厂与包装厂,或者当佣人、女招待和送货人。1991年,美籍墨西哥人的失业率是10.4%(白人是6.0%)。

语言障碍使这个群体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努力显得十分困难。有些美籍墨西哥人的子女上学时还不会讲英语,这在过去造成了很高的辍学率。不过,近几年的趋势表明美籍墨西哥人的教育地位有所改善,年轻人受的教育比其父辈要多,而且现在许多人都上了大学。1991年,43.6%的美籍墨西哥人完成了中学学业(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实际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美籍墨西哥人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成为正在发展的美籍墨西哥人中产阶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籍墨西哥劳动力中最重要的部分已不再是农场工人,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甘恩和杜伊格南,1986)。1992年,10.8%的美籍墨西哥工人受雇于管理和专业职位,23.8%从事技术性、销售和管理工作(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

波多黎各人。1898年,美国在西班牙—美国战争中吞并了波多黎各岛,随即波多黎各人开始向美国大陆迁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稳步增加,到50年代初达到高峰。刺激这一移民浪潮的因素有波多黎各人口的迅速增长、岛上经济发展机会不足、对迁移没有法律或者政治限制以及到美国大陆有廉价的交通条件等(甘恩和杜伊格南,1986)。

今天在美国大陆大约有270万波多黎各人,成为一个很大规模的、看得见的少数民族。他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纽约市及其周围地区,但是在像芝加哥、克利夫兰以及费城等城市及其周围,也能发现其他波多黎各人的大社区(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

波多黎各人经历了与非裔美国人和美籍墨西哥人相同的许多困难。他们的教育、职业与收入地位一般较低。1991年,37.8%的波多黎各人收入低于贫困线。25岁以上的波多黎各人只有10.1%是大学毕业(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

因为他们是美国公民,所以波多黎各人政治上关心的事情常常与其他西班牙语群体有很大区别,例如,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非法移民。然而,大多数波多黎各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波多黎各岛的官方地位。波多黎各于1952年成为一个自治政区,因此它有一个很像州的地方政府,但是在国会里没有代表席位。有一些波多黎各人赞成独立,多数人赞成成为一个州,而一小部分人倾向于目前这种地位或者稍加变化。

其他美籍拉丁美洲人群体。美籍拉丁美洲人的第三大群体是美籍古巴人,人数大约在110万人(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很多人定居在南方的

佛罗里达州。与大多数因贫穷而来到美国的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不同,这些古巴人一般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因此,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美籍拉丁美洲人要高。大约 25% 的美籍古巴人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

1980 年费德尔·卡斯特罗决定允许古巴向美国移民之后,80 年代美籍古巴人口数量有相当大的增长。近年的移民中很多人比上一批要穷,受教育水平要低。这引起了生活在迈阿密的有根基的美籍古巴人与新移民之间的摩擦(法洛斯,1983;波泰尔和罗姆鲍特,1990)。

另外 460 万美籍拉丁美洲人来自其他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加勒比国家,包括多米尼哥共和国、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秘鲁、厄瓜多尔、巴西以及阿根廷。他们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形成相当规模的社区(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

亚裔美国人

到美国的亚洲移民与美国人在种族、宗教、文化以及社会组织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福斯特和卡里诺,1987)。如同其他移民群体一样,他们体验到了种族主义、隔离、偏见以及歧视。大多数亚裔移民从西海岸进入美国,他们因此一般留在西部几个州;在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生活的亚裔移民比其他任何一个州都要多得多。

1960 年,向美国移民最多的前十名国家中没有一个是亚洲的,但是到了 1985 年前十名中有六个是亚洲国家。今天向美国移民最多的四个亚洲国家是菲律宾、韩国、印度以及中国(参见图 11—1)。我们这里简要讨论最先到达美国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两个亚裔群体以及新近到达美国的三个群体:越南人、韩国人和菲律宾人。

美籍华人。华人血统的人口现在是亚裔美国人中最大的群体,最近几十年来数量上超过了日本人。美籍华人人口现在达到 165 万人(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

华人移民开始于 19 世纪 40 年代,是亚洲人向美国的第一次重大迁移。这次迁移真正开始于 1849 年的淘金热,几乎全是男劳力。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子作为劳工被运送到美国去修铁路开矿山、在加利福尼亚的农场劳动(金和洛克,1980)。开始的时候,人们欢迎这些中国人到他们的新国家,欣赏他们愿意从事这些艰难的工作。然而,随着到达美国的中国人增多,他们开始与白人竞争工作,这时他们就遭到了普遍的敌视,最后酿成了一场排华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华人遭到迫害、殴打,法律上限制华人的经济权利和受教育机会。1882 年排华运动达到高潮,通过了《排华法案》,完全禁止中国人向美国移民。这部法律直到 1943 年才被废除。

尽管华人受到敌视,但是在禁止移民之前,在加利福尼亚的华人数继续快速增长,从 1852 年的大约 25 000 人增加到 10 年后的 5 万多人。19 世纪 70 年代后,加利福尼亚 10% 以上的人口是华人。

歧视性法律与种族对抗的结果是,许多移民被迫放弃比较理想的工作,去从事诸如家庭服务、洗衣、小商店打工之类没有竞争的工作。华人逐渐控

制了洗衣业，在制鞋和烟草业就业的人数庞大（金和洛克，1980；丹尼尔斯和基坦罗，1970）。到了1920年，在美国就业的华人有一半以上从事洗衣业或者开饭馆（萨威尔，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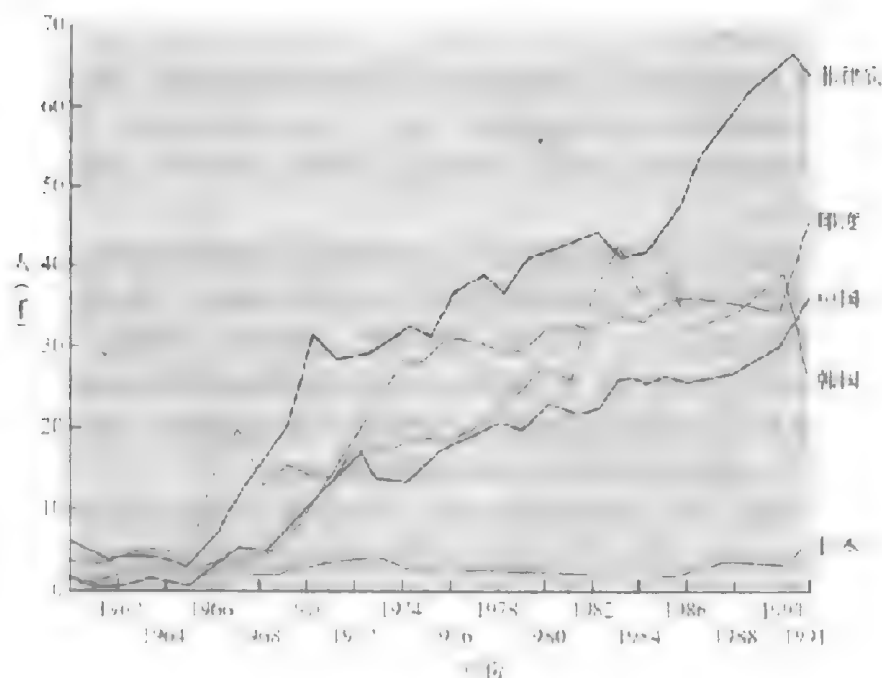


图 11-1 一些亚洲国家向美国移民的情况，1960—1991

资料来源：詹姆斯·福西特（James Fawcett）和本杰明·V·卡里诺（Benjamin V. Carino）（Pacific Bridges）：《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岛屿的新移民》（纽约：移民研究中心，1987）；《世界年鉴》，1992。（New York: Scripps Howard）；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3》（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来由于他们遭到敌视，二则因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仍很强烈，所以华人一般生活在一个与大多数人口相隔离的独立社区中。在全美范围内，他们几乎到处都建立起了唐人街——城市中一个特点鲜明的民族特区。尽管今天许多美籍华人仍然生活在唐人街里，但是也有很多人已经搬出去，在混居的城市郊区社区中生活（丹尼尔斯，1988）。

在20世纪60年代立法向亚裔移民敞开大门之后，美籍华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从1960年到1985年，有55.3万多华人达到美国（菲根，1989）。美籍华人已经成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的教育成就反映在他们现有的职业上，目前29%以上的男子从事科学、会计、绘图以及大学教员之类职业。

美籍日本人。美国84.8万多有日本血统的人是亚裔美国人的第三大群体（菲律宾人是第二大群体）（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他们在美国的历史与华人有点相似，都是作为劳工被带到美国去工作的，但是很快就成为种族

歧视的对象。

日本移民的主流是在华人涌入之后,大约是在1870年左右。大多数日本人定居在西海岸,充当农业和服务业工人以及在小商店打工。有些人当上了店主。与华人一样,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与美国主流社会相隔离(基坦罗,1985)。

日本人的勤劳和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成为法律限制的对象,法律阻止他们进入许多要求许可的行业和职业。而且,(1913年和1920年)还通过了制止早期移民拥有土地的法律。尽管有这么多限制,但是日本人的农业生意仍十分兴旺。

通常被认为,美国政府曾经作出的最具种族主义的法案是针对美籍日本人的。1942年3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拘留(监禁)了所有生活在西海岸的有日本血统的人。11万多人被迫离家,被安置在“重置营”(relocation camps)里。他们大多数人是很少与日本有联系的美国普通公民,对美国的战争努力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他们被迫生活在特别建造的、戒备森严的营区里,一直到1945年最高法院命令拘留结束为止。

今天美籍日本人继续集中在西海岸,尽管许多人已经迁往内地的其他地方。像华人一样,许多日本人取得了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现在是美国收入最高、受教育最好的群体之一,很多人从事专业性工作(丹尼尔斯,1988;基坦罗,1985)。

越南裔美国人。61.5万多有越南人血统的人生活在美国,其中很多人是越战期间或者稍后一点逃离祖国的难民(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到达美国的时候,越南难民在特别的营区里生活,直到能够找到愿意帮助他们安置工作、提供住房以及安定下来开始新生活的保证人为止(李巴,1985)。

与其他难民群体相比较,例如,与那些30年代和40年代逃离纳粹统治的难民以及与1956年匈牙利的难民相比,从就业方面来说越南人是相当差的。大多数人从事比原来国内的职业地位低得多的职业,有些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尽管不像其遭受战争破坏的邻国柬埔寨和老挝难民那样普遍(菲什曼,1986)。解释越南移民社会经济困难的理由有很多,其中包括缺乏一个帮助他们的明确的民族共同体,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以及他们到达时美国经济状况不好等(弗里曼,1989;斯坦,1979)。

韩裔美国人。今天美国有79.9万多韩裔美国人(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和其他亚裔移民一样,最先到达美国的韩国人发觉,歧视和语言障碍使他们不能获得与其教育背景和能力相称的职业。结果是,许多早期韩国移民,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被迫从事像在农场干活、帮厨以及看门等之类的工作。然而,到20世纪40年代,一些韩裔美国人开始建立小型家庭企业,特别是在像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里,这一传统不断发展,继续到今天。他们通常要么是中间人,服务于自己社区中较穷的人,要么是企业家,为更多的异族群体提供饮食及服务(波泰尔和罗姆鲍特,1989)。

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到达美国的韩裔移民中已有许多专业技术人员(数学家、科学家、医生)和企业家。像美籍华人和日本人一样,韩

裔美国人已经相当成功。大约 40% 的韩裔男子从事上层白领职业（美国民权委员会，1988）。

菲律宾裔美国人。菲律宾男子最早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离开祖国，当时他们被招募为夏威夷和西海岸甘蔗园的农场工。这些男子中大多数为了微薄的工资一天劳动 12 个小时。尽管条件这样恶劣，菲律宾人还是源源不断地来到美国，直到 1934 年通过限制迁移的立法为止。菲律宾向美国移民的第二次浪潮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持续到近几十年（丹尼尔，1988）。今天菲律宾裔美国人有 140 多万人。

像其他许多亚裔美国人群体一样，菲律宾裔美国人在受教育与经济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今天菲律宾裔美国人的中等家庭收入是亚裔美国人中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卡比托斯、辛那加瓦和考瓦古奇，1986，1987）。

目前从事上层白领职业的菲律宾裔美国人（31%）比全国平均水平的 26% 高。然而，和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体一样，在菲律宾裔美国工人与白种美国人之间也存在着经济不平等。根据 1980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一项调查显示，就平均水平而言，菲律宾裔美国男子的收入只有白人美国男子的三分之二，而非裔美国妇女所挣的只有白种美国男子的一半（菲根，1989）。

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的历史是被征服与人口减少的历史。后来成为美国的那块土地上，原来印第安人的人口估计大约有 100 万到 1 000 万人之间。到 1850 年，人口减少到只有 2.5 万人了，这是与白人接触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从那时起，生存条件的改善以及较高的出生率，又使他们的人口达到了现在的约 200 万人（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

印第安人可能是今天美国最贫穷、最边缘、最不受重视的群体。1989 年，印第安人的人均收入比白人少 7 000 多美元，他们的失业率平均达到白人的两倍。印第安人的自杀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许多，而自杀率可以反映他们的生活状况（托恩东，1987）。印第安人一般比白人受教育少：只有 56% 的人中学毕业（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

作为受联邦政府法律保护的人，印第安人感到他们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境地（鲍彻、兰迪斯和克拉克，1987）。直到 1924 年，印第安人在美国——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才被授予公民权。过去，联邦政府一般用同样的办法对待所有的部落，没有考虑到部落之间在传统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对部落文化相当麻木无知。例如，在 19 世纪政府试图把印第安人转变为小农场主。政府把土地分配给个人，但是破坏了印第安人的建立在共有制基础上的部落组织。

印第安人的教育一直是一个问题。现行的教育体制是把责任分散到地方学校、私立学校和联邦学校，这一体制与印第安人儿童失学率高、成绩差、自信心不足不无关系。现在正在努力创立部落控制的学校，作为社区生活的中心，在他们的课程中强调印第安人的传统和价值观。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印第安人在全国各地都发起了激进的示威和抗议活动，表达了他们因在较大社会范围里缺少获得物质报酬的机会的不

满, 也表明他们不愿意接受主流文化的价值判断和法律。特别是全国印第安青年委员会和美国印第安人运动两个团体, 反对印第安人事务局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缩写为 BIA) 的政策, BIA 是一个负责印第安人福利的美国政府机构。这些团体认为, BIA 长期以来一直忽视、歧视并欺骗印第安人。联邦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在 80 年代减少对 BIA 的拨款, 现在正在鼓励部落自治 (特林布尔, 1987)。

白种少数民族

全美一半以上的人大概都可以称为白种少数民族 (white ethnics)。这一标签是用于描述欧洲移民的特点的, 他们来自英国以外的国家。

在 19 世纪后期进入美国的白种少数民族, 大多数来自北欧和西欧国家, 特别是爱尔兰、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一带的国家, 他们在文化上与英国血统的盎格鲁人比较接近。不过, 这些群体的成员在到达美国时遇到了很多偏见和歧视, 特别是爱尔兰人遇到的最多, 他们在 1845 年到 1849 年的土豆饥荒期间及以后大批进入美国。然而, 后来几代人通过美国化和相互通婚之后, 很多民族认同大部分不存在, 以致现在对他们是否仍然是少数民族群体存在争议。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而来的白种少数民族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移民大多数于 19 世纪后期以及 20 世纪的前几十年来到美国, 大多数人来自东欧和南欧国家, 特别是意大利、俄罗斯、波兰、希腊、匈牙利和原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大部分定居在东北部以及西部中间靠北的大工业城市, 他们在那里当工厂工人。

白种民族的第二次移民也遇到了很多敌视。不仅是他们的文化与“老牌”美国人不同, 而且他们大多数信天主教或者犹太教, 与信仰新教的盎格鲁人不同。宗教上的偏执一直是这一时代本土主义政治团体的支持者们所表达的主题, 这在 1924 年通过的《国家起源法》中达到顶点。根据这一立法, 制定一个配额, 确定每年可以接受多少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 这样的配额产生了具有种族偏见的后果, 即减少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 但是鼓励源源不断来自北欧新教国家的移民。这一法案直到 1965 年还在实行。

在整个 20 世纪的历程中, 大多数南欧和东欧的白种少数民族成员一直按照先他们而来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的一般方式生活, 逐渐融入一个较大的文化中, 放弃了他们早期定居的民族社区, 沿着阶级的阶梯向上流动。大约一半的白种少数民族成员现在上过大学, 他们是中产阶级中一个较大的正在发展的部分。尽管长期以来把波兰人看成是寡言少语的, 把意大利人看成是有犯罪倾向的都是一种反面的刻板印象, 其中不乏偏见, 但是公开歧视白种少数民族成员的现象相当少见。

这些群体的成员许多人还保持着很强的民族意识, 一是因为他们一般从欧洲来还没有超过四代, 二是因为他们有意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这些努力与开始于 60 年代后期的、以黑色为荣的运动并驾齐驱, 也可能是受到这一运动的鼓舞, 也可能是移民的孙代和曾孙代认识到, 如果他们现在不多了解一些自己的家庭背景的话, 他们可能永远失去这一机会。结果是, 意大利

人、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的人现在都对他们自己祖国的传统食品、服装、音乐以及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阿尔巴，1985）。

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与歧视

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出现偏见和歧视。一个宣称“我的学校是这个城市中最好的，其他所有学校都不好”的人就有偏见。一位只雇佣一个和自己毕业于同一个大学的求职者的老板，对其他求职者也有歧视。尽管这样的行动可能导致误解与失望，但是它们是很随意的，只会伤害到一些人。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社会上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偏见和歧视这样一个更严肃的问题。

1

偏 见

偏见（prejudice）一词拉丁语词根的意思是“判断在前”，因此，从字面上理解偏见就是超前判断。偏见包含两个成分：信念和态度。偏见的信念成分叫做刻板印象，即关于一个类型中所有人、物或者环境的简单化的或未加证实的概括。态度部分是由对于偏见对象的评价性判断构成。因此，也许可以把偏见正式定义为以刻板印象的方式对人、物或环境作出的判断。一种偏见既可能是肯定的，例如认为非裔美国人是优秀的体育运动员；也可能是否定的，例如认为依靠福利的人很懒惰。尽管否定性的偏见非常有害，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肯定性的、带偏见的想法也会歪曲事实，把一个人塞进一个先定的类型里。

一定的偏见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有用的。例如，假如你一个人在大街上，有一个拿刀的家伙要袭击你，而你看见旁边有两个可能会帮助你的男子，一个强壮高大，另一个瘦小，那么你会叫谁帮忙呢？当然是找高大健壮的那个男子。实际上，那个男子可能怕刀，见到流血就恶心，不愿意掺合别人的麻烦事情。另一方面，那个矮小瘦弱的男子可能很勇敢，而且在空手道比赛中得过冠军。但是当时的情况使你不能以两个男子块头大小以外的东西为依据作出决定。

平常类似的偏见例子几乎每天都有。一个商业主管雇佣一个秘书，一个大学生要求某种类型的室友，或者一个家庭选择生活的郊区，所有这些都要有一定的判断，而这种判断是根据以前形成的概括作出的。

当一个人先前形成的判断在事实证明它不是真的以后仍然不改变，偏见就成为一个问题了。还是回到我们前面的那个例子，假设你认出那个瘦子是最近空手道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作出选择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你会想：“高大健壮的人往往比矮小瘦弱的人打架更厉害，但是这个人已经证明是一个出色的斗士，所以我选他会更安全一些。”换句话说，你将会抛弃偏见，因为它无助于你在此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然而，有些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多年来一直相信瘦人不会成为一个好斗士，并对此

深信不疑，根本不会接受（而且甚至拒绝去考虑）与此相反的任何证据。

超前判断在很多情况下对社会互动是必要的，而偏见引起的社会问题与在增加证据后不能抛弃超前判断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大量证据表明，有些人在心理上可能比别人更容易带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阿多诺（T.W.Adorno）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研究表明，有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有专制型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专制主义者把世界严格分成强和弱、好和坏、优和劣。他们靠着等级制度而兴旺发达，对模棱两可的东西感到不舒服。他们一般认为自己的群体比较理想，看不起群体外的所有人。专制型人格形成于儿童早期，一部分是出于父母严格的不可改变的训练，而这种人格通常一代代传递下去。

然而，专制主义只是解释产生偏见的根源的一个部分。尽管人格因素可能使一个人或多或少带有偏见思想，但是社会学家强调偏见总是后天习得的。没有人天生就有偏见。偏见是我们从父母那里、在学校或教堂、从朋友那里以及从读过的书籍中、看过的电视中学习得来的。偏见可能形成一种文化。例如，在北爱尔兰长大的新教儿童对天主教的偏见通常是从所有的社会经验中习得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所习得的大部分东西加强了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思想，认为自己的文化比较优秀，并以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其他文化。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提到过的，人们的思想、态度和感情受到接受流行的信念（包括刻板印象）的社会压力的严重影响。

是什么导致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产生偏见？社会环境的变化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一个已经扎根下来的群体感到另一个群体对它存在经济上的威胁时，偏见一般就会产生。例如，20世纪初新移民群体到达美国时，他们在工作上与定居了较长时间的移民形成竞争。结果，早期移民常常对新的移民群体有偏见和敌意。相反，当人们感到的威胁没有以前那么大时，偏见可能会减少。

几项研究都表明，有些群体的人比另外一些群体成员更有可能对少数民族群体产生偏见。因为工人阶级中的白人往往与黑人在职业上形成竞争，所以他们往往比社会地位较高的其他白人对黑人更有偏见。出于类似原因，上层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偏见特别普遍（威廉斯，1964）。有些社会学家指出，地位较低的群体比地位较高的群体一般更有可能带偏见（辛普森和英格尔，1972）。这一趋势可能是由于偏见可以间接地提高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的地位，假如他们使另一个群体的地位比他们更低，那么他们的地位就可以提高。

2

歧 视

偏见和歧视通常被看作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尽管它们确实经常一起出现，但是把它们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区分也是重要的。偏见是建立在信念上的一种态度，歧视是一种行动或行为。更准确地说，歧视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之成员而对他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

偏见和歧视并不总是同时出现。人们有可能带有偏见，但并不通过歧视

的方式表达这种偏见。例如，有些人可能认为亚洲人较差，但是因为这些人也承诺要实现民主的理想，所以他们不会阻止不让亚洲人住在他们的小区，参加他们的教堂活动，与他们自由竞争工作。相反，歧视有可能是没有偏见的。公司领导可能意识到史密斯女士有能力担任副总裁之职，不过还是拒绝让她出任此职，因为他们担心客户不愿意与一位女主管打交道。“我个人并不反对史密斯女士，但是如果我提拔她将会影响我的生意”这一借口，表明的是歧视性行动的正当性，并不反映个人的偏见。

尽管如此，偏见和歧视往往还是会相互加强。很多种形式的歧视都产生于偏见的态度，而持续的歧视也会产生偏见。如果通过歧视性行为使一个群体的成员得不到足够的教育，那么别人就有可能逐渐认为这一群体智力低下。而到最后，反而可能忘记了这一群体教育的不足是歧视的结果。

美国许多种歧视曾经都是合法的甚至是法律所要求的，比如说投票的限制，在原来的13个殖民地中绝大多数地方，只有有财产的21岁以上的白人男子才有投票权。这一法律限制歧视穷人、非白人（包括印第安人）、年轻人以及妇女。19世纪初，对贫穷白人男子投票的歧视被取消。1870年，对黑人男子投票的歧视在法律上被废除——尽管还有很多微妙的习惯做法存在。1920年妇女获得了投票权。最后，1924年当印第安人获得特许得到投票权后，正式宣告选举歧视寿终正寝。

在美国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非正式的歧视，其中有一些十分微妙。例如，有偏见的老板拒绝招收每一个黑人求职者，说他们都不合格；一个大学的招生官员擅自决定招收犹太人的名额，多一个也不招；房地产代理商不让美籍拉美人看某些小区的房子，解释说“你们不会喜欢住在城市中的那个地方”。想想这些人的行为！

当然，歧视并不是美国所特有的，而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很多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是法律上认可的，特别当少数民族是政治或者宗教上的异己者时更是如此。

3

偏见与歧视的变化形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通过了许多废除歧视性行为的法律。然而，这些法律不会自动改变人们的态度和感情，因此要实施并不容易。很难证明要租房子的人被房东拒绝是因为他是黑人，也很难说明一个求职者没有被雇佣是因为他是意大利人。甚至在证据很清楚的情况下，往往长时间的昂贵的法庭诉讼对实施反歧视法来说是必要的。

增加对立群体之间的接触能够减少偏见吗？在一项开拓性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958）得出结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接触确实有此效果。如果主导群体成员与少数民族成员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如果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彼此合作，相互依赖，如果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着平等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接触是由大家接受的法律或习俗所认可的，那么偏见性态度一般会减少。另外，新近对消除隔离状态的白人与黑人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在消除种族隔离之后他们相互之间的态度有显著改善

(利普赛特, 1987; 彼蒂格鲁, 1971)。

不过, 增加接触并不是普遍有效的解决办法, 有时甚至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例如, 有一项研究比较了田纳西州的橡树岭 (Oak Ridge) 市中学生在校取消隔离制度之前与取消隔离后一年的态度, 结果发现反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实际上更严重了 (坎贝尔, 1971)。检讨 25 年来的研究, 我们发现我们并不真正清楚消除种族隔离和增加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接触是否减少了偏见 (福特, 1986)。

然而, 随着少数民族成员逐渐取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 他们地位的改善有助于修正其他群体的态度。例如, 非裔美国人获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 因此他们找到高收入的好工作机会就增加了, 而他们经济状况的改善可能有助于弱化仍然在我们社会中占主流的一些刻板印象 (彼蒂格鲁等, 1982)。

少数民族的关系模式

在一个社会内部少数民族的待遇可能有很大差异。这一点可以在美国清楚地看到, 法国、德国和瑞典移民没有像非裔美国人、美籍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以及印第安人那样受到持续的歧视。这一节我们将研究主导群体可能对待少数民族的不同方式, 下一节我们将研究少数民族群体可能对他们地位的各种反应方式。

以两大对立的关系类型——接受与排斥——来讨论少数民族关系是很有用的。接受型 (acceptance) 试图使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社会群体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排斥型 (rejection) 阻止对少数民族的接受或使接受程度最小化。

1

接受模式

如果一个社会重视平等和自由, 那么它就有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少数民族群体, 它会努力向新来的移民敞开大门, 使他们能够获得充分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

同化

许多美国人把同化 (assimilation) ——主流社会对于新成员的吸纳——看成是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理想模式。

有两种主要的同化类型: 文化同化与结构同化。移民群体放弃不仅包括语言和服饰而且还包括许多重要的政治、社会 and 宗教价值观在内的大部分传统文化, 接受所移入社会的文化, 这时就出现文化同化现象 (cultural assimilation)。文化同化可能是极其痛苦的, 但是它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三代或第四代人完成的。与此相对, 结构同化 (structural assimilation) 是少数民族成员完全被主导群体的学校、商界、社区以及家庭所接受的现象, 它需要的过程可能会更长。

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同化是按照所谓的熔炉模式 (melting pot model) 进行的。按照这种解释, 人们认为美国所有的民族亚文化群——英国人、爱尔兰人、黑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墨西哥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社会学家承认有这种倾向, 但是他们怀疑现实与此有点不同。这种盎格鲁认同模式 (Anglo-conformity model) 表明, 在很多不同的民族群体融入到这个熔炉的时候, 有些群体已经被迫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文化, 但是其他一些群体, 特别是那些来自不列颠诸岛的人要改变的则相对较少。持此观点的人指出, 美国的政治、法律与社会结构以及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 实际上是对由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带到美国的文化模式稍作修改形成的。

盎格鲁认同模式有助于解释文化与体格上与主导群体相近的少数民族群体为什么一般会更容易很快地被同化。因此, 浅肤色说英语的新教徒群体 (例如, 苏格兰人和加拿大人) 很容易地与美国社会融为一体, 而非基督教教徒的、不说英语的黑皮肤民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被同化。同化的难易程度也与民族群体的地位高低密切相关。地位最高的民族群体 (当然从主导群体成员的角度来看的!) 遇到的阻力最小。

一般来说, 尽管同化可能是少数民族适应社会的一个积极方式, 但也不是完全有益的。强大的少数民族亚文化群体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天然的资源, 提供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促进新思想的产生和社会洞察力的提高。另外, 少数民族群体的许多成员完全拒绝同化, 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很有价值, 不愿意让其在这一熔炉中消失。

当民族群体抵制同化压力并且努力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时, 有可能引发冲突。例如, 在斯里兰卡, 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这两个有着不同宗教和语言的民族群体, 正在为了和谐共存而斗争 (阿拉沙那姆, 1987)。在印度这样一个由多种不同民族群体、语言和宗教组成的国家, 锡克人、印度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是常有的现象。

混合

如果说同化意味着不同民族和种族的社会和文化融合, 那么混合 (amalgamation) 则指某一民族或种族群体与主流人口在生物意义上的结合。有些混合往往是在两个群体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出现, 不过混合很少是主导的接受模式。例如, 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通婚就没有得到普遍赞成, 而且两个种族体格上仍然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夏威夷和波利尼西亚可以看到真正的混合, 在这两个地方许多种族之间通婚非常频繁, 于是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种族和民族群体。

文化多元论

文化多元论 (cultural pluralism) 是少数民族群体完全参与主流社会, 但是仍然保留许多社会和文化差异的一种文化模式。尽管文化多元论有时被描述为美国的主导接受模式, 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成功。许多少数民族群体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参与。不过, 总体上看, 移民群体可以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一部分文化传统。例如, 希腊移民可以自由加入希腊正教会, 没有要求他

们成为新教徒，他们可以继续吃羊肉串而不必吃奶酪汉堡包。然而，如果他们要在美国社会做事得心应手，他们就必须学会英语，上班时穿美式服装，遵从美国社会的其他许多习俗。

瑞士是一个在文化多元论基础之上运作很好的社会。在瑞士到处都讲德语、法语，还有意大利语。只要一个人能说三者中的一种语言，他就可以作为一个公民完全参与社会活动。瑞士人可以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进行选择，两者地位平等。讲法语的天主教徒和讲德语的新教徒比较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没有一方统治另一方。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如果瑞士人同样对待十几个其他民族群体，那么他们的社会就很可能四分五裂。

2

排斥模式

在下面研究的排斥模式中，我们将对歧视和偏见进行细致的整理和集中的讨论。这些模式通常反映了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通观历史，完全或部分排斥新来的群体一直是大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最常见的模式。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他们担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

消灭与种族灭绝

最极端的排斥形式是消灭（annihilation），即主导群体导致大量少数民族成员死亡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都借助过这种残酷的方法。例如，在古代亚述和19世纪的土耳其，消灭就是一种惯用的方法。两个国家都制定了把被征服的城市或国家的多数居民杀掉的政策。

有时消灭采取种族灭绝的形式（genocide）——指对某一整个民族或种族群体的蓄意摧毁。现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例子是希特勒对欧洲犹太人的“解决办法”，纳粹政府围捕了大约600万犹太人，把他们送进毒气室。

驱逐

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另一种排斥形式是驱逐（expulsion），或者强迫一个民族离开某一个地区或某一社会。从牺牲生命的角度来看，驱逐可能差不多和消灭一样代价高昂。如果一个少数民族群体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家园，那么就要使用强制手段。又因为主导群体往往很少关心少数民族的疾苦，所以通往“新家”之路可能非常艰难痛苦。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军队强迫彻罗基人^①离开他们乔治亚州的家乡，迁居到俄克拉荷马的印第安人居留地生活。在1万人的大迁移队伍中有4000多人在途中死亡。彻罗基人称这一旅途为“泪水之旅”（斯塔克，1946）。又因为他们的文化不适应俄克拉荷马的生活条件，他们在居留地定居以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彻罗基人死亡。

通常在驱逐之前没有努力去安排他们重新定居。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圣经》上所说的犹太人的故事，他们不只一次地被赶进无人居住的沙漠。越南人驱逐华人民族是一个现代的例子。华人被迫渡海迁移，估计多达一半

^① 即北印第安人。——译者注

的人死亡。

政治区划

政治区划(partition)是指某个国家为了使行政边界与某些民族或种族区域更加一致的政治重组过程。有时所涉及到的群体赞成政治区划,例如在结束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印度为了解决占统治地位的印度人与人口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印度人获准控制印度的大部分土地。穆斯林获得西部的土地(西巴基斯坦)以及东部角落上的一小块领土(东巴基斯坦,现在是独立的孟加拉国),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度里和平地生活。另一方面,有时候政治区划是强加的,没有得到所涉及的群体的同意。例如,巴勒斯坦于1947年被英国分成了分治的阿拉伯地区和犹太人地区。

历史事实表明,政治区划并不是解决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冲突的根本方法。这一方法往往产生夙仇。尽管印度的政治区划在当时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它没有结束每一个国家内部继续存在的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普遍歧视(肖、诺尔迪耶和夏皮罗,1987),而且两个民族之间的敌对行动继续存在,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升级。巴勒斯坦分治后40多年来,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仍然处于经常的冲突状态。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于1921年按照宗教线实行政治区划,两者的关系现在也是极端痛苦和仇恨的。

隔离

隔离(segregation)指基于民族或种族特征而将人们的居住地、社会服务或其他设施隔离开来。这是一种国内的政治区划行为,但是其确立的边界是社会与法律的而不是政治的。被隔离的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可能被迫生活在城市的一个特定地方,法律可能禁止他们离开这一地方,除非是去工作。而且可能不允许他们参加主导群体所属的教会或学校,不允许他们参加政府,也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的群体之外结成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

在南北战争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隔离一直是美国黑人与白人关系的主导方式。在美国建国的时候,情况是不同的。非裔美国人本来是作为奴隶被带到殖民地美洲,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对劳动力的需求的。那时,奴隶——并不是所有的黑人——都经历过严重的歧视。奴隶有几条途径可以获得自由,一旦自由,他们就享有与任何其他公民同样的权利与特权。然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随着南方种植园日益依赖于廉价稳定的奴隶劳动力,人们就制定并通过了歧视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的所有黑人的法律。结果,非裔美国人逐渐被迫处于一种隔离的、被奴役的地位。

南北战争之后,在南方出现了一种限制较少的隔离方式。在此情况下,黑人与白人建立密切关系就有了可能,有些社会活动他们共同参加。然而,人们认为公用设施应该平等但是要分开。《1875年民权法案》批准了在提供公用设施中实行“分开但平等”的做法;1883年最高法院裁定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学校。然而学校和公用设施事实上并不相同,特别是在南方。为白人提供的设施远比黑人的好。

在最近几十年里，隔离方式已经废除。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法律裁决以及《1964年民权法案》推翻了“分开但平等”的原则，禁止公用设施中的歧视。非裔美国人现在有权和白人一样上同样的学校、去同样的电影院，公共汽车上的座位也无白人与黑人的区分。但是有些白人仍然反对消除种族隔离的住房制度、社会俱乐部、跨种族的交往与通婚。

在北方，大多数对非裔美国人的社会隔离是与法律相反的居住习惯的结果（达登，1989）。几项研究都表明，北方非裔美国人的居住地的隔离比南方的极端情况丝毫不差，尽管有些证据表明在阳光地带的较新的大都会地区这样的隔离正在减弱（詹姆斯、麦卡明斯和泰南，1984）。非裔美国人所忍受的隔离部分是因为他们肤色有着明显的不可改变的差异。非裔美国人体格上的鲜明特征使他们难以很快被以白人为主导的社会完全接受。

最具种族色彩的隔离形式是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①，这个制度是法律认可的，直到最近还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策最先是由南非白人控制的国大党于1947年提出的。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理由是，不同的种族在传统与能力方面差异很大，因此他们应该各自分开发展。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结果是，南非的黑人与白人生活几乎彻底分开。只允许黑人在白人地区工作，而这种工作通常是很低下的。通过种族隔离制度，人口非常少的白人却能够使黑人处于相当无权的地位。

在几十年来国际国内要求改变这一制度的巨大压力下，南非政府最终采取措施决定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制度。1991年2月，当南非总统德克勒克（F. W. de Klerk）宣布废除所有现存的种族隔离制度法律后，种族隔离制度就退出了官方的历史舞台。然而，存在了几十年的种族、阶级以及民族紧张关系仅仅通过改变法律是否就能够消除，还是一个问题（范登贝格，1990；施勒默，1991）。

3

美国的结构 性不平等

现在大多数种族歧视是非法的，民意测验表明种族偏见已经减少。但是美国社会离实现真正的平等还很遥远。事实上，有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可能正在变得更坏。因此，很多学者呼吁研究民族和种族关系的人要重视种族主义和压迫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詹克斯，1985；菲根，1989）。

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racism）一词是整个社会学领域最难定义的一个词。少数民族支持者和政治自由主义者一般把种族主义看成是主导群体对少数民族群体成员造成伤害的态度或行为。注意到这点，并不意味一种有意识的种族主义，而只是要人们注意到它会产生有害的后果。还要注意，在这一定义中少数民族不会成为种族主义者。

政治保守主义者更赞成与此很不相同的定义。他们认为种族主义是按照

^① 这是一个荷兰语词汇，意思是“分开”。——译者注

不同种族对人们加以区别对待的态度和行动。按照这样的定义，三“K”党和根据法庭要求的赞助行动计划所实施的倾斜雇佣行为都将被看作是种族主义的。

大多数社会学家通过强调态度而非行动来努力避免这种意识形态的危险。因此，种族主义经常被定义为一种认为某一种族天生地劣于或优于另外一个种族的意识形态。

制度化种族主义

有些学者，特别是那些对“自由主义者”定义的种族主义比较满意的人，认为美国社会种族主义最重要的形式是制度性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 racism），这个词是由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和查理斯·V·汉密尔顿（Charles V. Hamilton）在他们的著作《黑人权力》（1967）中提出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指那些看上去是种族中立的、并且通常不是有意制造歧视的一些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实际上有限制少数民族成员机会的作用。这种形式的歧视几乎可以在美国生活的所有制度领域中找到，尽管几十年来法律一直努力保证平等对待少数民族。

人们经常用纽约市对消防队员最低身高的要求作为例子，来说明制度性种族主义。这一要求是在波多黎各人开始大批迁居纽约前很多年制定的，没有理由认为是故意做此要求以防止雇佣波多黎各人当消防队员（波多黎各人一般较矮）。无论这一要求的初衷如何，它的实际结果仍然限制了波多黎各人的机会。

让我们看一下几个重要的公共生活领域中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情况吧。

经济制度。在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很多人都可能随时失业，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在正常情况下，白领工人与专业人员相对来说得到较好的保护，受到经济循环的影响较小；联合起来的蓝领工人也有保护，有较好的薪水、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但是大量的少数民族成员从事季节性或者属于有规律地失业的工作，他们没有保障，工资收入低，得到的福利很少。

因此，许多观察者指出，在我们社会中存在一个“二元劳动力市场”。这一经济中有一个工资较高、工作较为稳定的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还有一个以工资低、工作不稳定为其特征的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不过，如果种族歧视是非法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成员在二级市场就业呢？其中一个理由说，这是过去法律公开允许的歧视所造成的后果，少数民族成员过去常常受到排斥，得不到他们参与一级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术、经验和资历。因此，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正是通过它的这种结构而不带任何公开的偏见或非法的歧视，对少数民族群体造成很大不利。

表 11—1 和表 11—2 记录了美国近年来白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白人与其他群体成员相比，一直是失业率较低，收入较高的。

教育制度。因为教育是获得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机会的主要手段，所以它是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在一个致力于机会平等——美国大多数公民共享的价值——的社会里，我们期望教育机会能够平等。但是直到相当近期，非裔美国人还是受到公开的、而且往往是合法的歧视，得不到优质教育。例

如, 60 年代以前, 有些专门学院和综合性大学使用配额制度, 限制录取非裔美国学生的数量。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学校的研究反复证明, 直到今天许多以非裔美国学生为主的学校要比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学校差得多 (威利, 1984)。在人员配备不足、设备缺乏的种族隔离学校接受劣质教育的青年人, 很少有可能满足大学和老板所要求的很高学术标准。尽管这些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歧视一定的群体, 但是由于过去教育的不平等却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另一个说明教育中存在制度性歧视的例子是大学费用太高, 这对贫穷的少数民族学生获得较高程度的教育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法利, 1988)。仅仅在 1989 到 1990 年间, 大学学费就平均上涨了 6%—7%, 而与此同时州和联邦的财政资助并不没有相应提高。

表 11-1 1980—1992 年分种族和民族的失业率

年份	白人	美籍拉美人	黑人
1980	6.3	10.1	14.3
1988	5.3	8.2	11.7
1990	4.7	8.0	11.3
1992	6.5	9.8	14.1

资料来源: 美国劳工统计局:《就业与收入: 1990 年》(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表 11-2 美国贫困线以下的白人、黑人以及讲西班牙语的人的比例 *

年份	白人	黑人	讲西班牙语的人 +
1959	18.1	55.1	≠
1970	9.9	33.5	≠
1975	9.7	31.3	26.9
1980	10.2	32.5	25.7
1987	11.0	31.1	27.3
1989	10.0	30.7	26.2
1992	11.3	32.7	28.1

* 用百分比。

+ 讲西班牙语的人可能是任何一个与西班牙传统有关的种族。

≠ 没有数据。

资料来源: 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家庭与个人的货币收入与贫困地位, 1983》(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美国人口普查局:《当代人口报告》(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 1993》(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刑事审判制度。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因多种形式的犯罪被逮捕并被判有罪的数量通常比他们应有的数量多。用官方数据对犯罪进行的每一项研究都表明, 非裔美国人被捕、判刑、监禁的比例远远超出一般水平。黑人因暴力犯罪而被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四倍, 因犯侵犯财产罪而被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三倍 (威尔逊和赫恩斯坦, 1985)。

解释这些统计数字的一个理由是少数民族成员比犯同样罪行的主导群体

成员更有可能被捕并被判刑。认真的研究表明,非白人比白人更经常被警察拦住询问,黑人罪犯比犯同样罪行的白人罪犯更有可能被捕,而警察对待黑人嫌疑人的态度更为专断,更带有鄙视性(范奥登、霍文和威伦森,1989)。另外,主要是下层少数民族成员构成的犯罪类型比主要是由中产阶级成员构成的犯罪类型更有可能导致被捕与判刑。因此,刑事审判制度似乎以不平等地位对待少数民族的方式在运作。

制度性的歧视也在政治、住房、大众传媒以及美国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里出现。这种歧视往往不是由有意要伤害少数民族的故意行动所构成。但是其效果恰恰可能和有意的歧视一样是有害的。

赞助性行动

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特别是教育与经济领域的制度性种族主义,美国社会作出反应的主要机制是赞助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即指为了弥补以前歧视所造成的影响而采取的针对少数民族成员的优惠政策。这种赞助性行动,从简单地有意确保向少数民族群体公开机会,到为少数民族求职者或入学申请者预留一定的名额,其形式是多样化的。

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在多种情况下法律都要求有赞助性行动。近年来,法院开始不太愿意批准所谓的“硬性配额”,但是向少数民族倾斜的基本原则作为宪法允许的东西似乎牢固地建立了起来。然而,赞助行为存在很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我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能弥补以前故意歧视所造成的伤害结果。为了使比赛场地真正平坦,作出一定的让步是必要的。另外,他们指出,调查研究有力地说明,要求与赞助行动路线保持一致的商业与教育制度,消除种族隔离比那些没有做此要求的部门快得多,也彻底得多。

赞助行动的反对者们也有一些强烈的意见。许多人把赞助行动贬低为“倒过来的歧视”,并且质问为什么今天的白人为了纠正其先辈们的罪孽后果就应当忍受痛苦。另外,赞助行动可能被认为是对少数民族的侮辱,一个在赞助行动保护下受雇的非裔美国人可能总是必须与这样一个怀疑作斗争,即他(或她)如果没有特别的帮助就不够条件获得那份工作。最后,反对者指出,赞助行动在白人中也极不受欢迎的,因此它的继续实行只会给已经很敏感的种族关系火上加油。

赞助性行动从来没有打算要成为一个永久性政策,而不过只是一个给少数民族提供足够的帮助以使他们克服以前故意压迫所留下的后果的办法,或许明白这一点就能够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将近三十年的赞助行动的结果是,黑人中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情况可能是这样,这一群体对特别帮助的需要不再像以前那样大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下层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问题使黑人中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问题要大得多,可是他们反而不可能利用很多赞助行动所提供的教育与职业优惠。

国内殖民主义

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根源是什么?虽然法律要消除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但是为什么它还会继续存在?一些理论家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在美国的

早期历史中找到。他们说,制度性种族主义是一种称做国内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的经济剥削形式的结果(布劳纳,1969)。

国内殖民主义与15世纪初欧洲国家强加给世界很多地方的殖民主义相似,它是从中发展出来的。当欧洲人对一个地方进行殖民统治的时候,他们总是把自己作为主导群体而把原住民作为从属群体。他们把往往是不情愿的原住民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往往破坏或试图破坏本土文化及其价值观。即使大多数前欧洲殖民地现在都已独立,然而还有很多国家经济上依然由少数欧洲人控制着,仍然依赖于欧洲国家的经济维持。他们保持内部殖民化的状态。例如,印度直到1947年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自从独立后,它的现代化进程就一直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慢。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它的经济持续依赖于英国。

北美的原住人口很少,殖民化过程的早期就几乎被消灭掉了。结果,欧洲的定居者们只得进口廉价劳动力:非洲奴隶。与其他地方的前欧洲殖民地国家的原住民一样,美国黑人即使在奴隶制度取消以后,经济上仍然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在今天,他们可能还有很多人从事低工资的卑微工作。按照支持国内殖民主义观点的人的看法,非裔美国人实际上仍是一个被殖民的民族,处于从属地位,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就反映了这一点。

国内殖民主义观点的批评者认为,非裔美国人并不是惟一个最初作为廉价劳动力来到这里的群体。欧洲移民浪潮——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以及犹太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他们都是起初作为低报酬的劳动力而受到剥削并且遭到歧视的。然而,这些群体逐渐取得了大规模的向上流动。

作为对这一批评的回应,支持国内殖民主义的人指出了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一些重要差异:非裔美国人完全是违背他们愿望而被带到这里的,而且他们的本土文化大部分被破坏;欧洲民族群体是自愿到这里来寻找经济机会的,他们至少能够部分地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不受侵害,而且与非裔美国人不同,法律并没有阻止他们利用美国的教育与经济资源(基坦罗,1985;菲根,1989)。

种族的意义在减弱吗

近年来,在不平等方面种族的意义已经成为学术激烈争论的焦点。在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中,社会学家威廉·J·威尔逊(William J. Wilson, 1978)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在现代工业化时期,在决定黑人生活机会方面阶级已经比种族更重要”。威尔逊认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白领就业机会增加、民权立法的通过以及非裔美国中产的阶级成长,都使种族压迫在许多非裔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威尔逊接着指出,与此同时贫穷的下层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最大的不平等主要是基于阶级的,而很少像过去那样是种族歧视的结果。

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威尔逊(1987)认为,这种城市“下层社会”日益恶化的处境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力量的结果,特别是很多工作从中心城市迁出的结果。随着城市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变(参见第二十二章),技术性的与非技术性的蓝领职业——大量少数民族成员从事此职业——正在迅速缩

减。因此,许多少数民族就找不到新的职业,因为今天的许多职业对教育水平与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威尔逊还指出,由于非裔美国中产阶级迁往郊区,使留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人口缺少中产阶级的行为榜样,因而使其处境更加恶化。

威尔逊的理论引起很大争议。批评者指出,在臆断的非裔美国中产阶级成长的同时,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却增长了100%,与此相对的白人失业率却只有25%。威尔逊的反对者引用这些数字是为了说明,只有很少一部分非裔美国人向上流动成为中产阶级——这一比例非常小,他们认为威尔逊的著作歪曲了非裔美国人的社会体验,夸大了过去几十年里所取得的进步(潘克内,1984)。

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种族的意义可能一点也没有减小。事实上,有些批评家看到了一种正在出现的白人集体反对(white backlash)现象,这是一种由于白人强烈的敌对反应而导致歧视增加的现象,它实际上可能会使今后的种族意义更加重要(威利,1984)(参见“新闻报道”栏:“白人美国中的黑人”,可以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争议)。

白人美国中的黑人

在民权时代结束后的20年里,非裔美国人取得了多少进步呢?有些观察家同意威廉·J·威尔逊(1978)的观点,认为美国的种族意义正在降低。另外一些人指出大学校园里的种族骚乱事件正在增加,还有一些像1991年殴打汽车司机罗德里·金(Rodney King)以及1989年一位误入白人密集的纽约市布鲁克林本桑赫斯特区的非裔美国少年被暗杀之类的事件,证明种族主义仍然非常活跃。

当然,像60年代亚拉巴马前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那样公开声称支持“今天种族隔离、明天种族隔离、永远种族隔离”的态度今天已经不多见了,但是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白人的态度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在表面上改变了。金德(D.R.Kinder)和西尔(D.O.Scars)(1981)指出,公开提倡歧视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所谓的象征性种族主义(symbolic racism)所取代。他们认为,白人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感觉,即认为非裔美国人正在过分地追求进一步的优惠,而这正是一种新型偏见的例证。这些“新的偏见者”一般反对赞助行动,总是把非裔美国人与街头犯罪、依赖福利以及缺乏理想的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态度看起来没有什么偏见,但是可能会和早期公开的种族主义一样产生许多同样的效果。

评估非裔美国人取得了多少进步,也反映了就黑人口产阶级增长的幅度与意义所进行的争论。詹姆斯·布莱克威尔(James Blackwell, 1991)指出,现在40%的非裔美国人是中产阶级。然而,他所说的中产阶级不仅包括专业人员、经理以及白领职员,而且还包括技术性蓝领工人,因而使非裔中产阶层的比例大大增加。1992年,非裔家庭的中等收入是21 598美元,仍然只是白人家庭收入的57%。

另外,甚至成功的非裔美国人还会继续遇到至少是微妙的种族主义。斯佩尔曼学院校长科尔(Johnetta Cole)回忆说,在一次500美元一盘菜的宴会上有一位白客人问她是否在大学的合唱团里唱歌。富裕的黑人男子报告说,白人妇女常常在他们面前防御性地捂住她们的口袋。正如保守的黑人作家谢尔比·斯迪尔(Shelby

新闻报道

Steele) 曾经指出过的, 尽管这样的行为模式比早期直接限制非裔美国人机会的种族主义程度稍轻, 但是它们仍然极其令人不快。

当前非裔美国人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似乎与下层阶级家庭破裂日益增多有关。在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年代, 大多数下层阶级非裔美国人都生活在双亲家庭中; 今天, 尽管种族问题有所改善, 但是大多数贫穷的非裔美国家庭都是由一个妇女支撑的(斯特普尔斯, 1991)。其部分原因是技术要求相对较低而工资较高的工作机会减少了, 与种族主义无关。然而, 这一变化的结果却富有戏剧性: 完整的黑人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只是白人家庭的 88%, 与此对应的是前面说到过的非裔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白人的 57%。

如果黑人群体中的问题是白人种族主义的结果, 那么纠正措施就必须从白人的态度和行为转变开始。另一方面, 如果威尔逊的观点是有根据的, 那么至少部分解决办法需要依靠黑人自助。非裔活动家罗伯特·伍德森(Robert Woodson)号召他的同胞们重建自己的道德和经济, 要谴责为城市年青一代树立了坏榜样的毒品犯和其他罪犯。这样的呼吁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在谴责受害者, 因而被人置之不理, 但是在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似乎无意于继续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计划的时代, 它们有很大的意义。

资料来源:《白人美国中的黑人》, 选自《ABC 夜话》, 1989 年 8 月 29 日; 布莱克威尔(James E. Blackwell):《黑人共同体》, 第 3 版, (New York: Harper - Collins, 1991); 约翰·B·麦克纳黑(John B. McConahay)和小约瑟夫·C·休(Joseph C. Hough, Jr.):《象征性种族主义》, 选自《社会问题杂志》第 32 期, 1976, 23~45 页; 罗伯特·斯特普尔斯(Robert Staples)主编:《黑人家庭》, 第 4 版,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91); 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种族的意义在减弱》(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反应 与心理反应

因为一个社会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定义就是相对来说没有权力的, 所以主导群体的行动通常决定了群体间关系的主要模式。然而, 一切人类关系都是相互的, 主导群体的行动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少数民族群体反应的影响。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这种反应包括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敌视和攻击行动几种类型。

1

被动接受

一条向少数民族群体成员敞开的道路就是他们接受其处境。他们可以调整自己以适应其从属地位, 并且充分利用之。被动接受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汤姆大叔”——斯托的小说(Beecher Stowe)《汤姆大叔的小屋》(1852)中的黑人佣人。汤姆屈从于他的地位, 努力按照可以使他的生活尽可能舒适的方式行事。他按照吩咐的去做, 从不惹事, 忠于主人的利益。因为他的被动行为, 主人对他很好, 他甚至部分实现了个人目标。

在保持群体间和谐相处这个意义上，被动接受对于少数民族成员来说也许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不过，用此办法的人常常要以内心焦虑来换取外表的平静。人们要假装愿意接受自己的下等地位内心会是高度紧张的，因为这需要掩盖自己真实的情感。在接受下等地位的同时又要保持自尊可能是很难的，虽然说不可能。完全接受可能会引起自我憎恨以及其他各种病理上的反应。

另外，被动接受一般支持一种偏见和歧视的社会模式。因为少数民族成员显得很满意，所以主导群体的成员就觉得没有改变的理由。被动接受也会成为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指由于某种信仰或者预测所产生的行为而使该信仰或预测变成了一种真实。换句话说，假如少数民族成员认为他们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以被动接受的方式作出反应，那么他们的处境就有可能永远不会改变；少数民族因为其成员认为处境改善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地位就不可能得到提高。这种信仰就是自我证实。

2

个人攻击行为 与暴力行动

少数民族成员的另一个常见反应是攻击行为。这种反应可能采取对主导群体进行伤害身体的暴力行动，例如，19世纪后期阿帕切人对白人定居点的袭击以及60年代后期美国中心城市的骚乱。由于在这样暴力行动中被抓住的人通常要受到严厉惩罚甚至处死，所以这样的反应一般只是作为最后一搏的手段。

少数民族个人通常寻求比较安全的途径表达他们的攻击行为，例如通过语言或者书面的渠道。少数民族成员可能口头或者在墙上写字对白人进行恐吓，他们可能著书立说表达愤怒。人们通过讲笑话使主导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显得滑稽可笑，也可表达其攻击行为。

另外一个攻击行为的释放渠道是有意无意地破坏为主导群体所做的工作。南方的奴隶有时出现毁坏庄稼或者杀死牲畜的“事故”；一位厨师可能在一个特殊场合把全家人的饭给烧焦了或者把一个珍贵的盘子打碎了；少数民族工厂的工人可能在流水线上放慢速度以拖延工作。

有些社会学者指出，少数民族成员所犯的许多罪行都可以解释为是对他们受压迫的环境的攻击性反应。持枪抢劫地位较高者的少数民族个人可能不仅仅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们也可能以犯罪作为对社会的一种攻击性抗议（吉本斯，1977；佩蒂格鲁和马丁，1987）。

3

集体抗议

抗议运动出现于整个历史进程中，与许多不同的主题相联系。少数民族为了获得民权的抗议运动是一个相当近期的现象，不过他们或许很快成为了美国少数民族最常见的反应形式。

许多学者认为民权运动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体验之中。支持战争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大批非裔美国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进入了以前从来不对他们开放的技术性和半技术性的工作岗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殖民

帝国的终结，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对他们的心理影响还是很大的。

民权抗议运动的一个政治收获是使少数民族进入很多地方的决策位置。非裔美国人已经在大约 300 个城市中当选为市长，其中包括洛杉矶、底特律、芝加哥、亚特兰大、费城、纽约以及华盛顿等城市；不少人现在成为国会议员，很多人占据了联邦和州政府的重要位置。1992 年联邦和州一级立法机关中有 499 位非裔美国人（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然而，尽管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被接纳进入权力结构，但是离他们完全被接受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自我隔离

少数民族群体自愿与主流社会相分离的过程叫自我隔离（self-segregation）。少数民族群体成员找不到满意的方式与主导群体相处，他们就通过这一过程努力限制与群体外成员的接触。

美国黑人民族主义传统就是这种反应模式的一个著名例子。马奎斯·贾维（Marcus Garvey）^①领导的大众运动开始于 20 年代，通过现代伊斯兰国家继续进行，黑人民族主义者一贯坚持反对种族融合，认为非裔美国人永远不会得到白人的公正对待。与努力同化相反，民族主义者提倡黑人建立并支持他们自己独立的教育、经济与宗教制度。

自我隔离最极端的形式是分离主义（separatism），即通过这种形式少数民族群体渴望建立他们自己的完全独立的社会。分离主义可能通过迁移或者政治区划实现。1947 年巴勒斯坦实现分治、以色列犹太人国家诞生，就是几个分离主义的成功尝试之一。非洲国家利比亚是分离主义的另一个例子。在美国政府的倡议下，1822 年一群解放了的奴隶在利比亚开拓殖民地，但是美国的倡议只不过是安排他们迁移。除了缺乏资金和技术发展国家经济之外，殖民主义者还遇到了气候不适应与原住民不友好等问题。只是到了近几年，利比亚才有一些发展，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生活水平，但是它有着其他非洲国家共同的政治不稳定问题。今天原来殖民主义者的后代曾经拥有的权力已经大部分丧失。

5

自愿同化

少数民族成员对主流社会的另一个反应是自愿同化。选择这种反应的人试图学好主导群体的语言、服饰、行为模式以及其他文化特征，使人们难以辨认出他们实际上是少数民族成员。

对于许多欧洲民族群体来说，同化意味着放弃旧的传统、简化带外国味的姓名以及搬到郊区生活。第二、第三代波兰人和捷克人的城郊克利夫兰社区就是这种反应模式的一个例子。所有建在以美国总统名字命名的大街上的房子，都是美式的，门上有黄铜老鹰。在一些邮箱上，主人名字的最后一个

^① 马奎斯·贾维（Marcus Garvey）（1887—1940），美国黑人领袖，1914 年在牙买加成立全球黑人促进会，在美国建立协会支部，旨在团结全世界黑人和在非洲建立由黑人治理的黑人国家。后因诈骗案于 1925 年被判刑。——译者注

音节写得很整齐：约瑟夫·罗登斯基（Joseph Rudenski）变成了乔·罗登（Joe Ruden），罗伯特·马科维亚克（Robert Marcowiak）成为了鲍勃·马科（Bob Marco）。

采取同化的决定可能是很痛苦的，因为它需要背叛可能仍然带有感情意义与社会联系的民族传统。有时候，那些选择这一做法的人因其放弃家庭姓名、历史、语言以及文化传统等，而受到其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亲戚的严厉批评。父母是严格的正统犹太人的女子，如果嫁给了一个非犹太人，就可能被断绝与其家庭的关系。父母甚至可能举行一个象征性葬礼，宣布她已经死了。

民族、种族关系的未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民族和种族紧张是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主导群体与少数民族群体一直是一个社会事实，而这些边界看来不会很快打破（马雷和莱贡，1985）。采取什么方式可以缓解将来的紧张关系呢？

改善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关键可能在于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而不是通过关于人们行动方式的立法。因为民族中心主义似乎是大多数偏见和歧视的基础，所以通过灌输泛中心主义（altrocentrism）——一种从事件的表面看到其他方面的能力——可能会抵消民族中心主义感情的力量。把自己当成少数民族成员的能力肯定会对减少跨文化的误解有很大作用（斯塔格纳，1987）。

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过去几十年里开始出现的国际经济与文化最终将有助于改善民族和种族关系。这些学者认为，世界各地环境与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大，将会产生一种新的承诺，实现跨民族与跨种族的平等，同时也会实事求是地承认一个国家的福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民族过上好日子。有了这些变化，世人就有可能看到将来种族与民族群体不断混合，与此同时作为紧张根源的种族与民族性的意义将日益减小（斯托克，1986）。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少数民族群体指在一个社会中，那些可以通过某些生理的、社会的或文化的特征识别出来的、被这个社会当作偏见和歧视对象的人所组成的任何群体。民族群体被定义为任何与其他群体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区别，并且有自己的亚文化，有共同意识的群体。种族是指共同具有某种遗传意义上的身体特征的一群人。因为不可能研究纯粹的种族类型，又因为区别后天学习的

行为与先天遗传的行为以及不带偏见地测量智力与感情特征有困难,所以很难对智力与情感构成方面的种族变化作出评价。然而,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即民族或种族群体内部个体间的差异大大超过了群体间的差异。

2. 在美国几百个少数民族群体中,最显眼的是非裔美国人、美籍拉丁美洲人、亚裔美国人、印第安人以及白种少数民族。非裔美国人占总人口的12.3%,他们在内战后,开始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迁往北部与西部的城市地区,现在很多人生活在这些城市区域。美籍拉丁美洲人成为人口中迅速增长的一个部分。除了2 240万人讲西班牙语的人在美国合法生活之外,可能还有多达500万讲西班牙语的非法移民。华人与日本人是亚裔美国人中最大的两个群体,他们克服了早期的歧视,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近年来韩国人与菲律宾移民也是这样。不过,越南移民还没有得到很大的向上流动,有些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印第安民族的悲惨历史反映在他们今天的生活条件中:他们是美国社会最贫穷、最边缘的群体。许多白种少数民族,即来自英国之外的欧洲移民的后裔,最近一些年来又对他们的民族传统重新感兴趣。

3. 尽管每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具有不同的经验,但是在美国,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受过偏见和歧视。偏见指采取先入为主的方式判断某些人、事物或状况,当事实证明作出的判断是错误的时候,它仍然坚持不变,这时偏见就成为一个问题。刻板印象指关于某类人群的一种简单化的或未经证实的概括。偏见是通过社会化学习形成的,在专制型人格的人身上可能更常见。

4. 歧视指针对某些群体或类别之成员的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偏见和歧视未必一起出现,但是二者往往相互加强。通过立法可以废除法律上的歧视,就像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所做的那样。然而,偏见和非正式歧视通过法律并不能够轻易地得到改变。最近一些年来,对待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态度有了一定的改善;而更大的改善可能会在这些群体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地位提高之后随之而来。

5. 一个社会中少数民族群体得到的待遇取决于社会的价值系统与社会组织类型,取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性质以及其他的反应。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模式可以分成两大类:接受与排斥。

6. 接受的一种形式是同化,即指主流社会对于新成员的吸纳。同化既可能是文化上的,也可能是结构上的。为了同化,少数民族群体可能改变其社会结构以与主导模式(盎格鲁认同模式)相一致,或者主导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可能混合以产生一种独特的新文化(熔炉模式)。当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上与体格上与主导群体相近时,同化就更有可能容易而快速地发生。

7. 另一种接受的模式是混合,即某一民族或种族群体与主流人口在生物意义上的结合。还有另外一种模式是文化多元论,这是指这样一种文化模式,在这种文化模式当中少数群体民族完全参与主流社会,但是仍然保持许多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差异。

8. 当歧视和偏见高度组织化与集中时——经常是作为主导群体的一种有意政策——结果就会产生这样一些排斥模式:(1) 消灭,是指主导群体导致大量少数民族成员死亡的过程;这种类型有时采取种族灭绝的形式,即指

对某一民族或种族群体在整体上蓄意加以摧毁；(2) 驱逐，即强制人们（例如少数民族成员）离开某一区域或某一社会；(3) 政治区划，即指某个国家为了使行政边界与某些民族或种族区域更加一致的政治重组过程；(4) 隔离，即指基于使用者的民族或种族特征而将居住地、社会服务或其他设施隔离开来。隔离是美国黑人与白人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关系模式。隔离使少数民族成员服务于某些目的，例如当作劳动力，但是不承认他们有充分的权利获得许多社会机会。

9. 不平等并不总是建立在个人的偏见、歧视或者官方的排斥政策上的。它也有可能根植于一个社会。有些学者发现美国有制度性种族主义，即指那些看上去是种族中立的并且通常不是有意制造歧视的一些政策，但实际上起到了限制少数民族成员机会的作用。在美国的经济、教育与刑事审判制度中都可以看到制度性种族主义。赞助行动指为了弥补以前歧视所造成的影响而采取的针对少数民族成员的优惠政策。结构性不平等的根源可能是国内殖民主义，这是一种由于经济原因而使少数民族群体处于从属地位的制度。

10. 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对他们从属地位的一种反应方式是被动接受或者屈从于统治。这样的接受可能成为一种自证预言，即指某种信仰或者预测由于其本身所导致的行为而变成真实。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另一种反应是攻击行为——对主导群体的仇恨或者用身体攻击或者用语言表达出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抗议运动也许成为美国最常见的少数民族反应方式，民权运动就是例证。

11. 自我隔离指少数民族群体自愿与主流社会相分离的过程。最极端的形式是分离主义，即通过这种形式少数民族群体渴望建立他们自己的完全独立的社会。少数民族也可能通过完全自愿同化作出反应，这是个人试图把其文化特征混合进主流社会的过程。

推荐阅读书目

1. 鲍切 (Boucher, Jeff)、丹·兰迪斯 (Dan Landis) 和克拉克 (Karen Arnold Clark) 主编, 1987. 《种族冲突: 国际展望》(*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该书研究了世界各国的民族冲突案例, 同时分析了引起和维持冲突的各种变量。

2. 戈登 (Gordon, Milton M.), 1964. 《美国生活中的同化: 种族、宗教与民族根源的作用》(*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该书是一项关于美国种族与民族群体同化现象的重要说明。

3. 哈克 (Hacker, Andrew), 1992. 《两个民族——黑人和白人: 分离、敌对、不平等》(*Two Nations: Black and white, Separate, Hostile, Unequal*, Toronto: Maxwell Macmillan Canada.) 该书根据大量事实对美国持

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分析。

4. 金克斯 (Jencks, Christopher) 和保罗·E·彼得森 (Paul E. Peterson), 1991.《城市下层社会》(*The Urban Underclas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该书是一本有影响的研究下层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家文集。

5. 马格 (Marger, Martin N.), 1984.《种族与民族关系》(*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这是一本关于少数民族关系的教材, 该书包括关于巴西、加拿大、南非以及北爱尔兰等章, 因此超出标准内容。

6. 斯特普尔斯 (Staples, Robert) 主编, 1994.《黑人家庭: 论文与研究》(*The Black Family: Essays and Studie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这是一本关于非裔美国人家庭现状的优秀文集。

7. 塔卡基 (Takaki, Ronald), 1993.《一面不同的镜子: 美国多重文化的历史》(*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 它从社会学角度重新对美国历史进行分析, 有意拒斥传统的欧洲中心观。

8. 威尔逊 (Wilson, William J.), 1990.《真正的穷人: 内城地区、下层社会与公共政策》(*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该书强调了经济因素在形成非裔城市“下层社会”中的重要性。

社会中的年龄和健康问题

在美国社会，似乎没有一个人想变老。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尝试着这样或那样的方法防止自己变老。广告商们每年花巨额费用推销他们的产品——某种汽车、特别款式的服装、或是不同品牌的酸奶等等——目的就是让我们相信它们能够使我们变得更年轻。

当你的头发开始变灰或出现白发，至少你会考虑把它染黑。肚臍逐渐增大时，为了恢复“年轻时”的苗条身材，你也会积极锻炼和节食。随着年龄逐步由中年向人生的“秋天”过渡，你还可能想到收缩脂肪、美容或者带假发等。

美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健康护理系统，正是因为美国人害怕变老、希望衰老的过程越慢越好。年龄当然是与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个人一生中医疗花费最大的部分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内（科瓦、亨德里特和马西斯，1989；赖利，1987；科瓦，1986）。而且，随着人口的老化，国家的医疗开支必然会不断增加。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探讨这些问题以及年龄、健康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诸多方面。正像我们即将看到的，年龄与健康不仅仅是人生命中的生物性事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例如，把年龄的概念用在不同的人群时，它具有十分不同的社会含义。35岁左右的球类运动员被认为达到了“颠峰”状态，体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一般在22岁前后就结束了。然而，对于政治家来说，如果在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时候竞选公职，是非常年轻的

人选，而且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已经证明 70 岁的年龄并非是成为总统的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

年龄与社会

年龄和变老是社会学最新的研究领域之一，但也是迅速得到重视的领域。除了美国文化本身对年轻的人极度看重之外，美国社会正在快速老化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事实是，美国是世界各国中年龄中位数最高的国家之一（1991 年为 33.1 岁）。

死亡率与出生率比例的变化是人口老化的主要原因，“美国人的老化”不过是所有发达国家人口逐步向老龄化发展的一个部分而已。随着这种趋势的继续，必将带来更为深刻的社会影响。

1

人口的变化

工业革命前，传染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个孩子的生命。其中一项研究表明，在 1770 至 1789 年间，伦敦受洗的儿童中，有一半活不到五岁（埃德蒙兹，1835，1976）。但是，伴随着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医学知识的提高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婴儿的死亡率急剧下降，结果，在出生率没有任何增加的情况下，人口开始迅速膨胀。人口的平均年龄下降了，部分原因可归结为绝大多数孩子成活下来的事实（麦基翁，1976）。现在，随着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像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他们的婴儿死亡率正稳步下降，人口也正变得年轻化。

然而，目前发达国家却出现了与人口年轻化相反的一种趋势：这些国家的妇女选择了少生孩子。由于儿童的数目只占人口总数的很小部分，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年龄正在逐年变老。

在美国，这种趋势有着明显的表现。从 60 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妇女的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养孩子的数目——大大下降。战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孩子们，现在已到 30 岁至 49 岁的年纪，他们增大了年龄层里中年人的分布比例。当这一代人到 65 岁的时候，将会带来一个“老龄潮”。

迈向老龄化社会的趋势已经给社会增添了不少压力，它使得人们格外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将来，老年人的需要可能比现在还要多。因此，为了满足这种需要，重新考虑社会的优先权和价值观是必然的。

2

生命阶段的历史发展

年龄的含义似乎是显而易见和不可改变的，但是，过了几个世纪后，社会对年龄和老化的态度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西方社会，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倾向，一种是降低年龄的社会重要性；另一种则是强调年龄的重要性。这两种倾向具有截然不同的效果（纽加顿、赫基斯塔德，1976），它们有助于理

解对待老化和老年人的一些相矛盾的社会态度。

第一种倾向是这样，过去被认为适合于不同年龄组的特定行为，现在已经允许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例如，人们可以晚结婚，晚生孩子，也可以 50 岁去工作，60 岁回到学校读书。看到母亲与女儿一样穿牛仔裤、一同听摇滚乐甚至在同一场舞会上起舞，人们并不会感到很奇怪。年轻人进入以前仅仅是长辈们才能进入的办公室；大学，一直是年长者教授年轻人的场所，现在也有很多年纪相对较小的教师，以及不少已经退休但希望重新开始学习或者继续完成学业的学生。

第二种倾向尽管不引人注目但同等重要。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于根据年龄来把人们排序或分组。虽然我们以前也曾把自己看成是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但现在有越来越细的年龄分类，像少年、青年和中老年。政府机构的项目也是把人口按年龄分组，对不同的年龄组采取不同的政策。在大多数公司，65 岁是预期的退休年龄，这一年龄已成为开始老年生活的固定标志（然而，最近有关设定退休年龄的立法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

实际上，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像童年和少年这样的词汇竟然是很新的概念，童年直到 17、18 世纪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阶段，少年是 100 年前刚刚“发明”的词汇，中年则是一个更近的“发现”。

童年

在中世纪的欧洲，过了婴儿期的孩子与大人的区分并不明显。几乎是在他们会走路、会说话的同时，他们就进入了成人社会，成为田间的帮手或是作坊里的学徒（阿里斯，1962）。孩子们甚至穿得像个大人一样，因为那时的衣着更多是由社会等级而不是由年龄来决定的。直到 17 世纪——就像我们从那个时期的油画中看到的一样——孩子们开始穿着与大人不一样的衣服。正是在这一时期，童年被首次定义为生命的一个独特阶段。

童年一词的“发明”，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正规教育，特别是所有儿童都必须入学这一要求。它强化了当时仍然很新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不应把儿童看成是劳动力的一部分，而应把他们看成是需要认真培养和塑造的人。童年成为一个需要保护、关心和教育的生命阶段。而且，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时，只有那些在学校掌握了阅读技能的儿童才能获得某种特别的知识，而正是这些特别的知识把儿童与成人区分开来。另外，儿童身在学校与外界隔离，也促使孩子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从而使得儿童最终从成人世界中分离出来。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趋势正在逆转。由于 20 世纪下半叶电子媒体的发明，成人的秘密通过电视屏幕暴露在每一个能够看懂节目的孩子面前。有人认为，这不仅仅导致了童真在很多孩子中的丧失，而且也在更为一般意义上削弱了孩子与大人之间的差异（波斯特曼，1982）。

少年与青年

一直到 19 世纪末期，处在儿童期与成年期之间的那段时间才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阶段。儿童心理学的创始人斯坦利·豪（G. Stanley Hall）首先在《少年》（Adolescence）一书中对这一阶段作出了描述。豪（Hall）把少

年看成是“第二次诞生”，因为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以“道德理想主义、骑士精神、宗教热情”等为标志的事件。20世纪，法律对16岁以下孩子必须参加义务教育的规定更深化了少年这一概念（艾森斯塔德，1956）。有史以来第一次，年轻人被这么长时间地留在校园里，以至于性成熟与成人经济责任之间不再有必然联系。

现代社会里，成年期被一再延迟。实际上，在生理上成熟和完全进入成人世界之间，还有另一个生命阶段，这就是“青年”，在中上阶层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凯尼斯顿，1970）。在这个阶段，年轻人到了可以参军、结婚、生孩子的年龄，但是他们仍然依靠家庭的经济支持。今天，美国16至1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一半多点的是全职劳动力，剩下的几乎所有人都处在称之为“学生期”的生命阶段上（美国人口统计署，1991）。由于对高学识、高技能工人的需要不断增长，许多青年人直到20几岁甚至更大仍处于前成人阶段。

中年

中年在近几年来得到了人们相当的关注，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所谓的中年危机上（勒力松等，1978）。在办公室，一个管理者会认识到他将再也没有希望获得提升；在工厂，一个操作工人不得不承认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农场主或者一个独立的商人；即使是已经实现职业梦想的人，也会扪心自问：为获得成功我放弃了什么？这样做值得吗？

虽然许多中年男性痛苦反思的结果是感到沮丧或失落，但是中年女性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中年妇女最近才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因而并没有面临中年危机。尽管忙碌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之下，对她们常常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她们通过参与工作却获得了力量和自信（希伊，1976）。

老年

作为独立的生命阶段，老年也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社会产物（艾尔德，1975）。老年一般从退休开始算起，它通常意味着地位的丧失。就像青年被看作一生中最有希望的阶段一样，老年则被认为是希望最少的时期。

然而，几百年来，年老是与地位的增长而不是下降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非西方文化中，今天仍然如此。例如，肯尼亚（Kenya）的吉普赛吉斯（Kipsigis）人，人越老，其社会地位越高（科瑞姆考斯基、米德尔顿，1987）。那么，为什么在发达社会，老年人却丧失了其地位呢？一位学者注意到态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770年至1880年间（费舍尔，1978）。在这一政治和社会快速变化的时期，高地位与高权力自然属于老者的观念被社会平等的观念所代替。由于社会平等的观念向老年人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这种观念更有利于青年人而非老年人。与文化价值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广泛的经济变迁，它也降低了老年人的重要性（考吉尔，1986）。

以前的财产所有权给了老年人比青年人更多的权力，但在现代工业社会，所有权与控制权并不总是相联系的，这样，年轻人有机会获得提升——通过教育和商业——不需要依靠有权势的老年人的恩惠。过去，老年人是因

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而拥有了较高的价值，而现在，由于技术革新的速度非常之快，老年人掌握的许多技能也很快就过时了。并且，随着核心家庭的增加，年迈的父母，在其已成人的孩子（及后代）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外围的不重要角色，而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地位。尽管如此，在很多事情上，老年人仍然有较好的主意，人们也经常向他们请教。

用地位和角色的概念来解释年龄在社会中的重要程度，是社会学家采用的一种重要视角。正像第四章的定义，“地位”是一个群体或社会里确定的社会位置，“角色”是对占据某个地位的人的行为期望。

年龄地位与年龄角色

正像社会根据人们的阶层、种族和性别来确定他们的地位与角色一样，年龄也是判断人们地位与角色的依据之一（赖利、福纳和韦林，1988；赖利、约翰逊和福纳，1972）。例如，少年的地位和角色一般是学生、朋友和家庭成员。某些“转换仪式”，如毕业、得到第一份工作、结婚、生孩子等，标志着从少年向成人地位的转变。

依据一个人的年龄而确定的地位称为年龄地位（age status），与年龄地位相联系的是年龄角色（age roles），或者指人们对占据某一年龄地位的人的行为期望。像其他角色一样，年龄角色通过社会规范或标准来体现，它规定某个年龄的人应该如何想和如何做。这些规范称为年龄规范（age norms）。例如，法律对“未成年人”（minors）的规定，反映出人们对某一年龄段的看法。在某个年龄，他可以离开学校；在另一个年龄，他必须为自己的性行为负责。

年龄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更改。分别在50年代和70年代末期进行的两项调查表明，一些年龄规范在20年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罗森菲尔德和斯塔克，1987）。当被问到大多数人应该在何时开始其职业生涯时，50年代的调查结果是，74%的人认为应该在24至26岁之间；而70年代的调查则显示，仅有24%的人同意上述意见。年龄规范发生改变的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是，对妇女最适合结婚的年龄的看法，50年代被调查的妇女中，90%选择了19到24岁；而70年代末只有36%的妇女持有这样的观点。

应该指出的是，年龄规范不仅仅是对年龄遵从的看法，同样也是对年龄越轨（age deviance）的判断，年龄越轨指的是破坏一个群体或社会的年龄规范的行为。一个男人到了45岁仍然单身，被认为是年龄越轨；一个45岁的女人嫁给一个比她小10岁的男人，也被认为是年龄越轨；但是，一个45岁的男人娶了一个35岁的女人，则不被认为是违反了年龄规范。

社会设置中的年龄地位

年龄地位与其他地位一样，是大部分社会制度中社会等级的基础。我们不妨看一下生活主要领域里的年龄地位与年龄角色。

年龄地位与家庭。与社会上的多数领域相比，家庭中年龄地位的顺序有

更清楚的定义，与之相应的年龄角色也有着更明确的期待。女儿或儿子从童年到少年再到成年，年龄地位的变化，通常以很明显的生物或社会事件为标志，例如，毕业、结婚、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第一个孙子的出生、配偶的故去等等。在每一转折点，人们接受新的地位，社会等级也随家庭其他成员一起发生改变（纽加顿和穆尔，1968）。比如，当学生从大学毕业时，他们会获得一定声望；妇女结婚时也同样如此，自愿不生育的夫妇、正在离婚的夫妻无疑会失去声望。

年龄地位与教育。表明一个人年龄地位变化的传统教育标志有：升入高中、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等。因为成年期通常与学业的完成相联系，所以，在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年龄”或者除了常规年龄之外的年龄地位时，教育坐标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蓝领工人，例如，有执照的电工在20岁时开始工作，他迈向成年期的年龄地位标志就比一个法学院学生要早，后者必须一直呆在学校，直到24岁或25岁。电工在较年轻的时候就是“社会上的长者”。

年龄地位与工作。工作角色与年龄地位之间关系密切，特别是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除了结婚、完成学业以外，一个人获得社会承认的“成年”年龄地位的最重要标志是进入劳动力市场。自己谋生意味着社会成熟，同样的，退休——退出劳动力市场——代表着另一个关键年龄地位的改变。因为，它标志了成年人责任的完成和进入“高龄人士”的低等级地位。

法律与政治中的年龄地位。一个人能够投票的年龄是成年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它和这样的信念相联系，即当一个成年人得到承认时，他必须具备参加社区活动的判断能力。但是，也有不少的争议，像一个18岁的人足以应征入伍却不够年龄投票等。对驾驶、饮酒、签订合同、刑事诉讼等的法律规定，反映出年龄与责任之间的密切关系。

参加政治和领导活动也与年龄有关。政治职位的责任越大，符合要求的人选的年龄一般也越大。美国宪法对担任众议员、参议员以及总统的最低年龄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年龄地位的不一致

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年龄在不同生活领域的社会含义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的一个结果是：18岁的人既是一个“未成年人”，同时又是一个“成年人”。例如，在某些州，准予驾驶的年龄是16岁，投票年龄是18岁，可以饮酒的年龄却是21岁。与一个人年龄地位相联系的各种社会期望之间的不一致，称为年龄地位不一致（age status inconsistency）。当一个早熟的青年人获得通常是年纪大一些的人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时，这也是一种年龄地位的不一致。其中典型的范例是莫扎特（Wolfgang Amadues Mozart, 1756—1791），他6岁时就为奥地利女皇弹奏自己的钢琴作品。而更常见的例子通常类似于一个刚刚开始其商业生涯的60岁的妇女，她的职位很低，一般是20多岁的年轻人刚工作时的职位。

的、美貌的人。电视、书籍和电影总是把老年人的一些令人讨厌的特征展现出来，将他们刻画成不重要、不快乐、不受人尊敬的形象（西格罗里勒尔，1983）。虽然老年人比青年人看电视要多，但一项有关1700个加拿大电视广告的调查仍然表明，仅有不到2%的有号召力的角色是老年人（穆尔和卡多，1985）。

对老年人的忽视是年龄歧视的一种反映。年龄歧视（ageism）指的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它认为老年人在生理或社会方面是弱者。持这种观念必然会歧视老年人。这一观念认为，老年人是孤独的、有依赖性、情绪不稳定以及体弱多病的。尽管一些老年人确实有这样的特点，但是年轻人中有这些特点的也不在少数。研究表明，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基本上都是错误的（科克拉姆，1991；考克斯，1988）。

幸运的是，老年人对自己的认识要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真实。哈里斯（Harris）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老年人认为自己是开放型的、有适应力的，聪明、机警、能达成目标。小于65岁的人中，有35%的认为老年人很少或几乎不做事；但65岁以上的人中，仅有15%同意这种看法。总之，调查反映出，老年人并不认为变老给他们的生活运气带来了太多的改变。

但是，老年人也的确因为他们的年龄而面临着一些特别的问题。与公众的印象恰恰相反，他们是所有年龄层里最少可能成为犯罪牺牲品的一类人（除了某些接触性偷盗犯罪——主要是扒窃和欺诈以外）。然而他们却表现得最畏惧罪犯（奥尔斯顿，1986），这种反常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媒体大肆渲染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犯罪；再者，一旦受到罪犯的侵害，有时老年人确实会因为体力和财力的缺乏，而难以从其遭受的不幸中恢复元气；另一方面，生活在高犯罪率地区的老年人，成为罪犯牺牲品的机会也相对多一些。同时由于他们对犯罪如此高度紧张，因而他们实际上把自己关在家里，害怕一离开家就有危险（巴罗和史密斯，1979；考克斯，1988）；并且，还有很多老年人——难以知道其具体数目——受到他自己孩子的忽视和虐待（奥图尔和韦伯斯特，1988；克罗斯科普夫和伯尼特，1983）；不少的江湖郎中也把欺骗的目标对准了有恐惧心理的老年人。

变老

当人变老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搞清楚生理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差异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了解，虽然两者之间常常又是密切相关的。

1

体力和智力的变化在衰老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变化带来了与年龄相伴的体型的改变（如皱纹、秃顶、佝偻等），以及具有老年人社会行为与地位特征的举止，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把社会期望与生理变化联系了起来

生理变化

来(怀特,1988)。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考虑变老过程的生理因素。

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对随年龄而发生的事情的认识在不断提高,但是仍然很不完善。许多与年龄有关的疾病,像食欲不振、肌肉松弛、失眠健忘、性欲降低等症状统统用包罗万象的“老迈”(Senility)一词来形容。这些疾病不仅仅是老年人才有的,它可能在任何年龄段发生,受它折磨的也不全是老年人。

但是,有些症状,是变老过程的必然组成部分,凡是活到老年的人或迟或早都会受到影响。例如,随着年龄变老而来的视力下降。听力也是在20岁以后开始减弱,嗅觉和味觉以及反应力同样是随年龄而变得迟钝。除了一些个体差异外,变老的过程最终会影响每一个人的感觉功能、智力功能、性行为、健康和体型(科克拉姆,1991;科特雷尔,1974)。

感觉功能与大脑功能

感觉器官的损坏经常降低老年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种损坏代表变老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它既比稍前出现的皱纹更具破坏性,又没有后来的大病那么严重。

到65岁,一半的男性和30%的女性都会体验到由于听力减弱给社会交往所带来的困难。研究表明,听力减弱比视力降低所带来的挫折感和社会隔离要强烈得多。比如说,妄想症——总是以为别人在议论你或是陷害你——就是与听力的丧失相伴而来的(亨德里克斯、亨德里克斯,1986)。因为听力的减弱,人就很容易猜测自己是别人行为和言谈的中心。

接受感觉、身体刺激的心理反应时间,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慢。一个试验发现,尽管老飞行员的判断能力比年轻一些的要准确得多,但其对身体刺激的反应却慢得多(亨德里克斯、亨德里克斯,1986;波特温尼克,1967)。

许多大脑功能在变老过程中也受到损害。老年人能够学习新事物,但除了个别人,大多数都要花比年轻人更多的时间。同样地,从记忆中搜寻一些事件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往往是年龄越大,花费的时间越长。然而,很久以前的记忆似乎却并不受年老的影响。

男性与女性受大脑功能下降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大脑功能明显比男性保留得好,这一结论主要是得自于男性患病和死亡的时间早于女性的事实。同样,受过良好教育、智力活动活跃的人,与很少或不愿从事智力活动的同龄人相比,其大脑功能下降的速度要慢一些(亨德里克斯,1986)。

早老性痴呆病^①(Alzheimer's)是老年人中常见的一种脑力病,早老性痴呆病患者,“对姓名、日期、地点等生活内容的记忆模糊不清,最简单的事情——如系鞋带、用刀切肉、判断时间等——成为不可克服的困难”(《新闻周刊》,1984年12月3日)。最终,一般是在80岁以内,患者无法行走和

^① Alzheimer's, disease, 阿尔茨海默氏病, 又称早老性痴呆病, 据德国医生 Alois Alzheimer 的姓氏命名。——译者注

自控，蜷缩在床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早老性痴呆病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美国约有5%至15%的老年人染上此病。

性功能

某些身体变化会影响老年人的性功能。马斯特斯（Masters）和庄森（Johnson）指出老年人的性能力要弱于年轻人（路德曼，1981；马斯特斯、庄森，1966，1970），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就不能享受性生活。

实际上，很多研究（如特纳、亚当斯，1988）显示，老年人没有失去性行为的兴趣。例如，在阿布加斯人（Abkhasians）中，70岁以上的男性仍具有性能力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55岁以上的女性中13.6%的还有月经（贝尼特，1976）。人们在90岁时庆祝自己的婚礼，据报道，一个男人准备在他108岁时举行婚礼，尽管他坚持说自己才刚刚95岁。

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老年人缺乏——或者应该缺乏——性行为的能力和意愿。在一项研究中，大学生和护理人员把描写性行为活跃的老年夫妇的故事视为不可信的（也是不道德的），但对同样情况的年轻夫妇则不这么认为（路德曼，1981；拉托利、基耳，1977）。对老年人性生活持上述态度会给他们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身体健康

年轻人所患疾病大部分属于急性病——这些病症有明确的开始期、转折期、恢复期，病发的原因通常在体外——一般是由微生物感染引起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患慢性病的可能性增多，即病症发展得很慢，没有明显的转折期，痊愈的时期也较长。与急性病不同，多数慢性病很难用简单的外在原因解释，要彻底治愈也很难。

老年人中最常见的疾病以及死亡原因是心脏和循环系统的疾病，其中包括因血液凝结而阻塞头部氧气供应的中风。虽然癌症并不仅仅局限于老年人，但是某些癌症还是在老年人中更常见，例如胃、肠道、前列腺、肾等部位的癌症。关节炎也是一种与年龄有关的、最容易使人衰弱的疾病，尽管很少导致死亡，却能给患者的健康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亨德里克斯，1986）。

虽然使人衰弱的慢性病经常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但是必须记住的事实是：多数老年人是健康、活跃和独立的。他们的活动水平可能会降低，一些身体的损伤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认为老年人一贯体弱多病则是十分错误的。实际上，对“高龄老人”（80岁以上）的一项全国调查表明，他们中的三分之一仍然活动自如（哈里斯等，1989）。

2

社会老年学的观点

老年学是对老化以及特殊的老年人问题的多学科研究，以社会视角对老龄问题作研究的学科称为社会老年学。社会老年学是一个很新、但发展很快的领域，它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观点和理论。老年学与老年病学是不一样的，老年病学主要从医学的角度研究老龄以及一些针对老年患者的特殊治疗方法。

向老年的转变过程，是社会老年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四种理论：脱离论（disengagement theory）、活动论（activity the-

ory)、连续论(continuity theory)和老年亚文化论(the aged as a subculture),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老年人在对新角色的适应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与态度。

脱离论

脱离论是较早研究老年人社会状况的一种理论,虽然很多人对它提出了疑义,但由于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仍然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理论。

脱离论于1961年首次提出(卡明、亨利),它的中心内容是:当我们变老时,我们从内心开始退缩,并慢慢从整个成年期都要参加的社会活动中撤离。脱离论认为,当老年人认识到死亡已经临近、自己所能获得的时间与能量不多时,进行上述转变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脱离论还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必然同样要求老年人远离大量的交往活动。

几乎从脱离论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议。脱离的过程如何不能避免,在多大的程度上不能避免?虽然有一些老年人确实脱离于社会生活,但也决不意味着所有的老年人都要或都应该这么做。这一理论的最初提法,忽视了人们在个性、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健康等方面的差异。

脱离论的一位创始人后来对其作了调整,他认为,人的一生中,甚至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个性将会不断发展,人们不完全从社会脱离也能进行内心的转变(亨利,1965)。那些面对压力通常采取退缩方法的人们,当死亡临近时,可能会脱离社会。而那些在生活中积极进取的人则不会轻易退缩(亨德里克斯,1986)。

活动论

与脱离论的一些主要观点恰恰相反,活动论认为,老年人减少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安排。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当人们变老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一些社会角色,如活跃的社会成员、提供者、养育者等。他们失去的角色越多,获得的生活满足感就越少。如果老年人的活动水平仍然很高——即使比早期生活阶段的活动水平低——他们的生活满足感也会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赞同活动论的社会老年学家相信,被允许参加社会活动的年龄越大,他们的状况越好。

与年老相伴的角色丧失被称为角色退出(role exit)(布劳,1981)。角色退出最典型的情况是丧偶和退休。活动论强调,保持一个熟悉的角色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很重要;他们认为,适应角色丧失是老年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有一些活动论者把角色丧失看得较为乐观。一位学者指出,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完全依靠一个角色(阿齐利,1988),因此,假定一个老年人有足够的钱财和关心他的朋友,他能够很容易地把精力从丧失的角色转移到一个以前并不很重要的角色上来。比如,曾经在铁路局工作的人,可以为他的孙子或是当地的学校和孤儿院建造微型铁路模型;一个家庭妇女,也能够在她四五十年前曾经放弃的学生角色中,找到新的满足感。

活动论无法圆满地解释所有老年人都面临的适应问题,因为体力和智力的下降是变老过程的一个真实情况。虽然不少老年人为年老强加给他们

的活力减少而难过,多数的老年人仍能不失自尊地接受和适应这一不可避免的新情况(哈维格斯特、纽加顿、托宾,1968)。

而且,活动论是建立在一些特殊的价值观念之上的。在美国社会中,主动的价值高于被动,强壮优于虚弱。因为我们敬重与年轻联系着的高活动水平,人们普遍认为一生中“不做事”是一无是处的。这种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老年人的思想,使他们感觉到,除非保持着活力,否则就会失去社会的尊重。

连续论

连续论是当今最受欢迎的社会老年学派之一,它强调个人生命阶段发展的连续性。因此,连续论认为,“老年”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段”,只是人生的一个后续组成部分。这种观点与多数人对生活的看法一致:不是一个个独立的阶段,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渐进的发展过程。根据连续论的观点,那些把老年作为一个生命时期的阶段论者,以脱离社会、或活力水平的降低为标志,往往对人的生命的理解显得过于不自然、简单化和片面化。

与脱离论不同,连续论重视老年人的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同时也考虑到了个性与价值观的差异。当人们年老的时候,他们不是必然或自然而然地退出工作和社会活动,相反,他们选择能让自己继续获得满足感的生活方式,终止那些不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过程或许是从一个气候恶劣的地方搬到一个气候适宜的地方,或许是放弃一个职业去做志愿者的工作,也可能是卖掉房子到处旅行。这些决定并不是因为年老的缘故,而是那些有财力和有保障的人们的一种选择,他们能做他们生活中想做的事情。

老年亚文化论

另外一种解释老年人态度和行为的理论认为,老年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文化。随着退休社团组织的增加,老年人活动区域的出现以及年轻人对乡村的抛弃,老年人发现自身与其他年龄群的隔离越来越大。有关退休和补偿的社会政策也倾向于把老年人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赞成老年亚文化论的人认为,上述因素促成了老年人之间支持网络的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价值和观念的独特亚文化。

根据老年亚文化论的观点,老年人参与同龄群体的活动及其对亚文化纽带的体验,可以帮助他们顺利地向老年阶段过渡(亨德里克斯,1986;罗斯,1965)。别的一些活动也有这样的效果,如孤寡互助计划,是老年人彼此之间互相帮助的活动;退休老人志愿队,是老年人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大帮助的场所;祖父母抚养计划,则是老年人帮助年轻人的活动。

老年人与自己同龄群体的亲密关系,和对自身特殊社会地位认识的提高是否促成了独特亚文化的形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目前还不是很确切。在追求身份认同、形成组织,以及提高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中,他们似乎与其他亚文化群体,如少数民族群体,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由于大多数老年人更多地被整合于主流文化之中,因此,我们很难把他当作一个孤立的亚文化来精确地分析。

美国老年人的社会状况

在美国, 65 岁以上的人有 2 980 万, 约占总人口的 12.3%, 85 岁以上的有 250 万。老年人口分布在美国各地, 其中有几个地区是老年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老年人口数量最多, 1987 年两地的老年人口数分别是 290 多万和 230 多万。美国老年人口中, 大约有 45% 居住在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伊利诺斯、加利福尼亚、纽约和俄亥俄等七个州。这一节, 我们将了解一下美国老年人的社会状况。

1

退 休

我们一般把年老与退休联系在一起, 但退休却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过去, 人们只要体能没问题, 就一直可以参加社会经济活动。例如, 1900 年, 65 岁以上的人中有 65% 仍然继续工作 (福纳、施瓦布, 1981)。1992 年, 65 岁以上继续工作的人中, 男性占 16%, 女性占 8%。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退休还是很少见的。

直到 1935 年《社会保障法案》的通过, 退休的概念才正式在美国得到确认。建立全国退休金计划的《社会保障法案》, 最初的设想是帮助那些在大萧条中被迫失业的人们, 因为从理论上说, 老年人如果能够获得财力保障的话, 年轻人将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工会也支持这一计划。然而, 社会保障法通过后, 许多雇主开始设置强制退休年龄, “标准”的退休年龄是 65 岁——也就是可以领到全额社会保障金的年龄。

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鼓励或迫使老年人退休, 并且使得老年人在经济上也具备了退休的可能性。100 年前, 美国 50% 的人口是农业人口, 今天这一数字不到 2%; 同时还有很多自我雇用者。现在, 大多数人在规模很大的组织里工作, 农夫和自我雇用者可以决定自己何时不工作, 但大组织里的人, 却必须服从于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对退休的规定。

然而, 即使过去的老年人比现在的老年人有更多的自由来决定自己是否继续工作, 当他们想停止工作的时候, 他们也很可能因为缺少固定的收入而做不到这一点。而今天许多工人虽然不得不面对强制退休, 但却可以从公司和政府那里获得一定的退休津贴。

尽管如此, 大量的退休者却不得不依靠减少的收入来生活。1991 年, 12.4% 的 65 岁以上的老人, 其收入低于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线 (美国人口统计署, 1993)。对于退休的夫妇来说, 他们平均可以获得的社会保障与退休津贴的费用, 仅仅相当于退休前的一半 (福纳和施瓦布, 1981)。

人们原来认为适应退休很困难, 一般退休者对退休生活也不满意。但最近的研究表明, 事实并非如此, 一般来说, 退休后的感觉和兴趣是退休前的延续 (约翰逊和威廉森, 1987)。大多数退休的人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如

果让他们重新选择的话，他们愿意在同样甚至更早的时间退休（帕纳，1983）。那些对生活不满意的退休者，并非因为不再工作而不满意，而是由于生病或者没有足够的收入。

退休的趋势

过去的25年间，退休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1950年，85%的55~64岁的人仍然在工作，1992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7%。一位调查者从对退休者的访谈中了解到，大约一半的退休者愿意在65岁前退休（帕纳，1983）。

令人满意的经济环境与一系列的政府决策使得退休年龄不断提前。1961年，政府允许人们可以选择62岁退休获得部分社会保障金，而不是等到65岁退休拿到全额保障金。1966年设立了医疗护理金，减轻了老年人很多的医疗花费。70年代初，国会把社会保障福利与生活费联系起来，以确保老年人的购买力不至于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人们发现，自己能够承受提前退休后的经济负担，于是许多人就选择了提前退休（迪瓦伊尼和奥朗，1988；魏因斯坦，1980）。

但是一些经济和人口发展的情况威胁着这一趋势，像我们指出的那样，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增长，社会保障金也是直接由现在工作着的人们来支付的。如果现在的退休方式继续下去的话，工作着的人与退休的人的比例将急剧下降。1937年，每一个退休者的福利由12个工作的人负担；1980年，一个退休者的福利由3个工作的人负担（魏因斯坦，1980）；到2030年，据估计仅有2个工作者负担同一任务（曼内尔，1983）。

有时候，这些发展可能严重影响着社会保障体系，并且没有一个能够使每一个人都满意的解决办法。既维持目前的福利水平又保留早退休的模式，给工作着的人带来了不公平的负担。降低福利将会减轻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但也会限制退休者的收入来源。政府目前正在逐步提高能够获得全额社会保障金的年龄，这将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但是，一旦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势必减少工作的数量以及年轻人获得提升的机会。

2

居住

老年人对居住的要求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距离基础服务设施比较近。当老人们发现自己到处走动变得很困难时，从家里到洗衣店、医院、社区中心的距离就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在美国，老年人获得服务是一个尤为严峻的问题，因为这里的社区很分散，公共交通又很少。

人们正在努力设计一些适合老年人居住的房屋，自从1959年《住房法》颁布以来，联邦政府为老年人的住房已经花费了上亿美元——通常是低租金、高标准的公共项目。即使如此，也仅有3%的老人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日益增多的富裕的老年人正迁往退休社区，这些社区一般与别的社区分开，通常位于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地带，但是在全美各地都能看到这样的社区。集体居住（Congregate housing），是另一种形式的老年人住房形式，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它是专为这样的人设计的，一方面他们有残疾很难自己照顾自己，另一方面身体条件还可以，不需要住在护理院或医院。这里的居

民有自己的居住单元,但饭厅和医疗护理、房间卫生等其他服务是共用的。集体居住非常昂贵,只有高收入群体才能住得起(阿克斯伯格等,1988;威廉斯,1985)。

所有这些特殊居住形式都受到了批评,认为它把老年人以“老年群体”的形式与青年人隔离开。尽管如此,许多研究表明,大多数自愿选择在年龄隔离社区(age-segregated community)中居住的老人,由于远离了年轻人的吵闹和烦扰而感到非常愉快(劳顿,1977)。

3

健康与 个人照顾

家庭照顾

照顾老年人的负担一般是落到家人的头上,特别是当老年人生病、行动不便、收入无靠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缺少公共医疗保健的欠发达国家,美国也是如此(哈拉,1988)。

很多老年人喜欢得到家庭的照顾,如果他们的丈夫或妻子已经去世,他们首先求助于自己的孩子或者其他近亲。然而,家庭成员经常发现他们很难去照顾年迈的父母或亲戚,他们有自己的孩子,居住在拥挤的房屋里;给额外的依赖者提供住宿和食物往往给家庭带来紧张、财政危机甚至精神问题。在这样的状况下,从身体或精神上虐待老年人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此,照顾老人给家庭所带来的经济与精神负担,超过了给老人带来的好处,而这样也就使得专门机构的照料广受欢迎。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利因素,很多家庭仍然愿意在家里照顾老人,而且尽可能地推延将老人送到护理机构的时间。研究显示,除了那些身体极差的老人外,家庭照顾要比送护理机构便宜得多(范迪福特克伦和布朗,1984)。

然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很快改变这一状况。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能够照顾日渐增多的老人的成年人却越来越少。新家庭形式的扩展,单亲家庭的增多,妇女角色的转变,双职工家庭的增加,以及居住流动性的不断增大等,都减少了家庭成员照顾老人的可能性。

家庭外照顾

在美国,65~74岁之间的老年人中,被塞在护理机构的仅有1%,而85岁及以上的则有22%(国家健康统计中心,1988)。大多数家庭都尽可能地推迟老人进入任何种类的养老机构的时间,一般比需要的要晚得多。进入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多数是没有家庭或没有基本生活来源、无法独自生活的人。因此,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多数都是贫穷、无家可归、孤独的人。但是,也有一部分身体状况很差,一般的家庭无法给予照顾的老年人。

最近几年,由于“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国家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帮助项目)的引入,使用供短期住院的医院的老人数目增多了(谢那斯和麦马多克斯,1976),对供长期照料的设施(long-stay facilities)的利用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特别是护理院(nursing homes)。另外,老年人利用精神医院(mental hospitals)的情况也很普遍。在医护条件非常优越的情况下,每一类医护机构都能提供最好的健康护理。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老年人很

可能是处在通向死亡之路的一个个昂贵、凄凉、无人注意的中转站。

护理院 (Nursing Homes)

1987年,65岁以上的老人中,只有5%(约1300万人)生活在护理院。据估计,35%~40%的老年人临死前有一段时间是住在护理院的。住在护理院的老人具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的老人在此结束生命,有的则不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了解一个重要的因素——家庭状况。住在护理院的老人大多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单身、分居、离婚或者丧偶的人;一种是没有孩子或只有一个孩子的人。这两类人比其他老人住在护理院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护理院提供的服务质量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将近80%的护理院都属于商业企业,那些专为富人开办的护理院与为穷人服务的护理院相比,两者在可利用的设施、使用的治疗方法以及服务态度等方面有天壤之别。在为穷人服务的护理院,服务人员一般只接受过很少的教育和培训,使用的房屋通常由破旧不堪的私人住房改建而成,且位置偏僻。

这些护理院的条件之所以如此简陋,原因之一是经营成本的逐步攀升。其护理费用是国家健康护理费用中花费最大、增速最快的一部分。1980—1991年间,护理院的护理费用由20亿美元增至60亿美元(《美国统计摘要,1993》)。导致这一巨大增长的原因包括: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以及护理院燃料费与工资的增长(美国劳工统计局,1984a)。

护理院的护理成本很高(大约每月2000美元),这不包括心理成本在内。可以利用的设施的质量暂且不说,住进护理院,本身对老年人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令人遗憾的是,正是护理院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它本身的错位。老年人可能是被迫进入依赖的状态,有时就像服了镇静剂一样。就像在监狱和精神病院,对犯人或患者的管理要优先于治疗一样,据说在护理院里,不管老人们是否生病,工作人员、其他病人、还有家庭成员都期望他们表现的像一个病人那样(考克斯,1988)。因此,护理院的环境很难起到增进老年人健康、或者充分发挥老年人个人能动性的作用;相反,它损害了老年人已然具有的个性和独立性。

其他社会的老年人

我们似乎忘记了,当代美国人对老年人及其社会地位的态度并不具有代表性,虽然许多老年人的问题——住房、保健、依赖性经济负担、慢性病等——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美国的解决方法,如护理院、社会保障、退休金等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我们不妨看一下其他社会老年人的状况如何。

1

儒家传统倡导尊老爱老,历史上,年龄与权力总是联系在一起,父母对孩子拥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一个世纪前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变

中国:
尊敬老人

迁，逐步削弱了老年人的权力基础。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中国政府颁布法律，提倡年轻人与老年人地位平等。虽然经历了社会变迁，尊敬老年人的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英和莱，1983；特里斯，1979）。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不是由在职人员提供资金来源，而是由国有企业与福利承担。福利大约占退休前收入的70%，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是非常丰厚的。尽管不再“鼓励”老职工退休，但也没有强制的退休年龄规定他们必须退休。目前的社会保障机制主要帮助那些在城市居住、在工厂上班的人，而没有覆盖到农村地区约80%的人口，他们几乎还是完全由家庭来照管（布朗，1990）。

中国的退休老人很少会面临声望、地位下降的问题，他们通常接受很多有用又有价值的事情，例如做家务、看孩子等。而且，老年人在居委会等社区管理机构中也仍然担负着重要的作用。

2

以色列 吉布兹： 老年人的 整合

以色列吉布兹，是一种自愿的集体企业形式，通常是（但不完全是）一个农场。吉布兹的典型形式是一个500人左右的定居地。吉布兹成立于20世纪初期，在以色列建国的历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吉布兹为其成员提供全部的社会和经济保障，所有的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吉布兹，财产由集体所有，生产决策由集体作出。

一项研究显示，吉布兹这种整合老年人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美国社会的许多老年问题（威肖，1969）。生活在吉布兹的老人从来不用担心住房、经济支持等问题，他们可以继续从事生产性的工作，只要他们力所能及（阿马德，1988）。他们并没有与其他人隔离开，而是与任何年龄层的人保持联系。但是，与中国的老人相比，当吉布兹的老年人把领导权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创造性角色交给年轻人时，他们面临着地位丧失的问题。

3

艾克：弃老

在乌干达的一个部族——艾克社会中，老年人既没有地位又得不到任何方式的常规帮助。艾克人把老年人看成是无用的、该死的寄生虫（特恩布尔，1972）。

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大约一代人之前，艾克人被迫离开他们原来的土地——那里成为了一处比赛场地，迁移到附近多山且荒凉的地方。与先前相比，这场灾难使得艾克人一下子变得贫穷起来，他们社会里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面对贫穷的现实。这种适应使得社会团结几乎丧失殆尽。

对于艾克人来说，能够互相帮助是极不寻常的，特别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因为多数老年人体力不支，而体力又是这个社会非常看重的个人特征，因而他们只能获得很有限的帮助，必须自己解决生计问题。因此，不要说不帮助老人，即使是羞辱、虐待、甚至暗害老人，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老年人的死亡率迄今为止是最高的。这个事实似乎再明白不过,以至于没有必要去注意它。但是在前工业社会,也包括很多现存社会,年轻人的死亡率却是最高的。美国的老年人多数死于“老年”病:慢性的、非传染的疾病,明显的中风、心脏病和癌症(布罗迪,1989),这些疾病也是全部人口中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前工业化社会,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却是传染病和饥饿,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总之,健康与疾病是社会事实,除了生物因素以外,它们还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下面我们就将把健康与疾病看作社会现象来讨论。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今日美国的健康与保健情况。

1

健康的 社会分布

根据预期寿命的测量,美国人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健康。1900年,普通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47.3岁;1991年,这一数字是75.7岁。某些人预期寿命的变化更大,像黑人妇女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20世纪初的33.5岁上升到1991年的74.3岁。生命周期的扩展,主要是(但不全是)由于医学的进步。

虽然数字表明美国人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许多工业化国家相比,仍不尽如人意。1991年,22个国家,包括日本、瑞典、以色列、加拿大、希腊和哥斯达黎加,其预期寿命都要长于美国。同样在1991年,至少有22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要低于美国,这也是一个国家总体健康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人口资料局,1991)。

社会流行病学

每一个社会里,健康与疾病的分布要么是不平等,要么就是非随机的。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得病,很多疾病在某些人群中要比别的人群中更常见。例如,肺癌,在吸烟人群中较为普遍;黑肺病是煤矿工人的一种特殊疾病;穷人比富人的健康问题要多。

研究疾病的社会分布,以及这种分布与社会和环境状况的关系的学科,称为社会流行病学。社会流行病学家,主要采用社会学方法,试图了解某些特殊疾病患者的共同特征,以此确定这些疾病的诱因(科克拉姆,1992)。这些知识是疾病防治的重要因素。

究竟有哪些因素决定了一个人会染上某一种疾病?有一些是基因性的,即对某种疾病具有易感性或具有抵抗力的遗传,它同人们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的遗传方式一样。但是,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性的。收入水平、职业、居住地区、生活方式——所有这些因素及其他更多因素影响着患病的可能性(格雷厄·里德,1979)。社会流行病学家提供的信息,即确定某些疾

病与上述因素的关系，在公共健康系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社会流行病学的一个主要假设是，染上疾病仅仅是患者与疾病源相接触的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最后一件。最早证明这一因果链的研究者大概是普契瓦·波特爵士（Sir Percival Pott），在他 1775 年出版的研究中证明了这一问题。波特对英国的一些特殊职业群体很感兴趣，打扫烟囱者，患阴囊癌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正是波特揭示了感染这种疾病的一系列社会因素。冬天人们需要热量，为了获得热量，人们使用管道加热器。这些加热器烧燃料产生了大量的烟灰，于是，烟囱就需要经常打扫。这样一来，产生了对烟囱打扫者的需求，他们是经常与烟灰接触的人，而烟灰可以导致阴囊癌（格雷厄姆和里德，1979）。

在戏称为“流行的流行病学”中，社区成员——而不是健康事务官员——寻找危害他们生命的疾病的社会和环境诱因。比如，在马萨诸塞的沃本，许多家庭提醒科学研究成员，把倾倒在城镇饮用水源的工业致癌物和社区孩子白血球过多症的高发率联系在一起（布朗，1987）。居民活动分子也负责责任地把其他环境危险——如杀虫剂、石棉——从阴暗的角落引到公众的视野中。

健康与疾病的不均匀分布

社会流行病学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健康与疾病在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年龄。像上文提到的那样，在美国，导致死亡的疾病更多地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从婴儿期成活下来的人一般都能活到老年，5 岁至 12 岁之间的死亡率（0.3%）是各个年龄段中最低的，此后，死亡率的比例缓慢上升，直到 50 岁时开始快速增加，这时，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不断削弱。

性别。在美国以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妇女往往比男性的寿命长（胡佛和西耶热格，1986），妇女的死亡率在各个年龄段都低于男性。例如，1991 年美国妇女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 6.9 年。男性的较高死亡率有生物与社会两方面的原因。很多功能紊乱，包括循环系统疾病和严重的细菌感染，在男婴中要比女婴中更常见。一般来说，成活下来的男性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如工作压力等，并且吸烟与酗酒的比率，男性也要比女性高。

尽管把产妇的医疗护理排除在外，女性声称自己患病和使用医疗设施的比例仍然高于男性。一些研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更愿意了解病情，而且愿意寻求帮助（科克拉姆，1992）。

种族与社会经济地位。除了亚裔人以外，美国的其他非白人种族的寿命一般都比较短，并且健康问题也比白人多。例如黑人，在美国所有较大种族中的健康状况最差。实际上，十年来美国人口健康状况最大的变化正是黑人健康的急剧下降（科克拉姆，1992）。全美健康状况最差的是黑人男性，其预期寿命从 1987 年的 65.2 岁下降到 1988 年的 64.9 岁，尽管 1991 年又回升到了 65.6 岁。与此相比，白人男性 1991 年的预期寿命是 73 岁，黑人女性为 74.3 岁，白人女性为 79.7 岁。导致黑人健康状况如此糟糕的真正原因

尚未有定论，但是很多证据表明，黑人因为吸烟、高血压、高胆固醇、酗酒、超重以及糖尿病，而处在一种健康受到危害的境况，这些疾病因素通常又与低收入和高压力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奥滕等，1990）。

亚裔美国人代表了相反的另一极端状况，他们通常获得了比美国其他少数民族群体都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些数据表明甚至超过了白人——平均来看，他们的健康状况很不错，死亡率（包括婴儿与成人）也低于所有的种族。

这些事实说明，如果把种族中的收入和与其相关的环境差异抛开，许多健康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穷人对疾病的易感性高，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较差。穷人大多居住在拥挤的住房里，不具备基本的卫生条件，并且处在犯罪发生率较高的社区中——这里酗酒、吸毒的亚文化盛行。营养不良加上与贫穷相伴而来的身体与心理压力，不断削弱着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或者加重已有的健康问题。穷人不仅仅更可能生病，而且由于缺少必要的高质量医护条件，因此，与富人相比，他们的疾病也更难于治愈（达顿，1989）。

2

医疗保健系统

医疗保健系统包括所有承担、资助、规范医疗问题的人员与正式组织。拥有成千上万名医生、护士、值班医生、技师以及千百个诊所、医院、医学院、护理院的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只不过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因此，回顾一下其历史发展和产生的原因将很有帮助。

医疗保健的简短历史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医疗活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大量的行医人，包括受过正式训练的医生、草药医生、顺势医疗论者（homeopaths，相信对症状的医治包括了对疾病本身的医治）都能够合法地为赚患者的钱而自由竞争。许多公众不相信那些受过训练的医师，因为他对科学知识只是一知半解，常常用一些相对野蛮的方式为人治病，把病人弄得很痛苦，甚至致死。这些医师所喜欢的药方不过是放血、猛泻以及引人致呕的化学物品。

20世纪，医学取得了长足进展。受过很好训练的医生弃绝了多数非科学的竞争，并取得了对医疗的控制权（斯塔尔，1982）。医生治愈患者的能力不断增强，这使他们具有了超过其他行医人的优势，而且改善了在大众眼里的形象。医生开始被美国各个阶层当作治病救人的象征（弗里德森，1979）。

医生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职业专门化。专业技术人员是一类地位较高的职业，通常以服务为取向，他们的特征是对该专业领域的知识，接受了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的专门训练（古德，1960）。职业专门化无一例外地包括：设置本职业成员的条件和绩效的标准，培训新成员，剔除不合标准的成员。职业组织通常能够成功地保护成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

1847年，医生建立起职业组织，即美国医学联合会（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到20世纪20年代，医学联合会已经成为美国医疗

保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医学联合会之所以赢得如此大的权威，主要是由于它在医学教育改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1900年前，任何能够负担起医学院费用的人都可以成为医生，除了少数学校外，大多数医学教育的质量非常差。1910年，阿尔伯特·弗莱克斯纳（Albert Flexner）写了一份报告，对美国的医学教育提出严厉的批评，并要求进行改革。医学联合会具有批准医学教育的权力，并由此几乎完全控制了对医学教育。

医生的职业化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后果——医学教育和医疗护理的明显改善，以及医生和医学联合会声望与权力的加强。医学联合会通过剔除那些不适合从医的人员，产生了约束成员的规范与纪律。成为医学联合会的成员，是取得职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不是靠引见或其他职业联系。

医院的增加。医院的发展与医学技术的进步有明显的联系。直到19世纪末，医院还是穷人踏上不归路的代名词。由于污秽的环境，广泛传播的细菌，以及粗糙的医疗技术，医院的死亡率非常之高。对医院护理的需求如此之少，以至于1878年全美仅有178所医院（科克拉姆，1992）。

医学的进步极大地改善了去医院的人们的健康状况。由于私人医生无法获得和拥有新医学技术，医院就成了医疗技术和医学研究的中心。而且，在医学联合会的压力下，医学院开始把自己的教学更多地与医院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医院就逐步成为医学研究与教育和治疗患者并重的场所（罗森贝格，1987）。到1991年，美国的医院数量已增至6738所。

医疗保健资助的转变。20世纪早期，患者要么自己向医生和医院付费，要么受到慈善机构的帮助，政府很少参与医疗保健的供应、立法和资助。

伴随着大萧条期医疗保险的上升，医疗服务由第三方付费开始流行起来。同时，医生组织的保险计划可以为到医院就诊的人支付账单（称为蓝盾计划，Blue Shield），也可以为到私人诊所就诊的人付费（称为蓝十字计划，Blue Cross）。这些保险主要由中产阶级和雇主购买，但穷人和老人很少受到这一计划的保护。

1965年，国会修正了《社会保险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通过了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和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老年医疗保健制度为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医院和减免医疗保险费用，无论他们收入多少（一些65岁以下的残疾人也包括在这一计划中）。医疗补助方案把联邦津贴用于国家开办的项目，以此作为穷人支付医院和医生的费用。这两个方案使国家较深地——也是第一次——介入医疗保健的资助、管理和立法，尽管其对象大多数是老人和穷人。

政府在其他医疗保健事务中的作用也不断扩大。20世纪早期，大多数州政府都负责传染病的防治，他们提高了公共场所和工业的卫生标准。除了被医生忽略的某些方面，例如慢性精神病，州政府很少提供直接的患者保健。60年代中期，通过老年医疗保健制度和医疗补助制度，联邦政府成为医学研究的最大资助者，也是私人医疗机构和人员的主要影响者，而且通过170家左右的退伍军人管理局所属医院，凭借自己的实力，提供着大范围的医疗保健。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仍然主要是由相对自由、不受政府控制的

私人医生来承担。

今天,这种或那种私营的、或政府的医疗保险涵盖了大多数美国人(约87.2%)。超过65岁的老年人仅有0.4%不在其中(《美国统计摘要,1991》)。对于那些没有健康保险的人员——占总数的13.4%,大约3700万人口——医疗保健的花费可能是巨大的。大量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正迅速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克林顿政府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实施一个普遍资助计划,涵盖那些现在无法获得医疗保健的人员。

医疗保健的组织

美国的医疗保健由大量的自治组织和个人承担。对医疗保健系统的各种要素,没有中央机构来协调、控制和计划,结果,在美国医疗界,许多群体都卷入了大量的冲突之中。要了解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必须区分这一系统的一级提供者和二级提供者。

直接参与医疗保健活动的人员和组织是一级提供者,包括医生、护士、医辅人员和医院。

二级提供者发明和出售直接医疗活动使用的技术,并培训医护人员。这一类的组织包括医学院、护上学校和其他培训医疗工作者的机构,还有药厂和医疗设备供应商。

医生。医生是最令人熟悉的医疗保健人员,为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中,大约80%在医生的诊所里进行。现在美国约有将近56万活跃的医生,其他还有实习医生、常驻医生、医院和诊所的全职工作人员。

大多数医生是男性、白人、城市居民。1988年,仅有15%的开业医生是女性(《世界年鉴》,1990)。但是最近医学院毕业班的性别和种族构成表明,白人男性在这一领域的统治地位正在逐步下降。据估计,20世纪末将有24%的医生是女性(克勒特克、马德和西尔贝格尔,1990)。

20世纪早期,多数医生是通才而非专家。通才能治疗“所有的患者”;他们熟悉患者的所有医疗问题,帮助照顾患者,并在必要时推荐他们去见专家。当然,今天的大多数医生都是专家。有50多个医学专门领域,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去看相应的医生。一般没有一个医生熟知所有的病症。

有几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医生的专门化倾向。最主要的一种认为,医学知识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人不可能了解全部知识且达到很高的水平。另一种观点认为,成为专家比只做普通医生有更好的声望和更多的收入(科克拉姆,1992)。结果,甚至是普通的医疗活动也变成了专门的活动,如家庭医生。

医生在美国社会拥有十分优越的地位,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和比其他职业都高的收入水平。位于医疗保健等级系统上层的医生,对于自身的工作条件具有不同寻常的控制力。

医辅人员。医辅人员包括护士、药剂师和实验室技师,他们一般在医生的管理监督下工作。医辅人员负责照顾患者或与护理相关的一些工作,但比医生的声望要低。这种状况挫伤了医辅人员持之以恒地推进自己职业专门化的努力。而且,很多医辅人员来自少数民族、低收入阶层和工人阶层背景

(科克拉姆, 1992; 弗里德森, 1970)。

护士的职业化比其他医辅人员的职业化都成功。约有 75% 的护士在护理院和医院工作, 在这些地方, 他们成功地把一些不愉快的工作, 如床边护理, 转移给了声望较低的工人。近几年来, 护士进一步拓宽了工作空间, 进入许多以前属于医生的领域。护士已经获得管理者和护士开业者的角色, 并接受训练去进行体格检查、管理实验室实验、提出参考建议以及执行其他通常由医生完成的日常任务(科克拉姆, 1992; 福克斯, 1989)。

医院。医院是当今最重要的医疗保健机构, 担负着治病救人、医学研究、医护工作人员的培训和为公众提供预防性医药等众多功能。尽管大量的医疗服务工作是在医生的诊所里完成的, 但医院获得了医疗收入的最大份额——占全部份额的 39% 左右, 而医生仅占 20%。医院收费是消费价格指数中上升最快的项目之一。

美国主要有三种供短期住院的医院: 政府所有的医院(占全部的 31%) 可能是人员和装备最薄弱的一类, 通常位于城市的贫民区, 是穷人依赖的医院; 自愿不赢利医院(占总数的 50%) 位于郊外, 为中产阶层和上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私人赢利医院(占总数的 18%) 为收入较高的人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一般位于住家的附近, 规模比其他医院都小。

几种新动向可能影响到美国医院的发展。一个是美国住院病人的入住率不断下降, 这种情况将持续到整个 90 年代, 到 1995 年, 医院的入住率将下降 10%~15%, 其中 65 岁以下的人入住率将下降 20%。另一种倾向是住院平均时间的缩短, 许多患者出院越来越早。这两种倾向已经使一些低利用率医院不得不关闭。医院利用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医院外医疗保健的增长(布伦顿, 1985)。

其他主要医疗保健。除了医院以外, 还有很多组织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它们是护理院、收容所、流动医疗中心、急救中心、罪犯改造机构、诊断中心、外科中心、健康维护组织, 以及社区健康中心。

健康维护组织(The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HMO), 是一种预先付费的组织活动, 其成员每月付费, 可以获得综合性的医疗保健服务。它是一种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类型。参与的医生得到自己的年薪, 或是从每一个患者的保健中获得固定的报酬。这样的安排激励医生尽可能通过预防为主的方式保持患者的健康。健康维护组织的医生一般不会做那些不必要的治疗, 以避免组织利润的减少。到 1990 年, 有 607 家健康维护组织计划开业, 加入这些组织的成员已经达到 3 250 万——比 1970 年增加了 500%, 预计到 1995 年其成员还将增加三倍(布伦顿, 1985)。

社区健康中心(Neighborhood health centers)是联邦政府资助的诊所, 目的是为居住在贫民区的人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虽然他们已经使穷人可以看得上病, 但其工作人员的素质一般比其他组织的要低一些。

除了依靠医疗机构以外, 现在约有 400 万美国人能够在家里接受一些医疗保健服务。新技术的发展使得患者所希望的一些治疗, 如化疗、透析、静脉抗生素注射或者特殊止痛剂和营养素等, 可以在家里进行。这样的患者服

务一般是由赢利或不赢利的家庭保健机构承担，其费用大约只相当于住院治疗的30%~70%。

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与美国不一样（赛德尔，1982）。美国与南非是惟一没有任何国家医疗保险的工业化国家。许多国家，例如瑞典和英国，都有政府经营的国家健康服务系统。这些国家的医疗保健由税收来支持，免费向全体国民提供，几乎全部的医生都是为政府工作。

其他国家，像德国和日本，是非集中性的国家医疗系统，根据个人的职业与雇用地区的不同，强制保险和医疗服务的内容也不同。这种医疗保健系统主要由雇主和雇员所缴纳的费用来维持，政府只起管理者的作用（科克拉姆，1992）。

医疗保健存在的问题

医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成本的上升、公共医疗支出的减少等问题集中起来要求美国医疗保健系统进行变革。现代医学和新疾病也提出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社会与道德问题。因此，这一节我们将探讨一些主要的、目前仍有争议的医疗保健问题。

1

生活的医学化

不久以前，人们吃的食物、锻炼身体的方法、抚养孩子的方式以及性生活的质量等还被绝大多数人认为纯属个人私事。今天，在不同程度上，这些生活事务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已经属于医学的管辖范围了。也就是说，医学专家研究人的饮食、锻炼、孩子抚养和性等問題，并为医生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识，可以向人们推荐合适的行为方式，处理这些领域的“问题”。这种医学向原本不属医学所管的问题扩张的现象，被称为生活的医学化（伊里克，1976）。

对某些应受消极制裁的个体行为的医学化尤为迅速，这一过程被称为越轨行为的医学化（参见第八章）。酗酒和精神病曾经被普遍认为是邪恶的，现在则被认为是“病态”。虐待孩子、吸毒和许多与犯罪有关的行为也被部分地确定为病态。一旦一个人被认为是病态的，医生就要强制治疗。医生实际上就转变成社会控制者，负责“治愈”越轨行为（左拉，1972）。即使医药无法产生功效，医生把问题定性在医学范畴的垄断地位，也使得越轨行为能够被重新定义为病态，以确保这些问题处在医生的控制范围内。

酗酒等越轨行为不再被看成道德问题，不再受到道德的谴责，而是被当作需要医学治疗的疾病，这种变化多少显得人道了一些。但是，把越轨行为定义为病态并没有消除对它的道德判断，仅仅是把道德判断转移到了医学领域。虽然“健康”、“疾病”、“症状”等词语是道德中立的，但这种医学术

语的使用却具有更深远的影响。例如,近几年来,女权主义的批评家反对把月经前的综合症医学化,他们认为这种医学化似乎暗示着妇女是“危险人物”,因为每月的某个时间,她们的身体和情绪总会出毛病(康拉德和克恩,1990)。这种想法将给工作及其他类型的歧视提供合理的借口。

而且,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医学化把个人问题转化成了社会问题。当医生处理越轨行为时,患者成为用医学方法进行社会控制的受害者,包括使用麻醉药。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用药丸或注射来制止非遵从行为(康拉德、施奈德,1980)。

2

用医学技术 保存生命

20世纪,通过发现和制造相对低廉的药品和疫苗,到处都有了灭绝感染的药品,医学科学从而也就征服了大多数感染性疾病。但是,有人指出,“对一种疾病用廉价的方式加以消灭只不过又导致了其他更昂贵的疾病”(莫里森,1979)。人们在容易治疗的疾病下存活,这样可以把医药资源集中起来对付那些难以治愈的疾病。结果,医学技术被用来延长危重病人的生命,尽管有时花费惊人。

对于那些已经病入膏肓,或者忍受巨痛以至于自己都不愿活下去的病人来说,治疗面临着几个伦理问题。例如,用于照顾危险期婴儿和早产儿的新生儿护理室,要为婴儿提供不间断的护理。复杂的技术和高度专业化的医务人员治疗数量相对较少的婴儿,其花费相当高,已达到至少每年1.5亿美元。考虑到有限的医疗设备和财政资源,问题自然就出来了:他们是仅仅治疗少数婴儿的疾病,还是服务于使更多的人受益的医疗和社会目标呢?比如疾病预防或良好的营养。

建立医学技术的分配原则,必须考虑到社会平等这一基本问题。在今日美国,医生和医疗设备的制造商对开发何种医学技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样重大的权力是否应该集中在这部分人手里?哪一部分人的医疗问题更重要?病情最严重的、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决定了谁能负担起医疗技术费用,谁就是受益者。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私人 and 公共保险使人们能够平等地享用昂贵的医疗。但是,谁有最大的优先权使用昂贵的医疗设备呢?是能够负担得起费用的人,还是最需要的人?是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人,还是那些受过社会伤害的人?这些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医疗保健:一种更好的方式?

比尔·克林顿之所以能在1992年竞选上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出了改革美国社会服务系统构成的方案,特别是医疗系统。努力建立并通过立法改革医疗系统的资助方式,增加人民享有医疗保健的机会,成为克林顿政府1993和1994年的主要目标。

在重新思考美国医疗系统的过程中,克林顿总统与他的顾问们借鉴了正在加拿

大和欧洲社会民主国家实施的许多改革方案。虽然政府医疗改革的最后方案尚未出台,可以预计,克林顿的计划将不会比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实施的更复杂。

例如,加拿大正在实行的“单一付费”系统,其医疗保健系统由政府税收支持,而非多种多样的私人保险公司。克林顿政府讨论并摒弃了这种模式,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保险业的激烈反对。尽管它必然会扩大政府的规模,征收更高的税,但是单一付费计划具有削减政府开支的明显优点。实际上,政府的日常文书工作吃掉了美国医疗费用的10%,比加拿大高出十个百分点,而加拿大的医生和医院为政府服务,政府向他们付费。患者不需要付费。美国通用会计事务所估计,同样的内容如果在美国实施,每年将节省660个亿的花费。

我们还可以考虑德国模式,他们允许患者自己选择医生,医生的收入来自患者的保险基金,而不是患者。德国共有1100个类似的基金会,由雇主和雇员共同付费。个人从开始工作时加入医疗基金会,接下来就可以一直享受基金的资助,不论是否变换工作,也不论身体状况如何。基金会的成员或其代表每年会面一次,与政府机构共同协商,决定下一年医疗保健费用的增长幅度,以及如何在医生、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之间分配资金。接受者只能使用到下一年费用的最高限额;他们在这一范围内有权决定如何分配资金和如何开展工作。医生发现,有时候他们必须限制自己与患者在一起的时间;但从正面意义来看,这种做法确实降低了医疗费用。1989年,德国医疗费用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2%——平均每人1232美元——与之相对应,美国的数字是11.8%和2354美元。

法国的医疗计划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减少浪费的话,美国医疗系统能够获得多少收益。

- 孕妇的保健是免费的、综合性的。任何即将做母亲的人都能得到每月110美元的现金补贴,但为了确认资格,她们必须去医院做至少三次孕期检查,如果自己无法去医院,可以安排家庭检查。

- 要得到每个月政府给予的儿童保健津贴,父母必须在孩子1岁之内,带他做至少9次免费的体检。

- 免费的儿童医疗保健和给予父母的现金津贴一直持续(甚至增加)到孩子20岁止,只要他们是一直待在学校里。

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给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提供着良好的服务,但是,有大约4000万美国人在任何特殊情况下都无法获得医疗机会。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加拿大和欧洲的医疗系统虽然并非十全十美,但可以为美国起示范作用,只要政治上可接受的拓展医疗机会的计划能够实施。

资料来源:《美国医疗系统的日常文书工作十倍于加拿大》,美国广播公司今晚世界新闻;《成功的德国医疗系统》,美国广播公司今晚世界新闻;《法国医疗系统降低儿童的贫穷和疾病水平》,美国广播公司今晚世界新闻。

3

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是最昂贵的系统。1991年,国家用在医疗保健上的费用是7520亿美元——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3%。这一数字是在近

医疗费用
上升的危机

几十年里增长起来的。1960年，医疗开支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美国的这一数字以及人平均数字都是世界最高的（赛德尔，1982）（参见图12—1）。

为什么美国的医疗保健如此昂贵？最主要的原因是医疗系统中的一些机构——如，医院和护理院对昂贵医疗的内在倾向。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方案都慷慨地把费用花在这样的医疗上，而没有用于更廉价的家庭服务。某些情况下，尽管医生认为患者待在家里更好一些，然而，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的政策规定，却使得人们不得不把昂贵的机构医疗作为惟一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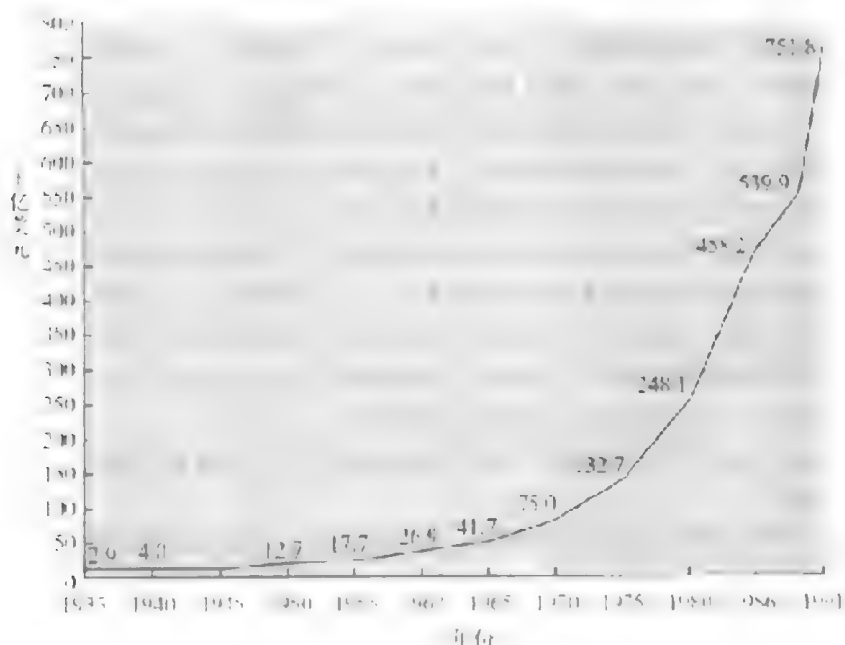


图 12—1 1935—1991 年美国国家健康保健支出
〔支出者：消费者、政府、慈善机构和工厂企业〕

由公共医疗项目和私人保险公司向医生和医院付费，作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报酬，这种第三方付费制度也助长了医疗费用的居高不下。医生建议病人接受昂贵的治疗方案的原因，部分在于保险费将分摊这笔费用，即使是税收和保险费最终将达到与支出相同的水平。虽然保险公司经常向医院和医生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削减成本，但是，保险公司提高保险费毕竟更容易一些，也不用冒着被医生和医院要么联合抵制，要么撤销使保险公司受益的折扣等报复的危险。

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是服务和医用资源成本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劳动成本的增长。而且，从专门的化验测试到先进的医疗设备，可采用新的技术手段也往往并不便宜。医生经常用医疗失误保险费的上升来解释医疗成本的增长。从更深的层次来看，美国医疗系统，健康维护组织例外，基本上是在付费服务的观念指导下运行的，为患者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要单独收费，而不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统一收费。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助长了医疗费

用的上涨。医疗费用较高的最后一个原因,大概可以归咎于作为服务供给方的群体所处的特殊地位。医生作为一个群体要求高工资,药品公司要获得比其他行业高的利润。只有消费者对削减医疗费用的愿望最强烈,但是他们却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也就无法实现降低价格的愿望。

政府最近建立了相关诊断组(diagnosis-related groups)(DRGs)系统,以控制政府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下的病人的医疗费用。根据这一系统,医院依据460种医疗诊断的预定费率收费,如果患者的实际花费低于相关诊断组所付给医院的费用,医院就赢利;否则,医院就要承担亏损甚至破产的风险。

相关诊断组系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反对最激烈的是美国医学联合会,它害怕医生会因此而失去在医疗保健系统的地位及控制权(麦金尼和斯托克利,1988)。其他人担心患者会在相关诊断组系统蒙受“损失”。比如说,相关诊断组对同一病症的严重程度没有作出相应的区分。医院是否会拒绝接收病情重(因而花费也更多)的患者?或者相反,医院将接收更多患者(但只是短期住院),因为这样能带来更多的利润(戴维斯,1986)?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昂的医疗费把一些美国人从医疗市场中排挤出去。这些人主要是占总人口13.5%的没有医疗保险者(从1986年的11.6%上升到现有的幅度)。他们是准贫困人口而非赤贫人口(赤贫人口可以享受国家医疗补助计划),准贫困人员拥有低收入的工作,但工作本身不提供医疗保险福利。这样,一方面,他们的收入水平对于获得医疗补助来说是太高了;另一方面,对于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来说又太低了。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没有保险的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36.9%),接下来是古巴裔(20.3%)和非洲裔(19.7%)。

4

艾滋病: 社会、经济 和道德问题

近年来,没有什么医学问题比艾滋病(获得性免疫功能缺乏症)(AIDS)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了。自从1981年艾滋病被首次确认以来,人们已经把它和瘟疫、或黑死病——14世纪肆虐欧洲的疾病,短短的四年内夺去了一半人口的生命——相提并论(普拉特,1987)。艾滋病比瘟疫发展得缓慢,感染率也较低。然而,1991年美国的艾滋病患者达到43 672名。这种疾病已经对我们的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迫使美国社会去面对新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道德问题。艾滋病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广泛流行,特别是非洲国家。

艾滋病战略学家认为,由于我们没有治疗艾滋病的方法,也没有能够抵抗艾滋病的疫苗,我们有必要告诉公众,尤其是年轻人,艾滋病毒是怎样感染的,也要劝说他们适当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尽管有关艾滋病的实际信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公众的认知仍有些混淆。例如,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艾滋病是通过性(同性或异性接触),或者非性活动(与感染者共用同一个针头),接触了被感染的血液以及出生于被感染病毒的母体等渠道传播的。然而,最近在十几岁的少年中的一次调查(盖洛普,1988)显示,大约一半

的人认为自己会因为捐血而感染艾滋病（很多成人也因为害怕捐血感染而不再捐了，结果导致国家血液供应短缺）。调查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错误地认为，他们会因为与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共用一个杯子，或者受到他们咳嗽和打喷嚏的影响而被传染上艾滋病。

除了提供真实的信息外，官方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艾滋病的教育计划中，到底可以把什么样的问题告诉大众。比如说，最近一位美国外科医生协会的秘书长曾建议，低年级学生的卫生保健课应该鼓励性节制，但也要明确地告诉他们一些安全套和性关系——包括婚外性关系——的知识。然而，代表一种较为保守观点的另一些人则反对开设任何有关安全套使用的课程，建议学校强调性节制，并把性关系的讨论局限于婚姻内（莱纳冈，1987）。意见分歧同样出现在成人艾滋病教育领域。纽约城市学校系统最近的决定——把免费的安全套分发给需要的学生——在全国激起了一场大论战。

在对感染艾滋病的流行性恐慌中，如何教育公众理性地对待艾滋病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例如，由于害怕自己的孩子感染上艾滋病，父母们要求已经感染上病毒的学生离开学校。其他与艾滋病有关的现象包括：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以及广泛的同性恐惧症——害怕和避免成为同性恋者。

艾滋病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控制病毒的传染、克服不理性的恐慌。人们还提出了其他控制行为的做法，但这些做法也同样带来了一些问题，引起实用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冲突。比如静脉注射毒品者，他们是在人群中传播艾滋病毒的高危群体。到目前为止，单是教育的力量还无法说服他们停止共用针头。因此，是否应该把干净的针头分发给他们？支持者认为，这样做有助于防止艾滋病毒的传播；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在鼓励不法行为。干净针头计划已经开始在几个地方实施，虽然有不少的反对者，但其结果仍有待检验。

公共医疗部门的官员们（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还必须应对由这种疾病带来的巨额经济负担。据估计，一个艾滋病患者到去世前的医疗花费平均在 27 000 至 150 000 美元之间（施托维基和克莱冈，1986），但一些分析家发现，在美国可用于每个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费用将不可能超过 80 000 美元（布卢姆和卡林内，1988）。许多艾滋病患者无法负担起医疗费，一方面是因为昂贵的医药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疾病严重损害了他们工作的能力（福克斯，1987）。因此，联邦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必须承担病人或商业保险公司所不能负担支付的费用（埃尔加，1987）。这引起了各种伦理与法律问题。社会是否应该承担那些已经得到警告但依然我行我素的患者的医疗费？由于血液的污染而感染上艾滋病的人们能不能起诉？如果能的话，他们应该起诉保险公司、医院、还是政府？同样地，谁来为感染艾滋病的无辜的孩子们付医疗费呢？

艾滋病已经引发了大量的、有关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伦理问题。例如，对艾滋病毒的检测应该不应该是强制性的？一些民权自由主义者认为不应该，但是，如果一个被怀疑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需要医治而又拒绝检测时

怎么办？这种情况下，医务人员的权力有哪些？军队（或者其他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是有权力对其成员进行检查呢，还是这样做会侵犯个人的隐私权？秘密是否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保留呢，还是应该通知艾滋病患者的家人，以及其他可能感染或已经感染的人？一个州可以隔离艾滋病患者，还是这种做法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权利？

艾滋病如何影响我们未来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现在尚没有明确的答案。人们的性行为可能开始变得保守起来；一些医生和护士可能因为恐惧和压力而转行，由此导致医务人员的短缺；国家为保护本国公民而实施旅游限制；作为对艾滋病的一种个人的和经济上的解脱，安乐死可能受到鼓励；作为艾滋病研究的副产品，可能会有医学研究的繁荣和治疗及预防其他疾病的新进步（科尼什，1987）。以上几个方面只是可能的几种变化，然而它们表明，这种新疾病所带来的长期社会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年龄和年老是社会学最新的研究领域之一。在发达国家，随着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而且，由于出生率的下降，老年人口在这些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2. 对年龄和年老的态度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儿童期只不过是17、18世纪才从成人世界独立出来的一个生命阶段，少年和青年也只是在19世纪末才被认可的独立生命阶段。中年与中年危机则是一个更晚的“发现”。老年也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在过去的美国以及很多现在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社会，变老与地位和权威的增长相联系；现在，由于美国社会赋予年轻人很高的价值，老年有时候意味着价值和地位的丧失。

3. 社会按照年龄来分派人们的地位和角色。基于人们年龄的地位称为年龄地位，与年龄地位相联系的是年龄角色，即对占据一定年龄地位的人的行为期望。年龄角色由年龄规范——规定一个既定年龄的人应该如何想和做的标准——组成。年龄越轨指违反群体或社会的年龄规范的行为。有时候年龄地位是不一致的，例如当一个人获得了一些成人权利（如有服兵役的义务）但不具备另一些权利（如喝酒的权利）时。对一个人不同年龄地位的社会期望的不一致，称为年龄地位不一致。

4. 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之一是认为他们情绪不稳定、身体不太好。这种负面的想象是年龄歧视的表现之一——即认为老年人是生物或社会意义上的次等人，并由此而歧视老年人的一种观点。

5. 生理上的变化在变老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老年人普遍都会感到听觉和视力的下降，记住近期发生事情的能力也常常会衰退。妇女的月经在中年就停止了。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多地经受着慢性病的折磨。

6. 老年学是研究变老和老年人特殊问题的学科。社会老年学分析人们

向老年转化的过程有以下几种视角：脱离论把变老看成是一个逐步脱离社会的过程，一个为死亡做准备的时期。活动论认为，由于社会的结构性安排，老年人减少了自己的活动水平；当人们变老时，他们失去了很多社会角色，然而，如果维持一个较高的活动水平，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将很高。连续论则把“老年”仅仅看成是个人生命的后半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段”。第四种观点认为，老年人构成一种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形成一个支持网络和组织，帮助提升老年人的权利。

7. 退休。20 世纪初在美国尚不多见，由于政府的社会保障计划和组织的退休金计划而变得普遍起来。因为许多公司有强制退休政策，很多人不得不退休。虽然退休通常伴随着收入的急剧减少，大多数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还是相当满意的，也有一种愿意提早退休的倾向。但是，不断增大的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比率，威胁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基础，并可能导致退休方式的改变。

8. 美国老年人居住的一个主要需要是靠近或容易得到基础服务。联邦政府为老年人兴建了一些低租金、高标准的住房，许多富裕的老人搬进退休社区，特别是在阳光地带。这些住房选择使老年人单独居住在特殊的社区中，和其他年龄的人分割开来。

9. 传统上，家庭具有照顾老人的责任。但是，财力的限制以及老年人严重的疾病常常使得社会性照顾成为必然。在今日美国，供短暂住院的医院、护理院、精神病院是照顾老年人的社会性组织。尽管住在护理院的老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但它对那些单身、寡居、离婚、无子女或身体较差的老人来说却非常重要。

10. 虽然所有国家老年人面临的问题大致相同，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在中国，有尊敬老人的传统，并且这种传统在企图摧毁旧的价值观念的考验下，也仍旧保存了下来。在农村地区，照顾老人几乎完全是家庭的责任。在以色列的吉布兹，老年人从不需要担心住房和财政支持。只要他们力所能及，就可以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但是，吉布兹老人把领导权交给年轻人以后，却面临着地位丧失的问题。乌干达的艾克人却粗暴地对待老年人。

11. 许多工业化国家比美国有更低的婴儿死亡率和更长的预期寿命。社会流行病学是对疾病的社会分布和这种分布与社会和环境特征的关系的研究。社会流行病学家们试图确定导致人类与病原体接触的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链条。

12. 在美国，健康与疾病在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分布情况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亚裔除外）老年男性和穷人的健康问题比较多。低收入者的健康状况较差是因为住房拥挤、不卫生的生活条件，接近暴力、酗酒、吸毒等其他有害的事物。

13. 医疗保健系统包括所有承担、资助和规范医疗保健事务的人员与机构。

14. 在 19 世纪，美国的医疗活动很不规范，人们生病大多去找草药医

生，到了 20 世纪早期，医学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训练的医生组成一支强有力的职业组织并且获得对医学教育和行医执照的控制权，这两个步骤消除了许多非科学的竞争。

15. 19 世纪末，医院还只是穷人通向死亡的地方。在 20 世纪，医院变成了有效的治疗中心，把医学教育和研究以及新技术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16. 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病人只能自己支付医疗保健费用或接受施舍，19 世纪 30 年代，第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成立了，随着 1965 年老年医疗保健制度和医疗补助制度的推出，政府开始资助医疗保健事业。

17. 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包括：(1) 二级提供者，如医学院，护士学校和其他一些培训医疗保健人员的机构以及药物生产者和医疗设备提供者；(2) 一级提供者，如医生和医辅人员（医疗辅助人员，包括护士、药师和实验室技师，他们一般在医生的指导下工作）、医院、健康维护组织和社区医疗中心。

18. 其他许多国家，包括英国、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都比美国更集中。在这些国家中，医疗一般都是免费提供给每一个公民，尽管存在隐性的成本。

19. 生活的医学化就是将过去认为不是医疗问题的问题纳入到医疗管辖权之内，在被称作越轨医学化的过程中，一些应受消极制裁的行为如酗酒被认为是一种医学问题。

20. 医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医生挽救生命的能力。但开发和使用这些技术的高昂费用又带来了严重的道德问题。

21. 昂贵的医疗机构，三方付费，昂贵的服务和资源，高额的医生薪水和药品公司的利润是医疗保健费用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

22. 艾滋病就如同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目前还没有办法医治艾滋病，它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经济和道德的新问题。在过去的 10 年中，艾滋病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

推荐阅读书目

1. 科克拉姆 (Cockerham, William C.), 1992. 《医学社会学》(*Medical Sociology*,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该书包括了对健康与疾病社会学的最新概念与综合。

2. 亨德里克斯 (Hendricks, Jon) 和亨德里克斯 (C. Davis Hendricks), 1986. 《大众社会的年老问题：神话与现实》(*Aging in Mass Society: Myths & Realities*, 3r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一本关于年老、老年人状况、老年学领域的综合教科书。

3. 林恩 (Payer, Lynn.), 1988. 《医学与文化》(*Medicine and Culture*).

New York: Holt. A discuss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illness is defined and treated in different societies.) 该书对不同社会如何定义与对待疾病的方式进行了讨论。

4. 斯塔尔 (Starr, Paul), 1982. 《美国医学的社会转换》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Pulitzer Prize-winning history of American medicine by a sociologist.) 一位社会学家眼里的美国医学历史, 该书为普利策奖获奖作品。

1993年秋季，俄亥俄州耶洛普林斯市安蒂奥克学院的新生除了像往常一样，了解学校周围的道路，搬进寝室，报名上课以外，他们又接受了一项少有的社会化教育：关于大学中性侵犯对策的介绍。

针对一般的性犯罪和特殊情况下约会强暴^①的问题，安蒂奥克学院制定了一个授权于女性的行为准则。这些女性一般是性犯罪和性骚扰的对象。行为准则明确说明了学生约会时合理的行为。

这个准则强调，所有的性接触必须是双方完全同意的。含糊同意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任何性行为发生之前，必须进行明确的讨论。与之相类似，在性接触发展到一个更亲热阶段之前，比如说，从接吻到身体抚摸，从爱抚到真正的性接触——双方都必须表示明确的同意，当一方希望将两人的亲密关系升级时，有责任征求对方的同意。

安蒂奥克学院的新政策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主要是这个政策的古怪震惊了许多外界的观察家，但同时大家也认为这个政策是很难执行的。这也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生活中一个严肃而真实的问题。

如果问一下为什么像这样的政策会在90年代产生呢？社会学家会引用埃米尔·迪尔凯姆的经典著作来解释：在价值和行为准则高度认同的社会，很少有正式、精确的法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或她）应该做什么，没有

^① 请参见第八章的“应用社会学”栏：“避免受害与避免约会时遭强暴”。

必要把任何事情都规定下来，与此相反，缺少强有力的道德认同感的社会，则通常有一个广泛而正式的法规（迪尔凯姆，1969）。运用于安蒂奥克学院的约会政策，迪尔凯姆的洞见提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两性间的关系正经历非常快的变化，许多现代社会的人对如何对待异性感到极为迷惑。

在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行为通常是由先天生物因素来解释的。人们认为，女性天生就具有母爱，能合群，认为她们生来就适合于管理家庭、照看孩子，而男性则被认为是勇敢、富有竞争力、有理性，不易被感情所摆布。所以说男性适于管理国家、参与战争和商业活动，如果男性试图控制女性，甚至用暴力达到他的目的，都被认为是男性的本性所致。

但如果男人和女人的行为都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那么人的行为在几十年里就不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基于这个研究，许多社会科学家都认为社会化是性别角色差异的主要原因，他们认识到传统的性别差异受到社会条件和人们认识自我的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因此他们认为人们有可能不断改变这些角色，以达到两性间的平等。改变性别角色的结果并不像安蒂奥克学院的约会政策那么极端，但就算是一个粗心的观察者都会认识到当代美国人的性别角色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

在这一章里，我们首先讨论存在于两性之间的生理和心理差异的表现，然后回顾一下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历史，考察性别不平等的模式是如何深入到美国社会的。最后，我们将简要论及一些目前致力于改变传统性别角色模式的做法。

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

在何种程度上，男性和女性采取的不同行为方式可以用生理和心理因素来解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近许多学者都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这一部分里，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生理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在“性和性别差异”这一问题中的研究发现。

1

生理差异

生理因素对男性和女性行为的影响是复杂的，我们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懂。尽管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具有基因、荷尔蒙和生理结构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对行为的影响程度我们还知之甚少。

研究表明，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明显是由性别来划分的，甚至在没有受到文化影响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比如罗猴在人造假“妈妈”的“抚养”下，它们在2个月大的时候仍具备了性别的基本社会特征（参见第六章），雄性较具侵略性，而雌性则更被动些（哈洛，1962，1965）。

性别角色在不同的方面有着广泛的差异，雄性罗猴一般对做父亲并不感

兴趣，而有些猫脸猴却十分关爱其幼崽；狒狒中雄性的地位高于雌性，而一些猕猴却是由一对母子作为统治者，因此，尽管雌性灵长类的行为与雄性不同，但差异的性质并不是总能预见的（阿博特、基托维切-温内和沃勒尔，1986）。因为灵长类动物之间在性方面的行为差异很大，人们在把这些发现推广到人类时，应十分慎重。

为了弄清生理学和行为的关系，有必要区分出生前的生理差异和出生后经培养而形成的生理差异。这种差异受以下两个基本生理成分——染色体和荷尔蒙——的影响。

染色体

当一个孩子出生时，我们通过看其生殖器就可以立即判断出性别。但在其他生理方面，两性是非常相近的，人们一般只能通过约定俗成的“粉色和蓝色”这样的标准来判断一个穿尿布的婴儿是男是女。否则，经常是会弄错的。

两性生理上的差异在出生前的很长时间就由基因决定了。人类胚胎的每一个细胞都带有 23 对染色体，这种位于细胞核内的线型结构中就包含着基因。它携带着所有的遗传特性，除了决定这个孩子性别的染色体之外，其他每对染色体的外形都是相似的。由男性排出的精子细胞，一半含有一个 X 染色体，一半含有一个 Y 染色体，而母体卵细胞往往只含有一个 X 染色体，两个 X 染色体结合产生一个女孩，一个 X 染色体和一个 Y 染色体结合产生一个男孩。

无论是一个 XX 组合还是一个 XY 组合，这个胚胎在妊娠六个星期后才能显现出其性别特征。与此同时，一个男性胚胎的 Y 染色体与一个 X 染色体，规定着睾丸的生长，而女性胚胎的两个 X 染色体则规定着卵巢的生长（莫尼，1977）。

荷尔蒙

性器官一经形成便开始产生荷尔蒙。这种化学成分增进或抑制着生理过程的活力和身体功能。有三种主要的性荷尔蒙：睾丸激素即男性荷尔蒙、黄体酮即妊娠荷尔蒙和雌激素，即女性荷尔蒙。这三种荷尔蒙都是由男性或女性的性器官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荷尔蒙混合体刺激胚胎组织，形成男性或女性的内部或外部的性器官。男性睾丸产生大量的雄性荷尔蒙，女性的卵巢产生雌性荷尔蒙和妊娠荷尔蒙，以及少量的雄性荷尔蒙。

青春期卵巢开始产生更多的雌性激素，而睾丸则产生更多的雄性激素，伴随着生殖能力的具备，这也促发了第二性特征，如乳房、体毛、变声。青少年时期，荷尔蒙引起了生理的快速变化。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也引起了心理和行为的变化，青少年时期，孩子向成人转变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荷尔蒙的变化引起的。

在生命的后期，当妇女绝经时，这些由卵巢产生的雌性激素的数量明显下降。同样地，老年男性的雄性激素的分泌也有所减少。

在哪些情况下荷尔蒙影响人的行为呢？一些证据表明，荷尔蒙影响某些由性决定的行为。男孩子似乎比女孩子更富活力，尤其是在一些室外活动和

体育项目上，男孩子表现得更具征服欲，更多地占据竞争中的统治地位；相反地，女孩子更愿意扮演父母的角色（莫尼，1977）。但是，应该注意到，两性都可能采用同样的行为模式，只是某些模式在某种性别中更普遍些。

性学专家约翰·莫尼（John Money）认为，男性和女性中的荷尔蒙差别仅仅是预定了它们的某些行为倾向，也就是说，使他们对环境诱因的反应在敏感度上存在差别（莫尼，1988）。他认为，这种天性在某种程度上会被社会化所改变。

生孩子与母性的本能

生孩子与喂养孩子的能力显然是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所在。事实上，它代表了更明显的性的二态性（sexual dimorphism），或是一个物种的两个不同的存在形式，一些人，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49，1975）认为，男人不能生养孩子是对原始社会男性的排他性习俗的最好解释，米德把这种习俗视作男人补偿他们在创造新生命这种神秘事件中受到限制的一种尝试。

生孩子的生理能力是否与某些母性本能有关，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林赛，1990）。一些研究表明，在满足一个18个月左右大的婴儿的要求上，女性比男性做得要好。因此，新母亲很快能与一个尚无语言能力的婴儿交流，而新父亲甚至是第二次做父亲的人，也不能与新生儿交流，而他们善于与能用语言交流的稍大些的孩子交往，这些孩子不需要太多的身体关爱（罗西，1984）。

但是，另一种研究认为后天形成的行为是由于受社会期望的影响，在斐济，性别区分就不明显，所以父母双方都乐于照看孩子（巴苏，1984），在巴厘岛也是这样（科尔特朗，1988）。

总而言之，目前的现象表明，两性间虽然存在生理差异，但是基因和荷尔蒙绝对不能完全解释性别角色的差异，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2

心理差异

对于两性之间心理差异问题的争论是很激烈的。社会学家认为“心理差异”主要是行为、智力和个性上的差异。这种心理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的，而不是社会化影响的结果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运用跨文化的理论。如果大部分的文化中都体现着某种特定差异，那他们就可能是遗传，而非后天习得。但是，因为社会化进程是从出生时就开始了，我们就不能确认是什么引起了这种差异。我们最好这样说，这种差异出现得越早、越普遍，它越有可能是天生的。

跨文化研究表明，女孩子一般比男孩子更愿接近和寻求帮助，更具养育的天性和忍耐力，另一方面，男孩比女孩更愿吸引别人的注意，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采取具侵犯性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男孩的侵犯性行为和女孩的感性行为出现得很早，因此更像是生理原因所致。女孩的养育本能和男孩维护统治的行为出现得稍晚一些，因此也就更可能是受到社会化的影响（威廉

斯, 1987; 斯托卡德和约翰逊, 1980; 惠特, 1975; 惠特和蔡尔德, 1975)。

心理学家埃利诺·麦科比 (Eleanor Maccoby) 和卡罗尔·杰克林 (Carol Jacklin) (1974) 试图辨别两性间的心理差异, 他们研究和阐释了从1 600多个研究中得到的数据。他们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清晰、公正的研究, 以超越原有的关于男性和女性的陈旧观念, 他们研究的结果可参见表 13—1 的总结。麦科比和杰克林发现, 旧理论没有得到有效的证实, 例如男性的竞争性和女性的被动性。然而他们确实找到了男孩具有攻击性的强有力证据, 以及两性在母性的方面有差异的强有力论据。但是, 在后来的研究中, 由于发现男孩的攻击性只与特定的情形相联系, 麦科比和杰克林对男孩具有侵犯性的结论有所削弱 (1980)。

麦科比和杰克林的工作并不是没有人提出置疑。有一个学者认为他们进行的大部分研究并没有揭示更多的性别差异。比如说, 很多调查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少具有合群倾向 (麦科比, 1966; 特曼和泰勒, 1954)。很显然, 我们在得出有关两性间心理差异的科学结论之前, 有必要做更多的调查研究 (斯托卡德和约翰逊, 1980) (节选自近期畅销书关于描述“男性与女性不同的交际方式在许多场合中是如何引起误解和不满的”描述, 参见“社会学之窗”栏: “悄悄话: 唠叨的女人和缄默的男人”)。

表 13—1 有选择性地列举的一些性别差异

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的	模棱两可或有问题的
在可以观察到大量侵犯性行为的文化中, 男孩比女孩更具有攻击性, 无论在生理上, 还是在语言上都是如此。	一些研究发现男性在社会活动中比女性更活跃, 然而另一些研究的结论却与此相反。要了解终身的差异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
从少年期到成年期, 男性的视觉空间能力一般强于女性。这一能力涉及到对空间中物体的视觉观察, 以及对这些物体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的判断。	一些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好竞争, 另一些研究则不然。
大约 12 岁开始, 男孩的数学技能的增长比女孩要快一些。	男性之间为了控制对方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存在于性别关系中的统治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关系越持久, 影响力就越平等。
大约从 11 岁到 18 岁这一阶段, 女性的语言能力开始超出男性, 这种优势可以在今后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持续下去。	多数研究表明女性并不比男性更被动。两性都愿意探索新环境, 涉入社会场合。尽管男孩更具有攻击性, 但是女孩成为受攻击的被动受害者的次数并不比男孩多。

资料来源: 麦科比和杰克林 (Eleanor Emmons Maccoby and Carol Nagy Jacklin): 《性别差异的心理学》(Palo Alto,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我们都能很清楚地区分男人和女人，但是如果有人问我们什么是男子气或女性特质时，我们可能首先从性开始：我们可能会提到生殖器有明显差异（即最原始的性特征），或者是第二性征的变化，如肌肉组织、体毛。但是我们知道，身为男人或女人的体验包含比生理特征更多的内容。区分性（sex，男性与女性作为生物个体的生理特征）与性别（gender，与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相关的社会、心理特征）是很重要的。事实上，作为生理特征，性是每个人类个体所固有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虽然只有两种性别，但却有多种有关性别概念，那些影响男子特质和女子特质的社会意识，在历史发展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社会是通过分配给两性不同的任务来体现其性别概念。如第四章所述，社会角色是一个社会或群体中占据特殊位置的人应有的行为，性别角色就是与作为男性或作为女性相联系的社会角色。

我们很难认识到自己关于性别角色的文化假定。我们经常想当然地把什么是男性特质和什么是女性特质直接归结于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差异上，但是更多的研究者认为性别角色不一定是由性来决定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早在1935年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她的研究表明一些原始部落中的性别角色与大多数现代化社会有很大差别。比如，新几内亚的千布利（Tchambuli）人，性别角色就“反过来”了。在那里，妇女是经济来源的主要提供者，而男人则在家照看孩子。千布利人视妇女为统治者和权威，而把男人看作是极富感情和创造力的人（米德，1935，1963）。

但是，在大多数社会中，男人和女人承担着——并将继续承担——多数美国人所熟知的性别角色。一般情况下，这种角色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一个女人在舞会上扮演着既娇气又无助，或极富魅力等所有被动的角色，然而她今天可能刚刚参加了一个复杂的商业谈判，同样地，一个男人可能具有温柔的天性，但他不得不表现得“坚强”或“强壮”，以达到社会对他的期望。

传统的社会角色期望塑造了我们的许多日常行为，一般地，人们希望一个男人应该努力工作，养家糊口，要富有竞争力、进取心和成就感。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还是希望女性承担与传统女性角色相关的母亲、妻子、教师、秘书等角色——强调养育作用——而不是那些诸如足球裁判或建筑工人这样的角色（有必要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民族和社会经济组织中的女性都这样，许多非洲裔美国妇女和工人阶层的妇女传统上也是外出工作的）。

由于性别角色由文化决定，它的变化跨越时代，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甚至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阶层之间也不相同。但无论我们担任何种社会角色，我们通常维持单一的性别身份——我们对作为男性或女性的自我认识。性别身份甚至与性倾向无关（即人们经历的性唤起和性快

感),同性恋的男人、喜欢抚养孩子的异性恋丈夫,和那些持传统观念的男人都具有男性的性别身份,尽管他们承担不完全一样的性别角色或具有同样的性偏好。因此,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包含着对性别的个人感受,以及扮演由文化所定义的角色。

悄悄话:唠叨的女人和缄默的男人

女人总是喋喋不休的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德波拉·坦南做了许多关于男人与女人交流方式差别的研究,他提供了一个答案。

戴尔·斯潘德(《人类语言》(Man-made Language)的作者)认为许多人本能地(如果说不是有意识地)认为,女性与小孩一样应该是用来看而不是用来听的,所以她们所说的话就显得太多了(斯潘德,1980)。许多研究表明,如果女人们在一个群体中说得多和男人们一样多,人们就会认为她们说多了。斯潘德的观点有一定的真实性。男人认为女人说得多的另一种解释是因为女人总是在男人不说话的场合说话:在电话里、在和朋友聚会的社交场合,她们不讨论那些男人们认为有趣的话题;像妇女群体中或独自在家的夫妇——换句话说,就是在私人谈话的场合中。

典型的美国家庭的现象就是一个缄默的男人和一个唠叨的女人,这种模式的家庭来源于我所描述的不同的目标和习惯,这就是为什么女人们总抱怨男人“他不和我说话”——然后就是“他不听我说话”。

一个写信给安·兰德丝的女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我丈夫下班后从不跟我讲话,当我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他说:“将就……”或者说“乱糟糟”(我们住在泽西,他在纽约工作)。

但当我们来客人或我们出去串门时就不同了,保罗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一个真正使人入迷的演讲者。他能讲最有趣的故事,人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却总想:“他为什么从没有跟我讲起过这些事呢?”

我们这样过了38年,保罗在我们结婚10年后就开始不太讲话了,我根本找不出是什么原因,您能解开这一谜团吗?

——一位困惑的女士

安·兰德丝认为这个丈夫之所以不想说话可能是因为他下班回来太累了。但女人下班回来也累了,她却渴望告诉她的同伴或朋友这一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甚至是那些一闪即逝的白日梦给她们的想法和感受。

原因可能像心理学家做的研究那么高深,又像写给专栏作者的信那么实际,也像电影和戏剧一样曲折,却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家里男人的沉默就是对女人的失望。而女人们一直抱怨:“他好像和别人有讲不完的话,对我却无话可说。”

电影《美国的高婚方式》是以这样一个场景开始的,德比·雷诺兹正抱怨她和迪克·范戴克不能交流。说他不告诉她所想的任何事。这时门铃打断了他们的争吵,夫妇俩马上开门,笑迎他们的客人。

在关闭的门背后,许多夫妻都会有类似的对话,就像德比·雷诺兹这个角色,他们认为男人不会交流和沟通,而像迪克·范戴克这个角色,男人们又觉得冤枉,她是怎么知道他没有告诉她任何事,而他又为什么确信已将心中所思全部告诉了她呢?是什么使女人和男人对同样的交谈产生不同的想法呢?



当出了一些问题，人们就去找理由抱怨：要么抱怨他们要交往的这个人，“你总是提要求，固执，自以为是”，要么抱怨这个人所属的同一群体（所有的女人都爱提要求，所有的男人都自以为是）。一些宽宏大量的人则是抱怨一种关系（我们只是不能交流）。但实际上，这种指责过度地使用，许多人就认为他们有了什么问题。

如果某个人或某种关系确实值得谴责，就不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人遇到相同的问题的情况了。真正的问题是谈话的方式。男人和女人的谈话方式不同，如果在谈话方式上出了问题，即使愿望再美好，想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都只能使问题更糟糕。

资料来源：节选自坦南（Deborah Tannen）：《你只是不明白：交谈中的男人和女人》（New York, Morrow, 1990, PP. 77~79）。

1

性别角色的 社会简史

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着性别角色行为的长期训练，这种行为被我们的文化、社会和历史阶段所肯定。回顾一下性别角色的发展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正在塑造这些角色的影响因素（泰纳希尔，1980）。

西方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定义反映了两性相似与两性相异两股对立力量的张力（布洛克，1978）。性别角色在英国和美国中产阶层中发生显著变化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17世纪的新教改革和前工业化资本主义及纺织工业的兴起，这一阶段赋予了男性与女性性别角色之间相似性的增长。随着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家庭渐渐成为宗教、教育和商业活动的中心，这种向家庭集中的趋势加强了妇女地位的重要性，人们认为两性间天生的差异相对较少，但是女人仍要从属于他们的丈夫。

尽管妇女们仍依附于她们的丈夫，但在经济生活中明显可以看到，女人已进入更高一层的社会生活。妇女经常参与生产活动，虽然还是在丈夫的指导之下，比如说，一个女人嫁给一个陶工，她在作坊里可能和她丈夫干得一样辛苦，甚至在丈夫死后接管生意，但是她却永远无法得到与丈夫平等的社会地位，因为女人不能获得正式的学徒资格和成为手工业行会的成员。

性别角色的第二次变化发生在18、19世纪。这时人们开始强调两性性格上的差异。人们认为男人是“理性的”，女人则是“感性的”。男人在更具竞争性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执掌大权，而女人们则主管宗教祭典、道德和情感方面的事，尤其在家庭中。

经济动力促成了这些变化，家庭中生产力下降，家务劳动转化为一种无商业价值的活动。这时妇女们开始了家庭生活，不断地从支付劳动力费用的工作中离开，做母亲便成为了理想的女性角色。当经济动力迫使越来越多的男人离开家庭，妇女们几乎完全承担了抚养孩子的责任。

尽管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别角色概念继续影响着20世纪的社会规范，但早期强调性别相似的观念重又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两种观念模式谁也没有将谁完全摒绝，它们至今都还继续影响着对性别角色的区分（参见“社会学之窗”栏：“对女性的认知：过去与现在”，该栏目对比了维多利

亚时代和现代对妇女的观念)。

2

性别角色的社会化

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开始通过社会化接受和强化性别角色期望。区别对待和对角色模式的认同,是影响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两种不同的机制。

婴儿时期,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主导机制就是区别对待模式。事实上,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父母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男孩还是女孩”?当亲戚、朋友重复这个问题时,一连串相关的问题就产生了,他长大了是当牙医、农民,还是矿工呢?他聪明吗?她能照顾好自己吗?她漂亮吗?此时,社会交往和社会期望就开始影响一个新生儿了。

当父母知道孩子的性别时,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就开始了。尽管男婴和女婴在长相和行为上非常相似,但成人却常常用固有的想象来对待他们。比方说,男婴哭,我们就说他生气了,而女婴哭,我们则认为她害怕了。父亲们对待男孩往往比对女孩要粗鲁些(杰克林、迪彼特罗和麦科比,1984;西格尔,1987),父母们也用固有的方式来描述她们的新生儿。一项研究表明,父母形容女孩时常用小巧、美丽、聪明,长得像妈妈等语句,而很少这样形容男孩。甚至实际长相并非如此时仍然是这样(鲁宾、普罗文扎罗和卢里亚,1974)。

早期的性别角色社会化有多重要呢?最有趣的是关于一对孪生男孩的研究案例。两个7个月大的孪生男孩接受包皮切割手术(用电烙术做的外科手术),其中一个男孩的阴茎意外地被损伤,几个月后,他的父母决定用外科手术来解决这个难题,把这个男孩变成女孩来养。当这对双胞胎5岁时,每个人都按照各自传统的性别角色行事,人们提供给他们的是符合他们性别特点的衣服、玩具和活动方式。女孩就干净、整齐,而男孩就乱七八糟的(莫尼和埃拉尔特,1972)。70年代的一些研究者把这个案例当作后天教育的影响远远超过天生因素的无懈可击的证据(参见第六章)。

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生理因素在性别角色形成的过程中与社会化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当这个“女孩”13岁时,她体会着作为一个女性的严重心理问题。她走路的样子很男性化,而且希望成为一名技师,她认为男孩子比女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她并不知道那个手术,也不记得她生来是个男性,但她看上去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戴蒙德,1982)。在这个重要的案例中,并根据以后发生的情况来看,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有道理的:那就是性别行为的决定因素,既不是先天性的也不是后天养成的,在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时期里,与性别差异有关的行为是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莫尼,1986)。

不论怎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还继续被区别对待。例如,父母通常体罚男孩多于女孩,尤其当男孩玩“错”了类似洋娃娃这样的玩具,会更让人感到失望(贝斯特,1983)。不论是性别角色的期待,还是社会化对孩子成长中的强化作用,都是来自于家庭的态度和外部世界的其他因素对他的影响,但孩子的第一性征一旦形成,他或她就很快能够明白人们所说的“男子汉气概”和“女性化”的含义。

一段时间之后，对角色模式的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role models）便成为社会化过程越来越重要的一种形式。最有影响力的角色示范就是孩子的父母，但在现代社会，大量媒体，尤其是电视所宣传的人物，其影响力也是很重要的。孩子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偶像对他们了解自己有很强的影响力。

在学校，孩子们可能也得到了老师的区别对待，尽管学校政策要求对待男孩和女孩要平等，但要求和事实却往往不同。由于老师们个人的价值观和偏见，他们关于性别角色本质的或多或少有些微妙的信息，都会传递给学生。研究表明，对于取得同样成绩的学生，老师们（家长也是）表扬男孩要多于表扬女孩，而不论老师是男还是女（利普曼-布鲁曼，1984）。男孩也经常比女孩多挨批评，但这能产生出积极的效果，因为男孩子们学会了如何对待批评（塞科等，1988）。



对女性的认知：过去与现在

性别角色随时间而变化，就像以下两段文章所清晰描述的一样。第一篇，初版于1887年，详细描述了维多利亚时期妇女“适当”的外表和行为方式；第二篇写于100年后，是美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格罗亚·斯泰内姆（Gloria Steinem）所著，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与妇女取得的进步相应的语言上的变化。

“旧时代女孩的礼仪”

一个女人的外表是很重要的，这对那些看上去风情万种，而其实并非如此的人，有一点天生的不公平。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如果身着没有品味的衣服，不协调的颜色搭配，性情随意不羁或者大笑都会被人误解。这个女人应该坐下来审视一下自己，并且记住在大城市中、在拥挤的剧院或在海滨，人们的评价一定是仓促而且浮浅的，她应该压制她天生的热情，并和与她不同类型的女伴来往。一个平淡冷静的清教徒式的人并不比一个性格鲜明、爱笑的35岁的“老小姐”更值得人尊重。但她们看起来就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女人一定要考虑她的外表。一个大龄女子必定要考虑外表怎么样，一个女人在海滨着装引人注目，披着宽大浴衣去吃早饭，染一下头发或看起来像染了发，用一条白色亚麻纱巾蒙着头发，坐在饭店的长廊上，展示着她的双脚，这样的女人可能是最好、最有教养的妇女，但一个浮浅的观察者却不会这么认为。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认为她缺乏女性的第一优点温柔——许多人的批评就产生了压力，一个男人遇见这样的女人，把她和衣着优雅而又谦逊的女人进行比较，自然就产生了不喜欢的看法。如果她单独出现，并且她的名字以史密斯“小姐”的名义写进书里，他就对她的古怪和某种“坏形象”不那么严格要求了，但如果，史密斯小姐非常普通，并且安静，穿着简单却富有品味，或她坐在沙滩上看海，或造访一个病人或一个年轻的朋友，那么她就可以像希望的那样不受人打搅，她也就不用忍受那些伤害性的议论了。

“词语与变化”

新词新句是衡量变化的工具。他们反映了观念的变化，有时也反映着事实本身的变化。

诸如性骚扰和受虐待的女人这类词，一些年前，它们被称为妇女生活的一部分（life）。

现在，女人与男人的差异正在减小。而过去女人接受的教育是嫁一个医生，而

不是做一个医生。在中心、报纸、网络和摇滚乐队等词前面的“妇女”一词显示了一种积极的选择，而10年前，这只是一种贬低的词汇。

现在，我们惊奇地发现孩子们应由父母双亲来抚养。而10年前善良的斯波克(Spock)博士也认为只有母亲们才负责孩子的抚养任务。

1972年，美国宇航局官员认为妇女在太空中的作用就是在“通往火星等漫长旅途中”的“性别多样化”。而现在，女性充当了宇航员。

直到前不久，人们还认为老年妇女进入大学校园学习是一件怪事，现在，许许多多的妇女返回大学接受曾经不接纳她们的大专教育，女性本科生的中位年龄是27岁。大学正变成一个具有新“学生”概念的公众来源。

70年代大多数大学还没听说过“妇女研究”，而现在，这类课程已超过30000个了……

现在两个党派中反对平等的政治家们都在为妇女的选票或性别隔阂担惊受怕。直到80年代，政治学专家们都还在说没有这回事呢。

10年前，男警察抗议与妇女一起工作，而现在女警察在每一个大城市工作着，而以男性词根结尾的警察(policeman)一词已变成了不带有性别色彩的警官(police officer)一词。

60年代，美国人还谈论着控制国家经济的白种女人和成为女家长的黑人妇女。现在70%以上的男人和女人都认为存在着性别歧视，并且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70年代，妇女还不得不在小姐和太太的称谓中选择，以一种男人不使用的方式来区分她们的婚姻状况。现在，三分之一的美国妇女坚持用女士作为通用之词，与先生相对应，政府出版物和商务及大多数媒介也都如此。

10年前，强奸是惟一一项受害者需要出庭的罪行，而今天，关于证据的法律条文已被改变，各种程度的性攻击(sexual assault)都被看成是一种暴力犯罪。

几年前，孕妇经常被迫永远离开工作岗位，而且父亲请假(paternality)或父母亲产假(parental leave)尚不是一个词语，现在，孕妇在妊娠后期，不能做日常工作被认定是合法的。四分之三的国有公司加上一些工会组织也为新父亲提供一些形式的休假。

大多数新词只是更精确了。例如，把congressmen(议员)改成了congresspeople，把men working(工作)改成people working——甚至那些变化在发音的重音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新造的词语也需要不断反映新的认识。

资料来源：约翰·居伍德(Ms. John Sherwood)：《礼貌与社会惯例》(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87, pp. 226~227)；以及格罗里·斯滕姆(Gloria Steinem)：《残暴的法令与日常的反抗》(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3, pp. 149~151)。

小荧屏上的妇女形象：有多少改变？

当女权运动学者开始调查70年代早期大众媒体是如何描绘妇女的形象时，大量材料证明了早就为任何普通观众所熟知的事实：电视上的妇女几乎毫无例外地被描绘成传统的角色(塔奇曼、丹尼尔斯和贝尼特，1978)。

在电视广告中，她们通常以家庭妇女的形象出现，眼界只限于家庭范围内，完全不了解更大的男人的世界。这些妇女似乎除了关心她们的丈夫不要“失业”外，很少关心别的事情。她们的角色是照顾的、帮助的，而很少被描绘成经济上、心理上、社会地位上的独立者，即使在那些大多数由妇女购买的产品广告中，如洗涤剂，



主持人那具有命令式的声音也几乎总是男性的。

在娱乐节目中,不仅大多数演员是男性,而且就算出现了妇女,她们似乎也需要男人的支持、保护和赞同,就如哈里特曾经对奥姬所说的那样:“如果你不告诉我你是否需要我,我怎么能一如既往?”

上述这些现象的出现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奇怪的。作为商业化的媒体,电视是用来吸引观众的人,而不是向人们的价值观挑战。如盖尔·塔奇曼(Gayle Tuchman)所说,大众传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美国社会的象征性的、而不是原原本本的描写,在70年代,尽管性别角色转换的风正在吹起,但很明显,大多数观众对妇女的角色仍然持传统的观点。

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从事工作,随着支持女权运动的目标逐渐成为主流,电视节目逐步开始反映这个发展着的现实。这种反映可能最早始于电视剧《玛丽·泰勒·摩尔剧》(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尽管不能说玛丽得到了完全的解放,但她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不需要有一个男人进入她的生活。这种反映也有可能始于达文波特(Joyce Davenport)和露西·贝特(Lucy Bates)所演的《希尔街布鲁斯》(Hill Street Blues),这是一部讲述坚强的女性不需要她们的男性同事来援救的电视剧。或者开始于1980年的电视剧《卡格内与拉希》,或者开始于1982年的电视剧《凯特和艾莉》。但突然之间,天平开始倾斜,在1984年秋季,22部新拍的电视剧中,有8部电视剧将妇女描绘成坚强的领导者。在第二年,19部情景喜剧中有9部讲述的是单身职业女性的故事。

到80年代后期,甚至电视广告也开始改变了。百事可乐公司在其广告中插入一段非常受欢迎的广告片段,描述一个女科学家试图教一头黑猩猩如何说话,一些广告甚至模仿传统的广告妇女形象写成游戏广告词(“如果他的衣服是肮脏的灰色,我就会立刻死去!”)一些流行的节目如“罗赛尼:设计女性”和“墨菲·布朗”,常常从正面的角度来塑造聪明、独立的女性形象。

除了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这些转变也反映了另外一些重要的趋势。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已经设法进入了仍然为男性主宰的电视节目的编剧、导演和制作领域。另一方面,研究显示,妇女是一个更大的消费购买群,这意味着广告商已经发现,对于那些有收入的职业女性,吸引她们那相对自由的感知变得越来越重要。到1989年,有七个电视网的节目基本上全是女性演员(包括《中国海滩》、《设计女性》、《金色女孩》),有另外八个节目很明显是女性倾向的(例如《谁是老板》、《凯特和艾莉》)。

今天,上述趋势还在继续发展,并伴有媒体圈内人士称做“危险”的新趋势。从《燃烧的床》开始,有相当比例的为电视制作的电影,以及众多连续剧的情节中都把处于危险中的女性作为主角。尽管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在过去,处于危险中的妇女只能等待男人来解救。在新时代,男人往往不是被描绘成正在威胁女英雄的恶棍,就是被描绘成怯弱或缺乏信心的人。由于孤立无援,被威胁的妇女们只能依靠她们自己的力量把坏人捉拿归案,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将他们杀死。确实,她们就是这样做的。有意思的是,观众调查表明,这些电影在受过很好教育的老年职业女性中尤其受到欢迎。在1991—1992年度,几乎有一半的电视电影属于“危险”片;仅在1991年11月份,有12部描述危险中的妇女的影片在美国的电视台播出。

人们很容易夸大近十年来所发生的性别角色转换的程度,本章中的许多状况表明,真正的机会平等对于美国妇女来说,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然而,琼·克莱弗和墨菲·布朗之间的差别表明,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至少公众的观念经历了一个

真正的革命性的转变。

资料来源：盖尔·图辛曼、阿伦·凯普兰·丹尼斯、詹姆斯·贝纳特主编：《炉床和家庭：大众传媒中的妇女形象》（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 women on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老师们对男生和女生的态度和期望已被称做是“隐课程”，它们常常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由于老师们认为男孩比女孩更活跃和更难以控制，所以，很多课堂时间典型地以迎合男孩子们的兴趣度过，并试图以此征服他们（塞科、塞科和克莱因，1986）。当女孩在学业上比男孩做得更好的时候（她们经常这样，至少到高中），老师们可能会认为她们只是更尽责、更勤奋些，与女性的方式相符。相反，如果男孩获得了成功，他们则可能被认为具有“真正的”创造力，比女孩更能引起老师的兴趣。这样，如果一个女孩完成了她做的事，她没有被授予与男孩同样的承认。这些习惯可能会影响孩子在学术上的自我认识（恩特威斯尔等，1987）。

在学校这个环境中，一个孩子对角色模式的认同受到老师和学校官员中性别比例的影响。在1989年，所有初级学校的老师中有84.7%是女性（美国劳工统计局，1991）。尽管孩子的日常教育由女性负责，但最后的决策权几乎都掌握在男性手中。今天，所有高级中学有90%的校长是男性，这个比例高于25年前的比例（国家教育统计中心，1987）。

由于女性教师在中学和大学中拥有的权力比男性教师要少，所以传递给学生这样一个观念：女性在职业能力上不如男性，这个观点反过来又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到女学生对她们自己的期望（费尔马，1976；巴苏和西尔贝格，1987；多宾斯、卡尔迪和特那克斯罗，1986）。

尽管今天美国社会中的性别角色正在转换，特别是在大城市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间，但下列关于成人性别角色的描述依然为我们社会中许多人所确信。随着女孩子们从高中升入大学，通常在青春期形成的、认为自己缺少能力去做需要充沛精力和较高智力的工作的自我认识，有时成为了现实。甚至那些在学术工作方面有天赋且有兴趣的女性都可能会对自己的才能缺少信心。她们可能看到男人们经常因学术成就而获奖，而女人们则很少获奖。一些妇女还感到，当她们达到或超过了男人的成就水平的时候，她们被认为超越了“天生的”界限。

这些观点在大学持续存在甚至可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一项研究发现，在男女同校的大学的课堂中，女生的发言要比男生少得多，并且她们还经历更为明显的自信心下降过程（妇女的研究和公平组织，1987）。另一项研究发现，大学女性非常容易丧失在科学领域工作的积极性（霍兰·艾森哈特，1990）。

3

成人的性别角色



我们能否使孩子在更少的性别模式化中成长？

产生和支持传统性别角色的力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中，因此，我们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改变它们。本着这个目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检测和确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对性别角色的获得起着促进作用。

在传统的核心家庭中，父母往往扮演相反但又互补的角色。按照传统，母亲是感情表达专家——照顾孩子是她首要的职责，她是温暖和养育的源泉。父亲的主要角色是工具性的；他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性，教给他们社会的规范（帕森斯，1951，1955）。父亲往往是父母中的强者，他们是纪律的来源（鲍姆兰德，1974），并且还往往主导家庭讨论，尤其关注他们儿子们获得“男性的”特征。尽管这个模式盛行于美国社会，就像它盛行于历史上大多数社会中那样，但它不一定是“自然的”。性别双方都有扮演感情性和工具性角色的能力（林赛，1990）。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只是代表了这样一个事实：由父母双方作出的角色选择受到了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价值行为规范的影响，特别是男性统治的行为规范的影响。

根据研究者的观点，父亲和母亲间角色互补性导致了妇女变得不那么决断和独立，而男人则变得不太关心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一项研究发现，4岁到9岁之间的女孩子与同一年龄段的男孩子相比，在精力和活跃性方面只有很小的差距，在避免进攻性行为方面的差别也不大。但当女孩子到了14岁时，她们却变得比男孩子害羞得多，没有主见得多。男孩们往往不善于处理社会关系，他们往往比女孩子不友好、不合作、更少考虑别人。在这项研究中，这些孩子的母亲的首要职责就是在家中抚养孩子，在决策方面往往服从于他们的丈夫（鲍姆兰德，1974）。

许多学者认为，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导源于传统的家庭结构，特别是通常把照顾孩子看作是母亲的职责这个事实（乔德罗，1978，1987；迪纳斯坦，1977）。童年时代是一个几乎完全依靠别人的时期，由于孩子们受到的主要是来自于他们母亲的照料，因此他们以自己特有的依赖感去和女性交往。相反，由于父亲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不在家里，因而代表独立和成人世界。结果，男孩和女孩都视妇女为依赖他人的眷属，因而在地位上要比男人们低一些（鲍姆兰德，1980）。

无疑，要改变这些模式，使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少一些模式化的性别角色，其中一个途径就是改变家庭结构，使父亲和母亲扮演的角色相似、更平等。例如，如果父亲更多地参与孩子的日常照料工作，孩子们或许就不会那么想当然地把温暖和养育主要与女性联系起来。事实上，跨文化研究表明，在一个男人更积极地参与孩子照料工作的社会中，男性统治的情况就不那么明显（科尔特朗，1980；斯托卡德和约翰逊，1980）。如果妇女同样也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的话（这种情况在今天正变得越来越常见），孩子或许就不会把成年人的独立首先和男人联系起来。

仅在口头上说说父母双方在家庭中应该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当然很容易，但要在现实中实现这样的平等关系就需要巨大的社会转变。妇女们必须能够拥有固定的工作，这些工作给予妇女的地位和报酬与给予男人的地位和报酬完全相同。并且，男人必须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工作的结构也必须改变，以使男人和女人都能与他们的孩子呆在一起而不会失去工作。必须有能够支付得起的日托中心（既有男职员，也有女职员），或者允许父母带着孩子工作。其他社会机构也必须配合。例如，学校可以教育学生，使他们认识到父母的身份是两性共同的职责。同时还必须鼓励男性

去从事低年级的教育工作，这些年级的教育工作目前主要由女性担任。

所有这些看起来完全是乌托邦，但是，确实有证据表明，促进父母之间成为平等伙伴关系的有限的改变正在发生。我们这个社会中男性似乎越来越愿意担当养育者的角色。例如，让男人参与生孩子的过程已变得非常流行。在瑞典，法律要求雇主允许那些要求获得父亲产假的雇员得到应有的假期，而且，在有资格获得父亲产假的男性中，已经有22%的人这么做了（波普诺，1988）。此外，在就业市场上，人们对妇女的歧视已经变得非常敏感。或许上述这些变化标志着一个重要社会趋势的开始。

就像我们的文化传统地把低智力与女人等同起来一样，也把非感情化的行为与男子气等同起来。媒体经常塑造一些坚忍不屈的“牛仔”形象来鼓励男人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坚强的、沉默的、或者看成性征服者。作为这些为社会所构建的形象的结果，那些温和的、易动感情的、对性负责的男人就可能被认为缺少阳刚气（布里坦，1989）。那些试图克服这些模式化形象的男人可能会发现他们被别人认为“友好但懦弱”，“不可能取得很大成功”。这样，人们会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大胆哭泣的男人，以及那些可能优先考虑家庭生活、牺牲自己的工作来支持妻子的工作的男人。而妇女表现出同样的态度或做出同样的行为则被认为是“正常的”。

当男人和女人继续他们的生命历程时，他们会不断地碰到不同的角色期望。社会通常认为一个40岁的妇女已到了“中年”，但一个同样年龄的男性却被认为正处于“壮年”。当女性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变得灰白”的时候，她们有时可能会去染发，而男人则把“少许白发”看作是“有智慧”的象征。这些观点常常被那些极力鼓动女性保持青春的大众媒介所强化。虽然人们也同样期望男人表现出青春活力，但人们主要还是鼓励他们走向成熟、获得成功，而成熟和成功往往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获得的。感到自己变老的想法可能会导致一些年过四十的妇女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即使她们充满了活力、有魅力、造诣颇高。

离婚或丧偶的男子能够与非常年轻的女子结婚，而不需要经过多少社会认同过程。而妇女在选择配偶时一般局限于同龄人或年龄比她们大的人当中，尽管现在对妇女选择比自己年龄小的男性作为配偶已较容易为人所接受了。离婚的男性常常可以从大量年轻的单身女性中选择伴侣，但社会的压力往往迫使离婚的女性只能在有限数量的离婚男子和老年鳏夫中选择伴侣。

在老年人中，再婚主要是男性的特权：老年男性再婚的比率要比老年女性高出八倍。虽然这主要是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找到配偶有关，但同时还与收入和教育状况有关。如果一个老年女性的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她再婚的可能性就越小；对于老年男性，情况则恰恰相反（赫基斯塔德，1986）。

那些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老年女性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困境。由于许多离婚或寡居的老年女性缺少商业经验，因此她们必须与雇主那种更愿意雇用“女孩们”而不是成熟女性的偏好作斗争，一个40岁或50岁的妇女会无奈

地感到自己的“有用之年”已经结束，但一个相同年龄的男子却知道自己仍有15到20年的创造力。

性别与不平等

正如社会具有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特征一样，它也同样具有性别不平等的特点。性别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源泉——不仅仅由于男人和女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角色受到了不平等的评价和对待。由于受到区别对待，男人与女人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也不平等。

性别上的社会不平等反映在一个社会的语言和大众媒体中。实际上在所有社会中，这都反映了男性统治的基本假设，所谓男性统治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声望。男性统治并不表示所有男人都故意地压迫女性，或者个别女性不能改变她们的境况取得与男性同等的成就。但是男性统治已深深地植根于各种文化中，它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社会成员的认知和日常交往。

由于语言是文化的基本要素，因此英语（还有其他许多语言）中发音和用法反映出男性统治就毫不奇怪。在那些把代词分成阳性和阴性的语言中，阳性代词通常是更基本的——只有阳性形式才能被用来指一群男女。英语也不例外：“he”在传统上用来代表单个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而单词“man”用来表示所有的人，例如，在“mankind（人类）”和“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中。近几年来，许多专业组织试图把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从它们的报告或刊物中删除，但要实施这样无性别歧视语言的政策往往不是那么容易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32家专业的社会工作期刊中有24家力图消除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只有10家期刊一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埃尔斯和桑福特，1987）。

男性统治还反映在诸如电视与广播的节目和广告、杂志、流行音乐以至课本等大众传媒中，尽管现在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长久以来，妇女在电视上出现的频率一直很低。直到80年代早期，只有30%~45%的电视演员是女性（当布罗、里普和贝尔，1988；布雷特昂和坎托，1988；斯托卡德·约翰逊，1980；塔奇曼，1979）。儿童节目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由男性主演的节目是由女性主演的节目的两倍。而且，男女演员所扮演的角色也是男性统治的典型反映。对电视里角色特征和形象的系列调查发现，在荧屏上，女性常常被描绘成年轻、担当传统角色、在低层次职业中工作的形象（西格诺雷利，1985，1989）。

然而，电视网不愿意在黄金时间播出塑造坚强女性形象的节目，近来已不得不让步于一个更迫切的需要：即吸引目前在劳动力中数量逐渐上升的作为观众和消费者的美国妇女。

现在，电视台开始在黄金时间更多地上演以精明能干的女性为主角的电视

剧,唐娜·李德(Donna Reed)已经被《设计女性》和《墨菲·布朗》所代替。

印刷品的内容也同样反映了传统的性别模式。例如,直到最近,妇女杂志中所刊登的小说,像《麦克卡尔一家》(Macall's)、《红书》(Redbook)和《女士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常常把女性塑造成以男人为生活中心的传统角色。但是这些小说已经开始受到了那些玫瑰色稍少、但更具现实性的小说的冲击。那些小说中,职业女性被描绘成“双重身份”——八个小时在办公室,然后几个小时在家中做家务(亨利,1984)。杂志广告现在也比过去更精确地去反映妇女社会和职业角色的多样性(沙利文和奥康纳,1988)。

当然,性别不平等并不局限于语言和大众传媒中。在这一节的剩下部分,我们将讨论性别分层的社会学理论和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然后我们来思考性别和一些主要的社会设置:婚姻、工作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1

性别分层的 社会学理论

研究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学家对性别不平等的起源,特别是对人类社会中男性统治的客观普遍性进行了探索。这里我们将要讨论社会学家用来解释男性统治和性别不平等的两种主要理论方法即功能论和冲突论。

功能论

功能主义理论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各种相互关联的地位和角色构成的系统。这些地位和角色是建立在广泛接受的价值观、信念和期望的基础之上,并被安排进各种社会制度中。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有一种均衡的基本趋势,并且各种角色和地位之间在正常情况下处于和谐与互补状态。这样,功能主义者往往把传统的性别角色看成是有助于社会的有效运行的。

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现代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源于早期社会中所形成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是建立在性别差别的基础之上的。妇女所具有的生育孩子的能力决定了她们的工作角色;她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范围内度过的,职责是喂养和照料孩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多数婴儿都不能长大成人,这就要求每个妇女一生中要生育和照料6~8个孩子,以保证他们这个社会的人口不会下降。上述原因,加上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寿命很少超过35~40岁这个事实,严格地限制了妇女的工作选择。另一方面,由于男人没有受到必须呆在家庭附近的约束,也由于他们拥有更强壮的体力,因此在早期社会中,男人的工作是打猎和帮助部落反击食肉动物和敌人的侵袭。他们这种获得食物的强壮与能力使得男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性别。这种统治地位慢慢地在全世界的社会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中变成一种制度化的安排。

传统的、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在前现代化社会中可能是最有效率的或最实用的制度安排。但在现代社会中它还仍然实用吗?在一个有关家庭的经典分析中,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贝尔斯得出结论认为,男女之间传统的、泾渭分明的分工仍然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安排。他们分析的基础建立在源自小群体动态研究的原则在家庭中的应用。

在较早的一部著作中，贝尔斯（1953）发现，如果想要使一个小群体有效地运转，两种形式的领导是必需的（参见第七章）——工具型的领导和表意型的领导。工具型的领导的职责是指挥群体去实现它的目标。与此相对，表意型的领导的职责是解决群体内部的冲突，促进群体内部的和谐与团结。

1955年，帕森斯和贝尔斯共同发现，大多数家庭都按照工具型—表意型这样的模式来组织，正如它对保持任何其他小群体的有效运转一样。这样的组织方式对保持家庭的有效运转是必需的，通过在家庭外面工作，男人为他的家庭提供了经济支持而承担工具型的角色。由于生育和喂养孩子这些生活上的限制，妇女往往呆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为家庭提供感情需要。

美国传统核心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结构与帕森斯和贝尔斯的观点很相似。但帕森斯和贝尔斯还同时声称，这种性别角色结构的特征是普遍的，它是核心家庭能够有效运转所必需的。他们认为，这种结构已发生了变化，因为工具型角色对男人来说是最自然的，而表意型角色对女人来说是最自然的。尽管越来越多的妇女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帕森斯和贝尔斯仍认为，妇女在家庭中的首要角色是作为一个“感情型的”家庭妇女。

功能主义分析者们继续强调一个由夫妇双方和孩子组成的完整家庭对社会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由母亲扮演传统的性别角色，有可能使孩子形成稳定的联系，并从稳定的角色模式中获益。在早期生活中，如果没有紧密的母子联系，孩子很可能长成为一个没有目标、孤独和焦虑的人，可能无法形成良好的自我认识。这样的孩子可能会更重视物质而不是人际关系（伯杰，1983；格尔森，1984）。

冲突论和女权主义论：权力与统治

尽管大多数冲突论者同意功能主义者关于传统性别角色起源的说法，但他们坚持认为这些角色在现代社会已经过时了。冲突主义理论强调，文化是由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形成的。从占至今，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已导致了性别角色安排的改变。例如，人们认为妇女更早接受家庭角色，部分原因是当时缺乏现代药品和有效的生育控制方法，以及当时还不存在能够取代男子体力的技术（伦格曼、马科尼和华莱士，1978）。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在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家庭已不再是一个生产的中心，妇女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窄，最后缩小到只剩下家庭妇女、母亲、妻子三个角色。但是，工业社会是以周期性的额外劳动力需求为特征的，因此妇女逐渐被允许进入市场经济（班纳，1984）。最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来自于下层阶级；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仍然被要求呆在家中（沃特海姆，1984）。然而，随着阻碍妇女完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障碍的消除，妇女角色发生重大改变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冲突论者还强调，男性统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作为统治集团，男性可以限制妇女接近由男性分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机会，以减少来自女性的竞争（雷斯金，1988）。只有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转变才能改变这一模式（雅各布斯，1989）。

分析性别角色的冲突论者中，有些是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者，他们把性别不平等看作是更广泛的社会分层现象的产物（伦格曼和华莱士，1985）。这些学者指出，当早期农业社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男人宣称原始公社的经济资源和妇女都是他们的私有财产。随着这种社会分层体系的进一步加强，性别不平等也就变得不太可能改变。根据这一理论，只有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华莱士，1989；查菲茨，1988）。

2

性别歧视

如前所述，社会不平等通常被某种意识形态证明是正当的。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支持某个特定社会观念的一整套信条。支持性别不平等和认为男性统治是正当的那种意识形态就是性别歧视（sexism）。与种族歧视（参见第十一章）和年龄歧视（参见第十二章）一样，性别歧视通常以男女生理条件不同这个事实为理由，认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正当的。性别歧视是建立在一些广泛流行的观点之上的，尽管存在与此相反的证据，人们仍然认为男女之间天生的差异必然导致他们之间的不平等。而这些流行的观点通常是从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和对男女性格特征过于简略的、不正确的认识发展起来的。

只有支持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统治者集团与被统治者集团的接受，社会不平等状态才有可能维持下去。在我们这个社会，许多妇女长久以来一直认为接受她们的传统角色是很“自然的”，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并已经在这个狭窄的框架中完成了社会化。尽管这种观点正在变得不那么普遍了，但一些妇女仍然认为她们因“天生的低人一等”而受害。

对单个女性来说，向性别歧视发起挑战是非常困难的。与少数民族、老年人和穷人一样，妇女们可能会发现，她们的生存取决于她们对主流的意识形态至少是在表面上的接受。对于妇女来说，就是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此外，性别歧视的观念和假设通常被纳入了主要的社会设置之中。

3

性别与婚姻

绝大多数美国人（大约88%）都会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结婚。因此，尽管对婚姻这项设置存着众多争论，然而很明显，在美国，结婚仍然是人们首选的生活方式。

一些研究指出，尽管男性有可能对婚姻不是那么负责任，但他们从婚姻中得到的东西却比女性要多（贝纳德，1982）。这种情况在传统的婚姻中尤其真实。为什么说更真实呢？一个理由是：按照传统，妻子的职责是照顾丈夫的生活和心理需要，使他们能在外面更好地工作。妇女虽然可能从婚姻中获得相对的经济安全保障，但作为代价，她们除了满足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外，还必须担负起满足丈夫和孩子生理、心理需要的职责（参见“应用社会学”栏：“我们能否使孩子在更少的性别模式化中成长？”中的讨论：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模式，以使丈夫和妻子在家里取得平等的伙伴关系）。

许多在外工作的已婚女性面临着双重困境。有自己职业的妻子们发现她

们同时需要做两份工作，并且通常很少从她们丈夫那儿得到生理和心理支持（克劳特和佩里詹金斯，1986）。当一个疲惫的丈夫工作回家时，他希望能吃上妻子已经准备好的饭菜，并且与孩子们一起玩耍。而一个疲惫的妇女工作回来后，她必须准备好上“第二个班”。在这段时间里，她要为丈夫和孩子准备饭菜，要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以及倾听丈夫讲述这一天他所做的事情。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许多大学生仍然不希望自己陷入职业男女分担家务责任这样的关系中（斯帕德和里斯，1991）。

然而，近几年来，情况已经开始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丈夫们逐渐开始与他们的妻子一起分担家务劳动（普雷克、拉姆和勒维纳，1986；普雷克，1985）。但是，当各种利益之间出现冲突时，一个妇女仍然很可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丈夫和家庭的利益之下。一个在外工作的妻子还可能认为，她应对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尽管一些妇女可能会因为自己不能整天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而感到内疚，男人们却有可能认为，对他们来说，不留在家中是正常的、自然的。

4

性别与工作

通常，男女之间工作报酬的差别非常明显。为了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情况，简短地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是有益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维多利亚时代认为男女有本质区别的观念的产生，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始。随着男人的工作逐渐从家庭脱离，妇女的工作变得更加集中，并丧失了其商业价值。尽管妇女的工作被认为是“有用的”，但由于男人的工作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有明显的货币价值和交换价值。既然在市场体系中，权力和声望主要是通过挣钱这条途径获得的，那么那些最具挣钱能力的人就得到最高的社会地位。因此，男人的工作往往被认为比妇女的工作重要得多。

但是在20世纪，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今天，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已占相当大的比例，部分原因是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同时也由于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教育。1950年，16岁以上的妇女在平民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为29.6%，到1992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45.5%（《美国统计摘要，1993》）。然而，尽管妇女更多地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在报酬和地位方面她们仍落后于男性。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男女平均工资之间的“收入差距”已逐渐缩小。1960年，女性的收入只有男性收入的61%；今天，女性的收入大约相当于男性收入的65%（参见表13—2）。然而，由于妇女主要从事那些地位低、收入低的工作，因此男女平均工资之间仍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差距。在1992年，学龄前学校和幼儿园的老师中有98.6%是女性；秘书中有99%是女性；电话接线员中有97%是女性（《美国统计摘要，1993》）。即使在同一职位上，女性的平均收入也要比男性的平均收入低得多。这种情况在那些男女都接受了相同的教育和培训的职位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个世纪以来，大多数职业妇女局限在少数的几个工种中，即所谓的粉

领职业。这些工种包括：学校教师、服务员、护士和秘书。如今，在美国所有职业女性中，80%的女性集中于劳工部认可的420个职业分类中的20个工种（康纳尔斯，1987）。

然而，妇女在专业学校的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从70年代早期以来，进入药科学校的妇女增加了两倍，进入医科学校的妇女增加了三倍，进入牙科学校的妇女增加了25倍。

即使在对妇女最开放的职业中，男性也往往占据那些地位和报酬更高的职位。例如，在零售行业，采用回扣方式买卖和销售贵重物品的男性比女性要多；女性一般是出售衣服等小商品，获得较低的小时工资。与此相似，尽管社会上的女服务员要比男服务员多得多，但在那些最高档、最昂贵的酒店，几乎没有女性在这个领域工作。此外，高中和大学的老师往往是男性，而初中和小学的老师往往是女性。男性一般教授理科，而女性往往教文学和语言课。

表 13—2 不同职业和不同性别的收入（1992 年）

职 业	每周的中等收入	
	男	女
管理和专业人员	777	562
主管、行政和管理人员	784	519
专业人员	770	587
技术、销售和行政辅助人员	519	365
技师和相关辅助人员	591	436
销售职位	523	313
行政辅助人员，包括办事员	482	364
服务业	330	248
私人管家	*	177
保安服务	501	399
服务（除去上述两类的其他服务）	283	248
精密产品生产、工艺和修理	503	336
技术工和修理工	496	523
装配工	495	*
其他精密产品的生产工艺和修理	523	316
操作员、纺织工和劳工	393	279
机器操作员、装配工和检验员	406	275
运输和物资搬运工	436	329
驯兽员、设备清洁、帮工、劳工	314	279
农业、林业和渔业	269	223
* 备注：基数少于100000的数据没有显示。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3》（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当妇女进入诸如医药、法律等高报酬、传统上为男性控制的领域时，她们往往被安排在这些领域中地位相对较低的职位上。女外科医生绝大部分被

安排在麻醉科、妇产科和儿科等这些较低级的职位上,同样,女律师往往被安排去从事家庭法律服务工作或信托和不动产的法律事务。前者是男性很少选择的一个领域,因此被看作是“女性的领域”。后者是一个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而且客户相对较少的领域(爱泼斯坦,1988)。这种情况经常阻碍妇女在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因为与客户建立联系通常是晋级的必要条件。

此外,妇女进入传统上为男性控制的领域工作后,她们常常集中于这些领域的较低层次中。例如,当妇女进入药科这个领域,她们一般都被医院雇用,而男性药剂师则继续在零售药店工作(那里的收入高)。同样,尽管驾驶公共汽车现在是一个“整合的职业”(integrated profession),但许多妇女只能把它作为一个非全日制工作,为学校开车,而收入最高的公共汽车司机则大多数是男性(英格兰和麦克里里,1987)。

一些社会科学家指出,男性往往在一级职业^①工作,这些职业支付的工资高,提供的工作条件好、有较多发展机会,并且工作也比较有保障。妇女,还有少数民族工人,则更可能在二级职业里工作,工资低、机会少、缺少保障(布劳和居森流斯,1976)。有两位学者曾指出,在那些高收入、高声望的工作中,妇女很少能够替代男性,因为妇女的工作只能导向另一些传统的女性工作岗位(迪普雷特和苏莱,1988)。只有当某些工作对男性失去了吸引力,它们才对妇女开放(塔夫里斯和瓦德,1984)。例如,当银行出纳员这个工作是通常能带来前途的入门水平职位时,它几乎完全被男性所占据。今天,这个工作通常没有发展前途,主要由妇女和少数民族来从事。然而,或许有一些理由让我们感到乐观,因为目前已有20多个州颁布了废除对性别的工资歧视法令(伯恩斯坦和纳尔逊,1989)。

那些经过努力取得了职业成功的妇女们的典型经验是什么呢?据《哈佛商业评论》前编辑、现在国内许多公司任顾问的罗萨贝丝·摩丝·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说,女经理的体验与在相同职业道路上发展的男经理的经历非常不同。坎特发现,许多女性的成功与她跟男性老板的关系有直接联系。例如,一个秘书由她老板的声望而获得地位,并且当老板被提升时,她也会被提升,这样提升不是建立在她自己的工作表现之上。同样,当一个妇女到达了经理层,她常常具有装点门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她被认为是所有妇女的代表。坎特指出,装点门面是自我永存的(tokenism is self-perpetuating)。装点门面的成功女性常把自己与其他妇女隔离开来。而当装点门面者不成功时,男性不愿意雇用女性的倾向再次被增强。

此外,在经理或主管职位上被作为装点门面角色的妇女更有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亨明,1985)。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安妮尔·希尔在最高法院起诉她原来的老板克莱伦斯·托马斯曾对她进行过性骚扰,人们对她在法庭听证会上所作的证词陈述的注意,正说明了对此类问题的关注。

^① 一级职业(primary occupation)与二级职业(second occupation)的划分,是一种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社会学观点。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根据工作岗位报酬的高低和工作条件的优劣分成两个级别。参见《简明牛津社会学辞典》“劳动市场”条目。——译者注

工作场所性别不平等的解释

为什么妇女在工作场所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对此，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人力资本模式、选择模式和歧视模式。

人力资本模式(human capital model)指出，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分层是男女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资源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妇女之所以比男性挣得少，是因为妇女提供的“人力资本”比男性提供得少。例如，妇女拥有的工作经验常比男性少，她们的变动率也比男性高，因此，在雇主看来，她们的价值就相对较低(布劳和居森流斯，1976)。这个理论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即使男性和女性在经验和培训方面没有什么差别，妇女挣得仍然比男性少。此外，当妇女的收入由于教育程度提高或工作经验更丰富而得到增加时，其增幅也往往低于男性在同样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李普曼—布鲁门，1984)。

第二种解释是选择模式(considered choice model)。这种理论认为，妇女之所以在工作场所处于不利地位是由她们所作出的决定(或被迫作出的决定)引起的。由于妇女承担双重角色——家庭和工作，因此她们往往选择能使她们既是家庭妇女又是雇员的那些工作。一般来说，这些职业工资很低，并且没有什么前途(霍克斯希尔德和麦克琴，1989；富克斯，1988)。

歧视模式(discrimination model)认为，妇女被安排从事被隔离的工作，同样的工作给予不同的报酬和职业名称，并因不平等的提升机会而受到阻碍(雅克布斯，1989；比尔比和巴伦，1986)。导致这种歧视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对性别的刻板观念直到完全的性别歧视。一名学者指出，工作场所中的男性不允许他们的工作受到女性的威胁，只有很小比例的男性(少于10%)真正支持在工作中的男女平等(阿斯特拉汉，1986)。

跨文化视角

社会学研究证明，工作中的性别不平等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全球工业化社会的比较研究指出有两个共同的问题：(1) 妇女极少在政府、商业和银行的管理或经理职位工作；(2) 尽管许多妇女从事全日制工作，但是这些妇女中的大多数仍然承担着抚养孩子和照顾家庭的首要责任(科尔特朗，1988；罗斯，1985)。

在前苏联的国营经济中，妇女的待遇与美国妇女在市场经济中的待遇非常相似。尽管妇女在前苏联的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是所有工业化社会中最高的，但职位和报酬不平等现象仍是很普遍的。前苏联妇女在所有的工程师中只占35%，但在工程生产和工程设计的技术员中却占71%。后者的地位和收入比前者要低得多(罗斯，1985)。大部分前苏联妇女被安排从事那些低收入、办事员性质的服务工作，而很少在经理职位工作(皮尔斯，1985)。与此同时，前苏联的职业女性还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劳动(阿洛特，1985；格雷，1990)。

很难预料，取代前苏联的独联体国家在1992年初所引入的市场原则将会有何后果。在匈牙利国营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一项研究发现，匈牙利32%的新办小企业的所有者、经理和雇员是女性(莎赖，1991)。与此相反，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

德),自1990年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统一后发生的相似的转变却使妇女的地位恶化了,她们承担了大量不应由她们承担的失业代价,并且在寻找新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比男性更大的困难(罗森伯格,1991)。在前苏联新独立的国家中出现的情况,与在原东德出现的、而不是匈牙利出现的情况更为相似,对于这些国家中渴望更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妇女来说,这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桑坚,1991)。

同样,在印度,妇女继续在各个方面承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尤其是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大部分印度妇女都是文盲,受雇为农业劳动力和临时工(day workers)(德索扎、纳塔坚,1986;杜利,1986)。但是,性别不平等可能在拉丁美洲国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妇女们生活在一个与男人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没有工会组织,没有丝毫前途。尽管在家中从事商品生产非常普遍,但对妇女们来说,这并不能让她们感到稍微轻松些,许多拉丁美洲妇女除了家庭和孩子外,每天工作多达15个小时(纳什,1986)。

最后,非常有趣的是,与不发达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一般不把男人的世界与女人的世界区分得那样明显。例如,亚马逊河流域的蒙杜鲁奇男人甚至不在他们的妻子的房间里睡觉(布雷恩和巴洛,1988)。阿拉伯半岛北部的贝都因人把男人的工作和女人的工作严格地区别开来,不同性别之间甚至连吃喝都是分开的(科尔特朗,1988)。

5

性别与政治

就如女人和男人在工作场所没有同等的地位一样,他们也无法平等地参与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研究表明,美国的妇女与男性持有相似的政治观点,并且参与选举的女性的比例要高于男性的比例(58.3%比56.4%)。此外,妇女与男性一样也是各种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是,是男性而不是妇女以绝对优势控制着政府机构。

尽管许多女候选人被选举进入政府工作,但这些政府机构往往属于地方层次,而不是全国层次。在70年代以前,仅有三位妇女曾被选举担任政府首脑,并且这三位妇女继承的都是她们丈夫的职位。

1993年,美国众议院中仅有47名女性议员,参议院中仅有6名女性议员。在国会服务的妇女通常不像男性那样有权力,因为她们常常缺少进入主要委员会或其他有影响力的职位所需的资历。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男性候选人能够比女性候选人更早开始其政治生涯,而妇女一般必须等到她们的孩子长大以后才能开始她们的政治生活,因为这样她们才能避免在竞选公职时被贴上“失职的母亲”这个标签(林恩,1984)。

1991年,桑德拉·戴·欧康纳(Sandra Day O'Connor)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此以前,没有女性在最高法院服务过。1993年,第二位女性——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也进入了最高法院。妇女在诸如内阁等高级委任制职位中的稀少,是她们被排斥在政治事务之外的另一个有力的反映。1984年,杰勒丁·弗拉罗(Geraldine Ferraro)被推选为副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成为人们试图改变那种状况的一次历史性尝试,

尽管这次尝试最后没有成功。

为什么在参与选举的妇女人数和被选入政府的妇女人数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为此，人们提出了三种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第一种解释认为，妇女基本上天生对政治没有兴趣。第二种理论认为，妇女的个人生活结构不允许她们轻易地参与政治活动。因为她们为扮演好妻子、家庭妇女、母亲以及经济提供者等角色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参与政治活动。第三种理论认为，与男性相比，在政治上，妇女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认为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角色（诺克、金斯顿，1989）。

第一种理论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并且第一种理论和第二种理论都忽视了一些与此相反的重要调查结果。大多数研究赞成第三种理论。例如，一位学者指出，男孩和女孩看起来对政治拥有相似的兴趣（萨皮罗，1983，1988）。然而，由于他们后来习得的性别角色，男孩比女孩更有可能从事政治职业。

6

女权运动

在60年代早期，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一部名叫《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书。按照常规的说法，女权主义运动由此诞生了，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妇女的地位。然而，尽管弗里丹的著作非常重要，但事实上女权运动开始的时间要更早一些。1792年，英国一位名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家写了一本名叫《妇女权利的辩护》（*A Vindication of Rights of Woman*）。1848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在美国纽约塞尼卡福尔斯组织了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南北战争结束后，斯坦顿在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的帮助下继续她的工作。两位妇女共同发起建立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把赋予妇女选举权看作是走向男女平等的第一步。1923年，艾丽丝·保罗（Alice Paul）起草了美国宪法的第一个平等权利修正案。

60年代确实是女权运动的转折点。在《女性的奥秘》出版前两年，约翰·肯尼迪总统成立了一个妇女地位调查团。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与男性相比，妇女的地位无疑是相当低的。部分是作为对肯尼迪调查团的报告的反应，弗里丹写了《女性的奥秘》（1963）一书来探讨“女性没有自己的身份的问题”。在弗里丹看来，妇女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只能因与男性的关系来确定、而没有自己的身份这样一个永无休止的难题。

三年后，即在1966年，作为参加过肯尼迪调查团的妇女们正在发起的妇女联系网络的一个结果，全国妇女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诞生了，由弗里丹担任首任主席。全国妇女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于白人中产阶级，她们努力的目标是，使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到70年代初，女权主义运动出现了两个发展方向。全国妇女组织和其他一些相对温和的组织继续把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使妇女获得更多的平等

机会作为目标。其他一些女权运动者则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这些女权运动者大部分为年轻人，曾经积极参加过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的这第二种发展方向非常重视唤醒单个妇女的自我意识，反对全国妇女组织那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方式。许多更激进的女权运动者指责说，全国妇女组织那种传统的科层制结构限制了其成员从男性统治社会中获得彻底解放的自由。然而，女权运动的两个流派在许多特殊的政策目标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其中包括增加妇女在政治进程中的参与机会。

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走向世界。联合国宣布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宣布1975—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四次重要的妇女大会先后召开：第一次于1975年在墨西哥召开；第二次于1980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第三次于1985年在内罗毕召开；第四次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这些大会不是没有它们的困难：某些参加者之间有不同的意见，而一些保守组织则试图中止会议的召开。但到了内罗毕大会召开时，参加会议的妇女明显地增强了团结意识，并在理解世界范围的妇女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林赛，1990）。

美国女权运动的中心任务之一是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 Amendment）（ERA）。这项立法提案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对妇女的各种形式的歧视：如果该提案被批准，它将是第27个宪法修正案。然而，尽管这项提案于1972年在国会获得了通过，但它没能获得批准必需的四分之三的州立法机构的支持。近年来，这项修正案每年都被提交到国会讨论，但又遭到了国会的否决。

80年代初期，一些女权运动领导者指出，现在是调整目标（Gears），帮助妇女把职业和满意的家庭生活有效统一起来的时候了。在一本名叫《第二阶段》（The Second Stage）的书中，弗里丹写道，许多在工作中获得了良好回报的妇女担心，她们没能留出足够的时间，以使自己同时也能成为一个好母亲。一些妇女感到她们陷入了与男人同样的职业陷阱中。她们推倒了障碍，同时是不是又给自己建立了牢笼？弗里丹认为（有很多人同意），现在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努力重建社会体制，以使男女双方都能更好地协调工作和家庭活动的时候了。

在里根时代，女权主义运动曾丧失了某些活力。但到了80年代末，随着全国范围内对堕胎合法化的争论，妇女组织开始联合起来，女权运动也重新活跃起来（参见第二十一章）。

女权主义运动取得了哪些成果了呢？尽管性别平等仍远未实现，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妇女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步（戈尼克，1990）。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妇女创办自己的企业的概率要比男性高出两倍。许多曾经反对女传道士的基督教堂，现在已变得更“开放了”，现在美国教堂中有21 000名女牧师。在许多国家，妇女已担任了总理和首相；1989年，日本自民党任命了它的第一位女性内阁长官（奈斯比特和阿伯登，1990）。对收入平等的预测看来也正在取得进展：尽管妇女挣的仅有男性的65%，但到2000年，这个比例有望上升到74%（《纽约时报》，1989年2月9日）。

1. 男人与女人是不同的,表现在基因、荷尔蒙和生理结构等方面。胚胎内的性别差异是由染色体决定的,每一个细胞核的线性结构都携带着具有全部遗传特征的基因。一旦睾丸或卵巢在胎儿内形成,就会产生荷尔蒙。荷尔蒙是一种化学物质,能够促进或限制生长和机体功能的发挥等生理过程。荷尔蒙可以使男孩和女孩具有先天不同的行为类型,但是社会化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荷尔蒙的这种作用。在青春期,增多的荷尔蒙导致了第二性征的发展,以及心理与行为的变化。生育和哺乳孩子的能力是性别二态性的最清晰的表征。

2. 跨文化的资料表明,攻击型行为在男孩子中较常见,而感觉型行为在女孩子中更普遍。根据麦科比和杰克林的研究发现,除了男性的攻击型行为倾向和男女之间的某种智力差别以外,对男性和女性的多数心理成见都是不正确的。

3. 性(sex)是指区分一个种群的男性与女性成员的生理特征。性别(gender)指的是与男性和女性相关的社会与心理特征。由于性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文化决定的,性别的含义也就随着时间和社会形态的不同而不同。

4. 性别角色是与男性或女性相关的社会角色。性别角色期望塑造着我们的行为。不管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有一种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即我们对自己作为男性或女性的认识。性别认同是社会和文化所确定的性别界限,它与性别的生理定位无关。

5. 在前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女性从属于男性,性别角色经常强调男女之间的相似性。工业革命以后,强调的是男女之间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分别占据着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

6.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性别角色期望就开始传递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得到加强。其中有两种机制起了很大作用:区别对待和角色认同。这两种机制在家庭、学校和大众媒体的活动中随处可见。到了成人期,通过社会化获得的性别态度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这种性别态度成了一种自证预言。

7. 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个主要源泉;男人和女人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是不平等的。性别分层反映了男性统治——权力和声望更多地给予了男性而非女性——的社会现实。男性统治根植于每一种文化中,并体现在语言和大众媒体上。

8. 社会学家通过功能论和冲突论两种视角来研究性别问题,试图解释性别不平等和男性统治的社会现实。早期人类社会按照性别进行分工,男人承担需要体力的工作,女人负责照顾孩子等活动。这种分工后来变成一种制度化安排。功能论者研究家庭这种工具型和表意型领导的分工在社会制度中

的应用。工具型领导是目标导向型的，而表意型的领导维持着社会的道德规范。这两种类型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群体中都是必需的。根据功能论的观点，在家庭里，妇女通常承担表意型的角色，男人承担工具型的角色。传统的功能论者认为，这种性别角色结构对于核心家庭的顺利运转是重要的。

9. 冲突论强调经济和技术力量给性别角色带来的明显变化，它也强调我们社会里的性别歧视和男性统治。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把性别不平等看成是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系统的延伸，认为只有推翻经济资源的私人所有制，才能改变这一状况。

10. 性别歧视 (sexism) 是一种赞同性别不平等，使男性统治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它的依据是 (无论这一依据与事实有多么大的出入)：男人与女人本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是不平等的。

11. 一些研究表明，妇女从婚姻中所获得的东西要少于男人。通过结婚，男人找到了可以照顾他的人，而妇女却要担负起关心照料丈夫和孩子生理及心理需要的责任。工作着的妻子们会发现自己有双重负担，因为她们必须同时负起照顾家庭和孩子的主要责任。

12. 虽然女性已经占劳动力的 45%，但其薪金和地位却远远低于男性。传统上，女性做那些收入低、地位低的工作，而且即使她们在声望较高的职业里工作，晋升也是相当困难的。对女性在工作中的不利状况有以下三种解释：人力资本模式认为女性的收入低是因为她们给雇主提供的少；选择模式认为女性工作中的不利地位是由于她们已经作出的或被迫作出的决策导致的；歧视模式则认为是性别歧视造成了女性工作中的不平等待遇。跨文化的研究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的两个经常性主题：在政府、商业和银行的行政性和管理的职位中，女性的比例明显较少；尽管很多女性从事全日制工作，但她们绝大多数仍然要负起抚养孩子和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

13. 妇女在政治领域远远落在男人的后面。妇女更多地担任地方性而非全国性的政治职务。

14. 在关于妇女地位的肯尼迪调查团毫无疑问地确认了美国妇女的地位低于男人之后，女权运动在 60 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70 年代，女权运动成为国际性运动。虽然几个女权组织在观念和方式上各不相同，但她们都支持意在结束歧视妇女的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尽管国会在 1972 年通过了这一法案，它却未得到立法机构的最终批准。

推荐阅读书目

1. 安德森 (Andersen, Margaret L.), 1988. 《想一想妇女：性和性别的社会学视角》 (*Thinking about Wome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Sex and Gender*,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该书是关于平等的结构性维度的讨论，包括社会阶层、民族和种族问题。

2. 哈里 (Brod, Harry (ed.) .), 1987. 《男子气的形成: 新男人的研究》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y: The New Men's Studies* .Winchester, Mass.: Allen & Unwin.) 该书是探索男性气质的论文集。

3. 富克斯 (Epstein, Cynthia Fuchs.), 1988. 《欺骗性的差异: 性、性别和社会秩序》 (*Deceptive Differences: Sex, Gender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该书认为性别的差异完全是由社会造成的。

4. 戈尔丁 (Goldin, Claudia.), 1990. 《理解性别鸿沟: 美国妇女的经济史》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该书解释了目前男女收入差别的历史发展过程。

5. 霍克斯希尔德 (Hochschild, Arlie.), 1989. 《二次转变: 工作着的父母和家庭革命》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the home* .New York: Viking.) 检验了双职工家庭的影响。


6. 林赛 (Lindsey, Linda L.), 1990. 《性别角色: 一种社会学视角》 (*Gender Role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一本考察了性别角色转换的详实可信的教科书。

7. 里克斯 (Rix, Sara E. (e.d.) .), 1990. 《美国妇女状况的报告, 1990-1991》 (*The American Woman, 1990-1991: A Status Report* .New York: Norton.) 关于美国妇女现实社会状况的有益回顾。

8. 赛德尔 (Sidel, Ruth.), 1990. 《属于她自己: 成长在美国梦的影响下》 (*On Her Own: Growing up in the Shadow of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Viking.) 探索妇女怎样应对工作环境中日益增多的机会。

9. 坦南 (Tannen, Deborah.), 1990. 《你只是不明白: 交谈中的男人和女人》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New York: Morrow.) 对性别差异如何影响男女之间日常交往的有趣的探索。

10. 威廉斯 (Williams, Christine L.), 1989. 《工作中的性别差异: 非传统职业中的男人与女人》 (*Gender Differences at Work: Women and Men in 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探讨当男人进入女人的传统职业领域或正好相反时, 对性别认同的影响。



第四部分

社会 设置

在美国，如果你打算参加政治竞选的话，说服人们给你投票的一条可靠、切实的办法就是要表明你很关心美国人的家庭“崩溃”问题，强调你将努力重新恢复过去的“家庭价值观”。不过如果你要在社会学家群体中推进你的竞选过程，那你最好准备回答一些尖锐的问题，即准确地说，你所谓的“家庭”到底是什么。

几代人以前，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通常人们认为，家庭由一对成婚的男女和几个孩子组成。并进一步认为，大部分的家庭由丈夫来作决定，除非是在阶层较低的家庭中，丈夫是惟一挣钱养家的人，妻子呆在家里照看孩子。

近几十年来，没有别的社会设置像家庭这样变化得这么快的了。例如，在1970年至1992年期间，女性为家庭户主的家庭和单亲家庭的比重，已由11%上升到26%。1960年，已婚妇女外出挣钱工作的比例是31%，到1992年，这一比例超过了59%（《美国统计摘要，1993》）。呈现在现代观察者面前的是多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家庭形式：有子女或无子女的同居伴侣；夫妇俩妻子工作而丈夫在家；想要收养孩子的同性恋伴侣等等。而现在，选择单身生活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这种多样化的家庭形式令许多研究人员，特别是那些强烈支持传统家庭模式的人，对家庭设置的急速减少感到担心。本章研究提到的一些事实，如美国人很高的离婚率，就支持了这种观点。然而，另一些证据，如有很高的

再婚率，则不然。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为了确定有关未来家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我们需要了解改变现代家庭的社会力量。将来家庭还会是——如果它现在仍是——儿童社会化、性满足、普遍意义上人类亲密关系的基本单位吗？21世纪家庭会是什么样？本章就将探讨这些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的答案。其他重要的社会设置（social institution，即组织起来以满足一个社会的基本需要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丛）——教育、宗教、政治和经济等——则是后面四章的主题。

社会中的家庭

在每个历史时期、每个人所了解的社会里，家庭都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所有别的社会设置，包括宗教、政府和教育都是在早期家庭体系里形成和发展的。只是在后来文化演变的过程中，这些设置才成为了明显不同的社会部门。

1

功能主义 的观点

在许多小的、有文字以前的社会里，家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因而能满足大部分家庭成员在生理上和感情上的需求。全部家庭成员合伙制造工具，修建房屋，狩猎，采集，或从事种植等活动。父母或其他长辈教给孩子们长大后必需的技能，帮助他们培养是非感。宗教活动被融入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决定个人分工，并裁决家庭争议。

与有文字以前的社会相比，在现代复杂的社会中，家庭更为专门化了，家庭所发挥的作用也少得多。学校与教师主要负责正式教育，教堂和牧师负责宗教事务，政府和警察负责社会控制。但是功能主义者强调家庭所保留的功能——社会化、情感支持和彼此陪伴、性规则及经济合作等——对社会保持良好状态（并平稳运行）非常重要。让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家庭的这四种功能吧。

社会化

社会化始于家庭。在家里孩子们学会认识他们是谁，他们能够和应该期望在生活中得到什么，应该怎样对待别人，等等。在许多方面，家庭都是承担社会化任务的理想场所。它是一个小群体，在这里群体成员享有很多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孩子们的进展情况能得到密切的关注，其行为可以得到必要的调整。进一步说，家长通常有很强的动力去教育他们的后代。把孩子看作是他们的生物体和社会体的延伸，父母在培养孩子上因而也就投入了很多感情。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有效的或有效能的社会化主体。父母很少经过明确训练来对孩子进行社会化。实质上，大部分家长对子女的社会化，只是把他们所记得的、从他们父辈那得来的东西，外加上从别人那里获得的

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见多识广的）再加工一遍传给子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社会化越来越成为学校、专业性服务（如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责任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家庭以外的社会化主体的角色已十分重要，以至于有时人们指责这些社会化主体使家庭在社会化方面的作用弱化了（拉斯卡，1977；伯杰等，1983）。

然而家庭的替代品被证明并不十分成功。有些社会偶尔用新法进行社会化试验，试图产生戏剧性的变化，一开始这些试验看起来是比传统的家庭结构提供的社会化更有效。例如，在早年的前苏联共产主义国度，政府官员为了政治原因试图大大削弱家庭的作用（家庭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引入了集体养育孩子的新模式。这种尝试失败了（佩雷温登，1983）。事实上，与别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前苏联几十年来的家庭体系是相对较强的（伊布洛格等，1986；拉皮德斯，1982）。可是，到80年代后期，由前苏联的改革开放（glasnost and perestroika）所带来的大量变迁中，就有离婚率跃升为欧洲之最这一项。前苏联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婚姻和家庭的不稳定是当时少年犯罪增多的主要原因（桑坚，1991）。

最广泛的探索性替代家庭试验发生在以色列。集体农庄中的孩子们与父母分开居住。在这里，年龄相仿的孩子分成小组与经过专门训练的集体农庄的成人生活在一起。一些研究表明，这种社会化的方法在传授以色列社会的价值观念方面是成功的（鲍斯，1989；贝特尔海姆，1969；斯皮罗，1958）。

然而集体农庄很特殊。它很小，是一个成员共享共同价值观的强烈整合的社区，经常担心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而且，虽然孩子们和父母不睡在一起，但他们每天中午后去父母家，与父母一起在社区食堂吃晚饭，并一直呆到晚上才返回到自己的房间。而且，有证据表明，集体农庄的家庭关系正在增强；越来越多的集体农庄的儿童现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并且许多母亲都想使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强烈一些（帕奇等，1983；蒂热和谢菲尔，1975）。

情感和陪伴

今天家庭的第二个主要功能就是为其成员提供爱和感情。感情对孩子就如学习一样都很重要，而且在其整个一生中都始终是这样。有证据清楚地表明，一个缺乏亲情关怀的孩子，其身体、智力、情感的成长以及其社会发展，都会受到损害（参见第六章）。

成年人虽不会因缺少爱而死，但也需要感情和他人的陪伴。过去，许多人一生都生活在出生和养育他们的社区里，结婚之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仍然和父母、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或是住得很近。像这样始终生活在熟悉的社区里，亲戚住得也很近的家庭，就有充分的机会保持友好往来，获得情感支持。

多数社会学家都赞同，现代社会中人们很少有机会从直接家庭（immediate family）以外的亲属那里获得友谊和支持。父母与其子女通常与别的亲属分开居住，偶尔彼此看望一下。同样，当父母一方在别处找到了新工作，或父母在别处买了房子，多数家庭都会搬家。这种趋势迫使直接家庭成员在情感和陪伴方面都深深地彼此依赖（帕森斯，1955；梅尔维尔，1988）。

尽管单身男子和单身女子保持活跃的婚外性生活日益为社会所接受了，但是由于家庭是现代社会中情感和陪伴关系中不多的几个来源之一，所以人群中仍有很高的结婚率。而且，正因为情感和陪伴关系变得如此重要，因此即使家庭的其他功能都仍能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但是当配偶的某一方的感情需求不能在家庭内部得到满足时，家庭就有可能破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提供感情和陪伴关系已成为现代家庭的核心功能。这对于男性来说尤为如此，而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无职业的妻子，就不大可能因为家庭无法满足她的感情需要而设法去结束婚姻（布卢姆斯坦和施瓦茨，1983；贝纳德，1982）。

性规则

就我们所知，没有一个社会提倡过完全的性滥交。但支配性行为的观念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却有极大的不同（霍华德，1986；斯通，1985）。例如，丹麦和孟加拉国对年轻人性行为的态度就是两个极端。丹麦人赞成男女青少年有性行为。虑及艾滋病的传播，丹麦学校在80年代后期开始向14岁以上的青少年免费发放避孕套（乔勒、汉森和塞奇斯特，1989）。可是，在孟加拉国，青少年女性的性行为是被禁止的。如果年轻女子不是处女，她就会贴上“为人所抛弃”的标签，是不值得迎娶的。即便她是被强奸的，情况也是如此。

虽然全世界的性观念多种多样，但没有一个社会将有关性的事情完全看成是个人之事。社会对性行为如此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着怀孕的可能性。因为孩子需要得到多方面的照顾，所以最好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旦一个婴儿降生，它的生身父母或是受命父母都有责任为它提供食品、居所和爱。性行为规范的制度化，其最主要、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保证儿童获得良好的照顾和代际之间的平稳过渡。结果，大多数社会就强烈提倡合法生育（legitimate birth，指婚内生育）而不是非法生育（illegitimate birth，指非婚生育）。

合法性的社会压力同样有助于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获得适当的社会地位。这意味着孩子所继承的或先赋的社会地位不会或几乎不会模糊不清。合法生育授予孩子明确的宗教、伦理、阶级身份，同时在父母双方的扩大家庭中，子女也同样具有明确的地位。而非婚生育的子女，其社会地位通常就不太明确，这就导致了在如何对待这个孩子的问题上产生实质性的含混。

在美国，传统的性规范是很严格的，这首先是清教徒的遗风，其次是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的影响。这些观念和宗教信仰密切相连，许多还由法律来强制；例如，有些州禁止婚外性关系，有些州把夫妇间的性行为限制为生殖器性交。有24个州的法律还明文禁止同性恋（“非自然”的性行为）（《西部联邦实践文摘》，1987）。

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性，更具体点说，对实际的性行为的态度，正在发生着非常迅速的变化（泽尼克、坎特纳和福特，1981；威尔逊·W.C.，1975；布卢姆斯坦和施瓦茨，1983）。过去，男人比女人被允许有较多的性自由，但是最近几十年，这种双重标准至少部分地有所削弱。一个研

究小组认为这种双重标准的降低代表了美国性观念最为显著的变化(克拉森、威廉斯和莱维特,1989)。人们也更能容忍婚外性行为了,特别是单身者的性行为。198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49%的美国人赞成婚前性行为,92%不赞成婚外性行为;可是到了198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降为38%和67%(《社会大众调查》,1988)。

这些变化对家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于观察。如果所有限制婚外性行为的规则都取消了,那人们可能就不会再感到需要结婚了,或者是,如果已经结了婚,也不再会与配偶呆在一起了。儿童社会化就可能发生严重的问题,同样,家庭作为感情和陪伴关系的稳定来源也很成问题了。但是,这样的前景不太可能。部分由于艾滋病风险的存在,最近以来在性方面的趋势是,远不再像六七十年代性革命时那样随便、滥交。

经济合作

家庭被经常部分地定义为--群人为追求经济目的而合作所形成的经济单位。在乡土农业社会,家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生产的主要单位。这些社会里的家庭通常从事农业生产或家庭手工业,如制陶、针织、铁匠铺等。

在现代社会,大多数生产性工业在家庭之外进行,但是,家庭仍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单位。然而家庭的主要经济行为已由生产转为了消费。以家庭为单位,它们进行着最主要的购买消费,如购买房屋、汽车、电视等。

在经济学概念上,女人、男人与家庭的关系有着典型的差异。没工作的妻子在经济来源上主要依赖丈夫的支持。有工作的妻子,通常挣得比丈夫少,在经济上往往也依赖丈夫。然而,这种状况正随着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单亲家庭的增多而发生着变化。

2

冲突论的观点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尽可能地重点讨论了功能主义从社会整体利益来强调家庭功能的观点。冲突论的理论家们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家庭。他们强调,两性以不同的方式彼此竞争,有些家庭成员比其他人对家庭的贡献要多。他们指出,家庭的历史,同样也是女人被男人统治的历史。

女权主义冲突论者注意到,许多法律、观念或政府的政策都支持男性统治(罗特曼,1989)。他们认为,男性统治的观念已深深植入美国的文化之中,以至于大多数人把家庭中妇女的传统附庸角色,看作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是自然的。这种从属角色在传统的婚姻仪式中就表现得很充分。虽然越来越多的夫妇选择了更平等的结婚仪式,但传统仪式上牧师总是问新娘是否会“尊重并服从”她的丈夫。牧师们宣告一对新人结为夫妇时,称的是“男人和妻子”(而不是“丈夫和妻子”)。女子的称谓由“小姐”变为“太太”,并且放弃了她们的父姓。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些仪式传统便是一桩不平等婚姻关系的象征性开端。

虽然关于人类家庭起源的确凿信息不多,但一些证据还是表明家庭内一直存在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历史早期,妇女由于怀孕和照顾幼儿,与男人相比迁徙较少。妇女通常和孩子呆在家里,在近

处采集食物。而男人，到较远的地方狩猎捕食，往往是主要的经济提供者。他们还从事一些战事（哈里斯，1988；高夫，1975）。

家庭内这种工作角色的划分成为性别不平等的最初基础，而且在较大程度上这种划分和不平等今天仍然存在。因此冲突论者把家庭看作是展现性别不平等的主要舞台。这种不平等反映在母亲、父亲（及女儿、儿子）所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上，也反映在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方面；多数情况下，父亲处于统治地位。

一些女权主义者对家庭中权力平衡的分析表明，男性统治地位只是在农业出现后的早期人类社会才出现。当人们还是狩猎者和采集者时（这是一段包括大部分人类历史的时期），一种更加平等的两性工作关系是占主导地位的。作为主要的食物采集者，女人，而不是男人，是经济的主要提供者。同样，部落（而非家庭）是那时的基本经济单位。所以，人们对男性在再生产中的角色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坎贝尔，1988）。根据这个观点，男性的统治地位不是源于男性作为食物提供者的角色，而是在农业（和战争）出现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埃斯莱，1987；李普曼、布鲁门，1984；布隆伯格，1978；哈里斯，1977）。

马克思主义者也特别关注过现代家庭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们认为，男性主导的家庭，通过为社会提供一些重要的不用付工资的劳动形式，如人口再生产、照顾儿童、准备食品、日常健康护理等（传统上都是妇女的责任），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扎雷斯基，1978）。这些免费的劳动使得男人能够保持他们的权力，并维持妇女的从属地位。想方设法保持家庭中现存的性别不平等便是资本家的最大利益（扎雷斯基，1976）。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如果资本主义体系不变，性别不平等就不可能被推翻（弗尔斯通，1971）。

家庭结构

虽然世界上的家庭有着许多同样的功能，表现了许多相同的不平等关系，但是，不同社会、甚至不同群体的家庭结构却有着显著的差别。由于家庭结构是前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一直是社会人类学关注的焦点。不过在现代社会中，家庭结构也存在着广泛的差异。

1

亲属与家庭

虽然家庭和亲属网络（family and kinship network）在英语中通常都被称做“家庭”（families），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两者之间还是做了重要的区分。亲属（kinship），是指一些有着共同的祖先或血缘的人，或是有姻亲关系或养育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网络。亲属可以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姑姨舅舅、祖父母、姑舅祖父母、叔伯祖父母、堂（表）兄弟姐妹、远房堂（表）

兄弟姐妹等。亲属网络中的确切成员关系是由特定的文化规范决定的。某些社会的亲属关系比其他社会所包括的范围要更广一些。

亲属并不总生活在一起，以群体的形式发挥作用。但是，他们确实承认彼此之间拥有相互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美国，亲属可能在感恩节或圣诞节聚在一起，或是一起参加婚礼、葬礼，也可能大家一生只聚会过一次。

由于家庭具有如此多样的形式，因此往往很难给家庭下一个定义。家庭(family)是亲属关系中(或类亲属关系中)相对较小的户内群体，是一个相互合作而发挥功能的单位。在美国，家庭通常是一个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小群体。然而，在许多社会里，家庭包括了三代或三代以上的亲属。例如，在有的家庭中，几个兄弟及其妻子、所有的儿子儿媳妇、未出嫁的女儿、孙子等都生活在一起，或住得很近。大家共同提供食物、维持家计、照顾小孩和老人。如果这些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单元发挥作用，社会学家就把他们看作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可是，如果他们只是住得很近，但并不共享资源，那他们就是不同家庭的成员，不过仍属于一个亲属群体。

在人的一生中，大部分人都属于两种不同的家庭。他们出生、并进行大部分社会化的家庭是出身家庭(family of orientation)；通过结婚生子建立起来的家庭是生育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不同的社会在两种家庭的文化上侧重不同。例如，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中，出身家庭具有特殊意义，而生育家庭则是一种较随便的组合。一对普韦布洛印第安男女结婚后，女方仍住在她母亲家里，男方搬来一起住。如果夫妇不和离婚，那丈夫搬回他母亲家里住则毫不奇怪。甚至夫妇婚后在庆祝和收获的季节里还要分开；妻子呆在她的出身家庭里，丈夫也暂时回到自己的出身家庭。对双方来说，出身家庭始终是最重要的家庭。

美国人把出身家庭和生育家庭都看作是“家庭”，但是典型地说，我们主要还是忠于生育家庭。例如，现代美国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很少在假期分开而各自返回他(她)们的出身家庭去。

2

核心家庭与 扩展家庭

虽然理想的美国家庭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由一对夫妇和子女两代人组成的家庭，通常不和别的亲属住在一起)，但这种家庭的变异也很普遍。死亡和离婚使许多家庭只剩下父亲或母亲；一位祖父(母)可能和这一家住在一起；由于经济原因可能使已婚子女及其配偶、子女仍住在出身家庭里；也可能未出嫁的女儿已生了个孩子，等等。如果一个家庭包括了三代及三代以上的成员，就叫作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因为典型的核家庭主要强调夫妻关系，所以它又叫作夫妇家庭(conjugal family)。如果一个家庭(通常是扩展家庭)主要强调与不同亲戚的“血缘纽带”，那它又可以叫作血亲家庭(consanguine family)。

“完整”的核心家庭在美国中上层阶级中最典型。单亲家庭虽然在各个阶级都存在，但在下层阶级中更为普遍。单亲家庭通常是由于离婚、分居、未婚生育或丈夫失业造成的。主要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扩展家庭也同样在

下层社会中更普遍。

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都能雇得起人照看小孩、帮他们迁往新居、照顾病人等。有急用的时候他们还能从银行贷到款，也买得起新车。这样看来，就没什么经济理由让中产家庭非扩展不可了。

购买许多这样的产品或服务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简直是奢侈。这样的家庭通常必须依靠家庭成员和亲戚来提供他们买不起的产品和服务。妹妹来照看小孩；祖母来照顾生病的父亲或母亲；哥哥借给妹妹 50 美元，下次发薪的时候再还；如果需要的话，表哥还要带孩子去看牙；搬家那天家里所有能动的人都要帮一把手……没有这种相互帮助的网络，低收入的家庭就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无法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家庭成员越多，每个人就越有可能得到帮助（斯托克，1974；哈里斯，1989）。这样，对于穷人来说，大家庭、扩展家庭和关系密切的亲属群体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好处——事实上，是一种必需。

全球家庭发展趋势

全世界的家庭结构正在逐渐朝核心家庭的方向发展。所谓全球家庭发展趋势的这种转变，是从英国开始的（古德，1963）。在前工业社会的英国农村（那个时期大部分欧洲地区扩展家庭仍很普遍），三代或更多代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已经是极少数了（古迪，1983；拉斯莱特，1972；拉斯莱特和沃尔，1977）。

今天，这种朝核心家庭方向发展的趋势看来是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全世界的社会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哈里斯，1983；穆尔，1979；克尔等，1964）。当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时，典型的情况是，年轻的家庭成员离开土地和乡村，搬到城市去，在那里找到工作，这常常削弱了他们与留在乡村的家人的联系。一旦到了城里，家庭就会为了求职或别的原因（如好的居住条件、退休、更适宜的气候等）不断地搬迁（明茨和凯洛格，1988；滕斯特朗，1973）。因此，农业家庭很可能是扩展家庭，与一块土地紧密联系，而工业家庭则是核心家庭，有更大的流动性。

扩展家庭的减少就是这样由于工作性质的改变促成的。与在工业社会中的穷人一样，农业社会的扩展家庭提供了一种经济上的实惠。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做一些生产性的工作。儿童、老人、残疾人，虽不能与健康成人干同样的活，但每个人都能为整个家庭单元的经济福利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在工业社会，儿童、老人、残疾人更多地是经济上的消费者，他们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被雇佣（如劳动力短缺时期）。因此他们几乎不为家庭单元贡献什么，却和有贡献的人一样消费。可见，在工业社会扩展家庭可能是一种负担而不是实惠。

伴随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个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流动性。在扩展家庭里，个人的需求通常从属于大家庭的需求。例如，很难找到有什么个人隐私。

但是，核心家庭也有弊端。虽然个人从很多责任、义务中解放出来，但是同样地，别的家庭成员也不再对他负有责任义务了。由于现在家庭单位更

小了,所以感情和经济支持也就更有限了,每个人可以从中获得满足、感情、陪伴、帮助的家庭成员也就更少了。结果就可能导致个人的社会孤独感增加(扎雷斯基,1976;波普诺,1988)。

3

家庭中的权威

综观西方历史,家庭权威一直由男性执掌。父权家庭(patriarchal family)是大部分权威由最年长的男性拥有的一种家庭结构。这位男性家长可能是扩展家庭中的祖父或叔父,或是核心家庭中的父亲。他在家庭各种事务中做最后裁决——如家庭住在哪里、如何消耗各种用品、孩子与谁结婚等等。在父权家庭中,妇女通常有她们自己的权力范围,主要是家务和孩子,但是即便是这些领域最终的主意还是由男人来拿。例如,日常厨下工作都由妇女来做,但主要的采购(如一只新炉子)却需要得到家长的许可。

相反,母权家庭(matriarchal family)则是大部分权威掌握在最年长的女性手中的一种家庭结构。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早的时期,母权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式。这种观点主要是在19世纪产生的(恩格斯,1884,1977;巴霍弗,1861,1967)。但多数现代学者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哈里斯,1989;韦伯斯特,1975;班伯格,1974;韦斯特马克,1894,1901)。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妇女曾同样拥有过现在男人所具有的对家庭乃至社会的权威。

在父系社会里,个别家庭也可能由于没有男性而由妇女领导。一位妇女成为家庭的核心和最重要的成员,这种家庭叫母主家庭(matrifocal family)。这种情况发生在没有男性的时候,例如由于战争、外出工作等,或是当存在高离婚率、非婚生育等的时候,后者在现代社会更为普遍。然而,许多这种家庭只是形式上的母主家庭,同居的男友或是前夫、不在家的丈夫等实际上还行使着相当的权力。

虽然大部分美国家庭仍倾向于父权家庭,但一种新的模式已经在现代社会出现了:平权家庭(egalitarian family)(扬和威尔莫特,1974;马尔毛德,1984)。这样的家庭里丈夫和妻子在权力和特权上大致平等。就像家庭的其他发展趋势一样,平权家庭的增多也与工业化相联系。在现代社会里,每个工作日男人通常离开家8至12小时,这必然削弱了他们的权力。由于妻子也成为劳动力大军中不断增多的成员,所以她们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减少了,这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正是由于这些变化,越来越多的丈夫和妻子开始平等拥有家庭权力。

然而,即使在相对平权的家庭里,许多重要的决定还是由丈夫作出的。例如,丈夫的职业往往决定了家庭在哪生活,怎么生活。只有极少数家庭的搬迁是由于妻子变换工作或妻子在另一城市有了更好的工作。许多双职工今天已成为了“通勤夫妇”(commuter couples),他们在不同的城市里工作,周末在其中一方的住处度过(泰勒和克恩斯伯里,1988)。

在不同社会中，家庭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婚姻居所——即夫妻结婚后居住的地方。在某些社会中，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是其习惯。婚后夫妇俩住在丈夫父母的家里或与他们居住在同一个社区。这种文化中，儿子带新娘住父母家或与父母住得很近，女儿婚后搬到丈夫家住。而在从妻居（matrilocal residence）的社会里一切都要反过来。婚后夫妇住在妻子的父母家或同一个社区中。女儿一直住父母家，儿子搬去与妻子和她的父母住。例如，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和纳瓦霍印第安人从夫居，而东北部的易洛奎和休伦部落则是从妻居。

虽然许多美国人要么从夫居，要么从妻居，但是多数新婚夫妇还是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新家，特别是那些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婚后夫妇俩不与任何一方父母或亲戚住在一起的方式叫单居制（neolocal residence）。这使得夫妇俩有了更多的隐私、流动性和个人认同感，但是也更有可能会使得这个家与整个亲属网络割裂开来。

亲属和血缘关系世代相传的方式就是世系（descent）。世系相传和财产继承有三种方式。父系继嗣（patrilineal descent），即家庭中父亲这一边的叫做亲属。在父系体系中，男性沿男性一边继承财产；女性通常不允许继承。而母系继嗣（matrilineal descent），是指家庭中母亲这一边的叫做亲属；世系沿女性一边传承，财产也是由母亲留给女儿。还有一种是双系继嗣（bilateral descent）——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是这种体系——孩子们的亲戚与父母两边家庭相关联，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有继承权。

婚姻、离婚和寡居

在扩展家庭中，子女婚姻伴侣的选择对整个家庭都很重要。一位懒惰的配偶，或想诱使子女离开扩展家庭的配偶，对于家庭的稳定性来说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同样，因为婚姻在建立整个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配偶的选择就成为一条建立亲属之间联系的途径。在这种社会里，选择配偶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留给个人自己解决，而非要由父母或村里的长辈们来安排才行。有时这种配偶的选择会与孩子们自己的意愿相冲突。

现代社会里的年轻人可能会对这样安排婚姻很难理解，更不用说接受了。可是要意识到，在这些扩展家庭中，婚姻更多的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不是出于爱情的考虑。同样，一位“不太合适”的配偶在大的扩展家庭里并不像在孤立的核心家庭里那样十分重要。在扩展家庭里婚姻关系只不过是许多亲

密的个人关系中的一种。

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和个人的选择，已经成为婚姻的基础，而非出于经济考虑和父母的安排（戴维斯，1985；古德，1959）。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婚姻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伴侣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可能是人们所知道的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个人的选择非常重要。家庭之间的联系相对不那么重要，婚后夫妻通常与亲属分开住。因此，婚姻伴侣的选择就不会那么直接地影响到其他人，除了夫妇俩自身和他们未来的孩子以外。

1

选择一位 婚姻伴侣

所有的社会都对性伴侣和婚姻伴侣的选择有所限制。乱伦禁忌（incest taboo，一种很强的道德禁律，它禁止特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发生性关系）几乎是全世界都有的限制。乱伦禁忌特别适用于核心家庭的成员，但是有时也适用于更远些的亲戚。在美国，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妹之间的性关系和婚姻被严格禁止。有些州还把堂（表）兄妹之间的性关系和婚姻关系定为非法。有的社会甚至禁止六代以内的堂表兄妹之间通婚。

历史上官方还几乎从没允许过兄妹之间的性关系。但有两个例外，那就是古埃及和古夏威夷的皇室中曾出现过的兄妹结婚，因为当时他们是那个等级门当户对的仅有成员。然而这种例外只能发生在皇家；乱伦对其他人仍是被严格禁止的。另一个例外是发生在现代瑞典，在那儿对兄妹乱伦的惩罚已经减轻了（哈里斯，1989）。

许多理论都试图寻找近乎普遍的乱伦禁忌的根据（默多克，1949）。较典型的是生物学理论，认为近亲繁殖会导致大脑和身体的退化。但这一理论有两点值得怀疑：第一，近亲繁殖并不必然会导致退化；第二，近亲繁殖的负面效应通常发生得非常缓慢，要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观察出来。因此，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乱伦禁忌是由文化决定的（哈里斯，1989）。一个比较常见的解释就是乱伦禁忌有助于防止亲属之间的冲突。如果没有这个禁忌，竞争者会严重破坏家庭的稳定。例如，女儿为得到父亲的爱可能会与母亲竞争，兄弟之间也可能会因为追求同一位姐妹而彼此敌对。

除了乱伦禁忌外，有些文化要求实行内婚制（endogamy），即必须是同一群体中的人才能结婚。在美国，内婚制仍是有些种族群体的传统。例如，正统的犹太人当自己的子女与非犹太人结婚时会按传统为他们哀悼，就像他们已死了那样。许多在美国的希腊人也鼓励内婚制，他们认为与非希腊人结婚会削弱他们的文化，因为美籍希腊人如果和非希腊人结婚，就不大可能教孩子希腊的语言和传统（舒尔茨，1981）。

另一些文化则鼓励外婚制（exogamy），即规定要同自己群体之外的人通婚。这通常是小社会中的规范，因为在小社会里，几乎人与人之间或远或近都有着血缘或姻缘关系。在这样的社会里，婚姻对象必须是另一个村子的人。这种做法有助于加强比邻群体间的联系，因为每个配偶都有亲属住在另一个村子里。建立在这些亲属联系之上，村与村之间的联盟就会通过物品与

服务的交换而使经济关系得到强化(列维-施特劳斯, 1969)。外婚制的观念在传统基督教教义中也有, 即禁止三代以内的堂表亲之间通婚。

在美国, 只有一些婚姻选择的方式是被禁止的。准备结合的双方不能已经有合法配偶; 必须达到法定年龄; 不能是近亲; 是不同的性别; 不能是作出独身承诺的宗教团体的成员。不过, 其余婚姻都是合法的。名义上说, 白人可以和黑人结婚, 犹太人可以和基督徒结婚, 社会名流可以和下等人结婚。但事实上, 大部分美国人都选择那些经济、种族和宗教背景与自己基本一致的人结婚。这种具有共同社会特征的人之间的婚姻方式叫同类婚(homogamy)。

同类婚是部分地基于许多美国亚文化对外婚制的微妙抵制之基础上的。例如, 通常天主教徒要想在教堂里与非天主教徒结婚是很难的, 除非双方保证今后教养孩子信奉天主教。来自父母的压力以及可能会被取消继承权的威胁等, 都曾阻止过许多上层社会的后代与下层社会的人联姻。不过, 种族之间的通婚会遭到广泛的社会反对, 所有种族都如此, 这减少了同类婚发生的几率。

同类婚有两种重要的功能。第一种, 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 就是孩子接受前后一贯的社会化的机会增多了。如果夫妻双方异质性比较强, 他们很可能在如何教养孩子方面出现许多争议, 会对下一代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同类婚还有一个重要功能, 就是除了对孩子社会化以外, 夫妻在其他事情上的争吵也会减少。因为社会地位相当的人往往会有共同的价值观, 所以同类婚会使相对幸福的婚姻机会增多, 减少离婚的几率。

传统社会里, 同类婚通常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安排的婚姻来保证。而在现代生活中, 同类婚是大多数人倾向于与“同类人”交往这一事实的典型反映(参见第一章“社会学之窗”栏: “常识还是科学的判断”)。并且即便他们没有这种偏好, 他们与自己群体成员相遇、相处的机会还是要远远大于与“外群体成员”接触的机会。

美国人倾向于同与自己有共同宗教信仰、属同一人种的人结婚。尽管不同人种之间的通婚率一直在上升, 但这在 1989 年全美国约 5 300 万对夫妇中也只有 0.4%。在黑人与白人结合的夫妇中间, 有三分之二的是丈夫黑人、妻子白人(美国人口普查局, 1990a)。

在美国, 虽然不同经济地位间的婚姻比不同信仰、不同种族间的婚姻要普遍, 但尽管如此, 人们还是强烈倾向于在同一阶级内部通婚(西蒙, 1987; 克莱顿, 1975)。人们还通常与相同年龄段的人结婚。美国夫妇间的年龄差异平均只有两岁左右, 大多数丈夫比妻子大(美国人口普查局, 1989)。

虽然人们倾向于同与自己相似的人结婚, 但另一种趋势也很明显, 这就是婚姻倾度(marriage gradient)。它是指男人倾向于同比他们年轻的、文化水平比他们低的、职业声望不如他们的女性结婚。

求爱和罗曼蒂克式的爱情

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爱情”是最重要的婚姻基础(康西安, 1987; 沃尔斯特等, 1978)。人们谈论爱情、歌唱爱情, 把它写进小说里、戏剧里、诗里。这种作为典型的、实质性的婚姻基础的爱, 是一种包括性吸引、激动甚至狂喜的感觉、以及把对方理想化的混合物。围绕婚姻的全部复杂观念都与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相联系。许多人甚至相信离婚的原因就是缺少这种爱。

不过, 罗曼蒂克爱情并不总被认为在婚姻中很重要。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 在传统社会里, 个人根本不能选择他(她)的婚姻对象, 更不用说因为爱情而选择伴侣了。人们期望个人首先考虑家庭或部落的需要、愿望, 而不是个人自己的。如果对家庭来说, 这个婚姻对象是好的选择, 那他(她)对个人来说, 也是好的选择。

然而在西方工业社会里, 人们很尊重个人的权利。人们选择婚姻对象主要是建立在个人满足的基础上(尽管经济上的需要仍是许多夫妇考虑的重要因素)。

这种文化价值对婚姻制度有什么影响? 很可能光有罗曼蒂克爱情还不能成为建立持久婚姻的理想基础。许多人相识、疯狂相爱, 在热烈的感情迸发中结为夫妻。他们期待对方常青之爱的激动能在多年的日常家务与经济生活中历久不衰。可是当伴侣罗曼蒂克式的感情消失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受骗了。那种认为激情应该永远持续的观念对双方都是一种压力。失望会引起婚姻中的种种辛酸, 导致通奸, 还可能会引起离婚。

相互的支持以及相似的社会背景, 而非浪漫激情, 对于持久的婚姻爱情来说, 看来是最重要的。一位学者把一桩好的婚姻适当地描述为“一种两人之间的最有助于双方最佳发展的关系”(富特, 1953)。要想在感情上彼此令对方满意, 夫妇双方必须认识到对方的需求, 有共同的经历, 尊重对方的个人价值。这种爱不仅与夫妻双方个人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 还与双方的相似程度, 或者说至少是与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和信仰的相容程度密切相关。就像一位学者所说的, “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必须发展成为“理性”的爱情——一种对对方的真实的接受、交流, 以及给予和接受的爱(扎斯特罗, 1986)。

有许多强烈迹象表明, 这种相互的包容性可能是最重要的婚姻稳定的社会因素(齐默尔曼和塞万提斯, 1960)。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婚姻中彼此相反两个人是不会相互吸引很长时间的。例如, 一项对 331 对军人夫妇的研究发现, 对婚姻最不满意的夫妇是那些丈夫对性角色持传统态度、而妻子持现代态度的夫妇(鲍恩和奥尔托内, 1983)。另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具有相似地位的夫妇通常幸福感会更强, 婚姻更稳定。在渴望亲近、性格外向、喜欢娱乐活动、人际间的交往与讨论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 对夫妇之间的相互包容起很大的作用(巴斯, 1984)。最令人满意的男女婚姻关系看来是以容貌、个人魅力、影响力、智力、财富和其他资源方面大致相等为基础的。

婚姻在社会学上被定义为一种社会赞许的配偶约定，通常包括一男一女之间性行为、经济合作。美国的婚姻体系是以一夫一妻制（monogamy，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结合）为基础。而婚姻里同时涉及不止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叫多偶制（polygamy）。最常见的多偶制婚姻是一夫多妻制（polygyny），一个男人同时有几个妻子。相反，如果一个女人同时有几个丈夫，就是一妻多夫制（polyandry）。

一夫多妻制在世界上广泛存在。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对 238 个社会（大部分是前现代社会）的经典研究发现，有 193 个是一夫多妻制，43 个是一夫一妻制，2 个是一妻多夫制（默多克，1949）。在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以及中东的部落社会里，一夫多妻制至今仍很盛行。在中东，穆斯林男人允许同时有四个妻子。所有的妻子和孩子通常都住在一起，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典型地，这是建立在经济需求的基础上的，一夫多妻制有助于增加社会的人口出生数，或是有助于弥补由于战争造成的男人短缺。

绝大多数美国人结婚，并在家庭中度过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上，美国比其他任何现代社会有更高的结婚率。1990 年，40 岁以上的妇女中 92% 已结婚或曾结过婚；所有子女年龄在 18 岁以下的美国家庭中，约 75% 的家庭中丈夫和妻子住在一起（《美国统计摘要，1993》）。

但是目前流行的趋势是结婚年龄推迟。现在妇女首次结婚的年龄中位数是 24.1 岁，是政府自 1890 年开始保留统计数字以来的最高年龄。对男性来说，首次结婚的年龄中位数是 26.3 岁。而且选择根本不结婚的人数正不断增加。1980 年单身家庭的数量比双人家庭多 1 090 万，到 1992 年，单身家庭比双人家庭多 2 400 万个。单身家庭现在占全部家庭的四分之一。数量增长最多的是单身妇女，她们占单身家庭的 58%（《美国统计摘要，1993》）。1990 年，25 至 29 岁的妇女中有 31% 从未结过婚（《美国统计摘要，1993》）。妇女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增多，可能是解释这种趋势的一个原因。

那些不结婚或是推迟结婚的年轻人普遍担心他们的婚姻可能会不幸福。可是在美国有多幸福才能达到婚姻的平均水平呢？我们很难获得婚姻生活中情感质量的准确数据，而且人们可能倾向于把他们的婚姻说得比实际上幸福。然而，有些证据表明理想的婚姻和现实差距很大，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

在一项开拓性的研究中，米拉·卡莫罗夫斯基（Mirra Komarovsky，1964）从 58 对工人阶级的婚姻中发现，夫妇俩并不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丈夫和妻子倾向于各过各的生活。丈夫通常和哥们呆在一起，妻子则和女亲戚或朋友呆在一起。通常，这些人好像并不认为亲密关系和伴侣关系特别重要。样本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夫妇认为他们的婚姻幸福，另有三分之一认为不幸福。只要家庭保持完整，经济上稳定，那么夫妇俩或多或少就是满意的。大多数人认为婚姻是一种必需且有用的关系。

另外一项关于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著名研究是由里利安·布雷斯洛·鲁宾

(Lillian Breslow Rubin) 指导进行的。在《痛苦世界》(1976)一书中,鲁宾得出的结论与卡莫罗夫斯基的非常相似:工人阶级通常结婚比较早,求爱的时间很短;这种婚姻中的夫妇往往很少注重相互的交流、亲密关系或能否苦乐与共等;他们认为婚姻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能够过上适当的好日子,并且“对孩子有利”。然而,最近对美国中西部一个城镇 58 年来(1920 年至 1978 年)的家庭情况调查则描绘了一幅不同的图景。这个城镇中工人家庭的态度与商业阶级的家庭并没有明显差别。两个阶级的夫妇对他们的婚姻关系都表示满意,并认为开诚布公的交流和相互的支持是婚姻幸福的主要因素(巴尔等,1982)。

一个有代表性的人口抽样调查发现,美国人的婚姻幸福感水平相对较高。对特大城市地区已婚夫妇的调查表明,34%的人认为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56%的人认为幸福,只有 9%的人认为不幸福(《社会大众调查》,1988)。研究还表明,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整体的幸福感更多地是取决于有一个好的婚姻,而不是其他诸如工作满意程度或家庭关系等变量(格伦和韦弗,1981)。

4

离婚和再婚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离婚率的增长一直十分稳定,但最近几十年来,这个增长率则十分显著。1970 年,每 1 000 个已婚(且与配偶住在一起)者中有 47 个离婚。这一数字在 1980 年上涨到 100,1989 年上涨到 138——几乎是 1970 年的三倍(美国人口普查局,1990b)。现在美国的离婚率是所有工业化社会中最高的。如果最近这几年的高离婚率持续下去,那么今天缔结的婚姻中将有超过 50% 的婚姻以离婚、而不是以一方的死亡而告终(而 100 年前离婚率只有 5%) (托恩东和弗里德曼,1983)。不过,离婚并不是婚姻破裂的惟一原因;现在因分居和抛弃家庭造成的婚姻破裂也相当多。

许多研究家庭关系的专家对最近以来那些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离婚数量增长感到很震惊。在 1956 年,离婚牵涉到的孩子是 361 000 名。到 1988 年这个数字大约增长了两倍,达 1 091 000 名(国家健康统计中心,1989)。据估计,约 41% 的孩子在 15 岁以前都会经历父母离婚(国家健康统计中心,1989)。

有研究表明,离婚对孩子所造成的某些负面效应会相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有一项研究认为,与完整家庭中的孩子相比,离婚家庭中的孩子认为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不太肯定——也就是说,更为疏远,缺乏爱与交流(法恩、莫兰和施韦贝尔,1984)。另一项研究表明,从长远看,离婚在感情上对年长的孩子比对年幼的孩子造成的不稳定感更强一些,因为年幼的孩子对家庭破裂前的记忆要少一些,而且并不感到自己对家庭破裂负有什么责任,这点并不像年长的孩子。年长的孩子比年幼的孩子还更可能把被抛弃的恐惧带进自己今后的人际关系中去(卡马拉,1986;瓦莱斯坦和凯利,1981)。

离婚的时候,孩子会经历一系列情感变化,多数是恐惧、被抛弃、被拒

绝、悲伤、担忧、孤独、内心的冲突和矛盾、愤怒、内疚等。然而，离婚对孩子所造成的长期心理后果很难在他或她的早期反应中预见到。有些心理效果可能一直潜伏着，只在往后的发展阶段上甚或成年期才表现出来。对父母离婚后10年至15年的孩子进行访谈调查表明，50%的孩子认为他们父母的离婚在感情上一直对他们有着重要的影响（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1989）。

离婚后家庭关系的质量对孩子的心理调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离婚后父母保持积极的交往，彼此尊重，没有大的冲突，那么孩子就有较好的心理调试机会（博安南，1985）。不过，对于离婚后孩子如何认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在生活的不同方面如何发挥作用而言，母亲与孩子之间关系的质量是最关键的因素（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1989）。

虽然离婚通常被认为是消极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对孩子还是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对那些受父母虐待或父母打架很凶的孩子来说更是这样（德漠和阿科克，1988）。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父母离婚后那些受痛苦最多的孩子正是父母在家里没有暴力行为或没有感到痛苦的孩子（博安南，1985）。

离婚带给子女的单亲生活境遇，在美国要比在其他现代化社会更艰难。多数西欧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服务和福利来支持家庭，包括各种家庭津贴（发给所有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津贴），住进公共房屋的优先权，以及为工作母亲提供儿童看护的计划（摩根，1986；卡梅尔曼和卡恩，1981）。这些服务有助于减轻家庭破裂后的紧张。

相比而言，美国的家庭通常被看作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这样，就不是一个完全适合政府行为关注的焦点（斯泰纳，1981）。在美国如果要提供家庭服务，那通常只是在家庭已经破裂后。而且，可得到的那些服务，例如“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援助”（Aid to Family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等，都不如其他工业化国家那么慷慨。

在美国，离婚者的子女通常必须特别依赖于父亲提供的子女抚养费。但是这种费用是否需要通常依赖于母亲的社会地位。1989年，1000万妇女中，58%的人与21岁以下的子女生活在一起，但孩子的父亲都住在别处，不过有法院裁定父亲有负担抚养费的义务。尽管其中68%的白人妇女与孩子父亲签有抚养费的协定，但只有41%的西班牙裔妇女、35%的黑人妇女签有这样的协议。还有，大学学历的妇女得到孩子抚养费的人数要比只受过高中教育的妇女多。不过，在法庭上获准得到子女抚养费并不一定意味着事实上就能得到这笔费用。1989年获准得到子女抚养费的妇女中只有75%确实从孩子父亲那拿到了钱（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

再婚

虽然最近再婚率一直在下降，但是离婚者中的大多数仍然会再婚。近几年，大约有一半婚姻中，夫妇一方或双方是再婚者（格利克，1990）。离过婚的男女通常会在离婚后三到四年内再婚。大约10对再婚婚姻中有8对是带着以前婚姻中的子女（坎特罗威茨和温格特，1990）。某些个人特征会影响再婚的可能性：年轻人、白人、富有的男人和贫穷的女人最有可能会再婚（谢尔林，1981）。不过，第二次婚姻成功的几率没有第一次婚姻那么高。总

的来说,60%的再婚婚姻会失败;如果还有孩子,那失败的几率就增大到75%(迪堪里奥,1989)。

对第二次婚姻离婚率很高的一种解释是,与首次婚姻相比,再婚夫妇会更加密切地监测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他们对婚姻破裂前的警报更为敏感,所以他们更可能会在可预见到的、痛苦的婚姻结束之前自己放弃这次婚姻(科克斯,1983)。经历了一次离婚会更容易料到另一次离婚。而且,把第一次婚姻中的感情和问题带进来,也会妨碍新关系的成功发展(迪堪里奥,1989)。与继父母相关的问题也是导致再婚失败的因素(谢尔林,1981)。

结婚、离婚(或寡居)和再婚可能会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多次重复,这使得一些社会学家把美国人的婚姻体系概括为“一夫一妻系列制”(serial monogamy)或“连续多偶制”(sequential polygamy)。也就是说,许多美国人在他们一生中有几个配偶,但是他们一次婚姻只有一个配偶。一位杰出的学者指出:“很可能在我们的社会中实践多婚制的人数……要比那些公开承认是多偶制社会的人数还要多”(贝纳德,1956)。

离婚率分析

对结婚、离婚和再婚的统计数字可能暗示了许多美国人对婚姻生活持消极态度。然而其反面似乎与事实更为接近。虽然某些个体可能会放弃特定的婚姻,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美国人仍强烈地忠实于婚姻这种制度。很高的结婚率和再婚率就能证明这一点。

人们已经发现了离婚者的一些主要社会特征。那些十几岁就结婚的人;婚前认识时间很短的人;不参加宗教服务的人;以及住在城市的人离婚率会比较高(基德森、巴布里和罗奇,1985)。另一些研究者发现,朋友或家庭成员对婚姻持反对态度是婚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指示器,因为这种反对不只代表了那些认识夫妇双方的人们的一种预见,而且代表了那些可能会帮助维系夫妻关系的人对婚姻投不信任票(古德,1982)。早期的研究发现下层社会和工人阶级中的离婚率要比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中的离婚率高。这种情况通常是由经济压力所造成的。但是最近几年社会阶层较高者的离婚率上升要比较低阶层的离婚率上升更快,不同阶级之间的离婚率差别几乎已经消失。

有些研究者认为丈夫和妻子的工作境遇对婚姻是否能持续下去有显著的影响。如果丈夫找工作或保住工作有麻烦,或是妻子有能力挣钱养活自己,夫妇俩就易于离婚。妻子的工作状况非常重要。要是妻子能养活自己,而不用依赖丈夫的收入,妻子看来就没必要呆在不幸的婚姻里了,这样他们的离婚率就会很高(里克斯,1989;布卢姆斯坦和施瓦茨,1983;罗斯和索希尔,1975)。

要判断为什么一桩特定的婚姻会失败就更难了。离婚的原因通常包括个性冲突、经济困难、养育孩子中的分歧、宗教差别、与姻亲的矛盾,以及性生活的不和谐等(参见“应用社会学”栏中关于离婚可能性的研究:“预备:离婚中的风险因素”)。

预备：离婚中的风险因素

你的婚姻是否会因离婚而终止？社会学的分析并不能保证你一定与合适的人结婚，但是看一看与离婚有联系的这些因素会提醒你哪些冲突最可能对婚姻构成威胁。

有一个叫预备的研究提供了一组对已订婚的准夫妇的研究调查结果。它是单独发给每位准夫妇的详细清单，是三万多对准夫妇从他们牧师那儿获得的婚前咨询的一部分。预备研究是1978年明尼苏达大学发起的，它有80%的准确性，能够预计在刚结婚的三年内哪些夫妇会离婚、分居、或将面临严重的婚姻问题。因为大约四分之一的新婚夫妇在这段时间会分居或离婚，所以这样一个有预见性的工具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预备用125个问题调查了11个主要方面，这些问题夫妇两人分开回答，然后与一位顾问讨论。已经证明，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分歧是婚姻将要面临困境的最好预示：

个性方面，如对未来配偶喝酒、吸烟感到焦虑，生活杂乱无章，妒忌，不可信赖，动作迟缓，或有依赖性。

交流方面，如无法与对方分享自己的感情，受到批评时感到不安，经常奚落别人，过分抱怨。

解决冲突方面的问题，如害怕冲突，无谓的争吵，或永远无法解决的争论。

对婚姻的现实期望，如能够意识到多数夫妇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中都有问题，这些问题并不能随婚姻而解决，而且一方并不能满足另一方的全部需求。（《今日美国》，1985）

婚姻是否会失败，基本宗教信仰方面的分歧也是重要因素。然而，其他重要方面（如平权家庭的角色、家庭财务管理、娱乐爱好、性、孩子和婚姻，以及家庭和朋友等）的分歧，并不能预见婚姻关系可能成功还是失败。

参加预备调查的夫妇中，大约每八对就有一对在接受了婚前咨询后决定不结婚。因为他们的分数与那些今后会遇到婚姻困境的人的分数很类似，所以他们的决定也许是明智的。

在更广泛的层次上，美国的高离婚率与我们社会的多样性特征相联系（谢尔林，1983）。有一些社会特征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像核心家庭的相对孤立性等。另一些包括，如：居住地的变动率高（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不断地重新定义家庭成员和性别角色；还有，美国社会的民族多样性，这意味着有不同背景和价值观冲突的人很可能会相遇并结婚。

最近几年，美国有关离婚的法律已经变得更自由了；也就是说，离婚更容易了，因为离婚的法律依据已经扩大。许多离婚案件再也不需要证明是否有过错了。1970年，加利福尼亚成为接受“无过错离婚”观念的第一州。这一观念，使双方自愿和平离婚，减少了昂贵、痛苦的法庭战争。这已为其他许多州采用。法律上的这些变化可能对离婚率的上升也起了作用，但是它们也是对离婚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反映。

寡居

在美国大约有 1 380 万鳏夫和寡妇。其中妇女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为通常女人比男人活得长，而且女人往往与比她们大几岁的男人结婚（美国人口普查局，1990a）。寡妇再婚的并不像鳏夫那么多，所以许多寡妇在余生中仍然是孑然一身。

在美国，许多老年寡妇发现自己处境非常艰难。虽然有些搬去同已婚的儿子或女儿住，但仍有一些过着非常孤独的生活。由于她们的家庭和已婚朋友更愿意同其他夫妇交往，因此，寡妇与他们的来往也断绝了。不像鳏夫，寡妇还会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许多寡妇以前一直依赖她们的丈夫作经济后盾，所以她们并没有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充分的准备。随着生活费用的增加，寡妇的主要生活来源如养老金、社会保险、生活保险政策等，都不足为继。受过良好教育的寡妇要比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寡妇日子好过些，失去丈夫后，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重建新生活要更容易（洛帕塔，1986，1987）。

变迁中的美国家庭

美国家庭在朝什么方向发展？人口统计的趋势表明，单亲家庭和继父母家庭数量的增多，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的变化，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以及婚姻和核心家庭的种种变化，都正在对今天的美国家庭产生影响。

1

人口趋势

家庭中的许多变化都源于所有现代社会都存在的人口趋势。1920 年出生的人平均预期寿命是 55 岁。可是，今天，男人的预期寿命达到 72 岁，女人是 79 岁（《美国统计摘要，1993》）。另外，生孩子和养孩子也不再是整个一生要做的事，不像以前，典型的父母很年轻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养活一大家人，去世很早。越来越多二战后出生的妇女推迟了她们生头胎的年龄，都是二十好几才生孩子，许多都只生一胎，最多生两个孩子（里克斯，1989；威尔基，1981）。而且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夫妇选择不要孩子。

这些趋势极大地延长了妇女在家庭生命周期开始和结束时，不用养育子女的年限。尽管妇女生头胎子女的岁数已经增长了，但是大多数只有两个孩子的妇女在 40 多岁的时候就进入所谓的空巢期。已婚妇女在一生中用于养育子女的时间明显减少，这与妇女就业有密切关系。

2

单亲家庭和继父母家庭

离婚和再婚的流行已经导致在过去几十年中单亲家庭和继父母家庭数量的显著增加。今天单亲家庭占全美所有家庭的四分之一。大多数这些单亲家庭（87%）是由母亲维持的。而且据估计，今天出生的美国孩子中有一半

(45%的白人孩子和86%的黑人孩子)将在由母亲维持的家庭中度过至少是部分童年,这位母亲可能离婚、分居、未婚或寡居(加芬克尔和麦克拉纳汉,1986)。

单亲家庭要克服许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感情的问题。这些家庭经常会遇到经济不稳定、阶段性无收入、迁移、家庭角色和责任的改变、情感紧张等问题。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单亲父(或母)经常报告说遇到了儿童教育、犯罪、缺乏安全感、前夫(妻)、生活标准的降低以及抑郁等问题(加芬克尔和麦克拉纳汉,1986)。此外,单亲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要面临扮演父母两个角色的挑战。

因为多数离婚者都再婚了,所以继父母家庭(stepfamilies)、或曰混合家庭(blended families)的数量在增多。这些家庭里的孩子可能是从以前的婚姻中带来的,也可能是目前婚姻所生,大人则是有些孩子的父(母)和另一些孩子的继父(母)(迪堪里奥,1989;博安南,1985)。1990年,美国有530万继父母家庭,这样家庭中有孩子730万(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1970年以后出生在美国的孩子,大约有一半在一生中的某段时间会生活在继父母家庭中,其中大多数孩子父母离异。继父母家庭往往变得很复杂。不幸地是,目前没有什么建议能帮助成功地建立一个混合家庭,而且在努力建立新的家庭单元时,子女和成人之间的紧张情绪往往会导致仇恨、妒忌、不安全感和竞争。“真正的”父母和继父母的角色往往会使成人很迷惑,也搞得孩子很不愉快。

一般地,混合家庭的成员通常会说,在任何地方花三到六年的时间,就可以建立起新家庭的稳固联系。人们已经注意到,如果孩子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参与作出决定,那他们对新家的适应会更快。

离婚的夫妇通常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孩子的监护问题。一个越来越流行的解决办法就是联合监护(joint custody),即父母双方共同监护孩子(阿特金斯,1986)。这样安排,孩子每周或每月,甚至每半年分别在父亲和母亲家过。父母必须保持合乎情理的友好态度以便联合监护能顺利进行,而且他们必须作出额外的努力让孩子有安全感。

许多专家相信,这种联合监护可能是试图减少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的一项很有希望的进展。然而,在加利福尼亚进行的一项初步调查表明,孩子在父母双方友好的联合监护下,感情的发展并不比只有一位父母监护好(《纽约时报》,1988年4月7日)。

3

工作与家庭

已婚妇女就业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施里夫,1984;史密斯,1979)。现在全美有薪劳动力中妇女占45%强。子女不满六岁的已婚妇女中58%在工作,这比1975年36.7%的比例有了明显增长(美国劳工统计署,1989a)。

已婚妇女就业改变了许多家庭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这种变化比较广泛地出现在较高阶级的家庭中。在这些家庭中,妇女就业的比率上升最大,

而且这些妇女比工人阶级或较低阶级的妇女更倾向于走向职业化。在工人阶级和较低阶级的家庭里,性别角色则更加抗拒变迁。

关于正在变化的性别角色,有一个未曾预见到的后果就是,大约 210 万年龄在 5~13 岁的儿童放学后没有成人监管(儿童、青年和家庭特别委员会,1989)。这些“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latchkey child)在家里发生意外的比率要高于平均水平,而且在学校也更容易出问题。有些情况下,地方图书馆成了代替昂贵的日托、雇佣保姆或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的一条途径。图书馆报告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放学后在那儿等着被父(母)接走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德堪德里多,1988)。

美国社会为了适应就业母亲人数上升的趋势,在某些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夫妇俩,特别是在中产阶级中,共同承担家务并照顾孩子的数量增多了,不过这一数量仍很少。还有,虽然大多数就业母亲的子女由朋友或亲戚等非正式关系照看,但可资利用的日托机构也越来越多起来。1987 年,美国有 26 000 多家注册的日托中心(美国人口普查局,1989)。不过,许多日托中心是私人设施,是工商企业为自己的雇员所建。在美国到现在为止,相对来说几乎没什么公立日托中心,也几乎没有日托公共基金。事实上,一项调查发现,极度缺乏能利用得上又支付得起的日托中心,是今天城市面临的第三大问题(美国市长会议,1988)。

这种状况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儿童照料体系(child-care system)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了儿童照料政策,许多欧洲国家在实施广泛的日托计划。例如在丹麦,44%的 3 岁以下的孩子和 69%的 3~5 岁的孩子都加入了公立日托机构。

改善美国儿童照料体系的努力结果很不一样。在州一级,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成了提供日托机构基金的领先者,但许多州却根本没有制定计划。旧金山市最近启动了一项革新计划:现在,所有商业写字楼的开发商要么必须在同一地点建一个儿童看护中心,要么就必须为城市的儿童照料计划有所贡献。

从全国来看,要通过一项建立联邦日托服务体系的法律几乎没有什么机会。然而,比尔·克林顿总统在 1993 年 2 月签署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确实代表了一种很有意义的努力,它试图解决有就业妇女的家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这项法律要求有 50 名以上雇员的公司应允许雇员(无论男女)有 12 周不带薪的假期,去照顾刚出生的或刚领养的婴儿,或是当自己或家庭成员生重病时休息照料。休假期间,雇员有权享受连续的健康保险,当他们回来工作时,应得到原来的工作或同等的一份新工作。可是,这项法律只能使大约 40% 的美国劳动力得到好处;小公司的雇员、兼职工人、在公司工作不满一年的人,以及公司中 10% 的薪水最高的人处于法律的覆盖面之外(斯坎伦,1993)。

在美国,由于母亲对孩子的照顾减少,又没有父亲或公共服务来代为照料,这可能会对孩子产生持久的影响。于是,许多心怀忧虑的人,正在想办法使父亲更多地担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他们还试图为子女尚小的父母提供

更灵活的工作日程安排，并扩大儿童照料和发展的社区服务（加林斯基，1986；亨特和亨特，1982）。

双职工家庭

许多已婚妇女仍然只做兼职工作或是反复地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但是，现在双职工家庭的（dual-earner families）数量越来越多，即夫妇俩在一连续时间段里都持续从事全职工作。这些家庭中尽管妻子的时间安排可能与丈夫的不同，但通常是夫妇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双方的工作得到同等的重视（赫茨，1986；法瓦和吉诺维斯，1983）。

双职工家庭有几点优点。它为妇女提供了更广泛的就业视野，为孩子建立了更积极和平等的角色模型。它可以满足家庭成员“打破一成不变的角色关系，通过努力获得个人成就”的愿望（拉波波尔等，1978）。当然，双职工家庭的收入也更多。

不过，这些优点，往往伴随着紧张忙碌、压力很大的生活方式，特别对母亲来说（约翰逊等，1980）。虽然传统的性别角色期望已经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但是有研究表明，职业妇女仍继续承担着家务劳动、照顾子女和事务安排的主要责任（比尔比等，1989）。在美国从事全职工作的母亲平均每周工作40个小时，照顾家庭和孩子用36个小时（克劳特和佩里詹金斯，1986）。因此，当“既为妻又为母”的妻子，在照顾孩子、处理社会事务、做家务之间无法分身的时候，或为其他日常生活要求所牵扯的时候，双职工夫妇就需要想出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些所面临的特殊家庭问题（霍克斯希尔德，1989；纳尔逊等，1980）。

为了在就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有些妇女采取了“按顺序”变换角色的做法（卡多佐，1986）。典型的顺序就是：首先，妇女花几年时间建立自己的事业。然后她回家做全职母亲，这又是几年时间，之后她可能又开始做兼职工作。最后，又重新融入家庭生活。这种方式允许妇女“拥有一切”，但是当她离开就业岗位去养育子女时，也需要冒牺牲事业的危险。按顺序变换角色之所以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有赖于雇主允许妇女能有一段时间离开工作。

4

家庭暴力

今天家庭暴力的增加，是否是因为今天的美国家庭比早期更有暴力倾向，或是因为只是现在才对家庭暴力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这点还不确定。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家庭暴力问题的范围很广，报道事件的严重性和死亡数字都在升级（利斯塔尔，1986；利什曼，1983）。研究者估计每年有65万到600万的儿童受虐待（看到这个估计范围这么广很正常，因为数据很难得到）。光是禁止虐待儿童国家委员会收到的报告数量就从1983年的9万份（安德森，1983）上升到1988年的200多万份（参见表14—1）。

挨打的孩子并不一定是婴幼儿；受虐待的儿童平均年龄是7岁。十几岁的孩子也经常是受害者；一项研究发现受虐待的孩子中42%年龄在12岁和17岁之间（霍尔姆斯和奥尔森，1984）。高达90%的罪犯陈述他们在儿童时期受过虐待。

表 14—1

家庭暴力情况

	暴力种类	估计每年发生频率	受害者	施虐者
对儿童的暴力	身体上的虐待和忽视	超过 200 万;比例估计为每 1 000 名儿童中有 3.3 名。	越小的孩子越危险。很严重的虐待中 64% 的对象是 6 岁以下的,比较轻的虐待中 37% 的对象是 6 岁以下。9 岁以下的孩子中受虐待比率没有性别差异;9 岁及以上的男孩比女孩更易遭虐待。平均年龄:7.2 岁。	更多的女人是施虐者。女人实施的虐待要轻,男人要重一些。施虐者通常感情上比较压抑,容易激动。一半的施虐者接受公共救济;许多是失业者。施虐者通常比较孤独,缺乏社会支持网络。
	性虐待(为性交媾的爱抚)	比例估计在每 1 000 名儿童 0.7 到 1.4 个。	85% 是女孩,75% 是白人。受害者的年龄主要在 4 岁至 9 岁之间。	大约 95% 是男性;77% 是叔舅、兄弟和(外)祖父,23% 是生父或继父。更可能是单亲家庭;不大可能得到公共救济。
	乱伦	不详,但并不少见。	在一项调查中,28% 的成年妇女和 23% 的成年男子与家庭中的一名儿童有过性经历。所有社会阶级中都有。	几乎都是男性。乱伦的最高比例发生在兄弟和姐妹之间。继父比父亲要多。男性典型地是不正常家庭的成员,人格错乱或表现出性偏离行为。
	死亡	1988 年有 1 225 名。	平均年龄 2.8 岁。	
对成人的暴力	殴妻(踢、打、咬、恐吓、使用武器)	180 万(每 26 名妇女中就有 1 名)。	所有社会阶级和各个教育水平的妇女。	所有社会阶级的男人,虽然更多的是低收入者。有很高的比例是失业者。33% 在六个月内重复使用暴力。每年八个丈夫中有一名承认使用过较“温和”的虐待——推、抓、撞。
	婚内强奸	强奸最常见的形式,准确数字不详。	所有社会阶级和受教育水平的妇女。大多数还经常遭受非性虐待。往往是社会隔绝的,典型地在经济上有依赖性。	所有阶级和各个教育水平的男性。
	虐待丈夫(打、推、扔东西,用东西砸,很少但有时也用武器恐吓)	通常未见报道。估计都不相同;许多研究认为女人虐待男人要比男人虐待女人多。	许多情况下,男人也具有施虐倾向;两人组成一对暴力夫妇。	许多情况下,是自我防卫行为。
	虐待老人	50 万至 100 万之间。估计 10% 的老人受虐待。	多数是妇女,75 岁或更老;许多在体力上或精神上受到损害。	主要是老人的赡养者。多数是女性。儿子和孙辈的比率很小。

资料来源:迪堪里奥(Margaret DiCanio):《婚姻、离婚和家庭大百科全书》(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89);斯特劳斯(Murray A. Straus)和盖利斯(Richard A. Gelles):《两份全国调查所揭示出的 1975—1985 年间的社会变迁和家庭暴力的变化》,《婚姻与家庭杂志》,465~479, 1988;范哈赛尔特(Vincent B. Van Hasselt)、莫里森(Randall L. Morrison)、贝拉克(Alan S. Bellack)和赫森(Michel Hersen):《家庭暴力手册》(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8)。

虐待儿童并不是家庭暴力的惟一形式。夫妻之间的暴力是最普遍的形式。有些丈夫打妻子，有些妻子也虐待丈夫（斯特劳斯、盖利斯和斯坦内茨，1980）。

子女虐待父母或年长的家庭成员是家庭暴力的又一形式，近几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注意（科斯塔，1984）。虐待长辈有许多形式：体罚、精神上的侮辱、忽视、经济剥削，甚至还有性虐待（克劳特和佩里詹金斯，1986）。据报告，十位父母中就有一位遭受过子女的拳打脚踢，3%的父母报告至少有一次遭受过子女的暴力。这也就是说，每年有90万人受虐待（盖利斯和斯特劳斯，1988）。

对儿童的性虐待，直到最近还是一个禁忌话题，现在正被广泛报道。估计在美国至少有22%的孩子是性虐待的受害者（范哈赛尔特等，1988；克雷德森，1988）。虽然大部分事件发生在孩子自己家或邻居家，但有几件日托中心的性虐待案也已被发现了。至今最常见的情形是父亲对女儿，特别是对继女实施性暴力。最近一项关于父亲施加性暴力的研究发现，他们是典型的被社会孤立的、危险的人，他们对冲动的控制能力很弱，判断力差，对他们行为的后果极不敏感（凯伦·柯克兰和克里斯·鲍尔，1984；克雷德森，1988）。

家庭暴力并不是在整个社会中平均分布的——有些群体比另一些更有可能诉诸暴力（盖利斯、斯特劳斯和斯坦内茨，1980）。尽管非裔美国人兄弟姊妹之间的暴力相对很少，但是黑人家庭中虐待妻子的比率最高。年轻夫妇比年长者有更严重的暴力倾向（研究者认为，家庭暴力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年轻夫妇的数量很多）。

家庭暴力与收入有关。通常，家庭越贫困，就越可能诉诸暴力。收入与兄弟姊妹间暴力的相关性不太明显，但与虐待儿童高度相关。收入水平是影响虐待配偶事件发生率的最重要因素，很贫穷的家庭中发生率是很富有家庭的5倍（斯特劳斯、盖利斯和斯坦内茨，1980）。不过，收入水平在性虐待中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性虐待在中等或较高收入的家庭中发生得更多些。除非医生和其他专家，特别是私人医院里的医生，更愿意报告中等或较高阶级家庭中儿童受虐待的事件，否则关于收入与儿童受虐待之间的相关度的信息是不全面的。

只是到最近人们才认真探讨理解家庭暴力的原因。人们已经观察到，受虐待的儿童长大后通常也会虐待他们自己的子女，但是这种循环方式并不能告诉我们家庭暴力最初是怎么产生的。虽然我们需要强调指出，数百万靠公共救济的失业人员从不伤害他们的孩子，但是，与经济困境相伴随的紧张无疑在家庭暴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施虐症和神经病症因素也有一定关系（范哈赛尔特、莫里森和贝拉克，1988）。美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可能也间接地导致了对儿童的虐待，因为人们期望甚至鼓励对儿童体罚。如果太过分了，体罚就变成了虐待。核心家庭的相对隔绝，使得虐待可以相当隐秘，这也纵容了家庭暴力（卡泽纳夫和斯特劳斯，1979；盖利斯，1978）。

自从60年代早期以来，公众越来越意识到了家庭暴力的存在，人们正

在采取一些措施以减少它的发生率、减轻其后果。妇女群体为受虐待的妇女、儿童建立起庇护所。1977年,只有4个庇护所;到1987年就超过1000个。儿童虐待热线现在在多数大城市都开通了,通过它可以匿名地报告对儿童施暴事件。有一些机构提供了托儿所,并为那些想不再虐待子女的父母进行咨询。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广告正在定期地刊登在公众场所。禁止虐待儿童全国委员会相信,广告、热线和公众觉醒运动对于虐待儿童报告数量急剧增加起了作用。1976年,每1000个孩子中就有10.1个报告;到1987年,报告数量上升到每1000个孩子有32.8个,增长了212%(范哈赛尔特、莫里森和贝拉克,1988)。然而,资助这许多计划的公共基金的前景并不确定。

最后,应该指出家庭暴力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社会现象。一份报告指出,殴打妻子是世界上家庭暴力最普遍的形式,所研究的90个国家中,85%都有殴打妻子的现象,75%有对儿童身体虐待和惩罚的现象,而只有7%的丈夫挨过打。这些统计分析使学者推测到,受文化赞许的男性主导地位是殴妻的根本原因;并且,在相信邪恶的超自然精神的社会中,孩子最可能成为被严重虐待的对象(范哈赛尔特、莫里森和贝拉克,1988)。

保持单身一直是相对婚姻而言的一种选择,在今天的美国已越来越普遍。自愿保持单身有许多理由,特别是自从婚外性关系不再受到广泛谴责以来。一些男人、女人认为他们无法兼顾事业和婚姻,所以他们就选择了事业。另一些人保持单身是因为他们对父母有很强的责任感,或是因为不想要孩子,而且又找不到别的理由结婚。还有一些人不结婚是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虽然已经作出了一些努力允许两个同性恋结婚,但这种结合仍不被法律承认,不过现在美国有七个城市(包括洛杉矶和西雅图)通过了“家庭中的伴侣关系”法律,为登记注册的同居同性恋伴侣确认了许多配偶权利(包括保险受益、丧偶的遗产和税务信用等)(《新闻周刊》,1990年5月12日)。

异性同居作为相对婚姻或保持单身的一个选择,也越来越普遍。从1970年到1992年,未婚同居的数量已经从52.3万对增长到330.8万对,增长到了六倍多(《美国统计摘要,1993》)。今天,每10个18至29岁的人中,就不止有一个同异性未婚同居的(贝内特、布兰克和布卢姆,1988)。今天三十多岁的已婚男女中,有一半都有婚前同居史(伍德沃德,1990)。

正如人们所预料,研究已经表明未婚同居者通常不接受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布卢姆斯坦和施瓦茨,1983;马科斯基、克罗克和凯勒,1978;彼得曼、里德利和安德森,1974)。不过,同居往往是婚姻的前奏。在一项对约300名男女做的调查中,约一半认为同居是对两人是否相合的一种检验,是迈向婚姻的一个步骤(西梅瑞尔和卡洛尔,1982)。

婚前同居是否降低了拥有一个好婚姻的机会呢?有一些证据表明确实是这样的。使用瑞典数据的一项研究发现,婚前同居的妇女婚姻破裂的比率要比那些不同居的妇女高约80%(贝内特、布兰克和布卢姆,1988)。主要原因可能是同居者首先就不大会同意婚姻的传统习俗。

有些年轻人尝试群婚，就是三个或更多的个体在一个家庭单位中生活，共同享受性生活和个人的亲密关系。虽然这有一些同扩展家庭类似的优点（除了多种性关系外），但群婚很少有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个人之间有很强的冲突倾向（像嫉妒等）（康斯坦丁等，1973）。

就像本章所描述的，家庭这一设置在过去三十年中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少的人结婚了。那些选择结婚的人也很晚才结婚，并且很少要孩子。更多的婚姻以离婚而告终，单亲家庭急速增长。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或是未婚同居，因而“非家庭”户的数量急剧增长。1990年大约230万人独居，比1980年增长了20%多（美国人口普查局，1990a）。因为家庭更不稳固，且比以前持续时间更短，所以今天人们生活在家庭单元中的时间在他们一生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总体来说，有些人认为，这些趋势表明家庭这一设置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了。

虽然社会学家相信家庭仍很有活力，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在多数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下降（波普诺，1988）。随着生育率出现负增长，以及越来越多的夫妇选择不要孩子（这已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家庭作为生育单元的重要性已经消失了（里克斯，1989）。家庭曾经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机构，今天只是许多社会化主体之一了。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与家庭相比，电视和其他大众传媒，还有学校和国家，对孩子都产生着更为重要的影响（梅罗维茨，1985）。

照顾老人是家庭的另一项传统责任，但其重要性也下降了。与以前相比，今天有更多的老人独住。许多老人还搬到新开发的、按年龄隔离开的退休社区去住。还有一些在护理院或日间护理中心接受照料。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家庭成员个人通常变得更加自主，更不为家庭群体所束缚，就毫不奇怪了。家庭的一些权力和权威也已经让渡给了其他的设置，特别是国家及其机构。因此许多人已经有些不大情愿在家庭生活中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古德，1984）。

不应该把这些变化完全看作是否定的。许多变迁来源于妇女地位的改善，并且在婚姻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心理氛围，它可以在感情上使夫妻双方受益。不过，许多人还是关心近来的家庭变化对特殊群体（特别是孩子）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些家庭变迁已经同儿童贫困、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抑郁症的增多联系起来了。因为孩子代表着社会的未来，对他们的任何负面影响都特别重要。

最近家庭发展的趋势是否会在将来继续保持下去，这一点并不确定。今天大多数年轻人仍认为，包括孩子在内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持久的婚姻关系才是主要的生活目标。而且特别在美国，家庭观念仍相当强烈。寻找可以替代核心家庭的选择可能会继续，但是人们也同样会意识到，家庭仍是塑造人格、价值观和促使人们把握机会的推动力量。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功能主义者强调家庭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的社会设置。在小的传统社会里，家庭大多自给自足，并为多数成员提供物质的和情感的需要。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家庭的功能要少一些，但是在四个领域里仍很重要：社会化、情感和陪伴、性规范和经济合作。

2. 家庭在许多方面都很适合承担社会化的任务，它是一个亲密的小群体，父母通常都很积极，有动力。可是，家庭并不总能很有效果、有效率地完成这一功能。于是人们尝试了许多替代家庭的儿童社会化方式，但没有一项成功。在现代社会，对孩子和成人来说，家庭是感情和陪伴的主要源泉。性规则用于确保能有人对子女抚养负责，以及保证种的繁衍。家庭还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单元。在乡土气息浓厚的农村社会，家庭通常是生产的主要单元。在现代社会，家庭的主要经济行为是消费。

3. 冲突论者认为家庭是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场所，因而是社会中许多别的不平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不推翻，性别不平等就不可能减弱。

4. 世界上家庭结构中有许多变化形式。在描述家庭结构时，社会学家注意到亲属群体和家庭的区别。亲属，是指一些有着共同的祖先或血缘、或是有姻亲关系或养育关系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网络。虽然亲属并不总是生活在一起，以群体的形式发挥功能，但是，他们承认彼此之间具有某种责任和义务。家庭是亲属关系中（或类亲属关系中）相对较小的户内群体，是一个相互合作而发挥作用的单位。在我们一生中，大部分人都属于两种不同的家庭：出生、并进行大部分社会化的家庭叫出身家庭，因结婚生子而建立的家庭叫生育家庭。不同的社会对两种家庭的重视程度不同。

5. 核心家庭，即一个两代人的家庭，包括夫妇俩和子女，通常和别的亲属分开住，这在美国很标准。扩展家庭是一个包括了三代或更多代的成员的家庭群体。家庭结构的不同主要是由于经济因素。全世界的家庭结构正在逐渐朝核心家庭的方向转变。这种趋势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相关联。

6. 综观西方历史，家庭权威一直由男性执掌。父权家庭是大部分权威由最年长的男性拥有的一种家庭结构。而母权家庭则是大部分权威掌握在最年长的女性手中的一种家庭结构；这种模式并不是任何社会都具有的特征。有些社会的家庭是母主家庭。母主家庭就是指，一位妇女成为家庭的核心和最重要的成员。在现代社会，出现了朝平权家庭发展的趋势，即丈夫和妻子在权力和特权上基本平等。

7. 婚姻居所，即夫妻结婚后居住的地方，在不同的社会中也不同。有些社会的传统是从夫居：婚后夫妇俩住在丈夫父母的家里或与他们住同一个

社区。而在从妻居的社会里一切都要反过来：婚后夫妇住在妻子父母家里或所在的社区。几乎所有当代的美国夫妇是采用单居制的。在单居制里，婚后夫妇俩不与任一方父母或亲戚住在一起。

8. 亲属和血缘关系世代相传的方式就是世系。世系相传主要有三种方式。在父系继嗣中，家庭中父亲这一边是亲戚和财产继承的基础；男性沿男性一边继承财产。而母系继嗣，是指家庭中母亲这一边是亲戚和财产继承的基础；财产由母亲留给女儿。还有一种是双系继嗣，孩子们的亲戚与父母两边家庭相关联。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有权继承父母双方家庭的财产。

9. 所有的社会对性对象和婚姻对象的选择都有一些限制。乱伦禁忌是一种很强的道德禁忌，限制特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的性关系，这是全世界几乎都有的限制。许多文化要求实行内婚制，即必须是同一群体内部的人才能通婚；另一些则鼓励外婚制，即规定要同本群体之外的人通婚。虽然美国人认为伴侣的选择纯粹是个人的人事，但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人都选择那些经济、种族和宗教背景与自己基本一致的人结婚。这种婚姻方式叫同类婚。男人倾向于同比自己年轻的、文化水平比自己低的、职业声望不如他们的女性结婚，这就叫婚姻倾度。在西方社会中，建立在罗曼蒂克爱情基础上的个人选择已经代替了父母安排的婚姻（这仍是许多前现代社会的婚姻规范）。不过，许多专家意识到，与罗曼蒂克式的爱情相比，价值观的相容性为婚姻提供了更为稳固的基础。

10. 婚姻是社会赞成的一种配偶方式，通常涉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性行为和经济上的合作。美国的婚姻体系建立在一夫一妻制的基础上——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婚姻。同时包含了不止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婚姻叫多偶制。最常见的多偶制是一夫多妻制，一个男人有不止一个妻子。相反则是一妻多夫制，即一个女人有不止一个丈夫。多数美国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间会结婚，但是趋势是朝着晚婚发展，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根本不结婚。有证据表明在那些持久的婚姻中，婚姻幸福感相对较强。

11. 在美国婚姻破裂很普遍，对子女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虽然再婚率已经降低，但是多数离婚者又再婚了。美国的高离婚率与社会因素有关，如核心家庭的相对隔绝、地理意义上的高流动率、一直在变化的家庭和性角色、多元伦理、更自由的离婚法等。寡妇再婚并不像鳏夫那么多，寡妇经常会面临经济困难和适应的问题。

12. 人口与社会的发展趋势缩短了家庭生活周期中生育和抚养子女的阶段，单亲家庭和继父母家庭数量增加了，空巢期延长了，寡居期延长的机会也增多了。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已经改变了。这些变化会对儿童教育质量产生什么影响尚有待确定。已婚妇女就业数量上升被称做 20 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之一。双职工家庭（即夫妻俩在一段连续时间段里都同时持续从事全职工作）的数量越来越多。

13. 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的事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注意，报道也越来越频繁，但是这些事件增长的程度并不清楚。贫穷和经济困难与家庭暴力（特别是殴妻事件）有很强的相关性。

14. 替代婚姻和核心家庭的选择有保持单身、与异性同居和群婚。虽然家庭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它仍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设置之一。

推荐阅读书目

1. 伯杰 (Berger, Brigitte) 和彼得·L·伯杰 (Peter L. Berger.), 1984. 《家庭战争》 (*The War over the Family*. Garden City, N.Y.: Anchor.) 该书对传统家庭的防卫作了很好的描述。

2. 布卢姆斯坦 (Blumstein, Philip) 和施瓦茨 (Pepper Schwartz.), 1983. 《美国夫妇: 金钱、工作和性》 (*American Couples: Money, Work and Sex*. New York: Morrow.) 该书被广泛引用过, 总结了一项主要针对白人中产阶级夫妇做的大型调查。

3. 弗兰克 (Furstenberg, Frank F., Jr.) 和谢尔林 (Andrew J. Cherlin.), 1991. 《分裂家庭: 父母分手后孩子会怎么样?》 (*Divided Families: What Happens to Children When Parents P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该书对离婚给孩子造成的影响作了全面分析。

4. 盖利斯 (Gelles, Richard J.) 和克莱利 (Claire P. Cornell.), 1990. 《家庭中的秘密暴力》 (*Intimate Violence in Familie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该书报告了最近对美国社会家庭暴力所作的研究。

5. 霍克斯希尔德 (Hochschild, Arlie.), 1989. 《第二变动: 在夫妻都工作的婚姻中》 (*Second Shift: Inside the Two-Job Marri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该书对双职工家庭做了描述, 特别强调了夫妇在兼顾家庭任务和父母责任中所作的努力。

6. 鲁宾 (Rubin, Lillian Breslow.), 1976. 《痛苦世界》 (*Worlds of Pain*. New York: Harper.) 该书是在对 50 对夫妇进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写成的, 是一本研究工人阶级婚姻的具有广泛可读性的书。

7. 瓦莱斯坦 (Wallerstein, Judith S.) 和布莱克斯利 (Sandra Blakeslee.), 1989. 《第二次机会: 离婚后的十年, 男人、女人和孩子》 (*Second Chances: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 Decade After Divorce*. New York: Ticknor & Fields.) 该书纵向研究了离婚后的子女, 指出他们面临的问题。

8. 威茨曼 (Weitzman, Lenore J.), 1985. 《离婚革命: 对美国妇女和孩子来说未曾料到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The Divorce Revolution: The Unexpecte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n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该书令人大开眼界, 它分析了无过错离婚法律是如何造成了贫穷的女性化的。

是否有一度你好像一辈子都在上学？特别是，如果你刚结束高中生活就进入大学，那么你可能就会习惯于按照校园的生活节奏安排你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毕业后当意识到9月份并不是新一年的开始，5月也并不是这一年的结束时，就会觉得很奇怪。接受广泛的教育在现代社会中非常重要，几乎每个希望得到一份体面工作或是想拥有我们社会所认为的正常生活的人都需要接受教育。

广泛的正式教育在相当近的时间内才发展起来。在工业化之前，教育只在小范围内由精英群体享受。大多数人都不上学，没有文化。不过，现代劳动力市场性质的改变大大增强了正式教育的重要性。几乎80%的美国人受过高中教育，超过20%的美国人拥有大学学历。事实上，就像你可能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如果希望在广阔的专业领域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成功，那就需要在获得了本科学历之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而且我们进入学校的诸多理由之一就是使我们更容易受雇。就像功能主义者指出的那样，学校传授我们文化中的主要价值观，帮助我们学会如何与他人交往，首次为我们提供与科层组织接触的经验，而且学校把我们看住了，这样父母就可以去工作，而不用在家里照顾我们。

但是除了上面列出的作用外，教育甚至还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学校还是一个能治愈许多棘手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也许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为少数民族增加各种机会所作的斗争，这种努力在过去

四十年中改变了多数美国人的公众生活。尽管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少数民族的机会有了实质性的扩大,但是人们还是特别关注于学校是否能通过诸如禁止公共汽车乘坐的种族歧视,吸引不同种族同校学习、多元文化课程及赞助性行动等有争议的社会计划来确保机会均等这一目标得以推行。

另外,我们还试图利用学校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例如,通过像D.A.R.E.那样的信息课程以及反对酒后驾车那样的学生组织来解决浪费钱财的问题,通过性教育课程和在高中分发避孕套来解决青少年怀孕问题,通过为家长提供的特殊课程来提高为人父母的技能,甚至通过澄清价值观的课程来解决缺乏道德理想的问题等等。并且,为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有平等的机会(至少是还过得去)与其他人竞争去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我们便为这些孩子设立一些专门的奖学金或提供类似的援助,而学校正是这个方面的主要工具。

不用说,就完成这些任务而言,美国的学校比其他机构更有效。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及相关内容。我们先比较功能主义与冲突论关于教育的不同观点。然后考察在美国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教育安排的一些独特方式,并提出现代教育的多种重要趋势和观点。最后就关于教育对收入和价值观、态度的影响进行一些分析。

社会学视野中的教育

学习(learning)是一生中的社会和个人经历,它将改变一个人的知识、态度和行为。没有一个社会会让这样的经历任其发展。教育(education)是一个社会指导这样的学习经历的正式设置。

教育活动的范围很广,小到父母教孩子骑自行车,大到一名教授给800名学生上物理课。现代社会建立了复杂的正式教育组织,并雇佣了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教育活动,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除正式教育的义务。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教育这种设置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大的控制力量之一。

像家庭一样,教育也非常适于用功能论来进行分析,我们就从这一视角开始对教育的讨论。

1

功能主义 的观点

在组织上和内容上,世界上的正式教育都呈现出多种形式。例如,英格兰的夏之山(Summerhill)(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宽容”学校),结构就很松散。孩子们可以自由漫步,只上那些感兴趣的课程。相反,在一所严格组织的法国中学莱西学校(lycée)中,孩子们有时得记忆法国古典戏剧中的大段篇章,并且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练习写作。在中国,教育往往与有组织的练习、工厂的工作和打扫学校等“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联系在一起。

尽管有这些不同，三个国家中的学校都有非常类似的社会目的或功能。教育有五个主要的社会功能：(1) 社会化；(2) 社会控制；(3) 筛选和分配；(4) 对外来人员的同化作用；(5) 社会革新和变迁。

并不是每个教育组织都具备所有这些功能；有些学校更专门化。这种专门化与该组织在教育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有关。一个极端是幼儿园，其主要目的是社会化；另一个极端是以研究为目的的博士后流动站，主要强调革新与变革。

社会化

人们对教育最为熟悉的社会化功能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从最狭隘的意义上说，这就是职业训练。例如，在非洲马布提 (Mbuti)，父亲教儿子怎么做笔直的箭杆，怎么把箭头安全地安在箭杆上，以及怎么用箭射中移动的目标。美国的职业高等学校教学生怎样修汽车引擎或如何开动钻机。马布提男孩学习如何当一名猎人；美国人学习怎么成为一名机械师。他们学的都是能帮助他们生存并对社会有用的技能。

在依赖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专家的现代工业社会中，让新一代人学会大量知识和技能非常重要，尽管多数知识和技能并不专门与某个职业有关。因为这些知识非常广泛，所以在这些社会中接受正式教育要花许多年时间，而且因为知识内容更新频繁，所以父母很难给孩子教授这些知识。这样，就需要专门的人员（如一名八年级的理科教师）和专门的教育机构（如工程学校）来传授知识。

知识的传授就像是一座冰山的顶端，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教育。学校中的大部分活动，读课本、做报告、参加考试、收到成绩单，都被认为是传授知识。在学校“干得好”往往意味着学会了课堂上所传授的东西。但是，就像我们曾经指出的，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远远比这些要多得多。他们还学到文化价值观和规范，这个过程有时被叫做隐含的课程（里科那，1988；布劳迪，1987）。

人们期望学校教会学生诸如民主、法律条文，甚至包括关于一夫一妻制婚姻的重要性等价值观（瓦莱，1932，1961）。规范的社会化（即传授价值观和观念）也暗含在孩子阅读的材料以及被允许的行为中。

例如，当大学英语课上学生们阅读海尔曼·麦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的《莫比·迪克》(Moby Dick)，学习 19 世纪新英格兰人的航海亚文化时，当他们阅读阿柏船长 (Captain Ahab) 苦苦追逐大白鲸的故事时，他们同时也学到了美国人的善恶观。老师可以让同学们讨论其中一些观点；另一些观点留给学生推断。无论哪种方式，结果都将是越来越熟悉美国的一些重要价值观。

社会控制

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不仅限于传授价值观和规范。大家认为学校还应该教导学生必须按照这些规定行事（戈斯林，1965）。事实上，给学生评分并不只是由他们学得有多好所决定，还取决于他们合作得怎么样，是不是遵守秩序，甚至包括是否讲卫生。这也是隐含课程的一部分。在学校的头几年里，

这些通常是他们评分的惟一标准。如果孩子在上二年级或三年级前不能按特定的规则行事（如那些要求合作和卫生的规则），那无论他们功课有多好，在学校的日子也很可能不好过。通过这样的社会化过程，学校就直接参与了社会控制。他们试图给学生灌输忠诚的观念，要服从权威，甚至是屈从（罗特斯坦，1987；威尔斯，1981；拉斯坎，1972）。

学校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办法，就是教孩子将国家元首理想化。当权者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形象出现。冲突论者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发展大众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鲍尔斯和金提斯，1976）。

对教育来说，这种功能是否合适？当然，如果要将人们适当地整合在一起，任何国家的人民都需要对它的核心政治设置有一个合理的认同。但另一方面，对某个领导人盲目忠诚会妨碍政治变革的阶段性需求，以及消除腐败和低效所做的努力。

教育的社会控制功能大大地超过了社会化的功能。学校也作为年轻人的“监护”机构，在一年中的许多日子里，在一天中的许多小时里，使孩子们不是在街上到处游逛。另外，放学后的活动经常使这段监护时间延长到更晚。

学校还试图引导年轻人从事社会认可的活动。当孩子表现出在不被认可的领域感兴趣或被认为有“行为问题”时，那么学校可以严密监视他们好几年——例如在每升一个年级时都提醒他们的老师。

筛选和分配

将人们筛选分配到特定的职业岗位上去的责任落在了学校身上。这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因为现代社会有成千上万个高度专业化的职位角色，如果没有合格的人，那工作就没法干；如果合格的人太多了，那失业率就会上升，人们的才能就浪费了。

在美国，筛选、分配的机制就不那么正式。例如，商业性质的中学和大学选择所开设的课程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供需关系。如果对某个特定专业的需求降低了，那么就应该减少或是删掉这个专业的课程。而对需求大的领域，就应该增加新课程。过去20年中与计算机相关的教育课程急剧增加，就是这种方式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而，要知道到1995年仍需要许多计算机程序员，以及对他们提供训练课程，可这并不能解决该挑选哪些人来从事这项工作的问題。虽然最终要由个人决定是否准备从事并接受某一项工作，但是教育的主要功能仍是挑选人才并将他们输送到各个岗位上去，以及帮助学生学会有用的、合适的工作技能（莱尔施，1988）。

高中和大学都雇佣了受过专门职业指导训练的职员。大学保留了职业部，在那里学生可以获取关于就业和工作机会的信息。大学还对政府和工业部门的新成员敞开大门。

同化

在文化多样化的社会里，如美国，教育的另一项主要功能就是在同化（assimilation）过程中起作用——将新成员吸收融入主流社会。教授英语、美

国历史和美国传统是一种办法。更为微妙的同化方式是传授爱国主义。通过面对国旗举行宣誓效忠的仪式、展览总统的照片、在集会或体育赛事之前演奏国歌等办法来灌输爱国主义。

教育是主要工具之一，通过它许多移民已经完全参与到了美国生活之中。今天学校的同化作用也指向了美国主流社会中的穷人、残疾人等，无论他们是否是新近的移民。

有一些反对者认为美国教育的同化目标被过分强调了，现在需要保护文化多样性（麦科马克，1984）。这些批评者呼吁，不应把文化少数派成员看作“问题”，美国应该尝试更加强有力地保持自己的亚文化。许多大学、学院中对种族研究的浓厚兴趣就反映了这种立场，就像在许多小学、中学中试图开展双语教学那样。

革新和变迁

从对教育前四个功能的讨论中大概可以看出教育这种设置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维持现状。确实是这么回事。教育更多的是一种保守的社会力量。然而，在某些方面教育确实促进了社会变迁。而教育促成这种变迁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创造、传播新的知识、价值观和信仰。

最熟悉的创造知识的例子就是大学教授所做的研究。除了教学，教授领导一些研究，这将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里增加新的知识。这种研究通常是受政府的支持或接受私人基金会的委托。

有些研究是基础性的，即它并不是应某个特定的实际需要而设计的，而是要揭示现实的最基本规律。社会学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研究小群体行为的一般动力学。另外的研究则是应用性的，即要解决某个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例如，社会学家做一些研究以便发现教导学生避免尝试毒品的最有效办法。无论是基础性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一旦研究完成，获得的知识通常都将通过文章和书的形式在学术机构之外传播开来。

一些对高等教育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美国的大学太注重研究了。他们感到这种强调使得大学远离了其他应有的功能。例如，教授有时只是由于他们的研究能力而受雇，而导论性的课程经常是由没什么经验的研究生来上。在美国每一所大规模的大学中这已经成了一个问题。

不过，还是有几条理由来为大学强调研究加以辩护。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和知识主导的社会中，创新研究很重要。虽然多数学生没有亲身参与研究活动，但是创新研究不断地刺激知识的增长，学生能间接地从中获益。同样地，从实用的观点来看，研究项目为大学吸引来了经费，这些经费使学院可以雇佣更多更好的研究人员，拓宽课程领域和改进教学设备。公司和基金会给予的最大捐赠通常是给那些拥有最具影响力的研究项目的大学。无论是好是坏，一所现代美国大学的经济都极大地依赖于它的研究能力。

除了新知识以外，教育组织还创造并传播新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些可能是社会变迁的潜在发动者。例如，科学是一个信仰体系，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学校体系这个媒介。

教育促进社会变迁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它鼓励一种批评的氛围，这种环境

中人们可以批评或者背叛原来的社会制度。这种环境在许多学院和大学中都存在,例如,贝宁顿学院的一项经典研究(纽科姆,1943)发现学生越接近毕业,就越倾向于接受老师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观。

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多数校园里学生的观点则更加保守,更倾向于接受社会现状。威廉姆斯学院一项对男生的长期研究发现,在70年代中期以后,学生很明显不太关心社会和政治事务了,而且在道德和宗教上也更为保守(黑斯廷斯和霍根,1986)。另一项研究发现,新生的态度在1970年和1987年之间变化很显著。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学生人数从1970年的34%降为1987年的22%。认为自己是“中间派”的人数则从45%上升到56%(美国人口统计署,1989)。近来有些迹象表明钟摆现在开始朝着更自由的方向来回摆动了,但是立即回复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许多校园中广泛流行的左翼观点,好像还不大可能。

2

冲突论的观点

我们已经用功能主义的观点考察了教育和教育体系。但是功能主义的观点倾向于将教育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最小化。要讨论教育的“另一面”,我们必须转向冲突论,这种理论认为教育是统治者维护自己地位的主要手段之一。

冲突论者并不去确定教育在社会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目的,而是把教育看作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通过控制入学资格(巴兰坦,1989)和训练出驯顺、守纪律的工人(罗特斯坦,1987),使社会不平等永远存在下去。达到这些目的的两个重要途径就是分班和文凭主义。

分班

就像功能主义者所指出的,学校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选择学生并分配到不同的专业领域去。这么做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分班(track-ing)——依据学习成绩,把学生分成不同的组或班级。事实上从孩子一入校门这个选择过程就开始了。早在一年级,学校就开始进行常规正式考试和评分。那些考试成绩好的学生通常比普通班以更快的进度、更丰富的材料上课。他们也许还要做附加的独立功课——读书或准备报告。学生考试成绩不好可能就会被安排在慢班。这些学生通常学习不太难的功课,得到老师的特别关照。表面上看分班的目的是保证每个学生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避免使学得快的学生感到枯燥而学得慢的学生有挫折感。

分班在初中和高中尤其普遍,在这里分班往往采取与大学和职业轨迹相联系的形式。虽然这些计划都是好意,但是冲突论者指出,分在慢班的学生往往会感到他们在任何需要广泛教育或专门知识的事情上不可能成功。他们的职业渴望渐渐消失,长到一定岁数时,往往会辍学。

对冲突论者来说,分班真正的问题在于,有大量证据表明慢班中少数民族学生和来自较低阶级的学生与人口构成不成比例(索伦森,1989;帕索,1988;李和埃克斯特龙,1987;范福森、琼斯和斯帕特斯,1987;奥克斯,1986)。因此,分班制度倾向于保护现存的不平等,而不是帮助差学生不断向上流动。贫穷的学生在慢班中不大可能受到鼓励和高质量的教育,而且往

往支付不起继续上大学的费用。这些学生因此也不能竞争获得高薪水、高声望的工作——这些工作通常都被那些获得昂贵大学学位的人占据着。这样看来,贫穷和不平等的循环通过教育体系得到了强化。

文凭主义

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指某一职位要求申请者必须拥有高学历。功能主义认为,文凭主义是确保最有能力的人受雇于重要岗位的一种办法。而冲突论者则相反,他们认为越看重学历,就越忽视干工作的能力。一项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研究发现,虽然教师的平均资格水平上升了,但是影响所有工作的文凭“浮夸”现象事实上降低了教师的地位(菲尔森,1988)。同时,虽然研究表明那些拥有高学历的人平均收入要高于只受过基础教育的人,但是这种区别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实在的。

文凭主义也曾因为加剧了关于教育的神话而受到批评,例如,拥有较高学历必然表明更智慧,而不仅仅是接受了更高一级的教育而已。另一些批评者认为有些有能力或甚至是很独特的人也会被某个工作岗位拒绝,就因为没有必需的学位,这就是当代对文凭过分信赖造成的后果。最后,许多冲突论者认为,获得较高学历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几乎就保证了传统上需要多年学习的一些高薪职业(如法律和医学)始终不公平地集中于那些能支付得起这种多年学习费用的精英阶层。

因此,冲突论者认为美国教育本质上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常常是不公平的过滤体系。在每一个层次中,慢班和少数民族学生很可能退学比例很高,而中产阶级和白人学生则被鼓励继续学下去(李和布里克,1988;霍奇基斯和埃贝思特,1987;詹克斯和里斯曼,1977;帕森斯,1959)。

冲突论者认为美国教育体系还有其他缺点,包括以下几点:

1. 学校和学院对诸如记忆力好和超常的考试才能等技能给予很大的鼓励。可是在许多地位很高的职位中,这些特点并不如创造性或领导才能那么实用。

2. 考试是用来测量智力和能力的,但往往做不到这一点。除了低智商,有许多理由(如动机水平低、由于紧张而分神)使得孩子在标准智商测验中得低分。因此孩子的真实智力水平不能完全由这样的考试来反映。

3. 有时教育体系阻碍了那些大器晚成者的发展。因为他们已经被分在慢班,被引导去地位低的岗位工作,所以这些人获得很高的职业目标就非常难。

美国教育体系并不是惟一维持不平等的教育体系。冲突论者指出,例如,英国“公共”学校(与美国的私立学校类似)的位置大多被来自较高阶级的学生占据着,这样的学校强调很高的学术标准,并赋予他们的毕业生很高的声望。能进入这样的学校是被名牌大学接受的很重要的第一步。因为较低阶级的成员支付不起这种学校的学费和他们提供的社会网络机会,所以较低阶级成员进入高等学校——进而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很有限。事实上,很多研究都表明社会阶级是教育中的一个因素,全世界都一样(达西尔瓦,1988)。

二 教育组织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考察当代美国教育结构的几个方面内容。首先简要讨论教育发展全球化的一些后果，然后分析教育组织的基本逻辑。其后讨论关于政府支持和父母选择的一些观点，最后分析教师和学生的角色、以及评估学生表现的手段。

1

教育的普及

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完成了越来越长的正式教育。1959—1960 学年，在所有美国教育机构注册的人数是 4 520 万人。到 1990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6 080 万人，上升幅度超过 34%。这种增长部分地是由于学龄人口的增加，但也反映了教育参与程度的提高。

美国人口中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数比例增大了，这可能是最明显的教育普及趋势的标志。1900 年，只有约 7% 的年轻人完成高中教育。今天人口中的大多数——约 79.4%——高中毕业。1990 年 25 岁或再大一些的人接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已达到 12.7 年（《美国统计摘要，1993》）（参见图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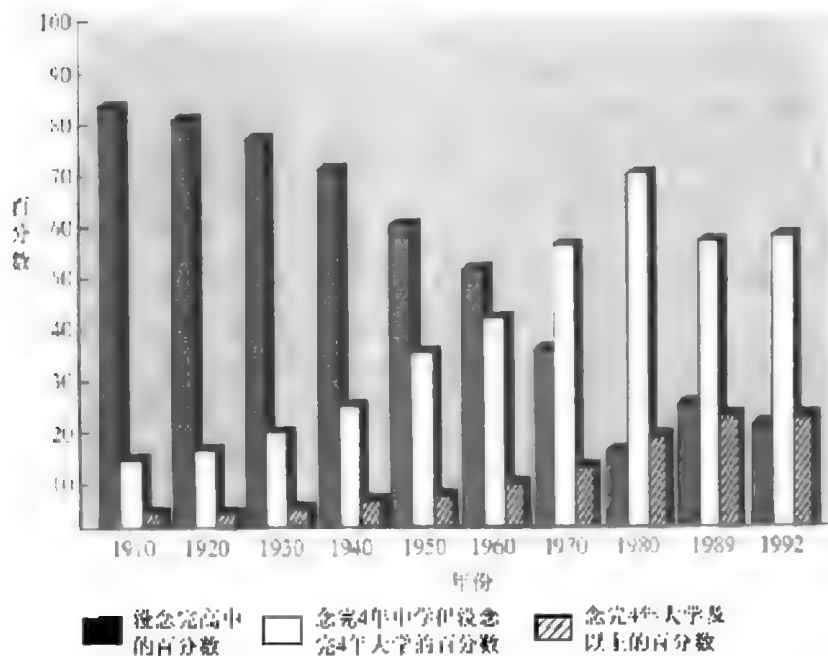


图 15—1 1910—1992 年间学校毕业人数水平

资料来源：托马斯·D·斯奈德 (Thomas D. Snyder)：《教育统计文摘，1987》(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1987)；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3》(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虽然并不是每个念大学的人都能拿到学位，但是大学毕业生人数在 20 世纪已经增长很快了。1900 年，3 万人获得学士学位；1940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36.2 万人；到 1990 年就达到了 105 万人。获得更高级学位的人数也增加了。今天所有获得大学学位的人中几乎有四分之一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要实现教育普及，学校就不得不放宽文化成绩的标准，特别是中学和大学。标准的降低——伴随着课程也重新定位在对更多学生有用的专业上——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那时在校注册人数首次开始迅速增长。

在过去几十年中，文化成绩标准的持续降低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美国人由于 50 年代前苏联在空间领域取得的成就而惊慌，害怕我们的大众教育系统会导致质量的降低。因此，全国范围内作出了许多努力来提高公众教育水平，主要是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持这个办法。最近几年语言和数学能力标准化考试分数的下降已经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又要提供普及教育又要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水平，这个两难困境始终没有解决。一个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智力天才和智力障碍学生的课程之间取得平衡。但是平衡点并不那么容易确定，而且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学生往往有被忽视的危险。

2

美国的教育组织

在美国，公立小学和中学的正式组织包括两个主要群体：直接负责学生教育的教学人员和负责协调教师行为的行政人员（即校长和行政助理）。在校长之上是学监，即必须协调本地区所有学校行为的行政长官。学监受雇于校董事会或教育委员会并对其负责。委员会成员通常由每个地区的选民选举产生。有些情况下，由经选举产生的城市长官（如市长）任命委员会成员（巴兰坦，1989）。

在教师和校长层面上，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有同样的组织。但是在责任链上再高一级的环节是资助学校的组织——如教堂（如果学校是教区的）或是董事会（如果学校是一所独立的私人机构）。

美国学院和大学的组织与小学、中学教育体系中的组织大相径庭（帕森斯和普拉特，1973）。在高等教育中，教师组织有更明确的等级制度，顶尖级职位的薪水更多，特权也更多。其结果是，比起小学和中学教师队伍的一般情况，大学教师的职位更具有竞争性。另外，大学中的教员有更大的自由。行政人员——校长、财务主任、系主任和注册主管人——集中关注募集和分配资金、录取和管束学生、修建新宿舍和教室等事项。不像中学校长，大学校长很少直接监督教师。课程设置、教学责任的划分以及雇佣新教师等通常都由教学成员决定。

在一所学院或大学中，对学校运转和政策作出决策的最高责任往往并不像较低教育层次那样被清楚地界定出来。因为州政府支持的学院和大学使用公共基金，所以他们必须向州立法机关和州长述职。但是在私立学院，校长对制定政策的校董会负责，这与商业公司中的组织方式类似。不过，在公司里，董事会最终对股东负责，只要多数票通过，股东就有权撤掉不满意的官

员。私立学院的董事对任何外部组织（大概除了给学校捐赠的校友或别的什么人）往往没有明确的责任。

3

教育组织模式

在现代社会里，多数教育组织的结构变得相对科层化了（参见第七章）。所有活动按其功能被区分开来：教师教学，而行政人员监督。人员的雇用和升职以专业技能为基础，从学校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到监护人，其权力划分非常明确。而且学校按照必须严格遵守的固定规章行事（比德韦尔，1965）。

这种科层结构引起许多争议。有些人认为教育组织是有效的、合理的，因为它对贡献最多的人给以回报。事实上，有些观察家甚至认为还需使教育进一步科层化，这样学校才能像“不漏水的船”那样运行（帕雷利于斯等，1987）。可是，另一些人认为教育的科层机构很不灵活，效率也不高。他们认为这些组织并不能很有效地对社会变革作出反应或适应当地需要，而且科层机构遏止了创造性，将自身淹没在毫无意义的、无尽的文书当中（罗特斯坦，1987）。

教师经常抱怨公立学校体系的官僚机构妨碍他们充分进行真正的教学。他们认为，文书工作往往把教学时间变成行政时间，教学时间经常被占用来填写座位表、签到表、缺席和扣留报告等，高等教育中还有委员会工作。而且行政管理人员和办事员事实上经常指示应该教什么以及怎么教（巴兰坦，1989；罗杰斯，1969；戈斯林，1965）。

不过认为教育组织过于科层化的观点可能言重了。很明显，教育组织与政府、商业、工业组织有本质区别。有些学者认为教育组织是一个“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体系”（韦克，1976），这其中不同的部分（如不同的系、所）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只不过是松散地结合在了一起（古德兰，1987；泰勒，1985）。另一种模式想象学校是按照棒球队的结构组建起来的——其中团队整体的努力与个人表现同等重要，而且“经理”（学监、校长等）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发挥“队员”（教师和教辅人员）的才能（蒂马，1989）。

4

政府的支持和父母的选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受政府支持，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方面。公立学校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地方政府，地方财政要负担教师工资、教学楼和教学设备等。部分地为了平衡地区间的差异，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已经越来越多地介入了公立教育。这两级政府的资金用于：提供在校午饭，改善数学和理科的教学，为低收入学生购买上学的必需品，甚至还有建造新教学楼等。另外，多年来联邦政府已经建立并资助了一些专门项目，以解决低收入学生、残疾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的社会问题。

虽然私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和私人捐赠，但也得到了一些政府资金，用于公共交通和供给残疾儿童等。多年来，非公立学校的政府资金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个原因就是多数非公立学校与教会有关，政府资助它们会破坏政教分开的原则。占优势的看法是，虽然政府可以为教会学校提

供额外福利、甚至还有课本等，但政府不能直接捐助宗教项目。

因为几乎所有的美国公立小学和中学都得到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某项支持，所以它们也不得不接受政府越来越多的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制定了教师合格标准，还坚持要把某些政策——如反种族隔离——作为财政支持的条件。有时也只有某些科目能得到政府资助，所以州和联邦政府间接地影响了学校开设的课程种类。

公立学校有时被较高级别的政府当作实现重要社会计划的一个舞台。融合美国黑人和白人就是这样的一项计划。另一个例子就是为残疾儿童提供补偿教育的计划。同时，公立卫生机构还利用学校广泛接种疫苗，开展免疫工作以防止传染病。

一些美国公司现在也为公立教育提供资金，这成为政府资金很小的一个补充，然而却是潜在的重要补充。它们还游说议员使政府增加教育资金，目的在于生产出不仅有知识而且也能进行创新思维的劳动力大军。

公立学校的社区控制

在大多数现代社会里，有关教育的多数决定通常都由中央政府部门作出。而美国则相反，它强调社区控制（community control）这一传统，即社区居民可以直接影响他们孩子所在公立学校的行为。但这种控制方式争议很大。

一般地说，美国公众更喜欢社区控制而不是华盛顿或州首府的投入（盖洛普和克拉克，1987）。有些社区居民抱怨，当地公立学校并没有听取他们关于该给他们的子女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建议（格林和雷维德，1987；安德鲁斯，1987）。例如，许多少数民族和种族群体，希望有更多的针对他们特殊需要的课程。他们希望学校在该安排哪些课程、雇用什么老师、该采取何种纪律手段等问题上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成功的教育是地位较低的群体向上流动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的共鸣。

不过，许多老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反对不断扩大的社区控制，他们认为，要作出有关教育方法和教育政策的重要决定必须要有专门知识。他们还说，使“政治”远离学校很重要。市政官员也经常反对扩大社区成员对教育的影响。他们认为学校的集中管理对效率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他们担心当地的控制会加大教育成本，给预算带来压力。

父母、学校官员和市政府之间的冲突有时会变得很激烈，特别在大城市里。有时它表现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问题，这使美国教育中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更加恶化（安德鲁斯，1987）。

教师

教师的角色会如此复杂，不禁令人惊讶。教师对校董事会来说是雇员，对校长来说是下属，对别的老师来说是同事。对学生来说，教师肯定不只是维持纪律的人、裁判、知己、提供道德标准的人和父母的代替者，还是一个能有效交流的、有知识的人。

一段时间以来教师的公众形象已发生了急剧变化。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

5

教师和学生 的角色

期,教师曾是手里拿着一根教鞭的严厉的男老师;毫无幽默感、古板严谨的女教师;心不在焉的教授;受人尊敬的学者;以及富有同情心的青年导师。在一篇关于教育的经典社会学报告中,维拉德·沃勒(Willard Waller, 1932, 1961)分析了作为监工的教师,以及师生之间统治与服从的制度化关系。

无论在哪个特定时点上什么形象会占主导地位,美国人对教师的认识都是不现实的。父母希望教师参与社区生活,但又不能具有社区中的缺点(哈维格斯特和纽加顿, 1978)。他们还希望教师有强烈的价值观,但又要在有争议的公共事务上保持中立、客观。

另外,今天教师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怀疑,即认为他们并未受过良好的训练和教育。最近几年,打算念教育专业的高中高年级学生在学习才能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中的平均分是812分(数学和语言)(满分为1600分)。这个分数比全体高年级学生的平均分893分低。此时,教育专业的学生受到普遍嘲笑;甚至一个教师联合会的主席也说,他的大多数同事“如果没有经过教育训练可能会过得更舒适”(威廉斯, 1984)。

当然还是有不少有知识、受过良好训练的老师。尽管如此,教师的公众形象仍然直线下降,相作随的便是愿意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人数也直线下降。1970年,20%的大学新生愿意教书;1982年只有5%。另外,过去多数学习好的女生选择教师这一职业,现在已经转向从事其他职业如法律、医学和工程学了(威廉斯, 1984)。

学生

在一所典型的学校里,学生角色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有些学者认为独立性和成就是其主要特征(迪里班, 1968; 帕森斯, 1959)。另一些人对此则不太那么理想化。一位人类学家认为,做一名好学生的关键就是简单地“满足老师的要求”(亨利, 1955)。在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像海军新兵训练营一样的幼儿园》(Kindergarten as Academic Boot Camp)中,作者提出一个观点,即学生角色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默默地服从”(格雷西, 1970)。孩子们最早在幼儿园里学会这么做,很像新兵在海军新兵训练营地学会如何当一名好战士那样。沿着类似的思路,还有一些别的学者指出,学生角色中最突出的特征是耐心(布科克, 1980)。

无论我们怎样描述学生这个角色,按照学校的观点,学生能适应这个科层体制才是重要的。这意味着学生必须学会这些规范,诸如准时、尊敬师长、学习上诚实等。

学生亚文化。学生通常会形成他们自己的亚文化,部分是出于对学校科层设置的一种反应,部分是由于学生们会遇到许多共同的经历和问题。事实上,通常任何一所学校中都有许多学生亚文化。这些亚文化所采取的确切形式与学校及其所服务的社区的特征有关,也与学生对自身角色的认识有关。

詹姆斯·科尔曼所做的一项经典研究(1961)指出,许多学生亚文化系统地拒斥成人的学术价值观,而且其对同伴的影响要远大于老师的影响。科尔曼发现,大多数男孩认为运动上的成功比取得好的学习成绩更有价值;女孩则会通过假装不太聪明、不太用功来吸引男孩。

另一个著名的研究项目揭示了一所医学学校里的学生亚文化是如何发展形成的。在这所学校里，所有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单独的一个群体来对待的。每个学生都上同样的课，交同样的作业，参加同样的考试。而且似乎每个学生承担的负担都太重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承受着同样的压力，所以他们往往会互相影响。经过讨论，他们决定采取集体行动——只交那些他们认为合理的报告和其他作业。这一集体行动最终被老师接受了。这样，通过形成一种强大、积极的学生亚文化，这些学生实际上能够调整他们的受教育计划（休斯、贝克尔和吉尔，1962）。

但是这所学校的环境并不典型。在组织程度不那么高的学校里，学生亚文化可能不太积极或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在大多数学校都有多种学生亚文化。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三种青少年亚文化在全美几乎所有高中都有所表现，即学术亚文化、娱乐亚文化和违法亚文化（科恩，1979）。

学术亚文化（academic subculture）是由那些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想上大学的学生构成。作为学校学习带头人，他们参加许多学生会的工作，编辑学生报纸、文学杂志，参加辩论队，以及其他类似的学生组织。

娱乐亚文化（fun subculture）是由那些热心于体育、约会、聚会和学生组织的学生构成。他们是学校最受欢迎的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们参加体育运动和学生会），而且通常取得相当好的学习成绩。

违法亚文化（delinquent subculture）是由那些拒斥学校中一些学术和社会价值观的学生构成。多年来，他们曾被称做“长发飞车青年”、“嬉皮士”或朋克，尽管这些标签每几年就会发生变动。这些违法群体普遍有一种反叛态度，指向权威、结构、遵从社会习俗的行为以及中产阶级价值观（他们认为这种价值观过分强调上学的重要性）。他们强烈反对规则，但他们自己群体制定的规则除外。这个亚文化的成员常常对行为规则严格执行，例如对朋友忠诚，另外他们保持服装标记，标明他们的群体成员独树一帜。

就像在较大的社会中一样，等级制度往往会在学生亚文化中形成。一个群体拥有或是被认为拥有的权力越大，那它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就越高。这些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学校之外社会中各因素的关系，其中的界限往往根据种族、性别、性取向、宗教和政治信仰等来划分。但是学生看待校内这些划分标准的方式并不必然反映他们在校外（如从父母那）所学到的。例如，有一项研究发现学生比他们父母更能接纳其他种族（格兰特和斯里特，1988）。另一个项目主要研究了一所在一个澳大利亚的男校高中里的四种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中三种分别代表其成员都很在行的三项特殊的体育运动，第四种是“三个朋友”，被蔑称为“娘娘腔男人”。研究者发现，前面三个亚文化群体对第四个群体容忍程度最高的是人种最混杂的那个群体，这就意味着多样化的个人经历使人们对个人或群体差异有更大的容忍度（沃克，1988）。

6

对学生的评价

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学生一直都在受到评价。这个过程细节因年级

不同而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测量，分类，往往还要贴上标签。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玩耍的时候就有人观察他们。老师对每个孩子能力的印象都记录在一份永久档案中。指导顾问和老师写下评语。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长，就运用其他一些评价方法。学生的档案伴随他们从一个年级升到另一个年级，往往还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

除了这种正式的书面记录外，学生还有一个非正式评语，在老师之间传递。学生被认为是“领导人物”或“喜欢专权”或“热心肠”或是“多愁善感”等等。这些标签会伴随他们直至校园生活结束。

这种评价过程的两个根本方面对学生至关重要。第一个方面就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会反映出多少文化定势的影响。就像教师周围的社会成员一样，教师很可能同别的人一样受定势的影响。这一点会对学生产生什么影响？假定教师在对两个不同的孩子（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所做的同样行为进行评价。例如，两个孩子都没有按顺序发言，老师是否会认为白人孩子“很活跃”，而黑人孩子“不遵守纪律”呢？一名男孩对同学发号施令会被看作是“有领导才能”，而女孩这样做就被认为是“喜好专权”吗？这些例子只是提示了评价会反映文化定势。

对学生评价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事实上这些评价能对学生行为方式产生多大影响。在一个广泛报道的研究中，所有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参加了标准智商测验。可是老师被告知这是一个特殊的测验，能够预测出极端聪明的人。然后随机选择一些学生（而不是根据考试成绩选择），但同时告诉老师这些选出的学生会成为成功的人。几个月以后这个智商测验重复了一次，第二年又重复了一次，结果表明那些被期望会取得好成绩的学生确实取得了好的成绩（罗森塔尔和雅克布森，1968）。

这项研究在学术界内外引起了一阵轰动。后来，试图重复试验结果的尝试并不成功，这便引起了对首次试验结果效度的怀疑。不过另一些研究得出了类似结果。另外，小学教师对学生形成的刻板印象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往往形成了学生今后被分在快班和慢班所依据的重要基础，这种班级的分配往往会成为自证预言。这样，每个学生在教室里被对待的方式就会影响他们自我认知的方式，以及他们在考试中的表现。已经表明，这种认知与学生辍学的可能性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那特罗和帕拉斯亚历山大，1989）。

评分

使用几个数字或字母来评价学生表现的方法，早已因其僵化、不公平而受到批评。人们提出许多代替传统评分体系的办法，但没有一个得到普遍响应。其中有及格/不及格评分办法、默契评分法和不评分等。及格/不及格评分办法有限地在一些大学使用。而默契评分法则是指学生和老师在获得某一评分等级、该学什么以及该学多少上达成协议。在完全取消评分即不评分的办法中，比较典型的的就是老师为每名学生写很长的评语。

所有这些代替通常评分体系的作法，都是以某种对学生和相关老师具有共同含义的方式来评价学生的表现。问题在于怎样把这种含义传递给外人——例如，对高中学生来说就是要传递给大学，对大学学生来说就是要传递

给研究生院。接下来这又与教育设置的科层特征相关联。作为科层机构，大学和研究生院很难处理特殊情况，因为对学生的评价缺乏对他们在校表现的标准化测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替代办法无法被广泛接受的一个主要原因。

标准化考试

最近，关于窃取考试信息的丑闻使公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全国性考试所公布的分数的有效性，以及这些考试准确估价学生水平的能力。

1980年，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和艾伦·奈尔恩（Allan Nairn）出版了《在教育考试中心控制之下》，对教育考试中心做了批判性的研究。教育考试中心创造了学习才能考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许多学生的大学梦想由此产生或破灭。这篇报告出版之后引发的争论又引出了另一项研究，该研究认为学习才能考试完全没必要。研究者认为虽然学习才能考试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大学的成功与否，但如果把它加入已经从高中可以获得的关于学生功课和成绩的信息，它也并不必然能提高已有的预测能力（克罗斯和特那舍姆，1988）。

不过，虽然教育考试中心的考试由于只能测验有限范围的能力（例如，学习才能考试就是测量语言和数学能力的）以及能很容易得到训练而受到批评，但是研究者通常并不建议取消所有的标准化考试。他们引用大学董事会的高级定位项目（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作为模式，这一项目在考试内容与教学内容之间更为匹配，因而产生更准确的考试分数。而且自从高级定位考试的题目建立在由大学和高中联合设计的高中课程的基础之上后，分数就更能准确地预测学生在大学是否能获得成功了（克罗斯和特那舍姆，1988）。

美国教育的趋势和问题

作为美国社会中最强大、最重要的设置之一，教育受到了许多批评，现在正采取一系列改革以纠正失误。这一部分我们首先介绍美国教育的一些主要弱点，然后讨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如在教室里更多地使用计算机和电视、重新强调基础课程以及凭证计划等。之后我们考察一下私立学校的特征，这其中有一些作法值得公立学校借鉴。最后我们考察与少数民族教育以及学校为其毕业生创造更多机会的能力有关的一些问题。

1

美国教育体系的质量与其他国家相比如何？根据一项跨国调查来看并不是太好。来自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学生参加了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标准化考试。美国五年级和九年级学生的分数居于中等和差等之间。如果涉及科学知识的更多专门领域，美国学生的排名甚至更低。在13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英语地区、英国、芬兰、匈牙利、意大利、日本、挪威、波兰、新加

对美国教育的批评

坡、瑞典、美国和香港地区)中,美国十二个年级的学生物理排名第九,化学排名十一,生物排名最后(《科学新闻》,1988年3月12日)。

如果要评价这些数据,我们首先应记住在美国念完高中的学生比例要比其他国家高。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可能会以为美国高中高年级的平均分数比其他国家低。但如果只看最好的那些美国学生的分数——排名最靠前的5%——与其他国家学生的分数比还是非常类似的(科根、托毕珀塔和安德森,1988)。尽管如此,大多数美国公众仍认为美国的公立教育不如其他西方国家(盖洛普和纽波特,1991b)。

最近几年,美国公众对学校的主要关注集中于缺乏纪律和适当的财政支持、难以吸收合格的新教师、课程弱化和教学质量过低、人满为患等(伊拉姆和盖洛普,1989)。

这些关注引起了80年代初对公立学校的一些全国性调查。其中最重要的调查报告有:《一个有风险的国家》;由“教育对经济增长之影响”专题研究小组提交的《为寻求卓越而行动》;由“专业化的教学”小组提交的《全国总动员:为21世纪培养教师》。所有这些报告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研究科学技术的教育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些报告认为未来发达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只能靠教育提供的高水平技能。而且,报告认为,美国学生在这些技能上有严重缺陷,特别是与日本——美国的主要经济对手相比。

报告还研究了现在进入教师行业的那些相对素质低的学生,提出将来吸引更好的教师的一些办法。给教育者付更高的工资看来可能是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但是在政府资金削减的时期,报告倾向于强调其他的一些解决办法。有两个较受大家赞成的建议是:对教师制定最低限度的能力考试和褒奖那些有特殊教书才能的人(而不是普遍提高教师工资)。后者引起很大争议。反对意见包括奖励工资会起到降低教师普遍工资水平的作用(奥恩斯坦,1988)。另一个建议是“延长准备期”,即要当教师必须受五年教育而不是四年(霍利,1989)。对这条建议的批评者认为这样一个项目的成本对许多有希望的教师来说是昂贵的,而且还会使公共基金从别的更有创造性的教育项目中抽走。

另一个由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87)所做的报告《贫穷的一代》(An Impoverished Generation)呼吁,改善教育的努力应集中在城市中心区的学校。报告认为这些学校中的问题与郊区发现的问题不同,他们的问题是贫穷、营养不良、种族主义、毒品和恶化的设施。报告说如果没有额外的帮助,努力提高这些学校的教学水平就会没有效果(《华盛顿邮报》,1988年3月19日)。民意测验显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大多数美国人愿意交更多的税(伊拉姆和盖洛普,1989)。

2

教育革新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许多教育革新抱有很高的希望。尽管有些革新为过去几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并不是所有的革新都获得了成功。

教育者曾对教学仪器和闭路电视作为教学辅助手段有很大期望。教学

仪器通过给予学生即时的反馈，而能使老师的指导更个人化；闭路电视可以拥有范围很广的学生观众，而且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教育。但是人们发现购买和维护这些设备太花钱了，而且教师不情愿使用它们，大概害怕教学过程可能会变得非人格化。另外，关于如何使用这些设备也缺乏足够的训练，也没有对怎样才能有效地在教室中利用它们进行研究（参见“大众文化之窗”栏：“教学电视是一柄双刃剑吗？”）

另一项革新是小组教学（team teaching），几个老师组成小组负责一个班级。这意味着给学生提供了具有更多种技能的而且更精通专门科目的老师。但是因为这个技术需要如此多的计划和分析，而且因为老师习惯于对一个班级行使自己专有的权力，所以小组教学并不成功。

开放教室（open classroom）是一个非正式的环境，其中学生被单独教学或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教学。虽然在一些欧洲国家已经获得成功，但是在美国从未普及。只有经过大量计划，在开放教室中每个学生才有可能被赋予更大的自由。

学生表现合同（performance contracting）是雇佣私立机构来教学生阅读和数学等课程。很典型地，这些组织依赖不同种类的教学工具。这种方法只是在最低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考试成绩。许多这种试验已经被中断了。

虽然这些革新中没有一项非常成功，但另外一些进展得却比较好，而且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的一部分。一个例子就是在学校中广泛使用专业人员助手（paraprofessionals）——并没有获得全部教师专业训练的人。使用专业人员助手可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而且还能为社会弱者中的母亲提供工作，以及以后成为完全专业人员的机会。

教育中的电脑

另外一个最近才出现的重要革新是发明了作为学习工具的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s）。虽然它们在教学上的好处仍不很清楚，但是这些书桌般大小、不很昂贵的设备在我们的学校里已经变得几乎很普遍了。1988年美国95%的公立学校里至少有一台微电脑（《纽约时报》，1988年6月29日）。一项全国调查发现多数美国学生已经使用了电脑，虽然多数不是以学习为目的（威尔逊，1988）。

学校使用电脑一方面是为了指导学生自己使用电脑——换句话说，为了电脑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了教授其他课程。用电脑教育的这两个用途并没有太大争议，因为如果无法接触电脑却又要学会如何操作它是不可能的。不过在下面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即多数学校强调程序技巧——怎样写出程序告诉电脑做什么；另一些学校更愿意教学生利用现有的许多可以通过商业渠道得到的程序。

作为一种教学媒介无论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电脑已经成为学校课程的一个基础部分。由于担心学生会在这个电脑时代落在后面，所以中学体系在教学中都赋予电脑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这种态度，他们感到电脑训练应该是高中教育的基础，无论是对能上大学的学生来说，还是对不能上大学的学生来说都是如此（盖洛普和克拉克，1987）。

关于电脑在教室中的使用存在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专家认为,在一些通过电脑来学习的班级中,学生也并不是完全依靠电脑来学习(《纽约时报》,1989年8月6日)。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校社会组织中心认为,计算机并没有充分用来加强教学(《纽约时报》,1989年8月9日)。另一些人发现电脑在有些教室具有明显的效果,指出在学校使用电脑最大的益处并不是由于电脑本身,而是由于学生在学习使用电脑时从老师那儿得到的个人指导和关注(沃克,1987)。

教育中的电视

电视作为一个教学工具可以与电脑抗衡,甚至超过电脑。虽然电视很久以来被认为应对智商水平下降和注意力分散负责,但是最近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正确使用,它会是一个有效的教学工具。电视现在被认为是介绍学生接触其他社会、鼓励新思想、增强教室里动机水平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丰塔纳,1988)。电视通过给青少年提供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所没有替代性的角色模型和社会互动,而在教授青少年时代的特殊价值(卢克和约翰斯顿,1988)。

从为很小的孩子制作的节目(如《芝麻街》),到那些允许年龄大的学生获得高中学分的节目,再到那些促进阅读和数学技能的节目,电视作为教育媒介其潜能无法被抹杀。



教学电视是一柄双刃剑吗?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当电视机首次在美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时,一些观察家热情洋溢地写道,电视这种新媒体可能会具有的潜在教育价值。美国孩子可以在自己家舒适的起居室里随时获取大量编排好的信息。因此,可以自信地断言,我们已经顺利地走上了一条成为一个学者、专家国度的道路。当播放了50年“锣鼓剧”(The Gong Show)和“海湾表演”(Baywatch)之后,令人悲伤的是,这种乐观态度似乎显得有些天真了。可是问题仍然存在:电视能提供正面的教育功能吗?

大部分儿童节目已经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FCC前主席纽顿·敏诺(Newton Minnow)的观点,即电视是“一片广袤的荒蛮之地”。但是,有时还是有例外。儿童电视剧场制作的一个很著名的《芝麻街》节目,自从1969年开播以后,一直被称赞为是儿童节目的杰出典范,即儿童电视可以是或应该是这个样子。该节目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提高三、四、五岁儿童(特别是那些来自社会弱者家庭的儿童)的学习能力。《芝麻街》的设计目的是,通过提高对字母表和数字1至10的熟悉程度、扩大词汇量以及鼓励他们发展广泛的学习技能等,帮助儿童做好上一年级的准备。

就像在第一章所讨论的,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在认真评价《芝麻街》节目的效果,而且这些研究的多数结论还是很令人鼓舞的。经常看该节目的儿童在许多重要的学习技能上比不常看的儿童表现突出。孩子的收获大多数是在看该节目的第一年中得到的,而且年龄小的儿童获益更大,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该节目的真正观众。美国约有600万名学前儿童在看这个节目,平均一周三次(利伯特和施普那夫金,1988)。该节目还用英语向四十多个国家广播并有几个外语译本。

在推动实现重要教育目标方面,儿童电视剧场的另一些作品也很成功,特别是

“电力公司”(The Electric Company)节目。该节目曾在1971年至1985年间播出,帮助一年级至四年级学生培养基本阅读技能。许多观察家也认为,这些节目,以及《罗杰斯先生的邻居》和其他一些节目,在促进达到更广泛的亲社会目标方面(包括分享并培养对具有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和国籍的人群的理解能力和接纳能力),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做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曾看过《芝麻街》节目片段(该节目中不同人种的孩子相处很融洽)的年轻白人,比根本没看过的人更可能选择非白人作为自己的伙伴(查伦和桑德勒,1982)。

另一方面,一些批评家仍不相信电视(哪怕是高质量的电视)会是一种适当的教育工具。他们的观点如下:

1. 看电视,无论节目质量如何,都花费了娱乐性阅读的时间,而且会养成“电视习惯”。

2. 电视丝毫无助于延长儿童集中注意力的时间。这是对“芝麻街”节目最严厉的批评之一。节目中的短片段和快速拍摄的动作有效地抓住了小观众的注意力,但是这并不能帮他们在教室里集中注意力。

3. 类似地,电视暗含着这种意思,即任何重要的东西都是娱乐性的(或能被制作成娱乐性的),而且很容易掌握。这就带来一个可怕的推论,即任何困难的或令人烦恼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

4. 最后一点,而且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即便看最好的儿童节目所获得的学习体验也是完全被动的。虽然《芝麻街》和其他类似节目尽其所能去鼓励孩子与克密特(Kermit)和“曲奇怪怪”进行“互动”,但是孩子可以完全意识到他们只要静静地坐着等,一切都会解释给他们听的。然而事实上,所有现代教育方法都强调积极参与学习过程的重要性。

无论好坏,电视都是现代生活的事实。平均每个孩子毕业前在教室度过11 000个小时——大约比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间少4 000个小时。在60年代早期到中期那段时间里SAT和ACT考试分数开始下降(那时恰好是第一代被电视养大的孩子开始参加这些考试的时候),这一事实并不是结论性的证据,难以证明电视对儿童学习表现有不良影响,但是它确实为这个观点提供了论据。在最近几年里,一直有一些小规模但令人振奋的现象,表明一些网络和几个受欢迎的频道正在作出真正的努力以增加高质量的儿童电视节目。但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努力是否是实现这一媒体教育允诺的一个非常滞后的步骤,或者说,电视固有的局限性是否意味着即使是高质量的节目,也很可能对美国儿童的学习表现产生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查伦(Charren, Peggy)和马丁·W·桑德勒(Martin W. Sandler.):《转换频道:与电视(可感知地)生活》(Changing Channels: Living (Sensibly) With Television. Reading, Mass.: Addison - Wesley, 1983);利伯特(Liebert, Roberts M.)和施普那夫金(Joyce Sprafkin.):《早期的窗口:电视对儿童和青年的影响》(The Early Window: Effects of Television on Children and Youth. New York: Pergamon, 1988);帕尔默(Palmer, Edward L.):《电视和美国儿童:忽视的危机》(Television and America's Children: A Crisis of Negle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重新强调基础训练和更高的标准

按照当今许多批评者的观点,美国教育体系必须建立更高的标准,并回到强调阅读、写作和算术这些传统领域上来。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批评者建

议学校在诸如艺术、音乐欣赏、种族关系、驾车训练、体育等“虚饰”上花的时间要少一些。保守主义者相信学校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儿童”，负担已经过于沉重了；他们认为，这是学校在充分进行基础教育上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且这些批评者相信对学生的社会调试给予了错误的关注，因而使得许多年轻人还没有掌握好基础学术技能却不断升到下一个年级。他们认为，精通传统科目比“自我发现”更重要。他们引用了令人惊讶的统计数字来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美国1亿工人中有一半阅读水平在九年级以下，这样工商业每天至少损失2亿美元的产量（《今日美国》，1987年10月29日）；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根本不认字，更多的人是功能性文盲（《洛杉矶时报》，1988年3月20日）。一些公司不得不开设文化课教职工读书。

《一个冒险的国家》是优才教育全国委员会1983年一篇有影响的报告，主张对学生和学校执行更严格的标准和更激烈的竞争。沿着这些思路已经进行了一些适度改革。大多数州最近已经增加了对高中毕业生的要求，而且许多州现在需要学生通过最低程度的能力测验才能毕业。虽然这些考试的公平性正在法庭上受到挑战，但是它们的使用仍不断增加（雷斯尼克等，1983；波帕姆和林德海姆，1981；皮尔林，1981）（参见“新闻报道”栏目：“加拿大的学校”，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办法以提高公立学校教育的水准）。



加拿大的学校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都在吹嘘他们公立学校的质量。事实上，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美国人进行向上社会流动的基础。

然而，在过去30年中，曾有令人震惊的现象表明美国教育质量在下滑。学习才能考试SAT和ACT分数在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晚期这段时间下降了。一些报告指出，与此同时学生的学习技能也在退步，有些学校越来越危险，并充满暴力。

就像本章所指出的，80年代见证了“重新强调基础训练”的运动，这一运动旨在使这些下滑趋势逆转。伴随教师收入的提高，许多地区的学校减少了选修课，提高了毕业的必要条件，对老师实行竞争性考试。对纪律的重新强调也很明显。然而，这些改革是否能产生人们预期的结果还并不清楚，即标准化考试分数和学生竞争力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因此，应该问一问是不是就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提高学生表现。在过去15年里，多伦多学校体系一直在试验一种办法，不是“重新强调基础训练”的办法，而是向学生挑战，让他们自己设定高标准，并积极学习以达到他们的目标。

这项多伦多计划一开始就清楚地表达了人们从学校毕业时应具备的技能。该计划的最高目标是将学生塑造为这样的人：热爱学习；思维清晰；感情深厚；行为理智；善于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依靠自己；尊重自身以外的其他文化；以及牢固掌握基础技能和知识。

这些远大目标与对积极学习的着重强调是分不开的。多伦多的老师们不是对着一满教室百无聊赖、被动学习的学生进行说教，而是指导那些年轻人去花大部分时间来调查研究周围世界。老师们说这样使他们的时间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他们可以

跟踪每个孩子学习的进程，在必要时随时提供帮助。班级中还强调合作学习，即每个学生都有责任帮助自己的同伴。

多伦多计划并不像美国高度科层化教育体系中进行革新时所采用的方式那样，严格地、不可更改地自上而下实施，而是由高级行政人员确立总目标和指导原则，学校和老师决定这一计划在自己的教室中如何具体执行。

多伦多计划执行得如何？大量报告指出，多伦多的学生对学校和他们在那儿学到的知识真正感到兴奋。当美国的学校正在采用只保证每个学生掌握范围很窄的低水平技能这种办法的同时，多伦多体系正在指导其学生准备去思考、成长。这是美国教育者应该考虑要赶上并超过的模式吗？

资料来源：《ABC 今晚世界新闻》，1990年11月5日；凯斯·贝克（Keith Baker）和罗伯特·吕贝尔（Robert Rubel）：《学校中的暴力和犯罪》（Violence and Crime in the School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0）；优才教育全国委员会：《一个冒险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凭证体系

在政府对教育的支持中，凭证体系（voucher system）是被讨论得很多的一项革新。在该计划中，家长会拿到一张“凭证”，用它来选择他们想选的学校（公立或私立）。公立学校根据吸收的凭证数量得到财政资助，而不是直接靠税收支持。这个体系主要是保守人士的主张（但不完全是保守人士），用以增加学校间的竞争，并提高教育水平。联邦政府已经尝试性地在一些领域资助凭证体系。

许多教育专家批评这种凭证项目。一些人认为凭证会使学校更加具有隔离的性质。另一些人担心由于那些无法在别处得到上学许可的学生到这儿上学，所以公立学校会变成“倾倒垃圾的地方”。公众对凭证系统的反应多种多样。1986年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允许公立学校学生家长自由地在公立、私立和教会学校之间选择的一张600美元的凭证，并不能刺激这些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被调查者中67%的人说他们会让孩子留在公立学校里。

3

私立教育

超过4 000万的美国儿童现在在上公立小学或中学。不足600万的儿童上私立学校（美国教育部，1990）。但是这些数字并不一定反映了家长的偏好。1986年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在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或上教会学校的意愿上，公立学校学生家长几乎平均地分成两部分——49%的人赞同，46%的人反对。

天主教学校占了全部私立学校学生注册数的大多数，但是这一比例已经降低了。1967年私立学校学生中87%进入天主教学校，到1988年这一数字就降为不足53%了（美国教育部，1990）。原教旨主义新教学校最近几年增长很快。

私立学校注册人数的增加是否能告诉我们关于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相比

的质量情况呢？按照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观点，学生聚集到私立学校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在这儿得到了更好的教育。根据与全国教育统计中心（一个联邦机构）签订的合同，科尔曼在全国1 015所公立和私立高中约5.9万名学生中进行了调查。在他所报告的公立和私立学校中，他得出结论说，即便考虑到家庭背景的不同，私立学校学生教育的平均水平也比公立学校平均水平高。

科尔曼认为私立学校更为有效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他指出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纪律严，例如公立学校的二年级学生打架、不服从老师、故意破坏学校公物的数量往往是私立学校的两倍，而且私立学校的功课成绩挑战性更强。全国130万私立高中学生在基本阅读、写作、算术，以及自然科学、公民学和词汇量上都比公立学校学生强。科尔曼发现多数私立学校学生与老师的比率较低，这也是导致这些积极结果的原因。而且少数民族和白人学生从私立教育受益是同样的。虽然黑人学生在私立学校中所占比例比在公立学校中要低，但是私立学校中种族隔离却更少，这一事实也许部分地解释了私立学校中少数民族和低收入学生获得好的功课成绩的原因。

最近科尔曼对数据又进行了再检验，发现天主教学校学生辍学率非常低，甚至与其他私立学校相比也是如此。他把这归因于多数天主教学校周围的社区的支持（《纽约时报》，1988年3月30日）。

并不奇怪，科尔曼的报告激起了一些公立学校官员的愤怒，他们指责这篇报告调查不严谨、有偏见、不准确。批评者特别指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人员的可比性（或由此而来的缺乏可比性）问题，他们说，70%的私立学校学生将上大学作为目标，但是只有约33%的公立学校学生追求类似的学习目标。这样私立学校的学生肯定会比公立学校的对手表现出色。

针对科尔曼的研究还有许多别的批评。有些人对成就考试（科尔曼用来测量学习表现的考试）的效度，以及他认为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程度低的观点提出疑问。他们还攻击他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加以控制的方法（帕日，1981）。有一位研究者认为，通过控制科尔曼忽视的一些变量（性别、身体残疾、居住地区和上大学的意愿），他能表明天主教私立学校的学生“并不比公立学校的学生做得更好或更坏”（诺埃尔，1982）。

在美国除了学术质量的争论以外，按照人人平等的观点，私立学校有时受到一些指责。由于它们的学费高，相当多的美国年轻人没法上私立学校。尤其是，一些学者认为学术上很著名的学校，特别是寄宿学校，永远被美国上层阶级所垄断（库克森和佩塞尔，1985）。增加进入私立学校机会的一条途径就是，采用前面讨论过的凭证计划，这可以覆盖部分或甚至是全部学费。不过，许多观察家相信，使用政府凭证来付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是对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的违背。

4

教育和 少数民族

今天几乎没有比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更重要的问题了。在这一部分，我们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少数民族的特殊教育需求，特别是那些贫困家庭中的少

数民族；二是为了消除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现象所付出的努力。

教育少数民族学生

因为较低阶级的少数民族学生往往上学时缺乏多数中产阶级学生已经在家里学会的语言、价值观和技能，所以他们给教育者提出了一个特别严峻的挑战。通常认为最有辍学危险的孩子，是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是那些单亲家长抚养大的孩子；是那些不懂什么英语的孩子——往往同一个个体身上具备好几个这些特征。

多数教育者都同意，语言往往是少数民族学生的一个重要难关。例如，我们经常能见到，来自波多黎各、墨西哥以及诸如越南之类亚洲国家的孩子，在上一年级时只懂几个英语单词，可是英语又是讲课用的语言。而且不同种族背景的孩子有不同的口音，使用的语言老师也听不懂。这样导致的许多挫折就会使孩子甚至在很小的年纪就认为，学校是他们不可能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地方。因此，他们有时就放弃尝试成功或甚至放弃上学。

我们应该怎样教育那些母语不是英语的孩子呢？1974年美国最高法院要求所有学校为这样的儿童提供特殊帮助，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应该能让学生获得什么样的帮助。联邦政府人权办公室解释说这一决定是呼吁过渡性的双语教学：用母语指导学生，直到他们能上用英语教授的课程为止。提议者认为用这种办法教学生可以使学生在掌握英语的过程中继续学习其他课程，而且他们在英语和其他领域取得的进步，要比强迫他们在还不能完全听懂时就接受英语授课取得的进步大。他们还建议双语教学可以帮助说外语的学生保持与其原来文化的联系（余和阿特金斯，1988）。

双语教学项目的效果并不很清楚。有些研究好像表明这些项目很有效果；可另一些研究表明它们根本没有任何效果；还有一些研究报告说这些项目有负面影响（贝克和德康泰，1983）。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应该鼓励外国学生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和语言。有一个拥护派，即“美国英语”群体，一直在奋斗要使英语成为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至今为止，超过三分之一的州已经通过了这个立法。

另一个与对少数民族群体教学有关的项目是，决定选用哪种教材合适。直到最近，小学的典型阅读教材都是关于白人、中产阶级、小城镇美国家庭生活的。对于芝加哥南区的美国黑人孩子或南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家庭好像是完全陌生的。由于受到来自种族群体的压力，教育者和出版社最近开始编辑更为合适的教材。许多初级读者现在描绘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与他们描述白人的频繁程度和正面程度一样，包括描绘城市图景与乡村设置一样，而且他们试图以一种更现实的方式描述童年（参见“全球社会”栏目：“A代表西非阿散蒂人，B代表黑人……”这是一篇关于最近为非裔美国孩子提供一门非洲中心的课程所做努力的报道，以及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争议）。

然而，经济剥削这个现实仍在一些来自较低阶层的少数民族儿童身上起作用。有些孩子没有父亲，母亲晚上还要工作，他们就没法让父母参加诸如家长晚会或学校演出这样的特殊活动。这会使学生感到尴尬或沮丧。老师往

往无法与这些孩子的家长就孩子在学校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些家长也不能辅导孩子完成家庭作业。

而且，这些老师，通常是白人、中产阶级，可能不知道怎样激发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努力学习。例如，墨西哥裔美国学生，可能不愿意直接对老师的批评作出反应，老师就可能会误解这种态度，认为是反抗的表现。或者，一个来自波多黎各的学生习惯了倍受呵护和富有感情的家庭环境，可能会由于老师的冷淡感到失望、受伤害，但老师的本意是尽量顾及到这个学生，只是学生不理解老师采用的方式。

少数民族学生可能由于同学、或更为严重地由于老师表现出的偏见和歧视而受到伤害。有些老师故意歧视少数民族学生——不给他们提供额外帮助或参与的机会，忽略他们举起的手，或给他们评分更加严格。不过更多的歧视是无意识的或更细微的。例如，有偏见的老师可能会认为非裔美国孩子数学学不好是意料之中的，白人孩子学不好则是没有完全发挥潜力。因此，白人孩子得到了额外的辅导。这样，由于白人孩子被期望能学得更好，所以他们就比具有同样能力的黑人学习了更多的数学知识。不过在美国学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并不总是学得那么差。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英国和加利福尼亚的锡克族年轻人比白人要学得好（吉夫森和哈楚，1988）。高中的亚裔美国学生，整体来说，在标准化考试中往往比其他少数民族和白人分数高（索奥，1986）。美国高中的亚裔学生比其他学生学习更多的数学、自然科学和外语类课程，而且在大学预科和给有天赋的学生开设的课程中表现超群（奥恩斯坦，1985）。大学一年级新生中，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两年制学院中比四年制学院（公立或私立）中人数多。亚洲人是惟一在四年制大学中注册人数比两年制大学多的少数民族群体（美国大学考试计划，1986）。



A 代表西非阿散蒂人，B 代表黑人……

虽然同化是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一些冲突论者争辩说，这一进程剥夺了种族和民族群体自身的许多价值观和传统。反对同化的一种形式就是非洲中心主义，按照它的支持者的说法，这是“为美国黑人重建文化遗产的一种尝试”，文化遗产是别的种族群体与生俱来的权利。下面摘录中描述的是有争议的非洲中心课程所涉及到的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习科目。

在加利福尼亚东帕洛阿尔托的舒勒·曼德拉学院（Shule Mandela Academy），学生们在追求非洲理想。他们早上集合时，学校的42名学生都是非裔美国人，他们发誓“为黑人着想，为黑人做事，讲黑人语言，买黑人的货物，为黑人祈祷，爱黑人，为黑人生活”。学生们唱鲍伯·马利（Bob Marley）的歌，而不是弗朗西斯·斯格特·凯（Francis Scott Key）的歌。他们背诵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而不是万歇尔·林赛（Vachel Lindsay）。“我们有丰富的共同传统”，穿着非洲服装的执行主席诺巴图·安扣达（Nobantu Ankoenda）说。可以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即学院的毕业生是地方高中高级定位班级中仅有的一些黑人。

在芝加哥苏得小学（Chicago's Suder Elementary School），非洲对儿童来说远不止是功课。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它底荫在已遭到麻烦的亨利·霍纳（Henry Horner）的

居住计划下。每个夏天，布兰达·戴格热（Brenda Daigre）带10名五、六、七年级的学生去非洲做一次学习旅行（钱来自社区捐赠）。为了获得旅行资格，学生们必须学习法语、数学（兑换货币）、写作（记录旅行日记）和当地风俗。这些孩子中有许多甚至连芝加哥郊区都从未去过，他们说旅行为他们开阔了眼界。“我原以为那儿是一片密林，但并不是”，玛利亚·穆恩（13岁）说。“他们的建筑物就和我们一样：商店、旅店和汽车旅馆。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舒勒·曼德拉和苏德只是课程建立在非洲文化上的许多私立、公立学校中的两个。没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个自认为是“非洲中心”的学校，虽然教育者对这一数量的增加表示赞同，特别是在内城居住区，在这儿家长和社区行动者推动了这些变化。给非洲中心课程下个定义是非常主观的。像舒勒·曼德拉这样的学校是一个极端，在这些学校里非洲文化统领着全部课程。另一些学校将非洲特色融入音乐、艺术和社会研究等课程，但传统的数学和科学课程仍然继续教授。更多的以黑人学生占多数的学校将非裔美国人的影响限定在特定活动中，如食品节或艺术展览。

在1990年，非洲中心课程成了激烈辩论（关于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开展多文化教育问题）中一个闪亮的焦点。甚至那些希望教一些关于不同文化信息的教育者也表示出对非洲中心主义的强烈反对。“它是反美国的”，前教育部长威廉·伯奈特（William Bennett）这样说。他现就职于修森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这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思想库”。“我认为它会使穷人更加疏远，而它们与美国文化的联系已经很微弱了……认为学习更多关于非洲的事会使这些孩子对学校更有兴趣，这是一种误解。”

像伯奈特这样的批评者说，他们觉察出在一些非洲中心学校使用的教材中有反白人腔调，对此他们很恼火。全国人文捐赠会主席林奈·辰尼（Lynne Cheney）说：“好像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任何发生在西方的事都是坏的，而来自非洲的所有东西都是好的。”而著名的非洲中心主义者，如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莫里非·阿斯奈特（Molefi Asante），说他们只是尽力让黑人孩子了解他们的文化遗产。“欧洲孩子很自然地就是欧洲中心的，因为课程基本是白人自尊的课程”；“我想为黑人争取的是，当他们走进教室时，同样拥有着白人孩子自然就拥有的自尊。”

资料来源：摘自《新闻周刊》，1991年9月23日。经允许重印。

种族整合

在美国只招收或主要招收非裔美国儿童的学校，平均来说，质量比那些招收白人儿童的学校差。这些学校教室大，设备过时或早已损坏，图书馆的藏书也少。这种条件使许多高水平的教师不愿在这儿教书。因此说种族隔离往往意味着教育质量的低劣（科尔曼等，1966）。

美国许多公立学校体系历史上执行着法律上的隔离政策（de jure segregation）或以地方法律为基础的隔离政策。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委”案的法律裁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法律上的隔离政策被宣布为是违宪的。

但是决不要相信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学校就不存在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由事实上的隔离（de facto segregation）引发出来，这个隔离是由居住方式所导致的。比较典型的是，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收入较低，而且一直

受到的歧视,使他们往往在选择住所方面受到很多限制。这样,他们通常会居住在黑人聚居区。由于多数美国公立学校为附近居民服务,所以这些地区的学校很少招收到白人的孩子。这样种族隔离就一直以事实上的隔离形式存在着——主要是在小学(柯比等,1973)。由于中学和社区大学的学生来源不局限于一个居住区,所以这些学校往往隔离程度轻一些。

事实上的学校隔离是一个严重的全国性問題。因为居住方式不能轻易改变,所以减轻隔离的惟一办法就是部分或全部取消学校为附近社区服务的特点。一些社区已经照此办法重组了它们的学校体系。例如,一个拥有三所小学的城镇,就可以让一个学校专教一、二年级,另一所专教三、四年级,而第三所学校专教五、六年级。这个计划使同一年龄的所有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学习。

但是,这个办法以及其他类似的办法,必须具有送孩子到本居住区以外去上学的交通条件。这种为大家所熟知的班车接送办法遭到强烈反对,特别是在有很强地区认同的白人居住区(比尔,1980)。家长有时是反对班车接送,而并不是反对种族整合,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孩子们穿过城镇上学太辛苦,可能会迷路或弄混该坐哪趟班车,以及家长与老师的交流会越来越少等(阿莫尔,1989)。但是有证据表明,白人反对班车接送其实是种族和政治态度的一种反映,这至少与关心社区认同和班车本身的问题所引起的反对是一样的(韦瑟福德,1980;西尔斯、亨斯勒和斯皮尔,1979)。

一些研究(科尔曼、凯利和穆尔,1975)对强迫性的班车接送从长远看是否有效提出强烈质疑。例如,70年代早期,波士顿通过用班车接送小学生跨地区上学的办法,在教育体系内消除种族隔离。虽然一开始波士顿的白人反对这样做,有时还很强烈,但到了80年代中期这种反对的声音就消失了。不过,同时波士顿公立学校中白人学生的数量和比例都有明显下降,大概是由于白人家庭选择搬离该区域的原因吧,这种趋势就是所谓的“白人大逃亡”。因此,学校的种族隔离最终变得比以前更严重了。

替代班车接送:几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一些旨在消除种族隔离的办法已经被明确表示不涉及班车接送。这些所谓的可供挑选的办法包括两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是多数向少数转学的计划,或曰开放招生,即从其人种为多数的学校转到其人种为少数的学校的学生可以获得免费交通(阿莫尔,1989)。另一个显然是“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往往在市中区,学校用特殊的课程吸引中产阶级学生,否则这些学生可能会上私立学校或搬往郊区。

第一批磁石学校建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它们已经成为实现学校种族整合的重要工具:达拉斯、休斯顿、洛杉矶、密尔沃基和圣迭戈等城市都接受法庭的指令修建这样的学校;芝加哥、辛辛那提、印第安那波利斯和西雅图也建立类似的学校,希望能延缓法律上的麻烦;还有一些城市包括剑桥、马萨诸塞等,甚至还没有法庭命令的威慑就已建设这种学校了。

尽管磁石学校在全国不断增加,但是它们也并非没有问题。一项批评就是,磁石学校故意只招收最聪明的学生和老师,这样会导致本地区其他学校

的质量降低。一项对学校的录取政策做分析的研究发现，磁石学校经常让考试成绩好、牢固掌握英语、没有学习困难的学生入学，而拒绝来自低收入家庭、阅读水平低于一般、有出勤和学习困难、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来学校注册（穆尔和达文波特，1989）。另外，磁石学校的建设和运转往往比普通学校开销大。法律和财政的限制也使得跨区转学不大可能，可是如果少数民族学生被安排到白人占绝对优势的郊区学校里，这往往又是必需的（阿莫尔，1989）。

另外，一些磁石学校很明显只是在名字上特殊罢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项对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20所磁石学校调查发现，所有的学校都极其相似。有报告说，在波士顿多数磁石学校“私下承认它们的吸引主题还很不发达——或并不存在”（巴尔，1982；美国教育部，1984）。

尽管如此，可供选择的这些方案前景已远不再模糊了。美国几个大区已经成功地运用这些办法保持了多种族的混合。在圣迭戈，7000名少数民族学生参加了多数向少数转学计划，近3万名白人和少数民族学生在磁石学校上学。在乔治亚州萨瓦那，代替班车接送的磁石计划吸引了近1000名白人学生从私立学校回到公立学校（阿莫尔，1989；里斯特，1989；罗塞尔和格伦，1988）。最近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公众在这些可供选择的项目上的偏好与对传统反种族隔离办法的偏好相比是2:1（伊拉姆和盖洛普，1989）。

5

教育和平等

美国的学校经常被指责为引起了所有领域的不平等。如果只有学校拥有平等的资源、设备和教师，那美国就走上消除不平等的正确道路了。不过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个前提受到很大怀疑。

首先是著名的“科尔曼报告”（科尔曼等，1966）。詹姆斯·科尔曼开始是研究在多大程度上黑人和白人的不平等地位能用他们所获得的不同教育质量来解释。科尔曼发现，“学校对孩子的成绩影响不大，后者与……家庭背景和一般的社会环境相关。”科尔曼所说的家庭背景和一般社会环境，特指孩子的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的文化生活、邻里条件以及和同龄人之间的关系。

家庭环境受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很大，它有助于塑造在学校中很重要的认知技能。来自“文化富有”家庭的学生——例如，家里书很多——就比那些“文化剥夺”家庭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学习上的成功。而且，家庭对教育的态度也有助于决定学生受教育的程度。中产阶级高中毕业生，尽管他们并不特别喜欢学习，也往往会上大学；而来自工人阶级或较低阶级家庭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喜欢学习，就更可能失学。

科尔曼的发现总体上得到了克里斯朵夫·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所领导的另一项研究（即“不平等”）的证实（詹克斯等，1972）。詹克斯的结论是：“有证据表明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不能使成人更加平等。”原因在于，“学校产出的特点广泛依赖于单个投入，即入学的学生的特征。”

这些研究人员可能会认为,美国人对他们的学校抱有不现实的期望。詹克斯建议,如果美国人想要更多的平等,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税收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虽然在政治上可能不可行。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支持这种观点。一个例子就是研究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对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子女后来的学习与职业生涯的影响。该研究持续了16年,研究对象来自密西根州伊普西兰蒂,智商很低(贝吕埃克莱芒等,1984)。他们三岁时开始接受学前教育,后来当他们上初中、高中时所需的矫治帮助,以及辍学者和失足者人数都比类似的控制组(未接受学前教育)少。而且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或全职工作的人数也比控制组多一倍。不过,尽管这一研究首次报道时就受到广泛的欢迎,但是至今仍没有使这些孩子达到中产阶级学生的知识水平。

教育的影响

虽然教育可能并不能保证机会人人平等,但是社会学研究已经测定出,它确实对人们一生潜在收入和许多社会价值有重大影响。

1

教育和收入

每个人都听说过有人连小学都差点没上完却成了百万富翁的事,也听说过博士们不得不开出租车或在超市工作的事。然而,这些例外情形掩饰了其中的一般模式,即比较典型的是,上学时间越长,收入越多。表15—1显示了不同领域大学毕业生或更高学历毕业生的收入情况(詹克斯等,1979)。

表 15—1 不同学历的年收入(1992)

领域	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人文学科	22 941 美元	—	—
社会科学	21 623 美元	—	—
会计学	27 179 美元	31 259 美元	—
计算机科学	30 523 美元	39 120 美元	61 555 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3》(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下面一段摘录概括了关于大学教育是否值得的一些不同研究的结论(詹克斯等,1979)。

所有这些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地位就越高,收入也越多。当然,所有这些差别并不与在校学习时间长短有必然联系。那些呆在学校上学的人,往往是已经具备了雇主们所看重的素质和技能的人,他们上几年学无关紧要,而且他们很可能来自富裕家庭,不管他们学问上有多成功,经济上本身就有优势。

然而,即便来自同一类型的家庭,考试成绩一样,最初职业相似,大学毕业的人最终获得的职业地位也比只上完高中的人高。研究还表明获得学士学位对收入有很大影响。高中毕业生可能比具有同样背景但没念完高中的人收入高约 51%。而大学毕业生可能比具有同样背景但大学没毕业的人收入多 76%。

上一所“好”大学有什么优越性呢?一项研究表明,有着同样背景的人,学校声誉的差别对职业地位——即最终获得的工作的声望——影响不大。不过,考虑到收入,大学的选择就重要了。这项研究发现“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非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收入多 28%。

约一半美国人受过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除了给他们教授新知识外,大学的经历是否能使这些美国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在任何一方面发生重大改变呢?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一项早期研究认为,教育会使一个人更有忍耐性、更民主、“更多地介入政治和文化”(克拉克,1962)。大学毕业生参加政治俱乐部或协会的可能性是高中毕业生的两倍,是小学毕业生的四倍。另一项研究指出,在大学里多念一年书会使人更支持公民的自由权(塞尔文和哈格斯特龙,1960)。

对大众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学毕业生比那些只上过中学或小学的人在所谓的社会问题上更自由(盖洛普,1983b)。美国大学毕业生中有 85% 会投黑人总统竞选者的票,而高中毕业生中只有 78%,小学毕业生是 59%; 87% 的大学毕业生、80% 的高中毕业生和 69% 的小学毕业生支持更严格的手枪管制; 32% 的大学毕业生、22% 的高中毕业生和 10% 的小学毕业生同意必要时应做人工流产手术。

这些证据表明,只受过小学教育与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之间态度差异比受过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人之间的差异大(阿尔芒德,1950)。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在影响态度的变化方面高中教育比大学教育更重要。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学习是一生中的社会和个人经历,它将改变一个人的知识、态度和行为。教育是社会指导许多这样的学习经历的正式设置。

2. 教育设置有几个主要的社会功能。最普遍的功能就是社会化,即传递技术技能、知识、价值观和规范。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社会控制,即学校帮助规范人们行为的方式。教育设置还试图保证为需要人员的岗位提供足够的经过训练的人。在美国,教育还有同化作用,即通过教英语和普遍的文化价值观的办法将新成员吸收融入主流社会。教育组织,特别是学院和大学,还是现代社会中革新的主要源泉。

3. 冲突论者认为教育主要是统治者永久保持自己特权的工具。按照这种观点,贫穷的学生不大可能受到鼓励去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而且往往支付不起继续上大学的钱。教育保持不平等的两个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分班,依据学习成绩,把学生分成不同的组或班级,但事实上经常是根据阶级和种族分班。另一个手段是文凭主义,指某一职位要求申请者必须拥有高学历。文凭主义是确保最有能力的人受雇于重要岗位的一种办法。因此,较低阶层的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往往无法竞争获得高薪水、高声望的工作。这样,贫穷和不平等的循环通过教育体系得到了强化。

4.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学校一直努力要实现教育普及这个目标。但这导致了保持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和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信仰之间的冲突。一个解决这个两难困境的现实办法就是在智力天才和智力障碍学生的课程之间取得平衡,但是要保证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学生不被忽视。

5. 美国小学和中学的主要特征就是与特定角色相联系的一个体系,包括负责学生教育的教学人员和负责协调教师行为的行政人员。而在高等教育中,教师组织有更明确的等级制度。在发达社会中,多数教育组织的结构变得越来越科层化。

6.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受政府支持。公立学校完全受公共基金支持,资金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也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资金。私立学校也得到了一些政府资金,用于公车交通和为残疾儿童提供膳食等。

7. 最近几年一个受到广泛争论的话题就是社区控制——即社区居民影响他们孩子所在公立学校行为的能力。多数老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反对社区控制。

8. 教师比较典型地扮演着几个往往是互相冲突的角色,包括下属、维持纪律的人、代替父母和同事。人们期望学生能遵从这样的规范,如耐心、准时、尊敬师长、学习上诚实等。在全美高中存在三种主要的学生亚文化,即学术亚文化、娱乐亚文化和违法亚文化。

9. 对学生进行评价是教育在每个年级进行的一项关键活动。它可以是正式的,通过评分的方式,也可以是非正式的,通过老师口头的评语来传递。还没有一种代替传统评分体系的办法被广泛接受。最近一些年里,标准化学习测验受到很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有些考试准确地预测了学生在大学的表现;批评者则认为已经从学生高中学习记录中获得的信息就能准确预测将来成功与否。

10. 一项有争议的跨国调查表明,特别在理科方面,美国高中学生的表现不如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好。然而,美国学生高中毕业的比例却更高。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学生的平均分数必然较低。

11. 在过去30年里,许多教育革新——包括教学仪器、闭路电视、小组教学、开放教室、学生表现合同等——被引入美国学校。虽然这些革新中没有一项非常成功,但另外一些革新如专业人员助手的使用则已经为美国教育组织所接受。并且学校中个人电脑已经变得几乎很普遍了。许多教育者还对在教室中使用电视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12. 美国教育体系的许多批评者提出建立更高的标准以及一个“重新强调基础训练”的办法（即强调阅读、写作和算术等传统学习技能的办法）。

13. 有些社区试验了凭证体系，在该体系中，家长选择他们想选的学校（公立或私立）。许多人批评这种凭证项目，认为它会使美国的学校种族隔离更加严重。

14. 最近几年在私立学校注册的人数增加了。根据詹姆斯·科尔曼的研究，私立学校学生教育的平均水平比公立学校平均水平高。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私立学校有时受到指责：相当多的美国年轻人支付不起私立学校的学费。

15. 低收入、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是今天美国教育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少数民族学生往往由于不会说英语，所用的教材缺乏与他们生活环境的联系，老师也不懂得怎样激励他们，以及老师和同学的偏见，因而学习上有很多困难。

16. 种族隔离往往导致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的劣势。虽然最高法院宣布以地方法律为基础的隔离政策或法律上的隔离政策是违宪的，但是由居住方式所导致的事实上的隔离仍然导致教育的种族不平等，特别是在小学。建议用班车接送孩子上学以减轻隔离的办法遭到强烈反对，特别是在有很强地区认同的白人居住区。最近几年，两个替代班车接送的办法已经形成了：多数向少数转学的计划和磁石学校。第一个办法是：为那些从其人种为多数的学校转到其人种为少数的学校的学生提供免费交通。磁石学校往往建在内城，学校用特殊的课程吸引中产阶级学生。

17. 美国的学校由于造成了生活中所有领域的不平等而经常受到指责。但是研究指出，家庭背景（特别是经济地位）是教育成就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18. 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也越多。还表明，教育对人们的价值观有很重要的影响，通常使他们更有忍耐力、更加自由。

推荐阅读书目

1. 巴兰坦 (Ballantine, Jeanne H.), 1989. 《教育社会学：一项系统分析》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这是一本综合的现代教科书。

2. 布卢姆 (Bloom, Allan.), 1987. 《美国人心灵的封闭》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这是对现代教育趋势进行批评的很有影响的一本保守主义著作。

3. 约翰 (Chubb, John E.) 和特里 (Terry M. Moe.), 1990. 《政治、市场和美国学校》 (Politics, Markets and America's School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这本书针对官僚主义对公立教育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

尖锐的批评。

4. 彼得 (Cookson, Peter W.) 和霍奇斯 (Carolyn Hodges Persell.), 1985.《为权力做准备: 美国的精英寄宿学校》 (*Preparing for Power: America's Elite Boarding Schools*, New York: Basic Books.) 这本书分析了精英寄宿学校是如何教育学生使他们为获得权力、财富和声望做好准备的。

5. 佩尼罗普 (Ecker, Penelope.), 1989.《强者与弱者: 美国高中的社会分类和认同》 (*Jocks and Burnouts: Social Categories and Identity in High School*,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该书分析了高中班级对学生亚文化的影响。

6. 芬恩 (Finn, Chester E., Jr.), 1991.《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来: 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未来》 (*We Must Take Charge: Our Schools and Our Fu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一位著名教育分析家提出的学校改革建议。

7. 科佐尔 (Kozol, Jonathan.), 1985.《文盲美国》 (*Illiterate America*, Garden City, N. Y.: Anchor-Doubleday.) 这是一本对美国广泛存在的功能性文盲问题进行热情讨论的新闻体书籍。

如果社会设置运作正常的话，它们就可以满足重大的社会需求。否则，就会像一所学校未能成功地教育好学生、某个经济部门未能维持或创造出急需的工作岗位那样，产生巨大的危害。然而，在所有具有反功能的社会组成部分中，没有谁能像误入歧途的邪教那样，造成如此巨大的混乱。你可以就这一问题请教一下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中那些仍活在世上的追随者们。琼斯是一个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巡游牧师，60年代中期，他把其教众迁到了加利福尼亚，由于害怕政治迫害，1977年又迁徙到南美的圭亚那。在与外隔绝和日益增长的偏执状态下，琼斯强迫他的追随者们长时间地劳动，为他们的“琼斯镇”修建房屋。工作之余，信徒们受到持续4~6小时语无伦次的日常说教，并且，考虑到那些因病不能亲自参加布道会的人，他们还通过麦克风将声音传至这个四周用围墙圈起来的聚居地的每一个角落。

琼斯确信他的敌人正随时准备破坏这一膜拜团体，因此，他建立了一种叫做白夜（White Night）的仪式。在这一仪式上，追随者们心甘情愿地喝下被告知可能有毒、但也可能没有毒的饮品。1978年，国会议员伦·瑞安（Leo Ryan）在访问过琼斯镇之后即被琼斯的信徒所暗杀，他此行的原因是为了调查关于“人民圣殿”教对其成员进行胁迫的申诉。琼斯意识到外界不会对这一事件善罢甘休，于是举行了最后一次白夜仪式，在这次仪式中他用了真正的毒药。912名男女老少喝下了掺有氰化物的饮品。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人们开始对宗教能够驱使其信徒达到的种种极端状态进行反

思(米尔斯, 1979; 班布里奇和斯塔克, 1979; 约翰逊, 1979; 纳泊尔, 1980)。

15年后, 当圭亚那集体自杀的记忆刚刚退逝, 历史又重现了, 这一次则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生在得克萨斯州一个叫做瓦口的地方。这个团体叫做“大卫宗”, 是“安息日复临会”中的一个分支的分支, 其领袖是一个33岁的前摇滚音乐家、自称是先知的男子, 他出身于维森·豪威尔(Vernon Howell)家族, 却冒称自己是戴维德·科内什(David Koresh)家族的成员。

与“人民圣殿”教的成员一样, 大卫宗的成员们从现实世界中隐退, 过着一种封闭的、共同体式的生活。这两个团体都有一些在外部的观察者看来十分古怪的行为: 科内什, 这个上到九年级就辍学的男子, 竟以他的一些女信徒为妻, 其中的一些妻子才12岁, 他同时还被看成大卫宗聚居地中所有孩子的父亲。与琼斯一样, 科内什也担心他的敌人们会采取某些行动, 他也为抵御攻击做好了准备, 只是他采用的方式是囤积相当数量的军事武器以备它日之用。

1993年2月28日, 联邦酒精、烟草和武器管制局的特工试图对大卫宗用围墙圈起来的聚居地进行偷袭, 但是行动失利, 4名特工和6名教徒在此番交火中丧生。双方僵持了51天后, 4月19日, 由联邦调查局和装甲兵训练部队采取的联合进攻为事件的结局拉下了帷幕。在抵抗过程中, 科内什的宗教团伙点火烧毁了他们的聚居点, 86名信徒, 其中至少包括17名14岁以下的孩子, 以及科内什本人共焚于这场大火之中(贝克, 1993; 坎特罗威茨, 1993a, 1993b)。

专门研究宗教的社会学家常常会接受请求, 参与研究发生在琼斯镇和瓦口的这类悲剧。本章的一些内容会有助于你去理解, 信徒们是怎样发展到对其宗教如此痴迷, 以至于心甘情愿为信仰而献身的。不过, 宗教社会学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了更加传统的各种宗教表现形式上, 这些传统宗教在美国社会中是随处可见的。

研究显示, 作为一个群体, 美国人事实上比绝大多数的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中的公民更信奉宗教。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 95%~98%的美国人坚定地表示了他们对上帝的信仰(鲁夫和麦金尼, 1987)。在美国, 正式加入某一教会的现象不仅司空见惯, 而且这一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在今天仍保持着上升趋势, 在1850年, 仅有16%的美国人归属于有组织的宗教教派, 而到了1991年, 这一数字已上升为59%, 达到了1.47亿人之多。

如果这些数字是准确的, 那么, 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会认为, 美国是一个宗教正在逐渐丧失其重要性的世俗社会呢? 也许, 对问题的解释部分在于对“信奉宗教”的定义上, 我们可以把所有宣称具有某个正式宗教组织成员资格的人都看成是虔诚的宗教教徒吗? 或认为, 宗教作为一种更加强烈的个人体验, 不能以是否加入某个宗教组织作为测量的标准? 这些都是我们在本章将探讨的部分问题。下面, 我们将透过理论的视角, 就宗教与社会的联系方式、宗教组织、美国人生活中的宗教以及世俗化等问题进行一番考察。

社会学家和神学家都认为,宗教(reigion)这个术语可以被用在很多行为上面。某本词典是这样来定义宗教的:“以崇拜的形式、对圣命的遵从……以及对一种被认为是真正信仰者之义务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等方式,表达出的对上帝或神的礼拜和敬慕”。由于这一定义过于狭窄,因此它未能涵盖某些宗教行为和宗教体验。也正是因为宗教表现形式的这种多样化,才使得对宗教下定义非常困难,社会学家们在宗教的定义问题上也各具见解。其中一个较好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操作化定义把宗教看成是“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某群人对其感受到的神圣之物、通常还包括超自然的东西,进行阐释并作出反应”(约翰斯通,1988)。

不管这一术语被如何定义,大多数观察者认为宗教主要是与超自然的现象相关(斯塔克和班布里奇,1979,1985;哈蒙德,1985)。与这一着重点相对应,宗教几乎总是涉及到信仰,即一种不被或不能被科学证据或材料证实或证伪的信念。

1

宗教的类别

有神论(theism),即对一神或多神的信仰,是西方社会中最常见的宗教类型。在西方,有三种主要宗教具有历史重要性:它们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几种宗教都是一神教(monotheism),即只信仰一个神。它们还拥有正式的宗教组织、神圣仪式、圣典以及牧师或教士制度。

基督教包括罗马天主教、各个新教教派和东正教三大部分,信徒已超过18亿人,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其次是伊斯兰教,拥有10亿信徒,它同时还是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威克斯,1988)。犹太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中规模较小的宗教之一,大约有1800万教徒(关于世界各宗教信徒的估计人数,参见表16—1)。

表 16—1 世界各宗教的成员估计值(1993)

宗教	成员数	
	千	百分比
基督教徒	1 869 751	33.5
罗马天主教徒	1 042 501	18.7
新教徒	382 374	6.9
东正教徒	175 560	3.1
英国国教徒	75 847	1.4
其他基督教教徒	195 470	3.5
伊斯兰教徒	1 014 372	18.2

续前表

宗教	成员数	
	千	百分比
非宗教人士	912 874	16.4
印度教徒	751 380	13.5
佛教徒	334 002	6.0
无神论者	241 852	4.3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者	140 956	2.5
新宗教信仰者	123 785	2.2
部落宗教信仰者	99 736	1.8
印度锡克教徒	19 853	0.4
犹太教徒	18 153	0.3
萨满教徒	10 854	0.2
儒教徒	6 230	0.1
巴哈教徒	5 742	0.1
耆那教徒	3 927	0.1
神道教徒	3 336	0.1
其他宗教信仰者	19 183	0.3
总人口	5 575 954	100.0
注：由于舍入运算，总人口数不是精确值		

资料来源：经许可摘自《1994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93年版权，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主要流行于印度的印度教是一个多神教（polytheism）的例子，它信仰多个神。印度教是成百上千个地方化的信仰和仪式体系组成的松散集合，据称有 7.5 亿信徒。在印度，每个村庄和种姓都有自己的神，在宗教节日上，这些神会受到人们的敬奉。某个特定的地方，比方说一座神殿、一眼圣井、一棵圣树或者是一块圣地，会被保护起来专供祭祀之用。其他村庄或种姓的神如果被认为具有特别强大的威力，或是被认为护佑着人们生活中的某些重要方面的话，例如，农作物的收成或生儿育女等，那么这些神灵也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

对西方人而言，世界上其他的一些主要宗教，例如佛教、儒教、神道教以及道教等，就显得比较陌生。这些超验唯心主义（transcendental idealism）宗教并不崇拜某个神灵，而是以一套伦理、道德或哲学原则为中心（在实践中，许多佛教徒的确也把佛当作神来敬仰，不过这并不是正式的教义）。

佛教、儒教和道教都致力于达到一种道德或精神上的启迪。这意味着达到佛“途”或孔子的“礼”是这些宗教的中心目标。主要盛行于日本的神道教，是一个关于光宗耀祖的行为准则和仪式的体系，它使得对父母的责任（这也是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许多宗教的组成部分）成为宗教情感和奉献的核心内容。儒教中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不过在其他东方宗教中，则拥有一个

负责行使宗教职责、维护宗教价值观念的特殊群体。所有的这些东方宗教都拥有一些仪式和圣典。

上述宗教都有悠久的历史（印度教也许是最古老的宗教，发轫于大约6000多年前）。经历了数世纪的演变，它们已经发展成了信仰和行为的复杂体系。在世界各地，它们为了能够适应20世纪的人类生活境况，已经对自身做了一定的调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们同时也是“现代的”。

比较而言，前文字社会的宗教在遇到必须顺应现代的环境而改变自己的情况时，它们常常面临着艰难的挑战。前文字阶段的人类宗教的一般形式是图腾崇拜（totemism），即把某种动物（在极少情况下，也把植物）作为神或祖先加以崇拜。那些被称为图腾（totem）的圣物往往在人们的生活共同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食物的来源或是某种危险的食肉动物。在宗教仪式中，人们学习并表演以模仿图腾的行为为特征的独特舞蹈，并且穿戴着特定的服饰和其他图腾象征物。人们还可能在公共的仪式宴会上享用图腾动物，或者沉浸在与图腾的某种交流形式之中。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图腾崇拜是最初的宗教形式，其他形式的宗教组织则是从它演变而来的（迪尔凯姆，1915）。

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其他宗教形式包括简单的超自然崇拜（simple supernaturalism）和泛灵论（animism）。作为一种宗教类型，前者是指该宗教没有确定特殊的神或精灵，但是相信有影响人们生活的超自然力的存在；后者则认为有活生生的精灵在操纵着这个世界。在西方世界，简单的超自然崇拜的一些形式包括了诸如幸运的四叶苜蓿^①和不幸的星期五、十三号等迷信。泛灵论的宗教通常认为在风、雪、雨等自然力量背后存在某种精灵，因此常常集中于旨在影响这些自然力量的巫术仪式上。雨舞，就是泛灵论仪式中最常见的形式之一。

今天，图腾崇拜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新几内亚的一些部落中依然存在。在包括美国西北海岸一些部落在内的美洲土著人中，他们过去常常也会雕刻出一些精美的、装饰性的木质“图腾柱”。而简单的超自然崇拜在南太平洋群岛上还依然存在。在一些非洲部落中，泛灵论也还很普遍。

2

宗教与人类境况

像家庭一样，宗教是最普遍存在的人类设置之一，它也同样展现了人类境况的一些基本方面。以下几点则表明了宗教给信奉者的生活带来的效用。

1. 宗教提供的支持和慰藉，有助于人们克服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未来的焦虑。生活总是难以预料的，因此人们常常感到焦虑和恐惧。宗教帮助我们去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通过对来世的承诺，多数宗教为死亡，这一最终的未知领域，提供了特定的安宁和希望。

2. 宗教为人类的存在赋予了意义和目的。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苦苦

^① four-leaf clovers；四叶苜蓿，也叫幸运草，极少见。传说中认为可以给发现者带来好运。

追问：“我为何在此处”？而宗教通过在更宏大的、神圣或超自然的事物体系中解释人类的角色，来帮助人类回答这个问题。此外，在对生命意义的探求中，也包括了对绝对的道德内涵和标准的追求，而这也可以从宗教中得到解答。因此，宗教同时也充当了评判各种行动、目标、理想、观念，甚至社会本身的准绳。

3. 宗教使人们可以超越日常生活。大多数人似乎渴望与超越了日常生活界限的“他者”建立某种关系。宗教通过其神圣“他者”或“超凡”的信条，帮助人们实现这一愿望。这些信条还培养和鼓励一种超脱凡尘和超越自我的感受。

4. 宗教帮助人们发展出一种认同感。宗教通过向人们提供某种特定组织中的成员资格，帮助人们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较之其他组织，宗教组织提供了更强的认同纽带，因为它鼓励人们去分享一些“终极”的价值和信仰。

5. 宗教帮助那些处于生命转折阶段的人们。所有宗教对人类生命周期中的主要事件：出生、青春期、结婚以及死亡都进行了注释，并围绕这些事件发展出了一套仪式体系，人类学家把它称做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人生中的这些转折阶段总是给人们及其家人和朋友带来紧张，而宗教所提供的“通过仪式”（婚礼、洗礼和葬礼），则有助于人们消除这种紧张。在与丧礼和临终告别相关的一些仪式中，它还能带给人以安慰。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它还能为人们适应一些新的角色而提供指导，有关青春期和结婚的“通过仪式”（例如犹太教中为庆祝青少年进入成人期而举行的庆典以及婚礼等）就发挥了这种作用。

宗教并非是唯一能够帮助人们处理人类存在问题的社会设置。强烈的职业责任感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家庭、邻里关系、工作组织或国家，都能建构起一种认同感。社会和政治运动也能够带给人一种超越自我的感觉。然而除家庭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设置能像宗教那样，有效地帮助人们应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也没有一种设置能够像宗教那样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强烈的忠诚感和参与感。

3

功能主义 视角：宗教 与社会稳定

大多数社会学家对宗教满足特殊个人需求的方式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更多地关注宗教对整体社会而言所具有的功能。功能主义的视角强调了宗教在促进社会稳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宗教至少通过以下四种方式维护了社会现状。

1. 通过神圣仪式，宗教把社会成员联结在了一起。迪尔凯姆（1915）注意到，那种共同的忠诚感是潜伏在人们的宗教仪式和信仰中的一种巨大而神奇的力量。一个神学家可能用超自然力来解释这种力量的源泉，认为那是崇拜者们所敬畏的神的力量。而社会学家则不能用神学术语来对其进行解释，人们希望他们提供的，是对这些社会现象的经验性解释。在对澳大利亚土著部落阿伦塔（Arunta）的神圣图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迪尔凯姆指出：信仰者在参加宗教活动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其实质是社会对其成

员所施加的一种强制力。作为宗教社会学中的重要观点,迪尔凯姆认为,在对神圣力量和超自然力的颂扬中,人们实际上是在建构某种类似物,通过这种建构,人们表达出了潜意识中对社会加在个人身上的强大力量的感知。

迪尔凯姆进一步指出,当与我们同样虔诚的其他人也在场时,尤其是当我们参加以赞颂对社会中的他人承担责任为主题的宗教仪式时,我们会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因此,阿伦塔(Arunta)人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图腾的敬意而跳的仪式性舞蹈,同时也是对其部落统一的象征性表达,它使人摒弃个人私利,并产生一种可以共享的、被放大的部落成员间的团结感。图腾成为了社会所拥有的某种能力的外显象征物,这种能力使得社会可以接受或拒绝个人,以及改造和塑造个人。

2. 宗教强化了社会的基本规范和价值观念。社会规范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基础。宗教通过被赋予了道德含义的规范和价值观念,通过将这些规范和价值的某些部分神圣化,从而才能在人们的个人愿望与社会需要发生冲突时(例如在战争年代中),使个人毅然面对必须作出的牺牲。

尊敬父母是在家庭和学校中教导的一条社会规范。对于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来说,这条规范因为圣经中“要尊敬父亲和母亲”的戒律而被神圣化。同样,禁止婚外性关系的规范也因为圣经中“不应通奸”的戒律,而被给予了强大的道德支持。

表达这种功能的另一种方式,是指出宗教有助于控制越轨行为。世俗社会通过人为的报酬和惩罚来鼓励遵纪守法。宗教则增加了另外一种尺度:超自然力。那些服从宗教戒律、遵从社会规范的人,被许诺将会得到人力所不能及的回报:例如,在危急时刻神的相助、保护虔诚的信徒不受敌人伤害、生命将会永恒等等。而那些背离了戒律和规范的人,则会受到超自然惩罚的威胁,比方说时运不济,或者是备受折磨等等。

此外,宗教还为社会控制过程增添了超自然的“侦查”力。犯下越轨行为的人只有在有人看见并举报的情况下,才会受到社会的制裁(参见第八章)。通过将控制力延伸到未能被人察觉和报告的情况,宗教将应有某人来充当观察者的需要降到了最低点。神灵,或者是信徒们虔信的超自然力,自会明辨是非、扬善除恶。一些宗教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以至于去谴责仅仅是想法上的偏离;即使是在预期中的受害者一点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计划要杀某人或是希望别人遭遇灾祸,都要受到宗教的惩罚。因此,宗教对个人的良知有着很大的影响。

宗教也为越轨者提供了赎罪并重新加入社会的方法,例如洗罪仪式。在许多现代宗教中,赎罪常常还伴随着某种适当的自我惩罚形式,例如,更经常地去教堂,严格的斋戒,或者是取消某种休闲娱乐活动。由于大多数越轨者都清楚地知道怎样赎罪,同时也明白他们何时才能重新被社会所接纳,这种赎罪体系因此卓有成效。从而减缓了社会紧张,使社会控制得以维持。

3. 宗教可以使政府权威合法化。如果社会中的人们完全接受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的话,那么社会稳定就会得到巩固,因为这种接受使得人们更愿意遵守政府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在早期的政治体系中,宗教的这种功能表现

得十分充分。例如，古埃及的法老就同时被看作国王和神灵。任何违抗法老权威的人都有受到世俗和超自然双重制裁的危险。欧洲历史上的专制君主虽然没有被当作神灵看待，然而人们相信他们的统治是蒙荫于上帝的保佑之下的，对君主的不服从就等于对上帝意志的违背。虽然英国在1869年就实行了政教分离，但是英国国王和王后的就职典礼仍是由教会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来主持。像伊朗等国家至今仍在实行神权统治（theocracy），教会和国家在那样的社会中至少是部分重叠的。

甚至在美国这样高度世俗化的社会中，仍保留着这种功能的某些方面。在美国参众两院中任职的牧师的薪水是由公共基金来支付的，人们在宣誓就职时会习惯地将手放在圣经上，在我们的硬币和纸钞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的箴言。

4. 宗教有助于人们妥协于艰苦的生活和社会中的不平等。穷人和被压迫阶层往往更加坚守某些形式的宗教信仰。这些信仰可能包含了对获得救赎和来世的强调，以及与其相关的极严厉的道德戒律。让穷人们遵从于将他们置于社会底层的社会秩序所发出的指令，终究需要一个特殊的理由。由于他们不能从日常参与社会的方式中获得很好的补偿，因此他们就需要对他们的社会遵从有其他形式的回报。

而宗教正好能提供这些必需的原因和回报。任何宗教都给其信徒们提供达到较高道德地位的机会，这有助于弥补他们社会地位的低下。一些宗教强调所有信徒一律平等，一些宗教则把其拥护者们看成是特殊的精英。

宗教还试图通过影响上层阶级的行为来解决不平等问题。宗教一般都提倡仁慈、宽恕、友好、帮助不幸者以及放弃傲慢和虚荣。虽然这也许无助于改善贫困者和无权者的现实境况，然而这些主张却有助于减缓社会中的受压迫者和弱势者的不满情绪。

宗教的反功能

尽管宗教所具有的促进社会稳定、建构社会现状基础的能力通常被认为是积极的，然而在某种环境下，宗教保守的本性将为社会中的部分或所有群体带来一些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反功能。

第一，宗教可能会阻挠必要的变革。马克思将宗教比作“麻痹人民群众的鸦片”，就已经很清楚地指出了宗教的反功能。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积极同盟军（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1969）。他论证道，就像鸦片使人对身体的伤痛感觉迟钝一样，宗教使人们，尤其是使被蹂躏的穷人们，受到麻痹，从而接受社会中的不平等。因此，马克思认为宗教降低了人们追求必要的社会变革的意志力。

同样，宗教也会延缓思想领域的变革。当强有力的宗教组织在致力于帮助维护现行的规范以及文化中的其他要素时，就会将这些文化特质变得神圣化，从而对变迁产生更大的阻力。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对伽利略的天文发现的排斥。伽利略发现并不是太阳在围绕着地球运行，而是地球在围绕着太阳运行。由于教会致力于维护前一种认识，因此它们勒令伽利略推翻自己的发现，这样就明显地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表明宗教具有

反功能的例子还有：今天美国社会中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拒斥，以及一些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新教教会相继表示对上帝造物说的肯定。

第二，宗教能使政治冲突更难解决。绝大多数的政治斗争最终都是为了获取稀缺资源，例如土地或职位等。然而当斗争双方都给对方贴上宗教的标签时，冲突的解决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对手，较之宗教的眼光、道德的眼光，则会更易达成妥协。北爱尔兰的新教与天主教之间之所以存在长期的纷争，也主要是因为这个道理（比奇，1977）。在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的斗争中，以及中东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长期冲突中，宗教因素都在发挥着作用。

宗教和家庭

对家庭这种社会设置而言，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宗教有可能就是从家庭的活动中产生的。直到现在，家庭也仍被深深嵌入了宗教的意义。

宗教对家庭的影响首先是关于婚姻的理念。通过强化贞洁规范以及对合法结合之外的性行为进行谴责，宗教增强了婚姻的神圣性。1988年的一项研究揭示：参加宗教礼拜的人中，有85%反对婚前性行为，而这一比例在不参加礼拜的人群中为65%（盖洛普，1998b）。此外，宗教还影响着个人对婚姻伴侣的选择。尽管美国主要宗教都放宽了与不同宗教信仰者结婚的禁令，但是这些宗教团体仍然鼓励其信徒与宗教信仰一致的人结婚。

一些研究还发现宗教参与和婚姻稳定及低离婚率呈相关关系（盖洛普，1988d；基德森、巴布里和罗奇，1985；阿尔布雷克特、巴尔和古德曼，1983）。对其进行解释的一些理论也相继被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参与某种教会鼓励人们遵从于社会的期望，即宗教能使人们更加坚守社会关于婚姻的理想形式。另一种看法是认为具有宗教信仰的夫妇分享同样的规范和伦理信念的可能性更大。此外，通过极力反对甚至禁止离婚，宗教团体也能有助于保持其成员婚姻的完整性。

宗教还影响着孩子们的社会化过程，因此它对家庭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宗教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办教区学校，制定教育课程，另一方面还间接地提倡关于子女抚养和教养的社会规范，从而或明或暗地参与了孩子们的社会化。

许多宗教都把自己的神灵想象成家庭中的成员，这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宗教里的神是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出现的，例如，印度教中的湿婆（Siva）和卡里（kali）。一些宗教里的神则是以兄弟姐妹的关系出现的，像古希腊宗教中的阿蒂弥斯（Artemis）和阿波罗（Apollo）。埃及人的神奥斯利斯（Osiris）和伊斯（Isis）既是夫妇，又是兄妹。父母—儿女关系在神灵中也很普遍，像基督教中的上帝和耶稣就是父子关系。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最古老的宗教形式的母性崇拜，在史前的宗教艺术中有大量的反映。在今天仍旧存在的母性崇拜包括对印度教中的女神以及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然而目前最普遍的神灵仍然是以父亲的形象出现的，他对孩子们（即信徒们）既仁慈又严厉。

冲突论视角： 宗教与 社会变迁

对社会稳定的促进可能是宗教在社会中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这当然也是社会学家分析得最多的地方。但是宗教并不总是支持原有状况的。正如以韦伯为传统的冲突论中所强调的那样，宗教也可以成为一种造成纷争的力量。当对现状不满的人攻击现存制度，寻求社会变革时，宗教往往是一种号召力。一个宗教团体可以将不满的市民们召唤到一起，给予他们共同的利益，提供一种组织化的力量。宗教还能赋予这些反叛者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对社会变革的要求合理化。简言之，宗教可以成为改变社会秩序的现成基础。通观人类历史，宗教的狂热和理想已经导致或加剧了多起全国性革命和国际纠纷。两个重要的例子就是16世纪的新教改革和当代的伊斯兰战争。

新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16世纪，欧洲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伴随着这一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基督教中一种新的制度形式——新教的兴起。这场影响了欧洲生活各层面的新教运动，从两个方面对这场社会变迁的产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方面是这场运动将社会中的各个组成要素统一到了一起，另一方面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给予的支持。

1500年，欧洲处于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经济仍处于农业阶段，物物交换还很流行。中产阶级的数目极少，几乎没有任何地理上的和社会的流动。仅有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生活在城市里。几乎所有欧洲人的生活都被对社会上层的依附和对社会下层的责任所桎梏着。

罗马天主教会的内部结构与世俗世界中的封建组织极为相似，它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系统予以极大的支持。教皇对反叛者以逐出教会相要挟，帮助不止一个国王镇压了反叛和起义，保住了其统治。

到了1600年，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业和制造业经济稳步成长，城市逐渐扩展，并开始在国家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赢利机会出现，并且不再需要投资农业时所需的巨大资本，中产阶级的规模得到了迅速增长。在新的宗教发展的推动下，封建体系开始瓦解了。

新教改革发生在16世纪，源于德国偏远地区天主教牧师间的一场教义之争。然而不久，新教的思想便吸引了许多对现存社会制度不满的人们，其拥护者遍及各行各业。在新教教义的感召下，不管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不管是来自上层阶级或是社会底层，不管是来自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还是封建成分，那些持异议者都被团结在了一起。新教成为能使他们联合起来的惟一的、充满激情的事业。宗教的结合力将这些人凝聚成重建社会的主力军。

在经济领域的变革中，在向资本主义的转换中，新教是一个极其有效的动因。韦伯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30）中指出，在新教的价值观与获得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新教信仰中对勤奋工作大加赞誉，其教义认为尘世间的繁荣是上帝宠爱的标志，这些思想与资本主义所推崇的勤俭、主动、竞争、进取的价值观十分

吻合。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观点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一些批评者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激发了新教的出现,而不是相反。这一立场的支持者们认为,新生资本家的强大经济力量足以使教会沿着能够支持他们经济活动的方向发展。

毋庸置疑,在16世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许多力量都发挥了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令人信服地提出了新教信仰促进资本主义兴起的论点。然而正如韦伯自己也相信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同样促进了新教的壮大。一种新的宗教体系与一种新的经济体系齐头并进,彼此支持,共同促进了对方的发展。

好战的伊斯兰教和伊朗革命

1979年,伊朗的君主政体解体,一个新的政府和剧烈转型的社会随后建立。这是宗教作为革命性的社会力量而发挥作用的一个较近的实例。在这一事件中,作为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及伊朗国教的什叶派,是革命的载体。什叶派为沙哈王朝^①的反对者们提供了通讯网络、制度化的结构、思想观念和人员的准备,使革命得以传播和发展壮大。什叶派牧师中的一个重要领袖霍梅尼,成为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把宗教与革命运动融合在一起,使霍梅尼终于实现了推翻国王的梦想。在此之前,尽管不少人都曾经做过推翻国王统治的尝试,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贝纳德和哈里扎德,1979;贝纳德和哈里扎德,1984;迪里普,1985)。

显而易见,如果伊朗人民不是前仆后继地献身于这些滋生了革命的宗教理想的话,伊朗革命就不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远非仅仅只是一种宗教。它是对整个生活方式的规定。穆斯林认为他们的真主“阿拉”授意他们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这种简朴性涉及对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方式的效仿,提倡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避免极端的贫穷和富有。西方的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性放纵和军事强权被视作对伊斯兰宗教完整性和传统的威胁。因此,伊朗革命不仅表现为新旧事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它还意味着延续至今的神圣与世俗之间根深蒂固的冲突。

迄今为止,伊朗的伊斯兰教政府的首要目标一直是希望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不仅要反抗压迫,消除腐败,还要抵御外来势力干涉穆斯林的事务。新政府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它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在外界看来却过于极端。1989年,霍梅尼在临终前发出了对拉什迪的暗杀令。因为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被视为异端邪说,并且冒犯了伊斯兰教的信仰。这一追杀令的发出震惊了全世界。许多领导人都对拉什迪表示支持,强烈抗议伊朗宗教领袖的这种做法,认为霍梅尼没有权力宣判一位他不赞同的作家的死刑。

伊朗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当一个国家在为自由或独立而奋斗的时候,这两种社会设置会倾向于紧紧交织在一

^① “沙哈”(Shah)是伊朗国王的称号。

起。伊朗革命的目标会最终胜利吗？伊斯兰的宗教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系统呢？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还需一些时日，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激进的伊斯兰教已把自己看作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容不得当今世界的忽视。

宗教组织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宗教的各种类别，以及宗教影响个人和社会的一般方式。但是，我们还必须把宗教本身当作一种设置来理解。了解宗教的重要要素和宗教组织的主要类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为一种社会设置的宗教的性质。这种社会设置已是许多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宗教的要素

绝大多数的宗教都包含了四个基本要素：圣物或圣地、仪式、信仰体系，以及信徒组织。

神圣物

按照迪尔凯姆的观点，世俗（the profane）是由日常生活中被看成普通物质（自然）世界组成部分的一切要素所构成的。而与它相对的神圣（the sacred）则是由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的，能够唤起由衷的敬意和敬畏的事物。不管人们认为敬畏感的最终源泉是超自然力或超然之物，还是同意迪尔凯姆的理论，认为对社会加在个人身上的力量的下意识认知是对信仰者敬畏感的最好解释，这种由神圣所引发出的敬畏感总是潜在的、最基本的宗教动力。只要面对神圣之物，人们通常就会感到触及到了生命永恒的源泉，并且相信他们正在体验一种不能仅仅用理智就能理解的特殊力量。神圣之物是如此令人神往，它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由于它的威力，使得人们也不禁感到畏惧。

对神圣事物的体验常常与物质实体相联系，像祭坛、神像、十字架等。几乎任何东西都能被看成是神圣的。它可以是特定的地点，例如一片树丛，一股喷泉，或是一个洞穴；也可以是特定的时间，例如日出时，或复活节；还可以是动物或植物，像牛、响尾蛇，或树等。有时，神圣是与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火山喷发或是河流泛滥。一些具有超常能力的人和非常事件发生的日期也能被看作是神圣的。

例如，橄榄树是伊斯兰教的圣物。对基督徒来说，圣餐仪式上的面包和酒象征着基督耶稣的身体和血。在印度，印度教的教徒们认为在恒河里沐浴可使身体和灵魂都能得到净化。犹太教徒为了祈拜耶鲁撒冷的圣地“哭墙”，不远万里地从世界各地去那里朝圣。

仪式

宗教仪式（ritual）是与对神圣事物的体验密切相关的、已确定的行为模式。仪式常常出现在表达或唤起对神圣事物的强烈体验，或向圣物祈求神

力相助的时候。例如，通过在尼罗河沿岸举行特定的仪式，古埃及人认为他们是在引致或象征性地参与给他们的土地带来必需水源和淤泥的一年一度的河水泛滥。仪式还是保护圣物免遭世俗玷污的一种方式。例如，圣餐杯就不能作为日常的饮具。它只能被用于一些特定的典礼，装满特殊的酒水供人们轮流饮用。

仪式是一种组织宗教信徒的手段；它将信徒们集合为一个群体。心理学家认为，仪式的重复有助于恢复人们的整合感、认同感和安全感。例如，通过在正式仪式上祭拜鳄鱼，一些非洲部落认为他们正在保护自己免受这些可怕动物的攻击。

仪式自身通过与神圣事物的联系，也能变得神圣起来。在仪式中用到的一些物品，例如使用的草药或药剂，参加者穿戴的衣服，举行仪式的场所，都能令人产生敬畏感。

信仰体系

宗教信仰体系是宗教的各要素中经历了最多演变的部分。在传统的宗教中，信仰体系的主要功能就是把圣物和宗教仪式联系起来，并且界定和保护这些神圣事物。例如，在《旧约全书》中，上帝被描绘成能用人类的语言来理解的一位神通广大的形象。而上帝的抽象概念则被转化为了人们可以识别和与其发生联系的一种象征符号。

信仰体系还对宗教仪式的意义和目的加以阐释。例如，穆斯林都知道在做晚祷前必须清洗自己，因为身体的干净象征着道德的纯洁，而在真主面前，一个人在道德上必须是纯洁的。在这里，清洗仪式就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事件。

大多数现代的宗教信仰体系已不只是仅对宗教的其他要素提供支持，他们常常还包括一些被认为是重要真理的道德主张，例如人人平等的思想。尽管这些信念并不一定被信徒们看成是神圣的，但它们的确带有神圣的性质。由于它们常常被纳入宪法、政治意识形态和教育上的学说，这些信条不仅对宗教本身，而且对一个社会中的非宗教性事务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教徒组织

教徒组织是为了确保宗教经验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而必须建立的。指导宗教仪式、建造祭拜场所、以及挑选专司保护圣物之职的牧师、僧侣和教士，都需要某种形式的组织。例如，蒙大拿州大瀑布区第二卫理公会就修建了教堂，选聘了牧师，购买了赞美诗集和管风琴，并且征募了唱诗班。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信徒们能够在礼拜天上午来到教堂，共享对神圣事物的体验。

2

宗教组织的类型

社会学家一般把宗教组织划分为四种类型：国教（ecclesia）、教会（church）、教派（sect）、膜拜团体（cult）。韦伯（1922，1963）曾对教会和宗派进行了区分，他的学生特勒尔奇（Troeltsch，1931）第一次在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中赋予这种分类法以重要意义。尽管在概念上我们能够区分这些组织类型，但在现实中要把它们区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国教 (ecclesia) 是一种宣称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其成员的宗教组织。通常, 国教被认作是国家的官方宗教, 在有些情况下, 它对于政府的政策和实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国教成员资格的获得是非自愿性的, 作为一个公民自然就成为了国教成员。尽管在当今世界中也许没有真正的国教, 但是爱尔兰共和国的罗马天主教和伊朗的伊斯兰教可以被当作近似的实例。

教会 (church) 是一种由宗教信徒组成的相对稳定、制度化的宗教组织。其特征包括了明确的管理和教职等级制, 以及详细阐述的教义或教条 (dogma, 它们通常覆盖了大多数一般的人类境遇以及详尽的仪式体系)。一些社会学家在提及韦伯指的教会时, 倾向于使用另一个相对不容易产生混淆的概念: 宗派 (denomination)。与国教不同的是, 宗派与社会上的其他类型的有组织宗教是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 即我们通常所指的“宗教多元化”。

宗派还有另外几个特征: 他们吸收的新会员大多是现有成员的子女, 这一举措保证了其成员的连续性, 但也有可能使那些不是那么真心实意的教区居民也混入其中。其次, 宗派的领导人往往是经过正式培养并被授予证书的。最后, 大多数宗派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的支持, 比从穷人那里获得的支持更多。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现象: 即虽然宗派在一定程度上把社会看成是罪恶的, 然而它们却常常劝告其成员要积极参与社会, 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与一些教派所宣扬的退隐现实形成对照。

教派 (sect) 在正规组织化程度上比宗派要低一些。它的领导人通常缺乏正式的培训, 在一些情况下主要是依靠其个人魅力作为权威的基础。在典型情况下, 在宗派中需要由宗教专职人员来执行的功能, 教派中的普通成员就能行使: 他们可以招收和指导新成员, 主持礼拜和其他仪式, 甚至可以对神圣信仰和实践进行阐释。因为教派成员积极地参与组织的各种活动, 他们比宗派成员更忠于自己的组织。

宗派的新成员主要来自现有成员的子女, 而教派则不遗余力地网罗改变宗教信仰的人。加入教派者的职业和教育地位一般比宗派成员低。他们对其生活现状更有可能不满, 这一因素也使他们对其宗教更加忠诚 (约翰斯通, 1988)。

许多教派强调宗教感情的深入和纯洁。忠实和激情是重要的教派价值观。由于教派坚决拒绝就其宗教原则进行妥协, 他们常常在信仰的问题上与其他社会设置发生冲突。按照一位观察家的说法: “教会是接受其存在的社会环境的一种宗教团体。而教派是排斥其生存环境的一种宗教团体” (B. 约翰逊, 1963)。

教派通常是由一些拒绝现有宗教某些方面的人所组成的。新团体一般是从旧有的、已确立的宗教实体中分离出来的, 并且攻击旧的实体离经叛典。教派还通常以回归到原初形式的“纯洁性”作为口号。

一些宗教团体, 像长老会、浸礼会以及“安息日复临会”在成立之初都是以教派的形式出现的。幸存下来的绝大多数教派都企图抛弃其纯粹状态, 而成为新的宗派。在他们的演进过程中, 教派甚至与他们最初分离出的宗教组织重新合并。当教派的规模日益扩大, 它们也日趋官僚化; 其结果是使教

派原先所具有的自发性和灵活性开始消失。当一个教派变得越来越像宗派时,对其学说和教条不满的一些分子就会从中分离出来,建立新的教派。(尼布尔,1929;斯塔克和班布里奇,1985)。

最后的一种宗教组织类型是膜拜团体(cult),这一术语近年来为媒介和普通公众所广泛使用。在社会学中,膜拜团体传统上被定义为与教派相似的一种团体,它们拒斥现有宗教的某些方面。它们还在其他几个方面具有教派的一些重要特征,然而它们与教派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是从现存宗教实体中分离出来的,而是或多或少建立起了一些全新的宗教。因此,它们不是为了号召对旧有形式的回复,而是常常设计出新的神圣标志、仪式和信仰体系。膜拜团体通常特别强调个体,集中关注使其信徒能够获得所渴望的精神体验。

然而,在通常的用法中,“膜拜团体”这一术语具有多种含义。它常常被用来描述一些小型的、非传统的、引起了广泛社会不满的宗教。流传的关于膜拜团体的主要消息称,其成员是一些受一个宗教骗子所摆布的怪人。一些通常被认为是膜拜团体的宗教,包括大卫宗和克利须那教,实际上都是从现有宗教中分离出来的宗教团体,把它们称为教派其实更合适。另一方面,一些在社会学家看来应归到膜拜团体中的相对主流的宗教团体,例如基督科学派等,却普遍被认为是教派或甚至是宗派。由于这些原因,许多社会学家感到“膜拜团体”这个术语太易混淆,又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所以我们应干脆抛弃这一概念,将那些小型的、非正规的、相对非传统的宗教统称为“教派”。

在任何情况下,传统上被社会学家贴上膜拜团体标签的宗教团体通常都建立在一种新的启示、一位新先知的洞察、或是一份不为人知的经文片断的发现等事件基础上的。它们在历史上都是由强硬的、神气十足的领袖所领导,例如,迪瓦伊尼(Devine)神父、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吉姆琼斯、戴维德·科内什(David Koresh)和文鲜明(Moon)牧师。由于膜拜团体所具有的非正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常处于社会主流之外。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很短命,但是其中的一些发展成了已经确立的主要宗派。

教派和宗派为什么会形成,它们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按照一种理论的说法,人们之所以被驱使去建立一个新的宗教团体,是因为他们希望以此来减轻自己的被剥夺感(戈洛克,1964;巴克,1982;斯塔克和班布里奇,1985)。下列几种类型的剥夺感会促进新宗教的发展。一种可能是经济上的,那是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收入,而且获取物质产品的途径又受到限制;也有可能是社会性的,那是因为人们缺乏地位、权力和声望,而且也不具备加入某些组织或参加某些活动的的能力;剥夺感还可能是心理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某人获得社会给予的一些物质回报,也会感到对社会不满或被社会所排斥。

按照这一理论,在经济剥夺感的刺激下,宗教运动会发展为教派;在心理剥夺感的激励下,社会运动则会发展为膜拜团体。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会受

到这些团体处理剥夺感的方式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这种剥夺感是否会波及更大社会范围，并且能否吸收更多成员的影响。比方说那些在萧条时期由经济剥夺引起的宗教运动，它们或许很快就会消失，或许为了生存而改变其组织形式。它们选择那样做，可能是因为剥夺本身已经不存在了，也可能由于这个团体已经成功地帮助其成员战胜了它。

三 美国生活中的宗教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考察美国社会中宗教和宗教生活的一些特征。美国人的宗教态度和宗教设置充分反映了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但是，美国的宗教设置还受到美国所独有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政府的民主制架构、广为接受的诸如宽容和乐观等价值观念，以及人口中多样性的民族和种族构成，都对美国宗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宗教与美国文化

美国的宗教生活所具有的显著特点是它的多样性。目前，美国大约有85个至少拥有5万名成员的、有组织的宗教宗派，而拥有较小成员规模的宗派则有成百上千个（《美国及加拿大教会年鉴》，1991）。宗教的多样性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多元化，后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的历史源头。这与那些只有一种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有官方宗教或国教的国家、或那些教会和国家尚未分离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美国许多最初的定居者都是来自欧洲的宗教反叛者，所以甚至早在《民权法案》颁布之前，宗教宽容性已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早期的移民定居点中，这种宽容性相对要少一些。因为大多数的宗教异议者都想使他们的宗教成为官方的、或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然而随着殖民地的发展，宗教的多样性变得更为明显，人们最终不得不学会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宗教。没有一个宗教团体能够占据支配地位。到18世纪末，宽容的价值观已成为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从而被写进了美国宪法。

美国是建立在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基础上的。作为宪法的一部分，这一原则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与英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没有官方的宗教。而且，政府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压制任何特定的宗教。尽管有人认为最高法院对这一分离原则的阐释过于极端，例如，制定了禁止在公立学校中祈祷的规定，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条原则会起到保护这个国家中各个宗教的作用。

美国宗教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乐观性。那些对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大为赞赏的宗教在美国很少能够稳固住其成员。美国的宗教信仰通常更加关注宗教生活的积极回报（例如，安全、心灵的平静和天堂般的来世），而不是诸如诅咒和永恒的痛苦之类对宗教过失的惩罚。彼得·伯格（Peter

Berger, 1967) 认为美国宗教中的这种正面性的强调源自于宗教的多元化。所有的教会都在与其他教会争夺成员, 因此它们的教条从总体上来说必须是吸引人的。伯格用市场的语言来表述了这种吸引力。

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来说, 宗教设置的“产品”必须是“卖得出的”。用地狱炼火和诅咒来威胁中世纪农民之类任人摆布的听众是一回事, 要向郊区“通勤族”和家庭主妇们兜售这种教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换言之, 现在是必须考虑顾客“需求”的时候了。

美国宗教的另一个正面特征是它受反对教权主义 (antidicalism) 的影响较小。反对教权主义是指人们对牧师和教士的厌恶和不信任。在那些封建社会时教会曾拥有大量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国家中, 反对教权的倾向尤为明显。在那些社会中, 普通老百姓惧怕和厌恶那些属于富有、暴虐的上层阶级的圣职人员。对于建立在封建体系已经终结之后的美国来说, 这些事情则从来没有发生过。

罗伯特·贝拉 (Robert Bellah, 1967, 1970) 指出, 尽管美国具有宗教多样性, 并且政教分离, 但是有一种十分精细的国民宗教 (civil religion) 已被大多数的美国人所接受, 并且已经整合到了公众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按照贝拉的说法, 这种国民宗教是建立在“国父”这种基督教取向基础上的。虽然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等人避免公开地提及基督耶稣, 但是他们常常提到上帝。国民宗教中的神大体说来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 但他绝不能特指天主教或浸信会、犹太教或是卫理公会的神, 因为这个神是所有美国人的、而不仅仅是某些人的上帝。这个上帝才是总统和其他的政治家们经常在重要的政治讲演中提到的, 才是我们在硬币和纸钞上印的那句箴言所说的: 我们所信仰的上帝。

在美国的国民宗教中, 民主制和美国社会的其他特色形式已近乎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就像十字架和教堂建筑在基督教中被视为神圣之物一样, 国旗及白宫、阿灵顿国家公墓等场所对所有美国人来说都负载了神圣的意味。国民宗教的上帝被认为对美洲有着特殊的兴趣, 因此美国也被认为赋予了特殊的、崇高的圣命。在某种意义上, 美国被看成了新的以色列, 而美国人则被看成了上帝新的选民。这些信仰被用于, 也有的人说是被误用于, 使“显耀圣命”的教条合法化, 从而支持了 19 世纪中叶美国在整个北美大陆的扩张, 以及最近发生的对科威特、格林纳达以及索马里的军事干预, 其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等美国的神圣价值观。实际上, 美国的国民宗教促发了某种形式的国家主义, 使得国家本身获得了至少是“准”神圣的地位, 成为宗教信仰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从爱国主义到偶像崇拜 (切斯特, 1988)。

宗教信仰

如果用宗教信仰的强度来衡量的话, 那么美国在所有主要的西方社会中也许是最信奉宗教的。1981 年的一项跨国调查表明, 85% 的美国人“进行祈祷、冥想或沉思”, 79% 的人“从宗教中获得安慰和力量” (《哈佛分析》, 1986)。这些国家中惟一可以与美国相比的只有爱尔兰共和国, 有相同比例的人从宗教中获得安慰和力量, 稍少一些的人 (81%) 做祷告。

调查还显示了欧洲国家的人民不如美国人那样信仰宗教。在英国，只有50%的人做祷告，46%的人从宗教中获得安慰和力量。在瑞典这个所有调查国中最不信仰宗教的国家里，仅有33%的人做祷告，27%的人从宗教中获得安慰和力量。在信仰上帝以及相信天堂的比例中，美国也是最高的，分别为95%和84%。在英国，这两个比例分别为52%、26%（参见图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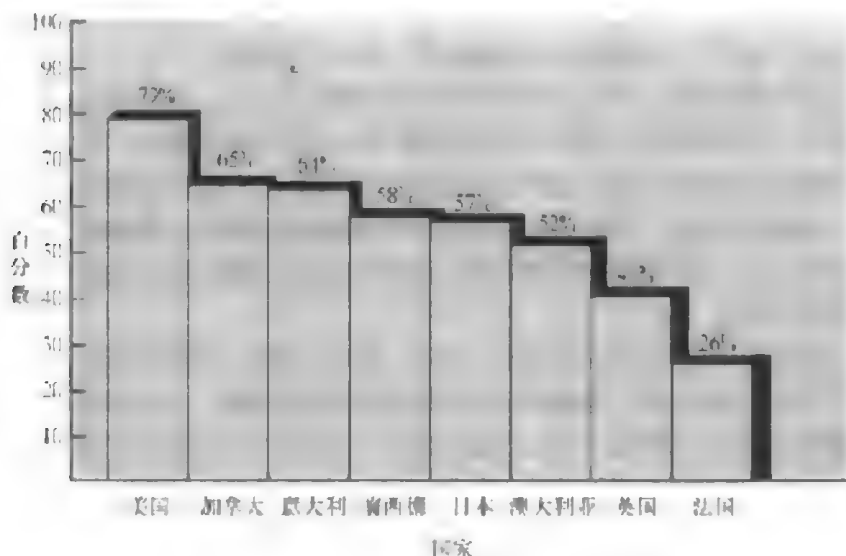


图 16—1 宗教在人们生活中重要性的跨国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咨询研究调查》，《国际公众舆论索引》，1980—1981，526页。

尽管有上述发现，但是也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宗教信仰在美国正在衰退，这个国家正在面临与欧洲一样的情况（格伦，1987）。在1957年，81%的美国人认为“宗教能够对当今所有或绝大多数的难题作出回答”。到了199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61%。在1965年，7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尤其重要。而1991年的数字已降到了55%。同样，从1963年到1991年，相信“圣经是上帝的真实言语”的人已从65%降到了32%（盖洛普和“新港”调查，1991a）。

2

宗教成员资格 及宗教倾向

1991年，有1.47亿以上的美国人声称自己属于某个宗教组织（《美国及加拿大教会年鉴》，1991）。这一数字占全国人口的59%。如果将宗教组织以三种宽泛的信仰（新教、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来划分的话，新教徒的人数最多。如果按宗派来划分的话（参见表16—2），则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分布。罗马天主教的信徒比第二大的浸信会的信徒人数多出一倍以上。尽管浸信会分为15个不同的宗派组织，例如，美国浸信会教友协会、美国保守浸信会教友协会、自由意愿浸信会等等，然而罗马天主教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单个宗教团体。拥有1400万成员（相当于罗马天主教成员数的四分之一）的卫理公会，则是第二大宗教团体。

有关美国宗教组织人数的数字并不总是那么可靠的。每个团体都倾向于

夸大自己的成员数，而且并非所有的宗派都保存了细致的纪录。此外，成员资格的标准存在差异。一些组织只将圣会中的积极成员计算在内，而其他一些组织则将只要进行过洗礼或按手礼的人都算做成员。

表 16—2 美国宗教成员人数估计 (1993)

宗 教	成员数
罗马天主教	58 287 000
浸信会	37 312 000
卫理公会	14 626 000
五旬节会 *	10 101 000
路德宗	8 599 000
伊斯兰教	6 000 000
后期圣徒 (摩门教徒)	4 489 000
犹太教	4 300 000
长老会	4 118 000
圣公会	2 472 000
东正教	2 118 000
耶稣会	1 742 000
耶稣联合会	1 584 000
基督教会和基督会	1 071 000
基督教会 (耶稣信徒会)	1 023 000
耶和华见证者会	914 000
安息日复临会	733 000
革新会	585 000
拿撒勒教会	574 000
救世军	448 000
上帝会	263 000
门诺派	259 000
所有数据精确到千位	

* 包括上帝大会 (2 235 000) 和上帝基督会 (5 500 000)。

注：虽然新教徒组成了美国最大的宗教共同体，但是天主教是最大的统一宗教组织。

资料来源：经许可摘自《世界年鉴和资料集》，1994。Funk & Wagnalls 公司 1993，版权所有。

在美国，宗教倾向的分布多少有些不同。在 1989 年，90% 的被调查者表示对某种特定的宗教具有倾向。但是这种回答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有关宗教参与度或忠实度的信息。对某些人来说，宗教倾向意味着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个宗教组织中去；对另一些人而言，它仅仅意味着对某种宗教信念的个人信仰，而不需要任何有组织的参与。同时，一些人对宗教倾向的确认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戚、或所属的民族群体信仰这一宗教。例如，一些认为自己是犹太教徒的人，仅仅把这当作一种民族认同，而不是意味着要积极参与宗教生活。

年龄较大的人更倾向于加入宗教 (格里利，1989；德泰尔法诺，1990)。宗教的地区差异也十分明显。犹太教、天主教、圣公会教以及一神教等教会

的教徒多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而卫理公会和浸信会的教徒则集中在南部和中西部。犹太教和天主教徒更多居住在城市；而大多数的乡村居民则是新教徒。

最后，宗教派别的社会地位也存在差别：圣公会教徒的声望一般位于最高的水平上，而犹太教徒的收入和教育水平最高。在美国历史上，天主教徒的职业地位较低，然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相对社会地位在近几十年来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主教徒开始赶上、甚至超过新教徒的社会地位（鲁夫，1979；鲁夫和麦金尼，1987）（参见表 16—3）。

表 16—3 40 岁以下白人男子在宗教、教会和民族上的收入（1980—1984）

团 体	年家庭收入（美元）
犹太教	26 291
意大利天主教	30 321
爱尔兰天主教	28 985
波兰天主教	27 858
长老会	27 513
路德宗	25 012
卫理公会	23 910
德国天主教	23 785
浸信会	21 618
西班牙天主教	16 426

注：虽然天主教在传统上比新教徒收入低，但是近期的数据显示不同民族背景的天主教家庭在家庭收入水平上已经赶上了一些新教教会。

资料来源：经许可转引自安德鲁斯·格里利（Andrew Greeley）：《美国的宗教变迁》，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

宗教成员的发展趋势

在美国，没有能够反映宗教信仰及忠诚的长期历史性变化的资料，但是有关组织成员的统计却显示了明显的趋势。在 1991 年，超过 59% 的美国人归属于宗教组织，而在 1850 年时，这一数字仅为 16%，1900 年为 36%，1940 年为 49%。显而易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宗教成员人数有了显著的增长。

专家们对这些数字的意义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在一个世纪以来，并没有证据表明对超自然力的信仰有所增加，或者是宗教价值观念进一步地深入到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神职人员与总人口的比例，以及教会收到的人均财政资助都有所下降。此外，近些年来的许多“宗教”活动比几代人以前的善男信女们所经历的宗教活动，要世俗化得多。一些观察者相信，宗教成员的增加仅仅只是对渴望获得地位的一种反映。在获得更高经济地位的同时，人们将注意力放在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上。他们通过加入社会声望较高的宗教团体来达到这个目的（德梅那斯和哈蒙德，1969）。

然而，近几十年来的宗教成员变化呈现了另一种趋势。宗教组织的规模在二战后得到增长，在 60 年代末达到了最高点，自那以后，成员人数均呈

现下降趋势。一位研究者指出,教会具有的影响个人在世俗社会的认同和地位的能力,近些年来也许已经在减小。因此,很少再有人试图通过宗教成员资格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哈蒙德,1988)。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宗派在规模增长方面显得进展缓慢,招收新成员一直是它们长期关注的问题(鲁夫和麦金尼,1987;伍斯洛,1988)。

事实上,最近在传统的“高地位”宗派中出现的成员数目下降已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与其相对照,天主教在整个20世纪都在持续增长。一些在传统上对蓝领和中下层阶级具有吸引力的保守新教团体,例如,南部浸信会、上帝会、耶和华见证者会以及五旬节会等,过去二十年间在成员数和影响力方面都有所增长。这些变化出现的原因尚未完全清楚。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面对日益混杂的世俗文化,那些加入保守教会的人们受到了它们所提倡的清晰而一贯的信条和实践的吸引。与其相对照,其他教会为了适应现代世俗世界所采取的一些举措反而降低了其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生命历程中改变了宗教信仰。大约43%的美国人已经脱离了伴随他们成长的宗教团体(鲁夫和麦金尼,1987)。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希望与那些具有相似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有共同的信仰;决定加入配偶所信仰的宗教团体;以及青年人对现有宗教的抛弃。而在那些脱离了伴随他们成长的宗教团体的人中间,有27%的人宣称他们目前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3

宗教参与

区分宗教参与和宗教成员资格及宗教倾向是很重要的。仅有四成的美国人宣称他们每周都要参加宗教仪式。20年前,则约有一半人声称这样做(参见图16—2)。每周都去教堂的罗马天主教徒的人数在急剧下降:1989年为52%,而1958年为74%(盖洛普,1989)。有多种原因使得这一下降发生。在调查中,许多人都表示要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犹太教徒,并不一定要参加宗教仪式。而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天主教仪式参加人数的急剧下降,表现了天主教徒们对罗马教廷在生育控制问题上强硬立场的不满。

如果对真正参加礼拜进行测量的话,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出席率都相对较低。至少在新教徒中,上等蓝领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出席率最高,其中携子女参加的人尤为如此。从犹太教的传统来看,下层阶级的宗教参与率一直较高(穆勒和约翰森,1975)。最近的趋势还表明,上层阶级的参与率也在逐渐增加(格里利,1989)。在天主教中,社会阶级与宗教参与的关系则不太明显。

一些原因被用于解释各阶级的新教徒在宗教参与方面的差异。例如,有人认为上层阶级之所以对宗教参与不太热衷,是因为他们不太需要宗教所能提供给他们个人和社会方面的益处。下层阶级不参与的原因,部分归因于他们对家庭和直系亲属以外的一切设置和机构的怀疑态度。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如买不起体面的衣服参加教会仪式,或是无力给教堂提供经济资助。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社会阶级特征并不能充分解释宗教参与的群体差异(奥尔斯顿等,1979;鲁夫和麦金尼,1987)。个体所具有的性质比阶级地位所能表现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建议,更好的方法是去考察个人在宗教虔诚方面的本性。

从50年代中期到1989年,美国人对宗教仪式的参与水平有所下降,较之新教而言,天主教下降得尤为剧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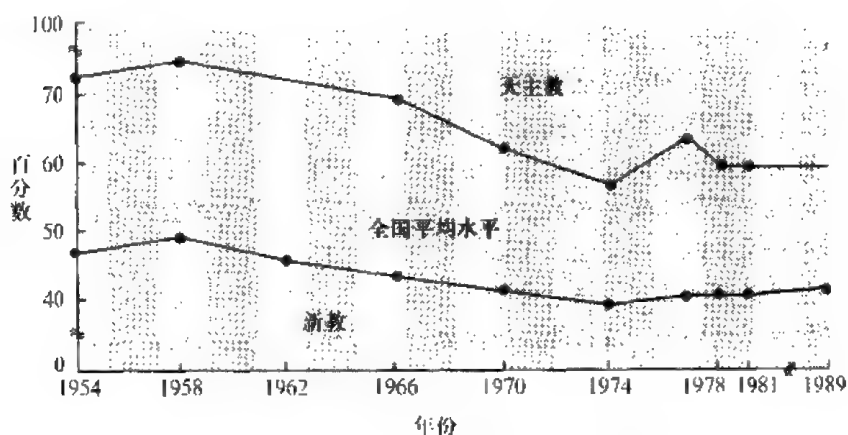


图 16—2 美国的宗教仪式出席率 (1954—1989)

资料来源:盖洛普调查,《公众舆论年度报告》。

宗教虔诚

如何定义和测量个人在宗教体验或宗教虔诚 (religiosity) 方面的本性? 这一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宗教虔诚之所以难以考察,是因为宗教体验在每个人那里都有不同的含义。某个宗教实体的成员资格并不是一个可以正确测量宗教虔诚的指标。同一宗教中的成员,甚至是同一教区里的信众,通常都表现出了对其信仰的不同忠诚程度。某个人可能对宗教信条了如指掌,但有可能对其中一些表示怀疑。某个人也可能对其宗教忠诚不二,但却疏于参加宗教仪式。

社会科学家认识到,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信奉宗教。乔斯弗·菲克特 (Joseph Fichter, 1951, 1954) 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罗马天主教徒的四种类型:核心型、常见型、边缘型及隐匿型。核心 (nuclear) 型天主教徒是理想型的教会成员,他们已超出了对其忠诚程度的最低要求。他们积极参与教区生活,每周参加一次以上的宗教活动,并且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教区学校上学。与核心型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隐匿 (dormant) 型天主教徒,这些伴随着宗教长大的人从不以任何方式参加宗教仪式或实践宗教信仰。常见型和边缘型处于中间状态。常见 (modal) 型天主教徒定期去教堂,但对宗教或教区活动没有强烈的兴趣。边缘 (marginal) 型天主教徒将自己看做这一宗教的成员,但很少参加宗教仪式。

在更抽象的层次上,可以从四个近乎相互独立的维度来分析宗教虔诚 (戈洛克, 1959)。经验 (experiential) 维度是指信徒对超自然力的情感依恋

程度。仪式 (ritualistic) 维度指的是信徒对祷告和宗教仪式的参与水平。意识形态 (ideological) 维度是指个人对宗教信仰的忠诚度。最后一个是结果 (consequential) 维度, 是由个人行为受到宗教信念和宗教参与影响的各种方式所组成。

托马斯·卢肯曼 (Thomas Luckman, 1967) 曾提出, 一些对组织性宗教持批判态度的人 (他们因此也不参加宗教仪式) 可能是深深信仰着宗教的人。卢肯曼用无形的 (私人) 宗教来指称一种广为流传的想法, 即宗教是个人或主体的体验, 而不是群体或共同体的体验。这种类型的宗教之所以是“私人的”, 是因为它发生在个体的心灵中, 而不是发生在用于礼拜或拜祭活动的公众场所中。这种私人宗教的存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有 95% 的美国人宣称信仰上帝, 而仅有 42% 的人定期参加宗教仪式 (哈里斯, 1987)。

4

新宗教意识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尽管宗教面临着宗教成员、宗教参与和信仰等方面在美国社会各部分中的全面衰退, 它还是显示出了令人惊讶的生命力。事实上, 一些民意调查已经发现了一种“新宗教意识”的迹象 (盖洛普和新港调查, 1991a)。

这种宗教体验尤其与“福音派” (evangelical) 基督教的发展有关。一般而言, 福音派的教徒对《圣经》上的每字每句都深信不疑, 他们都经历过灵魂上的再生, 并且致力于传播使他人能够获得拯救的信息。一些人估计, 当今美国可能有 4 000 万左右的福音派基督教徒 (鲍尔默, 1989), 并且宣称道: 这是在美国增长较快、最显著的、雄心勃勃的、政治上积极参与的一个宗教团体 (鲁夫和麦金尼, 1987)。

很快, 福音派的传教士们便出现在电视中, 来传播他们的讯息。目前有好几个宗教型的电视网络和成百上千个不同的宗教电视节目。节目的竞争从福音传道者比利·格雷厄姆 (Billy Graham) 传统性的讲道, 到雷克斯·亨巴德 (Rex Humbard) 娱乐性和脱口秀取向的节目, 不一而足。这些节目加上支持着它们的复杂市场技巧, 使得电视福音传道者达到了全国的每一个家庭, 并且每年都能筹集到数百万的捐款 (参见“大众文化之窗”栏: “神圣与世俗的结合: 电子教堂”)。

福音会运动在 80 年代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显著的影响。直到现在, 仍还在以一种较温和方式在继续发挥作用 (西尔克, 1988; 马西森等, 1988)。福音派基督教团体已成为右翼政治运动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一政治运动是以“反冲式的道德政治复兴”为特征的 (利普赛特和拉布, 1981; 维迪奇, 1987; 鲍尔默, 1989)。

尽管这些信奉正统基督教的团体还未能说服国会, 接受禁止堕胎和允许学校祷告的宪法修正案, 但它们参与发起了 1984 年一项法案的成功通过, 该法案规定, 在其他与课程无关的集会也被允许的情况下, 学生们有权在非上课时间组织宗教集会。这些团体的一些意见还获得了普通公众的青睐。在 1988 年的一次全国性民意调查中, 68% 的被访者赞同关于允许学校祷告的



宪法修正案，而只有 26% 的人对此表示反对（盖洛普，1988a）。按照某些分析家的说法，这些正统基督教的信奉者们成功地将美国公众舆论的关注点，部分地从社会公正转移到了公共道德问题上来（贝克、莫兰和斯蒂德，1989）。一些人认为，这些努力会增大宗教保守主义者与宗教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两极分化（亨特，1991；伍斯洛，1988）。

神圣与世俗的结合：电子教堂

每个礼拜日的上午，数百万的人通过收音机和电视机收看、收听教堂礼拜转播。据估计，耶稣在其有生之年为 3 万人进行了传教，而电视福音派传教者们每周的听众就有 5 000 万之多（福里，1987）。

是哪些人在收看和收听这些节目呢？调查表明，受众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妇女、非白种人、老人、缺乏教育者和穷人们组成的；受众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人是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妇女。有 77% 的人都是各福音会的信徒，他们中的一些也表示了对这些组织的不满（弗兰克，1987）。

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通过电视传教，但直到七八十年代，这种电视教堂才成熟为一种主要行业。在 1977 年，已有 700 个宗教电视网络和广播台在提供各种形式的宗教节目。从脱口秀、乡村及西方音乐到名人专访和旧式的福音仪式，种类相当繁多。虽然电视教堂的受众在近十年来有所下降，但是电视传教士们仍然吸引了为数不少的人，并且赚取了可观的利润（福里，1987）。

用于制作宗教节目的费用是庞大的。除了电视网络、广播和制作费，基督教的传播网络还需支出教学设备费和政治游说的费用。通常，基督教和犹太教通过个人或会众的呼吁来筹款，接受捐赠和年金，有时还发动例如直接邮寄倡议书等其他一些筹款活动。由于电视传教者不能面对面地接触到绝大多数的受众，因此这些电视教堂不得不想出了新的筹款策略。基督教的传教者们咨询了心理学家、市场研究人员和媒体专家，以指导他们如何吸引受众。尽管小部分的电视福音传道者不在节目中索要捐款，但是他们中大多数都要占用 12% 至 43% 的节目时间去筹款（福里，1987）。一些传道者还用出售基督教纪念品、提供电话祷告咨询服务、组织与电视福音传道者一起旅游等方式，让一些信徒掏腰包。一些有利可图的次要商业手段也被用来获取受益。吉姆·贝克（Jim Bakker）通过书和录像带的邮购业务，以及销售印有他前妻（Tammy Faye）特写的体恤衫，把他的 PTL（Praise the lord 或 People That Love，意为“感谢上帝”或“有爱心之人”）俱乐部建设成了拥有 1.72 亿资产的、经营电视、房产、主题公园等产业的大企业。

利用大众传媒来祈祷福音与美国的宗教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传统上的宗教参与是以公共的礼拜和与社区中的人们一起参加这些活动为特征的。而电视宗教使人们在起居室中就参加了宗教活动。一些观察家据此认为，电视教堂对当前美国社会的分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先前关于“电子神职人员”会减少地方教会成员的看法已得到了一些实例的支持，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也并非如此。据当前的报道，有近一半的南方浸信会的社区教会解雇了当地的牧师，原因是他们不如电视福音传道者那样“有趣”。其他一些研究却发现电视传道者增强了人们对本地教会的忠诚度。此外，这种活动还因为将宗

教带到了那些不能定期参加宗教仪式的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家中，而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

当前这种形式的电子教堂的成功及延续，依赖于正统派基督教运动在今后的影响力。鉴于罗伯特·奥雷尔（Oral Roberts）、吉姆·贝克（Jim Bakker）及吉米·斯沃加特（Jimmy Swaggart）等人的丑闻，基督教传道者们已开始加强对自身的监督，并开始重新获得前些年失去的尊严。但是，仍有79%的美国公众认为电视福音传道者在处理信徒捐赠的问题上不值得信任（克拉松托和德泰尔法诺，1989）。电子传教士们是否还会获得70年代时的欢迎程度还有待观察，而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电子化宗教在今后的一些年里，仍是美国社会一支活跃的道德和政治性力量。

为了试图说明这一新的政治—宗教联盟，人们指出了基督教正统派运动与右翼政治观点的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二者都倾向于接受一种共谋的世界观并对世俗主义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它们都建立在绝对的哲学观之上：认为只有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而几乎没有中间阶段。它们还强调个人的努力，不管是为了精神上的目标还是经济上的目标。因此，它们对社会福利工程和政府对于私营企业的干涉有一种保守性的指责（鲍尔默，1989）。尽管基督教正统派的影响有所增长，但是一些社会学家仍认为右翼的宗教正统处于衰退之中，因为新一代的福音会领导人正面临着政治框架内的家庭、工作、道德和自我等问题（亨特，1987）。

新宗教意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宗教教派和膜拜团体的流行和壮大。现在已有21个美国教派的成员数超过了50万，而规模相对较小的教派则成百上千，其成员常常不超过2000人。膜拜团体的成员数通常比教派更少（参见“应用社会学”栏：“推销宗教”，描绘了一个当代膜拜团体是怎样招募其新成员的）。膜拜团体可以被分为三个不同种类：反文化型、个人成长型和新基督教型。反文化的膜拜团体通常是非西方或非基督教的宗教传统的分支。例如，佛教中的禅宗，印度教中的克利须那宗，以及伊斯兰教中的苏非宗（Sufism）。看起来，亚洲宗教是绝大多数反文化膜拜团体的源泉。它们通常有个人魅力型的领袖，并强调直接的宗教体验。它们通过膜拜团体箴言以及与主流美国文化的对立，为信徒们提供完整的生活方式（格勒克和贝拉，1976；盖兰特，1982）。

新基督教膜拜团体包括例如“上帝之子”和“爱耶稣的犹太人”之类的团体（伍斯洛，1976；斯塔克和班布里奇，1985）。美国历史中充斥着这一类团体的盛衰史，像“奥尼达至善论者”、“震教”和“火柱教”等等。而其中的一些膜拜团体仍长盛不衰，“耶和华见证者会”就是其中之一。

个人成长型膜拜团体在起源上是西方的，从性质上来说是非宗教性的团体。它们对基督教传统保持中立态度，试图让信徒能够体验到某种形式的终极意义。例如，“科学论派”和“超验冥想派”就是此类膜拜团体的例子。一些个人成长型膜拜团体是以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为核心的，但由于信徒们不需要在膜拜团体资助的社区中隔世而居，所以较之反文化型和新基督教型

的膜拜团体，个人成长型膜拜团体的领袖对其信徒个人生活的控制较少。一些成员并不把他们的生活托付给膜拜团体，而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或为了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生活，才参与了个人成长型膜拜团体的活动（格勒克和贝拉，1976；莫萨克，1983）。

一个在近年来传播较快的个人成长型膜拜团体是“新时代运动”（乔斯塔德，1990）。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膜拜团体，而是一项具有一些膜拜团体特色的宗教运动。与此处提及的绝大多数宗教团体不同，它希望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这项运动在中产阶级尤其受欢迎，许多商业经理和企业行政人员都是它的信徒。这些信徒借用了东方神秘主义和玄宗里的一些宗教仪式，认为当足够数量的人经历了“内心改造”的过程之后，就引发巨大的社会变迁。金字塔、水晶体和宝石是“新时代运动”仪式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医治能力。



推销宗教

社会学家指出，尤其在美国，许多宗教团体都在为了抢夺宗教成员而竞争。这个“信仰市场”与其他市场一样，为了让人们购买“商品”，使“顾客们”了解“制造商”运用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下面摘录的这段经典的社会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宗教组织有时会运用一些精妙完善的“销售技巧”。这项研究的作者约翰·洛夫兰（John Lofland）已将他所研究的团体在文章中隐匿掉了，他把其成员统称为“DPs”，将其宗教领袖称为“Chang”。而经过最近的披露，这项研究的对象其实就是由韩国人文鲜明（Myung Moon）所领导的“统一教会”。读者们应该意识到，自洛夫兰（Lofland）实施完他的研究后，统一教会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且这个组织目前的招募策略虽然还反映了下文所述的基本原则，但是已经变得老练了许多。

在六七十年代，这个教会负责招募工作的人员认为他们的宗教意识形态对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人来说，太具有“心灵冲击性”，因此不可能在对他们宣传了教会的基本主张之后，就可以立即使他们皈依。因此，这些招募人员会小心翼翼地逐渐表露出自己的信仰和目标，他们一开始会装作对宗教和千年至福的事情一无所知，直到最后则会袒露无余。这个过程可被分为五个阶段：挑选、下饵、封闭、关爱和允诺。

挑选。对新成员的招募一般开始于公共场所的偶然交往，实际是在“挑选”。这些组织的成员经常花去一整天的时间开车兜风，等那些要求搭便车的人；或者就是在公共场所结识一些年轻人。接下来通常会邀请这些对象参加宴会，或某个报告会。而关于宗教方面的事情则一概不谈。

下饵。通过某种方式，那些有希望入会的人被带到会员圈子中。其后采取的手段则又是多种多样了。

1. 参加宴会的候选者会发现有许多年轻人也参加了这个聚会，可能达到50人或更多。他们微笑着、交谈着，还在帮忙做着一些零星的琐事。整个场面充斥着友好平和的气氛。此时，有人会给候选者介绍一位“伙伴”，以后就由这个伙伴来关照他（她）。接下来，候选者会听到来自众人不绝于耳的恭维和赞许。

2. 在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的基础上，组织成员们开始表述自己的一些认知，他们会做一次演讲，概要性的、很平和，还略有几分生动，以此来阐述他们这个大家庭的“原则”。在提到的关键性的概念中会包括分享、相互关爱、为人类造福以及集

体活动。而有关教会领袖及其宗教活动的事情，还未被提及。

封闭。某种形式的周末营被用于主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通过有效地把候选者封闭起来，宗教的意识形态能够在一个可控制的情景中被抬出来，在这种环境下，任何怀疑和犹豫都可以浮出水面，然后被予以驳斥。其次，在没有外人的干涉下，那些有效的结合性手段可以被尽情采用。这一封闭过程包括：

1. 使其全神贯注。除了睡觉以外，所有的时间都被用来吸引候选者的注意力。整个计划从早上7:30到晚上11:00，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甚至连进浴室，也得让那位指派的“伙伴”陪着……

2. 进行集体性聚焦。最大限度的集体活动被塞进平常日程之中：共进早餐、健身、培植花园、听传教、做游戏、吟诵经文、欢呼、跳舞、做祈祷、唱歌，等等。

3. 实施排外性输入。候选者在身体上并未受到限制，但是外出是会被严厉劝阻的。他们的会所在居民点的数公里之外，此处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和电视，打电话也很难。

4. 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每天要听好几个小时的传教，身体和社会节奏也显得格外紧张……吃的是粗茶淡饭，睡觉的时间也会受到控制。

5. 达到认知的全面合理化。在这种环境下，DP宗教的意识形态系统地、精细地得到了展现……如果人们接受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前提，那么就不会被这些特别的手段所困扰，这套体系在他们看来也是非常合理的……

关爱。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还只是将候选者们置于一种很难把握的境地的部分原因。他们所面临的症结在于那种被人关爱的感觉、对与爱“融合”（一种行动观念）的渴望、以及集体的怀抱……这种封闭周末营的有意识的策略，就是想让候选者被赞许和爱所浸润，用那些组织内成员的话来说，就是用“爱的炸弹”来使人就范……

允诺。候选者被邀请呆得更久一些，或许是一周。一周过后，会再次被邀请呆上更长的一段时间。直至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被渐渐拖下水，最后也开始参与全日制的教会工作、街头招募和各种事务。

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表露出来的疑问被看做是“魔鬼的举动”，如果随后想要脱离教会，那么可能引致的可怕后果就会被指出来。大部分的新皈依者都是没有什么人好牵挂的，而那些与外界还有联系（例如牵挂着他们的父母）的人，则被鼓励尽量不要把团体内的活动告诉给局外人……

资料来源：经许可摘自约翰·洛夫兰（John Lofland）：《成为一个救世者，再访录》，《美国行为科学家》，20（6），1977，805~818。

社会中的宗教：一种长远的观点

为了对宗教社会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我们十分有必要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下来考察宗教。我们关心的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当前的世俗化趋势。

起源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宗教主要是在扩展家庭中存在(华莱士,1966;约翰·斯通,1988)。神圣物都是那些对家庭有特殊意义的东西:提供水源的井、墓地、祖先的遗物等。宗教仪式是由家庭成员创建和履行的。神灵被认为存在于家庭拥有的住所和土地中,护佑着一家大小。

宗教的这种家庭取向在西方罗马文明的初期仍十分重要。那时,每个扩展家庭都有自己的神,其中的一些在后来成为全社会都崇拜的神。在东方,相似的取向到现在仍很明显,许多日本家庭仍以神道教神龛的形式,敬奉着他们的祖先。

宗教组织的主要单位后来终于扩大至整个部落或村庄,但是宗教更多的仍是作为其他社会设置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家庭中的首领,后来是部落中的首领,通常被要求学习举行关键性宗教仪式的正确方法,然后再传授给继任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首领比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更信奉宗教。他也与其他人一样从事其他非宗教活动,而且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专职宗教人员。

在这些早期社会(以及今天的一些社会)中,不存在宗教多样化。每个人类共同体就只有一种宗教,所有的小孩子都被要求参加宗教仪式,并在很小的年龄就被灌输这一宗教的信条。宗教与家庭、家族和共同体不可分割,它几乎在人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发挥着作用。种植、收获、狩猎、进入成年期、结婚、生病、建新房子、准备食品和吃东西,几乎每一种人类活动都与某种宗教仪式或信仰相联系。宗教提供了物质世界与“其他”世界的一种连接,“他者”与日常生活的一种综合。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放弃宗教,就无异于放弃他(她)的整个社会身份。

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社会设置都试图从家庭中脱离出来。宗教也从未将自己排除在这一潮流之外。随着时间的流逝,宗教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设置,有自身的专门组织和角色,也出现了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的分离。在现代社会中,参加宗教活动,甚至选择宗教信仰,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的选择(德梅那斯和哈蒙德,1969;鲁夫和麦金尼,1987)。

牧师角色的发展也许是宗教的制度性分化的第一步。当教义变得更加精深,仪式变得更加复杂的时候,一些人(牧师)开始专门从事阐释和解释他们的工作。牧师们不再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事务上,而是全身心地从事宗教活动。最终,宗教发展出了神职人员体系来管理宗教事务。例如,当今美国的圣公会就拥有数百位主教和数千名牧师。

专任牧师的出现引起了第二个变化,即世俗领域和神圣领域的进一步分离。牧师们作为宗教的专职人员,不再被允许对其他领域行使领导权和指导权。而从前,村庄的首领不仅决定春天何时插秧,而且还会施行一些宗教仪式,作为庄稼种植过程的一部分。到后来,世俗的种植活动与宗教仪式相互分离。村庄首领发布种庄稼的指示,而由牧师来主持宗教礼仪。这种划分既象征着、又促进了宗教对日常事务影响力的衰减。

一旦神圣与世俗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第三个变化就不可避免了。人

们开始选择他们是否该加入宗教。因为在宗教和世俗活动完全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无法避免涉入宗教。但是随着它们的相互分离，人们可以拒绝参加宗教活动，甚至可以放弃宗教本身（贝拉，1964）。

2

世俗化讨论

与所有的社会设置一样，宗教也不得不去适应现代社会不断变化的环境。许多学者认为，这种适应过程导致了宗教影响力长期的持续减退（马丁，1978；哈蒙德，1985）。作为对这种观点的支持，彼得·伯格（Peter Berger，1970）认为宗教影响力还能继续维持的惟一重要领域就是家庭。今天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教育和市场没有什么关联。它不再是社会的主要凝聚力，因为它已经开始被民族主义和其他世俗的、政治的意识形态所取代。这种宗教逐渐滑向社会和文化边缘的过程，就叫做世俗化（secularization）。

随着宗教作为一种社会设置而衰落，有人认为宗教规范和价值已经失去了不少影响力。宗教日历中的重要日期不再是神圣的日子，而仅仅被当成了节日。天堂与地狱、罪恶和救赎，已经失去了重大意义。曾经以受到严厉宗教制裁为后盾的有关不同信仰间的通婚、离婚、性关系的道德戒律，早已松动。宗教信仰从总体上来说已变成了个人的事情，而不再是社会的信念。

世俗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方面也许要算对超验物信仰的减退，以及在世俗信仰和设置中，超自然惩罚的消除。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所有的评论家就宗教的现状都会同意这个观点，即超自然力已经脱离开了当今世界”（伯格，1969）。1989年，在接受调查的每两个美国人中就会有一个认为，宗教正在丧失掉它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影响力。

与绝大多数的社会潮流一样，世俗化也必须要与反对它的倾向做斗争。我们已经提到了20世纪宗教参与的显著增加，以及像五旬节派这样的宗教派别在蓝领阶级和中下层阶级中所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世俗化的另一股反对力量就是对东方宗教的广泛兴趣，以及与“个人发展运动”和“新时代运动”相联系的一些准宗教活动。第三种反对力量则来自于美国政治生活中新兴的保守宗教。

这些逆流是会减慢世俗化进程呢，还是会扭转这一趋势，尚有待观察。伯格（1977）认为，用一种世俗化的眼光来看世界，人们是不会感到快乐的。因为它不能为人类的苦难、不公正以及死亡提供可以接受的答案，他预言道：作为对世俗化的反击，宗教的复兴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一些学者对伯格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们也认为不久将会有一场深刻的宗教觉醒，以及对神圣世界的回复。届时，科学和技术作为个人和世界难题的解决之道，将失去其可信性（科克斯，1988；福尔克，1988）。另有一些学者持有更宏大的观点，认为宗教的边界正在日益模糊，世界会演进出一种“新全球意识”，在这种观念之下，东西方之间的障碍将被打破（金，1986）。还有一些人把美国社会的世俗化看成是一种荒诞的说法，认为对组织化宗教的全面参与在过去五十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乌特和格里利，1987）。

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美国人生活的世俗化会继续深入，并且把欧洲一些

国家发生的宗教生活的衰败作为例子，认为这些现象在美国也会出现。他们预想出了一个分崩离析、人人疏离的美国社会，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关注将导致共同价值观念和人类共同体的不断崩溃。

而站在中间立场上，用一位社会学家的话来表述，即“全民的宗教虔诚和完全的世俗化一样，都不具有永恒的历史可能性”（威廉斯，1970）。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与传统社会中一度存在的状况不同，宗教将不会再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但是宗教也许将继续给予人们情感上的支持，并且为他们的生命提供意义。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宗教是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某群人对其感受到的神圣之物、通常还包括超自然的东西，进行阐释并作出反应。所有社会中都有宗教存在，只是在表现方式和制度化形式上存在差异。有神论（theism）是对一神或多神的信仰。在世界的主要宗教中，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是一神教（monotheism）的例子，即这些宗教都只信仰一个神。而印度教，则信仰多个神，是多神教（polytheism）的例子。当今世界中的其他一些主要宗教并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超验唯心主义的抽象原则为中心，从而致力于获得道德和精神上的德行。一些传统社会施行的是图腾崇拜（totemism），它把所崇拜的图腾（totem），通常是动物（在极少情况下也有植物），既看成神，又当作祖先。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其他宗教形式还包括简单的超自然崇拜（simple supernaturalism）和泛灵论（animism）。作为一种宗教类型，前者是指该宗教没有确定特殊的神或精灵，但是相信有影响人们生活的超自然力的存在；后者则认为有活生生的精灵在操纵着这个世界。

2. 宗教与人类境况中的一些基本方面相联系。它能够给人类提供支持 and 慰藉；为人类的存在赋予意义和目的；提供给人类一种认同感；使人类超越日常的现实生活，并且使人类在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能够顺利过渡。围绕这些重要的人生转折阶段而发展出来的一系列仪式就被称为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

3. 宗教设置既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力量，又是实现社会变迁的手段。宗教从以下几方面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它通过神圣仪式将人类共同体团结在一起。它把一个社会的基本规范和价值变得更为重要，并辅之以超自然惩罚的威胁，从而有助于控制社会越轨。宗教还能使政府的权威合法化，使人们妥协于艰苦的生活和社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宗教可能阻挠必要的社会变革，或者使政治冲突更加难以解决。

4. 宗教的稳定效应在家庭这种设置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宗教最初是作为一种家庭活动出现的，在一些社会中，家庭仍然和宗教信仰与实践紧密相连。宗教信仰影响着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道德态度、婚姻稳定性以及社会化。

5. 社会学家较多关注宗教在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但它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引发纷争的力量。例如,新教将社会中的不同要素团结起来,并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推动了16世纪欧洲的变迁。

6. 所有的宗教形式都包括四个基本要素。神圣(the sacred)是由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的,能够唤起由衷的敬意和敬畏的事物。作为神圣的对立面,世俗(the profane)是由日常生活中被看成普通物质(自然)世界组成部分的一切要素所构成的。宗教的第二个要素是仪式,是与对神圣事物的体验密切相关的、已确定的行为模式。仪式将信徒们结合为一个群体。宗教的第三个要素是宗教信仰体系。信仰有助于解释神圣事物和仪式的意义和目的。最后,为了保证宗教经验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建立起由信徒组成的社会组织也是十分必要的。

7. 社会学家区分了宗教组织的四种主要类型。国教(ecclesia)是一种宣称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是其成员的宗教组织。教会(church)是一种由宗教信徒组成的相对稳定、制度化的、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教义或教条(dogma)的宗教组织。在宗教多元化的社会环境里,教会也被称为宗派(denomination)。宗教组织的另一种类型是教派(sect),这是一种在正规组织化程度上比教会较低的宗教组织。第四种类型是膜拜团体(cult),这种团体拒绝现有宗教中的一些方面,致力于帮助其信徒能够获得所渴望的精神体验。膜拜团体不是为了改革已经存在的宗教,而是提供崇拜的新方式,或提供新的启示。教派和膜拜团体常常源自于人们的剥夺感。

8. 在美国社会中,宗教和国家的分离以及宗教宽容性的传统促进了宗教的多元化。美国宗教的特色在于其乐观的信仰和较少受到反对教权主义的影响。美国还存在一种强烈的国民宗教。虽然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已显得有些衰减,美国也许在所有的发达西方社会中仍是最信奉宗教的。

9. 在美国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宗教团体的成员人数都保持了上升趋势。美国的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或犹太教徒多,但用单个的统一宗教团体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天主教是美国最大的宗教团体。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一生中至少转换过一次宗教信仰。

10. 社会学家分析了社会阶级对宗教参与的影响。在新教徒中,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宗教参与率比其他阶级要低。关于宗教虔诚(religiosity),或者说个人宗教体验,已经有了许多细致的研究,至今仍是争论的焦点。近几十年来,尽管美国社会某些部分的宗教成员、宗教参与和信仰显得处于全面衰退之中,但是美国的宗教生活还是显示出了令人惊讶的生命力。其表现维度之一就是新宗教意识的兴起,包括福音派基督教的发展、保守派政治家与信奉正统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结盟以及像“新时代运动”一类的教派和膜拜团体的蓬勃发展。

12. 宗教起初是作为其他社会设置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开始是家庭,而后是部落或村庄。它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有其独立组织和角色的社会设置。专业化的专职神职人员体系得以发展,随后便是神圣活动与世俗活动的分离。至此,是否参加宗教活动就变成了一种自愿性的活动。

13. 宗教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在当今世界中已经在衰退,宗教规范和价值观念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在日益从宗教的联系和影响中摆脱出来,这个趋势被称之为世俗化(secularization)。然而,在美国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反潮流与之抗衡。表现为诸如五旬节派等宗教派别的繁荣,以及对东方宗教的广泛兴趣。发达社会中的世俗化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已成为一个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话题。

推荐阅读书目

1. 罗伯特·贝拉(Bellah, Robert N.), 1976.《被破坏的和谐:处于考验中的美国国民宗教》(*The Broken Covenant: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in Time of Trial*. New York: Harper & Row.) 本书对美国的国民宗教和美国生活中的宗教特性进行了富有洞见的评论。

2. 彼得·伯格(Berger, Peter.), 1970.《关于天使的谣言》(*A Rumor of Angels*. New York: Doubleday.) 本书从社会学角度雄辩地论述了当今世界仍有超自然力存在的余地。

3. 安德鲁·格里利(Greeley, Andrew.), 1989.《美国的宗教变迁》(*Religious Change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简短而清晰地对美国宗教信仰在今天并未显著消蚀或改变的观点予以了强有力的支持。

4. 詹姆斯·戴维森·亨特(Hunter, James Davison.), 1987.《福音派:新生的一代》(*Evangelicalism: The Coming Gener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本书对下一代的福音派领袖,以及福音派运动如何对美国文化作出反应进行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分析。

5. 约翰斯通·罗纳尔多(Johnstone, Ronald L.), 1992.《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社会学》第四版(*Religion in Society: A Sociology of Relig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这是宗教社会学方面的一本内容丰富的优秀本科教科书。

6. 鲁夫·瓦德克拉克(Roof, Wade Clark)和威廉·麦金尼(William McKinney.), 1987.《美国的主流宗教:变化的形式及其未来》(*American Mainline Religion: Its Changing Shape and Futur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认为21世纪宗教变迁的基础在于今天美国传统的、组织化的宗教,而不是教派或膜拜团体等边缘性宗教团体。

7. 沃纳·R·斯蒂芬(Warner, R. Stephen.), 1990.《旧瓶装新酒:一个小镇教堂中的福音派信徒与自由主义者》(*New Wine in Old Wineskins: Evangelicals and Liberals in a Small-Town Chur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这项受到广为推崇的研究,细致地考察了影响加州门多西诺地区长老会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力量。

权力、政治和政府

假如你是一名聋哑学校的学生，你希望学校校长是一位聋哑人，还是一位听力正常的人？

华盛顿格劳德大学（Gallaudet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 C.）的多数学生认为，一位聋哑人校长会对该校有听力残疾的学生的需要更负责任和更具同情心。1988年，一位没有听力残疾、而且不熟练手势语言技巧的妇女被任命为校长，这引起了许多学生和教师的愤怒。格劳德大学的学生在国家聋哑人协会的支持下，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应由一名有同样资格的、听力残疾的人来担任新校长。在提出抗议一周后，乔丹博士（I. King Jordan），一位聋哑人，被任命为校长。

对于乔丹博士的任职，该校学生和教师的运动是起一定作用的。但是，如果这一运动没有重要的政治支持，那也是不会成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求政府来决定此事，或者要求公民投票决定此事。而是说，格劳德大学的学生和教师运用了他们可支配的政治资源来表达某种情感，并且采取措施确保其愿望被大学管理部门尊重而得以实现。迫于这种政治压力，教工和学生的要求实现了。

在小团体中，政治程序是非正式的。而在国家这样的大型团体中，政治程序体现为称为政府的高度结构化机构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少有人意识到，政治活动产生的政策规定着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人们的机会，控制着人们获取和利用资源。现代社会主要的政治系统就是国家或政

府，在这一章，我们将集中讨论这个主题。首先，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权力、权威和国家，然后将分析政府的具体类型或形式。进而继续详细讨论美国的政治和政府，最后以一种关于社会和国家的人文观点而结束。

权力、权威和国家

如果人类及社会群体的各种利益从来不产生冲突，如果可利用的资源是无限的，那么政治系统将无需存在。然而事实上，每个社会都必需调和人的欲望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且，资源和人们想要的东西也是缺乏的。总是需要有办法来决定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以及如何得到。这就是政治系统，或者说政治活动（politics）的功能，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某些人和团体因此而获得权力和运用权力。

政治，是公众尤其关心的事情。通常影响我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的决定就是政治决定。政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达成并且实施集体的决定。然而只有那些有权力的人才能做出决定并运用和实施这些决定（博格达诺，1987；米勒，1987）。

1

权力

政治的精髓在于权力。权力（power）是指个人或群体控制或影响他人行动的能力，不管这些人是否愿意合作。尽管单独行动的个体也能运用权力，但大部分情况主要是个体代表某个群体来实施权力。比如，权力的拥有者作为某团体的官员而行动，权力是被赋予这个职位或职务的，而不是赋予某次偶尔占据这个位置的个人。因此，一旦那个人不再拥有这个职务，他也就失去了与之相伴的权力。

控制他人行动主要有三种机制。首先，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一种奖赏（reward）提供给服从者。一位父亲可能会因为他的孩子们在某次购物中的听话行为而奖给他们一份自制的小甜饼和奶油巧克力。轮胎厂的工人们可能会因为满勤和高生产率而得到一笔丰厚的圣诞奖金。支持总统选举成功的人可能会在新政府中得到工作。

第二种机制是威胁不遵从者，给他以惩罚。犯规的足球运动员知道他会被罚款或被罚下场。考试作弊的学生可能被学校开除。直言批评一个独裁者的人知道自己在冒生命危险。

权力还可以通过控制和操纵信息、态度和情绪等而间接地发挥作用。不管信息是由国家还是由组织所控制，流向公众的信息就是对其观点和行为产生影响的潜在力量。例如，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为了维持其统治权力，他们会做出一些符合听众政治态度的承诺。类似地，电视新闻节目的编辑运用权力，选择哪条新闻可以报道，甚至更关键地，这些新闻以何种形式报道。有时，我们把这种间接的权力称为影响力。

由于权力不能直接被观察和测量，因此，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位社会学家发现社会中的权力和物质世界的能量有类似之处：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我们观察到的只是（能量的）效果，在某种效果和所有的活动都只是能量的表现。我们可以自由谈论能量和权力的作用，但当我们想更具体准确地说明它们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却遇到了困难。主要原因是在于能量和权力都无法直接观察和测量。他们的存在、性质和力量只能从其影响中推断出来（奥尔森，1968）。

2

权威与权力的合法化

社会学家围绕权力使用的环境，将权力分成两类。以社会普遍接受的形式所使用的权力称做合法权力；没有社会认可的权力称为非法权力。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二者的差别。以暴力威胁店主、要求店主交保护费、并得到了这笔钱的黑帮就是在使用不合法权力。而政府机构向同一店主要求并且收取零售税，就是在运用合法权力。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中，权力最终都基于权力持有者惩罚不合法者的能力。当然，那些使用不合法权力的人，为了获得遵从，必须不时地诉诸惩罚或威胁。而那些合法权力的拥有者通常能够以奖赏或影响的方式使其要求毫无抵制地被接受，然而，一旦其他的方法失效，他们也必须采取惩罚措施的能力。

权威是指制度性的合法权力。那些有权使用合法权力者被认为是拥有权威位置的人。拥有权威的权力是受这个位置的作用大小所限制的。在美国，警官有权对超速者开罚单或逮捕他（她），但不能给一罪犯定罪或判刑。法官有权判处罪犯，却无权开罚款单。

有权力的人并不总是把其对权力的运用严格限制在官方划定的范围之内。当他们逾越了这些限制时，他们对权力的运用就是不合法的，例如，政府官员利用关系谋取私人利益。一旦被发现，那些以公谋私的官员就有可能失去其合法的官方权力。而且，他们还有可能失去公众的尊重，无法继续保持那个职位，甚或被判有罪。因此，只有当这种权力的运用符合人们认为是合法的标准或期望时，人们才会同意——也即授权——这种权力的运用。

尽管有相对大量的权力可以被不合法地运用，但这样做通常需要秘密地、小心谨慎地进行。权力的运用者往往冒很大风险。因此，多数权力拥有者总是寻求其权力的合法化以便他们在运用权力时不用担心法律的限制。

权力的合法化是引起社会学家极大兴趣的一个课题。合法性常常是通过诸如选举或宪法等正式程序获得的。有时，如果对权力的非常规的运用未遭到反对，其合法性就间接地得到承认。假如城市管理者开始分发停车票，只要其行为没人表示反对，他们的行为就被间接地合法化了。大多数权力拥有者偶尔扩大其权力的使用范围，直到有人提出反对，通过这种方法来测知他们的合法权力的范围。

马克斯·韦伯（1919，1946）根据权威或合法权力的主要来源将其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1. 传统型权威 (traditional authority) 是由习俗和已接受的行为所授予的。在世袭的君主国里, 政府首脑的权力天生是合法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君主仅仅是因为其父母或其他祖先以前统治过。古代中国, 人们认为他们那个社会的高贵统治者 (称为达官贵人) 获得来自天国的权力, 这种权力允许他们依据流行的儒教道德规范进行统治活动。

2. 魅力型权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 是指由一位领袖所具有的与其追随者建立特殊关系的能力而导致的权力。这样一位领袖被认为是具有异常优秀的甚至是上帝赐与的能力。许多重要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领袖——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 (the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以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都是这类领袖的例子, 他们的权威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个人魅力。魅力的原意是天国授予特殊个人的恩赐。

3. 法理型权威 (legal-rational authority) 的基础在于理性建立的规则, 这些规则反映了组织依据制度未达到目标的系统性尝试。选举和任命的政府官员以及一个正式组织的官员都拥有这种类型的权力。在美国,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通过类似于宪法和普选这样的“合理”机制而产生的人们对这种权力的基本赞同。

在大多数社会, 虽然通常只有一种类型的权威占主导地位 (例如, 在美国是法理型权威), 但三种类型都是存在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是一例, 他的权威合法化有三种来源。作为年长的男子, 他有一定的传统权威; 作为一个大而复杂的宗教组织——罗马天主教的首脑, 他具有法理权威; 而作为一个具有智慧和个人魅力的人, 他具有魅力权威。即使在以法理权威为主的社会里, 通常, 政治领袖的极大成功也有某些魅力权威的因素。这点已经被证实, 现代具有成功的政治生涯的温斯顿·邱吉尔 (Winston Churchill)、查尔斯·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约翰·F·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和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就是例子。

3

国家

在每个群体或组织中都会发现合法权力或权威。但是, 在现代社会里, 国家 (state) 是拥有至上权力并且合法使用暴力、拥有垄断权的机构 (韦伯, 1919, 1946; 威廉姆斯, 1970), 它命令何时、何地以及多大的物力可以被合法使用。

早期人类社会主要是围绕家庭和氏族组织起来的, 那时, 国家还没有成为一种特别的机构。国家的特殊功能是与社会其他方面: 宗教、经济和教育的功能紧密联系的。所有机构和大部分活动都由同一个人来规范, 这个人既是家庭或氏族的首脑, 又是宗教和文化首领, 还是重要的教导者。

从大约公元前 3000 年到中世纪末 (公元 1500 年), 城市国家 (由独立城市及其被该城市直接控制的领土组成的政治单位) 是西方世界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城市国家的管理权一般都延伸到周围的农场, 这些农场为城市提供食物、劳力和税收。即使是帝国, 如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 也只是由许多城

市国家松散结合而成，这些城市国家由于军事强权和对当地权威的政治让步才结合在一起的。当帝国灭亡时它的城市国家继续独立存在，从而不再需要向外国封建君主进贡，当然也失去了帝国提供的保护、贸易、机构和技术。

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欧洲城市国家逐渐演变为民族国家（本迪克斯，1964；蒂利，1975）。民族国家的形式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首先必须有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以及保卫国家的能力；还必须有各民族间进行贸易和交流的方式（关于这一点，技术进步有助于加速一个民族的政治组合）。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人们必须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共同忠诚，而且，一般来说，有一种共同语言。政治组织的更早形式，如家庭或独立的城邦国家，也必须受民族组织的管辖。这每一个因素不仅促进了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出现，而且反过来也被它所促进。

民族国家的出现是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卡努瓦，1984；斯科波尔，1979）。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已成为城市—工业时期强大的刺激和组织力量（斯科波尔和阿门特，1986）。而且它们对于以技术为取向的复杂社会的成长以及在同时冲突的重大事件中都起着关键作用。

4

关于政治 权力分配 的几种观点

民族国家对其公民的生活发挥着重要的控制作用。他们有权收取税收，制定法律，惩罚违反者，与其他国家进行斗争。学者们在考察社会中国家权力和政治权力分配时，有三种观点，形成三个学派：多元论者、精英论者和阶级冲突论者。

多元论

多元论者把社会看作是由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包括社会阶级、政治党派、工会、经济组织和消费者。这些不同群体不断地提出要求，试图影响国家领导人及官员。多元论者假定每一利益集团在多数时候或任何时候都不是为所欲为的。国家的作用就是斡旋于利益群体之间，听取公众舆论，通过反映公众意见的法规，从而维持社会秩序。国家通过政治体系来完成这些任务，这被看作是利益群体间讨价还价或者说是交换意见的连续过程（罗斯，1967；达尔，1961）。

在某些情况下，不存在讨价还价的问题。例如，在大多数社会里，强烈的公众舆论认为不应该容忍谋杀。这样，国家也很容易地宣告谋杀非法，并且保护它的公民不受谋杀的危害。但是在其他一些情况下，舆论并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美国的奴隶制问题就是这样。在国家刚建立时，一些利益群体试图迫使国家取缔这一制度，而其他一些同样强大的利益群体却坚决维护它。政治领导人不能成功地调解这些不同的要求，而且也没有任何一致的公众舆论出现。最终，国内战争解决了这个问题，付出了昂贵的血淋淋的代价。

多元论者认为国家是由代理机构和机关组成的，它们是国家和各利益群体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这些组织拥有一系列相互重叠的司法权，并且经常处于争夺如人事和金钱资源的竞争中。每个组织必须对它服务的利益群体、管辖它的组织以及国家的民主政治程序负责。如果国家机构或机关严重违背

了社会舆论，最终它会被迫改换。

精英论

多元论者认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复杂性产生了对妥协与合作的需求。然而，精英论者却认为这种复杂性至少在某个基本意义上是一个假象。他们认为，在许多利益群体之中突出存在这一事实，即所有的人总是由一个小的甚至极小的少数人群体来控制的。

所谓的阶级精英论者，尤其是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倾向于认为大众是“落后的、无能的、并且不愿意或不能管理自己”（马杰，1981）。他们认为，这些必然导致寡头统治或杰出的少数人统治。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宣称，精英统治最终将大规模流行，无论多么民主，依然会出现官僚集团。

罗伯特·米歇尔斯最早提出了这一“铁律”，他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并且是好朋友。在《政治党派》（1991）一书中，米歇尔斯首先分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后分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以表明铁律是如何运作的。党派的民主目标和非民主的日常工作之间的差距，使米歇尔斯的幻想破灭了，他认为党派就是极少数工会领袖和知识分子所支配的，他们根本不代表普通百姓的想法和愿望。根据这个例子，他认为任何官僚组织的领导人倾向于依恋其负有职责的高层位置，并且通过控制组织的运转，使用一些幕后技巧谋取私利，尤其为了保持其有权、有影响的职位。在最后的分析中，米歇尔斯指出，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权力依赖于多数组织成员的淡漠、缺乏参与，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向寡头统治挑战。

当代精英论者的理论大都认为，虽然大众能够管理自己，但他们“被精英所控制和剥削，而精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进行统治的，并不代表更大社会的利益”（马杰，1981）。在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基础上，现代精英论者指出：大而复杂的组织，如大学、公司、政府机构、工会和政治党派，支配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位以特别知识为武装的精英控制着这些组织及其巨大资源，从而统治着社会。

现代精英论者像多元论者一样，否认不同组织之间精英的相互竞争。而且这些人的教育和教养通常是共同的，他们总是从官僚到官僚，而很少有某个大公司的头会变成一位内阁官员，或一位内阁官员会在某私人企业中占极高的位置这样的情况发生。多元论者认为有许多精英，而精英论者却倾向于认为只有一个，而且这一群体紧握权力，把社会塑造成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且使人们认为它是必不可少的。上述观点和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观点是相联系的，他的《权力精英》（1956）一书是对多元主义进行的最早的、最有影响的学术批评之一。

阶级冲突论

国家的阶级冲突论源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马克思和他的同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48，1969）指出全部历史可以被描绘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

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当马克思提到地主和农奴或贵族和平民时，他是在把人分成不同的经济阶级。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上基本的阶级差别是以经济地位的不同为基础的。例如，在中世纪，经济实行封建庄园制，因此，主要的阶级就是地主或封建领主和农奴或农业工人。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西方经济主要是以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为基础的。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通过巩固掌握在那些拥有生产方式的（即“资产阶级”）手中的权力，工业时代带来了古老的阶级斗争的简单化。

我们的时代……已经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越来越分成两大敌对阵营，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1969）。

马克思说，当资产阶级成员在经济萧条期失去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将会继续增长。当土地所有者数量减少以及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迫使雇佣者更加严酷地对待他们的被雇佣者时，无产阶级的数量将会增加，政治觉悟将会提高。马克思预测其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新经济秩序的建立，共产主义的诞生，工人掌握生产工具。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阶级冲突和政治斗争性质的洞察力。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政治冲突基本上是经济斗争：政治权力只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组织化了的权力。他认为，对所有权体系的控制就意味着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恩格斯进一步形象地指出国家就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政府制定所有制的规则，给控制财产的人以合法权力。

广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于经济冲突的政治观点的、现代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自马克思时代以来发生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试图构建阶级冲突理论（米尔班德，1969；鲍兰扎斯，1973；奥费，1984）。最近，这种发展表现为大公司和垄断集团的增加以及他们在工业、金融和商业生活中占有的统治地位，新马克思主义者将这种发展看作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的经济权力的进一步集中。这种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倾向涉及到现代国家不断变化的特征。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在国家对许多活动负责，而不仅仅是经济事务，同时，国家也获得了独立于经济统治阶级之外的自治权。然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然把西方社会中的国家看作是主要代表经济统治阶级利益，并且总体上拥护资本主义的直接或间接地运作（帕朗蒂，1988，1978）。

政府形式

国家通过政府控制社会。有些社会区分了国家与政府。例如，在英国，

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是宪法规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的元首，但是政治选举产生的领导即首相，却是政府首脑。然而在许多社会里，如美国，都是一个人，即总统，既是国家又是政府的首脑。

历史上有过许多种不同的政府形式。今天，最重要的三种政体是：民主政体、极权政体、独裁政体。

1

民主政体

民主政治的字面意思是“人民统治”。“民主的”这个形容词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流行的标签，各不相同的政府都被他们的首脑称为“民主的”政府。但是，真正的民主主义有两个特征可以使之与其他种类的政府区分开来：在一个真正民主国家里，政府的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正式认可，而且公民有权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决策过程。

代议制民主政府（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是最普遍的形式，公民投票选举官员来代表他们。一旦执政，代表者就依照民主决策程序作出政治决定。这种民主制的成功是基于对多数人统治原则的普遍接受。

一个民主政府并不要求它的公民对自己实行排他性的服从。相反，人民被允许对他们的家庭、宗教以及任何的其他群体怀有强烈的感情。因此，一个民主的社会有许多的权力中心。

在理想状态中，实行代议制民主的社会里的所有公民之间的公开自由的讨论会导致对公众利益极为有利的政策的采纳。然而在实践中，某些讨论一旦展开，代表们就被迫作出政治选择。这实际上就保证了作出重要的决定，而不仅仅是无休止的讨论。

只有在极小的民主体系中，每一个公民才能通过直接的参与影响政府；这种民主制称为参与式或直接民主制（participatory or direct democracy）。新英格兰的镇会议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会议上，对民主过程的直接参与是可能的。在古希腊城邦国家，虽然那时的政府并不反映所有成年人的观点，因为妇女和奴隶禁止参与政治，但是，也存在过类似的民主类型。

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里，包括美国，已经存在的民主制被称为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制既支持自由原则，即个人拥有某种社会不可侵犯的权利；也支持民主原则，即社会应该确保所有人在影响其生活的决定中有平等的发言权（鲍尔斯和金提斯，1986）。当然，这些原则经常发生冲突，因为对个人来说是最有利的并不总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说也是最有利的。

在自由民主制的社会里，自由和民主的原则都运用到国家中（即运用到政治的公众领域，这涉及到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但是只有自由原则运用到经济上（即私人领域，人们由追求个人的、有时是自私的利益）。这样，自由民主制就只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民主。结果，许多重要的决定并不是民主地作出的，即使这些决定的结果会影响到许多人的生活，如某工厂雇佣的成千上万的工人的重新安置或某公司的投资策略。私有制社会才赋予人们作出那样的决定的权力。工厂或公司的所有者自由地决定那些问题，从不考虑

公众的意愿。另一方面，现代自由民主制社会为了促进公众利益，发现必须在某些方面严格限制财产所有权。这样的例子有：法律严格限制雇主在雇佣行为中的歧视自由，以及最近几十年内已经制定了宽泛的环境规定。

2

集权主义

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指由一个政党所统治的政府形式，政府对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监督和控制。集权主义不是一个新概念；罗马帝国的许多皇帝都试图建立集权主义国家。由于进行广泛控制的技术手段还不具备，直到20世纪高水平的集权主义才成为可能。随着现代通信技术以及宣传和监视技术的提高，几乎可以做到对整个社会的完全控制。的确，有好几个20世纪的国家，尤其是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几乎达到了完全的集权主义统治。

集权主义国家创造了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一个整体的世界观和一套行为规则。敌对的世界观受到压制，宗教团体受到迫害，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作品受到严格审查。由于看不到集权主义缺陷而形成了盲目的爱国主义，使民族主义（即认为本民族利益和安全更重要）通常成为这种政府形式的重要方面。

传统的政府组织不足以确保集权控制。一个有效的集权主义国家必须建立特殊的控制机制。其中一种机制就是官方政党，它成为多数政治活动的中心场所。政党训练、挑选并合法化那些政治统治精英。绝不允许组织任何其他政党，成立政党的企图被谴责为背叛。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民族社会党（纳粹党）是惟一政党，也是合法的政治表达的惟一渠道。

在前苏联体制下，选举活动按常规举行，但不允许选民选择提倡不同政策的其他党派的候选人。

前苏联共产党解体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前苏联经济是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控制的，这样缺乏效率和创新能力，而这些因素在迅速变化和技术复杂的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经济的迅速崩溃是与威胁集权统治基础的政治支持受到深深的侵蚀相联系的。

1985年，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上台执政时，他发誓要优先处理经济问题。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他提倡改革（perestroika）或称为社会的“重组”。这种重组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逐渐引进私有企业和市场机制以及对前苏联经济的刺激。另外，在1986年戈尔巴乔夫又引进了新的开放政策（glasnost）。这一政策鼓励人们对政府官员、组织和政策展开公开的讨论和批评（诺夫，1989）。

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受前苏联影响的集权国家，如波兰、原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前东德等国都实行了自由选举。在90年代初期，遍及前苏联国内的相同的反党情绪一浪高过一浪。当紧张达到顶峰时，1991年党的领导人逮捕了戈尔巴乔夫并且控制了政府。他们重建集权统治的努力因为受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领导的大众抵制而受到削弱，仅仅维持了三天。

作为政变失败的后果，曾经是前苏联集权主义中心的共产党被击垮了。戈尔巴乔夫辞去了党的总书记职务（虽然他还是苏联领导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撤销，它的财产包括出版社、新闻报纸和私人医院被占用（《经济学家》，1991年8月31日）。在1991年12月，尽管戈尔巴乔夫反对，但叶利钦还是与其他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声称“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作为国际法律和地理政治现实的主体已不复存在”（《时代》，1991年12月23日）。

3

独裁主义

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指一个人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政府形式。统治者要么可能是君主（世袭的统治者），要么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主要通过暴力掌权的人）。独裁政权中，意识形态和政治并不占有重要地位。相反，政治变成了一种向统治者效忠的表达（安德伦，1970）。

君主独裁政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哈勒·舍拉施（Haile Selassie）皇帝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在他统治的那个时代（他1974年下台），埃塞俄比亚国家的统一取决于臣民对皇帝个人的忠诚。独裁者们经常企图唤起他们的臣民对自己的一种类似的个人的信仰。这样就经常出现对独裁者的个人崇拜，例如，海地的杜瓦烈尔（Duvalier）或乌干达的伊地·阿明（Idi Amin）。

独裁政权缺乏民主政治所具有的宪法的和程序的基础。在独裁体制中，基本上不存在代议制政府的常规选举和基本的公民权（如选举权）。反对派通常受到武力的迅速镇压，这对大多数独裁政府相对脆弱的特征来说是合情理的。独裁主义和集权主义政权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

独裁政权不能容忍政治反对派，但愿意让社会机构和其他部分独立于国家而运作，前提是他们不从事政治活动。而集权主义政权寻求对社会的每一个机构实行国家控制，不管他们从事政治活动与否，就是试图按照一个包括一切的政治方案来把社会整合成一个整体（伯格爾，1986）。

因此，独裁体制不像集权主义那样是包揽一切的。的确，许多独裁政府曾经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过。今天，独裁主义的政治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化的结合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继续存在。

美国政治与政府

1990年3月18日，当时还是原东德公民的人们在进行自1933年以来的首次选举时，《时代》杂志开始登载一系列关于美国政治的文章。那一系报道这样开篇说：“当美国的民主幻想和标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时候，在国内却出现了令人不快的舆论，国内政治已经变得阴暗、卑鄙甚至毫无意义以致无法产生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可以引导美国前进的思想观念和领导人……美国政治体制不能解释和争论一些关键性问题，更不用说解决这些问题了。”

这样的批评站得住脚吗？美国是最古老的、最稳定的、最开放民主的国家之一，这是人所共知的。它的政治体制一直都是作为其他国家通向民主政府之路所仿效的模式。但是，强大的民主却需要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需要强大政党对自己成员的培养和动员，还需要持久的政治讨论和争论以及一种可以分享的目的感或共同利益，它们可以压倒至少是节制自私的特殊利益。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为，上述条件在美国的今天并不像他们的过去一样实现得更充分、更完全。

1

历史和文化背景

美国人在现代人中是最具个人主义特征的。自由权和个人自由在美国人价值模式中占有非常高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背景，它是吸纳了从其他社会中逃避迫害的难民而组成的一个民族。美国人知道，他们有权经营自主的企业，读未受审查的报纸，为任何事业而和平地组织在一起，并且可以不用担心不必要的搜查或逮捕而自在地生活。同时，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政府、当地社区甚至是他们的邻居将告诉自己该做什么而统治着自己的生活。

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使美国成为政治上最保守的发达国家之一。许多美国人依然坚定地相信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并且希望避免“政府解决方案”和政府尽可能多地控制。经常可以听到（而且是普遍相信的）这样的话：“政府只会增加问题，而不会解决问题”、“管得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这种强有力的个人主义潮流不仅已经帮助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经济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同时，一些人认为，这种个人主义也导致了公民自豪感和义务感的削弱。当政府被看作是“必要的邪恶”（在美国情况经常就是这样）时，对共同利益的承诺会被削弱，而且公民的义务也不会被认真对待。因此，强烈的个人主义会产生一个学者曾经所说的“虚弱的民主”（巴伯，1984），在这种民主中，公民的自私性，集中体现在对家庭、职业和休闲的自私追求中，代替了公民对所有人享有的共同生活价值观的关心和欣赏（哈贝马斯，1973）。

公民的自私自利可能导致拒绝参与政治程序的许多方面。《心性》一书最近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作了一次考察（参见第三章），书的作者们发现，美国中产阶级都极典型地将政界看作是威吓的、无吸引力的和无意义的。结果，普遍避免政治参与。相反，大多数人只是因为关心对他们的私人生活的威胁和挑战而参与政治，除此之外都是极勉强的（贝拉等，1986）。在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情势下，民主只是成为一种个人或群体寻求表达和满足自身特殊利益的途径。

2

政治参与

经典的民主理论都非常重视政治决策过程中公民的普遍的、正式的参与。经典理论家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能使公民保护自己及自身利益不受不负责任的国家的侵害。然而，更重要的是，对政治过程的正式参与被认为是能够使人们更正义、更通情达理、更宽容以及更能熟练运用自治的艺术。

然而,这一理论现实吗?最近有人提出另一种民主理论的说法,认为这一理论对政治参与做了准确得多的评价。这一现实的或经验性的民主理论警告人们不要大肆鼓励公民对政治的积极参与,这主要根据以下理由:首先,普通公民并不都是很有知识的人,他或她的积极参与有可能为政治过程注入非理性的因素;第二,现代政府会遇到许多复杂而又极具技术性的问题,最好由那些与未受教育的选民相隔离的、并且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来处理,他们不应受到未受教育的选民带来的压力;第三,考虑到已经提高了的公民参与有可能会对负担已经过重的政府提出关于特殊服务、利益和做法的更高要求,那么对某种程度的公民冷漠来说是有其道理的。美国在过去的25年间政治参与率的下降肯定使经典民主理论家感到难过,但却使现实主义的民主理论家感到高兴。

政治参与总体上可以分成三类。斗争的活动(Gladiatorial activities),包括对某项活动投入时间,甚至担任公共职务,要求最大程度的公众参与。过渡性的活动(Transitional activities),包括与公共官员接触到参加政治会议或集会,要求较少的参与。旁观者活动(Spectator activities),如投票选举、从事政治讨论以及展示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不干胶宣传画,要求最少的参与(米尔伯勒斯,1965)。60年代的一项著名研究发现,美国达到选举年龄人口的约三分之一的人对世界政治淡漠、不知道或漠不关心。只有1%~3%的人从事斗争活动,只有7%~9%的人参加过渡性活动。几乎60%的属于低参与度的旁观者类(米尔伯勒斯,1965)。后来的研究也得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果(维巴和尼,1972;戴维斯和史密斯,1986)。

公民参与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经济地位(SES)。当人们在等级体制中上升到更高层时,其政治参与率会增加。这一观察的结论适用于使社会经济地位操作化的三个个人因素,即职业、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并且适用于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时的情况(奥莱姆,1988)。阶级与公民参与之间关系的最一般的解释就是高社会经济地位伴随着使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得以增强的一些因素,如:对政治和政府的运作和影响有较好的理解;与社会及有关现有制度安排的维持或改变的政策有更大的利害关系;以及更多的经济和教育资源(贝内特,1986)。

公民参与还随性别、年龄和种族而变化。女性的政治参与率总是低于男性。有人认为,这是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敌视造成的结果,而且还受妇女主持家务及生育后代责任的限制,这些继续落在妇女身上。这也就是妇女很少参与政治的原因(参见第十三章)。

年龄也会造成政治兴趣及参与度的差异。研究表明,在中学期间政治兴起和参与度上升,在青年时代政治兴趣明显下降,随后成熟期又有一次迅速的、持续的实质性提高,最后,在退休以后兴趣又下降(贝内特,1986)。今天,青年人中对政治冷漠的比例最高。

最后,美国政治参与因种族不同而变化。总体上说,白人比黑人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政治参与。然而,这一现象却是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黑人与相似等级层次地位的白人比较,黑人显示出更高的参与率。

在社会经济地位三个维度中（职业、收入和教育），教育对政治事件的参与和兴趣有最大的影响。的确，当把教育水平考虑进去以后，女性和男性、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参与水平的差别几乎没有（贝内特，1986；萨皮罗，1983）。更具体地说，教育对选举来说是惟一重要的、强有力的预测因素：一个人受教育越多，他或她参加选举的可能性越大（沃尔芬格和罗森斯通，1980）。因此，当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时，人们就可以预期选举人口会相应增加。然而，自1960年以来，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选举

选举是政治参与的最起码的形式之一。然而依然有统计数字表明，在过去的三年里参与投票的人数出现下降（参见图17—1）。许多学者把参与选举的下降趋势看作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承担民主政体中这一项公民义务，其实这是一项很小的、而且耗时很少的、但仍是最重要的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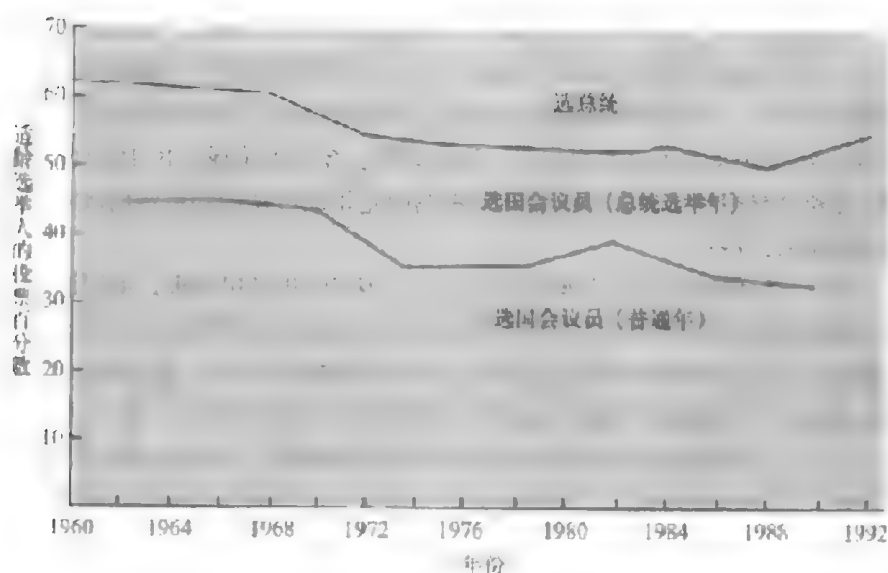


图 17—1 1960—1992 年的参与选举者

参与总统选举的投票人数一般比参加中期选举的人数多出一半以上，但从1960年以来仍呈锐减趋势，那时接近63%的达到选举年龄的人口参加了总统选举的投票。1988年，只有50.2%的人口参加。这是自1828年建立全国性政党制度和民选总统制以来的第三低的参选比例。然而，1992年的总统选举却出现了这种趋势的波动，有55.2%的选民参加了选举投票。分析家不敢肯定这种反弹是实施了恢复政治参与的积极措施所产生的成效，抑或是罗斯·帕罗特（Ross Perot）的第三党参选造成的结果，有人认为这一运动增加了远离政治的人的投票率，因为帕罗特这样民粹主义的候选人对他们有特殊的吸引力。分析家从参加选举人数的长期下降中得出结论，在美国增长最快的政治群体是“弃权派”（布尔汗，1981）。1980年，这“党派”占选举年龄人口的47.4%（1960年是10%多一点）。至1984年，也就是罗纳

德·里根(Ronald Reagan)获得第二任选举的压倒性胜利的那一年,弃权的人增加到潜在选民的48.6%。因此,当里根总统赢得总投票的59%时,他击败华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胜利只是以占选举年龄的人口的31%的投票者为基础的。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达到选举年龄的成年人有49.8%是弃权者。虽然各阶层都有这种减少趋势,但选举弃权主要集中在最穷、受教育程度最低及依赖性最强的群体中(布尔汗,1971)。

有好几种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投票人数递减的情况。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由于美国的相对繁琐复杂的登记程序造成的,这种登记程序把美国选举体制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区分开来。根据这一观点,有人提议简化登记程序,使这一程序更可行,例如,允许邮寄登记、允许人们在登记投票的同时注册他们的汽车或者容许社会服务机构促进和帮助他们的当事人登记,这些都将真正增加投票人数(派温和克劳伍德,1989)。

第二种解释根据美国人口变迁提出,从1960年以来美国人口变得更单一、更具流动性,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选举人减少。虽然,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在提高,而这个因素和政治参与度的提高有极大的相关关系。为了解释这种表面上的反常现象,第三种解释将注意力放在自1960年以来发生的态度变化上。研究表明,今天的美国人比1960年时更好怀疑和更难捉摸,并且他们表现出更弱的党派成员认同和更弱的政治竞争感(华莱利,1990)。

最后一种解释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党上。从20世纪初以来,美国政党已经花越来越少的资源和时间去动员和组织潜在的及已有的投票人。在国内战争期间及大萧条时期形成的党派忠诚一直延续到70年代,直到这个年代,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也还存在着真正的差别。然而,自70年代以来,由于民主党派逐渐趋向于共和党的更保守的政治,这些差异已经缩小。民主党人在这样做的同时,可能失去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而且这些人将成为投票弃权者(华莱利,1990)。

3

政党

按照美国的传统,政治参与主要是以政党为中心的。政党(Political Party)通常是由具有类似态度和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组织,它的目的就是为获取和维持对政府的合法控制。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政党从事着政治职位候选人的提名(道斯和休斯,1972)。

非常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强烈反对政党。然而,尽管受到这种敌视,党派在19世纪初期仍然发展迅速。到19世纪中叶,党派一般被看作是美国民主进程的“灵魂”。在19世纪末的25年间,党派是大部分美国人政治认同的主要方面,而且,由于强大有效的党派组织,使得参与总统选举的人数达到了有资格选举的人口的78%~82%这样的高记录。

然而,在19世纪末期,上层阶级的主要成员(以及支持更有效率的管理的那些人)开始受到由政党取得的高水平的公民参与的威胁。公民参与总是威胁财富的集中,当那些在政治上表示不满的群体,如劳动骑士团和农民

联盟转向用政治选举来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时，那种危险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华莱利，1990）。为了削弱这些政党的势力从而使选举过程变得更加可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修正案。选举人登记变得更加困难；在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的名义下，党派受到国家更严格的规定；并且党派对提名过程的控制因为直接预选制度的引入而受到削弱。这些变化所调动的力量、效率、忠诚和认同感开始下降（布尔汗，1984）。

当政党影响下降时，党派成员也开始减少。在那些继续认同两个主要党派之一的人中间，对党派的感情也大大削弱了。另外，现在的无党派人士占美国所有选民的40%（贝拉等，1991；泰格塞勒，1990）。伴随这些变化，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这种不满情绪明显地表现出来。

新政治技术

当党派的组织力量受到削弱时，他们曾经为追求政治权力而依赖的资源（党派工作人员及动员支持选举的能力）都渐渐地被电子传播技术所取代。新政治技术的主要形式归纳如下（金斯伯格，1984）。

1. 民意测验（polling）。对选举人观点的调查是最基本的，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适当的竞选策略，并选择和提出一些问题（参见“应用社会学”栏：“政治过程中的社会科学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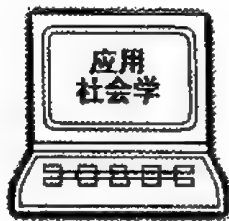
2. 广播媒介（broadcast media）专为提高候选人的知名度、候选人的积极形象以及对手的不良形象而设计的电视广告，是一项主要的媒介技术。

3. 电话银行（phone bank）为加强竞选运动的“个人接触”，助选工作人员使用计算机化的拨号系统及早已准备好的广播稿，以选举中特有的煽情式的语言来阐述候选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从而与目标群体的成员取得联系。

4. 直接邮寄（direct mail）。使用计算机处理的邮件名单来选择可能同情该候选人的选举人。这些选举人会收到正规的、表面上像是个人化的要求经济资助和选举支持的请求。

5. 专业化的公共关系（professional public relation）。专业管理人员和顾问实际上是各州和全国性职位竞选运动的主要依靠人员，可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做民意测验并分析测验结果；特意安排媒介报道、制作电视中的广告节目；还可以选择个人电话和直接邮寄请求的接受者。

新政治技术使候选人比以前更少地依赖政党。候选人知道，要获得普遍的支持，不是依靠传统党派的组织力量，而是要求有采用新政治技术所必须大量的现金储备。一位学者指出：“曾经由大量党派工作人员及少量金钱来完成竞选运动的任务，现在需要越来越少的工作人员，但却需要多得多的金钱来运用新政治风格所依赖的民意测验、计算机和其他的电子设备”（金斯伯格，1984）。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美国政治过程中党派的作用不仅受到实质性削弱，而且美国政治明显向右盟或保守派转变（埃兹尔，1984）。由于国家财富集中于那些带有保守政治倾向的人中间，因此，新政治技术的高额费用已迫使在传统上人数众多（但美元很少）的民主党为筹集竞选所需的足够金钱而变得更加保守。



政治过程中的社会科学方法

在过去的 50 年中，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调查研究和民意测验在政治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预测选举结果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精确度，民意测验者不仅可以非常准确地说出谁将赢得多数选票而且可以说出得票优势的多少。而且政治家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发现调查研究还有许多其他用途。

调查研究的关键因素不是样本规模，而是反映分析人口的精确性。这一社会学的自明之理早在 1936 年的总统竞选中就得到了极好的证明，那时，一本称为《文摘》的杂志主要按照电话簿和汽车注册登记本上的名字邮寄了 1 000 万张模拟选票。其中作出回答的 250 万相对富裕的人（在当时的萧条时期绝大部分人没有电话也没有汽车）以绝对优势选择了共和党候选人 A. 兰登（Alf Landon）。然而，在真正的选举中，投票者以 62:32 选择了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这次预选失败后，样本规模永远丧失了作为保证精确度的地位（马丁，1984）。

在现代竞选运动中，候选人发现他们私人的民意调查是必须的，而民意调查家已经很明显地成为了竞选策略家和顾问。在过去的 20 年中，总统竞选候选人几乎没有不向他们的民意调查家做咨询的。而且，这些总统一旦上台，比如说肯尼迪（Kennedy），当他们做重要决策时也会受到民意调查的影响。

民意调查家为他们的候选人提供好几种服务。他们确定一些策略性的有助于形成竞选问题的竞选主题和概念，并且把某些选举人纳入民意测验中。用这种方式，他们帮助建立整个竞选运动的议事日程。民意调查家还向他们的候选人建议如何处理关键事件，如集会和辩论等。

最近有一个新创造就是“出口测验”（exit poll），它是在选举那天选举人正要离开投票处时采取的。通过询问投票者投了谁的票以及一些重要问题的观点，还有选举人的年龄、职业和宗教等背景特征，民意测验者可以得到大量关于各候选人的受欢迎程度和政治潮流的信息（《民意》，1985）。

为了避免使人留下民意测验是那么精确以至于准确无误的印象，那么应该记住：民意调查者必须认识到所有政治家知道的：在最后的分析中，惟一算数的民意测验是投票人在选举当天的所作所为。

在美国，“保守的”政治观点和“自由的”政治观点之间存在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与区分世界的习惯有关。一方面是商业和经济的私人领域，另一方面是政府和政治的公共领域。一般说来，繁荣、通货膨胀、失业、投资、生产率、经济增长和个人存款等问题都是和私人领域相联系的。而司法、社会安全、福利、公民权和机会均等问题被认为是公共领域的内容。传统上，共和党是私人领域的保守的保护者，提出一些专为减少政府强烈干预经济而设计的政策。相对照，民主党却是公共领域的自由的保护者，拥护更大和更积极的管理，有助于减少经济变迁对个人和家庭带来的不良后果。一般而言，那些从减少政府开支、降低税率中受益最大的人，即那些获得经济利益的人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人。而那些受益少的人，如穷人、受歧视的人、工人阶级等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人。

然而，从 70 年代开始，民主党变得越来越不解放，而共和党变得更加

保守。在这段时间里，更多的人把自己说成是“保守的”，而越来越少的人把自己说成是“自由的”。确实，到1988年的总统选举时，自由主义对许多人来说代表一种强烈的否定内涵。乔治·布什（George Bush）竞选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他把对手米歇尔·道格拉斯（Michael Dukakis）这位民主党人描绘成自由主义者。正如一些批评家指出的，无论民主党和共和党是否靠得那么近，以至于在许多问题上它们各自所提供的并非是不同的答案，而只是与对方的共鸣，但是美国政界存在的明显的右倾趋势，已经使得政治图景比以前更狭窄（当然以前也不是特别宽）。

许多人认为，在过去二十年间，美国政治上的保守价值观的普遍流行已经使得美国全体选民走向了一个极端，纳税者反对发放救济金，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反对实行福利国家，白人反对黑人。一位研究者指出：

种族极端化有助于产生一种倾向于保守经济政策的政治气候。一方面，政府大大增加对经济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及其利益的刺激和回报，另一方面，不支持塔底层的那些人，这样来刺激经济的扩张和增长。当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异与穷人和富人、受赡养者和继承人、城市和郊区之间的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种族就和保守主义结成了同盟（埃兹尔，1991）。

换句话说，种族极端化使富人中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白人克服了阶级差异而连接成为一个坚固的保守的多数人群体。

在过去二十年间，造成这种政治态度右倾转变的其他原因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当效率和成本问题变得明显时，比如70年代和80年代情况就是这样，选举人倾向于支持市场方案及与这些解决方法相一致的保守政治。而当市场强化了不公正及不平等问题时，自由政治就会获得支持并变得流行，只有等效率、成本与经济增长再度成为问题时，人们又会倾向于保守政治（赫希曼，1982）。

4

利益群体与 院外活动

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s）是指代表某成员利益的、并试图影响政府政策和法律的组织及社会运动。利益群体通常通过院外活动即游说（lobbying）来寻求其施加影响的途径。院外活动（通常由职业游说者来操作）是一个涉及与立法委员及其工作人员的直接沟通、动员一般民众的支持、并且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为竞选运动捐款的过程（下面还会讨论）。

所有有组织的群体，包括宗教组织、大学、公司、军队等都会有政治利益，并且会采取行动迫使政府以支持各自利益的方式进行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存在大量的院外活动。最有影响的就是由大公司、商业协会、工会、公共利益群体和单问题群体（single-issue groups）所组织的院外活动。

除了支持代表产业利益而进行游说的商贸协会的活动，大多数大公司还在华盛顿雇佣一群专职游说者来代表自己公司的具体事务。美国制造商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s）代表了约13 000家大公司。每个较

大的工会都资助大规模的游说活动,如美国劳工联盟-工业组织代表会、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卡车司机(Teamsters)。公共利益群体(Public Interest Groups)声称自己代表的不是社会某个特殊部分的特殊利益,而是全体公众的利益,如西尔拉俱乐部(Sierra Club)、共同事业(Common Cause),由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开创的各种消费者协会和环境协会。这些群体都为诸如野生环境不遭受破坏、清廉的政治过程、安全的消费产品等目标而工作。单问题群体(single-issue groups)的数量在过去三十年间已大大地增加了,它们主要以一个相对狭窄的限定范围内的利益为主。在美国最活跃的两个单问题群体,一是国家枪支委员会(NRA),它是因极成功地抵制了控制枪支的立法而著名;另一个是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所有的利益群体都试图通过使用金钱、选举和信息运动来影响政府政策和立法活动(斯通和巴克,1985)。

一些观察者认为利益群体对民主政府来说是基本的。根据这一观点,那些群体完成许多有用的功能,他们使人们能在选举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迫使被选的官员对公众意愿负责。另外,人们认为,利益群体还具有促进以知识丰富和活跃为特征的公民技能、态度、知识和觉悟的发展(埃斯欧尼,1984)。

社会学家埃斯欧尼提出了一种极不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自60年代以来发生的利益群体的大大增加,反映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基础正在腐败。

不受约束的利益群体将阻碍全国范围内舆论和政治参与的发展;而且将导致制定的政策忽视掉那些既不是为了任何群体的利益也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将增加群体间冲突,如果说不是极其猛烈的话,也会使整个系统无法有效运作,从而逐渐变得令人沮丧和疏离。美国好像是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转变(1984)。

很多人,包括一些对利益群体政治总体上持赞成观点的人,都把利益群体的负面作用归因于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建立。

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PAC)是工会首先建立起来的,但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为商业团体而建立的PAC在美国政界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利益群体的成员自愿向PAC捐款(通常较少),然后等资金筹集到5 000美元的时候就捐给各个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候选人。1986年,美国众议院185名成员(约占全部成员的一半)的50%以上的竞选资金来自PAC。同年,82%的众议员的竞选资金30%以上来自PAC(斯滕,1988)。

近年来,有两个因素使得PAC筹集和分配大量资金的能力越来越重要。其一是对个人可以捐献给某次政治竞选的资金数量的限制:给每个候选人限1 000美元,每年给所有联邦职位的候选人捐款的上限为25 000美元。其二是由于新政治技术而引起的不断上涨的竞选费用。众议院成员一次成功的竞选平均费用从1978年的126 900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355 000美元。参议院成员一次成功的竞选,1978年费用是120万美元,1986年是310万美元。就在这些年, PAC给国会竞选的捐款也呈相应的上升趋势:1978年,

1 653个 PAC 共捐资3 410万美元 1988 年, 4 000多个 PAC 捐资超过15 920万美元 (美国人口普查局, 1991; 斯滕, 1988)。

有的学者认为, PAC 在好几个方面破坏了美国政治的民主性。第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对于一个群体的影响力来说, 金钱变得比该群体全体成员规模或群体的客观的位置优势更重要, 从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第二, PAC 使参众两院的代表对他们的政党和选民的依赖更少也更不负责任。最后一点, 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受 PAC 影响的政策把大量的费用加在全体人口身上。例如, 1985 年, 国会以 78 票的优势通过了一项对养牛场进行补贴的法案, 这项法案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耗费 30 亿美元。所有每年收到来自养牛场的超过 3 万美元捐款的议员, 97% 的受捐款额在 2 万~3 万美元的议员, 以及 81% 的受捐款额在 1 万~2 万美元的议员, 都对这项法案投了赞成票。而没有得到牛奶场的 PAC 的钱的人, 只有 23% 投票赞成这种补贴 (斯滕, 1988)。一定程度上, PAC 使政治过程只对某些具有特殊利益的金钱负责, 它们削弱了代议制政府的基础。

5

军事—产业 联合体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总统在 1961 年的告别演说中警告美国: “大规模的军队企业和大型武器工业” 将资源结合起来对政府发挥了强有力的和危险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指出: “在政府委员会中, 我们必须谨防军工企业获得不正当的影响力, 不管它们是否企图那样做。权力错位的灾难性出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会持续下去。我们决不应该让这种联合起来的权力威胁我们的自由或民主程序。”

艾森豪威尔如此关心的军事—产业联合体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是由下列人员组成的: 上层公民和国防部的军事官员、从军事合同中获利的大型私人公司以及志同道合的国会议员 (尤其是那些因为获得依靠国防开支生存的选民的支持而当选的议员)。美国国防部控制的财富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控制的都多, 它是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之一。主要涉足国防工业的私人公司大多是美国最大的、最成功的企业 (柯里和斯科尔尼克, 1984)。

尽管对军事—产业联合体中军工企业可以独立决定国防开支水平的程度有不同看法, 但是政治学家普遍认为, 军事工业利益对国家安全策略的形成以及对用于国防开支的款项的分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个部门, 像美国政府其他部门一样, 其决策过程由于强大的特殊利益群体的存在而受到影响。

每一个军事—产业联合体的主要部分都形成了利益集团, 它影响到军费开支和国防策略。国防工业的最大承包商利用全体 PAC、游说人员及贸易协会来对政府施加压力。这种压力通常由于代表国防工人的工会而得到加强。坚持增加武装部队各部门利益的协会也施加额外的压力 (埃斯欧尼, 1984)。

在军工企业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 它利用了反共情绪。二战结束后一直

谁统治美国

到最近，这种反共情绪在美国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现在，随着前东欧和苏联的解体，军工企业可能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1992年，国会议员和布什政府的成员中没有人会否认对国防预算的重大削减是适当的。然而，克林顿总统在他的预算计划中虽然有某种程序的削减，但仍保留了相当高的军事开支水平。

那些被选举和被任命的官员主要对谁负责呢？谁真正统治美国？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运用这章的前面部分介绍的关于权力分配的理论视角以及新近出现的第四种观点对它进行分析。

第一，多元主义的观点。多元主义论者认为，美国政治权力由许多利益群体所掌握，每一个群体都代表一套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由于每个群体都试图得到更广泛的公众支持，因此，极端主义通常行不通。然而，如果存在一个极其强大的利益群体打破了竞争的平衡，如果群体间的僵局导致管理无效，那这种多元主义体系就可能被破坏。

美国宪法体现了多元主义体系的框架。宪法的抑制和平衡功能使每一个管理机构包括立法、司法、行政部门都不能享有太多的权力。这种分权至少在理论上形成了分散的政治控制。这样，不同的政治派别都有机会影响政府决策。

美国社会存在许多以职业、种族、宗教、民族和地理界线划分而形成的亚群体。多元主义理论认为，那些群体都形成了自己正式的协会作为他们在政治过程中的代表。比如，职业亚群体组织工会或职业协会；地方社区成立街道委员会和社区俱乐部。所有这些协会都为追求成员利益而努力，而且防止成员利益受他人侵害。

因此，多元主义把政治看作是国家监督下的竞争状态中的利益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当情况需要时，国家就以中立调停者、裁判员或调解者的身份介入政治竞争，为制定对有组织的公民群体的要求负责的政策而努力（达尔，1961）。

第二，精英主义者的观点。赖特·米尔斯的名著《权力精英》（1956）对多元主义理论进行了最强有力的批评。米尔斯认为，美国的大部分权力由一个精英群体所掌握，这一群体包括最大的公司的领导、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以及重要的军队官员。大部分权力精英都来自相同的社会背景，都在相同的大学念书，都是同一俱乐部的成员，并且因此而具有基本相同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经常在公司、政府、军队部门的重要位置上更换，以至于表面上看起来有一定区别的这三个群体实际上是一个同质性很强的精英群体。米尔斯认为，这个不超过几千人的小群体决定着“国民经济的规模与发展，决定着就业、顾客购买力、广告价格以及投资水平”。他们基本上统治着整个国家并且做出所有重要的决定。当然，米尔斯并不认为权力精英必定是邪恶的，但他认为权力精英所做的确实只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行为有可能有益于也可能根本无益于普通公众。

最近有人扩充了权力精英的内涵,认为权力精英包括那些大机构的上层人物,如那些集中了美国权力和资源的公司、银行、公用事业部门、政府官僚、广播网站、法律公司、大学、基金会、文化组织及公民组织(拜伊,1986)。尽管米尔斯把权力精英说成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托马斯·戴(Dye)却列出了7314个精英职位。正如米尔斯所说,占据这些位置的人(大部分是富有的白人,另外他们还有相似的价值观和信仰)很容易相互间建立经常的交往,并且通常能相互了解和熟悉。根据这一观点,国家总是反映出权力精英的利益,许多权力精英的成员曾经占据、现在正占据着或者不久的将来将占据着州和联邦政府的上层位置。

第三,阶级冲突论观点。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阶级冲突论认为美国是个阶级国家,它几乎总是自觉地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冲突论者认为权力不是以上层建筑为基础,而是以生产方式的所有制为基础的,而且,权力不是由权力精英来操作,而是由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来行使的。为了促进资本积累、减少次属阶级的对抗、缓解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国家制定政策和分配资源时总是有利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但是,由于国家有两个主要的职能,即维护社会秩序和为资本积累营造有利的环境,因此,国家并不仅仅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被动的工具(米尔班德,1977)。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国家有时候必须采取违背统治阶级的当前利益的做法。由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依赖这个阶级,所以,为了采取符合资本主义制度长期稳定发展需要的措施,国家可以克服资本家的短视利益。因此,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采取的新经济政策虽然违背了资产阶级的意愿,促进了工会组织发展,制定了高要求的商业规则,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但是,通过发展经济并安抚了越来越富战斗性的次属阶级,这一政策却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长期利益。

第四,主张中央集权下实行经济统制者的观点。经典的多元主义论者、精英论者和阶级冲突论者都认为国家的行为与有组织的群体利益相关、与权力精英的利益或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关。相比较而言,最近才出现的主张实行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观点认为,美国是一个有权威的、富有资源的强大组织,它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即使在违背其他的群体、精英或阶级利益时,它有采取行动的能力。赞成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家是一个独立的、有自身利益的并以自己的方式行事的强大的行动者。国家官员使用国家授予的权力和资源来制定有利于国家自身的政策(诺德林格,1981)。这些官员并不以权谋私,他们只是代表国家行动,他们深知他们的职权来自国家的力量。近些年来,主张实行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的观点越来越流行了。

社会学与国家：一种人文观点

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作为人们学习和实践对他人所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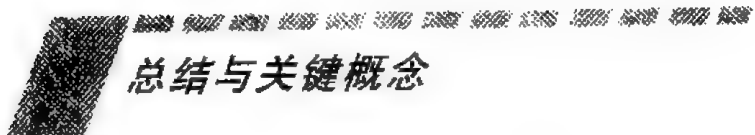
的社会义务和责任的场所，已经被现代的自由民主所削弱。保守主义者认为这种削弱是由于国家的扩张。而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的日渐增长的重要性破坏着社会联结。二者也许都是正确的。社会正被国家和现代市场所销蚀（这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人们逐渐地、越来越少地依靠自己、朋友、家庭及社区，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市场和国家的非个人化的结构。如果我们希望加强社会的力量，我们就可能不得不限制市场和国家。

在所有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里，包括美国在内，国家的规模、范围、权力和权威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40年美国联邦的总支出是960亿美元，1970年这个数字跃升到5980亿美元，而到1992年增加到11380亿美元（所有的数字都以1987年美元价格计算的）。当国家成长时，它也渐渐承担了许多责任：照顾老年人、儿童、病人及被抛弃的人，而这些曾经都被认为是家庭和朋友的义务。这既是必须的，也是人道主义的。但是，当国家承担了这些义务和责任时，我们也越来越多地依赖国家。同时，这也削弱了“我们对他人命运的个人责任感，而这曾经是和私人密切相联的社会领域”（沃尔夫，1989）。

当国家扩张而社会削弱时，基于国家强权的政治义务逐渐取代了基于合作的社会义务。作为公民，我们完成自己的政治义务（如纳税），主要是因为这些义务是国家强制实行的。结果，慈善事业和自愿者服务减少了，而社会冷漠增加了（沃尔泽，1982）。

正当社会义务的基础削弱时，我们发现，相互依靠、信任和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还发现，维持家庭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稳定，规范群体成员的行为也变得更加困难。社会义务的权力消退时，国家的权力却逐渐增强。由于社会没有管理和控制好自身，非个人化的、强制的政治控制进入到这一真空领域。通过这种方式，国家承担了越来越大的规范公民生活的责任。

自由民主国家采取的福利措施已经为无数人提高了生活条件，拓展了他们的前景。很少有人会否认，提供基本的福利服务的任务最好应由国家来承担。然而，国家至多能提供“干净光亮的地方，如医院、日托中心、老人院等等，它们管理有序，没有腐败和暴力”（沃尔泽，1982）。除此之外，友爱和同情心等仍需要人们互相给予。那种以利他感和团结纽带为基础的社会义务应该得到鼓励，而不该被国家非个人化的机制所取代。有一位学者预言：“如果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了，国家将会继续发现只有它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国家将变成一种管理机构，取代人们自身应该拥有的共同良知”（沃尔夫，1989）。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政治活动是指人们和群体取得权力以及对他人运用权力的过程。它

也是人们做出并实施那些影响整个社会的决定的方法。权力是指人们或群体控制或影响他人行动的能力,不管他人是否愿意服从,这种权力都可以通过提供报酬和惩罚,或操纵信息等方式而得到实施。合法权力的使用一般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而非法权力是没有得到社会认可的权力。权威是一种制度性的合法权力。韦伯将权威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传统型权威是得到社会风俗及已接受习俗认可的;魅力型权威来自领袖和他(或她)的追随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法理型权威是以理性地建立的规则为基础的。

2. 国家是在社会中拥有最高权力并对武力的合法使用享有垄断权的机构。在现代的民族国家之前还存在过其他的不太复杂的政治组织,如城市国家。

3. 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可以用来分析社会形态中的国家权力及政治权力分配问题。多元主义观点认为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这些利益群体都试图影响政府,使其按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行动。国家的作用就是调解利益群体间的关系,并达成共识,从而按照共识来行动。精英主义观点认为,政府是由社会主要机构的领导人统治的。经典的冲突论社会学家包括罗伯特·米歇尔在内,确定了组织中(包括官僚国家)产生寡头统治或杰出的少数人统治所需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大部分组织成员的冷漠和缺乏主动参与性。阶级冲突论观点把政府权力看作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维护 and 加强自身地位的工具。

4. 现代政府形式主要有三种:民主主义、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民主政府是指:政府的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正式认可,而且公民有权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决策过程。在西方绝大多数社会中形成的民主类型包括美国在内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自由民主国家是指政治上而非经济上的民主。重要的商业决定都是由商业领导人作出的,而与普通民众的意愿无关。集权主义是指由某个政党所统治的政府形式,政府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监督和控制。独裁主义是指一个人集所有权力于一身进行统治的政府形式。统治者要么可能是君主,要么是一个独裁者。

5. 美国人是现代人中最具个人主义特征的。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已使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政治上最保守的国家之一。个人主义有可能使人们更多关注私人的利益追求,而不顾公共事业。最近有关美国的分析认为,公民的那种不介入与自己直接利益无关事情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6. 一般来说,政治参与可以分成三类。斗争活动,包括对某项运动投入时间甚至担任公共职务,这都要求最大程度的公众参与。过渡性活动,包括与公共官员接触甚至参加政治会议或集会,要求较小程度的参与。旁观者活动,如投票选举或从事政治讨论,要求最小程度的参与。美国绝大多数人可以归入旁观者类。

政治参与受到如性别、年龄、种族等许多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个人在等级体制中上升得越高,他的政治参与水平也会越高。在社会经济地位所有因素中的教育因素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和参与度的影响最深。

7. 有统计数字表明,过去30年中参与投票选举的人数在减少。一些分

析家从这种下降趋势中推断,美国成长最快的政治群体是“弃权派”。弃权者主要集中于国家中最穷的人及最不利的群体。不同的学派把选举人数的下降趋势归因于复杂的投票登记程序、人口因素、态度变迁、政党的削弱等。

8. 政党通常是由具有类似态度和利益的人形成的一个组织,它的目的就是争取并控制政府。美国政党在19世纪发展迅速并在19世纪最后25年其成员数量及权力都达到顶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修正案极大地削弱了政党的力量,而且在过去的30年中已经导致政党力量、忠诚和身份意识急剧下降。

9. 正当政党的组织力量受到削弱时,他们曾经为追求政治权力而依赖的资源(包括党派工人和动员选举支持的能力)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昂贵的、新型的政治技术所取代,这些新技术主要有五类:民意测验、广播媒介、电话银行、直接邮寄和专业化的公共关系。这种新技术与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在美国政界的右转趋势密切相关。

10. 传统上,共和党是私人领域的保守的防卫者,而民主党却是公共领域的自由的捍卫者。然而,从70年代开始,民主党变得越来越不自由,而共和党变得更保守了。这可能是一种循环过程,当成本和效率问题突出时,公众就支持保守政治,而当保守政治产生出普遍的不公正、不平等时又去支持自由政治。

11. 利益群体是指代表其成员利益的、并试图影响政府政策和法律的组织及社会运动。他们通常以院外活动的方式进行。院外活动一般包括:与立法委员及其工作人员的直接沟通、动员一般人民的支持、捐钱给政治行动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收集这些捐款后再把这笔钱捐给政治候选人。有些学者认为,对民主进程来说,利益群体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利益群体的存在严重威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12. 军事—工业联合体是由下列人员组成:上层公民、国防部军事官员、从军事合同中获利的大型私人公司以及志同道合的国会议员(尤其是那些因获得依靠国防开支生存的选民的支持而当选的议员)。政治学家对于军工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国防开支的水平持不同看法,但一般都认为军工利益对国家安全策略的形成有决定性发言权。

13. 为回答“谁统治美国”及“被选举和被任命的官员该对谁负责”这两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四种不同观点。根据多元主义者的观点,政治是国家监督下处于竞争状态中的各利益群体的相互作用。当需要时,国家就以中立调停者、裁判员或调解者的身份介入政治竞争,为制定对有组织的公民群体的要求负责的政策而努力。精英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相对较小的权力精英集团是国家和政府行动的主要决定者。阶级冲突论观点则认为,国家和政府的行动是以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需要及利益为依据的。而主张中央集权下实行经济统制者的观点认为,美国是一个有权威的、资源丰富的强大组织,它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即使在违背其他的群体、精英或其他阶级利益时,它也有采取行动的能力。

14. 在所有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里,包括美国在内,国家的规模、范围、

权力和权威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也渐渐承担了许多责任,例如,照顾孩子、病人和老人,而这些曾经都被认为是家庭的主要责任。正当国家扩张时,社会义务的权力缩减了,结果慈善事业减少了,社会冷漠也增加了。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能够而且应该为它的公民提供支持,但是基于利他主义和社会团结纽带的社会义务也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被国家非个人化的机制所取代。

推荐阅读书目

1. 康威·马格雷特 (Conway Margaret), 1991. 《美国政治参与》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考察和解释了政治参与的最新趋势。

2. 戴恩尼, E. J (Dionne, E. J.), 1991. 《为什么美国人讨厌政治》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解释了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党意识形态的变迁,并说明了对美国政治逐渐不满的背景原因。

3. 多姆霍夫, G. 威廉 (Domhoff, G. William), 1983. 《现在谁统治美国?》 (*Who Rules America Now?*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在 C·莱特·米尔斯的传统基础上对美国政治领袖的重要研究。

4. 托马斯·R·戴 (Dye, Thomas R.), 1990. 第四版《谁在掌握美国?》 (*Who's Running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对布什时代的权力精英的构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

5. 托马斯·埃兹尔 (Edsall, Thomas) 和马莉·埃兹尔 (Mary Edsall.), 1991. 《连锁反应: 种族、人权及税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Chain Reaction: The Impact of Race, Rights and Taxes o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对造成美国人民两极分化及过去二十年间促成美国政治右翼转变趋势的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

6. 迈克尔·帕朗蒂 (Parenti, Michael.), 1994. 《土地崇拜: 美国政治神话》 (*Land of Idols: Political Mythology 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一位重要的冲突论取向的学者对美国政治文化进行的仔细考察。

7. 兰德尔 (Randall, Vicry.), 1987. 《妇女在政治中: 一种国际视角》 (*Women in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妇女参政情况进行了考察。

8. 施瓦茨 (Schwartz, Mildred.), 1990. 《关于政治的社会学观点》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简要介绍了社会学对政治生活的解释。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塞梅（Semai）部落的猎人费了很大的劲英勇地杀死了一头凶猛的野猪，他把野猪拖回村庄，平均分配给人们。他得到的不比任何人多也不比任何人少。甚至没有人会因为他的贡献而感谢他，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就违背了塞梅部落的一个重要的规矩。

在哥伦布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生活在太平洋西北岸的当地美洲人经常举行一种称为冬节的竞争性活动。当地富人的社会地位就是由他能为大家提供多少食物和有价值的东西为标准来确定的。所以，一些人实际上是在努力使自己破产。

同时，美洲北部的部落如霍皮（Hopi）和朱尼（Zuni）与居住在现在的墨西哥的其他部落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贸易关系。他们主要以颜色好看的金刚鹦鹉和亚热带水果来换取绿宝石和玉米粉。

杰茜卡在麦当劳店站了一天的柜台后，脱下她的围裙，收起她的小费，准备回家。

弗雷德为她的邻居杰里修好了汽车发动机，明天杰里将用自己的木工技术来为弗雷德修好后阳台，以作为交换。在这场交易中不涉及金钱。

莎娜打开了她的视频显示终端，给纽约股票市场的联系人打了一个预售电话。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她将为她的委托人赚得好几十万美元，为自己也赚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上述例子是人们参与经济的不同方式，也可以定义为商品和服务被生产

和分配的组织过程。经济制度千差万别。一些只是以简单的交换和交易为基础，而另一些则涉及复杂的再分配制度。一些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不用金钱就可以进行，而另一些若没有精密的财务运算则无法进行。每一种社会中都存在某种经济制度，经济是人类文化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经济范畴是极其重要的。随便举个例子，如果人们被问及五种最基本的社会设置中（宗教、政府、经济、家庭、教育）哪一个最重要，大部分人可能会说是家庭。当然，这种回答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基本都在家庭范围内度过的。但是，如果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想想“最重要”这个词，问一问哪一种主要设置对整个社会产生最大的影响，那我们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许多社会学家，尤其是那些冲突论传统的信守者会认为，经济是所有社会制度中最重要。

像其他的制度一样，经济制度必须解决许多问题。资源，包括人和自然，都是有限的。谁来决定生产哪些商品和服务？谁来生产那些产品？

世界上每一个社会都采取了一种经济制度来回答这些问题。一些制度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具体工作；而另一些则允许人们选择；还有一些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反过来，个人的工作生活有助于确定自己的身份和社会价值。经济制度也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不平等经常发生，而且这种不平等会导致社会阶级、种族、人种和性别之间的社会不平等。

这些主题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过多次了。这里我们集中讨论经济制度的构成，他们是如何形成、由什么构成以及如何运作的。然后转向对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进行广泛讨论。为了得到结论，我们提出了“工作社会学”，并以一种关于社会和市场的人文观点来结束。

经 济

1

经济的历史演变

历史上，最简单的社会经济制度很少有超出家庭范围的。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劳动分工，安排谁打猎、谁采集食物或者谁种植和收获庄稼，以及谁生产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在满足了家庭的生存之需后，如果说还有产品剩余的话，那也是极少的。在这种生存性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中，贸易、市场和税收都不存在。社会角色是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经济来区分的。

随着种植作物和饲养动物，人们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提高了。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不同的目的，比如，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动物。很多家庭发现，通过集中种植某种作物，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而且剩余产品可以用来交换。然而，在简单的农业社会里，大部分物质产品仍在家里生产。牧师、医生和金属制造者是极少数人，他们主要为社区提供服务。

当专门化的生产优势变得越来越明显时,家庭就可能生产剩余产品,如酒、羊毛或陶瓷。市场经济的最初阶段体现为一种经常的或每周一次的剩余产品交换的集市。这些交换中心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生活中心。渐渐地有些人开始从事一些特殊的工作,他们依靠为市场所在地的人服务而谋生。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分工超出了家庭,跨越了村庄甚至整个地区。人们的社会角色更多地以他或她参与经济的性质来决定。

上述制度最终演变成一种高度复杂的经济秩序。地主租土地给手工工人。统治者收取贸易税来养活专门的军队,保卫这个日渐复杂的社会不受其他的统治者和敌人的侵犯。奢侈贸易,如调味品或进口的布匹,就成为经济的一般特征。人们还发动政府战争来满足更活跃的市场需求。终于,商人阶级有了重要的地位。这些商人本身不生产任何产品,但他们在商品富足的地方买进,又在商品短缺和昂贵的地方卖出,以谋取利润。

2

现代经济的构成

关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现代经济必定面临几个基本的问题: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用于生产的资源和技术,以及分配方式的选择(萨缪尔森,1970)。一种经济制度对这些问题如何作出回应取决于五个基本因素: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经济权力集中的程度、经济是在市场体制下还是在计划体制下运作、主要的产权所有制及经济所倚重的刺激生产和分配的手段。

第一,资源和技术。经济学家把经济分成三部分: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第二产业或制造业;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在前工业经济中,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原材料是主要的经济资源。用于开发自然资源的技术,如种植、打鱼、挖矿都是劳动密集型的(labor-intensive)(即主要依靠人力)。在工业化经济中,第二产业成为社会财富最主要的来源。制造业和加工业依靠的技术是资金密集型的(capital-intensive)(即依靠机器生产)。因此,工业经济的关键资源是能源。在后工业经济中(postindustrial economy)(参见第二十二章),第三产业是工作和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第三产业的工人提供的是服务而不是工业品。银行家、作家、科学家、广播人员、教育工作者都属于服务行业,安全保卫人员、医院护理员、建筑管理人员、理发师和侍卫也是如此。在后工业社会里,信息是主要资源,信息加工和知识密集型技术(knowledge-intensive)(计算机、机器人技术、无线电通讯)是最重要的(贝尔,1973)。

第二,经济集中和分散。经济的基本特征也受到经济权力分配的影响。如果经济决策权掌握在大多数个人、家庭和公司手中,那这种经济就是分散型的。如果那些权力是由少数个人或公司所掌握,那这种经济就是集中型的。理想化的集中型经济只对一个中心负责,通常是管理机构。相反,完全分散化的经济对积极参与的个人喜好负责(埃利奥特,1985)。

第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关键的决定者:市场经济必须对消费者的喜好有所反应。在计划经济中,最终的决策者是计划者:计划经济对计划机构负责并与计划相一致。

市场经济不如计划经济更集中。然而，没有计划的经济也可能相当集中。在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如美国，大部分决策权集中于少数大公司手中。在日本，公司也存在类似的集权现象，国家制定民族工业政策，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因此，美国和日本都是高度集中的市场经济（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1989）。

第四，产权所有制。经济行为还受到财产、资源和技术所有制的影响。产权所有制包括几项重要的权力：财产转让权、财产使用权以及财产带来的产品、服务和剩余财产的完全使用权。在私有制（private ownership）体制中，这些权力属于个人或群体。在公有制（public ownership）体制中，这些权力属于政府。在集体所有制（cooperative ownership）体制中，这些权力由合作企业（cooperative enterprise）所拥有，它是一种自愿的、互惠互利的经济联合体，当然，它是否拥有财产有待讨论。集体所有制是集体所有（类似公有制），而不是非政府的（类似私有制）（埃利奥特，1985；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1989）。

第五，刺激。影响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的最后一个经济因素是经济制度的报酬结构（reward structure）或激励体系（incentive system）。在不存在暴力的情况下，人们必定有行动的愿望，去买和卖、去生产和消费、以特殊的方式和为特殊的目的来使用他们的资源和技术。一般说来，一种经济制度要么以物资刺激（material incentives）、要么以道德刺激（moral incentives）来激活有目的的行为，物资刺激包括工资、利润、奖金和其他的金钱报酬，而道德刺激主要是呼吁人们对社区、社会或宗教的责任感。

市场经济几乎完全依靠物质刺激。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既想降低物质刺激对人的控制，又想减少由于收入差异而带来的不平等，因此试图使物质刺激服从道德刺激。

经济制度

上述现代经济的五个因素对于理解现代世界经济制度来说是最基本的，这些经济制度可分为：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混合经济（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1989；埃利奥特，1985）。

1

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的兴起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早始于一种简单的农业市场经济，到中世纪晚期在西方才开始采取现代形式（沃勒斯坦，1979）。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要素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出现了，但商品仍以农业产品为主。可用于销售的商品主要来源于社会之间的贸易，而工业制品很少在一个社会中的流通。由于那时大部分人口仍依靠小规

模的农业生产，“资本家”也主要是商人和金融家。他们的经济权力不得不与封建经济秩序中的固有的权力同时存在。

工业形态的资本主义是随着非人力的能源资源的发现而逐渐形成的。蒸气的使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第一次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的集中成为可能。从此，商品生产从家里移到了工厂。同时，欧洲国家大幅度的人口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不管他们是否欢迎这种新的秩序，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转向工业制造。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再也无法直接满足他们生存的土地，纷纷移向了工业生产中心。

现在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正如彼得·伯格（1986）指出的，从为大多数人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也许是最成功的经济机制。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甚至都开始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成功之处。而且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的许多共和国在内，目前也正在努力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然而，资本主义也产生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些我们下面将加以讨论。

资本主义制度的要素

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几乎所有的财产都归个人或群体所有，他们是与作为一个整体或政治统治者的社会相对立的。由于个人或群体拥有这些财产，如房地产、用于生产商品的生产资料以及产品本身，因此他们有权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商品。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所有者为了从所有物中谋取最大限度的个人利益，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与竞争者争名夺利而不受任何限制。

利润是掌握和管理生产方式者的目标。按照资本主义的理论，所有者有如何使用自己的利润的自由。他们可以立刻提高生活水平、扩张自己的企业或者在其他经济领域投资，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想保证现在的或将来的舒适。原则上，能够赚得的利润数量不受政府的限制。

某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通过竞争来努力吸引最多数量的顾客。竞争者不断地改变商品的价格，而且为了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可以改变商品的性质。在理想状态下，当生产者试图胜过对手时，竞争可以刺激技术进步。但同时，他们总是小心地不去胜过自己，因为一种商品连续而渐进的改进比激烈的改变更能确保它在未来受人们的欢迎。公司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惊奇竞争者和顾客对待“革命性”的商品是如此的相像（看一看可口可乐公司改变它的被实践证明了的配方时所发生的一切就明白了。当时公众大声疾呼，要求公司停止损害那些最重要、最成功的产品形象）。

法语 *laissez-faire* 一词，大意是说“让人们做自己想做的事”，它概括出了这样一个共识，资本主义制度在那些政府干预市场最少的社会里运作得最好。按照这种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有着密切联系的竞争力与消费者需求被认为是可以充分规范经济运行的“自然控制”手段。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单位是有限公司，它是一种由政府许可的、完

成某些功能或服务的企业。有限公司由股份持有者群体所拥有，他们通过法律限制对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从而保护个人资本。股份持有者在决策过程中享有发言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多数大公司都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经营权授予专门的管理部门。

在 20 世纪里，资本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特大公司。不断的竞争使生产者努力争取控制更多的原材料和更广阔的产品销路。弱小的生产者通常被更强的竞争者所吞并，然后强者则从不断增加的市场控制中获利。这些大生产者利用利润来资助自己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增长。许多人提出了关于允许数量极少的公司领导人控制大笔资产是否公正的问题。

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在 19 世纪，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有影响的批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将最终导致自身灭亡的矛盾。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在于，当生产扩张时利润水平却倾向于降低。因此，资本家只能通过更残酷地剥削劳动力来维持高利润。

例如，资本家为了生产更多的商品而购买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使用机器增加了产量，但是由于自动化生产而使许多劳动力剩余下来无事可做，因而，购买剩余产品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少。由于资本家们互相竞争这一越来越小的市场，他们为了降低商品的销售价而必须降低工人的工资。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也能接受不断下降的利润，有时他们也必须这么做。但是，不断减少的利润可能引起资本家大批破产，从而造成很大的危机，反过来这种危机导致更多的失业或更大规模的萧条。无论如何，最终是工人遭殃。马克思认为，经过一系列严重的萧条以后，穷困的工人会起来反抗并控制国家。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治权力，他们就会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并收归集体所有。也就是说，他们将私有财产公有化。然后，劳动阶级将控制生产方式，这样工人就不再受剥削。

马克思主义者对 20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成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解释就是由列宁在 1917 提出的，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西方工业国家能在发展中国家倾销剩余产品。在不发达国家倾销其剩余产品能够帮助资本家维持高价格和高利润。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那种倾销只能为西方资本家提供临时的解决方案。最终整个世界将工业化，这样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来。根据这一观点，工人阶级的革命只是推迟了，但最终仍将发生。

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对 19 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对劳工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要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在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之外重新加以思考。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观点为 20 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带来了重要的改变。凯恩斯提倡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应增加开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制定了减轻大萧条时期影响的政策，而且许多国家在那时也颁布了类似的政策。从那以后，凯恩斯的理论在美国

的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现在有所减弱。

“凯恩斯革命”导致了最近几年的一个日渐重要的问题，即赤字开支（deficit spending）或政府开支超出税收的倾向。到1992年，美国国债达到历史空前水平，超过了4万亿美元。有些学者把这一巨大的赤字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奥康纳，1973）。还有学者认为这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失败：在政治上，通过增加政府开支的法案比增加税收要容易得多。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预算赤字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如果税收不能维持政府开支，政府就要借钱。人们认为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即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普遍提高）。自6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一直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存在的问题。这有许多原因，包括要求高工资、原材料（如石油、天然气）费用大幅度增加等。

要区分通货膨胀的原因和结果是很困难的。是工人要求高工资导致了通货膨胀，还是他们为了赶上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而要求高工资？到目前为止，美国商业领导人责怪劳方要求额外的工资刺激了通货膨胀，而反过来，劳方指责商人使价格的增长超出了合理水平，这种相互指责的情景已是司空见惯。

失业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长期的问题。尽管二战后几十年内总体上处于繁荣阶段，但失业率仍然相当高。有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时候同时受到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的困扰。这种双管齐下的情况，又称为经济不景气状况下的物价上涨，已经困扰了整个80年代早期的美国经济。虽然在后五年二者的比率都下降到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但是当美国经济经历又一次不景气（经济低迷时期）时，失业率在90年代又开始上升。

在今天的高技术社会里，一种新的失业开始出现。除了商业周期的下降时期工人被解雇外，许多工人还因为他们的技术跟不上生产过程的进步而被“落下”。这些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的受害者可能产生痛苦和敌对的情绪。由企业和政府资助的再培训工程，已经部分解决了结构性失业的问题，这在欧洲表现得尤其明显。但是人们逐渐认识到，可能再也不会存在充分就业。由于工作的高技术要求以及失业者典型的低技术水平，资本主义经济可达到的最低失业率至少为3%或4%，这一水平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市场需求为依据的。但是这些经济中的市场并不一定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例如，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将受益于不断进步的城市间铁路网和高度发达的城市快运体系。然而由于市场需求，许多资金被投资到汽车生产中，可用于公共交通的钱越来越少。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高利润商业活动总是吸引最多的投资。不幸的是，这一原则意味着许多重要的产品和社会服务经常被忽视。许多钱被用于资助大型的新兴企业或快餐企业的发展，例如，试图发展太阳能体系的公司必定经常依靠政府的资助。

也许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里，尤其是美国存在的问题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贫穷和财富分配不平等（这些问题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已详细讨论过）。人

们应该认识到，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的穷人的数量及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来说，美国是尤其明显的。在那些采取了越来越完善的福利措施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例如，北欧的许多国家就是这样，收入分配更加平均，而严重的贫穷几乎不存在（斯皮罗，1983；艾森斯塔德和艾梅尔，1985）。

2

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经常被看作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和分配方式是集体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国家是典型的集体所有者，但是在某些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中，所有者有可能是一个小社区或者是在某个企业工作的全体成员。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认为，价格应由集体而不是由市场机制来确定。这明显意味着，至少是主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由政府机构来确定的。

资本主义论者认为，最大的公众利益来自于市场中追求自私利益的不规则的个人行为，但是社会主义者拒绝这一看法。相反，他们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就像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一样），重要的决定应由全体人民的代表来作出，而且应该协调起来促进国家的更大的社会目标。

社会主义制度最初是以马克思和几位19世纪法国思想家的著作为基础的，但是在现代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不再严格依据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党派在方法上经常是更现实的，而不是更理论化的。尤其在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社会主义制度最近的两个重要的发展应该受到重视。第一，通常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非常穷的农业国家建立起来（佩奇，1975）。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开始组织中国农村的农民。这一运动是成功的，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农民构成了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自从20年代以来，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常是以吸引农民的政治纲领为基础的。古巴、阿尔及利亚和越南就是很好的例子，农民取向的社会主义运动为他们赢得了政治权利（沃尔夫，1970）。

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前苏联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经济国家。在80年代晚期，所有东欧国家由于受到了严重的经济停滞的困扰，都从中央政府管制的经济转变为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引入前苏联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perestroika）所引发的。尽管这一政策本想通过改革来挽救前苏联社会主义，但它最终失败了。

1992年初，前苏联十五个共和国宣布苏联解体。其中大部分也开始引入市场经济，包括财产私有制、利润刺激及市场定价。这些深入的改革使这些国家陷入了通货膨胀、失业及食物、燃料和住房的短缺。

为什么前苏联经济体制会解体呢？在80年代末期，苏联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它拥有最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它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及原铁的生产国；而且拥有世界第二强的军事力量。然而另一方面，前苏联社

会生产率在近 20 年内没有增长。另外，其生活水平（在世界排第 60 位）在逐渐下降，越来越多的前苏联人民处于饥饿状态（贝尔，1991）。前苏联经济的惨淡景象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力，它不能有效地协调成千上万的相互依赖的现代经济因素。

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取决于政府庞大的生产计划。实际上，在某个地方增加生产的决定通常引起另一个地方不可预测的后果。因此经常产生无效。正如两位经济学家所指出的：

如果派给公司的任务是生产 1 万件衬衣，那它可能会使用一些粗糙的布料而且会把线缝制得弯弯曲曲。讲到运输企业也是这样，他们为了完成指定的吨公里数的运输目标，有可能来来回回地运输满卡车的水（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88）。

由于生产几乎完全实行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前苏联管理者很少注意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以及生产的效率。对于满足经济变化的要求而创新的方法经常被蠢笨的计划工具所压制。前苏联经济在七八十年代遭受到的一系列坏收成、急剧上升的军事开支以及以弹性创新为价值标准的新型国际市场的出现，都使其增长无法满足前苏联人民的基本需求。

3

混合经济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经济制度的两种理想型模式。在现实世界中，既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也没有纯粹的社会主义存在。相反，几乎所有实际存在的社会都是以混合经济（mixed economics）为特征的，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原理的结合。混合经济的两种特殊类型是市场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前者相对接近社会主义模式，后者含有更多的资本主义成分。

市场社会主义

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以利润为目标的企业为满足市场需求而使用公共拥有的资源。因此，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表现出了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特点（例如，公有制和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中的市场力量及分散决策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1989）。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是由政府控制的，与之相对照，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是根据期望获得利润来决定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与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但是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中，利润属于国家，国家拥有资源和技术。这些利润的一部分被用来促进社会的更大平等。

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是一种规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的有效工具。然而，他们认为，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它不能为许多想要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它制造了所有者和被雇用者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可以防止那些不公正，“通过对投资进行公众规范以保证充分就业……鼓励企业形式的发展（尤其是工人合作企业）以达到主要收入更平均的分配，而且……通过使用税收制度进一步实施博得全体赞同的重新分配措施”（米勒，1989）。

民主社会主义

自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欧洲国家包括瑞典、挪威、丹麦及荷兰等，都是由民主政府统治，他们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移植到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去。这些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t）政权把它们的主要责任看作是消除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结果，社会主义社会比更加资本主义化的社会的福利开支要高得多，社会服务措施也要复杂得多，而且政府对公民的保护也更实在。然而，尽管这些国家的公有制范围比美国更广泛，但其全部经济财富接近 90% 仍是私人所有。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民主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厄斯平-安德森，1985；斯蒂芬斯，1979）。

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指导性目标就是修正市场对医疗、住房及就业等领域的影响（即减少市场因素的作用）。这种修正“要想达到一定程度，使得个人和家庭能够不管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为而能够维持一种正常的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厄斯平-安德森和科彼，1985），这就要求建立极其全面的公民权及广泛的社会服务来满足这些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商品和服务（例如保健）的分配就很少依赖市场原则（即人们得到他们付钱购买的商品），而是以公民权为基础（即不管人们是否有支付能力，他们有权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如充分的医疗）（罗森布卢姆，1991；雷，1991）。

西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是完全民主的。他们实行有许多党派参加的自由选举。

美国的经济制度

1

历史与文化背景

美国文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强烈的个人主义（参见第十七章）。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给他 18 世纪的同时代人提出建议时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富兰克林呼吁道：应该好好利用美国提供的最特殊的礼物，即美国为每个人提供了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及主动性而取得成功的机会。

很明显，许多美国人把富兰克林的建议牢记在心。到 20 世纪初，对个人主动性的强调在美国人的思想中占有中心的地位。有成千上万的人读过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只是虚幻地描述了从乞丐到富翁的经历，但是它却认为通过艰苦努力和坚定的决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正如一个学者所指出的：

这个世纪初的美国人亲眼见到了阿尔杰的故事在他们的身边变成现实。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arriman）最初是一个办公室的勤杂员，每周薪水是五美元，后来他统治着一个强大的铁路帝国；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从一个委托商办公室的办事员变成了世界上最

富有的人之一；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最初是匹兹堡棉纺厂的一个绕线工人，每周赚取1.2美元，后来他成为美国最大的钢铁大王。20年后，当孩子们仍在读阿尔杰的传说时，亨利·福特通过成批生产“T”型车发了大财，并且成为了一位民族英雄（赖克，1987）。

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模范都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人。他们的成功，如阿尔杰，并没有依靠政府的帮助，而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取得成功的。洛克菲勒、卡耐基及福特的生活经历似乎使得不受政府干预的经济合法化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尔杰的故事达到顶峰，不是在19世纪流行的高度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而是在这种制度让位于一种越来越少竞争的、更多依靠政府干预的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时期。自从19世纪末以来，政府的规模和权力以及它对市场的影响与日俱增。19世纪的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得许多工人受到剥削，并且最终导致政府制定规则来结束这种糟糕的情况。1913年累进制所得税的引进是政府权力不断扩张的又一标志。然而，30年代部分地为了消除大萧条而制定的经济和社会计划才是更重要的。当大萧条结束时，这些方案的大部分仍然存在。另外，大政府扩张的其他时间还有二战及60年代，60年代是以新的社会方案的制定而著名的。

2

合作资本主义

美国19世纪的相对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制度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现代的工业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政府逐渐规范经济的某些方面。技术进步使得生产过程逐渐复杂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应付这种复杂性，大规模的组织应运而生。在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时期，关键人物是一些个人企业家，他们要么通过精明的投资（如铁路），要么资助一种聪明的发明（如汽车）而发了大财。但是在20世纪晚期，关键的表演者却是股份公司。

在1900年到1920年间，合作公司在成批生产企业中变得非常强大。批量生产是以大量投资为基础的，对专业设备和工人的投资是为了适应某种商品的大量生产。然而，当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下降时，公司就会有很大风险，因为它无法用其他方法处置它的原料。因此，早期的成批生产只有在这样的市场中才是有利可图的，这个市场必须“足够大，可以吸收某种单一的、标准的商品的大量生产，而且足够稳定，可以确保用于生产那种商品的原料不断被使用”（派奥和萨贝尔，1984）。为了应付这些问题，现代公司做了不懈的努力：（1）减少因强烈竞争带来的市场风险及市场波动；（2）发展它所需要的稳定的大市场。

公司合并的风潮发生在20世纪头十年，为了稳定和扩大自己的市场，许多公司纷纷与竞争者联合起来。美国最早的大公司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如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力公司、美国电话电讯公司、标准石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赖克，1983）。一旦合并，大公司就努力寻求合作项目（例如，供给和分配），而这些以前都是外在于公司的。结果，大公司所运行的企业环境经常变成少数制造商控制市场（参见第十七章）。这种由少数大

公司控制市场的企业环境因为被极少的大公司所占据,从而使其他公司的进入遇到了强大的壁垒,这样使得他们长期遇不到竞争者。

二战后,许多垄断性公司由于拥有相当的投资资金并且容易得到贷款,他们采用两手的策略变化来稳定和扩大市场。第一种就是产业多样化(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即通过建立或取得不同的生产线而进入新的产业。例如,钢铁公司可以通过获得化学公司、石油公司或器具制造厂而使产业多样化。结果,集团企业的形式就出现了,即大公司包含了许多小公司,这些小公司通常生产各种不同的商品和服务。通过这种方式,母公司可以在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求下降时,保护自己不受灾难性打击。第二种变化策略就是对外国市场的渗透:美国公司通过在全世界建立分公司而成为跨国公司(赫恩,1988)。

跨国公司有许多优点。这些公司可以在劳动力廉价的国家和地区,如台湾、朝鲜、香港等地生产产品。所以,美国国内一些公司在远东制造产品,然后再运回美国。许多跨国公司的建立在某些方面既有利于外国投资者,又有利于东道主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得到额外的技术培训及收入。

然而,一些批评家很担心这些公司的巨大力量。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因为在东道主国家投资而可能给这些国家带来一些影响,但他们经常逃避这种责任。在南美洲、非洲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可能榨取他们的资源、剥削廉价劳动力,这对独立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毫无益处。那些国家的经济可能变得依靠单一产品或单一产业,从而使得他们易受外国投资者政策变化的影响(哈里森,1984)。

3

经济集中与 双重经济

在19世纪,垄断企业(即控制一种产业和市场的单个企业)经常可以人为地抬高价格,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竞争。这种情况导致政府“解散托拉斯”,即开始阻止企业垄断。第一个反托拉斯法案是1890年的《谢尔曼法案》(Sherman Act),这一法案禁止“受规定的商业的联合”,而且规定“凡是垄断或企图垄断任何国家间或外国商业的活动”均属非法。在20世纪早期,凡是限制竞争的价格歧视、排它性合同、在竞争对手的公司取得股份以及其他不公平的行为都是法律所禁止的。二战后,通过了一些法律来阻止公司间垄断形式的合并。

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但是今天美国经济仍然比20世纪初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公司权力和财富已经变得高度集中。自大萧条结束以来,经济集中稳步上升,已经达到比例极不相称的程度,国家经济资源的很大一部分由相当少的公司所控制。据估计,大约只有4300个人(美国总人口的0.002%)控制了全国产业资产的一半、银行资产的一半多、所有通讯交通设施资产的一半多、所有保险业资产的三分之二强(戴伊,1986)。

尽管美国经济由相当少的大公司所控制,但在竞争市场中也存在成千上万的小规模和中等规模商业活动。这样,美国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双重经济,有两个不同部分组成:由大公司组成的高度集中的、并受到管理的部分

以及由小得多的公司构成的高度竞争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可以分别称为中心和边陲（埃夫里特，1986）。外围公司很少与中心的公司竞争。的确，更小的公司通常不和大公司竞争相同的工人，因为随着双重经济的形成，劳动力市场也分割成不同部分。

劳动力市场把要寻找工作的工人与要雇用工人的雇主带到了一起。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segmented labor market）是指，劳动力市场被分成不同的部分，各自有自己的工人和雇主。在这个市场中提供和雇佣劳动力的人不会与另一个市场的人竞争。美国现在的劳动力市场被分成三个相对不同的部分：次等市场，与外围经济接近；次主要市场；以及独立的主要市场。后两者主要与中心经济紧密相连。

次等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提供的工作稳定性最差、工作条件最糟糕、发展机会最少。主要包括一些小的不属于工会的企业所提供的低工资、低技术的工作，以及中心经济中大公司所提供的办事员一类的工作。在这个市场中，劳动力的供应者绝大部分是妇女、少数民族群体、愿意或被迫兼职的人，以及在两个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等待机会的新来者。

次主要劳动力市场（subordinate primary labor market）提供的工作安全系数更大、工资更高、更稳定而且发展机会更多。这些优点主要是因为这个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会有联系。加入工会的产业（如汽车制造业和钢铁制造业）所提供的生产工作以及中心经济中加入工会的办事员工作和其他管理工作都可以归入此类。

独立的主要劳动力市场（independent primary labor market）所提供的工作工资相当高、安全系数大、发展机会多。这些工作一般要求通过专业学习的技术或知识。手工工人（例如，机械师和电工）、专业人员（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那些占据大公司销售和技术职位的人一般在这一市场中寻找工作（爱德华兹，1979）。

有研究发现，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雇用、选拔入学、培训活动以及其他选拔工人的制度中，经常出现性别和种族歧视（鲍尔斯和爱德华，1985）。在次等劳动力市场中，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工人占绝大多数，因此，他们就不可能与白种人一样有相同的机会进入中心经济，得到大公司提供的更稳定、发展机会更多、工资和薪水更高的工作。

尽管一些有家庭责任感的白人妇女确实选择低收入、要求不高的工作，但是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来说，机会受到限制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中心经济对那些愿意、并且能够作出长期承诺的工人有特殊的偏好。以这种偏好为基础的招聘标准就会导致歧视妇女（因为她们有了孩子就可能离开工作）、排斥少数民族群体的工人（与在第二劳动力市场中找到低层次工作的其他受雇者一样，他们的就业通常是极不稳定的）（卡茨，1989）。

4

政府与劳工组织的作用

美国公司为创建更大、更稳定的市场所做的早期努力得到了政府及劳工组织的必不可少的帮助。的确，从大萧条结束到80年代初的四十年间，公

司利益与政府和国家最强大的工会的利益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

政府。大萧条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完全规范、矫正以及稳固自身。如果完全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机制运行,那它将会有规律地在通货膨胀和萧条之间急转突变。从1930年罗斯福的新经济政策开始,美国政府采纳了凯恩斯的主张,开始对稳定经济负有越来越大的责任。通过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增加或减少税收和政府开支、改变失业救济金和福利供给水平,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保持稳定。当政府扩张、军工企业变得更强大时(参见第十七章),政府渐渐成为一个比过去更积极的消费者。政府支持住房和高速公路的建设工程实质上增加了对建筑材料、消费品、汽车、天然气及石油的消费需求,而这些市场主要由大公司所占领(派奥和萨贝尔,1984)。另外,美国政府为跨国公司提供便利条件,为他们在海外投资提供军事保护。

劳工组织。1935年《瓦格那法案》(Wagner Act)经常被认为是“劳工权力法案”。《瓦格那法案》是大萧条时期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之一,它为集体性讨价还价(collective bargaining)(即有组织的工人和他们的雇主之间的关于工作条件、报酬及其他利益的谈判)制定了一个合法的框架。《瓦格那法案》保护工会的支持者不受雇主的报复、使某些类型的罢工活动合法化,而且要求公司诚恳地与代表被雇用者的工会进行谈判,这一法案鼓舞了工会运动的发展。

在由大公司所控制的企业中,工会得到迅速发展。由于那种公司往往把工人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把工人组织起来相对容易。然而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公司很少有竞争,他们也很容易把工会赢得的增加的工资以更高的价格形式转嫁给他们的消费者。工会为他们的成员取得了越来越高的工资、越来越好的福利,也提高了工作环境及工作稳定性。当然,工会也代表大公司的利益,为他们提供更少分裂的、更稳定的劳动力(赫恩,1988)。

大公司与政府及劳工组织的对抗。在70年代晚期,大公司开始采取行动,经常共同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减少劳工组织的力量。公司成功地降低了税收和国内政府的开支并且减少了政府的规则。公司的游说活动及资助活动在前总统里根的竞选中也是有效的,里根政府的劳动政策在目的和结果上都被认为是反工会的(埃兹尔,1984;布卢斯通和哈里森,1982)。

工会成员数量在《瓦格那法案》通过以后稳步增加,在1956年达到了非农业劳动力的34%的高峰。尽管这个数字在1960年下降到31.5%、1980年下降到25.2%,但是有组织工人的总数量从1960年的1800万略有上升,到1980年接近2300万。在这段时间里,工会运动仍然是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力量。但这一切在80年代有所改变。到1992年,所有工人中只有15.8%是工会成员。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工会占非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到2000年的时候就会下降到低于13%,这一比例会比《瓦格那法案》通过之前的比例还低(赫恩,1988;福特,1988)。

工会力量的降低导致了劳工组织谈判地位的削弱。从80年代进入到90年代,工会工人被迫接受工资和利益的减少、接受以前赢得的利益的让步

(“给出去又拿回来”),例如,保护性的工作规则(这些规则保护工人不受资方专横的对待)以及生活成本协议(在这些协议中,工资随通货膨胀率自动增加)。

造成这种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80年代许多大公司采取的有效“工会回避”策略。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如反工会的公共关系运动、不合法地解雇企图组织工会雇员、不断威胁要解雇工人(经常受到这种威胁)并威胁把工作机会和生产设施移到其他无工会组织的地区去,等等,这种策略使得大公司很容易减少工会的规模及影响(弗里德曼和梅多夫,1984;布卢斯通和哈里森,1982)。

为什么曾经依靠政府和劳工组织的大公司会变得与这二者对抗呢?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在70年代,美国大公司开始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现在都必须与日本汽车制造商竞争。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也被迫与德国、日本、韩国的钢铁制造商竞争。政府和工会对于稳定这种竞争及随之而来的风险都表现得无能为力。一旦大公司联合起来,大多数公司管理者就认为政府和工会是他们在日益竞争的全球市场中获得利益的障碍。

5

经济全球化

二战后的三十年间,美国大公司不仅控制了国内市场,而且很容易地得到了廉价的外国资源和市场。然而,在70年代,美国公司所占据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来自好几个方面的挑战。受到战争摧残的日本和欧洲经济发生了强力反弹,成功地进入了世界市场和美国市场参与竞争。同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采取了进攻性的发展策略。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台湾,都采用了出口取向型的战略,使他们与美国公司在国内外市场上直接竞争。一些拉美国家企图发展自己的产业,坚持要求美国跨国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更多的拉美产品。最后,第三世界国家是主要的原材料出口国,他们成立了卡特尔(cartel)(即组织起来的使其产品在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的制造商团体),真正提高了基本资源的成本(鲍尔斯、戈登和魏斯科普夫,1983;派奥和萨贝尔,1984)。这些卡特尔中最著名的就是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它是由石油出口国家组织起来的。

这种发展的结果是,美国公司发现自己是新近出现的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在全球市场中商品可以在最廉价的地方生产。大规模的批量生产的商品制造最廉价、最有效的地方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不仅提供廉价劳动力、严格的工会限制和低税率,而且对某些商品如用具和基本的碳钢有最快速增长的市场。为了在批量生产企业即美国大公司占据的最有优势的那些经济领域中保持竞争力,美国公司不断地改变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设备(赖克,1983)。

对于全球市场来说,国际劳动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全球市场上,发展中国家正成为生产中心,而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转变成制订公司策略与计划的国际金融中心。在美国,“一种新型的

公司出现了：有些制造商很少进行生产或根本不生产……他们有可能完成从设计到分配的一系列的利润制造功能，但他们缺乏自己的生产基础。与传统的制造商相比较，他们是一种空心的公司”（《商业周刊》，1986年3月3日）。随着生产设备的全球化，仍然从事生产的那些公司达到了全球规模。因此，这些公司更注重自己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而不是在美国市场中的地位；他们更关心世界经济的变化，而不是美国国内经济的变化（科恩，1988）。但是，当代美国经济是全球市场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相当重要。

9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主要是因为它不能很好地适应国际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1991年末，当东欧国家开始采用市场机制时，美国经济却很景气。一星期有450 000人失去工作，商业性建筑处于16年来最低点（勒文松，1992）。

造成这种不景气有许多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二十年来不断下降的收入而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的。在1970年到1990年间，美国的人均收入实际上下降了接近14%（《纽约时报》，1992年1月12日）。90年代初期，工资水平继续下降，而贫困程度和失业率却上升（勒文松，1992）。近期，西弗吉尼亚煤矿的一位失业工人表达了美国公众对国家经济下降的气愤和失望：“今天，人民非常生气，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一定出什么问题了。我并不害怕自动化和新技术……而我更不惧怕艰苦的劳动。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工作？我需要得到答案。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时代》，1992年2月9日）。

日本国会下议院发言人对该问题作了一个极具宣传性的回答。沙库劳奇（Yoshiro Sakurauchi）把美国经济问题归因于“美国劳力的低质量……美国工人太懒了。他们想得到高工资却不想付出劳动。有许多人甚至不能阅读……因此，他们做出坏零件的比率很高”（《时代》，1992年1月22日）。还有人谴责了美国公司的执行总裁们，认为他们过于看中短期利益及高工资和津贴，这使他们不去重视自己的创新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在世界市场上的有效竞争却是必不可少的（海斯，1988）。另外，还有人归咎于美国政府，认为它没有采取措施，鼓励公司和工人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来恢复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赖克，1991）。

任何一种批评都表明，美国经济运行的关键在于劳动的组织方式。要对失业的煤矿工人的问题进行完整的回答，我们就必须仔细考察工作社会学。

劳动社会学

不同时代对工作的看法也极不相同。古希腊人把劳动看作是必要的灾难，尽可能地留给妇女和奴隶去做，而男人从事高尚的政治和哲学讨论。早期基督教徒把工作看作是人们由于原罪而遭受的惩罚。相比较之下，17世

纪新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所信奉的劳动伦理并不把劳动看作是惩罚，而是看作对上帝的义务，是上帝在人间建构王国的主要方式。这个概念世俗化以后，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创立者中间相当流行，工作成为人们自己及家庭的天职。

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类似的观点。有些人把劳动看作是一种灾祸或一种惩罚；另一些人却认为是自己、家庭、社区的责任或看作是一种事业；还有人把它看作是自我表达的方式，是内在满足感的源泉。

1973年，美国的卫生部、教育部和福利部门联合发表了一篇极有影响的报告《美国的工作》，该报告认为，工作会产生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但除此之外，工作是大部分人的生活意义的主要源泉。该报告一开始就指出，工作对自尊有两个重要的贡献。

首先，人们在工作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意识到自己对劳动对象的处理能力，这样，人们就可以获得一种满足感，认为自己既能控制自己又能控制环境。其次，有人认为，人们从事的某些活动就是在劳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会生产出一些被别人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工作会告诉那个日夜辛勤劳动的人，他能为别人提供一些东西。

在现代社会中，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上述作用？劳动到底是使人感到满足还是使人不满意？这些是下面部分要回答的问题。

1

工人的异化 与满意度

多数社会学家对劳动的分析受到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猛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强化了劳动异化（alienation of labor）。马克思这样描述令人不满的、异化的劳动，劳动是：

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93～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工业社会中的工人没有控制他们的劳动。他们使用的机器是别人的，他们制造的产品也是别人的，而且，他们的生产过程也是在别人的指令下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工人是异化于（alienated）他们的劳动以及他们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对马克思来说，令人满意的、没有异化的劳动，即自由地、合作进行的劳动，并且劳动本身就是目的的劳动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普遍存在。

工人异化。工人异化的定义很多，但最基本的含义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层次是无能（powerlessness），即工人无法控制劳动过程、无法控制自己的工作性质。第二个层次是无意义（meaninglessness），指的是缺乏目的感：工

人不能把他或她的工作与个人目标和组织的更大目标结合起来。第三个层次是孤立感 (isolation), 即工人缺乏对组织本身的归属感、不能将自己与他或她的同事结合在一起。第四个层次就是自我疏远 (self-estrangement) 或称自我异化, 工作使工人无法表达独特的个性, 如创造力和独立的判断力 (西曼, 1961; 布劳纳, 1964; 伊斯雷尔, 1971)。

关于工作组织模式与工人异化之间的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普遍发现, 无能、无意义、孤立感、自我疏远在大的科层制公司的人中表现得更加强烈 (参见第七章)。虽然不一定总是这样, 但一般说来, 工作组织规模越大, 工人异化的程度越高。当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化时, 当工人参与劳动过程的影响降低时, 当工作关系和工作任务变得越来越正式时 (即越来越受到公开严密表述的规则的限制, 规则减少了个人的自由处置权), 异化程度就更厉害 (西曼, 1961; 布劳纳, 1964; 利茨尔和瓦尔扎克, 1986)。

工作不满意的代价是很高的。工人异化经常导致工人极低的自尊心、糟糕的精神风貌、在工作场所的故意破坏、高的缺席率以及需要补缺的工人的比例也很高。所有这些都会降低生产率。因此, 许多大公司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经济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刺激, 开始寻求更低异化的、更令人满意的、更多产的工作安排。

工人满意度。前文引用过的《美国的工作》报告中列举了与工人满意度相联系的八个重要方面:

1. 能提供权力、控制力和个人满意度的高地位的工作。
2. 具有多样性和自主性的挑战性工作。
3. 考虑周到的、替人着想的、商量性的监督行为。
4. 可以平等交流的工作。
5. 高工资。
6. 明显具有一定提升机会的工作。
7. 良好的劳动条件。
8. 就业保障。

一些美国公司一定程度上响应了这一报告, 同时也为了努力提高生产率, 重新调整了工作安排, 其中包含了促进更大工作满意度的条件。这种努力主要包括三次改革: 扩展工作、丰富工作及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作群体 (德贝尔和施瓦茨, 1988; 坎特, 1983; 米勒和福姆, 1980)。

许多现代的工作, 尤其是那些工厂和制造厂的工作, 都已经高度的常规化了, 即这些工作已经简化为许多套简单的重复性行为, 几乎不要求有经验、培训、知识和技巧 (鲍尔, 1974)。

扩展工作 (job enlargement), 是为了克服因常规化造成的分散化及工作简单化。工作扩展增加了工人期望的任务量, 使工作经历更加丰富, 工人也可以参加范围更大的工作活动。

丰富工作 (job enrichment), 是指给工作增加更大的权力和责任及额外的任务。被丰富的工作为工人的创新能力、判断力、创造力及自我监督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工作扩展一样, 工作的丰富创造了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

技术性工作，而且使每个工人对他或她的工作有更大的控制权。

在采用了自治工作群体（autonomous work group）的制度中，每一个相对独立的7~12人的群体被布置一套完整的任务，以完成工作程序中被广泛定义的几个部分。不同工作间（包括监督者的工作在内）的轮换，在群体内部有规则地进行。另外，每一个群体在纳新、培训、工作评估、纪律、工作设计、质量监督等方面有相当大的决定权。

社会学研究表明，这些改革使工作满意度、工人的表现及生产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对这些研究的回顾可以为这样一个假设找到强有力的支持证据，即“工人提高了工作控制力、增加了工作满意度、降低了工人异化的程度。这与工人表现及生产率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提高了的独立性和参与性、降低了的缺勤率和工人补缺率与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质量之间有极强的相关关系”（德贝尔和施瓦茨，1988）。

2

美国的劳动倾向

女性劳动力的参与

二战后，加入劳动大军行列的妇女数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参见第十三章）。1970年，25~64岁间的女性只有49%的人积极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198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9.5%，1991年上升为69.3%。相比较之下，男劳动力的参与率在逐渐下降，1970年为93.5%，21年后降为88.9%。让人更觉惊讶的是，已婚妇女和有小孩的母亲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数却急剧上升。劳动力市场中已婚妇女的比例从1960年的31.5%上升到1980年的49.8%，1992年为59.2%。就在同一时期，有6岁以下孩子的已婚妇女的参与率从18.6%上升为59.5%，有6~18岁孩子的妇女的参与率从39%上升为75.4%。到1992年时，美国妇女占劳动力总数的46%（参见“新闻报道”栏中的“妈妈的出路”，它讨论了当工作要求影响到父母责任时，许多工作妇女所面临的危机）。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反映了美国社会性别平等程度的增加。尤其在过去的20年里，女性的就业机会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然而，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率水平的上升也标志着范围更广的人口和就业变迁。妇女参与率水平的上升伴随着单亲家庭和以女性为主的家庭的增加，表明了越来越多的妇女认为加入劳动大军是必须的。同样，相对高工资的制造工作的减少以及被低工资的服务工作所取代也产生了这种压力。由于这些变化而使男性工人收入的减少，已经迫使许多妻子和母亲加入劳动大军。

新闻报道

妈妈的出路

许多妇女加入劳动大军已经使得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维持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且这也使得妇女能够更充分地拓展她们的能力，运用她们的才智。然而，同时，这也造成了今天许多妇女面临的过度劳动危机，那些有很小的孩子的工作母亲更是如此。这种两难困境的根源在于美国人坚持传统的劳动分工，男人扮演赚面包的角色，而女

人承担照看家庭和抚养孩子的大部分责任。信奉这种文化原则就意味着,许多丈夫在他们的妻子参加工作后,仍然不会承担更多的家庭内部事务。因此,许多妇女从全日制的工作回到家中后,面对的只是那些还要花好几个小时的无报酬的劳动。

对于处在各个经济层次的妇女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对于那些以医学、法律及高层管理职业为目标的人来说,这种变戏法似的角色就变得更为困难,因为按照常规她们一周要投入 60~80 小时在这些工作上。在这些妇女中间,疲劳及因忽视了父母责任而内疚的感觉是经常存在的。一些人得出结论,她们要在职业上获得成功的惟一方法就是完全放弃做父母的目标,而男人就不会被迫作出这样的困难决定。目前,95%的男性管理人员有孩子,相比较之下,与男性有相当职位的妇女只有 40%的人有孩子。

费雷斯·施瓦兹 (Felice Schwartz) 是一个专门帮助妇女建立职业之组织的主席,她在 1989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了对这种两难困境的可行的解决办法。她认为,公司应该为他们的雇员提供两种出路:第一,快速的或“以职业为主”的途径,这种途径要求工作时间长、对工作要全身心地投入。走这条途径的妇女要么不要孩子,要么就把抚养孩子的工作留给保姆或其他要报酬的外人;第二种,施瓦兹称之为“职业/家庭型”,而媒体已经把这种方式称为“妈妈的出路”,这种方式允许妈妈作出权衡。如果妇女选择低报酬并且降低职业期望,那么她们就可以有一个弹性的工作时间安排,可以花足够多的时间去完成作为一个主动积极的母亲的任务。

施瓦兹的建议被证明是存在极大争议的。同意她的观点的人指出,她的计划是与下列事实相符的,即 87% 的工作妇女在工作期间的某个时间怀孕,但是 80% 的人最终将回到劳动大军中。“妈妈的出路”允许妇女把工作和家庭以一种合理的方式结合起来。而且,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父亲也采用同样的选择方式。

反对施瓦兹观点的人认为,选择了职业/家庭型的妇女只能作为二流公司的成员。尽管从理论上讲,当这位妇女的孩子长大一点时,她返回到快速的职业也是可能的。但实际上,公司当然会这样认为,选择了“妈妈的出路”的妇女与放弃了这种选择的妇女相比,她们对工作不会全身心投入,从而提升机会也比较少。另外,因为施瓦兹建议的前提假设就是照看孩子主要是妇女的责任,所以,“妈妈的出路”等于就是说妇女心甘情愿地接受家长制。正如家庭和工作协会的戴安娜·弗雷德曼 (Dana Friedman) 所指出的,“妈妈的出路”最终也同样是没出路的,因为妇女总是被引向低工资工作。

资料来源:《ABC 晚间新闻》,1986 年 3 月 16 日;《妈妈的出路》,《新闻周刊》,1991 年 11 月 25 日,48~49 页;费雷斯·施瓦兹 (Felice Schwartz):《妇女管理和新生活》,《哈佛商业评论》(1989),65~76 页。

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 (deindustrialization) 是指美国经济在 70 年代早期爆发的私人投资从制造业中有组织的撤出行为,这一过程在 80 年代继续加速进行 (布卢斯通和哈里森,1982;米什尔,1989)。去工业化已经严重削弱了经济的工业基础。单单从 1973 年到 1985 年,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从 26.7% 降为 19.7%,300 万个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消失了。1973 年到 1987 年间,制造业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贡献下降了 3% 以上。美国劳动统计局预测,1990 年到 2005 年间将会有

600 000个制造业工作机会消失(库切尔,1991)。1981年美国制造业产品有1 300万美元的贸易盈余,到1987年则变成11 600万美元的贸易赤字(米什尔,1989),而到1990年末,赤字上升为35 000万美元(波罗塞奇,1992)。美国工业经济基础的破坏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造成的。在以全球市场为特征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前面已讨论过),劳动力和原材料都在最便宜得到的地方去寻找。因此,美国制造商为了降低成本,要么把生产设备和工作机会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去,要么完全淘汰掉无竞争力的生产线。另外,有证据表明,去工业化由于公司管理人员削弱工会的极大努力而得到加强(布卢斯通和哈里森,1982)。由于去工业化而失去了的大部分工作机会都是中等工资的、加入了工会组织的、次属主要市场中的工作。

一些人认为,国家工业基础的收缩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减少(参见第十章)(布卢斯通和哈里森,1988)。由于中等工资的工作机会大大减少,由于工会要求工资提高的能力被削弱,去工业化促使家庭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致使美国工人真正的小时工资长期停滞(西尔特和莫厄里,1989)。

服务行业的扩张

尽管制造业工作有所减少,但在80年代美国经济仍然经历了一个工作机会增加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出现的新工作大部分属于服务行业。虽然在二战前商品生产向服务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开始,但服务行业的增长尤为迅速的时期却是在战后。这一行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从1948年的54%增加到1986年的68%,这一年从事服务业工作的人占劳动力的72%(1950年是54%)。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中所有工作的增加接近86%都发生在服务行业。据估计,美国90年代90%的新工作都将是服务性工作(赫恩,1988;洛夫曼和蒂莉,1988)。更具体地说,美国劳动统计局推算,从1990年到2005年,美国经济中将增加2 460万个新工作,而其中2 300万个工作机会将在服务行业中产生(凯里和富兰克林,1991)。

正如前文指出的,服务行业包括的工作范围很广,一方面是报酬相对较好的会计、计算机专业人员、金融顾问等,另一方面是报酬很差的洗碗工人、保管员、医院勤杂工等。尽管低等的服务工作机会增长得尤为迅速,但服务行业就业机会的增长意味着上述两种类型的工作同时都有增加(洛夫曼和蒂莉,1988)。

因此,由于去工业化造成的从产品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已经使高收入的工作有所增加,然而,报酬明显低于原来的制造业工作的低工资工作却有了更大的增长。这种转变使低工资工作在整个经济中占的比例增加。在1963-1979年这段时间里产生的新工作中,那种低工资工作占了20%或者更少一点,而在1979-1985年间新增工作中44%为低工资工作(洛夫曼和蒂莉,1988)。

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经济制造业基础的削弱作用,已被服务行业就业机会的大幅度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所抵消。他们认为,美国将来经济的繁荣要靠服务业的不断扩张。然而,也有人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复兴国家工业的努力,而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这种观

点认为,服务业只能作为工业的补充成分,而不能取代工业。在美国近70%的服务业就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更重要的是,大部分服务业是在最靠近工业设施的地方最为发达,因为这些服务业利用了工业设施。因此,工业经济基础的继续收缩将很可能意味着服务业工作的最终丢失。这种情形在钢铁业和电子业中已经出现。美国曾经在这两个领域的高水平出口服务中占据领先地位,而现在,美国却从日本和欧洲进口这种服务(科恩和兹斯曼,1987)。

弹性生产组织

美国工业经济基础的复兴可能需要依靠不同于20世纪的大公司所采取的生产组织原则(“应用社会学”栏目中的“社会学与生产组织”描述了20世纪受到社会学研究影响的生产组织的变迁轨迹)。将来,生产有可能必须以一种有利于促进更专业化生产、更高质量产品的方式进行组织。美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生产高技术要求的产品,从而能够保证不受低工资的竞争。类似的产品有:高精密度的管芯及工具,这要求精确的工艺、测试及维修技术;用户化的产品,如用于满足特殊需要的机器工具及多功能自动装置;还有以技术带动的产品,如计算机、光纤光学及激光。这些类型的产品都要求传统上分离的商业功能(研究、设计、工艺、购买、制造、分配、市场及销售)形成一个高度统一的体系,以便能够对新机会作出迅速的反应(赖克,1983)。

许多学者认为,这些专业化的、精密的、高质量的产品生产需要弹性生产制度(flexible-system production)。弹性生产制度具有从一个项目向另一个项目快速转变的能力,它主要依赖于:(1)适用于大范围产品生产的新型计算机技术;(2)用心钻研技术的劳动力,这些技术可运用于大范围的生产任务。与大型科层制公司相对照,弹性生产组织表现出相对较少的劳动分工特点。这种组织鼓励集体的合作,而且技术知识得以扩散;它有一种更好的等级结构,这种结构在许多方面模糊了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责任差异;而且它有少得多的正式规则与条例,这使工人有更大的空间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及判断力(赫恩,1988)。

不同产业的公司,如钢铁业、造纸业、纺织业、金融业、化学及计算机业,都已经转向了弹性生产制度(佐伯夫,1988;赫希霍恩,1984;贝利,1990)。另外,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强生公司、惠普公司在内,都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活动。弹性生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主要的模式,然而,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社会学与生产组织

1914年,亨利·福特建立了所谓的“美国工资”制,使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每天可获得5美元的报酬,这一工资超出其他汽车业现行比率的两倍还要多。这一措施使他成功地增加了全身心投入福特汽车公司工作的工人。不久,他又成立了“福特社会学部”,主要解决员工的经济、健康及其他个人问题。一位研究者认为,这个



部门实际上成了“监督工人的阴险手段”(哈伯斯塔姆, 1986)。福特公司为了防止他的员工乱花他们增加的收入, 它要求员工允许这一部门的 100 名调查员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人来检查他们家里的干净程度、监督他们喝酒的习惯、调查他们的性生活等, 以便从总体上保证他们的业余时间被“正确地”使用了(弗希尔, 1984)。不能满足福特的得体标准的员工将被解雇。福特的“社会学家”比管理部门的警力还要多一些。

在美国, 职业社会学对生产组织的影响实际上是在 30 年代早期开始的, 那时, 著名的霍桑研究已在芝加哥郊外的西部电力公司(the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 outside Chicago)展开(参见第二章)。霍桑试验表明了非正式群体对工作效率的重要性。通过满足工人对尊重、爱以及认知的需要, 非正式工作群体会提高士气、工作满意度和生产率。然而, 研究也表明, 非正式群体拥有他们自己的标准和权力。当他们的标准与管理部门的标准发生冲突时, 他们就可能使用他们的力量来破坏该组织的目标。

在过去, 社会学家(经常受管理部门雇用)给公司一些建议, 告诉他们在非正式群体存在对立的潜在性的同时, 应利用非正式群体的在加强效率这一方面的作用。有些人认为, 一旦管理者认识到关心他们的工人的需求的作用后, 这些建议就会有利于极大地改善工作场所的环境。然而, 也有人坚持认为, 这些建议主要是使管理者能够增加对非正式群体的控制, 能够以表面上对工人生活的关心来掩盖劳动结构发生异化的真正变化。

今天, 许多社会学家在正在进行的生产组织变迁中发挥着作用。罗萨贝斯·康特(Rosabeth Kanter, 1983)已经仔细考察了一些公司的特征, 这些公司已经成功地使生产组织的传统模式向创新模式转变。肖珊娜·朱波夫(Shoshanna Zuboff, 1988)也研究了许多组织, 包括一个造纸厂、一个制药公司以及一家国际银行的巴西分行等, 这些组织都采用了适合于自己的新型计算机技术和弹性生产结构。拉里·赫希宏(Larry Hirschhorn, 1984, 1988)也做了调查研究, 公司采用了更具创新性的及弹性的工作安排, 结果却使管理人员和工人一样都有不确定感和焦虑感。作为商业公司的顾问, 上述三人都是用社会学的奖学金来承担组织结构的具体问题的研究。

他们都认为, 今天的经济环境使得传统的生产组织原则过时了。现在, 竞争力要求有大量的新技术和极高的效率作后盾, 而这些只有在有创造力的、更小一点的、更多生产种类的、更具弹性的组织中获得。在今天的全球市场中, 一个公司要取得成功, 它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同样都必须了解在相互的交往中的新责任和新方式。

但是, 究竟一个组织的员工应该为什么样的变化做准备呢? 答案取决于员工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工人。管理者必须对变化持积极的态度, 而且应该加强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当他们的角色从监工变成服务者和调节者时, 他们应该具备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他们还应该学会以团队精神来工作; 学会如何代表权威和分享信息; 学会从工人的利益出发, 鼓励工人积极参与、发挥自己的判断力和自主性。简而言之, 管理者必须学会以更少的权力和界限越来越不清晰的权威来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 工人必须对他们的工作有更大的控制权和更负有责任。他们必须对大部分生产程序更熟练、更了解。他们还必须更积极地参与工作的总体运作, 并为塑造表现和计划策略的研究小组和委员会服务。

当美国从二战中成长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时，日本却处于一片废墟中。然而，到 80 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造成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并取得非凡的成绩有许多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应归结为日本的生产组织原则。

经济与劳动

直到 19 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相对封闭的国家。日本的民族特征强调合作和公共事业，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那种封闭主义者的传统上。但是，19 世纪晚期，西方开始侵入日本，就在海军准将佩里 (Commodore Perry) 的率领下，他的炮船迫使日本打开了对美国的贸易大门，由于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日本的现代经济形成了。西方的经济模式及技术很快地传入了日本而且被日本领导人所采用。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次级工业强国。二战毁坏了日本一部分生产能力，而且剥夺了日本从它的亚洲帝国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力。但是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帮助下，日本采用了最新的技术，这使得战后的日本创造了一种强大的工业动力。

今天，日本经济结构是以许多大型产业集团为特征的，这种松散联合的组织一般由 20~30 个大公司组成，它们以一个主要的银行为中心，银行为它们提供必要的资金。一般来说，每一个集团的公司都代表了一种主要的产业活动，如运输业、电子、钢铁生产或保险业。而每一个主要的公司周围又有许多更小的公司，这些小公司为更大的公司提供某种特殊的产品和服务 (乌奇, 1981)。

尽管日本的公司主要是以赚取利润为取向的，但是大部分公司很少注重短期利益，这一点与美国的公司很不相同。日本采用的是使公司长期成功、工人连续就业的计划。为了使资源能用于为将来建立坚固的基础，从而取得不断的成功，他们很可能牺牲短期利益。日本公司很乐意为员工培训而投资，他们帮助员工提高技术以便在将来需要的时候使用。如果有很好的机会，如果技术有利于公司将来的发展，那么，为引进和发展技术他们会不惜代价。尽管目前的生产也需要资金，但为了满足将来的需要，资金仍有可能被用来使工厂现代化 (沃格尔, 1979)。另外，日本管理层被培养成为稳定的、为公司长期和总体的发展而工作。他们能达成这些目标，才有报酬，而不会因为他们为公司赚取了短期利益而得到奖励。

日本政府密切地关注贸易及经济。虽然日本贸易由私人领域拥有和操作，但是日本政府竭力为繁荣贸易而提供框架。为达到总体经济成功，为确保经济发展，公共机构完成许多与贸易密切相关的特殊的计划功能和工作。重要的政府官员随时准备促进贸易发展，而且他们也很愿意帮助公司选择地点、组织资源或者获取关键的新技术。而且政府并不依靠采取法律行动，如反托拉斯法，因为那样有可能损坏公司有效运作的整体能力。

正如前文指出的，日本的生产组织与美国的极不相同。日本的劳动是以

一系列的集体合作为组织特征的。在日本，决策过程向大多数人公开，有相对广泛的人参与，这样，以多数人意见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形成了。组织的各层次的团队合作使得分散的劳动分工很少发生，而且专为提高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水平的持续的培训活动也能达到这种效果，然而在美国，劳动分工的分散化却是极为典型的。所有这些是与终身就业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终身就业创造了高水平的雇员信任感和责任感（参见第七章）。在这种环境下，日本从来不会发生像美国工人那样抵制技术改进的行为。

但是，我们并不应该过分强调日本经济制度的积极方面。具有高度公共化特征的日本生产组织只拥有 30% 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被 1 000 个左右的大公司所雇用）。剩下的 70% 仍在低工资、低技术的小公司就业，而这些小公司没有提供终身就业保障、以多数人意见为特征的管理模式或者连续的职业培训。另外，占日本劳动力 40% 的妇女在这些人们不愿从事的工作中占了绝大部分。而且，即使被大公司雇用的妇女通常也只能得到一些不重要的工作，她们的提升机会受到限制，她们也不能得到男性可以得到的相应部分，如保险规定、职业培训等（赫恩，1988）。

另外，日本经济也不像它过去那样强大了。在 1987 - 1991 年间，日本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经济学家》，1992 年 3 月 24 日）。然而，1992 年它经历了全球经济萧条时期。人们仍然可以看见日本是如何对这次经济萧条作出反应的，但是大多数观察家期望日本发扬创新和奉献精神，从而把日本带回到全球市场的前沿（《商业周刊》，1992 年 4 月 13 日；《经济学家》，1992 年 3 月 24 日）。

社会与市场：一种人文观点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市场上，人们不是以利他主义精神（不私自地为他人着想）为导向的，而是以对利益的理性的自私计算和企图为目的的。因此，市场并不滋养反而破坏了强烈的道德契约和深厚的感情联系，因为这些都不可能产生于对自私利益的理性计算中（沃尔泽，1986；沃尔夫，1989）。

普遍被接受的诚实、信任、合作和社会义务的标准是依靠强烈的利他感和团结感建立起来的，这些因素曾经“为个人主义的、无利他主义的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契约”（伊尔希，1976）。如果缺乏这些社会契约，市场就会逐渐变得无情，市场关系就会变得不可靠，市场的参与者就很少会去考虑他们的行为后果。的确，社会学研究已经表明，当越来越多的人以理性的、自私的市场逻辑作为生活导向的时候，要保持市场经济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伊兹沃尼，1989）。

在“市民社会”中，如在家庭、朋友、亲属网、非正式的工作及宗教团体、自愿者协会中，我们能感受到信任、同情、利他主义及团结感。我们知道如何关心自己及互相关心。但是，现代国家（正如我们在第十七章所见到

的)和现代市场已经侵入并且削弱了市民社会。社会义务渐渐失去了它们的力量。

国家和市场都不讲求把他人仅仅作为人来对待的义务,而是把人当作公民或当作机会。实际上,人们希望连接在一起,而不要考虑短暂的自私利益或者为了那些外在的(有权执行那些契约的)权威。但是,国家和市场都不注重人们所希望的那种契约。最后,二者都不愿意承认……人民是有能力参与制定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的(沃尔夫,1989)。

社会义务的复兴以及要保持意义丰富而深远的市民社会实实在在的持续下去,需要作出新的努力,以减少市场和国家的侵人。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一个社会的经济是由一些组织和过程组成的,通过这些组织和过程,商品和服务得以生产和分配。经济被分成三个主要的部门: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属劳力密集型;第二产业生产和制造商品,属资金密集型;第三产业以生产服务为主,属知识密集型。

2. 当经济决策权大部分掌握在个人、家庭及公司手中时,这种经济是分散型的。当经济决策权只由少数个人或公司所掌握时,这种经济是集中型的。

3.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关键的决定者。经济必须对消费者在市场中表现出来的偏好作出反应。在计划经济中,最终的决定者是经济策划者:计划经济对制定计划的机构尤其是管理机构负责并与这些机构相一致。

4. 我们界定了三种财产所有制形式。在私有制经济中,个人或群体拥有财产。在公有制经济中,政府拥有财产并为公共事业服务。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中,财产由合作的企业所拥有,这种企业是为其成员的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联合体。

5. 在一种经济中,用来刺激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的措施有两种类型:物质刺激(工资、利润、奖金或其他金钱报酬)和精神刺激(号召人们对社区、社会或宗教的义务感)。

6.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它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利润、竞争、自由、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基础上的。在20世纪,大公司已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了主要位置。

7. 马克思预言,当工人起来反抗自己的命运并且控制了自己命运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垮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结构性失业以及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8.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以生产方式的集体所有制和经济的集体计划与控制为基础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9. 混合经济制度是将资本主义制度因素和社会主义制度因素结合在一

起的一种制度。市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公有制和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制度与强调市场力量和分散决策的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家承担通过福利和其他社会政策来减轻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责任。

10. 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使得许多人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然而，在 19 世纪，政府的规模和权力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现代经济中，关键的表演者是公司，它是由持股人组成的实体，它通过法律上的有限责任来保护个人的资金。20 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公司发展主要表现为批量生产、垄断企业、产业多样化及跨国公司的形成。

11. 经济集中是指，国家经济资源的很大一部分由相当少的公司所控制，已经达到比例极不相称的程度。美国自大萧条结束后，经济集中稳步上升。当代美国经济是一种双重经济，由两部分组成：中心经济，由强大的垄断公司组成；边缘经济，由一些在竞争市场中运作的小型 and 中等规模的公司组成。

12. 美国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成单独的市场，每一个市场都有自己的劳动力供应者和雇主。次等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组成）提供的工作最不稳定、劳动条件最差、提升机会最少。次属主要劳动力市场（大部分都是参加了工会组织的企业）提供的工作安全系数更大、工资更高、提升机会也多一些。独立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一般要求通过深造学习后取得的知识技术）提供的工作工资相当高、工作有保障、职业升迁机会相当多。

13. 直到 70 年代，大公司都是依靠政府和劳工组织来帮助稳定经济。但是，当经济逐步全球化而且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时，公司却把政府和劳工组织看成是自己获取利润的障碍。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大多数公司成功地采取了减少工会成员的措施，严重削弱了有组织的劳工讨价还价的力量。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发展中国家变成生产的中心，而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成为国际金融、战略和设计中心。

14. 我们界定了工人异化的四个维度：无能、无意义、孤立感和自我疏远。尤其是那些在官僚性大公司工作的人会产生强烈的异化。美国一些公司为提高工人满意度采取了：扩展工作（通过给工作增加任务而扩大工作）；丰富工作（给工作增加额外的任务，同时赋予工作更大的权力和责任）；以及自治的工作群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要完成范围较大的一系列的工作程序）。

15. 美国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劳动倾向：二战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人数增加；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或称为私人投资从制造业中系统地撤出；服务行业的急剧扩张和制造业的消退；以及弹性生产制度的出现，这种制度采用新型计算机技术和高技术的劳动力来提高效率，以便迅速地从个项目向另一个项目转变。

16. 日本长期以来实行的封闭政策，使得它不受外界的影响，以及日本政府的封建制度有助于日本当代社会特征的形成。今天，日本经济是以从事大范围的经济活动的大型企业集团为基础的。执政党、政府、官僚及商业界

都一起努力,试图保障国家的持续繁荣。好的管理技术、工人的福利措施以及工人的高度忠诚感都使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可能。

17. 一种人文观点指出,市场鼓励自私利益的计算而不鼓励利他主义和社会团结。为了恢复社会责任的契约,就必须保护某些领域的社会生活、某些社会习俗以及某些商品和服务,以抵抗市场的侵入。

推荐阅读书目

1. 本斯曼 (Bensman, David) 和林奇 (Roberta Lynch), 1987. 《生锈的梦: 钢铁社区的艰苦岁月》 (*Rusted Dreams: Hard Times in a Steel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该书考察了影响工厂倒闭的人的因素。

2. 彼得·伯格 (Berger, Peter), 1986. 《资本主义革命》 (*Capit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的拥护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既创造了财富又繁荣了民主。

3. 埃斯欧尼 (Etzioni, Amitai), 1988. 《道德的尺度: 面向新经济学》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 a New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该书认为经济行为的理性模式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形。

4. 米歇尔 (Goldfield, Michael), 1987. 《美国劳工组织的衰落》 (*The Decline of Organized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该书考察了当代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

5. 哈里森 (Harrison)、贝内特 (Bennett) 和布卢斯通 (Barry Bluestone), 1988. 《U型大转折: 公司重组与美国极端化》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本书对美国经济中正在进行的主要变迁的影响进行了冲突论的分析。

6. 霍德逊和沙利文 (Hodson, Randy, Tessa Sullivan), 1990. 《工作的社会组织》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rk*.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本书是对工作社会学的综合论述。

7. 赖克 (Reich, Robert), 1991. 《国家的劳动》 (*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Knopf.) 该书对最近美国经济发生的结构性变迁以及主要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批判性考察。

8. 赖斯特 (Thurow, Lester), 1992. 《面对面》 (*Head to Head*. New York: Morrow.) 该书对增强和阻碍国际市场中的美国、日本、新形成的欧洲经济的竞争力的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



第五部分

社会环境 和 社会变迁

我们的地球已经拥挤不堪了，但总的人口仍在以每秒3人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每天增长25万人，而每年增长9 000万至1亿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1990）。全球人口在20世纪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令人惊愕的。人类从开始一直到1815年才达到了10亿人，100年后人口增加到20亿，再过了35年则达到了30亿，而第四个10亿只花了14年，第五个10亿仅仅用了12年。而现在，全球的人口达到了55亿，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速度没有丝毫减慢。

美国人已经很熟悉“人口爆炸”这个字眼，但这一威胁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多少有些抽象，因为美国并不像大多数别的国家那样人口过多。全球人口增长的94%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人口的增加也许仅仅意味着我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在路边找到一个停车位，而一项关于香港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在20年前，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也只有43平方尺，39%的香港居民要与非亲非故的人合住一所房子，28%的人要三个人合用一张床，而13%的人甚至四个人或更多人合用一张床（米歇尔，1971）。

关于拥挤产生的效应的研究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结论。一些关于动物的研究表明，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下，幼小动物的死亡率会大大增加，而且还会引起其他形式的病理反应（卡尔霍恩，1962）。关于人类的研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人口使得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越来越难以找到足够的粮食、建造足够的房屋以满足人民的生活。由于人们总是

向往富有的国家，人口的增加还刺激了国际间的移民的增多，而增多的人口必然又加速了清洁空气、水以及燃油等自然资源的枯竭。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众多的原因，去弄清在现代化和前现代化国家里人口的增加与减少的变化规律、人口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在当今显得尤其重要。在本章，我们将介绍人口变化的基本概念，并将讨论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最后，我们将依照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人口与生存环境和非生存环境的关系。

人口研究

仅在一个世纪前，研究人口的还是数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而不是社会学者。然而随着社会学的出现，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影响人口的数量、组成、分布和变化的社会因素。而且，社会学家还认识到人口对于个人行为、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的重要影响。尽管关于人口的研究——人口学——本身还包括很多个学科，它已经成为社会学中发展最完善的、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人口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数量上的，而且在这方面，人口学可能是整个社会学领域发展最完善的学科。但对于人口进行科学的研究却并没有进行多久。早期的人口学家研究用的数据往往是不可靠的，仅仅是依靠猜想或想象，而不是通过科学的程序获得的。而现在大多数国家定期地、系统地收集人口数据，尽管这些数据，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还远不是精确的。此外，计算机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人口学研究，使得人口数据的收集、分析工作比以往进行得更容易、更快、更精确。

1

人口研究的数据来源

最重要的数据来源就是人口普查，即定期的人口统计，包括年龄、性别、职业等数据的调查。人口普查在很久以前就有，古罗马帝国就曾试图清算出整个帝国的人数。著名的《英格兰土地清账书册》则是在 1086 年，由于征税的需要，由征服者威廉一世下令编辑的、有关财富和人口的统计资料。在现代，人口普查是定期进行的。美国联邦宪法规定，政府有义务对“所有自由的人，包括所有有义务服兵役的人”进行人口普查。自 1790 年起，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每 10 年进行一次。

进行人口普查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在发达国家，人口普查是定期举行的常规活动。而在欠发达国家，由于缺乏资金和训练有素的人员，人口统计工作很难开展。尽管联合国，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一直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口普查工作，但这些国家仍然难以获得准确、及时的统计数据。

美国的人口普查是由人口普查局完成的，调查内容包括全体美国公民及其他在美居民的年龄、性别、住址、婚姻、种族和民族。对于职业、住房、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附属信息也进行抽样调查，并以此为准对全部人口的状态

况进行测算。1990年的人口普查总共花费超过26亿美元,即被统计的人均1040美元,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深入的一次社会调查。调查问卷寄往1亿套住宅,而对那些没有回复问卷的人进行访问调查的人则足有315000人。

美国人口普查的最大挑战是获得并保持较高的精确性。可靠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是确定众议院和立法机关中代表数目的依据,也据此来分配联邦和州的教育、医疗等福利基金的数额(人口普查同时还具有商业价值,参见“应用社会学”栏目:“信息时代的人口学”)。人口统计曾是造成人口普查的误差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在最近几十年,计算机系统的应用大大减少了这种误差。

人口普查的准确性的最大障碍也许是有部分人口在普查中漏掉。1990年人口普查涉及了全部人口的98%,被认为是所有人口普查中最精确的,但遗漏情况仍然存在(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a)。人口普查局认为有以下几种原因: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的人及那些有可能被起诉的人对普查的害怕和疑虑、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地的人担心迁移要交纳的费用、由于不了解人口普查的重要性而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遗漏的情况在城市里出现得更多。人口普查局估计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有4.8%的非裔美国人、5.2%的拉丁美洲裔、3.1%的亚太裔、5.0%的美国土著被遗漏了(美国人口普查局,1990c)。而且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属于那些最需要外界资助的群体。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口统计的遗漏而失去部分选举权,那么这个地区的医疗和福利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除了人口普查的数据外,人口学家还利用州与联邦政府的动态的人口统计——出生、死亡、结婚、离婚的人数——来统计和研究人口的变化。同人口普查的数据一样,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也随着各州与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在瑞典等国家,准确的人口统计记录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而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这些数据却不那么可靠。在美国,到1933年才开始所有的州都进行人口统计。如今,美国的人口统计资料(由各州分别编辑)是非常可靠的。

2

人口结构: 性别与年龄

人口结构是指人口的显著生理和社会特征,比如性别、年龄、种族、居住地、婚姻状况、家庭规模、职业和收入等。人口学家特别注重性别和年龄这两个生理特性,因为他们对于研究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的工作能力、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口(幼儿、年少及年老的人)的情况都是至关重要的。人口学家利用性别与年龄等数据来研究社会的需求、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确定人口的增长率、制定人口规划。



信息时代的人口学

20世纪末被称为“信息时代”。计算机及传真机等技术的应用使得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可以以20年前人们不曾听说的方式获取所需资料。顾问公司和市场研究人员在向客户提供最复杂的专业信息方面进行着相互竞争。一个公司的董事曾经这样说:“如果有人要求,我们可以将美国各人口普查区按照使用立陶宛洗碗机的用

户数量来排序”(里什,1981)。

在美国,联邦人口普查是最重要的人口数据来源。没有任何别的报告有如此的综合性和完备性。美国商业部成千上万的全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每次要花一年的时间去收集和整理普查数据,而且这些数据向任何人开放。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作为政府及商业机构制定20世纪最后几年的决策的依据。

政府机关经常应用这些人口普查数据。比如,华盛顿特区的交通官员在设计华盛顿地铁系统时,会依照人口密度数据来决定在何处建地铁车站。纽约及新泽西地区交通局(负责管理连接纽约和新泽西的隧道及一些机场和公交系统的机构)每年都会从人口普查及其他数据来源中对纽约市各地的经济状况作出仔细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被整个地区的商业机构应用。佛罗里达州的卫生局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研究本州的人口增长情况,以决定资源的分配情况以及发展新的服务项目(豪布,1989)。

一些非营利组织也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新泽西州一个处于衰退中的大学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本地居民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居住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一个新的潜在学生来源: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少数职业妇女。这所大学针对这些人成功地开设了非全日制的夜大教育。当纽约父母协会(Planned Parenthood Association)打算为西班牙裔人提供服务时,对居民人口的研究帮助他们决定在哪里张贴地铁站广告。

私人部门也会用到这些普查数据。对于许多资源有限的提供专门产品的小企业来说,普查数据几乎是不可缺少的。80年代后期,“便携商店”,一家经营电子配件的小商店,经营规模从一个夫妻小店最终扩展为28家连锁店,利用人口数据来决定每家店的位置对于这家企业的成长和成功极为重要。

大型企业对口信息的利用更为复杂、更具有创造力,它们经常聘请专家来帮助它们收集数据,以发现新的市场和机会,确定新商店、工厂的位置及办公地点,决定广告的散发对象,制定公司的计划和发展目标。一位经理说:“人口普查数据的价值是无限的,它仅仅受限于那些没有创造力去利用它的人的思想”(波尔,1987)。

市场研究和速递是两项重要的现代产业,它们把人口普查数据当成其运作的基础。市场调查人员通过分析消费者的态度、花钱习惯、生活方式来利用和扩充人口普查数据,从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件中,企业会发现获得最大利润的途径。施乐公司,美国著名的最复杂的销售公司之一,要求职员首先要了解自己的产品,其次就是了解消费者。对像施乐这样的公司来说,市场调查是了解现有及潜在客户最好方式。

在80年代,为了满足美国人对快速速递及电视购物的需求,速递成长为一个大的产业。速递公司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建立复杂的投送名单,并出售给将其用于广告用途的公司。像市场研究人员一样,速递公司的专家也扩充了人口普查的信息。他们建立了复杂的消费者档案,将符合要求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等信息编入档案中,然后向其客户公司提出建议,告诉他们此类消费者会倾向于购买哪些型号的产品(纽厄尔,1988)。

性别比

在人口普查中,男性与女性的人数通常用两性比例(sex ratio)、或者每百人中的男性人数来表示。如果两性比例恰好为100,说明男、女人数相等;如果大于100,说明男性多于女性;相反如果小于100,则男性比女性

少。例如，男女性别比为 105 说明男女性别比为 105:100，如果为 87 则说明男女比例为 87:100。

在美国，同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样，新出生婴儿的男女性别比较高。1990 年出生了 200 万个男婴和 190 万个女婴，新生儿的男女性别比为 1.05（美国健康与人力服务部，1991）。尽管开始是男婴比女婴多，但逐渐地男女比例会变小。在每个年龄组中，男性的死亡率都比女性高，结果，全美国的女性总数反而明显高于男性。1990 年的人口普查表明：65 岁以上的女性比男性多了将近 2 100 万人（美国人口普查局，1990d）。

由于女性的寿命高于男性，许多研究者认为，从生理上讲女性比男性要更健康 and 强壮，但是非生理的原因也起到很大作用。战争及其他危险的体力活动从传统上讲更多是男性的领域，甚至是拒绝女性参与，那么受害者也绝大部分是男性。所以一场战争过后，男女比例经常会失调。还有，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某些时期内，由于更多的男人从国外移民到美国，使得这些时期内男性的数量多于女性。事实上，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女性才开始多于男性。1920 年两性比例为 104.1，1940 年降至 100.7，二次大战后这个比例则变为 98.6，而 1980 年仅为 94.5（美国人口普查局，1990d）。

性别比例也有地域不均衡性。在阿拉斯加州，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处女地的地方，有 30.1 万个男性和 27 万个女性。而在佛罗里达州，则有 640 万个男性和 685 万个女性（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a）。一般来讲，经济发达地区的性别比例比欠发达地区低，因为城市的就业机会对女性的吸引力更大一些。而在重工业中心地区，男性一般比女性多一些。而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性别比例则比较高。

性别比例的一个含义就是人们可以找到婚姻伴侣的可能性。某一年龄组的婚姻数量部分取决于本年龄组可以结婚的男女人数。这一点在老年人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女性的寿命比较长，使得在老龄人口中寡妇的数量远远多于鳏夫。

年龄

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的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一直比较大。在 19 世纪，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绝大多数人口集中于低年龄组。1900 年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有了明显下降。现在，美国人的年龄中位数为 32.9 岁，这个年龄现在逐年在增长。1980 年的年龄中位数为 30 岁（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

一个国家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同年龄组的相对比例）可以用人口金字塔来表示，图 19—1 给出了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人口金字塔。人口金字塔上的每个横条表示一个年龄组（age cohort）——某一特定年龄段的人口全体。在本图中，年龄组是以每 5 岁为单位的，每年龄组的百分比指的是相对于总人口（包括男性和女性）的百分比。在图中，女性在右半部，男性在左半部。

人们预计美国的人口金字塔的形状会发生变化，从外形上讲它正迅速地向着矩形发展，这一现象被称为“人口金字塔的矩形化”。这是由于在美国越来越少的人在年轻时死去，所以平均寿命就越来越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

去，那么到 2030 年美国的人口金字塔就会变成近似标准的矩形（美国健康与人力服务部，1991）。然而，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变化还不可避免地受到移民现象的影响，这种因素使得未来不那么容易预测。

某一年龄组的人在其一生经历中会有很多相同之处（伊斯特林，1980）。比如在美国人口金字塔中膨胀部分所代表的从 25 岁到 39 岁的人都出生于二战后的“生育高峰”（Baby boom）时期，由于这一年龄组的人数众多，这些人都经历着工作机会竞争和住房缺乏等问题。

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或者说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有重大影响。在工业化社会里，年幼和年老的人是没有多少经济生产能力的，如果说他们在农田里还能干点农活的话，在工厂和办公室中他们却几乎帮不上忙。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还专门立法在很多劳动部门中禁止使用童工。某些年龄组的人越来越依赖于他人的劳动，如果依赖别人的人数相对于被依赖的人来讲太多的话，就会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

1990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美国人口中 21% 的人不足 15 岁，而大于 65 岁的人占 12%。此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还要加上占人口 13.5% 或更多的 15 至 24 岁的人，他们由于上学、参加职业培训而经济上尚未独立。加起来，美国总人口中有 46.5% 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a）。

这个比例看起来似乎很惊人，却还远比不上某些发展中国家。回忆一下图 19—1 中显示的美国和墨西哥根本不同的人口金字塔形状。在墨西哥 1992 年有 38% 的人在 15 岁以下，而美国仅为 21%。在墨西哥，15 岁至 19 岁年龄组是所有单一年龄组中人口最多的，而美国人数最多的年龄组为 30 至 34 岁年龄组（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a）。

墨西哥庞大的年轻人口给墨西哥带来很多现实和未来的问题，最有可能的是人口在 21 世纪初将持续增长。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所带来的是是一种非常强劲的社会力量，即便是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墨西哥的人口增长也将持续到 2075 年（梅里克，1986）。

图 19—1 墨西哥的人口结构与美国大不相同。从两国的人口金字塔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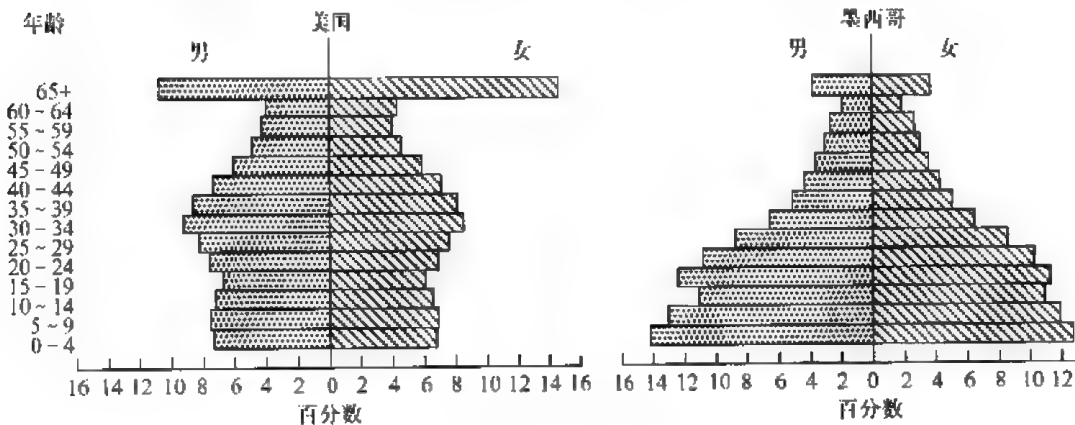


图 19—1 1992 年美国 and 墨西哥的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数据库，1992。

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人口变化的要素

就像从连续动作中摄取一个静止图像一样，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也抓拍下某一时刻的人口情况。人口学家为了弄清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他们设法将得到的数据进行推算，以得到普查前并预测普查后的人口情况。

人口学家通常使用投影法（population projections），即外推法来预测未来的人口走势。比如，1950和196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这期间美国人口增长了18.6%，所以基于这种增长速度，1960年的一项测试认为美国人口到1970年将达到2.2亿。然而，由于1960年后人口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1970年的人口仅为2.03亿，那个预测显然太高了。

与人口投影法不同，人口预测（population forecast）则是通过设想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会怎样影响人口的变化来预计未来人口情况（彼得森，1975，1985）。比如，如果认为医学进步会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继续延长的话，预测的未来人口数将会比假定寿命不再变化的预测人口数要大。

影响人口增减的基本因素有三个：出生率、死亡率和移民，它们是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的关键，下面我们将逐一进行分析。

1

出生率

人口的出生率，即出生的比率，同时受到生理和社会因素的制约。最重要的生理方面的因素是人口中育龄妇女的数量。为了确定出生率，人口学家选择与妇女的生育年龄大致相对应的年龄组——14至44岁或15至49岁——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这一年龄组的妇女数来推测潜在的婴儿的数目。

影响出生率的另一项生理因素是育龄妇女的平均健康水平。打个比方，如果某个地方流行风疹（德国麻疹病），那么，更多的妊娠会以流产而告终，出生率因而也就下降。类似地，严重的饥荒也会从生理上降低妇女的生育能力。

然而，影响出生率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人们对生育的社会态度。从来没有一个社会的出生率达到或接近其繁衍能力，即妇女生育的生理极限。人口学家将控制出生率的方法归纳为三类（戴维斯和布莱克，1956；伊斯特林和克里姆斯，1988）。第一类包括限制人们性行为的因素，比如社会认可的结婚年龄、对婚前性行为的限制以及对贞节的推崇。第二类是减少怀孕的因素，包括各种计划生育措施和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家庭规模等。第三类是指影响实际的生育和婴儿存活的因素，比如流产、杀婴等。

在历史上，人类社会几乎总是在努力避免过高的人口死亡率和人口下降。绝大多数传统社会总是鼓励达到最高的繁衍能力，《圣经》上的“多子多福”在许多社会准则上都有体现，只是到了最近情况才有所变化。由于医

疗手段的进步,人类的寿命得以延长;由于技术的发展,人类更容易同大自然相处,地球上许多国家的人口都变得庞大而且增长速度依然很快。尽管一个国家不希望有过高的人口出生率,但在许多地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规范中还都没有接受降低生育率的概念。如何扭转这种观念是发展中国家当今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这种观念变化已经基本上被普遍接受。实行计划生育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两个孩子是理想的家庭规模。而且,由于结婚年龄不断地提高,育龄妇女的人数就越来越少(然而由于在生育高峰出生的为数众多的女性正值生育期,上述效应被暂时抵消)。

出生率一般用总人口中平均每1000人每年出生的婴儿数来表示,称为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而某一年龄组的出生率是指某一年龄组内(比如20至24岁)每1000名女性生育的婴儿数。

当前使用较多的一个人口统计指标为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是指每一名妇女在生育年龄内(大约15至49岁)都保持当前的各年龄组的生育率时,她所生育的婴儿数目。1991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是2.0,也就是说如果以当前的生育率计算,一位美国妇女一生将生育两个孩子(人口资料局,1992;《世界纪事》,1990)。尽管美国的新生婴儿数在1990年经历了1963年以来最大的增长,在最近十年中美国的总生育率仍然保持稳定(美国健康与人力服务部,1991)。

人口中各部分的生育率是不同的,例如,在美国,由于人们对于生育以及家庭规模的观点的不一致,以及由于人们的知识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对安全有效的控制生育手段的运用程度不同,低收入的人的家庭规模就比中产阶级和高收入家庭的家庭规模要大,另外,农村人口的生育率总是比城市的生育率要高一些。天主教徒也一直比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生育率要高,尽管这种差异在最近几十年已经大大缩小。黑人家庭的规模总比白人家庭的规模要大,尽管这种区别或许更多地反映了阶级的差别。不参加劳动的妇女比有工作的妇女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助于人口学家预测未来的人口趋势。

2

死亡率

一个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取决于该国的科技和医疗水平,以及它是否愿意将这些技术用于人们的健康和医疗保障。美国投入巨资致力于控制导致死亡的因素,在这方面的投入实际上比对生育问题的投入要大得多。这保证了美国死亡率的逐年下降。

同生育率一样,死亡率也随着人们的收入而不同。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得不到好的医疗保健,低收入阶层的人的死亡率是最高的(参见第十章)。

在20世纪,导致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流行性疾病转移到人体的衰竭和人为的疾病。在1900年,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分别为肺炎、流感、结核、腹泻。到1990年,主要的疾病变为心脏病、癌症、

中风。所有的这些疾病都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有关。吸烟、酗酒、紧张、缺乏锻炼、饮食和污染都与一些疾病有关，而正是这些疾病决定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寿命（参见表 19—1）。

用于测量死亡率的方法有很多，在这里我们介绍三种。

粗死亡率。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是指人口中平均每 1 000 人每年的死亡人数。例如，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是 10 000 000 人，每年死亡 110 000 人，那么它的死亡率就是 11（ $110\,000/10\,000\,000 \times 1\,000$ ）。粗死亡率并不是非常科学，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人口的年龄结构。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自然比年轻化的社会的死亡率要高。

某一年龄组的死亡率。某一年龄组的死亡率（age-specific death rate）是指在某一年龄组内，人口中平均每 1 000 人每年的死亡人数。这个死亡率可以显示在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出生后的第一年，人往往处于一个特别危险的阶段，而此后的死亡率就迅速下降。最低的死亡率出现在 5 至 14 岁年龄组，此后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年增加，至 60 岁，死亡率回到 1 岁时的情况。60 岁以后，死亡率会急剧增加。

婴儿死亡率通常被认为是表明一个社会普遍的健康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重要指标。另一个常用的指标就是不满一月的婴儿的死亡率，在这段年龄里，婴儿死亡的危险性很大。最常用的指标是粗婴儿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是指某一年中出生的 1 000 个婴儿中不满 1 岁就死亡的人数。

尽管美国的婴儿死亡率从全球的标准来看较低，但绝对不是最低的。1992 年，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是 9.5，而日本是 4，瑞典是 6，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英国的婴儿死亡率都比美国的要低（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a）。人们认为美国婴儿死亡率较高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完善的公共医疗保健体制以及人们不能够获得同等的医疗护理机会（参见第十二章）（韦伯，1988）。

发展中国家往往饱受高婴儿死亡率的困扰。印度的婴儿死亡率是 81，而埃及为 80。在某些亚非小国，竟然会超过 100，阿富汗的婴儿死亡率高达 162，哥伦比亚为 129，索马里为 115（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a）。

预期寿命。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是指现存人口中某一年龄组的人的剩余寿命。世界上年轻人的剩余寿命相差巨大，反映了每个国家对婴儿和青少年疾病的防治的进展情况。而对于老年人，各国的预期年龄相差不大，例如，对于 70 岁的男性，各国的情况基本一致。

预期寿命应当与生命跨度的概念区别开来，生命跨度是指某一物种的最长的可能寿命。人类的生命跨度对于各国来讲相差不大，仅有很少的人能够活过 100 岁。而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却有了很大的增长，尤其是由于 20 世纪以来传染性疾病的攻克。有关美国这方面的数据参见表 19—2，从中可以看出女性的寿命长于男性，白人的寿命长于黑人。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女人的寿命都超过男人。

表 19—1 1900 年与 1990 年导致死亡的十大原因

1900 年排序	所占比例 (%)	1990 年排序	所占比例 (%)
1. 肺炎与流感	11.8	1. 心脏病	33.5
2. 肺结核	11.3	2. 癌症	23.4
3. 痢疾与肠炎	8.3	3. 中风	6.7
4. 心脏病	8.0	4. 意外事故	4.3
5. 中风	6.2	5. 慢性动脉障碍疾病	4.1
6. 肾炎	5.2	6. 肺炎和流感	3.6
7. 各种意外事故	4.5	7. 糖尿病	2.3
8. 婴儿早期疾病	4.2	8. 自杀	1.4
9. 癌症	3.7	9. 他杀	1.2
10. 年迈	2.9	10.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1.2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统计年鉴从殖民时代到 1970 年》（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美国健康与人力服务部，国家卫生统计中心，1991。

表 19—2 美国不同种族、性别的预期寿命（1900—1990）

年份	白种人		黑人及其他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990	72.6	79.3	68.4	76.3
1980	70.7	78.1	65.3	73.6
1970	68.0	75.6	61.3	69.4
1960	67.4	74.1	61.1	66.3
1950	66.5	72.2	59.1	62.9
1940	62.1	66.6	51.5	54.9
1930	59.7	63.5	47.3	49.2
1920	54.4	55.6	45.5	45.2
1910	48.6	52.0	33.8	37.5
1900	46.6	48.7	32.5	33.5

注：1900 年以来，美国群体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已有了大幅度的上升。

资料来源：同表 19—1。

美国婴儿死亡危机

一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通常被认为是衡量该国健康医疗体系的最佳单项指标。按照这种标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1900 年美国的婴儿死亡率高达 143‰，1991 年下降为 8.9‰。但是，美国在这项指标的世界排名中只名列第十九位。如果 1985 年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像日本一样的话，该年就会少死 19 000 个婴儿。而且，近些年美国的这项指标的下降速度有些减慢，甚至在某些城市及农村，还有些上升。

上面最后一点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美国整个社会的婴儿死亡率很不一致。每年，贫穷的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的婴儿中有近 4 万个死亡，远远超出其应占比例。1990 年，美国黑人的婴儿死亡率达到 17.0，比白人 7.7 的两倍还多，这一比例在几十年内几乎一直如此。美国城市市中区的少数民族的婴儿成活率还比不上牙买加、



古巴、哥斯达黎加。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差别?社会学家认为有两点。首先,低收入家庭中的母亲抽烟、酗酒、营养不良、吸毒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这些对后代都很不利。底特律儿童医院是一家主要为贫穷的少数民族服务的医院,据其统计,在那里生育的母亲40%到45%吸毒。吸毒会导致婴儿瘦小,而重量不足5.5磅的早产儿的死亡率是最高的。母亲吸毒及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市中心的穷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另一点更具有批判意义,那就是美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失败,它没有能充分考虑穷人的需要。30年前,联邦制定了为老年人提供保障的医疗护理制度,但对于帮助穷人母亲和孩子却没有相应的措施。由于没有完善的能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体系,低收入家庭的母亲只能依靠凌乱的、设备陈旧的小诊所。底特律的待产妇要等八个星期才能够看一次医生。

大多数发达国家极低的婴儿死亡率表明,美国至少有一半的婴儿死亡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拥有每年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的技术;我们所缺乏的是如何向那些最需要的人提供健康知识与服务。

3

移民

移民是指人们在地理位置上的迁徙,一般分为国际间移民(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和国内移民(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迁徙)。当人们从一个国家迁出并在国外永久定居时,他们的迁移就称为出境移民;而当迁入一个国家并永久定居时,称为入境移民。年移民率(有时称为净移民率)是指每年每千人中,入境移民与出境移民的差。

国际间移民

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发生于罗马帝国灭亡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来自东欧及中亚的游牧部落大举西进,经常把他们占领的地域上的居民驱赶到更远的地方,某些专家相信,旱灾和中国的兴盛引起了这场大规模的移民。

发生于17、18、19世纪的从欧洲和非洲到南北美洲的移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际间移民活动之一。据计算,三百年间有超过6 000万的欧洲人移居海外,尤其是到美洲定居(希尔,1975;卡梅伊尔和吉恩,1986),这次移民在1901至1910年间达到高潮(这期间有900万欧洲人移居美国),之后还一直不断地有移民进入美国。最近的一次国际间移民高潮开始于1947年,即穆斯林占多数的巴基斯坦从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印度正式独立出来后。随后的三年时间内,1 000万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从巴基斯坦迁居印度,750万穆斯林从印度迁居巴基斯坦(萨顿,1987)。

从1820年起有5 600万人移民到美国。进入美国的移民比任何其他的国家都要多,但某些国家的移民数量对他们的人口来说占了更大比例。出生于国外的美国人仅占总人口的6%,而在加拿大和新西兰却占到了16%,在澳大利亚占21%,而在以色列则超过了40%(人口资料局,1989)。

移民并不全是永久性的。男人经常抱着外出挣钱的目的一个人离开家,而当他们达到了目的以后就返回家乡。有时移民会发现并不能适应在新国家

的生活，就会重返家乡。故国的社会及经济情况的变化也会使曾经不得不离开的人回国。一项关于世界人口流动的研究表明，在1821至1924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中有30%回到原来的国家（卡尔桑德斯，1936）。

移民能够给故国和接受国带来一些好处，但同样也会带来问题。移民最主要的动机是经济状况的改善，所以在新的国家，移民总是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然而在失业率较高的时候，移民就会同本国争夺就业机会。由于没有得到体面工作的必需的技能，新移民经常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救济生活。所以大多数国家都限制每年迁入移民的数量。

移民美国。美国限制移民进入的历史已有几百年。1789年通过的一项法案授权总统可以驱逐“危险的”移民。1790年通过的《国籍法》规定只有“修养良好的”、在美国居住两年以上的自由白人才能成为美国公民（布维尔和加德纳，1986；左尔伯格，1987）。1882年一项臭名昭著的法案规定禁止没有技术的中国工人移民美国（不禁止有技术的）（该法案至1943年才被废除，当时美国和中国为二战时的同盟国）。20世纪20年代，面对日益增长的反移民浪潮，美国实行了移民配额制度。各国的移民数额根据1910年时美国人口的组成来分配。这就意味着，在20年代后期，82%的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16%的人来自东欧和南欧，仅有2%的移民来自其他国家。亚洲人尤其遭到排斥。

20世纪30年代及二战期间的移民数量很少，战后又重新掀起高潮。1952年通过的一项法案重申了移民配额制度并规定，配给每国的签证中，“美国急需的”技术移民（包括他们的家属）必须要占到50%。此后，又规定在移民配额以外，允许政治难民、移民的配偶及孩子移居美国。在保持总的移民限度的同时，1965年通过的新法案废除了有关来源国的规定，结束了对亚洲人的歧视。从那时起，亚洲和拉美成为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在1981至1990年间，仅有10.4%的移民来自欧洲，而来自亚洲的占37.3%。约有一半的移民来自中、南美洲（《世界年鉴》，1991）。1990年的《移民法》将每年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增加到714 000人。

数量惊人的非法移民仍在继续进入美国。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在80年代前期非法居留美国的人有200万（帕斯和伍德洛，1984），但有人认为这个数额超过500万。与合法移民一样，大多数非法移民离开祖国是为了获得好工作、政治自由、学习及更理想的生活方式。非法入境的渠道很多，从与美国人假结婚到从途经美国的船上跳海然后游上美国。多数是通过短期的留学和旅游签证进入美国，然后逾期滞留。还有很多人从墨西哥和加拿大穿越边界进入美国。

大多数非法侨民来自墨西哥，他们由于在本国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太低而驾车来到美国。穿过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墨西哥的农场工人就可以期望获得比在家乡多得多的收入（布鲁克斯，1989）。大多数非法侨民一般留在边界附近，或者到阳光地带的大城市居住，例如，休斯顿、迈阿密、旧金山、洛杉矶等地。也有很多人聚集到纽约和芝加哥。他们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也有不少从事半技术类的工作。

非法移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带来很多经济、社会和民族问题。一些农业和工业部门希望能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阻挠对移民法规的严格实施。另一些人指出，完全取缔非法移民会导致很多负面效应：迫使更多工业部门转移到国外劳动力廉价的地区、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破坏外交关系等（萨顿，1987）。工会则担心会使本国人失去就业机会，因而极力主张禁止非法移民。而非非常在意人口数量的组织认为，移民的进入会抵消近些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好处。

今后，想移民到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有增多的趋势，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的增长，使得人们到别处去寻求更好的生活。

政治难民。难民是移民中很特殊的一类。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认为难民是指“离开自己的祖国并‘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回国后会遭到迫害”的人。据估计，世界上的难民总数为1 500万。近东和南亚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聚集地，其次是非洲（美国国家电讯部，1990年10月15日）。

国内移民

一个国家内部也有移民现象。历史上的西进运动就是美国经历的一次非常浩大的国内移民运动。美国人有到西部去寻找更好的机会和生活条件的传统。现在美国许多西部州的人口大部分来自别的地区。

美国另一次重要的国内移民是南部的黑人向北向西的迁移。这次移民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北部的工业区不再能够从外国移民中得到足够的工人而向全国募集劳动力。二战以后，移民速度更快。到1970年，出生于南部的黑人中有24%生活在别的地方。在30至34岁的年龄组，比例达到了51%（美国人口普查局，1978）。199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却表明人口开始反向流动，越来越多的黑人现在正离开北部的大城市返回南方。

阳光地带，包括从弗吉尼亚到加利福尼亚美国沿边境的各州，一直吸引北方和东方人的迁入。从1930年起，西南部的阳光地带的各州人口增长比北部要快，80年代，西部人口增长了22.3%，南部增加了13.4%（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佛罗里达的人口增加了32.7%，而纽约只增长了2.5%。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人口增长最快的五个州是内华达（50.1%）、阿拉斯加（36.9%）、亚利桑那（34.8%）、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25.7%）。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三州的人口增长占全国人口增长的一半还多。

移居阳光地带的人包括原本住在此地又返回来的人、大公司雇用的白领职员以及退休后来此养老的人。这种人口的迁移，使得政治经济权力的地理分布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在联邦众议院，东北部的议员逐渐减少，而西部和阳光地带的席位逐渐增多。

移民的原因

正反两方面的许多原因使得人们作出移民的决定。最普遍的动机是希望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另一个就是对宜人气候的偏爱，这是人们迁往阳光地

带的主要原因。更好的住房条件和学校使得许多城市居民迁往郊区。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压迫则是国际间移民的主要动因，有时也是国内移民的原因之一。

移民的原因可以理解为“推和拉”两方面的力量。“推”是指原居住国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条件，包括人口过多、恶劣的气候条件、居住条件不好、缺乏机会、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迁居别地的因素，包括丰富的就业机会、适宜的气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价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布维尔，1977；卡梅伊尔和吉恩，1986）。

许多别的因素可以调节这些推和拉的因素（斯道夫，1940；世界银行，1985）。距离、搬家的费用、欲迁居的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纽带的强弱等都会最终影响迁居的决策。法律及物质的因素也会起作用。1989年底，分割东西欧的柏林墙打开了大门，移民被这面墙实际上阻止了28年。自由旅行重新被允许，成千上万的原东德人离开。1990年初，这面墙被彻底推倒，碎块被当作纪念品在机场和礼品店出售。

人口增长与社会

人口的规模、组成、变化的速度会对社会的性质产生深远影响。反过来社会的性质也会对这些人

托马斯·马尔萨斯 (Thomas Malthus)

英国的牧师和经济学家托马斯·R·马尔萨斯 (1766 - 1834) 首先提出了引起争论的关于人口增长的可能后果的理论。在 1798 年发表的一篇经典的论文中，马尔萨斯论证人口是按几何级数 (2, 4, 8, 16) 增长的，而粮食产量仅仅能按序数 (2, 3, 4, 5) 增长。当人口的增长超过粮食供给时，饥荒、瘟疫、战争就会使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将人口调整到粮食供给可以保障的规模。马尔萨斯把那些通过死亡率上升使人口下降的因素称为“积极的障碍” (positive checks)。尽管马尔萨斯总是对未来持悲观态度，他还是希望将来人口能够通过“预防性的障碍” (preventive checks) 来控制，例如晚婚、节欲等方法，这样人口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出生率的下降来控制，而不是死亡率的上升。

尽管马尔萨斯对人口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理论却不完全正确。马尔萨斯没能预见到生育控制技术的发展。他也没能够想到农业技术的发展会如此大地增加粮食产量。一个当代的学者与马尔萨斯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人口的增长和不断增加的个人收入，会使得自然资源的价格提高，反过来当资源稀缺的时候，就会刺激人们寻找新的资源来替代。最终，新的资源总会

1

世界人口增长

找到,世界会更加富有(西蒙,1990)。

人口变迁理论

人们对于美国和西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个时代的基本模式特征被称为人口变迁,可以归纳如下:

前现代时期的人口通过在较高水平浮动的死亡率与高出生率之间的平衡来保持数量的稳定。现代化进行的初期,人们的营养及健康水平的提高使得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还维持在较高水平,因而引起人口的快速增长。然后工业化的成熟带来的城市化和其他社会变革产生的压力使人们更愿意保持较小的家庭规模,出生率就随之下降。最终出生率和死亡率在存在波动的较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平衡(朗,1964)。

一个国家在人口变迁的初期,总是呈现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人口的自然增长即便是有,也是处于极低的水平。然后,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不变,引起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再往后出生率逐渐下降,人口的增长放慢,最终出生率和死亡率在较低的水平上重新平衡,人口的增长呈现出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最终的时期就是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图19—2给出了人口变迁理论的形象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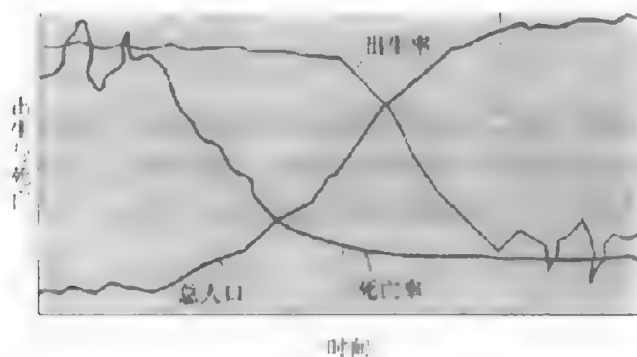


图 19—2 出生率与死亡率

人口变迁理论依据的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在二战以前两百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末期,西方各国呈现出上述最终时期的特征。然而随着二战以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国家的出生率也迅速增长,并保持了20年的高出生率。人口学家们就开始怀疑出生率和死亡率与工业化的关系是否像模型表示的那么简单。

人口变迁理论对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进行了修正,强调了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与短期作用的区别(希尔,1975;鲁宾逊,1981)。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增长时期人口的出生率会有短期的上升。但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种增长会带来很多使出生率下降的因素。比如,家庭规模会变得更小,因为更多的子女能够长大成人,而且父母希望赋予孩子们一些花费很大、但在工业化社会里非常重要的优势,比如大学教育等。而且,经济发达国家提供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父母不再必须依靠子女来养老。在工业社会里还经常出现城市人口过度密集的情况,家庭的居住条件很拥挤,自然就

不想要更多的孩子。

人口变迁理论一度被认为会影响现代化的全过程，但人口学家现在对此产生了怀疑。现在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呈现出了不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许多与西方的模型相去甚远。

人口与经济增长

人口增长对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力的影响与经济增长对人口的影响同样重要。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对他们的经济增长来说增加过快。经济几乎不能、甚至完全不能跟上人口的增长。比如，在瑞士、比利时等人口呈现不增长或负增长趋势的国家，如果经济以2%的速度增长，他们的人均收入也会实现同样的增长。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情况就大不一样，他们的人口在未来的30年至少会翻一番。例如，肯尼亚，人口在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f）。那么经济以2%的速度增长就意味着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

人口过多的一个主要经济后果就是会占用资本投资所需的大量资金。每个国家都需要资金，以建设和维护高速公路、通信系统、工厂、电站等设施。国家的投资资本通常都来自人民的存款。而当工资要用来维持一个大家庭时，就没有什么钱能节余下来。当劳动力过剩时，失业者难以糊口度日更不会有存款。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只好依靠外国投资和贷款作为资金来源。但是外国投资将利润拿走，而贷款利息又会加重国家的债务负担。

在许多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中，人口的高速增长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巴基斯坦就是这样，1991年，它的人口据估计为1.212亿，是世界上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口资料局，1991）。高达43%的出生率及13%的低死亡率使得巴基斯坦一直处于严重的人口过多状态。

巴基斯坦的经济问题不仅是由于人口的庞大，而且还因为有太大比例的人要依靠其他人生活。人口的半数在15岁以下，如此众多的年轻人和现代化带来的低死亡率导致了人口的迅速增加。如果这种增长持续下去，2020年以前巴基斯坦的人口就会再翻一番（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a）。要养活两倍的人口，农业产量就要充分增加，就要有庞大的资金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及开垦荒地。结果这个国家就没有钱实现工业化、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而工业化国家不同，它们可以从人口增长中获益。更大的家庭意味着要消费更多的商品，而这种消费的增加会刺激商业发展。商业专家和经济学家把二战后的生育高峰带来的繁荣作为人口增长带动经济发展的事例。

世界人口变化趋势

发达国家的平均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1%，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一般都高于2%。事实上，近些年亚洲、非洲、拉美的非工业化国家还出现了人口爆炸。死亡率的下降是人口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死亡率从1950年的23%下降到现在的12%。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占世界总人口增长的94%以上。

有效的药物、医疗服务的普及、卫生设施的改善、食物及饮水条件的提

高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迅速下降（联合国，1980）。其中主要是由于青少年死亡率的下降，这个年龄组的人一般认为很容易传染以下疾病而导致死亡：疟疾、黄热病、天花、霍乱等。现在的公共医疗手段已经可以控制这些疾病，其中，天花已经完全消灭。

由于死亡率的下降，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即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一般用百分比来表示），从1940至1950年间的0.9%迅速增加到1950至1960年间的1.8%。人口翻番期（doubling time）（人口增加一倍所需要的年数）从1940年至1950年推算出的77年下降到1950至1960年的39年。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口的增长率稳定在1.8%，之后下降到大约1.7%。这被一些人口学家称为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呈稳步上升趋势。现在世界总人口大约为55亿，人口翻番期为39年（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f）。形成这个历史性转折的具体原因还不很清楚，但一个重要的因素似乎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生育控制工作取得了成功。

尽管有这些正面的因素，第三世界人口爆炸的影响在数年以后还是会出现。过去的高出生率意味着现在进入育龄的妇女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比例非常大。所以，即便这些国家的出生率降下来，即每个妇女生育较少的孩子，由于育龄妇女的数量非常巨大，总的婴儿数量依然会增加。例如，巴西的生育率从1965年的5.8下降到1980年的4.0，下降了30%，而每年新生婴儿数量从50年代末的290万上升到80年代初的370万（伊斯特林和克里明斯，1988）。

2

生育控制

生育控制的方法

大多数人口学家都认为生育控制的普及是减少世界人口的关键手段。现在采取的一些生育控制措施在几千年前就有了。而其他方法在20世纪才发展起来并被采用。现在还在试验其他方法，但很遗憾，至今还没有完美的方法。

弃婴与杀婴（杀死婴儿）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控制人口的办法，从古代就被采用。有的社会在抚养婴儿的两三年间禁止性生活。在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国家，晚婚逐渐成为习惯。

节育器具的广泛采用则没有多少年。现在有很多种避孕器具，大多数是女用的。避孕药丸是最有效的单独使用的避孕措施。如果照章使用，有效率接近百分之百。避孕药使用方便有效，但有副作用，长期使用会产生不良后果。其他女用避孕措施包括，子宫内避孕器（IUDs）、避孕隔膜、棉球、杀精泡沫、杀精凝胶及霜剂。在发展中国家，避孕药和子宫内避孕器的使用占一半以上。

对于男性，避孕套是最常用的节育工具，特别是在欧洲。避孕套还可以避免性病传染，在艾滋病流行以后，其使用大大增加。新兴的男性节育措施，比如避孕药和可以恢复的截断精子导通的结扎手术还处于试验阶段。但

已婚美国男性采用最多的方法是输精管切除手术，或绝育手术。

人们曾经认为男性和女性的绝育手术太过分，一般不能够接受。而现在已成为美国已婚夫妇最常用的避孕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比其他方法的增长都要快。到1988年，估计有23%的美国已婚妇女实行了结扎手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信息计划，1990）。

在其他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扎也很快流行起来。事实上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避孕方法。至1990年，全球大约有1.38亿妇女已经接受了结扎手术。韩国的比例是最高的，育龄妇女的37%接受了结扎手术，中国的比例是30%，印度为21%。在近东及非洲地区，人们不太愿意选择这种方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信息计划，1990）。这些数据表明全世界的人都越来越愿意控制生育。但还是应当注意，女性主要是在生过孩子以后才采用结扎手术，而且大多数是在已经有了她们所希望多的孩子以后（美国人口普查局，1989）。

流产是另一种广泛采用的节育手段。从全球看，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妊娠是通过流产结束的（弗朗科姆，1984）。几百年以来，流产即便不能算作最流行的节育方式，也该是非常普遍的。流产有多种方法，比如喝草药等，但不那么有效。其他方法，比如针刺、服用猛烈药物等，对妇女的身体都会带来危险，甚至死亡。

在70年代初，流产在美国许多地方都得到了法律的许可。开始的时候，仅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流产，而且必须要医生证明，继续妊娠会给妇女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严重损害。1973年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法案》中规定，是否流产主要由母亲自己决定。1989年，最高法院又允许各州对妇女在流产的决定权上作一些限制。两法案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许多人从宗教和道德传统出发，谴责流产合法化的“反生命”性。其他人则坚信，流产带来的社会效益比道德上可能的损失要大得多。

在美国，27.3%的妊娠以流产的方式结束。1988年，有四分之一的流产妇女的年龄小于20岁，当然这并不奇怪。还有三分之一流产妇女的年龄在20至24岁之间（美国卫生部，1991）。

发展中国家的生育控制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人口过多的严重后果，纷纷采取“降低出生率”（antinatalist）的计划来控制人口。这些计划的实施往往非常困难并且耗资巨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多没有文化、贫穷、迷信，这些对政府实行生育控制政策非常不利。所以，只有符合当地人的已有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生育控制政策才是有效的。比如在印度，多数人认为医院是一个去等死的地方。如果绝育诊所设在人们聚集的火车站旁，生意就会好得多（埃利希和埃利希，1972；伊斯特林和克里明斯，1988）。此外，还专门设立了计划生育日，其间实行绝育手术并宣传其他避孕措施。主动绝育会得到奖金或礼品，比如收音机，这种东西对于穷人来讲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是两个成功实施了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在60年代泰国就率先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从1969年至1984年，15至44岁的泰国

妇女中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从15%增加到65%；同时，出生率从6.0下降到2.4。在印度尼西亚这个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出生率在15年的时间里下降了三分之一还多，从70年代初的5.6下降到1987年的3.4。在印尼15至44岁的妇女中，有42%的人采用了现代避孕措施（伊斯特林和克里明斯，1988）。

对生育控制的态度受到政治、宗教、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过去的基督教会坚信结婚的主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所以一直对生育控制持反对态度。然而近50年来，大多数新教教会开始对这个问题持自由态度。其他在传统上对生育控制没有严格规定的宗教，也逐渐从过去的教条中走出来，近些年开始支持计划生育工作。比如在泰国，佛教徒鼓励和推崇妇女自主权，所以认为她们有权力对生育控制作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对生育控制持自由的态度。在有家长传统的伊斯兰教国家，人们认为计划生育是有悖习俗的，他们鼓励多生育，认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融合才表明了妇女的主人地位。然而传统的穆斯林信条已有所松动，在埃及和巴基斯坦这两个人口问题非常严重的国家，已经着手进行有效的计划生育工作（诺德尔、阿菲恰特和德比莱斯，1987）。

罗马教廷对人工控制生育一直持有强硬的反对立场。而调查表明，美国的天主教在这方面对教会的教诲却置之不理。调查者甚至还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在天主教风气较重的拉丁美洲，计划生育的提倡者认为教会的立场使得该地区人口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

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也会对人口控制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以保证在2000年前实现人口不继续增长的目标。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妇如果保证他们不再生育，并证明确实采取了计划生育措施，在孩子年满14岁之前，每月都能够得到一定的补贴。并且在住房、孩子入学及安排工作等方面都享有优惠。退休时也会得到更多的退休金。

在中国的某些省份，超生的夫妇将被处以罚款。最少的罚款占夫妇收入的6%，孩子越多比例越大。在某些情况下，比如第一胎是女孩，允许生育第二胎。没有被允许的妊娠一旦被发现，就会强制流产，妇女甚至会施以绝育手术（科尔曼和斯科菲尔德，1986）。据报道，在某些偏远地区，强制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与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发生了严重冲突，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的话，有的父母会杀死自己的孩子。这将严重影响下一代的男女比例，并且会对社会生活造成多方面的、严重的负面影响。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高的出生率，中国的人口增长仍将持续很多年。

3

美国的人口 增长与变化

美国在1790年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今天的生活方式。那时，家庭规模很大，平均每家有5.79人，仅有十分之一的人独自生活。现在的家庭规模是历史上最小的，平均仅有2.63人，一个人生活

的比例上升到四分之一（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

其他方面的对比也很明显。在1790年，仅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城市。纽约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人口重心在巴尔的摩附近。此外只有三个重要的中心城市：费城、波士顿、查尔斯顿。今天，50%以上的美国人口居住在100万人以上的巨型城市中。所有的城市居民超过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最大的六个城市是：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顿、费城、圣地亚哥。1790年，人口重心在巴尔的摩以东约37公里，现在却移到约1316公里以外，大约在密苏里州斯的威乐西北15.6公里处（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

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美国人口非常年轻，年龄中位数只有16岁。由于很多妇女处在生育年龄，粗出生率高达55%，比现在的印度还要高得多。那时人口的预期寿命为35年。现在的美国人口年龄则大得多，年龄中位数为32.6岁。人口出生率在多年来的持续下降以后，到1989年又回升到16%（美国人口普查局，1990d）。

这种人口的变迁，既引起又反映了美国人生活及价值观念的变化。现在有些妇女为了工作不要孩子，还有很多推迟婚期。老年人口的增多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比如退休政策、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等。人口的过度城市化给城市带来了许多特殊困难，这些都是早期的美国人所不曾遇到的。下面让我们来仔细关注一下当代人口的发展趋势。

不断变化的出生率

根据我们前面讨论的人口变迁理论，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但这种规律只有长期才能体现出来。在短时间内，生育率的急剧波动可能而且经常发生。20世纪美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从这段时间美国人口生育率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最初10年，出生率逐渐下降，到经济大萧条的30年代达到最低点，每1000个育龄妇女生育75.8个婴儿。二战以后，生育率出人意料地急剧上升，到50年代的生育高峰时期，上述数据增加到122.7。在60年代中期，生育率又迅速下降，之后虽然稍有波动，但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1990年每千名育龄妇女的生育数是67.0，共有417万名妇女生育孩子，从数量上讲比80年代晚期略有些增加。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波动呢？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生育率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处于育龄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变化造成的（伊斯特林，1980；舒克里，1984；西蒙，1986）。经济大萧条时期生育的人数较少，所以到临近二次大战结束的1945年，就业机会就显得较多。到经济繁荣的50年代及60年代初，许多妇女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并生育了很多孩子。而他们的孩子到70年代及80年代初成年时，就业机会就相对缺乏。由于生育高峰带来的人口过多，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许多年轻人不能确定到底能挣多少钱，只好不要孩子或尽量少要孩子。

其他社会学家强调，妇女对生育的看法反映了她们个人的青春期经历（马斯尼克和麦克福尔斯，1978；卡逊，1988）。这种经历取决于通行的社会规范和经济条件。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条件的限制迫使人们尽量限制家庭规模，所以大多数夫妇都切实采取了生育控制措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二次大战期间。然而在从战后直到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期，由于经济条件的优越，人们对避孕节育又放松了警惕。

我们并不能肯定，生育高峰是经济大萧条和二次大战后的自然反弹，还是战后惊人的经济繁荣本身的必然结果。也许两种原因都有，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从长时间来看，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还是呈下降趋势。这些国家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而不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韦斯托夫，1978；布朗和杰克逊，1987）。

最近几十年出生率的下降越来越多是由于参加工作的妇女的增加。在美国，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从1960年的30%上升到1990年的57.5%，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此外，避孕药等有效而廉价的避孕措施的更加普及也是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人口零增长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的人口更替水平，这个水平是指人口要保持繁衍，每个妇女应当生育的最少的孩子数目。这个数字应当大于2.0，因为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活到生育年龄；在婴儿死亡率较高的国家，必须远大于2.0。如果这一更替水平要永远持续下去，那么就意味着人口零增长（zero population growth, ZPG），即人口不再自然增长。

80年代初期以前，生育率一直下降到1.8。之后稍有回升，1991年为2.0。但是美国在20世纪内仍然不能达到人口零增长。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现在正处于生育期。尽管生育率很低，但她们人数众多，使得在未来几年里新生人口数仍大于死亡人口数。

即便是实际的出生率达到了零增长点，移民仍然可能使人口继续增长。在1981年至1990年间，估计有733.8万人合法地移民到美国（《世界年鉴》，1991）。如果这种移民速度继续下去，即便是生育率下降到1.6，美国还要经过50年才能够达到零增长点。

美国人口爆炸的结束

许多观察家预测，美国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在将来会带来惊人的变化。几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将受到影响，包括经济、时尚、土地使用、娱乐、教育、医疗保健、退休政策、音乐等。由于超过20%的选民大于65岁，美国的政策将特别反映出“老龄化的美国”。

有一些变化已经很明显了。一些学校由于入学人数越来越少而关了门。大学也越来越注重成人教育。玩具厂商和婴儿食品公司开始把它们的产品线转向新的商品和服务，比如保险业、化妆品、成人游戏等。社会保障体系将由于退休人员的增多而发生较大变化，因为他们的福利要有越来越少的工人来保障。因为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正处于生育期内，他们生育的孩子将使得上述某些趋势不会很快表现出来。这种现象被称为“生育高峰的连锁反应”。但是这种反应最终还是会逐渐消除，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还是将继续。

美国老年人将变得迟钝、缺乏创造力而且保守吗？在老龄化的国家里还会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吗？在老年的熟练工人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年轻人

还会有机会获得发展吗？这些问题困扰着人口学家和社会计划的制定者。

生态学与环境社会学

生态学 (Ecology) 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是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在 19 世纪发展起来的。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及适者生存规律对这门学科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1893 年，埃米尔·迪尔凯姆开创了“社会形态学”，以研究人口与环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但直到一次大战后美国社会学家才真正认识到社会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对环境的适应，开始把生态学的许多观点应用到社会学中。在适应社会及自然的过程中，为了占有有限的资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断地相互合作、相互竞争。人的这种适应性与生物生态学家研究的动物行为在某些方面非常类似。

在美国，首先是罗伯特·帕克在芝加哥大学把生态学的观点引入到社会学当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二三十年代时，芝加哥在该学科处于领先地位，许多工作都是面向生态学进行的。对许多城市的生态行为、生态过程的研究就是最重要的例子。第二十章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次大战以后，社会学界对生态学的兴趣减弱了。《人类生态学》是一个例外，这是艾莫斯·霍利 (Amos Hawley) 的一部研究社会共同体结构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研究是基于“所有有机体的生活方式都有一定的一致性”的假设。然而最近人们对生态学及即将被称为环境社会学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的学科重新产生了兴趣。这种复苏主要是由国内外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引起的 (邓拉普和卡托, 1979; 鲁宾逊, 1981)。

社会生态学家和环境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不完全相同。社会生态学家一直更关注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比如，他们曾经仔细研究了自杀及精神病等“社会事实”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况 (肖特, 1971; 哈福, 1986)。社会生态学与人口学密切相关。它们在研究社会问题时都强调定量分析，并且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也大都相同。

环境社会学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与社会生态学家一样，环境社会学家也比其他社会学家更少关注文化价值与规范。环境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环境对社会组织及社会行为的影响。比如，一位学者曾经研究某次特定的自然灾害 (发生在孟加拉的一次迫使灾民迁移的严重洪灾) 对村民的影响 (扎曼, 1986)。其他有关环境的研究还仔细考察了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设施泄漏造成的灾难性的危害，以及人们对核武器及核辐射的恐惧 (盖尔, 1987; 罗莎米切尔和基廷, 1988)。另一位环境社会学家还研究了海地人民对这个岛国越来越稠密的人口造成的生态后果的反应。拥挤的人口使得海地每年损失 10% 的森林，这对于主要依靠木材做饭和取暖的海地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 (伍德沃德, 1983)。

人口密度与人类行为

社会学领域的生态与环境方面的研究的另一个焦点是人口密度与人类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动物试验表明：过度拥挤会导致病态行为。一项著名的实验研究了过度拥挤对耗子行为的影响。在试验中，人们给这些老鼠充足的食物和水，但密度要比自然条件下要大的多。试验中产生了以下反应：不断增加的死亡率，尤其是在幼鼠中更为严重；生育率下降；母亲不再关心幼鼠；过度好斗，甚至出现了老鼠吃老鼠的现象；性失常等（卡尔霍恩，1962）。

尽管有人坚持在动物试验中的结论不能应用到人类中来（西蒙，1981），但如此令人震惊的试验现象，以及人们对许多大城市中不断恶化的环境的日益关注，还是促使人们进行了许多调查，以研究有关密集的城市人口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社会学家一般要区分人口密度（density）（某一给定空间的绝对人口数）与拥挤（crowding）（人们对是否人口过多的主观感受）。一些研究表明，尽管较高的人口密度会使人感觉不舒服，但一般不足以导致社会病态反应（弗希尔等，1975；弗里德曼，1975）。然而这种说法遭到其他社会学家的猛烈抨击。有些研究发现，家庭中人口过度密集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退却，让人普遍有一种“精疲力竭”的感觉（戈夫、休斯和盖尔，1979），还让人产生越来越强的敌对情绪（兹戴克-雷安史密斯，1983）。在芝加哥进行的一项开创性研究发现，高人口密度伴随着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家庭关系紧张、对婴儿的关心下降，以及青少年行为不端（盖尔等，1972）。另一项研究认为，人口密集会导致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从而产生紧张情绪（然，1987）。

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生态系统（ecosystem），即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网。著名社会生态学家邓肯（Otis Dudley Duncan，1959）称之为“生态联合体”，认为包含以下四要素：人口、组织、环境、技术（一般简称为POET）。对这些要素相互关系的分析在生态学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邓肯曾经以分析南加州洛杉矶盆地的烟雾问题为例，来说明生态系统复杂的相互作用（1961）。在二战及以后的时间里，有大量的人口涌入洛杉矶地区，并兴建了很多工业设施，居民开始注意到有一种兰灰色的薄雾妨碍人们的视线，并刺激他们的鼻子和眼睛。这种烟雾后来越来越严重，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很大危害，也对本地的农作物造成极大影响。科学家最终发现，是由于太阳光将燃烧的废弃物，尤其是汽车尾气产生的废气转化为有毒的化学物质。在洛杉矶，由于四面环山，空气不易流通，废气就不能散发到大气中去，情况就更为严重。邓肯注意到烟雾问题与洛杉矶地区的人口规模及居住方式有密切关系。

问题在开始就非常严重，洛杉矶地区急剧增加的人口虽然分散到周围较

为广阔的地区内,对此也没有丝毫帮助,反而加重了对已经无处不在的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依赖。人们为了逃避汽车产生的烟雾在高速公路上不停加速,谁还能找到比这更能体现循环因果关系(生态学理论中的中心定理)、更令人痛苦的事例呢?

3

地球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概念可以推广到整个地球,像其他动物一样,人类也需要充足的洁净水和空气、直接或间接来自绿色植物的食物,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利用太阳能合成碳水化合物。此外,人类还需要一定的活动空间。

人类曾经以为地球可以无穷无尽地提供这些自然资源。然而现在,环境的有限性越来越明显,许多自然资源很快就将耗尽。大气、水、土壤已经被化学药品、放射物质、垃圾所污染,显然,最终还会超过地球的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

肯尼斯·博尔丁这样比喻这种最终到来的两难境地:我们将不得不从“牛仔”经济转向“太空人”经济。“牛仔”经济认为世界很大、没有边界,鼓励毫无顾忌地开发。“太空人”经济把地球看作一艘巨大但有限的飞船,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人类也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太空人”经济的核心就在于强调节约地球重要的自然资源宝库。这与“牛仔”经济提倡的持续增长的经济生产形成鲜明对照(博尔丁,1966)。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改善自然的尝试最终还是对自然环境造成毁灭。例如,以增产为目的的施肥会破坏水源附近的生态平衡。类似地,将绿地变为城市会减少空气中的氧含量。

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非洲、印度、南美,许多以前肥沃的土地由于几百年来的过度耕作正在沙漠化。联合国另一项报告得出结论,“地球上容纳了8.5亿人口的占陆地总面积35%的土地正在受到沙漠化的威胁,而占全球人口将近10%的多达4.07亿的人已经受到部分沙漠化的影响”,这些地方的土地已经丧失了25%的生产能力(联合国,1988)。就像8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发生的灾害一样,当人们不当利用的土地遇到周期性的干旱时,就会造成饥荒,成千上万的人将被饿死,无数人受到威胁(沃森,1984;科雷亚、吐基和沃利,1989)。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公开发表的一项报告预计,如果现在的人口增长、污染、食品生产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到21世纪末,世界的增长将达到极限。最终就可能是人口和工业生产的突然的、大幅度的下降。报告中并没有预计这些情况一定会发生,但作为对制定经济、政治、社会政策的警告和建议,它根据现在的趋势进行了预测和分析,是为了保证这种灾难不会发生(泰勒,1975;劳里卡和黄,1987)。根据这个报告,避免这种黑暗未来的惟一途径就是,趁还来得及,尽快约束我们的扩张行为(梅多斯等,1972)。

即便是这种“增长的极限”观点有些过于悲观,自然环境的利用极限的确在接近。未来的社会学家们可能不得不更多地考虑环境因素,甚至会像他们现在关注文化一样。



全球协作，绿化地球

人们讨论由污染、过度开发、人口过多造成的环境危机已经有 20 多年的时间了。对全球环境造成威胁的因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下面只给出一些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

- 在发展中国家，每天有 2.5 万人死于被污染的水源造成的疾病。
- 2000 年以前，将有 100 万种物种灭绝。一些专家预测全球物种的 25% 将在 50 年以内灭绝。
- 10 亿人居住在二氧化硫含量过高的城市中。
- 20 世纪末，所有可耕地都将被用来种植农作物。
- 热带雨林仅占地球面积的 7%，却包含了一半以上的物种。在最近 10 年中，雨林面积减少了 239 000 公顷。
- 地球现在遭受的环境威胁大多数源于人类最近 50 年的活动。
- 地球在以惊人的速度变暖。如果造成温度升高的气体仍以现在的速度排放，21 世纪地球表面温度将上升 3 至 8 度。极地冰帽的融化将使地球表面水位上升，沿海地区将被淹没。温度的升高也将使可耕地面积减少。

当然也有好消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大多数国家计划团结起来保护生态。1992 年 6 月，由联合国发起的世界首脑会议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100 多位国家首脑及 6 000 名环境专家到会，会议有两个基本目的：就减少造成全球变暖的化学物质的排放达成共识；通过各种保护措施来拯救动植物物种。

在发达国家，水源和空气质量在最近 20 年有了较大改善。20 年内，美国各大公司斥资 8 500 亿美元治理他们的污染，结果在美国，许多河流比 20 年前更清澈。但是同一时期，东欧及前苏联造成了要耗资巨大才能治理的污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依赖廉价、但污染更大的煤和木材的快速工业化计划。

穷国与富国之间在关于首先做什么及由谁来做的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这可能成为有效的国际行动的最大障碍。穷国认为富国在发展过程中犯下许多环境方面的过错，现在回过头来命令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降低发展速度来保护环境。富国尽管承认对环境的现状负有责任，但还是反驳说，如果穷国一味追求高速工业化，必将带来环境灾难。毕竟有了一个开始，大家对制定能协调经济发展和环保的全球策略有了更紧迫的认识。

资料来源：伯勒斯等 (Don L. Boroughs)：《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91 年 3 月 25 日；斯蒂文 (William K. Stevens)：《人类遇到了自己制造的难题：一个面目全非的地球》，《纽约时报》，1992 年 5 月 5 日；“TNC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联合国年鉴》，1991 年 9 月；《地球还能养活人类吗？》《联合国年鉴》，1988 年 6 月。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数量、组成、分布和变化的学科，是社会学中发

展最完善、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人口学的研究数据通常来自人口普查，即定期进行的人口统计，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和职业。政府的人口统计纪录，即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婚姻和离婚等情况，是对人口普查数据很好的补充。

2. 人口的众多生理和社会特性中，人口学家最感兴趣的是性别和年龄。人口普查资料中经常用性别比例（每100名妇女对应的男人的数量）来表达人口的男、女人数。战争等将一种性别的人更多置于危险境地的事件会导致性别失衡。一个社会的年龄结构（社会中不同年龄组人口的相对比例）可以用年龄组的金字塔图来表示，也可以用给定的年龄将人口分组表示。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生产有很大影响。年幼和年老的人要依靠别人的生产劳动来生活。如果这样的人同参加劳动的人相比太多的话，社会就会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

3. 人口学家不仅分析已有数据，而且还对人口进行投影研究和人口预测。人口投影就是利用外推法来估计未来的人口趋势。而人口预测则是依据对社会、经济、技术发展会如何影响人口趋势来预测未来的人口状况。

4. 出生（出生率）、死亡（死亡率）、移民将决定人口的增减。出生率指的是人口中婴儿出生速度，它受到育龄妇女的人数和健康状况等生理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人们对生育的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生育能力，即人口中妇女生育婴儿的最大生理极限，一般要比实际的生育情况大得多。粗生育率，是总人口中平均每年每1000人生育的婴儿数量；而某年龄组的生育率则可以表达得更科学些，指的是某年龄组中平均每1000人每年生育的婴儿数量；而总和生育率也是一种较为科学的表示方法，即假设现在的全部年龄组的生育率都保持不变，一个妇女在它的生育年龄中将生育的婴儿数。在同一个社会内，生育率会随着阶级、人种、宗教、居住地的不同而不同。

5. 一个社会的死亡率受到科技和医疗知识水平以及是否愿意将这些技术用于人们的健康和医疗保障等因素的影响。表达死亡率的方法有粗死亡率（人口中平均每年每1000人死亡的数量）和某年龄组的死亡率（某年龄组中每年每1000人死亡的数量）。新生儿的死亡率是指不满一月的婴儿的死亡率；粗婴儿死亡率，是指某一年中出生的1000个婴儿中不满1岁就死亡的人数。预期寿命是指现存人口中某一年龄组的人的剩余寿命。而生命跨度是指任一物种的最长可能寿命。

6. 人口变化还受到移民的影响，移民是指人们在地理位置上的迁徙。从一个国家迁出的移民为出境移民，迁入一个国家成为入境移民。年移民率（有时称为净移民率）是指每年每千人中，入境移民与出境移民的差。移民又分为国际间移民和国内移民。推和拉的因素都影响人们作出移民的决定。

7. 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建立了人口增长可能超过粮食增长的理论。当粮食供给不足时，饥荒、瘟疫、战争等灾难就会使死亡率上升，使人口减少。马尔萨斯的理论一直是争论的热点。在工业革命之前，美国和西欧国家都呈现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情况。但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这些国家

的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依然较高,使得人口激增。在工业化后期,出生率下降到与死亡率平衡的水平,人口保持稳定。这种人口增长变化的模型称为人口变迁。

8.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可用资金被迫用来维持人口的生存,因而就没有钱投资到经济建设中。

9. 二战以后,现代医药水平和公共医疗手段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大幅下降。同一时期的高出生率导致了人口的惊人增长。然而,二战以后的人口高速增长已经明显放慢了一些。由于意识到人口过多的严重后果,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通过生育管制计划来努力控制人口。

10. 生育控制是减少世界人口的关键。现在有很多种避孕措施,绝大多数是女用的。男性和女性的绝育在全世界变得普及起来。流产是另一种广泛采用的、但又引起争议的生育控制手段。

11. 二次大战带来了一个生育高峰,但之后的几十年中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在20世纪,美国还基本不可能达到人口零增长,即人口的自然增长为零的状态。

12.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学家以人类适应自然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的社会行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为了稀缺的资源相互合作、相互竞争。

13. 许多社会生态学家以生态系统的观点分析社会现象,即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网。生态系统包括四个要素:人口、组织、环境、技术。社会学领域的生态与环境方面研究的另一个焦点是人口密度与人类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出完整的结论。

14. 生态系统的概念可以推广到整个地球。人类曾经以为地球可以无穷无尽地提供这些自然资源。然而现在环境的有限性越来越明显,人类的浪费即将耗尽自然资源。

推荐阅读书目

1. 威廉(Alonso, William)主编,1987.《互动世界中的人口》(*Population in an Interacting World*.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从全球的角度考察了人口的相互依赖性。

2.《美国人口学》(*American Demographics*),是面向大众的人口学月刊。

3. 巴里(Commoner, Barry.),1990.《与地球和平共处》(*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New York: Pantheon Press.)一位坦率的环境主义提倡者有关我们必须反思技术应用的讨论。

4. 伊斯特林(Easterlin, Richard A.)和克里明斯(Ellen M. Crimmins.),1988.《生育革命》(*Fertility Revolu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该书回顾了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生育变迁过程。

5. 约翰 (Firor, John.), 1990. 《变化中的气候: 一个全球性挑战》(*The Changing Atmosphere: A Global Challeng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的最新分析。

6. 吉尔·理查德 (Gill, Richard T.) 和滕斯特朗 (Stephan A. Thornstrom.), 1992. 《变化中的人口》(*Our Changing Popula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一本讲述美国人口变化趋势的教科书。

7. 琼斯 (Jones, Elise F.)、弗利斯特 (Jacqueline D. Forrest)、汉肖 (Stanley K. Henshaw)、琼西尔韦曼 (Jane Silverman) 和托里斯 (Aida Torres.), 1989. 《工业化国家的怀孕、避孕、和计划生育》(*Pregnancy, Contracep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对二十个发达国家的节育政策的研究。

8. 《人口公告》(*Population Bulletin*), 华盛顿特区: 人口资料局, 每年发行六次, 主要是关于美国及全球面临的紧迫的人口问题的深刻评论。

9. 西蒙 (Simon, Julian L.), 1989. 《移民入境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指出移民带来的问题不是对入境国家的经济的削弱而是为其做出了大量贡献。

10. 威克斯·约翰 (Weeks, John R.), 1992. 《人口概述——概念与问题》(*Popu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oncepts and Issue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最近出版的一本涵盖人口学领域的主要问题的教科书。

城市、城市化和社区变迁

美国人对城市历来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心情。尽管人们偶尔能听到对都市生活之优越性的一丝赞许，但历史上绝大多数的观察者都以饱蘸贬抑之辞的笔墨来描绘城市。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位名叫斯特朗（Josian Strong）的社会评论家、改革家和政府部长就以略带奇异的语言表现了这一现在看来仍十分时髦的主题。

这里堆积着社会的炸药；形形色色的下层人、赌棍、小偷、强盗、违法者和亡命之徒聚集在一起；为了破坏和抢劫，他们时刻准备以任何借口来发动骚乱；外来人口和以工资为生的工人在此处聚合；怀疑论和反宗教观念盛行；不平等程度在这里尤为剧烈和昭彰，贫富差别触目惊心（1885）。

许多 19、20 世纪的作家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指责城市孵化了美国精神中每一个黑暗而邪恶的冲动。肮脏、杂乱、骚动、危险、犯罪和腐败——按照历代社会批评家的说法，似乎这一切就是城市生活的本质。

尽管抨击一直是这样的无情，然而，美国人在口头上反对城市的同时，又在用脚步支持着城市。在殖民地时期，美国主要是个农业社会。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就业机会的推动，大量人口开始涌入城市地区，直到今天，这个国家城市人口终于超过了 70%。

许多移民开始在靠近大城市中心的地区安家，这里房租最便宜。而内城地区日益拥挤，再难以让人称心如意，于是掏得起钱的人便开始外移，转向

郊区。在郊区，既可轻易地从城市获得经济文化的好处，又可以重新创造一点村镇生活的氛围。

近年来，由于买房的花费急剧提高，使得郊区梦也越来越渺茫。来自城市中心的数以百万计的避难者只得住进了“花园公寓”。这种花园公寓是一些低层建筑，外面有一个绿色风景带。尽管许多花园公寓的住户仍执著于他们的郊区梦，但考虑到当前的经济状况，他们中的大多数恐怕只能在现在的单元房或类似的地方过上一辈子。

其他一些美国人，特别是在西部和南部的美国人，甚至搬得更远，他们常常在小镇里安家。尽管一些以前的郊区居民已被诱导到了市中心的重建区，大多数美国人对城市的看法与一个世纪以前尊敬的斯特朗（Strong）先生相比并没有多少变化。

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对城市生活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呢？既然反对城市的意见铺天盖地，又为什么美国城市在过去 200 年里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呢？那些郊区居民，以及完全搬离城市的人们，他们找到了他们追寻的东西吗？中心城市能否东山再起？在本章里，我们将考察城市生活的结构，主要城市问题以及生活在大城市区域的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等问题。

城市的起源和成长

城市是行政、金融和工业中心，现代生活与城市息息相关。然而为了充分理解现代城市生活，我们还得了解现代城市得以形成的历史过程。

1

最初的人类社区

最早的人们，组织成采集或游猎的群体，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这种群体生活的模式，今天仍能在为数不多的残存下来的游牧部落中看到，他们辗转迁徙，维持着生计。当人们的土地还无法长期支持种植和放牧时，这种生存方式是适应环境的比较有效的办法。

大约一万年以前，在所谓的“新石器革命”时代，以农业为基础的长期定居村落开始出现。一些简单的农业技术，比如谷物的种植和收割，大大增加了食物的供应。一旦他们长期居留在某一地方，人们就开始学会了驯养动物。家养动物不但可以供人玩赏，充当守卫和拖拉重负，还增加了人类的食物供应。在这种新式的定居村落里，人们过着稳定的生活，吃得更饱，过得更安全，也有了更多的闲暇。城市史学家、批评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961）指出，由于这一变化，人们可用于发展家庭技艺（family art）的时间也更多了。

部分地因为他们生产的食物很有限，这些早期定居点很少超过 200 人。这里的居民们关系密切，社区主要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世界各地都有考古学证据表明这样的村落确实存在过。几乎在所有国家，包括在美

国，人们都可以发现与这些早期社区非常相似的村落：在一个小村里，每个人都从事耕作，几乎没有什么劳动分工（拜罗赫，1988）。

2

城市的诞生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大约公元前 5000 年以后，少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成了小集镇和城市。这一变化有时被称之为“城市革命”（蔡尔德，1951；贝尼沃罗，1980），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确定一个地方是否为城市的最重要因素，不在乎其规模，而在于其居民的谋生方式。在城市社区里，大多数人不再自己种植食物。所以，只有当粮食生产者除满足自己消费外尚有粮食盈余时，该地区才有可能出现城市（乌克罗等，1972；本德，1975；舍德尔和金策尔，1978）。

开始，农民为城里人提供粮食常常很勉强，于是士兵、税收官等新行当便应运而生。又因为一些人不必再生产自己的粮食，又出现了一些新型的专业人士，比如手工艺匠、商人、宗教职员等。城市生活不可能再靠血缘规范来调节，也不可能再用新石器时代的非正式手段来实施其社会控制。新的城市状况要求新的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

随着第一批市镇的出现，被称为城市化的社会过程开始了。“城市化”是指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的运动。但要说到所有社会都有很大比例的城市人口，这是现代才有的事。而纵观人类历史，大多数的人还是生活在乡村。

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伊拉克境内，沿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岸而立。按现代的标准来说，这些城市并不大，而与此前存在过的人类定居点相比，它们则算得上是庞然大物了。乌尔（Ur），这是现今所知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其全盛时期，有一两万人（怀特豪斯，1977；拜罗赫，1988）。当时交通落后（大约直到公元前 3000 年，才发明了车轮），城市里谋生艰难，卫生条件差，传染病极易流行，这些都严重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大多数早期城市相当不稳定。频遭征服和洗劫，统治者经常被推翻，无法解释的灾难随时来临，人们至今仍对古代许多伟大城市为何最终竟被遗弃知之甚少。

早期城市的发展并非仅限于中东。在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在公元前 2400 年到公元前 1500 年之间，城市已经有了先进的管道设施。中国城市在公元前 1800 年以后出现（惠勒，1968）。新大陆（南北美洲）的早期城市虽然发展较晚，但与“旧大陆”的城市一样给人以深刻印象。

大约公元前 1000 年，铁开始得到广泛使用，这大大改善了交通，促进了生产，最终也使得城市人口大为增加。城市人口之间的思想交流也刺激了新的发明与发现，例如，文字、历法、数学、货币、青铜器、铜和黄铜制品等，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即使在城市发展了数百年之后，除了古罗马，还是没有任何别的城市人口超过几十万（戴维斯，1955；亚当斯，1966）。

欧洲城市的根在地中海地区那些伟大的古典城市：雅典和罗马。早在基督教诞生几个世纪之前，雅典就已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城邦，有着民主政治的传统和辉煌的艺术成就。历史学家们顺藤摸瓜，将西欧民主的肇端追溯到了雅典，尽管当时雅典也只有男性自由公民（妇女和奴隶排除在外）才有权投票选举。公共事务由每周召开的大会来讨论决定，所有有选举权的人都可以参加会议。后来雅典又发展成殖民势力，统治着周围的许多城邦和岛屿，向他们索取贡赋并为他们提供军事保护（芒福德，1961；贝尼沃罗，1980）。

然而，与罗马相比，雅典只是个小城市。到公元2世纪，罗马已拥有百万居民，并且是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的中心。历代罗马皇帝不惜重金，投资各项建设项目。比如，大多数罗马人居住的公寓里，都接通了大规模的供水排污系统。然而治安始终是一个问题，卫兵在街上巡逻着，以维护法律和秩序。

随着罗马的衰落，欧洲各中心城市里的居民也纷纷流散，城市的影响减少；在整个中世纪早期，这些城市脆弱而动荡。到了11、12世纪，城市开始复兴，其商业和文化地位日渐重要，但规模还是很小时。居民为了有效地保护其土地而能够巡护的距离，限制了城市的控制范围。1377年，伦敦仅有3万人（皮雷纳，1925；吉鲁阿尔，1985）。14世纪，由于“黑死病”横行，城市发展突然减速。黑死病是一系列传染性瘟疫，有时一个城市可能会有半数人因此丧生。瘟疫过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稳定地缓慢发展。

18世纪，工农业的发展复苏了欧洲经济，这才开始了现时代急骤的城市化进程。这一转型被称之为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到1800年，伦敦人口猛增至100万人。“农业和交通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和新商路的开通；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提高：首先是在高度组织化的手工作坊中，后来又出现了革命性的新生产方式——由机器和燃料推动的工厂”（戴维斯，1955；科维茨，1985），这一切是这个时期城市发展的基础。

前工业时期城市的社会结构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不同于现代的工业城市（希欧贝格，1960）。尽管两者都人口密集，都以社会多样性为其特征，前工业时期城市的社会结构还是更接近于乡村社会。家族和亲属关系网仍是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社会分层体系禁锢着社会流动。工业活动围绕着在自己家里干活的手工艺工匠和手工工人展开。一小部分权贵把持了政府。社会秩序的基础主要是习俗和严格的传统等级制度而不是成文法典和警察势力。这些特征反映了传统乡村社会体系的影响，这些早期城市仍与乡村社会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拉斯莱特，1984）。

部分地因为交通手段不发达，前工业城市常常划分为区。政府官员和上层阶级聚居于某一区域（通常最靠近市中心），外国人住在别处，下层阶级又住在其他地方。金属工匠、织工、裁缝和其他的手工艺人也都有自己的居住区。今天的伦敦有一个“舰队街”（Fleet Street），新闻出版界人士都在此

工作，有时就住在这里，由此我们仍可辨认出这种分区模式的踪迹。

尽管前工业社会城市的区划是专门化的，而建筑物的功能却并未分化。人们常在同一个屋檐下既生活又工作。商店可能和学校、政府办公室同在一处。当时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高度职业分化。一个商人买来原料，又加工成成品，并亲手把它们卖给消费者。

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化

作为工业化的结果，西欧的城镇在 18 世纪晚期开始飞速发展。中世纪晚期，许多镇发展成手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建立起了完善的商业体系，这使得新兴工业家们更易于获利，于是他们便在这些城市落户了。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减少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鼓励了人口流入城市中心。由于被新兴城市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所吸引，工人不断涌入，这又促进了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发育。

1700 年，只有不到 2% 的英国人在城市里生活。到 1900 年，大多数英国人都成了城里人。其他欧洲国家城市化起步较晚，可也很快就跟了上来。原来许多地方性流行病使得城市健康状况极不理想，而今由于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措施的发展，大多数流行病得以根除，这大大刺激了城市的发展。地理和环境因素也大大影响了新兴城市的选址和已有城市的发展。最典型的是大城市常常坐落于那些交通成本低的地方：靠近海岸，傍依大河或是在自然矿藏附近。

随着工业城市的发展，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变迁。公共教育更加必不可少、也更为容易获得，这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移民、来自乡村的人、种族和宗教上的少数群体都至少部分地被吸收到一种单一的城市文化中来。城市和工业环境强烈影响了社会分层体系。例如，由经理、商人、专业人士组成的不断成长的新兴中产阶级取代了工业革命前由手工艺匠人、商贩和农村小私有者组成的那个小规模的中产阶级（罗马克，1974；拉布和罗特贝格，1981）。中产阶级的成长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

1

美国的城市化

尽管在英国飞速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了很长时间以后，美国大体上还是一个乡村国家，但是在更短的时期内（主要是 1860—1920 年之间），它也实现了高度的城市化。1860 年时，居住在城市里的美国人尚不足 20%，而到 1920 年，大多数美国人已是生活在城里了。到 1920 年，农业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 20%，而一百年以前，这个比例高达 72%（曲达科夫和史密斯，1988）。

包括纽约、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在内的东北部地区，工业发展较早，

这也是美国最早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地区。1900年，城市人口超过50%的八个州中，有六个位于东北部。主要依靠于贸易的西部城市，到二战以前还是远远落后于东北部；二战期间，国防工业的急剧扩张使得这些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这一增长势头在二战后仍在继续，80年代，城市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仍是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和亚利桑那这几个州，而东北诸州则发展很慢。总之，美国近十年的人口增长90%发生在南部和西部（沃尔德罗普和埃文斯特，1900），这反映了美国人向南部、西部边陲地区的“阳光地带”流动的总趋势。而今，美国十大城市中有六个位于阳光地带：洛杉矶、休斯顿、达拉斯、菲尼克斯、圣安东尼和圣地亚哥。80年代，在所有大城市区域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洛杉矶长滩的人口增长了130万（沃尔德罗普和埃文斯特，1990）。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的生活 在城市社区，将近90%的人由住所驱车前往市中心用不了1个小时。由于现代传播媒介和交通的发展，即使不住在城市里的人，也与城市生活方式紧密相关。

2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西方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努力。而非洲、亚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则试图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要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取得同样的成就。即使在工业化以前，西方国家便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则非常贫穷。在工业化过程中，他们必须同发达国家高度成熟的经济体系展开竞争。

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状况也与高速城市化时期的西方国家大为不同。例如，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与西方城市化相比，人口涌入城市的速度要更快。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增长速度是爆炸性的。据估计，在未来20年内，城市增长的十分之九将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布朗和雅各布森，1987）。这种高速增长主要是当今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的结果。

相反的过程看来正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发生，在这些地区，发达的交通通讯体系鼓励人口分散，因为货物和信息从一个国家的一端传送到另一端已是非常迅速的事（哈维，1989）。这种“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过程也受到成熟的社会组织的推动，这些国家的公司等社会组织能够协调好遍布世界各地的雇员的活动。相反，第三世界国家的交通与通讯要落后得多。

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一般都远远落后于其城市人口的增长。人口多而就业机会少，所以农村地区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的剩余劳动力远远超过城市的容纳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为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流入城市的人口与在城市里能获得的机会和服务相距悬殊。

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大体上未受政府控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常常处于中央集权的国家的管理之下。这些政府发现自身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愿望，一方面是保存传统社会结构的强大压力。面对这

种冲突,城市发展的管理常有不当之处,这一问题又由于资金和资源的缺乏而更趋严峻。

住房是个特殊的问题。一般而言,新到的城市移民先住在大城市周围临时的“非法占地定居点”(squatter settlement)里。这些地方居住条件很差,不仅严重拥挤,而且缺乏水电和废物处理等基础设施(吉尔伯特和古格勒,1983)。在内罗毕,五分之一的居民就是这些非法占地者,他们很多人成了非正式的“街道劳动力”的一部分,沿街叫卖食品,提供服务,从事卖淫等非法活动(古格勒,1988)。在南撒哈拉非洲,非法占地者的百分比最高,有66%的城市人口住在这些“非法占地定居点”里。某些中东城市,这类人也多达52%,在许多拉美城市中他们占了37%,在一些南亚城市中这一比率是27%(卡斯泰尔,1988)。

美国大都会的结构和发展

城市社会学家用“社区”这一术语来指小村庄、城市里的邻里关系,以及类似的大城市地区。对他们来说,社区(Community)就是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域中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围绕着日常的互动模式而组织起来。这些模式包括工作、购物、娱乐等活动,以及教育、宗教、行政等设置(在一种与此不同然而又有关联的意义上,社区也用来指这样一些地方或群体,在其中人们感到团结一致,并通过日常共同的认同感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

19世纪典型的城市社区,人口密集而紧凑。但是到现代,大多城市社区都已发展成大城市区域(metropolitan areas),即一个或多个大城市,再加上其周围的郊区。美国人口普查局使用“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缩写为MSA)这一概念来分析都市生活。一个MSA被定义为包括城市及其郊区的地区,总人口不少于5万。现在,75%以上的美国人生活在MSA里。

1

大都会社区

城市向外扩张,进入人口较少的地区,结果形成了大城市区域。20世纪大都会区的发展得益于汽车的广泛使用。汽车的普及,使得人们既可以生活在不那么拥挤的城外,又可以兼顾城里的工作并享受各种服务之便。第一批迁入郊区的是那些富人,随之而来的是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大城市的发展助长了按社会阶级、种族和其他社会变量而形成的地理隔离(geographic segregation)(斯卡基尔,1979;桑德斯,1981)。白人中产阶级聚集在郊区,仍然呆在市中心的是大量城市贫困人口——包括黑人、拉美人和老龄人口。

近几十年来市郊社区已成了美国大城市区域发展最快的部分。市中心本身增长很少,在很多情况下其总人口事实上还有所下降。市中心人口构成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白人中产阶级弃之而去，来自农村的黑人、移民和其他新来者取而代之。许多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和老移民也迁入了郊区（赖克，1991）。另外，也有许多人并不经由城市过渡，而直接由小镇或农庄搬进郊区。现在仅有30%的美国人住在中心城市，而有45%的美国人生活在郊区。因此，与其说美国人是城市化了，还不如说是郊区化了。

中心城市

大城市区域的核心通常主要发展商业。中心城市一般是当地交通网络的枢纽，因而是从事广告、出版、金融、娱乐以及某些零售商业的理想场所。这些活动要求面对面的互动、大量劳动力以及可供职员、顾客、观众便于见面的地方。而中心城市正好满足所有这些要求。

生活在美国中心城市的少数民族贫民很多，多得不成比例。一方面由于白人中产阶级迁入郊区，一方面又由于很多穷人迁入城市来寻找对技术要求低的工作并享受健康、福利等市政服务，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但是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特别是黑人）向城市地区的迁移已经放慢了脚步。1976年至1986年间，有近500万的黑人、拉美人、亚洲人移民美国，其中近半数已在郊区或非大城市区域而不是中心城市定居（弗雷和斯皮尔，1988）。

城市贫民集中在贫民窟，挤在低于法定标准的住所里。那些新迁进城的人也常与他们为邻，计划在这里歇歇脚，一等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便可以搬出去。而很不幸，对于许多境况不佳的少数民族人们来说，这里成了一个陷阱。缺少足够的就业和教育机会，他们哪里能攒下足够的钱离开贫民区。就算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在郊区租到或买下了房子，也常常遭受歧视（W. J. 威尔逊，1978，1987）。

当然，市中心住的不只是贫困人口，事实上，各式各样的人都在此安家，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都在此汇聚。在一个颇有影响的分析中，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 1962）定义了五个有着明显区别的人群，这些人群可以在美国的许多中心城市里见到。

1. “四海为家者”（the cosmopolites）。这一群体的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从事广告、出版、设计之类的与文艺有关的职业。他们收入通常很高，选择住在城里，是为了接近这里的文化环境，而与当地邻里并无密切关系。

2. “未婚者或无子女者”。这些人选择城市生活，主要是认为在这里可以与很多人交往，社会生活很活跃。他们经常搬动，其中很多都是有了孩子以后，便一起搬离城市。

3. “民族村落居民”（the ethnic villagers）。这些群体由外国移民组成，他们仍未充分整合到美国的生活方式中来，继续遵循着其出生地的方式。他们很少走出其邻里关系的小圈子，对城市的其他部分根本不感兴趣。正如甘斯所说：“尽管他们生活在城市，却孤立于大多数城市设施之外，除了工作场所，与城市并无重要接触。”

4. “被剥夺者”（the deprived）。穷人、有色人种、未婚妈妈构成了这一群体的大多数。他们住在城里，是因为城里可以找到便宜的住所。而且，城里的福利补贴通常比农村高。另外，他们还希望能在城里找到工作，以改善

其经济处境。

5. “身陷城市的人” (the trapped)。这主要指那些老人,他们靠养老金过日子,根本无力搬走。况且,他们中很多人就在这个城里生活了一辈子。就像那些“民族村居民”一样,他们对其邻里有强烈的认同感,很少离开他们。

这一分类虽然早在 60 年代就提出来了,但与今天市中心的情况仍旧相符。不过,在最近 20 年来,还是出现了一些值得一提的变化。许多欧洲民族村落的居民搬到了郊区,大量来自拉美和亚洲的移民取代了他们原来在市中心的位置。特别是在东部和中西部的老城市里,被剥夺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出现了惊人的增加,他们构成了所谓的“下层阶级”,很多人吸毒、失业、犯罪、怀孕的少女也不少,这些构成了其特征(威尔逊,1987;卡萨达,1989;特柯斯,1972)。在很多城市的小区里,出现了一个称之为“士绅化”的过程,这使得四海为家者、中产阶级未婚者和无子女者人数增加。一个新的群体——无家可归者,已在中心城市随处可见。

郊区

郊区相对较小,靠近并依赖于中心城市。虽然有史以来,有城市便有郊区,但直到 20 世纪,郊区才兴旺发达起来。现代郊区的发展,是交通发展、特别是汽车和公共交通系统发展的结果。郊区已被描述为美国社会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杰克逊,1985)。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郊区是解决城市人口过于密集而引起的种种问题的一个途径。如果人口过于密集,公共设施便会不堪重负,住房紧缺而价位高昂。为了满足对商品和服务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商业活动和政府活动日益扩张,又占去了一些生活空间,致使居住区更为拥挤,通常解决这一恶性循环的办法是在城市外沿建立新的居住区。这既使得城市化的经济优势得以保持,又减少了过于密集拥挤的问题。

在美国,郊区的高速发展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刺激。个人收入的提高,拥有自己独门独院的房屋的强烈愿望,以及政府促进郊区化的政策,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杰克逊,1985)。为了迅速实现拥有住房这一美国梦,政府于 30 年代创设了房主信贷公司,以保护房主的房产赎回权不被取消;二战后,政府设法使老兵们可以获得低价抵押,并为住房翻新和住房发展提供联邦住房管理局贷款,又规定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一部分以充作抵押利息。为了方便郊区居民往来,交通部还特意拨款,以修建公路和支持双轨铁路(commute railway)的扩展。郊区化也受到了中心城市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刺激,许多人把迁往郊区看作对城市生活消极方面的逃避。

中心城市的工作和商店也逐渐跟随人流迁往郊区。产业部门也被郊区开阔的空间和低廉的税收所吸引。大多数市区的百货公司都在郊区设立分店,有的干脆弃城而出,迁往市郊的商业区。市郊的商业区不仅是购物中心,也是非正式的娱乐、社交中心。因此,现在郊区对中心城市的依赖要比以前小得多了,如果依赖性还存在的话,也是中心城市越来越依赖郊区了。这种依赖模式,在洛杉矶、休斯顿、菲尼克斯等新兴城市更为明显。这些城市不再

以市中心的商业区为中心，而主要由一系列住宅区与一些远离市区的办公楼和购物中心构成。

郊区一般依据社会阶级和种族而高度分化。一些郊区，比如康涅狄克州的达里恩、密执安州的格罗斯角和新泽西州的富兰克林湖区，住的主要是上层阶级。一些地区，比如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和加州的斯坦福，住的是中上层阶级。大多数郊区住的是中产阶级和上层劳动阶级。有些郊区住的几乎全是白人，事实上，郊区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为明显的社区（福克斯，1986）。尽管法律禁止房产租赁与买卖中的歧视，但美国70%的郊区里，黑人仅占2%（吉勒特和米勒，1987）。这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因素起作用，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也可以将一些人排除在外，例如，那些禁止在小块土地上建公寓和住房的区划法（Zoning laws）（弗什曼，1987）。

某些郊区也确实有富裕的少数民族人，事实上，在大多数美国城市，黑人的郊区化已是一个重要潮流（弗雷等，1988）。像其他种族以前曾经历过的——一样，越来越多的黑人中产阶级正由城市搬入郊区，但其中大多数搬入的是靠近中心城市的以黑人为主的郊区，所以这并没有消解郊区的隔离模式。而且，正如城市白人和郊区白人之间一样，城市黑人和郊区黑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小（博多维奇，1991；巴尔达萨里，1986；洛根和施奈德，1984）。

2

大都会的兴衰

大都会带

大城市区域的成长和去中心化，造成了一种新的城市区域模型：大都会带（megapolis），即两个或多个大都市不断发展，最后连接成片，互相重叠形成大都市的集结。结果，市区和郊区连成狭长地带，有时绵延百余里（斯科特，1988；戈特曼，1964）。分析家们在全国确定了十余个大都会带。最为有名的是“波士顿——华盛顿走廊”（Boswash Corridor），这是一个位于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的城市混合体。另有一个位于西海岸，从旧金山延伸到圣地亚哥。

在大都会带里，乡村、郊区和城市界限模糊不清，整个地区由工业区、郊区和市区连缀而成。高速公路接送人们上下班，有时有百余里的路程。看来人们喜欢将工作、生活和娱乐安排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因为区域性问题的必须由很多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共同面对，而他们每一方又都有各自的利益，所以公共政策和公共计划颇为难以协调。因此，大都会带为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人员提出了大难题。然而，由于美国人试图将城市生活的优点与人口密度较低的郊区的优点结合起来，看来大都会带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社区最有希望的形式。

大城市的衰落

正当美国走向完全都市化国家的途中，新情况又出现了：一些大城市区域的人口竟然开始下降。70年代，主要城市减少人口约1300万（菲什曼，1987）。从1975年到1980年，每有100人迁入大城市区域，便有122人从其中迁出。最大的城市，衰退最为厉害，比如纽约、波士顿、克利夫兰、费

城这些地方。

这种人口衰退可以部分地解释为大都会扩展到了原来不是城市的乡下，因此美国的人口统计中遗漏了城市增长的一些部分。但这尚不能充分解释这一趋势，看来其中包括更多因素的复合作用：一些工业迁入了乡村；高速公路多了起来，“通勤族”（commuter）赶远路更方便了；有些人靠固定收入过日子（比如老人），没必要靠近城市以方便工作。

对搬出大都会区域的人们进行的调查表明，他们搬动的原因包括追求更好的学校、更好的消遣娱乐、更好的房子、更大的院子、更安全的街道。这些人，通常都很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有个小家庭，工作也不错，都不大考虑就业机会、公共交通和购物是否方便。从大城市地区迁出的人中，白人是有色人种的两倍，但少数民族中的中产阶级离开城市的比率也越来越高（加佩特和奈特，1982b）。

迁出大都会的运动使得人们一时间竟谈起了“乡村复兴”的话题（莫里斯和惠勒，1976）。然而到了80年代，外移的步伐慢了下来，大都会的发展又超过了非城市地区。未来会怎样尚难下定论，但美国人更倾向于住在人口较少的地方而不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只要经济许可，美国人的生活很可能还会进一步去中心化（赫伯斯，1986；菲根和帕克，1990）。



城市排名

让你的心儿漫游片刻，如果让你自由选择，你愿在何处生活？旧金山？西雅图？波士顿？纽约？或许，可能是东京或伦敦？更为重要的是，你将用什么标准来指导你的决定？

如果将在同一个城市中的移居计算在内，许多人在一生中至少要变更十一次地址（博耶和萨瓦诺，1989）。可特别是到了现代，人们贯穿全国的大搬迁越来越常见。很多时候，搬迁的动机是出于经济目的：一些行情看涨的地区就业机会提高了，或是公司将其雇员调往其他州的分支机构。然而，人们搬迁常常是因为过腻了简单而平静的生活，于是向往更为刺激、节奏更快的生活。或是相反，想由一种快节奏生活转向一种更平静的生活。

社会学研究可以帮助人们选择更好的生活地点。几十年来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访问调查，以了解人们对他们所生活的地方的体验、态度和情感，这些观察现已编辑成很多关于世界各地城市的“生活指南”。

当你开始考察一个新城市时，你首先得明白你优先考虑的是什么。最近有两个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包括72个问题的“偏好清单”，以帮助人们澄清其偏好与优先考虑的事物（博耶和萨瓦诺，1989）。首先，到一个新地方你想寻找的是什么？宜人的天气？近便的住房？较慢的节奏？潜在的高收入？干什么样的工作你最合适？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犯罪率或者房价？气候是否是你选择的一个因素呢？是否对大气污染水平或交通量极为关心？《城市排名年鉴》（1989）提供了全美各城市关于所有这些因素的详细信息。

如果你首先考虑的是钱，那么当然，你感兴趣的是，在你打算迁入的城市里就业机会如何。一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总体上最能发现经济潜能的城市是：奥兰多、

拉斯维加斯、西棕榈滩、奥斯汀、华盛顿和图森。当然，某些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其产业上更为专门化。亚特兰大是有名的“发家的好地方”；拉雷多被称为“未来之城”；迈阿密以室内设计中心而闻名。波士顿既有优越的生活质量，又有充裕的商业机会。纽约城也是无与伦比的，在这里人们可以从底层起家，经过奋斗而直达顶层（马林，1988）。

对于有着某种种族或民族背景的人来说，一些城市可能更具经济潜能。例如，对非裔美国黑人来说，他们可以在亚特兰大、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找到他们最好的工作机会。拉美人则会发现，洛杉矶、圣安东尼奥、迈阿密和纽约对他们“恩赐”尤多。亚裔美国人在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和西雅图最有机会。妇女要想成功，最好去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或华盛顿（马林，1988）。

对于某一特定地区，要确定其总体生活质量，你可能会考虑以下因素：气候、房价、健康设施、大学的质量与花费、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数量、失业津贴。你或许会感兴趣，告诉你吧，美国大陆上最冷的城市是北达科他州的法戈；最热的城市是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海拔最高的城市是新墨西哥州的圣菲；最低的城市是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另外，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实：气候最好的城市中有23个在西海岸。在旧金山，人们上下班一个来回平均得花55分钟。华盛顿的人们所受教育最高。纽约城的公共交通系统最棒。

根据九项“适住性”因素——生活费用、工作机会、犯罪率、健康设置和环境、教育、交通、艺术、娱乐、气候——《城市排名年鉴》的作者排出了美国最适合于生活的一些城市：西雅图、旧金山、匹兹堡、华盛顿、圣迭戈、波士顿、纽约、阿纳海姆—圣安娜、路易斯维尔和纽约的拿骚—萨福克郡。被列入最难让人满意的“黑名单”中的有：德克萨斯的拉雷多和阿肯色州的派因布拉夫（Pine Bluff）。但请记住，这些排名也有些主观性。《城市排名年鉴》有助于印证一下你对某一城市的预感，但千万别把它的结论当作绝对真理。

如果你的视野超出了美国国界，你就得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机会在哪里。伦敦、东京、巴黎、海牙、大阪、汉堡是许多大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东京、伦敦、巴黎、大阪、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都是有名的金融中心。每小时收入最高的是苏黎士、卡尔加里、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而按人均来计算，应该是卡尔加里人和埃德蒙顿人的收入最高（马林、内斯和柯林斯，1986）。

就像美国一样，世界各地城市的住房条件也不同。在汉城、曼谷、墨西哥城，住房最拥挤，房子最贵的是吉达（沙特）、香港和东京。巴黎人口比孟买还要密集。气候也各有千秋：孟买和马尼拉的热是出了名的，传奇性的“湿城”（Wet city）伦敦，其实年降雨量还不到休斯顿的一半。犯罪率虽各有高低，但全世界很少有城市的暴力犯罪率赶得上美国的那些大城市（马林、内斯和柯林斯，1986）。但对那些想逃离美国的高犯罪率的人来说，搬到法国乡下或非洲的热带岛屿上去居住，或许只能是医生的主意罢了。

中心城市士绅化

70年代，在许多人离开大都会的同时，分析家们注意到，中产阶级选择留在中心城市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那些单身人士、无子女夫妇和四海为家者（泰姆士，1988；巴尔达萨里，1986）。结果，在那些被认为是最为

刺激、最吸引人的城市里，比如，纽约、费城、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以前那些不起眼的街区被士绅化（gentrification）了。换句话说，街区中穷人的位置被专业人士取而代之了（拉斯卡 and 斯佩恩，1980；杰勒德，1984）。

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是郊区房价的昂贵，以及小规模家庭数目增多（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结婚和育子）。士绅化不是郊区家庭重返城区。“绅士”（一个英国术语，原指富豪地主）似乎是那些在郊区长大成人的人，他们成年后进了城，至今尚未决定离开。在某些地方，这一趋势造成了中心城市的“复兴”。许多人推测，士绅化有可能缓减城市经济的长期衰退。

士绅化通常经过三个阶段。首先，少数“开拓者”家庭迁入了一个颓败废弃的区域，购买和翻新现存的建筑。一两年后，其他人也跟来了，这里既住得起房子，又有投资潜力。房租也上去了，那些付不起新的房钱的穷人被迫逐渐离开（佐金，1987）。最后，发展商和投机商也赶来了，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复重建。“城市发展行动拨款”等联邦津贴吸引着发展商，地方政府负责广告宣传，在开发地区附近提供支持设施——商店、停车场、办公楼、公园等，以此鼓励开发商（菲根和帕克，1990）。近年来，重修的建筑物纷纷转变成公寓大楼，住户们买下而不是租下他们的单元，由此，开发商有利可图，可是住户要掏的钱可就增多了。在费城，一个月租金 560 美元的单元，转变成公寓套间后，抵押和维护就得每月花去 1 200 美元。许多人仅仅因为付不起套间的维护费，等他们的房子改造以后便被迫搬离。

一位国家住房顾问估计，士绅化大约每年更换了 100 000 人（菲根和帕克，1990）但是，使城市贫民们难于找到住得起的房子的因素还有另外一些，士绅化只是其一。学者们还确定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另外两个趋势（格里尔，1980），一个是“中止投资”——因为不再能带来利润，一些房子被房主遗弃，长年失修，不能再住人了。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那些被烧掉的房子，成了城市衰落的一个全国性象征。第二个因素是因为中止投资减少了廉价房屋的供给，人们便争相住进那些保存完好的房子，好房子的价格继续上涨，常常超出了穷人们的支付能力。

3

城市生态学

城市生态学家（urban ecologist）指那些对城市社区的社会空间组织有着特别兴趣的社会学家。经典城市生态学家确认了一些促成城市变迁的过程，并以此解释特定类型的城市居民及其在特定地区和相邻地区的活动的分布（麦肯齐，1926）。

城市生态过程

生态隔离（Ecological Segregation）。在土地使用、服务或人口方面，一个城市的不同地区逐渐专门化的过程称之为“生态隔离”，其中最明显的形式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一个城市里某一特定民族的人集中居住的区域）。但是还有其他很多形式的隔离。无子女夫妇和单身者通常住在那种以出租单元房为特点的地区。公共住房计划按收入把人们隔离开来。芝加哥的

老镇 (old Town)、旧金山的卡斯特村 (Castro Street) 和纽约的格林尼治村都是按生活方式将人们分隔开的地区的典型；它们吸引着那些选择非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人们。纽约的休南区，许多艺术家在此安家，这是以职业为基础的隔离。

商业、政府以及其他的设施也倾向于云集在城市中的一些特定区域。例如，纽约有服装区，洛杉矶有电视制片区，一些郊区都有“工业园区”。城市生态学家们也注意到，相关的服务业通常互相靠近。法院毗邻监狱，小零售店傍依大百货商场；类似地，剧院和饭馆云集于娱乐区。诸如此类的被隔离开来的邻里关系，其出现并非人为的精心策划，故称“自然区”。

“入侵和演替” (Invasion and Succession)。入侵指一个社会群体或一种土地使用方式进入了目前为其他人或别的土地使用方式所占据的区域。生态学的“演替”，是指一个社会群体或一种土地使用方式在某一地区取代其竞争对手而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些概念直接由生物生态学中借用而来 (施魏连恩, 1983)

克利夫兰市中心霍夫区 (Hough) 的历史，清楚地演示入侵和演替这两个概念。从前，印第安人在此狩猎，到了殖民地时期，这里成了农场。随着城市的发展，农田让位于房舍：开始还只有一些小房子稀疏散布，然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房子大了也更密集了。最后，该地紧靠中心商业区的特点吸引了许多富人在此建起豪宅。作为克利夫兰市多年的高地位阶层区，此地却又开始中落。富人走了，穷人接踵而来，因为霍夫区那些阔大的老房子收的租金还算便宜。人们慢慢地把那些庞然大物分隔成了多家住宅，有时甚至支解成许多的单间，用来出租。终于，这一地区衰退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成了人们谴责的对象，窝藏着吸毒者、流浪汉和那些最贫穷的人。

当房价变得非常便宜时，就被房地产开发商抢购了过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精心制造出一种恐慌气氛。仍住在那里的白人民居，以低廉无比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发展商，这些发展商赚一笔后，再把房子卖给了有收入的黑人。那些有房子的黑人却发现银行并不愿借钱给他们修葺重建 (这是一种叫“红线拒贷” (redlining) 的通用然而违法的政策)。看来，这片街区的沉沦几乎是无法挽回了。

城市空间结构

隔离、入侵和演替这些生态过程常常导致城市里出现清晰可辨的自然图案。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之间，许多城市生态学家都试图建构这些图案的模型。

20 年代，厄内斯特·伯吉斯 (Ernest Burgess) 在其芝加哥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最为有名的“同心圈模型”。伯吉斯的“同心圈模型” (concentric zone model) 把城市展示为以中央商业区为中心的一系列的环圈，从核心出发往外推，包括轻工业区，以下层阶级居民为主的过渡地带，以及中产阶级生活的郊区等一些环状地带，靠近中心的住宅区有很多新来者和单身者，犯罪率高，社会问题多。外环地带家庭更多。从中心城市往外移，意味着向上的社会流动。

批评者指出,同心圈模型与芝加哥这一原型联系太紧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普遍性。为回应这些批评,后来的城市生态学家们逐渐提出了一系列更概括、更普遍的模型(霍伊特,1939;哈里斯和于尔曼,1945),但即使是这些新版的模型,也还是被证明受某一些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定城市的束缚。

现代城市生态学家不再去建构城市空间结构的什么固定模型,而是另有打算,寻求理解在一定时段上决定城市空间结构形式的普遍原则。一种叫做“社会区域分析”(social area analysis)的定量技术对此类探索颇为有用,这种方法是谢维基(Eshrer Shevsky)和贝尔(Wendell Bell)在50年代提出来的(谢维基和贝尔,1955)。这种技术用三个指标来描述社会群体在城市的空间分布,这三个指标是:阶级、生命历程阶段(Stage in the life Course)和种族。数据来自人口统计。把这种方法运用于不同的城市,都能有效地解释人们聚居的方式。

当代城市生态学

如同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城市生态学家近期的工作更多地使用计算机来建立和检验更精致的模型。这些新模型更广泛地引进了社会和文化因素,以更精确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今天大多数的城市生态学家已把他们关注的焦点由中心城市转移到整个大城市区域(贝里和卡萨达,1977;霍利,1981;波克钦,1987;格拉斯,1989)。他们对大城市伸缩过程中产生的交通、通讯和社区权力的种种变化有着特殊的兴趣。

城市生活和文化

除了城市人口的迁移和城市生态学外,城市社会学家还对很多别的东西感兴趣。他们很关心由城市化促成的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变迁,也很留意生活方式如何因社区类型不同而不同。

1

社区生活的变迁

在过去200年里,美国社区生活经历了重大变迁。小城镇曾是美国传统社会中如此重要的部分,而今都已成往事(沃伦,1972;莱昂,1987)(参见图20—1)。因为这一转型如此重要,尽管在本书中他处已多次讨论,但也有必要在这里作一概括。

第一,交往活动和人际关系日益支离破碎。人们可能在某处工作,又在他处消遣闲暇,再在另外的地方吃饭睡觉。每一种活动都常常牵涉到一组互相分离,互不相干的组织、角色和人群。

第二,社区组织和设置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科层化。同时,这些组织和设置多是面向全国,有效摆脱了当地社区的控制。昔日街角的小杂货铺,

如今已被属于全国性公司或跨国公司的超市取代了。

第三，以前由家庭发挥的功能，或由志愿者在家庭之外发挥的功能，现在逐渐由商业组织或政府部门接替过去了。家庭的许多娱乐活动，现在都在商业机构中进行；学校执行了主要的教育功能；需要经济帮助的人都求助于公共福利机构。在饭店里进餐也越来越成为“家常便饭”。

第四，大大小小的社区联系越来越紧密。城镇和城市正如家庭一样，不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接管了地方政府的许多职能。结果，地方社区受制于越来越强大的来自于联邦和州的控制力。一个社区可能会被命令去铺设更现代的排污系统，修改学校的课程，或用公共汽车接送远道的学生。

第五，社区之间的文化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在当今美国，典型的来自城市的看法，特别是来自纽约和好莱坞的看法，对小城镇和乡村社会的文化越来越起着一种主导作用。大众媒介是城市文化的载体。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定期阅读全国性的新闻杂志，收看有线电视节目，在电影院里度过星期六晚上。这些传媒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华盛顿之类的城市生产，并把那些典型的属于城市生活方式的看法和价值观念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传达给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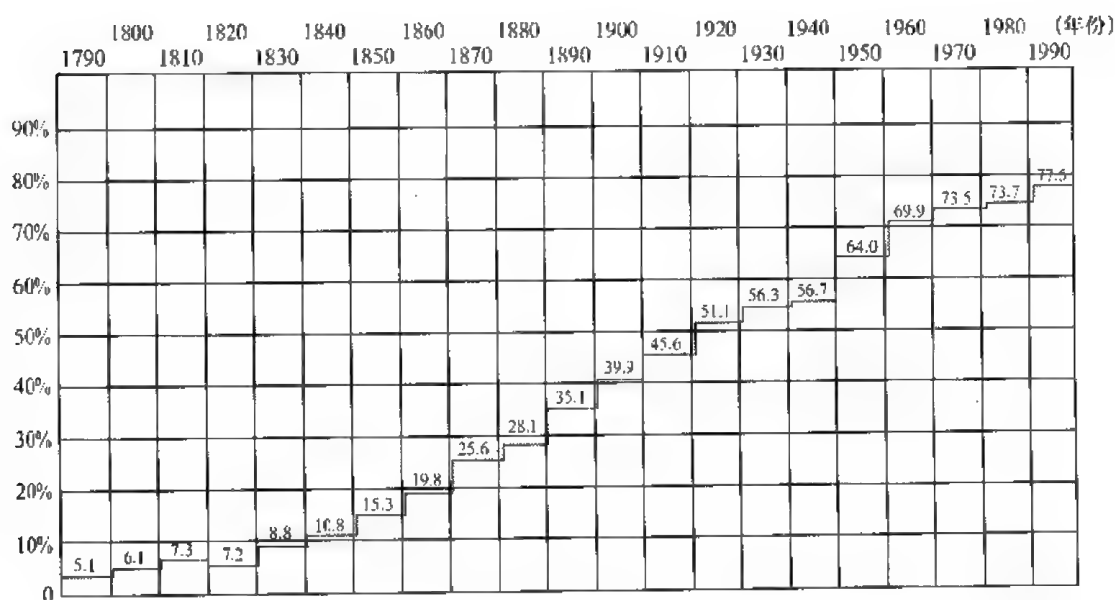


图 20—1 美国的城市化 (美国城市人口百分比: 1790—1990)

资料来源: 美国历史统计和美国人口统计局, 1984, 1989, 1991。

每过 10 年，美国城市化便更进一步。然而图上的资料可能会误导读者。因为这些数字既包括生活在郊区的人，也包括生活在中心城市的人，而且在小至 5 000 人的小镇和大至数百万人大城市之间也未加区别。

确切地说,城市生活方式(Urbanism)是什么?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一直对“城市生活方式”(即城市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以及城市生活方式与小城镇及乡村的生活方式有何差异这些问题感兴趣。第一位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社会学家是费迪南德·滕尼斯,他的著作成为此后关于这一主题的大量研究的基础。在这一领域里,二三十年代的罗伯特·帕克,厄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和路易斯·威斯(Louis Wirth)等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做了很多经典性的工作。他们关于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著作在此领域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公社与社会(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滕尼斯(1855-1936)相信,社会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公社的社会关系以朋友、血缘等个人纽带为基础,与此相反,社会中的关系是正式的、契约性的、非人格化的、专门化的。

公社中的人际互动通常频繁而强烈。人们倾向于以家庭或社区为取向。然而,社会中的人际互动次数有限,常常是非人格化的。人们倾向于个人取向而非群体取向。一般说来,在乡村或农场生活中,大多数社区成员互相认识,互动频繁,是公社的典型。现代城市生活强调隐私和个人性,是社会的典型。

决定论视角

芝加哥学派深受滕尼斯著作的影响,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透视,在路易斯·威斯题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生活》(1938)这篇经典论文中,有最好的表达。威斯相信,城市的大规模、高密度、文化异质性这些特征共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城市生活文化”。这种观点被称为“决定论视角”(弗希尔,1975;戈特迪纳,1985),因为这种观点暗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城市的人口学特征最终决定了城市人的行为和态度。

在威斯看来,城市居民相互互动时,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角色扮演者,而非那种涉及完整个人的关系。社会控制的正式机制比非正式机制更重要。还有,血缘关系和家庭群体在城市中的重要性要比在小镇中差多了。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居民可能经历种种“失范”(anomie),即一种规范和价值观念冲突、衰弱、缺乏的社会状况。在失范状况下,人们不能就正当行为的通用标准达成共识。威斯对城市生活的总体印象就是一幅匿名大众的图景,他们与邻居们互不往来,只有为了使自已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时才与他人打交道。

面对不断增长的大城市问题,一些学者追随威斯的传统,继续探讨城市生活的独特特征。例如,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0)就把威斯的视角与德国理论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所作的类似观察结合起来,得出结论说城市居民面临“心理超负荷”(psychic overload)的问题,无力处理那么多接踵而来的感觉信息和认知信息。

米尔格拉姆(Milgram)确认了城市居民通常用以适应心理超载的几种方式。因为城市居民常常每天要遇见数百人,所以他们与大多数的人仅保持表

层的、短期的关系，以保存自己的心理能量。对那种不相下的关系完全回避。这就是当人们看见醉汉倒在城市人行道上时为什么会绕道而行，而不是停下脚步伸出援助之手。

根据决定论的观点，这种适应方式减弱了城市居民与他人的道德卷入和社会卷入（Moral and Social involvement）。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64年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纽约市她的公寓楼前被杀害。当时有八个邻居听到了她的呼叫，但都无动于衷，甚至没有一个人给警察局打电话。米尔格朗认为，这种冷漠部分地是因为当时受害者是向普通大众而不是向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求助。他认为，城市居民只有当与他人有特殊的个人关系时，才会卷入到他人事务中去。

近来在德国进行的一项调查似乎支持了米尔格朗的理论。当问到他们是否会对来自别的单元房的尖叫探究原委时，只有36%的回答者作出了肯定的答复（黑斯廷斯等，1989）。公共场合中的行为，发生在互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它需要一种特殊的礼节（即小心、非人格的、非侵入的），这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冷漠（弗希尔，1982）。

组合论视角（The Compositional Perspective）

不同意威斯对城市生活研究的观点的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种替代的解释，叫做“组合论”（弗希尔，1984）。这种观点把城市生活的特殊性质解释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特性的结果。接受组合论的人，把城市看作是“拼接的社会世界”（弗希尔，1984），它由不同的群体组成，每一群体都共享诸如亲属关系、民族起源或社会阶级之类的因素。与威斯及其追随者相反，这些社会学家否认城市生活方式必然削弱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例如，当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在大城市定居后，他们相互之间通常发展和保持着很强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有助于他们缓解城市生活的压力。

实际上，社会学家早已发现，城市里的社会团结和社区结构要比威斯的分析所预言的要多。例如，有一项抽样调查研究了洛杉矶的两个街区，发现半数居民每周至少要拜访一次亲戚（格里尔，1956）。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1962a）的《城市村民》（The Urban Villagers）（一项关于来自乡村的意大利人如何适应波士顿生活的研究）表明，在新环境中，大多数人维持着许多原有的社会结构。这种做法使得移民们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且保护了他们与其他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联系。其他一些下层劳动阶级的街区里，也存在着强烈的社区感情（萨特尔斯，1968；亨特，1974）。

亚文化视角（The Subcultural Perspective）

克劳德·弗希尔（Claude Fischer，1984）把决定论和组合论的一些特征结合起来，提出了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研究的第三种视角，即“亚文化视角”。弗希尔同意威斯的看法，即城市生活的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规模、密度、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的混合）确实影响了社会群体的结构和力量。但是，与威斯相反而更接近于组合论观点的是，他认为城市生活并没有损害亚群体的团结，而是相反，强化了这种团结并提高其重要性。事实上，城市生活确实创

造了在别的地方不可能存在的亚文化，因为它使得具有共同背景和兴趣的人走到一起来了。例如，在大城市里就有可能成立一个左撇子大号队——显然，这要比在小镇上更有可能。不幸的是，大城市也同样可能形成左撇子毒贩和左撇子偷车贼的群体。

3

城市生活方式 的经验研究

城市生活和非城市生活的比较

城市和非城市地区的生活方式到底有多大区别？那种威斯式的思考能否得到证明？这些年做了大量关于城市生活和非城市生活的比较研究，但总的来说，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有两个得到较好证明的经验概括是，城市生活与高犯罪率（特别是财产罪）相联系，同时也和家庭制度的衰落相关（弗希尔，1984；法利，1987）。然而，这一模式的原因还是不清楚。也有经验证据表明，城市社会关系更为“私人化”（Privatized），邻里关系不再那么频繁积极，人们对待陌生人不再那么乐于帮助和周详体谅。然而显而易见，城市居民的朋友和熟人至少不会比非城市居民少（凯勒，1968；科特，1980；弗希尔，1982；希尔，1987）。这样看来，也许可以这样说，城市地区和非城市地区居民之间的真正区别是在公共生活中，而非私人生活中（弗希尔，1981）。

关于城市的和非城市的心理紧张和精神健康的比较研究也很少有可靠的结论（弗希尔，1984）。在美国，生活在人口越密集的地区，人们对其环境越不满意，但是大多数的心理紧张和精神健康指标在城市情境和非城市情境中并未表现出很大差异。

在发达社会里，城市生活方式十分普通，城市——非城市的比较研究可能已没有太大意义。就像我们前面曾提到过的一样，由于当前交通和通讯的便易，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都变成了城市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城市生活和非城市生活之间发现的差别不再激动人心。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在第五章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社会网络分析，现在已有一大批城市社会学家以此来研究社会生活。一个社会网络包括一个人与他人形成的所有关系，既包括正式的，也包括非正式的。我们可以运用网络分析来重新分析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比如威斯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的观点。

所谓的“社区问题”，或者说城市化与城市生活方式是如何影响当地社区团结的问题，作为威斯观点的一个方面，已由网络分析家们做了有意义的考察（韦尔曼，1979；西韦尔曼，1986）。网络分析家们指出，在很多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都混淆了“社区”和“街区”这两个概念（韦尔曼和莱顿，1979）。换句话说，社会学家们常常设想，为了形成一个有内聚力的社区，人们必须住得很靠近才行。

但如果我们以社会网络的方式来看社区，我们就没必要将街区当作社区的基础了。这就是说，即使其成员散布全城，一群群人也可能参与到有着强烈内聚力的网络中去。重要的是成员间人际联结（interpersonal ties）的强度

和数量。采取这一视角,网络分析家们认为,地方城市社区很好地适应了现代生活的地理流动(韦尔曼,1988)。

4

郊区生活

一个学者指出如果19世纪可以称为“大城市的时代”(age of great cities),那么20世纪下半叶也可以称为“大郊区时代”(age of great suburbs)(弗希尔,1982)。1970年,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郊区人口超过城市居民的情况。在1950年至1980年之间,美国25个大城市中有18个出现了人口净流出,而与此同时,郊区居民则有6000多万。到1990年时,46%的美国人生活在郊区,40%生活在中心城市,14%生活在非城市地区。

关于美国郊区的文化,人们已经写得够多了,而且常常是拿它与大城市生活作比较。五六十年代,郊区常常被描绘为顺从者的社区,由一些追求地位的人组成。郊区居民的特征是神经过敏,在性问题上很宽容,喜酗酒。这些品质是由郊区独特的特性产生的,特别是其低密度、文化上的相似性及远离都市的服务与工作(唐纳森,1969;弗希曼,1987)。

但一项对移居郊区的劳动阶级家庭的研究得出了新结论,认为这种关于郊区文化的看法全然是个神话(B.伯杰,1968;非根和帕克,1990)。甘斯(1962a,1962b)坚决认为,郊区文化主要是那些最有可能生活在郊区的人的社会阶级及生命过程身份(life course status)的产物(组合论视角),而并非直接由与其他社区生活方式相对的郊区生活方式所产生。典型的郊区居民都已结过婚,有了子女,在家里生活,所以郊区文化自然以家庭为中心。郊区人可能看重在经济上出人头地,但这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特性,而不在乎他们生活在何处。甘斯注意到移居郊区常常是社会地位上升过程的一部分。因此,郊区人比生活在中心城市的人显出更多的向上流动便不足为奇了。

然而还是有人认为,郊区生活本身可能确实有一些消极影响,尽管不是以前的观察者所注意到的那些消极影响。一项研究对比了美国郊区与有计划发展的、中等人口密度的瑞典郊区,发现美国郊区生活对青少年和职业妇女来说有一些不利后果。青少年苦于缺乏交通工具和就业机会(波普诺,1977)。

最近几十年就业机会的郊区化(因为越来越多的生意搬到了郊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消极性(杰克逊,1985)。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高科技组织和公司总部在郊区安家,使得一些市郊街区变成了自足的经济实体。随着人们像从郊区跑到城市去上班一样,开始从一个郊区跑到另一个郊区去上班,通勤族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如今在华盛顿外围的亚历山大—阿灵顿—费尔发克斯(Alexandria—Arlington—Fairfax)郊区,已有了100万人,这里不仅为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居民提供了服务设施,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没必要老往华盛顿跑了(弗希尔,1987)。

随着郊区逐渐城市化,郊区居民也已遇上了那些大城市过去经历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拥挤、污染、交通阻塞、生活节奏加快,以及民族、种族、阶级关系的紧张(巴尔达萨里,1986)。

美国大都市问题和城市危机

城市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中心城市问题和大都市问题。“城市危机”(Urban crisis)这一词组通常仅用来指第一类。但两个问题紧密相连，因此，要解决中心城市危机可能还得涉及整个大城市区域的改变。

1

老中心城市的问题

近年来，波士顿、克利夫兰、底特律和纽约等美国老城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引起广泛的关注。从性质来说，其中很多问题是经济问题和物质问题。这些城市已被卷入强有力的漩涡之中，难以逃脱。例如，随着低收入人口涌入这些城市，对学校、医院之类的公共设施的需求自然增加，然而启动这些设施的费用却在飞速增长。因为地方税收基础的衰竭，用以满足这些需求的基金事实上正在减少。

解释城市危机，最好从理解中产阶级迁往郊区对城市产生的冲击开始。那些住在郊区而在城市工作的人根本不交城市财产税，通常也不交城市所得税。有时他们不向城市交税，却大量使用公共交通、街道和人行道、警察和消防，还有图书馆等城市设施，这都增加了城市的开支。然而如果市政当局提高其税率，更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就会离开城市。工商业也可能搬出，城市财政问题就会更为突出。因此，城市不得不削减开支，降低服务，而不是提高税收。过时的交通系统无法现代化，有些地方无法提供足够的警力保护，学校也掏不起钱聘请最称职的老师。

降低公共服务质量与提高税收的影响是一样的：居民们要么适应，要么离开，而更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已选择了离开。中产阶级大量流出城市，从5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结果，城市居民和郊区居民的收入差距稳步扩大。

留在城市里的人，主要是富人和最穷的贫民。富翁们留在城市里，可以享用城市文化方面的好处，也有足够的钱送他们的子女上私立学校，也不用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乘出租车就行了，要保护他们的财产，只须雇佣保安人员。穷人们留下来，因为没钱离开。迁往郊区得准备足够的钱，才能为房屋支付分期付款的第一期付款；也得有良好的信誉评分，才能获得抵押贷款。郊区生活还得有辆车。仅仅是搬家费一项，就足以使许多穷人望而却步。

中产阶级家庭离开城市，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乡村或国外的低收入者。这些新居民比中产阶级更需要城市服务设施，但他们掏不起这份钱。看来，城市似乎陷入了一个无底的漩涡，开支和需求不断提高，财源却日益枯竭。

无家可归者 (The Homeless)

许多集中发生在老中心城市中的社会问题，比如犯罪、贫穷、社会紧张等，在前面的章节已做过讨论。当今美国城市面临的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无家可归者。自大萧条以来，任何时候都不像现在一样有那么多人想找个临

时住所安身。无家可归这种现象不只美国有；事实上，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的城市和其他社区中，都存在这一问题。

没有人真正知道，当今美国到底有多少无家可归者。对这一高度流动的人口做一准确的计算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好取个近似值。1984年，在里根任职期间，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一直认为美国无家可归者在25万至30万之间。一贯为此呼吁的人则坚称美国有200万到300万人无家可归（雷德本和巴斯，1986）。真实值应当在这两个数据之间。

现在一般认为洛杉矶和纽约这两座城市无家可归者最多，保守估计，两地每天各有34 000人和30 000人。然而，无家可归者无论如何也不只局限于美国大城市那些破落的地区；在市郊社区的街道上，从纽约的东汉普顿，到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都有无家可归者。

谁是无家可归者？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凡是没有固定住所的人都可归入此类。然而，这一定义不能充分反映与无家可归问题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剥夺的程度。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提出了一个替代的定义，认为无家可归者是那些“没有适当住所，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社区联系的人”（宾厄姆、格林和怀特，1987）。无家可归者是一些孤立无援的人，他们职业纪录很差，难于与人发展关系，遭遇过情感问题和各式各样的家庭问题（巴斯尼克、吕班和劳威特，1986）。

在各种种族、各种年龄和各种教育水平的人中，都有无家可归者。无家可归者的平均年龄估计是33到36岁；而且男性比女性多，其比例大约是4比1。据一项研究报导，45%的无家可归者有高中文凭，其中又至少有一半人上过大学（雷德本和巴斯，1986）。现在无家可归者中黑人和拉美裔人比白人多，虽然其百分比在每个城市都不同。

一项更深入的观察发现无家可归者包括许多不同种类的人。其中有精神不健全的人（他们从医院里放了出来，但不能照顾自己）；离家出走者；吸毒者；还有一些家庭，主要是未婚或已离异的妇女带着她们的子女。很多无家可归者是一些“新穷人”（New poor），他们因个人危机或经济上的危机而失去了家（摩蒙尼，1989）。

许多研究人员已经把造成无家可归或与无家可归有关的一些主要因素分离了出来。在一项研究中，48%的回答者报告遇上了经济问题（失业、福利削减、被驱逐），26%的人列举了个人危机（personal crisis），7.3%的人指出吸毒是造成他们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雷德本和巴斯，1986）。另一项研究又加进了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人际关系差、情感问题、家庭暴力、刚从监狱获释（巴斯尼克、吕班和劳威特，1986）。还有一项研究也发现，造成无家可归的最强有力的肇因是缺乏足够的低收入者住房和精神康复护理手段（埃利奥特和克里沃，1991）。许多批评者认为无家可归者是变幻不定的政府政策的牺牲品；他们特别谴责联邦政府对低收入者的住房补贴、失业补助和社会保障福利的削减（贝尔彻和桑热，1987）。

地方、州和联邦政府为无家可归者所做的准备还远远不够。为了解决无家可归这一问题，下面这一系列的社会服务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咨询、过渡

性住房、物质使用计划、安排工作、安全管理、职业培训以及流民安置（雷德本和巴斯，1986）。

2

大都会的离析和蔓延

大城市区域的政府机构通常分裂成许多相互竞争、相互重叠的分支机构。例如，在芝加哥大城市区域，就有1 000个以上的政府单位；纽约甚至超过了1 400个。这种割裂分散的局面使大城市区域很难作为一个整体来计划协调。

类似地，中心城市及其郊区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也使得资源非常难以公平分派。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一样，那些晚上返回郊区的工人和店主们，每天都使用城市设施，增加了城市的开支。然而，在多数大城市区域，这些通勤族很少负担这类费用。因此中心城市不得不牺牲教育等其他职能，把钱花在警察、卫生等基础服务上。这样，与一般的郊区相比，中心城市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费用要更少，而毫无疑问，他们更需要教育。简单地说，城市有需求，郊区有资源。

大城市工作职位的分布是需求和资源极不协调的又一例子。许多工作都最适合于中心城市的劳动力（那些报酬较好，而又不需要很多正规教育的工作，特别是那些制造业工作），但这些工人很难赶去郊区上班。同时，很多最好由郊区居民来从事的工作，却仍旧留在中心城市。

美国大城市的无计划发展，造成了所谓的“城市蔓延”。美国的城市蔓延程度比任何其他工业化社会都要高，这是因为受到了高速公路补贴和住房抵押保险等联邦计划的推动。尽管很多美国人喜欢无控制的发展，但早些的一项研究显示，无控制的城市发展会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后果。1974年，“全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城市的蔓延看来降低了政府有效运转的能力，而且城市与郊区之间以及郊区与郊区之间的费用分担还应该更加公正。报告还提到，那些补贴在实践中鼓励了单门独户的郊区居住方式，看来有足够的理由考虑终止或修改这些补贴了。

近年来，又出现了关于郊区蔓延的新观点。

一些城市研究人员和政治分析家认为，那种把郊区蔓延看作问题的观点尚有待于商榷。例如，一个近期的报告认为，从技术上来说，老城区的城市布局已经过时，新的多中心的（延展的）布局结构更适合于与现代传播和自动调控交通系统相联系的现代技术。该报告还坚持认为，低密度的郊区住宅延展与高密度建筑相比，仅增加3%的能源消耗。根据这份报告，郊区人较少接触污染，因为郊区人口更为分散，这样，与那些更集中的居住方式相比较，每人接触的污染就更少。郊区化还通过一个垂滴过程，为中心城市的贫民带来了更好的住房条件。（菲根和帕克，1990）

然而，很多社会学家依然相信，城市蔓延必须小心控管。城市规划是抑制（或至少是控制）蔓延的一种办法。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晚实行城市规划的国家之一。“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就是有目的地、而且明确地提出城市社区布局结构的未来目标的过程。政府机构为社区发展确立目标,并有一个为促成目标实现而准备的计划。只有那些与目标一致的计划(有时以“总体规划”的形式勾勒出来),才能获得批准,付诸实施(拜罗赫,1988)。

英国人曾是最有创意的城市规划者,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该领域的发展。1945年,伦敦的城市规划人员决定通过创建一个永久绿化带,并在伦敦城周围按计划建设一圈小镇,以此来限制城市的发展。这些新兴小镇如规划人员所期望的那样发展了起来。不久以后,瑞典人和日本人也采纳了这种英国模式的一些做法(萨克利夫,1987)。

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政府干预,致使城市规划未能在美国站稳脚跟。美国的城市规划人员主要在州和地方的层次上提提建议,辅助交通、住房、人文服务(human services)、经济发展和环境等部门。城市规划人员的典型工作必须分析与以下因素有关的资料:需求、土地使用、城市居民生活模式;同时确定各项议案和改良措施的成本及其带来的好处。大多数的城市规划人员认为他们的目标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实现城市空间利用的最大化(伯恩斯坦和弗里德曼,1985)。

许多美国社区都起草了总体规划,但这些计划通常并没有在任何重要的意义上得以贯彻实施(伯切尔和斯登列伯,1978)。然而,大多数美国社区确实使用了一种重要的城市规划手段——“划区”(zoning)。划区法赋予地方政府以控制土地使用方式的权力,并成功地将某些土地使用方式(例如家庭停车泊位、低成本住房和有毒害工业)排除在很多社区之外。

政府官员、工商业巨头和房地产发展商都很关心保持城市中心区的吸引力、生命力和经济活力,因为城市的商业核心通常都在这些地区。它们常常发动“城市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拆除那些破旧建筑,在此基础上建设全新的街区。虽然城市再开发项目给某些内城地区带了新的生命(比如费城的“国会山”),但总体上来说,这些项目还不是非常有效。不少批评者指出,城市再开发都常常是把低收入者赶出他们自己的家门,却没有让他们在别的地方得到像样的住房。甚至有人宣称,这种治病的办法比疾病本身还恶劣,城市再开发耗竭了城市的活力和多样性,也就是耗竭了城市的赖以活命的血液(伯恩斯坦和弗里德曼,1985)。近年来,很多城市再开发项目都被城市复兴(urban rehabilitation)所取代,这就是要保存已有地区,而不是铲平重建。

一些城市专家提出,在目前还未发展起来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城镇,并鼓励人们从城里迁到这些镇里去,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多城市问题。尽管新城镇可为富有创意的城市设计提供令人惊喜的机会,也能为充分消减城市蔓延展示可观前景;但真正要减少大量城市人口的话,要花的钱就太多了,现在根本弄不到这么多钱。伍德南兹,一个百万富翁住的开发社区,建在休斯顿外

面，原本想以此来表明建设新城镇可以解决城市问题，但是原来规划的很多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住房还是没有建起来，因为这样做无利可图（戈特迪纳，1985）。虽然这些新建起来的城镇很多都遇上了财政困难，但是近年来人们对私人在城镇建设方面的经营有了新的兴趣。

城市危机如此严重、如此复杂，以至于似乎任何单个的计划或是成套的方案都无济于事，看来只有将更多的收入再分配给城市和穷人，重新构建城市的发展，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长久的解决。那些推崇冲突论视角的社会学家们提出的正是这些措施。

冲突论者主张，消除美国社会中许多最基本的不平等现象，是改进我们的城市的惟一办法。这一学派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问题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上，有时称之为“新城市社会学”。冲突论者认为，想要在地方的层次上来消除城市危机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资本主义体系严重限制了任何地方性政治活动所能取得的成果（摩诺克，1979；卡斯泰尔，1977，1983）

一些冲突论取向的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危机的根源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经济资源比以前更为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一些跨国公司手里了（希尔，1978；桑德斯，1981）。这些公司在那些能使其投资得到最大回报的地方开设工厂。这常常意味着他们会抛弃那些座落在老城里的设施，而在成本更低的地方重起炉灶。这样，老城市残留下来的，是日渐萎缩的经济，以及越来越多的贫民和失业者（菲根和帕克，1990；史密斯和菲根，1987）。

很多冲突论者也分析了城市变迁过程中当地房地产发展商以及银行家所扮演的角色，得出结论说城市的兴衰主要是不公正的房地产投资模式的结果（菲根和帕克，1990）。这些理论家认为，州和地方政府被一些强有力的工商业和房地产巨头所控制，而这些巨头们根本不受公众监督。这些人基本上只对利润和保持城市的商业活力感兴趣——批评家们坚持认为，这些资本家的兴趣常常与内城贫民的基本需求相冲突，比如住房等（雷德本和巴斯，1986；帕特尔，1988）。

新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论者假定，我们每个人主要是作为某一社会阶级的成员而不是作为个人面对经济体系（Taret，1983）。工厂主们的利润主要不是来自其个人主动性，而是来自其对资本的所有权及其有产阶级的身份。工人们靠其低廉的薪水艰苦度日，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人格优点，而是因为社会是沿着阶级界限来组织的。

根据这种观点，城市问题与其说是社会制度未能正常运转，而勿宁说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实际上正想要以这种方式运行。只有当那些没钱的大多数人在政治上被分裂而不能行使其权力时，有产阶级才能保持其权力。例如，在印度，经济和社会上的弱势阶层被分裂成相互隔离的群体：1亿人属于“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其他5000万分属不同种姓。一些人相信，为了防止弱势群体获得权力，这种分离是被刻意支持的。

而且，有产阶级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也需要廉价劳动力。贫穷和种族主义等城市问题服务于有产阶级的利益，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使得工人们在政治上互相抵触。

5

美国城市的未来

美国那些老的中心城市希望何在？它们能否重新焕发活力？最近十多年的情况证明了中心城市商业利润的强劲复兴：在全国各城市的商业中心地区，新办公楼及旅馆的建立势如雨后春笋。这有助于为很多商业中心地区带来新的生命。但是这种活力主要是白天的现象；一到晚上，即便是举世瞩目的纽约、旧金山等地方，城市也是一片漆黑。如果城市要成为不只是下层阶级和被剥夺者居住的地方，那么大量中上阶级重返城市来生活就很有必要了。

与此相关的至少有一个积极趋势，即大量中产阶级年轻人现已在日趋衰落的内城地区买房，并重新加以修缮。因为他们一般没有孩子，不太关心安全和学校质量，而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使得很多家庭逃往郊区（奥卡尔维，1979；劳里，1980）。等到他们有了学龄期子女后，无论这些人是否呆在城市，总还是会有人留下来。

看到1992年春，罗德尼·金命案在洛杉矶南部中心区引起的破坏之后，公众注意力再次集中到这些问题上来了：内城贫民的不满和绝望下面隐藏着经济和社会原因，现在必须努力处理这些社会经济问题，必须救活老的中心城市。越来越多的人也注意到，复兴中心城市需要保护内城居民、工人和店主免受城市生活中极为常见的暴力侵犯。

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最可能的城市历程仍会是继续去中心化：向郊区，甚至向比郊区更远的地方发展。等到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到中年后，我们仍没有任何理由希望他们的做法能与其前面一代有何不同。大多数人还是执著于其美国梦：独立生存，郊区的独门独院，还有车库里的两辆汽车（斯登列伯和休斯，1986）。只要很多人还在追求着这个梦，美国的老城市就难有光明前景。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人类最早定居的社区非常小，基本上是通过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随着农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们除了生产食物外，便还可以干别的事了。一些早期的社区发展成了城市，其居民不必自己生产食物。出现了经济分工和一些新制度，具有乡村特征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模式也被更为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取代了。从第一个城市诞生起，便开始了“城市化”的过程：人们从乡村地区移进城市地区。

2. 前工业社会的城市人口相当密集，社会也相对多样化。但在很多方

面，它们更类似传统的农村村庄，而非今日的工业化城市。一小撮权贵把持政府，社会生活主要由世袭阶级和风俗习惯、而不是成文法典和警察力量来决定。

3. 18至19世纪，工业革命吸引了大量人口进入西欧城市。反过来，这些城市又扩大了由商人、专业人士及经理组成的中产阶级。1860年到1920年之间，美国城市化异常迅猛。到1920年时，大部分美国人都生活在城市里了。

4. 在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迅速涌入城市地区，其速度要比西方国家城市发展时期快得多，这造成了“过度城市化”的后果：移入城市的人口与城市所能提供的机会和服务相距悬殊。

5. 一群人定居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其生活围绕日常互动模式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一个“社区”。20世纪最为普遍的社区形式是“大城市区域”，包括一个或几个大城市，再加上其周围的郊区。美国大都会城市区中发展最快的部分是“郊区”，郊区是相对较小的社区，靠近并依靠城市。大都会城市区根据社会阶级和种族而高度分化。因为移往郊区的多是富人，郊区发展强化了中心城市居民和郊区居民之间的社会分裂，住在中心城市的主要是穷人、黑人、老人及没有结婚的人，而生活在郊区的多为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然而，最近20年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黑人中产阶级的郊区化。

6. 中心城市主要用于发展商业，特别是那些要求面对面互动的工业和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生活着不同种类的人群：（1）受过良好教育的四海为家者；（2）独身者和无子女者；（3）新移民；（4）穷人；（5）身陷城市者。城市贫民通常集中居住，生活在拥挤不堪的房屋里。

7. 大城市区域的持续扩展，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地区——“大都会带”。两个或多个大城市区域不断发展，直到相互重叠，形成城市集结，这就是大都会带。大都会带给城市和地区规划人员提出了重大难题，而这些问题需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努力对付。然而，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由于利益冲突势成水火，难以协调。70年代，一些大城市区域出现人口减少。同时，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选择留在或迁入老的中心城市，这一过程称为“士绅化”。士绅化使得中产阶级取代了部分穷人。

8. “城市生态学”研究城市社区的社会和空间组织。城市生态学家确定了人们及其活动在都市地区分布的几个过程。“生态隔离”指在土地使用、服务和人口方面，一个城市的不同地区日趋专门化的过程。还有另外两个生态学过程：“入侵”指某一社会群体或某种土地使用方式进入现在由他人或其他土地使用方式所占据的区域，“演替”指某一社会群体或土地使用方式在某一区域内取代其他竞争对手而占据统治地位。

9. 早期城市生态学家提出了关于城市和大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的几个不同的模型。根据同心圈模型，城市的中心是商业区，外面是一圈一圈的居民区，这些圈离市中心越远，其居民的社会地位就越高。有一种叫做社会区域分析的定量技术，依靠人口统计资料，也可用来做城市居住方式的分析。

有了计算机的帮助，现在城市生态学家发展出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致的城市过程模型。

10. 伴随城市化进程，社区生活常常发生广泛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些变迁包括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裂散，社区组织的扩大和科层化，家庭和志愿者的许多功能被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所取代，对州政府或联邦政府这样的地区性、全国性实体的依赖加强，城市文化控制了小镇和农村地区。

11. 芝加哥学派早期著作的主题，是城市生活方式的确切特性以及城市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这些工作是建立在滕尼斯的开拓性观察的基础上的。滕尼斯区分了社会的两种基本类型：在“社区”里，社会关系以个人联系、友谊以及亲属关系为基础；而在“社会”里，社会关系是正式的、契约的、非人格的、专门化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表明，城市生活的一个后果是人们与他人的情感卷入和社会卷入减少了。这种研究城市特性的方法被称为决定论视角。

组合论视角的提倡者把城市生活方式看作城市人口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的结果。他们不承认城市生活方式必然降低社会团结，相反，他们认为在城市情境下，人们仍然保持很强的社区感。亚文化视角的坚持者认为，城市生活和非城市生活的比较性经验研究发现，其间的主要差别存在于人们的公共生活中，而非私人生活中。社会网络分析提出，我们考虑城市的社区生活时要更多地按社会网络的方式，更少按街区的方式思考。

12. 郊区已由五六十年代典型的同质性社区发展为经济上相对独立、复杂、多样性的社区。现在人们迁往郊区，既是为了居住，也是为了就业。通勤族不但从郊区跑向城市，也由一个郊区跑向另一个郊区。现在，住在郊区的美国人要比住在中心城市的多。

13. 美国的中心城市问题与大城市区域的问题紧密相关。虽然中心城市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了，但用以满足这些需求的资源却因税源衰竭而减少了。现在城市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无家可归的问题。大城市区域政府的割裂、分散直接造成了中心城市和郊区之间的不平等的资源分割。

14. 近年来为了对付城市问题，人们采用了很多种方法，其中就包括“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指有目的地、而且明确地提出城市社区布局结构的未来目标的过程。但从长远来看，解决城市危机的惟一办法可能包括有利于贫民的收入再分配以及重新建构城市发展方式。冲突论者相信，消除美国社会内在的、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是改善城市的惟一办法。

15. 在不远的将来，城市发展最有可能的是继续去中心化，向郊区甚至比郊区更远的地方发展。

推荐阅读书目

1. 巴伯拉 (Ballis, Barbara.), 1990. 《城市文明中的文化传奇史：罗伯

特 E. 帕克论城市中的种族和民族关系》(*The Romance of Culture in a Urban Civilization; Robert E. Park on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Cities*. London: Routledge.) 关于这位早期城市社会学家著作的一个优秀导论。

2. 卡顿·卡罗尔 L. (Caton, Carol L.) 编, 1990. 《无家可归在美国》(*homeles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研究美国无家可归现象的根源及探索其解决办法。

3. 甘斯·赫伯斯 J. (Gans, Herbert J.), 1982. 《城市村民: 意大利裔美国人群体和阶级》(*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of Italy-Americans*. Updat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美国社会学的一个经典研究。考察了波士顿最北部居民的社区生活模式和他们对邻里关系因城市改造而遭到破坏的反应。

4. 戈特迪纳 (Gottdiener, Mark.), 1994. 《新城市社会学》(*The New Urban Soci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一本简洁全面的城市社会学著作。

5. 古格勒 (Gugler, Jose) 编, 1988. 《第三世界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of the Third w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对当前发生在亚非拉地区的城市革命的概述。

6. 芒福德·刘易斯 (Mumford, Lewis.), 1961. 《历史中的城市: 它的起源, 转型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关于西方城市的经典表述, 考虑了其形式和功能两方面的问题。

7. 威尔逊·J·威廉 (Wilson, J. William.), 1987. 《真正的弱势群体: 内城居民, 下层阶级和公共政策》(*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城市下层阶级的描述及关于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的讨论。

集合行为和社会运动

一个周六的深夜，三个年轻人进入了纽约市内一家非常有名的“新潮”音乐俱乐部，和着新潮乐队演奏的乐曲翩然而舞。其中的两个男子留着凯撒式的发型（一种剪得很短，头发垂至前额的发式）、连鬓胡，身着体恤，松垂的短裤掩至膝盖，脚上套着厚重的多克马顿靴。和他们一块儿来的女伴长发秀直，手上戴满了戒指和手镯，紧身衣外套着懒散宽松的连衣裙，脚上是厚重的长统靴。他们炫耀式地展现着肌肤上的各种文身以及穿刺于眉际、鼻孔、嘴唇及身体其他部位的饰物。穿过拥挤的人群，他们来到了舞池所在的俱乐部的前厅。五六十名新潮摇滚手已在这里狂跳乱舞，人群中不时玩着类似“叠罗汉”式的游戏。偶尔还有人跳到台上做出倒立之姿。自 90 年代以来在遍布全美的新潮俱乐部中，此类场景已是屡见不鲜。

1980 年夏末，来自制造业、矿山和造船厂的波兰工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为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待遇，波兰工人联合起来成立了“团结工会”来挑战当局。虽然当政者最终施以军事管制镇压了该运动，但“团结工会”仍被继续视为波兰民主运动的象征。今天，它已成为波兰新政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潮”摇滚的场面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这两个事件在许多方面是迥然不同的。然而，两者中却有使社会学家关注的共同之处：它们都超出了日常生活的制度框架。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考察非制度化的社会行为的主要形式，从时尚、歇斯底里、狂热等相对自发性行为（社会学家把它们称做集

合行为)到社会运动这样的更具目的性的行为。我们还将讨论大众传播和大众舆论在助长集合行为和社会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

集合行为的性质和发生的条件

从字面意义上讲,“集合行为”指的是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即经群体和社会形式出现的人类行为。然而社会学家们在一个更窄的意义范围内使用这个词:集合行为(collect behavior)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

我们不能把集合行为与组织行为或制度行为混淆起来。组织行为(organizational behavior)指的是由已确立的规则和程序控制的群体内部行为(例如,俱乐部和企业的行为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制度行为(institutional behavior)指的是由制度化规范所控制的行为(例如,与教育或宗教相关的行为)。与此相对,集合行为缺乏事先确定的组织程序和制度规范。此外,集合行为是动态的,它在不断地变化(蒂尔内和金廉,1987)。

1

集合行为的性质

在最有组织的行为到最无组织的行为之间,有一个社会行为的连续系谱,如果我们把集合行为看作是这一系谱中较无组织的一端,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概念。集合行为的发生有许多种形式,包括集群、骚乱、时尚与流行以及恐慌。尽管这些现象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别,但他们在另一些方面确是相似的,即参与其中的人们目标和期望相对不明确,社会情景模糊,社会的控制机制薄弱(吉纳维,1975)。

通过将集合行为与诸如高中消防演习之类的高度组织的行为相对照,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集合行为的性质。消防演习的目标事先很明确。每间教室的人要通过特定的出口离开建筑物。每个人不仅明确这一目标,而且对目标的实现方式也一清二楚。此时的情景定义也很清楚;学生们以前就经历过这些程序,甚至可能事先就从校长办公室得到关于演习的通知。每个人都知道没有真正的大火,15分钟后他们又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在这种情形中,社会控制的方式也是有效的。掉队的学生将会受到老师的处罚。

将演习与一场真正的大火相比,比如说在一个夜总会里。在闻到糊味或看到火光的第一刻起,社会情势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此处的目标和手段是模糊的,而且情景也不能明确定义。顾客们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以前可能从未经历过火灾。除此之外,他们缺乏对灾情大小、火势的蔓延速度以及为控制它而正在采取的措施的了解。群体目标被相互冲突的个体目标所取代,一些人可能在企求自保,另一些人可能会试着帮助他人,管理人员则试图做出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的样子。此时几乎不存在要求人们遵从的规范,也没有什么社会控制手段来增进人们对既存规范的遵循。因而在这个歇斯底里的人群

争先恐后地逃离大火时，他们可能会相互践踏。

虽然集合行为具有相对自发性，但它并非完全没有结构和模式。事实上，在集合行为中显露出的社会结构恰恰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例如，在交通事故中，特定的社会角色会迅速出现。一些人充当旁观者站在一边静观其变，另一些人则在帮助重新恢复交通，还有的人在为受伤者提供紧急救护。

从其内部而言，集合行为和社会运动具有极大的内在吸引力。然而社会科学家们同样意识到了集合行为可以成为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源泉。许多社会设置就源自于社会运动。今天的时尚可能成为明天的习俗。从现在的群众中可能发展出在将来具有高度结构化并且长期存在的社会群体。因此对集合行为的研究，也是对人们探求和实现重大社会变迁过程的研究。

2

集合行为 发生的条件

由于集合行为有多种形式，因此要概括出引发或促进它的社会条件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下列条件被认为是产生集合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并不需要它们同时具备，并且也没有一个因素是所有形式的集合行为都必需的。

环境因素

一定的环境因素增加了人们对某一共同的刺激以一种自发的方式产生反应的机会。比如，任何能使人们快速、便捷地进行信息传播的组合都增加了自发行为的可能性（蒂尔内和金廉，1987）。一群聚集在公共场合，如广场、体育场、或礼堂的人群就是这样的一种组合。

时间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根据克恩纳（Kerner）调查团对20世纪60年代城市骚乱的研究，大多数的动荡都始于周末或夜晚。这是一个大多数的人都从工作中空闲出来的时段（麦克菲尔，1971；布雷，1988）。1992年春季爆发于夜间的洛杉矶骚动也与这一模式相符合。

无规范

一些情况是如此新奇或罕见，以至于没来得及产生任何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例如，在船只失事中，可能除了“妇孺优先”的观念之外，几乎没有规范指导当事人的行为。其他相关的“无规范”情况还包括那些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通常的联系纽带出现松动的情况，例如，在度假胜地、摇滚歌曲节、集会等场合中。从家庭和职业角色中暂时性地脱离出来也很容易有助于诱发集合行为。

然而即使在最混乱的情形下，规范性的行为模式也会逐渐显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遭受的首次轰炸引起了大量的集合行为：人们涌出自己的住处，到防空洞中寻求保护以安然度夜。随着袭击的继续，规范也逐步产生。一些不太正式的穿着，如浴衣，拖鞋甚至赤脚，在防空洞中都成为可接受的装束。头发可以未经梳理，甚至还裹着卷发器，当然，第二天早上这样在大街上走是不可接受的。在防空洞中不与他人和谐相处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但人们仍有隐私权，如果他们希望如此的话。一段时间之后，一整套用以规范人们在防空洞中的行为的规则也发展了起来。简而言之，当一群人不

得不适应反复发生的事件时，他们会渴望将秩序和常规带到他们的生活中来。于是，人们通过发展出更多的社会结构来实现这一目标。

冲突的价值观和规范

冲突的价值观和规范也能引发集合行为。这样的冲突通常是急速的社会变迁或者是在文化中引入了对立因素的结果。

传统社会的急速现代化通常孕育了集合行为。例如，1979年推翻伊朗国王的事件就是由不同利益群体的广泛联盟而实现的。其中的一些利益群体反对伊朗国王的具体政策；另一些群体则反对他所制定的现代化整体规划。但他的覆灭只是一场不同价值观之间斗争的开始。新的政府试图恢复伊斯兰文化的传统模式，尤其是关于妇女和家庭的习俗。复兴的传统礼教要求妇女穿戴一种从头到脚披覆的面纱。男人们想离婚时，只要告知公证人即可，并可以在没有得到第一位妻子同意的情况下迎娶第二位妻子。一些早已获得如同西方妇女一样自由的妇女和一些参与了革命的伊斯兰妇女发现她们的价值观遭到威胁。结果，这些妇女卷入了各种形式的集合行为，来抗议对她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侵犯。她们拒绝穿戴面纱，继续穿着西式服装，并出现在一些妇女禁入的公共场合。

相对剥夺

相对剥夺是导致内乱和其他形式集合行为的另一潜在的普遍因素（海恩斯，1998；福斯和拉金，1986；格尔，1969，1970）。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指的是一种人们没有获得他们认为应得之物的情况。无论人们追求的是经济保障、政治权利、自我实现、还是社会归属感，社会总是教导人们：只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去努力，就能达到这些目标。而当人们感到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并未取得足够的进展时，就产生了相对剥夺。在他们看来，这个制度没能给他们应得的东西。

相对剥夺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在期望型相对剥夺（aspirati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中，人们的期望在不断增加，然而他们并没有看到情况有显著的改善。例如，美国民权运动的产生就是这样。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件中宣判学校的种族隔离不合法，之后，美国黑人的期望值增加。而白人反对者则阻挠了法庭判决的实施，又加速了期望型相对剥夺和民权运动的升级。

J状曲线型相对剥夺（J-curve relative deprivation）是另一种重要的类型（戴维斯，1969）。人们日益增长的期望正伴随着他们所认为的真实进步在发生，而当局突然倒转方向并且开始剥夺人们的近期所得，此后，这种J状曲线型相对剥夺便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期望继续上涨，而情况实际更像在恶化（而不像在期望型相对剥夺中那样保持不变）。J曲线型相对剥夺是集合行为的一种尤其强烈的激发因素，并且被认为是许多暴力型社会运动，包括伊朗革命、法国革命、两次俄国革命的重要潜在因素。

通常，遭受最严重剥夺的人并非是最可能参与集合行动的人。相反他们常常是最不积极的。而那些遭受的剥夺较轻、最能够意识到他们的情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人，往往是最积极的参与者。

社会控制机制的崩溃

社会控制是每一个社会系统都在持续发挥的功能。当这种控制机制减弱时，人们可能对现存的制度失去信心，并试图通过集合行为对其进行改革或重建。人们自发组建的“警戒行动”就是一个例子，当人们感到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没能得到官方的纠正时，他们就自己运用法律的武器。当社会控制的严厉手段猛然松懈时，骚乱之类的集合行为也可能会发生。

当正式的社会控制主体，如警察和法院，没能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时，社会控制会因此而崩溃。害怕出现犯罪，以及对警察保证居民安全的能力缺乏信心，许多市民就组织巡逻队，监管其居住地区。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的削弱也可能导致社会控制的崩溃。在一些城市居住区，非正式控制的崩溃很明显。那里缺少警惕的邻里守护街道，许多父母也无法管教他们的孩子。

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

尼尔·斯梅尔塞（1962）提出了产生集合行为或社会运动时必须依次出现的六个社会条件。由于它与经济学中的同名概念很相似，斯梅尔塞把他的这一理论称之为价值累加理论（value-added approach）。斯梅尔塞的理论假定，只有当这六个特定条件在特定情况下结合起来或相互作用时才能导致集合行为的产生。这些决定因素实际上可能以任何次序发生，然而只有当它们按以下顺序发生时才相互关联。

第一个决定因素是“有利的结构”，即社会结构的构成方式必须允许一场社会运动或一段集合行为的发生。例如，如果所有犯人一天24小时都被禁闭在牢房里，监狱骚乱则无法发生。需要强调的是，有利的结构是指使集合行为在特定情形下成为可能的一般的背景因素；这一因素与某件事错误与否全然无关。

第二个决定因素是“结构性紧张”，即人们感知到社会环境中的某个事情出了问题。这种紧张通常以相对剥夺的形式表现出来。监狱骚乱常常是由于糟糕的食物、拥挤的环境和种族仇视而引发的。

第三个决定因素“普通信念”的增长有助于参与者解释他们感知到的结构性紧张。它包括对失常状态的分析，对事情应该是怎样的看法，一系列用以纠正这一局面的策略战术，有时是一种消极的洞察，即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改进则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局面。普通信念使得当下形势对参与者个人充满意义，并使他们做好集合行动的准备。监狱骚乱中潜在的普通信念是：骚乱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力，从而最终使犯人们感到难以忍受的环境得到改善。

第四个决定因素是“促发因素”，它是集合行为的导火索。通常一个戏剧化的事件为集合行为提供了具体的刺激。这样的事件可能证实普通信念所表达出的恐惧，或者可能夸大结构性紧张形势的严重性。例如，某个犯人受到当局严厉而不公正的处罚的事件则可能促发监狱骚乱。同样，被指控残暴殴打黑人司机洛德尼·金（Rodney King）的四名白人警察被宣告无罪，激发了持续四天四夜的洛杉矶暴民骚乱事件。另一方面，有些集合行为却似乎缺少明确的促发因素。

斯梅尔塞的第五个决定因素是“参与者的行动动员”。这一因素仅仅表明,一旦前四个因素成立,行动就开始了。假定有利的结构、紧张、普通信念和适当的促发因素(通常是需要的)都已具备,一场骚乱就会爆发。在动员的过程中,通常出现一些相对模糊的行为规范和模式。

第六个即最后一个决定因素是社会控制,它决定了前五个因素,并有助于确定集合行为的结果。监狱当局的行为可能会使这种情势在结构上更有利或更不利于引发骚乱,可能会直接有助于结构性紧张的产生,可能会与发展起来的普通信念有很大的关系,也可能时不时地成了引发一场骚乱的促发因素。社会控制可以是预防性的(影响集合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可以是紧急性的(在事件发生之后出现,并影响集合行为事件的程度和性质)。针对正在发生的局势,官方总是会做出一些紧急反应,不管这些反应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这种紧急性社会控制都将是决定骚乱将持续多久,以及暴徒将会造成多大损失的关键因素。

斯梅尔塞的理论实质上是将导致爆发集合行为的因素归类到有意义的类别之中。有时,社会科学家无法在特定的案例中找出所有六个决定因素。尽管如此,价值累加理论仍然在确定和组织社会运动、集合行为的基本条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集群与大众行为

在集合行为的所有形式中,集群是最普遍和最容易为人们所意识到的一种形式。集群(crowd)是有着共同的关注点而临时聚集到一起的人群。集群与其他更为普遍的社会群体区别开来的特征是不确定感和紧迫感。集群中的每个人并非都有同样的期望。其情境相对模糊不清,情境本身也无结构性特征,目标不明确。不过集群中的成员都会感到有事将要发生。

在他们的行为中,集群的参与者有时可能无视常规的社会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集群可以说是无约束的(permissive)。在接受新的行为和看法时,集群参与者通常容易接受由集群的情绪所传达的暗示。

1

集群的类型

结构最为松散的一种集群类型,是赫伯特·布鲁默(1939)早年在一部颇有影响的论述集群类型的著作中提出的偶合集群(casual crowd),即一种参与者只投入了最低限度的感情和互动的相对消极的集群。在这种集群中,人们随进随出。他们对某些事件,如交通事故、商店的节日展销给予临时性的关注。他们可能相互交谈,也可能互不理睬。

常规集群(conventional crowd)更具结构特征,它的行为是可预料的。常规集群包括音乐会的观众和飞机上的乘客,这些情境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在这些情形中,人们通常遵守常规,集群成员间的互动通常是最低程度的。

社会学家对那些能够产生更广泛的集合行为的集群类型更感兴趣，例如，表意集群、社会连带集群和行动集群。

表意集群

那些用以提供感情表达和情感释放机会的集群称为表意集群。大多数远古文化都有用来庆祝丰收或某一重大军事胜利的周期性节日，以及具有宗教意义的日子。此时，为使尽可能多的人聚集起来，方圆几里的部落成员应邀加入。这些集群参与各式各样的活动，如跳舞、喝酒、盛宴、歌唱、呼叫以及各种游戏和技能比赛。因为在日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此类行为会导致混乱（而予以法律禁止），从而使集群活动这样的场合为其参与者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情感释放。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这样的节日对于那些以感情压抑为特征的文化社会尤为重要，他们以西南部的土著美洲人部落为例。那里的人们不时地打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情控制，在雨舞或摩根仪式等宗教庆典中毫无顾忌地发泄自己的感情（本尼迪克特，1959）。

表意集群在现代美国社会中随处可见。例如，纽约时代广场新年之夜热热闹闹的集会，新奥尔良庆祝狂欢节的最后一天的节日集群，以及挤在体育馆观看超级保龄球比赛的欢呼雀跃的球迷。这些表意集群显得无所顾忌，甚至有点狂野，然而角色和规范在这些情境中依然存在，人们明白在节日的场合中哪些行为是可被接受，哪些是不能被接受的。

社会连带集群

许多表意集群具有超出感情表达的社会功能。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tic）一词用以描述那些提供其成员强烈的社会团结感和统一感的集群（蒂尔内和金廉，1987）。例如，1969年夏，在纽约伍德斯托克附近参加摇滚歌曲节的人们在离开时都念叨着“伍德斯托克邦”。这些聚集在伍德斯托克的近50万人是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主义者的代表，这些鼓吹爱情和平的“花孩儿”嬉皮士反对越南战争，希望为和平、博爱和理解共同奋斗。

把大多数福音派宗教集会作为常规集群可能更有利于对其进行分析。这种集群中，“复活”参与者看似自发的情绪事实上是可预料到的，并且实际上也是由组织者编排的。但是有时这些集会和复活者可能会“失火”，从而超出常规的范围，产生高度的集合能量和兴奋。这样的事件包括强烈的表意和社会连带要素，并可能被参与者视为具有巨大意义和震撼心灵的体验。

政府有时也精心安排一些有许多人参加的集会或群众大会，以求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一种社会团结感。阿道夫·希特勒尤其精于此道。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他利用政治集会成功地巩固了他的权力。聚集在古巴聆听卡斯特罗的政治演讲的群众、在波斯湾战争期间集合在伊拉克支持伊拉克政府的群众是另外的两个例子。由于这种集群具有转变成对政府怀有敌意的暴民的可能，官方在运用这种策略时，需要对政治气候有一定的把握。

行动集群

行动集群（acting crowd）通常是愤怒和怀有敌意的。两种最富戏剧性的行动集群类型是暴民和骚乱。

暴民(mob)是这样的一种集群类型,群情激昂的集群成员将愤怒集中在单一的目标上,然而通常在达到目的后,他们就解体了。大多数暴民有领导者,暴民行为通常有一定程度的组织结构。但是由于他们是短暂且不稳定的,所以暴民被认为是一种集合行为。私刑处死、爆炸纵火、三K党等恐怖集团策动的恐怖活动都是暴民行动的例子。

与暴民一样,骚乱(riot)是一种采用了暴力的行动集群;与暴民中的成员不同的是,骚乱者表达的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愤怒,并通常在数小时或甚至数天之内从一个目标转向另一个目标。骚乱常常包括对不受欢迎群体的攻击、掠夺和捣毁财产,以及对权威的普遍蔑视。有的骚乱者可能有特定的目标,例如破坏不受欢迎者的房屋和商行。比如在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中,许多韩国商店被毁。

一些规范会在骚乱中产生,控制着骚乱行为,但它们不易被识别。骚乱通常包括劫掠,这看起来是规范和价值观的彻底崩溃。但劫掠在民众骚乱中往往是由新出现的规范所引导的。当一个地方性社区的成员公开参与劫掠时,劫掠成为针对更大社会的集体抗议(夸兰特里和戴恩斯,1970)。关于财产的社区价值观被暂时取消,劫掠成为社会可接受的行为。

参与骚乱和暴民的人通常处于极大的社会紧张感之下。为了引发动集群,这种紧张感必须是普遍的和广泛流行开来的。正如广为人知的那样,经济压力所产生的社会紧张是1992年洛杉矶骚乱的主要潜在因素。

暴徒往往是那些遭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团体。他们感到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或是觉得已无可救药,而且当权者既听不到也不愿意聆听他们的抱怨。换言之,暴徒常常是一些正经历着重大社会问题的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社会缺乏有效的制度化解决方案。

2

集群行为理论

常被提及的一个集群行为特征是明显地抛弃了个人信念和态度,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集体性生成行为模式。尽管集群成员的背景各不相同,他们在集群中的行为通常都遵循一套新的共同规范。统一的集群精神由此应运而生。在共同推动力的支配下,集群的所作所为好像有自己的意志。这一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集群场合会抑制了个性而激发了对集群行为和态度的接受?为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理论。

感染论

1896年,格式塔·勒朋(Gustave Le Bon)出版了《集群》一书,对集群行为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勒朋把集群看成是具有集体意志的单一有机体。他认为集群能使个人“着迷”的能力基于三个因素:(1)不可征服感(invincibility),即从单纯人数上获得的强大力量;(2)传染(contagion),即新的思维方式的迅速蔓延,类似传染病在人群中传播一样;(3)易受感染性(Suggestibility)。勒朋相信,在集群中,人们的心智很容易降到一个较低的活动水平上,并且人们容易毫不怀疑地被动接受和模仿集群中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

后来的研究发现,集群中人们的行为并不像勒朋认为的那样一致;“集体意志”的观点也一直没得到社会学家的重视。但类似勒朋的观点在大众中仍然十分流行。这些观点出现在媒体、政治言论以至于警察的战术中。人们仍然能听到把集群成员称做“毫无理性的动物”。

“集体意志”的概念产生谬误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它否定了集体成员间的个体差异。当人们说起“暴民袭击了闯入者”和“群众发狂了”时,他们忽视了在行为、态度和行动中显著的个人差异。其次,这一观点错误地将意志、良知或缺乏自治之类的性质赋予群体。说“集群改变了它的意志”是不对的,个体的心理属性是不能运用于群体的。

常常与集体意志这一错误概念相随的是将集群行为描述为“无理性”。社会学家指出了用这种方式看待集合行为的两个错误。首先,无理智是个体精神状态的特征,不能运用于群体。其次,“无理性”一词充满了价值判断的意味(蒂尔内和金廉,1987)。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人看来可能是无理性的,也可能是合理的。例如,许多的伊朗人认为他们的宗教而献身是无上光荣的。而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样的献身看起来是疯狂和无理性的。

将集合行为描述为无理性反映了这样一种错误,即没能细致考虑集群成员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情境。例如,1979年,为听一场音乐会,人群蜂拥而进会场时,踩死了11个年轻人,并有许多人受伤。媒体普遍认为,无理性的、失去控制的集群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一位社会学家在仔细研究了人群蜂拥的原因和群众的行动后反驳了这个说法。很显然,这一问题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大量的未预定座位的门票的出售,另一方面是体育场的大门较晚才打开,是它们导致了人们为争抢座位而猛冲。这位社会学家还指出许多当事人的行动也很理性,例如,当有的年轻人摔倒时,别的人在摔倒者周围围起圈,以保护他们(约翰逊,1987b)。

其他一些理论也采纳了感染理论的某些成分,只是在形式上稍有改动。由赫伯特·布鲁默创立的“循环反应”理论认为,集群中的一些人丧失了准确解释相互作用的能力。一个人兴奋起来;别的人也跟着兴奋;看到别人也激动了,首先兴奋的人变得更为情绪化。在这一理论中如同勒朋认为的那样,集群行为仍被视为无理性和情绪化的。只是无理性源于社会互动,而不是“群体意志”。循环反应理论在今天并不广为接受,并且面临着与感染理论同样的批评。

趋同论

第二个主要理论在解释集群成员之间明显的相似性时要简单得多。根据这种趋同论,参加集群的人们已经共同具有了这样的趋势,即以同样方式看待事物和以同样方式行动;实际上,正是这种共同的趋势使他们首先聚集起来,成为集群(福姆和贝,1988;赖特,1978)。因此,如果以色列大使馆外的抗议集群对以色列持有同样的否定态度,趋同论会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这种相似性,即认为由于大家反对以色列,所以能被激励着来到此处并参与抗议,而不是像感染理论所说的那样,用产生了共同的精神状态来解释这一现象。

新兴规范理论

根据新兴规范理论,由于一套行为规范逐渐被整个群体所接受,群体中的一致性普遍流行开来(蒂尔内和金廉,1987)。那些不遵循这套紧急规范的人将会被施以社会压力。例如,一群抗议超级市场价格过高的群众可能决定冲击超市,把货架上的高价商品扔掉。那些不同意这一行动、但保持消极沉默的人无意中支持了这一规范。而那些公开表示反对意见的人可能会遭到支持者的质问和起哄。对某些行为进行限制的规范也可能出现。例如,冲击超市的人会同意不采取任何攻击人的暴力行为。

对上述集群行为理论的评价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积累了大量关于集群行为的经验资料(格劳曼和默斯科维茨,1986;麦克菲尔和沃尔斯坦,1983)。我们现在知道:(1)大多数集群内部并不具有很高同质性;集群成员在态度和参与程度上通常是不同的。(2)集群行为本质上并不是无理性的,集群成员没有丧失理性,也没有脱离现实。(3)集群行为与所有社会行为一样是受规范支配的(蒂尔内和金廉,1987;赖特,1978)。

从这些研究结果看,新兴规范理论似乎提供了对集群行为最好的解释。集群并不像感染论所指出的那样是自己陷入了感情疯狂之中。他们的一致性也不像趋同论认为的那样,在形成集群之前人们的观点就必须经过认真考虑。集群是由社会个体组成的,他们根据他们自己对什么正在发生和需要怎么做的定义来采取行动。

3

大众行为

并非所有的集合行为都只在面对面的群体中发生。集合行为的不确定性、易受影响性和紧急性也可能成为广为分散的人即“分散集群”的行为特征。在分散的社会群体中出现的集合行为被称为大众行为(mass behavior);它涉及到那些互不相识、彼此联系甚少的人们。

恐慌

恐慌是一种广为人知的大众行为。它是面临迫近的危险时为获得安全而进行的逃逸。恐慌通常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有逃离的路径,但数量有限或是即将消失,因此看起来只有一些,而不是所有的人能够逃离。典型的例子是火灾爆发时的剧院、餐厅和夜总会中,人们不顾一切地相互践踏地冲向出口。这类事件最严重时数百人丧生。

恐慌并不一定局限于发生在同一物理空间。1929年股票交易所的崩溃就是一次经济恐慌。当股票持有人目睹它的资产价值在消蚀时,心中的恐慌使他们抛出股票,从而使股票价格进一步下跌。在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中,银行倒闭,失业率飙升。最近一次规模较小的金融恐慌发生在1985年,俄亥俄州家园储蓄银行在一次失败的投资中失去巨款。存款人担心该银行会倒闭,纷纷匆忙地取出他们的存款。反过来,他们的恐慌又导致了其他银行的储户也撤回他们的资金(约翰逊,1987a)。

大众歇斯底里

大众歇斯底里 (mass hysteria) 是当人们发觉他们处于模糊不定、危险和令人焦虑不安的情形中时,偶尔产生的一种集合行为类型。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中,流言在扩散、被接受,并导致怪诞想法的产生。大众歇斯底里可以局限在一个小社区中,也可能扩散至整个社会。当人们意识到所感知的威胁实际并不存在时,大众歇斯底里的推动力就会最终消失。

1962年夏,在不足一个星期的时间内,62名南部纺织厂的工人经历了一场短暂但严重的疾病,症状是头昏、寒战和恶心(克尔克霍夫和巴克,1968)。备受疾病折磨的工人坚信他们得病是被某种有毒的昆虫叮咬所致。工厂进行了彻底的消毒,但没有任何反常的毒虫滋生的迹象。迷惑不解的调查者最后发现,原来这实际上是一起由劳累过度 and 裁员谣言带来的大众歇斯底里。由于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紧张不安不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做出反应,制造厂的工人代之以集合行为来减轻他们的焦虑,哪怕只是暂时性的解脱。

1938年,当成千上万的收音机听众将一部小说作品当成是真实的新闻报道时,纽约发生了伴随着恐慌的大众歇斯底里。H. G. 韦尔斯(H. G. Wells)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一场来自太空的攻击,而且以极为真实的方式播送,致使人们以为这是真实的新闻报道。许多人跳进他们的汽车里,尽可能地远离假想的人侵地;有的人则把自己锁在家里,用步枪武装起来,准备与外星人作战,保护自己。

灾后行为

大众行为的另一种形式是灾后行为(disaster behavior),即在自然灾害或其他种类的灾难后的行为。灾难包括瘟疫、饥荒、干旱、飓风、地震和洪水之类的自然灾害,也包括人为事件如炸弹、爆炸和大火。灾难通常造成急剧的破坏,一片狼藉的场面,使人们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蒂尔内和金廉,1987)。

各式各样的人通常灾后赶到现场:那些居住在灾难地区但不在灾难现场的人;那些关心居住在灾难地区的朋友和家人安危的人;还有一些志愿者和纯粹的好奇者。

由于人数众多,他们的出现可能给遭灾地区带来重大的影响。然而灾后行为通常是非常正面性的。现场的领导者和计划产生了,救济供应也陆续到来,即使这都是以一种非常规的或无组织的方式出现的。给予受灾者的救济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情况下政府和其他组织在救援活动的紧急救助阶段之后就不管受灾者了(奥斯曼堪德,1987)。如果灾难持续,比如像饥荒或瘟疫那样,紧随灾难产生的自发性社会结构就会与从前建立的社会秩序相冲突。

流行、时尚和狂热

以上所提到的大众行为的几种形式都可能包含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情形。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众行为都是这样。

流行(fashion)指的是一时间深受人们喜爱的服装样式或行为方式。它是一种对习惯的“习惯性”背离,但同时仍处于可接受的行为范围之内(萨皮尔,1937)。绝大多数的流行与特定时间内的流行物——尤其是某些服装

样式——有关。比如说褪色的牛仔褲、名牌T恤、汗衫，以及一些鏈子、珠子和某些款式的鞋等诸如此类的物品。

流行具有短暂性以及具有大众吸引力等特点。尽管流行通常被看成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然而作为社会身份的象征，它可以成为社会分层体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要素。正如19世纪的社会批评家索尔斯坦·凡伯伦（1899，1967）所指出的那样，流行可以作为一个反映社会价值观和态度的指标。例如，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超短裙就戏剧性地象征了那个时代对性问题相对开放的态度。此外，在个人的层面上，穿戴着当前最新潮的服饰是用来向别人展现自己有品位、并且也有经济实力追随变动不居的流行文化潮流的一种有效方式。

时尚（fad）是指在短时期内被许多人狂热追求的一种活动。一位社会学家曾区分了四种类型的时尚：实物时尚（object fads），例如某些招贴画，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不干胶贴纸和新型布料；观念时尚（idea fads），比如说星卜术；行为时尚（activity fads），例如雪上汽车运动；以及时尚英雄（fad heroes），比方说像麦当娜和雷博士那样的歌手（洛夫兰，1985）。在美国，时尚还有“呼啦圈”和各种各样的新式舞蹈。在日本，青年人们效仿着加利福尼亚冲浪手的服装和生活方式（霍维茨，1989；布罗夫曼，1989）。在德国，乡村和西部音乐甚为时兴。

狂热（craze）是一种具有重大和持续影响的程度较烈的时尚。一个经典的实例就是17世纪30年代风靡整个荷兰的对郁金香的狂热（麦凯，1841，1932）。这一所谓的“郁金香热”如此剧烈，以致投机者们愿意用价值上万美元的财产来换期待价而沽的郁金香球茎。大量的土地用于种植郁金香，致使不得不依靠粮食进口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一个较近发生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极受欢迎的台式游戏机。商业街上似乎每三家商店中就有一家是新近开张的电子游戏厅，里边挤满了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排着队等着投入硬币，尝试最新的游戏节目。与郁金香热一样，这一台式游戏机热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在这两个例子中，狂热消褪之后，本身也就成了文化中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直到今天，郁金香在荷兰仍广受人们喜爱，台式游戏机也仍在吸引着青少年。

传播与集合行为

谣言、闲话、宣传和公众舆论都是人们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可以看作是集合行为的形式。或者说是所有易于引发诸如恐慌和骚乱之类更复杂的集合行为的初级阶段。

1

谣言与闲话

最无组织性的信息共享方式就是谣言和闲话，它们典型地产生于人们无

法获得所需要或渴望了解的信息时。人们通常寻求一切可能的、甚至是未经证实的信息来源，而不满足于缺乏信息这一现实。

谣言 (rumor) 是在人与人之间非正式地、通常是口头传播的未经证实的消息 (墨菲, 1985)。它有时 (尽管不是总是) 是不正确的, 并且它的发起往往比终止要容易得多 (罗斯诺和法恩, 1976)。例如, 当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落下时, 流传着该城市被喷射了汽油的谣言。虽然这个谣言不正确, 但它帮助受害者理解了这场爆炸和大火, 以及随之而来的疾病和被毒化了的水 (斯布坦, 1966)。虽然对爆炸的恐怖依然存在, 但谣言或多或少地消除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

都市传奇

社会学家詹·哈罗德·布伦凡特 (Jan Harold Brunvand) 推广并普及了他称为“都市传奇”的一种集合行为形式。都市传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谣言, 它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某种媒体进行传播。虽然细致的考察能毫无例外地发现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但它们往往被说成是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实的故事。都市传奇看起来似乎合理, 但同时又存在奇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歪曲。下面便是一些例子。

一个小伙子和他的女伴将车驶入他们最青睐的“爱的小巷”去听收音机并且亲热一下。这时, 音乐突然停止, 播音员插入来的报道说, 本地区有一强奸抢劫案犯刚刚逃离现场, 他的右手握着一个弯钩。这对情侣害怕起来, 驱车离开了。男孩送女孩到家门口, 然后下车为她开门。此时, 他看到一个弯钩就挂在车门把手上 (布伦凡特, 1981)。

有位老妇人, 她的孩子送给她了一台微波炉。一天, 她给爱犬洗完澡后将它放在微波炉里烘干。自然, 当她打开炉门时, 狗已经彻底烤熟了 (布伦凡特, 1981)。

一天晚上, 一个男人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到一家肯德基炸鸡店买了一份快餐。他一边吃着快餐一边继续驱车回家, 突然他咬到一块味道奇怪的东西。他把那块东西扔回袋中, 回家后仔细察看了一番。那的确不像他所熟悉的鸡块。于是第二天他把这块东西带到了公共卫生局去做分析。公共卫生局的人告诉他, 那是一块炸老鼠。他们说这种事情时常发生, 老鼠可能钻进奶油面糊中被溺死, 而肯德基的雇员看也没看一眼就把它扔进了炸锅里 (波普勒, 1994)。

大多数的城市传奇采取的形式是对现代生活危机四伏的“警世明言”。布伦凡特指出, “弯钩”反映的是对青少年性行为的负面后果的广泛关注; “微波炉里的狗”是对现代技术的不确定性的反应; “肯德基炸鼠”来自对可能不合格和靠不住的低薪雇员以及雇用他们的公司的猜疑。因此, 与其他集合行为一样, 都市传奇可以解释为在模糊不定的状况下为减轻压力所作的努力。它们强调新事物的危险——性解放, 微波炉, 快餐店, 并且含蓄地肯定了传统的行为模式——性克制、老式的技术和在家里烹调与进餐。

在最近的一项饶有趣味的研究中, 菲利普·波普勒 (Philip Popple) 发现了许多以社会工作者及其当事人的消极刻板印象为基础的城市传奇。

一个熟人与一个年轻迷人、并已有了两个孩子的少女母亲进行了一番交谈。年轻的母亲吐露到, 她主要的生活来源是 AFDC、食物券, 在另外一些叙说版本中还



有公共住房。她在言谈中流露了她对这一切的满足感：“看来我天生就该做母亲，这就是我的工作。”

一位社会工作者对他的当事人金太太进行第一次家访。金太太把他介绍给了她的儿子 Nosmo。这位社会工作者认为这名字非常特别，并询问这是否是家族或是种族的名字。这位母亲回答说“不是”，她说这个名字是她在生孩子时出现在她脑海里的。因为她将进行剖腹产，医生对她进行了全身麻醉。在她处于半清醒状态被推往分娩室时，她看到了这个红色的名字悬挂在空中。后来当这位社会工作者记录其所有家庭成员的姓名时，她发现了这位母亲的幻觉之由来。当把名放在姓之前时，孩子的姓名是 NO SMOKING!（禁止吸烟）（波普勒，1994）。

这样的传奇都反映了认为福利接收者既无耻又愚蠢的普遍性公众信念。这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担忧，他们认为在天真的社会工作者帮助下的穷人们会成为剥夺人们辛勤劳动成果的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波普勒写到，关键在于这些传奇加强了人们对社会工作的一种刻板印象，有助于维持在他们看来卑鄙、应受惩罚以及不完善的公共支持系统。

资料来源：詹哈罗德·布伦凡特（Brunvand, Jan Harold）：《消失的载车者：美国城市传说及其意义》（The Vanishing Hitchhiker: American Urban Legends and Their Meanings, New York: W.W.Norton, 1981）；菲利普·波普勒（Pople, Philip R.）：《当代民俗与社会福利》（Contemporary Folklore and Social Welfare, 1994）。

自从1977年42岁的“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逝世之后，谣言就不太明显地在传播。直到20年后的今天，就他们的偶像是否仍还活着的传闻的真实性，歌迷们还在争论不休；小报充斥着声称见到或与这位歌星进行了交谈的人们故事。

被称为“益智口香糖”（拉姆利、罗斯诺和法恩，1976）的闲话是关于他人个人的或隐私的谈话。虽然它充其量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先入之见。但事情是否“无关紧要”则依赖于社会情境。当一位社会工作者告诉他当事人的上司她未婚先孕时，这就是在传递重要的信息。同样的信息在邻里之间传来传去就成了闲话。

关于媒体诽谤的闲话长久以来是美国人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勒万和阿鲁克，1987）。将名人引入寻常人家的电视为一些人创造出与这些明星人物有某种“关系”的感觉。某些名人的追随者养成了一种收集和分享其偶像之嗜好的业余爱好。早在1990年，当一对加利福尼亚的夫妇声称即将出版的一本叫做《玩偶》的杂志将囊括有关歌星加影星多利·帕顿（Dolly Parton）的所有资料时，6 000人立即订购了这份杂志。

闲话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位人类学家巴塔吉对斐济的印度村庄中的闲话进行了研究，并且得出结论：闲话模棱两可的性质（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使人们在不必相互赞同的情况下体验到一种共同感（布雷内斯，1984）。

“公众”是谁或是何物？为什么它的看法受到如此频繁而细致的关注？在社会学的定义中，公众是对舆论有共同兴趣、关心或关注的一个分布较散的人群。

在现代社会中，公众围绕许多不同的问题而形成：堕胎、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政治倾向或能源政策等等。虽然公众成员有时是有组织的，例如，一些选民可能登记为民主党员，一些影迷可能是汤姆·克鲁斯影迷俱乐部的成员，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无组织的。因此，确定公众的确切规模是很困难的。

尽管它的组成含糊不清，但公众并非是不重要或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可能不知道谁是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者，但如果我们知道支持民主党的公众很少的话，那么下一届总统将是共和党人。同样，汤姆·克鲁斯的影迷可能姓名不详而且数目不清，然而正是影迷们在票房收入上的“投票”使他成为巨星，并保持其在摄影棚中备受青睐的地位。

公众所持的态度称为公众舆论。公众舆论通常是以可靠的信息而非谣言为依据的。但是这些信息可能以一种偏见或误导的方式来被阐释。同样，公众舆论也不像谣言那样转瞬即逝。不论在政治、娱乐或是商业中，公众舆论都有着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公众舆论的形成

长期以来，人们对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一直都有所推测。认为公众舆论是潜在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的直接表达这种看法似乎有道理，但情况却并非总是如此。人们基本的价值观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但公众舆论的变化却很迅速，同时，迥然不同的公众舆论可能基于同样的价值观。

公众舆论受到了社会背景和群体成员的深刻影响（布卢默，1948；坎特里尔，1980）。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特定团体的几乎所有成员在许多问题上都倾向于有相似的观点（例如，那些第七日基督复临论者或是IBM公司的主管人员）。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和具有相似民族或教育背景的人也是如此。例如，民意测验表明，对于核能的态度就深受个人教育和收入水平的影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比学历较浅的人对核能持有更多的积极认可的态度；并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支持核能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金斯伯格，1986）。

每个人都属于一个以上的社会群体。在形成公众舆论的过程中，有的群体比其他群体更为重要。一个群体的影响力取决于它的目标、组织和其成员忠诚感的强弱等因素。然而大多数的群体成员身份的重要性受到了特定舆论主题的制约。例如，天主教成员的身份会极大地影响个人对堕胎的看法，但对于个人对经济政策的看法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影响公众舆论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特殊人物施加的影响。每个社区都有一定数量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他们对公众舆论有着特殊而深刻的影响。每个问题都会有一批不同的意见领袖。一项开创性的研究表明，

至少在一些问题上,个人影响力是形成舆论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1955)。最近的研究表明,有魅力的新闻评论员和新闻节目主持人对公众舆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兰、科特勒和斯托勒,1987)。

近30年来,宗教差别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已变得不是那么明显了,这主要因为电视和其他形式的大众传媒促进了美国公众的同质化。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部地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舆论与整个国家的舆论大相径庭。这种情况如今已不复存在。虽然公众舆论仍表现出一些地域差别,但全国舆论的相似性正日趋明显(金斯伯格,1986)。



对公众舆论的测量

民意测验和调查对于试图影响公众舆论而言是基础性的工作。要想改变公众舆论,首先必须了解公众的想法。公众舆论的民意测验涉及到调查研究这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参见第二章)。在美国大约有140多家调查研究公司收集着有关各种话题的公众意见数据(布劳沃,1988)。

公众舆论的民意测验技术已经过了多年的改进,但它仍然并非完美无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调查结果的运用和解释。资助民意调查的机构或个人,往往只要求对自己的产品或政策进行研究。没有人想听坏消息,更没有人希望为坏消息付钱。1974年发生的事件是个非常好的例子。一家公司在对各种杂志的读者进行了民意测验,其结果显示的是,《时代》的读者比原来少了13%,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新闻周刊》的读者却戏剧性地增加了。《时代》起诉了该公司,认为它的研究带有偏向性,是不可信的(惠勒,1976)。

同样,政治家们也对不利于他们的民意测验持否定态度。有时某位政治家会竭尽全力否认民意测验的结果。当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感到为哈里斯民意测验所烦扰时,他就与哈里斯集团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如果哈里斯组织能在民意测验结果发表之前将其呈示给尼克松,尼克松的行政机构将不会攻击哈里斯组织所使用的测验方法及其结果。这就给了尼克松一个抗衡民意测验结果的机会。显而易见,尼克松开了个先例;近年来,总统和总统候选人通常雇用他们自己的民意调查机构。

民意测验的另一个问题是公众“舆论”和公众“知识”之间的关系。对问题知之甚少的公众能形成合理的意见吗?例如,在里根执政期间,为了解公众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的支持,进行了数次民意测验,这一计划需要庞大的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然而投票的人中很少有真正了解这一计划的。正如一位民意测验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接受调查的人往往愿意提出他们的看法,哪怕他们并不明白该问题,或是对其没有足够的了解(格雷厄姆,1988)。

民意测验中提问的方式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调查的结果。资助一项民意测验的公司,可以通过修改提问的方式来保证被访者的反应对其产品或观点有利。例如,在一次由阿斯匹林的主要生产者资助的调查中,公众被问及所列出的三种止疼药中哪一种是他们最喜欢的。为了使回答更有利于赞助者的产品,仅有的供选答案是一种阿斯匹林品牌和两种退热净品牌(一种代替阿斯匹林的解热镇痛药)。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分解了对非阿斯匹林类药物的选择频数,从而使仅有的那种阿斯匹林品牌胜出(布劳沃,1988)。

最后,对“公众”的分类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近几年来,政治家意识到政治

党派的隶属关系在预测选民意见方面效度极差，这仅仅是因为遍布全国的政党成员很少有共同之处。因此，民意测验家在信仰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投票人分类法。他们把美国公众从“穷人帮”到“有事业心的共和党人”分为十个群体，并且确定了这十个群体各自共同的政治及社会立场。例如，“穷人帮”通常支持社会支出，反对减税，主张死刑以及学校祷告，然而他们在堕胎权利问题上存在分歧（奥恩斯坦、科胡特和麦卡锡，1988）。这种新的分类法被证明在预测公众舆论方面比简单的党派成员资格更为有效。

对舆论的影响

许多人和集团都想对舆论施加影响。制造商和零售商想推销产品，政治家想要当选，政府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他们如何对公众舆论施加于自己有利的影响呢？

现代社会中塑造公众舆论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是大众媒体：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比亚吉，1989；麦克奎尔，1985）。电视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尤为强大。正因为如此，对于任何想要影响公众的个人和组织而言，利用媒体是至关重要的。

某些情况下，媒体可以使社会运动合法化并且改变公众对运动的看法。关于越南战争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初，新闻报道支持政府的战争立场，并贬低不断增长的反对意见。然而当记者们开始证实那些对战争的批评时，反战运动得到了信任，要求停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哈林，1984；吉特林，1980）。关于波斯湾战争的媒体报道，某种程度上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利用媒体只是到达公众的一种方式。然而到达公众与说服公众是两码事。说服公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宣传。

宣传（propaganda）是指通过唤起人民的感情和偏见来对公众思想进行有意控制的方式（埃吕尔，1966；乔伊特，1987）。宣传产生了以有利于宣传者的方式看待世界的公众。例如，1974年至1977年间，南非花了7 500万美元在国外进行宣传。它聘用公共关系机构，为美国竞选运动捐款，为议员们提供去南非的免费旅游，并试图收购美国的新闻媒体（温利克，1989）。当然，这一宣传的目的旨在为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寻求支持。

宣传常常利用公众的恐惧和焦虑，制造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然后提供只要接受某种观点就能防止可怕后果的承诺。例如，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就利用了德国人对30年代经济崩溃的恐惧，并且提出纳粹政治哲学是避免这场灾难的惟一出路。

宣传的感染力之一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帮助理解生活的知识框架。人们总是被“新闻”或是事件报道所包围，而能够成为新闻的往往都是一些社会问题、灾害或灾难。人们需要一种方法来处理这些负面的信息，而宣传恰恰能满足这种需要。按照一位学者的说法：“如果新闻所提供的信息在倾听者的脑海里已经有了现成的解释，或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答案的话，那么新闻就失去了它令人震惊的特征了”（埃吕尔，1966）。

如果宣传是成功的,那么它根本不会被视为是宣传。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宣传只在别的国家使用,而在美国则不存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政府至少使用三种不同的途径来宣传其思想。其一是通过教育系统,它加强了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价值观。其二是公共关系,政府每年要在这方面花费数亿美元。其三是大众媒体,包括总统的电视演讲和记者招待会(魏斯伯格,197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宣传引发了妇女传统观念的重大转变。战争爆发时,政府意识到为了保持必需的战争产品,需要大量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大军。问题是要激励公众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寻求家庭及妇女杂志的合作。战争期间,这些杂志中充斥着旨在影响妇女对一系列问题的态度的文章,从鼓励食物的定量配给到反映妇女作为爱国者为她们的国家工作和服务的积极方面。这些努力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到了战争末期同样需要强大的宣传攻势来重新强调妇女的家庭主妇角色,因为妇女们从事的工作要转移给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们(霍尼,1984;乔伊特,1987)。

社会运动

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为了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今天的人们更愿意进行集体的、有目的的行动。伴随而来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一种主要依赖于非制度化方式来产生社会变迁的集体努力。

社会学家们在传统上强调社会运动和集合行为的相似性。然而,最近几年,大多数的学者把注意力放在了两者的区别上(福斯和拉金,1986)。虽然集合行为和社会运动都倾向于相对的无结构性,但社会运动持续的时间较长,有更加牢固确立的领袖和内部组织模式,并且具有更有意识的资源动员特征。此外,由于它们是旨在纠正在其支持者看来是不公平的东西,因此,与大多数初级集合行为不同,几乎所有社会运动都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

近几十年风靡美国的社会运动包括民权、反战、女权、反核、环境、反堕胎、支持堕胎合法化、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绝大多数这样的运动都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初级集合行为。例如,在许多大众运动中,有关他们对手计划的谣言对动员支持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几乎所有当今运动的首要目标之一都是有效地利用宣传技术影响公众对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看法。为当代社会运动所青睐的群众示威和游行常常可能转变成骚乱或其他形式的行动群众。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运动的功能就好像是社会试验。如果运动最终是失败的,它就会失去绝大多数的支持者并且逐渐消逝,例如,为使出售和使用酒类饮料永久非法而斗争的戒酒运动。如果运动成功地达到了它的主要目标,那么它将成为社会结构中持久的一部分,如妇女选举权运动。由于社会

运动在促进社会变革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它们可以被看成是处于胚胎期的社会设置或者是孕育着新的群体或组织的温床。

社会运动包括一些重要因素：意识形态、战略和战术，以及领导人。每一要素都能用 20 世纪 50 到 70 年代的争取平等对待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来得到阐释。

民权运动的意识形态最初强调获取基本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如选举权、与白人同校、与任何人一起在公共餐馆中进餐等。获得了这些基本权利的大部分后（尽管有来自种族隔离者猛烈的、并且常常是暴力性的抵抗），运动逐渐转向争取更广泛的经济目标，如职业和住房的机会均等权。在运动遇到来自于代表既存社会秩序的巨大反对的困难时期里，对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对更好未来的憧憬，支撑着运动的追随者们。

正如民权运动的意识形态随时间变化一样，它的战略和策略也在不断变化。早些时候，这一运动推崇合法的方法。“促进有色人种全国联合会”，这个 20 世纪 50 年代民权运动的领导组织，在迫使地区、州和联合政府机构保证非洲裔美国人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应有权利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60 年代初，一些新的组织如“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出现了。它提倡更为积极的战略，包括像游行、静坐、自由乘坐公共汽车和群众示威等等。这些活动吸引了媒体的广泛注意，并扩大了运动的支持基础。到 60 年代末，像“黑色美洲豹”（the Black Panthers）一类的激进组织采取了更具争议性和进攻性的战术，为了宣扬他们要求平等待遇和结束警察对黑人社区的骚扰的要求，他们全副武装地开进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院。

最后，民权运动的不同组成部分是以不同类型的领导为特征的。迄今为止，最著名的运动领袖是极富个人魅力的马丁·路德·金。他凭借慷慨激昂的演说和为民权运动献身的精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相比之下，“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和种族平等联合会的年轻领导者们更倾向于保持相对的匿名性，通过回避人们注意力，集中力量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以此强调他们事业的重要性。同样，“黑色美洲豹”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波比·西尔（Bobby Seale）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十分强调思想的重要性，并将它作为其领导权的首要基础。

1

社会运动的类型

社会运动有许多种形式，主要包括改革、革命、抵抗运动和表意运动。

改革运动

一些社会运动试图通过改变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来改善整个社会，而不是寻求改变基本的经济或政治格局，或社会分层体系的实质（the stratification hierarchy），这些运动被称为改革运动（reform movement）。由于美国社会相对民主的结构，它一直是这类运动的多发之地。改革运动一般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但它们所致力于的变革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代表着 1 300 至 1 400 万美国严重伤残人士的残疾人权利运动是一场规模小、但在不断壮大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致力于执行帮助残疾人的第一个全

国性法案，即《1973年职业再培训法案》。这一法案禁止任何得到政府资助的组织在雇用中歧视残疾人。随着《1990年残疾人法案》的通过，这一运动赢得了另一个重大胜利。该法案规定雇主、公共交通、远程通讯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具有为残疾人提供方便的法律责任。

当今美国的其他改革运动还包括大部分的环境运动、由“母亲反对酒后驾驶组织”（MADD）发起的反对酒后开车运动、受害者权利运动、以及反色情宣传品运动等等。



堕胎政治学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主要的社会运动经历了起起落落，其中包括民权和黑人解放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90年代初，关于堕胎权利的斗争走到了前台。

支持堕胎合法化运动从60年代末发展迅速的现代女权主义运动中脱胎而出，同时与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973年最高法院在罗伊起诉韦德案中判决妇女拥有选择堕胎的宪法权力，运动的支持者们取得了改革运动少有的胜利。然而，在这极富争议的判决后的几年里，一场为推翻这一判决的轰轰烈烈的反堕胎运动发展起来。在来自保守天主教和福音派新教团体的支持下，反堕胎运动在里根和布什当政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来自日益保守的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决限制了在原来的判决中赋予怀孕妇女的权利。这鼓舞了反堕胎运动的支持者，但同时又再次激发了支持堕胎合法化运动的复兴，这一运动的拥护者为维护20年前获得的权利而广泛地动员起来。

正如许多运动的支持者一样，反堕胎运动和支持堕胎合法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多年来都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策略。例如，游说、为同情己方的候选人捐款以及游行、静坐等相对没有争议的方法被广泛使用。双方还都采用了更为激进的策略，从象征堕胎权利支持者的“衣冠假人”（让人想起1973年以前穷街陋巷中非法的为人堕胎者）到炸毁堕胎诊所，以及在反对堕胎的集会中展示保存胎儿的坛子。

1989年一次关键的法庭判决将两个运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主流政治行动上。在起诉生育健康服务中心一案中，法庭确定，各个州有权充分限制妇女堕胎的多种途径。从1989年起的多次选举中，堕胎都是大量投票者头脑中的关键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共识的事实也反映在公众舆论的民意调查中。1989年秋的一次由《ABC新闻》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全国调查发现，只有29%的人支持在宪法修正案中加入堕胎非法的条款。当问及他们是否支持“必要情况下的堕胎”时，54%的人表示支持，45%的人表示反对。就在这次调查中，54%的人反对在得知胎儿畸形时堕胎，85%的人认为母亲不能因为无力负担养育另一个孩子的费用而终止妊娠，92%的人反对将堕胎作为一种事后的生育控制手段。

反对堕胎运动和主张堕胎合法化运动的支持者都能从这些调查结果中得到慰藉；但双方的积极分子必须认识到，任何一方的完全胜利都将遭到很大比例美国人民的反对。正如其他一些积极分子已认识到的那样，有关这些极富争议性问题的政治斗争的最终结果通常是相互妥协，尽管这些运动的支持者对此种解决方案并不满意。

资料来源：ABC夜话，克里斯滕·卢克（Kristen Luker）：《堕胎与母性政治学》（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革命运动

有些社会运动寻求更彻底的社会变革。这些革命运动 (revolutionary movement) 的目的是推翻现存的社会结构, 并用新的制度取而代之。一般而言, 革命运动产生于那些改革运动看起来行不通的地方。当今世界上许多政府都诞生于革命运动。

1979 年发生在伊朗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革命运动之一。今天的伊朗与 1979 年以前迥然不同。多数的伊朗人, 除了小部分西化的精英之外, 在伊朗国王的镇压和独裁统治下都感觉受到排斥。70 年代初期, 当伊朗国王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同时发起对集市店主和伊斯兰教士团体的攻击时, 这两个强大集团之间长期以来建立的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抗伊朗国王。他们对伊朗国王的军国主义、现代化规划、对伊斯兰传统的不尊重以及与西方 (尤其是与美国) 的联系的愤怒已经压抑多年了。伊朗国王对集市和教士所在的宗教机构的攻击引发了群众反抗, 从而导致了其政权的颠覆以及军事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 (贝雷威和斯科波尔, 1982)。

抵抗运动

并非所有的运动都试图引发变革。抵抗运动 (resistance movement) 就是旨在防止变革, 或者是企图扭转已取得的变革。这些运动通常发生在急速的社会变革时期, 例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另一个例子是: 民权运动的胜利导致了反对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种族一体化的“对抗性反应”运动。

最近, 支持堕胎非法团体被动员起来反对在罗 (Roe) 诉瓦德 (Wade) 案中最高法院赋予孕妇在怀孕后的六个月中享有堕胎的权利。“手术救援”之类的团体在堕胎诊所外组织群众示威, 以期吸引公众对他们观点的支持, 从而关闭这些诊所。

表意运动

由于改革、革命和抵抗运动都希望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现存的权力结构, 因此它们在本质上或多或少都带有政治意味。然而, 有的运动并不旨在改变社会结构, 而是希望改变组成社会的人们。这些表意运动 (expressive movement) 试图为其成员提供某种形式的个人改造, 包括使他们得到感情上的满足, 塑造新的个性, 或是接受不同的意识形态。表意运动在本质上可以是宗教的, 也可以是世俗性的。

一项对追随导师梅赫·巴巴 (Meher Baba) 这一带有宗教倾向的表意运动的研究发现: 这项运动为它的成员们解决了许多青年文化与成年社会需求之间的冲突 (罗宾斯和安东尼, 1972)。随着社会整体日趋非个人化和官僚化, 许多年轻人在进入成人时都经历着一些困难, 他们转而寻求亲密的初级群体成员间的支持。“梅赫·巴巴”运动所提供的氛围充满了无拘无束、友好和富于人性的气氛。新成员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成员之间相互支持。这种表意运动不但没有使其成员进一步疏远成人社会, 反而支持和鼓励他们承担起成人的责任。

六七十年代的“人力潜能”运动是将焦点集中于内心解放的世俗表意运

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运动的成员参加偶遇群体、群体疗法和感官意识会议。人们聚集在厄萨伦(Esalen)协会(注:是该运动的中心,也叫加利福尼亚个人发展中心)和一些全国性的治疗中心去“与自己交流”,去认识自己的感受和学习如何更好地与他人交往。因为人们日益感到与社会、与他人和自我的隔绝,所以该运动就是随着这种异化程度的加深而发展起来的(利伯曼、雅罗姆和迈尔斯,1973)。最近的一项名为“新时代”的运动同样寻求为它的成员提供与身体和精神健康相联系的某种形式的个人改造。



绿色和平:拯救地球

1972年,法国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周围海域聚集了大批军舰。一艘名为“维加”的38英尺长的双桅小船大胆地闯入这一地区并成功地阻止了一次核试验的进行。这艘小船的船长叫戴维德·麦克塔格特(David McTaggart),它同时也是一个名为绿色和平组织的环境运动领导者,他的行动使法国人勃然大怒,以至于当他一年后再次试图阻碍他们时,法国人登上他的小船而且殴打了他,使他的眼睛受到严重损害。1987年,为了阻止一次类似的抗议,法国击沉了一条叫做“彩虹勇士”的绿色和平组织的船支,船上的摄影师因此丧生。由这一事件引起的尴尬导致了法国国防部长辞职(布朗,1987)。

前加拿大建筑行政官麦克塔格特(McTaggart)是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位满怀激情和创新精神的领袖,这一组织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富争议性的环境/生态组织。麦克塔格特和他的组织决定保卫地球、海洋和一切生物免受人类的摧毁。该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让人类拥有一个受到保护的、健康的、和平的绿色世界,并且这一组织将与在它看来与其目标相背的任何个人、国家或世界组织进行对抗。

绿色和平组织所采取的一些办法是开创性的和大胆的。它的成员推进到西伯利亚,在他们的小游艇中与俄国捕鲸船相抗衡。他们从俄亥俄州的大烟筒上跳伞以抗议酸雨;在新泽西州,他们堵塞化学管道;还因为在英国企图阻塞放射性废物排放管道而被起诉。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发起抗议,反对在密西西比河畔焚烧有害物质。他们锁住了多蒙山托化学公司在排放有毒废物时需要鸣放的警报器。在一次为阻止捕鲸者的行动中,绿色和平组织工作者坐在位于捕鲸者和其猎物之间的小艇上与捕鲸者周旋,250磅重的携带炸药的渔叉从他们的头顶飞过。1988年,24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为抗议倾泻污物将自己悬挂在纽约的三藩桥上,他们也因此而被捕。他们的行动为中断在海洋中处理放射性物质、减少90%加拿大海豹捕杀量以及延缓商业性捕鲸作出了巨大贡献(布朗,1987;格罗斯曼,1989)。

让许多绿色和平组织工作者最满意的一次行动是从朗吉拉普的马歇尔珊瑚岛上营救了304名居民。人们认为这个岛上的居民被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附近岛屿的核试验泄漏所损害,并且长期受到死产、流产、白血病和畸形的高发生率的困扰。绿色和平组织将居民们载上船移居到附近一个叫做梅嘉坨的较为安全的岛屿上(费尔斯科魏斯,1988)。

由于绿色和平组织善于运用媒体来吸引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他们采用的策略激发了全世界对他们的注意。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曾在幼海象的皮毛上喷上绿漆,使它们再也卖不出去。还有一次他们在双层巴士顶上架起梯子,爬上伦敦“大本钟”挂起反对核武器的标语。麦克塔格特说,“我们的惟一准则是非暴力。阴

友们，依照这条原则我们定能成功。”（布朗，1987）但并非该组织的所有精力都用来制造引人注目的创举。绿色和平组织最主要的工作是调查和收集数据。在最新数据的帮助下，该组织的成员能在任何时刻采取及时的行动。

绿色和平组织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他们依靠的是捐款、一群工资微薄但忠心耿耿的成员以及遍布全世界的志愿者网络。绿色和平组织的总部设在伦敦北部萨塞克斯的一幢四周充满了乡土气息的旧式建筑里。人们穿着牛仔和体恤工作，那里有一种 60 年代理想主义的气氛。但这种不经意的风格只是一种假像。绿色和平组织其实是高度组织化和具有目标取向的，其机构遍布全世界。满腔热情的支持者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建立个人的研究中心。然而，绿色和平运动首先是一群人的努力。支持这个组织的捐款大部分来自于低于 1 000 美元的个人捐助（布朗，1987）。

近年来，绿色和平组织工作人员正致力于阻止法罗群岛渔民捕捉金枪鱼的网所导致的大量海豚死亡，并继续他们反对核武器和垃圾的抗议。1988 年，绿色和平组织开始它的首次预防性行动：致力于保护南极洲的自然环境，反对对其进行开发。它宣布南极洲是一个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公园，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终年的定居点，供绿色和平组织工作者居住和监督俄国在附近海域的捕鱼业。

2

社会运动的过程

虽然社会运动的目的不一，特点也各不相同，但那些成功的运动仍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许多成功的社会运动在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后，为社会所接受，达到运动的巅峰（巴坤亚克，1987；霍珀，1950；道森和格蒂斯，1948；布卢默，1939）。用社会学的术语讲，这个运动到此时已经制度化了（institutionalized）。

社会运动的预备阶段（preliminary stage）的标志是社会不安定，集团间相互冲突以及对社会问题低效而不充分的处理。那些深受影响、焦躁不安、心怀不满且耿耿于怀的人们没有找到他们发泄的对象。这时候出现的领袖更可能是鼓动家而不是组织者。

在接下来的普及阶段（popular stage）中，不满现实者意识到别人的看法与之相同，并且看到通过社会运动来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一阶段最可能出现的领袖是预言家和改革者。预言家以一种权威感和自信心发表讲演，并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灌输给群众。改革家则将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具体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上。

第三阶段是正式组织阶段（formal organization）。此时意识形态得以产生，为运动指引了方向和维持参加运动者的团结。价值观和目标变得日益清晰。与此同时，运动已发展起具有领导层的组织结构、一整套政策和行动纲要。预言家和改革家的领导地位让位给战略家，即那些能把运动推进到底的人。

在制度化阶段（institutional stage）中，这场运动被接受为社会的一部分。运动参与者的理想主义和热情趋于平淡或消失，并且决策已成为运动中几个委员会的事情。这时，管理人员是这一阶段典型的领导者。

社会运动发展的一个现代理论：资源动员

多年来，社会学家在解释社会运动的起源时强调集体性的受挫和抱怨是最关键的因素。也许这一观点的最好例证是在本章前面论述的尼尔·斯梅尔塞在价值累加理论中赋予“结构性紧张”的中心地位。这一观点能很好地解释社会运动以及初级形式的集合行为的发展。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这一传统取向是不全面的。在不否认相对剥夺在社会运动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他们指出即使运动只是发生在社会中的特定时间和地点，但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经历着一定程度的紧张。造成这些关键性区别的是否具备足够可利用的资源（资金、追随者、媒体等等），从而使不满转变成运动的形成。这些社会学家发展了资源动员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关注运动行动者可获得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提出的一些问题，例如：“由运动行动者联合而成的组织是如何获得和动员他们所需资源，并利用它们来促进目标实现的？”（福斯和拉金，1986；奥贝沙尔，1973）。

资源动员理论与传统理论在社会运动分析中的几个关键区别是可以确定的（麦卡锡和扎尔德，1979）。第一点区别涉及到支持运动的基础。根据传统理论，支持运动的最关键资源是一大群愤愤不平的人们。它假定运动的发起主要是因为有大量寻求社会变革的人。相反，资源动员理论注意到：如果他们能够保证相对较少的忠实者的支持，一些尽管只有少数人支持（至少最初如此）的运动也能取得相当大的胜利。这些群体的关键资源通常是来自中上阶层支持者的忠诚以及私人基金会、政府机构、大学和大众传媒的支持（麦卡锡和扎尔德，1973；麦卡锡和扎尔德，1979；海恩斯，1988）。这些运动不是建立在公众的不满基础上的，而是它们必须能够积极地激发起群众的不满（然后这些抱怨就成为他们用以达到其目标的一个关键资源）。

第二个不同之处是运动策略。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些运动必须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来与当局讨价还价，有时甚至是威胁他们，以迫使其进行运动行动者所希望的变革。资源动员学派并没有否认上述行为的重要性，他们补充道：运动领袖还必须花大量时间招募支持者、获得资金以及与目标相似的其他组织发展关系。

资源动员的强大力量之一，在于它认识到当代运动的成功对大众媒体、公共邮件、游说等手段的日益依赖。这样的技术需要新型的运动领袖的产生：较少地去作慷慨激昂的演说家，而更多地去努力成为一位媒体专家。这样的领袖被称为“职业社会运动家”（麦卡锡和托尔德，1973）。在他们的生涯中，这些人经常从这个运动转向那个运动，似乎更钟情于行动本身而不是为了特定的理想。

资源动员理论主要是从对20世纪60年代一些主要的运动的分析中发展而来的，并且反映出许多当代社会学家个人来自大学期间参与运动所获得的运动动力学知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本框架中有着各自不同的主题（皮格罗，1988；詹克斯，1983）。例如，有的学者着眼于运动的长期过程，强调

运动的可得性资源随时间逐渐改变。而另一些学者则更强调短期中获得的忠实工作者和足够资金。有的分析家将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运动中的行动所反映的普遍潮流上（像通常的人权运动），而另一些学者则把重点主要集中在特定的运动组织上。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集合行为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对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而发生的行为。它涵盖了广泛的现象，包括集群、骚乱和恐慌，虽然集合行为是相对无结构化的，但却绝不是完全无章可循的。实际上，社会学家常常关注在集体行为的爆发中显露出的社会结构。

2. 许多社会条件能够引发集体行为，其中之一就是支持性环境因素的存在。第二是在新的或不寻常情况中缺乏明确的规范。第三是由急速的社会变革或在文化中引入了对立的成分引发的价值冲突。第四是相对剥夺感，即人们没有得到他们认为应得东西时的状态。最后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社会控制机制的崩溃。根据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集合行为只有在六个决定因素按一定的顺序发生时才能产生，即有利的结构、结构性紧张、普通信念的产生、诱发因素、参加者的行动动员和社会控制机制。

3. 集群是集合行为最普遍的形式。集群是指有着共同关注点、临时聚集到一起的人群。不确定感和紧迫感使集群区别于普通的社会群体。最不具有结构特征的集群类型是偶合人群：一种包括参与者最低限度的感情投入和相互作用的相对被动的集群。最具结构化的是常规集群，其集合情境都是事先仔细计划好的。为成员提供感情释放机会的集群称为表意集群。社会连带集群给予成员强烈的社会团结感。行动集群是指涉及针对外部目的或对象的集群，他们可能是以暴民或骚乱的形式出现。暴民是指情绪激发的成员将他们的愤怒集中于某个单一目标的行动集群。大多数的暴民有领导人，他们的行动也具有一定的结构。骚乱是指一群使用暴力的集群，其成员的目标常常发生转换。一般而言，卷入行动集群的人们都经历着极大的社会紧张。

4. 有三种理论被用来解释集群行为。感染论认为通过不可征服感、易受影响性和循环反应等方式，新思维方法会快速扩散并形成集群中的共同态度。趋同论认为是人们预先的相似性使他们聚集成集群。新兴规范理论认为，当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成为集群中的新兴规范时，那些不遵从该规范的参与者会感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压力。社会学研究表明，紧急规范理论对集群行为提供了最好的解释。

5. 集合行为不仅发生在面对面接触的人们中，而且发生在广泛分散的人群中。在分散的社会人群中发生的集合行为称为大众行为。虽然大众行为的参与者彼此互不相识，个人联系甚少，但他们都能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恐慌是面临迫近的危险时，为获得安全而进行逃逸的一种大众行为类型。大众

歇斯底里是偶尔当人们发觉他们处于模糊不清、危急和焦虑不安的情形下产生的一种集合行为形式。灾后行为是一种在自然的或其他形式的灾害后产生的一种大众行为类型。流行指的是一时间深受人们喜爱的服装样式或行为方式。时尚是指在短时期内为许多人所狂热追求的一种活动。狂热是一种具有重大和持续影响的程度较烈的时尚。

6. 闲话是指关于他人的个人或隐私之事的闲聊。谣言是指在人与人之间非正式的、未经确实的报道。闲话和谣言的传播形式相对无结构,可作为集合行为的初级形式来分析。

7. 公众是对舆论有共同兴趣、关心或关注的一个分布较散的人群。公众所持的观点称做公众舆论。公众舆论变化广泛,它不仅受到特定情境的极大影响,还受到社会背景、团体成员和意见领袖的深刻影响,意见领袖是对公众舆论有相当大影响的人。

8. 在美国对公众舆论影响最大的力量之一是大众传媒。宣传是指通过唤起人民的感情和偏见来对公众思想进行有意控制的方式。

9. 社会运动是主要依赖于相对非制度化的方式来产生社会变迁的集体努力。社会运动的主要类型有改革运动,它试图通过改变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来改善整个社会;革命运动是以推翻现存的社会结构,并用新的制度取而代之为目标的;抵抗运动旨在防止变革,或者扭转已取得的变革;以及旨在不改变社会结构,而旨在改变参与者本身的表意运动。许多成功的社会运动在其生存周期中都经历了四个阶段:(1)社会不满和不安定的预备阶段;(2)群体意识发展,领袖出现的普及阶段;(3)以结构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为特征的正式组织阶段;(4)运动成为被接受的社会组成部分的制度化阶段。

10. 资源动员理论关注的是领导社会运动的组织如何动员资金、人力和个人的忠诚,并且将这些资源指向他们的目标,而不是将受挫感和不平感作为运动的基础。

推荐阅读书目

1. 克鲁提斯 (Crutis, Russell L., Jr.) 和本尼杰 (Benigon E. Aguirre) 主编, 1993. 《集合行为与社会运动》(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Needham Heights, Mass.: Allyn & Bacon.) 本书广泛收集了近期关于集合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理论性文章。

2. 埃里克森 (Erikson, Kai.), 1976. 《各有其路》(Everything in Its Path.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本书对发生在弗吉尼亚西部的一场灾难性洪水之后的系列社会后果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

3. 埃文斯 (Evans, Sara.), 1979. 《个人政治》(Personal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本书对民权运动和在当代女权运动中兴起的学生新左翼运动

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说明。

4. 甘森 (Gamson, William.), 1990. 《社会抗议的策略》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2nd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本书对影响运动激进主义成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经验性的分析。

5. 麦克菲尔·克拉克 (McPhail, Clark.), 1991. 《疯狂集群的神话》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本书对集合行为的经典理论进行了批判。

6. 莫里斯 (Morris, Aldon B.), 1984. 《民权运动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本书从资源动员理论的视角出发, 对南部民权运动发展中潜在的社会因素进行了重新分析。

7. 查尔斯·蒂利 (Tilly, Charles.), 1978. 《从动员到革命》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本书探讨了有关集合行动及集合行为的研究, 对过去五个世纪以来的社会运动、社会动员以及社会冲突的根源进行了讨论。

8. 扎尔德·梅尔 (Zald, Mayer) 和约翰 D. 麦卡锡 (John D. McCarthy,) 主编, 1988. 《社会运动动力学》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本书收集了一批反映了资源动员理论视角的文章。

社会和文化变迁

变迁，有时是细微的而有时又是显著的，它已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为了能充分地评价美国所经历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个有着血缘关系却又相隔 120 年的大学生的生活方式。

1875 年时，约翰·威尔逊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那个时代，高等教育是一种只有少数美国人才能享有的特权；约翰的父母之所以能负担他上大学，是因为他们家非常富有。约翰乘火车去上学，一路上经过的地方大都是森林和田野。在学校他通过写信的方式与父母以及他的五个兄弟姐妹联系。晚上他在煤气灯下学习，并且所有的作业和学期论文都要手写。那时候校园里没有女生，因为高等教育被认为不适合于她们。约翰假期回家，会到他未婚妻的家里去看望她。

约翰·威尔逊四世是 1995 年的大学生。因为父母离了婚，所以他一直与母亲和弟弟一起生活，他们在机场为约翰送行。飞机穿越蓝天，下面是蜿蜒数百里的特大城市带。他的朋友大都接受着高等教育，其中许多人都来自迅速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学校里，要想和家人联系，约翰只要拿起电话，按几下按键，电脑就会迅速地为他接通线路。屋里晚上用的是电灯，他的计算机也是靠电力运转的。女生大约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一半，而且约翰所住的学生宿舍是男女混住的。他常和好几个女子约会，其中有一个还主动约他出去过。

约翰·威尔逊和他的后代都经历了社会和文化的急速变迁。老约翰·威尔

逊经历了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并且看到了无数使交通和通讯手段更加便捷的新发明的出现。

约翰·威尔逊四世把技术变迁看作很自然的事。他意识到矿物燃料的短缺有一天将会改变他所熟悉的生活。尽管有时处于后工业社会的美国电脑技术和服务性经济也会令人感到不安，但这一切是他所十分熟悉的内容。他已经懂得变迁是正常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有时他还是很想知道将来到底会变成个什么样子。

对社会变迁的研究是社会学家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认识这一普遍的进程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最后这一章的主要目标。

社会变迁的原因

让我们先从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谈起。从非个人的到极为个性化的因素，都可能引发变迁。其中一个极端是属于非个人原因的自然灾变，比如一场火山爆发会使良田掩埋在熔岩之下，从而迫使当地居民另谋生路；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单独个体的执著努力，如甘地为争取结束印度的殖民统治所作出的努力就属于这一类。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注意到要引起社会变迁的七种主要原因：物质环境、人口、技术、非物质文化、文化进程、经济发展和促进变迁的有目的的努力。

1

物质环境

社会变迁最显著的、虽然不是最普遍的原因之一，就是自然灾害，例如，水灾和地震。水灾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像美国西弗吉尼亚水牛湾的水灾后果，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已做了讨论。由大坝的坍塌而导致的这场水灾，迫使那些一直居住在大坝下游谷地的居民紧急迁移。其结果就是：一个曾经紧密相联的社区分裂成为零散的个人和家庭，并且人们发现迁移后很难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系。

并非所有的物质环境变迁都是如此突然而剧烈。比如，工业污染就可能是逐渐形成的，但它同样是改变一个社区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设想一下，对一个渔村而言，水体的污染、鱼类因此而受到的污染或相继大量死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

人口

一个社会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构成的变迁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在第十九章中已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一些发展中社会里，我们能够找到说明人口增长促使社会变迁的最有力的证据，由于他们处于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中间阶段，这些社会目前正经历着显著的人口增长时期。这些增长直接导致了第三世界国

家的巨型城市的增长,而且它们对这些社会中几乎所有社会设置的重大变迁都起着作用。人口增长又直接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耗竭,而反过来这又促使全球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发生广泛的变迁。

人口构成中的变迁同样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美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正在重塑着几乎美国社会的所有方面,这一点在第十二章中有过详尽的论述。又如,首批移民美国的一些群体中存在的性别比例不平衡的问题,还有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人口控制计划都已经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许多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3

技 术

由技术导致的社会变迁(即为了现实目的而利用知识和工具对环境进行控制)往往具有非计划的、似乎是必然的性质。一旦发明了一项新技术,一般来说,人们就会不顾其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重大潜在影响而去利用它。如60年代摩托雪橇在芬兰东北部的斯克特拉普斯(Skolt Lapps)社区中的引入就是一例。由于这种摩托雪橇代替了原来的驯鹿而成为当地人的交通工具,使得拉普斯人很快就依赖上了外来的能源——汽油。结果引起了生活费用的上涨。一个新的阶层“付不起油钱的人”(即买不起摩托雪橇用燃料的人)开始出现在这个从前有着平均主义传统的社会中。但与此同时,摩托雪橇也扩大了人们的社会接触范围,提高了像急诊医疗这类服务的运作速度(佩尔托,1973;佩尔托和米勒-威尔,1972)。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于许多技术发明的采用都没有考虑到它们的长远影响,也没有计划过如何面对这些影响,这一点是令人感到吃惊的;比如,原子能技术的发展、基因配接(gene-splicing)技术和空间探索飞船的开发等等。

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rn)是一位较早研究社会变迁的美国理论家。他在50年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直到今天这一概念对于我们认识技术的社会影响仍然十分有价值。他认为,通常来说采纳物质文化和技术新成果的速度是十分迅速的,这是因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新技术优于传统方法的方面。然而,采纳为适应新技术而进行修正的非物质文化内容的过程,则往往要比前者慢得多,奥格本称之为文化滞后(cultural lag),它是指新技术的采纳和与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的补偿性变迁之间的非协调期。

文化滞后概念为分析长久以来美国社会变迁中存在的一些困境,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洞察力。例如,美国对汽车(物质文化)的接受过程非常快,但到现在为止,美国人仍然排斥一些与引入汽车相适应的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举例来说,美国人应该进一步修改他们有关婚前性行为的规范。与从前相比,现在的婚前性行为现象更加普遍,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由汽车提供的隐私所造成的。同样,一些观察家认为,我们应该发展新型的都市政府(非物质文化),以应对由于城市范围的扩展及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所导致的19世纪以来的城市政治边界越发失去意义的状况,而这一切最终又可以归咎于汽车的广泛应用。一些学者沿着奥格本的分析逻辑,进一步认

为，由于现代的原子能和生物化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使得原本为谋求国家利益而采取的较为理性化政策的战争行为，很有可能转变成为一个灭绝人类种族的机制，这使得战争本身变得不可想象；然而我们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改变我们的政治和军事机构，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应对这一新技术性现实。最后一个例子是，美国的教育体系才刚刚开始对广为人们使用的个人电脑所提供的教学机会作出反应。

4

非物质文化

与奥格本的观点相反，许多社会学家强调非物质文化的变迁要先于物质文化的变迁。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价值观和信仰的社会影响的研究（1905，1930，参见本书第十六章），就是一个把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变迁原因的经典分析。韦伯认为新教有关工作、储蓄和成功的价值观及思想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发展。又如，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对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

文化进程

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提到过，社会变迁既可能由一个文化内部的发展引发，也可能受异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一个文化中的两个最常见的社会变迁原因就是发现和发明，有时它们也被合并在一起称做创新。发现指对一直存在的、但过去却没有被认识的事物的认识，如沃特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现了基因分子。发明则来源于尝试对一个文化中的固有成分以新的方式加以组合。例如，个人电脑或录像机的开发。

文化特质（traits）从一个群体或社会传入另一个群体或社会的过程，如基督教的传播过程，就叫做文化传播（cultural diffusion）。文化传播理论曾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中间盛行一时，而且直到现在，文化传播理论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6

经济发展

另一组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这些因素常常被包括在现代化这一概念之中，而现代化则指较为典型地发生在传统的前工业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广泛的内在社会变迁。

现代化概念通常包括三个关键要素：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层制化。工业化指的是从人力能源到非人力能源的转变以及进行经济生产的工厂体系的兴起（布卢默，1990）。比如，从以前在小作坊里靠手工制鞋，发展到在工厂中用电力机器制鞋的变化过程。城市化（urbanization）（参见第二十章）指的是人们从农村地区向工厂所在的城镇和城市的流动。科层制（bureaucratization）（参见第七章）指的是大规模的正式组织的兴起。现代化的这三个构成要素反过来又导致其他社会设置的变迁，如宗教、政治和家庭的变迁。稍后我们还将在本章中讨论有关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社会学理论。

有目的地 促进变迁

变迁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由人们有目的性的努力构成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变迁。这一原因在工业革命之前鲜为人知，但是它在今天却非常重要。纵观历史，当人们想到变迁时，他们只是把变迁看作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而不是他们能左右的事情。然而在现代世界中，随着我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不断增长，人们越来越试图按自己希望的方向塑造社会。

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近几十年来大型公司中研究与发展部（R & D）的成长。这一部门明显的功能就是使公司能够朝着自己设想的未来而进行商业发展，这将在许多重要方面与目前的情形有根本的差别。今天我们会认为这种对发展的设计是很自然的事，但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埋没了这种活动在历史情境中的新颖性。

我们在第二十一章中所讨论过的、广泛而多样的社会运动的重要性的日益增加，是现代社会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越来越具有人为因素的又一例证。杰出的社会运动领导人，从甘地到马丁·路德·金，他们都成功地获得了其追随者的支持，并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大规模变迁。其他运动，像妇女运动，也已经使私人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变迁。

社会变迁的理论

社会变迁理论包括从对引起小规模变迁的特殊原因的解释，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的根本趋势的抽象而广泛探求。发展这样的理论是社会学创始人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今天，许多社会学家仍然活跃在社会变迁的研究领域，他们以经验研究为基础来解释社会变迁的原因、过程以及方向。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家在回答这些“大问题”上的努力已经完全成功，但是我们对社会变迁的了解确实在与日俱增。

在这里我们将要讨论以下四种社会变迁理论：社会文化进化论（socio-cultural evolutionary theory）、循环论、功能论和冲突论。

1

社会文化 进化论

社会文化进化论是所有关于社会变迁理论中最为广泛接受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社会和文化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地发展，从较为简单的形式向较为复杂的形式转变（伦斯基和伦斯基，1987；帕森斯，1966）。

进化的思想在古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占有主导地位（参见第一章）。他们设想所有的社会变迁都呈线性发展模式，也就是说，沿单一的途径发展。这一设想使它的支持者们论证西方的文明必定是变迁过程的终点，而所有的非西方社会都将最终效仿这种发展模式，这些支持者由此还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和西欧国家天生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更先进。这一早期的进化论

思想发展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在理论上论证了对世界上许多民族实行经济和政治的殖民统治的合法性。

20 世纪以来，单线进化论 (unilinear evolution) 由于其意识形态基础和缺乏经验研究支持的原因，而变得声名狼藉。但是近年来，进化论思想已获得了再生。许多进化论学者设想，社会变迁是多线的。这意味着，总的变迁趋势还是从简单到复杂，但是不同的变迁方式可能发生在不同的社会中。现代进化论思想对于指导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经历的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很有帮助的。

当代社会文化进化论者指出了三个主要的进化论趋势的特殊意义：

第一，技术发展提高了社会控制环境的能力。

第二，群体、组织和社会设置的进一步专门化过程，即社会分化。

第三，社会构成要素的功能性相互依赖，每个社会的构成单位都更加依赖于其他构成单位的帮助而得以执行自己的任务。

英国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正是这些大趋势的反映。当时主要的技术发展包括蒸汽机的使用和纺织生产的机械化。社会分化的加剧可以从新的社会阶级——所有者（资产阶级）和拿工资的工人（无产阶级）的出现上体现出来。家庭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性，这一现象体现了社会功能的日益相互依赖的特性。比如，家庭不再自己做衣服。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开始依赖于纺织工业的发展来获取他们所需的物品。反过来，纺织工业也要依赖家庭购买它的产品，并为它提供稳定的劳动力来源。

研究这些主要进化趋势的当代学者比较注意避免以往进化论者的某些错误。当代学者没有提出这些趋势总是能增加人类的幸福。他们也没有认为这些变迁模式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人的控制的（桑德森，1990）。

另外，现代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趋势在未来有可能掉转发展方向。比如，如今社会的一些部分明显地变得越来越相似，而不是越来越多样化——这正与社会分化相反。例如，大众传播促进了文化的标准化；一些地域、阶级、种族和宗教的差异正在缩小。更有一些观察家认为，一个“世界文化”正在出现，包含着美国的价值观、产品和技术的这一文化正在影响着全球各地的生活方式（麦科德等，1986）。

2

循环论

与认为主要的社会趋势是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的进化主义者不同，其他理论家们认为文化和社会都在经历着一个无方向性的、连续的成长和衰落、挑战和反应的变化模式。循环理论 (cyclical theory) 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尤为盛行。这里讨论的三种循环理论的领域非常宽广，以至于他们常常被看成是历史的哲学，而不是有关社会变迁的科学的社会理论。然而，它们却曾经极大地影响过有关文明的成长和变迁的科学思想。

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在他的名著：《西方的衰落》(1918—1965) 中，把社会看作活的有机体。在斯

宾格勒看来,每个社会都有出生;有成长迅速的童年;可称为“黄金时代”的成熟期;漫长而又缓慢的衰退期;以及最后阶段,一个相对来说较快速的瓦解期,就像其他任何有机体一样,走向死亡。正像他著作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明正处在衰退期,并且悲观地宣称这一发展趋势是无法改变的。尽管现在已经很少有社会学家会赞同他的观点,但是在此书出版 70 多年后的今天,他的哲学思想仍然吸引着许多公众的兴趣。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Toynbee, 1889—1975) 的主要著作是宏厚的《历史研究》(1964) 一书。和斯宾格勒一样,汤因比也认为社会是循环发展的。但是他又认为这种循环是可以重复多次的,并且他对未来持乐观的态度。

汤因比认为每个循环都是以某种“挑战”开始的:最初是为了建立起经济生存 (economic subsistence) 的常规模式,随后是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社会条件。每个挑战都会得到一个“反应”,这一反应是由一个特定文化内的“具有创造力的精英” (creative elite) 发起的。如果这一反应成功了,该社会就能生存下来并继续面对下一个挑战。如果反应不成功,社会将会崩溃。汤因比把这种挑战和反应的循环看作是通向更好的文明的进步。他坚持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特别是英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已达到了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因而成为其他社会效仿的榜样。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观念,使人联想到 19 世纪单线进化论者的思想,所以有些评论指责汤因比是种族中心主义者 (ethnocentrism)。然而,其理论的支持者指出了一点事实,即对西方技术的采用,特别是在农业、工业和医药上的运用,已经使当今全世界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索罗金 (Pitirim Sorokin, 1889—1968) 是一位俄裔美国社会学家。他的历史理论包含在多部头的巨著《社会和文化动力学》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1941) 中,此书是建立在对大量的历史上的社会进行详细的、其中部分是定量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的。索罗金认为存在两种基本的文化形式。在“感知”文化 (“sensate” culture) 中,人类设置 (human institutions) 和符号表达 (symbolic expression) 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感官的需要而设计的。其艺术是形象化的,它的哲学则是基于能被经验性地学习或者说领悟的思想;科学是感知文化的关键设置。另一种文化是“观念”文化 (ideational culture),它主要诉诸信仰。观念艺术是抽象的,观念哲学是以非经验性或者说是超验性 (transcendent) 为基础的;宗教是观念文化中的关键设置。索罗金认为所有社会在其发展中总是在感知文化和观念文化之间变动。在索罗金看来,现代西方是“晚期感知”文化的一个完满的范例。尽管索罗金对这一时代持有相当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乐观地认为,这一文化将最终被更加观念性的文化所替代。

索罗金的理论在社会学家当中引起过许多争论。它常常遭到的批评是有关它没能解释文化为什么和怎样发生变迁。然而,尽管有这些反对意见,但索罗金的思想仍是社会学学术成就上的一个里程碑。

为了了解社会体系中的一个特定部分（如一个群体、一种设置或是一个阶级）为什么能够存在，功能主义会问它在维持社会整体秩序中发挥的功能是什么。他们主要关注于对社会体系的维持，而不是社会内部可能发生的变迁。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所有要素都被假定为是相对稳定的、整合在一起的，并且担负着重要的功能的话，那么变迁又从何而来呢？

著名的功能主义者帕森斯（1951）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各部分之间互相依存的体系，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为体系的维持作出一定的贡献。他认为一个社会体系的自然条件就是均衡，即体系所有要素之间的平衡。但是帕森斯又认为社会变迁是可以发生的，这源于两个因素：它可以来源于一个特定体系的外部，即别的体系中；也可以产生于体系内部的张力和紧张关系。

正因为体系是由互相依存的部分组成的，所以一个部分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甚至可能改变整个体系，造成一种暂时的失衡状态。举例来说，让我们把中学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学校中的各部分（学生、教师、行政管理部门、其他职员）都是互相依存的。这些部分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会被其他各部分所感受到。比如说，来自学校体系以外的一种新的崇尚严谨学风的风气传入学校，将会导致行政管理部门突然对教学质量格外地关注。这一变化会首先被教师所感受到，他们可能会加强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与之相对应的，学生们就会在他们的行动中对这种变化作出反应。但帕森斯认为，系统中的各部分对于变化还是可以适应的，所以该体系的均衡状态将会得到恢复。

帕森斯强调，文化（一个社会的共同信仰、规范和价值观）是维持社会紧密结合的“胶水”，因为它特别不易发生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如果和文化相冲突，其变迁速度将会非常缓慢。比如，政治家们都不大愿意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来禁止酒的消费。在美国的社会规范中，人们对适度饮酒非常宽容，以至于任何想透过政治制度促使这一领域发生重大社会变迁的企图都不会有什么效果。

除其他学派外，功能主义者自己也对帕森斯的社会变迁观点做了认真的审查。最常见的批评认为，它过分强调了外部环境作为社会变迁源泉的作用。虽然帕森斯明确指出社会变迁能够产生于体系内部的张力和紧张关系，但由于他在一开始假设社会体系通常是处于均衡状态，所以只有认为变迁的最主要原因存在于体系之外才是符合其逻辑的。批评家指出，虽然一个实施功能的社会能够满足其成员的需求，并达到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但这种需要的满足只是最低程度上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该社会就会承受严重的内部紧张和不协调状况。因此，批判家认为，功能主义者应该更关注分析社会体系内部产生的变迁泉源（穆尔，1960）。

许多社会学家发现功能主义的理论解释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现实社会比

功能论者所假设的要不稳定得多。并且，功能论观点无法解释多种形式的社会变迁。功能论局限性的最主要发现者是那些从冲突观点来认识社会变迁的社会学家们。

达伦多夫（Dahrendorf, 1959）提出了以下的假设条件作为有关社会变迁的冲突论的基础。

第一，每一个社会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变迁过程；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每个社会每时每刻都表现出不一致和冲突；社会冲突是普遍存在的。

第三，社会中的每一个要素对社会的分解和变迁都发挥着作用。

第四，每一个社会都是以其中一些成员对另一些成员的压制为基础的。

冲突论的主要观点是建立在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之上的。马克思的思想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过。尽管马克思主要关注于社会中由经济因素决定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而达伦多夫和其他当代的冲突论者已经大大地扩展了他们认为冲突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领域的范围。民族和种族群体、政党以及宗教群体也进入到冲突的研究中来。在所有这些领域中，造成冲突的最基本的原因被认为是权力和权威的不平等分配（瓦戈，1989）。因而，在冲突论者看来，社会变迁总要涉及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这种权力变迁可能突然爆发，就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1989年至1991年的事变那样，导致了前苏联社会体系彻底的和突然的结构重组；然而，权力变迁也可能缓慢地发生，就像它对当代美国环境主义逐渐流行的反应那样。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社会变迁的例子就是发生在世界上许多社会中的高速经济发展。近年来，社会学家们的一个主要的关注领域就是探寻能够解释这种经济发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变迁的理论。人们的大部分兴趣都集中在目前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身上，即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

1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

第三世界社会，有时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它们现在正处在与西方国家在上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阶段相类似的发展阶段。然而，第三世界现在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当时所具有的发展特征截然不同。在西方，经济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进化过程。与之相比第三世界的发展步伐要快得多：第三世界各国都企图只在几代人之间就从牛车过渡到飞机。因而第三世界都存在严重的文化滞后问题。物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社会和文化的适应期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落在了后面。这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动乱，甚至在一些国

家形成了对工业化的抵制活动。

最难改变的要算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如有关宗教、家庭和适当的两性角色的问题。学者们已经指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目前文化中的价值观与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国家文化中能找到的价值观非常不同。第三世界的宗教倾向和对工作的态度，甚至对繁荣的看法都使这些国家不能很好地适应工业化过程（迈德尔，1968；雷普托，1985；吉尔，1987）。举例来说，当60年代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公司在埃及设厂时，意大利人认识到，对于要精确到分秒的程度来认识时间，这一扎根于西方人思想中同时又对工业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观念，在埃及文化中几乎完全不存在（麦科德等，1986）。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地区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刚开始工业化时人口就已经过剩了，而且在经济的每一步成长中都伴随着人口的跳跃式增长。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国民生产率提高了，但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人均收入没有什么变化。

另外，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几乎总是被中央集权政府（centralized governments）所计划 and 管理的。这与西方的情况不同，在西方，政府倾向于避免大规模介入市场。更为不幸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政权往往缺乏实施它们雄心勃勃的计划所必需的政治稳定性和大众的支持（穆尔，1963，1979；格里芬，1989）。再进一步来看，这些社会通常缺乏足够的、具有高技术素质的和动机明确的专业技术人员，如工程师、经理、农业专家和医生。没有这些人员，经济发展是很难成功的。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还很年轻。大部分的非洲国家直到60年代才获得独立，并且许多国家到现在还处在建立其合法性的过程之中。大多数国家缺乏文化的凝聚力和经济的稳定性，而且很少有国家能够建立起完善的教育体系以促进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通讯体系也不够完善；事实上，非洲内部电信和邮政服务的效率非常低，以至于信件常常要绕道欧洲而不是从一个非洲国家的首都直接传递到另一个国家的首都。一些观察家认为，为了使非洲认识其经济潜力，它的50个国家将必须被更少的区域经济实体所替代或是被一个单一的大陆联合体所替代（马丁和坎达尔，1989）。

2

第三世界的 经济困境： 冲突论的观点

为什么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还很贫穷？许多分析家，特别是那些被称为“现代化理论家”的学者力图从我们上面讨论过的那些要素的某种组合中寻找答案。而冲突论者却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把另外一些条件考虑进来。他们指出：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与西方国家发展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沃尔顿，1987）。

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前都是殖民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曾经被外国势力所控制过。虽然最明显的殖民主义已经结束，但这些国家发现自己又陷入另一种外国势力所统治的体系之中：一个全球的经济和政治互相依存的复杂网络。在这种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世界体系的新的世界秩序中，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自决权并不比它们在殖民时代多多少（格杰森，1980；王和迪桑那亚特，1984）。说得更确切一些，冲突论者认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实际上正阻碍着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即一个国家力图通过控制其他社会以剥削他们的自然资源的过程）的形式下，经济上发达的国家通过介入经济和政治生活而间接地控制了其前殖民地地区（阿尔卡尔德，1989；弗兰克，1969；巴朗，1957）。

针对第三世界的帝国主义政策始于殖民主义时期。那些占据了第三世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兴趣。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从殖民地掠夺促进其自身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西方人操纵的殖民地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殖民列强的利益（吉尔和劳，1988；安德森，1974）。他们几乎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使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自足的社会。

因而，这些国家一方面依靠出口数量很少的原材料，而同时又不得不进口几乎所有的成品货物。更严重的是，第三世界国家边界的划分是基于帝国主义强权在殖民化过程中专断的决定。而殖民地地区的传统文化边界被普遍地忽视了，从而导致了新生殖民地国家的内部通常存在着严重的不同敌对群体。

当殖民统治结束后，大多数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麦科德等，1986；安德森，1974）。当地殖民时代的经济秩序仍然保留着，它要么是直接因为西方的经济利益的存在，要么是间接地通过西化了的本国领导人得以维持。“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一词专指这种西方经济统治在殖民地的长期延续。

近年来，冲突论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已经从建立新的殖民地转移到继续从先前的殖民地中尽可能多地掠夺资源上来。按照“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观点，他们是通过使先前的殖民地国家保持一种在经济和财政上依附于他们来达到这一目的。许多坚持理论的人都把美国看作是这种现代新殖民帝国主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认为，美国通过自己的对外援助和军事政策，来极力阻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成熟起来（弗兰克，1969）。

上述许多争论都在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下归结到一种全球的和历史的情境当中来。主要依据于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观点，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在400年前起源于西北欧的全球经济中，现代国家不是处于统治角色就是处于从属的角色（沃勒斯坦，1974，1979，1980，1990；霍普金斯等，1982；罗斯托，1987）。

核心国家（core nations）的特征是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强有力的国家官僚机构、军事机构以及高生活水准。边陲国家（peripheral nations）向核心国家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同时又为发达国家的许多产品提供市场。今天，处于统治地位或者说是核心地位的国家包括西欧、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而处于从属地位或者说边陲的国家则位于拉美、亚洲和非洲。世界体系理论还指出了第三类：半边陲地区，即部分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巴

西、台湾和韩国。

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观点是，核心国家能够控制全球社会变迁的进程，并且往往对边陲国家造成伤害。这一理论还强调，实施这种控制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并且认为核心国家能够把世界经济低落时的许多损失转嫁到边陲国家身上去。世界体系理论家利用这些观点来解释为什么自1973年以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贸易、经济条件和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的下降过程（马丁和坎达尔，1989）。

世界体系理论已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已发现跨国公司对边陲国家经济的控制程度与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之间有显著的关系。经济控制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也越高（吉尔和劳，1988；埃文斯和廷伯莱克，1980；本斯切尔和鲍尔默·曹，1979）。另一个研究显示（肯特尔，1981），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都与这些国家的边陲特点有关（参见第二十章）。

然而，针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批评认为，这些观点并没能对第三世界的实际发展模式作出全面的解释（希罗和霍尔，1982；希罗，1986；哈珀，1989）。从冲突论的观点来看，那些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国家应当是最穷的国家。但实际上，它们常常是第三世界中较为繁荣的社会。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拉丁美洲国家的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然而，尽管有这些批评，但很少有人会否认冲突理论开启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

3

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了广泛的社会学分析的对象。选中他们的理由在于：由于这两个国家的规模，它们的经济、人口、政治和社会体系变迁在世界上会产生非常大的反响。其中一个或这两个国家的显著经济增长会改变世界权力的平衡状态，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严重的经济滑坡都会导致世界资源的一次大规模的重新分配。

印度

印度的工业化始于二战之后，即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结束后，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当政成为总理的时候。在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援助下，印度发展了纺织制造、化肥、水泥和其他急需产品的工业。随着这些工业的发展，其他工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了。今天，印度工厂的产品常常是相当尖端的，如喷气式飞机、抗生素和重型机械等（麦科德等，1986）。

然而，印度社会要完全实现工业化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1989年，印度从事工商业的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9%，而70%的劳动力还在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世界年鉴》，1992）。印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小村庄里，那里的大多数劳动仍是用传统的手工方式进行的。这个国家仍然非常贫穷，1989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er capita gross national product）只有530美元，而相比之下美国却是21 100美元（人口资料局，1991）。

像其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过度城市化是印度的一个主要问题。城市的急速发展大大超过了社会对城市人口的经济承载能力。孟买的人口超过了1 150万，而加尔各答的人口是1 200万。这使得它们名列世界人口最多的十个城市之中。

和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况相比，印度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也是相当快的。人口过剩加上食物短缺，使印度长期处于大规模饥荒的威胁之中。正是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印度的人均经济增长水平自二战以来没有什么显著的提高。更进一步来说，人均粮食占有量实际上还低于20世纪初的水平（雷普托，1987）。自1977年以来，全国性的计划生育行动使出生率有了微小的下降。但是想要使印度的人口增长停下来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

除了过度城市化和人口过剩问题以外，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呢？社会学家早已注意到，印度一直受到种姓制度的阻碍，这是一种封闭的社会分层制度，虽然印度官方已经废除了这一制度，但是至今印度社会中仍然残存着它的一些成分。在西方的工业化过程中，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然而在传统的印度文化中，它不允许个人有向上流动的努力。并且，印度的价值观念体系不注重一些对于工业化来说非常重要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品质，如对财富和权力的获得以及技术上的创新精神等等。

冲突论者认为印度的困境既产生于它的国内问题，也是由于其殖民后遗症以及对国际经济的依赖所造成的。在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中，它一直非常依赖美国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并不能总是符合印度的最佳利益。

然而，印度经济发展的前景并不完全是暗淡的。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从前严格的贸易限制被取消了，印度开始接受跨国公司。印度还开始与日本这个传统上也有着封闭文化的国家建立合资企业。人们期望新生的印度中产阶级将会更加促进当今印度对商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视（麦科德等，1986）。

中国

在二战以前，印度和中国大致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两个国家都很贫穷，占支配地位的是有着简单技术的农村经济被淹没在高速人口增长和国民较低的识字率（literacy rate）之中。然而二战之后，中国和印度走上了非常不同的现代化之路。在印度，对经济的计划受民主原则和私有及国有企业的混合经济的共同指导。

中国经济的重组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经济计划曾经是从前苏联那里借鉴来的、非常严格的计划经济模式。所以主要工业和金融企业曾经直接受国家的控制，并且农业也是集体化的。尽管如此，管理和生产仍然处于不足状态。其体系的刚性和管理者群体中缺乏技术专家，造成了效率的下降。同时，又因为中国人缺乏技术性的技能，其现代化起步较晚，直到1958年才真正全面开始现代化进程。1989年，69%的中国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劳动，相比之下，只有18%的人在工商业工作（《世界年鉴》，1992）。

这种起步较晚的现代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城市化速率一直低于大

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上海和沈阳，在80年代初期，其人口实际上还经历了略微的下降。

中国人在过去的40年中，对他们的发展道路已经进行了几次调整。50年代建立起来的集体农业社在60年代被人民公社所代替。与集体农业社不同（集体农业社被组织成“生产大队”（production brigades），尤其是取消了传统的家庭在农业劳动中的作用），人民公社则建立在较小的“生产队”（production teams）的基础之上，一个生产队大约有33家农户，更强调自给自足和家庭的作用。因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缓慢、但是稳定的增长。

接下来，在80年代，中国的政策又有了一次转变。把收入与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挂钩的改革促成了农村经济的又一次进步。1983年，农村公社被解散，到了80年代末，中国农业总体中的60%脱离了计划体制的控制（《世界纪事》，1989）。在工业化方面，中国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从1978年到1983年，中国工业生产提高了50%，而且，整个8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平均10%左右的速度递增。同时，与印度一样，中国开始寻求与其他国家更加广泛的贸易关系。甚至展开了有关允许跨国公司在中国油田进行运营的磋商，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磋商的结果还很有限。

比较

如何来比较印度和中国？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这两个国家有着较接近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是360美元，印度是350美元（人口资料局，1991c）但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一直是印度的两倍。分析家很快就认识到，中国较高速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被解释为他们非常成功地减缓了人口的增长。

为了得以继续发展，印度需要更多的合格工人和更强的教育体系。1990年，印度的识字率只有48%；而中国则是73%（《世界纪事》，1991）。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把更多的市场激励机制引入其经济体系。

尽管印度和中国都几乎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水平，这确实是一个成就，但是他们都仍然名列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行列之中。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和中国都还在继续与阻碍他们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臃肿的官僚体系以及传统作斗争。

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成就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最成功的是环太平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在这些地区和国家文化中强调努力工作、具有竞争性的劳动力价格以及务实的政府。实际上，这四个较小的地区和国家迅猛的经济增长以及其充满活力和进取的表现，使其在世界经济中赢得了重要的位置。香港已经成为了企业家的天堂和世界金融、制造以及贸易中心；韩国的微波炉产量已超过了日本；新加坡已经从贫民窟变成了摩天大楼，并为高科技增长创造了一个适宜的发展环境，以至于人们给它起了“硅岛”这一绰号；台湾发展了广泛的出口型工业（罗恩和阿姆，1989）。目前，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都在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并且期望加强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力量（维特，1987）。

现代化的构成要素

经济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现代化”是指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内在的社会变迁。为了建立一种现代化理论模式，社会学家们分析了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以及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哈珀，1989；穆尔，1979；霍塞里茨和穆尔，1963；克尔等，1960；斯梅尔塞，1959）。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建立在本章前面所介绍的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

1. 经济关系从其他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在前工业社会中，经济关系是以家庭和亲属关系、种姓或阶级联系，以及宗教认同（religious identities）为基础的。在工业社会中，经济行为已大大地独立于社会网络中的其他部分。

2. 工厂体系改变了工人与他们工作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是最早注意到这种变化的学者之一。他写到，工业技术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劳动专门化，使工人们感到自己失去了原有的、在生产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力量，并且自身被异化了。在前工业时代，生产产品的质量主要依赖于工人的技巧、判断力和经验。但是在工厂，生产的质量由机器来决定，工人们则必须使自己的动作适应机器的运转。

3. 劳动力的主要经济活动从第一产业的农业和自然资源开发转向第二产业的制造业，随后又转向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如办公室、销售以及教育工作。表 22-1 显示了一些国家中三种产业各自的经济活动所占的比例情况。

4. 现代化使许多新的职业角色得以发展起来。人们离开了传统的工作，进入到新生的行业中来，如熟练和半熟练的工厂工人、办事员和推销员以及企业管理人员。

5. 职业角色的专门化导致了一种新型的、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的产生：行政管理组织（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这一部分工作者由经理和生产监督人员组成，他们使许多专业工作得以协调和统一，从而保证他们能有效地互相紧密配合促进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管理活动越来越变得专门化，导致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分化、一体化或协调，进一步分化、再一体化的循环过程（斯梅尔塞，1968；赫恩，1988）。

6. 新的职业角色的发展增加了地域和社会的流动。工业雇佣制度要求农村家庭离开传统的环境向城市流动。反过来，这种地域上的流动又导致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7. 社会分层体系发生了变化。财富和职业变得比出身和血统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先赋地位趋向于被自致地位所代替，并且，封闭性的社会分层体系也变得越来越开放（参见第九章）。在社会内部也经常发生一些权力的再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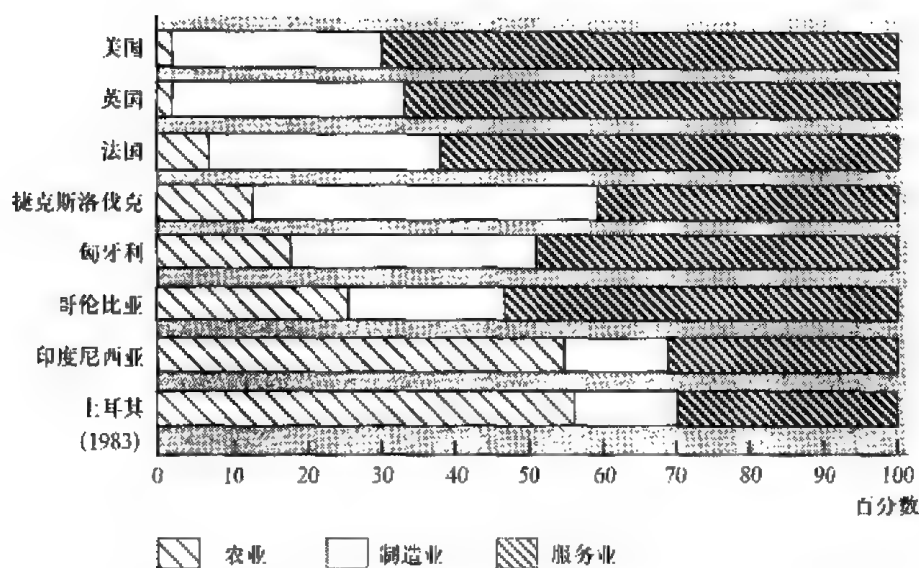


图 22—1 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受雇人数百分比，1985

现代化包涵了农业劳动工作比重的下降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业和服务业工作比重的上升。

资料来源：《劳动统计年鉴》，1991（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办）。

8. 因为核心家庭能更好地适应工业社会，所以尽管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一直没有完全消失，但正在日趋瓦解。在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中可以从事一些生产性劳动的年龄很大的和幼小的劳力，在工业社会中成了非生产性人口，因为他们不能从事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他们不再是经济资产，而成了债务。相反，许多妇女已能在社会上找到工作。她们更大的独立性改变了原来的婚姻关系，反过来，这种变化又改变了家庭生活的特征。家庭结构中减少了独裁性而增加了民主性。家庭作为日常生活全天中心的作用减少了，而更多的是人们夜晚的归宿。

9. 家庭和亲属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由于社会和居住地流动的压力而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国家机制。

10. 在世俗化（secularization）过程中，一些宗教信仰让位于理性和科学。随着宗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它越来越与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分离。

11. 大众交往、大众教育，以及最终的大众文化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一些艺术形式（如音乐）变得标准化和商业化了。这些发展变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形式的退化。相反，因为文化透过一些新的途径而得以与更加广泛的听众交流。

12. 在多数现代化国家，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制政治权力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大多数政府都采取自由经济政策。而在目前的第三世界，政府控制着经济的情况很普遍。但政治参与活动增加了。

13. 最后,现代化过程伴随着人们的心理的和价值观的变化。一些理论家认为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是伴随现代化而产生的,实际上他们是发展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现代化只可能发生在价值观和心理特质能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中(哈曼,1988;麦克莱兰,1967;哈根,1962)。这些变化包括:对接受新事物以及新发明的开明态度;民主导向的政治思想;坚信个人以及人类的尊严和对科学技术的信赖(英克尔斯,1974;英克尔斯和史密斯,1974)。

趋同论

就像进化论的早期支持者一样,现代化的早期支持者认为这一进程将会最终影响到世界上的所有人。这一理论假设,每一个社会最终都会经历上面所概括过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观点可以用卡尔·马克思的一句话来概括:“那些工业发达的国家正是不发达国家未来的形象。”所有社会都将因现代化过程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观点被视为是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的理论核心。

世界上的社会如此之多样化并且又处于多种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事实,意味着上述的主要概括必然存在许多例外。这些例外给批评趋同论的人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例如,有人指出,趋同论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世界各地之间极大的环境差异,如拥有的可耕地和能源的多少等等。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保护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举例来说,沙特阿拉伯具有与经济上发达的西方国家同等水平的国民人均收入,但却保持着一种近乎封建的制度结构,妇女的权利很少,扩展家庭的权力仍然十分强大,并且在这里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批评家还指出,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过度城市化问题,而且他们不可能创造出一个足够强大的经济基础来为那些成百万涌入城区的人提供像样的生活标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这些国家更注重农村而非城市的发展,因而其结果是,他们的农村人口数量与西方的相比非常大。

总的来说,那种认为所有社会正趋于一致形式的观点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甚至连现代化理论家们也开始承认他们最初的理论模型有点太僵化了。这一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最近给自己提出了两个问题:是否所有社会都在日趋一致?是否存在一个通往共同目的地的趋势?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比以前更肯定,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穆尔,1979)。然而即使这些社会不是朝着一个共同目的地前进的,但我们还是会惊奇地发现上述的现代化要素在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不断地重现着。

发达社会的未来

差不多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想尽快地发展其经济,尽管他们的发展道路并不相同。其中有些国家渴望在未来的几代人之间(大约是50到75年)达到现在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水平。到2000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走过工业发展的早期和困难时期。可是,正当这一发展在第三世界展开的时

候，西方社会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同样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

1

后工业社会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发达国家正进入一个“后”工业时代——它与工业时代的不同就像工业时代与前工业时代的差别一样。他们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这一概念来概括发达西方社会的一些主要发展趋势。丹尼尔·贝尔（1976）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以下就是贝尔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后工业时代与工业时代所不同的一些主要差别。

1. 在工业社会中，最典型的经济活动是制造业、农业和资源开发业，如采矿业。而在后工业时期，服务行业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服务行业范围广泛，如商业、政府、交通、通讯、保健和教育事业等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发达国家中，大多数工人都是在服务行业就业。

2. 如果说工业时期是机器的时代，那么后工业时代就是电脑的时代。许多工作方式，像学习和交往，都受到自动化和电脑化的深刻影响。

3. 在工业时代，蓝领工人占大多数，然而在后工业时代，劳动大军将主要由白领和中产阶级工人组成。这一趋势与服务性工作的成长以及自动化和电脑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动化和电脑化使工人离开了直接的生产劳动。与此同时，行政管理人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系统分析员以及其他白领工人的需求却迅速增长。

4. 后工业社会的问题一般都需要通过高技术的途径来解决。因而社会对知识和技术给予高度重视，而且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职位都要求有长期的教育准备。与工业时代那些缺乏正规教育的企业家不同，后工业社会中的关键性工作人员都是些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专家。

5. 如同商业主导着工业时代一样，政府将主导后工业时代。中央集权的政治倾向将会代替透过市场发挥作用的非中央集权的决策过程。国有部分的经济（即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将会增长，并且它与私有部分之间的界限也将变得较为模糊。会有更多的人为各级政府部门工作，尤其是在那些社会服务、工业管理和自然环境保护机构中工作。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近期所发生的事情又对这一概念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近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政治气候对日益增长的中央集权化和政府的控制行为表现出反感（艾森斯塔德，1992）。

批评家还指出，后工业社会的许多特征和工业社会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一些现象，如阶级冲突、工人的异化、种族隔离以及低于生活标准等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而且很可能一直存在到可以预见的未来。

批评家们还指出，后工业社会有可能导致人们对未来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到90年代初期，人们已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前景黯淡。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失业、环境问题以及社会冲突正在持续不断地困扰着全世界的现代社会。

悲观主义 情结：增长的 极限

近几十年来，一种对发达国家未来的悲观看法越来越流行起来。这一观点极大地促使我们去保存资源，重新评价我们对增长取向的特殊喜好，并且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遵从“越少的增长才是更好的”的信条。这种态度被称为增长的极限的观点（the limit-to-growth perspective）（梅多斯等，1972；布朗，1988）。

增长极限的论调在一份写给卡特政府的题为《致总统的 2000 年全球报告》（The Global 2000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arney, 1980）的文件中得到了着重说明。这一历时三年的细致研究，试图对全世界的环境、资源和人口情况进行综合性的预测。报告最后的结论是：

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的话，2000 年的世界将比现在更拥挤、污染更严重、经济上更加不稳定，并且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相比更容易崩溃。未来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已清晰可测。尽管物质生产将会更加丰富，但那时的人们在许多方面将比今天的人更贫穷。

美国人一直以来只知道追求“更大”和“更好”。除了一些小的挫折之外，美国在上两个世纪中一直朝着全面工业化的经济和更高的生活水平的方向不断进步着。但是，能否有足够的自然资源以保证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的高劳动力成本是否会使美国产品因价格因素而被挤出国际市场？并且，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即使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下去，也是以极大的损失为代价的。工业污染已经严重破坏了我们的自然环境，而且从环境条件来看，我们的生活水准也有所下降。难道我们还愿意继续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吗？我们能负担得起吗？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

到 90 年代初期，增长极限的讨论在美国有了新的转折。面对来自日本和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激烈经济竞争，人们越来越关注于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美国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收缩。一个越来越被关注的观点认为，如果说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权还没有经过其发展的巅峰的话，它至少正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肯尼迪，1987）。

因此，许多当代学者都在关注于分析目前的变迁，以及美国为了保持其在全球经济上的竞争性而必须构建的组织性结构。一些人认为，制造业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基础，而且美国无法承受放弃其世界市场中的工业角色（科恩和兹斯曼，1987）。其他一些人认为，官僚体系应该进行重新设计，从而创造出能够增加生产力的工作环境（米罗夫，1987）。还有一些人指出，全球的相互依存关系呼唤一种新的战略、思维方式以及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协作努力（普尔和斯托莫斯，1989）。

乐观主义 情结： 未来主义

其他一些社会预言家们反对悲观主义的增长极限的观点。这些乐观主义者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被称做“未来主义者”（futurists）的一群作家。未来主义者一般都不是学者，但他们所偏好的对遥远未来及其对我们影响的思

考,使得他们变得非常流行。虽然未来主义者对未来将会带来什么,意见并不十分一致,但是他们确实都认为未来充满了希望。

科恩(Herman Kahn)可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名的未来主义者之一,他在《即将到来的繁荣》(The Coming Boom, 1984)中预言:美国将很快经历一个较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繁荣期。科恩的理论核心来源于他对美国经济体系的信任。他认为目前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暂时的压力。科恩认为一旦这些压力减退,美国将会进入一段表现为长期的资本增长、更大的储蓄额、不断增长的现金流量(cash flow)、生产力层次的提高以及对通货膨胀更加有效的控制的巨大的繁荣时期。

科恩还认为,“在科技领域,美国有遥遥领先于其竞争对手的潜力”。他预言未来将给高科技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这些发明包括能更有效地利用的能源(cost-effective sources of energy)、生物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保健和医疗成本的降低、更有效和清洁的交通工具、有想象力的电脑网络以及食品制造方法的进步。科恩认为,这些进步将促使美国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并且带给美国人的生活“一个更新了的激动感觉”(sense of excitement)。

科恩有关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断言是他论述的关键部分。他认为,美国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过去的成就,并且在过去的荣誉面前停滞不前。美国需要一个制度化了的、强有力的“关于进步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progress)。虽然科恩预计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将在促进这一必须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中充当一定的角色,但是他还是认为政府是起关键主导作用的力量。

另一个杰出的未来主义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预测与假设》(1983)中,给出了他关于人类改变社会和自然景观的一个综合的观点。在托夫勒看来,那些对变迁持悲观态度的人,错误地把过时的逻辑运用于新的环境。例如,目前流行的大多数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工业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但这些却不能完全地应用到我们目前所处的后工业社会中来。托夫勒解释说,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引出了一个以全新的个人价值观、社会设置和工作组织为特征的重构过程。

托夫勒预见这些变迁的结果将是,大量的新型组织形式的涌现,将会取代现在的工厂和办公室这些使人失去人性的环境。未来将拥有经过改造的工作(customized job),以及极大的个人独立性和创造性。托夫勒说:“人们将不再是通过更加刻苦的工作而成功,而是通过更加灵巧的工作而成功”。

最后,未来主义学者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和阿布迪恩(Patricia Aburdene)在《2000年大趋势:90年代的十个新方向》(Megatrends 2000: Ten New Directions for the 1990s, 1990)中勾勒出了他们的一套最新的论断。同科恩以及托夫勒一样,奈斯比特和阿布迪恩认为未来的全世界商业活动是有希望的,而且一个全球规模的商业意味着国际关系的进步,即束缚着人、货物、服务以及货币的流动的障碍将被打破。

奈斯比特和阿布迪恩还预见,生物技术的进步将继续成为提高世界人口健康和幸福程度的最重要的力量。将会有新的药品和疫苗被发明出来;治愈艾滋病和癌症(甚至是普通感冒)的新药可能在世纪之交被发明出来。奈斯

比特和阿布迪恩还预言了艺术的复兴，即舞蹈、音乐、戏剧和文学将在 21 世纪得以复兴。宗教的复兴也将迫近。美国 60 年代以传统著称的一代人将回到教堂，虽然这些教堂也许不是他们以前所去的那种教堂。

无论这些变迁是否真的会到来，我们在心里一定要认清大多数社会变迁背后的推动力是人民。并且，尽管现代世界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存在如此之多的人类对社会变迁作出努力的方向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导引着社会走向积极的发展目的地。

总结与关键概念

1. 社会科学家考察了物质环境、人口、技术、非物质文化、文化传播过程、经济发展以及促进变迁的人为努力等等引起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自然灾害可能引起社会混乱，从而又导致人口规模的和人口构成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为了现实目的而利用知识和工具来控制环境）常常会导致深远的变迁。奥格本认为在物质层面文化的变迁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滞后——即物质的或者技术进步的采纳和与之相适应的必须的非物质文化变迁之间的一段不适应期。社会变迁也可能由非物质文化所引起。比如，新教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体系的兴起就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传播，即文化特质从一个群体或社会传到另一个群体或社会的过程，它也会促成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也有关系。现代化指当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所发生的内部社会变迁。工业化指从人力能源到非人力能源的转变，以及工厂体系的兴起。其他与现代化相联系的趋势包括：城市化和官僚制度化。促成变迁的人为努力，如研究和发展部门以及社会运动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的原因。

2. 四种主要的社会变迁理论是：社会文化进化论、循环论、功能论和冲突论。近年来，社会文化进化论又得到了重新关注，它认为社会和文化都处在逐渐的发展以及从较简单到更加复杂形式的变化之中。进化论者强调几个关键趋势的重大影响：技术发展、社会和文化单位的社会分化，以及构成社会的那些单位之间的功能性的相互依赖。但是，这些进化变迁未必就能增加人类的幸福；人类可以控制这些变迁，而且它们也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它们在将来还可能改变发展方向。

3. 与那些认为社会通常会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的进化论者不同，循环论者认为社会不断经历着没有方向性的增长与衰退的循环。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就像个体的生物组织一样，经历了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汤因比指出了社会挑战和反应的再循环，索罗金认为社会在感知文化和观念文化之间变动。

4. 功能主义者，如帕森斯，假设社会体系中的部分通常是促进整体社

会的均衡状态的。社会变迁可能来自体系之外,或者产生于体系内部的张力。但大多数功能主义者都把变迁的外部原因视为是最重要的变迁因素。体系内一个部分的变迁会引起大多数或者是所有其他部分的变迁。

5. 冲突论学者认为社会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变化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的每一个要素都在这种变化中发挥着作用,而且每一个社会都是以一些社会成员对另一些社会成员的压制为基础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是冲突论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认为,由经济因素决定的社会阶级是最重要的冲突群体,但其他冲突论学者研究了民族、种族宗教群体及政治党派之间的斗争。

6. 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经济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现在正处于这一过程之中。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国家曾经发生过的经济发展阶段有所不同。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对来说是缓慢渐进的,而第三世界国家必须迅速适应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因而这种变化往往与他们的一些文化价值观以及信仰发生冲突。人口过剩和对经济的中央集权控制更使今天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不同于19世纪西方的工业化过程。

7. 冲突论者强调指出,发达国家,如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有计划的剥削,是这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他们还强调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地历史。他们认为过去的殖民主义现在已经转变成了经济新殖民主义。依附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大部分的经济困境都源于他们在经济上从属于那些较富裕的国家。

8. 世界体系理论断言,当今的各国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作用是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像美国这样的核心国家属于经济发达国家,他们统治着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 and 边缘国家,这其中包括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核心国家正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而迫使边缘国家处于不发达的状况?

9. 现代化包括:经济行为从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中间分离出来;劳动异化程度的上升;伴随着工作角色的相应变化,经济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变;行政管理活动的细致化;地域和社会流动的增加;先赋地位影响力的下降和随之而来的自致地位重要性的扩展;扩展家庭的衰退;社会控制的正规化;世俗化;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增长;政治权力的集中;以及人们的心理和价值观的变化。

10. 由于现代化进程导致所有社会都将越来越相似的观点被称为趋同论。批评指出,人们所期望的社会趋同现象并未发生。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情况和西方不同;一些第三世界社会更注重农村而不是城市的发展;而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重大的区别。

11. 后工业时期的社会发展具有几个基本特征:(1)服务行业继续扩大并逐渐地统治了整个经济;(2)许多劳动形式被自动化和电脑化体系所代替;(3)劳动大军主要由白领和中产阶级工人组成;(4)社会对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给予高度重视;(5)政府成为社会中的统治力量。

12. 一些人认为发达国家将面临一个有限经济增长的未来, 而且美国将进入衰落期, 未来主义者的回答是, 我们当前的状况只是一些暂时问题造成的, 并预见了一个即将到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繁荣发展阶段。

推荐阅读书目

1. 丹尼尔·贝尔 (Bell, Daniel.), 1976.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这是有关后工业社会主题的一本经典之作。

2. 西奥多·卡普卢 (Caplow, Theodore.), 1991. 《美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American Social Trend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本书是有关美国社会生活各层面当代发展趋势的一个简要的、可读性强而且充满经验性信息的概括研究。

3. 丹尼尔·谢罗德和罗伯特·默顿 (Chirrot, Daniel, and Robert E. Merton.), 1986. 《当代的社会变迁》 (*Social Change in the Modern Era*.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从修正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来评说西方历史上的社会变迁。

4. 斯坦德利·埃森等 (Eitzen, E. Stanley.) 主编, 1989. 《重塑美国》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本书是有关当代全球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对社会影响的争论性论文选集。

5. 查尔斯·哈位 (Harper, Chales L.), 1993. 《社会变迁研究》 (*Exploring Social Change*.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这是一本详尽的有关社会变迁的大学本科高年级教科书。

6. 保尔·肯尼迪 (Kennedy, Paul.), 1993. 《为 21 世纪做准备》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本书是对美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透彻的分析。

7. 罗伯特·理查 (Reich, Robert B.), 1992. 《国家的任务》 (*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Vantage.) 这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讨论, 主要关注全球经济变化以及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8. 斯蒂芬·桑德森 (Sanderson, Stephen K.), 1990. 《社会进化主义: 一个批判的历史》 (*Social Evolutionism: A Critic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本书是关于社会和生物科学的进化理论详尽的回顾性评价。

9. 沃伦·威格 (Wagar, W. Warren.), 1991. 《未来的三种可能性》 (*The Next Three Futures: Paradigms of Things to Come*. New York: Praeger.) 本书就许多不同流派的未来主义进行了较广泛的概括研究。



参考文献

- 阿博特等 (Abbott, M. M., N. Kitovitch-Winer, and Judith Worrell.) 1986 "Three voices in opposition." *Society* 23 (September/October): 15-21.
- 亚伯内西 (Abrahamson, Mark.) 1979. "A functional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Forces* 58: 128-145.
- 阿克尔斯伯格等 (Ackelsberg, Martha A., Bennett M. Berger, Karol H. Borowski, Raymond Lee Muncy, Charles F. Petranek, Shulamit Reinharz, Laurence Veysey, and Carol Weisbrod.) 1988. "Communal lives and utopian hopes." *Society* 25(2): 29-65.
- 亚当斯 (Adams, R. M.) 1966.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Early Mesopotamia and Pre-Hispanic Mexico*. Chicago: Aldine.
- 阿德尔森 (Adelson, J.) 1980.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 阿德勒等 (Adler, Patricia A., Peter Adler, and Andrea Fontana) 1987. "Everyday life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217-235.
- 阿德勒等 (Adler, Peter, and Patricia Adler) 1980.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 Jack D. Douglas et al.,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ies of Everyday Life*. Boston: Allyn & Bacon.
- 阿多诺等 (Adorno, T. W.,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 阿尔巴 (Alba, Richard D.) 1985. *Italian Americans: In the Twilight of Ethnicit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 阿尔本蒂 (Albonetti, Celesta.) 1991. "An integration of theories to explain judicial discretion." *Social Problems* 38: 247-266.
- 阿尔布雷克特 (Albrecht, Stan L., Howard M. Bahr, and Kristen L. Goodman.) 1983. *Divorce and Remarriag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阿尔卡尔德 (Alcalde, Javier Gonzalo.) 1989. *The Idea of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Emerging Perspect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1900-1950*.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亚历山大等 (Alexander, J., B. Giesen, R.

Munch, and R. Smelser.) 1987. *The Macro-Mi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阿利森(Allison, M. T.) 1979. "On the ethnic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port." *Quest* 31:50-56.

阿洛特(Allott, Susan.) 1985. "Soviet rural women: Employment and family life." In Barbara Holland (ed.), *Soviet Sisterhoo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阿尔波特(Allport, Gordon.) 1958.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New York: Doubleday.

阿蒙德(Almond, Gabriel A.) 1950.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奥尔斯顿等(Alston, Jon P., and William A. McIntosh.) 1979. "An assessment of the determinants of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49-62.

奥尔斯顿(Alston, Letitia.) 1986. *Crime and Older Americans*.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爱尔文(Alwin, Duane.) 1988. "From obedience to autonomy: Changes in traits desired in children, 1924-1978."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33-52.

阿门特(Am-Ad, Zvi.) 1988. "Investment patterns of the kibbutz elders in their life domains." *Institute for Study and Research and Kibbutz and Co-operative Idea* 12:157-173.

美国大学考试计划(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Program.) 1986. *Demographics, Standards and Equity: Challenges in College Admissions*. Iowa City, Iowa: 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Program.

阿米尔等(Amir, Menachem, and Yitzchak Berman.) 1970. "Chromosomal deviation and crime." *Federal Probation* 34:55-62.

安德森(Anderson, Charles.) 1974. *Toward a New Sociology: A Critical View*.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安德森(Anderson, Kurt.) 1983. "Private violence." *Time*, September 5, pp. 18-22.

安德森(Andersson, Bengt Erik.) 1989. "Effects of public day-care: A longitudinal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60:857-866.

安德伦(Andrain, Charles F.) 1970. *Political*

Life and Social Change.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安德鲁斯(Andrews, Richard L.) 1987. "The school-community interface: strategie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John I. Goodlad (ed.), *The Ecology of School Renewal*. 86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安平(Ann-Ping, Chin.) 1988. *Children of China: Voices from Recent Years*. New York: Knopf.

阿拉沙那姆(Arasaratnam, Sinnappah.) 1987. "Sinhala-Tamil relations in modern Sri Lanka." In Jeff Boucher, Dan Landis, and Karen Arnold Clark (eds.), *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阿里斯(Ariès, Philippe.) 1981. *The Hour of Our Death*. New York: Knopf.

阿莫尔(Armor, David J.) 1989. "After busing: Education and choice." *The Public Interest* 95 (Spring):24-37.

阿施(Asch, Solomon.) 1955.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Scientific American* 193(5):31-55.

阿斯坦等(Astin, Alexander W., et al.) 1984. *The American Freshman: National Norms for Fall, 1984*. Los Ange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阿斯特拉汉(Astrachan, Anthony.) 1986. *How Men Feel: Their Response to Women's Demands for Equality and power*. Garden City, N. Y.: Anchor/Doubleday.

阿特克利(Atchley, Robert C.) 1988. *Social Forces and Aging*.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阿特金斯(Atkins, Richard N.) 1986. "Single mothers and joint custody: Common ground." In Michael W. Yogman and T. Berry Brazelton (eds.), *In Support of Famil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埃夫里特(Averitt, Robert.) 1968. *The Dual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莫里斯(Axelrod, Morris.) 1956. "Urban structu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13-18.

阿齐克里(Azicri, Max.) 1988. *Cub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Pinter.

阿佐米(Azumi, Koya.) 1977. "Japan's changing world of work." *Wilson Quarterly* (Summer): 72 - 80.

巴赫曼等(Bachman, Jerald G., Lee Sigelman, and Greg Diamond.) 1987. "Self-selection, socialization, and distinctive military values: Attitudes of high school senior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13: 169 - 187.

巴霍弗(Bachofen, Johann Jacob.) 1967. *Myth, Religion, and Mother Right*. Translated by Ralph Mannhei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61.)

巴格利(Bagley, Christopher.) 1989. "Aggression and anxiety in day-care graduat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64: 250.

巴尔等(Bahr, Howard M., Bruce A. Chadwick, Reuben Hill, and Margaret Holmes Williamson.) 1982. *Middletown Families: Fifty Years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贝利(Bailey, Thomas.) 1990. "Jobs of the future and the skills they will require." *American Educator* (Spring): 10 - 15, 40 - 44.

班布里奇等(Bainbridge, W. S., and R. Stark.) 1979. "Cult formation: Three compatible models." *Sociological Analysis* 40: 283 - 295.

拜罗赫(Bairoch, Paul.) 1988.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Dawn to the Pre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贝克等(Baker, Keith A., and Adriana de Kanter.) 1983. "An answer from research on bilingual education." *American Education* 19(6): 40 - 48.

贝克等(Baker, T. A., L. W. Moreland, and R. S. Steed.) 1989. "Party activists and the new religious right," pp. 161 - 175. In C. W. Dunn (ed.), *Relig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CQ Press.

巴坤亚克等(Bakuniak, Grzegorz, and Krzysztof Nowak.) 1987. "The creation of a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Society* 16: 401 - 429.

巴尔达萨里(Baldassare, Mark.) 1986. *Trouble in Paradise: The Suburban Transform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贝尔斯(Bales, Robert F.) 1951. *Interaction Process Analysis: A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Small Groups*. Cambridge, Mass.: Addison Wesley.

贝尔斯(Bales, Robert F.) 1953. "The equilibrium problem in small groups." In Talcott Parsons et al. (eds.), *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Gencoe, Ill.: Free Press.

贝尔斯等(Bales, Robert F., and Fred L. Strodtbeck.) 1951. "Phases in group problem solving."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485 - 495.

巴兰坦(Ballantine, Jeanne H.) 1989.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鲍尔默(Balmer, Randall.) 1989. *Mine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班伯格(Bamberg, Joan.) 1974. "The myth of matriarchy: Why men rule in primitive society." In M. Z. Rosaldo and L. Lamphere (eds.),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班杜拉(Bandura, Albert.) 1973.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aggression." In J. F. Knudson (ed.), *The Control of Aggression*. Chicago: Aldine.

班纳(Banner, Lois W.) 1984. *Women in Modern America: A Brief History*. San Diego, Calif.: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班通(Banton, Michael.) 1988. *Racial Consciousness*. London: Longman.

巴朗(Baran, P.)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巴拉什(Barash, David P.) 1977. *Sociobiology and Behavior*. New York: Elsevier.

巴伯(Barber, Benjamin.) 1984. *Strong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巴克(Barker, Eileen.) 1982.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A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Society*.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巴尼(Barney, Gerald O.) 1980. *The Global 2000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Summary Report*. Vol. 1. New York: Pergamon.

- 巴伦等 (Barron, James N., and William T. Bielby.) 1986. "The proliferation of job titles in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1: 561 - 586.
- 巴尔 (Barr, Robert D.) 1982. "Magnet schools: An attractive alternative." *Principal* 61(3): 37 - 40.
- 巴罗等 (Barrow, Georgia M., and Patricia A. Smith.) 1979. *Age, Ageism, and Society*. St. Paul, Minn.: West.
- 巴里等 (Barry, Herbert, Margaret K. Bacon, and Irvin L. Child.) 1957. "A cross-cultural survey of some sex differences in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327 - 332.
- 巴特 (Bart, Pauline B.) 1981. "A study of women who both were raped and avoided rap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7(4): 123 - 137.
- 巴维什等 (Barwise, Patrick, and Andrew Ehrenberg.) 1988. *Television and Its Audience*.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巴斯尼克等 (Basnik, Ellen L., Lenoire Rubin, and Alison S. Lauriat.) 1986. "Characteristics of sheltered homel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6(9): 1097 - 1107.
- 巴苏 (Basow, Susan A.) 1984. "Ethnic group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n Fiji."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5: 435 - 451.
- 巴苏等 (Basow, Susan A., and Nancy T. Silberg.) 1987. "Student evaluations of college professors: Are female and male professors rated differentl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9: 308 - 314.
- 鲍姆等 (Baum, Alice S., and Donald W. Burnes.) 1993. *A Nation in Denial: The Truth About Homelessness*. Boulder, Col.: Westview.
- 鲍姆兰德 (Baumrind, Diana.) 1980. "New directions in socialization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 639 - 652.
- 巴克斯特等 (Baxter, Ellen, and Kim Hopper.) 1984. In John A. Talbott (ed.), *The Chronic Mental Patient: Five Years Later*. New York: Grune & Stratton.
- 比奇 (Beach, Stephen W.) 1977.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ern Irel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38(1): 37 - 48.
- 贝克 (Beck, Melinda.) 1993. "Thy kingdom come." *Newsweek*, Mar. 15: 52 - 55.
- 贝克尔 (Becker, Howard S.) 1952. "Social class variations in the teacher-pupil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5: 457.
- 贝克尔 (Becker, Howard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 贝克尔 (Becker, Howard S.) 1967. "Whose side are we on?" *Journal of Social Problems* 14: 239 - 247.
- 贝尔彻等 (Belcher, John R., and Jeff Singer.) 1987. "Homelessness: A cost of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18: 44 - 48.
- 贝尔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贝尔 (Bell, Daniel.) 1976.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 贝尔 (Bell, Daniel.) 1978.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 贝尔 (Bell, Daniel.) 1991. "Behind the Soviet economic crises." *Dissent* (Winter): 46 - 54.
- 贝尔等 (Bell, Wendell, and Robert V. Robinson.) 1980. "Cognitive maps of class and racial inequalitie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321 - 342.
- 贝拉 (Bellah, Robert N.) 1964. "Religious 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358 - 374.
- 贝拉 (Bellah, Robert N.) 1967.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Daedalus* (Winter).
- 贝拉 (Bellah, Robert N.) (1970). *Beyond Belief*. New York: Harper & Row.
- 贝拉等 (Bellah, Robert N.,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 Tipton.) 1986.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 贝拉等 (Bellah, Robert, Richard Madsen, Willia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Tipton.) 1991. *The Good Society*. New York: Knopf.
- 贝尔斯基 (Belsky, Jay.) 1987. "Risks remain."

Zero to Three 7:22-24.

贝尔斯基(Belsky, Jay.) 1988a. "The 'effects' of infant day care reconsidered."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3:235-272.

贝尔斯基(Belsky, Jay.) 1988b. "Infant day care and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29:397-406.

贝尔斯基(Belsky, Jay.) 1988c. "Nonmaternal care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and the security of infant-parent attachment." *Child Development* 59:157-167.

贝纳德等(Benard, Cheryl, and Zalmay Khalilzad.) 1979. "Secular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Khomeini's Islamic republ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4:229-241.

本德(Bender, B.) 1975. *Farming in Pre-History: From Hunter-Gatherer to Food Produc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本迪克斯(Bendix, Reinhard.) 1964.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本迪克斯(Bendix, Reinhard.) 1978.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本尼迪克特(Benedict, Ruth.) 1959. *Patterns of Culture*. 2n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贝尼特(Benet, Sula.) 1976. "Why they live to be 100 or even older in Abkhazia." In Cary S. Kart and Barbara B. Manard (eds.), *Aging in America*. Port Washington, N. Y.: Alfred.

贝尼沃罗(Benevolo, Leonardo.) 1980.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贝内特等(Bennett, Neil G., Ann Klimas Blanc, and David E. Bloom.) 1988. "Commitment and the modern union: Assessing the link between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subsequent marital sta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1):127-139.

贝内特(Bennett, Stephen.) 1986. *Apathy in America*. Dobbs Ferry, N. Y.: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本斯曼等(Bensman, Joseph, and Israel Gerver.) 1963.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factory: The

function of deviancy in maintaining the socia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588-598.

本斯曼等(Bensman, Joseph, and Arthur Vidich.) 1971. *New American Society: The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Times Books.

伯格(Berger, Bennett M.) 1968. *Working Class Suburb: A Study of Auto Workers in Suburb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伯格等(Berger, Brigitte, and Peter J. Berger.) 1983. *The War over the Family: Capturing the Middle Ground*. New York: Anchor.

伯格(Berger, Peter L.) 1963.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Anchor.

伯格(Berger, Peter L.) 1967.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n Neil J. Smelser (ed.),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Wiley.

伯格(Berger, Peter L.) 1969. *A Rumor of Angel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伯格(Berger, Peter L.) 1977. "'A great revival' coming for American churches." Interview in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11, pp. 70-72.

伯格(Berger, Peter L.) 1986.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伯科威茨(Berkowitz, L.) 1962. *Aggression: A Social-Psych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Hill.

贝纳德(Bernard, Jessie.) 1956. *Remarriage: A Study of Marriage*. New York: Dryden Press.

贝纳德(Bernard, Jessie.) 1981. *The Female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贝纳德(Bernard, Jessie.) 1982. *The Future of Marriag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3.)

贝尔曼(Berreman, Gerald D.) 1960. "Caste i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6:120-127.

贝吕埃克莱芒等(Berrueta-Clement, John R., Lawrence J. Schweinhart, W. Steven Barnett, Ann S. Epstein, and David P. Weikart.) 1984. *Changed Lives: The Effects of the Perry Preschool Program on Youths Through Age 19*. Ypsilanti, Mich.: High/Scope Press.

- 贝里等(Berry, Brian J. L., and J. D. Kasarda.) 1977. *Contemporary Urban Ec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贝斯特(Best, Raphaela.) 1983. *We've All Got Scars: What Boys and Girls Learn in Elementary Schoo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 Bruno.) 1969. *The Children of the Dream*. New York: Macmillan.
- 比亚吉(Biagi, Shirley.) 1989. *Media Reader: Perspectives on Mass Media Industry Effects and Issue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 比德·韦尔(Bidwell, Charles E.) 1965. "The school as a formal organization." In James G. Mar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Rand McNally.
- 比尔比等(Bielby, William T., and James N. Baron.) 1986. "Men and women at work: Sex segregation and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759-799.
- 比尔比等(Bidby, William T., and Denise D. Bielby.) 1989. "Family ties: Balancing commitments to work and family in dual earner househo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776-789.
- 伯德威斯特(Ray L.) 1970. *Kinesics and Context: Essays on Body Motion Communic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比辛格尔(Bissinger, H. G.) 1990. *Friday Night Lights*. New York: Harper.
- 布莱克(Black, Donald J.) 1971.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rrest." *Stanford Law Review* 23: 1087-1111.
- 布莱克本等(Blackburn, M., and D. Bloom.) 1985.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middle class?" *Demographics* (January): 18-25.
- 布莱克威(Blackwell, James E.) 1991. *The Black Community*. 3rd 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布雷恩等(Blain, Jenny, and Jerome Barkow.) 1988. "Father involvement,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and the sensitive period." In Kevin B. MacDonald (e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布莱克等(Blake, Judith, and Kingsley Davis.) 1964. "Norms, Values and Sanctions." In R. E. L. Faris(ed.), *Handbook of Modern Soci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布劳等(Blau, Francine O., and Carol L. Jusenius.) 1976. "Economists' approaches to sex segreg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An appraisal."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 181-200.
- 布劳(Blau, Peter M.)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 布劳(Blau, Peter M.) 1974. "Parameters of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5): 615-635.
- 布劳(Blau, Peter M.) 1987. "Contras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J. Alexander, J. B. Giesen, et al. (eds.), *The Macro-Mi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布劳等(Blau, Peter M., and O.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布劳等(Blau, Peter M., and W. Richard Scott.) 1962. *Formal Organization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San Francisco: Chandler.
- 布劳(Blau, Zena S.) 1981. *Aging in Changing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 布洛内(Blauner, Robert.) 1964.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布洛内(Blauner, Robert.) 1969. "Internal colonialism and ghetto revolt." *Social Problems* 16(4): 612-617.
- 布伦登(Blendon, Robert J.) 1985. "Policy choices for the 1990s." In E. Ginzburg (ed.), *The U. S. Health Care System: A Look to the 1990s*. Totowa, N.J.: Rowman & Allenheld.
- 布洛克(Bloch, Ruth H.) 1978. "Untangling the roots of modern sex roles: A survey of four centuries of chang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4(2): 237-252.
- 布洛克(Block, Jeanne H.) 1976. "Issues, problems, and pitfalls in assessing sex difference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22: 283-308.
- 布卢姆等(Bloom, David E., and Geoffrey Carliner.) 198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I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cience* 239, 4840 (February 5): 604-610.

布卢斯通等(Bluestone, Barry, and Bennett Harrison.) 1982.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Plant Closings, Community Abandonment, 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布卢姆(Blum, Marian.) 1983. *The Day-Care Dilemma*.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布隆伯格(Blumberg, A. S.) 1970. *Criminal Justice*. Chicago: Quadrangle.

布隆伯格(Blumberg, Rae Lesser.) 1978. *Stratification: Socioeconomic and Sexual Inequality*. Dubuque, Iowa: William C. Brown.

布卢默(Blumer, Herbert.) 1939. "Collective behavior." In Alfred Lee (ed.),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布卢默(Blumer, Herbert.) 1948.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 poll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3:542-549.

布卢默(Blumer, Herbert.) 1962. "Society as symbolic interaction." In Arnold Rose (ed.),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es: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布卢姆斯坦等(Blumstein, Philip, and Pepper Schwartz.) 1983. *American Couples*. New York: Morrow.

博多维奇(Bodovitz, Kathy.) 1991. "Black America." *American Demographics Desk Reference Series*, No. 1(July):8-10.

博格达诺等(Bogdanor, Vernon (ed.)) 1987.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博安南(Bohannon, Paul.) 1985. *All the Happy Families: Exploring the Varieties of Family Life*. New York: McGraw-Hill.

布科克(Bocock, Sarane.) 1980.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2n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波克钦(Bookchin, Murray.) 1987. *The Rise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Citizenship*.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布思等(Booth, Alan, David R. Johnson, and Harvey M. Choldin.) 1977. "Correlates of city crime rates: Victimization surveys versus official statistics."

Social Problems 25:187-197.

本斯切爾等(Bornschier, Volker, and Thanh-Huyven Ballmer-Cao.) 1979. "Income inequality: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NC-penetration, dimensions of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487-506.

伯勒斯等(Boroughs, Don L., and Betsy Carpenter.) 1991. "Cleaning up the environment."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Mar. 25:pp. 45ff.

博温尼克(Botwinick, J.) 1967. *Cognitive Processes in Maturity and Old Age*.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鲍彻等(Boucher, Jeff, Dan Landis, and Karen Arnold Clark (eds.)) 1987. *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博尔丁(Boulding, Kenneth E.) 1966. "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 In Henry Jaret (e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布维尔等(Bouvier, Leon F., and Robert W. Gardner.) 1986. "Immigration to the U. S.: The unfinished story." *Population Bulletin* 44:4.

布维尔等(Bouvier, Leon F., with Henry S. Shryrock and Harry W. Henderson.) 1977.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Population Bulletin* 32:26.

鲍恩等(Bowen, Gary Lee, and Dennis K. Orthner.) 1983. "Sex-role congruency and marital qual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223-229.

鲍尔曼等(Bowerman, C. E., and J. W. Kinch.) 1959. "Changes in family and peer orientation of children between the fourth and tenth grades." *Social Forces* 37:201-211.

鲍斯(Bowes, A. M.) 1989. *Kibbutz Goshen: An Israeli Commune*.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鲍尔斯等(Bowles, Samuel, and Richard Edwards.) 1985.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鲍尔斯等(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鲍尔斯等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鲍尔斯等 (Bowles, Samuel, David Gordon, and Thomas Weisskopf.) 1983. *Beyond the Wasteland*. New York: Doubleday.

博耶等 (Boyer, Richard and David Savegeau.) 1989. *Places Rated Almanac*. New York: Prentice Hall.

布雷尔曼 (Braverman, H.) 1975.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布雷 (Bray, Thomas J.) 1988. "Reading America the riot act." *Policy Review* 43:32-36.

布雷内斯 (Brenneis, Donald.) 1984. "Grog and gossip in Bhatagon: Style and substance in Fiji Indian convers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11:487-505.

布雷特昂等 (Bretl, Daniel J., and Joanne Cantor.) 1988. "The portrayal of men and women in U. S. television commercials: A recent content analysis and trends over 15 years." *Sex Roles* 18:595-609.

布里 (Brim, Orville G., Jr.) 1968. "Adult socialization." In Davi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布里等 (Brim, Orville G., Jr., and Jerome Kagan.) 1980.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布罗德斯特等 (Broadstreet, Simon, and Susanna Segnit.) 1975. "Is anybody out there?" *View* (November.)

布罗迪 (Brody, Jacob A.) 1989. "Toward quantifying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9:685-686.

布罗夫曼 (Brofman, Rob.) 1989. "Red hot. Soviet watches are fad in Italy." *Life*, December, p. 8.

布罗姆利 (Bromley, Ray.) 1988. "Work in the streets: Survival strategy, necessity, or unavoidable evil?" In José Gugler (ed.), *Urbaniz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布龙方布雷内 (Bronfenbrenner, Urie.) 1958. "Socialization and social clas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In Eleanor E. Maccoby et al. 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3r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布鲁克斯等 (Brooks, John (ed.)) 1989. *South American Handbook*. Bath, England: Trade and Travel Publications.

布鲁姆等 (Broom, Leonard, and Robert Cushing.) 1977. "A modest test of an immodest theory: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157-169.

布劳迪 (Broudy, H. S.) 1987. *Becoming Educated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布劳沃 (Brower, Brock.) 1988. "The Pernicious power of the Polls." *Money* (March):144-163.

布朗 (Brown, Arnold S.) 1990. *Social Processes of Aging and Old Ag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布朗等 (Brown, L. R., and J. L. Jacobson.) 1987. "The future of urbanization: Facing th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Worldwatch Paper* 77, (May). New York: Worldwatch Institute.

布朗 (Brown, Lester R.) 1988. *State of the World*. New York: Norton.

布朗 (Brown, Phil.) 1987. "Popular epidemiology: Community response to toxic waste-induced diseas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 12 (Summer/Fall):78-85.

比尔 (Buell, Emmett H.) 1980. "Busing and the defended neighborhood: South Boston 1974-1977."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16:161-188.

布尔默 (Bulmer, Martin.) 1984.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Institutionaliz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贝雷威 (Burawoy, Michael.) 1984. "Organizing consent on the shop floor: The game of making out." In Frank Fisher and Carmen Sirianni (eds.), *Critical Studies in Organization and Bureaucra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贝雷威等 (Burawoy, Michael,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2. *Marxist Inquiries: Studies of Labor, Class, an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伯切尔等 (Burchell, Robert, and George Sternlieb.) 1978. *Planning Theory in the 1980s: A Search for Future Directions*. New Brunswick, N. 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伯纳姆 (Burnham, Walter.) 1981. "The 1980 earthquake." In T. Ferguson and J. Rogers (eds.), *The Hidden Election*. New York: Pantheon.

伯纳姆 (Burnham, Walter.) 1984. "The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American voter." In T. Ferguson and J. Rogers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Armonk, N. Y. : M. E. Sharpe.

伯恩斯等 (Burns, Leland S., and John Friedmann.) 1985. *The Art of planning*. New York: Plenum Press.

伯里奇 (Burridge, Kenelm O. L.) 1957. "Disputing in Tangu."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9: 763 - 780.

巴斯 (Buss, David M.) 1984. "Toward a psychology of person-environment (PE) correlation: The role of spouse sel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361 - 377.

卡比扎斯等 (Cabezas, Arnado, Larry Hajime Shinagawa, and Gary Kawaguchi.) 1986 - 87. "New inquiries into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Philippino Americans in California." *Amerasia Journal* 13: 3 - 7.

卡尔霍恩 (Calhoun, J.) 1962. "Population density and social pathology." *Scientific American* (February): 139 - 148.

卡马拉 (Camara, Kathleen A.) 1986. "Family adaptation to divorce." In Michael W. Yogman and T. Berry Brazelton (eds.), *In Support of Familie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坎贝尔 (Campbell, Angus.) 1981. *The Sense of Well-Being in America*. New York: Mc-Graw-Hill.

坎贝尔 (Campbell, Anne.) 1991. *The Girls In the Gang*. 2nd ed. Cambridge, Mass. : Basil Blackwell.

坎贝尔 (Campbell, Bernard.) 1985. *Human Evolution*. 3rd ed. New York: Aldine.

坎贝尔 (Campbell, Ernest.) 1971. "On desegregation and matters sociological." *Phylon* (Summer): 140 - 142.

坎贝尔 (Campbell, Joseph.) 1988. *The Power of Myth*. New York: Doubleday.

康西安 (Cancian, Francesca M.) 1987. *Love 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坎特里尔等 (Cantril, Albert H. (ed.)) 1980. *Polling on the Issues*. Cabin John, Md. : Seven Locks Press.

卡普兰等 (Caplan, Nathan, Marcella H. Choy, and John Whitmore.) 1992. "Indochinese refugee familie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Scientific American* 266: 36 - 42

卡普洛 (Caplow, Theodore.) 1969. *Two Against One: Coalitions in Triad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卡普洛等 (Caplow, Theodore, H. M. Bahr, B. A. Chadwick, R. Hill, and M. H. Williamson.) 1982. *Middletown Families: Fifty Years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卡多佐 (Cardozo, Arlene Rossen.) 1986. *Sequencing: Having It All but Not All at Once*. New York: Atheneum.

凯里 (Carey, James T.) 1978. *Introduction to Criminology*.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凯里等 (Carey, Marx, and James Franklin.) 1991. "Industry output and job growth continue slow into the next century." *Monthly Labor Review* (November): 45 - 63.

卡林等 (Carlin, Pat, and Anne Worrall (eds.)) 1987. *Gender, Crime, and Justice*.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卡迈克尔等 (Carmichael, Stokely, and Charles V. Hamilton.) 1967. *Black Power*. New York: Vintage.

卡努瓦 (Carnoy, Martin.) 1984.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卡尔桑德斯 (Carr-Saunders, A. M.) 1936. *World Popu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卡斯泰尔 (Castells, Manuel.)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卡斯泰尔 (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 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卡斯泰尔 (Castells, Manuel.) 1988. "Squatters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In José Gugler (ed.), *Urbaniz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卡斯提吾等 (Captive, George Pierre, and Gilbert Kushner (eds.)) 1981. *Persistent Peoples: Cultural Enclaves in Perspective*.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卡顿 (Caton, Carol L. M.) 1990. *Homeles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卡泽纳夫等 (Cazenave, Noel A., and Murray A. Straus.) 1979. "Race, class,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family violence: A search for potent support syste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10: 281-300.

查菲茨 (Chafetz, Janet Saltzman.) 1988. *Feminist Sociology: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Theories*. Itasca, Ill.: Peacock.

钱布利斯 (Chambliss, William J.) 1973. "The Saints and the Roughnecks." *Society* 2(1).

查普曼 (Chapman, Anthony J.) 1973. "Funniness of jokes, canned laughter, and recall performance." *Sociometry* 36: 569-578.

蔡斯 (Chase, Ivan D.) 1975. "A comparison of men's and women'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483-505.

谢尔林 (Cherlin, Andrew.) 1983. *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切斯特 (Chidester, David.) 1988. *Patterns of Power,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n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蔡尔德 (Childe, V. Gordon.) 1951. *Man Makes Himself*.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奇诺伊 (Chinoy, Ely.) 1968.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Basic Concep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rev.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希罗 (Chiot, Daniel.) 1986. *Social Change in the Modern Era*.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

vanovich.

希罗等 (Chiot, Daniel, and Thomas D. Hall.) 1982. "World system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8: 81-106.

肖多洛 (Chodorow, Nancy.)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肖多洛 (Chodorow, Nancy.) 1989.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肖尔丁 (Choldin, H. M.) 1984. *Cities and Suburbs*. New York: McGraw-Hill.

乔姆斯基 (Chomsky, Noam.)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乔姆斯基 (Chomsky, Noam.) 1975.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舒克里等 (Choucri, Nazl (ed.)) 1984.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Population and Conflict*.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克利斯托弗 (Christopher, David.) 1983. *The Japanese Mind: The Goliath Explained*. New York: Linden Press/Simon & Schuster.

曲达科夫等 (Chudacoff, Howard, and J. Smith.) 1988.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Urban Society*.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克拉克 (Clark, Burton R.) 1962. *Educating the Expert Society*. San Francisco: Chandler.

克拉克斯图尔特 (Clarke-Stewart, K. Alison.) 1988. "The 'effects' of daycare reconsidered."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3: 293-318.

克拉克斯图尔特等 (Clarke-Stewart, Alison, and Susan Friedman.) 1987. *Child Development: Infancy Through Adolescence*. New York: Wiley.

克莱顿 (Clayton, R. C.) 1975. *The Family, Marriage, and Social Change*.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克莱格等 (Clegg, Stewart, and David Dunkerley.) 1980. *Organization, Class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克林纳尔 (Clinard, Marshall B.) 1979. *Illegal Corporate Behavior*.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克劳伍德 (Cloward, Richard A.) 1960. "Social

control in the prison." I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Prison*.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克劳伍德等(Cloward, Richard A., and Lloyd E. Ohlin.) 1964.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科克利(Coakley, Jay J.) 1986. *Sport in Society: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St. Louis, Mo.: Mosby.

科克等(Coche, Judith M., and Erich Coche.) 1986. "Leaving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to enter private practice: A mid-life crisis resolution." *Psychotherapy in Private Practice* 4:43-50.

科克拉姆(Cockerham, William C.) 1991. *This Aging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科克拉姆(Cockerham, William C.) 1992. *Medical Sociology*.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科根等(Cogan, John, Judith Torney-Purta, and Douglas Anderson.) 1988.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ward global issues: Student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2: 282-297.

科恩(Cohen, Albert.) 1966. *Deviance and Control*.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科恩等(Cohen, Carl I., and Jay Sokolovsky.) 1989. *Old Men of the Bowery: Strategies of Survival Among the Homeles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科恩(Cohen, Jere Z.) 1979. "High school subcultures and the adult world." *Adolescence* 16: 491-502.

科恩(Cohen, R. B.) 1988.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Frank Hearn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科恩等(Cohen, Stephen S., and John Zysman.) 1987. *Manufacturing Matt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克拉松托等(Colasanto, Diane, and Linda DeStefano.) 1989. "Religion: Public image of TV evangelists deteriorates." *The Gallup Poll Monthly* (September): 16-19.)

科尔曼(Coleman, James S.) 1961. *The Adolescent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科尔曼等(Coleman, James S., et al.) 1966.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科尔曼等(Coleman, James S., and Thomas Hoffer.) 1986. *Public and Private High Schools: The Impact of Commun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科尔曼等(Coleman, James S., Thomas Hoffer, and Sally Kilgore.) 1982. *High School Achievement: Public, Catholic, and Private Schools Compared*. New York: Basic Books.

科尔曼等(Coleman, James S., Sara D. Kelly, and John A. Moore.) 1975. "Recent trends in school integration."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eetings, April 2.

科尔曼等(Coleman, John C., and Leo Hendry.) 1990. *The Nature of Adolescence*.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科尔曼等(Coleman, Richard, and Lee Rainwater.) 1978. *Social Standing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柯林斯(Collins, Randall.)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984-1014.

柯林斯(Collins, Randall.) 1990. "Market dynamics as the engine of historical change." *Sociological Theory* 8(Fall): 111-135.

科尔特朗(Coltrane, Scott.) 1988.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A crosscultural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1060-1095.

科姆斯托克等(Comstock, George, and Victor C. Strasburger.) 1990. "Deceptive appearances: Television violenc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Care* 11(1): 31-44.

孔德(Comte, Auguste.) 1877.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London: Longmans, Green.

《国会季刊》(*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86. *The Soviet Union*. 2nd ed.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88. Vol. 44.

康纳尔斯(Connors, John H.) 1987. "Ranks of

the poor swell with women and children." *State Government News* 29:4-7.

康拉德等 (Conrad, Peter, and Rochelle Kern.) 1990.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illness." In Peter Conrad and Rochelle Kern (eds.),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康拉德等 (Conrad, Peter, and Joseph W. Schneider.) 1980. *Deviance and Medicalization: From Badness to Sickness*. St. Louis: Mosby.

康斯坦丁等 (Constantine, B. L., and J. M. Constantine.) 1973. *Group Marriage: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Multilateral Marriage*. New York: Macmillan.

康弗斯 (Converse, Jean M., and Stanley Presser.) 1986. *Survey Questions: Handcrafting the Standardized Questionnaire*. Beverly Hills: Sage.

库克斯等 (Cookson, Peter W., Jr., and Caroline Hodges Persell.) 1985. *Preparing for Power: America's Elite Boarding Schools*. New York: Basic Books.

库利 (Cooley, Charles Horton.)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ribner's.

库利 (Cooley, Charles Horton.) 1909.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Scribner's.

库恩 (Coon, Carleton S.) 1982. *Racial Adaptation*. Chicago: Nelson-Hall.

科尼什 (Cornish, Edward.) 1987.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AIDS." *The Futurist* 21(6):45-46.

科雷亚等 (Correa, Hector, Mohammed Al El Torky, and Miriam K. Were.) 1989. "Ecological upheaval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esertification and predicting health impac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8(3):357-367.

科塞 (Coser, Lewis.) 1956.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Free Press.

科斯塔 (Costa, Joseph J.) 1984. *Abuse of the Elderly: A Guide to Resources and Services*.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科特雷尔 (Cottrell, Fred.) 1974. *Aging and the Aged*. Dubuque, Iowa: William C. Brown.

考吉尔 (Cowgill, Donald O.) 1986. *Aging Around the Worl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考克斯 (Cox, Christopher.) 1983. "Second marriages: Better while they last." *Psychology Today* (February):72.

考克斯 (Cox, Harold G.) 1988. *Later Life: The Realities of Aging*.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克雷德森 (Crewdson, John.) 1988. *By Silence Betrayed: Sexual Abuse of Children in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克罗斯比等 (Crosbie, Paul V. (ed.)) 1975. *Interaction in Small Groups*. New York: Macmillan.

克劳斯等 (Crouse, James, and Dale Trusheim.) 1988. "The case against the SAT." *The Public Interest* 93(Fall):97-110.

克劳特等 (Crouter, Ann C. and Maureen Perry-Jenkins.) 1986. "The impact of working mothers on children's attitudes and gender development." In Michael W. Yogman and T. Berry Brazelton (eds.), *In Support of Famil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克鲁斯 (Cruse, Harold.) 1987. *Plural but Equal: A Critical Study of Blacks and Minorities in America's Plural Society*. New York: Morrow.

克里斯特尔 (Crystal, David.) 1988.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卡尔弗 (Culver, Lowell W.) 1979. "America's troubled cities: Better times ahead?" *The Futurist* (August):275-286.

卡明等 (Cumming, Elaine, and William E. Henry.) 1961. *Growing Old: 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柯伦等 (Curran, Jeanne, and Carol Telesky.) 1980. *Up the Job Market: Controlling the Ascent*.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柯里等 (Currie, Elliot, and Jerome Skolnick.) 1984. *America's Problems*. Boston: Little, Brown.

柯蒂斯等 (Curtis, Richard, and Elton Jackson.) 1977. *Inequality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西尔特等 (Cyert, Richard, and David Mowery.) 1989. "Technology, employment, and U. S. competi-

tiveness." *Scientific American* 260(5):54-62.

达尔 (Dahl, Robert.) 1961.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达尔 (Dahl, Robert.) 1990. "Social reality and 'free' markets." *Dissent* (Spring):224-228.

达伦多夫 (Dahrendorf, Ralf.) 1958. "Out of utopia: Toward a reorganization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4:115-127.

达伦多夫 (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达尔加德等 (Dalgard, Odd Steffen, and Einar Kringlen.) 1976. "A Norwegian twin study of crimin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6(3):213-232.

当布罗等 (Dambrot, Faye H.; Diana C. Reep, and Daniel Bell.) 1988. "Television sex roles in the 1980s: Do viewers' sex and sex role orientation change the picture?" *Sex Roles* 19:387-401.

丹尼尔斯 (Daniels, Roger.) 1988.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 S. Since 18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丹尼尔斯等 (Daniels, Roger, and Harry H. L. Kitano.) 1970. *American Racism: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丹尼洛夫 (Daniloff, Nicholas.) 1983. "The posh world of Russia's ruling clas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ember 5, pp. 43-44.

达比等 (Darby, John, Nicholas Dodge, and A. C. Hepburn (eds.)) 1990. *Political Violence: Irelan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达登 (Darden, Joe T.) 1989. "Afro-American inequality within the urban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7-1987."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5(1):1-14.

达西尔瓦 (Da Silva, Tomaz Tadeu.) 1988. "Distribution of school knowledge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a Brazilian urban sett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9:55-79.

戴维斯 (Davies, James C.) 1969. "The J-curve of

rising and declining satisfactions as a cause of some great revolutions and a contained rebellion." In H. D. Graham and T. R. Gurr (eds.), *Violence in America*. New York: Bantam.

戴维斯等 (Davis, James A., and Tom W. Smith.) 1983. *General Social Survey Cumulative File, 1972-1982*. Ann Arbor, Mich.: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戴维斯等 (Davis, James, and Tom W. Smith.) 1986. *General Social Surveys: 1972-1986*. Storrs, Conn.: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戴维斯 (Davis, Karen.) 1986. "Aging and the healthcare system: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issues." *Daedalus* 115(Winter):227-246.

戴维斯 (Davis, Kingsley.) 1940. "Extreme social isolation of a chil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554-565.

戴维斯 (Davis, Kingsley.) 1947. "A final note on a case of extreme iso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432-437.

戴维斯 (Davis, Kingsley.) 1955.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431.

戴维斯等 (Davis, Kingsley (ed.)) 1985. *Contemporary Marria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戴维斯等 (Davis, Kingsley, and Judith Blake.) 1956. "Social structure and fertility: An analytic framewor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 (April):211-235.

戴维斯等 (Davis, Kingsley, and Wilbert Moore.) 1945.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242-249.

戴维斯 (Davis, Robert C.) 1987.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services for victims in crisis." *Crime and Delinquency* 33:520-531.

道金斯 (Dawkins, Richard.) 1976.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道森等 (Dawson, Carl A., and Werner E. Gettys.) 1948.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New York: Ronald Press.

德梅那斯等 (Demerath, N. J., III, and Phillip E. Hammond.) 1969. *Religion in Social Context:*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德谟等(Demo, David H., and Alan C. Acock.) 1988. "The impact of divorce on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0:619-648.

丹尼斯(Dennis, Everette E.) 1989. *Reshaping the Media: Mass Communication in an Information Ag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德诺那(DeNora, Tina.) 1986. "How is extra-musical meaning possible? Music as a place and space for work." *Sociological Theory* 4:84-94.

邓金(Denzin, Norman K.) 1978. *The Research Act*. New York: McGraw-Hill.

邓金(Denzin, Norman K.) 1984a. "Retrieving the small social group."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Interaction* (Vol. 15).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邓金(Denzin, Norman K.) 1986a. "Behaviorism and beyon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5:553-556.

邓金(Denzin, Norman K.) 1986b. *The Recovering Alcoholic*.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邓金等(Denzin, Norman K., and Charles M. Keller.) 1981. "Frame analysis reconsidere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0(1):52-60.

德贝尔等(Derber, Charles, and William Schwartz.) 1988. "Toward a theory of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Frank Hearn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德斯泰法诺(DeStefano, Linda.) 1990. "Church synagogoc membership and attendance levels remain stable." *The Gallup Poll Monthly* (January): 32-33.

托克维尔(de Toqueville, Alexis.) 1945. *Democracy in America*. 2 vols. New York: Knopf.

迪瓦伊尼等(Deviney, Stanley, and Angela M. O'Rand.) 1988. "Gender-cohort succession and retirement among older men and women, 1951 to 1984."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9:525-540.

戴蒙德(Diamond, Milton.) 1982. "Sexual identity: Monozygotic twins reared in discordant sex roles and a BBC follow-up."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1:181-186.

迪堪里奥(DiCanio, Margaret.) 1989. *The Encyclopedia of Marriage, Divorce,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迪里普(Dilip, Hiro.) 1985. *Iran Under the Ayatollahs*. New York: Praeger.

迪纳斯坦(Dinnerstein, Dorothy.) 1977.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Sexual Arrangements and Human Malaise*. New York: Harper & Row.

戴恩等(Dion, K., et al.) 1972. "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4:285-290.

迪普雷特等(DiPrete, Thomas A., and Whitman T. Soule.) 1988. "Gender and promotion in segmented job ladder syste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26-40.

多宾斯等(Dobbins, Gregory H., Robert L. Cardy, and Donald M. Truxillo.) 1986. "Effect of rater sex and purpose of appraisal on the accuracy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Basic and Applied Psychology* 7:225-241.

多姆霍夫(Domhoff, G. William.) 1978. *Who Really Rules?*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多姆霍夫(Domhoff, G. William.) 1983. *Who Rules America Now?*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多姆霍夫(Domhoff, G. William.) 1990. *The Power Elite and the State: How Policy Is Made in America*. New York: Aldine.

唐纳森(Donaldson, Scott.) 1969. *The Suburban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道格拉斯等(Douglas, Jack D., et al.) 1980.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 Boston: Allyn & Bacon.

道斯等(Dowse, Robert, and John Hughes.) 1972.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Wiley.

德里班(Dreeban, Robert.) 1968. *On What Is Learned in School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德苏扎等(D'Souza, Neila, and Ramini Natarjan.) 1986. "Women in India: The reality." In Lynn B. Iglitzin and Ruth Ross (eds.), *Women in the World, 1975-1985: The Women's Decade*. Santa Barbara, Calif.: ABC-CLIO.

迪宾(Dubin, Robert, and Daniel Goldman.)

1972. "Central life interests of American middle managers and specialists." *America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133-141.

杜利(Duley, Margot I.) 1986. "Women in India." In Margot I. Duley and Mary I. Edwards (eds.), *The Cross-Cultural Study of Women: A Comprehensive Guide*.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邓肯(Duncan, Greg.) 1984. *Years of Poverty, Years of Plenty*. Ann Arbor, Mich.: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邓肯等(Duncan, G., M. Hill, and S. Hoffman.) 1990. "Welfare dependents within and across generations." *Science* 239:467-471.

邓肯(Duncan, Otis Dudley.) 1959. "Human ecology and population." In Philip M. Hauser and Otis Dudley Duncan,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邓肯(Duncan, Otis Dudley.) 1961. "From social system to ecosystem." *Sociological Inquiry* 31 (Spring):140-149.

邓拉普(Dunlap, Riley E., and William R. Cattin, Jr.) 1979.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5.

迪尔凯姆(Durkheim, Émile.) 191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lated by Joseph Ward Swain. New York: Macmillan.

迪尔凯姆(Durkheim, Émile.) 1950.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Glencoe, Ill.: Free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4.)

迪尔凯姆(Durkheim, Émile.) 1950. *Suicid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7.)

迪尔凯姆(Durkheim, Émile.) 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达顿(Dutton, Diane.) 1989. "Social class, health, and illness." In Phil Brown (ed.), *Perspectives in Medical Sociology*.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戴伊(Dye, Thomas.) 1986. *Who's Running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戴伊(Dye, Thomas R.) 1990. *Who's Running America: The Bush Era*.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伊斯特林(Easterlin, Richard A.) 1980. *Birth*

and Fortune: The Impact of Numbers on Personal Welfare. New York: Basic Books.

伊斯特林等(Easterlin, Richard A., and Ellen M. Crimmins.) 1988. *Fertility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埃丁(Edidin, Peter.) 1989. "Perros caliente." *Psychology Today* 23:36.

埃德蒙兹(Edmonds, T. R.) 1976. "On the mortality of infants in London." *Lancet*, 1(1835):692.

埃兹尔(Edsall, Thomas.) 1984.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Norton.

埃兹尔等(Edsall, Thomas, and Mary Edsall.) 1991. *Chain Reaction*. New York: Norton.

爱德华兹(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埃伦豪斯(Ehrenhaus, Peter.) 1989. "Commemorating the unknown war: On not remembering Vietna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9:96-107.

埃利希等(Ehrlich, Paul R., and Anne H. Ehrlich.) 1972.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ent: Issues in Human Ecology*. 2nd ed. San Francisco: Freeman.

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 S. N.) 1956.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 S. N.) 1971.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 S. N.) 1992.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t regimes." *Daedalus* 121 (2):21-41.

艾森斯塔德等(Eisenstadt, S. N., and Ora Ahimeir (eds.)) 1985. *The Welfare State and Its Aftermath*. London: Croom Helm.

埃克曼等(Ekman, P., and W. V. Friesen.) 1971. "Constants across cultures in the face and emo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7:124-129.

伊拉姆(Elam, Stanley M., and Alec M. Gallup.) 1989. "The 21st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Gallup Monthly Report*, September, 31ff.

埃尔德(Elder, Glen H.) 1974.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埃尔德(Elder, Glen H., Jr.) 1975. "Ag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

埃尔金等(Elkin, Frederick, and Gerald Handel.) 1978. *The Child and Society*. 3r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埃尔金德(Elkind, David.) 1968. "Giant in the nursery: Jean Piage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26.

埃尔金德(Elkind, David.) 1970 "Erik Erikson's eight ages of ma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5.

埃利奥特(Elliott, John.) 1985.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埃利奥特等(Elliott, Marta, and Lauren J. Krivo.) 1991.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homeles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Problems* 38:113-131.

埃吕尔(Ellul, Jacques.) 1966. *Propaganda: The Foundations of Men's Attitudes*. New York: Knopf.

埃尔斯等(Else, John F., and Martha J. Sanford.) 1987. "Nonsexist language in social work journals: Not a trivial pursuit." *Social Work* 32:52-59.

恩格斯(Engels, Friedrich.) 1977.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84.)

英格兰等(England, Paula, and Lori McCreary.) 1987. "Gender inequality in paid employment." In Beth B. Hess and Myrna Marx Ferree (eds.), *Analyzing Gender: A 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恩特威斯尔等(Entwisle, Doris R., Karl L. Alexander, Aaron M. Pallas, and Doris Cadigan.) 1987. "The emergent academic self-image of first graders: Its response to social structure." *Child Development* 58:1190-1206.

爱泼斯坦(Epstein, Cynthia Fuchs.) 1986. "Symbolic segreg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language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of women and men." *Sociological Forum* 1:27-49.

爱泼斯坦(Epstein, Cynthia Fuchs.) 1988. *Deceptive Distinctions: Sex, Gender, and the Social Or-*

d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埃尔加(Ergas, Yasmine.) 1987.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AIDS epidemic."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41(3/4):33-39.

埃里克森(Erikson, Erik.)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埃里克森(Erikson, Erik.) 1982.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A Review*. New York: Norton.

埃里克森(Erickson, Kai T.) 1966. *Wayward Puritans*. New York: Wiley.

埃里克森(Erikson, Kai T.) 1977. *Everything in Its Path*.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厄兰格(Erlanger, Howard S.) 1974. "Social class and corporal punishment in child rearing: A reassess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68-85.

厄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 Gosta.) 1985.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The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厄斯平-安德森等(Esping-Andersen, Gosta, and Walter Korpi.) 1984. "Social policy as class politics in post-war capitalism: Scandinavia, Austria, and Germany," pp. 179-208. In John Goldthorpe (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埃斯欧尼(Etzioni, Amitai.) 197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 On Power, Involvement, and Their Correlates*. Rev. ed. New York: Free Press.

埃斯欧尼(Etzioni, Amitai.) 1984. *Capital Corrup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埃斯欧尼(Etzioni, Amitai.) 1989. *The Moral Dimension*. New York: Free Press.

埃斯欧尼等(Etzioni, Amitai, and Edward W. Lehman.) 1980. *Complex Organizations*. 3r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埃文斯等(Evans, Peter B., and Michael Timberlake.) 1980. "Dependence, inequal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tertia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531-552.

艾森克(Eysenck, Hans.) 1977. *Crime and Personali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福尔克(Falk, Richard.) 1988. "Religion and politics: Verging on the postmodern." *Alternatives* 13: 379-394.

法洛斯(Fallows, James.) 1983. "Immigration: How it's affecting us." *The Atlantic Monthly*, November, pp. 45-106.

法洛斯(Fallows, James.) 1988. "A talent for disorder." *U. S. News & World Report*, 21 February 8, pp. 83-84.

《家庭经济学评论》*Family Economics Review*. 1989. "Population growth of the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2:21.

法利(Farley, John E.) 1987. "Suburbanization and the central city crime rates: New evidence and a reinterpre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3):688-700.

法利(Farley, John E.) 1988. *Majority-Minority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福斯托-斯特林(Fausto-Sterling, Anne.) 1986. *Myths of Gender: Biological Theories About Men and Women*. New York: Basic Books.

法瓦等(Fava, Sylvia F., and Rosalie G. Genovese.) 1983. "Family, work,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n dual-career marriages: Issues for research." *Research in the Interweave of Social Roles: Jobs and Families* 3:163-185.

福斯特等(Fawcett, James T., and Benjamin V. Carino.) 1987. *Pacific Bridges: The New Immigration from As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New York: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菲根(Feagin, Joe R.) 1989.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菲根等(Feagin, Joe R., and Robert Parker.) 1990. *Rebuilding American Cities: The Urban Real Estate Game*.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1989. *Uniform Crime Reports*, 1989.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1991. *Uniform Crime Reports*, 1991.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范伯格(Feinberg, Andrew.) 1987. "Sleeping dragons." *Venture* 9(7):50-52.

弗尔森(Felson, Richard B.) 1991. "Blame analysis: Accounting for the behavior of protected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st* 22:(2):5-23.

费尔马(Fennema, Elizabeth.) 1976. "Women and girls in the public schools: Defeat or liberation?" In Joan J. Roberts, *Beyond Intellectual Sexism: A New Woman, A New Reality*. New York: McKay.

费尔斯科-魏斯(Fersko-Weiss, Henry.) 1988. "A man, a ship, and a dream to sail by." *Sierra* 73: 66-72.

菲克特(Fichter, Joseph.) 1951. *Southern Pari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菲克特(Fichter, Joseph.) 1954.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Urban Pari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法林(Filene, Peter.) 1987. *Men in the Middl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菲尔森(Filson, Glen G.) 1988. "Ontario teachers' d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proletarianiz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2:298-317.

法恩等(Fine, Mark, John Moreland, and Andrew I. Schwebel.) 1984. "Long term effects of divorce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5):703-713.

芬克尔约尔(Finkelhor, David, and Linda Meyer Williams, With Nanci Burns.) 1988. *Nursery Crimes: Sexual Abuse in Day Car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芬恩(Finn, Chester, Jr.) 1981. "Why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matter. Report analys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1:483-525.

弗尔斯通(Firestone, Shulamith.) 1971. *The Dialectic of Sex*. New York: Bantam.

弗希尔(Fischer, Claude S.) 1981. "The public and private worlds of city lif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2):306-316.

弗希尔(Fischer, Claude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弗希尔(Fischer, Claude S.) 1984. *The Urban Experience*. 2n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

vanovich.

弗希尔等 (Fischer, Claude, s. et al.) 1975. "Crowding studies and urban life: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41 (November): 406 - 418.

弗希尔 (Fischer, Claude S.) 1975. "Toward a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6): 1319 - 1341.

弗希尔等 (Fischer, Claude S., et al.) 1977. *Networks and Places*. New York: Free Press.

弗希尔 (Fischer, David H.) 1978. *Growing Old in America*. Exp.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弗希尔 (Fischer, Frank.) 1984.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In Frank Fischer and C. Siriani (eds.), *Organization and Bureaucra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菲什曼 (Fischman, Joshua.) 1986. "A journey of hearts and minds." *Psychology Today* (July): 42 - 47.

菲什曼 (Fishman, Robert.) 1987. *Bourgeois Utopias*. New York: Basic Books.

菲奇 (Fitch, Ed.) 1987. "Is red carpet treatment plush enough?" *Direct Marketing* 50: 20 - 21.

福纳等 (Foner, Anne, and Karen Schwab.) 1981. *Aging and Retirement*. Monterey, Calif.: Brooks/Cole.

丰塔纳 (Fontana, Lynn.) 1988. "Television and the social studies." *Social Education* 52: 348 - 350.

富特 (Foote, Nelson.) 1953. "Love." *Psychiatry* 16: 247.

福特 (Ford, F. Scott.) 1986. "Favorable inter-group contact may not reduce prejudice: Inconclusive journal evidence, 1960 - 1984."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70: 256 - 258.

福特 (Ford Foundation.) 1989. *Social Welfare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New York: Ford Foundation.

福特 (Ford, Ramona.) 1988. *Work, Organization and Power*. Boston: Allyn & Bacon.

福里 (Fore, William F.) 1987. *Television and Religion: The Shaping of Faith, Value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Augsburg.

福姆等 (Form, William, and Kyu Han Bac.) 1988. "Convergence theory and the Korean connection." *Social Forces* 66: 618 - 640.

福斯等 (Foss, Daniel A., and Ralph Larkin.) 1986. *Beyond Revolution: A New Theory of Movements*. South Hadley Mass.: Bergin & Garvey.

福克斯 (Fox, Daniel.) 1987. "The cost of AIDS from conjecture to research." *AIDS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2: 25 - 27.

福克斯 (Fox, Kenneth.) 1986. *Metropolitan America: Urban Life and Urba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 - 1980*.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福克斯 (Fox, Renee C.) 1989. *The Sociology of Medicin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福克斯等 (Fox, Thomas G., and S. M. Miller.) 1965.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mobility: An international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 9: 76 - 93.

弗朗科姆 (Francome, Colin.) 1984. *Abortion Practi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Allen & Unwin.

弗兰克 (Frank, A. G.) 1969.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弗兰克等 (Franke, Richard H., and James D. Kaul.) 1978. "The Hawthorne experiments: First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623 - 643.

弗兰克尔 (Frankl, Razelle.) 1987. *Televangelism: The Marketing of Popular Religi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弗里德曼 (Freedman, Jonathan J.) 1975. *Crowding and Behavior*. San Francisco: Freeman.

弗里德曼 (Freeman, James M.) 1989. *Hearts of Sorrow: Vietnamese-American Liv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弗里德曼等 (Freeman, Richard and James Medoff.) 1984. *What Do Unions Do?* New York: Basic Books.

弗里德森 (Freidson, Eliot.) 1970. *Profession of Medicine*. New York: Dodd, Mead.

弗里德森 (Freidson, Eliot.) 1979. "The organi-

zation of medical practice." In Howard E. Freeman, Sol Levine, and Len G. Reeder (eds.), *Handbook of Medical Sociology*.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1962.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0.)

弗雷等 (Frey, William, and Alden Speare, Jr.) 1988. *Regional and Metropolitan Growth and Dec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弗里丹 (Friedan, Betty.) 1963.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Norton.

弗里丹 (Friedan, Betty.) 1981. *The Second Stage*. New York: Summit.

弗里丹 (Friedan, Betty.) 1980. "Housing allowances: An experiment that worked." *The Public Interest* 69:15-35.

弗里德兰德 (Friedlander, Walter A., and Robert Z. Apte.) 1980.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elfare*.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弗罗斯特 (Frost, Peter.) 1986. "Skin color preference, sexual dimorphism, and sexual selection: A case of gene culture co-evolu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9:87-113.

弗罗斯特等 (Frost, Richard, and John Stauffer.) 1987. "The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gender, and personality on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filmed viol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7:29-45.

富克斯 (Fuchs, Victor R.) 1988. *Women's Quest for Economic Equal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加布里埃利等 (Gabrielli, William, Barry Hutchings, and Sarnoff Mednick.) 1984. "Genetic influences in criminal convictions: Evidence from and adoption cohort." *Science* 224:891-894.

根斯鲍尔等 (Gaensbauer, Theodore, and Susan Hiatt.) 1984. *The Psychobiology of Affective Development*. Hillsdale, N. J.: Laurence Erlbaum.

盖尔 (Gale, Robert Peter.) 1987. "Calculating risk: Radiation and Chernoby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7:68-75.

加林斯基 (Galinsky, Ellen.) 1986. "Family life

and corporate politics." In Michael W. Yogman and T. Berry Brazelton (eds.), *In Support of Famil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加林斯基 (Galinsky, Ellen.) 1989. "A case for intergenerational child care." *Journal of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20:239-243.

盖尔等 (Galle, Omar R., et al.) 1972. "Population density and pathology: What are the relations for man?" *Science* (April):23-30.

盖洛普等 (Gallup, Alec M., and David L. Clark.) 1987. "The 19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Phi Delta Kappan* (September):17-30.

盖洛普 (Gallup, George H.) 1983b.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83.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盖洛普等 (Gallup, George, Jr., and Alec Gallup.) 1988. *The Gallup Youth Survey*. Princeton, N. J.: Associated Press.

盖洛普公司 (Gallup Organization.) 1988a. *As reported by Emerging Trends* 10:1.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Religious Research Center.

盖洛普公司 (Gallup Organization.) 1988b. *As reported by Emerging Trends* 10:4.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Religious Research Center.

盖洛普公司 (Gallup Organization.) 1988d. "The undivided American - 10 years later." *As reported in Emerging Trends* 10:12.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Religious Research Center.

盖洛普公司 (Gallup Organization.) 1989. *Religion in Americ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Religious Research Center.

甘恩等 (Gann, L. H., and Peter J. Duignan.) 1986. *The Hispanic in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y*.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甘斯 (Gans, Herbert J.) 1962a. *The Urban Villagers*. New York: Free Press.

甘斯 (Gans, Herbert J.) 1962b. "Urbanism and suburbanism as ways of life." In Arnold M. Rose (ed.),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es: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加德纳等 (Gardner, R. A., and B. T. Gardner.) 1975. "Early signs of language in child and chim-

panzee." *Science* 187:752-753.

加芬克尔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加芬克尔等 (Garfinkel, Irwin, and Sara S. McLanahan.) 1986. *Single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A New American Dilemma*. Washington, D. C.: Urban Institute Press.

加藤 (Garten, Helen A.) 1987. "Insider trading in the corporate interest." *Wisconsin Law Review* 4: 573-640.

盖格 (Geiger, Jack.) 1971. "Poor hungry babies." *New South*, 26:4.

盖利斯 (Gelles, Richard J.) 1978.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 In J. P. Martin (ed.), *Violence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Wiley.

盖利斯等 (Gelles, Richard J., and Murray A. Straus.) 1988. *Intimate Violence: The Definitive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buse in the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社会大众调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s) 1972-1988: *Cumulative Codebook*. 1988. Storrs, Conn.: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吉纳维 (Genevie, Louis E. (ed.)) 1975.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Itasca, Ill.: Peacock.

杰勒德 (Gerard, Karen.) 1984. *American Survivo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格尔森 (Gerson, Mary Joan.) 1984. "Feminism and the wish for a child." *Sex Roles* 11:389-397.

吉本斯 (Gibbons, Don C.) 1977. *Society, Crime, and Criminal Careers*.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吉本斯等 (Gibbons, Don C., and Joseph F. Jones.) 1975. *The Study of Devianc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吉布斯 (Gibbs, Jack.) 1966. "Sanctions." *Social Problems* 14:147-159.

吉布斯 (Gibbs, Jack P.) 1975. *Crime,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New York: Elsevier.

吉布斯 (Gibbs, Jack P.) 1981. *Norms,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New York: Elsevier.

吉布森等 (Gibson, Margaret A., and Parminder K. Bhachu.) 1988. "Ethnicity and school perform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uth Asian pupil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1: 239-262.

吉尔伯特等 (Gilbert, Alan, and Joseph Gugler.) 1983. *Cities,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吉尔伯特等 (Gilbert, Dennis, and Joseph A. Kahl.) 1992.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A New Synthesis*. 4th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吉尔 (Gill, Lesley.) 1987. *Peasants,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Change: Frontier Development in Lowland Boliv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吉尔等 (Gill, Stephen, and David Law.) 1988.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吉勒特等 (Gillette, Howard, Jr., and Zanel Miller (eds.)) 1987. *American Urbanis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金斯伯格 (Ginsberg, Benjamin.) 1984. "Money and power: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elections." In T. Ferguson and J. Rogers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Armonk, N. Y.: M. E. Sharpe.

金斯伯格 (Ginsberg, Benjamin.) 1986. *The Captive Public: How Mass Opinion Promotes State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吉鲁阿尔 (Girouard, Mark.) 1985. *Cities and people: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吉特林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吉特林 (Gitlin, Todd.) 1987. *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 New York: Bantam.

格拉斯 (Glass, Ruth.) 1989. *Cliches of Doo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格伦 (Glenn, Norval D.) 1987. "The trend in 'no religion' respondents to U. S. national surveys: Late 1950s to early 1960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 293-314.

格伦等 (Glenn, Norval D., and Charles N. Weaver.) 1981. "The contribution of marital happi-

ness to global happines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3:161-168.

格利克(Glick, Paul C.)1990. "American families: As they are and wer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74 (3):139-145.

格洛克(Glock, Charles Y.)1959. "The religious revival in America." In Jane Zahn (ed.), *Religion and the Face of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格洛克(Glock, Charles Y.)1964. "The role of deprivation i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religious groups." In Robert Lee and Martin Marty (eds.), *Religion and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格洛克(Glock, Charles Y., and Robert N. Bellah) (eds.). 1976. *The New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格卢克曼(Gluckman, Tim Jacob.)1988. "The census and data privacy." *Network* 42:7-8.

戈夫曼(Goffman, Erving.)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戈夫曼(Goffman, Erving.)1961.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Chicago: Aldine.

戈夫曼(Goffman, Erving.)1971. *Relations in Public*. New York: Basic Books.

戈夫曼(Goffman, Erving.)1976. *Gender Advertisements*. New York: Harper & Row.

戈夫曼(Goffman, Erving.)1980. Reprint of 1963 ed.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戈夫曼(Goffman, Erving.)1986.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Seth.)1984. *Theory Z Hospital Management: Lessons from Japan*. Rockville, Md.: Aspen Systems Corp.

戈德索普(Goldthorpe, John H.)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戈比斯基(Golembiewski, Robert T.)1962. *The Small Group: An Analysis of Research Concepts and Oper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古德(Goode, Erich.)1990. *Deviant Behavior*.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古德(Goode, William J.)1959. "The theoretical importance of lo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6):38-46.

古德(Goode, William J.)1960. "Encroachment, charlatanism, and the emerging profession: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medicin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902-914.

古德(Goode, William J.)1963.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Free Press.

古德(Goode, William J.)1982. *The Family*.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古德(Goode, William J.)1984. "Individual investments in family relationships over the coming decades." *The Tocqueville Review* 6-1:51-83.

古迪(Goody, Jack.)198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戈登(Gordon, Milton M.)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戈勒尔(Gorer, Geoffrey.)1965. *Death, Grief, and Mourning*. New York: Doubleday.

戈尼克(Gornick, Vivian.)1990. "Who says we haven't made a revolutio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5, 1990.

戈斯林(Goslin, David A.)1965. *The Schoo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戈特迪纳(Gottdiener, Mark.)1985.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戈特曼(Gottman, Jean.)1964. *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高夫(Gough, Kathleen.)1975.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In R.R. Reiter(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古尔德等(Gould, M. S., and D. Shaffer.)1986. "The impact of suicide in television movies; Ev-

idence of imita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15:690-694.

古尔德(Gould, Stephen J.)1971, *Ever Since Darwin: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古尔德(Gould, Stephen J.)1981.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Norton.

古尔德纳(Gouldner, Alvin W.)1962. "Antiminotaur: The myth of a value-free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9:199-213.

古尔德纳(Gouldner, Alvin.)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戈夫(Gove, Walter R.)1985. "The effect of age and gender on deviant behavior: A bio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In Alice S. Rossi (ed.), *Gender and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 Aldine.

戈夫等(Gove, Walter, Michael Hughes, and Omar Galle.)1979. "Overcrowding in the hom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ossible pathological consequen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February):59-80.

格雷西(Gracey, Harry L.)1970. "Kindergarten as academic boot camp." In Dennis Wrong and Harry L. Gracey (eds.), *Readings in Introductory Sociology*.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格雷厄姆等(Graham, Sazon, and Leo G. Reeder.)1979. "Social epidemiology of chronic diseases." In Howard E. Freeman, Sol Levine, and Leo G. Reeder (eds.), *Handbook of Medical Sociology*.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格雷厄姆(Graham, Thomas W.)1988. "The pattern and importance of public knowledge in the nuclear ag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2(2): 319-334.

格拉纳(Grana, César.)1987. "The bullfight and Spanish national decadence." *Society* 24: 33-37.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ark.)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360-1380.

格兰特等(Grant, Carl, and Christine E. Sleeter.)1988. "Race, class, and gender and aban-

doned dreams."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90:19-40.

格劳曼等(Graumann, Carl F., and Serge Muscovici.)1986.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Crowd Mind and Behavior*.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格雷(Gray, Francine du Plessix.)1990. *Soviet Women: Walking the Tightrope*. New York: Doubleday.

格雷森等(Grayson, Betty, and Morris I. Stein.)1981. "Attracting assault: Victim's nonverbal cu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68-75.

格里利(Greeley, Andrew M.)1989. *Religious Change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格林伯格(Greenberg, David F.)1986. "Marxist criminology." In Bertell Ollman and Edward Vernoff (eds.), *The Left Academy: 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 Vol. 3. New York: Praeger.

格林等(Greene, Maxine, and Mary Anne Raywid.)1987.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schools and schooling." In Kenneth D. Benne and Steven Tozer (eds.), *Society as Educator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86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格里尔(Greer, Scott.)1956. "Urbanism reconsider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ocal areas in a metropol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19-25.

格雷戈里(Gregory, Paul, and Robert Stuart.)1989.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格里本等(Gribben, John, and Mary Gribben.)1988. *The One Percent Advantage*.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格里尔等(Grier, George, and Eunice Grier.)1980. "Urban displacement: A reconnaissance." In S.B. Laska and D. Spain(eds.), *Back to the City*. New York: Pergamon.

格里芬(Griffin, Keith.)1989. *Alternate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格罗金等(Gromkin, Victoria, Stephen Krashen, Susan Curtiss, David Rigler, and Marilyn

- Rigler.) 1974.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n Genie: A case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beyond the critical period." *Brain and language* 1:81-107.
- 格罗斯曼(Grossman, Andrew.) 1989. "A radical departure." *Marketing and Media Decisions* 24: 30.
- 古格勒等(Gugler, José (ed.)) 1988. *Urbaniz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格默(Gummer, Burton.) 1985-1986. "'Committing the truth': Whistleblowing, organizational dissent, and the honorable bureaucrat." *Administration in Social work* 9(Winter):89-102.
- 格皮等(Guppy, Neil, and John C. Goyder.) 1984. "Consensus on occupational prestige: A re-assessment of evidence." *Social Forces* 62:709-723.
- 格尔(Gurr, Ted Robert.) 196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 strife." In H. D. Graham and T. R. Gurr(eds.), *Violence in America*. New York: Bantam.
- 格恩(Gun, T. R.)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盖斯菲尔德等(Gusfield, Joseph R., and Jerzy Michalowicz.) 1984. "Secular symbolism: Studies of ritual, ceremony, and the symbolic order in modern lif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417-435.
- 阿贝马斯(Habermas, Jürgen.) 1973.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 哈根(Hagen, Everett E.) 1962.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 赫基斯塔德(Hagestad, Gunhild.) 1986. In A. Pifer and L. Bronte, *Our Aging Society: Paradox and Premise*. New York: Norton.
- 海恩斯(Haines, Herbert H.) 1988. *Black Radicals and the Civil Rights Mainstream, 1954-1970*.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 哈伯斯塔姆(Halberstam, David.) 1986. *The Reckoning*. New York: Morrow.
- 霍尔(Hall, Edward T.) 1966. *The Hidden Dimension*. New York: Doubleday.
- 霍尔(Hall, Edward T.) 1988. "The hidden dimens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today's world." In F. Poyatos(e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grefe.
- 霍尔(Hall, G. Stanley.) 1904. *Adolescence*. New York: Appleton.
- 霍尔(Hall, Richard H.) 1991. *Organizations: Structures, Processes, and Outcomes*.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哈林(Hallin, Daniel C.) 1984. "The media, the war in Vietnam, and political support: A critique of the thesis of oppositional media." *Journal of Politics* 46:2-29.
- 哈蒙德等(Hammond, Phillip E. (ed.)) 1985. *The Sacred in a Secular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哈蒙德(Hammond, Phillip E.) 1988. "Relig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identity."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7:1-11.
- 汉南等(Hannan, Michael T., and John H. Freeman.) 1989. *Organizational Ec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黑尔(Hare, A. Paul.) 1962. *Handbook of Small Group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 黑尔(Hare, A. Paul.) 1976. *Handbook of Small Group Research*. 2n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 哈福(Harf, James L.) 1986. *The Politics of Global Resources: Population, Food, Energy, and Environment*.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哈金斯等(Harkins, Stephen G., and Kate Szymanski.) 1989. "Social loafing and group eval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934-941.
- 哈洛(Harlow, Harry F.) 1959. "Love in infant monkeys." *Scientific American*, 200:68-74.
- 哈洛(Harlow, Harry F.) 1962. "The heterosexual affectional system in monkey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7:1-19.
- 哈洛(Harlow, Harry F.) 1965. "Sexual behavior in the rhesus monkey." In Frank A. Beach (ed.), *Sex and Behavior*. New York: Wiley.
- 哈曼(Harman, Willis.) 1988. *Global Mind Change*. Sausalito, Calif.: Knowledge Systems.
- 哈珀(Harper, Charles L.) 1989. *Exploring So-*

cial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哈里斯(Harris, C. C.)1983. *The Family an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Allen & Unwin.

哈里斯等(Harris, Chauncey, and Edward L. Ullman.)1945. "The nature of c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42 (Nov.):7-17.

哈里斯(Harris, Louis.)1987. *Inside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哈里斯(Harris, Marvin.)1977. *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哈里斯(Harris, Marvin.)1988. *Culture, People, and Nature*. 5th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哈里斯(Harris, Marvin.)1989. *Our Kind*. New York: Harper & Row.

哈里斯等(Harris, T., M. G. Kovar, R. Suzman, J. C. Klein, and J. J. Feldman.)1989. "Longitudinal study of physical ability in the oldest old."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9:698-702.

哈里森等(Harrison, Bennett, and Barry Bluestone.)1988.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哈里森(Harrison, Paul.)1984. *Inside the Third World: The Anatomy of Pover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哈特曼(Hartmann, Heidi.)1976. "Comment on Marnie W. Mueller's 'The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volunteer work by wome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773-776.

哈维(Harvey, David.)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黑斯廷斯(Hastings, Philip K., and Elizabeth Hann Hastings.)1989,1991. *Index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1987-198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黑斯廷斯(Hastings, Philip K., and Dean R. Hoge.)1986. "Religious and moral attitude trend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1948-1984." *Social Forces* 65:370-377.

豪布(Haub, Carl.)1989. "Understanding popu-

lation projections." *Population Bulletin* 42:4.

哈维格斯特等(Havighurst, Robert J., and Bernice L. Neugarten.)1978. *Society and Education*, 5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哈维格斯特(Havighurst, Robert J., Bernice L. Neugarten, and Sheldon S. Tobin.)1968. "Disengagement and patterns of aging." In Bernice L. Neugarten(ed.), *Middle Age and Ag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霍金斯(Hawkins, John N.)1988.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2:266-281.

霍利(Hawley, Amos.)1950. *Human Ecology*. New York: Ronald Press.

霍利(Hawley, A.)1981. *Urban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Wiley.

海斯等(Hayes, Robert, and William Abernathy.)1988. "Managing our way to economic decline," pp. 129-139. In Frank Hearn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赫兹里里格等(Hazelrigg, L. E., and M. A. Garnier.)1976.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A comparable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access to occupational ranks in seventeen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498-511.

赫恩(Hearn, Frank.)1985. *Reason and Freedom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Boston: Unwin Hyman.

赫恩等(Hearn, Frank (ed.))1988.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希尔(Hecr, David M.)1975. *Society and Population*.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海德森(Heidensohn, Frances.)1987. "Women and crime: Questions for criminology." In Pat Carlen and Ann Worrall, *Gender, Crime, and Justice*.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海尔布伦那(Heilbroner, Robert.)1991. "Symposium: From Sweden to socialism." *Dissent* (Winter):96-110.

海尔布伦等(Heilbrun, Alfred B., Jr., and

Mark R. Hailbrun.)1986. "The treatment of women with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0:240-251.

亨明(Hemming, Heather.)1985. "Women in a man's world: Sexual harassment." *Human Relations* 38:67-79.

亨德里克(Hendrick, Clyde.)1977. "Social psychology as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Clyde Hendrick (ed.), *Perspectives on Sociology*.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亨德里克斯等(Hendricks, Jon, and C. Davis Hendricks.)1986. *Aging in Mass Society: Myths and Realities*. 3r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亨利(Hendry, Joy.)1987. *Understanding Japanese Society*. New York: Croom Helm.

亨利(Henry, Jules.)1955. "Docility, or giving teacher what she wan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1:33-41.

亨利(Henry, Susan.)1984. "Juggling the frying pan and the fire: The portrayal of employment and family life in seven women's magazines, 1975-1982."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23:87-107.

亨利(Henry, W. E.)1965. "Engagement and disengagement: Toward a theory of adult development." In R. Kastenbaum (ed.),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亨斯勒(Hensley, Thomas R., and Glen W. Griffin.)1986. "Victims of groupthink: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 and the 1977 gymnasium controvers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0:497-531.

赫伯斯(Herbers, John.)1986. *The New Heartland: America's Flight Beyond the Suburbs and How It Is Changing Our Future*. New York: Times Books.

赫茨(Hertz, Rosanna.)1986. *More Equal than Others: Women and Men in Dual-Career Marri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希尔(Hill, Grechen.)1987. "Clos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t work and with kin: Testing an urban subculture theory." *Mid-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

ogy 12(2):51-70.

希尔(Hill, Richard Child.)1978. "Fiscal collapse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decaying central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illiam K. Tabb and Larry Sawers (eds.), *Marxism and the Metropol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海因兹(Hinds, Michael de Courcy.)1990. "Pulling families out of welfare is proving to be an elusive goal." *New York Times* April 2, p. A1.

欣克尔等(Hinkle, Roscoe, Jr., and Gisela J. Hinkle.)1954.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赫希霍恩(Hirschhorn, Larry.)1984. *Beyond Mechan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赫希霍恩(Hirschhorn, Larry.)1988. *The Workplace Withi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伊尔希(Hirschi, Travis.)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赫希曼(Hirschman, Albert.)1982.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海特(Hite, Shere.)1987. *Women and Love: 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rogress*. New York: Knopf.

霍克斯希尔德等(Hochschild, Arlie, with Anne Machung.)1989. *Second Shift: Inside the TwoJob Marri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霍基特等(Hockett, C. F., and R. Ascher.)1964. "The human revolu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5:135-147.

霍奇等(Hodge, Robert W., Paul M. Siegel, and Peter H. Rossi.)1964.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5-196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286-302.

霍根等(Hogan, Dennis P., and Nan Marie Astone.)1986.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109-130.

霍兰等(Holland, Dorothy C., and Margaret A. Eisenhart.)1990. *Educated in Romance: Women, Achievement, and College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霍林格等(Höllinger, Franz, and Max Haller.)1990. "Kinship and social networks in modern soci-

etie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among seven nation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102 - 124.

霍林格等(Hollinger, Richard C., and John P. Clark.)1982.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s of employee devianc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3: 333 - 343.

霍林斯等(Holmes, William, and Lenore, Olsen.)1984. "Abused teens." *Psychology Today* (July):8.

霍曼斯(Homans, George C.)1958.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2:597 - 606.

霍曼斯(Homans, George C.)1974.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Rev.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霍尼(Honey, Maureen.)1984. *Creating Rosie the Riveter: Class Gender and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胡滕(Hooten, Ernest.)1939. *Crime and the 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胡佛等(Hoover, Sally L., and Jacob S. Siegel.)1986. "International demographic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on aging."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5 - 30.

霍普金斯等(Hopkins, Terence K.,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1982. *World 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霍珀(Hopper, Rex D.)1950.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Social Forces* 28:270 - 279.

霍恩(Horn, Patricia.)1991. "A market: But what kind?" *Dollars and Sense* (December):6 - 9.

霍维茨(Horowitz, Rose A.)1989. "California beach culture rides wave of popularity in Japan." *Journ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381:1 - 2.

霍塞里茨等(Hoselitz, Bert F., and Wilbert E. Moore(eds.))1963.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ety*. Paris and the Hague: UNESCO, Mouton.

霍奇基斯等(Hotchiss, Lawrence, and Linda Eberst Dorsten.)1987. "Curriculum effects on early posthigh school outcome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7:191 - 219.

霍夫兰等(Houghland, James G., Kyong-Dong Kim, and James A. Christenson.)1979.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variables on memb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Rural Sociology* 44:602 - 612.

乌特等(Hout, Michael, and Andrew Greeley.)1987. "The center doesn't hold: Church attend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325 - 345.

霍华德(Howard, Michael C.)1986.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2n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豪(Howe, Louise Kapp.)1978. *Pink Collar Workers: Inside the World of Women's Work*. New York: Avon Books.

霍伊特(Hoyt, Homer.)1939. *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n Cities*. Washington, D. C.: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休伯(Huber, Bettina J.)1984. *Career Possibilities for Sociology Graduate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Sociology Association.

赫德森等(Hudson, Ray, and Allen M. Williams.)1989. *Divided Britain*. New York: Behaven Press.

休斯(Hughes, Everett.)1945. "Dilemmas and contradictions of statu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0:353 - 359.

休斯等(Hughes, Everett C., Howard S. Becker, and Blanche Geer.)1962. "Student culture and academic effort." In Nevitt Sanford (ed.), *The American College: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gher Learning*. New York: Wiley.

休斯等(Hughes, Michael, and Bradley Hertel.)1990. "The significance of color remains: A study of life chances, mate selection,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among black Americans." *Social Forces* 68(4): 1105 - 1120.

休斯(Hughes, Patrick H.)1977. *Behind the Wall of Respect: Community Experiments in Heroin Contr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汉弗莱斯(Humphreys, Laud.)1970.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Chicago: Aldine.

亨特等(Hunt, Janet G., and Larry L. Hunt.) 1982. "The dualities of careers and families: New integrations or new polarizations?" *Social Problems* 29: 499-509.

亨特(Hunt, Jennifer.) 1985. "Police accounts of normal force." *Urban Life* 13(4):315-341.

亨特(Hunt, Morton.) 1985. *Profiles of Social Research: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亨特(Hunter, Albert.) 1974. *Symbolic Communities: The Persistence and Change of Chicago's Local Commun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亨特(Hunter, James Davison.) 1987. *Evangelicalism: The Coming Gener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亨特(Hunter, James Davison.) 1991.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海曼(Hyman, H. H.) 1953. "The value systems of different class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analysis of stratification." In R. Bendix and S. M.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伊加(Iga, Mamoru.) 1986. *The Thorn in the Chrysanthemum: Suicide and Economic Success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伊利克(Illich, Ivan.) 1976. *Medical Nemesis*. New York: Pantheon.

伊布洛格等(Imbrogno, Salvatore, and Nadia Ilyin Imbrogno.) 1986. "Marriage and family in the USSR: Changes are emerging." *Social Casework* 67: 245-259.

英克尔斯(Inkeles, Alex.) 1966. "The modernization of man." In M. Weiner (ed.), *Moder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Growth*. New York: Basic Books.

英克尔斯(Inkeles, Alex.) 1978.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modernity." In Richard F. Tomasson (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ology*.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英克尔斯等(Inkeles, Alex, and Peter H. Rossi.) 1956. "National comparison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29-339.

英克尔斯等(Inkeles, Alex, and D. H. Smith.) 1974. *Becoming Moder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英斯科等(Insko, Chester A., Richard H. Smith, Mark D. Alicke, et al.) 1985. "Conformity and group size: The concern with being right and the concern with being like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1:41-50.

艾里什(Irish, Richard K.) 1978. *Go Hire Yourself an Employer*. Garden City, N. Y.: Anchor.

欧文等(Irvine, S. H., and J. W. Berry.) 1988. *Human Abilities in Cultural Contex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伊斯雷尔(Israel, Joachim.) 1971. *Alienation*. Boston: Allyn & Bacon.

杰克林(Jacklin, Carol Nagy, Janet Ann DiPietro, and Eleanor F. Maccoby.) 1984. "Sextyping behavior and sex-typing pressure in child/parent interactio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3:413-425.

杰克逊(Jackson, Kenneth T.) 1985.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雅克布斯珍妮(Jacobs, Jane.)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雅克布斯杰里(Jacobs, Jerry A.) 1989. *Revolving Doors: Sex Segregation and Women's Career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然(Jain, Uday.) 1987. "Effect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resources in the feeling of crowding and personal spac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7: 331-338.

詹姆斯(James, Franklin J.) 1977. *Back to the City: An Appraisal of Housing Reinvestment and Population Change in America*.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詹姆斯等(James, Franklin J., Betty I. Mc-

Cummings, and Eileen A. Tynan.) 1984. *Minorities in the Sunbel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贾尼斯 (Janis, Irving.) 1972. *Victims of Groupthin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贾尼斯 (Janis, Irving.) 1983.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2nd ed., rev.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詹森 (Janson, Carl-Gunnar.) 1980. "Factorial social ecology: An attempt at summary and evalu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6:433-456.

詹克斯 (Jencks, Christopher.) 1985. "Affirmative action for black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8(6):751-760.

詹克斯等 (Jencks, Christopher, et al.) 1972. *Inequality: A Re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of Family and Schooling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詹克斯等 (Jencks, Christopher, et al.) 1979. *Who Gets Ahead?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Success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詹克斯等 (Jencks, Christopher, and David Riesman.) 1977. *The Academ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詹金斯 (Jenkins, J. Craig.) 1983.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詹森 (Jensen, Arthur.) 1969. "How much can we boost IQ and scholastic achievement?"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9:1-23.

詹森 (Jensen, Arthur.) 1973a. *Educability and Group Differences*. New York: Harper & Row.

詹森 (Jensen, Arthur.) 1973b. "The differences are real." *Psychology Today* (December):80-86.

詹森等 (Jensen, Gary, and Eve Raymond.) 1976. "Sex differences in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13:427-448.

约翰逊 (Johnson, Benton.) 1968. "On church and se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539-549.

约翰逊等 (Johnson, Colleen Leahy, and Frank A. Johnson.) 1980. "Parenthood, marriage, and careers: Situational constraints and role strain." In Fran Pepitone-Rockwell (ed.), *Dual-Career Coupl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约翰逊 (Johnson, Doyle Paul.) 1979. "Dilemmas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The case of the People's Temple." *Sociological Analysis* 40:315-323.

约翰逊等 (Johnson, Elizabeth S., and John B. Williamson.) 1987. "Retir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K. S. Makjides and C. L. Cooper (eds.), *Retirement in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New York: Wiley.

约翰逊 (Johnson, Norris R.) 1987a. "Panic and the breakdown of social order: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Sociological Focus* 20(3):171-183.

约翰逊 (Johnson, Norris R.) 1987b. "Panic at 'The Who concert stamped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Social Problems* 34(4):362-373.

约翰斯通 (Johnstone, Ronald L.) 1988.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Interaction*.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乔利等 (Jolly, Clifford J., and Fred Plog.) 1979. *Physical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New York: Knopf.

乔斯塔德 (Jorstad, Erling.) 1990. *Holding Fast/Pressing On: Religion in America in the 1980s*. New York: Praeger.

乔伊特 (Jowett, Garth S.) 1987.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s: The re-emergence of a research tradi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7:97-114.

乔伊等 (Joy, L. A., M. M. Kimball, and M. L. Zabrack.) 1986. "Television and children's aggressive behavior." In T. M. Williams (ed.), *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Three Communities*. Orlando, Fla.: Academic Press.

卡恩等 (Kahn, Alfred J., and Sheila B. Kamerman.) 1987. *Child Care: Facing the Hard Choices*. Dover, Mass.: Auburn House.

卡恩 (Kahn, Herman.) 1984. *The Coming Boo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凯泽 (Kaiser, Robert G.) 1976. *Russia: The People and the Power*. New York: Pocket Books.

卡梅尔曼 (Kamerman, Sheila B.) 1991. "Child care policies and programs: An international overview."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7(2):179-

196.

卡梅尔曼等(Kamerman, Sheila B., and Alfred J. Kahn.)1981. *Child Care, Family Benefits and Working Parent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卡明(Kamin, Leon J.)1974.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 New York: Wiley.

卡梅伊尔等(Kammeyer, Kenneth C., and Helen Ginn.)1986. *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Chicago: Dorsey Press.

坎特(Kanter, Rosabeth Moss.)1977.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坎特(Kanter, Rosabeth.)1983. *The Change Make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坎特罗威茨(Kantrowitz, Barbara.)1993a. "The messiah of Waco." *Newsweek*, Mar. 15:56-58.

坎特罗威茨(Kantrowitz, Barbara.)1993b. "Day of judgment." *Newsweek*, May 3:22-27.

坎特罗威茨等(Kantrowitz, Barbara with Pat Wingert, Patrick Rogers, Nadine Joseph, and Shawn D. Lewis.)1991. "A is for Ashanti, B is for black...and C is for curriculum which is starting to change." *Newsweek*, Sept. 13:45-46.

卡萨达(Kasarda, John D.)1989. "Urban industrial transition and the underclas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1:26-47.

卡斯鲍姆(Kasselbaum, Gene, David A. Ward, and Daniel M. Wilner.)1971. *Prison Treatment and Parole Survival*. New York: Wiley.

卡逊(Kasun, Jacqueline R.)1978. *The War Against Population: The Economics and Ideology of World Population Control*.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卡茨等(Katz, Elihu, and Paul Lazarsfeld.)1955. *Personal Influ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卡茨(Katz, Michael.)1986. *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 A Social History of Welfare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卡茨(Katz, Michael.)1989. *The Undeserving Poor*. New York: Pantheon.

凯勒(Keller, Suzanne.)1968. *The Urban*

Neighborhood. New York: Random House.

凯尼斯顿(Keniston, K.)1970. "Youth as a stage of life." *American Scholar* 39:631-654.

肯尼迪(Kennedy, Paul.)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肯特尔(Kentor, Jeffrey.)1981.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peripheral urbanizati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depend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201-211.

克尔克霍夫(Kerckhoff, Alan C.)1986. "Family position, peer influences, and schooling." In John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克尔克霍夫等(Kerckhoff, Alan C., and Kurt W. Back.)1967. *The June Bug*.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克尔等(Kerr, C., et al.)1964.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凯斯勒等(Kessler, Ronald C., and Paul D. Cleary.)1980. "Social clas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463-478.

哈里扎德等(Khalilzad, Zalmay, and Cheryl Bernard.)1984. *The Government of God: Iran's Islamic Republ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哈拉(Khullar, Gurdeep S.)1988. "Retiremen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odern Sociology* 18:107-137.

基德尔等(Kidder, Louise, Joanne L. Boell, and Marilyn M. Moyer.)1983. "Rights consciousness and victimization prevention: Personal defense and assertiveness train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9(2):155-170.

金等(King, Haitung, and Frances B. Locke.)1980.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entury of occupational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4:15-42.

柯比等(Kirby, David J., et al.)1973.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Northern School of Desegregation*.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基坦罗(Kitano, Harry H. L.)1985. *Race Relations*.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克切尔(Kitcher, Philip.)1987. "Confessions of a curmudge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0: 89-99.

基德森等(Kitson, Gay C., Karen B. Babri, and Mary J. Roach.)1985. "Who divorces and wh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6(3):255-293.

乔勒等(Kjoller, Susanne, Bente Hansen, and Erling Segest.)1989. "Free condoms in the schools of Copenhagen, Denmark."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59:66-68.

克拉斯(Klass, Perri.)1988. *A Not Entirely Benign Procedure*. New York: NAL/Penguin.

克拉森等(Klassen, Albert D., Colin J. Williams, and Eugene E. Levitt.)1989. *Sex and Mor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mpirical Enquiry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Kinsey Institute*.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克勒特克等(Kletke, Phillip R., William D. Marder, and Anne B. Silberger.)1990. "The growing proportion of female physicians: Implications for U. S. physician suppl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0:300-304.

克拉克洪(Kluckhohn, Clyde.)1961. "The study of values." In D. N. Barrett (ed.), *Values in America*. South Bend,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克卢格尔(Kluegel, James R.)1987. "Macroeconomic problems, beliefs about the poor, and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spending." *Social Problems* 34: 82-91.

奈特·罗宾(Knight, Robin.)1989. "Just you move over, 'Enry' Iggin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24, p. 40.

诺德尔等(Knodel, John, Chamratrithron G. Aphichat, and Nibhon Debevalya.)1987. *Thailand's Reproductive Revolution: Rapid Fertility Decline in a Third World Setting*.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科克恩等(Kochen, Manfred (ed.))1989. *The Small World*. Norwood, N. J.: Ablex.

科恩(Kohn, Alfie.)1988. "You know what they say..." *Psychology Today* 22:36-41.

科恩(Kohn, M. L.)1963. "Social clas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8:471-480.

科马洛维基(Komarovsky, Mirra.)1964. *Blue-Collar Marri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科维茨(Konvitz, Josef.)1985. *The Urban Millenniu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科贝尔(Koppel, Herbert.)1987. *Likelihood of Victimization*.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Technical Report NCJ-104274.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科特(Korte, Charles.)1980. "Urban-nonurban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models of urban impac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6 (3):29-51.

科瓦(Kovar, Mary Grace.)1986. "Expenditures for the medical care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in 1980." *Milbank Quarterly* 64:100-132.

科瓦等(Kovar, Mary Grace, Gerry Hendcrshot, and Evelyn Mathis.)1989. "Older people in the U. S. who receive help with basic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9:778-779.

克劳斯科普夫等(Krauskopf, Joan A., and Mary Elise Burnett.)1983. *Trial*.

克里考斯基等(Krymkowski, Daniel H., and Russell Middleton.)1987.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ast Africa: Bases of respect among Kipsigis and Kikuyu men in rural Kenya." *Rural Sociology* 32: 379-388.

金(Kung, Hane.)1986. *Christianity and the World Religions*. New York: Doubleday.

库切尔(Kutscher, Ronald.)1991. "Outlook: 1990-2005: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Monthly Labor Review* (November):3-12.

兰迪斯(Landis, Suzanne E.)1987. "Sick child care options: What do working mothers prefer?" *Women and Health* 1:61-77.

莱恩(Lane, Christel.)1987.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Soviet lower white-collar worker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ociology* 21: 171 - 198.

莱恩(Lane, David.) 1984.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lass." In Erik P. Hoffmann and Robbin F. Laird (eds.), *The Soviet Polity in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Aldine.

兰利(Langley, Lester D.) 1988. *Mex America: Two Countries, One Future*. New York: Crown.

拉皮德斯等(Lapidus, Gail Warshofsky (ed.)) 1982. *Women, Work, and Family in the Soviet Union*. Armonk, N. Y.: M. E. Sharpe.

拉什(Lasch, C.) 1977.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拉什(Lasch, Christopher.) 1979.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 Warner Books.

拉斯卡(Laska, Shirley B., and Daphny Spain (eds.)) 1980. *Back to the City*. New York: Pergamon.

拉斯莱特(Laslett, P.) 1977. *Family Life and Illicit Love in Earlier Gener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拉斯莱特(Laslett, Peter.) 1984. *The World We Have Lost: 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Age*. 3rd ed. New York: Scribner's.

拉斯莱特等(Laslett, P. (ed.), with R. Wall.) 1972.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拉塔内等(Latané, Bibb, Kipling Williams, and Stephen Harkins.) 1979. "Many hands make light the work: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loaf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822 - 832.

拉托利等(La Torre, R. P., and K. Kear.) 1977. "Attitudes toward sex in the aged."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6: 203 - 213.

劳顿(Lawton, M. Powell.) 1977. "Environments for older persons." *The Humanist* (September/October): 20 - 24.

勒巴等(Leba, John Kong, John H. Leba, and Anthony T. Leba.) 1985. *The Vietnamese Entrepreneurs in the U. S. A.: The First Decade*.

Houston, Tex.: Zieleks.

勒邦(Le Bon, Gustave.) 1946.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New York: Macmilla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6.)

李等(Lee, Valerie E., and Anthony S. Bryk.) 1988. "Curriculum tracking as mediating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high school achievemen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1: 78 - 94.

勒格兰等(LeGrand, Julian, and Saul Estrin (eds.)) 1989. *Market Soc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利什曼(Leishmann, Katie.) 1983. "Child abuse: The extent of the harm." *The Atlantic* 252: 23 - 32.

莱曼(Lemann, Nicholas.) 1991.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Knopf.

雷梅特(Lemert, Edwin.) 1951. *Social Pat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雷梅特(Lemert, Edwin.) 1967. *Human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Control*.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莱纳冈等(Lenaghan, Donna D., and Michael J. Lenaghan.) 1987. "AIDS and education: The front line of prevention." *The Futurist* 21(6): 17.

伦格曼等(Lengermann, Patricia M., Katherine M. Marconi, and Ruth Wallace.) 1978. "Sociological theory in teaching sex roles: 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phenomenology." *Woma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 375 - 385.

伦格曼等(Lengermann, Patricia Madoo, and Ruth A. Wallace.) 1985. *Gender in America: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Chang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列宁(Lenin, V. I.) 1917.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Path Press.

伦斯基(Lenski, Gerhard.) 1984.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2nd e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伦斯基等(Lenski, Gerhard, Jean Lenski, and Patrick Nolan.) 1991. *Human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伦纳德(Leonard, Eileen B.) 1982. *Women*.

Crime, and Society: A Critique of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New York: Longman.

莱尔施 (Lersch, Rainer.) 1988. "Praktisches Lernen und Bildungsreform: Zur Dialektik von Nähe und Distanz der Schule zum Leben." *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 34:781-797.

勒文松 (Levenson, Richard L., Jr.) 1984. "Incestuous fathers." *Psychology Today* (April):14.

勒万 (Levin, Jack, and Arnold Arluke.) 1987. *Gossip: The Inside Scoop*. New York: Plenum Press.

勒文热 (Levinger, George.) 1979. "A social exchange view on the dissolution of pair relationships." In Robert L. Burgess and Ted L. Huston, *Social Exchange i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勒文松 (Levinson, Daniel J., et al.) 1978. *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 New York: Knopf.

勒文松 (Levinson, Mark.) 1992. "Our economy keeps limping." *Dissent* (Winter):5-6.

莱维斯特劳斯 (Lévi-Strauss, Claude.) 1969.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Boston: Beacon Press.

刘易斯 (Lewis, Oscar.)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刘易斯 (Lewis, Oscar.) 1961.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New York: Random House.

刘易斯 (Lewis, Oscar.) 1964. *Pedro Martinez*. New York: Random House.

刘易斯 (Lewis, Oscar.) 1966. *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San Juan and New York*. New York: Random House.

雷温亭等 (Lewontin, R. C., S. Rose, and L. J. Kamin) 1984.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antheon.

里科那 (Lickona, Thomas) 1989. "Educating the moral child." *Education Digest* 55:45-47.

利伯曼 (Lieberman, Morton A., Irvin D. Yalom, and Matthew B. Miles.) 1973. *Encounter Groups: First Facts*. New York: Basic Books.

利博 (Liebow, Elliot.) 1967. *Tally's Corner*. Boston: Little, Brown.

莱特 (Light, Donald W.) 1989. "Social control and 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system." In Howard E. Freeman and Sol Levine (eds.), *Handbook of Medical Sociology*. 4th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林肯等 (Lincoln, James R., and Arne L. Kalleberg.) 1990. *Culture, Control,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Work Organization and Work Attitu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林德布朗 (Lindblom, Charles.)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林赛 (Lindsey, Linda L.) 1990. *Gender Role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林克等 (Link, Bruce G., and Francis T. Cullen.) 1990. "The labeling theory of mental disorder: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Research in Community and Mental Health* 6:75-105.

林顿 (Linton, Ralph.) 1936. *The Study of Man*.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林顿 (Linton, Ralph.) 1937. "The one hundred percent American." *American Mercury* 40: 427-429.

林茨等 (Linz, Daniel G., and Edward Donnerstein.) 1989. "The effects of violent messages in the mass media." In James Bradac (ed.), *Message Effect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Sage Annual Review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17.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李普曼布鲁门 (Lipman-Blumen, Jean.) 1984. *Gender Roles and Powe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利皮特等 (Lippit, Ronald, and Ralph K. White.) 1952.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group atmospheres." *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in Child Welfare* 16:43-195.

利普赛特 (Lipset, Martin N.) 1987. "Blacks and Jews: How much bias?" *Public Opinion* 10:4-5.

利普赛特 (Lipset, Seymour M.) 1963.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利普赛特等(Lipset, Seymour M., and Reinhard Bendix.) 1964.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利普赛特等(Lipset, Seymour M., and Earl Raab.) 1981. "The election and the evangelicals." *Commentary* 71:25-31.

利普赛特等(Lipset, Seymour, Martin Trow, and James, Coleman.) 1956. *Union Democrac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利特沃克等(Litwak, Eugene, and Henry Meyer.) 1966. "A balance theory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primary group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1 (March):31-58.

勒林等(Loehlin, John, Gardner Lindzey, and J. N. Spuhler.) 1975. *Race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San Francisco: Freeman.

洛夫兰(Lofland, John.) 1971.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洛夫兰(Lofland, John.) 1977. "'Becoming a world saver' revisite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6):805-18.

洛夫兰(Lofland, John.) 1985. *Protest: Studie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洛根等(Logan, John R., and Mark Schneider.) 1984. "Racial segreg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n suburbs, 1970-198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874-888.

隆布罗索(Lombroso-Ferrero, Gina.) 1911. *Criminal Ma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Cesare Lombroso*.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洛帕塔(Lopata, Helena.) 1986. "Becoming and being a widow: Re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and support systems."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19:203-214.

洛帕塔(Lopata, Helena Z. (ed.)) 1987. *Widows*. Vol. 1.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洛夫曼等(Loveman, Gary, and Chris Tilly.)

1988. "Good jobs or bad jobs: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January-February):46-65.

劳里(Lowry, Ira S.) 1980. "Dismal future." In A. P. Solomon (ed.), *The Prospective C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卢肯比尔(Luckenbill, David F.) 1986. "Deviant career mobility: The case of male prostitutes." *Social Problems* 33:283-296.

卢肯曼(Luckmann, Thomas.) 1967. *The Invisible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卢肯曼(Luckman, Kate.) 1981. "The sexuality of the older person: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e Gerontologist* 21:203-208.

卢克(Luker, Kristen.) 1984. *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卢克等(Luker, Richard, and Jerome Johnston.) 1988. "TV and teens: Television in adolescent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Education* 52: 350-353.

伦德(Lund, Dale A., (ed.)) 1989. *Older Bereaved Spouses: Research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New York: Hemisphere.

伦德等(Lund, Dale A., Michael S. Caserta, and Margaret F. Dimond.) 1986. "Gender differences through two years of bereavement among the elderly." *The Gerontologist* 26:314-320.

伦丁(Lundin, T.) 1984. "Morbidity following sudden and unexpected bereave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4:84-88.

林德等(Lynd, Robert S., and Helen M. Lynd.) 1929. *Middletow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林德等(Lynd, Robert S., and Helen M. Lynd.) 1937.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林恩(Lynn, Naomi B.) 1984. "Women and politics: The real majority." In Jo Freeman (ed.), *Wome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alo Alto, Calif.: Mayfield.

莱昂(Lyon, Larry.) 1987. *The Community in Urban Society*. Chicago: The Dorsey Press.

利斯塔尔(Lystard, Mary.)1986. *Violence in the Hom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Brunner Mazel Publishers.

马可比等(Maccoby, Eleanor Emmons (ed.))1966. *The Development of Sex Differenc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马可比等(Maccoby, Eleanor Emmons, and Carol Nagy. Jacklin.)1974. *The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马可比等(Maccoby, Eleanor Emmons, and Carol Nagy. Jacklin.)1980. "Sex differences in aggression: A rejoinder and reprise." *Child Development* 51:964-980.

麦凯(MacKay, Charles.)1932.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41.)

麦金农等(Mackinnon, Carol E., and Donna King.)1988. "Day care: A review of literatur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critique of resources." *Family Relations* 37(2):229-236.

马格兹里尔等(Magaziner, Ira, and Mark Patinigin.)1989. *The Silent War: Inside the Global Business Battles Shaping America's Fu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马洛伊(Mallo, Ruth.)1989. *Fielding'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Morrow.

马尔毛德(Malmaud, Roslyn K.)1984. *Work and Marriage: The Two-Profession Famil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曼根帕克等(Mangan, J. A., and Roberta J. Park.)1987. *From Fair Sex to Feminism: Sport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Women*. London: Frank Cass.

曼宁(Manning, Peter K.)1974. "The police: Mandate strategies and appearances." In Richard Quinney (ed.), *Criminal Justice in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马杰(Marger, Martin N.)1981. *Elites and Masse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Van Nostrand.

马戈利斯(Margolis, Maxine L.)1990. "From

mistress to servant: Downward mobility among Brazilian immigrants in New York City." *Urban Anthropology* 19(3):215-231.

马里斯(Maris, Ronald W.)1981. *Pathways to Suicide: A Survey of Self-Destructive Behavio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马科斯基等(Markowski, E. M., J. W. Croake, and J. F. Keller.)1978. "Sexual history and present sexual behavior of cohabitating and married couple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4:27-39.

马林(Marlin, John T.)1988. *Cities of Opportunity: Finding the Best Place to Work: Live, and Prosper in the 1990s*. New York: National Civic League.

马林等(Marlin, John T., Immanuel Ness, and Stephen T. Collins.)1986. *The Book of World City Rankings: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Work in Over 100 Urban Centers*. New York: Free Press.

马雷等(Marrett, Cora Bagley, and Cheryl Leggon (eds.))1985. *Research in Race Relations*. Vol. 4.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马西(Marsh, Dave.)1981. *Born To Run*. New York: Dell.

马丁(Martin, David.)1978. *A General Theory of Secularization*.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马丁(Martin, L. John.)1984. "The genealogy of public opinion polling."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72:12-23.

马丁等(Martin, Michael T., and Terry R. Kandal.)1989. *Studie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Marx, Karl.)1964.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马克思、恩格斯(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1969.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48.)

马斯尼克等(Masnick, George S., and Joseph A. McFalls, Jr.)1978. "Those perplexing U.S. fertility swings." *PRB Report*, November.

马萨奇里等(Masaghi, Michael P., and Claire McCullough.)1979. "Policy research and politics:

Some inferences from the 'Coleman Report' for the policy role of the social scientist." *Sociological Focus* 12:87-101.

马斯特斯等(Masters, William H., and Virginia E. Johnson.) 1966. *Human Sexual Response*. Boston: Little, Brown.

马斯特斯等(Masters, William H., and Virginia E. Johnson.) 1970. *Human Sexual Inadequacy*. Boston: Little, Brown.

马西森等(Mathisen, Gerald S., and James A. Mathisen.) 1988. "The new fundamentalism: A sociohistor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ological change."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30:18-32.

马特斯(Matras, Judah.) 1984. *Social Inequality,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麦卡锡等(McCarthy, J.D., and M.N. Zald.) 1973. *The Trend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麦克莱兰(McClelland, David G.) 1967. *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麦科纳希等(McConahay, John B., and Joseph C. Hough, Jr.) 1976. "Symbolic Rac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2:23-45.

麦科德等(McCord, William, and Arline McCord.) 1986. *Paths to Progress: Bread and Freedom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麦科马克(McCormick, Teresa.) 1984. "Multiculturalism: Some principles and issues." *Theory into Practice* 23(2)(Spring).

麦基尔(McKeachie, W. J.) 1954. "Student centered versus instructor centered instruc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5:143-150.

麦肯齐(McKenzie, Roderich D.) 1926. "The scope of human ecology." In E. W. Burgess (ed.), *The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麦基翁(McKeon, Thomas.) 1976. *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麦金利等(McKinley, John, and John Stoekle.) 1988. "Corporation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docto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

vices 18:191-205.

麦克卢汉(McLuhan,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New York: McGraw-Hill.

麦克尼尔(McNeil, Kenneth.) 1978.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al power: Building on the Weberian legac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3(1):65-90.

麦克菲尔(McPhail, Clark.) 1971. "Civil disorder participat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recent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1058-1073.

麦克菲尔等(McPhail, Clark, and Ronald T. Wohlstein.) 1983.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s within gatherings, demonstrations, and rio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麦克奎尔(McQuail, Denis.) 1985.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93-111.

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arles W. Morri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 1964. "The psychology of primitive justice." In Lewis A. Coser and Bernard Rosenberg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A Book of Readings*. New York: Macmillan.

米德等(Mead, Lawrence M., and Laurence E. Lynn, Jr.) 1990. "Should workfare be mandatory? What research say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9(3):400-404.

米德(Mead, Margaret.) 1935/1963.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 Morrow.

米德(Mead, Margaret.) 1975. *Male and Female: A Study of the Sexe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Morrow.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9.)

米德(Mead, Margaret.) 1977. *Letters from the Field: 1925-1975*. New York: Harper & Row.

梅多斯等(Meadows, Dennis L., Donella Meadows, et al.)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梅堪里克(Mechanic, David.) 1986. *From Advocacy to Allo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梅尔维尔(Melville, Keith.) 1988.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Tod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梅里克(Merrick, T.)1986, *Population Pressure in Latin America*. 41(3). Washington, D. 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梅里克等(Merrick, Thomas W., and Stephen J. Tordella.)1988. "Demographics: People and markets." *Population Bulletin* 43:1.

默顿(Merton, Robert K.)1956.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72-682.

默顿(Merton, Robert K.)1956.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 ed.). Glencoe, Ill.: Free Press.

默顿(Merton, Robert K.)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 ed.) New York: Free Press.

默顿(Merton, Robert K.)1976.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In Robert K. Merton and Robert A. Nisbet (eds.),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4th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默顿(Merton, Robert K.)1984. "Scientific fraud and the fight to be first."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November 2, pp. 1-2.

梅思尼(Metheny, E.)1977. *Vital Issue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梅罗维茨(Meyrowitz, Joshua.)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ortance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米尔布雷思(Milbrath, Lester.)196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米尔格朗(Milgram, Stanley.)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371-378.

米尔格朗(Milgram, Stanley.)1970.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cities." *Science* 167:1462.

米尔班德(Miliband, Ralph.)1969.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米尔班德(Miliband, Ralph.)1977. *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米勒(Miller, David (ed.))1987.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米勒(Miller, David.)1989. "Why markets?" In Julian LeGrand and Saul Estrin (eds.), *Market Socialism*, pp. 25-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米勒等(Miller, Delbert, and William Form.)1980. *Industrial Soci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米勒(Miller, Jeannie.)1979. *Six Years with God: Life Inside Reverend Jim Jones' People's Temple*. New York: A & W.

米勒琼斯(Miller-Jones, Dalton.)1989. "Culture and test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360-366.

米尔斯(Mills, C. Wright.)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米尔斯(Mills, C. Wright.)1967.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迈纳等(Minor, W. William., and Joseph Harry.)1982. "Deterrent and experimental effects in perceptual research: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9:190-203.

明茨等(Mintz, Steven, and Susan Kellogg.)1988. *Domestic Revolution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米什尔(Mishel, Lawrence.)1989. "The late great debate on deindustrialization." *Challenge* (January-February):35-43.

米切尔(Mitchell, Robert E.)1971.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high-density hous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18-29.

米罗夫(Mitroff, Ian I.)1987. *Business Not As Usual*.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摩诺克(Molotch, Harvey.)1979. "Capital and neighborh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conceptual links."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14:289-312.

摩蒙尼(Momeri, Jamshid A. (ed.))1989. *Homeles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State Survey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蒙尼特等(Monette, Duane P., Thomas J. Sullivan, and Cornell R. De Jong.)1986. *Applied Sociological Research*.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莫尼(Money, John.)1977. "Destereotyping sex roles." *Society* 14(5):25-28.

莫尼(Money, John.)1986. "Gender: History, theory, and usage of the term in sexolog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nature/nurture." *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 11:71-79.

莫尼(Money, John.)1988. *Gay, Straight, and In-Between: The Sexology of Erotic Orien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莫尼等(Money, John A., and Anke A. Ehrhardt.)1972. *Man & Woman, Boy & Gir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穆尼等(Mooney, Linda A., and Sarah Brabant.)1988. "Birthday cards, love, and communication."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72:106-109.

穆尔等(Moore, Timothy E., and Leslie Cadeau.)1985.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the elderly and minorities in Canadian television commercials."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7: 215-225.

穆尔(Moore, Wilbert E.)1960.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810-818.

穆尔(Moore, Wilbert E.)1963. *Social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穆尔(Moore, Wilbert E.)1979. *World Modernization: The Limits of Convergence*. New York: Elsevier.

摩根(Morgan, Gwen G.)1986. "Supplemental care for young children." In Michael W. Yogman and T. Berry Brazelton (eds.), *In Support of Famil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摩根(Morgan, Lewis Henry.)1964. *Ancient Society* (L.A. White,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77.)

莫里森(Morison, Robert S.)1979. "Life extending technologies." In Robert M. Veatch (ed.), *Life Span*. New York: Harper & Row.

莫里斯(Morris, Desmond.)1977. *Manwatching: A Field Guide to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Abrams.

莫里斯等(Morris, Peter A., and J. P. Wheeler.)1976. *Rural Renaissance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莫萨克(Mosatche, Harriet.)1983. *Searching: Practices and Beliefs of the Religious Cults and Human Potential Movements*. New York: Stravon Educational Press.

莫伊尼汉(Moynihan, Daniel P.)1965.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米勒等(Mueller, Charles W., and Weldon Johnson.)1975.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785-800.

米勒(Mueller, Gerhard.)1983.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riminology." In Elmer H. Johnson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Criminolog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芒福德(Mumford, Lewis.)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曼内尔(Munnell, Alicia.)1983. "Financing options for social security." In Herbert S. Parnes (ed.), *Policy Issues in Work and Retirement*. Kalamazoo, Mich: W. 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默多克(Murdock, G. P.)1949.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Macmillan.

默多克(Murdock, George.)1956. "How culture changes." In Harry L. Shapiro (ed.), *Man, Culture &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默菲(Murphy, Michael D.)1985. "Brief communications." *Human Organization* 44(3):132-135.

默里(Murray, Charles.)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马森等(Mussen, Paul H., John J. Conger, and Jerome Kagan.)1974.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马斯托(Musto, David F.)1987. *The American Disease*. Expande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迈戴尔(Myrdal, Gunnar.)1962.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Harper & Row.

迈戴尔(Myrdal, Gunnar.)1968.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3vo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纳德尔曼(Nadelman, Ethan.)1992. "America's drug problem." *Dissent Spring*: 205 - 212.

纳泊尔(Naipaul, Shiva.)1980. *Journey to Nowhe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奈斯比特(Naisbitt, John.)1982. *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 New York: Warner.

奈斯比特等(Naisbitt, John, and Patricia Aburdenc.)1990. *Megatrends 2000: Ten New Directions for the 1990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纳什(Nash, June.)1986. "A decade of research on women in Latin America." In June Nash and Helen I. Safa (eds.), *Women and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South Hadley, Mass.: Bergin & Garvey.

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1987. *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Education Division.

国家健康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1988. *Health United States*, 1987.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国家健康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1989.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Series 21, No. 46.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1982. "Television and behavior: Ten year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eightie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74.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Metropolita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那特罗等(Natriello, Gary, Aaron M. Pallas, and Karl Alexander.)1989. "On the right track?

Curriculu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2:109 - 118.

尼尔等(Near, Janet P., and Marcia P. Miceli.)1989. "The incidence of wrongdoing, whistle-blowing, and retaliation: Results of a naturally occurring field experiment." *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 2:91 - 108.

纽加顿等(Neugarten, Bernice L., and Gunheld, O. Hagestad.)1976. "Ag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Robert H. Binstock and Ethel Shanas (eds.),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纽加顿等(Neugarten, Bernice L., and Joan W. Moore.)1968. "The changing age-status system." In Bernice L. Neugarten (ed.), *Middle Age and Ag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纽科姆(Newcomb, T. M.)1943. *Personalit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纽厄尔(Newell, Colin.)1988. *Methods and Models in Demograph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纽曼(Newman, Katherine S.)1988. *Falling from Grace*. New York: Macmillan.

尼布尔(Niebuhr, H. Richard.)1929. *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New York: Henry Holt.

尼米等(Niemi, Richard C., John Mueller, and Tom W. Smith (eds.))1989. *Trends in Public Opinion: A Compendium of Survey Data*.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尼斯比特(Nisbet, Robert A.)1966.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尼斯比特(Nisbet, Robert A.)1970. *The Social Bond*. New York: Knopf.

尼克松(Nixon, Howard L.)1979. *The Small Group*.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诺布尔(Noble, Trevor.)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Batsford.

诺尔等(Nock, Steven L., and Paul W. Kingston.)1989. *The Sociology of Public Issue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诺埃尔(Noell, Jay.)1982. "Public and Catholic schools: A reanalysis of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2:109 - 118.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5(April/July):123-132.

诺迪(Nordhoy, F.)1962. "Group interaction in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 Cited in Stephen Wilson. 1978. *Informal Groups: An Introd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诺德林格(Nordlinger, Eric.)1981.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诺里斯(Norris, William P.)1984. "Coping with poverty in urban Brazil: The contribution of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 *Sociological Focus* 17: 259-273.

诺斯滕(Notestein, Frank W.)1945. "Population: The long view." In Theodore W. Schultz (ed.), *Food for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诺夫(Nove, Alec)1982.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viet Socialism*. 2nd e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诺夫(Nove, Alec.)1989. *Glasnost in Action*. Boston: Unwin Hyman.

诺夫(Nove, Alec.)1990. "Market socialism and free economy." *Dissent* (Fall):443-446.

奥贝沙尔(Oberschall, Anthony.)1973.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奥康纳(O'Connor, James.)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奥费(Offe, Claus.)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奥克本(Ogburn, William.)1950. *Social Changes with Respect to Culture and Original Nature* (rev. ed.) New York: Viking.

奥黑尔(O'Hare, William P.)1987. "America's welfare population: Who gets what?" *Population Trends and Public Policy* 13,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奥尔德姆(Oldham, G. R., and D. J. Brass.) 1979. "Employee reactions to an open-plan office: A naturally occurring quasi-experi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267-284.

奥尔森(Olsen, Marvin E.)1968. *The Proces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奥尔森等(Olsen, Marvin E., and Michael Micklin (eds.))1981. *Handbook of Applied Sociology: Frontiers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New York: Praeger.

奥恩斯坦(Ornstein, Allan.)1985.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3r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奥恩斯坦(Ornstein, Allan C.)1988. "The changing status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Urban Education* 23:261-279.

奥恩斯坦等(Ornstein, Norman, Andrew Kohut, and Larry McCarthy.)1988. *The People, the Press, and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奥恩斯坦等(Ornstein, Norman J., Thomas Mann, and Michael J. Malbin.)1989. *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奥鲁姆(Orum, Anthony.)1988.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奥斯特兰德(Ostrander, Susan A.)1984. *Women of the Upper Cla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奥斯曼-堪德(Othman-Chande, M.)1987. "The Cameroon volcanic gas disaster: An analysis of a makeshift response." *Disaster* 11(1):96-101.

奥图尔等(O'Toole, Richard, and Stephen Webster.)1988. "Differentiation of family mistreatment." *Deviant Behavior* 9:346-368.

奥滕等(Otten, Mac W., Steven M. Teutsch, David E. Williamson, and James S. Marks.) 1990. "The effect of known risk factors on the excess mortality of black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68:845-850.

乌奇(Ouchi, William G.)1981. *Theory Z: How American Business Can Meet the Japanese Challeng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牛津分析(Oxford Analytica.)1986. *America in Perspectiv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帕日(Page, Charles H.)1969. *Class and American Sociology*. New York: Schocken.

帕日(Page, Ellis.)1981. "Coleman Report 'just plain wrong.'" *Phi Delta Kappan* 63(September): 74.

佩奇(Paige, Jeffrey M.) 1971.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rio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810-820.

佩奇(Paige, Jeffrey M.) 1975. *Agr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帕奇等(Palgi, Michael, J. R. Blasi, M. Rosen, and M. Safir (eds.)) 1983. *Sexual Equality: The Israeli Kibbutz Tests the Theories*. Norwood, Pa.: Norwood Editing.

帕尔默等(Palmer, C. Eddie, and Sheryl M. Gonsoulin,) 1990. "Paramedics, protocols, and procedures: 'Playing doc' as deviant role performance." *Deviant Behavior* 11(3):207-219.

潘贝尔等(Pampel, Fred J., Kenneth C. Land, and Marcus Felson.) "A social indicator model of changes in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197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6):951-964.

帕雷利于斯等(Parelius, Ann Parker, and Robert J. Parelius.) 1987.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帕朗蒂(Parenti, Michael.) 1978. *Power and the Powerl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帕朗蒂(Parenti, Michael.) 1988. *Democracy for the Few*. 5th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帕克等(Park, Robert E., and Ernest W. Burgess)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帕克等(Park, Robert E., Ernest W. Burgess, and R. D. McKenzie.) 1925. *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帕克(Parker, Gordon) 1985. "The search for intimacy in mid-life: An exploration of several myth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326-371.

帕金(Parkin, Frank.)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Praeger.

帕金森(Parkinson, C. Northcote.) 1964. *Parkinson's Law*. New York: Ballantine.

帕纳(Parnes, Herbert S.) 1981.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en, Work,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帕纳(Parnes, Herbert S. (ed.)) 1983. *Policy*

Issues in Work and Retirement. Kalamazoo, Mich.: W. 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帕罗特(Parrot, Andrea.) 1988. *Date Rape and Acquaintance Rape*. New York: Rosen Publishing Group.

帕森斯(Parsons, Talcott.) 1951.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Free Press.

帕森斯(Parsons, Talcott.) 1955. "The American family: Its relations to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alcott Parsons and R. F. Bales (eds.),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New York: Free Press.

帕森斯(Parsons, Talcott.) 1959. "The school system."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9.

帕森斯(Parsons, Talcott.) 1964.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帕森斯(Parsons, Talcott.) 1966.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帕森斯(Parsons, Talcott.) 1967.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帕森斯等(Parsons, Talcott, and Robert F. Bales.) 1955.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帕森斯等(Parsons, Talcott, and Gerald M. Platt.) 1973.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帕森斯等(Parsons, Talcott, and Edward A. Shils (eds.)) 1951.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帕森斯等(Parsons, Talcott, and Neil J. Smelser.) 1956.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帕斯等(Passel, Jeffrey S., and Karen A. Woodrow.) 1984.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ternal Migration Review* 18: 642-671.

帕特尔(Patel, Diana.) 1988. "Some issues of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Zimbabwe."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3(2):17-31.

皮尔斯(Peers, Jo.) 1985. "Workers by hand and womb: Soviet women and the demographic crisis." In Barbara Holland (ed.), *Soviet Sisterhood*. Bloomington

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佩尔托 (Pelto, Pertti J.) 1973.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Arctic*. Menlo Park, Calif.: Cummings.

佩尔托等 (Pelto, Pertti J., and Ludger Müller-Wille) 1972. "Snowmobile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Arctic." In H. Russell Bernard and Pertti J. Pelto (eds.),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Macmillan.

佩尔顿 (Pelton, Joseph N.) 1988. "Tele-education: The future." *Social Education* 52:366 - 369.

佩雷温登 (Perevzentsev, Victor Ivanovich.) 1983. "The Soviet family today."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67:245 - 259.

珀金斯等 (Perkins, H. Wesley, and James L. Spates.) 1986. "Mirror images? Three analyses of value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7:31 - 50.

佩罗 (Perrow, Charles.) 1979. *Complex Organizations: A Critical Essay*. 2nd ed.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佩罗 (Perrow, Charles.) 1984.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佩科索里多等 (Pescosolido, Bernice A., and Sharon Georgianna.) 1989. "Durkheim, suicide and religion: Toward a network theory of suicid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1):33 - 48.

彼得 (Peter, Laurence J.) 1985. *Why Things Go Wrong, or, The Peter Principle Revisited*. New York: Morrow.

彼得等 (Peter, Laurence J., and Raymond Hull.) 1969. *The Peter Principle: Why Things Always Go Wrong*. New York: Morrow.

彼得曼等 (Peterman, D., C. Ridley, and S. Anderson.) 1974. "A comparison of cohabiting and non-cohabiti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6:344 - 354.

彼得森 (Peterson, William.) 1975. *Population*.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彼得森 (Peterson, William.) 1985. *Dictionary of Demographic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彼特兰克 (Petranek, Charles F.) 1988. "Recruit-

ment and Commitment." *Society* 25(2):48 - 51.

彼蒂格鲁 (Pettigrew, Thomas.) 1971. *Racially Separate or Together*. New York: McGraw-Hill.

彼蒂格鲁 (Pettigrew, Thomas F., et al.) 1982. *Prejud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彼蒂格鲁等 (Pettigrew, Thomas F., and Joanne Martin.) 1987. "Shaping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for American inclus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3(1): 41 - 78.

普法伊费尔等 (Pfeffer, Jeffrey, and Gerald R. Salancik) 1978.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 Row.

普夫尔 (Pfuhl, Erdwin H., Jr.) 1987. "Computer abuse: Problems of instrumental control." *Deviant Behavior* 8:113 - 130.

菲利普斯 (Phillips, David P., and John S. Wills.) 1987. "A drop in suicides around major national holidays." *Suicide and Life Threatening Behavior* 17:1 - 12.

皮哈罗 (Picharro, Nelson A.) 1988.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 analysis of conflicting theoretical vision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9(1):97 - 118.

派那奇尼 (Pieraccini, Tina.) 1987. "Sexism and the media." In Alan Wells (ed.),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派尼斯 (Pines, Maya.) 1981. "The civilization of Genie." *Psychology Today* 15(September):28 - 34.

潘克内 (Pinkney, Alphonso.) 1984. *The Myth of Black Progre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派奥 (Piore, Michael, and Charles Sabel.)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皮雷纳 (Pirenne, Henri.) 1925. *Medieval Citi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派温等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1982. *The New Class War*. New York: Pantheon.

派温等 (Piven, Frances, and Richard Cloward.) 1989. *Why Americans Don't Vote*. New York: Pantheon.

普拉特 (Platt, John.) 1987. "The future of AIDS." *The Futurist* 21(6):10-17.

普雷克 (Pleck, Joseph H.) 1985. "Husbands' paid work and family roles: Current research issues." In H. Lopata (ed.), *Research in the Interweave of Social Roles, Jobs, and Famil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普雷克等 (Pleck, Joseph H., Michael E. Lamb, and James A. Levinc.) 1986. "Epilog: Facilitating future change in men's family roles."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9:11-16.

波尔 (Pool, Louis G.) 1987. *Business Demography: A Guide for Business Planners and Marketers*. New York: Quorum Press.

波拉切克 (Polachek, Solomon.) 1984. "Women in the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ender equality." *Comparable Worth* (June): 53-68.

普尔等 (Pool, John Charles, and Stephen C. Stamos, Jr.) 1989.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Beyond the Trade and Debt Crisi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波普 (Pope, Whitney.) 1976. *Durkheim's Suicide: A Classic Reanalyz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波普诺 (Popenoe, David.) 1977. *The Suburban Environment: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波普诺 (Popenoe, David.) 1988. *Disturbing the Nest: Family Change and Decline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Aldine.

波帕姆等 (Popham, James W., and Elaine Lindheim.) 1981. "Implications of a landmark ruling on Florida's minimum competency test." *Phi Delta Kappan* 63:18-20.

波普金 (Popkin, Susan J.) 1990. "Welfare: View from the bottom." *Social Problems* 37:64-73.

人口资料局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1991. *1991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Washington, D.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人口资料局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1992. *1992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Washington, D.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人口资料局 (Population Report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0. "Voluntary female sterilization: Number one and growing." Series C, no. 10. Baltimore: Population Information Program.

波特 (Porter, Bruce D.) 1980. "Parkinson's law revisited: War and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Public Interest* 60:50-68.

波泰尔等 (Portes, Alejandro, and Ruben G. Rumbaut.) 1990.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波泰尔等 (Portes, Alejandro, and Cynthia Trulove.) 1987. "Making sense of diversity: Recent research on Hispanic mino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359-385.

波斯特曼 (Postman, Neil.) 1981. "TV's 'disastrous' impact on children." *U. S. News & World Report* 90:43-45.

波斯特曼 (Postman, Neil.) 1982.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New York: Delacorte.

波斯特曼 (Postman, Neil.) 1985.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w York: Penguin Books.

鲍兰扎斯 (Poulantzas, Nicos.)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普雷马克 (Premack, David.) 1985. *The Future History of the Animal Language Controvers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普雷斯 (Press, Aric, et al.) 1985. "The war against pornography." *Newsday*, March 18, pp. 58-66.

《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 1985. "Opinion roundup." 7(6):23-42.

皮尔林 (Pullin, Diana.) 1981. "Minimum competency testing and the demand for accountability." *Phi Delta Kappan* 63:20-22.

夸兰特里 (Quarantelli, F. I., and Russel R. Dynes.) 1970. "Property norms and looting: Their patterns in community crises." *Phylon* 31:168-182.

拉布 (Rabb, Theodore K., and Robert Rotberg (eds.)) 1981.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拉德克里夫-布朗 (Radcliffe-Brown, A. R.) 1952.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雷 (Rae, Bob.) 1991. "A socialist credo." *Dissent*

(Winter):43-45.

雷纳(Raine, Philip.) 1974. *Brazil: Awakening Giant*.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

拉波波尔等(Rapoport, Robert, and Rhona Rapoport.) 1978. *Working Couples*. New York:Harper & Row.

拉斯坎(Raskin, Marcus G.) 1972. "The channeling colony." In Martin Carnoy(ed.), *Schooling in a Corporate Society*. New York:McKay.

劳里卡(Raunika, Robert, and Chung-Liang Huang.) 1987. *Food Demand, Analysis Problems, Issu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雷克利斯(Rockless, Walter.) 1967. *The Crime Problem*. New York:Appleton Century Crofts.

雷德本等(Redburn, F. Stevens, and Terry F. Buss.) 1986. *Responding to America's Homeless: Public Policy Alternatives*. New York: Praeger.

赖克(Reich, Charles A.) 1970.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New York:Random House.

赖克(Reich, Robert.) 1983. *The Next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赖克(Reich, Robert.) 1987. *Tales of a New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赖克(Reich, Robert.)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Knopf.

兰等(Rcin, Irving J., Philip Kotler, and Martin Stoller.) 1987. *High Visibility*. New York: Dodd, Mead.

赖斯(Reiss, Albert J., Jr.) 1968.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5. New York: 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

雷普托(Repetto, Robert (ed.)) 1985. *The Global Possible: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Centu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雷普托(Repetto, Robert.) 1987.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 uncertain future." *Population Bulletin* 42:2.

雷斯金(Reskin, Barbara F.) 1988. "Bringing the man back in: Sex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devaluation of woman's work." *Gender and Society* 2:58-81.

雷斯金等(Resnick, Daniel P., and Lauren B.

Resnick.) 1983. "Improving educational standards in American schools." *Phi Delta Kappan* 65(3): 178-180.

雷诺兹(Reynolds, Vernon.) 1976. *The Biology of Human Action*. San Francisco: Freeman.

里什(Riche, Martha F.) 1991. "We're all minorities now." *American Demographics* 13 (October): 36-34.

里什(Riche, Martha F.) 1981. "Demographic supermarkets of the eighties." *American Demographics* 3:15-21.

里斯曼(Riesman, David.) 1961.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赖利(Riley, Matilda White.) 1987. "Aging, health, and social change." In Matilda Riley, Joseph D. Matarazzo, and Andrew Baum(eds.), *The Aging Dimension*. Hillsdale, N. J.: Laurence Erlbaum.

赖利等(Riley, Matilda White, Anne Foner, and Joan Waring.) 1988. "Sociology of age." In Neil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赖利等(Riley, Matilda White, Marilyn Johnson, and Anne Foner.) 1972. *Aging and Socie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里斯特(Rist, Marilee C.) 1989. "Should parents choose their child's school?" *The Education Digest* 55: 3-6.

利茨尔(Ritzer, George.)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利茨尔等(Ritzer, George, and David Walczak.) 1986. *Working: Conflict and Change*.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里克斯(Rix, Sara E. (ed.)) 1989. *The American Woman 1988-89: A Status Report*. Women'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 New York: Norton.

罗宾斯等(Robbins, Thomas, and Dick Anthony.) 1972. "Getting straight with Meher Baba: A study of mysticism, drug rehabilitation and postadolescent conflict."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7:122-128.

鲁宾逊(Robinson, Harry.) 1981.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鲁宾逊等(Robinson, John P., and Mark Levy.) 1987.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news comprehension." In Michael Gurevitch and Mark Levy (eds.),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Vol 6.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罗杰斯(Rodgers, Harrell R., Jr.) 1982. *The Cost of Human Neglect: America's Welfare Failure*. Armonk, N. Y.: M. E. Sharpe.
- 罗马克(Roeback, Janet.) 1974. *The Shaping of Urban Society*. New York: Scribner's.
- 罗特利斯伯格(Roethlisberger, F. J.) 1949. *Management and Mora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罗杰斯(Rogers, David) 1969. 110 *Livingston Street: Politics and Bureaucracy in the New York City School Syst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罗克赫(Rokeach, Milton.) 1973.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 罗克赫(Rokeach, Milton (ed.)) 1979. *Understanding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 罗尼格(Roniger, Luis.) 1987. "Coronelismo, Caciquismo and Oyabunkobun bonds: Divergent implications of hierarchical trust in Brazil, Mexico, and Japa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8:310-330.
- 鲁夫(Roof, Wade C.) 1979.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among white socio-religious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58:280-289.
- 鲁夫等(Roof, Wade C., and William McKinney.) 1987. *American Mainline Religion: Its Changing Shape and Future*.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罗普那恩(Roopnarine, Jaipaul L., and Lynn M. Hempel.) 1988. "Day care and family dynamic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3:427-438.
- 罗斯(Roos, Patricia A.) 1985. *Gender and Wor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罗沙等(Rosa, Eugene A., Gary E. Machilis, and Kenneth M. Keating.) 1988. "Energy and socie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149-172.
- 罗斯(Rose, A. M.) 1965. "The subculture of the aging: A framework in social gerontology." In A. M. Rose and W. A. Peterson (eds.), *Older People and Their Social World*. Philadelphia: Davis.
- 罗斯(Rose, A. M.) 1967. *The Power Struc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罗森贝格(Rosenberg, Charles E.) 1987. *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n Hospitaliz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罗森贝格(Rosenberg, Dorothy.) 1991. "Shock therapy: GDR women in transition from a socialist welfare state to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Signs* 17: 129-152.
- 罗森贝格(Rosenberg, Morris.) 1956. "Misanthropy and political ide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690-695.
- 罗森贝格(Rosenberg, Morris.) 1990. "The self-concept: Social product and social force." In Morris Rosenberg and Ralph H. Turner (eds.),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罗森贝格等(Rosenberg, Morris, and Roberta Simmons.) 1971. *Black and White Self-Esteem: The Urban School Child*.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onograph Series.
- 罗森布卢姆(Rosenblum, Simon.) 1991. "Social Democrats win in Ontario." *Dissent* (Winter): 19-21.
- 罗森菲尔德等(Rosenfeld, Anne, and Elizabeth Stark.) 1987. "The prime of our lives." *Psychology Today* (May): 162-172.
- 罗森菲尔德(Rosenfeld, Rachel A.) 1978. "Women's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36-46.
- 罗森塔尔等(Rosenthal, Robert, and Lenore Jacobson.) 1968. *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 Expectation and the Pupil'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罗斯诺等(Rosnow, Ralph L., and Gary Alan Fine.) 1976. *Rumor and Gossip*. New York: Elsevier.
- 罗斯等(Ross, Heather L., and Isabel V. Sawhill.) 1975. *Time of Transition: The Growth of Families Headed by Women*. Washington, D. C.: Urban Institute.
- 罗塞尔(Rosell, Christine H., and Charles L. Glenn.) 1988. "The Cambridge controlled choice

plan." *The Urban Review* 20:75-94.

罗西(Rossi, Alice S.)1984. "Gender and parent-ho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1-16.

罗西等(Rossi, Peter H, James D. Wright, and Sonia R. Wright.)1978.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Evaluation Quarterly* 2: 171-191.

罗西德斯(Rossides, Daniel M.)1990.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American Class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罗斯托(Rostow, W. W.)1987. *Rich Countries, Poor Countries: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Lessons for the Futu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罗特曼(Rothman, Barbara Katz)1989. *Recreating Motherhood: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罗特曼(Rothman, Robert.)1978.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罗特斯坦(Rothstein, Stanley William.)1987. "Schooling in mass society." *Urban Education* 22: 267-285.

罗恩等(Rowan, Roy, and Sara Hammes.)1989. "A Guide to the Pacific rim." *Fortune* 120:72-82.

吕班等(Rubin, Jeffrey Z., Frank J. Provenzano, and Zella Luria.)1974.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Parents' views on sex of newborn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4:512-519.

吕班(Rubin, Lillian.)1976. *Worlds of Pain: Life in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瑞安(Ryan, William.)1976. *Blaming the Victim*.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赖德(Ryder, Judith, and Harold Silver.)1985. *Modern English Society*. 3rd ed. New York: Methuen.

塞科等(Sadker, David, and Myra Sadker.)1988. *Teachers Make the Difference*. 2n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塞科等(Sadker, Myra, David Sadker, and Susan S. Klein.)1986. "Abolish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sex equity in education." *Theory into Practice* 25:219-

226.

萨格林(Sagarin, Edward.)1975. *Deviants and Deviance*. New York: Praeger.

沙尔林斯(Sahlins, Marshall.)1978. *The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萨尔茨曼等(Saltzman, Linda, Raymond Paternoster, Gordon P. Waldo, and Theodore G. Chiricas.)1982. "Deterrent and experiential effects: The problem of causal order in perceptual deterrence research."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9: 172-189.

萨缪尔(Samuel, Maurice.)1943. *The World of Sholom Aleichem*. New York: Knopf.

萨缪尔森(Samuelson, Paul.)1970.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萨缪尔森等(Samuelson, Paul, and William Nordhaus.)1988.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桑德斯(Sanders, Jimmy M.)1990. "Public transfers: Safety net or inducement into poverty?" *Social Forces* 68:813-834.

桑德斯(Sanders, Richard J.)1985. "Teaching apes to ape language: Explaining the imitative and nonimitative signing of a chimpanze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99:197-210.

桑德森(Sanderson, Stephen K.)1990. *Social Evolutionism: A Critic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桑尼(Saney, Parviz.)1986. *Crime and Culture in Americ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桑坚(Sanjian, Andrea Stevenson.)1991. "Social problems, political issues: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the USSR." *Soviet Studies* 43(4):629-649.

萨皮尔(Sapir, Edward.)1937. "Fashion." I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萨皮罗(Sapiro, Virginia.)1983.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Wome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萨皮罗(Sapiro, Virginia.)1988. *Women, Political Ac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沙宾等 (Sabin, Theodore, and Jeffrey E. Miller.) 1970. "Demonism revisited: The chromosomal abnormality." *Issues in Criminology* (Summer): 195-207.

桑德斯 (Saunders, John.) 1971. *Modern Brazil: New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桑德斯 (Saunders, Peter.) 1981.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New York: Holmes and Meyer.

萨克斯 (Saxe, Leonard.) 1986. "Policymakers' us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Knowledge, Creation, Diffusion, Utilization* 8(1): 59-78.

萨克斯等 (Saxe, L. D. Dougherty, and K. Esty.) 1985. "Alcoholism: A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 In J. Mendelson and N. Mello (eds.),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lcoholism*. New York: Wiley.

斯坎伦 (Scanlan, Christopher.) 1993. "Reality awaits leave bill: Most US workers won't be covered." *Wichita Eagle*, Feb. 5.

斯卡基尔 (Scargill, D. I.) 1979. *The Form of Cities*. London: Bell and Hyman.

舍德尔等 (Schadel, Richard P., Jorge E. Hardy, and Nora Scott Kinzer.) 1978. *Urbanization in the Americas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The Hague: Mouton.

沙弗尔等 (Schaffer, Jeffrey, and Suzy Blackaby.) 1984. "How to gain status and intimidate peopl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 26.

沙茨曼等 (Schatzman, Leonard, and Anselm L. Strauss.) 1973. *Field Research*.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沙因 (Schein, Edgar.) 1961. *Coercive Persuasion*. New York: Norton.

希夫等 (Schiff, Michael, and Richard Lewontin.) 1986. *Education and Class: The Irrelevance of IQ Genetic Stud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施拉朋多克 (Schlapentokh, Vladimir.) 1988. "The XXVII Congress: A case study in the shaping of a new party ideology." *Soviet Studies* 40: 1-20.

施勒默尔 (Schlemmer, Lawrence.) 1991. "A challenge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South Africa: Majority vs. minority right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o-*

ciology 22(1): 16-23.

舍勒 (Schneller, Raphael.) 1985. "Heritage and changes in the nonverbal language of Ethiopian newcomers." *Israe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 33-54.

朔普夫林 (Schöpflin, George.) 1990. "The end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66(1): 3-16.

舒尔茨 (Schultz, Sandra.) 1981. "Adjusting marriage tradition: Greeks to Greek-America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7: 205-218.

舒尔 (Schur, Edwin M.) 1971. *Labelling Deviant Behavior*. New York: Harper & Row.

舒尔茨 (Schutz, Alfred.) 1962. *Collected Papers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施瓦茨 (Schwartz, Barry.) 1967.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iva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741-752.

施瓦茨 (Schwartz, Barry.) 1975. *Queuing and Waiting: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ccess and Dela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施瓦茨 (Schwartz, Felice N.) 1989. "Management women and the new facts of lif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9: 65-76.

施魏连恩 (Schwirian, Kent P.) 1983. "Models of neighborhoo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83-108.

施拖维基等 (Scitovsky, Anne A., and M. Cline.) 1986. "Medical care costs of patients with AIDS in San Francisco."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56(3): 3107-3109.

斯科特 (Scott, Allen J.) 1988. *Metropolis: 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r to Urban 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西尔斯等 (Sears, David O., Carl P. Hensler, and Leslie K. Speer.) 1979. "White opposition to 'busing': Self-interest or symbolic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 161-188.

西曼 (Seeman, Melvin.) 1961.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753-758.

儿童青年与家庭委员会 (Select Committee on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U. S. House of Repre-

sentatives.) 1989. U. S.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Current Conditions and Recent Trend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塞尔文等 (Selvin, Hanan C., and Warren O. Hagstrom.) 1960. "Determinants of support of civil liber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1 (March): 51-73.

休厄尔 (Sewell, William H.) 1971.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or higher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793-808.

休厄尔等 (Sewell, William H., Robert M. Hauser, and Wendy C. Wolf.) 1980. "Sex, schooling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551-583.

谢那斯等 (Shanas, Ethel, and George R. Maddox.) 1976. "Aging, health,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health resources." In Robert H. Binstock and Ethel Shanas (eds.),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肖等 (Shaw, Clifford R., and Henry O. McKay.) 1929. *Delinquency Ar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肖等 (Shaw, John W., Peter G. Nordie, and Richard M. Shapiro (eds.)) 1987.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Race Relations: The Anglo-American Experience*.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肖 (Shaw, Marvin E.) 1976. *Group Dynamics: The Psychology of Small Group Behavior*.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希伊 (Sheehy, Gail.) 1976. *Passages: Predictable Crises of Adult Life*. New York: Dutton.

谢尔登 (Sheldon, William H., et al.) 1949. *Varieties of Delinquent Youth*.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谢里夫 (Sherif, Muzafer.) 1936.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Norms*. New York: Harper & Row.

谢里夫等 (Sherif, Muzafer, and Carolyn Sherif.) 1953. *Groups in Harmony and Tension: An Introduction to Studies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舍伍德 (Sherwood, Mrs. John.) 1887. *Manners and Social Usage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舍伍基 (Shevky, Eshrev, and Wendell Bell.) 1955. *Social Area Analysi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斯布坦 (Shibutani, Tomatsu.) 1966. *Improv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肖特 (Short, James F.) 1971. *The Social Fabric of the Metropol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西布利 (Sibley, Elbridge.) 1971. "Scientific sociology at bay?" *American Sociologist* 6:13-17.

赛德尔等 (Sidel, Victor W., and Ruth Sidel.) 1982. *A Health Stat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Crisis in United States Health Care*. 2nd ed. New York: Pantheon.

西耶热格 (Siegal, Michael.) 1987. "Are sons and daughters treated more differently by fathers than by mothers?" *Developmental Review* No. 3:83-209.

西格罗里勒尔 (Signorielli, Nancy.) 1983. "Health, prevention, and television: Images of the elderly and perceptions of social reality." *Prevention in Human Services* 3:97-117.

西格罗里勒尔 (Signorielli, Nancy.) 1985. *Role Portrayal and Stereotyping on Televis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西格罗里勒尔 (Signorielli, Nancy.) 1989. "Television conceptions about sex roles: Maintaining conventionality and the status quo." *Sex Roles* 21:341-360.

西尔伯曼 (Silberman, Charles E.) 1978. *Criminal Violence and Criminal Justi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西尔克 (Silk, Mark.) 1988. *Spiritual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希尔斯 (Sills, David.) 1968.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6. New York: Crowell Collier.

希尔斯 (Sills, David.) 1970. "Preserving organizational goals." In Oscar Grusky and George Miller (eds.),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西尔韦曼 (Silverman, Carol J.) 1986. "Neighborhoods and urbanism: Commonality vs. friendship."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22(2):312-328.

西梅瑞尔等(Simenauer, David and Jacqueline Carroll.) 1982. *Singles: The New American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西梅尔等(Simmel, Georg.) 1955.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 Translated by Kurt H. Wolff & Reinhard Bendix. New York: Free Press.

西蒙(Simon, Barbara Levy.) 1987. *Never Married Wome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西蒙(Simon, Julian L.) 1981. *The Ultimate Resour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西蒙(Simon, Julian L.) 1986. *Theory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xford: Basil Blackwell.

西蒙(Simon, Julian L.) 1990. *Theory of Population Control*. 2nd e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西蒙等(Simon, Rita, and Jean Landis.) 1991. *The Crimes Women Commit, the Punishments They Receive*.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辛普森等(Simpson, George E., and J. Milton Yinger.) 1972.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4th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肖伯格(Sjoberg, Gideon.) 1960. *The Preindustrial City*. New York: Free Press.

斯基德莫尔等(Skidmore, Rex A., M. Hon, G. Thackeray, and O. William Farley.) 1988.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4th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斯科波尔(Skopc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斯科波尔(Skopcol, Theda.) 1980. "Politic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crises." *Politics and Society* 10: 155-201.

斯科波尔等(Skopcol, Theda, and Edwin Amenta.) 1986. "States and social polic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 131-157.

斯科甘(Skogan, Wesley G.) 1979. "Crime and crime rates." In Wesley G. Skogan (ed.), *Sample Surveys of the Victims of Crimes*.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斯科尔尼克(Skolnik, Jerome.) 1966. *Justice Without Trial*. New York: Wiley.

斯梅尔塞(Smelser, Neil J.)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斯梅尔塞(Smelser, Neil J.)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斯梅尔塞(Smelser, Neil J.) 1968. *Essays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史密斯(Smith, A. Emerson.) 1981. "Work roles of applied sociologists."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Workshop on Directions in Applied Sociology.

史密斯等(Smith, Michael P., and Joc R. Feagin (eds.)) 1987. *The Capitalist City: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Community Politic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史密斯(Smith, R. E.) 1979. *The Subtle Revolution: Women at Work*. Washington, D. C.: Urban Institute.

斯诺(Snow, David A.) 1988. "On the Precariousness of measuring sanity in insane contexts." *Social Problems* 35: 192-196.

斯诺等(Snow, D., and P. Leahy.) 1980. "The making of a black slum-ghetto: A case study of neighborhood transition."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s* 16(4).

斯奈德(Snyder, Benson R.) 1971. *The Hidden Curriculu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斯奈德(Snyder, Thomas D.) 1987. *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87*.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索奥(So, Alvin Y.) 1986. "The math/reading gap among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A function of nativity, mother tongue, and SES."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70(1): 76-77.

索奥(So, Alvin Y.) 1990.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 Theorie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所罗门等(Solomon, Lewis C., and Paul Wachtd.) 1975. "The effects on income of type of college attende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8: 75-90.

索罗金(Sorokin, Pitirim A.) 1941.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New York: American Books.

索厄尔(Sowell, Thomas.) 1981. *Ethnic Ameri-*

ca: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斯帕德等 (Spade, Joan Z., and Carole A. Reese.) 1991. "We've come a long way, maybe: College students' plans for work and family." *Sex Roles* 24:309-321.

斯帕特斯 (Spates, James L.) 1983. "The sociology of valu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27-49.

斯彭德 (Spender, Dale.) 1980. *Man Made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斯彭格勒 (Spengler, Oswald.) 1965.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8.)

斯皮罗 (Spiro, M. E.) 1958. *Children of the Kibbutz*.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斯皮罗等 (Spiro, S. E., and Ephraim Yuchtman-Yaar (eds.)) 1983. *Evaluating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施皮茨 (Spitz, Rene A.) 1945. "Hospitalism: An inquiry into the genesis of psychiatric conditions in early childhood."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53-74.

斯塔克 (Stack, C. B.) 1974. *All Our Kin*. New York: Harper & Row.

斯塔克 (Stack, John F., Jr.) 1986. *The Primordial Challenge: Ethnic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斯塔克 (Stack, S.) 1987. "Celebrities and suicides: A taxonomy and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01-412.

斯塔克 (Stack, Steven.) 1990. "New micro-level data on the impact of divorce on suicide, 1959-1980: A test of two theor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1):119-127.

斯塔格纳 (Stagner, Ross.) 1987. "Group conflicts." In Jeff Boucher, Dan Landis, and Karen Arnold Clark (eds.), *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斯特普尔斯 (Staples, Robert (ed.)) 1991. *The Black Family*. 4th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斯塔克等 (Stark, Rodney,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1979. "Of churches, sects, and cults: Pre-

liminary concepts for a theory of religious movement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8:117-133.

斯塔克等 (Stark, Rodney,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1985. *The Future of Religion: Secularization, Revival, and Cult 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斯塔克 (Starkey, Marion L.,) 1946. *The Cherokee Nation*. New York: Knopf.

斯塔尔 (Starr, Paul.) 1982.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斯塔连诺斯 (Stavrianos, L. S.) 1983. *A Global History: The Human Heritage*.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斯蒂芬斯迈耶等 (Steffensmeier, Darrell, and Cathy Streifel) 1991. "Age, gender, and Crime across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1935, 1960, and 1985." *Social Forces* 69(3):869-894.

斯蒂芬斯迈耶等 (Steffensmeier, Darrell J., and Robert M. Terry.) 1973. "Deviance and respectability: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reactions to shoplifting." *Social Forces* 51:417-426.

斯坦 (Stein, Barry.) 1979. "Occupational adjustment of refugees: The Vietnam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3:25-45.

斯登姆 (Steinem, Gloria.) 1983. *Outrageous Acts and Everyday Rebellion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斯登纳 (Steiner, Gilbert Y.) 1981. *The Futility of Family Poli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斯蒂芬斯 (Stephens, John.) 1979.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London: Macmillan.

斯特恩 (Stern, Phillip.) 1988. *The Best Congress Money Can Buy*. New York: Pantheon.

斯登列伯等 (Sternlieb, George, and James W. Hughes.) 1986. "Demographics and housing in America." *Population Bulletin* 41:1.

史蒂文斯 (Stevens, William K.) 1992. "Humanity confronts its handiwork: An altered planet." *New York Times*. May 5.

- 斯图尔德 (Steward, Julian.) 1955. *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斯蒂普 (Stipp, Horst, and J. Ronald Milavsky.) 1988. "U. S. television programming's effects on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urrent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Reviews* 7: 76 - 92.
- 斯托卡德 (Stockard, Jean, and Miriam M. Johnson.) 1980. *Sex Rol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 斯通等 (Stone, Alan, and Richard Barke.) 1985. *Governing the American Publi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斯通 (Stone, John.) 1985. *Racial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斯通等 (Stone, Joseph L., and Joseph Church.) 1975.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3r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 斯通 (Stone, Lawrence.) 1985. "Sex in the West." *The New Republic*, July 8, pp. 25 - 37.
- 斯托那 (Stoner, J. A. F.) 1961. "A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decisions including risk." Cited in Stephen Wilson. 1978. *Informal Groups: An Introd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 斯道夫 (Stouffer, S. A.) 1940. "Intervening opportunities: A theory relating mobility and dist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 845 - 867.
- 斯道夫 (Stouffer, Samuel A., et al.)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斯托 (Stowe, Harriet B.) 1962. *Uncle Tom's Cabin*. New York: Macmilla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52.)
- 斯特劳斯等 (Straus, Murray A. and Richard A. Gelles.) 1988. "Societal change and change in family violence from 1975 to 1985 as revealed by two national survey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 465 - 479.
- 斯特劳斯等 (Straus, Murray A., Richard J. Gelles, and Suzanne K. Steinmetz.) 1980. *Behind Closed Doors: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Anchor Books.
- 斯特劳斯 (Strauss, Anselm.) 1956. *George Herbert Mead: On Social Psyc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斯特朗 (Strong, Josiah.) 1885. *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 New York.
- 萨格登 (Sugden, John.) 1987. "The exploitation of disadvantage: The occupational subculture of the boxer."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33: 187 - 209.
- 沙利文等 (Sullivan, Gary L., and P. J. O'Connor.) 1988. "Women's role portrayals in magazine advertising: 1958 - 1983." *Sex Roles* 18: 181 - 188.
- 萨姆纳 (Sumner, William G.) 1960. *Folkway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6.)
- 国际咨询调查研究 (Survey Research Consultants International.) 1981. *Index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1980 - 1981*.
- 萨克利夫 (Sutcliffe, Anthony.) 1981. *Towards the Planned City: German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1790 - 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萨瑟兰 (Sutherland, Edwin H.) 1940. "White-collar crimin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February): 1 - 12.
- 萨特尔斯 (Suttles, Gerald D.) 1965.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萨顿 (Sutton, Frances X.) 1987. "Refugees and mass exodus: The search for a humane, effective policy." In William Alonso (ed.), *Population in an Interacting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斯旺森 (Swanson, Guy.) 1967. *Religion and Regime. A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the Reform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赛克斯等 (Sykes, Gresham, and David Matza.) 1957. "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 A theory of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 664 - 670.
- 赛姆等 (Syme, S. Leonard, and Lisa F. Berkman.) 1986. "Social class, susceptibility, and sickness." In Peter Conrad and Rochelle Kern (eds.),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Critical Perspectives.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莎赖等(Szalai, Julia.) 1991. "Some aspects of the changing situation of women in Hungary." *Signs* 17 (1): 153 - 170.

泰杰菲尔(Tajfel, H., and J. Turner.) 1979.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and S. Worchel(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onterey, Calif.: Brooks/Cole.

坦纳希尔(Tannahill, Reay.) 1980. *Sex in History*. New York: Stein & Day.

坦南(Tannen, Deborah.) 1990.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Men and Women in Conversation*. New York: Morrow.

塔夫里斯(Tavris, Carol, and Carole Wade.) 1984. *The Longest Wa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泰勒(Taylor, Ann Siegrist, and John W. Lounsbury.) 1988. "Unconventional commuter marriages: Living in different cities." *Human Relations* 41: 407 - 423.

泰勒(Taylor, Ella.) 1989. *Prime - Time Families: Television Culture in Postwar Americ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泰勒(Taylor, Howard.) 1975. "Quantitative racism: A partial documentation." *Journal of Afro-American Issues* 3: 19 - 42.

泰勒(Taylor, Howard.) 1980. *The IQ Game*.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特克舍拉(Teixeira, Ruy.) 1990. "Things fall apart." In Maureen Hallinan, David Klein, and Jennifer Glass(eds.), *Changes in Social Institutions*, pp. 239 - 255. New York: Plenum Press.

电视观众评估, 1983. *Methodology Report*. Television Audience Assessment.

特曼等(Terman, Lewis M., and Leona E. Tyler.) 1954.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s." In L. Carmichael(ed.),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Wiley.

特雷斯(Terrance, Herbert S.) 1979. *Nim: A Chimpanzee Who Learned Sign Language*. New York: Knopf.

特厄恩(Theen, Rolf H. W.) 1984. "Party and bureaucracy." In Erik P. Hoffmann and Robbin F. Laird(eds.), *The Soviet Polity in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Aldine.

滕斯特朗(Ternstrom, Stephan.) 1973. *The Other Bostonians: Poverty and Progress in the American Metropolis, 1880 - 19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托马斯(Thomas, W. I., with Dorothy Swaine Thomas.) 1928. *The Child i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汤普森(Thompson, William E.) 1983. "Hanging tongues: A sociological encounter with the assembly line" *Qualitative Sociology* 6: 215 - 237.

托恩东等(Thornton, Arland, and Deborah Freedman.) 1983. *The Changing American Family*. Washington, D. 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托恩东等(Thornton, W., and J. James.) 1979. "Masculinity and delinquency revisited."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 225 - 241.

托恩东(Thorton, Russell.) 1987. *American Indian Holocaust and Survival*.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蒂热(Tiger, L., and J. Shepher.) 1975. *Women in the Kibbutz*.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蒂莉(Tilly, Charles(ed.)) 197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蒂玛(Timar, Thomas.) 1989. "The politics of school restructuring." *Phi Delta Kappan* 71: 265 - 275.

蒂特尔(Tittle, Charles R.) 1980. *Sanctions and Social Deviance: The Question of Deterrence*. New York: Praeger.

滕尼斯(Tönnies, Ferdinand.) 1963. *Community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托夫勒(Toffler, Alvin.) 1983. *Previews and Premises*. New York: Morrow.

托梅(Tomch, Aida K.) 1974. "Form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correlate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In M. P. Effrat(ed.), *The Community: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汤因比 (Toynbee, Arnold.) 1964. *A Study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汤因比等 (Toynbee, Arnold (ed.)) 1967. *Cities of Destiny*. London: Thames & Hudson.

特拉韦尔等 (Travers, Jeffrey, and Stanley Milgram.) 1969.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smallworld' problem." *Sociometry* 32: 425 - 443.

特雷斯等 (Treas, Judith.) 1979. "Socialist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Latent consequences for the aged." *Gerontologist* 19: 34 - 42.

特雷曼 (Treiman, D. J.)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 O. Laumann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dianapolis, Ind.: Bobbs-Merrill.

特雷曼等 (Treiman, Donald J., and Kermit Terrell.) 1975. "Sex and the process of status attainment: A comparison of working women and m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174 - 200.

特林布尔 (Trimble, Joseph E.) 1987. "American Indians: Interethnic conflict." In Jeff Boucher, Dan Landis, and Karen Arnold Clark (eds.), *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特勒尔奇 (Troeltsch, Ernst.) 1931.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New York: Macmillan.

隋凯云 (Tsui, Kai Yuen.) 1991. "China's regional inequali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5 (1): 1 - 21.

塔奇曼 (Tuchman, Gaye.) 1979. "Women's depiction by the mass media."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4(3): 528 - 542.

图明 (Tumin, Melvin.) 1953.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 critical review."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387 - 394.

图明 (Tumin, Melvin M.) 1985.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Inequality*.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蒂尔克 (Turk, Austin T.) 1969. *Criminality and the Legal Order*. Chicago: Rand McNally.

特恩布尔 (Turnbull, Colin.) 1972. *The Mountain Peop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Touchstone.

特纳等 (Turner, Barbara F., and Catherine G. Adams.) 1988. "Reported change in preferred sexual activity over the adult year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5: 289 - 303.

特纳 (Turner, Ralph H.) 1960.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855 - 857.

特纳 (Turner, Ralph) 1978. "The role of the pers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1 - 23.

特纳 (Turner, Ralph H.) 1990. "Role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87 - 110.

特纳等 (Turner, Ralph H., and Lewis M. Kilian.)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泰勒 (Tyler, Leona.) 1965.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Differences*. 3rd ed.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泰勒 (Tyler, Miller G., Jr.) 1975. *Living in the Environment: Concepts, Problems, and Alternative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泰勒 (Tyler, William B.) 1985.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school."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 49 - 73.

泰里等 (Tyree, Andrea, Moshe Semyonov, and Robert Hodge.) 1979. "Gaps and glissandos: Ine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in 24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410 - 424.

乌克罗 (Ucko, Leonora Greenbaum.) 1986. "Perceptions of aging. East and West: Soviet refugees see two world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 411 - 428.

乌克罗 (Ucko, P. J., et al. (eds.)) 1972.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1988. *World Population Trends and Policies, 1987 Monitoring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人口基金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1990. *The Stat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199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美国人口普查局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8. "The source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black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cal view 1790

- 1978.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3: 80,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83. "Money income and poverty status of families and persons in the U. S. : 1983."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 no. 145.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87a. "Estimates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0 to 1983."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5, no. 957.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89.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9. 109 ed.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89b.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 The Hispanic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1988, Series P-20no. 438.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0a. "Marital statu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1989 and 1990."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0, no. 445.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0b. "Child support and alimony: 1987."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3, no. 167.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1. "Geographical mobility, March 1987 to March 1990."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0, no. 456.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1d. "Ethnic origin of the population, state by state."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1f. *World Population Profile*, 1991.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2. "Stud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Consumer Income*. Series P-60, no. 183.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2. "Summary of social, economic,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United States." *1990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2.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2.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2. "General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0." *1990 Census of Housing*.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3.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2,"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Consumer Income*. Series P-60, no. 185.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 "As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0 Census of Population*. 1990 CP-3-5.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1992a. Accessed through CompuServe, 1992.

美国劳工统计局(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84a.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Aspects of Aging in the U. S.*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人权委员会(U. 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1988. *The Economic Status of Americans of Asian Descent*. Washington, D. C. : Clearinghouse Publications.

美国市长会议(U. S. Conference of Mayors.) 1988. "A status report on children in America's cities." Washington, D. C. : The U. S. Conference of Mayors.

美国教育部(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84. *Survey of Magnet Schools: Analyzing a Model for Quality Integrated Education*.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健康与人力服务部(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1. Accessed through CompuServe, 1992.

美国健康、教育与福利部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73. *Work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美国司法部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87.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6 *Uniform Crime Report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Prison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Institutions on December 31*.

全国司法研究所 (U. S.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Drug Use Forecasting*. Quarterly.

瓦女 (Vago, Steven.) 1989. *Social Change*.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瓦雷利 (Valelly, Richard.) 1990. "Vanishing voters." *The American Prospect* (Spring.): 140 - 150.

瓦伦丁 (Valentine, Charles A.) 1968. *Culture and Poverty: Critique and Counterproposa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瓦伦丁 (Valentine, Charles A.) 1971. "The 'culture of poverty': Its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ction." In Eleanor B. Leacock (ed.), *The Culture of Poverty: A Critiqu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万斯 (Vance, James E., Jr.) 1977. *The Scene of Man: The Role and Structure of the City in the Geograph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per's College Press.

范登伯格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1990. "South Africa after thirty years." *Social Dynamics* 16 (2.): 16 - 37.

范迪福特 (Vandivort, Rita, Gaile M. Kurren, and Kathryn Braun.) 1984. "Foster family care for frail elderly: A cost-effective quality care alternative."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7: 110 - 114.

范哈赛尔特等 (Van Hasselt, Vincent B., Randall L. Morrison, Alan S. Bellack, and Michel Hersen.) 1988. *Handbook of Family Violen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范奥登霍文等 (Van Oudenhoven, Jan Pieter, and Tineke M. Willemsen (eds.)) 1989. *Ethnic Minoriti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Berwyn, Pa.: Swets North America.

凡伯伦 (Veblen, Thorstein.) 1967.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Vikin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9.)

维特 (Veit, Lawrence A.) 1987. "Time of the new Asian tigers." *Challenge: The Magazine of Economic Affairs* 30: 49 - 55.

维巴等 (Verba, Sidney, and Norman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维迪奇 (Vidich, Arthur.) 1987. "Religion, economics, and class in America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 4 - 22.

沃格尔 (Vogel, Ezra.) 1979.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瓦格利 (Wagley, Charles.) 1971. *An Introduction to Brazi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沃尔德罗普等 (Waldrop, Judith, and Thomas Exter.) 1990. "What the 1990 census will show." *American Demographics* 12 (January.): 20 - 34.

沃克 (Walker, Elaine M.) 1987. "Understanding minority students' mathematics learning gains in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56: 557 - 569.

沃克 (Walker, J. C.) 1988. "The way men act: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 male cultures in an inner-city school."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9: 3 - 18.

华莱士 (Wallace, A. F. C.) 1966. *Religion: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New York: Random House.

华莱士 (Wallace, A. F. C.) 1970.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2n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华莱士等 (Wallace, Ruth A., and A. Wolf.) 1986.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华莱士 (Wallace, Ruth A. (ed.)) 1989. *Femin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沃利奇等 (Wallach, M. A., N. Kogan, and D. J.

- Bern.) 1962.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level of risk taking in group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263-274.
- 瓦莱 (Waller, Willard.) 1961. *The Sociology of Teaching*.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2.)
-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0.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0. "Societal development, or development of worldsystem?" In Martin Albrow and Elizabeth King (eds.),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Readings from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沃勒斯坦等 (Wallerstein, Judith S., and J. B. Kelly.) 1981. *Surviving the Breakup*. New York: Basic Books.
- 沃勒斯坦等 (Wallerstein, Judith S., and Sandra Blakeslee.) 1989. *Second Chances: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 Decade After Divorce*. New York: Ticknor & Fields.
- 沃尔斯特等 (Walster, Elaine, and William G. Walster.) 1978. *A New Look at Lov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沃尔顿 (Walton, John.) 1987. "Theory and research on industria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89-103.
- (Walum, Laurel Richardson.) 1974. "The changing door ceremony: Notes on the operation of sex roles in everyday life." *Urban Life and Culture* 2:506-516.
- 沃尔泽 (Walzer, Michael.) 1982. "Socialism and the gift relationship." *Dissent* (Fall.):431-441.
- 沃尔泽 (Walzer, Michael.) 1986.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assignments." In W. Knowlton and R. Zeckhauser (eds.), *American Society*. Cambridge: Ballinger.
- 王 (Wang, Georgette, and Wimal Dissanayatte.) 1984.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 Asian Perspective*. Norwood, N. J.: Ablex.
- 沃纳 (Warner, W. Lloyd, et al.) 1949. *Social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 沃伦 (Warren, Roland L.) 1972. *The Community in America*. 2nd ed. Chicago: Rand McNally.
- 沃里克 (Warwick, Donald P., and S. Osherson.) 1973.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 沃森 (Watson, Russell.) 1984. "An African nightmare." *Newsweek*, November 26:50-55.
- 韦瑟福德 (Weatherford, M. Stephen.) 1980. "The politics of school busing: Contextual effects and community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42:747-765.
- 韦布 (Webb, E. J., et al.) 1966. *Unobtrusive Measures*. Chicago: Rand McNally.
- 韦伯 (Weber, Max.) 1922/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Ephraim Fischhoff et al.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 韦伯 (Weber, Max.)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s.
- 韦伯 (Weber, Max.) 1946.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ans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9.)
- 韦伯 (Weber, Max.) 1963.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oston: Allyn & Bac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2.)
- 韦伯 (Weber, Susan (ed.)) 1988. *USA By Numbers*. Washington, D. C.: Zero Population Growth, Inc.
- 韦伯斯特 (Webster, Paula.) 1975. "Matriarchy: A vision of power." In R. R.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Monthly Review Press.
- 威克斯 (Weeks, John R.) 1988. "The demography of Islamic nations." *Population Bulletin* 43:4-53.
- 韦克 (Weick, K.) 1976.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oosely-coupled syste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1:1-19.
- 魏因斯坦 (Weinstein, Grace W.) 1980. "How se-

cure is social security?" *American Demographics* 2:14-17.

魏斯(Weiss, Robert S.) 1988. "Loss and recover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4:37-52.

魏斯(Weiss, Carol H.) 1987. "Evaluating social programs: What have we learned?" *Society* 25:40-45.

魏斯等(Weiss, Carol H., and Elcanor Sin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Phyllis Endreny.) 1987. *Reporting of Social Science in the National Medi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魏斯(Weiss, R.) 1989. "Teen suicide clusters: more than mimicry." *Science News* 136:342.

魏斯贝格(Weissberg, Robert.) 1976. *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韦尔曼(Wellman, Barry.) 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1201-1231.

韦尔曼(Wellman, Barry.) 1988. "The community question re-evaluated." In Michael P. Smith(ed.), *Power, Community and the Ci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韦尔曼等(Wellman, Barry, and Barry Leighton,.) 1979. "Network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question."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4:363-390.

韦尔曼等(Wellman, Barry, and Scot, Wortley.) 1990. "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558-588.

威肖(Wershow, H. J.) 1969. "Aging in the Israeli kibbutz." *Gerontologist* 14:300-304.

沃特海姆(Wertheimer, Barbara M.) 1984. "Union is power: Sketches from women's labor history." In Jo Freeman(ed.), *Wome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alo Alto, Calif.: Mayfield.

韦斯特加德等(Westergaard, John, and Henrietta Resler.) 1976. *Class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Brit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 Edward A.) 1894-

1901.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London: Macmillan.

韦斯特利(Westley, William A.) 1970. *Violence and the Police: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Law, Custom, and Moral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韦斯托木(Westoff, Charles F.) 1978. "Marriage and fertility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cientific American* 239(December.):51-57.

西部联邦实践摘要:(*West's Federal Practice Digest*. 3rd ed., Vol. 112. 1987. St. Paul, Minn.: West.

惠伦等(Whalen, Marilyn R., and Don H. Zimmerman.) 1987. "Sequent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s in calls for help."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 50 (2.):172-185.

惠勒(Wheeler, Michael.) 1976. *Lies, Damn Lies, and Statistics: The Manipul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New York: Liverwright.

惠勒(Wheeler, Mortimer.) 1968. *The Indus Civilization*. 3rd e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怀特豪斯(Whitehouse, Ruth.) 1977. *The First Cities*. New York: Dutton.

惠特等(Whiting, Beatrice B., and Carolyn Edwards.) 1973.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ex differences in the behavior of children aged three through eleve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1:171-188.

惠特等(Whiting, Beatrice B., and John W. M. Whiting.) 1975. *Children of Six Cultures: A Psycho-cultural Analys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沃夫(Whorf, Benjamin Lee.) 1941. "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 In Leslie Spier(ed.),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Menasha, Wis.: Sapir Memorial Education Fund.

怀特(Whyte, William Foote.) 1981.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3.)

威克伦德等(Wicklund, R. A., and J. W. Brehm.) 1976. *Perspectives on Cognitive Dissonance*.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威尔兹比卡 (Wierzbicka, Ann.) 1986. "Does language reflect culture? Evidence from Australian English." *Language in Society* 15:349-374.
- 威金斯 (Wiggins, Lee M.) 1955. "A panel study of automobile buying." Report of a conference at the Center Advanced Stud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 威伦斯基 (Wilensky, Harold L.) 1975.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威伦斯基等 (Wilensky, Harold L., and Charles N. Lebeaux.) 1965.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Free Press.
- 威尔基 (Wilkie, Jane Riblett.) 1981. "The trend toward delayed paren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3:583-590.
- aren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3:583-590.
- 威廉斯 (Williams, Dennis A.) 1984. "Why teachers fail." *Newsweek*, September 24.
- 威廉斯等 (Williams, John E., and John R. Stabler.) 1973. "If white means good, then black" ... *Psychology Today* 7(2.):50-54.
- 威廉斯等 (Williams, J. R., and Martin Gold.) 1972. "From delinquent behavior to official delinquency." *Social Problems*, 20:209-229.
- 威廉斯 (Williams, Juanita H.) 1987. *Psychology of Women: Behavior in a Biosocial Context*. New York: Norton.
- 威廉斯等 (Williams, Kipling D., Steve A. Nida, Lawrence D. Baca, and Bibb Latané.) 1989. "Social loafing and swimming: Effects of identifiability on individual and relay performance of intercollegiate swimmer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0:73-81.
- 威廉斯 (Williams, Robin M., Jr.) 1964. *Strangers Next Doo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 威廉斯 (Williams, Robin M., Jr.) 1970. *American Society: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3rd ed. New York: Knopf.
- 威廉斯 (Williams, Sarah.) 1985. "Long-term care alternatives: 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ies." *Journal of Housing for the Elderly* 3:15-34.
- 威利 (Willie, Charles Vert.) 1984. *School Desegregation Plans That Work*.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威利斯 (Willis, Paul.) 1981.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威尔逊 (Wilson, Carter A.) 1986. "Affirmative action defended: Exploding the myths of a slandered policy." *The Black Scholar* 17(3.):19-24.
- 威尔逊 (Wilson, David S.) 1988. "Computer's role in class expands." Report of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 威尔逊 (Wilson, Edward O.) 1975. *Soc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威尔逊 (Wilson, Edward O.) 1978.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威尔逊 (Wilson, James Q.) 1968. *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威尔逊等 (Wilson, James Q., and Richard J. Herrnstein.) 1985. *Crime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威尔逊 (Wilson, Stephen.) 1978. *Informal Groups: An Introd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 威尔逊 (Wilson, W. Cody.) 1975. "The distribution of selected sexu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mong the adult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1(1.):44-64.
- 威尔逊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78.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Blacks and Changing American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威尔逊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rban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温里奇 (Windrich, Elaine.) 1989. "South Africa's propaganda war." *Africa Today* 36(1.):51-60.
- 温格特 (Wingert, Pat, and Barbara Kantrowitz.)

1990. "The day care generation." *Newsweek* (Special Issu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amily.) (Winter/Spring.):86-92.

威斯等 (Wise, Gordon L., and J. Paul Merenski.) 1974. "Reactions to sexy ads vary with ag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14:11-16.

威斯曼 (Wiseman, Jacqueline P.) 1979. *Stations of the Lost: The Treatment of Skid Row Alcohol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沃尔夫 (Wolf, Eric.) 1970.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沃尔夫 (Wolfe, Alan.) 1989. *Whose Keep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沃尔夫 (Wolff, Kurt H.)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沃尔芬格 (Wolfinger, Raymond, and Steven Rosenstone.) 1980. *Who Vot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伍德 (Wood, Floris W. (ed.)) 1990. *An American Profile—Opinions and Behavior, 1972-1989: Opinion Results Derived from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New York: Gale Research.

伍德等 (Wood, W., D. Polek, and C. Aiken.) 1985. "Sex differences in group task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 63-71.

伍德沃德 (Woodward, Herbert N.) 1983. *Human Survival in a Crowded World*. London: McFarland.

《世界年鉴与纪事》*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0. 1989. New York: Scripps Howard.

《世界年鉴与纪事》*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1. 1990. New York: Scripps Howard.

《世界年鉴与纪事》*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2. 1991. New York: World Almanac.

《世界年鉴与纪事》*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4. 1993. New York: World Almanac.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1985. *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199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世界纪事》*World Factbook*. 1989.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世界纪事》*World Factbook*. 1991.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赖特等 (Wright, Erik Olin, and Bill Martin.) 1987.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1960-198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29.

赖特 (Wright, James D.) 1989. *Address Unknown: The Homeless in America*.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赖特 (Wright, Sam.) 1978. *Crowds and Riot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朗 (Wrong, Dennis H.) 1959.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Some neglected consider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772-782.

朗 (Wrong, Dennis H.) 1961.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183-193.

朗 (Wrong, Dennis H.) 1964. *Population and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伍斯洛 (Wuthnow, Robert.) 1976. "The new religions in social context." In Charles Y. Glock and Robert N. Bellah (eds.), *The New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伍斯洛 (Wuthnow, Robert.) 1988. *The Restructuring of American Relig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雅波尔斯基 (Yampolsky, Helene Boas.) 1958. "Excerpts from the letter diary of Franz Boas on his first trip to the Northwest co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4.

扬克洛维奇 (Yankelovich, Daniel.) 1981. *New Rules: Searching for Self-Fulfillment in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New York: Random House.

扬克洛维奇 (Yankelovich, Daniel.) 1991. *The Affluence Effect*.

扬克洛维奇 (Yankelovich, Daniel.) 1994. "How changes in the economy are reshaping American values." In Aaron, Henry J., Thomas E. Mann, and Timothy Taylor (eds.), *Values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6-53.

扬洛维奇 (Yanowitch, Murray, and Wesley A.

Fisher.) 1973.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he USSR*. White Plains, N. Y.: 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美国与加拿大教会年鉴》*Yearbook of American and Canadian Churches*, 1991. 1991. New York: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劳动力统计年鉴》*Year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1991. 1991.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彼得·颖与郭运来 (Yin, Peter, and Kwok Hung Lai.) 1983.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age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8:608-613.

麦克·杨与威尔摩特 (Young, Michael, and Peter Willmott.) 1974. *The Symmetrical Family*. New York: Pantheon.

余·阿特金 (Yu, Vivienne W. S., and Paul A. Atkinson.) 1988.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nguage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by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English-medium schools: I. The problem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9:267-284.

扎卡罗 (Zaccaro, Stephen J.) 1984. "Social loafing: The role of task attractive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0:99-106.

扎尔德等 (Zald, Mayer, and John McCarthy (eds.)) 1979.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扎曼 (Zaman, M. Q.) 1986. "The role of social relations in response to riverbed erosion hazards and population resettlement in Bangladesh." *Studies in Third World Societies* 36:177-199.

扎巴坦尼 (Zarbatany, Lynne, and Michael E. Lamb.) 1985. "Social referencing as a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source: Mothers vs. stranger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8:28-33.

扎雷斯基 (Zaretsky, Eli.) 1976.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扎雷斯基 (Zaretsky, Eli.) 1978.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In A. M. Jagger and P. R. Struhl (eds.), *Feminist Frameworks: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Account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and Men. New York: McGraw-Hill.

扎斯特罗 (Zastrow, Charles.) 1986.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Social Problems, Services, and Current Issues*. Chicago: Dorsey Press.

兹戴克-雷安等 (Zeedyk-Ryan, Janice, and Gene F. Smith.) 1983. "The effects of crowding on hostility, anxiety, and desire for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0:245-252.

泽尼克等 (Zelnick, Melvin, John F. Kantner, and Kathleen Ford.) 1981. *Sex and Pregnancy in Adolescence*.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齐默巴多 (Zimbardo, Philip.) 1971. "The psychological power and pathology of imprisonment." A statement prepared for the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3: Hearings on Prison Reform,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October. 25.

齐默巴多 (Zimbardo, Philip.) 1972. "Pathology of imprisonment." *Society* 9(April.):4-8.

齐默尔曼等 (Zimmerman, Carle G., and Lucius F. Cervantes.) 1960. *Successful American Families*. New York: Pageant Press.

齐默林等 (Zimring, Franklin E., and Gordon Hawkins.) 1973. *Deterrence: The Legal Threat in Crime Contr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左拉 (Zola, I. K.) 1972. "Medicine as an institution of social control." *Sociology Review* 20:487-504.

左尔伯格 (Zolberg, Aristide.) 1987. "Wanted but not welcome: Alien labor in western development." In William Alonso (ed.), *Population in an Interacting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佐伯夫 (Zuboff, Shoshanna.) 1988.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齐克尔曼 (Zuckerman, Harriet.) 1988.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Neil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佐金 (Zukin, Sharon.) 1987. "Gentrification: Culture and capitalism in the urban co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129-147.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Abbott, M. M. 阿博特
Abelman, R. 埃布尔曼
Aberanthy, W. 亚伯内西
Abrahamson, M. 阿伯拉罕森
Aburdene, P. 阿伯登
Ackelsberg, M. A. 阿克尔斯伯格
Acock, A. C. 阿科克
Adams, C. G. 亚当斯
Adams, J. 亚当斯
Adams, R. M. 亚当斯
Adelson, J. 阿德尔森
Acier, P. 阿德勒
Adler, P. A. 阿德勒
Adorno, T. W. 阿多诺
Ahimeir, O. 艾梅尔
Aiken, C. 艾肯
Albonetti, C. 阿尔本蒂
Albrecht, S. L. 阿尔布雷克特
Alcalde, J. G. 阿尔卡尔德
Alexandel, J. 亚历山大

Alicke, M. D. 阿利克
Allen, G. 阿朗
Allison, M. 阿利森
Allott, S. 阿洛特
Allport, G. 阿尔波特
Alston, J. PM 奥尔斯顿
Alwin, D. 爱尔文
Alexander, K. L. 亚历山大
Am - Ad, Z. 阿马德
Amenta, E. 阿门特
Amin, I. 阿明
Amir, M. 阿米尔
Anderson, C. 安德森
Anderson, D. 安德森
Anderson, K. 安德森
Anderson, K. 安德森
Andersson, B. E. 安德森
Andrain, C. F. 安德伦
Andrews, R. L. 安德鲁斯
Ann - ping, C. 安平

Anthony, D. 安东尼
 Anthony, S. B. 安东尼
 Aphichat, C. G. 阿菲恰特
 Apte, R. Z. 阿普特
 Arasaratnam, S. 阿拉沙那姆
 Aries, P. 阿里斯
 Arluke, A. 阿鲁克
 Armor, D. J. 阿莫尔
 Asch, S. 阿施
 Ascher, R. 阿舍
 Asnate, M. 阿斯内特
 Astin, A. W. 阿斯坦
 Astone, N. M. 阿斯頓
 Astrachan, A. 阿斯特拉汉
 Atkins, R. N. 阿特金斯
 Atkinson, R. A. 阿特金森
 Averitt, R. 埃夫里特
 Azicri, M. 阿齐克里
 Azumi, K. 阿佐米
 Babri, K. B. 巴布里
 Baca, L. D. 巴卡
 Bachman, J. G. 巴赫曼
 Bachofen, J. J. 巴霍弗
 Back, 巴克
 Bacon, M. K. 培根
 Bae, K. H. 贝
 Bagley, C. 巴格利
 Bahr, H. M. 巴尔
 Bailey, T. 贝利
 Bainbridge, W. S. 班布里奇
 Bairoch, P. 拜罗赫
 Baker, K. A. 贝克
 Baker, T. A. 贝克
 Bakker, J. 巴克
 Bakker, T. 巴克
 Bakuniak, G. 巴坤亚克
 Baldassare, M. 巴尔达萨里
 Bales, R. F. 贝尔斯
 Ballantine, J. H. 巴兰坦
 Ballmer - Cao, T. H. 鲍尔默 - 曹
 Balmer, R. 鲍尔默
 Bamberger, J. 班伯格
 Barnett, W. S. 巴尼特

Barney, G. O. 巴尼
 Bandura, A. 班杜拉
 Banner, L. W. 班纳
 Banton, M. 班通
 Baran, P. 巴朗
 Barash, D. P. 巴拉什
 Barber, B. 巴伯
 Barke, R. 巴克
 Barker, E. 巴克
 Barkow, J. 巴洛
 Baron, J. N. 巴伦
 Barr, R. D. 巴尔
 Harrow, G. M. 巴罗
 Barry, H. 巴里
 Bart, P. B. 巴特
 Barwise, P. 巴维什
 Basnik, E. L. 巴斯尼克
 Basow, S. A. 巴苏
 Bauer, 鲍尔
 Baum, M. 鲍姆
 Baum, R. C. 鲍姆
 Baumrind, D. 鲍姆兰德
 Baxter, E. 巴克斯特
 Beach, 比奇
 Beck, M. 贝克
 Becker, H. S. 贝克尔
 Belcher, J. R. 贝尔彻
 Bell, D. 贝尔
 Bell, W. 贝尔
 Bellack, A. S. 贝拉克
 Bellah, R. N. 贝拉
 Belsky, J. 贝尔斯基
 Bern, K. J. 贝姆
 Bernard, J. 伯纳德
 Benard, C. 贝纳德
 Bender, B. 本德
 Bendix, R. 本迪克斯
 Benedict, R. 本尼迪克特
 Benet, S. 贝尼特
 Benevolo, L. 贝尼沃罗
 Bennett, N. G. 贝内特
 Bennctt, S. 贝内特
 Bennett, W. 贝内特

Bensman, J. 本斯曼
Berger, B. M. 伯格
Berger, Bennett, M. 伯格贝内特
Berger, Brigitte. 伯格布里吉特
Berger, Peter L. 彼得·伯格
Bergeson, A. 伯格森
Berkman, L. F. 伯克曼
Berkowitz, L. 伯科威茨
Berman, Y. 伯曼
Berreman, G. D. 贝尔曼
Berrueta - Clement, J. R. 贝吕埃克莱芒
Berry, B. J. L. 贝里
Berry, J. W. 贝里
Best, R. 贝斯特
Bettelheim, B. 贝特尔海姆
Bhachu, P. K. 哈楚
Biagi, S. 比亚吉
Bibb, 比布
Bidwell, C. E. 比德韦尔
Bielby, D. D. 比尔比
Bielby, W. T. 比尔比
Binet, A. 比内
Bingham, R. D. 宾厄姆
Birdwhistell, R. L. 伯德威斯特尔
Bissinger, H. 比辛格尔
Black, D. L. 布莱克
Blackaby, S. 布莱克本
Blackburn, M. 布莱克本
Blackwell, B. 布莱克威
Blackwell, J. 布莱克威
Blackwell, J. 布莱恩
Blake, J. 布莱克
Blakeslee, S. 布莱克斯利
Blanc, A. K. 布兰克
Blasi, J. R. 布拉西
Blau, F. O. 布劳
Blau, P. M. 布劳
Blau, Z. S. 布劳
Blauner, R. 布洛内
Blauner, R. J. 布洛内
Blendon, 布伦登
Bloch, R. H. 布洛克
Block, J. H. 布洛克

Bloom, D. E. 布卢姆
Bluestone, B. 布卢斯通
Blum, M. 布卢姆
Blumberg, A. S. 布隆伯格
Blumberg, P. 布隆伯格
Blumberg, R. L. 布隆伯格
Blumer, H. 布卢默
Blumstein, P. 布卢姆斯坦
Boas, F. 博厄斯
Bodovitz, K. 博多维奇
Boell, J. L. 贝尔
Bogdanor, V. 博格达诺
Bogue, D. J. 博格
Bohannon, P. 博安南
Bonora, 博诺拉
Boockck, S. 布科克
Bookchin, M. 波克钦
Booth, A. 布思
Borden, 博登
Bornschieer, V. 本斯切尔
Borosage, R. 波罗塞奇
Borroughs, D. L. 伯勒斯
Borowski, K. H. 博罗夫斯基
Boucher, J. 鲍彻
Boulding, K. E. 博尔丁
Bouvier, L. F. 布维尔
Bowen, G. L. 鲍恩
Bowerman, C. E. 鲍尔曼
Bowes, A. M. 鲍斯
Bowinick, J. 博温尼克
Bowker, L. H. 鲍克
Bowles, S. 鲍尔斯
Boyer, R. 博耶
Brabant, S. 布拉邦
Brass, D. J. 布拉斯
Braun, K. 布朗
Braverman, H. 布雷尔曼
Bray, T. J. 布雷
Brehm, J. W. 布雷姆
Brenneis, D. 布雷内斯
Bretl, D. J. 布雷特昂
Brim, O. G. Jr 布里
Brittan, A. 布里坦

Broadstreet, S. 布罗德斯特
 Brody, J. A. 布罗迪
 Brofman, R. 布罗夫曼
 Bromley, R. 布罗姆利
 Bronfenbrenner, R. 布龙方布雷内
 Brooks, J. 布鲁克斯
 Broom, L. 布鲁姆
 Broudy, H. S. 布劳迪
 Brower, B. 布劳沃
 Brown, A. S. 布朗
 Brown, L. R. 布朗
 Brown, M. 布朗
 Brunvand, J. H. 布伦凡特
 Bryk, A. S. 布里克
 Buell, E. H. 比尔
 Buff, 巴夫
 Bulmer, M. 布尔默
 Burnett, M. E. 伯内特
 Burns, N. 伯恩斯
 Buraway, M. 贝雷威
 Burchell, R. 伯切尔
 Burgess, E. W. 伯吉斯
 Burnes, 伯恩斯
 Burnham, W. 伯纳姆
 Burns, L. 伯恩斯
 Burns, L. S. 伯恩斯
 Burridge, K. O. L. 伯里奇
 Bush, G. 布什
 Buss, D. M. 巴斯
 Buss, T. F. 巴斯
 Cabezas, A. 卡比扎斯
 Cadeau, L. 卡多
 Cadigan, D. 卡迪概
 Caenter, B. 卡昂泰
 Calhoun, J. 卡尔霍恩
 Calle, O. R. 加勒
 Camara, K. A. 卡马拉
 Campbell, B. 坎贝尔
 Campbell, E. 坎贝尔
 Campbell, J. 坎贝尔
 Campbell, Anne 坎贝尔·安妮
 Campbll, Angus 坎贝尔·安格斯
 Cancian, F. M. 康西安

Cantor, J. 坎托
 Cantor, A. H. 坎托
 Cantril 坎特里尔
 Caplan, N. 卡普兰
 Caplow, T. 卡普洛
 Cardozo, A. R. 卡多佐
 Cardy, R. L. 卡尔迪
 Carey, J. T. 凯里
 Carey, M. 凯里
 Carino, B. V. 卡里诺
 Carlin, P. 卡林
 Carliner, G. 卡林内
 Carmichael, S. 卡迈克尔
 Carnegie, A. 卡内基
 Carnoy, M. 卡努瓦
 Carroll, J. 卡罗尔
 Carr - Saunders, A. M. 卡尔桑德斯
 Carstensen, L. L. 卡斯滕森
 Caserta, M. S. 卡塞尔塔
 Castells, M. 卡斯泰尔
 Castive, G. P. 卡斯提台
 Castro, F. 卡斯特罗
 Caton, C. L. 卡顿
 Catton, W. R. Jr. 卡托
 Cazenave, N. A. 卡泽纳夫
 Cervantes, L. F. 塞万提斯
 Chadwick, B. A. 查德威克
 Chafetz, J. S. 查菲茨
 Chambliss, W. J. 钱布利斯
 Chapman, A. J. 查普曼
 Charren, S. 查伦
 Chase, I. D. 蔡斯
 Cheney, L. 切尼
 Cherlin, A. 谢尔林
 Chidester, D. 切斯特
 Child, I. L. 蔡尔德
 Childe, V. G. 蔡尔德
 Chinoy, E. 奇诺伊
 Chira, 希拉
 Chiricas, T. G. 切里卡
 Chirot, D. 希罗
 Chodorow, N. 肖多洛
 Choldin, H. M. 肖尔丁

- Chomsky, N. 乔姆斯基
 Choucri, N. 舒克里
 Choy, M. H. 乔伊
 Christenson, J. A. 克里斯坦森
 Christopher, D. 克利斯托弗
 Chudacoff, H. 曲达科夫
 Churchill, W. 邱吉尔
 Clark, B. R. 克拉克
 Clark, D. L. 克拉克
 Clark, J. P. 克拉克
 Clark, K. A. 克拉克
 Clarke-Stewart, A. 克拉克斯图尔特
 Clayton, R. C. 克莱顿
 Cleary, P. D. 克利里
 Cleaver, E. 克利弗
 Clegg, S. 克莱格
 Clinard, M. B. 克林纳尔
 Cline, M. 克莱因
 Clinton, B. 克林顿
 Cloward, R. A. 克劳伍德
 Coakley, J. J. 科克利
 Cockerham, W. C. 科克拉姆
 Cogan, J. 科根
 Cohen, A. 科恩
 Cohen, C. I. 科恩
 Cohen, J. Z. 科恩
 Cohen, R. B. 科恩
 Cohen, S. S. 科恩
 Colasanto, D. 克拉松托
 Cole, J. 科尔
 Coleman, D. 科尔曼
 Coleman, J. S. 科尔曼
 Coleman, J. C. 科尔曼
 Coleman, R. 科尔曼
 Collins, R. 柯林斯
 Collins, S. T. 柯林斯
 Coltrane, S. 科尔特朗
 Comstock, G. 科姆斯托克
 Comte, A. 孔德
 Conger, J. J. 康格
 Connors, J. H. 康纳尔斯
 Conrad, P. 康拉德
 Constantine, B. L. 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J. M. 康斯坦丁
 Converse, J. M. 康弗斯
 Cook, T. D. 库克
 Cookson, P. W. Jr. 库克森
 Cooley, C. H. 库利
 Coon, C. S. 库恩
 Cooney, 库尼
 Cornish, E. 科尼什
 Correa, H. 科雷亚
 Coser, L. 科塞
 Costa, J. J. 科斯塔
 Cotterill, F. 科特雷尔
 Cowgill, D. O. 考吉尔
 Cox, C. 考克斯
 Cressey, D. R. 克雷西
 Crewdson, J. 克雷德森
 Crick, F. 克里克
 Crimmins, E. M. 克里明斯
 Cripps, T. 克里普斯
 Croake, J. W. 克罗克
 Crosbie, P. V. クロス比
 Crouse, J. 克劳斯
 Crouter, A. C. 克劳特
 Cruise, T. 克鲁斯
 Cruse, H. 克鲁斯
 Crystal, D. 克里斯特尔
 Cullen, F. T. 卡伦
 Culver, L. W. 卡尔弗
 Cumming, E. 卡明
 Curran, J. 柯伦
 Currie, E. 柯里
 Currie, R. 柯蒂斯
 Curtiss, S. 柯蒂斯
 Cushing, R. 库欣
 Cyert, R. 西尔特
 D'Souza, N. 德索扎
 Da Silva, T. T. 达西尔瓦
 Dahl, R. 达尔
 Dahrendorf, R. 达伦多夫
 Dalgard, O. S. 达尔加德
 Darnbrot, F. H. 当布罗
 Daniels, R. 丹尼尔斯
 Daniloff, N. 丹尼洛夫

Darby, J. 达比
 Darden, J. T. 达登
 Darwin, C. 达尔文
 Davenport, S. 达文波特
 Davies, J. C. 戴维斯
 Davis, F. 戴维斯
 Davis, J. 戴维斯
 Davis, K. 戴维斯
 Davis, Karen 戴维斯卡伦
 Davis, Kingsley 戴维斯·金斯利
 Davis, R. 戴维斯
 Dawkins, R. 道金斯
 Dawson, C. A. 道森
 de Gaulle, C. 戴高乐
 De Jong, C. R. 德容
 de Kanter, A. 德康泰
 Debevays, N. 德比莱斯
 DeCandlido, G. 德堪德里多
 Dees, 迪斯
 Defoe, D. 迪福
 Demerath, N. J. 德梅那斯
 Demo, D. H. 德漠
 Denzin, N. K. 邓金
 Dennis, E. E. 丹尼斯
 DeNora, T. 德诺那
 Derber, C. 德贝尔
 DeStefano, L. 德泰尔法诺
 Deviney, S. 迪瓦伊尼
 Diamond, G. 戴蒙德
 Diamond, M. 戴蒙德
 DiCanio, M. 迪堪里奥
 Dilip, H. 迪里普
 Dimond, M. F. 戴蒙德
 Dinnerstein, D. 迪纳斯坦
 Dion, K. 戴恩
 Diprete, T. A. 迪普雷特
 Dipreteo, J. A. 迪彼特罗
 Dissanayacce, W. 迪桑那亚特
 Divine, Father 迪万·法瑟
 Dobbins, G. H. 多宾斯
 Dodge, N. 道奇
 Domhoff, G. W. 多姆霍夫
 Donaldson, S. 唐纳森

Donnerstein, E. 唐纳斯坦
 Dorsten, L. E. 多斯顿
 Douglas, J. D. 道格拉斯
 Dowse, R. 道斯
 Dr, Dre 德雷博士
 Dreeban, R. 迪里班
 Dubin, R. 迪宾
 Daignan, P. J. 杜伊格南
 Dukakis, M. 杜卡基斯
 Daley, M. I. 杜利
 Duncan, G. 邓肯
 Duncan, O. D. 邓肯
 Dunkerley, D. 邓克利
 Dunlap, R. E. 邓拉普
 Durkheim, E. 迪尔凯姆
 Dutton, D. 达顿
 Duvalier, D. 迪瓦利耶
 Dye, T. R. 戴伊
 Dynes, R. R. 戴恩斯
 Easterlin, R. A. 伊斯特林
 Eddy, M. B. 埃迪
 Edidin, P. 埃丁
 Edmonds, T. R. 埃德蒙兹
 Edsall, M. 埃兹尔
 Edsall, T. 埃兹尔
 Edwards, C. 爱德华兹
 Edwardw, R. 爱德华兹
 Ehrenberg, A. 埃伦伯格
 Ehrenhaus, P. 埃伦豪斯
 Ehrhardt, A. A. 埃拉尔特
 Ehrlich, A. H. 埃利希
 Ehrlich, A. H. 埃利希
 Eisenhart, M. A. 艾森哈特
 Eisenhower, D. D. 艾森豪威尔
 Eisenstadt, S. N. 艾森斯塔德
 Eisler, R. 埃斯莱
 Ekman, P. 埃克曼
 Ekstrom, R. B. 埃克斯特龙
 El, Torkey M. A. 吐基
 Elam, S. M. 伊拉姆
 Elam, G. H. Jr. 伊拉姆
 Elder 埃尔德
 Elkin, F. 埃尔金

Elkind, D. 埃尔金德
Elliot, M. 埃利奥特
Elliott, J. 埃利奥特
Ellul, J. 埃吕尔
Else, J. F. 埃尔斯
Endreny, P. 昂德里尼
Engels, F. 恩格斯
England, P. 英格兰
Entwistle, D. R. 恩特威斯尔
Epstein, A. S. 爱泼斯坦
Epstein, C. F. 爱泼斯坦
Ergas, Y. 埃尔加
Erikson, E. 埃里克森
Erikson, K. T. 埃里克森
Erlanger, H. S. 厄兰格
Esping - Andersen, G. 厄斯平 - 安德森
Estrin, S. 埃斯特林
Etioni, A. 埃斯欧尼
Evans, P. B. 埃文斯
Exter, T. 埃文斯特
Eysenck, H. 艾森克
Falk, R. 福尔克
Fallows, J. 法洛斯
Farley, J. E. 法利
Farley, W. O. 法利
Fausto - Sterling, A. 福斯托斯特林
Fava, S. F. 法瓦
Fawcett, J. R. 福斯特
Fawcett, J. T. 福西特
Featherman, D. L. 弗瑟曼
Feinberg, A. 范伯格
Feldman, J. J. 弗尔德曼
Felson, R. B. 弗尔森
Fennema, E. 费尔马
Ferraro, G. 弗拉罗
Fersko - Weiss, H. 费尔斯科魏斯
Fichter, J. 菲克特
Filene, P. 法林
Filson, G. G. 菲尔森
Fine, G. A. 法恩
Fine, M. 法恩
Finkelhor, D. 芬克尔约尔
Finn, C. Jr. 芬恩

Firestone, S. 弗尔斯通
Fischer, C. S. 弗希尔
Fischer, D. H. 弗希尔
Fischer, W. A. 弗希尔
Fischman, J. 菲什曼
Fishman, R. 菲什曼
Fitch, E. 菲奇
Foner, A. 福纳
Fontana, A. 丰塔纳
Fontana, L. 丰塔纳
Foote, N. 富特
Ford, C. 福特
Ford, F. S. 福特
Ford, H. 福特
Ford, K. 福特
Fore, W. F. 福里
Form, W. 福姆
Foss, D. A. 福斯
Fox, D. 福克斯
Fox, K. 福克斯
Fox, R. C. 福克斯
Fox, T. G. 福克斯
Francome, C. 弗朗科姆
Frank, A. G. 弗兰克
Frankc, R. H. 弗兰克
Frankl, R. 弗兰克尔
Franklin, B. 富兰克林
Franklin, J. 富兰克林
Freedman, D. 弗里德曼
Freedman, J. L. 弗里德曼
Freedman, J. M. 弗里德曼
Freedman, J. H. 弗里德曼
Freedman, R. 弗里德曼
Freidson, E. 弗里德森
Freud, S. 弗洛伊德
Frey, W. 弗雷
Fridemann, J. 弗里德曼
Friedan, B. 弗里丹
Frieden, B. J. 弗里登
Friedlander, W. A. 弗里德兰德
Friedman, S. 弗里德曼
Friesen, W. V. 弗里森
Frost, P. 弗罗斯特

Frost, R. 弗罗斯特
 Fuchs, V. R. 富克斯
 Gabrielli, W. 加布里埃利
 Gaensbauer, T. 根斯鲍尔
 Galanter, M. 盖兰特
 Gale, R. P. 盖尔
 Galileo, 加利莱奥
 Galinsky, E. 加林斯基
 Gallup, A. M. 盖洛普
 Gallup, G. Jr. 盖洛普
 Gandhi, M. 甘地
 Gann, L. H. 甘恩
 Gans, H. J. 甘斯
 Gappert, G. 加佩特
 Gardner, B. T. 加德纳
 Gardner, R. A. 加德纳
 Gardner, R. W. 加德纳
 Garfinkel, H. 加芬克尔
 Garfinkel, I. 加芬克尔
 Garnier, M. A. 加尼尔
 Garten, H. A. 加滕
 Gates, D. 盖茨
 Geer, B. 吉尔
 Geiger, J. 盖格
 Gelles, R. 盖利斯
 Genovese, L. E. 吉诺维斯
 Genovese, R. G. 吉诺维斯
 Georgianna, S. 乔治亚娜
 Gerard, K. 杰勒德
 Gerson, M. J. 格尔森
 Gerver, J. 杰弗
 Gettys, W. E. 格蒂斯
 Gibbons, D. C. 吉本斯
 Gibbs, J. P. 吉布斯
 Gibson, M. A. 吉布森
 Giddings, F. 吉丁斯
 Giesen, B. 吉森
 Gilbert, A. 吉尔伯特
 Gilbert, D. 吉尔伯特
 Gill, L. 吉尔
 Gill, S. 吉尔
 Gillette, H. Jr. 吉勒特
 Ginn, O. H. 吉恩

Ginsberg, B. 金斯伯格
 Ginsburg, R. B. 金斯伯格
 Gintis, H. 金提斯
 Giock, C. Y. 格勒克
 Girouard, M. 吉鲁阿尔
 Gittlin, T. 吉特林
 Glass, R. 格拉斯
 Glenn, C. L. 格伦
 Glenn, N. D. 格伦
 Glick, P. C. 格利克
 Gluckman, T. J. 格卢克曼
 Goddard, H. 戈达德
 Goffman, E. 戈夫曼
 Gold, M. 戈德
 Goldman, D. 戈德曼
 Goldsmith, S. 戈德史密斯
 Goldthorpe, J. H. 戈德索普
 Goleman, D. 戈勒曼
 Golembiewski, R. T. 戈比斯基
 Gonsoulin, S. M. 冈苏林
 Goode, E. 古德
 Goode, William J. 古德威廉
 Goodlad, John I. 古德兰约翰
 Goodman, K. L. 古德曼
 Goody, J. 古迪
 Gorbachev, M. 戈巴赫
 Gordon, D. 戈登
 Gordon, M. N. 戈登
 Gore, T. 戈尔
 Gorer, G. 戈勒尔
 Gornick, V. 戈尼克
 Goslin, D. A. 戈斯林
 Gottdiener, M. 戈特迪纳
 Gotman, J. 戈特曼
 Gough, K. 高夫
 Gould, M. S. 古尔德
 Gould, S. J. 古尔德
 Gouldner, A. W. 古尔德纳
 Gove, W. R. 戈夫
 Gracey, H. L. 格雷西
 Graham, B. 格雷厄姆
 Graham, S. 格雷厄姆
 Graham, T. W. 格雷厄姆

Grana, C. 格拉纳
Granovetter, M. 格兰诺维特
Grant, C. 格兰特
Graumann, C. F. 格劳曼
Gmy, F. 格雷
Grayson, B. 格雷森
Greeley, A. M. 格里利
Green, R. E. 格林
Greenberg, D. F. 格林伯格
Greenen, M. 格林
Greer, S. 格里尔
Gregory, P. 格雷戈里
Gribben, J. 格里本
Gribben, M. 格里本
Grier, E. 格里尔
Grier, G. 格里尔
Griffin, K. 格里芬
Gromkin, V. 格罗金
Gross, H. S. 格罗斯
Grossman, A. 格罗斯曼
Gugler, J. 古格勒
Gummer, B. 格默
Gurr, T. R. 格尔
Gusfield, J. R. 盖斯菲尔德
Habermas, J. 阿贝马斯
Hagen, E. E. 哈根
Hagestad, G. O. 赫基斯塔德
Hagstrom, W. O. 哈格斯特龙
Hainese, H. H. 海恩斯
Halberstam, D. 哈伯斯塔姆
Hall, E. T. 霍尔
Hall, G. S. 霍尔
Hall, R. H. 霍尔
Hall, T. D. 霍尔
Haller, M. 哈勒
Hallin, D. C. 哈林
Hamilton, C. V. 汉密尔顿
Hammes, S. 阿姆
Hammond, P. E. 哈蒙德
Handel, G. 汉德尔
Hannan, M. T. 汉南
Hansen, B. 汉森
Hardy, J. E. 哈迪

Hare, A. P. 黑尔
Harf, J. L. 哈福
Harkins, S. G. 哈金斯
Harlow, H. F. 哈洛
Harman, W. 哈曼
Harper, C. L. 哈珀
Harriman, E. 哈里曼
Harris, C. 哈里斯
Harris, C. C. 哈里斯
Harris, L. 哈里斯
Harris, M. 哈里斯
Harris, T. 哈里斯
Harrison, B. 哈里森
Harrison, P. 哈里森
Harry, J. 哈里
Hartmann, H. 哈特曼
Harvey, D. 哈维
Hastings, E. H. 黑斯廷斯
Hastings, P. K. 黑斯廷斯
Haub, C. 豪布
Hauser, R. M. 豪泽
Havighurst, R. J. 哈维格斯特
Hawkins, G. 霍金斯
Hawkins, J. N. 霍金斯
Hawley, A. 霍利
Hawley, W. 霍利
Hayes, R. 海斯
Hazdrigg, L. E. 赫兹尔里格
Hearn, F. 赫恩
Heer, D. M. 希尔
Heidensohn, F. 海德森
Heidensohn, R. 海德森
Heilbroner, A. B. Jr. 海尔布伦那
Heilbrun, M. R. 海尔布伦
Hemming, H. 亨明
Hempel, L. M. 亨普尔
Hendershot, G. 亨德里特
Henderson, H. W. 亨德森
Hendrick, C. 亨德里克
Hendricks, C. D. 亨德里克斯
Hendricks, J. 亨德里克斯
Hendry, J. 亨德里
Hendry, L. 亨德里

Henry, J. 亨利
 Henry, S. 亨利
 Henry, W. E. 亨利
 Hensler, C. P. 亨斯勒
 Hepburn, A. C. 赫伯恩
 Herbers, J. 赫伯斯
 Herrnstein, R. J. 赫恩斯坦
 Hersen, M. 赫森
 Hertel, B. 赫特尔
 Hertz, R. 赫茨
 Hiatt, S. 希亚特
 Hill, A. 希尔
 Hill, G. 希尔
 Hill, M. 希尔
 Hill, R. 希尔
 Hill, Reuben 希尔鲁本
 Hill, Richard Child 希尔里·查德·蔡尔德
 Hinds, M. 海因兹
 Hinkle, G. J. 欣克尔
 Hinkle, R. Jr. 欣克尔
 Hirsch, F. 赫希
 Hirschhorn, L. 赫希霍恩
 Hirschi, T. 伊尔希
 Hirschman, A. 赫希曼
 Hite, S. 海特
 Hochschild, A. 霍克斯希尔德
 Hockett, C. F. 霍基特
 Hodge, R. W. 霍奇
 Hoffer, T. 霍弗
 Hoffman, S. 霍夫曼
 Hoge, D. P. 霍根
 Hoge, D. R. 霍格
 Holland, D. C. 霍兰
 Hollinger, F. 霍林格
 Hollinger, R. C. 霍林格
 Hollinger, E. 霍林格
 Hollinmes, W. 霍林斯
 Homans, G. 霍曼斯
 Hon, M. 霍恩
 Honey, M. 霍尼
 Hooten, E. 胡滕
 Hoover, S. L. 胡佛
 Hoper, K. 霍珀

Hopkins, T. K. 霍普金斯
 Hopper, R. D. 霍珀
 Horn, P. 霍恩
 Horowitz, I. L. 霍维茨
 Horowitz, R. A. 霍维茨
 Hoselitz, B. F. 霍塞里茨
 Hotchkiss, L. 霍奇基斯
 Hough, J. C. Jr. 霍夫
 Houghland, J. G. 霍夫兰
 Hout, M. 乌特
 Howard, B. M. 霍华德
 Howard, M. C. 霍华德
 Howell, V. 豪厄尔
 Hoyt, H. 霍伊特
 Hubert, B. J. 休伯
 Hudson, R. 赫德森
 Hughes, James W. 休斯詹姆斯
 Hughes, John 休斯·约翰
 Hughes, M. 休斯
 Hughes, P. H. 休斯
 Hughes, E. C. 休斯
 Hull, R. 赫尔
 Humbard, R. 亨巴德
 Humphreys, L. 汉弗莱斯
 Hunt, Janet G. 亨特
 Hunt, Jennifer 亨特
 Hunt, L. L. 亨特
 Hunt, M. 亨特
 Hunter, J. D. 亨特
 Hutchings, B. 哈钦斯
 Hyman, H. H. 海曼
 Iga, M. 伊加
 Illich, I. 伊利克
 Imbrogno, N. I. 伊布洛格
 Imbrogno, S. 伊布洛格
 Inkeles, A. 英克尔斯
 Insko, C. A. 英斯科
 Irish, R. K. 艾里什
 Irvine, S. H. 欧文
 Israel, J. 伊斯雷尔
 Jacklin, C. N. 杰克林
 Jacksac, J. 杰克逊
 Jackson, E. 杰克逊

Jackson, K. T. 杰克逊
Jacobs, Jane 雅克布斯·珍妮
Jacobs, Jerry A. 雅克布斯杰里
Jacobson, J. L. 雅克布森
Jacobson, L. 雅克布森
Jain, U. 然
James, F. J. 詹姆斯
James, J. 詹姆斯
Janis, I. 贾尼斯
Janson, C. G. 詹森
Jaret, C. 加内特
Jay, 杰伊
Jefferson, T. 杰斐逊
Jencks, C. 詹克斯
Jenkins, J. C. 詹金斯
Jensen, A. 詹森
Jensen, G. 詹森
Johnetta, 约翰内特
John Paul II, P. 约翰保罗
Johnson, B. 约翰逊
Johnson, C. L. 约翰逊
Johnson, D. P. 约翰逊
Johnson, D. R. 约翰逊
Johnson, E. S. 约翰逊
Johnson, F. A. 约翰逊
Johnson, D. P. 约翰逊
Johnson, D. R. 约翰逊
Johnson, E. S. 约翰逊
Johnson, F. A. 约翰逊
Johnson, L. 约翰逊
Johnson, M. 约翰逊
Johnson, M. M. 约翰逊
Johnson, N. R. 约翰逊
Johnson, V. E. 约翰逊
Johnson, W. 约翰逊
Johnston, J. 约翰斯顿
Johnstone, R. L. 约翰斯通
Jolly, C. J. 乔利
Jones, J. 琼斯
Jones, James E. 琼斯詹姆斯
Jones, James E. 琼斯约瑟夫
Jordan, I. K. 乔丹
Jortad, E. 乔斯塔德

Jowett, G. S. 乔伊特
Jusenius, C. L. 居森流斯
Kagan, J. 卡根
Kahl, J. a. 卡尔
Kahn, A. J. 卡恩
Kahn, H. 卡恩
Kaiser, R. G. 凯泽
Kalleberg, 卡勒贝格
Kammerman, S. B. 卡梅尔曼
Kamin, L. J. 卡明
Kammeyer, K. C. 卡梅伊尔
Kandal, T. R. 坎达尔
Kanter, R. M. 坎特
Kantner, J. F. 坎特纳
Kantrowitz, B. 坎特罗威茨
Kasarda, J. D. 卡萨达
Kasselbaum, G. 卡斯鲍姆
Kasun, J. 卡逊
Katz, E. 卡茨
Katz, J. E. 卡茨
Katz, M. 卡茨
Kaul, J. D. 考尔
Kawaguchi, G. 考瓦古奇
Kear, K. 基尔
Keating, K. M. 基廷
Kell, J. B. 凯尔
Keller, C. M. 凯勒
Keller, J. F. 凯勒
Keller, S. 凯勒
Kellogg, S. 凯洛格
Kelly, S. D. 凯利
Keniston, K. 凯尼斯顿
Kennedy, J. F. 肯尼迪
Kennedy, P. 肯尼迪
Kennedy, R. 肯尼迪
Kentor, J. 肯特尔
Kephart, W. M. 克菲阿特
Kerckhoff, A. C. 克尔克霍夫
Kern, R. 克恩
Kerr, C. 克尔
Kessler, R. C. 凯斯勒
Keyness, J. M. 凯恩斯
Khalilzad, Z. 哈里扎德

Khomeini, A. R. 霍梅尼
 Khomcini, A. R. 基利安
 Khullar, G. S. 哈拉
 Kidder, L. 基德尔
 Kilgore, S. 基尔戈
 Kim, K. D. 金
 Kimball, 金博尔
 Kinch, J. W. 金奇
 Kinder, D. R. 金德
 King, D. 金
 King, H. 金
 King, M. L. J. 金
 King, R. 金
 Kingston, P. W. 金斯顿
 Kinzer, N. S. 金策尔
 Kirby, D. J. 柯比
 Kirkland, 柯克兰
 Kitano, H. H. L. 基坦罗
 Kitcher, P. 克切尔
 Kitovitch - Winer, N. 基托维切 - 温内
 Kitson, G. C. 基德森
 Kjoller, S. 乔勒
 Klass, P. 克拉斯
 Klassen, A. D. 克拉森
 Klein, J. C. 克莱因
 Klein, M. W. 克莱因
 Klein, S. S. 克莱因
 Kletke, P. R. 克勒特克
 Kluckhohn, C. 克拉克洪
 Kluegel, J. R. 克卢格尔
 Knight, Richard V. 奈特理查德
 Knight, Robin 奈特·罗宾
 Knodel, J. 诺德尔
 Kochen, M. 科克恩
 Kogan, N. 科根
 Kohn, A. 科恩
 Kohn, M. L. 科恩
 Kohut, A. 科胡特
 Komarovsky, M. 科马洛维基
 Konvitz, J. 科维茨
 Koresh, D. 科内什
 Korpi, W. 科彼
 Korte, C. 科特

Kotler, P. 科特勒
 Kovar, M. G. 科瓦
 Kraig, B. 卡拉奇
 Krashen, S. 卡拉森
 Krauskopf, J. A. 克劳斯科普夫
 Krauss, E. 克劳斯
 Kringle, E. 克林伦
 Krivo, L. J. 克里沃
 Krymkowski, D. H. 克里考斯基
 Kubler - Ross, E. 库布勒罗斯
 Kung, H. 金
 Kurren, G. M. 克伦
 Kushner, G. 库什纳
 Kutscher, R. 库切尔
 La, Torre R. P. 拉托尔
 Lai, K. H. 莱
 Lamb, M. E. 拉姆
 Land, 兰德
 Landaon, A. 兰达恩
 Landers, A. 兰德斯
 Landis, D. 兰迪斯
 Landis, J. 兰迪斯
 Landis, S. E. 兰迪斯
 Landy, J. 兰迪
 Lane, C. 莱恩
 Lane, D. 莱恩
 Langley, L. D. 兰利
 Lapidus, G. W. 拉皮德斯
 Larkin, R. 拉金
 Lasch, C. 拉希
 Laska, S. B. 拉斯卡
 Laslett, P. 拉斯莱特
 Latane, B. 拉塔内
 Lauriat, A. S. 劳里亚特
 Law, D. 劳
 Lawton, M. P. 劳顿
 Lazarsfeld, P. 拉扎斯菲尔德
 Leahy, P. 莱希
 Leba, A. T. 勒巴
 Leba, J. K. 勒巴
 Lebeaux, C. N. 勒博
 LeBon, G. 勒邦
 Lee, V. E. 李

Loggson, C. 莱贡
LeGrand, J. 勒格朗
Lehman, E. W. 莱曼
Leighton, B. 莱顿
Leishmann, K. 利什曼
Leland, J. 利兰
Lemann, N. 莱曼
Lemert, E. 雷梅特
Lenaghan, D. D. 莱纳冈
Lenaghan, M. J. 莱纳冈
Lengermann, P. M. 伦格曼
Lenin, V. I. 列宁
Lenski, G. E. 伦斯基
Lenski, J. 伦斯基
Leonard, E. B. 伦纳德
Lersch, R. 莱尔施
Levenson, R. L. Jr. 勒旺森
Levin, J. 勒万
Levine, J. A. 勒维纳
Levinger, G. 勒文热
Levinson, D. J. 勒文松
Levinson, M. 勒文松
Levi - Strauss, C. 莱维斯特劳斯
Levitt, E. E. 莱维特
Levy, F. 莱维
Levy, M. R. 利维
Lewis, O. 刘易斯
Lewontin, R. 雷温亭
Lickona, T. 里科那
Lieberman, M. A. 利伯曼
Liebert, R. M. 利伯特
Liebow, W. 利博
Light, D. W. 莱特
Lincoln, J. 林肯
Lindblom, C. 林德布朗
Lindheim, E. 林德海姆
Lindsey, 林赛
Lindzey, G. 林德泽伊
Link, B. G. 林克
Linton, R. 林克顿
Linz, D. G. 林茨
Lipman - Blumen, J. 李普曼布鲁门
Lippit, R. 利皮特

Lipset, M. N. 利普赛特
Lipset, S. M. 利普赛特
Litwak, E. 利特沃克
Locke, F. B. 洛克
Loehlin, J. 勒林
Lofland, J. 洛夫兰
Logan, J. R. 洛根
Lombroso, C. 隆布罗索
Lopata, H. Z. 洛帕塔
Lounsbury, J. W. 克恩斯伯里
Loverman, G. 洛夫曼
Lowry, I. S. 劳里
Luckenbill, D. F. 卢肯比尔
Luckmann, T. 卢肯曼
Ludeman, K. 吕肯曼
Luker, K. 卢克
Luker, R. 卢克
Lumley, 拉姆利
Lund, D. A. 伦德
Lundin, T. 伦丁
Luria, Z. 卢里亚
Lynch, J. P. 林奇
Lynd, H. M. 林德
Lynd, R. S. 林德
Lynn, L. E. Jr. 林恩
Lynn, N. B. 林恩
Lyon, L. 莱昂
Lystard, M. 利斯塔尔
Machilis, G. E. 麦克希尔斯
Machung, A. 麦克琴
MacKay, C. 麦凯
Mackinnon, C. E. 麦金农
Maddox, G. R. 麦马多克斯
Madonna, 马多纳
Madsen, R. 马德森
Magaziner, 马格兹里尔
Mailer, N. 梅勒
Mailor, R. 马洛伊
Malmaud, R. K. 马尔毛德
Malthus, T. R. 马尔萨斯
Mandela, N. 曼德拉
Manning, P. K. 曼宁
Mao Zedong, 毛泽东

Marconi, K. M. 马科尼
 Marder, W. D. 马德
 Marger, M. N. 马杰
 Margolis, M. L. 马戈利斯
 Maris, R. W. 马里斯
 Markowski, E. M. 马科斯基
 Marks, J. S. 马克斯
 Marlin, J. T. 马林
 Marrett, C. B. 马雷
 Martin, B. 马丁
 Martin, D. 马丁
 Martin, J. 马丁
 Martin, L. J. 马丁
 Martin, M. T. 马丁
 Marx, K. 马克思
 Masnick, G. S. 马斯尼克
 Massagli, M. P. 马萨奇里
 Masters, W. H. 马斯特斯
 Mathis, E. 马西斯
 Mathisen, G. S. 马西森
 Mathisen, J. A. 马西森
 Matras, J. 马特斯
 Matza, D. 马茨扎
 McCarthy, J. 麦卡锡
 McCarthy, L. 麦卡锡
 McClelland, D. G. 麦克莱兰
 Mccoby, E. E. 麦科比
 McConahay, J. B. 麦科纳希
 McCord, A. 麦科德
 McCord, W. 麦科德
 McCormick, T. 麦科马克
 McCreary, L. 麦克里里
 McCullough, C. 麦卡洛
 McCummings, B. I. 麦卡明斯
 McFalls, J. A. 麦克福尔斯
 McIntosh, W. A. 麦金托什
 McKay, H. O. 麦凯
 McKeachie, W. J. 麦基尔
 McKenzie, R. D. 麦肯齐
 McKeon, T. 麦基翁
 McKinley, J. 麦金利
 McKinney, W. 麦金尼
 McLanahan, S. S. 麦克拉纳汉

McLuhan, M. 麦克卢汉
 McNeil, K. 麦克尼尔
 McPhail, C. 麦克菲尔
 McPherson, A. S. 麦克弗森
 McQuail, D. 麦克奎尔
 McTaggart, D. 麦克塔格特
 Mead, G. H. 米德
 Mead, L. M. 米德
 Mead, M. 米德
 Meadows, Dennis L. 梅多斯·丹尼斯
 Meadows, Donella. 梅多斯·唐奈拉
 Mechanic, D. 梅堪里克
 Mednick, S. 梅德里克
 Medoff, J. 梅多夫
 Melville, K. 梅尔维尔
 Merrick, T. W. 梅里克
 Merton, R. W. 默顿
 Mctheny, E. 梅思尼
 Meyer, H. 迈耶
 Meyrowitz, J. 梅罗维茨
 Mibrath, L. 米尔布雷思
 Miceli, M. P. 米塞利
 Michalowicz, J. 米恰诺维茨
 Michel, R. C. 米歇尔
 Michels, R. 米歇尔斯
 Middleton, R. 米德尔顿
 Miles, M. B. 迈尔斯
 Milgram, S. 米尔格朗
 Miliband, R. 米尔班德
 Miller, David 米勒·戴维
 Miller, Delbert C. 米勒德尔伯特
 Miller, J. E. 米勒
 Miller, S. M. 米勒
 Miller, W. F. 米勒
 Miller, Z. 米勒
 Miller-Jones, D. 米勒琼斯
 Mills, C. W. 米尔斯
 Minor, W. W. 迈纳
 Mintz, S. 明茨
 Mishel, L. 米什尔
 Mitchell, R. 米切尔
 Mitroff, I. I. 米罗夫
 Molotch, H. 摩诺克

Momeni, J. A. 摩蒙尼
Mondale, W. 蒙代尔
Monette, D. P. 蒙尼特
Money, J. A. 莫尼
Moon, S. M. 穆恩
Mooney, L. A. 穆尼
Moore, D. R. 穆尔
Moore, J. W. 穆尔
Moore, J. A. 穆尔
Moore, T. E. 穆尔
Moore, W. E. 穆尔
Moreland, J. 莫兰
Moreland, L. W. 莫兰
Morgan, G. G. 摩根
Morgan, L. H. 摩根
Morison, R. S. 莫里森
Morris, D. 莫里斯
Morris, P. A. 莫里斯
Morrison, R. L. 莫里森
Mosatche, H. 莫萨克
Mosca, G. 莫斯卡
Mowery, D. 莫厄里
Moyer, M. M. 莫耶
Moynihan, D. P. 莫伊尼汉
Mozart, W. A. 莫扎特
Muekker, C. W. 米勒
Mueller, G. 米勒
Muellerr, J. 米勒
Muller - Wille, L. 米勒威尔
Mumford, L. 芒福德
Muncy, R. L. 芒西
Munnell, A. 曼内尔
Murdock, G. P. 默多克
Murphy, M. D. 默菲
Murray, C. 默里
Muscovici, S. 默斯科维茨
Mussen, P. H. 马森
Musto, D. 马斯托
Myrdal, G. 迈戴尔
Nadelman, E. 纳德尔曼
Nadelson, C. C. 纳德尔森
Nadclson, T. 纳德尔森
Nader, R. 纳德

Naipaul, S. 纳泊尔
Nairn, A. 奈恩
Naisbitt, J. 奈斯比特
Nash, J. 纳什
Natarian, R. 纳塔里
Natriello, G. 那特罗
Near, J. P. 尼尔
Nelson, B. N. 纳尔逊
Ness, I. 内斯
Neuendorf, K. 诺伊恩多夫
Neugarten, B. L. 纽加顿
Newcomb, T. M. 纽科姆
Newell, C. 纽厄尔
Newman, K. S. 纽曼
Newport, F. 纽波特
Nida, S. A. 尼达
Nie, N. 尼
Niebuhr, H. R. 尼布尔
Niemi, R. C. 尼米
Nisbet, R. A. 尼斯比特
Nixon, H. L. 尼克松
Nixon, R. 尼克松
Noble, T. 诺布尔
Nock, S. L. 诺克
Noell, J. 诺埃尔
Nolan, P. 诺兰
Nordhaus, W. 诺德豪斯
Nordhy, F. 诺迪
Nordie, P. G. 诺尔迪耶
Nordlinger, E. 诺德林格
Norris, W. P. 诺里斯
Nove, A. 诺夫
Nowak, K. 诺瓦克
O, Conner, S. D. 奥康纳
O, Connor, J. 奥康纳
O, Connor, P. J. 奥康纳
O, Rand, A. M. 奥朗
O. Hare, W. P. 奥黑尔
O. Toole, R. 奥图尔
Oakcs, J. 奥克斯
Obersschall, A. 奥贝沙尔
Offe, C. 奥费
Ogburn, W. 奥克本

Ohlin, L. E. 奥林
 Oldham, G. R. 奥尔德姆
 Olsen, L. 奥尔森
 Olsen, M. E. 奥尔森
 Ornstein, A. C. 奥恩斯坦
 Ornstein, N. 奥恩斯坦
 Orthner, D. K. 奥尔托内
 Orum, A. 奥鲁姆
 Osherson, S. 奥谢尔森
 Ostrander, S. A. 奥斯特兰德
 Othman - Chande, M. 奥斯曼 - 堪德
 Otten, M. W. 奥滕
 Ouchi, W. G. 乌奇
 Paalgi, M. 帕奇
 Page, C. H. 帕日
 Page, E. 帕日
 Paige, J. M. 佩奇
 Paight, D. J. 派特
 Pallas, A. M. 帕拉斯
 Palmer, C. E. 帕尔默
 Palmer, E. L. 帕尔默
 Pampel, F. 潘贝尔
 Parelus, A. P. 帕雷利于斯
 Parelus, R. J. 帕雷利于斯
 Parenti, M. 帕朗蒂
 Pareto, V. 帕雷托
 Park, R. E. 帕克
 Parker, R. 帕克
 Parkin, F. 帕金
 Parkinson, C. N. 帕金森
 Parnes, H. S. 帕纳
 Parrot, A. 帕罗特
 Parrton, D. 帕顿
 Parsons, T. 帕森斯
 Partridge, W. L. 帕特里奇
 Passel, J. S. 帕斯
 Passow, A. H. 帕索
 Patel, D. 帕特尔
 Paternoster, R. 佩特诺斯特
 Patinigin, M. 帕亭金
 Paul, A. 保罗
 Peers, J. 皮尔斯
 Pelto, P. J. 佩尔托

Pelton, J. N. 佩尔顿
 Perevudentev, V. I. 佩雷温登
 Perkins, H. W. 珀金斯
 Perot, H. R. 佩罗特
 Perrow, C. 佩罗
 Perry - Jenkins, M. 佩里詹金斯
 Persell, C. H. 佩塞尔
 Pescosolido, B. A. 佩科索里多
 Peter, L. J. 彼得
 Peterman, D. 彼得曼
 Peterson, W. 彼得森
 Petranek, C. F. 彼特兰克
 Pettigrew, T. F. 彼蒂格鲁
 Pfeffer, J. 普法伊费尔
 Pfuhl, E. H. Jr. 普夫尔
 Phillips, D. P. 菲利普斯
 Piaget, J. 皮亚杰
 Picharro, N. A. 皮恰罗
 Pieraccini, T. 派那奇尼
 Pines, M. 派尼斯
 Pinkney, A. 潘克内
 Fiore, M. 派奥
 Pirenne, H. 皮雷纳
 Piven, F. F. 派温
 Platt, G. M. 普拉特
 Platt, J. 普拉特
 Pleck, J. H. 普雷克
 Plessix, F., du 普莱西
 Plog, F. 普罗格
 Pol, L. G. 波尔
 Polacheck, S. 波拉切克
 Polek, D. 波莱克
 Pool, J. G. 普尔
 Pope, W. 波普
 Popenoe, D. 波普诺
 Popham, J. W. 波帕姆
 Popkin, S. J. 波普金
 Popple, P. 波普勒
 Porter, B. D. 波特
 Portes, A. 波泰尔
 Postman, N. 波斯特曼
 Pott, P. 波特
 Poulantzas, N. 鲍兰扎斯

Powell, C. 鲍威尔
 Premack, D. 普雷马克
 Presley, E. 普雷利(莉)
 Press, A. 普雷斯
 Presser, S. 普雷斯特
 Provenzano, F. J. 普罗文扎罗
 Pullin, D. 皮尔林
 Quarantelli, F. I. 夸兰特里
 Raab, E. 拉布
 Rabb, T. 拉布
 Radcliffe-Brown, A. R. 拉德克里夫-布朗
 Rae, B. 雷
 Raine, P. 雷纳
 Rainwater, L. 雷恩沃特
 Rapoport, Robert 拉波波尔
 Rapoport, Robert 拉波波尔
 Raskin, M. G. 拉斯坎
 Raunika, R. 劳里卡
 Raymond, E. 雷蒙
 Raywid, M. A. 雷维德
 Reagan, R. 里根
 Reckless, W. 雷克利斯
 Redburn, F. S. 雷德本
 Reeder, L. G. 里德
 Reep, D. C. 里普
 Reese, C. A. 里斯
 Reich, C. A. 赖克
 Reich, R. 赖克
 Rein, I. J. 兰
 Reinharz, S. 雷哈兹
 Reiss, A. J. Jr. 赖斯
 Repetto, R. 雷普托
 Reskin, B. F. 雷斯金
 Resler, H. 雷斯勒
 Resnick, D. P. 雷斯尼克
 Resnick, L. B. 雷斯尼克
 Reynolds, D. 雷诺兹
 Reynolds, V. 雷诺兹
 Riche, M. F. 里什
 Ridley, C. 里德利
 Riesman, D. 里斯曼
 Rigler, D. 里格勒
 Rigler, M. 里格勒

Riley, M. W. 赖利
 Ringelmann, 林格尔曼
 Rist, M. C. 里斯特
 Ritzer, G. 利茨尔
 Rivlin, A. M. 里夫林
 Rix, S. E. 里克斯
 Roach, M. J. 罗奇
 Robbins, T. 罗宾斯
 Roberts, O. 罗伯特
 Robinson, H. 鲁宾逊
 Robinson, J. P. 鲁宾逊
 Robinson, R. V. 鲁宾逊
 Rockefeller, J. D. 洛克菲勒
 Rodgers, H. R. Jr. 罗杰斯
 Rockbuck, J. 罗马克
 Roethlisberger, F. J. 罗特利斯伯格
 Rogers, D. E. 罗杰斯
 Rokeach, M. 罗克赫
 Roniger, L. 罗尼格
 Roof, W. C. 鲁夫
 Roopnarine, J. L. 罗普那恩
 Roos, P. A. 罗斯
 Roosevelt, F. D. 罗斯福
 Rosa, E. A. 罗莎(女名); 罗萨
 Rose, A. M. 罗斯
 Rose, S. 罗斯
 Roscfield, A. 罗森菲尔德
 Rosen, M. 罗森
 Rosenberg, C. E. 罗森贝格
 Rosenberg, D. 罗森贝格
 Rosenberg, M. 罗森贝格
 Rosenblum, S. 罗森布卢姆
 Rosenfeld, R. A. 罗森菲尔德
 Rosenstone, S. 罗森斯通
 Rosenthal, R. 罗森塔尔
 Rosnow, R. L. 罗斯诺
 Ross, A. A. 罗斯
 Ross, H. L. 罗斯
 Rossell, C. H. 罗塞尔
 Rossi, A. S. 罗西
 Rossia, P. H. 罗西
 Rossides, D. M. 罗西德斯
 Rostow, W. W. 罗斯托

Rotberg, R. 罗特贝格
 Rothman, B. K. 罗特曼
 Rothman, R. 罗特曼
 Rothstein, S. W. 罗特斯坦
 Rowan, R. 罗恩
 Rubel, R. 吕贝尔
 Rubin, J. Z. 吕班
 Rubin, Lenoire 吕班勒努瓦
 Rubin, Lillian, Breslow 吕班莉莲布雷斯洛
 Rumbaut, R. G. 罗姆鲍特
 Rushdie, S. 罗什迪
 Ryan, L. 瑞安
 Ryan, W. 瑞安
 Ryder, J. 赖德
 Sabel, C. 萨贝尔
 Sadker, D. 塞科
 Sadker, M. 塞科
 Safir, M. 萨菲尔
 Sagarin, E. 萨格林
 Sahlins, M. 沙尔林斯
 Sakurachi, Y. 沙库劳奇
 Salancik, G. R. 沙兰克
 Saltzman, L. 萨尔茨曼
 Samuelson, P. 萨缪尔森
 Sanders, R. J. 桑德斯
 Sanford, S. K. 桑福德
 Sanford, M. J. 桑福德
 Sanjian, A. S. 桑坚
 Sapir, E. 萨皮尔
 Sapiro, V. 萨皮罗
 Sarbin, T. 沙宾
 Saunders, J. 桑德斯
 Saunders, P. 桑德斯
 Savageau, D. 萨瓦若
 Sawhill, I. V. 索希尔
 Scanlan, C. 斯坎伦
 Scargill, D. I. 斯卡基尔
 Schaedel, R. P. 舍德尔
 Schatzman, L. 沙茨曼
 Schein, E. 沙因
 Schiff, M. 希夫
 Schlagentokh, V. 施拉朋多克
 Schneider, J. W. 施奈德

Schneider, M. 施奈德
 Schneller, R. 舍勒
 Schofield, R. 斯科菲尔德
 Schopflin, G. 朔普夫林
 Schultz, S. 舒尔茨
 Schur, F. M. 舒尔
 Schutz, A. 舒尔茨
 Schwab, K. 施瓦布
 Schwartz, B. 施瓦茨
 Schwartz, F. N. 施瓦茨
 Schwartz, P. 施瓦茨
 Schwartz, W. 施瓦茨
 Schwebel, A. I. 施韦贝尔
 Schweinhart, L. J. 施魏因哈特
 Schwirian, K. P. 施魏连恩
 Scitovsky, A. A. 施托维基
 Scott, A. J. 斯科特
 Scott, W. R. 斯科特
 Seale, B. 西尔
 Sears, D. O. 西尔斯
 Seeman, M. 西曼
 Segst, E. 塞奇斯特
 Segnit, S. 塞奇里特
 Selassie, H. 塞拉希
 Selvin, H. C. 塞尔文
 Semyonov, M. 塞约挪吾
 Sewell, W. H. 休厄尔
 Shaffer, D. 谢弗
 Shaffer, J. 谢弗
 Shanas, E. 谢挪斯
 Shapiro, R. M. 夏皮罗
 Shaw, C. R. 肖
 Shaw, J. W. 肖
 Shaw, M. E. 肖
 Shechy, G. 希伊
 Sheldon, W. H. 谢尔登
 Shepherd, J. 谢菲尔
 Sherif, C. 谢里夫
 Sherif, M. 谢里夫
 Sherwood, Mrs. J. 舍伍德
 Shibutan, T. 斯布坦
 Shils, E. A. 希尔斯
 Shinagawa, L. H. 辛那加瓦

- Short, J. F. 肖特
 Shreve, A. 施里夫
 Shryrock, H. S. 夏洛克
 Sibel, V. W. 赛德尔
 Sibley, E. 西布利
 Sidcl, R. 赛德尔
 Siegal, M. 西格尔
 Siegel, J. S. 西耶热格(法)
 Siegel, P. M. 西耶热格(法)
 Sigelman, L. 西格尔曼
 Signoriellei, N. 西格罗里勒尔
 Silberg, N. T. 西尔贝格
 Silberger, A. B. 西尔贝格尔
 Silberman, C. E. 西尔伯曼
 Silk, M. 西尔克
 Sills, D. 西尔斯
 Silver, H. 西尔韦
 Silverman, C. J. 西尔韦曼
 Simenauer, D. 西梅瑙尔
 Simmel, G. 西梅尔
 Simmons, R. 西蒙斯
 Simon, B. L. 西蒙
 Simon, J. L. 西蒙
 Simon, R. 西蒙
 simon, T. 西蒙
 Simpson, G. E. 辛普森
 Singer, E. 桑热
 Singer, J. 桑热
 Sioberg, G. 希欧贝格
 Skevky, E. 斯克基
 Skidmore, R. A. 斯基德莫尔
 Skinner, B. F. 斯金纳
 Skocpol, T. 斯科波尔
 Skogan, W. G. 斯科甘
 Skolnick, J. 斯科尔尼克
 Sleeter, C. E. 斯里特
 Smelser, N. J. 斯梅尔塞
 Smelser, R. 斯梅尔塞
 Smith, A. E. 史密斯
 Smith, D. H. 史密斯
 Smith, G. F. 史密斯
 Smith, J. 史密斯
 smith, M. P. 史密斯
 Smith, P. A. 史密斯
 Smith, R. E. 史密斯
 Smith, R. H. 史密斯
 Smith, T. W. 史密斯
 Snow, D. A. 斯诺
 Snyder, B. R. 斯奈德
 Snyder, T. D. 斯奈德
 So, A. Y. 索奥
 Sokolovsky, J. 索科洛夫斯基
 Solomon, L. C. 所罗门
 Sorensen, A. B. 索伦森
 Sorokin, P. A. 索罗金
 Soule, W. T. 苏莱
 Sowell, T. 索厄尔
 Spade, J. Z. 斯帕德
 Spain, D. 斯佩恩
 Spates, J. L. 斯帕特斯
 Speare, A. Jr. 斯皮尔
 Speer, L. K. 斯皮尔
 Spencer, H. 斯宾塞
 Spender, D. 斯彭德
 Spengler, O. 斯彭格勒
 Spiro, M. E. 斯皮罗
 Spiro, S. E. 斯皮罗
 Spitz, R. A. 施皮茨
 Sprafkin, J. 施普那夫金
 Spuhler, J. N. 施普勒
 Stabler, J. R. 斯特布勒
 Stack, C. B. 斯塔克
 Stack, J. F. Jr. 斯塔克
 Stack, S. 斯塔克
 Stagner, R. 斯塔格纳
 Stamos, S. C. Jr. 斯托莫斯
 Stanton, E. C. 斯坦顿
 Staples, P. 斯特普尔斯
 Stark, E. 斯塔克
 Stark, R. 斯塔克
 Starr, P. 斯塔尔
 Stauffer, J. 斯托弗
 Stavrianos, L. S. 斯塔连诺斯
 Steed, R. S. 斯蒂德
 Steele, S. 斯蒂尔
 Steffensmeier, D. J. 斯蒂芬斯迈耶

Stein, B. 斯坦
 Stein, M. I. 斯坦
 Steiner, G. Y. 斯泰纳
 Steinem, G. 斯登姆
 Steinmetz, S. K. 斯坦内茨
 Stephens, J. 斯蒂芬斯
 Sternlieb, G. 斯登列伯
 Stevens, W. K. 史蒂文斯
 Steward, J. 斯图尔德
 Sticht, T. G. 斯蒂奇特
 Stockard, J. 斯托卡德
 Stoeckle, J. 斯托克利
 Stoller, M. 斯托勒
 Stone, A. 斯通
 Stone, J. 斯通
 Stoner, J. A. F. 斯托那
 Storn, P. 斯特恩
 Stouffer, S. A. 斯道夫
 Stowe, H. B. 斯托
 Strasburger, V. C. 斯特兰斯伯格
 Straus, M. A. 斯特劳斯
 Strauss, A. L. 斯特劳斯
 Streifel, C. 斯特菲尔
 Strodtbeck, F. L. 斯多特贝
 Strong, J. 特朗
 Stuart, R. 斯图尔特
 Sugden, J. 萨格登
 Sullivan, W. M. 沙利文
 Sullivan, G. L. 沙利文
 Sullivan, T. J. 沙利文
 Sumner, G. 萨默
 Sumner, W. G. 萨姆纳
 Sutcliffe, A. 萨克利夫
 Sutherland, E. H. 萨瑟兰
 Suttles, G. 萨特尔斯
 Sutton, F. X. 萨顿
 Suzman, R. 苏兹曼
 Swaggart, J. 斯沃加特
 Swanson, G. 斯旺森
 Swidler, A. 斯威德勒
 Sykes, G. M. 赛克斯
 Syme, S. L. 赛姆
 Szalai, J. 莎赖

Szymanski, K. 席曼斯基
 Tajfel, H. 泰杰菲尔
 Tannahill, R. 坦纳希尔
 Tannen, D. 坦南
 Tavis, C. 塔夫里斯
 Taylor, A. S. 泰勒
 Taylor, E. 泰勒
 Taylor, H. 泰勒
 Telcsky, C. 泰勒斯基
 Teixeira, R. 特克舍拉
 Terman, L. M. 特曼
 Terrance, H. S. 特雷斯
 Terrell, K. 特雷尔
 Terry, R. M. 特里
 Teutsch, S. M. 迪兹
 Thackeray, G. 撒克里
 Thatcher, M. 撒切尔
 Theen, R. H. W. 特厄恩
 Thernstrom, S. 腾斯特朗
 Thomas, C. 托马
 Thomas, D. S. 托马
 Thomas, W. I. 托马
 Thompson, W. E. 汤普森
 Thornton, A. 托恩东
 Thornton, W. 托恩东
 Thornton, R. 托恩东
 Tiger, L. 蒂热
 Tilly, C. 蒂莉
 Timar, T. 蒂马
 Timberlake, M. 廷伯莱克
 Timpane, P. M. 廷潘
 Tipton, S. M. 蒂普顿
 Tittle, C. R. 蒂特尔
 Tobin, S. S. 托宾
 Toffler, A. 托夫勒
 Tomeh, A. K. 托梅
 Tonnies, F. 托尼
 Toqueville, A. de 托克维尔
 Tordella, S. J. 托德拉
 Torrey - Purta, J., 托毕珀塔
 Toynbee, A. 汤因比
 Traveers, J. 特拉韦尔
 Treas, J. 特雷斯

Treiman, D. J. 特雷曼
 Trimble, J. E. 特林布尔
 Troeltsch, E. 特勒尔奇
 Trow, M. 特罗
 Trusheim, D. 特那舍姆
 Truxillo, D. M. 特那克斯罗
 Tsui, K. Y. 隋
 Tuchman, G. 塔奇曼
 Tully, J. C. 塔利
 Tumlin, M. M. 图明
 Turk, A. T. 蒂尔克
 Turlove, C. 特洛伍
 Turnbull, C. 特恩布尔
 Turner, B. F. 特纳
 Turner, J. H. 特纳
 Turner, R. H. 特纳
 Tyler, G. Jr. 泰勒
 Tyler, L. E. 泰勒
 Tyler, W. B. 泰勒
 Tynan, E. A. 泰南
 Tyree, A. 泰里
 Ucko, L. G. 乌克罗
 Ucko, P. J. 乌克罗
 Ullman, 于尔曼
 Vago, S. 瓦戈
 Vallery, R. 瓦雷利
 Valentine, C. A. 瓦伦丁
 Van, Hasselt V. B. 范哈赛尔特
 Van, den, Berghe, P. L. 范登伯格
 Van, Dyke, D. 范戴克
 Van, Oudenhoven, J. P. 范奥登霍文
 Vance, J. E. Jr. 万斯
 Vandivort, R. 范迪福特
 Vanfossen, B. E. 范福森
 Veblen, T. 维布伦
 Veit, L. A. 维特
 Verba, S. 维巴
 Veysey, L. 维齐
 Vidich, A. 维迪奇
 Vogel, E. 沃格尔
 Wachtel, P. 瓦克特爾
 Wade, C. 瓦德
 Wagley, C. 瓦格利

Walczak, D. 瓦尔扎克
 Waldo, G. P. 沃尔多
 Waldrop, J. 沃尔德罗普
 Walker, E. M. 沃克
 Walker, J. C. 沃克
 Wall, R. 沃尔
 Wallace, A. F. C. 华莱士
 Wallace, G. 华莱士
 Wallace, R. 华莱士
 Wallach, M. A. 沃利奇
 Waller, W. 瓦莱
 Wallerstein, I.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J. S. 沃勒斯坦
 Walster, E. 沃尔斯特
 Walster, W. G. 沃尔斯特
 Walton, J. 沃尔顿
 Walzer, M. 沃尔泽
 Walum, 瓦莱姆
 Ward, D. A. 沃德
 Ward, L. 沃德
 Waring, J. 韦林
 Warner, W. L. 沃纳
 Warren, R. L. 沃伦
 Warwick, D. P. 沃里克
 Washington, G. 华盛顿
 Watson, R. 沃森
 Watson, T. 沃森
 Weatherford, M. S. 韦瑟福德
 Weaver, C. N. 韦弗
 Webb, H. J. 韦布
 Weber, M. 韦伯
 Weber, S. 韦伯
 Webster, P. 韦伯斯特
 Webster, S. 韦伯斯特
 Weick, K. 韦克
 Weeks, J. R. 威克斯
 Weikart, D. P. 韦克特
 Weinstein, G. W. 魏因斯坦
 Weis, R. S. 魏斯
 Weisbrod, C. 魏斯布罗德
 Weiss, C. H. 魏斯
 Weiss, R. 魏斯
 Weissberg, R. 魏斯贝格

Weisskopf, T. 魏斯科普夫
 Wellman, B. 韦尔曼
 Wells, H. G. 韦尔斯
 Were, Miriam K. 沃尔米里亚姆
 Wershow, H. J. 威肖
 Wertheimer, B. M. 沃特海姆
 Westergaard, J. 韦斯特加德
 Westermarck, E. A. 韦斯特马克
 Westley, W. A. 韦斯特利
 Westoff, C. F. 韦斯托夫
 Whalen, M. R. 惠伦
 Wheeler, J. P. 惠勒
 Wheeler, M. 惠勒
 Wheeler, M. 惠勒
 White, L. K. 怀特
 White, R. K. 怀特
 White, S. B. 怀特
 Whitehouse, R. 怀特豪斯
 Whiting, B. B. 惠特
 Whitmore, J. 惠特莫尔
 Whorf, B. L. 沃夫
 Whyte, W. F. 怀特
 Wicklund, R. A. 威克伦德
 Wierzbicka, A. 威尔兹比卡
 Wiggins, L. M. 威金斯
 Wilensky, H. L. 威伦斯基
 Wilkie, J. R. 威尔基
 Willemsen, T. M. 威伦森
 William the Conqueror, 威廉一世
 Williams, A. M. 威廉斯
 Williams, C. J. 威廉斯
 Williams, D. A. 威廉斯
 Williams, J. R. 威廉斯
 Williams, John, E. 威廉斯约翰
 Williams, Tuan ita, H. 威廉斯
 Williams, K. 威廉斯
 Williams, K. D. 威廉斯
 Williams, L. M. 威廉斯
 Williams, R. M. Jr. 威廉斯
 Williams, S. 威廉斯
 Williamson, J. B. 威廉森
 Williamson, M. H. 威廉森
 Willie, C. V. 威利

Willis, P. 威利斯
 Williamson, D. E. 威廉森
 Willmott, P. 威尔莫特
 Wills, J. S. 威尔斯
 Wilner, D. M. 威尔纳
 Wilson, D. A. 威尔逊
 Wilson, D. S. 威尔逊
 Wilson, E. O. 威尔逊
 Wilson, J. Q. 威尔逊
 Wilson, W. J. 威尔逊
 Wilson, E. 威尔逊
 Wirth, L. 威斯
 Wiseman, J. P. 威斯曼
 Wlum, L. R. 伦
 Wolfinger, R. 沃尔芬格
 Wohlstein, R. T. 沃尔斯坦
 Wolf, A. 沃尔夫
 Wolf, E. 沃尔夫
 Wolfe, W. C. 沃尔夫
 Wolff, K. H. 沃尔夫
 Wollstonecraft, M. 沃斯通克拉夫特
 Wood, F. W. 伍德
 Wood, W. 伍德
 Woodrow, K. A. 伍德洛
 Woodson, R. 伍德森
 Woodward, H. N. 伍德沃德
 Woodward, K. L. 伍德沃德
 Worell, J. 沃勒尔
 Worell, A. 沃勒尔
 Wortley, S. 沃特利
 Wright, 赖特
 Wright, E. O. 赖特
 Wright, J. D. 赖特
 Wrong, D. H. 朗
 Wurtzel, E. 沃泽尔
 Wuthnow, R. 伍斯洛
 Yalom, I. D. 雅罗姆
 Yampolsky, H. B. 雅波尔斯基
 Yankelovich, D. 扬克洛维奇
 Yanowitch, M. 扬洛维奇
 Yeltsin, B. 也尔辛
 Yin, P. 英
 Yinger, J. M. 英格尔

Young, M. 扬
Yu, V. W. S. 余/于
Yuchtman - Yaar, E. 于兹曼 - 雅阿
Zabrack, 扎布雷克
Zaccaro, S. J. 扎卡罗
Zald, M. 扎尔德
Zaman, M. Q. 扎曼
Zarbatany, L. 扎巴坦尼
Zaretsky, E. 扎雷斯基
Zastrow, C. 扎斯特罗
Zeedyk - Ryan, J. 兹戴克 - 雷安

Zelnick, M. 泽尼克
Zimbardo, P. 齐默巴多
Zimmerman, G. G. 齐默尔曼
Zimmerman, D. H. 齐默尔曼
Zimring, F. E. 齐默林
Zola, I. K. 左拉
Zolberg, A. 左尔伯格
Zuboff, S. 佐伯夫
Zuckerman, H. 齐克尔曼
Zukin, S. 佐金
Zysman, J. 兹斯曼

Young, M. 扬
Yu, V. W. S. 余/于
Yuchtman - Yaar, E. 于兹曼 - 雅阿
Zabrack, 扎布雷克
Zaccaro, S. J. 扎卡罗
Zald, M. 扎尔德
Zaman, M. Q. 扎曼
Zarbatany, L. 扎巴坦尼
Zaretsky, E. 扎雷斯基
Zastrow, C. 扎斯特罗
Zeedyk - Ryan, J. 兹戴克 - 雷安

Zelnick, M. 泽尼克
Zimbardo, P. 齐默巴多
Zimmerman, G. G. 齐默尔曼
Zimmerman, D. H. 齐默尔曼
Zimring, F. E. 齐默林
Zola, I. K. 左拉
Zolberg, A. 左尔伯格
Zuboff, S. 佐伯夫
Zuckerman, H. 齐克尔曼
Zukin, S. 佐金
Zysman, J. 兹斯曼

Young, M. 扬
Yu, V. W. S. 余/于
Yuchtman - Yaar, E. 于兹曼 - 雅阿
Zabrack, 扎布雷克
Zaccaro, S. J. 扎卡罗
Zald, M. 扎尔德
Zaman, M. Q. 扎曼
Zarbatany, L. 扎巴坦尼
Zaretsky, E. 扎雷斯基
Zastrow, C. 扎斯特罗
Zeedyk - Ryan, J. 兹戴克 - 雷安

Zelnick, M. 泽尼克
Zimbardo, P. 齐默巴多
Zimmerman, G. G. 齐默尔曼
Zimmerman, D. H. 齐默尔曼
Zimring, F. E. 齐默林
Zola, I. K. 左拉
Zolberg, A. 左尔伯格
Zuboff, S. 佐伯夫
Zuckerman, H. 齐克尔曼
Zukin, S. 佐金
Zysman, J. 兹斯曼

Young, M. 扬
Yu, V. W. S. 余/于
Yuchtman - Yaar, E. 于兹曼 - 雅阿
Zabrack, 扎布雷克
Zaccaro, S. J. 扎卡罗
Zald, M. 扎尔德
Zaman, M. Q. 扎曼
Zarbatany, L. 扎巴坦尼
Zaretsky, E. 扎雷斯基
Zastrow, C. 扎斯特罗
Zeedyk - Ryan, J. 兹戴克 - 雷安

Zelnick, M. 泽尼克
Zimbardo, P. 齐默巴多
Zimmerman, G. G. 齐默尔曼
Zimmerman, D. H. 齐默尔曼
Zimring, F. E. 齐默林
Zola, I. K. 左拉
Zolberg, A. 左尔伯格
Zuboff, S. 佐伯夫
Zuckerman, H. 齐克尔曼
Zukin, S. 佐金
Zysman, J. 兹斯曼